

Five Families

The Rise, Decline, and Resurgence of America's Most Powerful Mafia Empires

五大家族

黑手党帝国兴衰史

(美) 塞尔温·赖布 著 程涛 钱坤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e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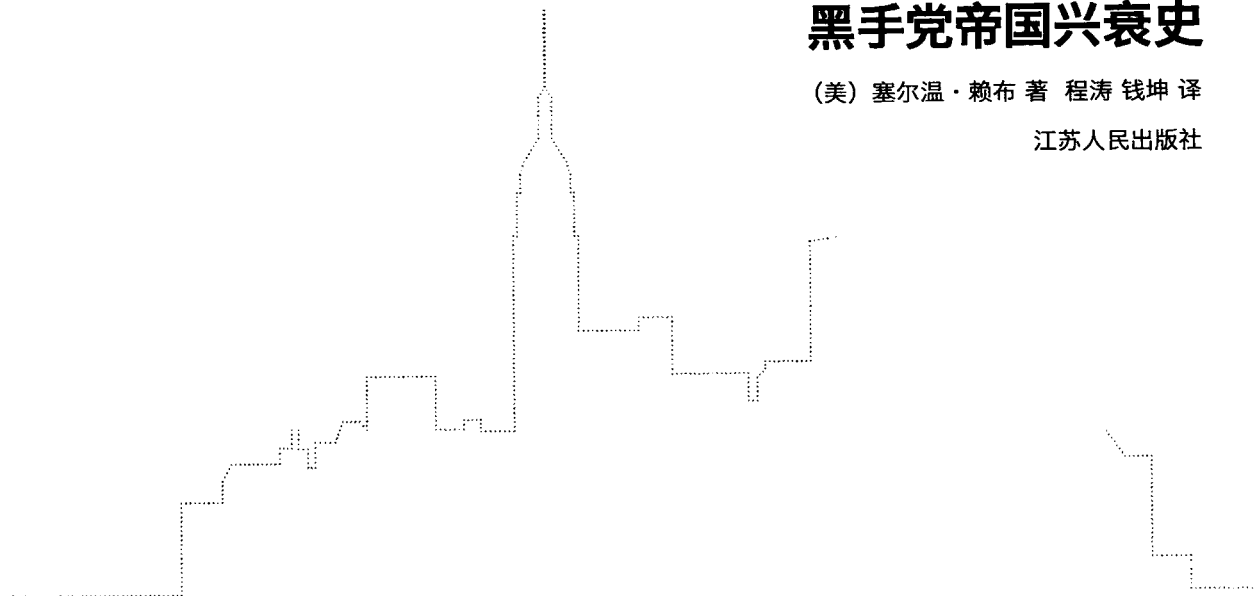
o

五大家族

黑手党帝国兴衰史

(美) 塞尔温·赖布 著 程涛 钱坤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Five Families

THE HISTORY OF THE LOMBARDO CRIME FAMILY IN NEW YORK CITY

Selwyn Raab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大家族:黑手党帝国的兴衰史/(美)赖布著;
程涛、钱坤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1
ISBN 978-7-214-06300-7

I. ①五… II. ①拉…②程… III. ①黑手党—历史—美国 IV. ①D77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7794 号

Five Families: The Rise, Decline, and Resurgence of America's Most Powerful Mafia Empires
by Selwyn Raab

Copyright © 2005 by Selwyn Raab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6-161

书 名 五大家族:黑手党帝国的兴衰史
著 者 [美]塞尔温·赖布
译 者 程涛 钱坤
责任编辑 陈茜
责任校对 刘焱 蒋卫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000毫米×1436毫米 1/32
印 张 20.25
字 数 73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300-7
定 价 5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在纽约地区，每个人都曾经碰到过美国黑手党，但绝大多数人对此并无察觉。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这步入新千年之际，黑手党，或者说“科萨·诺斯特拉”，毒害着所有纽约人乃至千百万美国人的生活。它在暗中洗窃我们的口袋，损害我们的整体生活质量。这个国家的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以种种方式资助了美国五个最强大和传统的“科萨·诺斯特拉”有组织犯罪帮派。这五大黑帮全部以纽约为犯罪的大本营，并喜欢以较温情的名字自称为“家族”。

这些以纽约为老巢的家族共同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领地，在东海岸沿线建立了前哨据点，并在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地方占据了丰饶肥沃的财富之地。它们最得意的一个经济成就是在拉斯维加斯拓荒垦野并秘密占有一流的赌场，将昔日沉寂的沙漠小镇变成一个名闻世界的赌博胜地。

毫无疑问，这些被称为博南诺、科洛博、甘比诺、吉诺维斯和卢切斯犯罪家族的帮派逐步发展成为黑社会的统治巨人。数十年来，它们通过单独把持权力机构和行使否决权来控制美国的许多其他黑手党组织，迫使其中一部分成为事实上的附属帮派。

通过对衣服以及诸如蔬菜、水果、鱼和肉之类的基本食品间接征收“黑手党”税，纽约——“科萨·诺斯特拉”的共有资产——滋养着它们。它们会在汽车司机们在加油泵前加油时吸走可观的不法利润；它们控制了个国家最大港口的码头贸易；它们染指我们的垃圾——抬高家庭和工地每片垃圾的清理费用；它们靠一个 10 亿美元的建筑产业牟利，从包括法院大楼、郊区住宅土地、公寓综合楼、医院、博物馆和摩天大楼的大型政府和民营工程项目中勒索酬金；通过从 FBI、警察局和监狱新大楼建造商身上榨取回扣——它们甚至从其主要的执法对手身上捞取好处。

黑手党这些掠夺行为的人道代价难以估量。19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海洛因大量涌进东部和中西部城市，而其直接的罪魁祸首便是这些家族的头目们。目睹毒

品走私带来的巨大利润，其他组织性稍差的犯罪团伙也纷纷步其后尘。但“科萨·诺斯特拉”追逐毒品暴利的贪欲加速了犯罪率的攀升、执法部门的腐败，并导致纽约内城区与美国各地遭到侵蚀。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最初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纽约市的公立学校系统碰上了黑手党。不管怎样，这种开场白反映了黑手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大城市生活中如此多的幽暗领域。

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原《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的一名新记者，我被分配从事教育专题的采访。我通常写一些诸如降低阅读和数学的测验分数、尝试让教师组成工会和种族一体化争论之类的专题，直到我碰到一个小小的涉及到威胁着数千名在校学生和教师安全的伪劣建筑与翻修工程的丑闻。屋顶、墙体和地板的破裂现象严重，电路走火的危险性显而易见，而一所中学里还有污水和饮用水混用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一些结伙舞弊的公司多年来都在提供低劣、非标准的材料和安装服务。

通过调查这些建筑公司的背景，一个有违常规的共同点终于被发现，即许多公司的投资人都未公开登记或者有名无实，而这些人也都与黑手党家族有牵连。许多争取学校那些赚钱工程的低标价竞争者显然受到黑手党的操纵，他们都通过“变更定单”的伎俩来大幅增加利润。

最终，学校负责建筑与承包监督的官员被解聘或突然辞职，而那个不检点的承包商则被禁止将来承包学校的工程，但与这起腐败案有牵连的黑手党人没有一人受到指控。其原因是官员们推托称没有明确的个人档案显示黑手党人卷入了诈钱活动，而承包商们都没有胆量证实黑手党在这些丑闻中的作用。简而言之，黑手党将数千名儿童置于险境却全身以退地逃避了责任，而它的不法所得也毫发无损。

后来，作为一名报纸和电视调查记者，我不断碰到黑手党在政府、执法部门、工会和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留下的印迹。

这里有关于黑手党人在巴勒莫引进并监督海洛因走私的报道。如果没有警方的强力干预，蓝领社区就会遭受侵害而变成毒品的露天市场。

这里有乔治·惠特莫尔（George Whitmore）所承受的痛苦折磨。借助一个通过黑手党老板的支持谋取职位的法官之手，黑手党使这个黑人少年受到三项谋杀罪的指控并含冤入狱被监禁多年。

这里曝光过健壮结实的黑手党人取得“残疾人”驾驶证的丑闻。在这个拥挤的城

市里，那种证件几乎可以让他们在任何地点停车。他们在警察局里有众多“朋友”帮他们开出那宝贵的证件。

这里有对富尔顿鱼市场的批发商进行的长期胁迫。为避免其日常经营活动受到骚扰，这些经营者被迫向黑手党人交纳“保护费”。

这里还有正直的油漆工、木匠和卡车司机所发起的艰难抗争。在工会会议上，当他们大胆讲出黑手党人接管他们的地方分会和窃取他们的福利与养老基金时，等待他们的是一顿暴打。

一个稍有洞察力的记者不难判定，到了20世纪70年代，黑手党在纽约大都会地区充当了一个代理政府的角色，它们厚颜无耻地控制着诸多重要产业，并从每个人身上榨取无形的苛捐杂税。事实上，黑手党在20世纪下半个世纪里的经济勃兴是惊人的。政府的一份分析报告估计，在20世纪60年代，全国二十多个黑手党家族的年非法利润高达7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前十大实业公司的总收入。这些不法财富的大部分由“科萨·诺斯特拉”集团最强大的组成部分——纽约五大帮派所攫取。

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纽约的市政和执法机构对这些犯罪入侵显得漠不关心。被问及20世纪70年代黑手党的影响时，官员们私下承认，以往试图驱逐他们的努力大多收效甚微，而民众也没有为类似徒劳无功的镇压大声疾呼。于是政府当局也感觉到，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包容了黑手党人，认为他们对普通百姓不构成危险，只是一种组织松散的乌合之众，主要从事的是像赌注经纪和开办普通的社区赌档这样的非暴力犯罪活动。

黑手党的辩解者们声称，在食品批发、建筑和垃圾清运行业推行严厉的管理措施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市政厅和许多执法机构默许对黑手党采取一种放任主义的适应态度。几乎所有当权者都将目标简单设定为饭店和超市的食品正常供应以及建筑项目能竣工，因而他们采取拒绝改革的态度便在情理之中。多数人的意见是，只要没有持续不断的控告申诉，就没有理由自寻麻烦讨论黑手党人卷入日用必需品供应的问题。

情形远不止于此，大多数媒体编辑都持有与官方类似的想法。他们更喜欢报道偶然的耸人听闻的谋杀或黑手党两败俱伤的内部战争，而不愿对“科萨·诺斯特拉”的经济影响及其对市府机关的操纵行为投入精力进行长时间的调查。相当一部分媒体热衷于美化黑手党人，把他们描绘成纽约那多元化肌体中的一个完整而多彩的部分。尽管他们有过犯罪前科并涉嫌参与多起谋杀，但约翰·葛提、乔伊·加洛和乔·科洛博还是被给予社会名流的地位，他们经常被描绘成独行其是的反现行体制的民间英雄，

而不是残忍无情的杀手。

一份被报纸和电视反复采用的报道甚至巧妙地赞扬了黑手党，把意裔美国人聚居区的低街头犯罪率归功于其令人生畏的存在。随着掠夺性犯罪的剧增，两个黑手党的大本营，曼哈顿的小意大利和布鲁克林的本森赫斯特被誉为“居家生活的安全港口”。缺乏报道和缺乏足够的重视是这些统计数字背后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当执行刺探任务的执法特工和可疑的外来者试图进入他们的堡垒时，黑手党人会依靠与其相亲相近的社区居民来提醒他们。这些监视者推波助澜地将他们的社区变成了仇外的飞地，导致经常发生针对陌生人，特别是非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人的暴力事件。

在新世纪里，有关黑手党盘据区安全性的传说仍然流行。一位郊区朋友对他女儿搬到纽约表示了欣慰，因为她在市里的一个安全窝，即受当地“黑手党好汉”保护的小意大利，找到了一套公寓。

有组织的犯罪事件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新闻专题，关于黑手党秘密活动的准确且具有文件证明的数据通常很难核实。五大家族从未发布年度财经报告，他们的老板也不乐见一针见血的人格剖析。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查阅了大量的公开和保密文献、法庭抄本、房地产交易档案，凭借《信息自由法》从联邦和州执法机构取得文件，一份一份地搜集着相关资料。

我还采访过几十位现任和前调查人员，特别是拉尔夫·萨勒诺，他们对美国黑手党的博闻广知及其契合历史事实的可信性无人能及。

当然，这里还有反抗黑手党打手控制他们工会而被围攻的工人所提供的可怕详情。收集关于劳工敲诈之真相的工作得到了两位工会改革的终生倡导者赫尔曼·本森和詹姆士·F·麦克纳马拉的帮助，他们能够找出黑手党人接管他们地方分会的目击证人。本森是工会民主联盟的一名创始人，而该联盟是美国帮助积极分子在工会运动中与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斗争的主要公民组织。麦克纳马拉曾是一位工会组织者，后来成为多个执法机构的劳工敲诈犯罪的专家顾问。

说服已认罪的黑手党人及其帮手坦率直言绝非易事。而我很幸运地找到了几个愿意配合的人，他们愿意揭开黑手党那神秘习俗的秘密，也愿意揭秘在复杂多变的犯罪环境中求得生存的技巧。

20世纪80年代初，探知当代“科萨·诺斯特拉”知识与传统的一个突破口在无意中出现了，而这得益于《纽约时报》的一条称呼的规定。在一个备受瞩目的指控黑手党从纽约市一个地铁项目中牟取暴利和实施一起神秘谋杀的检控案当中，一个名叫

佩莱葛瑞诺·马塞利的黑手党人是个核心人物。许多媒体乐于用他的黑社会绰号“屠夫好汉”来称呼他。因《时报》禁止使用侮蔑性的绰号，所以我所有的报道提及这个黑帮分子时总是用一个敬语“马塞利先生”。显然对这种新闻礼节毫无所知，马塞利突然打来电话，感谢在报道当中给予他独有的“尊重”，他还主动针对地铁交易和其儿子遭黑社会谋杀的相关案情提出在狱中接受采访。

那次短暂的相见让我们从此保持着联系，直到马塞利因正常原因死亡。在五年的时间里，以绝不在新的报道中公开其身份为条件，马塞利吐露了黑手党扩张的内情，讲述了有关“科萨·诺斯特拉”传统习俗的基本知识。他特别提及其同伙们那病态的思维定势和他们如何评判彼此的行为。实施谋杀对正常人来说可能是种极其可怕的行为，但马塞利解释称，一名尽职的黑手党人对血腥的暴力会无动于衷。此外，只要“那件工作做得专业且利落”，哪怕是受命杀死一个好朋友，他都会受到老板和同伙们的赞赏。

我曾对另一名已认罪的黑手党人安东尼·阿塞图拉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公开采访，这让我对一个老牌黑手党人的“科萨·诺斯特拉”经历和思维有了特别的认知。阿塞图拉是个老角头，领导着新泽西的一个行动队或小组。在因敲诈勒索被监禁之后，他同意接受采访，并无所挂碍地谈起他的黑手党生涯及其与黑手党大佬们的交往经历。

一名“科萨·诺斯特拉”的“合伙人”，或者说帮手，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关于黑手党在华尔街的白领活动和其他金融犯罪的情报。他声称自己“已经洗心革面”，并描述了黑手党利用20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的狂热之机策划了各种诈取投资者利益的阴谋。他对其全盘招供的解释是，希望安抚自己的良知并防止未来容易上当者落入有组织犯罪的金融陷阱。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结果证明那些情报是准确的。为保护他免遭报复，他的身份必须得保密。

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自称“黑手党律师”的弗兰克·拉加诺深度讲述了自己与黑手党要人之间肮脏的法律与社会关系。在他死去之前，他发誓要弥补令他在法庭和幕后为“科萨·诺斯特拉”辩护的道德过错。他为时已晚地承认，企图快速致富和成为知名律师的野心促使他为黑手党辩护。他提供了大量的意想不到的材料以揭露其高级客户的人格特点和阴谋诡计，包括两名权倾一时的南方老板桑托·狄拉菲肯特与卡洛斯·马塞诺和他们那好争吵的盟友——卡车司机工会的主席吉米·霍发，他还知晓黑手党仇恨约翰·F.·肯尼迪总统及其弟弟罗伯特并企盼他们死亡的隐秘细节。

这些黑手党的知情人和大批背叛者近来的揭露，连同 FBI 和其他执法机关的一批富有价值的情报报告，都非常有助于我们还原美国黑手党的历史并理解这种黑社会现象。纽约五大家族的目标是掠夺这个国家最富有的城市和地区。本书便是它们如何实现其目标的长篇报告。

目 录 | CONTENTS

序言 / 001

这个国家的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以种种方式资助了美国五个最强大和传统的“科萨·诺斯特拉”有组织犯罪帮派。这五大黑帮全部以纽约为犯罪的大本营，并喜欢以较温情的名字自称为“家族”。

第 1 章 燃烧的圣像 / 001

阿塞图拉接过一张方形的圣母画像，用火柴将它点燃，然后重复科拉罗吟诵的阴沉的咒语：“如果我背叛朋友和家族，我和我的灵魂终将如这圣像一般燃烧。”

第 2 章 图麦克的故事 / 008

在长期毫不动摇的忠诚之后，图麦克这个享有威望而又令人畏惧的角头，这个黑手党最典型的成功者，背弃了他以前视为生命的“乌默它”和其它准则。他成了叛徒。

第 3 章 根 / 012

新奥尔良无意中成了首批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黑帮分子在美国的落脚点。他们的后代和继任者成了真正的美国黑手党家族的成员。

第 4 章 城堡之战 / 019

只有其父母均出身于西西里或意大利南部的人才能成为黑手党成员。黑手党成员是一种终生的责任；没有辞职和提前退休的规定。“唯一的出路是躺在棺材里”。

第 5 章 肮脏的 30 年代 / 030

据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梅耶·沃尔夫希姆的原型就是魅力超凡的罗思坦。一天晚上，有人发现他腹部中弹，跌跌撞撞地走在曼哈顿中城区的人行道上。

第 6 章 失控的陪审团 / 038

强盗、谋杀和绑架在禁酒期间都是报道的好题材，几乎成了一种令人愉快的缓和剂，将人们从严酷的大萧条经济新闻中暂时解脱出来。

第 7 章 不幸的洛克 / 043

1937 年，根据卢西亚诺案改编的流行影片《艳窟泪痕》公映，亨弗莱·鲍嘉在影片中扮演男主角，即那个以杜威为原型的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地方检察官。

第 8 章 “首相” / 050

科斯特洛给出了一个简洁的黑手党式的辩解。“我三年级后就再也没进过学校，但我是 10 所逆境大学的毕业生，我认为所谓敲诈者就是一个靠已经拥有的权力、尊严或财富来获得权力、尊严或财富的人。”

第 9 章 谋杀公司 / 058

谋杀公司的效率，还有黑手党那无敌杀手队的传闻，都增强了一句流传于美国黑社会的西西里谚语的恐怖效果：“在法律和黑手党之间，法律不是最可怕的。”

第 10 章 一场有利可图的战争 / 065

一夜之间，布鲁克林一个毫无名气的角头卡洛·甘比诺靠配给制变成了百万富翁。

第 11 章 风平浪静的时期 / 071

在纽约礼查饭店举行的这场豪华婚礼是当年美国黑手党的社交大事，并成了电影《教父》开始时那场婚宴的原型。

第 12 章 “醒来吧，美国！” / 084

在电影《教父》当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第一代黑手党独裁者，据说他根据电视节目模仿了科斯特洛与特别委员会斗法时的口音和语调。

第 13 章 海洛因与阿帕拉沁事件 / 094

1957 年，黑手党重要头目齐聚在巴勒莫大酒店，在一间装饰华丽的以 19 世纪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之名命名的套房里筹划了一场爆炸式的海洛因贸易扩张。

第 14 章 总统之死 / 109

歌手兼演员弗兰克·西纳特拉在肯尼迪与黑手党的恩怨中扮演过角色。他使萨姆·詹卡拉、肯尼迪总统和周旋于好莱坞与拉斯维加斯娱乐圈子里的迷人少妇朱迪思·坎贝尔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爱与性的三角关系。

第 15 章 “事实的金石之音” / 121

肯尼迪总统被谋杀中断了联邦政府对黑手党展开的首次持续不断的打击力。随着 FBI 和政府的再次沉默，黑手党的教父们终于可以松口气。压力烟消云散。

第 16 章 风光无限的帮派：黑手党 / 134

那些只有一个黑手党犯罪家族的城市，教父们可以坐享事业的长盛不衰并颐养天年直到自然故去。而在纽约，争斗几乎是司空见惯，教父们过着不得安宁的日子。

第 17 章 RICO 的诞生 / 147

影片《小凯撒》大致还原了阿尔·卡彭，垂死的小凯撒在一条巷子里吃力地道出好莱坞一句著名的绝命语：“慈悲之母啊——RICO 命当该绝吗？”

第 18 章 团结日 / 157

在派拉蒙电影公司拍摄《教父》前，科洛博连续发表了带有恐吓意味的新闻公告，警告制片人不得使用“黑手党”和“科萨·诺斯特拉”字眼和将意大利人描绘成邪恶的罪犯。

第 19 章 狂人与利诺 / 164

在迪伦的畅销歌曲《乔伊》当中，加洛是个死得太早的不被理解、得不到赏识的不屈从成规者。

第 20 章 FBI 的觉醒 / 178

韦尔奇将纽约地区视为黑手党的“世界总部”，到那里任职让他面临着最为危险

的挑战。他相信，在打击纽约五大犯罪家族的问题上，当地特工正在做着唐吉珂德式的努力。

第 21 章 大亨 / 189

FBI 官员希尔发誓说：“我们将让五大家族蹈入死地。”

第 22 章 “美洲虎”行动 / 199

电话窃听发现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规律，大多数早晨，阿韦利诺会驾着他那锃亮的 1982 年产价值达 10 万美元的“美洲虎”离开乡间豪宅……

第 23 章 播种季节 / 208

几个小时后，萨勒诺那沙哑的声音非常清楚地传到 FBI 的侦听哨位，最后一个被列为目标的黑手党老板受到了窃听。

第 24 章 “就是这样！” / 217

这是一枚重磅炸弹。在纽约五大家族中，有四大家族的首领将成为它的袭击目标。黑手党整个统治集团将被推上被告席。

第 25 章 帷幕升起 / 229

有个首席法官曾说过，只要愿意，一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就能够起诉“一个香肠三明治。”

第 26 章 混凝土俱乐部 / 243

迈克尔·切尔托夫完美无缺的庭辩表现成了他升迁的跳板。2005 年，他进入内阁。

第 27 章 “远未完结” / 256

特遣队发现，一些高层管理机构和工会组织心甘情愿为黑手党提供方便，因为作为一种“必要的恶”，黑手党能带来更多的利益。

第 28 章 转折点 / 265

对黑手党新贵来说，老教父们的 RICO 逮捕与审判是一个转折期，它预演了执法部门可能用来打击他们的主要手法。

第 29 章 玩蛇的人 / 275

在巩固和保护黑手党犯罪家族方面，血缘和忠诚是极为重要的因素，然而这次却是反受其害。

第 30 章 卡迈恩的战争 / 287

得到奥瑞拉提议公投的消息之后，卡迈恩决心痛下杀手：干掉奥瑞拉。

第 31 章 王朝 / 298

在外面，卡迈恩·珀西科的残忍令人不寒而栗，而在加利福尼亚中部这座阳光充足的离太平洋数英里之遥的监狱里，他却闲适地照料着一个玫瑰花园来消磨时光。

第 32 章 遗产地狱 / 303

一夜之间，爬到“科萨·诺斯特拉”最高层的葛提已上升到莫尔的优先名单的首位。这两个年龄相仿的人有着全然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这注定着他们将成一对冤家。

第 33 章 “嘎嘎—嘎嘎” / 314

如果 FBI 需要一个原型特工作为广告形象代理人的话，酷似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布鲁斯·莫尔无疑是个标准人选。

第 34 章 “真为他们害臊” / 328

政府向黑手党发起的进攻遭遇了令人痛心的失败，它首次输掉了一场重要的 RI-CO 审判。

第 35 章 “他像罗宾汉” / 343

唯一在法庭上获胜的老板葛提成了全国最著名的难以制服的黑手党野马，以至于安迪·沃霍尔画了他的头像，让他成为自卡彭以来第一个上《时代》杂志封面的黑道人物。

第 36 章 西瑞莉太太的假日 / 360

黑手党的习俗要求将周六留给妻子。葛提诉苦说，周六的夜晚是最无趣的。

第 37 章 “我想投靠政府” / 373

半夜转狱，只意味着一种可能：公牛萨米成了叛徒。

第 38 章 苦涩的结果 / 383

就在他被捕前不久举行的联邦调查局全国主管特工会议上，他还是个有名的演讲者。他的题目是：有组织犯罪如何运作。

第 39 章 自我崇拜 / 393

紧随出租车之后的是 22 辆大型高级轿车、数百辆私家车和 19 辆花车。那些花艺造型经过了巧妙的设计，反映了他生活中爱好的各个方面：一只马提尼酒杯、一匹赛马、一把红桃同花顺、一支香烟和纽约北方佬的标志符。

第 40 章 “煤气管” / 407

在五大家族中，他那可怕的复仇激情是人所共知的。在江湖上，他有个令人恐惧的绰号：“煤气管”。

第 41 章 血洗 / 417

他的嘴里塞了一只金丝雀，这是传统上黑手党对告密者的一种警告。

第 42 章 “教授”与胖子皮特 / 428

卢切斯家族暴力与白领犯罪的详细情报是个证据的宝库。“教授”与胖子彼特合力推开了检控卢切斯家族 50 多名黑手党人和合伙者的大门。

第 43 章 图麦克的蜕变 / 438

阿塞图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黑手党人，一个笃信黑手党的荣誉规则神圣不可侵犯的狂热信徒，代表着黑手党的完美理想。

第 44 章 455 年监禁 / 446

腐败警察向来是困扰纽约地区警察机关的一个敏感话题。堕落的警官和调查员要么被直接拉下水，要么作为黑手党人的亲戚或老友被慢慢腐蚀。

第 45 章 “美国队” / 459

他 35 年间从一个周薪 75 美元的学徒爬上家族的最高层再到最终逃亡浓缩了美国黑手党的近代史。

第 46 章 睡衣把戏 / 463

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沙利文大街上的古怪男人在吉诺维斯家族里实际上拥有多么大的权力。

第 47 章 心理战 / 471

FBI 对文森特·吉甘特的跟踪终于取得了有意义的发现，“这个穿着浴袍的谜”有两套住宅、两种爱情生活和两个互不相干的亲密家庭。

第 48 章 真正的老板 / 484

胖子托尼·萨勒诺随口说出的许多重要话语居然被 FBI 特工和检察官们忽视了。

第 49 章 “钦”的数百万财富 / 493

富尔顿鱼市场是东北地区最棘手的有组织犯罪难题，你拿掉一个家伙，就有一大群不值钱的恶棍在排队接替他。

第 50 章 “我知道尸体埋在哪儿” / 502

放她一马。我能给你相当不错的情报。我知道尸体埋在哪儿。

第 51 章 穷途末路 / 511

“那个堕落的人，那个肮脏的人，那个劣迹斑斑的人就在这里。”

第 52 章 “钦”最后的炫耀 / 521

作为一个黑手党头子，很难理解他靠什么获得乐趣。他唯一感兴趣的似乎是他所运用的绝对权力。

第 53 章 并无魔力：刑事侦破会计 / 526

经过两年的监视、奔走和搜寻证据，FBI 小组里十来名特工没找到博南诺家族可资利用的任何弱点，也没能找出一个有价值的告密者。

第 54 章 “干得不错，路易” / 529

乔·马瑟诺说话温和、沉着、镇静，一团和气，对细节的精确记忆令人敬畏，在黑白两道都能赢得尊重。

第 55 章 “漂亮塞尔” / 540

罗伯特·利诺打响了第一枪，但显然未击中或者只擦伤了布莱克，再开枪时却卡了壳。跪坐在地上的布莱克抬起头，说道，“再来一次，干得漂亮点。”

第 56 章 黑手党的霍雷肖·阿尔杰 / 548

“我给他松了松骨头。”按照黑手党的恶行标准，马瑟诺认为一次后果不甚严重的袭击算不上控告的合理理由。

第 57 章 和善的教父“耳朵” / 559

所有家族成员都得到忠告，要像他那样对司法人员谦恭有加。即使被特工和侦探纠缠不休，都得像礼仪学校的毕业生一样有礼貌。

第 58 章 黑手党迷 / 574

奢侈而放纵的生活方式，包括吸毒和暴饮暴食，将这个身高 1.89 米、曾经非常精壮打手变成了一个衰老的、大腹便便的黑手党人。

第 59 章 分而治之 / 584

马瑟诺能够嗅出最高明的跟踪者，在其霍华德海滨的家里，那些全景式地监视着附近那条安静街道的摄像机已经证实，特工们正在他家前门布哨监控。

第 60 章 多米诺骨牌效应 / 592

马瑟诺长期被执法部门和黑手党人描绘成 20 世纪最后的主要教父，被看成是黑手党的救世主。然而，他 62 岁时留下的最后作品是衰败零落的博南诺家族，他的背叛还威胁着其他黑手党家族。

后记 回到山洞 / 606

9·11 事件是改变黑手党的前途与命运的决定性因素，FBI 和整个美国的警察无可非议地专注于一个最主要的任务：防范恐怖袭击。

第1章 燃烧的圣像

“如果我背叛朋友和家族，我和我的灵魂终将如这圣像一般燃烧。”

托尼·阿塞图拉（Tony Acceturo）吟诵着庄严的誓词，任手上的圣像燃成灰烬。一群表情严肃的人点着头，依次上前拥抱他，吻他的面颊，然后有力地与之握手，郑重地向他表示祝贺。这是阿塞图拉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时刻。这次仪式已烙入他的灵魂深处，他的主要抱负已经实现。他现在是一个门槛甚高的黑社会组织的最新成员：他成了美国黑手党的一名“荣誉者”。

20年来阿塞图拉忠诚地为新泽西州的黑手党头目们效力并最终获得了回报。最初他做过冷酷无情的高利贷执法打手，后来则成了一个重要的“捞钱人”。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有种强烈的直觉告诉他，这一天将具有特别的意义。他接到了与乔·阿巴特（Joe Abate）见面的指令。阿巴特是个离群索居的人物，难得与手下们面对面地碰头，尽管靠着他们的敲诈勒索、赌博和高利贷活动发了大财。作为一个精明的“百佳塔”（borgata 或 brugard，黑手党俚语，意为犯罪家族，源于西西里语对组织严密的社团或部落的称呼）角头，阿巴特负责管理卢切斯犯罪家族在新泽西州的所有犯罪活动。

在熙熙攘攘的曼哈顿中城区港务局公交终点站，阿巴特在一个预定地点等着阿塞图拉。身为角头或者说队长的阿巴特掌管着一百多名黑手党成员。这些人每年为他搜刮数百万的不义之财，而作为什一税，他们还得将部分所得交纳给管理层，即卢切斯家族居住在哈得逊河对岸——纽约的首脑们。阿巴特已经七十多岁，高高的个儿，体形修长，站如笔挺，完全不像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草草地与阿塞图拉握手以示欢迎之后，他脚步轻快地步出了公交底站。

1976年6月的那个下午，他们一路上寡言少语，比其角头几乎小了40岁的阿塞图拉只是加快步子紧跟那个精神矍铄的前辈。阿巴特从未主动和他搭搭话，这让身材

魁梧、体格健壮、体重 90 公斤、身高 1.76 米的阿塞图拉感受到一种苦涩的挫败感。在新泽西的黑手党人中间，作为一个地位显赫的老战士，乔·阿巴特是个令人生畏的灵魂人物。当阿尔·卡彭（Al Capone）在 20 世纪 20 年代成为美国最恶名昭彰的黑帮头子时，阿巴特已是一个在芝加哥为他效力的枪手。在阿巴特面前，阿塞图拉必须恭敬谨慎，必须干脆利落地回答他的问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命令。

在曼哈顿服装中心一家与公交车站相隔数个街区的制衣厂，阿巴特把阿塞图拉介绍给一个表情冷酷的人，而这个人将会驱车把他们送到下一个地点。此人叫“汤姆”安迪摩·帕帕迪奥（Andimo “Tom” Pappadio），是一个卢切斯家族在服装中心负责操纵大量劳工敲诈、赌注经纪和高利贷活动的重要打手。与到服装中心的那段短时间的步行一样，他们一路沉默无言，直到抵达一栋简易的木屋门前，这 30 分钟的乘车旅行才告结束。对纽约许多地方都不太熟悉的阿塞图拉觉得，他们已经来到了曼哈顿正北方的布朗克斯区。

在一间陈设简陋的客厅里，几个与阿塞图拉素昧平生的人正等在那里，其中就有那个自称托尼·科拉罗（Tony Corallo）的人。阿塞图拉知道，在黑手党这个受到层层隔离保护的核心圈子里，这个六十多岁的矮而健壮且不苟言笑的男人还有一个叫得更响的名字——“鸭子”托尼（Tony Ducks）。他非常清楚这个名字的含义。安东尼奥·科拉罗（Antonio Corallo）是整个卢切斯家族的老板，其绰号得自他终生都在逃避追捕和传唤。这些人聚在客厅里只有一个目的：举行秘密仪式，吸收阿塞图拉为“荣誉者”（man of honor），让他成为一名经过了全面考验的正式党徒。

托尼·阿塞图拉知道那些“书”——纽约五大黑手党家族的成员名册已经尘封了 20 年。最近，隐约有传言称，那些名册最终将为有功者重新打开。阿塞图拉曾为自己的前程苦闷过，他渴望获得让人垂涎的“打手”资格，结束自己长期的跟班身份。

“证明你的骨气。”黑手党就是否有资格通过其入会审查的委婉之语，即要求参加过一次暴力犯罪——通常是谋杀——或是成为家族的“大捞钱人”。阿塞图拉自信在这两个方面都能以高分证明自己的骨气。

阿塞图拉曾经听说过前辈们对入会仪式的零星暗示。他有个模糊的印象，认为要念那古老的宣誓效忠的咒语，要手按枪、刀和圣像发誓，然后割开扣动扳机的手指放血生效。然而，当他的仪式结束时，阿塞图拉才发现它简短无奇，心里不免涌起些许失望。

“鸭子”托尼从客厅的椅子上站起身，开门见山地说道：“开始吧”，然后直言不讳地告诉阿塞图拉他是家族的“老板”。阿塞图拉接过一张方形的圣母画像，同时被

告知用火柴将它点燃，然后重复科拉罗吟诵的语调阴沉的咒语：“如果我背叛朋友和家族，我和我的灵魂终将如这圣像一般燃烧。”

尽管仪式显得突兀而简短，但一想到其意义重大，阿塞图拉还是由衷地狂喜不已。“我兴奋得不得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它让我与普通人不同。我已经进入那个我从孩提时起就渴望归属于它的秘密社团。”

不久以后，返回新泽西老窝的阿塞图拉从前辈荣誉者那里得知了其入会仪式简朴的原因。这些人现在可以开诚布公地与他谈话，因为他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正式成员资格。阿巴特和卢切斯家族其他头目非常看重他的成就与作为，认为他不同于普通新成员，没有必要因循那些繁文缛节。他已经牢记了基本准则，在把握和践行黑手党的行为规范上，他被认为比绝大多数新打手要出色得多。毫无疑问，他适合这种“生活”。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通过亲眼目睹和黑手党密友的告知，阿塞图拉将了解到美国黑手党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是如何举行更具代表性的入会仪式。这种仪式仿效西西里黑手党早在19世纪就开始采用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秘密入会规程，意在显示从“崇拜者”，即一个犯罪家族的合伙人，一名毫无声望的奋斗者，到跨入精英阶层，成为一个拥有特殊权益和承担特别义务的荣誉者的重大转变。

虽然仪式在全国都大同小异，但在纽约这个公认的美国黑手党老巢，其严格的规程为五大老牌黑手党家族所奉行。候选人须经过角头举荐，然后由家族最高首领，即家族的“代理人”或者说老板亲自核准。最后的考查是将打手候选者的身份交给其他四大犯罪家族的首领，确认是否存在不利于他的污点和负面信息。为保持家族的固定规模与实力，防止出现未经许可的扩张，候选者只能填补家族里死亡者遗下的空缺。

尽管可能猜得出其入会仪式在临近，但候选者从不会被明确地告知将会发生什么或者哪天他将获得“转正”的机会。突然间，他会接到通知“穿好衣服”，即穿上套装打好领带去执行一项性质不明的任务。荣誉者将候选者接上车并护送到入会仪式现场。在驱车赶往聚会地点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利用所谓的“清洗”或“干洗”的伎俩来躲避可能的执法监视。驱车者会突然将车拐进公共停车库。他们也有可能漫无目的地转上半个小时，然后“走直角街段，”即在缓慢行进中突然急转弯，或者逆向行驶以摆脱可能尾随他们进行例行监视的侦探。

采取这特殊的预防措施是为了防止探员侦知集会地点，主要因为家族老板和其他高级头目将会参加仪式，防止他们被执法人员窥探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

与阿塞图拉的仪式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鸭子”托尼主持的仪式都有更大的

排场，而且更拘泥于形式。“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开始时他会这么问，而候选者则应该故作不知地回答：“不知道。”重复这种虚伪的游戏是因为入会仪式被认为是个要严密保守的秘密，要防止将家族首领与成员的底细泄露给执法探员和局外人。

接着，“鸭子”托尼说道：“你将成为这家族的一员，你对此有何异议？”

围坐在仪式桌旁的另一个人接着会用一根针、一把刀或一个别针刺破候选者扣动扳机的手指，将血滴在一幅圣徒的画像上。当这名候选者举高那幅血染的画像时，有人就用火柴点燃它，然后“鸭子”托尼领着那新党徒吟诵道，“如果我背叛家族的任何人或者这屋内的任何人，愿我，还有我的灵魂，都如这圣像一般燃烧。”

撒去圣像的灰烬之后，科拉罗或他的一名副手就告诫这个新荣誉者，从此以后，家族的需要——包括进行谋杀——将是其生命中的第一责任。新成员不再忠于上帝、国家、妻子、孩子或近亲，而只效忠于他的犯罪家族。老板，亦即家族“教父”的命令必须立即执行，哪怕这意味着无暇照顾一个垂死待救的孩子。

在为阿塞图拉的老友汤米·理奇阿迪（Tommy Ricciardi）举行的仪式上，“鸭子”托尼和他的亲信仔细列举了家族和黑手党的那些不可违犯的准则和规约。最重要的是“乌默它”（omerta）戒律，即缄默准则。它禁止组织成员与执法机构有丝毫的合作，或更为恶劣地告发、出卖黑手党的任何人。

新“枪手”，或者说打手，直接效命于为其党徒资格提供担保的角头。打手参与的所有非法活动和经营的合法生意都要通过角头向家族“备案”或“登记”，这样组织就可以从中获利并利用他们策划犯罪活动和交易。打手的合法与非法所得都要分给角头，还要上交一定比例的收益给老板以示孝敬和满足家族的经济所需和经常性开支，这视老板的兴致而定。

在谈生意和社交事务中，只有卢切斯家族和其他犯罪家族的荣誉者才能作为“我们的朋友”（amico nostro）被介绍给其他黑手党人。其他与黑手党合作或共事的人只能被称为“一个朋友”或“我的朋友”，意在提醒这个第三者不是荣誉者，在他面前不得谈论黑手党的秘密。

令人恐惧的“黑手党”一词在该组织的词汇表中被剔除。即使在秘密交谈中也被禁止使用，因为如果遭检方证人偷听到或被调查人员通过电子手段窃听，它在法庭上就可能成为罪证。取而代之的是，如果不得不提及组织的名称，无关痛痒的“Cosa Nostra（科萨·诺斯特拉）”、“我们的事”或首字母“C. N.”就派上了用场。

不管新成员在入会时知道多少情况，他仍然会被正式告知家族领导层的构成与权限。处在塔尖的老板制定政策，确定家族可以参与哪些犯罪与非法行当，并有权委任

和调动角头与其他高层领导。

像一个帝国的独裁者一样，老板最为可怕的专制权力是决定谁生谁死。因家族内部原因而实施的内部谋杀或除掉家族以外的任何人都只能由他来批准。

通常出现在入会仪式上的“二老板”，即协助管理家族日常事务的二把手，而顾问则负责就家族事务，协调与其他黑手党帮派的关系，和针对一些纠纷提出建议。

在卢切斯家族的入会仪式上，纽约其他四大黑手党家族（吉诺维斯家族（Genovese）、甘比诺家族（Bambino）、博南诺家族（Bonanno）和科洛博家族（Colombo））和新泽西一个较小家族（迪凯伏坎提家族（DeCavalcante））老板的底细都要向新打手交待。在获得这种机密信息的同时，他们也被警告，如果遇到其他家族的老板，应当给予他最高的礼遇。

最后，几个纽约家族用 *ticada*（意大利亚语，意为“紧紧拥抱”或“手拉手”）来结束他们的仪式。为了显示其秘密组织的内部团结，所有见证人和新成员彼此都紧紧地手扣着手，结成老板所宣称的“牢不可破的兄弟纽带”。

阿方斯·达尔科（Alphonso D'Arco）在卢切斯家族的大好日子是1982年8月23日。他接到角头的指示：“穿好衣服，你得去个地方。”在曼哈顿小意大利区的一个街口被接上车后，他像托尼·阿塞图拉一样被带到布朗克斯一处不起眼的房子里。其他4名候选者都坐在客厅里，等着被传唤到另一个房间——厨房里去。轮到达尔科时，他被介绍给了“鸭子”托尼·科拉罗和其他围桌而坐的管理层成员。

“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吗？”其中一个人问道。达尔科恭敬地回答：“不知道。”

“你将成为家族的一分子，”那人继续道，“如果被要求去杀人，你愿意执行命令吗？”

达尔科点头以示肯定，于是他的扳机指被刺破，那圣徒画像也被烧成了灰烬。坐在桌旁的一个人用毛巾包住桌上的刀与枪并拿走。“你靠刀枪吃饭，如果你背叛这屋里的任何人，你将死于这刀枪之下。”讲话者阴沉地说道。最后，达尔科重复了一遍黑手党的圣誓：“如果我背叛朋友和家族，愿我，还有我的灵魂如这圣像一般燃烧。”

所有候选者的仪式举行完毕后，“鸭子”科拉罗站起身来，让所有人手扣手地联结成一体。“本家族事务开始。”科拉罗宣布道。随后，他严肃地向新打手们讲授了深深铭刻在达尔科记忆之中的基本准则。

“我们被告知不得贩卖毒品、伪造货币或窃取股票和债券，要尊重家属和其他成员，不得与家族成员的妻女鬼混。如果出现任何你与其他成员都不能解决的争端，你必须求助于你的角头。你不能把手伸向其他家族的人。在任何时候，你都要保持自

尊。当角头召唤你时，无论何事，无论何时，你都必须立刻回应。家族高于你自己的家庭。最重要的是，你不得与其他家族的成员谈论本家族的任何事情。如果你不能遵守这些规定，你将被处死。”

科拉罗重申了另一条铁的纪律是：永远不得“殴打”（即谋杀）警察和其他执法人员。

“无论今夜发生了什么都绝不许谈论。”科拉罗警告说，并示意这群人再次手扣手相连，他用意大利语宣布：“本家族事务到此结束。”仪式画上了句号。

下午的仪式结束后。没有安排宴会以示欢庆，在那些老党徒和新出笼的黑手党人分成小股散开之前，他们只用了些咖啡、简单的小吃和酥皮糕点。

达尔科将知道科拉罗禁止卷入毒品走私、伪造货币或窃取股票与债券的原因，因为这些都是联邦重罪，都意味着漫长的刑期。和其他黑手党领导人一样，科拉罗有足够的理由制止杀害执法人员。谋杀警察、探员或检察官会引发针对黑手党的执法风暴，使正常的生意遭受危险。此外，这条规定意在维护严格的纪律，防止头脑发热的人采取鲁莽的未经批准的行动。

举行入会仪式的第二天，在一场有行动队其他成员参加的宴会上，达尔科被他的角头指定为主宾。这对他和其行动队的二十多名成员来说是个平等的互相认识的机会。达尔科的新伙伴们笑着告诉他倘若在布朗克斯的仪式上拒绝接受家族的成员资格会有何后果：他会当场被处死。因为拒绝将证明他是一个试图渗入家族的特工或告密者。

在成为荣誉者的最初几天里，更多的“科萨·诺斯特拉”习俗和规定都会由老打手给他讲授。有些习俗显得很奇怪，特别是那些与相貌修饰和着装有关的更是如此。纽约的黑手党头目们对打手蓄胡须或穿红色的衣服很反感。留胡须被认为过于招摇，而红颜色则被穿着保守的首领们视为过于俗艳。令人费解的是，一些黑手党大佬也相信红色衣物是“鼠辈”，即告密者的偏好。

尽管他们处处受制于角头和管理层成员，但对于像阿方索·达尔科和托尼·阿塞图拉这样忠诚而野心勃勃的打手，他们仍有着巨大的潜在利益可图。荣誉者自然而然地可赢得更高的礼遇，拥有更大的特权和更多的赚钱机会。对于新成员来说，比起原来作为一名与家族共事或合作的崇拜者或“合伙人”来，他们现在能取得犯罪收益的更大份额，而且新党徒已经有资格从其他家族控制的非法行当中获得一份收益。

打手们还得到另一份礼物，即有权在不法活动中组织和自己的崇拜者。大多数打手渴望成为荣誉者，但只有那些具有西西里和意大利血统的人才具有这种资格。

曾经，几乎所有家族都要求候选者的父母双方都是意大利人。最后，这个先决条件被放宽：只要父亲的原籍是意大利即可。无论他对家族具有何种价值，倘若没有意大利血统——即使他是遵命执行谋杀任务的杀手或者是个大捞钱人——他也绝不可能被接纳为正式党徒。一名非意裔者也许会备受敬重，但绝不会取得和最低级黑手党人同等的认可。

同样重要的是，只要打手按照黑手党的行为准则行事，他就可以利用家族的经济和法律关系。如果他被监禁或遭到逮捕，家族就会花高价钱聘请知名律师。倘若荣誉者被关进监狱，家族管理层或者其角头可望照顾他的妻儿。

为了鼓励在激烈而危险的环境中效忠并效力于家族，打手还会得到另一项极为重要的馈赠：一份人寿保险。只有在老板下令和在严重违犯黑手党规约的情况下，荣誉者才能被处死。其他为家族效力或与黑手党人合作的人则不会享有类似的保护。如果与荣誉者发生冲突，他们就有可能在荣誉者的一念之间被谋杀或被打成残废。打手们知道，其他怀疑或知道其来头的犯罪分子不敢伤害或侮辱他，因为组织的报复力量在黑社会里是众所周知的。

20世纪中后期，加入黑手党甚为不易且危险重重，但殷切的申请者向来不乏其人。对于像托尼·阿塞图拉这样的新党徒，正式成员资格就像一种有着高额经济回报的奖品，闪耀着令人艳羡的光芒。

第2章 图麦克的故事

荣誉者所犯的最不可饶恕的罪行是违犯缄默准则“乌默它”。告密者所受的惩罚通常是一颗子弹被射进其后脑。

安东尼·阿塞图拉（Anthony Acceturo）忠于黑手党的荣誉准则是他取得黑社会的荣耀与尊敬的保证，这最终会让他跻身黑手党高层，成为一个千万富翁。

然而，他早年并没有显现出会在哪个领域飞黄腾达的迹象。阿塞图拉的父母都是西西里移民，育有六个孩子。他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在新泽西州纽华克市郊一个脏乱的蓝领小镇奥林奇长大。他的父亲安吉洛（Angelo）是个屠夫，也是阿塞图拉肉店的老板，他没能让托尼对他的合法生意产生兴趣。这个年轻人更喜欢在体育馆里完美地展现他的才能。

他无意于求学上进，六年级之后就开始经常逃课，而他的父母也不觉得传统教育有多大用处，于是便同意他在16岁那年早早地离开学校。刚度过少年时代，这个孩子就被送到纽华克的亲戚家居住。在当地一个意裔美国人的帮派当中，他从五六十名年轻地痞中渐露头角，成了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暴徒。16岁时，他的名声就被传扬开来。他那时曾挥舞拐杖将一名对手打得不省人事，为自己赢得了“图麦克（Turnac）”的诨名。1940年有一部名为《公元前一百万年》的电影，维克多·麦卓（Victor Mature）在片中扮演了粗犷而忠厚的野人英雄图麦克。年轻的阿塞图拉很喜欢这部电影，他那个与之终身相随的绰号就源于这个角色。

不逞凶斗狠的时候，阿塞图拉主要靠砸开自动唱片机和香烟贩卖机偷走硬币以及经常性的轻度犯罪来养活自己，也因此搅得附近的店主鸡犬不宁，而更重要的是，他惹恼了一个当地的大腕“火腿”安东尼·德拉斯科（Anthony Ham Delasco），曾是职业拳击手的德拉斯科将这个毛头小子召来教训了一通。通过街谈巷议以及亲眼目睹邻

居对德拉斯科的深深敬畏，阿塞图拉知道他碰上了一个真正的黑手党荣誉者。“那些机子是我的，”德拉斯科威胁称，“我希望停止这种胡闹。”

德拉斯科也看出这个野性十足的17岁男孩所具有潜力，就给了他一份周薪75美元的工作，任务是帮助管理德拉斯科那非法的乐透彩赌博，并用暴力在其“夏洛克”式的高利贷经营中讨债收款。

阿塞图拉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而那个老谋深算的黑手党人在教他黑手党的基本规矩的同时，不久就开始约束他那桀骜不驯的习气。“给我拿支冰淇淋来！”德拉斯科有一天向阿塞图拉命令道，当时这个年轻人正与一帮敬仰他的朋友站在一个路口边。尴尬的阿塞图拉知道，如果像跑差的一样被人差遣，他在好朋友面前会大丢面子。但估摸德拉斯科是在考验他的服从意识，他还是给老板买来了冰淇淋。

“我知道，如果我想留在‘火腿’身边并向他讨取经验的话，他就必须绝对控制我，”阿塞图拉说道，“他必须驯服我，而我得服从管束。”

阿塞图拉成了德拉斯科的得意门生，后来又成为其导师死后填补其空缺的另一个黑手党人的得力助手。在将一个塞满钞票的包裹交给那个表情严肃的角头乔·阿巴特时，作为崇拜者的图麦克犯下了他惟一的错误。那个包裹是卢切斯家族纽华克支派付给阿巴特的月分红，当时他正独自坐在车内等着他的酬金。

年轻的阿塞图拉急切地要在从未谋面的阿巴特面前表现自己，殷勤地说了些诸如非常荣幸之类的话。阿巴特冷冰冰地命令他下车，然后驱车离开。3小时之后，阿塞图拉被阿巴特派来的老牌黑手党人伦尼·皮扎拉塔（Lenny Pizzolata）骂得狗血淋头。

“谁他妈的让你和乔·阿巴特搭话？”皮扎拉塔咆哮道，“要不想死，就绝不要提他的名字，只有跟你说话时才能开口！”

除了那次的错误，在五六十年代，阿塞图拉在家族里一直平稳地爬升着。60年代末，当纽瓦克的非洲裔美国人急剧增加，黑人犯罪分子开始强有力地和白人赌注经纪人手中抢夺彩票赌博地盘的时候，他引人注目地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在阿塞图拉和他那一伙经过精心挑选的武装暴徒的支撑下，卢切斯家族保住了它在彩票赌博上的利益。警方情报官员断定阿塞图拉粉碎了一帮激进的黑豹党徒对卢切斯家族领地的尝试性入侵。尽管没有受到谋杀罪的指控，但警方怀疑阿塞图拉的小组实施过数起谋杀以保卫黑手党的地盘。

1979年，77岁的阿巴特开始懈怠起来，并过起了半隐退的生活。“鸭子”科拉罗（Ducks Corallo）果断地任命阿塞图拉为其新泽西的角头，使图麦克成了那些先前曾是其训导者的老牌打手的头目。阿塞图拉很快展现了其管理才能。他壮大了家族传统的

赌博、高利贷和毒品走私组织，并开始涉足劳工诈骗。通过暴力手段，新泽西行动队控制了腐败的工会官员，为榨取工人的福利基金和以黑手党支持的罢工来威胁公司支付酬金以换取劳资和谐扫清了道路。

这个新角头还将家族的活动扩展到佛罗里达州，在迈阿密地区开拓了类似的犯罪事业，并附带着操纵赛马赌博。阿塞图拉在黑社会取得的成功让他有资本进行投资活动，能够以股东身份在新泽西、佛罗里达和北卡罗来纳州介入貌似合法的房地产、保险、设备租赁和其他事业。他在这三个州分别安了家，并打算退休后闲居在北卡罗来纳州，他在那里伪装成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商界人物。

他的财富迅猛地增长着，他甚至夸耀已经将价值 700 万的千元钞票、宝石和稀有钱币作为应急储备金放进保险箱，藏在浴室梳妆橱后的储藏间里。在财富滚滚而来的同时，作为一个相对隐没无闻的黑手党人，阿塞图拉在阴暗处过得顺风顺水，除了新泽西州少数几个有组织犯罪执法专家外，他的名字和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都不为人知。

偶尔惹上官司时，由于能够花大价钱聘请知名律师，图麦克总能让身犯重罪的自己获得缓刑或仅仅数月的刑罚。凭着金钱和关系向一名陪审员行贿 10 万美元，他曾将自己的敲诈勒索罪指控一抹干净，并帮助其新泽西行动队的 20 名成员赢得无罪宣判。还有一次，他的律师驳回了他在一起人身伤害案中威胁关键证人的指控。在佛罗里达州，通过找到诊断他患有精神疾病而不宜受审的精神病医师，一项棘手的阴谋罪控告也被挫败。其早老性痴呆症，即早期阿耳茨海默氏病（Alzheimer）的诊断纯粹是个骗局。“我在雨里滑了一跤，摔着了脑袋，阿耳茨海默氏病便走开了。”他对朋友说道，同时寡廉鲜耻地咧嘴笑开了。

在近 40 年里，黑手党——“科萨·诺斯特拉”——及其肮脏的毒品走私、暴力和谋杀都是被阿塞图拉所接受并珍视的存在。他认为黑手党的生活是如此美妙和值得拥有，以至他乐于让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加入黑手党，成为自己行动队里的一名荣誉者。

那天，他手捧着燃烧的圣像画，发誓永远效忠接纳他的家族。这个日子已深深铭刻在他的记忆之中。甚至在他入会之前，他就知道荣誉者所犯的最不可饶恕的罪行是违犯缄默准则“乌默它”。告密者所受的惩罚通常是一颗子弹被射进其后脑，阿塞图拉从不怀疑这种处决是罪有应得。

但在长期毫不动摇的忠诚之后，图麦克这个享有威望而又令人畏惧的角头，这个黑手党最典型的成功者，却背弃了他以前视为生命的“乌默它”和其他准则，他成了

叛徒。他向检察官，向调查人员，披露了其几十年来进行阴谋活动的罪恶秘密。他的证词使几十个黑手党人被曝光，而这些追随并效命于他的人曾经将他视为最可信赖的头领。而且，他的背叛象征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折磨“科萨·诺斯特拉”的难去之疾。保护了阿塞图拉和其他自命不凡的荣誉者达 70 年的“乌默它”和其他行为准则受到内外力量的无情破坏。

在 21 世纪的黎明来临之际，“科萨·诺斯特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在 20 世纪，黑手党在美国打造了一个独一无二且几乎牢不可破的犯罪组织。它的许多恐怖力量来自一种从褊狭的西西里岛传到美国城市的神秘传统。

第3章 根

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它们从求取自保的游击队式的松散团伙逐渐发展成贪婪而恐怖的帮派，其基本理念和指导原则将远涉重洋传播到美国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于偶尔来访的游客而言，几个世纪以来西西里岛都是一块充满着迷人魅力的土地，是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岛上非常好客的居民、阳光明媚的气候、迷人的棕榈树和柑桔与柠檬花那淡淡的芬芳让人心情愉悦，令人倍感诱惑。

但那些令人兴奋而肤浅的印象大多数都如海市蜃楼一般不真实。在两千多年的时期里，大多数西西里岛的人民都承受着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大地主所施加的暴政和压制。从古代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个9000平方英里的岛屿遭受过外来统治者的轮番袭击、入侵，甚至被用来做交易——确切地说是被用于换取其他的土地。西西里差不多处在地中海的中心，靠近南部意大利和北非，其兼具战略性与脆弱性的地理位置使它连续不断地遭受外来者的侵占和统治。这些外敌有腓尼基人、希腊人、伊特鲁斯坎人、迦太基人、罗马人、拜占庭人、诺曼第人、阿拉伯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奥地利人和最后的仇敌意大利军队。

西西里人饱经侵略与被占领的创伤生存了下来，他们依靠的是一种逐渐形成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根植于两个基本理念：藐视和怀疑政府当局；与面临相同危难的血缘亲戚和同胞紧密团结。

站在20世纪的制高点剖析许多西西里人所固有的受围心理时，卢吉·巴齐尼（Luigi Barzini）在其《意大利人》一书中评论道：他们在摇篮中就被教育，或者说生来就已经知道他们必须互相帮助，要与朋友站在一边对付共同的敌人，即使朋友是错误而敌人是正确的；每个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尊严，绝不容忍丝毫未加报复

的轻视和侮辱；他们必须保守秘密，时刻提防政府机构和警察。

随着时间的流逝，为防备耳目遍布的腐败压迫者以求自保，这些历史与文化的积淀催生出西西里语称之为“科斯切”（cosche）的秘密部族。没有可以信赖的公共机构来保护他们或他们的财产，那些主要分布在乡村的部族就依靠秘密行动、妥协和族间仇杀来取得私下的正义。

最后，这种秘密的“科斯切”在西西里逐渐有了一个共同名字：黑手党。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它们从求取自保的游击队式的松散团伙逐渐发展成贪婪而恐怖的帮派，其基本理念和指导原则将远涉重洋传播到美国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像许多西西里黑手党的根一样，其名字的起源也披上了民间传说与神秘性的色彩。有一个浪漫的传说，西西里黑手党称它的名字来源于13世纪晚期西西里主要城市巴勒莫抗击法国安茹省军队的一次起义。据称，一名西西里女人在反抗一名法国士兵的强暴时被杀死，他的未婚夫为了复仇就以残忍的方式杀死施暴者。据传这个富于幻想的事件成就了一个反判的、由每个单词的首字母缩略而成的名字：MAFIA（“Morte alla Francia Italia anela”（“法国人的灭亡是意大利的呼唤”）。1282年反抗法国占领军的一次起义被称作“西西里人的晚祷”，因为抵抗的信号是敲响教堂晚祷的钟声。

Mafia（黑手党）这个名字还有一个不甚浪漫却比较可信的起源之说，即它一种西西里-阿拉伯俚语的组合用语，意思是充当保护人打击权势者的傲慢。直到19世纪，mafioso（黑手党人）的称呼在西西里一直广泛流行。

“黑手党人在其私人恩怨中不会向政府或警察求援，也不靠打架来解决分歧，而是通过博得强硬而勇敢的声誉来为自己赢得尊重和安全。”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写道。“除了谨遵首要条款是禁止向政府当局告密的荣誉准则或‘乌默它’（男子气概）的首要条款外，他不认为自己要承担别的义务。”

对于19世纪一个继承了数世纪危险与压迫的文化遗产的西西里人来说，据说真正的男子气概包括一种不受摆布的傲慢，即在犯罪时保持缄口不言。对于他本人或亲人所遭受的攻击，西西里人保留着针对个人的族间仇杀（复仇）的权利。

对全岛所有的黑手党部族来说，它们从来不会在统一、集中的领导下开展活动而是以区域性帮派的形式涌现出来，其组织起来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特定的地方利益免受外国侵略者和西西里其他地区入侵者的损害。直至19世纪中叶，黑手党人一直被一些作家描绘成保卫和维护该岛神圣传统的爱国游击队员。部族也被称作“家族”，其主事者被称为老板、教父或者族长。这些专制的家族首领在其规模扩大的帮派当中

拥有仲裁纠纷与争端的权力。

1860年，复兴运动（统一意大利的运动）的军事英雄朱泽培·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带领1000名志愿兵在西西里登陆。这支部队因其别具特色的军服而被称为“红衫军”。在岛上居民的广泛支持下，加里波第轻松地击败了两西西里国王的军队，最后的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君主被废黜。

在聚集于加里波第的军队周围并响应他争取社会正义之号召的起义者当中，有约1000名来自乡间的草莽农民。受经济条件所限，这些人时而劳作于田间，时而躲入山洞为匪。为表示对这些亦民亦匪者的尊重，加里波第称赞他们是他的“Squadri della Mafia”（黑手党中队）。

在加里波第登陆并闪电般地取得军事胜利的一年之后，西西里——一个面积与佛蒙特州相近地区——作为一个省被并入新建立的意大利国。1863年，一部名为*I Mafiosi della Vicaria*（《监狱英雄》）的戏剧在西西里上演。这部戏剧中的黑手党人是一些遭受压迫却勇敢不屈的爱国者与囚犯，他们在刀枪的决斗中显示出其动作的勇猛大胆。这部戏剧在西西里和意大利进行了巡回上演，这些演出有助于将词语Mafia（黑手党）和mafiosi（黑手党人）引入到意大利的平民语言当中。1868年编纂的一部意大利字典以非犯罪之意定义“mafia”为“故作勇敢”。

但不到10年之后，西西里的解放和旧政权的覆灭将普遍的无秩序状态和猖獗的犯罪带到了这个岛屿。对于最具组织性并能动用看家护院的小规模私人武装的黑手党“科斯特切”而言，这些状况给它们带来了蓬勃发展的前景。通过形式诡秘的犯罪活动，他们充分利用了局势的混乱和司法与政府缺失的真空。在几乎没有法律与秩序的时期，“科斯特切”向富有的地主和商人收取例费，保证他们的财产免受损害，并保护他们及其亲人不受诱拐和勒索。

奇怪的是，为恢复法律与秩序的表象，新的中央政府于19世纪70年代招募这些家族，请他们帮助抓捕那些最为残暴的非黑手党匪徒。这些到处肆虐的匪徒使这个岛屿陷入惊恐不安之中，威胁西西里公共安全和经济稳定。

作为对黑手党提供帮助的一种回报，罗马新政府私下保证，“科斯特切”在西西里地区可以不受干扰地继续他们优雅的掠夺和经济控制方式。那些主要来自意大利中北部的罗马官员并不熟悉西西里文化的微妙之处，将这种私下交易视作一种有利的妥协方案。他们过于自信，认为黑手党首领们在他们和该岛居民之间会充当过渡性的中间人，并在年轻的君主立宪政体获得施加自己意志的力量之前能够帮助维持秩序。

然而，这种安排将一种事实上的许可证和一种新的动力赋予了黑手党家族。最强

大的家族集中于西西里西北靠近巴勒莫的地区，他们开始公开且更加厚颜无耻地活动，根本没有考虑要放弃他们的特权地位。

意大利的统一和新政府的成立导致许多西西里封建庄园破产和一部有关经济自由法案的出台。黑手党帮派抓住了这些意外的机遇。在根基尚不稳固的中央政府视而不见的情况下，这些家族事实上成了一个超脱于法律之外的代理政府，特别是在边远的农村地区。通过暗示施以暴力，这些家族开始向希望收割庄稼的新兴和在外地主榨取钱财。它们对城里的商人也进行类似的敲诈，承诺可以利用其影响力挡开政府，特别是收税员的干扰。

天主教教会成了许多“科斯切”的心甘情愿的合作伙伴，前者要依靠它们保护自己在该岛广大土地上的财产，并压制农民提出土地要求或者佃农索取更大报酬的诉求。出于对这种保护的感激，教堂领袖对黑手党人的高压策略保持了沉默。

只要家族“教父”认为可能，他就会授权给他的黑手党人廉价收购或垄断该家族想占有的有利可图的产业。这些家族或许伪称，他们是无助的农民和小商人的恩人、保护者和正义的施与者，但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自己致富。

黑手党家族在生意或土地纠纷上给予个人的任何帮助都有明码标价。受惠者迟早会被赤裸裸地要求履行某种契约——一种合法或非法的交换条件——作为对该家族给予帮助的补偿。

国家统一赋予了西西里人选举代表参加国家议会和进入地方政府的权利。对黑手党家族而言，这种民主改革也是一种福利。通过胁迫和控制选民集团，黑手党人帮助选出了许多政客。正因为如此，这些人对他们感恩戴德并听凭其摆布。

意大利统一之后，黑手党人在西西里充当着严厉无情的执法者，其最流行的典型形象是：肩上挎着一杆短枪，急切地要伸张黑手党式的正义。

在19世纪后期，为巩固他们的权力和抵抗敌对家族的入侵，那个最强大的“科斯切”采用一条新规：举行宣示忠诚的“乌默它”血誓仪式。一旦入会，新成员就要视自己为荣誉社团里的精英分子。作为“荣誉者”和“体面人”，他可以恣意嘲弄地自夸，“意大利国王或许统治着这个岛屿，但管理它的却是禀承我们传统的人。”

对黑手党家族怀以崇敬与畏惧的矛盾心理在西西里民俗学权威和超民族主义者朱泽培·皮特叶（Giuseppe Pitre）身上尤为明显：“黑手党是个性的力量，不能忍受别人的傲慢，”皮特叶在世纪之交谬误地写道，“黑手党将高傲的美、无与伦比的勇猛、往往更为强烈的本我意识、灵魂上的安宁和大胆却绝不自大、绝不骄傲的印象统一了起来。”

复兴运动带来一个新体制的政府，却未能给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数百万的无地农民和贫困劳动者带来繁荣。对意大利人，特别是对正极力摆脱他们在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困境的西西里农村人来说，美国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门户开放的移民政策变得极具吸引力。

1890~1920 年间，约有 400 万意大利和西西里移民来到美国定居。大多数人都是守法的技术工人、农民和没有技能的苦力。但正像每个大的种族移民群体一样，其中有少数人是罪犯，包括了解黑手党传统的潜逃者和寻找新机遇或逃避族间仇杀的低级黑手党人。

在这次移民潮当中，没有一个西西里“科斯切”试图在美国建立据点或分支组织。归根结底，这里并无必要。在西西里，黑手党家族是受优待的“富人”，而不是在遭蹂躏的“穷人”。他们没有理由放弃那令人羡慕的、舒适的生活地位到异国他乡冒险创业。

新奥尔良是美国最早接收意大利移民的港口城市之一。他们乘坐的海船被称作“柠檬船”，因为这些船只在运送移民的同时，还装载着产自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柑橘类水果。

在美国黑手党的历史上，新奥尔良无意中成了“科萨·诺斯特拉”的普利茅斯洛克（据说 1620 年清教徒在英国登陆的地点），即首批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黑帮分子在美国的落脚点。他们是一些低级的仿效原黑手党的伎俩甚至借用那个秘密社团名号的犯罪分子。最终，他们的后代和继任者成了真正的美国黑手党家族的成员。

到了 1890 年，有一千多名意大利移民生活在新奥尔良，并有两个暴力团伙为控制港口装卸生意而火拼。在长期争斗的巅峰时期，警察局长戴维·亨尼西 (David Hennessy) 因被怀疑收受其中一个帮派贿赂被杀。谋杀激怒了一大批治安维持会的成员，他们用私刑处死了 16 名意大利人。在这些人当中，有数人被指控为杀害警察局长的同谋。

调查该案的大陪审团首次用文件证明某种形式的黑手党已抵达美国，同时强调了搜集与这个秘密社团有关的情报所存在的困难。在 1891 年在一份报告当中，陪审团宣称：“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确实存在被称为‘黑手党’的秘密组织。证据来自多名他们自己就完全能证明其真实性的内情披露者，而真相也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累累罪案的支持，但要找到犯罪者或得到证人却又几乎不可能。”

尽管新奥尔良经历了黑手党首次渗透美国的事件，但大批西西里和意大利移民的主要聚居地是像纽约这样的东北部城市。此外，20 世纪初，黑手党人的仿效者和其他

掠夺者也麋集在那里。暴徒们掠夺自己那忧虑不安的同胞，而这些人正在适应不同语言和不同习俗，并对美国执法机构心存犹疑。

在意大利人移民的初期，纽约和其他东部大城市的警察经常把黑手党和打着“黑手”（Black Hand）旗号活动的个人或团伙混淆。“黑手”是一种个人或小帮派实施随意敲诈的野蛮手法，与黑手党没有直接联系。“黑手”不是一个组织，主要向意大利人聚居区的生意人和店主送出恐吓信，警告他们如果不为其持续的安全买单就会面临可怕的伤害或死亡。为了扩大恐吓效果，一个令人恐惧的符号——边缘饰以刀和头骨的一个黑手图案——被印在每封信上。

面对意大利人聚居区急剧飙升的犯罪与凶杀率，1883年纽约警察局招募了第一个讲意大利语的警官“乔”朱泽培·彼得罗西诺（Giuseppe “Joe” Petrosino）。彼得罗西诺出生在意大利南部，13岁时随父母移民纽约，在从警前干过擦皮鞋和清扫街道的工作。生性固执、身体结实的彼得罗西诺只有1.62米，警方官员不得不放弃警局的最低身高标准将他纳入警队。在意大利和西西里人管辖区，讲英语的警官或探员对搜集线索表现得无能为力，更不用说破案，因而工作效率极低。和他们不同，在追捕危险的嫌犯方面，工作勤奋、熟悉街头情况的彼得罗西诺证明了自己的价值。1895年，时任纽约市最高民事警察首长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提拔彼得罗西诺为探员。善于伪装并能够讲多种意大利和西西里方言的彼得罗西诺使五百多名罪犯被判刑入狱。他的工作业绩使他取得了警尉之职，而每当发生牵涉到西西里或意大利人的重大案件，头头们就会大声喊道，“交给那个意大利人”。

和许多执行危险任务的雄心勃勃的警官一样，彼得罗西诺期望正面的新闻报道有助于他的事业发展，所以他曾向新闻记者披露过在大案当中即将实施的抓捕行动。有个事例是他向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恩里科·卡鲁索（Enrico Caruso）提供帮助。卡鲁索当时接到一封勒索5000美元的“黑手”信，这笔钱在20世纪初算是个大数目。卡鲁索原打算满足勒索者的要求，直到彼得罗西诺劝说这样只会让他面临着更多和更大的敲诈才罢手。于是这位侦探设了一个陷阱，亲手抓住了那个前来收取勒索金的人。

彼得罗西诺竭力让警方高层明白，意大利罪犯何以将纽约和其他大城市视为如此诱人的目标。“这里实际上没有警察的监视，”他在一份备忘录中报告提到，“这里容易购得武器和炸药，这里对使用假名没有处罚措施。由于我们宽广的国土和拥挤的城市，这里还易于躲藏。”

到了1909年，彼得罗西诺的建议引起了注意，当警察局长西奥多·宾厄姆

(Theodore Bingham) 派他到意大利和西西里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时，他已成为一个拥有 25 名成员的小组——意大利中队的主管。美国的一部新法律允许驱逐任何在其他国家被定罪和在美国居住不到三年的外国人。拿着一份长长的要犯名单，彼得罗西诺要在意大利证实他们的犯罪行为，然后带着证据回来将他们赶出美国。

不幸的是，在彼得罗西诺出国期间，好出风头的宾厄姆向一家纽约报纸披露了他的任务性质，西西里黑手党因此听到了探员赶到那里的风声。显然对彼得罗西诺插入到他们的后院感到恐慌，西西里黑手党决心向其他潜在的美国调查人员发出威慑信息，于是这位探员在到达巴勒莫的第一天就被瞄上了。在旁边矗立着加里波第雕像的马利纳广场，他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杀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手法老道的刺客在近距离朝他连射两枪，一枪射进后脑，另一枪正中颜面。

黑手党头目维托·卡肖·费罗 (Vito Cascio Ferro) 后来声称对这起谋杀负责。唐·维托曾在纽约短时间待过，他显然对彼得罗西诺追根究底地调查西西里案犯感到愤怒。

纽约为彼得罗西诺举行了葬礼，25 万市民涌向街边悲哀地向送葬队伍告别。为纪念这位倒下的英雄，纽约市将下曼哈顿的一小块土地辟为“约瑟夫·彼得罗西诺警尉广场”。如今，此处空荡荡的混凝土平台成了小意大利附近的一处道路隔离带和行人安全岛，与它相隔一个街区的是老警察总部，那里是彼得罗西诺最后从局长宾厄姆那里接受那致命任务的地方。

彼得罗西诺成为执行海外任务时被谋杀的唯一一名纽约警官，其凶手一直逍遥法外。数十年后，在 20 世纪即将落幕之际，纽约黑手党仍稳如磐石，并像其早年的西西里前身那样肆无忌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彼得罗西诺广场的对面，有家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张的玫瑰夫人饭店 (La Donna Rosa)。其老板是当时的黑手党高级党徒阿方斯·达尔科 (Alphonse D'Arco)。这个饭店被达尔科当成一个安全的会议场所，是卢切斯犯罪家族策划谋杀和其他犯罪活动的地方，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为缅怀彼得罗西诺警尉讨伐黑手党而树立的纪念碑。

第4章 城堡之战

黑手党成员负有一种终生的责任，没有辞职和提前退休的规定。“唯一的出路是躺在棺材里。”

在20世纪的前20年里，纽约的意大利移民罪犯要么是街头上无纪律的乌合之众，要么是些单独活动的抢劫犯。到了1920年，有近100万意大利移民生活在纽约，他们大部分来自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这些人约占所在城市人口的15%，并被挤进三个聚居区：小意大利、曼哈顿区的东哈雷姆和布鲁克林区的威廉斯堡。和其他种族犯罪团伙一样，新来的黑手党人和其他意大利暴徒大多都将自己的同胞作为侵害对象。此外，爱尔兰恶棍在曼哈顿西区进行着类似的活动，犹太暴徒的势力范围则是下东区。

一场政治与社会的地震——禁酒令——将彻底改变这些尚未形成气候的意大利、犹太与爱尔兰黑帮分子在美国的犯罪活动。加上另一场剧变——法西斯在意大利的胜利，禁酒令将极大地改变黑手党在美国的作用，使它成为这个国家的超级犯罪组织。

禁酒令，美国宪法第18修正案，于1920年1月生效，将所有酒精饮料的生产和销售定性为联邦犯罪。历史学家斯蒂芬·福克斯（Stephen Fox）形容这部法律是一种“社会控制的种族试验”，企图保护国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特性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禁酒令的支持者形容这项禁令是一种保护美国乡村的那些看起来有益于身心的田园价值免受堕落的大城市及其大量外来人口影响的改革运动。

实际上，在污秽的城市中心，许多意大利、犹太与爱尔兰黑帮分子很快觉悟到这部法律的意义和它给一种新型犯罪带来的巨大机遇：给守法却爱喝酒的顾客供应啤酒和烈酒。一夜之间，在公寓房里，在工棚里，在店铺的后堂，那些被称为“酒精锅”的简陋蒸馏器或蒸馏室在纽约少数民族聚居区遍地开花。

与此同时，黑手党在西西里岛半个世纪的平稳发展突然遭遇了挑战。20世纪20

年代早期，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法西斯政权控制了意大利政府，并迅速消灭所有对法西斯专政的绝对霸权持异议的敌对势力。出生于意大利北方的墨索里尼深知黑手党在西西里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并且清楚它在历史上对所有罗马中央政府都持以轻视态度。

1924年，墨索里尼访问西西里时受到冷遇，这激起了他对黑手党的敌意。黑手党头目唐·西西奥·卡西亚（Don Ciccio Cuccia）是希腊平原镇的镇长，他适时地表达了黑手党对领袖的无礼。当傲慢的墨索里尼起身发表演讲时，除了镇长召来的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和山村傻子外，主广场上空荡荡的一片。在另一个镇的欢迎会上，尽管有贴身警卫的保护，但黑手党还是设法偷走了墨索里尼的帽子。

随后墨索里尼展开了迅速而严厉的报复。他将极权主义的警察权赋予冷酷无情的北方官员切萨雷·莫里（Cesare Mori），并交给他一支特务部队去铲除黑手党。在憎恨黑手党的势力和不满其勒索要求的地主和商人的帮助下，被称为“铁血长官”的莫里残酷地围捕并监禁几十个家族“教父”和他们的打手。

在与墨索里尼的战争中，首批牺牲者就包括轻率的唐·西西奥·卡西亚。在广场受辱事件一个月以后，复仇心切的墨索里尼未经正式审判就将唐·西西奥判处长期监禁。（“唐”是一种表示敬意的荣誉称呼，并不是继承的或贵族化的头衔。）

作为公开羞辱受审黑手党人的一种方式，莫里造了一些铁笼子，在出庭时将他们囚在里面。由于对前期司法程序的慢节奏感到不悦，墨索里尼下达了强硬的指示：“法西斯的审判必须迅速而果断。如果审判不快些进行，到2000年都不能将黑手党整肃干净。”

在莫里的大规模围捕与审判结束之前，有1200多名黑手党嫌犯被宣判有罪，并被处以从数月到终身监禁不等的刑期。巴勒莫是镇压的中心，那些黑手党人被指控的罪名通常是“结伙犯罪”和特定的谋杀、敲诈、勒索、抢劫和偷盗罪。

墨索里尼在打击黑手党的恐怖统治中得到了意外的收获，那是一种可随手拈来的借口，用以逮捕和消灭被不实地污称为黑手党人的西西里自由主义者、左翼分子和其他政治对手。

西西里黑手党从来没有考虑渗透到美洲或在美国成立分支组织。但墨索里尼与莫里的镇压证明是那么残酷，它导致大批新老黑手党人大量离开意大利以逃避不可避免的拷打和监禁。随着事实上禁止从意大利移民的《民族起源法》的颁布，向美国无限制的移民于1924年被终止。许多已上路的西西里黑手党人没有被移民限制吓住，他们将自己描绘成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继续前往纽约。没有费多少周折，他们就潜入

了美国，并联系上已经立下脚跟的西西里黑帮。

在这些最早的非法侨民当中，有一个叫约瑟夫·博南诺（Joseph Bonanno）的人将在美国创建一个黑帮帝国。博南诺的父亲和近亲都是宣誓过的黑手党党徒，他本人来自黑手党在西西里西海岸的神圣城堡——“海边城堡”（Castellammare del Golfo）。城堡里经受墨索里尼的清洗而生存下来的家族成员为他的美国之行提供了经济与道义的支持，同时居住在美国的城堡亲戚也对他给予了帮助。1924年，19岁的博南诺从古巴偷渡进入美国，来到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区。在那里，一个移民的城堡犯罪家庭已经扎下了根。

和其他新来的黑手党移民一样，博南诺对禁酒令所带来的光明前景感到惊讶。这是“每天能下一金蛋的鹅。”他狂热地说道。他的第一份不法事业是和其他年轻的城堡移民一起在布鲁克林开了个蒸馏室。“第一次进入私酒行业时，我觉得这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博南诺在他60年后出版的自传《体面人》中写道，“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错。没有警察找麻烦，这看上去相当安全。每个人都有许多买卖可做，利润是惊人的。”

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违反或无视禁酒令修正案是一种性质良善的游戏，而不是一种耻辱。在修正案通过后，国会批准的《美国禁酒法案》（通常称为“《沃尔斯特法案》”）对该法进行定义和强化，所有酒精含量超过0.5%的饮料都被认定是致醉品而被禁止。

大多数政府官员、法官和普通民众普遍认为，满足了这个国家巨大酒瘾的私酒酿造商、私酒贩子和地下酒吧业主不过是提供了一种基本的产品与服务。在执行一部存在争议且不大受欢迎的法律时，除了少数勤勉而清廉的联邦事务官外，地方和联邦法官一般都视而不见和放之任之。国家执法权大部分授予了新成立的财政部联邦禁酒局，这个机构不久就变成了一个笑料，因为在行政上大量任命腐败无能的冒充调查员的庸才，它受到了外界的普遍嘲笑。

大多数地方执法机构没有多少兴趣干涉贩私酒活动。实际上，许多在政治情感上亲“自由主义”（反禁酒令）的州县通过了一些看上去对私酒商有利的法律。纽约州在保护这种非法产业方面可能走得最远。1923年，纽约立法机构废止了脆弱的州禁酒法，因此在逮捕违法者的行动中，排除了地方警察部门为接纳或协助联邦特工而提出的任何请求。

受纽约宽松的执法环境所鼓舞，西西里帮派和犹太、爱尔兰私酒商放弃了简陋而

脏乱的酒精蒸馏室。他们开发了更加精密而经济的生产工艺，并从英国和加拿大走私优质白酒，还开办了自己的地下酿酒厂。这主要归因于贩私酒活动，除了海外的城堡家族外，其他几个组织松散的西西里帮派（有些帮派里还有来自那不勒斯地区的南部意大利成员）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都兴旺发达起来。

酿酒厂的利润十分可观。每桶啤酒的生产成本不超过 5 美元，而卖到地下酒吧就可净赚约 36 美元。供应威士忌酒和其他烈性酒赚取的未上税的非法利润甚至更高。

在种族对手间的竞争当中，西西里-意大利私酒商缺乏爱尔兰黑社会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在腐蚀拉拢警察方面，许多爱尔兰警察为他们提供了方便。爱尔兰黑帮分子在人数上和意大利人相差无几。但意大利黑手党拥有一种特别的资产：他们的对手认为他们具有更好的组织性，每当为争夺地盘和顾客而火拼时，他们表现得更为凶狠，更为可怕。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纽约最大的意大利帮派盘踞在东哈莱姆区，其头领是西西里中年移民“乔”朱塞佩·马塞里亚（Giuseppe “Joe” Masseria）。他身材矮胖，面颊肥厚，眼睛小而窄，因此博得了“中国人”的绰号。但马塞里亚自称“乔老板”，并成为第一个用此称呼而非传统的西西里头衔“教父”来表示美国黑手党家族首领的人。

马塞里亚靠着一段暴力而血腥的经历起家。在争夺贩私酒地盘和非法赌博生意的拼斗中，他领着一帮暴徒杀死了三十多名对手。在命令手下处死对手时，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把我鞋子里的石子拿走”。

尽管其肥胖身材不便于运动，但在街头伏击和枪战中，或躲避子弹，或追赶和摆脱刺客，马塞里亚的动作都敏捷得不可思议。与对权力的追求一样，他对食物的偏好也不可遏止。他一天当中会数次坐下来大快朵颐，狼吞虎咽地吃掉三盘意大利面食和一份配菜。马塞里亚的贪食习性和糟透的饭桌礼仪——训斥同桌者时，食物常常从他口中喷溅而出——惹得其贬低者给他起了另一个绰号——“贪嘴乔”。

马塞里亚成功的部分原因得益于其敏锐的眼光，能够发现人才来管理和保护他的生意。他最得意的三个门生是少年时就移居美国的塞尔瓦托·卢卡尼亚（Salvatore Lucania）、弗朗西斯科·卡斯蒂里亚（Francesco Castiglia）和盖塔罗·卢切斯（Gaetano Lucchese）。卢卡尼亚便是后来的“洛克”查理·卢西亚诺（Charlie “Lucky” Luciano）。卡斯蒂里亚将其洗礼名改为弗兰克·科斯特洛（Frank Costello）；而卢切斯将更多地以“三指布朗”汤米（Tommy “Three-Finger Brown”）的名号为人所知。这三个人在美国黑手党的万神殿中都将获得显赫的地位。

1925年，另一名被墨索里尼-莫里那势不可挡的力量赶出西西里的非法移民塞尔瓦托·马兰札诺（Salvatore Maranzano）来到了美国，他的到来使城堡家族恢复了活力。拥有唐·特里度（Don Turridu）荣誉头衔的老黑手党人马兰札诺当时40岁出头，是黑手党传统的忠实护卫者，在故里时是家族里最优秀的战士之一。他带着少许财产来到美国，并很快投身到私酒行业之中。

并非等闲之辈的马兰札诺在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北部建起了高级威士忌酒厂，并将20岁的乔·博南诺收罗在他的门下。为防备对手的劫持，博南诺精心挑选了一批武装枪手，专门保护马兰札诺的那些经常伪装成牛奶槽车的威士忌酒卡车。

和乔·马塞里亚不同，马兰札诺认为自己是个有阅历、有教养的欧洲人。尽管他只能说些蹩脚英语，但马兰札诺吹嘘自己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用低沉的西西里方言，他津津乐道于向他那没受过学校教育、几近目不识丁的手下们讲解古典文学和其偶像——朱利叶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德行。作为经营私酒生意的一种掩护，马兰札诺在小意大利设立了一家据称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公司。

马兰札诺的买卖和个性都有着残忍无情的一面，这在他教导年轻的博南诺时有所表露。他告诫他的被保护人，猎杀动物比较简单，而取人性命则需要勇气和谨慎。“当你向一个人瞄准时，你的手发抖，你的眼睛刺痛，你的心狂跳不已、你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博南诺记得马兰札诺向他这样说过，“如果可能的话，你在任何时候都要用你的枪碰碰尸体，确认那人已经死亡。人是最难杀死的动物。如果他逃掉，他就会回来杀你。”

那些话不久就被证明是富有预见性的。1930年，当马塞里亚自封为全纽约黑手党人的“乔老板”并向每名党徒索要1万美元作为承认其地位的贡金时，城堡犯罪家族的其他成员就转而投靠马兰札诺，接受他的指挥和领导。马塞里亚便开始派遣职业杀手谋杀不顺从的城堡家族的打手。煽动叛乱的马兰札诺拒绝服从马塞里亚或承认他的权威，从而点燃纽约地区两大犯罪家族间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冲突。随着伤亡数字的攀升，双方都向纽约其他帮派和其他城市的黑手党人求援。在西西里-意大利黑社会内部，这次黑手党大屠杀被称为“城堡之战”。

在意识到自己是首要伏击目标之后，马塞里亚和马兰札诺都安排保镖重重护卫，在城里活动时都以装甲汽车代步。马兰札诺的坐驾是一辆定做的凯迪拉克，采用金属板车身和防弹车窗。他在后座上装上了一挺可向窗外扫射的旋转机枪。作为近战的备用武器，他随身带着两把大口径手枪和一把匕首。

虽然充当一名高级助手为马塞里亚效力，但29岁的洛克·卢西亚诺担心这种死

伤惨重的街头枪战会给各帮派招来令人讨厌的恶名。更为糟糕的是，枪战会逼迫警察展开调查，从而危及他和同伙们那平稳且源源不断的非法收入。

从一开始，卢西亚诺就反对乔老板追求绝对控制力与影响力的专横之举，担心它最终会给主要参与者带来死亡和混乱。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卢西亚诺就频受挫折。他提出了将不法产业现代化和扩大规模的建议，但遭到马塞里亚的拒绝。

卢西亚诺的经营理念包括通过与其他意大利和非意大利帮派合作，使国际贩私酒活动简化并更有效率，以便输入更多的私酒并消除抢劫行为。他知道，通过向更多的执法人员承诺更丰厚的贿赂，这种合作将会阻止司法界的干预。

此外，卢西亚诺希望扩大劳工诈骗、赌博和色情业活动的空间。这些活动的许多方面都需要犹太或爱尔兰黑帮分子提供暂时或永久的合作。持怀疑态度的马塞里亚不愿意接受结盟策略，哪怕是和与之相竞争的西西里和意大利黑手党人，尽管他知道这些人拒绝与犹太或爱尔兰暴徒做任何生意。

卢西亚诺代表着在美国长大的新一代讲英语的黑手党人，他对马塞里亚及其老一辈移民伙伴那偏执且不合时宜的行事方式变得越来越不屑一顾。卢西亚诺和他的密友们轻蔑地将马塞里亚和其同类人称作“胡子皮特”和“外国佬”。

经过 18 个月的火拼之后，眼看这场城堡之战没有终结之日，卢西亚诺便通过出卖马塞里亚进行干预。据充当马兰札诺战时参谋长的乔·博南诺称，在一次秘密会见马兰札诺的时候，卢西亚诺提议通过除掉马塞里亚和接管他的帮派来停止敌对行动。作为交换，马兰札诺将召回其杀手，承认卢西亚诺为地位对等的老板，两个帮派之间将实现和平。

怀揣着秘密协议，卢西亚诺迅速行动起来。他诱骗马塞里亚，邀请他到科尼岛吃龙虾、打牌，并在其特别喜欢且觉得安全的饭店——“塔玛罗新公馆”聚会。

会议于 1931 年 4 月 15 日举行，名义上是要找出办法伏击马兰札诺。马塞里亚乘坐装配了 3 英寸厚防弹玻璃的私人装甲汽车赴会，一路由三名保镖随行护卫。在餐后甜点上来之前，卢西亚诺起身走进洗手间。当那三名保镖神秘地从饭店消失之后，卢西亚诺的四名杀手们突然现身，将乔老板打成马蜂窝。《纽约每日新闻》（以情节剧的夸张手法）报道称，马塞里亚死时“用戴满珠宝的手紧抓着黑桃 A——死亡卡片”。

在接受侦探的讯问时，卢西亚诺未能就这起谋杀的动机吐露任何看法。不幸的是，他补充说，他没有枪手的任何线索，因为他当时正在洗手，没有看见任何情况。

随着马塞里亚的出局，卢西亚诺被劫后余生的城堡家族当成耀武扬威的英雄受到欢呼拥戴。卢西亚诺获得了回报，他接管了马塞里亚那规模庞大的帮派。而马兰札诺

则向三个较小的犯罪家族的新首领送去了祝福，他认为这些人是值得信任的盟友。

但马兰札诺注定要给卢西亚诺一个意外。为彰显其自许的统治地位，马兰札诺召集芝加哥的阿尔·卡彭（Al Capone）和美国其他地方的黑手党首领到距离泰晤士广场75英里的小瓦平哲斯弗斯（Wappingers Falls）的一家度假酒店开会，向他们通告了纽约新的权力构成。这次会议的主要意图很明显：马兰札诺自封为纽约的最高首领，由于该市正成为美国黑手党的活动中心而具有突出的地位，他希望被公认为全国所有老板的领袖。

实际上，马兰札诺已经宣称自己是“capo di tutti capi”（老板中的老板）。

在纽约，他开始向城堡和其他犯罪家族发布组织命令。他曾经对凯撒极为崇拜，便希望这些家族能松散地仿效古罗马军团的军事指挥体系。教父或老板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将拥有无可置辩的统治权。其主要助手或执行官是二老板。行动队或街道小组（decini）将会组建，由十名或更多的人会打手或者说荣誉者组成。每支行动队由一名老板任命的角头或队长领导，这些小组将构成家族的骨干力量参与所有非法活动。

马兰札诺进一步下令，重申黑手党那些在西西里岛不可违犯的帮规也适用于纽约所有家族。其主要规条包括无条件服从教父或老板和他指派的官员；不得对黑手党同道之人进行人身攻击或侮辱；禁止向黑手党人的妻子或情人求受或存以非法之想；最为重要的是必须遵守缄默准则“乌默它”，违犯规约者将被处以死刑。

马兰札诺的高压措施激怒了卢西亚诺。卢西亚诺现在对他进行了重新评判，认为其思想比马塞里亚更为落后。马兰札诺不仅没有兑现他们在纽约平起平坐的约定，而且正在热切地追求统领全国的权力。

从亲信“三指布朗”汤米·卢切斯那里，卢西亚诺听到了更令人担忧的消息。狡猾的卢切斯讨好马兰札诺及其高级助手，得知马兰札诺已指派爱尔兰杀手“疯狗”文森特·科尔（Vincent “Mad Dog” Coll）企图用机枪谋杀卢西亚诺。

为了与自己的新贵地位相称，马兰札诺将其总部从小意大利搬到大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顶层大楼里的一间高档办公套房里。卢切斯的间谍向卢西亚诺透露，马兰札诺惹上了税费麻烦，估计他的假进出口贸易档案将受到美国国内税务局的稽查。预料到会有一场查账风波，马兰札诺指示保镖在他的办公室里不要带枪，确保不会因为违犯枪支管理规定而发生拘捕事件。

要想迅速行动将马兰札诺从其保镖手中抢走，卢西亚诺相信大中央办公室将是他的最佳机会。1931年9月10日，卢切斯突然出现在那间办公室，态度谦恭地前来拜访马兰札诺。几分钟后，一群自称美国国税局事务官的人大摇大摆地涌了进来。没有

谁看起来像西西里或意大利人，马兰札诺和他的保镖都没有怀疑他们是些雇佣杀手。在保镖们反应过来之前，那些杀手抢先制服了他们，并用枪逼着他们和卢切斯及一名女秘书一道面墙而立。

卢切斯点头确认了马兰札诺，一名枪手随后用肘碰了他一下，示意马兰札诺进入他自己的私人办公室。拼命挣扎的声音随即传了出来，紧接着便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枪声。在他的劲敌乔老板被铲除 5 个月之后，马兰札诺倒地身亡，浑身布满枪眼和刀洞。

有组织犯罪历史学家们并不能肯定卢西亚诺是从一开始就打算把马塞里亚和马兰札诺当成恐龙——阻碍黑手党前进和重组的障碍物除掉。

卢西亚诺身材瘦小单薄，留着一头黑发，表情冷漠的脸上布满麻子。9 岁时，卢西亚诺从巴勒莫附近的一个村庄来到纽约。14 岁时辍学之后，他在 10 年间留下了一连串被捕记录：武装抢劫、非法持枪、人身攻击、大窃盗罪、赌博和持有毒品。不同寻常的是，绝大多数指控都被驳回，除了一个 18 个月监禁的判决外，卢西亚诺逃过了所有的长期监禁。一位监狱心理学家对他有过恰如其分的分析，认为他智商高，但具有“好斗、利己和反社会的人性特征”。

少年时，卢西亚诺曾在一家帽厂当过一名周薪 5 美元的售货员，那是他拥有的唯一一份正当工作。在一次掷骰子赌博中赢了 244 美元之后，他当天就辞去了工作。他利用在工厂里获得的经验来隐藏海洛因，即将毒品藏在帽箱里转运和出售。18 岁的时候，他向一位缓刑官坦承，他发现按部就班的工作不适合他的个性。“我绝不是一个可鄙之人，如果我不得不做个可鄙者，我宁愿去死。”他告诉那个与他面谈的官员。在洛克的词典里，“可鄙者”就是辛辛苦苦地干着乏味而艰辛工作的普通人，他们拼命攒钱却从来不能尽情享受奢侈的乐趣。

到他 20 岁的时候，卢西亚诺已经博得了“洛克”（Lucky）的绰号，但无人知晓他赢得这个名字是不是因为他的赌博成就，还是因为从刀枪攻击之下死里逃生，或者是源于其意大利姓氏的美语读音错误。他命悬一线的时刻于 1929 年到来，当时他被绑架到斯塔腾岛上的一个仓库里，双手被捆绑吊在一根横梁上遭到毒打。坚守黑道行规的卢西亚诺拒绝告诉警方是谁和为什么要绑架他，这段经历在他的下颚上留下了一道锯齿状的伤痕。

在下东区（纽约东部的贫民区），当还是个未加入马塞里亚帮派的野小子时，卢西亚诺就和犹太族黑帮分子结成了将持续一生的同盟关系。查理·洛克最亲密的犹太犯罪盟友是精明的迈耶·兰斯基（Meyer Lansky）和兰斯基的一个反复无常的同伙

“毕斯”本杰明·西格尔 (Benjamin “Bugsy” Siegel)。

在纽约黑手党人看来，几乎可以肯定是卢西亚诺策划了马兰札诺谋杀案，而且其杀手队就是由他的犹太同盟者召集来的。然而，卢西亚诺散布消息称，他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嗜权如命的马兰札诺要无故杀掉他，因此按照黑手党的规约，这起谋杀是情有可原的。

城堡家族对卢西亚诺构成的唯一危险是一场新的战争，或者说是他们为其首领报仇的暗杀企图。但卢西亚诺的自卫声明很容易被人接受，甚至马兰札诺的铁杆拥护者乔·博南诺也表示认可。回想马兰札诺在赢得一场残酷斗争后的专横表现，博南诺相信他的老板是个精明的军阀，但不能适应新的美国化犯罪者的文化与生存策略。尽管在美国生活了6年，但马兰札诺很少讲英语，不能与年轻的犯罪分子交流，也不能理解他们的街谈巷语和俚语。

“马兰札诺在性情和风格上都属于老式西西里人，”博南诺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但他再也没有生活在西西里。在纽约，他不仅是西西里人，而且是美籍意大利人的顾问。”

成为城堡家族的首领之后，博南诺发现了卢西亚诺给黑手党带来新气象的才智，从而接受了他所描绘的“和平之路”。随着他们之间的战争结束，卢西亚诺和博南诺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者还有纽约另外三大家族的首脑，卢西亚诺认为他们会赞同自己的计划。这三位首脑是盖塔罗·加利亚诺 (Gaetano Gagliano)、文森特·曼卡诺 (Vincent Mangano) 和乔·普罗旺斯 (Joe Profaci)。没有任何特定的蓝图，到了1931年，五大黑手党家族在经历了10年的动荡之后逐渐成形了。

名称各异、首领不同的五大家族将继续生存到下个世纪。没有其他美国城市存在一个以上的黑手党家族，也没有其他的犯罪家族能在规模、财富、势力和影响力方面接近纽约的任何一个家族。

是年年底，纽约老板们赶到芝加哥参加一场国际会议。与会者还有芝加哥的意大利黑手党巨头阿尔·卡彭和全国各地二十几个黑手党帮派的首脑们。为避免家族内部和家族之间爆发战争并开创持久的繁荣局面，主要革新者卢西亚诺在会上阐述了他的理念。他沿用了马兰札诺那注重实效的人事组织结构来完成家族的大量工作，但对等级体系进行了革新。为缓和家族内部矛盾，解决与其他犯罪家族之间的争端，除了二老板外，每个家族的领导层或管理层将设置一名顾问，由有经验的律师或有外交手腕的人担任。

卢西亚诺注意到，西西里人传统上依赖绝对忠诚于家族的“乌默它”戒律和其他

许多规约，还有马兰札诺为防止执法人员渗透而提出的安全措施，在实践中都体现出了高度的智慧。这些行为标准将成为黑手党神圣的准则，即它的十诫。

无需商讨或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其父母均出身于西西里或意大利南部的人才能成为黑手党成员的提议得到了老板们的普遍认同。要想被家族接纳，父母双方只有一方属于意大利人血统是不够的。血统是决定是否值得信任和吸收为荣誉者的关键性因素。当时，每个家族荣誉者的人数是固定的，只有为了填补死亡者遗下的空缺才能接纳新成员。控制每个家族的实力是为了防止出现意在支配其他家族和可能引发地盘冲突的秘密扩张。限定成员人数也被视为一种有系统的用以选取最优秀和最能干的候选者的办法。

卢西亚诺申明，黑手党成员负有一种终生的责任，没有辞职和提前退休的规定。“唯一的出路是躺在棺材里。”洛克强调。

虽然不是书面文件，但该准则阐明了黑手党的基本指导原则：黑手党成员个人的需要与安全要服从于每个家族和整个美国黑手党的生存。

每个家族因此有义务保持经受住任何执法进攻的组织生存能力。这项准则的目的是使家族能够持续有效地运作，即使老板或其他首领被带走时也一样。

组织将是至高无上的，而它的部分则是可以替代的。

卢西亚诺又公布了他的一个设想，即他最引人注目的在西西里黑手党或美国黑帮中并无先例的创新，这就是管理委员会的创立。它相当于一个全国性理事会，将为全国所有家族制定总的政策和规定，并解决可能出现的地盘冲突和其他争端。管理委员会将是全国所有家族相互联系的至关重要的纽带，将确保在共同的犯罪事业上能够合作和保持协调。它类似于黑社会的最高法庭，其主要功能是在承认各个帮派主体性的基础上防止爆发冲突。

卢西亚诺和博南诺最初根据其主旨想将这个新机构命名为“和平委员会”。但生长于美国的年轻的黑手党人发现这个名字难以用意大利语或西西里语发音。

卢西亚诺给予纽约所有五大家族都有向管理委员会派驻代表的权利，明确规定了纽约在黑手党全国权力等级中的主导地位。这个新机构的其他成员将来自于芝加哥和布法罗，其附加规定是必要时可有更多的家族加入。

芝加哥的入选是对卡彭及其帮派的势力、财富及其在中西部对诸多不法产业拥有控制权的明确认可。布法罗家族的老板是另一名来自海边城堡的移民斯蒂法诺·马嘉迪诺（Stefano Magaddino）。马嘉迪诺备受尊崇且令人生畏，因为他是乔·博南诺的堂兄弟，与中西部和加拿大的黑手党组织有事务上的联系。

卢西亚诺坚持管理委员会里每个家族只有一票，所有决策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规定，这让黑社会代表大会颇感意外。他在纽约的成功使他上升到举国无敌的重要地位，他在全国的黑手党老板当中冠绝时辈是不存在多少争议的。

即使大家对查理·洛克自封为老板中的老板应该不会有反对意见，但卢西亚诺目睹了过去10年间各个家族为争夺优势地位和黑社会主导权而进行的血腥冲突，并经历了流血的高潮——城堡之战，这让他意识到强加一个最高领袖的企图总是无功而返。

好莱坞电影制作人马丁·戈斯克（Martin A. Gosch）称，在芝加哥举行秘密会议30年之后，卢西亚诺和他一起回忆了相关情况，准备将其生平拍成电影。戈斯克声称，卢西亚诺以生动的话语概括了参加会议的主要意图。他说：“我向他们解释过，所有的战争谎言都被戳穿。我向他们讲过，我们处在不到两分钟就会发生爆炸而不得不疲于奔命的境况之中，把人除掉仅仅是因为他们来自于西西里的其他地方，这种无意义之举正败坏了我们的名声，如果不停止这一切我们就不能正常活动。”尽管戈斯克与卢西亚诺的谈话内容从来没有其他文件能予以证明，但这处引语与调查人员发现的卢西亚诺关于芝加哥会议目的说明能够相互印证。

“科萨·诺斯特拉”专家一致认为，卢西亚诺的改造计划被美国各个黑手党家族所接受。卢西亚诺的策略清楚地表明，美国黑手党家族将绝不是西西里黑手党的附庸或追随者。尽管吸收了西西里的传统，特别是其“乌默它”准则，但美国自主自决的黑手党人正使自己适应他们大陆那即存的独特的社会与文化力量。

据称芝加哥秘密会议在布莱克斯通酒店（Blackstone Hotel）闭幕，阿尔·卡彭在那里设宴款待了与会代表。这些人寻欢作乐，仿佛置身于爵士时代，尽情享受着妓女们那曲意迎奉的种种快感。

无视美国大量执法机关的存在，1931年美国黑手党为适应高效率的抢劫活动进行了量体裁衣式的改革，而纽约是其活动的中心。

第5章 肮脏的30年代

“一个人必须记住，在经济领域，一个家族的目标之一便是尽一切可能地取得垄断地位。”

对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10年大萧条堪称艰难时世的代表。它无可非议地被称为“肮脏的30年代”，前所未有的经济凋敝、银行破产、工厂倒闭、暴力罢工、农场废弃、游民无家可归、饥民等待救济和施粥所遍布城市，让这个时代阴云密布。在危机最严重的1931年，约有1500万人（约为全国劳动力的25%）被解雇。

但是，新生的黑手党家族却没有经济之忧。这个10年是它们即将延续到下个世纪的空前繁荣与倾力合作的开始。在1931年召开的黑手党高层的芝加哥秘密会议上，富有远见的犯罪天才洛克·卢西亚诺为几十个现存的犯罪家族奠定了组织基础，而这些家族都将利用它来构建其非法产业网络。

作为现代美国黑手党创建大会的与会老板之一，乔·博南诺对卢西亚诺提出的出色计划所开创的长久和平感到高兴。“在城堡之战结束后的近30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损害家族团结的内部争斗，也没有出现威胁家族或者我本人的外部干涉。”博南诺在他的自传里惊讶地写道。

卢西亚诺的管理革命意在构建层层壁垒，以期在家族成员犯罪时保护和隔离自己，同时也使其他老板免受牵连。因此，每个首领或教父都将从家族的犯罪活动中获利却不会有受到控告或监禁的风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卢西亚诺的计划是要保护绝大多数同道老板，但他却是他那个时代被长期监禁的唯一一名纽约黑手党人。

禁酒令是将20世纪20年代的街头黑帮转变成平稳运行的区域性与全国性犯罪集

团的催化剂。像卢西亚诺、博南诺和卢切斯这些人刚开始都是不入流的暴徒，后来才逐渐变成黑社会巨头。生产和贩卖私酒让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得到了实际的管理历练。这些经历教会他们如何筹划和运作复杂的系统来生产和运输大批量的啤酒和威士忌酒。尚处于二三十岁的年龄段，在组织由走私者、卡车司机、货物装卸工和枪手组成的犯罪团伙方面，这些新型的黑手党人已经成了专家。这些年轻时就暴富起来的黑手党人开始熟练地进行洗钱活动以避税，同时学会了如何贿赂和操纵政治和警方来化解让人头痛的执法难题。

芝加哥会议获得了成功。权力布局已经到位。全国的黑手党头目们达成默契，同意每五年在全国犯罪论坛——很像一个政党大会或宗教教会会议——上集会一次，以进行友好交往并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

卢西亚诺和博南诺那新家族的内部实力得到了扩充，这是城堡之战的一种副产物，也是高损伤战役对援军的需求所催生的结果。在卢西亚诺计划和管理委员会以普通认同的规则与理念联合全国所有犯罪家族的同时，在成员资格的规定方面仍存在区域性差别。乔·博南诺拒绝响应将其家族作为所有意大利人融合之地的建议。他坚持说，只有完全的西西里血统才能忠实于美国黑手党的文化和责任。

所有家族都不同意用 Mafia（黑手党）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组织。纽约各个家族起用了 Cosa Nostra（黑手党在西西里所用的秘密代号，意为“咱们的事”），芝加哥家族称自己为“Outfit”（团队），布法罗家族则选用“Arm”（扶手）。其他家族，特别是新英格兰帮派偏好听起来中性的“Office”（办事处）。

最后，在黑手党人中间，确认荣誉者身份的最普通方式是那个简单的措辞：“他有关系。”

当黑帮代表们散会离开芝加哥时，他们许多人意识到禁酒令——那取之不竭的制钞机——已处于寿终弥留之际。大部分民众和绝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希望废除这部法律，因为在他们看来，它既不能得到执行，又不得人心，且容易令执法机关滋生腐败。对于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一届政府来说，持续恶化的大萧条为它提供了反禁酒令的另一个理由：支持废除该法的人声称，它将复活合法的酿酒产业并能创造数千个工作机会。

1933年12月，美国宪法第21修正案被通过，废止了禁止生产和销售酒精饮料的第18修正案。13年的干旱期结束的第一天晚上，纽约几万名酒狂欢者涌到泰晤士广场举行自发的庆祝活动。大规模的人群需要紧急出动几乎全城所有2万名警察来维持秩序。

纽约五大黑手党家族为这次翻在覆地的变化做好了准备。禁酒令慷慨地让他们暴富起来，他们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和能量为新的非法产业和犯罪提供经济动力，或者干脆从对手爱尔兰和犹太犯罪集团手中抢走现成的生意。有个关于黑手党资金来源的例子，电影制片人马丁·戈斯克称卢西亚诺曾告诉过他，1925年他单从私酒生意中就赚得了1200万美元的毛收入，扣除主要用于支付卡车司机与保镖工资和用于向执法官员和特工行贿的费用后，净赚400万美元。

禁酒令刚刚废止，纽约黑手党就在享受各类新老形式犯罪的盛宴：赌注经纪、放高利贷、操淫业、毒品交易、抢劫、货物劫持和彩票赌博。“racket”（社交）成了指代黑手党这些新的不法行当的流行用语。用“racket”作为俚语来形容黑社会的活动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英格兰。其确切出处不得而知，不过它可能与racket的另一种含义有关：大声吵闹或喧哗，社交兴奋，放纵或狂欢作乐。在19世纪中期和后期，这个词语开始被用来指代纽约爱尔兰裔美国人主办的喧闹而无序的私人聚会。为了资助他们的“社交”活动，帮派成员就要求或强迫商人和个人捐款，否则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将面临危险。

“racketeer”（敲诈者）纯粹是一个美语造字，或许是某个新闻记者为指代20世纪30年代创新立异的黑手党人而杜撰的新词语。

后禁酒令时代的黑手党人借用了一种已经消亡的“黑手”敲诈法——成立假“保安”公司，保护商行免受可能损害其财产的纵火犯和破坏者的袭扰。拒绝与这些冒牌保安服务商签约的店主和餐馆老板经常发现，他们的窗子不是被打碎，就是他们的房屋受到可疑的火灾破坏。

纽约的犹太黑帮在犹太工人和血汗工厂老板占有相当比例的服装中心创新了产业敲诈技巧。在20世纪20年代罢工斗争风起云涌的时期，犹太暴徒们曾受到双方邀请参入产业活动之中。他们既破坏罢工为生产商效力，又充当暴徒受雇于一些工会来胁迫厂主，同时又在开展组织运动期间充当工贼。对抗结束后，这些曾非法为双方效力过的黑帮分子留了下来，并在工会和管理协会中发挥影响力。和工会领导人相勾结让犹太敲诈者们有了通过威胁停工和推动工会化运动来向业主勒索酬金的能量。另外，工会还通过让黑帮所有的公司经营不属于工会的商店来回报他们。一些黑帮成员强行挤进公司成为秘密股东，并从大老板那里索取报酬。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允许这些老板们经营非工会的商店，或者在他们被工会化的情况下保证其得到私下签订的劳工合同。

在禁酒时期，洛克·卢西亚诺是唯一与犹太黑帮大佬们保持着亲密关系的教父。

他没有费多少力气就将犹太人在服装中心的勒索生意吸收到自己的领地之中。服装业是纽约市最大和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在这个行业当中，犹太暴徒成了卢西亚诺的小兄弟。据拒绝与犹太黑帮打交道和做交易的乔·博南诺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卢西亚诺是服装行业的黑帮老大。“卢西亚诺对服装行业，特别是对服装工人联合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Union）有着广泛的兴趣。”博南诺后来写道。查理·洛克提议将博南诺的人安插到联合会的重要职位上，而这个联合会是男装和童装生产行业的主要工会。一旦在工会中掌握权力，博南诺就可以像卢西亚诺那样控制关键职位、拟定工会合同条款，并分享生产商提供的酬金。

卢西亚诺的提议被礼貌地回绝了，因为博南诺不想为另一个家族承担责任。想独立施展拳脚的博南诺还有另一个不错的单干理由：他自己与另外一个重要的服装业工会——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有联系。

像纽约其他老板一样，博南诺有着许多传统的犯罪活动和新的“掩护”企业让他忙碌并致富。他接手了多种合法生意：三家制衣公司、一家货运公司、多家洗衣店和奶酪生产点。另外在布鲁克林区还有一个乔·博南诺殡仪馆，有人怀疑这里是处理被家族谋杀的受害者的地方。据称富有创造才华的博南诺曾使用特制的两层或双面板棺材，在已登记的尸体下面留有一个秘密隔间，这样可以同时埋掉两具尸体。这些被掩护企业的收益是随时可用的借口，足以应付税务稽查，并为其高水平的生活方式提供合理依据。

博南诺那潜在的资本主义哲学根植于一种指引他和其他老板前行的基本理论：排除所有竞争。“一个人必须记住，在经济领域，一个家族的目标之一便是尽一切可能地取得垄断地位。”他在《体面人》中写道。

除了服装业，运用高压手段和在工会里的影响力，五大黑手党家族还控制了许多其他经济实体并从中勒索报酬，如布鲁克林码头区的装卸公司、富尔顿鱼市场、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区的肉类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筑和运输公司和酒店餐馆。

在每年5000万美元的合法鸡肉生意中，西西里-意大利帮派甚至迫使犹太敲诈者放弃了其拓荒者的领先地位。纽约大量的犹太人口和其传统的饮食习俗保证了对相关家禽产业的稳定需求。犹太暴徒满足于简单而过时的诈取保护费的手法。他们只进行一些小额敲诈，目标是那些竭力保护其公司，害怕受到人身伤害且没有防卫能力的商人。在“三指布朗”汤米·卢切斯的推动下，黑手党有了更多的宏伟计划。卢切斯的爪牙们抛开其犹太同伙，运用后来成为进行产业敲诈的一种经典模式的手法在活鸡供

应商、批发商和屠宰公司中间建立了同业联盟。卢切斯成立了一个假贸易集团——纽约活家禽商会，然后通过软逼利诱，迫使大多数合法的鸡肉企业参加进来。为终止正常的竞争，价格被固定了，每个公司都被分配到一定的市场份额。作为回报，公司依据销售总额向黑手党的掩护机构家禽协会交纳会费。毫无疑问，因为成立同业联盟，卢切斯及其帮手们捞取了大量的不法收益，同时还阻止了新的公司在纽约参与竞争。对于将部分利润交给卢切斯的公司而言，它们只需通过抬高价格将这部分“犯罪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在他们控制的行业内部，从服装中心到码头区，黑手党还从以工薪者为欺诈对象的非法赌博和高利贷生意中进一步谋取不法利润。

五大家族不允许存在竞争者。在黑手党寻求绝对控制权的攻势面前，犹太和爱尔兰黑帮分子未进行多少抵抗，尽管在禁酒时期他们曾拥有自己实力强大的帮派。即使对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犹太黑帮大佬迈耶·兰斯基来说，他的大多数计划仍需要先取得其黑手党伙伴的同意。兰斯基陪同卢西亚诺参加黑手党大会，但从来没有被允许坐下来商讨问题。

在黑手党接手之前，20 世纪 20 年代当之无愧的犹太犯罪大师是阿诺德·罗思坦（Arnold Rothstein）。他那涉及面极广的犯罪活动包括国际私酒贩运、劳工诈骗、股票欺诈、珠宝和债券销赃、毒品走私和组织赌博。

罗思坦的传奇之作是策划了 1919 年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的“黑袜丑闻事件”（Black Sox Scandal）。在这次大赛中，夺冠势头最劲的芝加哥白袜队被辛辛那提红人队击败。在百老汇被称为聪明汉和“大投资家”的罗思坦是个面容和善、言谈温软、衣着光鲜的人。他的权力由一批生性残忍的亲信来行使，拜在他门下的是一群犹太和意大利黑社会的明日之星，包括兰斯基和卢西亚诺。据说在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梅耶·沃尔夫希姆（Meyer Wolfsheim）的原型就是魅力超凡的罗思坦。

在禁酒令被废除之前，罗思坦给黑手党接收纽约非法产业所造成的一切障碍都被清除干净。1928 年 11 月 4 日的晚上，有人发现他腹部中弹，跌跌撞撞地走在曼哈顿中城区的人行道上。罗思坦活了两天，但他严守自己的“乌默它”戒律，拒绝指认枪手或确认动机。“我不会告诉你的，”一名探员引述他在医院临终时所说的话，“你忠于你的职业，我坚守我的原则。”他死时 46 岁。

乔治·沃尔夫（George Wolf）是纽约的一名犹太律师，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为“科萨·诺斯特拉”和犹太黑帮成员辩护过。他近距离审视了黑社会中新的种族关

系。“两个帮派总是令人惊讶地默契配合着，”沃尔夫评论说，“意大利人佩服犹太人的经济头脑，而犹太人喜欢静静地待在幕后让意大利人施展必要的武力。”

黑手党的力量部分来自其极端的有组织犯罪武器——谋杀。在1931年的芝加哥会议上，老板们象征性地添加了只有黑手党人才能杀死黑手党人的规定。同时他们还可以杀外人，甚至因为威胁了一名荣誉者，其他罪犯就有可能面临死亡。

犹太诈骗犯迈克尔·海勒曼（Michael Hellerman）曾提出了警告，提醒人们在经济问题上挑战黑手党的权威会造成什么危险。“作为局外人，犹太人在黑手党主持或组织的任何谈判中总是输掉的一方，”他抱怨说，“不知何故，最后总是我们付出，即使在我们没错的时候也是如此。”

在禁酒期间，爱尔兰黑帮分子控制了纽约的许多地盘。他们最为强大和无情的偶像是奥尼·麦顿（Owney Madden）。麦顿最初是个掠夺成性的持枪抢劫犯，在曼哈顿西区的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附近开始了其犯罪生涯。他在禁酒时期的犯罪活动最终让他成了一个在二十多家夜总会（包括哈莱姆区的科顿俱乐部）都有投资的颇具魅力的知名富豪。麦顿有仇必报与诡计多端的名声和他在市政厅里的政治影响力都极具说服力，甚至意大利黑帮也得待在他的地盘之外。

但禁酒令的废止和黑手党的崛起使麦顿相信，他在任何领域都不能和意大利黑帮比肩共存或竞争。1933年，40岁的麦顿宣布退出纽约，并南下阿肯色州温泉城重新安营扎寨。那时，温泉城的警察和政府官员素以温顺和腐败出名，让当地成了非暴力犯罪分子的避难所。经历了纽约那猛烈的战斗之后，麦顿发现温泉城的环境很适合捞取不义之财，他后来便成为这个城市的非法赌博大王。

在后禁酒时期的其他城市，黑手党对其前爱尔兰和犹太竞争者的斗争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功。盘踞在芝加哥与波士顿具有相当实力的爱尔兰行动队，还有底特律（紫衣帮 [Purple Gang]）与费城的犹太人帮派，都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被击败或被诱骗成为实施特定犯罪的雇佣帮手，要么向黑手党交纳保护费然后以赌注经纪人的身份开展活动。

20世纪30年代初，在纽约各个家族纷纷巩固其组织的时候，打击他们的执法工作正处于最为无序的状态之中。然而，受隔离保护的老板们仍然密切关注让阿方斯·卡彭（Alphonse Capone）马失前蹄的法律陷阱——逃税案。

阿尔·卡彭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均不得而知。各种档案显示他生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其出生地若不是意大利南部，就更有可能是他成长于斯的布鲁克林。和许多

他那个时代的黑帮分子一样，卡彭早年辍学，随后作为街头帮派里的一名斗士接受了基本训练。在一家酒吧兼妓院的场所做保镖时，卡彭的左脸被砍伤，这让他博得了—一个凶恶的绰号——“刀疤脸”。

在禁酒运动和啤酒战进入白热化的时期，他来到芝加哥，成了一名执法打手和枪不离手的贴身保镖。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卡彭一路拼杀成了芝加哥黑社会龙头老大，控制着数百万美元的私酒、色情和赌博产业。禁酒令造成的浮躁和无序的社会风气将黑帮分子们变成了媒体名人和流氓英雄。洋洋得意的卡彭出尽风头，他接受采访时常说的话是：“我只是个商人，急人所急，济人所需”和“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满足民众的需求”。

身材矮胖、头顶渐秃的卡彭没有打算避开照相机和公众的关注。他喜欢坐在前排的包厢席位观看棒球赛，让队员们在那里排队为他签名，还喜欢在芝加哥酒店或他那佛罗里达棕榈岛的拥有14间房豪宅里举办盛大的宴会。

他的招摇与暴力最终惹祸上身。1929年情人节那天，其主要对手“臭虫”乔治·莫兰（George “Bugs” Moran）的6名手下，还有一个碰巧到访的无辜的验光师，靠着车库墙排成一排被机枪扫射致死。芝加哥的执法机关被卡彭收买，没有对这起屠杀或卡彭的任何活动进行认真的调查。但这可怕的情人节屠杀案激怒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的政府，促使它决心对目中无人的卡彭开刀。此外，这届政府继续推行禁酒令，而卡彭的公开挑战及其高知名度也令政府感到尴尬和窘迫。

财政部一个特别小组进行过—大范围的调查，不过只触及到卡彭实际非法收益的皮毛。但这个由审计员和调查员组成的小组还是发现了卡彭从1924年至1929年期间收到总计1038654美元酬金的相关证据，这些收入从来没有申报纳税。（打败卡彭的其实是勤奋的会计师，而不是联邦调查局，也不是勇猛无畏的联邦政府警探艾略特·尼斯（Eliot Ness）和他那帮在好莱坞影片和电视剧中风靡一时的正直侦探。）

被查明犯有逃税罪后，卡彭于1932年开始服刑。身患晚期梅毒的他先后在可怕的阿尔卡特拉斯教养所（Alcatraz Penitentiary）以及其他管理严苛的联邦监狱服刑了7年。1939年出狱时，曾经不可一世的卡彭变成了一个颓丧的、令人同情的病人。他再也没有回到芝加哥，1947年他死在其佛罗里达的家中。

除了提醒纽约的老板们得防范逃税调查外，他的垮台对他们并无影响。卡彭的权威只局限在芝加哥地区，其管理委员会的席位可以很容易地由其副手来填补。纽约人还怀疑卡彭并不是黑手党的文化与组织的真正信徒。他们对他曾心存疑虑，因为他拒绝把荣誉者的人会议式引入到他的帮派之中，并且没有任何角头或顾问。实际上，他

们怀疑他甚至并不把自己看成黑手党人。对黑手党纯化论者来说，卡彭的“团体”运作时更像是一个合伙企业而非一个传统的犯罪家族，而且他违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将职责托付给非意大利人履行。

卡彭从非法生意中赚了大钱，但因为他好出风头，他的声誉在举止低调的纽约教父中间多受贬损，因此他的名声大于他的实际影响力和势力。最终，卡彭在黑社会言过其实的重要性反而要了他的命。

第6章 失控的陪审团

在美国黑手党早期的领导人之间，有一项一致认可的协议，即清廉的执法官员和调查员——正直坦率的人——免受黑社会的报复和暴力。

阿尔·卡彭的灾难并没有立即在纽约重现，纽约当地和联邦执法机关要么太腐败、太漠不关心，要么就太无知，因而未能遏制黑手党家族。

作为当时的新闻与消息的主要来源，纽约市的报纸在调查和报道新的有组织犯罪现象的出现上也同样消极。强盗、谋杀和绑架在禁酒期间都是报道的好题材，并且几乎成了一种令人愉快的安慰剂，将人们从严酷的大萧条经济新闻中暂时解脱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记者和编辑都以同情的心态描述个别敲诈者，而达蒙·鲁尼恩（Damon Runyon）在《红男绿女》（*Guys and Dolls*）中对一些流氓的精彩描写成了被普遍接受的关于黑帮分子和罪犯的荒诞故事。一些有影响的主编和专栏作家从不曝光近乎公开的赌博、产业劳工诈骗、勒索保护费和色情活动，而是与黑帮人物一起亲密交谈、赌博和买醉。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Herbert Bayard Swope）是声誉甚隆的《纽约世界报》的编辑，他一度欠下黑社会赌注经纪人70万美元。为了打探秘密消息和得到独家新闻，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甚至和其他全国性的百老汇辛迪加专栏作家一起竭力和黑帮分子拉关系。

执法机关甚至比谄媚的媒体更不以为然。曼哈顿（纽约郡）（纽约市的色情业中心）多任地方检察官都没有调查这明目张胆的非法生意。这些地方检察官通常是由民主党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 Club，一群民主党领导人在曼哈顿操控提名和选举的大本营）挑选的无能之辈。为了保护他们不受改革者和警察可能进行的干涉，从禁酒令颁行的头几天起，意大利和犹太黑帮头目们就将坦慕尼领导人列入其贿赂薪金

名册。

1935年3月，曼哈顿一个大陪审团的例行选任意外地引发了一场执法地震。无能的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威廉·科普兰·道奇（William Copeland Dodge）喜欢处理容易结案的案件，他循着他这种惯常的癖好指示陪审员得重点关注起诉轻罪嫌犯的常规议程。道奇唯一需要优先考虑的其他对象是“红色威胁”（Red Menace）的荒谬威胁，他建议陪审员要注意共产党的报纸《工人》，在他看来，这家报纸正在利用大萧条来煽动起义。

大陪审团的任务是考查实据，并表决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让被告接受审判。通常，大陪审团容易被检察官所操纵，通常在只听完检方的陈述后就以流水作业的方式做出有罪裁决。但曼哈顿由23名成员组成的大陪审团在一个有主见者的领导下未受操控，要求对纽约市日益扩大的不法产业进行独立调查。他们的大声疾呼得到市律师协会和几位部长及市民协会的支持。失控的陪审团成了热门的新闻话题，它造成的压力迫使州长赫伯特·莱曼（Herbert Lehman）任命一位特别公诉人来调查革新者的主张。

民主党党员莱曼挑选了33岁的曾任联邦检察官的共和党人托马斯·E·杜威（Thomas E. Dewey）。杜威在密歇根州小镇奥沃索长大，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后留在纽约任职。在曼哈顿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三年之后，他变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检察官。杜威接手的大多数联邦案件都牵涉到贩私酒和所得税指控，他在工作中很快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法庭才能：不可思议地记住罪案中最为微小的细节，并借此在交互讯问中驳倒恶意证人。杜威放弃了华尔街上的成功事业，愉快地接受了莱曼提供的检控机遇，尽管这意味着自己的收入会大打折扣。

不像那些了无兴趣的由坦慕尼协会操纵的地方检察官，敢作敢为的杜威没有坐等案件来找他。他知道如何收集证据，并富有远见地将摧毁犯罪组织作为其目标，而不只是满足于将低级暴徒定罪。在他接受任命时，事实上还没有限制纽约州检察官不得进行电话窃听的相关规定，杜威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办法来挖取证据和线索。

杜威对黑手党家犯罪族的存在或它们组织结构并无准确的了解，但他的本能让他感觉到自己面临着一种新型罪犯的挑战。敲诈者从来不亲自实施谋杀抢劫或从受害者身上勒索一分钱。作奸犯科的工作都留给冒着被捕危险的跟班去做。

为了切实有效地检控黑手党老板，杜威不得不仔细研究烦琐的刑事诉讼法。根据纽约的现行规定，被告只能依据每一条特定的罪状接受审判，这意味着要进行多次审判，哪怕犯人被指控犯有一百种不同的罪行也得如此。在改革派政治家与组织的游说帮助下，杜威劝说立法机关批准“合并诉讼”来进行检控。这种程序为联邦法庭所采

用，它允许就多项指控进行一次性审判。这是杜威可在法庭上运用的法律武器，能够让他以多项罪名检控黑帮主犯，并将他们与实际由其手下所犯的罪行联系起来。

第一个被杜威锁定的重要勒索犯是达齐·舒尔兹（Dutch Schultz）。舒尔兹原名亚瑟·弗莱根海默（Arthur Flegenheimer），是另一个利用禁酒令打开大门及时抓住发财机会的草根罪犯。他拉起了一个主要由犹太暴徒组成的贩私酒帮派，控制了布朗克斯区的啤酒销售生意。通过威吓、谋杀、绑架和拷打等暴力手段，舒尔兹在其活动的领地和激起的敌意中与黑手党相抗衡。当杜威成为州特别公诉人时，舒尔兹的帮派是唯一留在纽约且不屈从于黑手党的非意大利人的组织。黑社会行家将五大黑手党家族和舒尔兹的帮派合称为“六大家族”。

舒尔兹也具有敏锐的商业头脑。私酒产业衰落时，他控制了一个饭店工人协会，并利用它以劳资和谐为名向餐馆敲诈贿赂金。一些著名的饮食场所，包括百老汇的林迪斯饭店和黄铜铁道餐厅为了开张都被迫向他行贿。在他寻找容易得手的^{不义之财}来取代枯竭的私酒收入的过程中，舒尔兹和他的残忍的“断腿工”在哈莱姆区从非洲裔美国人和美籍西班牙人“庄家”手中接管了数字和玻利希彩票赌博生意。

在禁酒期间，贩私酒的利润极高，以至于许多黑帮觉得这种主要在黑人社区经营的数字彩票赌博仅是小打小闹而兴趣了了。怀有种族歧视的帮派分子将这种赌博讥讽地为“黑鬼游戏”。但有好几万纽约人在玩这数字赌博。赌博者以 600/1 的赔率选出每天从赌注总额中选取的 3 位数，选中一场赛马赌金总额的最后 3 位数者中奖。对饱受大萧条之苦的人们来说，赢得这种赌博是一种大众化的白日梦，即使赌注只有几美分。

达齐极具预见性地将数字彩票赌博作为一种基本的替代手段，来补偿其消失的私酒收入。他兼并了哈莱姆和布朗克斯的几十个小规模的独立的数字彩票经营点。这个行当的前辈们面临着选择，要么继续经营并将其收入的相当部分交给舒尔兹，要么在太平间一了百了。舒尔兹很快发现他闯进数字赌博领域的确是明智之举。这种赌博一年吸收的总赌金约为 2000 万美元，而且没有几个幸运的中奖者能挖走舒尔兹的利润。

舒尔兹的暴躁脾气可能帮他扫除了追求新猎物的障碍。如果被激怒，黑社会绰号为“荷兰佬”的舒尔兹就会杀人，哪怕是当着目击者的面。“迪克西”理查德·戴维斯（J. Richard “Dixie” Davis）是舒尔兹的律师，他曾声称这个荷兰佬谋杀朋友和敌人“就像用牙签剔牙齿一样随意”。他有一次因分赃与手下发生争吵，结果他把枪塞进那人的嘴里打爆了他的头。当他怀疑长期深得其信任的副手博·温伯格（Bo Weinberg）正与意大利人密谋暗算自己时，舒尔兹就亲自用水泥包住温伯格的腿，然后将

他丢进哈得逊河中活活淹死。（半个世纪之后，残杀温伯格的情形在 E. L. 道科特诺（E. L. Doctorow）的小说《义胆风云》（*Billy Bathgate*）和根据原著改编的电影中成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

逃税指控似乎是政府对像舒尔兹这样黑帮大佬定罪的唯一对策，但他两次挫败了联邦检察官欲以逃税罪将其绳之以法的企图。有一次受审时，舒尔兹抓住了将审判地改到纽约郊区马隆镇的机会，通过用私人礼品和慷慨的捐款贿赂几乎整个社区赢得了陪审团的好感，从而逃脱了罪罚。

一旦纳税问题被解决，舒尔兹就意识到，作为特别公诉人，杜威的第一个重要动作就是通过选任特别大陪审团来重点“关照”他。调查行动进一步打乱了他的阵脚，使他更加嗜杀成性。为了讨好洛克·卢西亚诺并取得这位最具威望的黑手党首领的支持，舒尔兹改换门庭信仰罗马天主教。他显然相信宗教会将他与意大利老板们绑在一起，并让自己能以对等者的身份为他们所接受。受邀参加其皈依浸礼仪式的一个黑社会大佬便是查理·洛克本人。

更为不祥的是，舒尔兹开始策划暗杀杜威。他的下属开始尾随杜威，发现每天早晨离开曼哈顿东区的寓所后，这位检察官都会停下来在附近一个药店打电话，然后再赶往市中心的办公室。为了避免吵醒他熟睡的妻子，杜威就使用药店的公用电话和他的工作人员商量前一天晚上的新情况。跟随杜威的是一两个保镖，他们通常留在药店外面，于是舒尔兹认为这个药店是一个理想的伏击地点。用一把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单单一名杀手就能在杜威坐在电话亭里时射杀他，然后再击倒药剂师。舒尔兹估计，清晨人行道和车道的噪声会淹没枪声并掩护杀手逃走。

计划拟订出来之后，舒尔兹就将这项任务交给了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Albert Anastasia），此人是黑手党最能干的杀手之一，也是卢西亚诺的耳目。舒尔兹找借口说杜威并不仅仅是他的威胁，而是所有老板的威胁，除掉他是一件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阿纳斯塔西亚立刻将消息告诉了卢西亚诺，卢西亚诺随即召开了管理委员会紧急会议。

黑手党的最高理事会一致否决了舒尔兹的计划。据乔·博南诺称，老板们认为该计划极为疯狂。他们担心杀害像杜威这样有威望的检察官会激起民众要求打击非法产业的巨大声浪。在美国黑手党早期的领导人之间，有一项一致认可的协议，即清廉的执法官员和调查员——正直坦率的人——免受黑社会的报复和暴力。老板们断定，谋杀杜威只会让更多的托马斯·杜威和执法部门掀起打击他们所有人的风暴潮。

管理委员会会议的确以达成谋杀决定宣告结束——但目标是那个荷兰佬。舒尔兹

成了黑手党教父们的一个严重障碍，他对杜威失去理性的躁狂和他那难以遏制的暴力倾向会给他们的非法行当招来太多的注意。要知道，黑手党喜欢以静悄悄的方式行事。

在新泽西州纽华克市那家最豪华的酒店里，为设法逃避杜威的追查，舒尔兹龟缩在三室套的套房里。为了铲除舒尔兹，管理委员会挑选了黑手党的明星刽子手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也就是舒尔兹想雇来刺杀杜威的那个人。据信阿纳斯塔西亚将管理委员会的谋杀任务转交给为黑手党效劳的犹太职业杀手去执行。1935年10月23日，当舒尔兹在纽华克市中心的“宫廷排骨店”（Palace Chop House and Tavern）里进晚餐时，三名持枪的人将他逼到一个角落。进入这些人的房间后，一名杀手给了舒尔兹致命的一枪。三个杀手又一阵猛射打死了他的两名保镖和奥托·伯曼（Otto Berman）。奥托·伯曼在百老汇被人称作“神父”，是个数学天才，也是达齐的财务会计师。

舒尔兹之死铲除了最后一个势力强大的非黑手党帮派，并自然而然地扩大了洛克·卢西亚诺的帝国。洛克不费吹灰之力将舒尔兹的数字彩票赌博生意据为己有，并接管了那荷兰佬的饭店敲诈业务。然而，舒尔兹对杜威的长远影响所发出危险警告是有先见之明的。

第7章 不幸的洛克

“最终，杜威立案指控的与其说是卢西亚诺，倒不如说是卢西亚诺的名号。”

对于杜威这个富有生气的检察官与调查员小组来说，黑手党杀掉达齐·舒尔兹为追踪另一个诱人的猎物——“洛克”查理·卢西亚诺扫清了道路。

1936年，尽管是最强大的黑手党独裁者，但查理·卢西亚诺相比较而言并不为公众所了解。和纽约其他黑手党大佬一样，他喜欢在幕后行事并使他的名字隐没无闻，但自少年时起，他就开始走向其最后的被捕和监禁。他并不掩饰与坦慕尼协会领导人的联盟关系，并且在重大的政治集会上公开与他们交往。

1932年，在提名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为总统候选人的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卢西亚诺和他那富有政治远见的助手弗兰克·科斯特洛（Frank Costello）陪伴着坦慕尼代表团。当然，黑手党人不能在大会上投票，但他们被富有影响力的坦慕尼领导人像皇族成员一般对待。卢西亚诺和詹姆士·海因斯（James J. Hines）同住一个套间，后者是曼哈顿西区选区的一名政党领导人，后来因接受黑社会贿赂在赌博案中买通警察和法官被定罪。科斯特洛的同屋是他们密友和手握大权的政治联络人阿尔伯特·马里内利（Albert Marinelli）。被黑手党人亲切地称为“阿尔叔叔”的马里内利是纽约民主党意大利人选区的首任领导人，占据着市政府秘书长的要职。他的工作包括监督巡视员们用表格列出市选举的结果。除了有能力将假选票投入投票箱外，马里内利对黑手党和其他罪犯还有着特别的助益，因为他还监督大陪审团成员的选任。

尽管卢西亚诺刻意保持低姿态，但杜威的小组还是察觉到他在黑社会的显赫地位及其与民主党机器的政治联系。调查员们没有被他的所谓通过掷骰子、体育博彩和赌

注经纪生意令生活富足的说辞所欺骗。杜威的稽核员们发现卢西亚诺奢华的生活方式仅仅靠赌注经纪和赌博是绝对负担不起的。就其基本消费来讲，卢西亚诺拥有自己可供飞往萨拉托加温泉市、迈阿密和其他度假胜地的私人飞机。杜威的侦探们推测，卢西亚诺保留那架飞机的另一个目的是在遇到麻烦时作为紧急逃生的工具。穿着时髦、独身且爱好聚会活动的卢西亚诺以查理·罗斯的假名在高档奢华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Waldorf-Astoria Hotel）登记，住进了一间豪华的终年保持 36℃ 恒温的三居室套房。这间客房的年租金为 7600 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十多万美元。

州长在下令为特别公诉人杜威设立临时办公室时特别指出，其主要任务是铲除纽约市非法的彩票赌博业。在拓宽检控视野方面，杜威没有浪费时间，其严厉的面貌和竖起的黑胡须经常被拍成照片配发在新闻报道中。他设法为其粉碎黑帮的战役集结支持力量，通过报纸和广播，他宣布自己的目的远不止清除数彩赌博的庄家。他宣称，他的目标是根除纽约市的“产业敲诈”，即黑手党对行业与工会的暴力勒索。这种敲诈活动造成物价飞涨，让饱受大萧条之苦的人们更加难以度日。在广播里，用那成熟的男中音，他呼吁民众向他提供线索和内情。

杜威对卢西亚诺进行了首次监视与背景调查，但这番尝试未能找到对他不利的关键性的勒索证据。侦探和律师们发现，卢西亚诺显然对电话窃听保持着警觉，在电话交谈时总是非常谨慎。此外，他似乎从不在纸上做记录，所有能让他受牵连的财务细目都在他的大脑之中。

但杜威的特工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条让卢西亚诺牵连于一起色情犯罪的线索。当杜威唯一的女性助手尤妮斯·卡特（Eunice Carter）迫使他在市妇女法庭里接受腐败调查时，通向卢西亚诺的追踪之路便开始显现在眼前。卡特怀疑，在妓女们被带进特别法庭时，法官、律师和担保人之间发生了肆无忌惮的操纵案件和无视法律的情况。杜威坚持称他对产业敲诈更感兴趣，并且不想被人描绘成一个专为堕落的妓女和鸨母争取权益的清教徒式的检察官，因而不愿尝试性地批准进行一次有限度的调查。

让杜威惊讶的是，妇女法庭的调查远不止于腐败的法庭人员，它直接指向了卢西亚诺的帮派分子。20 世纪 30 年代，联邦法令和法庭裁决禁止政府特工安装电话窃听装置和窃听器，但纽约州的法律与此不同，它允许进行经法庭授权的电话监听。主要通过对接院的电话进行窃听，调查员们发现了线索。在被窃听的谈话当中，通话者们提到一个被称为“Combine”（联合企业）和“Combination”（联合体）的组织，称它控制着曼哈顿和布鲁克林总拥有 2000 名妓女的 300 多家妓院。对杜威来说，更为关键的是发现“小戴维”戴维·贝帝洛（David “Little Davie” Betillo），卢西亚诺的一名高

级亲信，在监督妓院的运作，并从有组织的卖淫活动中每年抽头 1200 万美元。调查发现，和黑手党从犹太和爱尔兰匪徒手中接管纽约市其他非法产业的模式相似，在妓院生意当中，意大利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犹太人占据了统治地位。

1936 年 1 月，杜威的探员同时抄查了 80 家妓院，逮捕了数百名妓女、鸨母和帮助经营妓院、补充妓女并根据需要将他们分配到不同场所的“经纪人”。通过声称将对不合作者收取高额保释金和处以长期审前监禁，杜威的探员说服许多在扫荡行动中被抓捕的妓女、鸨母、经纪人和皮条客来证实和描述这个庞大网络的重要性。除了指认卢西亚诺的助手的证人外，还有三名妓女称他们有直接证据表明卢西亚诺与这个团伙有牵连。

发现杜威正在步步逼近，卢西亚诺逃到了温泉城，那里也是奥尼·麦顿和其他黑帮头子在阿肯色州的避难所。杜威以 90 条“协助和教唆强制性卖淫”的罪状取得引渡令欲将他带回来。阿肯色州一名法官答应监禁卢西亚诺并准备进行审前聆讯。然而，在极易腐败的温泉城政府里，卢西亚诺有一些身居要职的朋友，因而经过仅仅 4 个小时的羁押之后，他被释放了。为他提供 5000 美元保释金的官员原来就是温泉城的主任探员。

“我活着也许不是最有道德和最正直的人，”得知受到指控之后，愤愤不平的卢西亚诺对记者说，“但在任何时候尚不至于如此堕落地协助卖淫。”

正当卢西亚诺的律师忙着寻找理由撤销引渡令的时候，杜威的探员们突然扑向温泉城，在州骑警的帮助下再次逮捕了这个知名潜逃者。在卢西亚诺的律师和温泉城的官员做出反应之前，杜威的探员们绑架了卢西亚诺并秘密地将他带出了这个刀背脊州。

卢西亚诺及其 12 名共同被告于 1936 年 5 月和 6 月接受了审判，这标志着杜威首次运用其新的法律武器——“合并诉讼”在单个案子中将多名被告联系起来。当然，卢西亚诺是核心目标。在其开庭陈述当中，杜威称他的主要检控对象是纽约“有组织犯罪的沙皇”和“联合企业”（色情业）的头目。

杜威拉出 68 名证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妓女、皮条客、鸨母、经纪人和囚犯。他们承认，因为协助检方，他们得到过减刑、免刑或缓刑的承诺。杜威的主要策略是将妓女描述成大萧条的绝望的受害者，受到“联合企业”一残忍看守的盘剥和恫吓。

“我告诉你，我非常害怕，”一名曾经的妓女作证说，“我知道‘联合体’会怎么对付讲话的女孩。许多女孩因为说得太多，她们的脚被烧伤，肚子被烟头灼伤，舌头被割掉。”

在杜威的大量证人当中，只有三名前妓女提供的证词将卢西亚诺与那些被指控的罪状直接联系起来。最具杀伤力的证词来自一名公认的海洛因吸食者科克·弗洛·布朗（Cokey Flo Brown），她说她曾跟随皮条客深夜与洛克见面商谈生意上事情。据科克·弗洛称，她听到卢西亚诺提出一个赋予妓院特许权的计划，“就像 A 和 P 一样。”她还回忆说，卢西亚诺曾经考虑过给鸨母发薪水，而不是让她们从毛收入中抽份子。

另一名妓女称，在其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的房间里，她和卢西亚诺有过几次性行为，并在交欢后偷听到他与一些共同被告的谈话。她声称曾听到卢西亚诺下令惩处一个不听话的鸨母，准备毁掉她的经营场所。另有一次，她证实说，卢西亚诺命令抬高价格以增加利润。沃尔多夫酒店的一个女招待和一名男侍者指认了其他被告，称经常发现他们到卢西亚诺的房间来找他。通过指认他与那些有更具体的证据等着他们的被告有来往，他们的证词增强了杜威指控卢西亚诺的力度。

辩护律师们抨击检方证人，称他们是一群受杜威逼迫的不足为信的吸毒者和重罪犯，他们是为了免受牢狱之灾而说谎。卢西亚诺是“年老色衰的妓女们那扭曲的想象力”的受害者，辩护小组争辩称。那些律师将杜威描述成一名好出风头的、冷酷而又野心勃勃的检察官——“一个过于理想而不切实际的人”和“一位孩子气的检察官”——他操纵着一桩指控洛克的蛊惑人心的讼案，并以此作为拓展自己政治生涯的跳板。

有个不见得可靠的辩护策略是设法将卢西亚诺描述成一个成功的赌客和赌注经纪人，因为太富有和太有能力而让自己堕入肮脏的风月场所。卢西亚诺迈出了危险的一步来作证并与杜威角智斗谋。在其律师温和地发问下，这个自负的证人否认见过那些指证他的妓女，坚持说只认识 12 名共同被告中的一个，并且从不知道所谓的“联合企业”或“联合体”。

被问到是否参与有组织卖淫活动或从中获利时，卢西亚诺一语双关地说道：“我从来没有拿走什么。”

交互讯问被证明更是碰运气。持有精心收集的机密文件和线人提供的关于卢西亚诺过去的每一条信息，杜威从容不迫地捻灭了卢西亚诺心中那些微的希望之火。在杜威对其证词的矛盾之处进行猛烈批驳时，身体摇晃且大汗淋漓的卢西亚诺承认，他在直接讯问中或许撒了谎或遗漏了一些细节。站在证人席上，面对杜威就其谎言发出的连珠炮似的提问，他只能有气无力地连连说，“我不知道”或“我不记得了”。

通过出示从其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的房间里拨打的电话号码记录，这位检察官进一步戳穿了卢西亚诺否认自己与许多共同被告相识的谎言。卢西亚诺声称可能有其他人使用其私人电话，可在陪审团看来，这种解释显然缺乏说服力。杜威还出示

了酒店的电话记录，证明他曾给阿尔·卡彭和全国许多其他知名要犯打过电话。

杜威找出了卢西亚诺在 1929 年至 1935 年期间的纳税申报单。这些申报单显示，他申报的最高年收入是 225 万美元。卢西亚诺时而结结巴巴，时而喃喃自语，无法解释靠着申报的这点收入怎么能过得像个土耳其皇帝。

也许，让这个自负的黑手党教父最为尴尬的是杜威揭穿了他的老底。杜威揭露称，1923 年，即他 25 岁的时候，靠举报一名毒贩藏有更多毒品，卢西亚诺避免了一次因毒品犯罪而被捕。

“你就是个告密者，”杜威面带轻蔑地说，“不是吗？”

“我告诉他们我知道的事情，”沮丧的卢西亚诺回道，实际上向同伙承认他曾经违反了“乌默它”戒律。

陪审团只需要 9 小时进行商议。当陪审团主席以抑扬顿挫的语调宣读指控他及其主要共同被告的所有罪名全部成立时，卢西亚诺只是麻木地听着。对他来说，这意味着 30~50 年的监禁。第二年，尽管有三名指控他的主要证人改变了证词，但他的上诉仍遭驳回。杜威用证据反驳了上诉，称改变口风的证词是伪证，是卢西亚诺的手下从受胁迫的或吸毒成瘾的证人那里取得的。



富有远见的教父和现代黑手党的设计者“洛克”查理·卢西亚诺（中）。1936 年 6 月 18 日，他被两名探员押到纽约市一个法庭，并在那里以强迫卖淫罪被判刑。一些专家相信洛克受到卖淫罪的诬陷。在他获减刑并被驱逐到意大利之后，洛克帮助策划了黑手党大规模向美国大城市输入海洛因的计划。（AP/Wide World photos 供图）

杜威一夜之间的胜利使他成为全国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他在广播和电影新闻影片（在 20 世纪 30 年代相当于目前的网络电视）中宣讲了辛迪加犯罪的危险性。

好莱坞注意到了他的辉煌成就。一部根据卢西亚诺案改编的流行影片《艳窟泪痕》（*Marked Woman*）于 1937 年公开上映，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在影片中扮演男主角，即那个以杜威为原型的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地方检察官。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主演片中那个勇敢的女英雄，她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了邪恶的勒索者及他们对妇女的残酷虐待。不过影片中的女子都被扮演成天真的夜总会舞女，而不是妓女。

与卢西亚诺的法庭辩战无疑对杜威的政治生涯大有助益，并几乎将他送进了白宫。他接连赢得了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和纽约州州长的选举，但在 1944 年和 1948 年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统时未获成功。

洛克·卢西亚诺是他那个时代唯一被杜威或其他检察官定下重罪的纽约黑手党主要头目。那三名证人将他直接牵连于色情组织的证据出人意料地脆弱。让卢西亚诺出庭作证是辩护律师所犯的一个极大错误，此举为杜威在交互讯问中连续提出与控告无关的问题，即其犯罪经历、生活方式和与著名匪首阿尔·卡彭的关系提供了机会。

大多数调阅过相关审判档案的黑手党与法律界学者都认为，卢西亚诺作为家族老板的确从色情行业中渔利，然而，重新审视那起案件，他们怀疑他很有可能是检方证人诬告的受害者。这些专家相信作为全国至高无上的黑手党教父，他太重要太繁忙，根本不可能对妓院生意进行微观管理，并让自己牵连于被指控的特定罪状，即“协助和教唆强制性卖淫”。对这个全国最大的黑手党家族的首领而言，如检方所称的那样为管理妓院这样的琐屑之事劳神费力并不符合他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卢西亚诺犯罪家族的成员卷入了收保护费的非法行当，强迫独立经营的鸨母和妓院经营者交给特许费以保证正常营业。控告卢西亚诺的恰当罪行应当是敲诈勒索，但杜威缺乏足够的证据将那更棘手的罪状钉牢在他的身上。

同时代另一个大腕老板乔·博南诺对 30 年代黑手党不法行当的规模非常了解，他对杜威把卢西亚诺说成是一个色情业奸商的论点颇不以为然。卢西亚诺的“捞钱人”最有可能抛出他的名字威胁妓院老板支付保护费，博南诺在《体面人》中写道，“最终，杜威立案指控的与其说是卢西亚诺，倒不如说是卢西亚诺的名号。”博南诺指出。

另一个有力的批驳者是波利·阿德勒（Polly Adler），她是纽约名号最响的高级妓院的鸨母，也是一个通晓三四十年代黑社会情况的权威者。“毫无疑问，”她在其回忆

录中夸口说，“我相信在我与色情业有密切联系的那些年里，如果有，哪怕是一点点查理与‘联合体’有密切瓜葛的传闻，我都不可能不知道。”

远离其曼哈顿奢华的生活环境，卢西亚诺被监禁在州监狱系统的“西伯利亚”，即防备措施最为严格的靠近加拿大边境的纽约州克林顿郡丹尼摩拉监狱（Clinton Penitentiary）。囚号为 92168 的卢西亚诺被分配在监狱干洗房里工作。但就像在外面一样，卢西亚诺在监狱的高墙之内也找到了一处舒适的安乐窝。为答谢他赠予的食物和钱财，同时也是出于对其教父地位的敬重，犯人们替他在洗衣房干活，帮他清扫牢房，还帮助处理狱中所有让他厌烦的杂事。在卖淫案中被定罪的共同被告小戴维·贝帝洛成了卢西亚诺的贴身男仆和厨师。在狱方留出来供卢西亚诺私用的监区厨房里，他为主人准备着各种可口的饭菜。

看守们知道卢西亚诺的黑社会地位，从来没有难为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打牌、在监狱里闲逛和看球赛上。在放风的院子里，同狱犯人们都在排着队等待机会和他说上几句话。

“他实际上在管理这个地方，”一名看守说，“他常常站在院子，仿佛他就是监狱长。”

第8章 “首相”

几十年来，在这个最大城市的政治管理机构当中，黑手党一直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

查理·卢西亚诺走了，但他的犯罪家族完好无损，一切运转得和他掌舵时一样平稳。

根据黑手党的传统，老板的王位只有在其死亡或让位时才能放弃。因此，即使身在离纽约 500 英里远的狱墙之内，卢西亚诺仍保持着家族首领的头衔。如果条件许可，他还有权通过到丹尼摩拉探望他的可靠信使向纽约发号施令。

但家族的日常运转和紧急决策必须托付给外面的某个人。在服刑之前，卢西亚诺将该家族的管理权交给了摄政者弗兰克·科斯特洛（Frank Costello），任命他为代理老板。在卢西亚诺被监禁之初，仍有微弱希望通过上诉来推翻他的有罪判决，而他不久就可以重登宝座。当 1937 年其上诉被驳回时，卢西亚诺看来注定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科斯特洛食言僭取了美国黑手党最大家族的老板头衔，有 300 多名打手听从他的指挥。

杜威让卢西亚诺获罪荒谬地验证了他在保存黑手党的管理策略上所具有的智慧。科斯特洛轻而易举地填补了卢西亚诺留下的空缺，而家族的其他组织——角头、行动队、打手和准会员——都保持完好。执法机关或许为击败卢西亚诺和卡彭欢欣不已，但它们并不清楚有组织犯罪家族内部发生的巨大变化：黑手党家族的生存能力不会因首脑人物被监禁而受到损害。与组织松散的在遇到像失去达齐·舒尔兹和奥尼·麦登这样的偶然事件而容易瓦解的犹太和爱尔兰帮派不同，富有凝聚力的犯罪家族不会因其首脑人物的突然离去而分崩离析。

在 30 年代以后的数十年里，杜威和他的继任者们成功地检控了几十名中下级意

裔美国和其他种族的黑帮分子。囿于既存的法律，杜威的注意力集中在个人而不是他们的组织上。毫无疑问，杜威——他那个时代最著名和最受尊敬的打击勒索犯罪的检察官——和其他主要的执法机构让黑手党的组织和力量暴露了出来。

1937年，在纽约黑社会和全国的黑手党军团当中，弗兰克·科斯特洛是个受到高度认可的知名人物。然而，他接管卢西亚诺家族并没有激起纽约和联邦执法机构的一点点兴趣和关注。

他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1891年在接受洗礼时起名为弗朗西斯科·卡斯蒂格利亚（Francesco Castiglia）。他的父母居住在意大利南端卡拉布里亚（Calabria）省境内一个名叫科林扎（Cosenza）的山村。这个家庭在科斯特洛4岁的时候移民美国。统舱的空间是那么逼仄，他说，以至于他不得不睡在一口大锅里。到东哈莱姆后，他们的旅行才告结束。和他许多未来的黑手党同伙一样，他用乡村的贫困换来了城市贫民窟的一席之地。

在17~21岁期间，科斯特洛因在街头抢劫妇女而被捕，但其家人和朋友往往都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让他经常获得无罪宣判。他在23岁那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携带一把隐匿的手枪，他被执法机关逮捕并被处以10个月监禁。他后来声称再也没有带过手枪，他的牢狱岁月教会了他要用脑子而非暴力来达到目的。

出狱后，弗朗西斯科·卡斯蒂格利亚依照法律程序改名为弗兰克·科斯特洛，显然因为他觉得一个爱尔兰名字听起来更有美国味，同时也是向“乔老板”马塞里亚帮派里的洛克·卢西亚诺看齐。得到阿诺德·罗斯坦（Arnold Rothstein）的部分资助，科斯特洛成了一名重要的私酒商。他从加拿大偷运大量的高档苏格兰威士忌酒到纽约地区并获得巨大成功。受卢西亚诺门户开放种族政策的影响，科斯特洛从不后悔与犹太和爱尔兰私酒贩子结成临时伙伴关系并和他们做生意。科斯特洛的黑社会同伙称，他后来会声称他在20年代有个私酒合作者是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即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父亲。

为应对禁酒令的终结，科斯特洛着重提升其赌博与赌注经纪业。他的一个精明之举是策划“划分”总赌款。为赚取酬金，科斯特洛允许较小的赌注经纪人将赌金转移或分摊给他的组织。当他们吃不消押在一个队或一匹马上的赌注，且如果其客户集体选中一个大获胜者而令自己面临巨大损失时，他们就可以将他们的部分赌金“划分”到科斯特洛的总赌款里。



得意洋洋地吸着雪茄烟的黑手党头脑人物弗兰克·科斯特洛。他 1950 年在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前作证，曾极力证明自己是个合法商人，并喜欢与国会的讯问者们角智斗谋。被问及其地下赌博帝国时，科斯特洛耸耸肩说：“我不知道。”担心对手维托·吉诺维斯夺其性命，他在 1957 年突然让出黑手党一个重要家族的老板之位。（AP/Wide World 供图）

甚至在禁酒令被废止之前，科斯特洛利用一种稳赢不输的赌博暗机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纽约黑社会公认的“老虎机大王”。他有个名符其实的幌子公司叫“真币新奇公司”，表面上是出售糖果自动贩卖机，实际上是向夫妻杂货店、冷饮店和其他便利商店提供非法老虎机的最大供应商。在 30 年代初老虎机的高潮时期，科斯特洛的 25 万台赌博机每天的毛收入在 50 万美元左右。利润是巨大的，即使他必须分一部分给卢西亚诺和家族的其他成员。当然，得向坦慕尼协会和警方官员交纳部分保护费，使他们将置赌博法于不顾。

1934 年，形势对科斯特洛严峻起来，当时共和党改革派政府和“联合党”市长菲奥雷洛·H·拉瓜迪亚（Fiorello H. LaGuardia）将坦慕尼民主党人从市政厅赶了出去。拉瓜迪亚对老虎机供应商的执法突袭发现科斯特洛的赌博机单在 1932 年就挣了 3700 万美元的证据。发誓要扫除这个城市的“假阔佬”赌徒和诈骗犯，脾气火爆的拉瓜迪亚亲自抡起斧头砸毁缴获的机器并将它们扔进河里，此举赢得了民众的交口称赞。

就在拉瓜迪亚的执法风暴让这座城市真正摆脱了老虎机的时候，科斯特洛为他的机器找到了另一个避风港。通过与南方一个黑手党家族和路易斯安那州腐败的修义龙（Huey Long）政治机器合作，他的老虎机大量涌入新奥尔良的酒吧和俱乐部及郊区城镇。那时候，新奥尔良对赌注经纪、轮盘赌轮和高赌注的纸牌游戏非常宽容，以至于到访者们完全没感觉到赌博在该州是非法的。

拉瓜迪亚政府反老虎机的除害运动仅仅是个小麻烦，对科斯特洛或其他黑手党家

族的整体活动几乎不构成任何妨碍。作为新老板，科斯特洛面临着来自于他自己家族内部的更大威胁，其对手是充满愤恨的维托·吉诺维斯（Vito Genovese），据说此人是卢西亚诺的合法继承人。

吉诺维斯的野心无法被科斯特诺轻易打消。他掌管着家族最为强悍的一支行动队，其成员都是卢西亚诺的骨干杀手。吉诺维斯那浓眉下的黑眼睛发出道道的寒光正威胁着这个最勇敢的黑手党人。

吉诺维斯比科斯特洛小6岁，十几岁时从那不勒斯附近的罗西格尔夫尼诺小镇移民美国，没受过多少学校教育，说得一口能用但磕磕巴巴的英语，其老巢就设在曼哈顿的小意大利。尽管有着小偷、暴徒和杀手的名声，但魁梧的吉诺维斯只被捕过一次。20岁时，他因携带枪支受到指控并入狱服刑了60天。他通过暴力解决问题的嗜好——即便是浪漫的事情——变成了黑手党的传统。吉诺维斯的发妻1931年死于肺结核，之后他爱上了已婚的表妹安娜·维妮蒂科（Anna Vernitico），同伙们相信吉诺维斯勒死了她的丈夫才娶到了她。

当科斯特洛从卢西亚诺手中接过权柄时，吉诺维斯作为家族的主要毒品走私者正在开拓毒品走私生意。然而，一桩谋杀案让科斯特洛暂时不必担忧吉诺维斯的嫉妒。1937年，吉诺维斯卷入一桩3年前的凶杀案，涉嫌谋杀了一个曾帮助他诈骗的同伙。这个同伙愚蠢地抱怨没有分到赃款，命案随即发生。得知检方有一名证人准备指控他后，吉诺维斯就逃到了意大利。那个曾经身无分文的移民少年衣锦返乡地回到了故



一张不多见的维托·吉诺维斯面带微笑时的照片。1957年，他夺取了弗兰克·科斯特洛的王冠成为一个至今仍以其名命名的犯罪家族的老板。此照片摄于他夺权后不久。维托素以奸险著称，曾为了娶得上人和逃避刑罚而杀死妻子的前任丈夫。他1959年最终因毒品走私被定罪并在10年后死于狱中。（征得弗雷德里克·马腾斯同意后转载的档案照片）

土，据称带回了75万美元的现款。此外，安娜·吉诺维斯作为送信人隔三岔五地看望他，每次都从他的哥哥迈克尔那里拿上5~10万美元不等的钞票带来，迈克尔在美国照料着他的非法生意。

吉诺维斯的离去消除了家族内部其他派系对科斯特洛统治地位的挑战，并平息了他鲸吞家族从赌博、高利贷、服装中心的敲诈和日常偷窃与绑架中取得的大部分收益的怨恨。大好的机遇让科斯特洛能够开拓自己的合法生意，利用亲属做掩护，他在酒类进口、房地产和石油公司上都进行了投资。

毫无疑问，科斯特洛最危险的活动是通过他对纽约市民主党的影响狡猾地渗透到重要的政府部门。他是个幕后掮客，悄悄地妨害司法公正和拉拢腐蚀重要官员并以此来保护黑手党人和他们的地下生意。继承了卢西亚诺与民主党政客的密切联系之后，运用赤裸裸的贿赂和秘密捐款，科斯特洛逐渐对坦慕尼协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犯罪控制。

在30年代之前，其历史可回溯至1789年的坦慕尼协会（官方名称为“纽约郡民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是个少有变化的大都市政治机器，其名字与操纵选举、授予市政合同和委任官职同义。除了改革者联合共和党选出一个中立派市长而赢得一次偶然而短命的胜利外，坦慕尼控制市政府达一百多年。

威廉·马西·特威德（William Marcy Tweed）（特威德老板），19世纪五六十年代坦慕尼协会的主席，是一种无可比拟的腐败象征。他最可耻的掠夺是建造市政厅后面一座成本应为25万美元的法院大楼。在特威德的指使和染指下，其费用剧增到1200万美元。

特威德的肆无忌惮最终将他自己送进了监狱，并在1878年死于狱中，但他的丑闻未能终结坦慕尼的影响力。他是坦慕尼最后一个新教徒领导人。他的死亡导致一连串的爱尔兰裔政客执掌了领导权，而科斯特洛对协会的渗透便发生在这段时期。

菲奥雷洛·拉瓜迪亚1933年的当选和他对坦慕尼的重磅出击出乎意料地让民主党领导集团的政客们比以前更屈服于黑手党的金钱攻势。1926~1933年期间，在花花公子市长吉米·沃克（Jimmy Walker）慷慨大方的政府里，坦慕尼为数千人安排了市政职位并收受受惠者的酬金。拉瓜迪亚剥夺了坦慕尼指派重要职位的权力，夺走了它手中握有的大量文职职位并扼制了它通过操纵市政合同来受贿的能力。失去了确保数十个市府关键职位（包括法官和地方检察官职位）选举的正常资金流，坦慕尼转而向弗兰克·科斯特洛求助。这位黑帮老板乐于打开资金的龙头，并接受回报成为坦慕尼协会事实上的领导人。

“科斯特洛经营了坦慕尼数十年，”纽约侦探兼有组织犯罪专家拉尔夫·萨勒诺（Ralph F. Salerno）特别指出，“许多政客和法官将他们的当选和地位归功于他。”

在科斯特洛到来之前，纽约的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爱尔兰政客手中。这个黑手党老板认为在坦慕尼统治集团中安插更多的名列其薪金名册上的意裔选区领导人的时机到了，于是他就顺势而为。这种变化实际上是让一个黑手党头目来掌管民主党最为重要的纽约分支机构，让他拥有提名候选人进入最高权力机构的权力。拉瓜迪亚的传记作者托马斯·凯斯勒（Thomas Kessner）发现，科斯特洛将黑手党与民主党领导人之间原有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在极盛时期，坦慕尼向有组织犯罪兜售保护，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是黑帮分子弗兰克·科斯特在发号施令，而此前他是通过坦慕尼用意大利口音来讲话。”凯斯勒写道。

其他黑手党老板对科斯特洛变得心怀感激起来，因为当他们的打手和合伙人需要得到法官、检察官或市政高官的照顾时，他能发挥其影响力给予帮助。科斯特洛暗中操纵政治和司法人员的能力巩固了他在黑手党管理委员会里的地位，并增加了和其他老板讨价还价的筹码。在黑手党人中间，他的政治头脑让他赢得了令其颇为自得的绰号：“首相”。

科斯特洛拥有马耶斯帝克公寓大楼（Majestic Apartments）顶层的一套可俯瞰中央公园的公寓。他频频在这里举办各种晚会，而法官、重要的政客、国会议员、作家和纽约的社会团体与餐饮业名流对参加这里的活动并无不安。公寓进行了豪华装修，处处体现了装饰派艺术风格，唯一显得虚饰流俗的地方是一台镶金的钢琴和几个老虎机。殷勤的科斯特洛无意掩饰其对赌博的强烈爱好，鼓励他的客人在老虎机上试试手气。永远不变的是，每个玩家都会赢得一兜叮当响的硬币。当一位客人打算还回硬币时，科斯特洛责备他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一个废物？没人会在我屋子里丢东西。”

科斯特洛成功地避开公众视线，掩藏了他的政治能量及其犯罪背景，这一切直到1943年才告结束。他当时栽倒在一个合法安装的电话窃听装置上。电话窃听者是弗兰克·霍根（Frank S. Hogan）手下调查敲诈勒索活动的人员，而霍根当时已接替汤姆·杜威任曼哈顿地方检察官。调查未能发现科斯特洛与任何敲诈勒索罪有牵连，但窃听装置捕获到他无耻地谈论其如何插足选举活动。他与刚刚获得坦慕尼协会的提名任州最高法院法官的托马斯·阿瑞里奥（Thomas Aurelio）有过一席谈话，它清楚地暴露了科斯特洛有能力将法官袍披在乐于施惠于人的候选者身上。

“早上好，弗朗西斯科，您好，感谢您做的一切。”阿瑞里奥首先讲话。

“祝贺你，”科斯特洛回道，“事情办得很成功。只要我给你打了保票，你就尽可

放心。”

“现在，”满怀感激的阿瑞里奥接着说道，“我向您保证，为了您所所做的一切，我将忠心回报。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在一次关于此次提名的听证会上，科斯特洛爽快地承认，他的确替阿瑞里奥争取到坦慕尼保证让他赢得选举的恩惠。沉着冷静的科斯特洛确认，通过说服四个选区的领导人给予支持，他曾使坦慕尼协会现任领导人迈克尔·肯尼迪（Michael Kennedy）顺利当选。至于为什么选区领导人会听从他的建议，科斯特洛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他们是“老朋友”。

地方检察官将电话录音公布给媒体，打算让阿瑞里奥的求官算盘落空。然而，在坦慕尼的支持下，阿瑞里奥最终赢得了选举并取得 14 年的任期。科斯特洛幕后政治能量的败露给他带来了广为传扬的恶名声，但未能松动他对坦慕尼协会的控制。

数年后，科斯特洛与威廉·奥德怀尔（William O'Dwyer）的一次会面被曝光，让人们发现了当民主党人 1946 年重新占据市长职位时他的权威是如何扩展到市政厅的。曾经做过警察、律师和法官的民主党人比尔·奥德怀尔（Bill O'Dwyer）于 1940 年当选为布鲁克林区地方检察官。次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他被寻求第三次连任的非奥雷洛·拉瓜迪亚击败，失去了任市长的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时任陆军准将的奥德怀尔 1942 年 12 月参加了科斯特洛在其顶层公寓主办的一场鸡尾酒会。三名坦慕尼协会的高层领导人也在场，目击者发现奥德怀尔和科斯特洛在一个角落悄悄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面对面谈话。

作为一个地方检察官和经验丰富的政客，奥德怀尔对科斯特洛那显赫的黑社会地位不知情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党派政治的权威人士相信，奥德怀尔很有可能正在为 1945 年的民主党市长候选人提名作准备，欲博取科斯特洛的好意和支持，最终他的确取得了坦慕尼的支持并如愿当选。

奥德怀尔辞职之后，他与科斯特洛的会面成了公开消息。这位前市长声称，他找科斯特洛是军事调查的一部分，因为据报科斯特洛的一个生意伙伴在一份军装生产合同中欺骗了军方。然而，奥德怀尔承认，他从来没有就接触科斯特洛或进行他所谓的军装合同调查提交一份正式报告。

奥德怀尔在 40 年代两次当选为市长，他承认在当选前欠下了科斯特洛的政治债。通过将科斯特洛的朋友和其他黑手党大腕委以市政要职，包括消防署专员和纽约法务部门的二把手，奥德怀尔承认，有一部分债已经偿还了。被问到这些人事任命和他与科斯特洛的关系时，奥德怀尔意味深长地回道，“如果你想获得支持，有些政治上的

事情你就不得不做。”奥德怀尔的意思很清楚：几十年来，在这个最大城市的政治管理机构当中，黑手党一直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

弗兰克·科斯特洛偶尔接受过几次采访，他从未承认与黑手党有任何牵连或企图腐蚀纽约政府。但很明显，他渴望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同，就像他在黑社会里一样。“其他孩子养尊处优地长大，然后被送进哈佛和耶鲁，”他说道，同时嘘叹他教育的贫乏和他那“dees（美妙）与 dose（痛苦）”不分的日常用语，“我？我像一根野草一样长大。”

游走在犯罪组织和上流社会之间，为寻求内心的平和，科斯特洛曾接受过心理治疗。他的心理分析师建议这个成功的黑手党人为他的过去忏悔，鼓励他摆脱以往的伙伴，与有修养的朋友多来往以发展新的人际关系。对一个犯罪家族老板来说，这是个不可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于是科斯特洛断绝了与那位心理医师而不是黑帮分子的来往。

尽管突然涌现了大量的关于科斯特洛那丑恶背景的新闻报道，但他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仍被一些寻求其支持的慈善组织所认同。1949年，救世军（Salvation Army）任命他为一次慈善活动的副主席。科斯特洛愉快地腾出其秘密控股的生意红火的科巴卡巴那（Copacabana）夜总会，供救世军举办募捐晚宴。除了科斯特洛的黑手党兄弟，几十名法官、市政官员和政客也如约赴宴，所有人显然对指责科斯特洛是个黑社会与政治权力掮客的公开报道并不在意。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在接受新闻记者鲍勃·康西丁（Bob Considine）的采访时，科斯特洛极力为他的生活辩解。他试图对自己所选择的职业给出一个定义式的解释“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弄明白什么是敲诈者，”科斯特洛说道，接着就迫使他成为一个犯罪者的社会原因给出了一个简洁的黑手党式的辩解，“我三年级后就再也没进过学校，但我是10所逆境大学的毕业生，我认为所谓敲诈者就是一个靠已经拥有的权力、尊严或财富来获得权力、尊严或财富的人。”

第9章 谋杀公司

“在法律和黑手党之间，法律不是最可怕的。”

身着保守而得体的服装，面带温和的微笑，在上流社会的朋友面前，弗兰克·科斯特洛将自己改头换面成一位成功的赌客兼投资者——一名普通的非暴力商人。像他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一样，科斯特洛的公共形象是一种骗局。身处顶层地位要求所有的黑手党老板拥有护卫在他们的身边，并确保其指令被执行的敢死队随时听从召唤，这位“首相”也不例外。

每当需要用暴力和威胁来保护其利益时，科斯特洛常常倚重于威利·莫雷蒂（Willie Moretti）。此人出身于马塞里亚帮派，是科斯特洛自禁酒时期就相识的黑道密友。莫雷蒂生活在新泽西州北部，领导着一支凶残的可到任何地方作案的行动队。科斯特洛和其他黑手党头目还可以调用另一股致命的秘密力量，也就是一帮新闻记者将在某天给其起绰号为“谋杀公司”的职业杀手。

黑手党所借用的这支杀人武装由犹太黑帮分子组成，其主要创建者是人称“利普克”（Lepke）的路易斯·布加尔特（Louis Buchalter）。他在纽约下东区长大，是家里4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在少年时代，他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是些租房客、工厂工人、小贩、手推车摊主和移民。他们拥挤地杂居在一起，生活在鸡飞狗跳的环境里，每天都得为生存而奔波。这里自然也是各种犯罪者恣意作恶的狂欢之地。

布加尔特的别名得自其依地语昵称“利普克列”（Lepkele），意为“小路易斯”，那是他妈妈对他的爱称。尽管家境贫寒，但他的三个哥哥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分别成了拉比（犹太人的学者）、牙科医生和药剂师。相反，到了利普克·布加尔特结束八年级教育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全校闻名的抢劫者和老练的扒手。他最初作为少年犯被送到少年管教所，后来又因抢劫和盗窃被送到了监狱。1920年，23岁的他出

狱时正好赶上禁酒令的到来。体格消瘦、貌不惊人的利普克受雇成了一名靠暴力说话的执法打手，为阿诺德·罗思坦和其他犹太黑帮分子效力，其主要任务是在服装中心破坏罢工。

到了1927年，利普克东拼西杀成了犹太主要帮派“大猩猩帮”的头目，并了解到控制地方工会比作为一名单打独斗的罢工破坏者更有甜头。那样，在服装、毛皮、货运和面包行业，通过恐吓和敲诈的业主和工会，他可以从双方身上渔利。

“大猩猩帮”的谋杀业绩得到黑手党高层的认可和赏识。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将刺杀达齐·舒尔兹的任务交给利普克，后者便派出他的三名同伙结果了那荷兰佬的性命。

20世纪30年代，许多服装生产商在布鲁克林区大型犹太人聚居区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开办工厂和经营店铺。利普克雇用当地一帮年轻杀手和高利贷放贷人在那里替他处理服装行业的敲诈生意。布朗斯维尔帮派早先根据要求实施过多起谋杀，后来归属布鲁克林的黑手党头目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领导。阿纳斯塔西亚是文森特·曼卡诺犯罪家族的一个显赫人物，经常被人敬称为“唐·昂伯托”（Don Umberto）。他偶然想到一个替黑手党完成谋杀任务的独特计划，并得到科斯特洛和其他管理委员会成员的认可。由阿纳斯塔西亚通过利普克传达指令，“布鲁克林好汉”们跟踪并杀掉黑手党要除掉的受害者并取得相应报酬。这样，犹太杀手，而不是意大利人，将冒全部风险却不知谋杀的动机。即使谋杀发生意外而阿纳斯塔西亚被捕，他们也没有黑手党卷入其犯罪活动的资料或证据。

纽约和外埠大多数独立行动的职业杀手都采用一种标准的模式。暗杀者和指认目标的人碰头，然后选择适宜的时机和地点来除掉受害者。杀手随即离开案发地，而受害人所在地的同伙则一口咬定杀手不在犯罪现场。

在接收“谋杀公司”很久以前，生于意大利南部的阿纳斯塔西亚在纽约黑手党内部就以喜欢看着受害者痛苦地死去的变态心理而出名。他乐于接受同伙们称他“刽子手”，后来借用吉尔伯特（Gilbert）与沙利文（Sullivan）创作的戏剧《日本天皇》里面的头衔，媒体将其绰号改成“大刽子手”。利用“硬汉托尼”安东尼·阿纳斯塔西奥（Anthony “Tough Tony” Anastasio）（改变了其姓氏拼写的一名荣誉者）作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1814分会（ILA）领导人的地位和艾伯特的杀手队，阿纳斯塔西亚与他的兄弟安东尼替曼卡诺犯罪家族控制了布鲁克林的码头。

即使在萧条时期，布鲁克林码头仍是这两兄弟和曼卡诺家族的聚宝盆。大多数码

头工人并没有固定地被码头搬运公司所雇用，当船舶停靠码头时，装卸的活儿都被 I.L.A 的工头分给了临时挑选的工人。需要工作的工人须按行规付给工头回扣，而这部分酬金大多落入指定工头的“硬汉托尼”的腰包。黑手党在码头上经营的日常赌博和高利贷生意都被“刽子手”艾伯特所垄断，而有关贵重货物进离港的内部信息则为实施重大的劫持和盗窃行动提供方便。

在近五年的时间里，黑手党和利普克的合同谋杀计划一直平稳地运作。到了 30 年代后期，利普克已经拥有约 250 名暴徒为他效力，这些人从事劳工敲诈和高利贷活动，并加入一个贩毒集团，从亚洲买进海洛因然后售卖到全国各地。通过用手枪、碎冰锥和绳索来射杀、戳刺和勒死受害者，十几个“布鲁克林好汉”执行了谋杀公司的大量谋杀任务。

“谋杀公司”之名是由原《纽约世界电讯报》记者哈里·菲尼（Harry Feeney）所起。在这个残暴的犹太杀手队里，有因服务怠慢将餐叉插进服务生眼中的“匹兹堡·菲尔”哈里·施特劳斯（Harry “Pittsburgh Phil” Strauss）；有持一把 45 口径手枪结果达齐·舒尔兹性命的人称“臭虫”或“英俊查理”的查理·沃克曼（Charles “the Bug” or “Handsome Charlie” Workman）；还有“法威尔”菲利普·科恩（Philip “Farvel” Cohen）、“漂亮人”亚伯·莱文（Abe “Pretty” Levine）、“宝贝”塞缪尔·范斯坦（Samuel “Tootsie” Feinstein）和因宗教信仰原因拒绝在犹太圣日里执行任务的“瑞德”西摩·莱文（Seymour “Red” Levine）。

谋杀公司这个杀人机器进行部分整合后，阿纳斯塔西亚因此有时能够调遣一些意裔杀手，包括“快乐人”哈里·梅昂（Harry “Happy” Maione）、“冲击者”弗兰克·阿班丹多（Frank “Dsher” Abbando）和用开枪打掉活鸡头来磨练技艺的“鸡头”维托·古力诺（Vito “Chicken Head” Gurino）。

与凶神恶煞的谋杀搭档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不同，利普克的长相并不凶恶，有着温和的褐色眼睛和柔和的嗓音。他爱好读书，喜欢晚上留在家中陪伴妻儿，还喜欢打高尔夫球，却不愿意和吵吵嚷嚷的手下一起寻欢作乐，这让他博得一个颇为受用的绰号——“土师”。这外在的行为举止是彻头彻尾的假象，下令杀人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且他似乎很喜欢参与那骇人听闻的谋杀。

凶杀案侦探们无从确定谋杀公司到底犯下多少起命案，但检察官们估计这些合同杀手至少留下了 60 具尸体。一些执法官员相信其总数远远高于 100 人，且大多数命案都发生在纽约地区。有多少人被黑手党下令谋杀，又有多少人单单因为利普克或其他

主顾的利益被害，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谋杀公司的效率，还有黑手党那无敌杀手队的传闻，都增强了一句流传于美国黑社会的西西里谚语的恐怖效果：“在法律和黑手党之间，法律不是最可怕的。”

通常依据谋杀的动机，“科萨·诺斯特拉”会使用各种各样的谋杀手法。线人嘴中塞着一只金丝雀或老鼠，表明这个被处以极刑的人是个帮助警方的告密者或叛徒；愿意作证的罪案目击者的眼睛会被枪打穿或挖出；觊觎或骚扰黑手党人的女性家眷者会被杀死并遭阉割。

谋杀公司设计了另一种逃避侦察的技巧，这种手法有点类似哈姆雷特的睡父之死，即将毒药灌进耳朵致其死亡。“布鲁克林好汉”们时常用碎冰锥从受害者的耳朵中深深刺入大脑而夺人性命，粗心的尸体剖检会将死因归结于脑溢血。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其1987年死去为止，桑托·狄拉菲肯特（Santo Trafficante）在佛罗里达州一直充当着黑手党的模范抬棺人。他曾向其律师弗兰克·拉加诺（Frank Ragano）透露黑手党制造的许多尸体何以消失的无影无踪。拉加诺知道狄拉菲肯特与纽约的几个家族都保持着联系，并且知道他和北方的黑手党人都使用类似的谋杀手法。

“首先，如果没有尸体，警方就得耗费更多的精力找出谁是凶手，”拉加诺记得狄拉菲肯特坦率地对他说，“其次，有些家伙做事太绝，他们死后你还得惩罚他们的家人。”提到惩罚家人，狄拉菲肯特指的是没有为受害者送行的教众或葬礼，而且根据大多数州的法律，在至少7年内，也就是失踪者最终被宣布为合法死亡之前，其家属都无法领人寿金。

利普克的成功没有受到阻挠，直到1938年其力量达到顶峰并发现托马斯·杜威的猎犬正紧紧追赶他时，他的好日子才告结束。那位地方检察官的侦探和会计师发现了线索，显示利普克通过产业敲诈每年从各种公司和工会身上勒索的收入在500万到1000万美元之间。杜威怀疑利普克从曼哈顿和希鲁克林诈取的部分收益交给了科斯特洛和曼卡诺家族。

利普克决心利用谋杀公司解决自己的难题。他躲藏了起来，同时交给阿纳斯塔西亚一份潜在的叛变者的名单。在杜威找到他们之前，他希望杀掉他们。至少7名有可能指证利普克的证人被除掉。由于联邦机构正为其他毒品指控追捕利普克，管理委员会认定这种搜捕正在造成太多的执法压力，因此是该牺牲这名逃亡者来避免引火上身的时候了。和达齐·舒尔兹一样，利普克变成了黑手党的一种负担和威胁。

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管理委员会饶了利普克一命。在一位中间人，即新闻专栏

作家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的帮助下，利普克于1939年8月24日向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自首。在其每周的无线电广播上，温切尔催促黑帮分子和平地投降，以免在与警察和联邦特工的交火中丢掉性命。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驱车把利普克从其布鲁克林的藏匿处带到曼哈顿市中心靠近麦迪逊广场公园的一条大街上与胡佛和温切尔见面。在利普克同意走出其藏身处之前，据说阿纳斯塔西亚向他保证在黑手党帮助下，一份他将只就联邦而非杜威的指控接受审判的协议已经达成。次年，利普克被查明违犯了联邦毒品走私罪并被判处14年监禁。阿纳斯塔西亚的确欺骗了他。黑手党和杜威之间当然不会有什么协议，后者以州敲诈勒索罪对他提起公诉，使他另外领受了13年刑期。

利普克与布朗斯维尔黑帮有牵连也浮出了水面。他在布鲁克林区受到另一项指控，即他在一名个体卡车司机告发其暴力接管服装业货运路线之前下令谋杀他。谋杀公司有个残忍的杀手“绞索手”亚伯拉罕·雷勒斯（Abraham “Kid Twist” Reles）于1940年因杀人罪被捕，为了保全性命，他同意指证利普克和其他在各种案件中被布鲁克林区检察官办公室拘捕的黑帮成员。（雷勒斯善用一根绳子巧妙地勒死不加提防的受害者，因此博得了“绞索手”的绰号。）

雷勒斯对几十起合同谋杀有着精确持久的记忆，1941年，立案调查利普克卷入一宗谋杀案并对他处以电刑的过程中，他所提供的调查线索起到了关键作用。求生心切的利普克打出其最后一张牌，据称主动提出要指证一位全国最有名望的工会偶像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即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Union）的创始人，与有组织犯罪有瓜葛。利普克声称，在1932~1937年期间，他每周都从希尔曼手中得到一笔通常由亲信代转的报酬。利普克指出，部分酬金落到了卢西亚诺和其他也参与工会和服装业敲诈活动的黑手党人手里。

这些钱是希尔曼主要为阻止或惩罚在工会与管理工作中给其制造麻烦的捣乱者而付出的报酬。利普克声称他偶尔才与希尔曼私下见面，并称因为帮助他赢得了一次糟透了罢工的罢工，那位工会领导人曾经给了他25万美元的奖金。利普克最危险的指证是希尔曼1931年谋杀了一个强烈反对联合会推动工会化运动的服装生产商。

利普克的报告被转给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FBI和联邦麻醉品局（Federal Bureau of Narcotics）。利普克的两名因谋杀和其他指控被捕的杀手保罗·伯杰（Paul Berger）和艾伯特·坦嫩鲍姆（Albert Tannenbaum）声称，他们可以证实利普克关于希尔曼的部分描述，从而增强了利普克证词的可信性。

杜威对希尔曼和纽约市服装业另一个重要工会的领导人，即国际女装工人联合会

主席戴维·杜宾斯基 (David Dubinsky)，早就产生了怀疑。被任命为特别公诉人后不久，杜威就在家中宴请这两个工会大佬，想就打击该行业的黑帮势力寻求他们的帮助，但两人都断然否认知道敲诈勒索或工会腐败的任何情况。

多年以后，已经退休的杜威在向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其生活经历时，嘲笑了杜宾斯基和希尔曼佯装懵懂无知。“他们俩都和黑帮分打交道，对他们了如指掌，”杜威说，“但他们不愿给我一丁点任何形式的帮助。”

针对希尔曼与黑帮勾结一事，看过利普克报告书的执法官员和检察官没有一人进行过深入调查。杜威的办公室和其他机构声称，对于利普克及其同伙所指称的腐败和其他严重罪行，他们缺少独立的支持证据。要依靠已被关进死刑监狱的头号恶棍利普克来对 40 年代初的政治明星希尔曼展开深入调查，联邦和州检察官都显得谨慎起来。当时，希尔曼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支持者和顾问，任何表明他与有组织犯罪有联系的线索都会在白宫引出一个难以洗刷的丑闻。

指证希尔曼的证词被掩盖起来，利普克逃脱电刑的最后希望是在 1944 年进行上诉，请求纽约州州长给予宽恕。时任州长碰巧是上马上任的托马斯·杜威，他拒绝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因此，47 岁的路易斯·利普克·布加尔特成了美国唯一因谋杀罪被处死的有组织犯罪的重要头目。

除了利普克，亚伯·雷勒斯的证词还把谋杀公司的另外六名杀手送上了电椅，并让其他三人被处以长期监禁。在证人席上，雷勒斯详细说明了其帮派的组织结构，指认唐·昂伯托·阿纳斯塔西亚为“我们的老大”和布鲁克林的黑手党老板。然而，唐·昂伯托从来未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和与致命的“布鲁克林好汉”及谋杀公司有牵连。

就在按预定计划准备在利普克的谋杀罪审判上作证的三天前，“绞索手”雷勒斯遭遇神秘而离奇的死亡。在科尼岛“半月亮酒店”的一个十室套房内，他和其他三名检方证人受到警方的 24 小时保护。在四名接受保护性监禁的重要证人中间，雷勒斯是唯一被允许单独睡在一个房间里的人。1941 年 11 月 12 日的黎明前，雷勒斯通过其房间的窗户扑向了死亡。

据警方称，37 岁的雷勒斯将床单撕成布条缠绕打结，并用一根铜线加固，然后绑在暖气管上从六楼的窗户上爬了下去。那根并不结实的绳子突然断裂，让他至少从四楼上跌落下去而死亡。在 five 名保护他的警察当中，有三人声称他们在睡觉，而另两名本应值班的人说他们在打瞌睡。房子里的警卫和另外三名重要证人都没有听到雷勒斯

爬出窗户。警方官员试图为一名重要证人的离奇死亡做出解释，坚持称雷勒斯企图进行一次愚蠢的逃跑，或者根本就是恶作剧，打算从低于其房间约3米的楼层重新进到楼内并返回原地，想以其大胆的特技动作惊吓警官。

一家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媒体认为，雷勒斯有可能被人从窗户上推了出去，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将他形容为“会唱却不会飞的金丝雀”。

几十年来，媒体对这起事件的报道把“半月亮”（一家坐落在日显衰落的海滨度假地的普通酒店）变成了纽约的一个黑手党地标和一处激发游客好奇心的探访地。

在谋杀公司受审和雷勒斯遭遇死亡时，未来的市长和弗兰克·科斯特洛的老熟人威廉·奥德怀尔正在布鲁克林任地方检察官。数年后，另一名地方检察官迈尔斯·F·麦克唐纳（Miles F. McDonald）主持调查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疑点。雷勒斯在布鲁克林的四次审判中作证期间，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躲了起来，奥德怀尔的办公室也向所有警察管区发出了要找他讯问的通缉令。但在雷勒斯死亡之后，奥德怀尔办公室撤回了通缉令，而那位黑手党暴徒又出现在纽约和布鲁克林的街头。

有组织犯罪的知情者们称，一直有传闻说弗兰克·科斯特洛和其他黑手党老板筹集了10万美元的悬赏金，要在雷勒斯牵连阿纳斯塔西亚之前杀死他。在受命保护那个大牌告密者的警察当中，从没有人因收受贿赂或卷入雷勒斯的离奇死亡被指控。尽管如此，雷勒斯的突然死亡还是有效地终结了谋杀公司案的调查和在法庭上将杀人机器与阿纳斯塔西亚和黑手党联系起来的任何可能性。实际上，在就行为失当问题接受执法部门讯问时，奥德怀尔还为那些警方看守们进行了辩护，并且提拔了证人保护小组的负责人。

10年后，麦克唐纳选任了一个特别大陪审团调查雷勒斯的死亡。陪审团得出结论是，看守们松懈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当初的调查也不严谨，但陪审团还是认定雷勒斯是在“企图逃跑时遭遇死亡”。

利普克、雷勒斯和谋杀公司终结的最大赢家是纽约五大犯罪家族。只要有需要，阿纳斯塔西亚和其他黑手党人照样召集杀手执行重要任务，所以谋杀公司的毁灭并未对黑手党造成困难。而作为一笔意外的横财，利普克那最令人垂涎的不法产业落到弗兰克·科斯特洛和文森特·曼卡诺所治理的“科萨·诺斯特拉”家族手里。

第 10 章 一场有利可图的战争

在战时经济烦恼消失和其他娱乐与旅游机会减少之时，纽约黑手党的体彩、赛马和数彩赌博工场得到急剧扩张。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天，日本突袭了珍珠港和美军驻夏威夷的其他基地，美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虽然美国本土没有进一步爆发战争，生活必需品也未出现严重的匮乏状态，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4 年的战争是一段定量配给稀有物资和需要个人做出牺牲的时期。

美国黑手党没有任何牺牲。作为诡计多端的掠夺者，为谋取丰厚的利润，许多黑手党人将战时状态视为一个千载难逢好机会加以利用。战争也将出乎意料地惠及黑手党唯一遭监禁的教父洛克·卢西亚诺。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除了特别公诉人、曼哈顿地方检察官杜威所做的努力外，在对付“科萨·诺斯特拉”斗争中，纽约其他地区和全国各地的执法工作总体上都显得松懈、腐败和缺乏成效。战时状态给联邦和州警察部门增加了更多的压力，许多机构都失去了那些应征到军队服役的最优秀的人员。面对新的保护国家免受间谍和破坏者危害这一优先问题，执法机构对调查有组织犯罪的苦差事更无足够的认识和兴趣。

自从大萧条开始以来，战争和庞大的国防工业首次创造了极速发展的经济、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大量有待消费的闲钱。在战时经济烦恼消失和其他娱乐与旅游机会减少之时，纽约黑手党的体彩、赛马和数彩赌博工场得到急剧扩张。

不过让野心勃勃的黑手党人发大财的却是战时定量配给和黑市。政府发行专用票、配给券和许可证，严格控制汽油、轮胎、衣物、鞋、肉、黄油、罐装食品、

糖和其他重要商品的供应。黑手党人急不可待地利用这个机会，他们主要通过伪造配给券或从腐败的政府雇员手中非法取得限量的联邦专用票再将其倒卖出去牟取暴利。

“汽油、肉类和食品的战时配给为美国民众打开了一个全国性的黑市，人们像以前买私酒一样急切地光顾它。”40年代的新闻记者兼黑手党专家保罗·麦斯基尔（Paul Meskill）如此评论道。

一夜之间，布鲁克林一个毫无名气的角头卡洛·甘比诺（Carlo Gambino）靠配给制变成了百万富翁。作为墨索里尼镇压西西里黑手党的一个难民，甘比诺于1921年偷乘一艘意大利船逃了出来，并在19岁时偷渡到美国，成为一名非法外侨。在有着许多亲戚的布鲁克林安顿下来后，甘比诺不久又将两个弟弟——初露头角的黑手党人带离了西西里岛。城堡战争开始时，他依附于“乔老板”马塞里亚的阵营。在战争于1931年结束之前，甘比诺虽然改换门庭转到取胜的马兰札诺一方，但实际上是隔岸观火，避免陷入任何危境之中。

甘比诺做过私酒商，与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和文森特·曼卡诺关系密切，是纽约五大开山教父之一。禁酒令废止之后，他继续留在非法的酒行业之中，1939年因对政府瞒交酒税被宣判犯有阴谋罪。因一次非法的联邦窃听行动，这项有罪判决被推翻，甘比诺因此与一项两年刑期的判决擦肩而过。1941年美国参战时，作为卡曼诺家族的一台经济发电机，甘比诺成了黑市里的一名中间商。

成了政府线人的黑手党背叛者约瑟夫·瓦拉齐（Joseph Valachi）承认，他也做过黑市商人。瓦拉齐证实，甘比诺是黑手党从配给证券中捞取了数百万美元收益的黑市巨头。他说，通过盗窃和向监管物资配给的政府机构物价管理局（OPA）行贿，甘比诺取得了大量的配给券。

“在战争期间，他和弟弟保罗……从配给券中赚了一百多万美元，”瓦拉齐后来在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前作证说，“配给券来自OPA。最初卡洛指使马仔窃取它们。后来当政府开始将其藏入银行时，卡洛便打通关节让OPA将票券卖给他。他实际上就是靠配给券致富的。”通过贿赂OPA的工作人员取得宝贵的配给券，即使是低级打手瓦拉齐每年也从黑市上净赚约15万美元。“周围有太多的合法票券，我认为制造假配给券并非明智之举。”他说。

经历一段坎坷的命运之后，战争证明对卢西亚诺大有益处，当时他正待在纽约北部一座远离都市的管理严苛的监狱里饱受牢狱之苦。在和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开战之初，美国和盟国船只在东海岸以极为惨烈的比例被纳粹潜艇（U型）用鱼雷击

沉。在1942年的头三个月内，有120多艘船只沉没和数百人丧生；而U型潜艇却毫发无损。

人们对美国最大的港口纽约码头遭受阴谋破坏的恐惧于1942年2月开始与日俱增，当时正在改装成运兵船的法国豪华邮轮“诺曼底”号发生火灾并倾覆在哈德逊河里。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最终确认火灾明显是工人使用乙炔喷枪引起的，但在1942年初，海军情报部门怀疑那条船被轴心国的同情者们所破坏。1942年6月，被U型潜艇送到长岛和佛罗里达的8名德国间谍和破坏者被抓获后，人们对港口安全的忧虑进步加剧。

在码头上的数百名意大利裔工人和划着小船的渔民当中，政府怀疑有人可能是秘密协助U型潜艇的破坏者的墨索里尼的支持者，于是海军情报机构B-3就派出一百多名特工搜集情报。挖掘线索寻找叛徒的工作没有取得成果，不过特工们很快发现，在黑手党控制的码头上，有些陌生人被可疑且口风甚紧的搬运工和唯利是图的渔民留在了港口。

为了在保护纽约港方面取得协助，B-3官员与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弗兰克·霍根(Frank Hogan)进行了接触。霍根的调查人员提出让情报官员与“短袜”约瑟夫·兰扎(Joseph Lanza)见面，后者是海产品工人协会富尔顿鱼市场分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市场内公认的犯罪首脑。兰扎的黑社会绰号“短袜(Socks有‘猛击、殴打’之意)”与袜子并无关系，他是黑手党的一个执法打手，其绰号与他那残暴凶恶的名声有关。

1942年，兰扎是科斯特洛-卢西亚诺家族的角头，在富尔顿鱼市场——全国最大的海产品批发配给中心——则是个凶暴的工会敲诈者。其惯用手法是出卖工会会员，并和市场老板们私下签订合同来诈取贿赂金。正如一名旁观者所指出的那样，为了装卸货，供应商和批发商们不得不打点兰扎的手下，否则他们那容易变质的货物就会在被卖掉并运出市场之前烂掉。

兰扎愿意与联邦反间谍人员合作，但他的能力只局限于下曼哈顿区东河上的富尔顿市场。他的权威尚未延伸到极为重要的曼哈顿西区和布鲁克林码头，这些码头都被黑手党人通过与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联手控制了。兰扎建议联邦特工与被监禁的洛克卢西亚诺接触，他说此人是唯一能“管束整个黑社会的人”。

按照兰扎的指点，霍根的高级助手默里·格法因(Murray I. Gurfein)将海军寻求卢西亚诺合作的要求转达给后者的律师摩西·波拉科夫(Moses Polakoff)，同时还知会了卢西亚诺的犹太同伙迈耶·兰斯基。通过政府的干预，卢西亚诺从丹尼摩拉转

到了纽约康斯托克的大草原监狱。这里在奥尔巴尼以北 60 英里处，是个更便于波拉科夫和兰斯基造访的地方。为了让卢西亚诺相信他们的良善之意和他对于他们计划的重要性，政府还允许弗兰克·科斯特洛和“短袜”兰扎到狱中探望他。

在受到淫业指控并被判刑之前，卢西亚诺在港口里没有多少敲诈勒索利益。但他自己的家族与其他黑手党犯罪集团的成员，还有在码头上活动的爱尔兰暴徒，都对他心怀好感。他指示迈耶·兰斯基作为中间人散布消息称，他希望人人都要与海军情报部门合作并按其要求行事。因为兰斯基与卢西亚诺的老关系，黑手党的工会和其他码头活动的操控者们都没有怀疑其指令的真实性。

当海军的请求到来时，卢西亚诺已经在监狱里待了 6 年，因为另一个 24 年的刑期，他还不具备保释资格。他向其律师交代称，他希望通过帮助政府获得减刑。但他还有另外的深层次考虑，因而向波拉科夫和兰斯基特别指出，他希望不要公开自己与政府合作一事。作为一个从未加入美国国籍的居民，洛克意识到他可能遭驱逐，如果他战时帮助盟国被曝光而法西斯分子仍在掌权的话，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拥护者们会使其遭遇不测。

在 1943 年 7 月盟国攻入西西里之前，卢西亚诺的黑手党帮手找到几名西西里人，让他们帮助海军情报部门绘制西西里的港口地图，这些人提供了该岛海岸线的一些老照片。战后媒体报道称，卢西亚诺设法联系并指示西西里黑手党头目帮助登岛是无稽之谈。卢西亚诺和西西里黑手党并无联系，他们和美国“科萨·诺斯特拉”对盟国在意大利的胜利都没有做出任何重要的贡献。卢西亚诺发挥影响力为战时工作提供过有限的帮助。黑手党人利用 ILA 工会这张牌，让情报特工在码头上工作和与人交往，没有一个工会号召会导致港口瘫痪的罢工或停工。码头上没有发生过破坏事件——而在卢西亚诺干预之前这里就原本如此，所以也找不到德国特工或纳粹同情者策划破坏的任何线索。

甚至是在战争结束之前，卢西亚诺就竭力利用他与海军情报部门合作的这段经历。他 1943 年要求减刑的上诉被驳回，但在 1945 年夏天，正当战争行将结束之际，他再次恳求州长给予行政赦免，并提到他给予海军的帮助。海军部门此时才为他们需要和利用有组织犯罪来提供帮助而感到难堪，于是拒绝证实卢西亚诺的说法。但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证实了卢西亚诺所言非虚，于是州假释委员会一致向州长建议，卢西亚诺应当被释放并立即被驱逐出境。当时的州长是托马斯·杜威，即那位将卢西亚诺送进监狱至少让其领刑 30 年的前公诉人。1946 年 1 月，杜威对卢西亚诺准予行政赦免，其条件是，他将被驱逐出境，如果他重返这个国家，那么他将被视为逃犯强

制性地服完其最高 50 年的刑期。

“随着美国的参战，”杜威就释放决定进行了简短的说明，“针对敌人可能进攻的情报，军队和其他机构曾取得过卢西亚诺的帮助。显然他在这问题上给予了合作，尽管其情报的实际价值尚不清楚。”

1946 年 2 月 10 日，卢西亚诺乘货船从布鲁克林的一个海军船坞出发开始了流亡生活。临行前的那个晚上，弗兰克·科斯特洛和几名其他黑手党人利用他们与 IIA 的关系，带着龙虾、意大利面食和酒水绕过警卫登上货船为他们的前老板饯行。洛克返回了他那土生土长的西西里村庄勒卡拉·弗瑞底（Lercara Friddi），腰缠万贯回归故里的他被当成历经磨难的孩子受到热忱的欢迎。当他被警车送到村子的广场上时，并不在乎其黑手党背景的数百名村民报以热烈的欢呼，同时拼命地挥舞着美国国旗。但对这个落后的村庄，卢西亚诺没有多少怀旧感或愉悦的记忆，他不久就离开那里前往巴勒莫，后来又移居那不勒斯。

卢西亚诺的释放给杜威带来了很大麻烦。这名黑手党人离开后不久，一些夸大其战时对政府帮助的新闻报道就出现了。辛迪加专栏作家和无线电广播员沃尔特·温切尔在 1947 年报道称，卢西亚诺因其秘密工作而应当拥有国会荣誉勋章——美国军方的最高荣誉。温切尔被怀疑从其公寓楼里的一个熟人兼邻居那里获得了这热门消息，而提供消息的不是别人，正是弗兰克·科斯特洛。

几乎从一开始起，媒体就散布消息说，杜威将其赦免状卖给了卢西亚诺。最后在 1953 年，仍任州长的杜威命令州调查委员会展开秘密调查。1954 年，一份长达 2600 页的报告证实卢西亚诺与海军有过合作，但没有发现杜威或假释委员会在给予其宽大处理时有任何不正当的行为。

华盛顿的海军官员审阅了这份报告，令他们懊恼的是，他们依靠黑手党获取情报的事实将被再次曝光。海军提出了并不充分的理由，称该报告对于海军而言将是一场公共关系的灾难，可能危及将来进行的类似的情报活动，因而厚着脸皮请求杜威压下调查结果。尽管会损害其声誉，但杜威仍响应了海军的请求，将报告埋藏在其私人文件堆当中。与卢西亚诺事件有关的基本真相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到 1977 年人们整理杜威的遗物才真相大白。

在辞世之前，杜威向其朋友吐露说，卢西亚诺最低 30 年的刑期属于量刑过重，对于协助与教唆卖淫罪而言，10 年的刑期——被赦免之前他已经服过的刑期——就足够了。这位前公诉人深信，卢西亚诺是有组织犯罪的主脑人物。但杜威有关量刑过重的惊人之语支持了许多独立观察家的观点，即审判卢西亚诺的证

据是脆弱的，那些后来撤销其证词的主要证人受到了杜威手下执着己见的调查员的哄骗和胁迫。

或许，在做出给予减刑的让步时，杜威内心深处会为处刑过重而略感不安。是不是这位前公诉人承认自己让卢西亚诺蒙受不白之冤呢？

第 11 章 风平浪静的时期

朋友，如果这场宴会后我死在布鲁克林诺，
我请求被埋葬，带着我的曼陀林诺。

提到利用二战谋取个人私利时，维托·吉诺维斯堪称大师级人物。战争结束之前，诡计多端的他同时与轴心国和同盟国做交意，因而发了大财。

因布鲁克林的一桩谋杀旧案，面临指控的吉诺维斯于 1937 年被迫逃离了美国，仍属意大利公民的他随后在那不勒斯站稳了脚跟。为讨取墨索里尼政权的欢心，他成了意大利领袖的殷切支持者，捐献了 25 万美元在那不勒斯附近修建了法西斯党总部以示忠心。利用其美国黑手党的关系，他在战时还帮助那独裁者在纽约策划了一次谋杀：1943 年 1 月刺杀了墨索里尼的宿敌卡洛·特雷斯卡（Carlo Tresca），即流亡的反法西斯主义社论撰写人马特罗二世（II Martello）（外号“铁榔头”）。

为表彰他的贡献，与西西里黑手党势不两立的墨索里尼授予这个在美国成长起来的黑帮分子以共和国指挥官（Commendatore del Re）的头衔。这是一种高规格的荣誉奖，一种意大利的骑士身份。

当战争势头逆转，盟国于 1943 年夏季攻入意大利时，吉诺维斯见风使舵地否认自己同情法西斯主义者。利用其英文读写能力和对美国风俗习惯的了解，他成了那不勒斯地区美军军政府的一名翻译和顾问。唐·维托很快用上其最拿手的把戏——在一切环境中寻找犯罪机会。通过与腐败的军官做交易，吉诺维斯在意大利南部成了一个黑市创新者。官员们向他提供军需仓库里的糖、面粉和其他稀缺商品，由他用美军的卡车将物资运送到其销售中心。据后来所知，通过战前返回意大利时所开的瑞士银行秘密账户，他进行了大量的洗黑钱活动。

在遭受战争蹂躏和饥馑漫延的意大利，当军情局调查员捣毁黑市集团并于 1944

年8月逮捕他时，唐·维托正过着安乐奢侈的生活。在情报员奥林奇·C·狄克尼(Orange C. Dickey)面前，吉诺维斯拿出25万美金企图靠贿赂脱身。这名正直的探员抵制住了这种诱惑，并在一次背景调查中获悉布鲁克林警方以谋杀罪发出了逮捕吉诺维斯的通缉令。

吉诺维斯于1945年6月被引渡。然而，当他抵达美国时，由于在布鲁克林接受保护性监禁的一名重要证人离奇死亡，导致这起谋杀检控案无果而终。检察官们指望一个名叫彼得·拉坦帕(Peter LaTempa)的正直烟贩提供证据来证实对吉诺维斯的谋杀指控。可以理解的是，由于担心拉坦帕在开庭前的人身安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就将他收押在雷蒙德街监狱。在被关押期间，大概担忧自己的安全，拉坦帕胆结石症发作，随后服用了被认为是止痛片的药剂。几小时后，他就死去了，市法医报告称，拉坦帕吞下的片剂并不是他所想象的药物，而是足够“杀死八匹马”的毒药片剂。尽管受监禁保护的证人在市监狱被谋杀，但没有人为这起凶案或卷入一个显而易见的让烟贩闭嘴的阴谋而被捕。

伯顿·土尔库斯(Burton Turkus)，谋杀公司案的首席检察官，表示侦破黑手党谋杀案和克制“乌默它”戒律的努力遇到了挫折。“只有一种办法才能击垮有组织犯罪，”他说，“除非有人熟知内情，否则你只能永无休止地调查下去却毫无进展。”

拉坦帕之死让吉诺维斯成了一个自由人。他重新回到黑手党高层，并招摇地炫耀他那从纽约的不法产业和意大利黑市里捞取的财富。为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他在大西洋高地的新泽西海岸上建了一栋豪宅。在那富丽堂皇的房子里，他和妻子安娜用黄金与铂金做成的盘碟盛装美食。

对弗兰克·科斯特洛来说，吉诺维斯1946年的回归是件令人不安的事情。洛克·卢西亚诺被隔离在意大利，显然放弃了其创立的黑手党家族的老板头衔。现在，在掌管这个犯罪家族10年之后，科斯特洛面临着来自吉诺维斯的危险挑战。吉诺维斯自认为是家族的二老板和王权当然的继承人，尽管他因突然流亡国外而与宝座失之交臂。

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科斯特洛深知吉诺维斯善耍阴谋诡计且性情残忍暴戾。“如果你去见维托，”乔·瓦拉齐说，“告诉他某个家伙正在做错事，他会杀掉那个家伙，然后就干掉你，因为是你告发了那个人。”

吉诺维斯放出话来，称在他暂时流亡期间，其手下没有得到科斯特洛的善待，没有像家族其他人那样富足起来。科斯特洛素有交际手腕，他与吉诺维斯及其蠢蠢欲动的兽默认科斯特洛为家族老板的小集团达成了一项休战协定。“科斯特洛对他非常尊

重，”纽约有组织犯罪专家拉尔夫·萨勒诺（Ralph Salerno）回忆说，“吉诺维斯心怀怨恨，因为他出国时地位在科斯特洛之上，认为自己本应该是老板。但事实上科斯特洛高高在上，他不过是个角头而已。”

战争帮了黑手党，和平则对其更为有利。1945年德国、日本投降让美国迎来了一轮全国性的繁荣和一股遏抑已久的消费狂潮。战时薪资与旅游限制的取消让纽约五大犯罪家族最大的地下产业和捞钱行当——非法赌博受益匪浅。体彩和数彩赌注经纪对所有黑手党人来说都是稳赚不赔的生意。科斯特洛和纽约其他大腕们在迈阿密和新奥尔良附近的非法赌场里拥有大量权益。然而，黑社会财富最大规模的扩张有赖于一种新的构想：开发拉斯维加斯的合法赌博业。

自19世纪70年代的边疆时代以来，内华达州就禁止各种赌博活动，而到了1931年，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得出的赌博方式都被立法机构所认可，该州政府错误地指望它能帮助其战胜大萧条。战争结束时，内华达是唯一为赌博大开方便之门的州。但赌博在这个边远地区对豪赌之人没有多少吸引力。里诺和拉斯维加斯为数不多的小赌场类似于沙漠里的度假牧场，扑克牌是它们吸引赌客的主要手段。

对赶往洛杉矶的司机们来说，拉斯维加斯只是一个沉寂的沙漠歇脚点。但东海岸一个小有名气的犹太黑帮敲诈者“狂人”本杰明·西格尔（Benjamin “Bugsy” Siegel）却突发奇想将它变成了一个赌博胜地。西格尔出生于纽约，少年时就与另一名野心勃勃的犹太暴徒梅耶·兰斯基（Meyer Lansky）勾结在一起。他们俩将为卢西亚诺、科斯特诺和其他黑手党老板立下汗马功劳。

兰斯基的乳名为麦尔·萨奇奥斯基（Maier Suchowljansky）。1911年，年幼的他随家人从白俄罗斯的罗德诺市移民到美国。他的故乡当时是“栅栏区”的一部分，犹太人被迫生活在沙皇的统治之下。在下东区，意大利、犹太和爱尔兰少年之间经常发生街头斗殴，据兰斯基的传记作者罗伯特·莱西（Robert Lacey）称，兰斯基和卢西亚诺在其中一次冲突中首次相遇。兰斯基身高1.6米，身材单薄消瘦，但他在遭遇一大帮意大利暴徒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犀利的辩才给卢西亚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下东区，西格尔和兰斯基手下一帮小阿飞被称作“司切塔克”（schtaskers），意第绪语表示“强人”或“硬汉”，后来则被称为“布格与梅耶帮”。这个帮派为兰斯基和西格尔经营的双骰儿赌博提供保护，并在禁酒时期持枪护卫卢西亚诺的啤酒和白酒以防拦路抢劫。

据称西格尔博得“狂人”的绰号是因为一位法官在审理一起野蛮的街头斗殴案件

时曾说，“你们这些家伙真疯狂。”在他们结成搭档期间，兰斯基被人视为出谋划策的权谋之士，脾气火爆的西格尔则因其不计后果的暴行而让人敬若凶神。胆敢当面叫他“狂人”的人会被打得不省人事且被踢断肋骨，西格尔通常还会留下一句警告：“叫我本·西格尔。你永远不要忘了。”据说他承认参与了12起谋杀。大多数有组织犯罪专家相信，作为卢西亚诺的爱将，兰斯基挑选犹太杀手谋杀了乔·马塞里亚和塞尔瓦托·马兰札诺，而西格尔在这两起终结城堡之战的杀戮中充当了杀手角色。

1936年，卢西亚诺选派主要在外地活动的西格尔前往洛杉矶，接管其黑手党帝国一个由杰克·德拉戈纳（Jack Dragna）统领的前哨阵地。卢西亚诺与家族的其他成员认为，德拉戈纳是马斯塔奇·皮特（Mustache Pete）那代不思进取的遗老，既不勤于发展色情和赌博集团，也无能力利用好莱坞电影制片厂的劳工敲诈机会。

西格尔衣着光鲜整洁，算不上英俊但态度温和，对女人有着难以理解的吸引力，是黑手党派驻洛杉矶和好莱坞的理想管家。他将纪律引入组织混乱的洛杉矶帮派，大力扩张其非法赌博产业，并通过在游船上开办海上赌场来增加新财源。他希望靠好莱坞的主打产业来捞钱，通过操纵后台工作者工会的选举，他获得了以劳资和谐为借口敲诈电影制片厂的机会。

惬意地体味着好莱坞的迷人魅力，西格尔和影坛上意裔黑帮分子的特型演员乔治·拉夫特（George Raft）结成了好友，还盘算着要亲自试一次镜头。除了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在战前和战争期间，西格尔还向科斯特洛的东海岸家族输入了数百万美元的赌博和敲诈所得。手头阔绰的他为妻子和两个女儿建了一座拥有35间房的宅院，同时也为自己购置了体面的衣装，出入当地高档的乡村俱乐部。在西海岸，西格尔给东海岸黑手党人的印象是，除了具有杀手的天分外，还富有组织能力。布鲁克林谋杀公司案的公诉人伯顿·土尔库斯（Burton Turkus）认为，是他替黑手党打开并开拓了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

战后，拉斯维加斯成了西格尔魂牵梦萦的地方。他曾在当地原有的破旧赌场里管理黑手党那尚不成气候的赌注经纪生意，后来就开始深信这个沙漠小镇是将其赌场旅馆的独特设想变成现实的理想之地。随着旅游限制的取消，对加利福尼亚南部爆炸式增长的人口而言，他们驱车可以很容易地赶到拉斯维加斯。而通过空中旅行，腰揣大把钞票的傻瓜们也能便捷地从中西部和东部来到美国这唯一合法的豪华赌场。

1946年，西格尔从科斯特洛、兰斯基和一个由黑手党与犹太黑帮投资者组成的财团手中筹到了300万美元的资金。西格尔在赌博生意上绝对是个老手，但这一次他却失算了。在迈阿密附近的佛罗里达州哈伦代尔市（Hallandale），有一家由兰斯基经营

的地下赌博俱乐部，他和科斯特洛及兰斯基均是其长期股东。按照最高估算，西格尔梦想中的赌场旅馆弗拉明戈旅馆（Flamingo）的建设成本约为100万美元，但他投入的费用却是原预算三倍以上，并且还需要注入更多的资金。1946年10月26日，弗拉明戈旅馆匆忙开张，不过等待它的却是一场灾难。在它最初的几个星期里，这个赌场不可思议地走着霉运，它实际上是在亏本经营，而且其旅馆也未产生效益，因为它的客房还没准备好供客人入住。

西格尔将弗拉明戈旅馆关闭两个月以解决生存问题，并从其赞助者那里筹集更多的投资和借款。1947年3月，这家赌场重新开业，但仍继续亏损。

1947年6月20日，西格尔独自呆在洛杉矶情妇维吉尼亚·希尔（Virginia Hill）的家里，后者在争吵之后已经摔门离去。除了与西格尔有暧昧关系外，维吉尼亚此前还有另外几个黑道中的玩伴，据说她是个替黑社会送钱传信的信使。

将近午夜时分，西格尔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这时，窗外的一杆军用卡宾枪骤然响起，子弹透过窗户射了进来。西格尔身中9发30口径子弹，脑袋和上半身被打成了马蜂窝。

此案不乏嫌疑人，但正像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黑帮谋杀一样，这起凶杀案成了无头悬案。弗拉明戈旅馆的经济损失让西格尔的许多赞助者心生不满并疏远了他，这些人相信他在欺骗他们。尽管有媒体称是犹太黑帮的投资者指使并策划了这次处决行动，但黑手党小道小消息称，这起谋杀的幕后指使者是东海岸的黑手党人，他们对西格尔的坐地托大和没完没了地要钱十分恼火。

“犹太人不会乱干涉意大利人，”与西格尔同时代的洛杉矶黑手党人“鼬鼠”吉米·弗拉蒂安诺（Jimmy Frantianno）说道，“他们很早以前就吸取了教训。”

最后，在黑手党新人的管理下，弗拉明戈赌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掀起了一轮开办赌场的高潮，而这些赌场被黑手党控制了数十年。弗拉明戈赌场将拉斯维加斯带进了现代，并成了其著名闹市区最早的中心建筑。拉斯维加斯对黑手党来说是一处新的资源和领地，为避免发生地盘冲突，管理委员会宣布它是一座开放性城市，这意味着任何犯罪家族都可以在那里活动。

20世纪40年代后期，内华达州赌场管理者们张开双臂欢迎涌到拉斯维加斯的意大利和犹太赌博行家。为了保护和鼓励这一有望成为该州最大税收喷油井的新兴产业的成长，州官员们小心地回避这些赌场投资者们的黑社会关系。官员们伪称，这些新来者是职业赌徒，而不是职业罪犯。

在拉斯维加斯数家由黑手党经营的赌场里，梅耶·兰斯基被邀请进来，成为一位

可靠的后台经理。兰斯基是个经验丰富的大“笃么士”（功成名就转而追求悠闲生活的人士），在佛罗里达、纽约和德克萨斯州开有多家地下赌博俱乐部，还在古巴哈瓦那拥有数家合法赌场。兰斯基旗下通常被称为“地毯赌场”的地下赌博俱乐部更为高档，会提供精美的食物和饮料，其装潢设施要比黑手党在纽约和其他大城市经营的脏乱赌场好得多。在赌场偷税漏税的做账技巧方面，无人能与兰斯基匹敌。为逃避向内华达州支付收益分红，在入账作为赌场赢利之前，他就将现款转移走了。

尽管与卢西亚诺和科斯特洛关系密切，但兰斯基充其量是个低级合伙人，他自然清楚自己在黑手党社会里的受支配地位。在他那没受多少学校教育的犯罪同伙中间，他因被视为金融奇才受到尊敬，作为“每月读书俱乐部”的成员，他还被尊崇为思想深邃的思想家。而就其黑社会的生存而言，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可靠的大捞钱人的声望，黑手党显贵们要靠他从赌博中牟利。然而，因为他不具有意大利血统，所以兰斯基绝不可能成为荣誉者，也不可能获准进入“科萨·诺斯特拉”那制定政策和定夺生死的核心领导层。他接受种种指令，却从来不能发号施令。

在拉斯维加斯为黑手党开采财富之矿的灵感应该源于“狂人”西格尔的开拓性努力。有组织犯罪历史学家霍华德·阿巴丁斯基（Howard Abadinsky）称，他是“第一个认识到内华达合法赌博潜力的重要罪犯”。兰斯基的传记作者莱西指出，西格尔被谋杀让他的赌博新宫殿在美国大多数报纸的头版上露了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格尔之死的大量报道让弗拉明戈赌场旅馆声名远扬，并让整个拉斯维加斯一夜出名。

扩张到拉斯维加斯是黑手党的另一个成功，它没有遇到官方的强力遏阻。即使在未遭遇黑手党的银弹攻势时，联邦和地方执法部门对各级罪犯的打击行动都存在着诸多缺憾并缺乏协调性。全国各地的联邦机构和警察局各行其事，很少分享情报信息，因而在调查一名黑手党人或“科萨·诺斯特拉”的一起勒索案时往往各执其词、莫衷一是。

作为全国最大的打击犯罪的机构，联邦调查局（FBI）拥有州际管辖权，可以深入调查发生在美国大陆的几乎所有犯罪活动。自联邦调查局1924年更名以来一直担任其局长的约翰·埃德加·胡佛否认美国黑手党或任何互相联系的全国性犯罪组织的存在。其结果是，FBI没有专门机构来打击有组织犯罪。整个20世纪40年代，即使在像纽约和芝加哥这样黑手党盘踞的城市，也没有一名特工被专门派去从事有组织犯罪的调查工作。

胡佛是媒体、电影、电视和无线广播的超级操纵者，他精心打造联邦特工的虚假形象，使之成为民众心目中无所不能且清廉正直的执法者，能够战胜全国最危险的罪

犯和外国敌人。20世纪30年代，他的主要目标是绑匪和银行抢劫犯。他的特工曾围捕并射杀了闻名一时的银行劫匪约翰·狄林杰尔（John Dillinger），让他赢得了无数喝彩之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FBI的调查重点转移到敌方间谍和破坏者身上。40年代后期，随着冷战的开始，苏联间谍和可疑的共产主义者及左派叛国者成为FBI的主要调查对象。

对于可能存在一个州际“犯罪辛迪加”和一些组织严密的有组织犯罪帮派的疑问，胡佛通常反驳称，他们只是一些流氓无赖，是地方警察部门负责的问题，不在FBI的职权范围内。胡佛驳斥一个提出质疑的国会委员会说，“在执法领域，联邦政府绝不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令人满意的替代者。”

甚至在联邦调查局内部的公文和报告当中，“黑手党”一词都被胡佛禁止使用。他禁止特工开展秘密工作来渗透和曝光犯罪集团组织，担心与犯罪分子进行任何形式的联系终究会给FBI带来污点或损害其廉正形象。

为取得令人瞩目的统计数字，求稳心切的胡佛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容易告破的联邦犯罪，特别是被盗车辆的州际运输和银行劫案上。被盗车辆可以通过在停车现场找到的线索和汽车的机器编号来追查。银行劫案通常是些笨拙且缺乏经验的人犯下的，通过目击证人的指认和逃跑车辆的车牌号也容易调查。

作为一个颇具手腕的官僚和权力掮客，胡佛保留了与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有关的秘密且负面的材料，即“灰函”，这足以让可能敢于挑战其论调的批评者们失去勇气。通常，他会通过传信者巧妙地告知某位议员或官员，FBI已经知道其道德或男女作风上的失检之事，但胡佛——作为一种友好表示——将尽他最大努力压下那令人尴尬的情报。

FBI局长全凭总统喜好任免，而胡佛却占据局长职位长达48年之久，尽管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和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并不看重他。他将FBI当成个人的王国来经营，他个人的习惯言行对它极具影响。据说特工们代表着他心目中的美国白人的男性形象。直到其主政的最后几年，胡佛还是亲自在办公室里通过简短的面谈来挑选新人。一次手掌发潮或柔软无力的握手就会自动让面试者失去成为特工的资格。他制定了一套呆板的人称“胡佛蓝”的着装规范，要求所有当班特工穿上饰着白色胸袋手帕的黑色工作服，内着白色衬衫，脚穿油光锃亮的黑色皮鞋，头戴礼帽。领带，当然，按照社交礼节需要是必须要带的，但训练学校的新学员们被禁止带红领带，因为胡佛认为这种颜色“不真诚”。在近半个世纪里，统一着装的特工们（在胡佛的任期里，他们还不许留胡须）在犯罪现场很容易被认出来，因此在进行

侦察和其他调查活动时，这种“胡佛蓝”套装常常令他们行踪败露。

原 FBI 特工和刑事司法研究者认为，胡佛不愿认真应对黑手党的挑战是出于三个主要原因。首先，他不喜欢漫漫无期而令人沮丧的调查工作，这种调查多半会以有限的成功而告终。其次，他担心黑手党人用金钱来腐蚀特工，从而损害 FBI 没有缺点的声誉。第三，胡佛知道黑手党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日益强大，能够收买那些容易下水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而这些人可以削减他的预算。

拥有 FBI 良好的民众口碑，加上他的官僚手腕，胡佛可以放开手脚选择其调查重点。他宣称不存在一个危险的意裔犯罪组织，而唯一对此提出挑的官员是其竞争对手哈里·安斯林格（Harry J. Aslinger），即联邦麻醉品局（Federal Bureau of Narcotics）局长。自 1930 年该机构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其负责人的安斯林格肩负着遏止并铲除毒品交易的任务。和胡佛不同，安斯林格的调查手段高效、新颖且异于传统，远远领先于他那个时代。他派遣大量特工化装成犯罪分子渗透到毒品团伙中去，承诺让愿意合作的罪犯免于起诉，并有偿招募线人。安斯林格为向告密者付酬进行了辩护，他说通风报信是一种危险的工作，他的几位告发者就被嫌疑毒贩所杀。他还授权使用严刑逼供的审讯手段。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方式在警察部门中相当普遍，但是违反宪法。在收集情报过程中，他的特工对公民权没有太多顾虑，对不合作的嫌犯会饱以拳脚，而且还常常用橡胶棒伺候。安斯林格经常未经法庭授权就通过非法窃听来收集情报和逮捕毒枭。“世界是属于强者的，”表情冷峻、体格健壮的安斯林格针对其手段向另一位政府官员辩解道，“过去总是这样，将来也总是如此。”

缺乏胡佛那样的官僚手腕与才能来耍弄政治权谋，在主持麻醉品局的 32 年里，安斯林格从来没有像 FBI 那样得到政府的实质性支持和媒体的关注。胡佛赢得了媒体战，成为政府的无可匹敌的犯罪斗士，而安斯林格则处于相对隐没无闻的角落埋头工作。安斯林格的机构最多时有 300 名特工，是 FBI 人数的三分之一，且其特工的薪水要比胡佛的人低许多。然而，安斯林格的周围还是聚集着一批强硬无畏的特工，包括一些前警察，这些人深谙毒品贸易的文化与精髓。

1930 年当安斯林格组建他的机构时，他发现地下毒品交易呈现多元化的态势，犹太黑帮分子占据优势地位，尽管中国堂会和爱尔兰及意大利帮派也在许多大城市活动。但到了 30 年代后期，通过秘密调查和逮捕，他的特工发现了全国各个毒品网络的一种大变动：所有网络都被意裔黑帮实际控制。“他们看上去有种特别的凝聚力，”后来在接见作家弗雷德里克·桑德（Frederick Sondern Jr.）并提及黑手党帮派时，安斯林格说道，“但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占主导地位的西西里人或者那意味着什么。

我们费了一些时间才弄明白。”

觉察到黑手党日益壮大的力量，安斯林格招募了一些意裔特工，因为比起其他调查人员来，他们更了解其道德观念与风俗习惯。安斯林格的对策让他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与黑手党活动有关的秘密情报，发现其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毒品贸易。他汇编了约 800 名黑手党人的文件档案并称之为“黑名册”，还有胡佛拒绝接受安斯林格提供的非常珍贵的档案副本。

20 世纪 40 年代，安斯林格的特工们搜集到足够的情报信息来处理大量的毒品案件。这些案件牵涉到纽约的加利亚诺、博南诺和科斯特诺-吉诺维斯家族及其他主要的黑手党家族，特别是那些以坦帕市的小桑托·狄拉非肯特（Santo Trafficante Jr）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卡洛斯·马塞诺（Carlos Marcello）为首的家族。卢西亚诺被驱逐时，警觉的安斯林格密切地关注着他，后来又派遣特工到意大利监视这个被放逐的老板。“那狗娘养的安斯林格。”卢西亚诺骂道。当被告知毒品调查员怀疑他可能试图打开新的通向美国的毒品渠道时，他咬牙切齿地吐出那个名字。

1946 年早些时候，安斯林格发现卢西亚诺到了哈瓦那，显然是在试水以确定自己能否从古巴重新操控他的犯罪家族。卢西亚诺召集科斯特诺、吉诺维斯和家族其他高层成员及梅耶·兰斯基到哈瓦那开会。安斯林格获悉了洛克的意图，随后美国政府根据他的情报向古巴人施压，将卢西亚诺赶出了那个国家，有效地挫败了他那东山再起的企图。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毒品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在美国成为祸患。麻醉品局估计二战后很快进入美国的毒品有 95% 的是被黑手党毒贩走私进来的。一份情报报告警告称，在 1947 年 3 月的一份备忘录中，麻醉品局针对这经过十多年的毒品调查后，认定贩卖毒品的组织将产生更大威胁，并向其他联邦机构发出了明确的警讯。

“多年以来，”该报告宣称，“这个国家存在着一个在某些时候和地点轮廓分明而在另一些时期又相当松散的犯罪组织。这个组织由西西里出生或血统的人组成，血缘和婚姻通常是他们联系的纽带。他们涉足各类犯罪领域，推崇恐怖和报复准则。这些人往往被称为 MAFIA（黑手党）。”

虽然对其组织结构的全貌和规模还不是很清楚，安斯林格和麻醉品局已对黑手党的大体轮廓有了认识。但 FBI 和所有其他与之竞争的联邦执法机构将那份情报分析报告斥为无确实根据的谣言和臆测，认为是某个机构在寻求本不属于自己的荣誉和赞扬。因此，安斯林格敏锐的发现未能受到重视。

在 20 世纪中叶，即在它们形成后的近 20 年里，纽约五大家族得到了蓬勃发展，其中四大家族的开山教父仍然在位，控制着庞大的犯罪集团。约瑟夫·博南诺、约瑟夫·普罗旺斯、文森特·曼卡诺和“汤米”盖塔罗·加利亚诺的家族没有感受到法律的威胁和压力。这四个人是位尊权重的犯罪人物，然而公众和大多数执法调查员对他们的名字及其组织均无从察觉。唯一具有高知名度的黑手党老板是洛克·卢西亚诺的继任者弗兰克·科斯特洛。科斯特洛因其在坦慕尼协会里具有令人震惊的政治影响力和利用赌博与老虎机牟利而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但作为全国最大的有组织犯罪家族的老板，其整个活动领域有多大尚不为人知。在政府报告和媒体报道当中，“黑手党”一词从来未公开与弗兰克·科斯特洛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总体而言，在数千名崇拜者与合伙人的协助下，约有 2000 名荣誉者在纽约市及其附近地区活动。在全国 24 个犯罪家族总计 5000 名黑手党人当中，五大犯罪家族的成员几乎占去了一半。纽约各家族的整体势力让芝加哥约有 300 名成员的第二大黑手党帮派相形见绌。

1945 年，在市政厅主政 12 年之后，菲奥雷洛·拉瓜迪亚离开了市长职位，没有寻求第四次连任，这对纽约黑帮分子而言是个意外的收获。除了科斯特洛的老虎机，拉瓜迪亚那牛虻似的政府和拘谨老实的警方高层并没有破坏任何重要的敲诈勒索行当。然而，这位改革派市长至少将赌博和黑手党其他传统的牟利活动赶到了地下，使黑手党人及其帮手对警方的突袭有所顾忌。

在原布鲁克林地方检察官威廉·奥德怀尔（坦慕尼协会和科斯特洛暗中保荐的候选人）的新一届政府里，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奥德怀尔市长就职后不久，警察部门对赌博这一属非暴力的犯罪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政策。这种巨变在中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多年以来，赌注经纪人和彩票经营者一直偷偷摸摸地在店堂后室和台球室里经营他们的生意。现在，在新政府的治理下，警方施加的压力大为减轻。像在下东区、哈莱姆、威廉斯堡、布朗斯维尔和南布朗克斯这些地方，赌注经纪人和彩票赌博操作者在街头自由地打理着生意，有些还用书写板公开记录赌注。松驰的反犯罪气氛表明，“爪垫”（警察用语，表示在地方管区和选区发生的警察系统的腐败）现象又回来了。

警方的放任态度变得如此明目张胆，以至于引起了 FBI 的注意。在拉瓜迪亚的政府里，一些管区官员开始将部分未告破的偷盗和抢劫案件隐瞒不报，以此提高其破案率。在警察局内部，将犯罪控告书丢到垃圾筒中已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恶作剧：“让垃圾筒侦探来办案吧。”在奥德怀尔的那些警察局长的治理下，“垃圾筒侦探办案”的

5名创始教父之一的乔·普罗旺斯。在1957年流产的纽约阿帕拉沁黑手党峰会上，他被州骑警拘留。此照即摄于他被羁押之后，其神情明显不悦。被誉为“橄榄油大王”的他是全国最大的橄榄油和番茄酱进口商，于1931年创建了今天被称为科洛博家族的黑手党帮派。在担任30年的黑手党老板期间，普罗旺斯从私酒贩卖、色情和彩票赌博及高利贷行当中敛聚了巨额财富，并且从未在美国监狱坐过一天牢。（征得弗雷德里克·马腾斯同意后转载的档案照片）



数量变得越来越多，以至于FBI在1949年拒绝公布纽约市的犯罪统计数据，说它们既不可靠也不可信。

所有黑手党家族继续倚重被公认为普通不过的敲诈勒索行当：体育赌博、数字彩票、高利贷和抢劫。每个家族还开拓了各自的犯罪领域，有时也会与其他犯罪家族联手合作。科斯特洛的家族将曼哈顿码头和富尔顿鱼市收入囊中，并和其他家族一起控制了服装产业中的货运业务和其他行业。

“唐·文森佐”文森特·曼卡诺，一个布鲁克林犯罪家族的老板，控制着布鲁克林码头，并和科斯特洛的帮派一起开始接管纽约市私营的垃圾清运公司。

乔·普罗旺斯是另一个盘踞在布鲁克林的老板，他和文森特·曼卡诺一起非法偷渡到这个国家。他们既是儿时的伙伴，又是一起逃难的兄弟。20世纪20年代，在普罗旺斯因偷窃罪而在那里蹲过一年监狱的西西里岛，他们一起脱去了墨索里尼给黑手党套上的枷锁。在纽约地区，利用黑手党从私酒贩运、色情业和彩票赌博及高利贷等非法产业中诈取的钱财，普罗旺斯收购了20家合法企业。根据FBI的一份秘密研究报告，他每周从彩票赌博和乐透彩生意中取得的毛收入达到惊人的500万美元。在食品行业，素以“橄榄油大王”著称的他通过玛玛咪亚橄榄油公司（Mamamia Olive Oil Company）成为全国最大的橄榄油和番茄酱进口商。安斯林格的调查人员怀疑那是一家被用来走私毒品的幌子公司。尽管因违反食品与药品法（Food and Drug Act）和偷逃所得税被判刑，但普罗旺斯从来没有在美国蹲过一天监狱，都以交纳罚金或领受缓刑的方式轻松过关。他在布鲁克林的生活不张不扬，但在新泽西乡村海次镇拥有一处狩猎小屋、一个私人飞机场和一处占地328英亩的地产。

生活在布朗克斯区的教父汤米·加利亚诺是个低调而神秘的人物，在黑手党核心圈子之外往往不为人知。在服装业和工会中开拓各种财源稳定的诈骗生意时，加利亚诺的老干将兼二老板“三指”汤米·布朗·卢切斯一直充当着他的替身。此外，卢切斯还监管家族的毒品走私生意，并在长岛向垃圾承运人与建筑商收取保护费。

“唐·巴比诺”乔·博南诺家族的不法财富在整体上与科斯特洛家族的不相上下，拥有大量的体育赌博、高利贷、数字彩票和毒品买卖。在纽约地区，博南诺帮派还取得了向旅馆提供洗衣服务和供应莫泽雷勒干酪的垄断地位。通过在加拿大短期逗留然后经由底特律合法返回美国，他消除了因非法偷渡到美国而产生的问题。这一花招为他1945年加入美国国籍扫清了道路，避开了潜在的折磨着卢西亚诺、吉诺维斯和其他高级黑手党人面临的遭驱逐出境的问题。为了从市区紧张忙碌的活动中放松下来，博南诺隐退到其纽约北部的豪宅中生活。那栋具有殖民地风格的住宅拥有14间房，是他在一处占地280英亩的庄园兼乳牛场里建起来的。

被纽约家族的组织力量和财富所打动，美国其他地方的“科萨·诺斯特拉”头目们在40年代派遣了一批年轻的黑手党人到纽约受训。一个值得注意的非凡人物是小桑托·狄拉菲肯特，此人是坦帕市黑手党老板的儿子，同时也是其衣钵传人。小桑托从加利亚诺家族的汤米·卢切斯和其他成员那里受到特殊锻炼。后来，在成为坦帕市的黑手党老板之后，狄拉菲肯特告诉其律师弗兰克·拉加诺（Frank Ragano）称，在非法的冒险事业、黑手党的生活方式和涉及到女人的行为规范方面，他在纽约学到了宝贵的经验。

从那些纽约人身上，狄拉菲肯特得知，比起对待他们的男性朋友来，黑手党人更应该尊重“他们女人的圣洁性”。“他们那严苛的行为准则禁止与其他黑手党人的妻子或女友发生暧昧关系，违者将被处以死刑，”拉加诺特别指出，“他们有义务保护同伙的妻子或情人，如果那人不在其身边的话。”狄拉菲肯特向拉加诺解释说，黑手党不反对已婚打手有婚外情，但会提出警告。“桑托有个情妇，但他非常谨慎地处理这件事，以免让其妻子和女儿们感到尴尬，”拉加诺接着说，“那是所有黑手党成员所期望的。”

到了40年代后期，禁酒时期发生在纽约家族之间的流血冲突与竞争已成了一种远去的记忆。通过博南诺的儿子“比尔”塞尔瓦托（Salvatore “Bill”）和乔·普罗旺斯的侄女罗莎莉·普罗旺斯（Joe Profaci）的婚姻，博南诺和普罗旺斯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关系。两大黑手党“王室”联姻，“科萨·诺斯特拉”所有头面人物都前来参加婚礼，歌手托尼·班尼特（Tony Bennett）还为3000名来宾演唱了月下情歌。在纽

约礼查饭店举行的这场豪华婚礼是当年美国黑手党的社交大事，并成了电影《教父》开始时那场婚宴的原型。

除了喜欢和政治人物与社会名流打交道的弗兰克·科斯特洛外，其他教父都刻意避免过分招摇的社会生活。但乔·博南诺是个例外。他喜欢戴着各种巨大的红宝石、蓝宝石、翡翠和缟玛瑙戒指，在黑手党人中间引领着一种浮华的生活时尚。

在举行严肃的黑手党会议和讨论管理委员会的事务之后，作为一种放松心情的方式，博南诺、曼卡诺、普罗旺斯和加利亚诺会愉快地参加彼此轮流作东主办的社交宴会，享用各种美味佳肴。聚会活动频繁地在曼卡洛那长岛的马场里举行。作为主人，曼卡诺会亲自准备许多道用鱼、小牛肉、里脊肉和意大利面食做成的特色菜，让客人纵情享用美食佳酿。博南诺在其自传中写道：“有曼卡诺和普罗旺斯参加的宴会通常显得别有韵味，他们会按照西西里人的风俗习惯用押韵的两行诗来为彼此祝酒。”

博南诺举出一例他所喜爱的“诙谐”的祝酒词：

朋友，如果这场宴会后我死在布鲁克林诺，
我请求被埋葬，带着我的曼陀林诺。

对这些老板来说，这些充满兄弟情谊的宴会象征着风平浪静的繁荣，一种 20 世纪中后期勃兴于他们家族内部的繁荣，一种与他们的同道教父所共同拥有的繁荣。然而，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们将不会如此无忧无虑。

第 12 章 “醒来吧，美国！”

“黑手党是一种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专门从事毒品销售和凭借敲诈与暴力操纵各种赌博、卖淫及其他非法产业。”

两名任期未满一年的参议员都想博得头彩，调查有组织犯罪将是个令人羡慕的美差。

竞争者是田纳西州的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和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R·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1950年两人都在寻找政治上的能让他们在全国大出风头的热门事件。他们同时想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对有组织犯罪的力量和政治影响进行一次全国性的调查。其推动力主要来自于公民犯罪委员会和市长们的抱怨，他们称没有联邦政府的干预，非法赌博和州际犯罪案件正在迅速飙升。由于其所在的民主党控制了参议院，基福弗得以挫败共和党人麦卡锡，被任命为一个特别附属委员会的主席来调查州际“赌博和诈骗活动”。

作为一种慰藉，麦卡锡找到另一个引发争议的领域：在政府内部清查共产主义的影响。麦卡锡毫无顾忌的调查手段和夸大共产主义的渗透让他在世界备受瞩目，其知名度远远高于基福弗。他那无情的歪曲、不道德的手段和对证人的恫吓为他的行事方式赢得一个不光彩的名词——“麦卡锡主义”。

从一开始，作为田纳西州一个并不讨人喜欢的土里土气的改革者，埃斯蒂斯·基福弗所领导的有组织犯罪调查没有被指望能取得多少成果。他是个资历较浅的参议员，其为人熟知的是他在田纳西参加选战时的形象：夸张地咧嘴大笑，头上还滑稽地戴着一顶浣熊皮帽子。然而，调查和基福弗以赌博为重点的决定遭到哈里·杜鲁门总统民主党政府的反对。北方的民主党领导人们担心，该委员会保守的南方民主党成员和共和党人将会重点紧盯大城市的民主党领导机构，而它们是该党的根基。

基福弗的人未能取得政府或胡佛的 FBI 的帮助。司法部长霍华德·迈克格拉斯 (J. Howard McGrath) 响应胡佛的观点, 斥责联邦调查将是浪费时间, 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全国性的犯罪辛迪加”。那位司法部长宣称, 由地方来打击非法赌博是最好的办法, 他籍此表明了白宫的厌恶态度。

在地方, 大多数警察部门没有为基福弗的国会调查提供多少帮助。毫不气馁的基福弗和他的人马知难而进, 并赢得了阿斯林格的麻醉品局、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 (Frank Hogan) 和其他多位州检察官的支持, 同时还得到芝加哥和新奥尔良 (New Orleans) 那些非官方性质的城市犯罪委员的鼎力相助。纽约警察局黑手党专家拉尔夫·萨勒诺 (Ralph Salerno) 和其他 10 名侦探接到命令, 即刻开始整理他们手中有限的与该市黑手党人有关的情报资料。“警察局长知道基福弗就要来到市里, 他希望有所准备地应对询问, 不要显得一无所知。”萨勒诺回忆说, “结果是其他城市的警察局都没有黑手党人的档案。这些城市让一些老资格的警察与基福弗的人谈话, 但他们没有相关档案, 没有可靠的情报。”

从 1950 年 5 月到 1951 年 5 月, 这个正式名称为“调查州际贸易有组织犯罪特别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先后在 14 个城市举行了公开听证会。该委员会共传唤了 600 多名证人, 但在 1951 年 3 月抵达纽约参加为期 9 天的形势会议之前, 它的行动基本上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在纽约, 这个附属委员会和黑手党发现了新兴的电视媒体的力量。当时的三大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和国家广播公司 (NBC) 以罕见的全国联播的方式用电视播放了听证会实况。各种可疑的角色——赌注经纪人、皮条客、政客和狡猾的律师在电视荧屏上轮番上阵迷倒了全国, 成了电视直播史上第一次场面惊人的公共事件, 每天吸引着 2000 万~3000 万名观众。

这次直播最精彩的部分是弗兰克·科斯特洛的亮相。其他被委员会传唤的黑手党重要头目——汤米·卢切斯、维托·吉诺维斯, 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和一些次要人物, 靠《第五修正案》中所赋予的免于自证其罪的权利拒不开口, 并很快摆脱了电视摄像镜头。科斯特洛则不然, 尽管他是全国最重要的黑社会人物, 并且他与坦慕尼协会的关系以前已被曝过光过, 但科斯特洛还是同意自蹈虎穴地作证。他显然想逃避责任, 免得像那些将《第五修正案》当做救命稻草的证人一样被人自动地贴上黑社会头子的标签。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尖锐的提问, 而为了那些赫赫有名的朋友, 他也得继续坚持自己是个商人的荒诞说法。

科斯特洛提出了一个被特别委员会所接受的要求: 电视里不得显出他的脸部。在

3天令人精疲力尽的作证期间，摄像机对准他的手部，近距离拍摄了他手上的皮肤、他那敲击着桌面的手指和那时而紧握时而松开的双手。科斯特洛的双手和他那口音浓重、嗓音粗哑的话语怪诞地组合在一起。与在电视上露出脸部相比，这反而让他成了一个更阴险、更神秘的角色。他的手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犯罪帝国的可怕象征。一位电视喜剧演员制作了一部滑稽短剧，科斯特洛那无所依附的双手在剧中表现着各种各样的情绪——惊讶、无知、痛苦——而最后，它们恼羞成怒地扼死了埃斯蒂斯·基福弗。

对于电视中那令人恐怖的声音，观众们并未意识到它形成的机体原因。在一次失败的移除喉部息肉的手术当中，科斯特洛的声带受到创伤，致使其话音显得尖厉而怪异。在电影《教父》当中，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作为主角扮演了第一代黑手党独裁者，据说他根据电视节目模仿了科斯特洛与特别委员会斗法时的口音和语调。

尽管同意作证，但科斯特洛拒绝回答恶意问题并避免牵连他人。唯一轻松且令观众发笑的时刻出现在一位参议员发问的时候。这名参议员特别提到科斯特洛那名声在外的非法赌博生意，问他为美国做了什么以馈报其积累的财富。“我纳税了。”科斯特洛回道。

通过重新审查科斯特洛在纽约坦慕尼协会和市政厅对美国民主党成员的政治影响，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为威廉·奥德怀尔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奥德怀尔，这位在1942年的那次无耻的鸡尾酒会上恳求科斯特洛给予支持的候选人，已于1950年辞去了市长职务，后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墨西哥大使。“国家需要我。”奥德怀尔说道，诡诈地解释了他何以突然离任，其真正原因是一桩他的政府和警察部门为赌注经纪人和其他赌客提供大量保护的丑闻即将曝光。

在与特别委员会脾气暴躁的参议员查尔斯·W·托比（Charles W. Tobey）进行紧张对话时，奥德怀尔承认曾渴望取得科斯特洛的保证和经济上的支持。

“他要得到什么？”提到科斯特洛的政治影响时，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人托比问道。“他有何诉求？那到底是什么？”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奥德怀尔回道，“他是否是银行家、商人还是黑社会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他的钱袋总是很吸引人。”

在公开听证会落幕之前，几位参议员看出了“犯罪辛迪加”、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和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所构成的相互关联的威胁。“我们内部的两大敌人——罪犯和共产主义者，常常联手合作，”参议员托比警告说，“醒来吧，美国！”

根据其旋风般的调查，该委员会得到结论，认为黑手党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组织。

它得到政坛和警方腐败势力的广泛支持，并且它的两大根据地就是纽约和芝加哥。更为不祥的是，据参议员们称，这些黑帮势力源于外国人的一个阴谋。

“在该委员会看来，有个被称为黑手党的邪恶犯罪组织在全国活动并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这个特别小组在一份总结报告中称。“黑手党是一种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专门从事毒品销售和凭借敲诈与暴力操纵各种赌博、卖淫及其他非法产业。”

调查结果标志着一种重大突破，因为首次有一个联邦团体公开确认黑手党是个存在并繁荣于美国的组织。但由于该委员会缺乏详细而精确的犯罪证据，FBI和大多数执法机构对该委员会的报告极为轻视，认为那是些无确实根据的普通问题，因而没有继续发掘在听证会上已经露出端倪的线索。国会也漠视该委员会的工作，拒绝通过任何可能遏制有组织犯罪的法律。

尽管付出了种种努力，但回想起来，该委员会对黑手党的大量资产揭露甚少，所披露的尚不及其规模与影响的一半，并且还忽略了许多黑手党老板。在纽约，它的调查人员没有对三名主要教父乔·博南诺、乔·普罗旺斯和盖塔罗·加利亚诺进行细致调查或当成证人传唤。

国会调查的最大受害者是那个唯一有勇气作证的黑手党教父弗兰克·科斯特洛。他对自己真实价值的虚与委蛇的回答招来了藐视国会罪和5个月的监禁。

科斯特洛的电视直播和重新流播的恶名促使美国国内税务署（IRS）——黑手党长久以来感到头痛的强硬对手——组成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来审查他的纳税申报单。以阿尔·卡彭的垮台为鉴，科斯特洛一直小心地隐藏着他的真实财富，但他被妻子的嫉妒所害。每当发现丈夫与情妇调情时，科斯特洛夫人就会进行一次疯狂的消费。国内税务署的一次审计发现，在6年多的时间里，她花掉了57万美元，而这些钱既不能证明是科斯特洛多年来所申报的部分收入，也不能证明来自他的合法资产和投资。他被宣判犯有逃税罪，并在判决经上诉遭推翻前被关押了11个月。

尽管身处监牢之中，但通过可靠的中间人来发号施令，科斯特洛轻松地操控着其犯罪家族。

在未发现许多真正的黑手党大亨的情况下，基福弗委员会突然把梅耶·兰斯基置于调查的中心并夸大其重要性。被传唤作证时，兰斯基也把《第五修正案》当成防身盾牌，但他还是和科斯特洛一起遭受重创。兰斯基在很大程度上逃过了听证会的审查，但他还是成了该委员会的主要目标之一。他的赌博背景和犯罪同伙被曝光迫使灰头土脸的地方政府关闭了他设在佛罗里达州布洛瓦县、萨拉托加温泉市（Saratoga

Springs) 和纽约北部的非法“地毯赌场”。他对萨拉托加市的赌博指控供认不讳，并在那里被监禁了3个月，同时交纳了2500美元的罚金。

口无忌言的基福弗错误地将兰斯基描绘成纽约和东海岸有组织犯罪的首脑人物，怒斥他是个“卑劣者”和“一个全国性犯罪辛迪加背后的社会渣滓”。该委员会的聚光灯错误地将兰斯基从一个富有但地位低下“科萨·诺斯特拉”合伙人凸显为黑手党的经济巨人。直到他1983年以80岁高龄去世，兰斯基此前一直受到执法机关无情的纠缠，尽管从未被判过一项联邦重罪。

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基福弗凭借听证会成了一个政治名人，但在全美国露脸也给他带来了指责和批评。有人提出质疑，称他对特定地区的黑社会赌博现象视而不见。这些地方包括他家乡的孟菲斯市（Memphis）、阿肯色州温泉城、内华达州和其他有参议员参与该附属委员会的州。探查基福弗私生活的记者们突然曝光了他那看来虚伪的一面：这个假装正直的反赌博的改革者靠免费入场券和其他赏钱频频赶往赛马场。

基福弗在全国突然声名鹊起，这让他能够将自己的浣熊皮帽子扔进1952年民主党总统提名的选战之中。然而，他的调查活动引起了哈里·杜鲁门和大城市政治大佬们的反感，他们将提名机会给予了阿德莱·E·史蒂文森。4年后，当史蒂文森再次败给现任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时，与民主党大腕们改善了关系的基福弗参选了副总统但遭失败。

就在基福弗的调查人员寻找黑手党的活动线索时，一场重大的权力交替就出现在他们鼻子底下。1951年，管理委员会的创始成员文森特·曼卡诺失踪了，他已经领导他那个布鲁克林犯罪家族达20年之久。他的尸体一直未能找到，但管理委员会其他成员都相信，曼卡诺必定被他那恶毒的二老板，即谋杀公司的一名创立者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除掉了。

阿纳斯塔西亚厚颜无耻地出现在管理委员会会议上，宣称是作为曼卡诺家族新任教父出席会议。其他黑手党首领都认为阿纳斯塔西亚是个鲁莽急躁之辈，不过仍接受了既成事实，而实际上，未经批准杀害自己的一个碰不得的首脑人物严重违反了管理委员会的规定。阿纳斯塔西亚没有明确承认自己已经杀死了曼卡诺，他紧紧抓住一条站不住脚的借口，暗示是为了自卫而抢先动手，因为曼卡诺对他心怀不满正欲阴谋杀害他。甚至与曼卡诺密切交往了20年的乔·博南诺也宽恕了阿纳斯塔西亚，称希望避免一场家族间的战争。尽管阿纳斯塔西亚来自于意大利大陆，但博南诺辩解说，既然他尊重古老的西西里传统，他就有权利获得老板的头衔，因而应该享受荣誉并被尊为“唐·翁贝托（Don Umberto）”。

为庆贺自己荣登老板之位，阿纳斯塔西亚在新泽西州靠近乔治·华盛顿大桥的利堡建了一处豪宅。“刽子手”阿纳斯塔西亚对自己的安全非常警觉。他让保镖们围在身边护卫自己，并在新家周围建起了2米高的带刺铁丝网篱笆，还放开凶猛的杜宾犬在房屋四周巡逻。

作为“刽子手”，阿纳斯塔西亚的恶行不仅仅局限在黑手党内部。1952年2月，狡猾的银行窃贼和越狱大师“行动者”威利·萨顿（Willie “the actor” Sutton）在布鲁克林被逮捕。因为这次追捕，21岁的前海岸警卫队员阿诺德·舒斯特（Arnold Schuster）获得了一笔奖金。他跟踪萨顿，并在地铁里认出这个银行大盗后向警方报了警。据称看到舒斯特在电视里接受采访，狂怒的阿纳斯塔西亚脱口叫道，“我没法容忍告密者，杀了他。”乔·瓦拉齐后来透露说，黑手党的小道消息印证了新闻报道，即舒斯特被阿纳斯塔西亚的杀手杀害于他布鲁克林的家附近。

基福弗的调查和执法机关未注意到黑手党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在盖塔罗·加利亚诺于30年代初所创立的犯罪家族里，掌权主政的监护者已经换了新面孔。由于身患严重的心脏疾病，盖塔罗·加利亚诺放弃了对长期以来充当其二老板的“三指汤米·布朗”盖塔罗·卢切斯的控制。这个犯罪家族开始被称为“卢切斯家族”。

1900年卢切斯生于巴勒莫，11岁时随父母移居到东哈莱姆那拥挤的廉租公寓里。少年卢切斯桀骜不驯，是个卑下的小偷，其不轨行为常常令父母颜面尽失。到了他16岁时，父亲把他赶出了家门。他在一家机械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拥有过的唯一一份正经工作——他的右手食指就在那厂里的一起事故中被轧掉。这次伤害让他对工人生活失去了兴趣，从此踏上了职业犯罪的道路。卢切斯21岁时因偷盗汽车被捕，一个给他提取指纹的警官戏谑地称他“三指布朗”，（那个警官是芝加哥小熊队棒球投手“三指”莫迪凯·布朗的球迷。）这个绰号从此伴他一生。

禁酒时期，卢切斯加入马塞里亚的帮派并与洛克卢西亚诺建立了友谊。作为卢西亚诺的心腹亲信，他的狡诈使谋杀塞尔瓦托·马兰札诺的计划得以成功实施，这让1931年卢西亚诺能够创立五大犯罪家族和管理委员会。卢西亚诺论功封赏了他，把他推上了汤米·加利亚诺新家族二老板的宝座，而靠着在黑社会不法生意方面的聪明才智，卢切斯让加利亚诺和他本人富足了起来。

在20多年里，消瘦、烦躁而亢进的卢切斯成了黑手党的一名开路人，不断地策划赚钱计划和改进黑手党传统的诈骗方式。运用暴力和智谋，他控制了纽约鸡肉同业联盟、一个伪装成窗户清洁公司的保护费勒索组织、多家服装业货运公司以及一个毒

品走私团伙。

卢切斯的得意之举是取代利普克·布加尔特成为服装业最可怕的“夏洛克”并引进新的高利贷诈骗技巧。服装生产商们长期以来都面临着一个头痛的问题，也就是在等待销售资金回笼来生产新款季节性外衣、套装和女服的同时，还得筹集更多资金以便在业界站稳脚跟。由于无法取得正常贷款，生产商们最后就求得求助卢切斯。只有接受一种人称“崩溃性贷款”的条件他才会提供资金，这意味着在开始偿还本金之前，借款人每周要付5个点（5%）的高利贷利息，而且至少要付20周。因此，以借款1万美元计算，借款人每周要付500美元或者说在20周里得付清1万美元的利息。在20个周结束时，生产商仍欠着黑手党人的全部本金，在受到人身威胁的情况下，受害者不得不无限期地每周支付500美元，直到1万美元的所有本金被另外还清为止。按照最低收益计算，卢切斯每笔非法贷款的利息就相当于其本金总额。这种方法据说让他每年赚了500万美元，即使在最黑暗的大萧条时期也是如此。

作为一种幌子和基于所得税的考虑，卢切斯在服装中心设立了办事处，并注明自己的职业是“服装生产商”。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他的确拥有或公开注册了十几家服装厂。服装业工会显然清楚他的黑手党底细，没有试图让他的血汗工厂加入工会。

身为一百多名荣誉者的老板，卢切斯赚得盆满钵满，并大胆地让角头和打手们放开手脚从事自己的彩票、赌博和抢劫活动。在他的领导下，鱼龙混杂的职业拳击界成了他的版图中越来越重要的势力范围。

自禁酒以来，爱尔兰、犹太和意大利黑帮分子就深入拳坛操纵拳击手和筹划比赛。奥尼麦登（Owney Madden）、达齐·舒尔兹、阿尔·卡彭、洛克·卢西亚诺和其他勒索者都是当红拳击手和拳王的幕后老板。拳击是一种与他们自己的危险职业相似的暴力运动，被黑手党人和其他黑帮分子所了解和认同。作为真正的拳迷，他们喜欢拳击场和训练馆里的气氛和那被大男子气概所激发出来的兴奋感。正如拥有夜总会让黑手党人在娼妓界享有特权地位一样，拥有并控制拳王及其竞争者会让他们在黑社会有着类似的声望。

许多拳击比赛的确都是公平的，但有些比赛结果早已谋定，差不多成了黑手党人为操纵赛事和赚取赌金而进行的内部友好角逐。40年代，卢切斯的一名杀手进行了渐进式的夺权行动，让其家族在拳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将其他家族排挤了出去。这个代表卢切斯行事的打手就是人称“弗兰克·卡勃”（Frankie Carbo）的保罗·约翰（Paul John）。卡勃在布朗克斯长大，自18岁开始就因杀人和人身攻击留下了长长的

犯罪记录。20年代，卡勃因受到4项谋杀指控和涉嫌参与暗杀“狂人”西格尔被逮捕，但最终被宣判只卷入一起谋杀，且以过失杀人罪领刑5年。

1942年，在受指控卷入谋杀公司的一起谋杀并最终被宣判无罪之后，卡勃将其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拳击赛上。到那时，他已经有了包括“弗兰克·塔克”（Frank Tucker）和“愤怒先生”（Mr. Fury）在内的多个绰号，但他在操纵拳赛时则化名“格雷先生”。作为一个敏锐的拳坛观察者，卡勃灵活地驾驭着多名拳击手。通过对经纪人、组织者和教练施以暴力和威胁，他发挥了自己所能施与的全部影响力。那些无视卡勃之警告的人都受过手拿铅管者的造访。卡勃控制了拳击手和经纪人，如果要举行高规格的拳击赛并保证其顺利进行的话，组织者就不得不遵照他的旨意行事。

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卡勃是黑手党无可争议的重要人物和拳击界的黑社会专员。在许多轻量级、中量级、次重量级和最重量级冠军赛中，哪位参赛者将取得冠军头衔均由“格雷先生”决定。他经常干预比赛结果。卡勃通过搜刮拳击手的钱包、瓜分组织者的利润和总是打稳赢不输的赌大发其财。

在利多海滩（Lido Beach）的高消费人群聚居的长岛镇，卡勃的老板汤米·卢切斯以其对拳击的了解和怂恿他们在大赛上押注让邻居们印象深刻，他们说他总是向他们吐露谁将是获胜者。

退役很久之后，杰克·拉玛塔（Jake LaMotta）承认，在1974年一场对决比利福克斯（Billy Fox）的比赛中，卡勃命令他假装被击倒。拉玛塔故意输掉了那场比赛，而作为补偿，卡勃两年后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在中量级冠军赛中真正凭实力战胜马赛尔·瑟丹（Marcel Cerdan）获得了冠军。

“当那个被称为‘卡勃先生’的人想让某个人露脸时，比赛就成了一场奉命行事的演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量级和次重量级冠军“糖鲛鱼”罗宾逊（“Sugar Ray” Robinson）如此说道。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名星拳击手，罗宾逊在一本与戴夫·安德森（Dave Anderson）合著的传记中称，他抵制过卡勃要操控一系列他与拉玛塔比赛的命令。罗宾逊的声望和吸引力似乎让他能够礼貌地回绝卡勃并平安地活下来。

1960年，在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拳坛圣经——《拳击杂志》（*Ring Magazine*）的编辑兼出版商奈特·弗莱舍（Nat Fleischer）简洁地概括了卡勃所施加的恐怖。“每个人都惧怕他。”谈起那个身材矮胖而表情严肃的戴着角质架眼镜的人，弗莱舍这样说道。

这个黑手党人的统治最终被一场开始于50年代末的执法调查所打垮。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以“非法操纵比赛”的罪名对他提起公诉。负责该案的检察官阿尔佛

雷德·J·斯科蒂 (Alfred J. Scotti) 称卡勃是“拳击界最强大的人物”。

60年代初，卡勃在洛杉矶受到联邦指控，罪名是敲诈勒索和威胁经纪人与组织者。他随后被宣判有罪，并领刑 25 年。入狱前，卡勃为卢切斯完成的最后一项任务是控制了索尼·利斯顿 (Sonny Liston)，并夺走他从 1962~1964 年期间作为重量级冠军赚取的相当部分的收入。利斯顿被穆罕默德·阿里 (Muhammad Ali) 的一记重拳击倒，据信在 30 年的时间里，后者是首位完全不受黑帮所影响的重量级拳王。

卡勃的恶运几乎不影响卢切斯在纽约和其他地方攫取非法收入。在其大本营之外，主要通过坦帕犯罪家族的老板小桑托·狄拉菲肯特联手，他平稳构建了毒品走私和其他非法交易网络。卢切斯在 40 年代与狄拉菲肯特的父亲有过密切的交往，并且帮助训练过他的儿子。小狄拉菲肯特频繁地赶到纽约与卢切斯见面，有一次还带上了他的律师弗兰克·拉加诺及其未婚妻南希·扬 (Nancy Young)。

这两个黑手党巨头对彼此的到访都不惜代价地给予帝王般的待遇。有天晚上，卢切斯邀请狄拉菲肯特及其佛罗里达的随客来到洛克菲勒中心附近的默丘里奥饭店用餐。晚宴期间，黑手党老板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用西西里语交谈，直到卢切斯突然转向那个活泼的白肤金发碧眼的女人南希·扬并用英语与她攀谈。在谈话中得知这个年轻女子还没有皮大衣时，卢切斯坚持要给她弄一件作为礼物。拉加诺对这慷慨的赠予心怀感激，但由于不想欠卢切斯的人情，便在一旁极力婉拒。狄拉菲肯特皱了皱眉头，小声告诉这个律师必须接受，并警告他拒绝教父就是在违犯黑手党的规矩。“别让我难堪，”狄拉菲肯特命令道，“你会因为回绝而侮辱他。”第二天，卢切斯陪着大眼睛的南希走进一个展示着数百件皮外套、毛皮披肩和其他皮货的皮衣卖场。在卢切斯的介绍下，她选了一件黑貂皮长大衣。拉加诺估计那件衣服至少值 5000 美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工厂工人一年的收入。

拉加诺把卢切斯描述成狄拉菲肯特在纽约家族当中最可信赖的盟友。这个佛罗里达老板特别羡慕卢切斯与政府腐败官员的密切联系。“这个家伙在纽约到处都有关系，”狄拉菲肯特带着些许嫉妒对拉加诺说，“政客和法官都在他的手里。”

在政治领域，卢切斯和弗兰克·科斯特洛保持着亲密的同盟关系，并像那位“首相”一样，在纽约民主党机构和在腐败法官、地方检察官助理及市府官员的任命过程中成了一个政治掮客。但不像科斯特洛，卢切斯的重要性被掩藏了起来，从来未引起公众的注意。卢切斯还扶植共和党官员，将其影响力扩展到激进的政治势力中间。他成功地游说代表其原居住地东哈莱姆地区的国会议员维托·马坎托尼奥 (Vito Marcantonio) (唯一被左翼美国劳工党多次选出的众议院议员)，推荐其子到西点军校学

习。(梅耶·兰斯基有个儿子也是西点军校毕业生。)卢切斯郊区的家远离东哈莱姆区那车厢式的单元住宅,但黑手党在这个当时意大利人占很大比重的地区仍影响着选票。

1945年,当汤米·卢切斯利用国会通过一部私法法案之机加入美国国籍时,他对立法者和政客们那谨慎低调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展现。几乎就在同时,为擦去他在20年代因盗用汽车和从事赌注经纪而被捕并遭定罪的污点,几位立法者劝说纽约州假释委员会授予了卢切斯一份“品行良好证书”。

1945年,大概是与弗兰克·科斯特洛和坦慕尼协会达成了秘密交易,卢切斯挑选默默无闻的俱乐部政客同时也是其西西里裔同胞的文森特·R·伊姆佩里特瑞(Vincent R. Impellitteri)任奥德怀尔的民主党竞选搭档。奥德怀尔当选为市长,只为一位民主党法官做过法务助理的伊姆佩里特瑞则获得了重要礼仪职位——市议会议长。1950年奥德怀尔辞职后,伊姆佩里特瑞(在小报头条上被称为“伊姆派”(Impy))继任成为代理市长。但是,坦慕尼协会领导人认为,哪怕是用他们最谦虚的标准来看,伊姆佩里特瑞亦是太无能、太拙于言辞和太无威望了,于是他们支持费迪南·佩科拉(Ferdinand Pecora)法官参加1951年的市长选举。

已经习惯了市政厅的排场、权力和额外优待的伊姆佩里特瑞拒绝退出权力角逐,决心作为新成立的“经验党”唯一的候选人参加选举。这次选举将黑手党推到令人妒忌的位置上,因为两位候选人都以它为竞争后台。卢切斯暗中支持伊姆派,而科斯特洛则支持佩科拉。

由于基福弗听证会上揭露的事情仍让选民记忆犹新,伊姆佩里特瑞便将其选战的重点放在反坦慕尼协会、黑手党和科斯特洛上,而恰恰就是这些人曾将身为法务助理的他推上了市长宝座。进行每一场政治演说时,他都会特别强调说,“如果佩科拉当选,弗兰克·科斯特洛就会是你们的市长。”凭借老套路的公关战,伊姆佩里特瑞取得了令人意外的成果,成为有史以来唯一当选为纽约市市长的独立党派候选人。他主政后不久,伊姆佩里特瑞被发现和卢切斯及一名前联邦检察官一起在饭店用餐。接受记者提问时,这位市长一脸无辜地声称,他只是认识卢切斯,而且那个黑手党人是以服装生产商的身份被介绍给他的。作为一个笨拙而急躁的盲动者,1954年伊姆佩里特瑞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被赶出了市政厅。在竞选市长当中,参选者们将矛头指向了他:改革者们指控他与有组织犯罪势力勾结。伊姆佩里特瑞的政治和黑手党朋友没有抛弃他,他们安抚他,把他安排在一个轻松自在的法官职位上。但是,随着伊姆派的失败,黑手党通向市政厅的宝贵通道实际上被切断了。

第 13 章 海洛因与阿帕拉沁事件

美国犯罪辛迪加的成员在共同进行努力，要通过联合和控制工会与企业来取得合法性。这种渗透的程度对我们国家的每一个经济领域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短暂的囚徒生活和基福弗委员会的听证会已成为过去，1957 年春，弗兰克·科斯特洛又信心满满地到处巡视他的日常生意。撇开保镖和防弹轿车，这个 66 岁的教父或像普通商人一样在饭店与黑手党合伙人会面，或乘出租车在曼哈顿到处转悠。

1957 年 5 月 2 日，在剧院区的钱德勒饭店，科斯特洛与其角头“托尼·本德”安东尼·斯特罗洛（Anthony “Tony Bender” Strollo）餐叙到深夜。他后来照例打的返回中央公园西大道的那处高档寓所。就在科斯特洛走向那住宅楼电梯时，一个戴着黑色浅顶软呢帽的人闪过门卫，喊道，“弗兰克，这是你的！”一转身，科斯特洛听到爆竹似的一声响，一颗子弹擦过了他右侧前额，把他击倒在地。枪手随即溜进一辆候在旁边的凯迪拉克里逃走。

他受了轻伤，头部在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打上了绷带。对这近距离遭枪击一事，表情阴郁的科斯特洛并没有向警方吐露任何信息。“我什么也没看见。”他告诉探员。搜查其口袋时发现了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一张写有“Gross casino win as of 4-27-57-\$651284”的纸条。探员们后来发现，这个数字与拉斯维加斯新开张的特罗皮卡纳赌场当天的“赌场进项”或毛收入相吻合，而科斯特洛是那家赌场重要的秘密股东。

尽管科斯特洛表示不知为何有人要杀他，但侦探们有一种强烈的看法，那就是维托·吉诺维斯最具有谋杀这位“首相”的动机。出院时，科斯特洛告诉警方，他不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将会继续例行巡视而不带任何保镖。但警方高层仍指派两名探员照

看这个受伤的老板。当探员们出现在其寓所的门廊里时，很有礼貌的科斯特洛坚持要让他们进去和他们夫妇共用早餐。其中一名侦探是意裔美国人，他告诉同事拉尔夫·萨勒诺（Ralph Salerno）说，受到安慰的科斯特洛曾善意地与他开玩笑。“像你这样的意大利小伙，跟这些爱尔兰警察混什么？”科斯特洛问道，“他们给不了你几个钱。跟我们干得了。我们不一样，钞票是大把大把的。”

在他们执行任务的第一天，这两名便衣侦探驾着一辆无标志汽车跟着科斯特洛的出租车来到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他几乎每天都要赶到那儿修指甲、理发和接受按摩，然后到酒店的酒吧间和餐厅里与人谈话。想到将来要不断地被人尾随，恼怒的科斯特洛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我们都绅士点，”他向探员们说道，“我要见女友，我不希望你们跟着。”他向探员们提出忠告，称自己只要塞给出租车司机 100 美元就能甩掉他们，让他们难堪。他接着承诺将在两个半小时左右返回沃尔多夫酒店，然后他们可以继续保护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直到警方取消对他的保护，只要科斯特洛有约会，探员和他之间的那个“君子协定”就继续有效。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弗兰克·霍根不像警方那样乐于助人。他将科斯特洛传唤到大陪审团跟前，要求他就枪击事件和 651284 美元的赌场收入做出解释。科斯特洛这次援引了《第五修正案》赋予他的权利，拒绝谈论那要命的袭击事件和那张在其口袋里发现的纸条。结果，在有人因子弹擦伤其前额而被捕之前，偏偏是受害者科斯特洛因蔑视法庭在“劳教所”，也就是市立监狱服刑了 60 天。

科斯特洛或许不愿意合作，但他那栋楼的门卫诺弗尔·基思（Norval Keith）却从嫌犯相册里指认了嫌疑人。他确认行凶者是维托吉诺维斯的司机兼保镖“钦”文森特·吉甘特（Vincent “Chin” Gigante），此人曾因赌注经纪、盗用汽车和其他轻罪而留下了被捕记录。作为一个前轻重量级职业拳击手，29 岁的吉甘特自枪击案发生后便消失了，直到三个月后才主动投案自首。在 1958 年吉甘特因谋杀未遂接受审判时，弗兰克·科斯特洛是个不愿配合的检方证人。宣誓时，科斯特洛承认曾经做过私酒商、赌注经纪人、老虎机经营者，并在新奥尔良拥有一家赌博俱乐部。但是，他接着说，他现在隐退了。

在作证期间，科斯特洛大部分时间都面带微笑，但当他首次叙述那几乎要他命的袭击事件时，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我经前门走进门厅。我听到了一声枪响。当时听起来就像爆竹的响声，我没太在意。随后就感觉面颊湿湿的。流血了，我才意识到自己被枪击。”

在交互讯问时，科斯特洛信守了“乌默它”誓言。他作证称自己没有看清枪手，

虽然他曾短暂地面对过他，同时还表示并不认识吉甘特，也不知道吉甘特为何要杀他。当科斯特洛离开法庭律师席时，记者们听到吉甘特小声说，“多谢，弗兰克。”

尽管那个门卫坚持了吉甘特就是攻击者的说法，但经过六个月的审议之后，陪审团做出了无罪判决。陪审团主席告诉记者，门卫的指认并不可靠，检控吉甘特的整个案子都缺乏说服力。

科斯特洛的幸免于难改变了他认为自己不会受伤害的想法。他知道，维托·吉诺维斯正要设法除掉他这个老对手。“他不带保镖到处走是因为他绝没有怀疑吉诺维斯或其他人要杀他，”萨勒诺说，“吉诺维斯从意大利已回来10年，科斯特洛相信一切都已过去。”在子弹擦过科斯特洛的脑袋后不久，萨勒诺和其他探员得知他已向吉诺维斯保证他将提前退休。“吉甘特的子弹就像实际杀了他一样有效。”萨勒诺接着说。

科斯特洛没有食言，他将所有的黑手党资产都让给了新老板唐·维托·吉诺维斯。在余下的日子里，科斯特洛平静地生活在曼哈顿，很少在夜间外出。但他常常会赶到其长岛沙点镇乡下的家里，喜欢在自家花园里侍弄花草。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公开露面是在花展上展示他自己那获奖的参赛作品。他接连不断的恶名声导致其公民身份于1961年被撤消，因为在1925年加入美国国籍的听证会上他隐瞒了其职业和犯罪记录。1973年，黑社会的前“首相”科斯特洛，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人物，死于心脏病发作，时年82岁。

尽管1957年科斯特洛无条件地向吉诺维斯屈服，但他的盟友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对这个与他有着互惠关系的教父被袭击感到非常愤怒。6年前，“刽子手”阿纳斯塔西亚冷酷地铲除了文森特·曼卡诺，并在事先未取得管理委员会多数成员同意的情况下接管了家族。现在，他要求管理委员会准许他发动讨伐维托·吉诺维斯的战争，因为后者未经许可也像他从前一样接管了家族。身为自己家族里地位稳固的首领，为阻止吉诺维斯和阿纳斯塔西亚两派爆发毁灭性战争，乔·博南诺作东将两个对手邀来参加“和平宴会”。两人在宴会上都吻了吻对方的面颊，算是达成和解。后来讲到他的居间调停时，博南诺将阿纳斯塔西亚和吉诺维斯贬斥为“冲动”的恶棍，同时褒扬自己“温文尔雅”、“能说会道”和“令人喜爱”。管理委员会的规定虽然禁止出现一个“老板中的老板”，但博南诺仍厚颜无耻地认为自己是同辈教父中的老大，是其他老板就棘手的问题向他寻求外交指导的首席顾问。在管理委员会上，他自负地将调停阿纳斯塔西亚和吉诺维斯的成果命名为“博南诺和平之吻”。

解决了阿纳斯塔西亚—吉诺维斯冲突五个月后，即在1957年10月，唐·佩皮诺·博南诺飞往意大利准备完成一个对黑手党和美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任务，其随行人

员有家族的高级成员和纽约的生意伙伴。博南诺及其陪同者像皇族一样受到意大利和西西里政府官员的欢迎。迎接这个团体的红地毯竟然铺到了机场的停机坪上。在罗马，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的—位部长亲自欢迎了来宾，该党在西西里岛受到黑手党强有力且公开的支持。

在差不多 30 年后所著的自我标榜的自传当中，博南诺将他首次返回西西里岛的旅行描述成—次渴解乡愁的观光之旅，—个与亲友及儿时伙伴重逢并到海边城堡探访父母之墓的良机。他的书中曾偶尔提到在巴勒莫和—些荣誉者进行过交谈，但没有—步详细说明。

在博南诺的书中，他到西西里岛的主要原因被略过不提。他实际上是带领—个美国黑手党代表团与西西里黑手党磋商—份向美国大量输入海洛因的协议。

巴勒莫大酒店，19 世纪 50 年代—处高档却正在没落的“美丽年代”的遗迹，是西西里黑手党大佬及其亲信经常聚会的—地方。待在巴勒莫的时候，遭驱逐的美国“唐”字辈大佬“洛克”查理·卢西亚诺将这家酒店当成了他的第二个家，酒吧休闲室有个角落专门为他保留着，那里是他喜欢与人交谈的—地方。

让意大利和美国执法机关意想不到的，从 1957 年 10 月 10~14 日，三十多名西西里和美国黑手党重要头目齐聚这家酒店举行了—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他们每天在瓦格纳厅会面，那是一间装饰华丽的以 19 世纪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之名命名的套房，因为瓦格纳曾在这里为其作品配过乐。在墙上—幅雷诺阿所作的瓦格纳印象派画像的注视下，这些西西里和美国人详细筹划了如何在—美国进行—场爆炸式的海洛因贸易扩张。

不妨提—下，美国调查人员在 20 世纪中期几乎没有掌握什么关于黑手党的重要情报。在此后的 25 年里，美国主要执法机构对这次会议及其重要性毫无所知。20 世纪 80 年代，当西西里和美国黑手党的背叛者们检举揭发时，这些机构及其意大利同行最后才知道了巴勒莫大酒店的会议情况。

卢西亚诺在大西洋两岸都有毒品利益和举足轻重的黑手党背景，于是他将两国的黑手党组织聚到了—起。在会议前不久，卢西亚诺还力劝西西里黑手党主要头目仿效他在美国的创新之举，成立—个类似于管理委员会的机构来解决内部争端。在西西里岛，这种机构被称为“卡波拉”。

在巴勒莫会议上，博南诺方与会者还有二老板约翰·邦温特 (John Bonventre) 和顾问卡迈恩·加兰特 (Carmine Galante)，而加兰特还是博南诺的主要毒品走私商

和麻醉品顾问，这足见美国黑手党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在酒店的秘密会议上，新成立的“卡波拉”头目得知了美方最担忧的事情。博南诺解释说，国会近期通过了一部强硬的毒品管制法律，规定可对毒品罪犯处以最高40年监禁，即1956年的《博格斯-丹尼尔斯法案》，美国老板们对该法案所造成的潜在危险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这强制性的刑罚会促使受涉毒指控的黑手党人为保全自己而违背“乌默它”誓言成为告密者，进而给家族老板及其他领导成员带来不测。对这些美国老板们来说，其最捞钱的行当远不止毒品走私，但因毒品被捕却是一个很现实的威胁，因为纽约五大家族及其外围合伙人进口并销售了这个国家90%以上的海洛因。

自1931年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西西里黑手党家族还从未在美国活动过。巴勒莫大酒店计划最引人注目的决定是美国人允许西西里人在美国接手海洛因销售的危险任务。有法国科西嘉人的提炼厂（后来是他们自己的意大利工厂）提供充足的海洛因货源，这些西西里老板们将在美国获得一个受到控制的市场。

美国黑手党人将从中受益，因为他们的打手被执法者（特别是被哈里·安斯林格的毒品调查人员）因走私和销售毒品而抓住的危险性减小了。西西里人获准向美国的毒品批发商供应大批海洛因，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人将向其收取“特许费”——一种收益分红。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海洛因和可卡因消费者仅限于一小部分人群，主要是音乐家、妓女、罪犯、赌徒和追求刺激的有钱人。在这西西里-美国计划当中，有个险恶的创新之举就是通过降低毒品价格并将其推向工薪阶层的黑人和白人社区来大幅拓展海洛因的销售。

美国和西西里黑手党人很早以前就互相溜进彼此的国家而未被当地执法机关所察觉。美国警方没有西西里人的档案和嫌犯照片，而意大利当局也同样忽视了美国黑帮分子。远离本土的西西里毒贩在美国会相对安全些，而意大利警方既不会知道也不会关心这些西西里人在他国从事什么活动。美国和意大利执法机构各行其是，从不分享情报，这种现实也掩护了新的海洛因贩运渠道。

为了庆贺海洛因协议的达成，在巴勒莫码头一家被包场的海鲜馆里，与会的大多数黑手党人参加了一次持续12小时的狂欢盛宴，标志着此次国际会议圆满落幕。对性格向来冷静的博南诺来说，只有一件小事让这长时间的庆祝活动显得美中不足。显然不知道博南诺的显赫地位和他对西西里方言的了解，一个男招待喃喃自语地辱骂博南诺，称他是个傲慢且苛刻的美国游客。无意中听到这番话，博南诺将一大杯冰水猛地泼向他。那侍者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马上告饶请求宽恕。

“科萨·诺斯特拉”五花八门的犯罪——谋杀、放高利贷、敲诈勒索、赌博、毒

打、卖淫、政治贿赂、腐蚀警察和工会及产业诈骗——让美国付出了巨大代价和痛苦。然而，比起黑手党大规模引进海洛因来，这些罪恶没有一种更能对美国社会造成持久的痛苦并损害其生活质量。在达成巴勒莫协议之后的几十年里，西西里黑手党及其美国帮凶用毒品淹没了美国。在 50 年代后期，估计有 5 万名美国人吸毒。到了 70 年代中期，根据政府和民间机构的研究结果，至少有 50 万人染上了毒瘾。

黑手党为自己和未来的希望瓜分海洛因、可卡因及其他毒品暴利的种族犯罪组织开拓了一个广阔的市场。毒品走私带来的暴力连锁效应，特别是在纽约和其他大城市，是令人惊愕的。由于数以千计的吸毒者靠行凶抢劫和入室行窃来获到毒资，犯罪率因而直线飙升。相互竞争的贩毒组织在街头上枪战火拼，打死打伤了无辜的受害者。内城的大片区域遭到劫掠，让受毒品围困的居民和商人几近绝望。而警察部门的可信性和可靠性也因毒贩的大量行贿而受到损害。

就在 1957 年卢西亚诺帮助美国黑手党创立世界最大的海洛因出口事业的时候，他因为一份杂志的人物简介接受了作家克莱尔·斯特林（Claire Sterling）的采访。当她提到毒品话题时，对于他卷入大规模的国际毒品走私的说法，洛克将其斥为无中生有的谣言而不予置评。相反，他抱怨警方的监视，抱怨他们没完没了地要将毒品罪名扣在他的身上。“他们监视了很长时间，就让他们监视吧。”他发牢骚说。

1962 年卢西亚诺流亡那不勒斯时死于心脏病发作，时年 65 岁。在他死后不久，美国和意大利官员宣布，作为一个涉嫌参与走私价值 1.5 亿美元海洛因到美国的犯罪集团成员，他已被列为追捕对象。

巴勒莫秘密会议结束两周后，在 1957 年 10 月 25 日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来到曼哈顿中央公园附近的喜来登公园酒店，全身放松地坐进理发师的椅子上，接受每天例行的修面和剪发。坐在旁边椅子上的是他的侄子文森特·斯奎兰特（Vincent Squillante），此人负责打理家族私营垃圾清运业的敲诈生意。就在他们聊天的当口，两个举止从容的人走进格拉索理发店并朝阿纳斯塔西亚的头和胸部连开了 5 枪。阿纳斯塔西亚翻倒在地立时毙命。杀手们迅即走进酒店大厅并消失在人群之中。未受伤的斯奎兰特一边喊着“让我出去……”，一边闪电般地逃离理发店。正像精心策划的黑手党处决行动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刺客出现时，阿纳斯塔西亚的保镖都适时地不在现场。保镖安东尼·科普拉（Anthony Coppola）驱车将阿纳斯塔西亚送到了酒店，但当枪击事件发生时，他令人费解地从老板身边消失了。

对于阿纳斯塔西亚，一个以自保为第一要务的杀手，他的被杀颇有几许带着嘲弄

意味的公平。作为谋杀公司创始人之一，他主要以其杀人的天才本领令人畏惧，但他却在权力巅峰时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杀。犯罪历史学家还特别指出，他就在阿诺德·罗思坦 29 年前住过并在路边遭致命枪击后踉踉跄跄地走进去的同一家酒店被刺杀。阿纳斯塔西亚拥有一项特别的“殊荣”，即自 1931 年达成和平协议以来，他是首个在公开场所被以黑社会旧式手法处死的黑手党老板。当年他铲除其首领兼对手文森特·曼卡诺时，阿纳斯塔西亚谨慎诡秘地实施了谋杀，让尸体永远不被人发现。

黑手党的聪明汉很快意识到，处决行动是由两个从阿纳斯塔西亚之死中获利最多的头领维托·吉诺维斯和卡洛·甘比诺策划的。尽管有博南诺居间调停，但吉诺维斯仍害怕阿纳斯塔西亚对他下毒手，以报复他企图谋杀科斯特洛并迫使其管理委员会的盟友引退。尽管是阿纳斯塔西亚的顾问，但甘比诺怀疑他那反复无常、性情火爆的老板忌恨他在家族里的财富与影响，故而想杀掉他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由于在除掉阿纳斯塔西亚上有着共同利益，甘比诺和吉诺维斯便勾结在一起并找出了多种除掉阿纳斯塔西亚的理由。前黑市商人甘比诺将升任一个全国最大的黑手党家族的首领，并自动成为拥有表决权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对于只当了 4 个月老板的吉诺维斯，通过争取甘比诺这样的盟友自然会巩固其地位。这个新的联盟还会有第三个老板，即“三指布朗”汤米·卢切斯的加入。由于女儿法朗士嫁给了甘比诺的儿子汤米，卢切斯与甘比诺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这对姻亲和吉诺维斯将在管理委员会形成新的三人领导小组，能够有效地抵制两名老资格的、更为传统的老板乔·博南诺和乔·普罗旺斯。

在纽约黑手党的所有谋杀当中，在繁华的中城区当着目击者的面枪杀阿纳斯塔西亚是个最为大胆的案例。这起令人难忘的谋杀经常在电影（最著名的是意大利电影《黑手党》）和小说中得到再现，一个无助的受害者被白毛巾绑住的生动形象深深地烙印在公众的记忆当中。

警方最关注的头号线索和怀疑都集中在与阿纳斯塔西亚在市里见过面的坦帕市神父桑托·狄拉菲肯特身上。就在阿纳斯塔西亚最后一次理发的两个小时前，以 B·希尔之名登记住店的狄拉菲肯特付账离开了，随后又消失了好几周。侦探们得知阿纳斯塔西亚正准备分一份从哈瓦那流出的分红，狄拉菲肯特在那里是个重要的黑手党人物，在三家赌场拥有巨大的利益。狄拉菲肯特开诚布公地提出一条方案，即与阿纳斯塔西亚共同拥有哈瓦那在建的希尔顿酒店的赌场特许经营权，但有个小麻烦是古巴独裁者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要求每年付给他 100 万美元的好处费。这位暴躁的纽约老板是否正打算强势进入哈瓦那或者与狄拉菲肯特商量出了一个

和平协议则不得而知。

狄拉非肯特涉案的意见最后被否定，尽管他失踪了几周。侦探们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甘比诺和吉诺维斯是谋杀案背后的阴谋者，并最有可能将谋杀任务交给乔·普罗旺斯家族的刺客——“狂人乔伊”约瑟夫·加洛（Joseph “Crazy Joey” Gallo）。案发后不久，加洛自豪地向密友暗示说，他的行动队负有责任。“你可以把我们五个人称为‘理发店五剑客’”。一名警方线人引述面露得意之色的加洛的话说。

这些与“3G”（甘比诺（Gambino）、吉诺维斯（Genovese）和加洛（Gallo））有关的情报素材只能埋在警察局刑事处的秘密档案堆当中。它们只算是花边新闻，徒增了一些魅惑于人的牵涉黑社会暴力与阴谋的传说，却没有价值作为能经受法庭考问的证据。侦探们机械地走着追查阿纳斯塔西亚之凶手的过场，他们心里明白这起黑手党谋杀案注定会成为悬案。他们引用了一句流行的警察箴言“这只是害虫杀害虫”，最终将调查黑手党谋杀案的无益合理化。

在曼哈顿以西 150 英里靠近宾夕法尼亚州边境处有个被称为“南线”的纽约乡村地区，那里的警察对轰动一时的阿纳斯塔西亚谋杀案没有多少兴趣。1957 年 11 月 13 日，就在凶杀案发生三周后，一个名叫埃德加·D·克拉斯威尔（Edgar D. Crosswell）的州警官正在当地主要城镇宾厄姆顿的帕克韦汽车旅馆（Parkway Motel）调查一起假支票投诉案，这时一个要订三个房间并告诉服务员由其父亲代为付账的年轻人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个年轻人是当地从事软饮料和啤酒批发生意的富商老约瑟夫·

表情冷峻的保罗·卡斯特利亚诺。在警察突袭阿帕拉沁会场时，时年 45 岁的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50 多名黑手党头目一起被羁押。他任甘比诺家族老板期间博得了“大保罗”的绰号。在 1957 年的秘密会议上，卡斯特利亚诺充当了其妻兄，同时亦是其教父的卡洛·甘比诺的助手。（征得弗雷德里克·马腾斯同意后转载的档案照片）



巴伯拉（Joseph Barbera Sr.）的儿子。克拉斯威尔知道他的父亲曾经是个私酒商，早年因谋杀和人身攻击留下过一次被捕的记录。

那天下午，克拉斯威尔和骑警文森特·瓦西斯科（Vincent Vasisko）一起驱车赶往巴伯拉的家。那是一处孤零零地建在山顶上的英式庄园宅邸，坐落在阿帕拉沁（Apalachin）（当地人的发音是“阿普尔—艾肯”（Apple-aykin））村一处占地 130 英亩的庄园里。看见有十几辆大多数都挂着外州牌照的轿车，克拉斯威尔意识到有事情发生，便马上请求监视并很快获得批准。当地有个食品供应商透露称巴伯拉当天订购了 207 磅肉排、20 磅小牛肉片和 15 磅冷盘，此言进一步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怀疑巴伯拉家正在举行一场阴谋违反酒法的聚会，克拉斯威尔请求联邦烟酒与武器局（ATF）驻当地的机构给予援助。第二天，即 11 月 14 日，克拉斯威尔和瓦西斯科带着两名 ATF 执法官员驱车赶到巴伯拉的家，发现了三十多辆大型汽车和豪华轿车泊在房屋周围。就在调查人员退出巴伯拉家的私人车道来到一条通往庄园的公路上设置路障时，有十几个人从屋子里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有个家伙抬头往公路上看了看并喊道，‘是州警察，’随后所有人都开始往旷野和森林里跑。”瓦西斯科说。

克拉斯威尔用无线电召来更多骑警。最后，警方抓住了 46 名乘车仓皇逃跑和另外 12 个在森林和原野里狂奔的人，并对他们进行了讯问。这些在阴冷的雨天徒步奔逃的人衣服脏乱、满身泥泞，显然不适应在乡野长途奔走。他们是些中年和上了年纪的人，穿着尖头皮鞋和西装。至于为何他们都聚在阿帕拉沁村这僻静的庄园住宅里，大多数都给出了同样的解释：这是个巧合，他们都是接到巴伯拉病危的电话赶来的，不过他们这个患心脏病的朋友正在恢复健康。



阿帕拉沁事件最大的猎物之一是卡洛·甘比诺。此罪犯照片摄于 1934 年。1957 年策划刺杀了现任老板“大刽子手”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之后，唐·卡洛创建了全国最强大的至今以其名命名的犯罪集团——甘比诺家族。（纽约市警察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调查人员知道这个说法荒唐可笑。随即进行的身份检查让他们发现了大批从纽约、新泽西、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宾夕法尼亚、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地区赶来的黑社会人物。被带到州警察局接受讯问的纽约人包括维托·吉诺维斯、卡洛·甘比诺、甘比诺的妹夫保罗·卡斯特利亚诺、乔·普罗旺斯和乔·博南诺。

在巴伯拉的客人当中，有些人越过了警方仓促设置的路障，另有几人在途中听到这次围捕的无线电报告后折返回去。汤米·卢切斯是唯一逃出封锁线的纽约犯罪家族老板，他和芝加哥教父萨姆·詹卡拉（Sam Giancana）一起跑到一条公路上并搭便车逃离了那个地区。

所有被捕获的人都带着一沓沓的现金，数目从2000~3000美元不等，这在当时都算是巨款。但由于没有犯罪证据也未发现无证枪支，警方没有照像和采集指纹就释放了所有人。媒体马上查清了这些人的组织背景及其重要性，“62名黑手党头目在偏僻山区的袭击行动中被捕”，《纽约每日新闻》头版头条登出了这则新闻。（据警方记录，其准确数字应是58人。）

通过电子窃听、线人的密报和乔·博南诺的自传，阿帕拉沁聚会的缘由一点点地显露了出来。自1931年以来，管理委员会和来自美国其他地方的黑手党头目每5年都要聚会一次。1956年的例会在巴伯拉的庄园里安全而舒适地举行过。巴伯拉也移民自西西里海边城堡，他主要是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地区活动的黑手党家族老板。他曾保证说，阿帕拉沁当地人手不足且历练不多的警察对黑手党会议不构成威胁。

1957年的这次计划之外的会议是维托·吉诺维斯心血来潮的结果，继阿纳斯塔西亚之死和科斯特洛让位之后，他决心要让美国其他黑手党家族相信纽约的一切都很正常和稳定。唐·维托认为，要想把身为新老板的自己和卡洛·甘比诺介绍给“科萨·诺斯特拉”其他首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无疑是他们的最佳论坛。

排在会议议程上的另一个重要而紧急的议题是制订政策应对更为严厉的联邦毒品法——《博格斯-丹尼尔斯法案》和与西西里海洛因进口商打交道。在克拉斯威尔警官打断他们的会议之前，教父们口头上支持全面禁止毒品交易，并宣称给予涉毒荣誉者的惩罚将是黑手党的死刑。但随着时间的过去，这项禁令只得到了部分人（如果有的话）的执行，因为毒品的利润实在太大了。回想弗兰克·科斯特洛对深度卷入毒品交易的危险性频频所提出的警告，一些老板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感到矛盾。毒品利润对贪婪的黑手党大佬及其党羽来说实在太诱人，的确难以割舍。他们最担心的是，新法案严厉的惩罚会使面临有罪判决的打手为求得自保而成为告密者。此外，贩毒者自己有可能染上毒瘾而破坏纪律和泄露秘密。最后，还存在一个公共关系问题。黑手党

的大多数活动，特别是赌博，是受到漠不关心的公众所默许的，但大范围涉毒会激起民愤，从而招来更为警觉的执法打击。

“他们知道那部新法将是个麻烦，但它是一剂对症下药的治病良方，”侦探拉尔夫·萨勒诺说道，“黑手党禁毒令的真正含义是，如果你涉毒，在进行毒品交易时不要被发现和其他任何荣誉者在一起，以免连累他人。那就是他们要向手下传达的主要信息——单独行动，不要危及家族。”

在州警察冲散会议之前，教父们的最后举动是“合上名册”，即停止增加新党徒，众首领当时还被建议须汰除家族里不合格的成员。他们知道阿纳斯塔西亚的一名亲信曾在家族里以每人4万美元的价格出卖正式成员资格，吸收了一些未经过考验和不符合条件的人。除了少数几次对黑手党首领的近亲网开一面以外，这条停止接纳新成员的禁令在许多家族里被贯彻了20年。

当维托·吉诺维斯提出召开第二届阿帕拉沁会议时，正准备从意大利返回的乔·博南诺并不在国内。博南诺前一年在巴伯拉的家中主持了一次顺利进行的全国会议。在其回忆录当中，博南诺声称自己反对1957年的集会，因为它违反每5年举行一次的既定协议，而且一年之后在同一地点集会也太过于冒险。其他老板相信博南诺感到气愤，因为没有人为这第二次会议征求过他的意见，而且他在纽约和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受到了新贵吉诺维斯的挑战。

在其自传当中，博南诺声称他在阿帕拉沁附近参加了私人聚会，并没有到巴伯拉家去抵制大会。他坚持说州警察认错了人，因为他有个被截住的听差用的是博南诺司机的驾照。他的解释与警方递交给时任纽约州州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rill Harri-man）的秘密报告相抵触。该报告明确载明骑警们发现惊慌失措的博南诺正东撞西碰地穿过巴伯拉庄园附近的一块玉米地，而且他告诉他们自己在“看望”一个病人朋友。

自6年前基福弗听证会以来，发生在1957年的弗兰克·科斯特洛遇刺案、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被杀和阿帕拉沁会议的流产（前后不到6个月），首次将黑手党直接推回到公众眼前。如何解释这在阿帕拉沁达到顶点的一连串神秘事件，执法官员们承受着新一轮的压力。显而易见且令人不安的问题是：是谁召集所有这些有名的黑帮人物参加大会？会议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组织的力量有多强大？

联邦大陪审团谴责了27名阿帕拉沁会议的与会者，并裁决其中20人犯有伪证罪和妨碍司法公正罪。这些判决无一例外地被上诉法院推翻，理由是阴谋罪和伪证罪的证据不足。这项司法裁决所提及的一个重要原因暴露了当时的刑事司法系统对管理委

员会的存在和黑手党的运作方式普遍抱以天真的看法。尽管提到阿帕拉沁会议的“性质异乎寻常”，但三人法官小组认为，“常识性经验”即排除了在如此大且看来无秘密可言的聚会上策划犯罪阴谋的观点。法官们或许正确地裁定了该案证据不足，但像当时大多数法官一样，他们明显地对黑手党的活动及其聚会的动机缺乏认识。阿帕拉沁会议的唯一动机是密谋和策划犯罪活动。

甚至在阿帕拉沁事件发生之后，全国最著名的执法专家约翰·埃德加·胡佛仍公开否认黑手党的存在。但是，这个 FBI 首脑却因阿帕拉沁事件暗受羞辱，因为所有荣誉都给予了他那颇有见地的老对手——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哈里·安斯林格。一夜之间，安斯林格被媒体褒扬为有组织犯罪最权威的执法斗士。胡佛不得不做出反应。没有承认以前的误判或提及禁忌用语“黑手党”，他以其惯有的方式重新启用屡获成功的公关策略，即发布了 FBI “十大通缉犯名单”，下令进行一场全力以赴的抓捕行动。每个 FBI 分局都将在自己的管区内查出和设法起诉“十大暴徒”。在胡佛的词典当中，“暴徒”指的就是黑手党人。身负追踪十大要犯之责的实际上只有纽约、芝加哥、费城和其他大城市的特工。在“科萨·诺斯特拉”尚未涉足的那些州——怀俄明、爱达荷、蒙大拿、爱荷华、犹他、内布拉斯加及其他许多州，FBI 分局则遵照胡佛的命令逮捕一些并不重要的罪犯和少年犯。这次行动虽然逮捕了几十个无足轻重的赌注经纪人和赌徒，但其总体影响有限。

胡佛的另一项举措是进行秘密且更为有效的情报搜集——但它是非法的。他发出绝密指令进行“黑包工作”（FBI 暗语，指未经法庭授权在黑手党嫌疑人巢穴安装窃听器搜集情报）。在一份发给地方办事处主管特工的指示当中，他要求他们使用“非常规的调查技术”（实施电子监听的委婉之言）。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大多数特工和 FBI 主管对黑手党的行踪或其头目的议事地点毫无所知。在抓捕头号暴徒的行动当中，除了芝加哥幸运地取得一个突破外，情报收集工作总体上收效甚微。经侦察得知芝加哥教父“魔魔”萨姆·詹卡拉有一家作掩护的裁缝店，执著的特工在那店铺楼上的一间房子里装上了窃听器。他们窃听到一段谈话，结论性地证明了阿帕拉沁会议的重要性和警方的围捕对它造成的耻辱。特工们听到詹卡拉在电话里狠批布法罗老板斯蒂法诺·马迦迪诺（Stefano Magaddino），指责他帮助组织了会议。这种非法窃听的情报不可能在法庭上当成证据使用，但其部分内容在 7 年后被 FBI 特工泄露给了媒体。

“好哇，我想你是满意了，”挖苦的詹卡拉埋怨马迦迪诺说，“我们 63 个老家伙被警察搞了。”

“我不得不承认，你是对的，萨姆，”马迦迪诺回道，“在你的地方是绝不会发生的。”

“不会，你狗娘养的说对了，”詹卡拉暴怒道，“这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聚会地点。我们会把你们分散在我的汽车旅馆里。我们会从汽车行里调用不同的汽车给你们，然后在我的一家大型饭店里开会。警察在这里找不到我们麻烦。”

胡佛还有一个更隐秘的举动。在高级助手威廉·沙利文（William C. Sullivan）的领导下，一份关于黑手党是否真正存在的专题或特别报告被付诸研究。1958年7月研究结束后，该报告宣称：“事实上，根据现有的证据，不可能从逻辑上否认一个被称为‘黑手党’的犯罪组织存在。它已经祸害了数代守法的西西里、意大利和美国公民。”

该报告坦率地指出，许多执法官员“不理解黑手党”，而且“容易结论性且合理化地断定不存在这个所谓‘黑手党’的犯罪组织。”最后，沙利文的研究报告警告说：“从这种意义上讲，它是古老的西西里-意大利黑手党的美国版。它不是作为一种轮廓清晰的传统组织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犯罪潮流和仍在危害美国的生活模式或方式存在。”

这份专题材料基本上是一种论述西西里黑手党的起源与性质及其向美国迁移的历史报告。只有少数局长最为信任的副手才能阅读这份全盘置疑胡佛在有争议问题上绝无错误的报告。接到报告后，胡佛将它作为机密文件藏在FBI的保险柜里。

不管胡佛如何固执，阿帕拉沁事件的附带结果是国会于1957年成立了一个名字拗口的新委员会：参议院劳资领域不当行为特别委员会。其主席是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John L. McClellan），这个来自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依附于该党南部保守的主张州权和反对种族融合的派别，这些人被称为美国南部民主党人。这位参议员在温泉城附近的一个小镇长大，个性执拗的他不愿受惠于工会和大城市有黑手党背景的民主党领导机构。为了让自己所希望的法规在国会获得通过，他还充当着手腕高明的谈判者。

注意到已确认身份的阿帕拉沁访客当中有22人受雇于工会或在劳资关系职位上任职，该委员会就这次黑手党会议举行了一次特别听证会。除了说出各自的名字和正式的合法工作外，受传唤的老板及其助手们纷纷将《第五修正案》当成了挡箭牌。卡洛·甘比诺称自己是劳工咨询者和法律顾问。他最高的进项之一是每年为长岛莱维敦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开发商就工会事务提供咨询服务获得的36万美元的收入。有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威廉·莱维特（William J. Levitt）否认支付给甘比诺那不明服务的酬金

是一种避免劳工破坏的“勒索金”，但莱维特的主管们未能提供背景材料来支持甘比诺自称是建筑或工会关系专家这一可疑的说法。

在汤米·卢切斯和维托·吉诺维斯身上也未能搞到多少信息。参议员仅仅知道卢切斯是个“服装生产商”，而吉诺维斯声称他的收入来源是垃圾转运和包裹投递生意。吉诺维斯创下了一个未经证实的纪录，也就是行使《第五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达150多次。在一次听证会上，愁眉不展的麦克莱伦被一群不合作的多属于移民的黑帮证人所激怒。他以饱含国家主义的激情猛烈抨击道：“他们不属于我们的国家，他们应被送到他处。在我的档案里，他们都是徒具人形的社会寄生虫，他们违犯了正义和人性的每一条准则。”

有了该委员会取得的黑手党染指工会的证词，加上从以前的听证会上获取的关于“国际卡车司机协会”腐败案的证据，1959年，一部意义重大的劳工法规《兰德勒姆-格利芬法案》(Landrum-Griffin Act) 获得了通过。该法对工会选举做出了规定，同时要求工会向劳工部递交年度财经报告。

“我们听过的证词，”麦克莱伦在听证会上总结道，“可以明白无误地证明，美国犯罪辛迪加的成员在共同进行努力，要通过联合和控制工会与企业来取得合法性。这种渗透的程度对我们国家的每一个经济领域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阿帕拉沁事件和参议院听证会让维托·吉诺维斯感到特别狼狈。其他老板因其首先呼吁召开那场没有先例的会议而抨击他怀有帝王野心，而且听证会还揭露了他私生活中存在的裂隙。为曝光吉诺维斯那急剧膨胀的财富，麦克莱伦委员会年轻的首席顾问罗伯特·肯尼迪 (Robert F. Kennedy) 出示了在另一起讼案中由吉诺维斯的妻子所提供的证据。作为一份财产协议的部分内容，吉诺维斯夫人详细吐露了唐·维托在赌博、赛马场、夜总会、工会诈骗、勒索和其他不法行当中攫取的不法收入。据她估计，他每周净赚4万多美元，而且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银行保险库里都有秘密存款。这份公开的分居协议让全国所有黑手党人都知道安娜·吉诺维斯离开了那个黑手党老板。吉诺维斯的嗜杀性格在黑手党内部令人不寒而栗，而他妻子的离开和其财产的泄露对这位教父的威信而言都是难以忍受的耻辱。维托在谋杀了安娜的第一任丈夫之后才娶到她，对这个靠谋杀得到的新娘他有着感情上的弱点，从来没有移情别恋而让她受到伤害。

比起东哈莱姆那个不起眼的毒贩纳尔逊·坎蒂拉纳斯 (Nelson Cantellops) 所带来的麻烦，吉诺维斯的婚姻问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就在阿帕拉沁事件喧嚣尘上之时，波多黎各人坎蒂拉纳斯因毒品犯罪正在服刑。为寻找机会提前出狱，他对联邦毒

品调查人员称，他曾直接为维托效力进行过毒品走私。政府当局称他通过了测谎仪测试，并主动供述了证实吉诺维斯卷入海洛因交易的第一手情报。

主要依据坎蒂拉纳斯的证词，1959年吉诺维斯因毒品指控被定罪，并领受了15年监禁的刑期。“我只能说，法官阁下，我是无辜的。”这是吉诺维斯在宣判时所做的唯一陈述。对这个特定的毒品指控，他也许说得是事实。与查理·卢西亚诺的审判相似，吉诺维斯案的合法性和有罪判决后来受到许多资深侦探和律师的质疑。他们相信政府让一个黑手党首脑人物领受了不实之罪。拉尔夫·萨勒诺在他的书《犯罪同盟》中强调，对吉诺维斯最不利的证人是低级信使坎蒂拉纳斯，他在法庭上宣誓称，他曾亲自与这个黑手党家族的老板见面并讨论毒品网络的细节问题。萨勒诺发现这种关系完全悖离了黑手党的传统习惯。“对于任何一个了解‘科萨·诺斯特拉’规约和隔离程序的人来说，这种证词几乎不可信。”他写道。

维托·吉诺维斯被囚禁让黑手党领导层自五大家族成立以来最为频繁的10年变动达到了高潮。在第一个家族当中，文森特·曼卡诺和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被谋杀，留下卡洛·甘比诺掌权。继洛克·卢西亚诺之后成为家族掌权者的弗兰克·科斯特洛被击伤后主动隐退；而那个家族新任教父维托·吉诺维斯则被监禁。在第三个家族里，汤米·卢切斯在盖塔罗·加利亚诺死后取代了他的位置。五个家族都承受了阿帕拉沁之乱、基福弗委员会的调查和麦克莱伦听证会，其中三大家族都经历了权力更替。然而，它们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活力。

但面对顽固且目中无人的黑手党人，参议员麦克莱伦及其调查委员会顾问罗伯特·肯尼迪那心中的热情被激发了起来。他们矢志更深入地调查有组织犯罪家族，而这将改变黑手党的未来。

第14章 总统之死

“如果不是我，你的情郎是进不了白宫的。”

在坦帕那家最豪华的酒店里，有两个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的人在频频碰杯豪饮。他们正在欢庆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在数小时前被刺杀。这是1963年11月22日的晚上，黑手党坦帕教父桑托·狄拉菲肯特与他的律师兼心腹朋友弗兰克·拉加诺正在坦帕国际饭店小聚。带着由衷的兴奋感，两人一边大声狂气地道着祝酒辞，一边享用着奢侈的美食和醇香的葡萄酒。“干得漂亮！是吧。他们干掉了那个狗娘养的，”狄拉菲肯特在席间反复说道，“那狗娘养的死了！”

狄拉菲肯特和拉加诺的欢笑在饭店里特别刺耳，但两人并不在意其他沉默而悲伤的用餐者和服务员的感受，这些人被当天那位年轻而受人爱戴的总统被刺杀惊得目瞪口呆。当天晚上，肯尼迪之死带来的解脱感在黑手党中间迅速蔓延开来。而在黑手党首领中间，狄拉菲肯特的行为也许是最为招摇的。“就像把大石头从我的肩上搬走了。”狄拉菲肯特向拉加诺倾诉道。他的律师自然清楚这个黑手党人的意思，肯尼迪被除掉将在全国范围内减轻并有可能突然消除一场空前的针对他本人及其黑手党同伙的执法威胁。

黑手党仇恨肯尼迪的起因是1960年的总统选举以及黑手党牵连其中。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①，即总统的父亲和肯尼迪家族的族长，在民主党初选和普选中都曾秘密向北方的黑手党老板们寻求过经济和政治上的帮助。老肯尼迪是个千万富翁和金融巨头，他在1929年的大崩盘之后被富兰克林·D·罗斯福任命为制定经济制度改革华尔街的官员，后来还出任过驻英国大使。尽管有着那些超体面的任

^① 昵称“乔·肯尼迪”。

职经历，但乔·肯尼迪很早就与有组织犯罪保持着松散的联系，这种关系可回溯至禁酒时期，当时他与弗兰克·科斯特洛结伙贩过私酒。乔·肯尼迪从没有承认也从来不是某个黑手党老板的仆从，但他知道如何与黑手党人打交道，以此获得生意和政治上的秘密帮助。

在1960年的总统选举很久以后，调查人员和国会委员会听到了一些黑手党人的抱怨。他们称在乔·肯尼迪的强烈要求下，他们于1960年春为约翰·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州赢得的初选注入过资金。肯尼迪需要在那里取得压倒性胜利来击败其主要对手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以此证明一个天主教徒在新教徒占很大比重的州依然能够获得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年的普选当中，据说乔·肯尼迪再次恳求北方黑手党人利用他们对北方大城市民主党领导机构的影响力来为儿子拉选票。芝加哥老板萨姆·詹卡拉的“团队”成员夸耀称，他们曾帮助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J. Daley）窃取了足够的选票让肯尼迪赢得了伊利诺斯州的选举，并且将关键性的选票投给了他使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落选。那是自1916年以来选票最为接近的总统选举，黑手党老板们相信他们在肯尼迪的险胜中发挥过作用。

歌手兼演员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在肯尼迪与黑手党的恩怨中扮演过角色。他使萨姆·詹卡拉、肯尼迪总统和周旋于好莱坞与拉斯维加斯娱乐圈子里的迷人少妇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拉（Judith Campbell Exner）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爱与性的三角关系。身为肯尼迪及其妹夫，即演员彼特·劳福德（Peter Lawford）的朋友，西纳特拉长期以来与詹卡拉保持着密切交往，而且与其他黑手党人也相处融洽。1960年，在肯尼迪当选之前，西纳特拉将坎贝尔女士介绍给了肯尼迪和詹卡拉。在肯尼迪任总统期间，两人与她都有过性关系。

据埃克斯纳女士称，詹卡拉得意于靠有组织犯罪来操纵选举让肯尼迪获胜。“听着，宝贝，”在一本泄露内幕的书中，她引述那个黑手党人的话说，“如果不是我，你的情郎是进不了白宫的。”

由于他们的支持，黑手党老板们希望能与新一届政府形成一种轻松而缓和的关系。但事与愿违，因为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当上了司法部长。

35岁的罗伯特·肯尼迪在1961年1月任全国最高执法首长，他当时并未意识到父亲曾借助黑手党之力来影响选举。相反，当他在参议员麦克莱伦的调查委员会任顾问时，他碰到许多傲慢自大的黑帮分子，让他对黑手党人形成了最为深刻而尖锐的记

忆。罗伯特·肯尼迪的两大急迫任务是摧毁黑手党这一有组织犯罪的中坚力量并肃清它与工会的腐败联系。

在一次检查司法部和 FBI 的工作时，这位新司法部长对普遍存在的冷漠感到怒不可遏。他吃惊地发现，美国最高执法官员们不仅没有打击黑手党的策略规划，而且更令人忧虑的是，他们拒绝承认那些强大的意裔黑帮组织的存在。

在媒体大量报道了 1957 年阿帕拉沁袭击行动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司法部曾成立了一个检察官小组专门进行有组织犯罪调查。该小组三年的主要成果是以阴谋妨碍司法公正和伪证罪将阿帕拉沁事件的部分参与者定罪。但是，那些裁决最终被推翻了。肯尼迪发现了这个小组处于人浮于事的状态，没有取得任何可圈可点的业绩。经过一次迅速的整顿与重组，他充实了司法部由检察官组成的调查有组织犯罪部门，将人手从 17 人增加到 60 人，并起用了一些工作积极的新人，淘汰了大部分能力不足的老手。肯尼迪对无动于衷的冷漠难以容忍的态度在新人中间迅速传开，特别是当职业官员们提到对黑手党人发起检控行动所存在的法律难题时，他的一句斥责之语让他们有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要告诉我不能做什么，”他态度坚决地说，“要告诉我能做什么。”

在应对黑手党的挑战时，干劲十足的新检察官 G·罗伯特·布莱克（G. Robert Blakey）在司法部遇到了普遍的冷淡。迎接他的是司法部前辈们那劈头盖脸的否定之辞，他们否认有组织犯罪是个严重问题。“他们告诉我，黑手党不存在。它只是犯罪团伙的松散联合。他们没有被组织起来。”

肯尼迪克服冷漠懒散的首要举措之一是成立专门小组，对全国最大的工会——国际卡车司机协会（IBT）里的劳工诈骗活动开刀。在麦克莱伦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针对工会受腐败的有组织犯罪染指的断言，肯尼迪与该工会尖刻好斗的主席詹姆士·霍发（James R. Hoffa）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辩战。肯尼迪任命沃尔特·谢里丹（Walter Sheridan）领导这个小组。谢里丹曾是麦克莱伦委员会的一名调查员，同时也是吉米·霍发的死对头。他拥有高昂而忘我的工作热情，以至于其工作人员在他的门上挂了个手工制作的情人节礼物——一张霍发在正中咧嘴而笑的图片，并注上标题：“总是想着你。”带着肯尼迪的祝福，谢里丹的调查员与律师团队被人普遍称为“抓捕霍发小组”。

在 FBI 内部，自 50 年代后期结束了手法巧妙却并无成效的“头号暴徒”行动之后，胡佛再次对黑手党漠然置之。胡佛的调查姿态在纽约表现得最为明显，他总共指

派4名特工专职监视全国最大和最活跃的黑手党军团，而那些军团拥有2000多名打手和数千名崇拜者合伙人。与此相反，胡佛顽固性地担忧美国共产党的间谍威胁，选派了400多名特工持续监视该党在纽约地区人数渐少和渐渐老去的党员，而实际上他们绝大多数人早就不是政治上或者破坏性的威胁了。

1961年FBI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情报档案主要是些报纸剪贴物，罗伯特·肯尼迪急切地接受了哈里·安斯林格手中长期被束之高阁的黑手党嫌犯“黑名单”，并将它们交给他手下的得到充实的检察官与调查员团队。开始时，胡佛对肯尼迪的计划表现得无动于衷。他在肯尼迪开始采取行动打击黑手党近一年以后公开宣称，“没有一个诈骗者的单独组织或联盟控制着全国的有组织犯罪活动”。

尽管FBI在组织上受司法部和司法部长的领导，但独断专行的胡佛一向自行其是。而在肯尼迪政府里，他却无法要花招绕过司法部长直达总统。这位司法部长有总统这个耳目，而且他们还是兄弟，胡佛很难破坏这种牢固的关系。

在30年的时间里，只要有可能，胡佛就对黑手党视若无睹。他有种种理由这样做，这些调查行动棘手、困难，而且经常没有结果。此外，胡佛意识到他的特工，主要来自中西部和南部城镇，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和街头技巧来渗入犯罪家族或迅速取得重大突破，因此很难赢得能够经受住法庭考验的案子。而且像所有执法官僚一样，他知道调查有组织犯罪就得穿过腐败的雷场，这对特工就像对普通警官一样具有危险。许多黑手党人都从赌博和高利贷中大发其财，他们会向任何人行贿，甚至有可能引诱口碑良好的FBI特工，从而败坏胡佛的声誉。

但在罗伯特·肯尼迪的严令驱策且有总统为其撑腰的情况下，胡佛被迫对黑手党展开了一次密集的调查。肯尼迪鼓励他要像对待其特别“关照”的两个目标——国内共产主义者和苏联间谍组织——那样鼓足精神彻查有组织犯罪。胡佛以其惯用的官僚伎俩做出回应，成立了一个新的FBI有组织犯罪特别科，并出炉了他的另一个“头号通缉犯”名单。在为黑手党的存在争辩了几十年之后，他突然搞出一份列明了40名适于立即着手调查的嫌疑犯的名单。这前40名嫌犯主要是黑手党老板及其副手，这些人在阿帕拉沁事件之后早已受到其他执法机关和媒体的高度关注。纽约著名教父卡洛·甘比诺、乔·博南诺、乔·普罗旺斯和汤米·卢切斯就在胡佛名单的前列。

对FBI新成立的黑手党猎手队的特工来说，情况不明是其主要困难。在胡佛的支持下，特工们通常都避免和其他联邦机构及州和地方警察部门进行密切合作。胡佛鄙视大城市警察部门的能力和腐败，并将其他联邦机构视为对手而不予信任。他很少批准进行联合行动，主要因为他不想和任何其他执法官员一起分享荣誉。当被要求将自

己的刑事案件资料交给 FBI 时，纽约和其他城市的探员们通常都颇不情愿。FBI 拥有一项法定权利，能够无须交换即可调阅警方的黑手党情报档案。纽约有组织犯罪探员雷默·弗朗西斯切尼（Remo Franceschini）对 FBI 专横地“掠夺我们的档案”感到极为愤怒。FBI 特工经常以受联邦法律的限制为借口，拒绝将他们可能掌握到的情报交给地方调查人员。曾有那么极少有的一次，弗朗西斯切尼称 FBI 的确将它的一份与某个黑手党人有关的机密调查材料交给了他，但那资料却毫无价值。FBI 的全部档案都是由市警察局交给它的情报报告构成。大城市的侦探大多数对 FBI 的自我宣传和沽名钓誉感到厌恶。出于对胡佛手下那些特工的蔑视，纽约侦探们讽刺性地将 FBI（FBI）的首字母诠释为“Famous But Incompetent”（出名但无能）。由于 FBI 热衷于通过找回被盗车辆来制造无甚意义的反犯罪统计数字，另一个诙谐的标签——“Fan Belt Inspectors”（风扇带检查员）又贴到了 FBI 特工身上。

罗伯特·肯尼迪要求马上取得成果，这迫使胡佛的探员们不得不设法从他人手里取得与黑手党有关的第一手情报资料。纽约的拉尔夫·萨勒诺是他们求助的老侦探之一，而他也愿意和他们分享自己那辛苦得来的情报。“他们有许多弥补工作要做，”萨勒诺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过来问，‘你们搞到这些家伙的什么东西？’”他教会了特工一些基本的技巧，即通过勤奋监视黑手党的社交场合：守灵、葬礼、婚宴、洗礼仪式和饭店聚会来收集其家族的情报信息。家族里的“社会等级”，这名侦探解释说，常常可以通过个人在这些场合受尊重的程度看出来，当然，从其讨论家族事务的会议上也能看出端倪。黑手党严格的行为准则要求向首领们得体地表达敬意，黑手党人在公共仪式上所给予的待遇常常暴露了新近的升迁、权力的变动和联盟关系。

侦探常用的刺探方法包括在集会活动中秘密拍摄黑手党人以进行身份鉴别，或溜进黑手党儿女们的婚宴现场获取来宾名单来确认新老成员。他建议窃取新娘记录下来的礼金名单，其金额多少会显示黑手党宾客的重要地位和等级，因为根据黑手党的礼节，结婚礼金是依地位最高者的最大金额依次登记。通过电话窃听，萨勒诺发现过黑手党婚姻礼节中一个可笑的细节。他听到卢切斯家族一名打手的妻子忐忑不安地和一个高级党徒的老婆聊天，探听她丈夫打算在一场即将到来的婚礼上送出多少礼金。那打手的妻子称，她丈夫想多送些，但害怕会让他的顶头上司显得小气。

胡佛打击黑手党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再次进行非法窃听，阿帕拉沁事件遭受尴尬之后他就这么做过。他指示办案主管和特工运用“高机密情报来源”。这是 FBI 的行话，指未经法庭授权安装窃听装置并对许多黑手党人的家庭和巢穴进行监听。在使用这种调查方法上，有着几十年间谍监视经验的 FBI 罕有对手。FBI 的电子技术人员甚

至让拉尔夫·萨勒诺都感佩不已。“我看到他们在 30 秒钟内安装了一个窃听器。他们非常棒，手法很专业。”

1962 年，在令人窘迫的既存法律和法庭裁决的约束下，联邦机构被禁止对电话谈话进行“截听和曝光”。1954 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期间，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Herbert Brownell）赋予胡佛在事关“本土安全”的案件中使用窃听器——隐藏起来的麦克风或发报装置——的自由酌处权。这项授权的目的是要让 FBI 用来对付苏联集团国家和美国共产党。胡佛现在能动地解释并扩大了这项授权的适用范围。FBI 的看法是，只要其内容不被“曝光”，它可以用窃听器和电话或搭线窃听装置秘密地“截听”。通过窃听获取的信息在法庭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它可以向 FBI 提供非常宝贵的与黑手党活动相关的情报和线索。

电子监听手段是个被谨慎保守着的秘密，胡佛从来没有正式告诉罗伯特·肯尼迪。他已将这种被特工称为“六月档案”的非法项目付诸实施。编档备案时，对那些突然获得的与黑手党有关的大量情报和内幕消息，FBI 总是注明它们来自于线人、变节者和特工们高强度的腿上工夫。只有司法部官员威廉·亨德利（William G. Hundley），即鲍勃·肯尼迪^①的有组织犯罪处处长，被谨慎地告知特工们可能在进行非法和违宪的窃听活动。“胡佛从来未提出授权申请，”亨德利说，“有时候，我的 FBI 同仁会以委婉方式暗示他们在靠窃听器获取情报，但他们从来没有具体地说明过。”亨德利相信，特工们以非正式方式告诉他窃听之事是个官场的障眼法，如果事情败露成丑闻，FBI 可以声称司法部知道这个合法性成问题的计划。亨德利显然知道，通过仔细阅读 FBI 的报告，司法部的检察官能够断定那秘密情报只能来自那所谓“黑包工作”的秘密窃听。

当肯尼迪事后来得知 FBI 的电子把戏时，他问亨德利为何要独自捂着这敏感的消息。“肯尼迪实际上对我说，‘你知道这事？你为什么告诉我？’”由于窃听器和电话窃听存在着合法性的问题，亨德利选择了沉默以保护肯尼迪个人免受伤害，倘若这监视计划会成为政治上的烫手山芋的话。“这就是那些你不想谈到的事情之一，”亨德利承认道，“胡佛在有组织犯罪方面从未做过任何事情。他打算利用窃听器尽快迎头赶上。到后来，他就可以靠窃听器取得的情报发展线人，调查案件，而没人会知道以前的一切。”

从技术上讲，电子窃听技术是近乎完美的。不过，对于不熟悉黑手党行话和它那

^① 译注：即罗伯特·肯尼迪。

令人迷惑的礼仪与文化的特工来说，要弄明白他们听到的东西还需要时间。他们被送到语言学校学习意大利语，特别是黑手党人经常讲或夹杂在粗俗之语中的西西里方言。FBI有个经验尚嫌不足的小组活动在拉斯维加斯，开始时它没有留意帮派分子的作息规律，总是按部就班地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进行监视和电子窃听。最后，特工们终于发现黑手党人及其赌场伙伴的绝大部分活动都在午夜过后才全面展开，而这时特工们已经下班睡觉去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FBI已到达认知曲线的顶峰，窃听器挖取的线索正在淹没FBI和司法部。“他们不得不从鸡零狗碎的材料中找些有用的东西，”提到FBI的工作时，肯尼迪的律师兼检察官鲍勃·布莱克（Bob Blakey）这样说道，“但到了1962年年中，他们已经搞到了所有情报素材。”

通过设法将黑手党人和那些愿意或不愿意帮助他们的律师和会计师分开，罗伯特·肯尼迪还开辟了另一条战线。辩护律师传统上认为他们自己和检察官们是法律界里的平等成员，因而认为他们与嫌疑当事人的交往应免受调查。为削弱黑手党的力量，罗伯特·肯尼迪打破了这个不成文的，看起来神圣不可侵犯的惯例。无需拥有可能存在不法行为的证据，FBI就可以对为黑手党家族提供服务的律师、会计师和商人展开调查。此举的一个长远目的是要阻止或威慑这些专业人士，让他们不要掩护黑手党人的核心利益并保护他们免遭起诉或被判刑。一旦这些经验丰富的帮手撒手不管，黑手党人或许更容易受到起诉和被监禁。该计划的另一个目的是，一旦对黑手党实施打击，有利于“转变”或说服这些未参与犯罪的支持者向政府报信或与政府合作。但是这些专业人员非常清楚等待告密者的是何种命运，所以该计划在这个方面收效甚微。

肯尼迪还利用移民归化局的驱逐出境权来打击非法入境或身份可疑的高级黑手党人。他的第一个大猎物是新奥尔良那无可争议的黑手党老板卡洛斯·马塞洛（Carlos Marcello）。洗礼名为卡洛迦罗·米纳科（Calogero Minacore）的马塞洛1910年生于当时属法国殖民地且有着许多西西里移民的突尼斯。8个月大的时候，他和母亲一起来到新奥尔良与父亲相聚。其犯罪经历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黑手党人相似：过早地辍学，轻微罪行之后便是抢劫和毒品走私罪。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当他与弗兰克·科斯特洛在路易斯安那的赌博事业发生联系后，马塞洛的好机会就到来了。1947年，37岁的马塞洛成了全国最年轻的控制着新奥尔良犯罪家族的黑手党教父。由于他身高只有1.64米，这位新首领在新奥尔良黑社会里常被人称为“小男人”，可就他的影响力和资产而言，这个绰号绝对失之偏颇。

马塞洛的合法幌子企业是多家弹子机与自动唱片点唱机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和

一个捕虾船队。拥有一处占地 3000 英亩的种植园是这个黑手党老板的骄傲，那是他在新奥尔良市郊购买并复垦出来的“邱吉尔农场”。在移民和其他政府机构要求必须填写职业的表格上，马塞洛谨慎地注明自己是个“番茄售货员与房地产投资商。”而实际上，他暗地里在南方和中西部经营赌场、赌注经纪行、老虎机、妓院和一家面向赌注经纪人业务室的新闻通讯社。联邦麻醉品特工很早就怀疑马塞洛的捕虾生意是个幌子，用来掩护从中美洲和墨西哥用小船走私海洛因和可卡因，但他们从来未能找出足够的证据来指控他。

凭借其通过大量行贿获得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马塞洛在美国黑手党内部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他是纽约和芝加哥之外最受尊敬和最为独立的教父，并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来制定主要犯罪政策，且无须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接纳家族新成员。

然而，基福弗听证会暴露了马塞洛致命的移民缺陷：他及其父母均未申请公民身份。自 1952 年以后，作为一个留居美国的外侨，他不得不每三个月向移民监察官报告，以便就其法定权利接受检查。对这个犯罪老板来说，这是个让人讨厌的事情，但 8 年以来他每个季度还是气定神闲地露面，接受例行核查。

选定卡洛斯·马塞洛作为首个开刀对象后，罗伯特·肯尼迪毅然决然地对他采取行动。1961 年 4 月 4 日，刚好在这位新司法部长宣誓就职的三个月之后，马塞洛照例出现在新奥尔良移民与归化局办公室。这次，肯尼迪的移民局特工给他带上了手铐，并突然指控他持有通过伪造出生证明而获得危地马拉的护照。尽管其随同律师提出了抗议，但他仍被命令立即离境。没有举行法庭听证会，那个狂怒的黑手党老板就这样被强行推上一架将飞往危地马拉市的政府飞机。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就在律师们手忙脚乱地要让突然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马塞洛重返美国时，他被一个个国家赶了出去。危地马拉将他驱逐到邻国萨尔瓦多，在军营里被监禁一段时间后，他被赶到洪都拉斯边境，并被迫徒步穿越国境线。这位 51 岁的教父大腹便便，穿着西服打着领带，顶着炎炎烈日，艰苦跋涉了 17 英里来到一个乡村。最后，马塞洛与一名随行的美国律师乘车抵达了洪都拉斯的首都特古西加尔巴。调查人员在那里失去了他的线索，直到他在新奥尔良突然出现。他何以能设法再次进入美国而未被移民官员截下尚不得而知。普遍的看法是，马塞洛赶到了墨西哥，并在那里乘坐自己的一条虾船偷渡到美国，那条船将他带到了路易斯安那境内一条偏僻的河汊。在新奥尔良被发现后，马塞洛遭到政府重击，受到偷逃联邦税 835396 美元、非法重返美国和发假誓等数项指控。这位黑手党大佬满腔怒火，私下发誓要报复那个破坏他生活的年轻的司法部长。

就在肯尼迪驱策其检察官和 FBI 袭扰和摧毁黑手党之时，一个名叫约瑟夫·瓦拉齐（Joseph Valachi）的半文盲罪犯意外地成就了他最大的情报与公关胜利。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打手和无足轻重的毒品贩子，瓦拉齐的职业生涯实际上在 1962 年就结束了。尽管从未被证明犯有杀人罪，但瓦拉齐被怀疑是个参与过二十多起谋杀的职业杀手或策划者。他 59 岁，因毒品犯罪正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服刑 20 年，而其家族的老板唐·维托·吉诺维斯因其他毒品犯罪也被监禁在这个防备措施最为严格的监狱。瓦拉齐自称从城堡之战中死里逃生，还称吉诺维斯曾在他的婚礼上做过伴郎。

一连串令人费解的牵涉到吉诺维斯的事件突然让瓦拉齐的牢狱生活变得凶险起来。有传言说瓦拉齐是个告密者，而吉诺维斯却想让他杀掉那个据称污蔑他为内奸的狱友。瓦拉齐深信狡猾的吉诺维斯实际上是怀疑他并要赐他“死亡之吻”，于是他成了半个多疑症患者，整日都在提防着什么。1963 年 1 月 22 日，在监狱的院子里放风时，瓦拉齐见到有个犯人朝他逼近。相信那人是吉诺维斯派来杀他的执法人“乔·贝克尔”约瑟夫·帝巴勒莫（Joseph “Joe Beck” DiPalermo），瓦拉齐在院子的一处工地上抓住一根铁管朝那人猛击，直到把他打死。他杀死了一个无辜的犯人，错将受害者当成了帝巴勒莫。

从他的单室牢房里，瓦拉齐向联邦麻醉品特工送信说，他准备透露其 30 年来作为一个黑手党人所知道的一切。瓦拉齐和特工们心里都明白，一旦他被定罪并返回普通囚犯区，吉诺维斯的仇恨必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他与司法部达成了协议：瓦拉齐对二级过失杀人罪认罪，并吐露他所知道的与黑手党有关的一切，而作为交换，他得到承诺将作为受优待的犯人接受终身保护。

作为纽约地区一个低级打手，瓦拉齐的信息囿于其活动经历而有限，但他还是清楚地描绘出黑手党内部生活的第一幅图景。他证实了五大家族的存在；他大致说清了它们的组织结构；他曝光了那秘密的“血盟”仪式；他道出了“乌默它”誓言的效力；而且他确认了每个家族的首领，首次说出了各个家族相应的名称。根据瓦拉齐的供述，关于黑手党的荒诞说法和模糊不清的推测都被戳穿或得到证实。胡佛采用的秘密窃听器与电话窃听对 FBI 来说是个巨大的情报胜利，然而某些谈话片段的意思和晦涩难解的引用仍让特工们捉摸不透。但是，经瓦拉齐稍加提醒，破解一个难解之谜的“罗塞塔石碑”^① 就浮现了出来，而这个谜就是所有家族所共用的名字。

^① 译注：碑文用希腊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通俗文字刻成的玄武岩石碑，1799 年发现于尼罗河三角洲埃及北部的罗塞塔附近，它为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线索。

特工们听到黑手党人谈话时经常讲到一个意大利词语，它听起来像“cosa”（意大利语表示“事情”），或者像“casa”（房屋），或者是“causa”（事业）。这个短语时常被特工们翻译为“casa nostra”（我们的房屋），或“causa nostra”（我们的事）。“Nostra”意为“我们的”。精明老练的FBI审讯员詹姆士·弗林（James P. Flynn）向瓦拉齐提到了那个令人迷惑的词语，想证实那些犯罪家族是不是用“Mafia”这个名字。

“不，”瓦拉齐回答说，“不是Mafia，那是外人的叫法。”

没有直接向瓦拉齐发问，弗林诈称，他知道其实际名字以“cosa”开头，然后等着回答。这位特工回忆称，瓦拉齐当时脸色变得煞白，然后说，“Cosa Nostra，如你所知。”

“Cosa Nostra”（我们的事），它成了美国习语的一部分。弄清了这个神秘的组织名称是官僚政治的一个令人惬意的胜利，它足以让胡佛压在20年里一直以为是“Mafia”的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哈里·安斯林格。忘记了过去曾拒绝承认一个全国性的犯罪组织网络的存在，胡佛独占了解密那个可怕犯罪辛迪加之名的所有荣誉。继FBI禁用“Mafia”之后，胡佛给那个名字加了个不必要的冠词，即“La Cosa Nostra”（大抵类似于“The Our Thing”（我们的事）），其缩略语为LCN，并以此作为FBI官方文件和声明中指代该犯罪组织的唯一正确的称呼。然而，其他执法机构、官员和媒体继续使用“Mafia”，认为它同样能准确地指代那些家族和管理委员会。

为打击有了新名称的“LCN”或“Mafia”，罗伯特·肯尼迪利用乔·瓦拉齐的背叛作为理想的撑杆来赢得国会和民众支持。1963年秋，作为全国第一个揭露黑手党内幕的可靠证人，瓦拉齐出现在通过电视对外播放的参议员麦克莱伦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基福弗委员会听证会所达成的宣传效果。和在基福弗听证会上未露出面部的弗兰克·科斯特洛不一样，瓦拉齐全身都出现在镜头面前。在参议员温和的发问下，他讲述了自己加入黑手党人的入会仪式，透露了他所知道的谋杀和他作为打手的其他肮脏经历。

FBI为委员会和电视观众展示了大量照片、图表和图解，设法将这些家族描绘成组织严密的军事机构，每个等级都有明确规定的职责。虽然它总体上准确地概述了每个家族的组织框架，但这种描述却漏掉了每个成员都是单独的创业者这一基本要点。为了生存、成功和发展，他们都要成为捞钱人或生产者。被南达科他州参议员卡尔·蒙特（Karl Mundt）问及是否从家族老板那里领取固定薪水时，瓦拉齐强调了拥有不法生意经营技能的必要性。“你得不到任何薪水，参议员。”瓦拉齐说道，并接着说他的部分收益还得交给家族首领。

“噢，那么你还挨宰了，”蒙特继续说。

“你得不到任何东西，”瓦拉齐说，“只有你自己赚的钱。明白吗？”

当来自农业州的参议员们问及在大城市从事敲诈勒索活动的意裔美国人的巨大数量时，瓦拉齐以暗示其结论的解释回答说：“我谈的不是意大利人。我说的是罪犯。”

在公开露面之前，瓦拉齐一直在接受特工们的训导，填鸭式地接受 FBI 通过电子窃听获取的其他犯罪家族的信息。经过巧妙的洗脑，瓦拉齐相信他在委员会面前所揭发的事情都来源于他的切身经历和对美国黑手党的直接了解。胡佛把他当成了一个话筒来公布 FBI 希望让国会和公众了解的黑手党实情，从而掩盖了那些情报实际上是通过违宪方式获取的事实。

由于只在家族的行动队或次级组织里活动，瓦拉齐对“科萨·诺斯特拉”的了解很有限，他提供的证据和线索不足以让检方提起一项单独的指控。瓦拉齐对纽约其他家族和外地犯罪集团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他甚至不知道芝加哥黑手党称自己为“团队”，新英格兰自称“办事处”，而布法罗的组织则是“扶手”。他还喋喋不休地说着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历史故事，误导 FBI 和参议员们接受那血淋淋的“西西里晚祷之夜”的传说。

瓦拉齐告诉那些听得着迷的参议员，当 1931 年 9 月卢西亚诺策划谋杀了塞尔瓦托·马兰札诺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黑社会掀起了一股铲除卢西亚诺之敌的谋杀浪潮。瓦拉齐错误地证实了流传甚久的传闻，即死亡人数在十几人到一百多人之间，其中 40 人是在某日的大屠杀中被害。迷信这场想象中的大屠杀的人称之为“西西里晚祷”（13 世纪西西里人反抗法国的起义暴动）清洗。直到 1987 年在一份关于黑手党历史的官方报告中援引它时，FBI 才确认 1931 年的“晚祷”事件属实。

但是，历史学家亨伯特·内利（Humbert S. Nelli）1976 年的一篇研究马兰札诺被杀前后两周黑社会谋杀的文章对瓦拉齐的“晚祷”之说提出了质疑。内利发现在马兰札诺被杀当天和之后的三个月里，据报道纽约发生了三起具有黑手党风格的谋杀案，还有一起发生在丹佛。这四起谋杀是否和马兰札诺刺杀案有关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它们并不等同于一场大屠杀。

尽管瓦拉齐之说存在诸多缺陷，但他的证词让调查人员对黑手党的力量及其活动方式有了大致的了解。由于对黑手党的内部运作知之甚少，所以他揭露的事情对公众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瓦拉齐不过是个低级暴徒，但他是第一个打破“乌默它”戒律并详细而准确地披露黑手党习俗和行为准则的荣誉者。而有了胡佛和司法部对瓦拉齐供述的认可，全国所有的执法机构——甚至是以前的否认者——都不得不表明立场

承认黑手党的存在，尽管他们对其威胁程度并不认可。

由于他的合作，瓦拉齐取得了联邦监狱局所能提供的最轻松自在的空间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在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城附近的拉图那监狱（La Tuna Penitentiary），狱方为他建造了一处两居室的空调套房，配有沙发和小厨房，并与普通犯人区相隔离。FBI和联邦监狱局有充足的理由为它们的这个大名鼎鼎的犯人担忧并将他隔离。瓦拉齐作证期间，FBI的窃听器捕捉到布法罗老板同时也是管理委员会成员的斯蒂法诺·马嘉迪诺针对瓦拉齐的讲话。“我们通过了决议，那个家伙得死。”马嘉迪诺对手下们说道。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为瓦拉齐提供过法律咨询服务的司法部官员威廉·亨德利称，罗伯特·肯尼迪曾打算向瓦拉齐提供新的身份并“把他和他的女友一块安置在一个荒岛上”，但这个计划终成泡影。除了看守之外，瓦拉齐总是单兵孤城地独处一隅，那里并不是他的安乐窝，他曾试图上吊自杀。1971年，68岁的乔·瓦拉齐在狱中自然死亡。

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就在瓦拉齐破天荒地在参议院委员会做证的一个月以后，乘坐车队中一辆敞篷豪华轿车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市迪利广场遇刺身亡。约一小时以后，在达拉斯市另一个地方，29岁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兼左翼事业支持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被逮捕并被指控谋杀肯尼迪总统和枪杀一个试图靠近他的警官。两天后，当奥斯瓦尔德从达拉斯警察局的地下室里被提出来送往一个县监狱的途中，一名身材短粗的中年男子突然从一群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中间冲出来开枪打死了奥斯瓦尔德，实况转播的电视新闻捕捉到了这一幕。

枪手是杰克·鲁比（Jack Ruby），此人是当地一个性情粗野的夜总会老板，与有组织犯罪人物有着长期联系。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奥斯瓦尔德，鲁比将作为一个神秘的环节出现在一个更大的难解之谜中。而这个更大的谜是：难道是黑手党策划了总统刺杀案？

第 15 章 “事实的金石之音”

“砍掉狗尾巴，狗还会咬你，但如果狗头被砍掉了，狗就会死掉。”

“我们拼老命帮他，让他赢得选举，而他却让弟弟把我们往死地里赶。”

在那个致命的星期五，乘坐车队里另一辆轿车的副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没有受伤并在当天宣誓就任总统。带着主要查清肯尼迪是不是外国或国内阴谋集团之受害者的目的，约翰逊指派一个由德高望重的美国首席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领导的委员会发布刺杀案的结论性报告。在胡佛狡猾地将管辖权从保护总统安全的财政部特勤处手中夺过来之后，沃伦委员会就依靠 FBI 作为它的主要调查工具。胡佛利用一个不起眼的管辖权上的技术细节，即联邦财产在刺客的子弹击中总统轿车挡风玻璃时受损，为突破口展开了调查。

1964 年 9 月，主要以 FBI 的调查为依据，委员会公布了它的调查结果。其主要结论认可了胡佛的分析：此案并无阴谋，行为古怪且心境不佳的孤癖者奥斯瓦尔德是唯一的枪手。在其工作地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里，他用一杆邮购来的廉价来复枪从六楼窗户里射出了子弹。FBI 的主要调查工作在一个月之内就草草完成了。在胡佛的授意下，许多调查方向和线索都被忽略。

几乎就在公布那 888 页的报告的同时，该委员会就因其基本判断受到了猛烈炮轰，被指责存在着明显的漏洞，不真实，误导民众，缺乏说服力。大批批评者驳斥了委员会认定奥斯瓦尔德是个孤独枪手的说法。这些置疑——主要集中在射出的子弹数量和它们来自的方向——让许多阴谋之说纷纷出笼。

首要嫌疑对象是黑手党和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

黑手党可能卷入其中的线索在刺杀案发生后的若干年内逐渐显现，其中许多都在 1979 年经过整理后被披露了出来。这一年，一个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完成了历时两年的

重新评估沃伦委员会调查结果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一个调查重点是黑手党卷入的可能性，因为为了阻止其弟弟讨伐他们，策划谋杀总统可能成了黑手党最有效的办法。另一种暗杀说是，中央情报局在60年代初曾招募重要的黑手党人帮助刺杀卡斯特罗，因此激起了古巴人的复仇之心，最终导致肯尼迪总统被刺杀。

在FBI以前的秘密档案中，特别委员会发现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表明，许多“科萨·诺斯特拉”头目害怕罗伯特·肯尼迪对他们的打击，并显示出他们对司法部长和总统的仇恨愈来愈深。这令人感兴趣的情报来自刺杀案发生之前安装的窃听器，而当时胡佛正在实施以打击黑手党为目的的电子监听追赶计划。

胡佛没有将重要情报交给沃伦委员会，他没有吐露窃听器的存在和靠它们获取的宝贵证据与内情。沃伦委员会绝没想到FBI录下了黑手党大佬对肯尼迪充满仇恨的谈话。另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是，1963年胡佛将刺杀案的调查任务交给了FBI负责处理银行抢劫和损毁联邦财产案件的部门，FBI两个最有资格调查国内和国外阴谋的机构——有组织犯罪处和国家安全处，则在调查中只起到辅助作用。国会调查人员后来推测，胡佛那有悖常规的任务分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说，他可能担心由精明能干的特工和讲究实际的检察官所进行的范围更广的调查会曝光其非法窃听活动，进而损害他的名誉。

70年代末，当这个众议院委员会开始展开工作时，FBI的录音带已被消磁或遭毁坏。新调查员们不得不求助于谈话录音那并不完整的摘要和部分抄本。黑手党人所做的绝大部分暗示性威胁都从较长的谈话片段中被剔除了。FBI的秘密窃听器揭露了黑手党人对肯尼迪兄弟，特别是对罗伯特那坦露无遗的憎恨。在被录音的谈话当中，许多黑手党人侮辱个别FBI特工，但令人意外的是，很少有威胁性或恶意的评论是针对约翰·埃德加·胡佛的。

1962年5月2日，特工们听到纽约吉诺维斯家族重要角头“迈克”米什莱诺·克莱门帝（Michelino “Mike” Clemente）与几个打手的谈话。“鲍勃·肯尼迪，”克莱门帝警告说，“他如今不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送进全国各地的监狱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只有到管理委员会开会并下狠手，事态才会平息下来。”强调为打败肯尼迪而加强保密时，他接着说，“我们碰头时，大家都握握手，然后坐下谈话，如果某个家族出现任何麻烦时，大家都得替它保密，只有对头头才能讲，否则哪个婊子知道了，最后就是报纸的漫天报道。”

一年以后，即1963年5月23日，乔·博南诺的堂弟，同时也是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布法罗家族老板斯蒂法诺·马迦迪诺担心受到政府的重拳打击，他悲哀地向副手们

说：“我们‘科萨·诺斯特拉’的境况不妙。他们知道太阳底下的所有事情。他们知道谁在幕后操纵，他们知道‘埃米希’（amici，朋友），他们知道‘角头’（capodecina），他们也知道有个管理委员会。我们现在要尽可能悄悄地注意这件事，看它发展到什么程度。”

马迦迪诺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被窃听，也不知道 FBI 关于黑手党的大多数情报都来自没有防范意识的谈话。1963 年 6 月 6 日，马迦迪诺再次言语失当，警告他的几个手下小心肯尼迪兄弟造成的麻烦。“我们面对的是这届政府。我们承受着总统的打击，但我们要反抗。”然后传来一声巨响，像是拳头砸在桌子上。

同月，这个教父向其打手安东尼·德斯蒂法诺（Anthony DeStefano）坦承，自 FBI 特工前来造访之后，他对 FBI 搜集情报的能力感到困惑。“你看，‘科萨·诺斯特拉’”，前几天他们把我吓了一跳。他们知道我们的事情比我们自己还清楚。他们知道各个家族的首领，角头，FBI 真的知道。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就在前几天，我说你开口前得倍加小心。因为有时候，有人可能是个间谍，而你却可能把他当成‘我们的朋友’。”

在刺杀案发生的前一个月，即 1963 年 10 月 31 日，马迦迪诺那身为荣誉者的儿子彼得激动地对其父亲说，总统“将会暴死”。那儿子接着说，“他们会杀掉他整个家族，包括他的父母。”

1962 年 2 月 9 日，正在开始调查黑手党的 FBI 特工听到费城家族老板安吉洛·布鲁诺和深受其信任的生意合伙人威利·韦斯伯格在一次意见听取会上的煽动性谈话。“看看肯尼迪干了些什么，”韦斯伯格说，“对肯尼迪，有个伙计得拿把刀像对其他人一样捅过去杀掉那狗杂种，他现在在哪儿……我要杀掉他。就在那该死的白宫里。有人得除掉这个狗杂种！”

针对黑手党实施报复的可能性，国会委员会仔细调查了新奥尔良老板卡洛斯·马塞洛和他对肯尼迪所怀的恶意。罗伯特·肯尼迪承认对马塞洛 1961 年被短时间驱逐到中美洲负有责任，但坚持说驱逐出境是根据移民法做出的。在暗杀发生之前，这个黑手党人一再怒骂司法部长让自己含辱蒙羞。有个让国会委员会感兴趣的疑点是 1962 年 9 月马塞洛和爱德华·贝克尔（Edward Becker）（一个与黑帮人物有生意联系的为所欲为者）之间的一次谈话。贝克尔有着多种职业头衔：一家前 FBI 特工开办的私人侦探所的调查员、公关员、影剧业经理、电视制作人。他声称听到马塞洛发誓要为遭驱逐向罗伯特·肯尼迪报一箭之仇。“不要担心小鲍勃那狗娘养的，”贝克尔引述马塞洛的话说，“他得当心点！”

1967年，得知贝克尔向有组织犯罪题材作家爱德·里德（Ed Reid）提供了一份相关情况说明之后，马塞洛的威胁被传得沸沸扬扬，FBI对此进行了调查。FBI有一份采访里德后整理出的内部备忘录。它称贝克尔曾回忆说，马塞洛告诉他“要搞掉鲍勃·肯尼迪，他们就不得不搞掉总统，他们不能杀鲍勃是因为总统会动用军队和海军陆战队来抓捕他们。”据说马塞洛告诉贝克尔，杀掉肯尼迪总统“会使鲍勃因新总统上任而失去其司法部长的权力”。FBI未接受贝克尔之言，认为他声名狼藉且不可信，因而没有进一步找他谈话或充分地进行核实或者驳斥他的言论。

在FBI坐了10年的冷板凳之后，贝克尔接受了众议院刺杀委员会调查人员的询问。他叙述称，在1962年9月至1963年1月期间，他在新奥尔良就一单燃油添加剂的生意和马塞洛见过三四次面，当时他和那个黑手党老板的一个生意伙伴希望马塞洛给予投资。1962年9月，在马塞洛的邱吉尔农场庄园里见面时，贝克尔向马塞洛问起罗伯特·肯尼迪的调查压力问题，那个黑手党老板当时就勃然大怒。贝克尔记不起马塞洛的原话，但称他“清楚地表明他正在策划用某种方式谋杀肯尼迪总统”，而且会安排黑手党之外的某个人去执行具体的犯罪行动。贝克尔还向委员会调查员们声称，马塞洛把肯尼迪总统称为一条狗，而罗伯特·肯尼迪就是那条狗的尾巴。贝克尔以不祥口气解释了马塞洛的话，“砍掉狗尾巴，狗还会咬你，但如果狗头被砍掉了，狗就会死掉。”在那一个多小时的生意协商会上，那刺耳的话语占去了一到两分钟，贝克尔告诉调查人员。

马塞洛那猛烈的口头攻击让贝克尔觉得心烦意乱，但他已经听惯了黑手党人和其他犯罪分子习惯性地威胁对手，他并没有把他们的话当真。由于害怕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前或之后立即向政府报告马塞洛的言论会招致黑手党的报复，所以他多年来都保持着沉默。

众议院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他与马塞洛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查证，结果证实贝克尔所言属实，同时还发现FBI不合情理地轻视了贝克尔和他的情报。“他们无意于对他的话进行公正的调查。”一位委员会律师报告称，“他们所做的就是驳斥告密者并令其信誉扫地。”

马塞洛被传唤到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的内部会议上，当重新提起自己是如何被罗伯特·肯尼迪的特工“绑架”并被草草丢进危地马拉时，他变得愤怒起来。但他强烈否认讲过威胁肯尼迪总统的话。“不，先生，我从来没说过那样的话。绝对没有，从来没说过那样的话。”由于只有贝克尔的一家之言，委员会对马塞洛可能卷入刺杀案中的调查没有取得突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3年11月22日，就在肯尼迪总统遭枪

击当天，被罗伯特·肯尼迪的检察官们指控阴谋伪造危地马拉护照的马塞洛被新奥尔良一个陪审团宣判无罪，他此后就再也没有被驱逐出境过。

第二个黑手党名人，佛罗里达的桑托·狄拉菲肯特，也是该委员会特别感兴趣的目标。在佛罗里达半岛两岸的坦帕和迈阿密都有着黑手党地下生意的狄拉菲肯特和马塞洛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所在的州构成了黑手党的南方大本营。在卡斯特罗的1959年革命以前，狄拉菲肯特是美国黑手党在古巴最有影响力的人，他拥有三家赌场的股份，并深深地卷入向美国走私毒品的活动当中。在卡斯特罗夺取政权时，大多数黑手党人都匆匆逃回了美国，而说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的狄拉菲肯特却留在了古巴，他相信通过贿赂新政权可以保住其日进万金的赌场。不久他就知道自己错了。卡斯特罗的政府不与赌徒或毒贩合作，没收了狄拉菲肯特的财产，将他关押了起来并威胁要处死他。至于狄拉菲肯特如何逃脱卡斯特罗的革命审判，这里有两种说法：他在所有财产被查抄之后被踢了出来；或者是他贿赂了一名未让上司知道就将他释放的监狱官员。

在古巴大损其财的狄拉菲肯特恼羞成怒，他返回佛罗里达并在那里与反古巴的流亡运动发展关系。他对卡斯特罗的仇恨和他与流亡者的联系引起了美国间谍首脑们的暗中注意。在众议院委员会开始就肯尼迪刺杀案展开调查的前一年，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于1975年公开了中央情报局（CIA）一个令人尴尬的阴谋：它让狄拉菲肯特和其他黑手党人参与一个愚蠢的计划来刺杀卡斯特罗。

与黑手党联手是CIA自1960年至1965年期间欲除掉卡斯特罗并推翻其左翼政府的八大阴谋之一。1960年夏天，CIA要求一个掌握有黑手党联系人的FBI前特工罗伯特·马休（Robert Maheu）寻找能对那个古巴独裁者实施致命一击的黑手党人。马休招募了洛杉矶枪手约翰·罗塞利（John Roselli），此人将芝加哥的萨姆·詹卡拉和坦帕的桑托·狄拉菲肯特拉了进来。在这三人当中，只有狄拉菲肯特熟悉古巴并与反古巴的流亡者们有着密切联系。

CIA特工给了马休15万美元，让他转交给被认为是刺客的人。在计划筹备阶段，CIA内部有份评论员文章准确地将黑手党参与者描述为不值得信赖的敲诈勒索犯，并强调如果卡斯特罗被推翻，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重新获得“赌博、色情业和毒品的垄断权”。这个信号告警被忽视了，1960年底或1961年初，在迈阿密豪华的枫丹白露酒店（Fontainebleau Hotel）的房间里会面时，马休将一个塞满CIA钱款的公文包交给了狄拉菲肯特，他同时移交的还有毒物胶囊。在哈瓦那一家卡斯特罗经常光顾的饭店，阴谋者计划在他用餐时用这种胶囊将其毒杀。当然，这种天真的投毒犯罪以流产

而告终。CIA 的机密文件未能指出这个计划为何流产或者它是否被尝试过，CIA 和参议院委员会也无法弄清那 15 万美元专款是如何用掉的。

在 CIA 招募的三人刺杀小组当中，只有狄拉菲肯特活着在肯尼迪刺杀委员会前作证。1978 年被传唤到该委员会面前时，对于在 CIA 谋杀卡斯特罗的行动中扮演何种角色，狄拉菲肯特将自己描绘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和翻译。CIA 的钱？毒药？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参议院委员会曾就 CIA 在古巴的冒险行动展开过调查。1975 年，在准备接受该委员会讯问的前夜，萨姆·詹卡拉在自己家中被杀。他遭近距离枪击，后脑、嘴和喉部都有弹孔。在黑手党分析人员看来，这种处决方式透露着明显的信息。这是一起传统的黑手党谋杀，子弹在嘴中或喉部射进表示受害者曾“多嘴多舌”，并表示他再也不会告密了。

约翰·罗塞利于 1976 年突然消失了，他失踪前刚刚在参议院委员会秘密作过证，并且两天前还在劳德代尔堡（Fort Lauderdale）和狄拉菲肯特共进过晚餐。两星期后，罗塞利的无腿尸体被一个漂浮在北迈阿密邓房帝林海湾的 55 加仑的油桶带出了水面。罗塞利被杀害的手法也符合黑手党的风格。在勒死前被截断肢体和受到拷打意味着他已经或即将违犯了“乌默它”戒律。

对于他参与的 CIA-卡斯特罗谋杀行动的合作者之死，狄拉菲肯特当然坚称一无所知。至于肯尼迪遇刺一案，狄拉菲肯特在众议院委员会面前也同样是百般推托，并表示一概莫知。专家组有证据表明他认识杰克·鲁比，并且知道鲁比在卡斯特罗掌权之前就为黑手党效力。鲁比当时很明显在帮狄拉菲肯特和其他涉足哈瓦那赌场和色情业的黑手党人偷偷洗钱。当谈起他与鲁比的交易时，这位佛罗里达教父的记忆再次出现空白。问到与鲁比的会面或联络时，这个黑手党人的回答是“我不记得了”或“我想不起来了”。

在公开听证会开始之前，该委员会偶然得知了黑手党对约翰·肯尼迪的另一个威胁，这个威胁据认为来自狄拉菲肯特。古巴著名流亡领袖乔斯·阿勒曼（Jose Alema）在一次秘密讯问中向调查人员透露，1962 年，狄拉菲肯特曾告诉他肯尼迪总统“将被袭击”。但当他被带到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上时，阿勒曼成了一个不合作的证人，他还暗示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要求政府提供保护。在勾起人们兴趣的关于狄拉菲肯特“袭击”之言的话题上，阿勒曼彻底改变了他原来的说法。他作证说，狄拉菲肯特的意思是如果肯尼迪寻求连任，他将被“大量选票所袭击”，并没有暗示威胁总统的生命。对于正在寻找线索破解一个多年谜团的委员会调查人员来说，阿勒曼的 180 度大

转弯把他们带进了另一个死胡同。

1979年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对沃伦委员会15年前最重要的结论——唯一的枪手奥斯瓦尔德应当为肯尼迪总统之死负责提出了质疑。这些众议院议员的确认同了沃伦委员会否认古巴、苏联、CIA或任何其他联邦机构卷入这个阴谋的看法，但他们仍非常重视寻找旁证来证明不止一名枪手在迪利广场朝肯尼迪开枪。可是经过两年的调查之后，该委员会最终承认未能找到充足的证据指证奥斯瓦尔德以外的任何人。

G·罗伯特·布莱克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前助手，同时也是该委员会的首席顾问和调查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他声称“有组织犯罪插手了”刺杀案。他相信，窃听器获取的大量证据足以证明黑手党首脑们至少在考虑除掉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弟弟。布莱克的分析阐述了谋杀总统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动机：他的死将阻止罗伯特·肯尼迪对有组织犯罪实施的持续而全面的打击。

在其报告当中，该委员会指出最有可能谋杀肯尼迪的黑手党头目是卡洛斯·马塞洛和桑托·狄拉非肯特。该委员会调查了另一个让人感兴趣的细节：奥斯瓦尔德于1963年春夏之交迁居到新奥尔良。在刺杀案发生前不久，他曾和叔叔“杜茨”查尔斯·穆雷特（Charles “Dutz” Murret）住在一起，而后者是马塞洛组织里的赌注经纪人。委员会怀疑奥斯瓦尔德或许受马塞洛或其家族某个人的诱骗而成了倒霉的替罪羊枪手，但这尚不是定论。另一个疑点是马塞洛与达拉斯市——其黑手党帝国的一部分——的关系。在那里，杰克·鲁比的“酒会俱乐部”是当地黑手党人聚谈之地，这些人有许多都在为马塞洛的二老板兼其德克萨斯州的利益保护者乔·西维诺（Joe Civillo）效力。

独立地梳理刺杀案发生前后FBI窃听黑手党人谈话的录音是该委员会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录音带未能带来确凿而具体的证据证明黑手党计划刺杀总统。但在审查了FBI的整个阴谋调查之后，这些议员及其调查人员都认为它存在“严重的瑕疵”。他们指责FBI仅仅把奥斯瓦尔德作为唯一的嫌疑人；没有追查有组织犯罪涉案的最新和有价值的线索；并且将至关重要的情报，包括利用秘密窃听器获取的表明黑手党对肯尼迪政府极端仇恨的证据，扣留下来未交给沃伦委员会。

调查结果委婉地指出，在60年代初，FBI未能像渗透到北方黑手党犯罪家族那样打入到马塞洛和狄拉非肯特的犯罪网络之中。FBI忽视了马塞洛，甚至从未对他进行监听，而对狄拉非肯特的电子窃听也只进行过4次，且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一位匿名的FBI官员向该委员会承认，狄拉非肯特在坦帕和马塞洛在路易斯安那的组织在20

世纪 60 年代是 FBI 的“盲点”。至于为何未能调查和窃听到马塞洛的活动，那位官员干脆地说道，“他太狡猾了”。众议院工作人员私下评价了 FBI 驻新奥尔良的特工，称他们忽视了马塞洛的黑手党帝国不是因为无能就是因为腐败。

该委员会结束调查 16 年后，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浮出了水面，这为相信黑手党要人参与暗杀阴谋的看法提供了有力支持。新的线索来自弗兰克·拉加诺，肯尼迪被刺杀时，他是狄拉菲肯特、马塞洛和卡车司机协会主席吉米·霍发的律师。在他所写的自传《黑手党律师》当中，拉加诺清楚地道出了黑手党对肯尼迪兄弟的憎恨。更为重要的是，拉加诺称狄拉菲肯特临死前向他讲过实际上证实黑手党卷入暗杀的话。

身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佛罗里达的律师，拉加诺为狄拉菲肯特服务了 30 年，且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充当着那个黑手党大佬的密友和心腹知己。他们的关系是那么融洽，拉加诺甚至将狄拉菲肯特视为自己的导师和兄长。拉加诺承认，直到晚年，他才解除与狄拉菲肯特达成的一份让他经济富足却出卖灵魂的契约。作为一种交换，他放弃了自己的道德准则，成了为一个残忍的犯罪老板及其组织服务的“家庭顾问”和“黑手党律师”。通过与狄拉菲肯特的亲密关系，拉加诺和许多南北方的黑手党教父、角头和打手们见面和聚会过，这种经历让他能够直接观察到他们那扭曲的行为准则。

当北方黑手党要人到佛罗里达度假时，狄拉菲肯特就在其经常光顾的迈阿密“卡普拉氏饭店”款待他们并邀请拉加诺参加。在刺杀案发生的前几个月里，拉加诺称他听到芝加哥老板萨姆·詹卡拉猛烈抨击罗伯特·肯尼迪和 FBI，称他们在折磨他和与之关系暧昧的流行歌手菲莉斯·麦圭尔（Phyllis McGuire）。在一次晚宴上，拉加诺记得詹卡拉咆哮着说，他的家族通过贿赂库克县的选票帮助肯尼迪赢得了——或者说窃取了——他 1960 年的选举。“那个杂种，狗娘养的！”詹卡拉说，“我们拼老命帮他，让他赢得选举，而他却让弟弟把我们往死地里赶。”

刺杀案发生后不久，在与包括汤米·卢切斯在内的纽约黑手党人及其女友一起用餐时，拉加诺听到肯尼迪遇刺的话题被提了出来。“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好人身上的。”卢切斯不怀好意地评论说。

刺杀案发生的当天晚上，拉加诺在坦帕参加了狄拉菲肯特的庆祝晚宴，当时后者精神亢奋、容光焕发。他显得轻松而快活，拉加诺说，相信总统之死会结束对他和马塞洛，还有与这两个南方老板有着肮脏交易的霍发的调查。此前，狄拉菲肯特总是怒骂肯尼迪总统让卡斯特罗继续掌权，让他无法到哈瓦那重新夺回其利润丰厚的赌场。他鄙视肯尼迪总统在 1961 年的猪湾入侵事件中撤回了对反卡斯特罗军队的空中支持，

在他看来，这使入侵行动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这件事会让我们有利可图，或许能回古巴了。”拉加诺记得在约翰·肯尼迪被杀的当天晚上狄拉菲肯特高兴地说。

拉加诺的秘密任务之一是充当狄拉菲肯特和马塞洛联系霍发的联络人，以避免让FBI发现他们与那个卡车司机协会领袖的关系。他们利用拉加诺说服霍发从卡车司机们的养老基金中借出数百万美元，投入到他们暗中入股或经纪的项目当中。

经过狄拉菲肯特的干预，拉加诺加入了霍发的律师团队。这个律师称他从来没有因其服务而直接得到过霍发的报酬，然而，像黑手党老板一样，他从霍发挪用卡车司机的养老金用于房地产开发中得到了大笔好处。由于以优惠条件为他自己、黑手党人和合法企业家取得被霍发迅速核准的工会贷款，拉加诺以经纪人佣金和直接利润的形式获得了报酬，从10亿美元基金——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会福利基金——中取得的大量贷款使拉斯维加斯以黑手党为后台的赌场获得了发展。尽管养老基金受到工会和资方代表共同管理，但对那些被确认利润有保证的贷款，霍发实际上把持着其审批权。

对于卡车司机协会与黑手党人的契约，霍发在拉加诺面前并无忌讳之言。在一些坦诚的谈话当中，霍发据理解释说，在三四十年代，为对付那些残忍的被公司雇来对抗工会并破坏罢工的人，他和IBT（国际卡车司机协会）前几任领导人都曾被迫借用黑手党的力量。黑手党的支持是霍发成功的关键。纽约家族在纽约地区炮制“纸上”或不存在的地方分会对他赢得IBT主席选举起到了关键作用。霍发为其黑社会盟友辩护称，黑手党人的影响力帮助了工会的成长，使它的蓝领工人得到空前的工资待遇、额外福利和工作条件。霍发自信，他能够与黑手党首领们做些注重实效的交易却不至于丧失自己或者工会的独立性。在其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卡车司机协会的会员人数从1957年的80万迅速增加到1963年的200万，使之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会。

但卡车司机协会的腐败丑闻败坏了美国整个劳工运动的名声，因而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于1957年驱逐了霍发领导的工会，声称它受到黑帮分子的大范围渗透。肯尼迪政府也关注此事，它害怕霍发及其黑手党同伙有能力在全国范围的通过货车运输业罢工来损害国家经济。1963年夏，就在刺杀案发生前不久，据拉加诺称，霍发被罗伯特·肯尼迪针对他的活动及其与有组织犯罪的联系展开的密集调查搅得心劳神疲。在他那靠近华盛顿国会大厦的总部里，霍发频频与拉加诺见面讨论法律上的麻烦。

在1963年7月23日的一次秘密会议上，面对一场即将到来的由罗伯特·肯尼迪的手下提起检控的刑事审判，霍发没有理睬拉加诺就其中的法律问题提出的置疑。相

反，这个工会领导人带着指挥者的口气向拉加诺发号施令。霍发命令他向桑托·狄拉菲肯特和卡洛斯·马塞洛传达一项紧急要求，他想让他们启动刺杀总统的计划。“有些事情必须得做了，”拉加诺称霍发向他指示道，“现在是你的朋友和卡洛斯除掉他的时候了，杀掉那狗娘养的约翰·肯尼迪。”

拉加诺称，他相信霍发是因为罗伯特·肯尼迪对他提起刑事诉讼而发脾气，但他并没有将这些过火的话当真。但是，第二天，拉加诺应约来到新奥尔良的皇家奥尔良酒店与狄拉菲肯特和马塞洛见面，目的是讨论一份他们与霍发敲定的非法贷款合同。尽管他认为霍发要求刺杀肯尼迪的要求是个恶意的玩笑，但他还是忠实地将意思传达给了这两个黑手党教父。“说来你们不会相信，”拉加诺告诉他们，“但他希望你们杀掉约翰·肯尼迪。”这两个黑手党人一言不发，只是冷冷地盯着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踩进了“雷区”，拉加诺赶紧转换了话题。

1963年11月22日，就在肯尼迪在达拉斯遭受致命枪击数分钟之后，拉加诺说，霍发在其办公室给他打来了电话。“听到了好消息了吗？”那个工会主席兴高采烈地说：“好哇，他死了！我听新闻说林登·约翰逊将宣誓就任总统。你知道吧，他会免掉那个傻瓜的。”（“傻瓜”是霍发对罗伯特·肯尼迪的蔑称。）

刺杀案发生三天后，拉加诺和其他律师到霍发的办公室开会，讨论他的刑事案子。霍发声称肯尼迪骚扰过他，因而拒绝将大厦顶部的美国国旗降半旗向遇害总统致哀和表示尊敬。在法律对策会议结束后，霍发把拉加诺拉到一旁。“我对你说过，他们能办成事的，”霍发低声说，“我绝不会忘记卡洛斯和桑托为我做的一切。”

对拉加诺来说，他几乎是在肯尼迪死去25年之后才突然洞悉那桩刺杀案的真相。1987年3月13日，星期五，他说这天上午遵照狄拉菲肯特的意思，他驾车把这个黑手党人从其坦帕的家里接了出来。72岁的狄拉菲肯特身患严重疾病：他的手不停地颤抖着，他的肾脏功能要靠血液透析维持，而且他马上就要去接受第二次心脏开刀手术。在沿着坦帕那风景如画的海岸大道行驶时，狄拉菲肯特先是缅怀起他们共同的朋友和经历，后来又转回到肯尼迪兄弟从前打击黑手党的话题。

和往常一样，狄拉菲肯特用西西里语与拉加诺聊着天，他嘟囔地说：“该死的鲍勃。我想卡洛斯干蠢事搞掉了乔万尼——也许该死的是鲍勃。”这令拉加诺顿感惊愕，狄拉菲肯特接着说：“我们不该杀乔万尼，我们该杀鲍勃。”拉加诺知道“乔万尼”指的是约翰·肯尼迪。

片刻之后，拉加诺称，狄拉菲肯特向他讲起了他们生命中的另一起重大事件：1975年吉米·霍发的失踪。1964年拉加诺是霍发的代理律师之一，曾在他的两次审

判中替他辩护过，当时罗伯特·肯尼迪的“抓捕霍发小组”以贿赂陪审团、欺诈和结伙共谋等罪状对他提起公诉并成功地让他获罪。1971年，已经服刑13年的霍发被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减刑释放。后来，拉加诺声称，霍发和他的一名高级助手曾向他坦承，减刑是通过向尼克松的支持者们秘密提供10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得来的，估计这部分献金被用在共和党1972年争取尼克松连任的竞选当中。

但在霍发出狱之后，狄拉菲肯特告诉拉加诺，那个好斗的工会领袖让纽约犯罪家族感到恐慌，因为他宣称正在写一本曝光黑手党内幕的书，并声称他想重新掌控卡车司机协会。狄拉菲肯特告诉拉加诺，他曾警告过霍发，称北方黑手党人相信他变成了一种不受控制的、破坏性力量，会危及他们在工会里的经济利益。

在坦帕驱车转悠的过程中，狄拉菲肯特向拉加诺讲起了霍发1975年被诱骗并遭杀害的情况。他被引诱到底特律郊区的一个汽车修理厂里，名义上是让他过来参加和平会议，和底特律黑手党要员“托尼·杰克”安东尼·贾卡洛龙（Anthony “Tony Jack” Giacalone）讨论重新夺回工会权力的构想。在汽车修理厂里，霍发被“托尼·普罗”安东尼·普罗文扎诺（Anthony “Tony Pro” Provenzano）的杀手队打昏并勒死。普罗文扎诺是卡车司机协会新泽西分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吉诺维斯家族的一名与霍发早就结下了怨仇的角头。狄拉菲肯特还说，霍发的尸体可能永远都不会被找到。

按照他第一次做狄拉菲肯特的代理律师时立下的规矩，拉加诺称，他得倾听唐·桑托想让他知道任何事情，但绝不许主动问些敏感的问题。在规矩的约束下，他在与狄拉菲肯特聊天过程中无法要求他吐露更多的谋杀肯尼迪总统和霍发及如何处置霍发尸体的内幕信息。4天后，即1987年3月17日，狄拉菲肯特在接受心脏手术时死去。

从入行当律师时起，拉加诺就坚持认真写笔记和记日记，记述与当事人的见面和谈话情况。那发黄且不时有些折皱的记录本，连同当时拉加诺在酒店住宿的收据，都有助于证明他所记录的与黑手党人和霍发进行业务与社会交往的真实性。他的笔记当中有一篇据称是在他与狄拉菲肯特做告别谈话之后草草写下的。拉加诺在那篇笔记里写到，那个黑手党人自称知道肯尼迪总统和吉米·霍发谋杀案的真相。

后来，拉加诺相信作为一个业余的历史学学者和名人传记的狂热读者，狄拉菲肯特向他坦露实情是出于一种邪恶的自豪。他推测，狄拉菲肯特或许想让世人知道是他及其黑手党同伙策划了刺杀总统的行动，而且成功地欺瞒了政府的最高执法机构并逃避了惩罚。

为了活命，在充当黑手党律师和狄拉菲肯特亲信的30年里，拉加诺一直严格遵

守着自己的“乌默它”戒律。然而，由于他与狄拉菲肯特和其他黑手党人有着法律与社会联系，这将他推到了罗伯特·肯尼迪发起的以黑手党要员专业助手为目标的打黑运动的中心。FBI和IRS（美国国税局）对拉加诺展开的密集调查让他两次受到情节相对较轻的偷逃个税的指控并获刑。1993年第二次被定罪后，他在狱中服刑了10个月。

通过他的书，拉加诺打破其长期遵守的缄默誓言，所有他曾为之服务过的声名狼藉的黑手党客户都已死去，他那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保密契约已经解除。而且，他也疾病在身并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在拉加诺的许多亲人和朋友看来，他公开坦承他那际遇沉浮的过去、他那雄心勃勃的抱负和对财富的渴求，都是天主教徒对其虚度生命的自责、忏悔和赎罪。1998年，时年75岁的拉加诺在睡眠中死去，看上去是死于心脏病发作。

尽管尚不是绝对可信的结论，但拉加诺之言向外界提供了黑手党老板卷入总统之死的最强有力的证明。经肯尼迪刺杀案和有组织犯罪最杰出的权威罗伯特·布莱克鉴定，拉加诺的信息是可以接受的。“它有着事实的金石之音。”他补充说。

“科萨·诺斯特拉”扭曲的道德准则反对向正直的官员施以暴力，因而约翰和罗伯特·肯尼迪本该免于黑手党的报复。但FBI的电子监听录音和拉加诺的证词都表明，黑手党老板们认为约瑟夫·肯尼迪为他的儿子们做过承诺，而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儿子们违反了这项承诺，老板们感觉他们被出卖了。于是老板们违背了在黑手党看来绝不可悔改的契约，肯尼迪兄弟或许因此而被视为可以给予暴力惩罚的对象了。

黑手党的统治者有足够的理由害怕罗伯特·肯尼迪。1960年，也就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后一年，只有区区35名低级黑帮分子被判刑，且主要受到罪行较轻的赌博指控。在肯尼迪持续近4年的针对黑手党高层展开的雷霆打击当中，有116名黑手党荣誉者和合伙人受到指控，包括吉米·霍发。对全国黑手党大佬来说，那些统计数字令人忧惧，他们知道那个司法部长决意要灭掉他们。

在立法前沿，由于罗伯特·肯尼迪对黑手党强大力量的警告，加上总统的政治影响力，首批几十亿美元用于打击一个全国性犯罪组织的预算破天荒地在国会获得轻松通过。四部新的法律扩大了联邦政府起诉黑手党人的司法权限，其主要法条是禁止出于诈骗目的跨州旅行和跨州运送赌博设备。尽管这些法律很难实施，但这标志着国会首次为打击黑手党而付出的一致努力。

在约翰逊政府里，罗伯特·肯尼迪与他哥哥的继任者有着麻烦不断的政治与私人

关系。他在这种状态下坚持了9个月，直到1964年霍发被定罪一个月以后辞去职务。从纽约被选到参议院之后，肯尼迪1968年遇到了和哥哥一样的命运——一名刺客的子弹——当时他正在洛杉矶竞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且几乎就要赢得胜利。刺客西尔汗·西尔汗（Sirhan Sirhan）与黑手党并无关系。

很明显，肯尼迪总统被谋杀中断了联邦政府对黑手党展开的首次持续不断的打击。罗伯特·肯尼迪离开后，这股冲击力就从司法部消失了。他的继任者，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因担忧未经授权电子监听计划被曝光而撤除了那些正向FBI提供重要情报的窃听器，黑手党调查实际上被束之高阁。胡佛敏感地察觉到这届政府的冷淡态度，也就不再将黑手党作为优先的调查对象。

随着FBI和政府的再次沉默，黑手党的教父们终于可以松口气。压力烟消云散。无论他们是否卷入其中，在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黑手党成为这场斗争中的大赢家。

第 16 章 风光无限的帮派：黑手党

“我们比美国钢铁公司还大。”

这动人的话听起来像是一句巧妙的广告语，意在吹嘘一家跨国公司的实力与知名度，而它实际上是黑手党财经大管家梅耶·兰斯基在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对黑手党毫无偏颇的即兴评论。

在罗伯特·肯尼迪的严打期间，胡佛下令启用“高机密情报来源”作为计划的一部分，特工们与几名纽约的酒店密探商定对经常光顾他们酒店的黑手党人实施窃听。黑手党人和他们的重要合伙人被安排在已改造成秘密录音室的房间或套房里。1962年5月，在曼哈顿上东区的沃尔尼酒店，最后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犹太黑帮人物兰斯基，“科萨·诺斯特拉”身价不菲的捞钱人，登记住进了其中一间套房。

10年前在基福弗委员会面前露脸之后，兰斯基成了一个名闻全国的声名狼藉的人物。随着肯尼迪打击行动的展开，胡佛将兰斯基列在其有组织犯罪名单的前列。在介绍全国的犯罪形势时，那位FBI局长将这个矮小精悍的老诈骗犯描述成一个异常重要的人，指示特工对他采取“特别的调查手段”（胡佛指称非法电子监听的委婉之言）。

经历了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正在康复的兰斯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和亲人朋友们懒散地聊些私人话题。他的每一句话都被FBI所窃听。1962年5月27日，在那个星期五的晚上，兰斯基与妻子单独在一起观看戴维·萨斯金德（David Susskind）的脱口秀电视节目。司法部对黑手党的打击正招来媒体的大量报道，萨斯金德当晚的话题便是有组织犯罪。一名特工在数年后被泄露给记者的窃听报告中称，兰斯基一直沉默不语，直到电视节目的答问小组称有组织犯罪在规模上仅次于政府处于第二位。当时兰斯基轻率地对妻子说，“我们比美国钢铁公司还大。”

尽管被排除在黑手党统治阶层之外，但兰斯基参与了黑手党首脑们的许多交易，

他的话反映出他们在 20 世纪中期的自信心态。尽管在罗伯特·肯尼迪的进攻中受创，但老板们并没有举起白旗投降。胡佛对此心知肚明，通过窃听器秘密搜集的大量情报信息让胡佛及其高级助手们认识到了黑手党的强大生命力，而兰斯基的谈话录音便是这情报信息的一部分。

令人惊讶的是，政府统计学家们相信，从兰斯基讥讽美国钢铁公司的俏皮话来看，他们实际上大大低估了黑手党的整体经济实力。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司法部的一份秘密分析报告估计，有组织犯罪的利润相当于前十大工业公司的利润总和。这十大公司是通用汽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福特汽车制造厂、通用电气公司、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美国德士古公司、海湾润滑油公司与美国钢铁公司。（这是一种主要以假设为基础的并不科学的分析，它假设黑手党的利润主要来自非法赌博、高利贷、绑架和毒品销售。综合黑手党巨大的毛利润、低管理费和逃避税收等因素，政府粗略估计，在全国范围内，黑手党人及其合伙人一年的净收益在 70~100 亿美元之间。）

然而，1964 年底在敲定 FBI 的工作计划时，胡佛再次自由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没有受到林登·约翰逊政府的更多干预，当时政府正忙于处理一些急迫的问题，如日益扩大的越南游击冲突、反贫困战争、民权运动和一些内陆城市的骚乱和无秩序状态。尽管在肯尼迪时期立了许多黑手党案件，但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还是很快将其降格，不再把它当成一个极为重要的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遵照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那只有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才可进行电子窃听的指示，胡佛取回了它最为有效的武器——黑手党巢穴里的窃听器。

约翰逊政府的政治关注点与胡佛本人保守的、冷战优先的思维相吻合。他加快了对其眼中的反美或颠覆性组织的调查，包括许多反越战组织和为非裔美国人争取民权的组织。（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胡佛唯一试图镇压的极端组织是疯狂反黑人和反闪米特人的三 K 党。）一种新的被 FBI 称为“反情报计划”的策略被确立起来，以监视和瓦解被胡佛视为有害的组织，并让热衷于破获刑事案件的密探对它们实施渗透。

有一封寄往 FBI 所有地方办事处的内部信件清楚地暴露了胡佛的意图和他对合法民权与政治组织的分化与征服策略。“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揭露、瓦解或抑制各种新左翼组织和其领导阶层及追随者的活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考虑分化这些团体的有组织活动，不得错过任何机会利用其领导层的组织与个人矛盾。”

在 60 年代中期以前，胡佛的近 8000 名特工的确逮捕过形迹败露且罪不可赦的低级黑手党人。然而，随着罗伯特·肯尼迪的离去，FBI 的华盛顿总部再也没有鼓励对

黑手党案件展开彻底调查。有些热诚的特工仍在勤勉地工作着，但激励作用正在大多数地方分局消失。比起缓慢而无回报地追查被层层隔离保护的黑手党头目来，在逮捕笨拙的银行劫匪或持不同政见者（胡佛永久不变的调查对象）的身上下功夫更容易获得升职的机会。

因此，FBI从黑手党的巢穴中撤除了电子窃听器，然后将其秘密设置在被胡佛认定是颠覆者或左翼分子的个人与组织的聚会场所。调查推崇暴力的激进团体，如埋设炸弹的“气象员”地下组织，无疑是正当的。但FBI还诉诸非法、违宪的手段窃听和监视一些被胡佛个人认定对美国的基本价值构成威胁的杰出政治家与民权人士。这些人包括民主党1952年和1956年的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被认是“共产主义走狗”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著有“反美”作品的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和一些演艺界的反越战积极分子，包括约翰·列侬和简·芳达。

与联邦政府的急转向桴鼓相应的是，几个设有专门机构调查有组织犯罪的大城市警察部门也出现了类似的懈怠现象。罗伯特·肯尼迪的打黑运动，加上乔·瓦拉齐那令人信服的证词，曾一度让纽约警方高层相信了黑手党的重大威胁。随着肯尼迪离开华盛顿，纽约侦探拉尔夫·萨勒诺和雷默·弗朗西斯切尼注意到，纽约警方高级官员对黑手党的兴趣正在逐渐消失。通过在布朗克斯区对赌博活动进行调查和监听，弗朗西斯切尼深信那些老练的有组织犯罪分子正操控着涉案金额达数百万美元的赌博网络。中央情报署（CIB）有位官员驳回了弗朗西斯切尼要求扩大其调查范围的请求，坚持说黑手党是一种虚构的错觉。“那官员认为意大利暴徒只是几个将两枚50美分硬币搓在一起的家伙，”弗朗西斯切尼回忆道，“他告诉我，‘它不是有组织的，它不是个官僚机构，它不是华尔街。’”

警方高层一致认为，犹太赌注经纪人正在作为有组织犯罪最能干的捞钱人大发其财。弗朗西斯切尼徒劳地想让官员们相信，重大的赌注经纪行为并非不受他人控制，只有取得五大犯罪家族当中任何一族的默许才能运作。

许多CIB案件和情报都与非法赌博有关，这是最容易调查的罪案之一，而被捕者也通常是些不重要的交纳罚金和领受轻判就可脱身的管理人员、赌注经纪人和记账人。挖掘赌博线索的一种方法是在意裔美国人聚居区窃听和搭线截听社交俱乐部，也就是黑手党人的聚会场所。这种俱乐部是一些被改造成秘密窝点的临街铺面，荣誉者和崇拜者可以在里面与同伙一块享用咖啡、打牌、闲聊，并在出门进行当天的不法活动前制订行动计划。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美国黑手党人的俱乐部都类似于西西里乡村广场的咖啡馆。

1964年夏天，CIB调查人员对“大萨姆”塞尔瓦托·卡瓦利尼（Salvatore “Big Sam” Cavalieri）的俱乐部，卢切斯家族在东哈莱姆区的一个聚会场所，进行了窃听和电话监听。卡瓦利尼是卢切斯的打手，监管着50多个数彩和体彩赌注经纪人。和FBI一样，CIB使用窃听器主要出于情报目的，尽管纽约州的法律只允许在特定条件下才可将窃听录音作为法庭证据使用。“大萨姆”俱乐部里的重要人物畅所欲言地谈论事情，似乎并不担心电子窃听，可就是他们的谈话常常招来警方通过抄查卡瓦利尼的几个赌博间来扩充其抓捕数字。对CIB侦探来说，通过秘密窃听器了解卢切斯家族的文化与背景比这些低层次的抓捕更为有用。

一天，高级角头卡迈恩·特拉芒提（Carmine Tramunti）出现在卡瓦利尼的俱乐部，用电话联系一名打手布置老板汤米·卢切斯亲自指派给其行动队的任务。特拉芒提没有具体说明任务的细节，但其语气严肃，“他想让我们干。”在与之相隔数个街区的侦听哨上，弗朗西斯切尼听到了这次谈话。“被委以重任，特拉芒提言语之间明显流露出敬畏与自豪。就像卢切斯刚刚提升他们做圣徒一样。”弗朗西斯切尼说。

还是那个夏天，这位侦探听到特拉芒提给中城区一家时尚餐馆“吉利饭店”的老板吉利·里佐（Jilly Rizzo）打去电话，后者也是弗兰克·西纳特拉的朋友。“嗨，”特拉芒提对里佐说，“宴会开始了。在俱乐部后面，我们会吃些牛排，还有香肠。你为什么不过来？把棒球手们也带过来吧。”弗朗西斯切尼意识到纽约当地的棒球手们经常在吉利的饭店聚会。“噢，行吗？”里佐回道。“弗兰克在市里，说不定我会把弗兰克带过来。”

几个小时后，据警方的监视日志记录，西纳特拉与里佐一起出现在那个俱乐部，即席参加了卢切斯家族那些头面人物的宴会。市内的聪明汉也纷纷赶来与西纳特拉握手交谈。西纳特拉离开后，站在旁边给他伺酒的一名崇拜者给其祖母打电话，将那歌手到访的令人兴奋的消息告诉了她。“弗兰克·西纳特拉给了我50美元的小费！”他大声叫道。

调查人员搜集的情报表明，黑手党愈加富足且对执法部门毫不在乎，纽约警察部门对此不以为然。由于官员们纷纷接受了新的任命，一股挫折与逆转的浪潮袭击了唯一负责监视黑手党犯罪家族的CIB（中央情报署）。和FBI一样，由于害怕越战反对者造成政治和民间动荡，CIB精心组建了特别勤务调查局（BOSSI）。许多官员被派到这听起来不祥的BOSSI（也称为“红队”）任职，据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摧毁恐怖主义者的激进组织，阻止在黑人 and 西班牙人社区发生骚乱，并调查那些被认为致力于暗杀警察的组织。60年代中后期，弗朗西斯切尼和其他黑手党专家被调到BOSSI。弗朗西

斯切尼注意到，CIB工作重点的转移给了黑手党“那些年里几乎所有不付诸正常努力就能得到的东西”。

在黑手党的大本营纽约，甚至最低级的崇拜者都能嗅出执法的松懈。拥有宽松的生存环境，黑手党人和他们那为数众多的合伙人给自己起了个时髦的俚语名称——“聪明汉”。新一代的聪明汉认为他们对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暴力犯罪和经济阴谋都有自由行动权。

“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深深地卷入到捞钱阴谋之中，而且几乎从来没有人被抓到过，”当时身为卢切斯家族合伙人的亨利·希尔（Henry Hill）向作家尼古拉斯·皮莱基（Nicholas Pileggi）讲述道，“外人并不知道。当你在从事各种阴谋活动时，你认识的所有人也在干着这些事情，而且除了偶然之外无人被捕，这时你就会开始相信这一切或许并不那么危险。于是，数以万计的不同阴谋就冒了出来。”

腐败也是让纽约的聪明汉享有舒适环境的一个潜在因素。后来的调查发现，在6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拥有3万名警员的警察部门当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向具有黑手党背景的赌注经纪人和赌客们收取保护费。这种习惯性的勒索被称为“爪垫”。在这种敲诈当中，贿赂金定期流向部门里主要负责赌博与色情业执法的官员，其数额依照索贿者的级别和地位而定。对那些偶尔或经常收受贿赂金的官员和主管而言，他们并不希望其反黑手党小组告诉他们那些行贿者是有组织犯罪的“妖魔鬼怪”。“警察部门很少有人愿意相信它们（黑手党）的存在和像它们实际的那样强大。他们只想把他们想象成赌注经纪人和赌客，而不是谋杀者和毒贩。”

不过，萨勒诺掌管的人手不足的部门始终监视着黑手党，而且它的搜集和监视工作得到了警方高层的容忍。“为什么他们不挤兑我们？你得有些诚实而且拼命工作着的家伙。这样就能让不诚实的家伙对坏蛋说，‘我们会保护你们不受那些催命鬼的伤害，’我越是拼命追查，我就会越让他们捞到更多的钱。”萨勒诺苦笑道。

有许多黑手党勒索者痛责萨勒诺调查自己的意裔同胞。他们叫屈道，“为什么伤害我们的偏偏是自己的同胞呢？”萨勒诺会反驳说，“我不是你的同胞，你也不是我的同胞。我的行事方式、道德观念和习惯与你的不一样。唯一相同的是我们都禀承了意大利的传统和文化——而你是那种传统与文化的背叛者，我却以归属于它而骄傲。”

作为土生土长的纽约人，萨勒诺最初对黑手党的恐惧来自其移民父母在世时发生的骇人事件。在他出生之前，其父母生活在黑手党横行的东哈莱姆区。一个夏日，他的妈妈，当时正在为四个大点的孩子在街头小贩那里买冰淇淋，亲眼目睹了一个人称作“花花公子查理”（Charlie the Dude）的暴徒被社区里另一个绰号为“冰箱米基”

(Mickey Icebox) 的黑帮分子枪杀。

“当天晚上，”萨勒诺说，“有个来自父亲那意大利故乡的家伙来到他们的寓所，他给父亲带来了口信。‘告诉你老婆闭上嘴巴。否则你的孩子都得扔进东河。’”萨勒诺称，他的母亲担惊受怕了几个月，害怕那个“冰箱米基”会被逮捕，那样她就会被认定是告密者，而她的孩子们都将被杀死。“直到18个月后才松了一口气，当时有人杀了‘冰箱米基’，我家的威胁也就此解除。”萨勒诺说道。

大约还是在那个时候，当萨勒诺的父母和孩子们正准备坐下来吃晚饭时，几个人通过敞开的太平窗闯进了他们的家。正在躲避警方追捕的他们让一家人保持安静，直到他们觉得可以安全地离开为止。一周后，萨勒诺的父亲来到附近一家充当着故国新闻传播中心的理发店。店里有个包裹在等着他，那是从萨勒诺家里避过警察追捕的人送过来的。包裹上附着一张条子，写着：“你做得对。”包裹里的礼物是一把直刃剃刀和一个用镀金字母刻着父亲名字的修面杯。

那一幕幕场景激起了萨勒诺对黑手党的憎恶，促使他从警20年矢志铲除黑手党。“我几十年来一直将那个修面杯放在我的桌子上，让它提醒我那些杂种是怎样威胁我父母的。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和孙子或任何其他人的孩子在那种环境里长大。”

1967年，身为CIB主管侦探的萨勒诺离开了警察部门，作为国会调查委员会的组织犯罪顾问，他应该会有更实际的工作可做。“不幸的是，当我在警察部门工作时，黑手党可能比我父母那时强大20倍。”

乔·博南诺称60年代的纽约黑手党是座“火山”。尽管联邦和地方调查人员施加的外部压力渐渐褪去，但内部骚动的岩浆正在火山的表层之下沸腾奔流。接管纽约任何一个犯罪家族都意味着开始面对重重困难，嗜财如命的五大家族当时都在竞相攫取更多的财富和争取更突出的地位。博南诺后来在写到那个时代时曾经称，在那些只有一个黑手党犯罪家族的城市，教父们可以坐享事业的长盛不衰并颐养天年直到自然死去。“而在纽约，争斗几乎是司空见惯，教父们过着不得安宁的日子。”

作为博南诺的同辈教父和最亲密的盟友，乔·普罗旺斯于1962年6月11日因癌症死去。在管理委员会和纽约那波谲云诡的黑社会里，他的离去突然间动摇了博南诺作为一种权威力量的地位。博南诺是1931年那批老板当中最后一个在世并掌权的人，普罗旺斯之死突然且决定性地让管理委员会里的权力平衡向卡洛·甘比诺和汤米·卢切斯两人倾斜。被监禁的维托·吉诺维斯仍在事实上控制着他的家族，博南诺估计其代理人在摊牌时会站在吉诺维斯—卢切斯联盟一方。博南诺的另一个挫折是，他那颇

具实力的堂弟斯蒂法诺·马嘉迪诺，布法罗的教父和管理委员会的永久成员，开始疏远他并反对他的意见，因为他们在加拿大的地盘之争趋于白热化。博南诺当时正设法将其犯罪帝国扩张到马嘉迪诺在大多伦多的后院。“他在世界遍地插旗。”FBI的窃听器捕捉到马嘉迪诺的声音，他对堂兄试图强行进入加利福尼亚和加拿大地区且注定会得到管理委员会的“容许”感到愤恨不已。

马嘉迪诺是正确的。做了30年的老板之后，博南诺还只有58岁，相对年轻的他没有放弃他要留在黑手党金字塔塔尖上的狡猾念头或野心。他的第一个举措是支持普罗旺斯的姐夫兼二老板乔·马格利奥科（Joe Magliocco）任普罗旺斯家族的老板，尽管要求马格利奥科接替老板之位的呼声并不高。普罗旺斯最后几年一直被他的职业杀手“狂人乔伊”加洛及其兄弟“冲击波小子”艾伯特（Albert “Kid Blast”）和拉里（Larry）所领导的叛乱搅得烦忧不已。他们将普罗旺斯视为贪得无厌的暴君，并因执行着家族所必需的谋杀与打架斗殴而获得更大的收益份额。据信在1957年的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谋杀案当中，加洛兄弟就是理发店刺杀队的核心人物。

自1930年至1931年的流血冲突以来，被媒体称为“加洛战争”加洛兄弟的叛乱第一次严重违反一个纽约犯罪家族的内部纪律。普罗旺斯临死时这场冲突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加洛兄弟拒绝接受马格利奥科为他们的老板促使甘比诺和卢切斯抵制马格利奥科——博南诺的候选人和盟友——在管理委员会拥有席位。

要扫清自己和马格利奥科眼前的障碍，在当时的大多数黑手党调查员看来，博南诺就得通过谋杀来除掉他的主要对手：甘比诺和卢切斯。学者们推测，他还希望由其堂弟马嘉迪诺来具体实施。马格利奥科对博南诺的鼎力相助感激涕零，他支持这个计划，并将这谋杀多人的任务交给了普罗旺斯忠实且嗜暴成性的角头约瑟夫·科洛博（Joseph Colombo）。通过借马格利奥科和科洛博之手来铲除敌人，博南诺认为自己是不会惹祸上身的。

40岁的乔·科洛博经验丰富且非常狡猾，他知道要想设计除掉两或三名教父并没有太多成功的把握，并且在争夺纽约统治权的内部斗争当中，他清楚地看出了哪个老板占有优势。他向甘比诺伸出了橄榄枝——不是去杀他，而是警告他要提防博南诺和马格利奥科的诡计。

手握科洛博的证据，甘比诺、卢切斯和管理委员会其他成员传唤博南诺和马格利奥科前来接受黑手党的审判。身患病痛且遭自己角头出卖的马格利奥科爽快地认罪并祈求宽恕。他最终得到的不是一颗从后脑射进的子弹，而是被其终生为之效力的黑手党所驱逐。似乎管理委员会也得遵从审计原则，那些教父向马格利奥科罚款43000美

元，用以弥补调查他和博南诺的阴谋所产生的费用。1963年9月，名誉扫地的马格利奥科将忠诚于他的角头召到跟前，宣布停止与加洛兄弟之间的战争，并告诉他们管理委员会免去了他作为普罗旺斯之继承人的资格。他后来不到一年即死于心脏病发作。甘比诺和其他老板对或许救了他们性命的王牌间谍科洛博给予了奖赏，指定他为原普罗旺斯家族的老板，并在管理委员会拥有相应的席位。

乔·博南诺从来没有露面与管理委员会的其他教父对质。他潜逃到加利福尼亚和加拿大躲藏起来，并在那里寻找机会侵占别人的不法产业。他将纽约的生意交给可靠的助手打理，并指定长子“比尔”塞尔瓦托任家族顾问。加利福尼亚在博南诺的规划当中举足轻重。这个州的南部正在创造惊人的财富，可博南诺觉得洛杉矶家族的老板弗兰克·德西蒙（Frank DeSimone）未能充分抓住这种机遇。博南诺打算让更具领导才能的比尔取代德西蒙，并让40名能榨取更大利润的打手接替德西蒙的那班人马。作为管理委员会成员，博南诺在加利福尼亚已拥有监督旧金山和圣何塞那些小家族的职责。通过攫取洛杉矶的控制权，博南诺相信他将会主宰黑手党在美国大陆两岸的活动。

FBI的一些窃听器仍在发挥作用，通过一个安装在新泽西家族老板“管子工萨姆”西蒙·德卡瓦肯特在伊丽莎白市巢穴里的窃听器，特工们得知博南诺与管理委员会发生了冲突。1964年8月13日，在与家族角头约瑟夫·斯弗拉（Joseph Sferra）交谈时，德卡瓦肯特提到了博南诺的困境。“这牵涉到乔·博南诺家族。管理委员会不喜欢他自行其是的做法。”德卡瓦肯特接着说，博南诺提拔比尔为顾问，可他那个儿子也惹恼了管理委员会，因为他无视后者的传唤。“喔，他让儿子做顾问——可据说，那个儿子，他并没有到场。”德卡瓦肯特说。

1964年9月21日，德卡瓦肯特向博南诺的打手约瑟夫·兹卡莱利（Joseph Zicarelli）解释了全权的管理委员会为何要阻止以博南诺为靠山的马格利奥科取得老板之位。“管理委员会插手接管了家族。普罗旺斯死时，乔·马格利奥科继任老板。他们硬把他踢了出去。‘谁他妈的让你来掌管家族？’博南诺先生对此自然心知肚明。当我们家族有麻烦时，他们就会插足进来。‘你们属于管理委员会管理，直到解决了麻烦为止。’”

与博南诺相抗衡的教父们把管理委员会视为黑手党的力量与组织基础，他们对他的挑衅及其新推行的扩张计划尤为不满。在布法罗与自己的打手聊天时，马嘉迪诺提到博南诺打算不经管理委员会批准就控制加利福尼亚和加拿大的阴谋，他说，“未经授权，就是神仙也不能进入我的地盘。”

吉诺维斯家族统治阶层也一致反对博南诺。1964年9月份，FBI通过窃听器得知，角头“汤米·赖安”托马斯·埃波利（Thomas “Tommy Ryan” Eboli）告诉维托·吉诺维斯的兄弟迈克尔，称博南诺正在制造分裂，而这种分裂会毁掉黑手党或者让黑手党和其他种族帮派一样出现内部分化。“如果有成员能够无视管理委员会的命令，你就可以跟‘科萨·诺斯特拉’说再见，因为管理委员会是‘科萨·诺斯特拉’的主心骨。和陷于内斗的爱尔兰帮派一样，他们（意大利人）将重蹈覆辙进行派系战争。”在芝加哥，针对博南诺拒绝到管理委员会露面一事，FBI的窃听器捕捉到萨姆·詹卡拉提出的解决办法。“不要再传唤他。杀了他！”

博南诺还有另一个麻烦。罗伯特·肯尼迪在辞去司法部长之前游说国会通过了反有组织犯罪诈骗法案，而博南诺是黑手党唯一受这部法案威胁的主要领导人。有个由锐意进取的曼哈顿美国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Robert M. Morgenthau）选任的大陪审团曾传唤博南诺进行讯问。1964年10月20日的晚上，就在他准备出庭做证或因蔑视国会罪而面临监禁的前一天，博南诺与他的三名律师在曼哈顿共进晚餐。饭后，他和律师威廉·鲍尔·马洛尼（William Power Maloney）打的来到后者所住的派克大街与36大道交叉处的公寓大楼，他准备在那里过夜。当时将近午夜，天正下着雨。博南诺走出的士付车费。就在这时，据他后来称，他被两个壮汉劫持了，“来吧，乔，我们老板要见你。”随后就被推进候在一旁的汽车里。马洛尼告诉警方，他当时跑过去阻挡，朝那两个人喊叫，但其中一人开枪示警把他吓退了。在他20年后出版的自传当中，博南诺声称那次绑架是他堂弟斯蒂法诺·马嘉迪诺的人干的。他被迫蜷伏在汽车地板上被带到纽约州北部一个乡村农场，他的堂弟在那里警告他，称他已经失去人心，因为管理委员会认为他贪图权位。不过博南诺的说法暧昧，他说绑架者将他控制了6个星期，然后按照他的请求把他送到德克萨斯并毫发无损地放了他。获得自由之后，他留起胡须伪装面容，在图森和纽约的藏匿处度过了此后的19个月。

博南诺失踪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仍是个谜。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在1966年5月，他不请自来地和律师出现在曼哈顿福利广场的联邦法庭，并口头解释说他前两年一直被绑架。因长时间未按传唤要求到案，他面临着一项拒不出庭的指控。他质疑这项控告的合法性达5年之久，直到该指控最终被放弃。

从博南诺的律师报告他失踪的那天晚上起，纽约和联邦调查人员就对他是否真的被绑架感到怀疑。警方无法证实马洛尼鸣枪示警的说法，案发现场未能找到弹壳。而且，既然博南诺卷入了一场即将到来的与甘比诺和卢切斯生死对决的冲突当中，那么对他这个面临着危险的老板而言，没有保镖的保护就四处闲逛是不合情理和愚蠢的。

失踪案发生后，侦探萨勒诺通过电子窃听很快得知他还活着。“当某个重要人物被杀时，黑手党人就称他是‘好灵魂，’”萨勒诺指出，“博南诺身边的人都没有这么叫他；相反，他们说，‘那狗娘养的跑了，把我们单独扔在这里。’”

派克大街事件发生两天后，通过窃听新泽西的“管子工萨姆”德卡瓦肯特，FBI特工掌握了博南诺策划了那次绑架的线索。和副手弗兰克·马尤里（Frank Majuri）谈起博南诺时，德卡瓦肯特说纽约老板们被蒙在鼓里，对失踪一事毫无所知。“那么这必定是他策划的。”马尤里回道，强烈地暗示绑架案是个骗局。

大多数调查人员认为博南诺逃离纽约有两个令人信服的原因：一是他需要时间与其管理委员会的敌人达成休战协议或和平协定；二是他害怕摩根索大陪审团的控告。在他“被绑架”期间，甘比诺和卢切斯高兴地在博南诺家族煽动动乱，怂恿异议者挑战比尔·博南诺的代理领导权。比尔遭到家族前辈的疾恨，这些人认为他不具备一个合格领导人应有的能力与威望。在博南诺失踪期间，争夺家族控制权的冲突已造成了数人伤亡，这些争斗被人称为“糊涂战”。老博南诺1966年5月突然露面可能是被儿子5个月前遭到未遂伏击给逼出来的。在布鲁克林参加一次夜间会议时，比尔和保镖一露面，迎接他们的就是一阵猛烈的弹雨。无人被击中，但伏击者们至少射出了20发子弹，警方后来找到7把被扔在人行道上的手枪。

返回纽约后不久，在位长达35年且绝不服输的老板博南诺终于承认失败。甚至他最亲密的副手“加斯帕瑞诺”加斯帕·迪格雷戈里奥（Gaspar “Gasparino” DiGregorio），他结婚时的伴郎和比尔·博南诺极端严谨的教父，也纷纷领导内部反叛势力抵制他。博南诺在与管理委员会的冲突中玩得过火，后者最终压垮了他，保住了它自己确认老板人选的特权和决定地盘扩张权益的权力。在与管理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当中，作为曾经是全国最强大的黑手党组织的首领，受到惩戒的博南诺被允许和平让位和退休。他把自己长岛亨普斯特德村拥有14间房的豪宅卖掉了。切断与纽约的一切联系之后，他把自己放逐到图森市，那里有他40年代初为休养度假而购置的一套房产。尽管不再是一个东部威严的教父，但作为兴趣或爱好，唐·佩皮诺·博南诺还是和儿子们在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继续涉足一些不引人注意的不法行当。作为管理委员会最后一个创始成员，他开始构思自己的回忆录，那将是一部让自己和其他黑手党人的纠葛愈发难解的回忆录。

博南诺对权力的强烈欲望几乎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事情过去多年之后，拉尔夫·萨勒诺得知，经过诸般争论之后，管理委员会决定放博南诺一马，因为他是黑手党的开山教父之一，还因为他誓言永不干涉纽约黑手党的事务或插足于“科萨·诺

斯特拉”的其他权力中心。如果他胆敢重返纽约，他将面临着必然的死刑判决。萨勒诺和其他调查人员认为，管理委员会的教父们也意识到，杀掉他们自己中间的一个人将会开一个危及他们自身的先例。

60年代后期，随着短暂且危害性不大的“糊涂战”的结束和几乎不用担心执法干预，黑手党首领们可以泰然地处理自己的事情了。他们偶尔会受FBI特工或地方探员的跟踪和纠缠，但以摧毁他们组织为目的的大规模打击行动已经绝迹。基于公共关系的考量，在黑手党盘踞的主要城市如纽约、芝加哥和费城，其警察部门都是周期性地对他们采取打击行动——通常是在地方检察官或县治安官选举之前，或在发生了让太多尸体留在街头令人无法视而不见的野蛮谋杀或火拼之后，但这些都是持续时间不长的小插曲。

然而，黑手党有时会出人意料地犯下粗心大意的错误。比如在1966年9月22日，星期四的下午，在纽约昆斯区一家不大起眼的意大利餐馆“拉斯特拉（La Stella）饭店”里，有13个人正坐在一处秘密就餐区的餐桌旁。这些中年和老年人或聊天或开着玩笑，一边啜着鸡尾酒，一边等待头道菜上桌。美味佳肴尚未入口，一群便衣警察却突然涌进来逮捕了所有人，就餐者全是黑手党老板及其高层官员。

这次逮捕是萨勒诺的警方情报小组对吉诺维斯的高级顾问迈克·米兰达（Mike Miranda）进行例行跟踪的结果。他们尾随米兰达来到拉斯特拉饭店，就在他们布哨监视的时候，眼尖的警察惊奇地发现美国黑手党的顶级人物分别走进了那家餐馆。震惊的警察们立即报告他们的主管，称碰巧遇到重要情况并请求支援。增援人员一赶到，便衣警察就冲进了饭店。店内没有一个黑手党人，他们发现楼梯后，警察迅速下到楼下一个隐蔽的餐厅。那帮人正坐在那里准备进午餐。“不许动！”一名探员命令道，“坐着别动！”便衣警察们随即登记那群懊恼不已的就餐者的姓名。这些人包括卡洛·甘比诺及其二老板安尼洛·德拉科罗塞（Aniello Dellacroce）、乔·科洛博、维托·吉诺维斯家族的代理老板汤米·埃波利（Tommy Eboli）、新奥尔良的卡洛斯·马塞洛、佛罗里达的桑托·狄拉菲肯特、各个首脑的高级亲信和显而易见的东道主迈克·米兰达。

一时不知该对这十几个黑手党人提起什么指控，有个主管探员想出了一个老套的罪名：结交知名罪犯——彼此都是。没来得及吃上午饭，这13个手铐上手的俘虏就被拉到警局作笔录，并被迫像所有嫌犯一样颜面无存地脱得只剩下内裤接受搜身检查。和普通盗贼和抢劫犯没有两样，他们也接受了指纹采集并被照相以便警方存档

备案。

当昆斯区地方检察官奈特·亨特尔（Nat Hentel）得知捕到了“大鱼”时，他立即冲到了警察局。身为共和党人的亨特尔被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任命为临时地方检察官，但在纽约一个民主党人占大多数的区里，他作为候选人要竞选满期检察官就明显处于下风。在他的管区里抓到大量黑手党名人是个意想不到的宣传资本。亨特尔迅速撤销了“结交罪犯”的指控，他以调查昆斯区有组织犯罪之名召集一个大陪审团，并认为将这13个人作为材料证人更为高明。“结交罪犯”的指控含糊不清，法官们当时正倾向于判定其违宪而予以驳回。

亨特尔对于其宣传价值的看法是正确的。这次逮捕行动在纽约和其他地区都算是重大新闻。黑手党俘虏的脸部照片醒目地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上，这次聚会也被媒体冠以“小阿帕拉沁”之名。亨特尔卖力地炒作这起事件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这位检察官受到电视、广播和报纸的高度关注，他——在没有一点点根据的前提下——发布了耸人听闻的声明称，这些黑帮头子聚会的目的是就黑手党在全国的发展前景进行规划。他夸张地宣称那顿未结束的午宴是一次历史性聚会，比9年前的阿帕拉沁会议更为重要。

南方老板卡洛斯·马塞洛和桑托·狄拉菲肯特表明了自己对那位地方检察官和逮捕他们的警察的蔑视，在袭击行动发生一周后，他们在保镖和律师的陪同下回到了拉斯特拉饭店的那张桌子旁。这次他们邀请了媒体并摆出造型拍照，时而举杯敬酒，时而大声啸叫喝彩。“他们现在干吗不逮捕我们啊？”马塞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轻蔑地问道。教父们随后叫了一桌和上次一模一样的酒菜：菊苣苜蓿肉汤、白蛤卤汁扁面条、烤蛤和几瓶白酒，还有最后端上来的水果和浓咖啡。

被传唤到大陪审团跟前时，“小阿帕拉沁”事件的13名当事人全部行使了《第五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亨特尔的调查陷入了尴尬境地，它未能带来任何指控或有用的情报。让亨特尔感到不幸的是，对逮捕行动的大肆宣传无助于提高他的当选机会，他被压倒性地击败了。对黑手党大亨们来说，这次逮捕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麻烦。而对于执法官员而言，餐馆袭击行动既暴露了他们在对付黑手党问题上的无能，也暴露了他们贪图功名的强烈欲望。

狄拉菲肯特告诉其律师弗兰克·拉加诺，那次午餐聚会是为了解决马塞洛的一项投诉，马塞洛声称纽约黑手党人未经允许侵入了他的新奥尔良地盘。纽约探员们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拉斯特拉餐馆聚会是几个家族在全国黑手党老板例会之后举行的一次“补充性会议”。当年，黑手党例会就在纽约地区举行，既没有遇到障

碍，也没有被侦查到。另一些探员推测，这群人齐聚拉斯特拉餐馆的主要目的与在路易斯安那州扩大马塞洛家族的规模有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聚会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安排得了不治之症的“三指布朗”汤米·卢切斯，并讨论由谁来接替他的职位。

比起“阿帕拉沁”事件来，“小阿帕拉沁”事件是个更大的谜团，也是另一个执法机关对黑手党的行动计划和动机毫无察觉的突出案例。

患有脑部肿瘤的卢切斯于几个月后死去，时年 67 岁。他的葬礼为黑白两道所共知。尽管地方探员和联邦特工在现场公开操着照相机，但仍有数百名黑手党人和法官、政客及商人前来参加。黑手党人既表达了他们对那个杰出偶像的崇敬之情，同时也表露出他们对那些无能的法官官员们的藐视。更为尴尬的是，由于对那个罪犯头子心怀感激并想与其继位者保持良好关系，一些地位显赫的“平民”也出现在现场。

卢切斯死去两年之后，即在 1969 年的情人节那天，因毒品走私被监禁却仍保留老板头衔的维托·吉诺维斯在监狱医院死于心脏病发作，时年 76 岁。博南诺被迫退位和卢切斯与吉诺维斯之死迅速将卡洛·甘比诺推上了黑手党权力的巅峰。他成了管理委员会至高无上的人物，同时也统治着黑手党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家族。虽然黑手党从未承认有“老板中的老板”这一等级，但甘比诺实际上已经取得了类似的权力。

在纽约那些未受挑战的犯罪家族看来，成功似乎没有边际，随着又一个 10 年的行将过去，源源不断的崇拜者竞相加入那个比美国钢铁公司还要大的组织，成了“聪明汉”。当时，警方高层很少有人了解和关注黑手党的危害，但助理副局长雷蒙德·马丁（Raymond V. Martin）是个例外，对于黑手党在布鲁克林和纽约其他地区意裔美国人社区里具有的迷人魅力，他给出了坦率而尖锐的评判。

“在巴斯比彻那么多的街头上，在本森赫斯特那么多的餐馆和糖果店里，孩子们见到的都是黑手党赌注经纪人在活动。他们遇到的是年轻的恶棍，是黑手党的执法者。他们听到的是人们口口相传的光荣故事——谁抢到了什么，谁痛打了谁，哪个歌女上了哪个黑手党人的床，谁被谁杀了，是敲诈勒索的伎俩，是一切多么容易，是钱财如何滚滚而来。如果孩子们渴望进入这罪恶的活动当中，而且其心情就像大一新生热望被学校里最温和可亲的兄弟会所接纳一样，那么这一切都不值得大惊小怪。要是有些运气和勇气的话，他们觉得，甚至他们某天也会属于那个风光无限且生活阔绰的帮派——黑手党。”

第 17 章 RICO 的诞生

“我是绘图员而麦克莱伦是建筑师，”布莱克回忆说，“没有他的谋略、政治悟性和热诚，这绝不可能成为现实。”

被问到他的种族关系时，无论是作为孩子还是作为成年人，乔治·罗伯特·布莱克（George Robert Blakey）始终只有一种回答：“我是个美国人。”

这种回答并不是基于空洞的爱国主义。在其个性形成时期，布莱克的祖籍问题从来没有被他的父母和亲戚提起过。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伯灵顿出生并长大，当时的南方正处于冥顽不化的《吉姆·克劳法》（种族隔离法）和暴虐的黑人种族隔离政策当道的时代。在伯灵顿，这个北卡罗来纳州北部一个拥有约两万人口的纺织工业城镇，家庭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是乡村俱乐部的绅士还是极度穷困的工厂工人。对于生活在皮德蒙特地区的人们来说，他们从来不使用归化性的词语来称自己为爱尔兰裔美国人、德裔美国人或波兰裔美国人。即使有意裔或西西里裔美国人生活在伯灵顿，可喜欢别人称自己为鲍勃的小布莱克也从来没有碰见过。至于黑手党——那个将决定布莱克职业生涯的事物——则是个听起来非常陌生的词语，在他成年之前完全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布莱克的父亲是个德克萨斯人，做过银行的稽核员，后来成了伯灵顿第一国民银行的行长。有着英国血统的布莱克兄弟是坚定的浸信会教徒，在美国内战中为联邦而战。鲍勃·布莱克的母亲是爱尔兰人的后裔，是她将他抚养成了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的父亲 1945 年死于心脏病发作，当时布莱克 9 岁，但精明而有远虑的父亲给他、他的长兄，还有其母亲留下了相当舒适的经济条件。布莱克到北方求学接受了高等教育，并以优异的成绩从印地安那州南本德市圣母玛利亚大学（Notre Dam University）毕业。他主修哲学，打算当一个教师过着平静而体面的生活，可当得知哲学教

授在高等教育界只能取得微薄的收入时，他就改变了主意。由于希望拥有一个大家庭（他将来会要 8 个孩子），布莱克就改修了圣母玛利亚大学法学院的法律专业，把它看成是取得不错的收入和赢得学术成就的最好途径。那些年里，为了自食其力，他曾利用暑假当过面包厂卡车司机，而这段工作经历激起了他对劳动法的兴趣。通过与面包厂强硬的工会卡车司机并肩工作，他取得了一些课堂之外的实践经验。布莱克发现，那些蓝领工人对通过与好斗的工会签约获得的经济收入感到满意，但与此同时，他们对改革工会缺乏民主的组织结构感到无奈，只能眼看着它限制他们选举国家和地区领导人的权利。

布莱克将劳资集体谈判和工会法令的细微差别作为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并于 1960 年以班级排名第二的成绩毕业。布莱克没有如原计划的那样专注于劳动法，而是被选入一个国家荣誉项目之中，成了司法部驻华盛顿的一个年薪 6500 美元的专职律师，并被分配到有组织犯罪与敲诈勒索处工作。

布莱克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任期结束时进入司法部，第一年是阅读备忘录和写些官样文章。那时候，司法部认同胡佛的观点，认为大城市里的意裔美国人帮派是些无关紧要的、组织松散的罪犯团伙。当偶尔有线人或证人试图主动向司法部检察官举报黑手党时，他都会因受到劝阻而泄气。“如果有人开始谈论黑手党或提到那个名字，他就会被提醒闭嘴，”布莱克发现，“黑手党与案件无关，我们只想听到特定的罪行受到调查。”

1961 年，当罗伯特·肯尼迪任司法部长时，那些状态与禁忌得到显著改观，一场打击黑手党和劳工诈骗的运动被注入了活力。在法学院，布莱克只修过一门刑法课程，但他具有扎实的基础将劳工法令运用到工会腐败案当中。随着工作任务的增加，他很快开始从头啃起那复杂的刑事检控知识。通过 FBI 突然向司法部有组织犯罪处提供的潮水般的电子窃听信息，他开始对黑手党那惊人的渗透力有了初步认识。这些情报是特工转给布莱克和其他律师检察官的，但特工们隐瞒了通过非法窃听器获取证据的事实。

“面对这突然奔涌而来的关于人会仪式、血誓和‘乌默它’的信息，我顿感措手不及，”谈到重新认识的黑手党时，他这样说道，“我不敢相信，我丝毫没想到。”

1964 年，罗伯特·肯尼迪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导致了布莱克的离去。在肯尼迪的激励下，三年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空前的打击黑手党以及他们对重要工会进行渗透的战役之中。但现在布莱克清楚地知道，原来那些敷衍塞责的想法再次感染了司法部，新的行政官员不再把黑手党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我在那里和肯尼迪一起经历过激情

澎湃的高潮，如今水落潮退，我就不想留在那里了。”布莱克告诉朋友说。

回到圣母玛利亚大学后，他在那里做过两年的副教授。在讲授法律课程之余，他总不由自主地忆起在司法部里的那段令人豪情涌动的时光。在法学院，他开了一门被他学生不逊地称为“扫黑课”的有组织犯罪普及课程。反省过去，他对罗伯特·肯尼迪之策略的持久成效感到怀疑。“我们是一群生气勃勃且努力工作的人，但我们并没有多少冲击力。”他悲观地评判自己。即使是罗伯特·肯尼迪打黑运动的完美之作——将吉米·霍发定罪——也未能清除黑手党对卡车司机协会的控制和腐蚀。霍发被监禁只不过为该协会那些同样堕落的官员取代他从事不法交易打开了机遇之门。“将霍发定罪，”布莱克反思道，“能让那工会有些什么不同呢？一点都没有。”

1964年，届满总统林·登约翰逊压倒性地战胜了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这间接地让黑手党重新进入了布莱克的生活。在选举当中，戈德华特触及到一个敏感区，该区参议员指责约翰逊和民主党对犯罪心慈手软。选举之后，暴力重罪率迅速飙升而抓捕行动却在减少，这支持了共和党人的说法并威胁到民主党将来的全国性选举。为了挫败大佬党（共和党的别称）对其犯罪遏制政策的破坏性攻击，还有可能是为了转移对越来越受质疑的越南战争的关注，约翰逊做了大多数政治家都会做的事情来扑灭政治火灾：他成立了一个研究团体。该团体被命名为“总统执法与司法管理委员会”，由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特兹恩巴奇（Nicholas de B. Katzenbach）领导，其既定目标是研究出新的犯罪预防对策。

1966年，9个特别工作组得以成立以寻找应对之策，布莱克被其中的有组织犯罪分析小组聘为顾问。和其他委员会成员一起，经过两年的研究和勤奋思考，布莱克终于找到一个对付黑手党的立法与执法构想。这种构想不是他灵光闪现的顿悟，而是他与另外两名顾问，即社会学家唐纳德·克雷西（Donald R. Cressey）和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一起经过长期的共同研究与分析之后取得的成果。

克雷西帮助他熟悉了每个黑手党家族的组织构成——自1931年洛克·卢西亚诺改革以来一直沿用的结构布局。那种结构层层保护了黑手党领导集团免受被捕威胁，实际上是通过稳定的分级接替来保证每个犯罪家族的长期存在。布莱克发现黑手党成员的血缘和文化联系提高了他们的团结性和忠诚度，将犯罪联盟变成了真正的持久存在的家族。这些是黑手党有别于以往被内部纷争和执法行动所摧毁的犹太和爱尔兰种族帮派的规定性因素。黑手党的这些独一无二的特性能让它经受住警方传统方式的渗透与破坏。

通过谢林的研究，布莱克对有别于其他犯罪组织的各种掠夺与利润体系的黑手党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布莱克相信，黑手党家族比得上管理良好的产业集团。“它们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镜像。它们在模仿它。”估计黑手党的收益比美国钢铁公司还多的梅耶·兰斯基一定会认同他的看法。

像他那个时代所有的律师一样，布莱克接受的训练主要是针对特定而非大规模的有组织行为或犯罪的个案诉讼业务。“它让我大开眼界，”提到克雷西和谢林对黑手党的组织与经济基础的分析时，布莱克说道，“我开始看到自己前所未见的东西。”

布莱克不再将主要精力投入对个别黑帮分子和某个犯罪行为的检控上，而开始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视角来构思起草一部法律或系列法令，以便以群体定罪的方式摧毁整个组织——黑手党的某个犯罪家族。在其构想成形之前，卡特兹恩巴奇委员会于1967年解散了，该委员会曾提出一系列建议和立法提案以解决美国犯罪灾难。特别工作组的有组织犯罪专家们充分认识到黑手党的威胁，建议投入更多的联邦预算和人力来铲除大城市的黑手党人。他们还支持布莱克最得意的提议：让电子窃听合法化，使之成为合法地调查黑手党人的一种基本工具。

布莱克自认为是个正统的民主党人，但在1968年，他成了赢得当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的犯罪问题顾问。布莱克认为，共和党政府将会比民主党人更严厉地打击犯罪，并且更容易采纳他与黑手党有关的创新观点。为了有机会与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共事并将自己打击黑手党的基本理念写进法律，他谢绝了司法部的高级职位。在阿帕拉沁袭击行动之后的10年里，阿肯色州的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麦克莱伦一直是国会最执着的要求以更严厉的法律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劳工诈骗的倡导者。

在为卡特兹恩巴奇委员会工作之后，1968年布莱克帮助麦克莱伦起草了一部开创性的被称为《第三章》(Title III)的电话与窃听器窃听法律。该法令对电子窃听活动首次给予了国会授权。以往依据模棱两可的法律条文和法庭裁决，联邦特工可以截听但不能公开或使用通过窃听器取得的证据信息。由于这些限制，FBI和联邦麻醉品局特工的秘密电子侦听活动有可能是违宪和非法的。禁止电话和窃听器窃听无疑制约了联邦政府对包括黑手党罪行在内的许多犯罪活动的调查。

根据《第三章》，即经约翰逊总统签署颁行的《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法》的一个章节，联邦和州检察官可以在严格遵守规定的情况下取得法庭的批准来进行电话窃听和设置窃听装置。要安装窃听器，检察官和特工们首先必须出示犯罪已经发生或正在策划的合理根据，或充足的事实来取得法官的授权。法官需进一步被说服，相信电子监视绝对必要而其他调查手段都不可能成功或过于危险。另外，截听谈话的司法命令在30天后终止，除非检察官们能够出示依靠首次授权取得的罪证，并证明继续

监听对正在进行的调查至关重要。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批判《第三章》违反了《权利和自由法案》，称它是政府警察权极端专制膨胀的产物。身为 ACLU 成员，布莱克认为该组织顽固的立场是不合理的。他争辩说，立法并未侵犯守法民众的公民自由权，而是一种迟迟未用的对付有组织犯罪的武器。“我们的目的是将非法的电话窃听装置和窃听器带出后街里弄，让法庭决定是否合法且充足的理由实施监听。我们对政府施加了严格的限制，而这就是对公民自由的肯定。”

支持电子监听的布莱克强调了另一个有力的观点：由于告密者可能为获得减刑而撒谎，通过窃听器或电话窃听装置从原告自己口中取得的证据要比这些人的证词可靠得多。

1968 年，当参议院刑法与刑事诉讼附属委员会主席任命布莱克为该委员会首席顾问时，32 岁的他正殚精竭虑地充当着打击黑手党的立法先锋。先前，在作为麦克莱伦的顾问协助起草《第三章》时，布莱克就力劝那位参议员倡议通过更多的反黑手党法令。由于国会这一年正在为《综合犯罪控制法》和电子监听争议案较劲，麦克莱伦觉得时机不利于讨论和通过更多的反黑手党法律。“有聊胜于无。”在取得《第三章》的胜利之后，他说道。

当他们开始将布莱克的提议变成立法草案时，年长布莱克四十多岁的约翰·麦克莱伦已经 73 岁。在自 50 年代中期以来的 15 年中，麦克莱伦直接面对黑手党人，主持了大量的调查工会腐败案、不法产业和其他黑手党犯罪的工作。在听证会上，这位参议员通常面无表情，但在内心，他对那些公开挑衅政府并认为自己就是法律的不肯合作且厚颜无耻的黑手党人充满了愤恨。作为坚定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麦克莱伦有着《旧约》中提及的所谓的正直感，经常被人说成是仁慈而体贴的人，而不是事实上有着强烈是非感和推崇惩恶除奸的人。

在组织起草首个递交给国会的专门反黑手党的法律提案时，麦克莱伦向其他立法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称它的通过纯粹是道德上的需要。预料到在扩大政府调查权上会有一场激烈的公民自由权论战，麦克莱伦已准备好为之辩驳：“民众在吁请我们认同社会的安全权高于罪犯的自由权。当正义与和平的力量遭遇邪恶与暴力的力量时，有些东西就不得不放弃。”

麦克莱伦是个机敏的立法者，他将那直指黑手党的议案藏进一部较大且广受支持的反犯罪法案当中，使之成为它的一个法条或章节。这种策略是要增加这部有组织犯罪法令的存活机会，因为它要经受参众两院的修改与政治妥协的考验。这部法规的全

名为《1970年有组织犯罪控制法》，对于麦克莱伦和布莱克来说，这部法律的精华，他们行动策略的核心，是《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RICO）这一章节的各项条款，该法简称为RICO，这别扭的名字隐含着故意成分。布莱克拒绝解释使用RICO这个缩略语的理由。但他是个犯罪电影迷，他承认自己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1931年大致还原阿尔·卡彭之生平的影片《小凯撒》（Little Caesar）。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扮演了片中主角——一个残忍的黑手党人，而其昵称，布莱克偶然发现，叫里科（Rico, RICO）。罗宾逊生动曲折地演绎了里科的兴衰沉浮，使这个角色成为影屏黑帮人物的一个典型形象。与警方枪战之后，垂死的小凯撒在一条巷子里吃力地道出好莱坞一句著名的绝命语——也是布莱克向黑手党发出的不言而喻的信息：“慈悲之母啊——里科命当该绝吗？”

在RICO法令被构思之前，黑手党大多数老板、二老板、顾问和角头们都受到了有效保护而免遭被捕。一旦处于统领之位，他们只是发号施令而绝不亲自犯罪。根据联邦和州既存的法律，事实上在法庭上不可能证明这些头目卷入了其下属的不法活动。违法犯罪的具体实施者是低级成员——打手、合伙人和崇拜者，并且在进行杀人抢劫、贩卖毒品、敲诈高利贷受害者、赌注经纪、绑架和其他犯罪活动时，他们也只是偶尔被抓。有着不可违犯的“乌默它”戒律，成功检控高级黑手党人的机率很小，这足以让人灰心丧气。

麦克莱伦和布莱克希望打破这种定势并简化作业程序，以此来穿透黑手党统治者周围的保护墙。RICO的着力点集中于两个词：“模式”与“组织”。通过证明他们为了某个“组织”的利益而卷入了某种“模式”的犯罪活动，检察官们可以检控大批黑手党人并将其定罪。“模式”是指“组织”在一段较长时期内犯下的两项或多项特定的联邦或州犯罪。“组织”被广义地包括非法联盟（如黑手党家族或行动队）和腐败的工会与公司。

这样，拥有RICO赋予的权力，检察官们可以通过整体起诉来摧毁家族的领导层，而不是集中精力打击受较轻罪行指控而遭羁押的低级落单者。更为重要的是，RICO首次明确规定，如果证明与犯罪组织有牵连，那么家族老板就可以被定罪。老板或角头参与瓜分赃物或被窃听到策划组织活动的证据足以作为将其定罪的依据。任何谋划或批准与组织有牵连的犯罪者都与凶手同罪。

实际上，这部法律将黑手党的骨干精英们界定为罪犯并明确了处置程序。RICO规定，在所列的20项重罪当中，若触犯或作为同谋者触犯其中任何两项者，即使犯罪间隔期超过10年，都可以将身为敲诈勒索组织成员的被告定罪。其犯罪类型涵盖

了几乎每一种可能的非法侵害或阴谋：谋杀、绑架、毒品走私、抢劫、高利贷、赌博、贿赂、敲诈勒索、挪用工会基金、诈骗、纵火和伪造货币。

在检察官们看来，这部法律还有其他突破性的规定。通常，除了谋杀罪，嫌犯必须在触犯绝大多数联邦罪后 5 年内受到指控。RICO 将 5 年的最高法定时效几乎延长到无期，因为组织犯罪的计算时间是以最后一次而非第一次为起始时间。检察官的另一件法宝是可利用州法院以往的有罪判决作为联邦政府指控原告的部分罪状。这种武器适用的情形是，以往的罪行现在将依据联邦法律之“组织”与“敲诈模式”之规定接受惩罚，同时又避免了同一罪行受到两次判决的双重审理。RICO 的惩罚严苛，对老板和其他首领的量刑事实上高达 40 年，而且为组织而犯下谋杀罪者将处以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

为摧毁黑手党的经济基础，RICO 的长臂伸到了民事和反托拉斯领域。该法让政府能够查抄黑帮分子藏匿的赃物与财产，并没收他们通过犯罪而拥有的房产、地产和银行存款。简言之，目的是要剥夺有组织犯罪的收益。RICO 有一个旨在打破黑手党对工会控制与影响的创新举措，即含有政府提起民事诉讼反托拉斯的相关规定。无需刑事审判，司法部就可向联邦法院提出请求，将一个全国性工会或其地方分会置于联邦的监管之下并驱逐其领导人。要肃清受到敲诈勒索折磨的工会，政府须首先向法官证明这些工会或地方分会与有组织犯罪分子有牵连。

最后，作为打破“乌默它”准则的一种手段，麦克莱伦和布莱克率先设计了让合作证人免受起诉的证人保护项目。布莱克相信，面对 RICO 的长期监禁，黑手党人及其合伙人可以被转化成证人和线人。一旦黑手党的报复威胁解除或至少被削弱，潜在的背叛者们将更有可能改变立场，转而向检方提供帮助并为其作证。有了这一证人保护项目，通过保证他们及其家人的安全并帮助他们开创新的生活，政府可以鼓励变节者远离他们过去的生活环境。

为避免提案被斥为反劳工、反民权和滥用刑罚而遭遇强大阻力，麦克莱伦首先取得保守和温和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人的广泛支持。打动他们的一个卖点是，RICO 的主要目的是将黑手党从合法产业与工会当中赶出去。参议院通过包括 RICO 在内的整个法案相对容易一些。最大的障碍是众议院议员伊曼纽尔·塞勒（Emanuel Celler），此人是纽约市一位崇尚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是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他强力反对通过 RICO。塞勒希望利用会期的议会伎俩来削弱和阉割那部综合性法规的 RICO 部分。当众参两院通过了不同版本的法案时，两院代表就要举行“会议”碰头讨论，通过在同一语言和单一版本上取得一致来消除异议。

在将法案递交给参议院之前，精明的麦克莱伦先让塞勒提交众议院法案的修正案，而该法案所改动的有争议的部分与 RICO 并无关系。该法案其他部分的争议发挥了避雷针的作用，转移了塞勒想在其提交的众议院法案中大幅修改 RICO 的注意力。塞勒原指望他那与 RICO 无关的异议会迫使麦克莱伦吁请召开一次国会会议，从而让他有机会阻击 RICO 或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其进行实质性修改。但令他意外的是，麦克莱伦接受了众议院修正案。既然获得通过的参众两院的法案都完全相同，这里就没有必要召开塞勒所指望的会议了。他被这位阿肯色州的参议员欺骗了。

1970 年，整部《有组织犯罪控制法案》原封未动地获得通过。经过两年的公开听证会、灵活的磋商和精心的协调之后，RICO 未遭改动而成了美国的法律。

“我是绘图员而麦克莱伦是建筑师，”布莱克回忆说，“没有他的谋略、政治悟性和热诚，这绝不可能成为现实。”

虽然布莱克有了他的法律，但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受尽冷落的困窘之地。联邦执法机构没有人想运用 RICO。小心谨慎的检察官们都不愿意第一个尝试那部未经考验的法令，害怕它会被宣布违宪，从而使他们赢得的有罪判决被推翻。没有哪个检察官愿意试用 RICO 的刑事条款而放弃根据现有法律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的案件和几近定案的有罪判决。RICO 的民事部分同样不为检察官和 FBI 特工们所接受。“他们都是持枪歹徒，对他们进行民事起诉显得太娘娘腔了，”布莱克意识到，“他们希望参与逮捕行动，而不愿去发送传票。”像一个巡游四方且具足法喜的新教布道者一样，布莱克将 RICO 的承诺带给了 FBI 特工和官员，也带给了全国各地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们。但每到一地，其待遇都是一样：他被看成一个满脑子浆糊的大学教授，一个陌生的推销假万能药的华盛顿式的官僚。“我们通过了法案，以为它会得到运用，”布莱克抱怨道，“但当我解释如何合法地应用它时，他们看我就像看到疯子一样。”

他最感到失望的碰壁和最尴尬的挫折发生在久负盛名的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他以为至少能在那里取得支持，因为每个机警的检察官都知道纽约都市区长久以来都是黑手党的根据地。1972 年 11 月 1 日的上午，正当他满怀激情地宣传 RICO 的优点时，曼哈顿美国检察官惠特尼·诺斯·西摩（Whitney North Seymour Jr）站了起来。西摩出身纽约名门望族，是曼哈顿最高联邦执法官员。他不容分说地命令布莱克离开会议室。“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布莱克记得西摩贬斥他说，“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助手的时间。出去！”

多年后，西摩承认自己和他的许多老检察官都不相信 RICO 的价值和合宪性。“事

后证明，我们百分之百地错了，”他承认，“我想，这就是你在碰到新事物时所发生的事情。”但西摩坚持说，尽管不同意那位法学教授的看法，但他还是客气地接待了他。

对于那些苦涩的经历，布莱克将其部分归咎于 RICO 并非司法部滴出的事实。“谈到执法创新时，纽约和司法部其他部门的人都自认为是最好和最聪明的，比外人更优秀。他们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无所不知。”

仍在担任麦克莱伦附属委员会首席顾问的布莱克更为沮丧地发现，检察官和 FBI 都未有效利用《第三章》，即那国会赋予他们的新的电子监听权力。搁置了 60 年代中期存在法律麻烦的窃听计划之后，FBI 在 70 年代初取得了司法授权并重新使用了电话窃听装置和窃听器，但其适用范围有限，主要限于需时甚短的赌博案件。赌注经纪人调查不费力气，却可成倍增加被捕者和无甚意义的定罪人数，但执法界任何有见地的人都知道，将低级赌客定罪无济于削弱黑手党的势力。

着迷于拘捕数字的 FBI 官员讨厌对黑手党人进行漫长的电子监听，因为这一手段代价高、费时长且无助于政绩的提高。窃听一根电话线或使用一个窃听器需要 6 名特工每天三班倒地工作一个月或者更多天，而且还不能保证会有结果。FBI 主管们选择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办法——他们鼓励特工们重点关注银行劫匪，而这有时候就像拙劣地模仿吉斯通式警察（20 世纪吉斯通电影公司在一系列老式幽默片中塑造的愚蠢、无能的警察形象，他们通常像无头苍蝇一样追赶逃犯）。在纽约和其他城市，FBI 特工会与地方警察抢着奔向银行抢劫现场以抢先确立自己案件管辖权，而这些案件通常都容易告破。在弗吉尼亚州 FBI 匡恩提科学院，布莱克向受训特工和主管们宣传过 RICO，称《第三章》是一种长久且极具穿透力的调查工具，而此言未引起听众的注意。“他们只想像警察那样破获孤立的罪案，却没想到要系统地摧毁黑手党家族。”

20 世纪 70 年代，FBI 在调查重点上保守退缩的思维模式激怒了许多联邦检察官，但无人愿意挑战这个广受民众尊重且可能报复于人的机构。1976 年 7 月，唯一的反对者出现了。此人是纽约的联邦高官戴维·G·特拉格（David G. Trager），他形容 FBI “患了动脉硬化症”，与联邦检察官的主要目标“不合拍”。特拉格是纽约州东区的美国检察官，其管辖区包括布鲁克林、昆斯、斯塔腾岛和长岛。尽管有组织犯罪并不是特拉格最关心的问题，但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响应了布莱克对 FBI 总体能力的批评。“他们（FBI）交给我们的案子大多数都无关紧要，”他告诉《纽约时报》说，“他们在琐屑之事上浪费资源，我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或人才去处理我们认为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官员腐败和白领犯罪。”

至于“科萨·诺斯特拉”，特拉格声称政府的工作乏善可陈。他指责了那些司法

部在各大城市组建的有组织犯罪特遣队，这一独立特勤部门旨在协调并充当检控黑手党的先锋。特拉格称，特遣队充斥着外行的检察官而且“暮气沉沉”，在打击黑手党方面毫无进展。

政府自己的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了那些早期特遣队的无能。70年代末，即在其存在了10年之后，特遣队的检察官们仍然未能指控任何一个高级黑手党人并使其获罪领刑。这些特遣队和FBI在调查谁呢？主要是那些无足轻重的赌客和高利贷者。即使在这些方面，他们的成果也非常可怜。国会的一份研究材料发现，52%的有罪判决都没有让谁进入监牢，而在那些被判刑者——绝大多数都是些不入流的打手和合伙人——当中，有60%的人领刑不到两年。

对这些新的自称其既定目标和工作重点是检控黑手党的特遣队，布莱克对它们的绝大多数负责人也持有类似的负面看法。他劝告、恳求甚至哄骗特遣队的检察官将RICO作为他们的主要武器使用，但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地消极。“听起来不错，”检察官们会说，“但我不想因为尝试新玩意儿而搞砸了本来满有把握的案子。”

作为东区的美国检察官，特拉格的管区是司法部最大的管辖区之一，里面充斥着大量的黑手党人。然而他也不愿通过试用RICO来行使检察权打击黑手党人。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并不随俗的检察官，特拉格还是竭力通过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纽约时报》对FBI过时的反犯罪和反黑手党策略提出了警告。像布莱克的一样，特拉格的告诫完全没有引起司法部和FBI决策者们的注意。

1970年10月15日，在鲍勃·布莱克开始踏上宣传RICO的挫折之旅之前，他经历了一段无限自豪的时刻。那天，尼克松总统签署《有组织犯罪控制法案》，RICO成为法律，而当时他就在白宫里。几年后，布莱克发现了那次签字生效的超现实主义后果。该法案有个不引人注意的条款扩大了国会给予在参众两院议员听证会上作证的证人免受检控的范围和类型。正由于那个未引起争议的不起眼的条款，尼克松总统的前顾问约翰·迪安三世（John W. Dean III）才同意于1973年在一个调查总统的参议院委员会上作证。迪安揭发称，尼克松对掩盖白宫卷入1972年民主党华盛顿水门大厦总部遭入侵事件的企图心知肚明。迪安后来因为参与包庇而被宣判犯有阻碍司法罪。但他向参议院委员会所做的证词有助于迫使尼克松1974年选择辞去总统职位，而不是面对国会就水门丑闻对他进行的弹劾。

RICO首次胜利的讽刺性后果并未影响布莱克的信心。“签署法案后，尼克松将它交给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并说道，‘拿走权杖吧，’”布莱克回忆道，“而被该法案打倒的最顶级的要人偏偏是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翰·米切尔。”

第 18 章 团结日

在巨大、嘈杂的喧嚣和震颤的军乐声中，目击者们听到三响爆竹似的沉闷声音。

1971年6月28日，星期一，这一天是约瑟夫·安东尼·科洛博的好日子。乔·科洛博的情绪亢奋不已，而且天公作美，这晴朗且凉爽的天气特别适合他的活动安排——意裔美国人在纽约市中心举行的一次大规模团结集会。当天下午舒适的温度肯定会让大批听众到场，而科洛博所意料的庆祝高潮——他的电视演讲也肯定会赢得雷鸣般的掌声与喝彩。

就在科洛博为他的重要日子做准备的时候，对黑手党强硬起来的法律 RICO 已经颁行了近一年却为执法部门所忽视。在科洛博看来，RICO 也同样微不足道，其缩略语对他来说和某个男人的绰号没有什么不同。黑手党大佬和他们那些殷勤的律师对这个备受冷落且得不到执行的法令也漠不关心。和乔·博南诺一样，纽约老板及其副手知道他们活动在一个反复无常的火山口上，威胁他们生命的最大危险来自内部那心怀嫉妒、深藏仇恨的对手，而不是 FBI 或警方的外部打击。

没有哪个老板因为害怕被 RICO 咬住而蜷缩于巢穴之中。相反，在 1970 年，当 RICO 接受国会审议时，乔·博南诺正在组织一场全国性运动——一场并不周密的反攻——来保护黑手党。与避免在公共场合露面的黑手党人不一样，科洛博开始设法争取媒体的支持，声称他和其他无数意裔美国人因为种族背景而受到不实的诬蔑。48 岁的科洛博正处于事业空前成功的巅峰期并享有高知名度。他是纽约五大黑手党家族的教父之一，同时也是意裔美国人民权联盟的奠基人和领袖。他所领导的民权联盟是个受到公职人员、公司经理和演艺界名人支持的组织。

在掌管一个犯罪家族的同时又被拥戴为公民领袖和民权先锋，这是一种前所未闻

的胜利，乔·科洛博已经设法取得了这种成功。

临近正午时，已经有一万人涌进了通向中央公园的哥伦布转盘广场参加第二届意大利人团结日集会。在耸立于一根 2.4 米高圆柱上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巨型雕像的俯视下，科洛博在保镖的开道簇拥下步向主席台。微笑着挥着手，科洛博缓步从那祝他好运、争着要摸摸他或与他握手的敬慕者们中间走过，从那一簇簇红、白、绿三色（意大利旗帜的颜色）旗帜与飘带中间穿过。

在巨大、嘈杂的喧嚣和震颤的军乐声中，目击者们听到三响爆竹似的沉闷声音。那是一把老式 32 口径手枪的枪声。子弹击中了科洛博的头部和颈部，他骤然倒地，鲜血从口耳中涌将出来，科洛博瘫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黑社会霸主、国家名人和政治明星的梦想破碎了。

乔·科洛博对暴力并不陌生。他在黑手党“发祥地”之一的南布鲁克林长大，从小就认识了黑帮之正义的幽灵。16 岁时，因触犯了黑手党的某种戒律，他的荣誉者父亲托尼遭遇了迅速且残忍的死亡。父亲与女友的尸体被捆绑并勒杀在一辆汽车的后座上，这明显具有西西里式仇杀的特点。

二战时应征加入海岸警卫队的科洛博在军队服役三年，后来因患“神经官能症”而被提前除役。他的心腹朋友将那种疾病归结于他的表演才能，因为他后来再也没有表现出半点精神苦闷的迹象。在黑帮横行的布鲁克林码头做了一阵子码头装卸工后，他转行经营起了双骰儿赌博，后来则成了为乔·普罗旺斯帮派效力的职业杀手。黑手党知情者相信，科洛博所在的杀手队至少杀死了 15 名受害者，为普罗旺斯解决了最为棘手的麻烦。

加洛兄弟在 60 年代初反叛乔·普罗旺斯的战争是科洛博爬升的进阶石。在打击加洛兄弟叛乱的过程中，他始终与普罗旺斯站在一起对付起义的加洛兄弟，并在原老板死去之后对乔·马格利奥科那场失败的争夺家族领导权的行动给予了表面上的支持。作为一个为普罗旺斯-马格利奥科派别效力的杀手，科洛博出色的服务让他获得了提升并成为一支行动队的角头。但在纽约家族老板之间的权力斗争中，他改变了立场。他没有按照马格利奥科的命令行事，而是策划了一场出卖行动，警告卡洛·甘比诺，要他提防乔·博南诺欲借助马格利奥科之力谋杀他与汤米·卢切斯的阴谋。甘比诺挫败了博南诺取得了胜利，成了黑手党管理委员会的首脑人物。身为纽约最大家族的正步入暮年的首领，甘比诺对科洛博的诡诈有着深刻印象，就把他收罗为自己的一名被保护人。1964 年唐·甘比诺的无条件支持为科洛博爬上原普罗旺斯帮派的老板之位扫清了所有障碍。这个有着 200 名打手和 1000 多个合伙人的犯罪家族很快在黑手党

圈子里改名换姓，成了科洛博家族。

科洛博在年仅 41 岁时就成为一个在管理委员会拥有表决权的家族教父，这引起了黑手党前辈们的不满。有一次，在对“管子工萨姆”德卡瓦肯特（新泽西一个以其名命名的小家族的老板）的办公室进行电话窃听时，FBI 听到他向一个身份不明的来电者抱怨科洛博的平凡资历和甘比诺的判断力。“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个叛徒。”“管子工”萨姆评判科洛博说，并用黑手党俚语轻蔑地称他是个无足轻重的靠纸牌和掷骰子赌博谋生的人。“是的，他总是拿夏洛当靠山。”电话另一端那愤愤不平的声音回道。

老资格的老板们或许会嫉妒科洛博的迅速爬升，但他本人知道该如何扮演一个家族既定统治者的角色。为提升个人形象，他选用保守庄重的西服、色彩柔和领带和量身定做的衬衫搭配着自己那结实的身材，竭力表现得像个事业成功的商人。作为中产阶级体面人物的另一种象征，他开始打起了高尔夫，不再和毛头小伙子们一块玩撞球。科洛博的实际收入源源不断地从非法赌博、高利贷、抢劫和敲诈勒索行当里涌了出来，但为了表现得合法，他成了布鲁克林一家实际上是其犯罪家族合伙人所拥有的房地产公司的“销售员”。一夜之间，这个新投资资本家还投资了一家殡仪馆和一个鲜花店。那些都是黑手党人喜欢的“掩护”公司，通常由雇员来打理。那些来自“销售员”的工作与投资的可以向美国国税局证明其合法性的虚假收入让科洛博能够选择一种与其黑手党头衔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他让妻子和 5 个孩子搬进本森赫斯特意裔移民社区里一套错层的大房子里，而其住宅所在地相当于布鲁克林中产阶级的小意大利区。为了寻得更为雅致且具有田园旨趣的静居处，他在离市区 100 英里的哈得逊河畔买下了一处占地 5 英亩的庄园。

身为第二代美国人，比起唐·夏洛·甘比诺和其他移民老板那口音浓重并夹杂着语法错误的讲话来，科洛博的英语要流利许多。而且，科洛博不害怕与执法官员短兵相接并说出自己的想法。

1964 年，科洛博家族的一名打手被枪杀，时任纽约刑侦探长艾伯特·西德曼（Albert Seedman）要求科洛博主动到布鲁克林警察局说明情况。让西德曼意外的是，这个黑手党新老板没带律师就单枪匹马地露面了，并且满不在乎地斥责西德曼。“如果我是个犹太商人，你绝不会以谋杀之名把我叫来，”西德曼记得科洛博嘲弄他说，“但因为我的名字是意大利人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我是个老黑手党人，不是个像你这样的好人。”

科洛博没有提供任何与凶杀案有关的线索，他在离开之前又狠批了西德曼一通。“你斜靠着坐在那大桌子后面，心里想。‘这家伙坐在这里，对我讲着满嘴的谎言。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个想让自己看起来体面的微不足道的外国佬。’那么，你错了。我是个美国公民，头等的美国公民。我没有徽章将我弄得像你这样像模像样，但我为了生活在诚实地工作着。我是个房地产销售员，我得养家糊口。”

6年后，科洛博就有了更为大胆的举动。1970年4月，他的儿子小约瑟夫受到联邦指控，罪名是涉嫌将镍币熔掉作为银锭出售，涉案金额达到30万美元。与黑手党通常花高价钱雇请律师来赢得法庭无罪宣判的手法不同，科洛博在FBI曼哈顿办事处门外以举行示威和设置纠察线的方式作出了回应。参与示威的人主要是科洛博犯罪家族的成员、崇拜者和他们的亲属。他们分发传单，指责FBI反意大利人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意裔移民。

科洛博组织的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的抗议活动，与全国各地暴发的反越战骚乱，非裔移民、拉丁美洲人及女权主义者组织为追求民权与平等而进行的反抗运动相呼应。由于纽约是全国乃至国际媒体的中心，一个黑手党知名老板的新鲜事儿招来了电视、广播和报刊的大量报道，让科洛博迅速成了一个媒体名人。他开始频繁出现在新闻和访谈节目中，申述黑手党是被执法机关和媒体所捏造的“一种虚构的事物”，意裔移民——就像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人种一样——是FBI和警方偏见与暴行的受害者。这种被科洛博口齿流利地表达出来的论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些热心且地位显赫的意裔美国人的认同，并在意大利移民社区引起了共鸣。受反越战势力的煽动，民众对权力机构及政府部门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加，他们明显觉察到在违反和漠视许多组织的公民权方面，政府有着极为糟糕的记录。

得益于黑手党案件通常的发展结果，科洛博的儿子在银锭阴谋案中被宣判无罪。指控小约瑟夫的关键证人，一个名叫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alomone）的前崇拜者，在证人席上意外地改变了主意。他突然声称小科洛博对那起阴谋毫无所知，撤回了原来的控告证词。取得庭审胜利后，老科洛博加快了他个人的十字军东征运动。不到一年时间，他就组建了意裔美国人民权联盟并任负责人，该联盟据称拥有45000名交纳会费的会员，并在全国拥有52个支部。科洛博及其追随者对FBI、大部分执法机构及媒体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让成千上万的意裔移民相信他们的大家庭被不公正地诬蔑为黑手党。

“总统要把我们打倒，司法部长憎恶我们的勇气。”这是科洛博在午夜电视脱口秀节目上的煽动性讲话。在接受《哈泼斯杂志》一篇颇具思想性的文章采访时，科洛博

摆出一副受虐待的为其族群而辩护的样子问道，“在纽约难道只有意大利人才可能犯罪吗？”科洛博被捕13次，只有一次因为情节轻微的赌博轻罪而留下记录。逃过了重罪审判，他能够合情合理地声称，他被当局无根据地诬蔑成一个有组织犯罪者。“我并不是天生无过，”他咆哮道，“但我绝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人——我把地下室当成了刑讯室，我是个谋杀者，我是所有高利贷组织的头子，是所有赌注经纪人团伙的头子，我是个大老板并且在伦敦办有企业，在机场我每年要赚上七八百万美元的收入。他们在骗谁？他们要把民众骗到什么程度？”

科洛博极力鼓噪称，他的不幸表明守法的意裔移民经常遭受虐待。这种惑民策略很快取得了成功。几乎在一夜之间，该联盟——实际上是科洛博——成了一种得到政治人物们认可和尊重的选举武器。在1970年6月的第一届团结日集会上，他提出的活动主题是“把尊严、骄傲和认同交还给每个意裔美国人”。在哥伦布转盘广场，当科洛博和其他发言人高呼着那个口号退场时，估计有5万人在欢呼喝彩。注意到该联盟的迅速成长，选举官员们很快对其潜在的投票能量做出了反应。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和其他地位稍低的政客争相接受该联盟荣誉会员的称号。在集会现场，四位国会议员和一名纽约市副市长与科洛博一道站在主席台上，对该联盟制止歧视与诽谤意裔美国人的奋斗目标给予了肯定。受该联盟的游说力量所驱使，州长洛克菲勒和纳尔逊的总检察长约翰·米切尔正式禁止其管辖区的所有执法机构使用“黑手党”一词。

好莱坞也感受到了科洛博愤怒的刺痛。在派拉蒙电影公司首次拍摄它的《教父》电影之前，科洛博连续发表了一份带有恐吓意味的新闻公告。由于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的小说，该影片的蓝本，对意裔美国人有一种“虚假而诽谤性的”的记述，他警告制片商不得使用“黑手党”和“科萨·诺斯特拉”字眼和将意大利人描绘成邪恶的罪犯。为施加更大压力，科洛博说服十几个当选的官员出面警告电影制片厂，要求将意大利人扮演的角色比小说里更正面一些。意识到黑手党的工会暴徒们会破坏外景拍摄场地的摄制计划，派拉蒙电影公司对科洛博进行了安抚。在剧本当中，它用“家族”和“辛迪加”替代了“黑手党”和“科萨·诺斯特拉”，并且可能是为了追求真实性和取得乔·科洛博的善待，制片人还聘用这个黑手党老板的几名听差做临时演员。马龙·白兰度扮演了片中的教父，而演员詹姆士·卡安（James Caan）则扮演了教父的儿子索尼·卡利奥尼（Sonny Corleone）。卡安和科洛博手下的可怕的角色“蛇”卡迈恩·珀西科（Carmine “the Snake” Persico）一起愉快地度过了许多时光。卡安的电影表演吸引了观众热情洋溢的评论。

在经济方面，科洛博领导的不同寻常的联盟似乎正在迈向成功。喜欢结交黑手党

人的弗兰克·西纳特拉作为主打歌星曾在麦迪逊广场公园的一次活动中为这个组织募集了50万美元，在长岛举办的一次慈善晚宴也筹到了10万美元。但科洛博凭借该联盟取得的惊人成就开始引起黑手党同伙并不友善的关注。对一些黑手党人来说，这种不满既是出于内心的嫉妒，也是由那无所不在的贪欲激起来的。他们相信该联盟募集的大部分资金和会费都转入科洛博的私人金库，而他们因无法插足这个新的行当而感到恼火。拥有无限权威的唐·卡洛·甘比诺有种不同寻常的担忧：该联盟的成功、科洛博的猛烈抨击与设置纠察线正在激怒昏昏欲睡的FBI和警察部门。在第二届团结日集会前不久，科洛博又向FBI喷出了更多恶毒之语。他指责FBI别有用心地鼓励使用“黑手党”和“科萨·诺斯特拉”字眼，意在为其理由并不充分的调查寻找借口。“当他们不能破案时，他们就将矛头指向这个他们还未渗透进去的秘密组织，”他嘲弄地说，“你不能破案所以你就怪别人，你就虚构些事物出来。”

科洛博那喋喋不休的抨击变得轻率起来，这也正招来那种可能惹火上身的注意，卡洛·甘比诺对密友们如是说。他担心，最终结果会刺激调查人员对所有家族进行打击。在1970年的首届团结日集会上，甘比诺显然在背后支持其被保护人，他传信要求纽约码头所有工人当天放假去参加集会。在第二届集会临近之际，甘比诺发出了指示：让船货动起来，不要闲在码头上。此外，卢切斯家族的角头兼甘比诺的盟友保罗·瓦里奥（Paul Vario）突然辞去了联盟理事的职务，明确表明卢切斯家族已不再给予支持。唐·卡洛不满的最终信号也出现了，当时他的人将1971年团结日集会的布告和宣传画从本森赫斯特及其他南布鲁克林社区的店铺前清除了。他在发出一种坦率的指责信息，即科洛博的自我重要感过于膨胀，他的鲁莽大胆正在威胁其他家族。没有甘比诺的支持，参加第二届集会的人数估计由上一年的5万人降到了1万人。

谁射击了乔·科洛博其实并无悬念。尽管有一圈黑手党保镖和许多着制服或便衣的警官保护，但杀手还是单枪匹马穿过了哥伦布转盘广场的防护网。就在科洛博瘫倒之际，大批警察和保镖向四五米开外的枪手猛扑过去，并像对待橄榄球赛中被围的四分卫一样堆压在他的身上。当人体小山层层剥离之后，那名24岁的黑人枪手杰罗姆·约翰逊（Jerome A. Johnson）已经躺在地上死去了。他受到三次致命枪击，估计是科洛博的一个未能保护好老板的打手所为。倍感窘迫的警方高层派出一支特别侦探小组，想要查明约翰逊是何等人物和谁是这起暗杀阴谋的幕后指使者。

从一开始，侦探们就有一个倾向性的看法，即约翰逊是个“替罪羊”，是个被科洛博的“科萨·诺斯特拉”敌人所利用的刺杀工具。刺杀案发生4个小时后，一个自

称“黑色革命攻击队”（BRAT）发言人的人向美联社打去电话，称科洛博被枪击是报复白权主义组织对非裔移民犯下的暴行。探员们不久就确认那是个凭空捏造出来的组织。他们不相信一个真正的地下黑人组织会从除掉一个黑手党首领中看到任何政治目的。调查没有发现杰罗姆·约翰逊与任何极端的黑人政治激进主义分子之间有联系。实际上，约翰逊主要和白人混在一起，探员们没有发现他有任何一个关系亲密的黑人朋友。探员们推测，伪称 BRAT 可能是个障眼法，目的是把他们引向错误的调查方向。

调查人员通过零碎的信息复原了杰罗姆·约翰逊的本来面目，发现他是个无足轻重的骗子、伪造支票者、夜贼和晃荡在大学校园附近企图勾引女生的好色之徒。不知何故，从无新闻摄影从业经历的约翰逊居然骗取了新闻采访证，故而能以该联盟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市支部派出人员的身份前来报道哥伦布转盘广场的集会活动。肩上挎着高档的价值 1200 美元的宝力牌照相机，身边有一个同样挂着采访证的面容清秀、体态优美的黑人女子相伴，约翰逊朝科洛博挤了过去。当他们接近科洛博的时候，侦探们推测，那名女子将手枪递给了约翰逊。那是一把难以查清来源的一战时期产于德国的 32 口径“门它”自动手枪。时机到来，那名女子挤到了科洛博身边并喊道，“嗨，乔！”科洛博停下脚步，转身透过他那角质架眼镜朝那名女子看过去。他笑了，向她回了一声“嗨，年轻人。”约翰逊的下手机会到了。他在近乎平射的距离连开了 3 枪，随即被一群保镖和警察扑倒在地。在混乱之中，科洛博的保镖将 3 发 38 口径的子弹射进了他的后背，那把同样无法查清来源的武器在刺客尸体旁被找到。

约翰逊的女同伙在狂乱的人群中迅速逃走。尽管进行了几个月的密集搜寻并排查了几十条线索，但侦探们最终未能确认那神秘女子身份或查出其住址。仔细查看相关线索和情报报告后，时任刑侦探长的艾伯特·西德曼认为约翰逊是个上当受骗的家伙，“他的脑子在外层空间的某个地方。”约翰逊那灰暗的犯罪记录让纽约市经验最精明的探员们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他受到诱骗才枪击科洛博，而诱惑他的可能是大笔金钱和那假意承诺的一条逃生线路。没有外界精心策划的引导，要筹划并实施那种任务，他就显得太过于愚蠢和妄动了。西德曼的调查人员推断说，那些知道如何取得采访证和如何判定科洛博何时最易受到攻击的阴谋家必定对约翰逊进行过精心的预先排练。西德曼与其探员们得出结论称，阴谋的策划者最有可能是极具动机的黑手党人。尽管缺乏明确的依据，但西德曼坚信间接与逻辑证据所指的只有一个方向：约翰逊那自杀式攻击背后的主谋是“狂人乔伊”约瑟夫·加洛。

第 19 章 狂人与利诺

“你跟卡洛有的东西，你留着。你想要更多的东西，我们谈。”

“狂人乔伊”加洛的黑社会绰号名副其实。作为一个年轻的新党徒，他是典型的替黑手党干些寻常跑腿活儿的掠夺性暴徒，由于没有从事复杂诈骗活动的头脑，其专长就是靠恐怖手段敲诈受害者。和其兄弟艾伯特和拉里一道，他以执法打手和杀手的身份开始了其职业生涯，乔·普罗旺斯家族掌管布鲁克林地区赌博与高利贷生意的角头是他们效力的对象。以乔伊为头领，这几个弟兄将老巢设在总统大街毗邻红勾区码头的一处大楼里。红勾区原本是个蓝领聚居地，后经房地产开发商的升级改造，变成了听起来更加悦耳而租金也更高的“卡洛尔花园”。

当黑手党的小道消息证实加洛就是 1957 年在理发店处死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的带队杀手时，他即刻声名鹊起。在 20 世纪 40 年代，演员乔治·拉夫特曾扮演过一个彬彬有礼且温柔谦和的黑帮人物。为了模仿这一银幕形象，加洛喜欢穿着黑色套装和黑色衬衫，并打上白色或浅颜色的领带。为了以非凡的胆量震慑敌人和手下，他曾在其总统大街的巢穴里养过一只加了链锁的宠物狮子。

在忠诚地为普罗旺斯效力了 10 年之后，野心勃勃的加洛兄弟开始意识到，这位并不领情的老板在榨取他们的劫掠品的同时，却拒绝将家族的一些赌博与高利贷专营权交给他们。公开反叛是他们的解决之道。1961 年 2 月的一天，加洛兄弟绑架了普罗旺斯的妹夫（家族的二老板）乔·马格利奥科和其他四名角头。他们的释放条件取得家族数百万美元收入中的更大份额。普罗旺斯以温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答应会更大方一些。这种让步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俘虏们被释放，普罗旺斯就收拢力量准备动手，先是诱开加洛的几名支持者，随后就开始征剿加洛的人马。这场叛乱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年多，被杀的 12 名受害者大多数都是“狂人乔伊”手下武器更精良的行动

队成员。1961年，就在拉里·加洛刚刚逃过劫杀的那天，加洛的行动队接到凶讯，他们最能干的杀手“乔·杰利”约瑟夫·乔伊诺正“和鱼睡在一起”。在加洛兄弟经常就餐的那个饭店门前，衣服里塞满了鱼的乔伊诺被人从汽车里扔了出来。

冲突逐渐白热化，加洛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但他仍不得不捞钱笼络手下和喂养他的狮子。其中一着棋就是扩大他曾经实施过的一个赤裸裸的敲诈计划。在与普罗旺斯摊牌之前，加洛注册了一个子虚乌有的酒吧侍者工会，然后利用它来敲诈布鲁克林的酒馆老板。为逃避暴力和恶意破坏，受害者不得不每周为每名雇员支付30美元的会费，而这些雇员完全不知道他们是加洛那个假工会组织的成员。为寻找更多唾手可得的勒索金，加洛的行动队将触角伸到了曼哈顿。他们在那里运用相同的恐怖手法暗示小酒吧的经营者，如果不为侍者交纳“会费”，他们很可能会碰上“不幸的事故”，他们的酒店也可能遭受破坏。有个胆大的店主不甘任人宰割，通过与侦探们合作，他在小意大利的卢纳斯饭店与加洛见面并秘密录下了罪证之言。这个证据1962年让“狂人乔伊”被判犯有敲诈勒索罪，并领受了最高10年的监禁刑期。随着他的出局和同年普罗旺斯的自然死亡，一项休战协定不久就得以达成，加洛战争最后以乔·科洛博就任老板告终。

州监狱里的8年监禁为乔·加洛的人格个性涂上了新的色彩——至少表面上如此。和许多未受过多少学校教育的罪犯一样，加洛发现读书可以用来打发那穷极无聊的囚禁时光之后，他成了文学和哲学书籍的热心读者。1971年返回布鲁克林时，加洛已经能够引用巴尔扎克、卡夫卡、萨特、加缪和福楼拜之言并讨论其微妙之处。他在监狱服刑时对绘画产生了兴趣，出狱后便开始参观各个博物馆，只是他那伪知识分子的表现不过是骗子的虚饰而已。

他的兄长拉里·加洛已经死于癌症，但“冲击波小子”艾伯特·加洛和原行动队留下来的成员都知道，乔伊一如既往地富有野心和具有决断力，他将会为自己争夺大块的黑手党蛋糕。加洛在监狱里就为东山再起做着准备。他将非洲裔美国人狱友培养成潜在的力量，以便在摊牌时机到来时秘密补充他手下已经衰竭的布鲁克林行动队。他安排其精心物色的黑人新兵出狱后联系他的兄弟和其他行动队成员，后者为他们提供了金钱和工作机会。

获释后不久，加洛就开始了行动。他向科洛博索要10万美金和其家族相当部分的不法收益，并声称这些补偿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一直在狱中，根本没有和他的兄弟一起在家族的和平协议上签字。这是一种含蓄的威胁，意味着加洛可能发起另一场

暴力运动。由于已经完全掌控了家族大权，而且在他的民权联盟里也大获成功，科洛博轻蔑地将加洛视为可有可无的过气人物而不予理会。

为展示其新的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格面貌——也或许是为了麻痹科洛博和其他老对手——加洛从脏乱的红勾区搬到了格林威治村^①，还开始频频光顾影院，并和演员杰尔·奥巴马和他的妻子玛尔塔交上了朋友。在根据吉米·布雷斯的《我的子弹会转弯》（一部滑稽小说，描述的是黑手党一支无能的行动队，那些人恰恰与加洛本人的二流人马相似）改编的电影当中，奥巴马扮演了一个黑手党人。在警方以前的档案中被称为“狂人乔伊”的他经常自夸已经脱胎换骨并在撰写回忆录，而在演艺界和纽约咖啡馆协会的晚宴聚会上，他还常常被奉为贵宾。

在知识界人士中间，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普遍存在的偏见阻碍了意裔美国人的发展，并将他们许多人逼到了犯罪的境地，而加洛佯装从暴力恶棍转变为得不到理解的冒险家便迎合了这种看法。民众对意裔美国人所怀的同情感变得强烈起来。从乔·科洛博反歧视联盟的成功，从马里奥·普佐的畅销小说《教父》及其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版所受到的普遍欢迎，你可以部分地感受到这一点。

马里奥·普佐的青年时代在曼哈顿西区犯罪横行的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度过。尽管他从未结交或认识一个真正的黑手党人，但凭借他对那个地方的了解，凭借他的调查与想象力，他创作了一个关于黑手党生与死的令人信服的故事，一个围绕虚构的唐·维托·科里昂（Don Vito Corleone）（马龙·白兰度在影片中将该角色扮演得极为生动）及其“家族”展开的故事。

尽管书和电影中都充斥着谋杀、暴行、背叛和伤害，但它们有个根本的潜台词，那就是似乎要将忠于黑手党或“家族”的德行合理化。根据故事的旨趣，种种犯罪行为，包括谋杀，都可解读为必要的手段。在一种充满敌意的美国文化与环境之中，它能够让早期的意大利移民和他们的子孙在公平待遇、经济成功和人格尊严上争取到平等的对待。故事的主人公迈克尔·科里昂是个凯旋归来的二战英雄，经历了对种族传统与血缘关系之光荣价值的迟到感悟之后，受到命运驱使的他批准和犯下了诸多谋杀。最终，作为其承袭的责任，同时也为了保护自己并扩张父亲创立的犯罪帝国，他承担起了黑手党老板的职责。

围绕普佐所塑造的人物，小说和电影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基调：是非分明、心怀

^① 译注：美国纽约市一个主要居民区，位于下曼哈顿，始建于殖民时期，1910年后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聚居地而引起人们的注意。

善意的黑手党人（如科里昂）和他们穷凶极恶的对手、狡猾的贩毒恶徒是完全不同的。最后，像一部老西部电影一样，戴着白帽的黑手党反毒好汉战胜了残忍邪恶的黑帮亡命徒。而事实却是，黑手党是60年代向美国内陆城市大量输入海洛因的罪魁祸首，而且每个家族都靠着毒品暴富起来。

对于《教父》的主旋律，没有哪个帮派比黑手党更为之着迷、更有鉴赏力并更感骄傲。它将黑手党人美化成一群君子，并且（可能并无心地）宣扬，即使在黑社会，信守节操并为之献身终将赢得胜利。许多聪明汉满怀喜悦地将原版影片看了许多遍。在执行监视任务时，联邦及地方调查人员发现，荣誉者和崇拜者们都爱模仿影片中黑手党人的扮相和语言。在举行集会和婚礼活动时，他们会没完没了地播放电影那极具感染力的配乐，好像那就是他们自己的国歌。影片肯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加入黑手党并接受其信条的选择。而且，它似乎支持了一种扭曲看法，即黑手党人属于一个令人敬重且乐善好施的团体，是一群值得褒扬的优秀公民。

1972年，在看了那部影片之后，终将成为黑手党名人的年轻崇拜者“公牛萨米”塞尔瓦托·格拉瓦诺（Salvatore “Sammy the Bull” Gravano）不禁为之欣喜若狂。“我被那部电影震撼了，”格拉瓦诺回忆说，“我是说，我飘飘然地出了影院。它也许是一种虚构的故事，但对于当时的我，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它真是太棒了。我记得我和很多人谈过，包括我们自己人，他们和我的感觉完全一样。不仅仅是那黑手党的结局，不仅仅是黑手党人和谋杀乃至那些粗俗的言谈，还有开始时的婚礼，还有那音乐和舞蹈，这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意大利人。”

乔伊·加洛很容易地钻进了这个新编织的宽容和赞美黑手党的天真壳茧之中。宴会上的熟人可能容易误认为像加洛这样的黑手党人对普通老百姓不构成威胁，而将其视为有趣的反现状的冒险家。然而刑侦探长艾伯特·西德曼并不这么看。经过对乔·科洛博枪杀案持续一年的调查，探员们挖出了加洛与其黑人狱友关系密切的情报，同时还发现他派那些人凭着他们的释放证加入其布鲁克林的行动队。探员们未能发现死亡枪手杰罗姆·约翰逊和乔伊·加洛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但西德曼相信加洛利用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狱友招募了身无分文的约翰逊，并很有可能以承诺大笔酬金来诱惑他。除掉科洛博，探员们推测，目的是为加洛的复出扫清道路。在科洛博家族的地盘里，加洛可以从其老板之死中得到很多东西，而且西德曼相信那起枪击案具有“狂人乔伊”独有的特征。“加洛的绰号是靠猛烈打击受害者直至其陷入绝望才赢得的，”西德曼强调说，“他还具有正面攻击的特点，1960年他就采取了攻击行动以图夺取家族统治权，当时乔·普罗旺斯是家族老板。”

为了进一步加以证实，探员们查访了线人并留意科洛博打手们口无遮掩的谈话，最后发现科洛博家族的想法与他们不谋而合。他们也将加洛纳入视线，认为他就是打瘫他们老板的幕后黑手。在因违反交规或需要接受讯问被拦下来时，科洛博的打手们会恼怒地嚷道，“你为什么不拦下那卑鄙小人加洛，为什么不抓他？”被招到警察局问话时，加洛声称并不认识约翰逊，对枪击案毫无所知，并坚称自己已经金盆洗手。不过在抛头露面闲逛时，加洛总是随身带着一名保镖。这个保镖通常是在求学时就是其好友的身材魁梧的“希腊人皮特”彼得·戴波拉斯(Peter “Pete the Greek” Diapoulas)。

在科洛博遭枪击 10 个月后，即 1972 年 4 月 7 日，在一向充当黑手党人矿泉疗养所的科帕卡巴纳俱乐部，加洛为自己举办 43 岁生日酒会。加洛邀请了众多贵客喝香槟庆祝，除了亲戚外，受邀到场的还有玛尔塔和杰尔·奥巴马及其他艺人，《纽约邮报》的百老汇专栏作家厄尔·威尔逊(Earl Wilson)也前来捧场。凌晨 4 点酒会结束时，一直没闲着且饥肠辘辘的加洛驾着凯迪拉克赶往市中心吃宵夜。陪伴在他身边的有其刚结婚 3 周的新娘西娜和她 10 岁的女儿利萨，还有他的妹妹卡梅拉·菲奥雷诺(Carmella Fiorello)与“希腊人皮特”及其女友伊迪丝·拉索。中国城的餐馆都打烊了，一行人只好往南信步穿过几个街区前往小意大利的桑树大街。在赫斯特街拐角处，他们发现了亮着灯的有着意大利风格的餐馆昂伯托蛤蜊屋。

没有多加留意，加洛碰巧走进了这家新开张的由“种马马蒂”马修·扬列诺(Matthew Matty the Horse Ianniello)的亲戚经营的餐馆。扬列诺是吉诺维斯家族一个膀大腰圆的角头，同时也是小意大利区的黑手党执法人。(昂伯托餐馆是一个扬列诺不甚招摇的消遣处和掩护地，他的主要职责是从泰晤士广场的脱衣舞吧和西区与格林威治村的同志吧诈取保护费。)餐馆并无其他食客，加洛领着众人在一张仿砧板的餐桌坐下，为所有人点了大量的海螺、蛤蜊和虾子等食物。就在这些心情愉快的客人边吃边笑的时候，一个穿着运动服的秃顶男人突然推开朝向桑树大街的侧门闯了进来，随后就用一把自动左轮手枪朝人群拼命射击。就在女人尖利的惊叫声和碗碟摔向地板的破碎声响成一片时，加洛飞快地朝面向赫斯特街的大门跑去。枪手急忙向加洛连开 5 枪：两枪未中，一枪射进屁股，另一枪击中肘部，而最后一枪穿过了他后背上的一条动脉。他踉踉跄跄地奔出门外，随即倒在了离门几英尺的地方。

枪手满意地微微一笑，然后从侧门退出钻进了候在街边的汽车。加洛的保镖“希腊人皮特”的臀部也被击中，最后挣扎着拔出手枪朝沿桑树大街向北疾驶的逃跑汽车射出了几发子弹。几分钟后，一辆警方巡逻车赶来将加洛火速送到一家有 5 分钟车程

的医院。一切都太晚了，还没有来得及抢救，加洛就在急救室因出血过多而死亡。

嫌疑立刻落到吉诺维斯家族角头“种马马蒂”头上，子弹开始飞窜之时，他就在餐馆里。“我什么都不知道，”马蒂对探员们说，“让这事发生在那个地方，你想我不是疯了？”扬列诺所言非虚，他扑倒在厨房的地板上，埋着头一动不动，并没有参与这起黑社会处决行动。两周后，探员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加洛的结局——一个渴望喝上蛤蜊杂烩汤的崇拜者招来的一场并无预谋的即兴袭击。

供认参与过袭击案的约瑟夫·卢佩尔利（Joseph Luparelli）是目击者，他道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衣衫破旧、人微言轻的卢佩尔利是科洛博家族一个住在布鲁克林区巴斯比街的崇拜者。他一直没有申请社会保险，因为他从未拥有过一份正经工作。作为年届不感的大龄崇拜者，他常常谄媚地干些琐碎杂事，靠为科洛博的打手们跑腿和买卖赃物来养活自己。

卢佩尔利在那个致命的清晨一直待在小意大利。在科洛博家族一个临街巢穴里，他讨好着家族的几名荣誉者，边和他们打牌边聊些无关紧要的话。将近凌晨5点时，他想吃点早餐，于是偶然来到附近唯一仍在营业的昂伯托餐馆，准备喝上一碗红蛤杂烩汤。他和“种马马蒂”在屋外聊着天，当说说笑笑的加洛一千人走进餐馆时，他顿时来了精神。

感觉是个绝好的机会，卢佩尔利赶紧沿着桑树大街奔跑，直到他在一家中国餐馆里发现了四个科洛博家族的打手才止住脚步。“厄布兹正在昂伯托吃东西，”他兴奋地对他们说，“厄布兹”的意大利语意思是“狂人”，明显是指加洛。其中一人奔向一个公用电话亭，随后带回了其行动队角头“牦牛”乔·亚科维利（Joe “Yak” Yacovelli）除掉加洛的指示。据卢佩尔利称，他和其中一人驱车赶到昂伯托餐馆外负责监视，并坐在“事故车”里准备阻挡警方或其他车辆追赶逃跑汽车。科洛博的另外三名暴徒在靠近餐馆侧门的桑树大街停下车。卢佩尔利称自己看到枪手闪进昂伯托餐馆，随后就听到了枪声，再后来就看到身受致命枪伤的加洛倒在人行道上。

行凶之后，乘坐逃跑车辆赶来的三个人丢掉了汽车，五个人都挤在卢佩尔利的车里逃往亚科维利那西区的家。那角头在家里赞扬他们干得漂亮。随后五个人驱车来到郊区尼雅克，亚科维利让他们躲在那里直到风平浪静。卢佩尔利向探员们强调，他指认加洛的动机是希望这有助于让他成为荣誉者并搞到他渴望得到的钱。“要知道，他们就像工会收会费那样捞钱，”他羡慕地说，“没有进门礼他们是不会收你的。他们才不在乎是不是一辈子不接纳你。他们设置了种种门槛，要不它准变成了一盘散沙。”

但卢佩尔利在藏身处与科洛博的四个打手近距离接触后他越来越不安并变得多疑

起来。他们提防他的那种举动——主要是冷冷地盯着他和窃窃私语——使他相信，他们已经认定他不可靠并要除掉他。在那藏匿处待了五天之后，他急忙驾车逃往纽瓦克机场并搭上飞往南加利福尼亚的首次航班。躲在加利福尼亚的亲戚家里，卢佩尔利变得更加疑神疑鬼起来。断定黑手党将把他作成嫌疑叛徒来追踪，他旋即投降了FBI，并在其探员的保护下飞回了纽约。卢佩尔利关于纽瓦克隐匿处的供词得到了证实，侦探们发现科洛博的四名打手仍躲藏在那里，但窃听他们谈话的努力未获成功。西德曼和其他调查该案的侦探们认为，卢佩尔利关于加洛伏击事件的说法是可信的。但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根据纽约州法律，检方没有对四名打手或亚科维利提起谋杀或阴谋罪指控。由于卢佩尔利有着不甚光彩的生活经历，仅凭他的证词进行检控原本就显得过于单薄，更不用说定罪于人。因告发有功受到政府奖赏与帮助的卢佩尔利消失在证人保护项目当中，从此再也无人听过他的音讯。

西德曼相信，他的探员已经解开或者发现了两起黑手党要案，即乔·科洛博和乔伊·加洛枪杀案的谜底。当着无辜的女眷和孩子面前杀害加洛无疑违犯了黑手党的礼仪，但作为冒犯科洛博和犯下“科萨·诺斯特拉”最严重罪行（未经管理委员会授权就刺杀一名老板）的一种报复，黑手党的规约又证明它具有正当性。

乔·科洛博遭枪击和杰罗姆·约翰逊与乔伊·加洛被杀都被列为悬案。在这些事件当中，唯一被捕并受审的人是加洛那个受伤的保镖“希腊人皮特”戴波拉斯。他受到罪行较轻的非法持有枪支的指控并被定罪。被判缓刑一年的他没有在监狱里待过一天。戴波拉斯的6枪未能击中逃跑的杀手和飞奔的汽车，但它成就了黑手党的一段历史。从昂伯托餐馆里窜出的子弹将对面公寓楼的石墙打出了一个凹痕。那餐馆和弹窝慢慢地被黑手党行家奉成了小意大利的标志物。

乔·科洛博的枪伤终归是致命的。他无法言语，只有右手两个指头能动。苟延残喘地过了7年之后，他终于在1978年5月死去，当时离他55岁生日还有1个月。在从纽约侦探局局长的职位上退休时，艾伯特·西德曼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有个个性鲜明且大胆的黑手党人发出科洛博的死刑令，同时也在无意中发出了自己的死刑令。“那个玩火的人，”西德曼带着些许钦佩说，“就是乔伊·加洛”。

加洛死后，他的能耐继续激起了演艺界名人的兴趣。1975年，不囿于传统习惯的鲍勃·迪伦创作并录制了音乐和抒情诗赞美那个遇害的黑手党人。在迪伦的畅销歌曲《乔伊》当中，加洛是个死得太早、不被理解、不被赏识的不屈从成规的人。

70年代另外两个大佬——卡洛·甘比诺和卡迈恩·加兰特的死亡极大地改变了黑

手党的历史。

第一个离去的人是受人敬重的唐·卡洛·甘比诺，比起管理委员会其他成员，他更接近于人们所称的“老板中的老板”。尽管它是媒体创造的一个头衔，但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这10年里，甘比诺的确是最有能力和最受尊敬的教父，他无疑是同辈中的佼佼者。1957年，通过策划谋杀性情反复无常的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他控制了那个后来以其名字命名的犯罪家族，随后又着手统一并扩大家族的敲诈勒索地盘。在甘比诺的铁腕统治下，这个家族成了全国最大的黑手党犯罪帮派，约有500名荣誉者和2000多名合伙人。仅凭其家族的规模与财富就足以将他推上黑手党霸主地位。而且，甘比诺是个革新者，他鼓励角头与打手们通过渗透到工会和合法产业之中来扩大家族的经济实力，这比通过暴力犯罪更能获取巨额收益而且风险也小得多。控制卡车司机、建筑业、码头和垃圾运输业的地方分会创造了一股稳定的来自于工会福利基金诈骗的资金流。他们在工会里的影响力让黑手党人有能力向公司索要回扣以换取劳资和谐并私下签订的集体谈判合同。那些私下的工会交易让甘比诺及其角头们成了半合法公司的股东，使他们能够从那些通过舞弊抬高标价的公私合同投标中获得巨额收益。

通过以智谋战胜在60年代中期被逼退位的主要对手乔·博南诺，甘比诺成了管理委员会中地位最高的老板。他的话对管理委员会及其为美国其他犯罪家族制定的政策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甘比诺在黑手党里的生活富足且惬意。在从打手爬升为教父的半个世纪里，他似乎并未受到执法压力的影响，针对他的指控要么遭到驳回要么在上诉中被推翻，让他一次次免遭牢狱之灾。表面上，他生活得不张不扬，在布鲁克林羊头湾的中产阶级聚居区租了一套普通公寓房，又在长岛北岸的马萨佩瓜购置了一处较为高档的住宅。面对收税员，他伪称其收入来自他在一家劳务咨询公司和几家货运公司里的投资。经验告诉他得时刻小心，外出活动时，他都让几个精心挑选的彪形大汉贴身跟随。他身材稍嫌单薄，有着鹰钩一样的鼻子和一脸淘气的微笑。他的相貌难以让人相信他能够对自己和其他黑手党家族施加致命的影响力。一旦卡洛·甘比诺穿上老板的披风，除了乔·博南诺那流产的秘密计划外，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想伤害他或夺其性命的袭击事件。

甘比诺很快适应了其黑手党党魁的角色。对自己喜欢的年轻党徒，他会主动向她们讲些激励其走向成功的哲理。“你得像狮子和狐狸一样，”他教导那些洗耳恭听的新党徒，“狮子吓跑群狼，狐狸辨认陷阱。如果你具备狮子和狐狸的优点，就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你了。”在这位老板的信徒当中，可能没有人会意识到甘比诺的寓言其实是

在盗用尼可罗·马基雅维利的话。马基雅维利是16世纪意大利政治现实主义者和讽刺者，他宣扬君主应依靠欺骗和诡计来夺取并保住权位。

1976年5月15日，这个狮狐论者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在遭受多年的心脏病折磨之后，74岁的唐·卡洛·甘比诺死在马萨佩瓜家里的床上。作为一个得到普遍认可并时刻考虑家族未来的创建者，甘比诺在死前挑选了其继承人。他指定的人是其妻弟亦即二表弟“大保罗”保罗·卡斯特利亚诺（Paul “Big Paul” Castellano）。根据传统习惯，与美国绝大多数犯罪家族一样，甘比诺家族的新老板必须取得大多数角头的认可。这种奇怪的类似于民主选举的惯例经常被体面地打破，因为在每个家族之中，正式表决的结果早就被取得控制权的派系所谋定。

在甘比诺的身体彻底垮掉的最后几个月，保罗·卡斯特利亚诺一直以家族代理老板的身份接受锻炼。他成了甘比诺的得力助手，把家族的活动导向了工会和产业腐败的白领领域。甘比诺死时，长期任二老板的阿列诺·德拉科罗塞（Aniello Dellacroce）再有几个月就可刑满出狱。他曾有一次敲诈阴谋中搞到大笔股票收入，但因偷逃这笔收益的123万美元的个人所得税，他被黑手党的老对手美国国税局给送上了法庭。在家族的活动上，德拉科罗塞和卡斯特利亚诺的观点尖锐对立。在小意大利廉租公寓区长大的德拉科罗塞身材粗犷，嘴里总是叼着一根雪茄，靠些过时的手段捞取不义之财，如放高利贷、劫持货车、抢劫、彩票和赌博。他有一大堆黑社会绰号，像“尼尔”、“尼尔先生”、“大家伙”和“波兰佬”，他在家族里的追随者是以精明能干出名的杀手和暴徒。德拉科罗塞在卡洛·甘比诺死后不久被释放出狱，他拥有挑战卡斯特利亚诺的重型武器，但永远是好打手的他尊重甘比诺临终前的遗愿，他没有挑起内战，而是接受了1976年底卡斯特利亚诺的加冕礼，并同意继续任二老板。据黑手党的传言称，“大保罗”拉拢“尼尔”靠的是一条务实的建议：“你跟卡洛有的东西，你留着。你想要更多的东西，我们谈。”通过妥协留用而不是挑选新的二老板，卡斯特利亚诺将甘比诺统一的王国分成了两个领地。但通过绥靖政策他避免了两败俱伤的内战，而且他自己和德拉科罗塞都能取得大量不义之财，各自的用度自然不会有太多担忧。此外，大保罗现在是家族公认的领袖，他的胜利让他成了甘比诺家族，也就是那个全国最重要的黑手党犯罪集团的第一个生于美国的老板。

在一年前的1975年，另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人物卡迈恩·加兰特试图掌控纽约那饱受内战之苦的博南诺帮派。头顶渐秃、戴着眼镜且走路稍显佝偻的加兰特是个举止优雅的人，这与黑手党缉毒者和刺客的流行形象大相径庭。当他在格林威治村巴尔杜

兹市场挑捡水果和蔬菜时，或者当他在下东区的德罗伯蒂斯甜点店停下来买浓咖啡和奶油甜馅煎饼卷时，在路人看来，身高 1.64 米的矮矮胖胖的加兰特更像一个悠闲的退休老爷爷。然而，他是个自孩提起就惹上严重的法律麻烦的人，有着无人能及的黑社会罪恶履历。尽管纽约警方怀疑他参与或策划了八十多起谋杀案，但加兰特总是巧妙地躲过了所有与之有关的指控。黑手党合伙人称，在 1943 年纽约那令人震惊的具有政治动机的卡洛·特雷斯卡（Carlo Tresca）谋杀案当中，他就是那个真正的杀手。特雷斯卡是个遭驱逐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社论撰写人，同时也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反对者。那是一桩让二战时生活在意大利的维托·吉诺维斯受益的杀人案，为赢得墨索里尼的宠幸，唐·维托想让特雷斯卡的笔和声音沉寂下来。

加兰特出生于 1910 年，成长于黑手党人聚集的东哈勒姆区。他的父母移民自“海边城堡”。那个渔村是西西里黑手党的古发祥地，是乔·博南诺和无数身在美国的博南诺家族成员的“培育箱”。10 岁时，因为逃学和一连串的街头抢劫，加兰特一度被当成“管束不了的少年被告”被送进了教养院。7 年后，他因人身攻击被定罪，并被关进纽约州新新监狱。回到街头，在有着良好社会关系的“城堡”亲戚的帮助下，加兰特成了博南诺帮派里一个机敏的新成员。加兰特 40 多岁时，乔·博南诺提拔他为顾问并由他负责家族的毒品网络。加兰特被其黑手党同伙起绰号为“利诺”（Lilo），意大利俚语表示一种短而粗硬的小雪茄。当 1957 年在马勒莫与西西里众家族签定向美国输入海洛因的协议时，加兰特就在博南诺身边并担任他的主要顾问。精通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有加兰特是黑手党派往欧洲处理数百万美元毒品交易的主要使者。1960 年，哈里·安斯林格的毒品特工抓住了他，并以从加拿大进口大宗毒品到美国的黑帮“首脑”的罪名对他提起了联邦指控。在庭辩总结的前夕，陪审团主席在午夜时分从一栋废弃的大楼楼梯上神秘跌下来并摔伤了腰，初审因此而终止，无效审判便告成立。联邦检察官们相信，袭击陪审团主席的动机是阻止审判的进行，同时也是要恐吓和胁迫其他陪审员，但这种看法没有相关证据的支持。

两年后，加兰特与 13 名共同被告一起受到第二次审判。在审判当中，一系列折磨法官和陪审团并要造成另一起无效审判的蓄意袭击事件发生了。加兰特的打手塞尔瓦托·帕尼科爬进陪审员座区，把陪审员们推开并厉声称他们污蔑人。另一个共同被告则抓起椅子朝检察官砸去，好在椅子撞在陪审团席的围栏上未伤着人。首席法官劳埃德·麦克马洪（Lloyd Mahon）住在郊区，有天早晨醒来时，他发现一个被斩首的狗头摆在他家的门廊上，这是黑手党的一种古老而残忍的威胁手法。在接下来的 4 个月里，那名法官接受了 24 小时保护。在频繁地向陪审员和检察官口吐污秽之语并进

行恶劣的冲撞之后，麦克马洪命令塞住几名原告的嘴巴并铐住其手脚。尽管发生了意在干扰审判的野蛮攻击，但加兰特的多项涉毒罪名还是被宣判成立。监狱精神病医师诊断他具有心理变态的人格，不能容忍输掉争论或被反驳、被羞辱。他那犀利阴森的目光令监狱看守们不寒而栗。据侦探拉尔夫·萨勒诺称，“加兰特的瞪视是那么可怕，以至于让坐在椅子上的人感到手足无措”。在多次与黑手党冷面杀手交锋的过程中，萨勒诺承认只有其中两个人以其可怕的目光让他感到慌乱，他们就是尼尔·德拉科罗塞和卡迈恩·加兰特。

在监狱里，加兰特仍然维持着他的地位，博南诺家族的其他狱犯留意着他日常的需求。加兰特对监狱的伙食不屑一顾，他每月拿出 250 美元贿赂看守，搞到肉食供自己和他那穿着号衣的仆人享用。当时，狱方给了黑手党囚犯管理自己监区的实际自由。那些黑手党人得到了宽容，因为他们不会制造暴力麻烦。后来有告密者报告调查人员称，傲慢自大的加兰特曾向狱中密友发誓，他将拯救日渐式微的家族，恢复它曾经拥有的荣耀。自乔·博南诺 60 年代中期被逼退位后，该家族一直处于飘摇不定的动荡之中，没有取得管理委员会认可的老板主持家族事务。1974 年，服刑 12 年被保释后，加兰特对权力的强烈欲望和其杀人的本能很快复苏起来。临时老板“拉斯提”菲利普·拉斯泰利（Philip “Rastelli” Rastelli）是加兰特角逐家族最高权位的强劲对手。但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刑，拉斯泰利开始了其 6 年刑期的囚徒生活，这为加兰特成为这个派系林立的家族里最有决策力与影响力的角头扫清了道路。作为乔·博南诺的原顾问和事实上的二老板，利诺认为自己是正统的王位继承人，甚至可以主持聪明汉的入会仪式，而那是通常只有老板才拥有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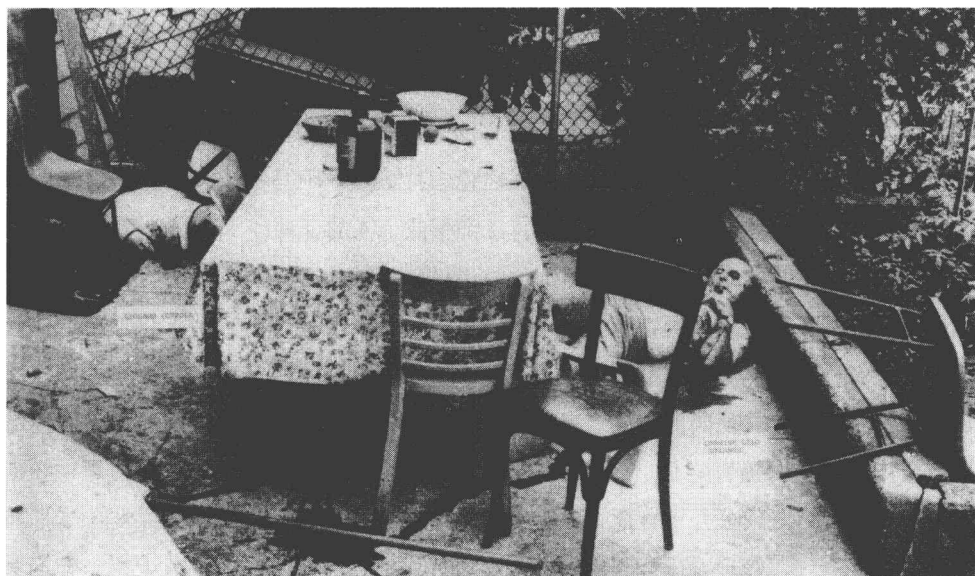
获释后，加兰特伪装成正经商人，在小意大利的伊丽莎白大街开了一家干洗店。他的私人生活同样也是表里不一。他和妻子育有三个孩子，但在服完毒品犯罪的刑期之后，他和另一个为他生了两个孩子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加兰特向朋友吐露说，作为“好心的天主教徒，”他不会寻求离婚。

加兰特拒绝承认拉斯泰利为老板，他采取了两个大胆的举措去捞钱和充实自己的队伍。为增加资金来源，他逐步提高了与西西里出口商的毒品交易量，并自封“收租人”，即黑手党唯一有权向在美国活动的西西里人收取特许费的大头领，这种不法收益不会与其他家族平分。为了增强其派别的力量，加兰特从西西里输入了被称为齐普（zips）的生力军。“Zips”一词的由来不得而知。纽约侦探和黑手党专家雷默·弗朗西斯切尼认为，它是个意为“乡下佬”或“原始人”的西西里俚语缩约词。

加兰特赤裸裸地独霸黑手党毒品市场的企图给纽约现任教父们带来了恐慌，他们

宣称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加兰特对自己正在招来敌意并不在意，他深信自己的齐普们保持着黑手党传统的优点，这些优点将复兴博南诺帮派的忠诚与凶猛。他开始任用西西里人来完成最棘手的任务，还经常让他们做自己的私人保镖。他有两名由他亲自吸收为荣誉者的亲信叫鲍尔达萨瑞·阿马托（Baldassare Amato）和赛萨瑞·邦温特（Csare Bonventre）。来自“海边城堡”的他们粗犷而朴实，是一对年龄都是 27 岁的亲密朋友。加兰特对他们的忠诚绝对自信。

1979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在那个潮湿的正午，加兰特被侄子詹姆士·加兰特（James Galante），一个打手兼司机，接到布鲁克林那日显衰败的布什威克参加午宴。当布什威克早先还比较繁荣的时候，那里已经是博南诺家族的一个大本营。齐普们现在仍然喜欢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有充斥着西西里方言的黑手党沿街俱乐部和匹萨饼店，秘密特工和缉毒刑警很容易在那里被认出来。加兰特的远房表弟吉赛贝·托雷诺（Giuseppe Turano）和妻子是“乔 & 玛丽意-美饭店”的老板。加兰特经常到那里品尝西西里家乡菜并和吉赛贝聊聊天。这家座落在尼克伯克大街的餐馆保持着特有的怀旧形象，是个样式古朴且不事张扬的聚会场所。店堂里的桌上铺着柠檬色的印着植物图案的油布，墙上装饰着弗兰克·西纳特拉和其他意裔名流的照片，门厅上方则是一幅巨大的油画《最后的晚餐》。



1979 年 7 月发生在布鲁克林一家饭店里的“利诺”卡迈恩·加兰特谋杀案在管理委员会审判当中引起了争议。检察官声称管理委员会为防止加兰特接管博南诺家族并控制黑手党的毒品走私而授权实施了这起谋杀。桌子右方是加兰特的尸体，他的嘴上紧咬着一根雪茄烟。（纽约市警察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加兰特赴宴的目的是为托雷诺饯行，后者次日就要离开美国前往西西里度假。在僻静的内院里，一张方桌已经摆好，入座的贵客有利诺·加兰特、他的侄子和安吉洛·普雷桑扎诺（利诺的老打手和忠诚可靠的助手）。在头道菜上来之前，普雷桑扎诺向其他在座者致歉，称有要紧的事去办，随即起身离去。

不久，博南诺家族的几个黑手党人意外地来到餐馆。齐普鲍尔多·阿马托和赛萨瑞·邦温特在利诺的毒贩利奥拉多·科波拉（Leonardo Coppola）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加兰特便邀请他们入席。吉赛贝·托雷诺对科波拉的到来感到意外，因为这两个人都彼此厌恶对方。加兰特充当了和事佬，他劝慰他们，希望这乐融融的午宴能消融他们之间的恩怨。

五个人坐在室外的餐桌旁用完了沙拉、鱼和白酒后，加兰特点了一根雪茄等着甜点和咖啡上来。就在这时，当天下午的2点45分，三个戴着滑雪帽的男人大步闯进饭店。店主17岁的儿子约翰·托雷诺一边朝敞着门的内院喊叫示警，一边慌忙奔逃。其中一个闯入者甩手朝那个少年开了一枪，打中了他的臀部。他的妹妹康斯坦扎随后听到父亲在厉声喝道，“你们干什么？”接下来就是一阵枪响。在院子里，突袭者——齐普阿马托和邦温特显然和他们是一伙——用霰弹枪和几把自动手枪大开杀戒。加兰特、科波拉和托雷诺当场死亡。加兰特遭近距离枪击仰面翻倒在地，左眼留下一个枪洞，那雪茄烟被死死地咬在其两排牙齿之间。

街上的目击者目视蒙面枪手走出乔 & 玛丽饭店，而阿马托和邦温特紧跟在他们后面。加兰特的这些齐普“贴身保镖”并没有打算反击杀手，当行凶者在饭店门口转身进入逃跑汽车时，他们就成了极易受袭击的目标。而当齐普们朝着另一个方向不慌不忙地离去时，枪手们也没有显出任何忧虑之色。很显然，阿马托和邦温特是这起刺杀案的同谋，但要逮捕或指控他们却缺乏直接证据或证人的证词。

加兰特遇害案的动机在黑手党内部通过小道消息被传开，并最终由告密者传给了侦探和FBI特工。拉斯泰利在狱中指派支持者向管理委员会申诉，请求将加兰特作为不法篡位者杀掉，黑手党董事会批准了请求。这个自封的博南诺家族老板犯了两次不可饶恕的威胁纽约其他四大家族老板的大错。通过垄断西西里人在美国的海洛因终端销售市场，他企图损害它们，特别是甘比诺家族的利益。或许更为严重的是，在卡洛·甘比诺死后，他公开预言他将成为老板中的老板。由甘比诺家族的保罗·卡斯特利亚诺主持会议，管理委员会判处利诺·加兰特死刑。那两个被他从故土招来充当其警卫军的勇敢的西西里人阿马托和邦温特被人劝服背叛了他。调查人员推断称，他们有预谋地将科波拉引到乔 & 玛丽饭店，因为阴谋者希望加兰特的这个狂热的支持者也

同时出局，以防他实施报复性袭击来为其“老板”复仇。

另一个被锁定的受害者安吉洛·普雷桑扎诺因提前离开宴席恰好躲过了一场血淋淋的屠杀。然而，这个70岁的黑手党老党徒只多活了几天。普雷桑扎诺躲藏在卡兹奇，他惊恐地认为自己是个被圈点成死犯的人，终于在杀手追到之前死于致命的心脏病发作。

“他必定触怒了什么人。”看过与加兰特有关的情报调查结果后，纽约探长詹姆士·沙利文（James T. Sullivan）说道。实际上，这个69岁的冷酷无情的黑手党人触怒了很多人。

加兰特之死让派系林立的博南诺家族再度陷入混乱，使它失去了坚强的领导集团来与其他黑手党家族协调争端或达成协议。纽约其他四大黑手党家族的基本组织结构都坚固而稳定，它们的老板们都急切地想从博南诺家族的衰落中捞到好处。

70年代，卡洛·甘比诺的自然死亡和乔·科洛博、乔伊·加洛与卡迈恩·加兰特遭黑社会枪杀导致甘比诺、科洛博和博南诺犯罪家族的防备态势发生了异变。这些发生在三大家族里的变化都是内部对抗和黑帮人物强权行为导致的结果，而不是由执法机构、《第三章》电子监听法或RICO法所施加的压力造成的。约翰·埃德加·胡佛于1972年死去，在调查黑手党人方面，他的三位继任者帕特里克·格雷（L. Patrick Gray）、威廉·拉克尔肖斯（William D. Rukelshaus）和克拉伦斯·凯利（Clarence M. Kelle）继续推行胡佛制定的不重实效和作壁上观的政策。

70年代到美国执行任务时，英国苏格兰场有组织犯罪侦探弗兰克·普利（Frank Pulley）发现美国警方高层大部分人对黑手党的可怕威胁都普遍抱以冷漠的态度，他对此感到震惊。身为情报专家，普利正在搜集美国黑手党人接管伦敦高级合法赌场的相关证据。他指出新泽西州警方在反黑手党工作上可圈可点，但许多联邦和其他地方机构却是敷衍塞责。“许多知道实情的优秀警察频频碰壁，他们从上司那里得不到支持。”普利回忆道。

他们的安乐窝似乎没有遭受外来侵袭的危险，管理委员会的老板们于是在70年代中期重新打开名册，允许全国所有黑手党家族吸收合格成员以取代死去的党徒。新鲜血液是必要的，而且下一代黑手党人似乎不会面临被那些懒洋洋的联邦和地方执法机构所伤害或渗透的危险。

黑手党老板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必顾忌执法机关的打击行动和热情。鲍勃·布莱克恳求检察官和调查人员们运用RICO攻击其神经中枢——黑手党的统治集团。但该法颁行了近10年，那位善于分析的法学教授在与黑手党战斗时仍然没有找到支持者。

第 20 章 FBI 的觉醒

“继续搜集情报，但还得追踪重要头目，得锁定大家伙！”

“黑手党是一种有可能毁掉美国劳工运动的可怕疾病。我们要瞄准黑手党的心脏来实施全面的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除掉这种在美国已存在半个世纪的毒瘤的唯一办法。”

执法者就像一条奔向鹿群的狼。你和检察官们如果调查单独的案子，你除掉的就是那有病和受伤的鹿，而这只会让鹿群——有组织犯罪——更加强大起来。

对两名刚毅冷酷的 FBI 特工来说，这是在特殊环境里执行的一项特殊任务。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处恬静的田园式的大学城，离他们办公室所在的可俯瞰曼哈顿老城区的法院大楼约有 200 英里。驾车在康奈尔大学的校园高地行使，特工詹姆士·科斯勒（James Kossler）和朱尔斯·博纳沃朗塔（Jules Bonavolonta）被吞没在如画的风光之中。在 1979 年 8 月那个宁静的星期六上午，卡尤加湖上的船帆片片摇曳，卡斯迪拉山谷和瀑布被那有着丝绒般质感的绿色山岗装帧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学生们轻松地抛着飞盘，旋律和谐的钟声从钟楼上传荡开来。这是一种田园诗般的如画景致。然而，科斯勒和博纳沃朗塔都相互发着牢骚，不知道为何要丢开他们追捕罪犯和敲诈者的重要工作被派到纽约伊萨卡市这个偏远的校园里待上一周。

他们俩在纽约都是新近被当地最高长官尼尔·韦尔奇（Neil Welch）提拔的中层主管。在愉快地接受提升的时候，科斯勒和博纳沃朗塔心里明白，他们在为一个志在打破旧习的改革者工作。韦尔奇突然命令他们去康奈尔出差一周。他的命令很干脆：参加专题讨论会，听听演讲。简洁明了的指示是韦尔奇独行其是风格特点，这位 FBI 官员厌恶长篇大论的备忘录和空耗时间的工作会议。

编配有 1000 名特工（约占 FBI 总人数的十分之一）的纽约分局是 FBI 的旗舰分局，管理这样的单位是最令人垂涎的外勤美差。在其他城市，FBI 办事处的首长在 FBI 内部被称为主管特工（SAC）。为了显示纽约的重要性，其负责人享有 FBI 副局长的显赫头衔。

在胡佛的独裁统治下，尼尔·韦尔奇是绝不可能被提拔到纽约分局的。但在胡佛 1972 年离世和原联邦法官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1978 年就任 FBI 局长之后，华盛顿总部机关里的官僚主义控制就渐渐松动了起来。决心修改这个机构过时的政策并清除胡佛遗下的陈规陋习，韦伯斯特给了韦尔奇放手改组纽约人事结构的权利。韦尔奇曾对胡佛贬低黑手党的重要性感到恼火，他决心彻底改革自己的有组织犯罪部门。他告诉每个愿意倾听的人说，黑手党是基层特工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但 FBI 总部却将它遗忘了。“我们没有接受与黑手党有关的训练，也不知道它怎样活动。”韦尔奇后来承认说。在胡佛那时断时续的打击“科萨·诺斯特拉”的过程中，作为纽约的一名新特工，他知道要取得那些黑手党人的准确线索，最好的办法是秘密搞到麻醉品局的黑名单，也就是胡佛的老对手哈里·安斯林格搜集的情报资料。胡佛禁止将那些档案分发给他的特工，这是他仇视安斯林格的一种荒唐之举。

作为一位律师和富有才干的行政官员，韦尔奇在 60 年代成功地担任过布法罗和底特律的主管特工，尽管没有得到胡佛的垂青。韦尔奇两次都在黑手党的地盘上任职，他曾不顾胡佛的警告对黑手党展开过调查。他的努力受到了胡佛的严厉斥责。“他指责我掌管着一边倒的办事处，我多年来都处在严峻的政治麻烦当中，”韦尔奇轻声笑道，“他埋怨我不调查共产主义案件，不处理他那老套的优先事务。”

韦尔奇在后胡佛时代被提拔为费城的主管特工，他在那里唾弃官僚作风和不理睬总部的干预成为 FBI 的传奇话题。曾有个期满而未离任的主管打电话给华盛顿，请求批准他原来做过的一项指示，愤怒的韦尔奇冲进那个胆小官员的办公室，用剪子剪断了他所有的电话线。

“这是个不错的教训，没有人会质疑我的命令而给总部打电话请示一些该死的事情，”提到这件事时，韦尔奇这样说道，“我希望教育每一个人，我们必须依靠自己，我们不需要总部的任何东西。”

韦尔奇将纽约地区视为黑手党的“世界总部”，到那里任职让他面临着最为危险的挑战。“我的事业发展的不错，我不希望靠一份没有意义的统计数字表来出人头地。我希望做些要紧的事情，除掉全国最大的诈骗犯。”

履新之后的一次评估让他相信，在打击纽约五大犯罪家族的问题上，当地特工正

在做着堂吉珂德式的努力。他的第一个决策便是把“办事处倒过头抖落一遍”，将“科萨·诺斯特拉”提到最高等级上来。此前，专司黑手党案件的特工在发展线人方面成绩不错，但这些线人并没有让多少人被捕。韦尔奇对一些特工与告密者打交道的办法感到沮丧。线人通常是为了金钱而成为叛徒，如果是卷入刑事案件当中，他们也不过是为了取得轻判的保证而变节。根据与纽约特工达成的秘密协议，线人的确在向FBI提供一些与那些犯罪家族有关的看似内幕的消息。然而，对这些秘密情报进行评估之后，韦尔奇认为它们绝大部分都是没有价值的流言蜚语。这是一种糟糕的工作方法，通过它很难搞到重要罪案和黑手党内部发展的具体情况或证据。“我们得到的都是笼统的情报，是那种家族‘名人录’式的情报，”韦尔奇恼怒地说。“如果有事情发生，我们的确会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但那是黑手党给出的说法，我们能够知道哪些东西全凭他们来决定，我们不会赶到现场去调查，去做些实际工作弄清它是事实还是谎言。”

韦尔奇逐步启用新人来出谋划策，准备向黑手党发起新一轮新的进攻。“我希望你们同时打两场球，”他指示新手们说，“继续搜集情报，但还得追踪重要头目，得锁定大家伙！”

许多特工都认为在纽约任职是个苦差事，主要因为那里的房价太高。几乎所有特工都生活在房价较为低廉的边远郊区，但那必然要花掉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往返在拥挤的公路上。韦尔奇要求特工盯紧黑手党人，要求他们做出更大的努力，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进行更密切的监视。对特工们来说，疲劳驾驶和家庭生活的压力都是不利的因素，这些都影响了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来跟踪黑手党人或找出不愿作证的目击者。

“对这些特工，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动起来，直到他们的嘴巴不再唠叨，”韦尔奇说，“让他们忘记自己在纽约。要不停地告诉他们，他们在干重要的事情，他们将会带来重大变化，会在有组织犯罪方面取得实际成效。”

科斯勒和博纳沃朗塔是韦尔奇那首批补充人员中的两个。两人都是30多岁，都有过以不同寻常的策略和勇气摒弃FBI僵化的行动准则的经历。缕缕青烟从他的烟斗里缓缓腾起，加上一副沉思冥想的神态，红头发的科斯勒会被误当成生活闲适的大学教授，而不是经受了10年风雨磨砺的粗犷而朴实的调查人员。与大多数接受过军事或法律训练的特工不同，他以教师的出身进入FBI。原籍匹兹堡的科斯勒拥有教育学学位，在签约受雇于FBI之前从事智障儿童的教育工作。在一次聚会当中，与一名FBI特工偶然的一席谈话激起了科斯勒改换职业的兴趣。与在课堂上亦步亦趋地度过一生相比，他更愿意从事那种在一年当中能够经历更多刺激、能赚更多钱并有更多出差机会的工作。

1970年科斯勒在胡佛任期的最后时刻加入FBI，当时有些老特工教导他说，通向成功最便捷的途径是设法逮捕一些三流的罪犯和暴徒。FBI流行的成功模式是：汇编厚厚一本关于被盗车辆、赌博和其他容易告破的案件的统计公文。“你的工作成绩严格按照统计数字来评定，而不是依据逮捕行动的质量，”科斯勒说，“用老牌特工的话来说，得像消防队员那样看待我们的工作。我们每天扑灭一些寻常的火灾，然后记下灭火的次数，直到有像绑架或重大的银行劫案发生。之后我们才放下手头的工作，一头扑进那重大且备受瞩目的案件当中。”

1975年吉米·霍发失踪时，科斯勒被派到新泽西展开调查。他所在的小组负责跟踪新泽西北部卡车司机协会的官员，即吉诺维斯家族的角头安东尼·托尼·普罗文扎诺，据怀疑他在诱骗和谋杀霍发的行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霍发之谜对科斯勒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让他知道了黑手党对执法机构是何等蔑视。通过谋杀重要的工会领导人并处理掉他的尸体，黑手党公然表明，对于一个关乎其利益的工会，它有着持续控制它的能力而不必担心遭受报复和政府的干预。在调查托尼·普罗文扎诺的过程中，科斯勒更加认清了黑手党与卡车司机地方分会之间秘密而危险的关系。在为新泽西一个劳工诈骗调查小组搜集证据时，他的勇敢引起了韦尔奇的注意，故而他能够赢得机会在纽约组建一个类似的小组。

韦尔奇知道，黑手党在纽约的许多能量与财富都与控制工会有关。韦尔奇提拔了一名持相同看法的特工来做科斯勒的搭档。他就是朱尔斯·博纳沃朗塔。博纳沃朗塔身体柔韧性好，是个空手道爱好者，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他言辞犀利对黑手党人冷酷无情的仇恨源于其孩提时期。他在遭受黑手党蹂躏的新泽西纽瓦克市长大，时常听起父亲，一名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裁缝，讲述勤劳的意裔移民是如何遭受附近聪明汉的骚扰和威胁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在父亲那个不大的裁缝店里，还是孩子的他目睹了多起野蛮的敲诈企图。多年以后，他骄傲地继承了父亲那面对蛮横的威逼却绝不交出一美分的勇气。

毕业于塞顿霍尔大学的博纳沃朗塔曾在军队里被任命为少尉，并加入了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赴越南参战。渴望经历新的冒险来打击黑手党和其他罪犯并取得有意义的成就，他于1968年加入了FBI。从一开始，他就强烈反对僵化的调查体制。有着在纽华克学到的街头生存技巧，他要求执行卧底任务，相信这在搜集指控黑手党人的罪证方面是最为有效的途径。在博纳沃朗塔任特工的前几年里，FBI不赞成这类冒险活动。甚至自胡佛死后直到70年代中期，他那帮固执己见的门徒在华盛顿仍然反对派人执行长期的卧底任务，认为那是些没有效益、耗费资源与人手的花招。

在获准进行有组织犯罪调查后，博纳沃朗塔常常摒弃那些循规蹈矩的调查方法。他伪装成荣誉者和聪明汉在黑手党的酒吧间附近闲荡收集线索和证据。他的主要武器是能模仿黑手党人那大摇大摆的姿态和透过乌黑的眼睛毫不畏惧地盯视别人。在布鲁克林的酒吧间，他那虚张声势的举动曾差点让他和真正的崇拜者发生肢体冲突和可能的枪战。令博纳沃朗塔灰心的是，他经常被迫离开街头去干些他十分讨厌的工作。在韦尔奇拯救他之前，博纳沃朗塔最郁闷的时候是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约翰·埃德加·胡佛大厦的总部里坐办公室。在讲述自己的FBI经历时，他称在那难熬的两年里，身边全是些“不干正经事的趋炎附势者、名利至上者和肥胖的办公室职员”。

尼尔·韦尔奇派他的工会诈骗专家科斯勒和有组织犯罪能手博纳沃朗塔北上康奈尔大学自有其道理。身为律师和专业的调查人员，韦尔奇始终置身于刑法发展的前沿。他阅读法学院的评论杂志，走访检察官和法庭的辩护律师，并与法学教授讨论法律难题。有位令他很感兴趣的教授是鲍勃·布莱克，他知道布莱克痛惜FBI十年来都没有认识到他的宝贝——RICO（《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令》）的重要性。

布莱克于1973年离开了参议员麦克莱伦的委员会，移居到康奈尔并成为一名刑法与诉讼学教授。在大学里，他依旧致力于研究反击黑手党的办法，并成立了独具特色的智囊机构——康奈尔有组织犯罪研究所。从1977年开始，布莱克暂时离开了教学，接受了一份耗时两年半的调查工作。他成了众议院重新调查棘手的肯尼迪总统遇刺案的首席法律顾问，这次调查要搞清黑手党是如何从肯尼迪之死中渔利，并要就黑手党人所起的作用提出看法。

后来返回康奈尔法学院继续从事全职授课的布莱克减少了在全国各地的演讲。他的新办法是在康奈尔的暑期专题讨论会上宣传RICO。凭借大学法学院和有组织犯罪研究所的声望，他准备把州检察官“引诱”到轻松自由的校园环境里专注地听听他的演说。他的另一个目的是鼓励州里的官员模仿那部经国会通过的法律创造“小RICO法律”来避开冷漠的联邦执法体系。通过这种迂回的策略，他相信，能够构筑第二道打击黑手党的法律防线。

在韦尔奇赶到纽约赴任之前，那里和全国其他地方的FBI官员都轻蔑地拒绝了布莱克的邀请，不打算派特工参加讨论会。向来特立独行的韦尔奇并不理会总部的那条训令，即特工只能参加官方在弗吉尼亚州匡恩提科市FBI学院主办的培训班。他热切地接受了布莱克的邀请，并在1979年夏天派首批FBI特工参加RICO教育项目。

决定挑选科斯勒和博纳沃朗塔，是因为韦尔奇知道，这两个想法与自己相近的调查员都想利用新的策略和手段来与纽约黑手党较量。然而，布莱克关于RICO法律的

公开演讲却令两名特工感到失望。临行之前，博纳沃朗塔朦胧地听说有那么一个法律，科斯勒只知道其大概，至于它对 FBI 调查人员有何可能的价值则不甚了了。在康奈尔的一百多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州检察官，这让两名特工在那些显然能领会布莱克的讲话要点和案例分析的与会者中间显得特别抢眼。“它主要是理论性的，而地方检察官感兴趣的是那些并不适合于我们的州执法体系，”科斯勒抱怨说，“朱尔斯和我总是问，‘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我们可不是这兄弟会的。’”专题讨论会是大学辅导课和福音奋兴会的一种融合。口齿清晰、头发稀疏泛灰的布莱克履行了模范教授的职责，详细而清楚地阐明了一部创新法律的微妙之处。倘若需要戏剧性效果，布莱克就会把自己变换成一个激情四溢的巡回传道者。回顾他为这教育项目所写的一份 61 页的美国工会诈骗史的材料时，布莱克大声疾呼，“黑手党是一种有可能毁掉美国劳工运动的可怕疾病。我们要瞄准黑手党的心脏来实施全面的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除掉这种在美国已存在半个世纪的毒瘤的唯一办法。”

突然间，科斯勒觉得那讨论会的主旨是直接针对他的。他特别留意布莱克反复强调的两点：第一，RICO 必须与《第三章》规定的窃听器与电话窃听结合在一起成为收集证据的唯一有效的手段。第二，调查员和检察官必须停止在无足轻重的黑手党人身上浪费时间，要竭尽全力对付特权阶层，即黑手党老板及其经验丰富的副手。“目标是家族、组织而非地位低下的个人。”布莱克恳求道。

布莱克所喜欢的一部老电影《小凯撒》（选择 RICO 作为一部法律的缩略词或许就是受到它的影响）是这位法学教授在讨论会上提到的另一个话题材料。那部电影引人入胜，但他谈到它是要强调他的主张，即教父们应当是调查员和检察官们的首要目标。在影片当中，爱德华·罗宾逊扮演了一个名叫“里科”凯撒·恩里科·班戴洛的残忍暴徒，一个不择手段爬到一个大城市黑帮最高层的杀手。然而，里科得服从于那个城市真正的黑社会巨头，一个被称为“大亨”的举止优雅、穿着礼服的上流人物。作为 30 年代好莱坞塑造的一个野蛮的意大利移民黑帮分子的典型形象，里科最终在谋杀一个检察官之后被警方击毙。

“是的，里科中弹并死在巷子里，”布莱克拖长语调向检察官和两名 FBI 特工讲道，讨论会的点睛之笔在这时出现了。“而‘大亨’怎样了？他逃过了惩罚，因为他没有受到调查。”长时间且富有戏剧性地停顿之后，布莱克道出了这持续一周的讨论会的潜在主题。“‘大亨’平安无事，他仍在掌权，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过真正的改变。这就是 RICO 压倒一切的价值，它是为了改变那电影的结局而设计的。”

回到纽约，科斯勒和博纳沃朗塔变成了 RICO 热切的皈依者。他们的热情得到了

韦尔奇的支持，但在运用那部法律打击黑手党上，他们需要从布莱克那里得到更为详细的指导。4个月后，即在1979年圣诞节前不久，韦尔奇派遣科斯勒、博纳沃朗塔和另外三个主管赶到伊萨卡市当面请教布莱克。在一家度假饭店的小会议室，他们吃着送进来的外卖，足不出户地进行了持续两天的马拉松式会谈，布莱克详细说明了RICO可能的适用范围。

教授利用黑板解说了如何利用RICO来打击黑手党。他告诉他们，这个法律包括调查、起诉和取得长期监禁判决的各项规定。“你得综合运用三大块，而不是只取其一，”他一边在黑板前踱着步一边说，“你得通过没收资产并提起RICO民事诉讼来攻击他们的经济基础。”

联邦检察官僵化的工作方式是特工们不得不克服的另一个障碍。“他们希望把事情弄简单些以方便他们的操作，”布莱克对联邦检察官不无批评地说道，“他们成了战利品的收集者，只是立案起诉某个人，然后把他送进监狱。那和骑着旋转木马没有两样，你得从木马上下来，要逼着检察官做更多的事情。要让他们明白，在个人犯下有组织罪行时，是组织使这种有组织犯罪成为可能。”

另一个重要对策是布莱克为安装窃听器和电话窃听装置而提到的“冰山与动态合理根据原理”。他提醒说，检察官们误解了在RICO案件中为取得法庭授权实施《第三章》之电子监视行为而确立“合理根据”所要求的证据数量。主要着力点是该法所定义的“组织”，而不是特定的个人或诸如放高利贷、敲诈或赌博这样的犯罪，基本要素是“组织”。他指出，特工可以利用线人提供的线索、特工自己对明显为了开会而聚集的黑手党人进行监视的报告和关于某个黑手党家族犯罪历史的档案作为对一个既存组织展开调查的依据。那些根据将足以从法官那里取得授权来实施RICO所规定的窃听器与电话窃听。

“利用你通过第一个电话窃听装置或窃听器搞到的东西取得另一个窃听装置的授权，”布莱克继续说，“然后利用前两个窃听器搜集的证据来窃听另一处聚会地点或黑手党人的家。”

“乌默它”——黑手党的缄默与保密准则——可通过持续的电子窃听来挫败。“当你为一个并不费力的有罪判决取得证据之后，仍不要拔掉窃听器，”布莱克接着说，“顺着梯子爬，直到你接触到该组织的最高层。这里对电话或窃听器窃听并无防备。”

最后，他迫切希望特工们系统地考虑问题，而不是起诉特定的犯罪。“如果你发现了一起谋杀的证据，就将谋杀的事实作为一条证据。证实一系列谋杀和其他犯罪，你就证实了敲诈勒索的行为。证实一个组织的存在与模式并与那些谋杀和其他犯罪相

联系，你就可以得到一项 RICO 控告和可确定的有罪判决。”

因为纽约是黑手党最大的区域性堡垒，布莱克向他的新追随者们强调了他们向五大家族开战的意义。他预测 RICO 在纽约——以其媒体优势和确定无疑的全国性宣传——取得胜利会鼓舞全国其他地方的 FBI 特工和美国检察官发起类似的打击行动。

当特工们坐车准备返回纽约时，布莱克将头伸进了车窗，向他们讲了最后一句话。“现在，执法者就像一条奔向鹿群的狼。你和检察官们如果调查单独的案子，你除掉的就是那有病和受伤的鹿，而这只会让鹿群——有组织犯罪——更加强大起来。”

布莱克在那 8 小时秘密会议上的解惑论道让科斯勒“顿悟了现实的真谛”，也让他“胸中勃发了万丈豪情”。“他让我茅塞顿开。他为我们调查和处理 RICO 案件画出了一幅畅通无阻的路线图。在离开伊萨卡之前，我告诉他下次起草法律时还得写一本使用指南，这样我们就知道如何运用它了。”

回到纽约，在同事和愿意接受新观点的上级官员面前，科斯勒和博纳沃朗塔大力宣扬布莱克的理念。尽管满怀热情，但这两名特工在 FBI 官僚体系中地位较低，他们在华盛顿缺乏强有力的关系背景来批准一个积极且需大笔支出的计划来挑战黑手党。

1980 年，他们的头号任务是帮助韦尔奇整治对纽约调查黑手党造成困扰的机构混乱。科斯勒指出，最严重的问题是为争夺资源而出现的相互保密、内部倾轧和对抗，它们消耗着纽约分局的竞争力。和其他有着单一而统一的 FBI 指挥机构的城市不同，纽约的超大面积导致它被划分为三大管辖区。曼哈顿办事处是整个市区事实上的总部，但有个办事处辖有布鲁克林、昆士和长岛，另一个设在新罗谢尔的分支机构则负责北部面积广大的郊区和布朗克斯区。三个办事处各设了一名主管特工，负责他们认为属于自己辖区范围内的所有调查和刑事案件。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边远片区发展成了半独立的分支机构，经常不通知曼哈顿总部的任何人即展开调查活动。

分权管理导致了工作上的割裂和不协调，并产生了令人困窘的后果。科斯勒和博纳沃朗塔发现，调查吉诺维斯家族敲诈勒索活动的工作一直被混乱的重叠侦查所困扰。有个鲜明的例子与乔伊·加洛在昂伯托蛤蜊店被杀时在场的吉诺维斯家族角头“利马”马蒂·扬列诺有关。扬列诺曾被四个小组分别调查和跟踪，而这些小组正在执行六项不同的调查任务。对这个负责从泰晤士广场的脱衣舞吧和同志吧收取保护费的头目，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他进行跟踪。利用小意大利区一年一度的圣吉纳罗节，马蒂甚至靠宗教活动捞取不法收益。在桑树大街昂伯托饭馆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这位身材粗壮的角头可坐等小贩们送来贿赂金。为了在街头节日期间搞到食品、赌博和百货摊位，这些人得从受吉诺维斯家族控制的一个社区市民组织那里取得许可证。

为取得扬列诺的罪证，监视小组各不相让，都互相使绊子和重复调查。更让人沮丧的是，这些调查闹剧过早地让扬列诺警觉到他就是猎物。

另一场混战与吉诺维斯家族的合伙人兼大捞钱人佩莱葛瑞诺·马塞利有关，此人在黑社会有个更响亮的绰号“屠夫好汉”。作为一名毒贩、抢劫者和杀手，当FBI辖区办事处对马塞利的活动展开调查时，另一个办事处正设法指控他贿赂政治人物以取得一份数百万美元的地铁建设合同。曾经有个可笑的插曲，一帮特工在确定马塞利的一名常随亲信的身份时犯了难，那个神秘的暴徒结果却是一名线人，是受另一个调查其他案件的FBI小组指派对马塞利的活动进行渗透。

经过几年你争我夺的调查之后，“种马”马蒂最终被宣判犯下敲诈勒索罪。然而，马塞利案经过多年的波折后最终尘埃落定。他先是受到联邦的轻罪指控，然后是被宣判无罪，最后是被州提起控告后达成认罪协议。在1987年因地铁腐败案而受到诈骗与盗窃罪指控的人当中，马塞利和原劳工部部长雷蒙德·多诺万一起都被宣判无罪。

“那完全是一场因彼此纠缠而造成的灾难，”科斯勒调查了三个办事处打击黑手党的工作之后报告称，“那是能抓到什么就抓什么的状态，每个人都各行其是，想立什么案就立什么案。当时那就像是一场赛马，看谁能最先提起控告。”

尼尔·韦尔奇在纽约分局的任期在突然之间结束了，他所有的改革方案都没有来得及实施。严重的背部疾病迫使他在1980年提前退休。他的继任者李·拉斯特（Lee Laster）支持韦尔奇的改革举措，而且他还让科斯勒草拟计划以便迅速而果断地对黑手党重新展开调查。妙思泉涌的科斯勒拟定了一个有着25个要点的办事手续简化而更具效率的行动计划。他的建议包括：剥夺三个片区主管特工的权力；任命曼哈顿的有组织犯罪主管来统一组织行动；尽可能依靠RICO与《第三章》窃听器与电话窃听之规定除去纽约五大黑手党家族的老板。

整个计划能否成功实施取决于一次彻底的人事重组。科斯勒建议成立五个独立的有组织犯罪小组，每个小组专门负责调查其中一个强大的犯罪家族。三个片区的小组不得各行其是、相互掣肘，不得随意对案件或犯罪家族展开调查。实际上，这些新单位——甘比诺、吉诺维斯、卢切斯、科洛博和博南诺小组——将与黑手党在大都会地区的组织结构相对应。

而且，每个小组将汰除能力欠缺的成员，不再从事无关紧要的调查。它们的主要目标是进行高水准的RICO案件调查，并将重点放在黑手党那取之不竭且极为庞大的金矿——工会和产业敲诈行当上，调查的长远目标是消灭家族的首脑人物并摧毁其经济基础。

“基本情况是‘科萨·诺斯特拉’的组织性比我们强，而我们还必须和他们较量，” 科斯勒分析说，“我们得追捕其领导成员，没收他们的资产，改变他们的文化。我们不能让这些家伙无休止地将权柄传给下一代。过去，如果我们把一个家伙定了罪，我们所能取得的成就不过是创造了一个空缺，创造了让更年轻的家伙得到提升的发展机会。”

科斯勒的整套计划——他的 25 点建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即通过了具有法官资质的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的审查和批准。这位 FBI 局长的迅速反应让科斯勒感到意外。这是一个信号，即除了冷战间谍外，黑手党现在也成了 FBI 的重点调查对象。韦伯斯特给了纽约另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即允许它使用超机密照相机和侦听装置来秘密监视黑手党。以前，这类敏感器材仅限于在反间谍案件中使用。这种设备将配备给一个专门成立的通过特殊的电子与侦察项目来渗透五大家族的“特别行动组”，领导该小组的是富有想像力的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同时也是越战老兵的詹姆士·卡尔斯特罗姆（James Kallstrom），在运用新的 RICO 策略上，他也是一个热情的支持者。

在重新改组的组织机构当中，吉姆·科斯勒由“人事项目主任”提升为有组织犯罪协调主管，成了主持黑手党调查的排头兵。根据五大家族而组建的各个小组不久就部署到位，但特工们不得不就新的目标和技巧，特别是工会诈骗这个重点领域重新接受教育。在 1980 年以前，黑手党调查员的基本工作由普通的敲诈勒索、赌博和高利贷拘捕及证明有罪组成。通常，取得了受害者证词、录下了敲诈时的谈话或对赌注经纪交易室来次突袭，就能让这些案件告破。然而，调查工会敲诈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这些调查是复杂的，要通晓晦涩的工会规定，要查清黑手党人和腐败的工会与资方官员之间的秘密交易。最后，为抓牢有罪裁决，几乎都得通过财务核查来弄清那盘根错节的分赃计划和非法的资金流量。

对许多老特工来说，要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并不容易。“那些黑手党家伙怎样，他们的工会搭档如何，产业活动怎么运作，他们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和博纳沃朗塔一起不停地向各个新小组介绍情况后，科斯勒疲惫地说道：“这些都是耗费时日且情况复杂的案件，这让他们很伤脑筋，但我们必须让他们转变看法，明白工会敲诈案是最优先的考虑对象。”

1980 年年底，就在纽约分局急剧转型之时，吉姆·科斯勒的搭档朱尔斯·博纳沃朗塔被调到华盛顿 FBI 总部。他们俩都相信，这次调动将有利于纽约的长期严打。博纳沃朗塔在 FBI 新成立的国家有组织犯罪缉捕科任二号首长。这份工作把他推到了一

个极为重要位置上，他可以为科斯勒和其手下在纽约构划出的大胆而冒险的非常规行动迅速争取总部的批准。

博纳沃朗塔还可以通过减少胡佛时代遗下的官僚主义的不利影响给予帮助。每隔18个月，正常进行的工作就会被突然来到这个地方分局的总部检查组所打断。事无巨细的审计员们得查实所有规章制度都被落实，每分钱的开支和每个回形针的使用都得严格审批。另外，检查人员要编写每个单位和每个特工拘捕人数的报告。这是胡佛时代留下来的传统，当年在国会预算紧缩的情况下，IGB（非法赌业）逮捕配额经常被用来粉饰FBI的形象。特工们嘲笑这种检查是“统计专家的入侵”，博纳沃朗塔则开玩笑地讽刺说，这些检查人员如果不成功地把FBI的名字改成“联邦会计局”是决不罢休的。这类检查必须得忍受，但好在博纳沃朗塔被安排在关键位置上可以在华盛顿化解和抵挡令人讨厌的指责。几乎可以肯定，那些目光短浅的探听者会掣肘纽约那费用浩大、旷日持久且未能取得即时性重大成果的有组织犯罪调查，这就得靠博纳沃朗塔去消除这些麻烦。

当五个黑手党小组开始展开行动时，科斯勒邀请鲍勃·布莱克为特工们讲课，使他们增强为RICO案件搜集证据的意识。科斯勒和FBI高层官员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个拥有不寻常资源的敌人。FBI于1980年发布的秘密报告不容乐观地承认，“科萨·诺斯特拉”是全国发展最成功的产业之一。据保守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其非法年收益约为250亿美元。据FBI和警方黑手党分析家估计，他们在纽约地区的包括间接费用在内的“毛收入”在120亿~150亿美元之间。

意识到黑手党的异常强大，布莱克不停地告诉特工RICO是战胜“科萨·诺斯特拉”的理想武器。“我希望你们在某个法庭里靠一个案子起诉所有老板，”在1980年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在曼哈顿市中心体育俱乐部用餐时，他对吉姆·科斯勒说道，“我做梦都想起诉纽约的每一个老板——整个管理委员会。”

没有多少胃口的科斯勒慢慢地吃着食物，心想，对于布莱克来说，白日梦似地幻想着对黑手党最高首脑们进行大规模调查当然要容易得多。FBI才刚刚开始它的首次集中行动，能否取得哪怕是小规模胜利都很难说。在一个保守而墨守成规的机构里，科斯勒不过是个地位较低的主管特工。他该如何宣扬这些大胆而新奇的理念？他怎么能搞到物力、财力和人力？他知道，如果他在官方备忘录中照搬布莱克所有的乌托邦式的建议，FBI的高官和司法部会认为他已经工作出轨了。

尽管如此，没有人特地打响发令枪，一位法学院的教授和那群为他所鼓舞的特工已经起跑奔向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检控管理委员会，攻击黑手党的心脏。

第 21 章 大亨

“告诉他这是纽约管理委员会。告诉他，他现在是和大亨们打交道。”

FBI 总部以北 5 英里，在东哈莱姆一个昏暗的临街铺面里，吉诺维斯家族的一个首领正在谈到管理委员会。实际上，他是在炫耀那个机构在全国的独裁影响。

“告诉他这是纽约管理委员会。告诉他，他现在是和大亨们打交道。”

1984 年 10 月的一个上午，在其盘踞的堡垒帕尔马好汉社交俱乐部（Palma Boys Social Club），“胖子托尼”安东尼·萨勒诺正向两个克利夫兰使者传达指令信息。这个俱乐部绝不是什么好汉的聚会场所，也不是什么青少年的娱乐中心，而是托尼·萨勒诺的办公地和合意的会场。萨勒诺身材肥胖，容貌可亲，很难让人将他与其真实职业相联系。FBI 和全国各地许多黑手党人都认为萨勒诺就是吉诺维斯家族的老板。与客人一起啜饮着咖啡，胖子托尼慷慨激昂地向他们讲了许多话，要他们警告一个傲慢无礼的家伙，称纽约的老板们将最终决定他们克利夫兰家族的领导权变更。实际上，纽约管理委员会的影响范围向西已远远扩大到芝加哥。如果有争端牵涉到更西部的一个家族，它就会由管理委员会和芝加哥家族共同来解决。

不像纽约其他态度冷淡且不愿会见外人的黑手党教父，萨勒诺平易近人。克利夫兰、费城、新英格兰、布法罗和其他城市的黑手党人都把他看成一个向纽约其他教父传递重要信息的渠道。他们经常就希望管理委员会出面考虑和解决的内部问题到帕尔马好汉俱乐部找他商量。外地的使者也往往知道在哪里才能找到萨勒诺。

在与克利夫兰的黑手党人会谈时，纽约的老板们没有注意到 FBI 正准备对他们发起进攻，而萨勒诺在高声谈论黑手党的“政治局”，即管理委员会的至高权威时心中并无不安。他在东哈莱姆感到特别安全，从童年到成人，那里一直是其世界的中心。

萨勒诺在成长中经历了那个地区排挤意大利人的过程，目睹了那里渐渐变成了一个西班牙语区的哈莱姆，一个波多黎各人占绝对优势的聚居区。在 80 年代，只有少量老意大利人和为数不多的意大利餐馆留了下来。第一大道有段延绵三个街区的街道，这些没有离开的意大利人和饭店便扎根在这段名为“快乐街”的市区道路两侧，尽管这个名字听起来并不协调。这是一块保留着旧式风格的老片区，很适合萨勒诺的活动需要。这里的紧凑逼仄是一种有利条件，可以为他的不法活动提供保护。追根究底的陌生人肯定是警察或特工，因此很容易被隔离起来，而且他们到来的警讯也会被迅速传给萨勒诺身边的人。

萨勒诺生于 1911 年。在 30 年代“科萨·诺斯特拉”的初创时期，已经成年的他成了一个黑手党人。在早期和新组建的洛克·卢西亚诺家族，他带着年轻人的闯劲循着黑手党人惯常的道路爬升，由高利贷执法人成长为一个负责家族的赌注经纪、数彩赌博和高利贷活动的头目。东哈莱姆与哈莱姆附近地区是赌博盛行的地方，萨勒诺早年在那里及时抓住了赚钱机会。

卢西亚诺帮派最终发展成为吉诺维斯犯罪家族，而萨勒诺也成了 1946 年惹上大麻烦的东哈莱姆高级角头“扳机迈克”迈克尔·科普拉（Michael “Trigger Mike” Coppola）的副手。据侦探们称，科普拉帮过当地国会议员维托·马坎托尼奥（Vito Marcantonio）的忙。“扳机迈克”指使三个暴徒前去教训马坎托尼奥的一个政治盟友，因为马坎托尼奥怀疑他在竞选中出卖了他。科普拉的拳击手出手过重，打碎了那家伙的头骨让他丢掉了性命。这起残忍的谋杀立刻让舆论哗然。媒体声称黑手党牵涉其中，是一起具有政治动机的凶杀案。种种因素迫使平时乐于施惠于人的警察不得不对科普拉采取行动。为躲避警察的追捕，科普拉逃到佛罗里达州。这是托尼·萨勒诺的大好机会，只有三十多岁的他成了东哈莱姆吉诺维斯家族的角头，前途一片光明。

作为一个打手或枪手，乃至后来作为一个角头，萨勒诺都曾经因情节轻微的赌博罪指控被捕过，但那顶多是交点罚金或者很快被驳回。这些短时间的拘留不过是警方那可以预料的、经常性的骚扰。为完成拘捕定额，同时也是向公众显示他们的廉正不阿，警方会以各种荒谬的借口来逮捕一些人。早些年，萨勒诺经常用各种假名字，通常是“托尼·巴勒莫”或“托尼·拉索”，来搪塞这些令人讨厌的逮捕。

到了中年，萨勒诺那 1.74 米的短粗身材发福起来，体重高达 104 公斤，这让他黑社会博得了“胖子托尼”的绰号。但他一旦根基稳固并成为吉诺维斯家族的权势人物，就没有人胆敢当面提起那个名字。1959 年，在调查他与其他黑手党人操纵弗洛伊德·帕特森（Floyd Patterson）和英格玛·约翰森（Ingemar Johansson）在扬克体育

馆进行的重量级拳王争霸赛的指控时，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对他的绰号和重要性变得敏感起来。尽管怀疑萨勒诺和吉诺维斯家族在这场拳击赛中暗中渔利，但检察官们未能找到相关证据。没有被提起公诉，胖子托尼又一次赢得了法律上的胜利。

萨勒诺在东哈莱姆行事低调，在黑手党的重大集会上，或在科帕卡巴纳俱乐部和其他黑手党人经常光顾的小酒馆里，他从来没有被调查人员盯上。他那自然而不造作的生活方式在他送给朋友的圣诞照片上得到了体现。照片上，这个肥胖的黑手党头目独自站在圣诞树前，身上穿着睡衣和浴袍，嘴里叼着一根雪茄，头上俏皮地反戴着一顶棒球帽，眼睛执拗地盯着照相机镜头。

1977年，66岁的萨勒诺碰到他一生中最为棘手的逮捕。FBI将他羁押起来，指控他是纽约最大的赌注经纪人和高利贷者之一，控制着一个拥有200多名地下雇员和年毛利达1000万美元的网络。那时，赌博和高利贷逮捕是FBI的工作重点，相关涉案者是FBI对黑手党展开有限调查的主要对象。另一个经常用来对付黑手党的武器——偷逃所得税指控也瞄准了他。这项控告声称，他申报的年收入约为4万美元，而实际上他每年从其不法产业中取得100多万美元的收入。

萨勒诺聘请罗伊·柯恩（Roy Cohn）为他的辩护律师，后者以右翼政治立场和政治掮客的名声出名，能够变戏法似地帮助其罪犯当事人达成温和的认罪协议。50年代，被指控为苏联窃取核弹机密的朱利叶斯（Julius）与埃塞尔·罗森伯格（Ethel Rosenberg）以间谍罪接受审判并被处以死刑。作为一个言辞犀利尖刻的联邦检察官，柯恩正是靠在这桩备受争议的间谍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一举成名。后来，在他偏执狂似地追查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共产党危险分子期间，他成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首席法律顾问。在私人执业过程中，柯恩成了黑手党被告特别喜欢的人，往往被私下要求以其交易撮合者的角色说服他的政治联络人对法官和检察官们施加影响。

两次就所得税指控进行的审判都因陪审团的内部僵持而悬而未决。柯恩随后和联邦检察官们商定了一份认罪协议。萨勒诺承认犯下已从轻指控的一项非法赌博重罪和两项纳税轻罪来换取从轻量刑。接受审判时，胖子托尼坐着轮椅出现在联邦法庭上，声称自己身患时刻危及生命的重病。否认其当事人是个黑手党人的柯恩把他描述成一个贪财的“体彩赌徒”，恳求法官考虑萨勒诺的年迈、虚弱的身体和没有污点的档案记录给予轻判。

这种策略果然奏效。萨勒诺被判处短短六个月的监禁并处罚金25万美元，而不是最低刑期两年的判决。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柯恩挡掉了针对其6名共同被告的赌博指控，其中包括萨勒诺的弟弟西瑞诺。听到法官的宣判，胖子托尼轻声说道，

“谢谢你。”他有足够的理由感到庆幸，这种短刑期的判决可以让他留在曼哈顿老城区一个管理宽松的拘留所里，在那里他能够便捷地与手下联系，而不必前往一座管理森严且遥远的监狱。

法律麻烦解决之后，萨勒诺于1978年底如期回到街头。从周一到周四，他白天大多数都在其位于快乐街和第一大道之间的东115号大街上的总部帕尔马好汉俱乐部度过。俱乐部——一个大而空旷的房间——按20世纪中期黑手党人的标准风格布置：屋子里有个配备咖啡机的吧台，还有几张牌桌和硬靠背木椅。后部约占整个空间三分之一的地方是萨勒诺的私人办公室，只有他最信任的心腹和受到邀请的客人才可入内同他围坐在一张旧桌子旁谈话。在离俱乐部几步之遥的一家水果蔬菜店的楼上，萨勒诺拥有一套狭窄而简陋的公寓房。有条隐蔽的连接街道的小巷直通到他的门前，这既保证了其住宅的私密性，也提高了它的安全性。

每到星期四或星期五，萨勒诺就会变换居所。从这个波多黎各人聚居区的住宅出发，他驱车两小时就可赶到哈得逊河谷的莱因贝克镇，那里有他占地100英亩的庄园——入口处两侧各立着一匹巨大的白色石马的斯普鲁斯巴农场。他在那里养了一些纯种马。他经常与妻儿一起在这充满自然风光的乡间度周末，这个时候，他那些受过吩咐的仆从绝不会拿黑手党的事情来打扰他。无论其帮派里发生了什么问题都得等到他愉快地过完周末，农场里是不会举行“业务”会议的。

像钟表一样准确，每到周一上午10点钟，萨勒诺就会坐在帕尔马好汉俱乐部里。天气晴朗时，萨勒诺会费力地走出俱乐部，坐到一张摆放在人行道上的椅子上晒晒太阳，身边围着他忠实的伙伴们。自1981年的一次轻微中风之后，他就得靠着拐杖行走了。叼着一支雪茄，戴着一顶浅顶软呢帽，穿着起皱的衣服，萨勒诺在路人看来和普通的退休老人没有两样。上了年纪的他过着恬淡而安详的日子，每每还被那天真无知的闲聊逗得发笑。

在80年代初期，萨勒诺和纽约大多数黑手党首领的快乐时光似乎没有尽头。胖子托尼及其“科萨·诺斯特拉”同党们就像他们前辈过去几十年那样波澜不惊地打理着他们的“生意”。他们觉得没有理由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习惯。他们安全地待在那特别的城堡（他们的社交俱乐部、家庭、饭店、汽车）里，自由地谈论着黑手党的事务。在这些庇护所里，他们感到既不会受到人身伤害，也能避开执法人员的电子监听。如果有严重的外部危险悄然出现，他们似乎也未采取应对措施——即使有着大量的警讯传来。

没有一个老板对1981年执法部门的内部变化多加留意。在11年前的1970年，带

着更多虚张声势的成分，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和州立法机关创建了州有组织犯罪特遣队。美国参议院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针对黑手党在纽约市都会区的活动及其工会敲诈举行了一系列令人尴尬的听证会，州里的政治家迟迟才对此做出反应。特遣队的任务是调查和协调牵涉不同县、区的检察权限发生重叠的案件。然而，一旦成立，它就成了一种政治上无足轻重的附属品，不过是为自称具有检察官资质的律师和退休后寻找稳定的调查员职位的前警官们提供照顾性的就业机会。在组建后的11年里，特遣队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共和党政府里未能带来一次意义重大的调查、控告或有罪判决。

两位民主党官员，即纽约州长休·凯里（Hugh Carey）和司法部长罗伯特·阿布拉姆斯（Robert Abrams），决心向这垂死的特遣队注入新的生命力，便于1981年联合任命了一名新主管来领导这个机构。他就是长期在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从事敲诈勒索案起诉工作的罗纳德·戈德斯塔克（Ronald Goldstock），这位身高1.83米的瘦高个律师还以代检察长的身份为美国劳工部调查贪污腐败问题。作为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一名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戈德斯塔克对纽约黑手党的历史非常了解。更为重要的是，他曾帮助管理过鲍勃·布莱克的康奈尔大学有组织犯罪研究所，并急切地想应用布莱克那未经实战考验的检控理论：打击黑手党对合法产业和工会的控制，并依靠《第三章》的电话窃听装置和窃听器挖掘关键证据和情报。

戈德斯塔克阐明了其行动方案之后，州长凯里回道，“去干吧，你尽可放手一搏。”特遣队的总办事处设立纽约北部郊区的怀特普莱恩斯，戈德斯塔克赶到那里上任的第一天，看到的是一幅毫无生气的景象。律师检察官们读着报纸，着迷于纵横拼字谜，许多人将脚搭在桌子上，对他们新首长的出现毫不在意。“他们不但没有事情可做，而且满不在乎。”感到惊讶的戈德斯塔克心里想。更让人震惊的是，他发现特遣队的情报档案实际上毫无价值可言，其内容足以显示他们没有更多兴趣深入该州两个最大的黑手党大本营——纽约市和长岛开展调查。

很快，戈德斯塔克裁掉了办事处里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人。有了一笔追加的近3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他将人手扩充三倍达到140人，招纳了一批大多数都具有丰富的刑案经验的检察官和调查人员。戈德斯塔克于1981年7月清楚地亮明了他的意图，声称要打击黑手党对重要产业和工会的控制及其毒品走私活动。“这是个关键时刻。”这位满腔激情的执法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说，同时指出他瞄准的是高层黑手党人——老板们。

就在州里加速展开行动时，还有更为糟糕的消息等着博南诺家族和管理委员会。

FBI欣喜地透露（也是在1981年）称，有个特工首次渗透到博南诺家族的一个行动队里，这使得检控该家族成员已指日可待。化名“唐尼·布拉斯科”（Donnie Brasco）的特工约瑟夫·皮斯通（Joseph Pistone）成功地扮演伪装了6年的崇拜者。身为抢劫案调查小组的成员，皮斯通的本来目的是查出并消灭重要的买赃卖赃者。但他以捞钱人和合伙人的身份混进了纽约黑手党的一个行动队，他的“仕途”后来发展得超乎想像：博南诺家族的一个头目打算推荐他正式加入其家族。除了皮斯通获取的大量坚实可靠的罪证外，他的冒险经历给人们提供了一次珍贵的了解纽约普通黑手党人思想状态的机会。在闲时的逗笑过程中，博南诺家族的普通打手“左撇子枪手”本杰明·鲁吉埃诺（Benjamin “Lefty Guns” Ruggiero）就加入黑手党的好处给“唐尼·布拉斯科”和另一个名叫“托尼”的卧底特工上了一课。“妈的，唐尼，你没发现这家伙其实什么都不是吗？”左撇子枪手说。“托尼，成了聪明汉，你可以撒谎，你可以欺骗，你可以偷窃，你可以合理合法地杀人。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对你指三道四。谁不想成为聪明汉？”

除了皮斯通对博南诺家族那令人尴尬的渗透所造成的可能破坏之外，管理委员会成员们有理由更加小心。左撇子枪手曾让皮斯通参与和纽约、佛罗里达和密尔沃基其他家族共同开展的合作项目，因此会牵连到多个家族的成员，并有可能危及到管理委员会。

黑手党对皮斯通摇身一变成了FBI间谍迅速做出了反应。有线人向特工们告发称，黑手党大佬们悬赏杀手50万美元，要他们在皮斯通能够作证之前除掉他或杀死他的妻儿。这名特工及其家人变换了居所并受到全天候保护。估计黑手党最高权力机关已经发出了谋杀令，特工布赖恩·泰勒（Brian Taylor）和帕特·马歇尔（Pat Marshall）夜间造访了被怀疑是管理委员会成员的胖子托尼·萨勒诺。在其东哈勒姆的寓所里，他们找到了他及其最受宠信的副手“飞鱼”文森特·卡法罗（Vincent “Fish” Cafaro）。特工们直言不讳地亮明来意：如果皮斯通和他的家人受到伤害或威胁，大规模的报复将会降临到黑手党头上。“传话过去，托尼，不要碰皮斯通。”泰勒说道。“我们不伤害警察，我们不伤害特工，”神态镇定的萨勒诺回道。“嗨，你们是尽自己的职责，我向你们保证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步出寓所，见惯了黑手党人的傲慢自大和满口污言秽语的马歇尔对萨勒诺的言谈举止印象深刻。“不论他在别人面前如何，但对于我们来说，他表现得像个绅士。”

皮斯通及其家人没有受到伤害。

皮斯通的伪装与渗透对博南诺家族产生了直接影响。对皮斯通的渗透负有责任的

打手被处死或遭驱逐。其他家族和管理委员会都将博南诺家族的成员排除在所有合作的不法行当之外，刻意回避这些不可信任的贱民。皮斯通的证据让“左撇子枪手”鲁吉埃诺和博南诺家族其他几名打手和合伙人受到敲诈勒索罪指控并被判刑，但纽约其他家族及其老板看来暂时安然躲过了这一劫。

然而，从1982年到1983年，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黑手党及其无孔不入的非法敲诈活动受到了密集调查。1982年4月，《纽约时报》详细披露了黑手党在纽约市10亿美元的建筑产业中占据了难以置信的主导地位。标题为“腐败的产业”的系列文章描述了非法操纵的竞标，工会与黑手党人的腐败勾结是如何吸走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并大幅抬高大型公共与民营工程的造价。这篇引人注目的报道披露称，一个与黑手党关系密切的由供应商与承包商组成的卡特尔让纽约市承受了全国最高的建筑成本——与东北部地区的城市相比较增加了70%。从舞弊交易中捞取回扣的高级黑手党人把将选中的承包商称为“棍棒”。这个组织主要参与纽约市造价最为高昂的工程项目，致使所有者不得不提高商业和住宅设施的租金以弥补超出部分的建筑成本。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曼哈顿每一个造价达数百万美元的工程都成了“棍棒”染指的对象，《纽约时报》称。在被黑手党的无形之手“课税”的知名工程当中，有费用浩大的炮台公园城、汉姆斯利宫酒店、IBM大厦和川普大楼。同样受侵害的还有一个公共展览场所——纽约州贾维茨会展中心。据州审计人员估计，将承包商的较大利润计算在内，其工程造价不超过1800万美元。然而，黑手党精心策划只允许两个受其控制的报价分别为3000万美元和4000万美元的承包商竞标。震惊的官员们与低报价者谈判，将造价降至2650万美元，但这仍比他们自己估算的高出800万美元。几年以后，这些被授予高造价合同的建筑公司——统称为Nasso-S&A集团——被曝光，秘密股东胖子托尼·萨勒诺随后被赶走。

甚至罗纳德·里根总统也针对黑手党的壮大敲响了警钟。“现在，有组织犯罪势力已深入到我们社会的每个层面。”1982年10月14日在司法部大礼堂做电视演讲时，里根引人注目地宣称。援引司法部长威廉·弗伦奇·史密斯（William French Smith）在秘密内阁会议上递交的情报报告，里根称司法部正在采取一种新的策略，今后它将“更积极地检控黑手党，包括运用RICO法令查抄其更多的金融资产。”他命令联邦机构，特别是FBI，要在打击黑手党的联合行动中与地方执法部门紧密团结。里根实际上正式废止了约翰·埃德加·胡佛几十年来拒绝分享情报的不合作政策。里根指出，在打击黑手党上，他的政府会比历届政府更积极主动，并声称他正在任命一个总统特别委员会谋划更多的举措来打击有组织犯罪。

纽约的 FBI 官员对华盛顿的支持感到满意，他们开始宣称雷霆之击将落在五大家族的首领头上。他们公开并充满信心地谈论着打击黑手党的工作，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1983 年 8 月，FBI 纽约刑事处处长托马斯·希尔（Thomas L. Sheer）大胆地预言，不久的将来将有几十起检控案。“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五大家族的领导集团，这些控告将具有特殊意义且数量庞大，”新闻报道援引希尔的话称，“我们不会追踪外围角色。”希尔吐露说，纽约分局已启用吉姆·科斯勒的计划对付黑手党：近 200 名特工已经部署到调查的第一线，特别是针对每个犯罪家族的五个 FBI 小组已经组建完毕。

1983 年 7 月，另一个自称是黑手党死敌的人到来了。他是纽约南区的新任美国检察官，其辖区涵盖屡屡发生重大刑事与民事案件的曼哈顿。委派到这个享有盛誉的办事处主持工作的人是 39 岁的鲁道夫·威廉·吉乌里亚利（Rudolph William Giuliani）。

从纽约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吉乌里亚利自 1970 年至 1975 年在曼哈顿任助理检察官，并在此期间证明了自己是个锐意进取的公诉人和老练的讯问者。吉乌里亚利早年是民主党人，1972 年曾投票支持该党自由主义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而到了 80 年代，他却成了一名忠实的共和党人。里根的共和党政府选任他为司法部副部长，成为主管刑事处的三号首长。当曼哈顿美国检察官的职位出现空缺时，吉乌里亚利抓住机会得到了它，尽管其级别从技术上讲比华盛顿司法部里的职位低。在解释自己的决定时，吉乌里亚利称领导纽约南区是全国最具有挑战性的执法工作，他从任检察官时起就渴望获得这个职位。吉乌里亚利对只有少数 FBI 和司法部高官知道的内情守口如瓶。他曾被约略地告知过，诱捕纽约黑手党老板们的调查大网就要撒出。

身材偏胖的吉乌里亚利自认为是个工作狂，但谈起他所喜欢的娱乐活动，人们会发现这个法庭上表情冷酷、目光严峻的公诉人却是个乐天派，他会去欣赏戏剧，还会为纽约扬基队加油喝彩。这位新美国检察官知道如何措辞表意，报纸和电视记者们发现他的话很适合引用。赶到南区赴任时，他曾被问及将如何使用他的 130 名检察官。他那早有准备的回答是：粉碎黑手党和毒品走私是既定的最高任务。“进攻那些家族是个相当不错的办法。”他告诉采访者，既亮明了 FBI 的新策略，同时也警告教父们利箭已在弦上。

在提到他本人的种族背景时，吉乌里亚利向记者们强调称，大多数意裔美国人都为美国黑手党的坠落感到羞耻。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和第四代意裔美国人，他称自己经常听到亲人讲述自己家族遭受的伤害，让他年少时就对黑手党人燃起了仇恨

之火。上个世纪初，“黑手”敲诈者们就向他的一个开香烟店的曾祖父勒索钱财。另一个做面包师的亲人则因为无法筹足黑手党人索要的保护费而自杀。在接受采访和做演讲时，吉乌里亚利经常自豪地提到自己亲属的执法成就：他有5个叔叔在纽约警察部门效力，还有一个警察堂兄在阻止拦路抢劫时牺牲。

吉乌里亚利打击黑手党的动机或许还在于他需要驱散他从未对外讲起过的玷污其家族历史的阴影。在吉乌里亚利离开检控工作很久以后，即在他第二次当选纽约市长时，他父亲和他的一个叔叔及一个堂兄的犯罪记录被曝光。在2000年出版的传记《鲁迪》(Rudy)当中，调查记者韦恩·巴雷特(Wayne Barrett)披露了其家族的负面历史。1934年，因在曼哈顿一栋公寓楼里抢劫送奶工，吉乌里亚利那26岁的在大萧条中失去工作的父亲哈罗德(Harold)被逮捕。哈罗德在拷问中供认了抢劫罪行，随后被判处16个月监禁。巴雷特还声称(未出示法庭档案)，哈罗德·吉乌里亚利在五六十年代曾替其姐夫——鲁迪的叔叔强索保护费，而后者是布鲁克林有名的高利贷者和黑手党的合伙人。巴雷特还称，这个叔叔的儿子刘易斯·达万佐(Lewis D'Avanzo)，即鲁迪的堂兄和校友，在六七十年代曾和科洛博及甘比诺家族合作过。法庭档案显示，1969年达万佐因抢劫汽车而被判刑入狱。1977年，调查一个盗车团伙的FBI特工用枪击中了获释出狱的他并致其死亡。

无论是何种因素在刺激吉乌里亚利，在执法圈子内部，没有人怀疑他铲除黑手党的热情。1984年1月，在他任美国检察官六个月之后，他接受了一次采访。当讲到他曾祖父受祸害的情形时，他那乌黑发亮的眼睛变得黯淡起来。他特别指出，亲自主持检控黑手党老板的法庭起诉工作将让他感到莫大的快乐。“有两桩案子我正在酝酿。”他明确表明检控工作即将展开。

无视媒体关于政府决心对纽约黑手党采取严厉措施的报道，一些政客显然乐意为被定罪的黑手党人出面游说。在吉乌里亚利赴任之初，由于被政府认定为吉诺维斯家族角头的马里奥·吉甘特(Mario Gigante)被判刑，纽约共和党参议员阿方索·达马托(Alfonse D'Amato)就此给他打电话提出了非分要求。查明犯有高利贷和敲诈勒索罪后，吉甘特正设法减少其8年的刑期，而推荐吉乌里亚利任美国检察官的达马托则明确指出他的量刑似乎过重。

吉乌里亚利称，他指责达马托提出此等要求，并反对减少吉甘特的刑期。然而，在罗伊·柯恩提出动议之后，吉甘特的原判刑期被减去了两年。吉诺维斯家族的打手菲什·卡法罗后来声称，为争取减刑，他曾送给柯恩17.5万美元用于打通关节。

还是在80年代初，纽约的一帮政客为吉诺维斯家族另一个已承认犯下劳工诈骗

罪的党徒和大捞钱人文森特·第那波利（Vincent DiNapoli）进行过类似的干预。其共同被告西奥多·玛利塔斯（Theodore Maritas），纽约市木匠协会的主席，在他遭受指控后失踪了，检察官们相信黑手党因为害怕他会成为告密者而杀人灭口。为第那波利伸出援手的是布朗克斯区民主党议员马里奥·比亚吉（Mario Biaggi）和一个由四名州立法委员组成的两党连立小组。他们强烈要求一位联邦法官缓期执行第那波利的5年刑期。那五名官员当中有三人声称了解第那波利本人，建议应给予他自由以帮助贫困青年在建筑行业中找到工作。事实上，他恰恰就在那个行业中犯下了诈骗罪。在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的强烈抗议下，那位法官拒绝修改判决。（1988年，国会议员比亚吉被吉乌里亚利办公室证明有罪，罪名是收受贿赂使政府的防务合同落入布朗克斯生产商韦德技术公司手中。）

纽约身居高位的政客对“科萨·诺斯特拉”的活动或许表现得无动于衷，但高级执法官员的态度却突然之间变得强硬起来。1984年，如果纽约教父们需要更多证明危险时刻即将到来的不祥线索，他们只需掂量FBI的话。“我们将让五大家族蹈入死地。”FBI官员希尔发誓说。在《纽约时报》的头版访谈文章当中，他强烈地暗示了FBI何以如此确信老板们已经处在其枪口之下。大部分证据都源源不断地从“电话与窃听器窃听”中得来，希尔所言非虚。

第 22 章 “美洲虎” 行动

在谈话过程中，他们讲出了一个名字——“管理委员会。”这是个料想不到的收获，其影响超出了戈德斯塔克与其手下最为乐观的估计。

攀越作响的锚链护栏时，倾盆大雨掩护了杰克·布雷赫尼（Jack Breheny）与他的两名队友。这种理想的天气很适合这三人突击队式的行动：潜入一辆新款 XJ-6 “美洲虎”，将窃听器安装在黑手党一名重要角头的时髦跑车里。

纽约有组织犯罪特遣队电子专家布雷赫尼已从 1.5 米高的围栏上跳到地面。现在他安全地进入了那饭店的大型露天停车场。几秒钟之后，技师吉姆·施特罗（Jim Stroh）和调查员理查德·坦尼恩（Richard Tennien）也各自翻过护栏。他们低身潜行了约 30 米，来到那辆黑色的“美洲虎”旁，这时周围看不见任何人。“谢天谢地下了这场雨，”布雷赫尼暗自庆幸。“真是再好不过的掩护。谁会顶着大雨到停车场里晃悠？”布雷赫尼已准备好钥匙打开车门，可真是好运连连，车门居然没有锁上。布雷赫尼先进入车内，蹲在车后部，用手电照在仪表盘上。用普通的螺丝起子，布雷赫尼和施特罗拆开了仪表板。健壮的布雷赫尼身高 1.92 米，只能把在已打开的仪表箱里拧来拧去的细致活交给个头瘦小的施特罗。没有与队友多言，施特罗用绝缘胶带将一个半英寸的麦克风和三个三英寸的发射机固定在仪表盘面板的内侧。装好这些微型装置后，他用一根蛛丝般的电线将它们接在连着汽车电池的熔线板上。电池会提供窃听器和发射机的工作“燃料”——电力。

像事先演练的那样，布雷赫尼和施特罗一起将仪表盘面板装了回去。任务完成后，两人小跑着奔向围栏并攀了上去。坦尼恩在后面滞留了一两分钟，他的任务是移去事前铺在前后座和地板上的塑料布，再用毛巾擦干了几处弄湿的地方。这样就能确

保不留下泥泞的痕迹，否则会让人察觉到有人潜入了汽车。清理完毕，迪克·坦尼恩也翻过护栏来到了队友身边。他们在卢切斯犯罪家族首领的移动指挥部里安装窃听器的惊险行动前后花了不到10分钟。但在他们1983年顺利取得成功之前，密切监视和耐心分析的基础性工作却持续了一年多。

1981年，罗纳德·戈德斯塔克开始对州反黑手党特遣队进行了重新改组，而“美洲虎”计划便发端于此。他的初衷是要抛弃在黑手党罪案发生后才展开调查的能抓到什么就抓什么这种被动的老路子。戈德斯塔克将新调整的人员分成若干小组，指示他们找出“非传统”的办法涤清受黑手党控制或影响的行业。每个小组都补充了调查员和检察官，准备为可能的检控和民事诉讼挖掘必要的罪证。戈德斯塔克还为他的团队注入了新的力量，他聘请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工会改革家和历史学家担任顾问。作为分析人士，他们的任务是推荐经过补漏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解决办法来彻底改革被黑手党侵蚀的产业。戈德斯塔克希望结束刑事审判这种令人沮丧的循环，审判常常是除掉一批黑手党人之后，眼看着他们又被另一批新暴徒所替代。

80年代初，每个执法部门都知道，纽约市区的垃圾收集、运送和倾倒在很大程度上都被黑手党所控制。联邦和地方的情报档案里堆满了线人的秘密情报和受胁迫的垃圾清运商投递的秘密控告书，它们都与黑手党人搜刮垃圾行业有关。尽管如此，这些猖獗的违法活动并没有受到政府的真正干涉。而政府信手拈来的不作为理由是，老实的垃圾清运营商太害怕报复而不愿同官方合作，更不用说在法庭上公开做证。尽管有着显而易见的重重困难，但戈德斯塔克决心着手治理垃圾处理行业。1982年初，在他接管特遣队六个月之后，一个小组开始调查黑手党控制长岛的两个大县——拿骚和萨福克境内的垃圾清运公司。

岛上每个垃圾清运营商和侦探都知道，“科萨·诺斯特拉”将长岛成吨成吨的垃圾都变成了黄金。犯罪者是卢切斯家族。几年前，黑手党线人就向FBI和当地侦探指认了卢切斯家族谋划垄断长岛垃圾清运业的领导人身份，他的名字叫“鸭子托尼”安东尼奥·科拉罗。

出生于东哈勒姆的科拉罗有过成功的黑手党成长经历，十几岁时他曾做过瓷砖镶嵌工，后来找到了他真正的职业理想。30年代，他投靠到未来的教父“三指布朗”汤米·卢切斯的门下。科拉罗是卢切斯的一个虔诚的门徒，他从导师那里学到了黑手党基本的城市活动技巧。其课程包括放高利贷、绑架和较为讲究的与腐败的工会官员勾结，以及通过工会化运动和罢工为要挟敲诈服装中心各个公司的实践课。贩毒是科拉罗研究的另一门高级课程，但哈里·安斯林格手下一个誓不言弃的毒品特工在1941

年逮捕了他，罪名是私藏价值 15 万美元的大宗海洛因，并从街头零售收入中瓜分了几十万美元。科拉罗被判处短短六个月的监禁，其他黑手党人据此认为，卢切斯非常看重科拉罗这个在服装中心为其效力得力助手，所以才会上动用其民主党的政治关系和进行贿赂来影响判决。

从 1941 年到 1960 年，科拉罗先后 12 次被捕，罪名是涉嫌卷入谋杀、抢劫、绑架和敲诈勒索活动，但所有指控均在审判前遭到驳回。卢切斯发现科拉罗善于钻法律的空子，并能通过引人发笑的逗乐方式劝阻控方证人。他表现得如此风趣圆滑，以致其身边的人称他是“‘鸭子’托尼再世”，于是“‘鸭子’托尼”便成了他终身的绰号。在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的劳工诈骗听证会上，科拉罗的油滑让他博得了一句负面的赞美话：“他是我们打过交道的最可怕、最坏的黑手党人。”

到了 60 年代，他在诉讼中就不再有太多的好运气。1962 年，因企图操纵一桩破产案，他和一名联邦法官及一位前美国检察官一道被宣判有罪。“鸭子”被判处两年监禁，但那些控告表明他是黑手党内具有影响刑事司法系统的这一非凡能力的重要人物。科拉罗的政治灵活性在 1968 年进一步显露出来，当时他卷入一桩贿赂案当中，而该案牵连到纽约市长约翰·林赛（John Lindsay）的一名亲密助手。科拉罗和“坦慕尼厅”领导人卡迈恩·德萨皮奥（Carmine DeSapio）一起被判有罪，罪名是向林赛政府的专员詹姆斯·马库斯（James L. Marcus）行贿，目的是为一个黑手党公司争取一份数百万美元的市政蓄水池清理维修合同，这次判刑让科拉罗又在联邦监狱里待了两年。

除了这两次在狱中服刑，60 年代“鸭子”托尼关注的重点转到了垃圾上。二战后不久，颇具先见之明的科拉罗注意到郊区人口的膨胀，便将卢切斯家族的旗帜插上了长岛。作为卢切斯家族的重要角头，他转战到那里并准备利用战后郊区扩张之机来牟利。战前属半农村地区的长岛经历了一次人口膨胀，其人口在 60 年代迅速飙升到 200 万。50 年代，科拉罗开始在那里进行赌博、放高利贷和敲诈勒索等不法活动。通过吉米·霍发与卡车司机协会其他腐败官员，在岛上大规模建造住房和商业设施的大批发展商和承包商都成了他的勒索对象。到了 60 年代中期，建筑业出现衰退，但长岛的快速发展将垃圾清运从一个不起眼的挣钱行当变成了一个年利润达数百万美元的重要产业，科拉罗发现了它的潜力。

1967 年，汤米·卢切斯死去。托尼·拉克斯成了其当然的继承人，尽管因蓄水池案被定罪判刑，但其老板之位仍为他保留着。专司毒品贩卖的角头“格里布斯”卡迈恩·特拉芒提（Carmine “Gribbs” Tramunti）作为临时老板暂时执掌家族权力，直到

他因毒品犯罪被起诉。1970年获释后，57岁的“鸭子”托尼就出任卢切斯家族无可争议的教父，并在管理委员会获得一个席位。通过贿赂和发挥黑手党对看守的影响，科拉罗吃的是美味佳肴，干的是狱中轻松的活儿，其监狱生活相对舒适许多。与其至高等级和突出的地位相适应，在长岛北海岸蚝湾的一个富人聚居区，科拉罗耗资90万美元建了一处豪宅。这个戴着角质眼镜表情阴沉的黑手党大佬看起来体面而严肃，他向IRS坚称其财富来自其名下的制衣厂。他的金库里实际上快要装不下他的财富，他有权按比例获取家族的部分收益，而且他还有新的收入来源——长岛的垃圾。

控制这个行业的关键是科拉罗与其同党创建的一个所谓的同业公会——私营公共卫生业协会。表面上，该协会的宗旨是处理劳资谈判问题并促进萨福克和拿骚县垃圾清运业的发展。实际上，作为一个被科拉罗的亲信所把持的同业联盟，它的作用是划分收集渠道、操纵公共垃圾清运合同的招标、抑制竞争和惩处异议者。每名垃圾清运商每年须交纳5000美元取得协会的会员特许权，同时还得承受科拉罗的打手私下进行的敲诈勒索。温顺的协会会员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被承诺将以非常有利的价格揽到生意，所有额外费用或付给黑手党的酬金都通过抬高价格转嫁到他们那无可奈何的客户身上。另一个实惠是通过科拉罗勾结甘比诺家族控制的卡车司机协会813分会来实现劳资和谐，而这个分会代表着同业联盟的绝大多数雇员。不用“鸭子”托尼动一下指头，他每年就能从同业公会的交易中捞得20万~40万美元，而因为帮助控制着那些卡车司机，甘比诺家族的其他大腕们也会得到类似的报酬。

有组织犯罪特遣队的目的是透过科拉罗的防护层对其展开立案调查，证实他在垃圾清运行业里犯下的罪行。在卢切斯家族或同业联盟内部，特遣队没有成功插入卧底线人，因此无法取得法庭授权对科拉罗的住宅电话进行窃听。两次入狱让托尼达·克斯更加注意诡秘行事和隔离自保。虽然偶尔会踏上怀乡之旅，回到他童年生活过的东哈莱姆，还和胖子托尼·萨勒诺在饭店里吃饭聊天，但他从不去其住宅附近的任何社交俱乐部。监视小组报告称，科拉罗只定期与少数几个副手见面。那些谈话经常在停车场以“边走边聊”的方式进行。那老板边走边讲，让所有调查人员都无法偷听。与助手们用餐时，科拉罗从不固定到哪个餐馆，也不固定在什么时间，他总是在最后一刻或凭一时兴致随意做出决定。由于无法预知他会在什么地方交谈并让自己落入窃听器的圈套，特遣队调查科拉罗的工作似乎陷入了无计可施的困境，这一切直到一个反叛的独立承运商出现才出现转机。他就是罗伯特·库柏卡（Robert Kubecka），一个性情活泼的愿意暗中帮助对付那个危险家族的志愿者。

20世纪50年代，库柏卡的父亲杰尔在萨福克县开了一个小型垃圾清运公司，当

时科拉罗还没有插足公共卫生产业这座金矿。卢切斯家族聪明汉的到来让老库柏卡面临着令人头痛的长期威胁与恶意破坏。不过，他仍竭力支撑着公司，拒绝加入那个假冒的垃圾清运商同业公会。1977年，精疲力竭的库柏卡将公司日常的管理工作交给了儿子罗伯特和女婿唐纳德·巴斯托（Donald Barstow）。拥有企业管理学位和环境工程硕士学位的罗伯特·库柏卡立即收到赤裸裸的警告。和父亲一样，他受到了其他清运商和卢切斯家族的暴徒警告，说是闹独立绝不会有好果子吃。但他顶住压力拒绝与黑手党人和那个垃圾清运商组织合作。比起同业公会的会员来，库柏卡父子提供的服务效率高而且费用低，这让他们拥有一个令其家族生意得以维持的忠实客户。库柏卡父子只装备了8台卡车，他们无法与同业公会竞争大合同。公司的势单力薄反而让它生存下来，卢切斯的暴徒将库柏卡父子的公司视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麻烦，倘若它胆敢挑战同业公会竞争高利润的工程，他们随时可以把它碾碎。

在州有组织犯罪特遣队走上舞台之前，杰尔和罗伯特·库柏卡就向萨福克县警察当局申诉了他们遭受到的折磨和虐待。他们的起诉书被收下，但翘首以待的库柏卡父子没有等来实质性的结果或补偿。最后在1981年底，罗伯特·库柏卡在重新改组的特遣队里找到了一个愿意倾听的人。特遣队有个从前做过萨福克县警探的新调查员迪克·坦尼恩，他了解到库柏卡父子的困境以及他们对那个同业公会的抗拒。一旦同业联盟里有个清运商和被称为“清运站”的客户签订了合同，即使新的商业或住宅客户接管了那个地方，其他公司也不得与之竞争。库柏卡提供的有关这种秩序，即所谓永久“财产权”信息成了特遣队的部分情报档案。但在刑事审判中，它属于“道听途说”的臆测之辞，是不被采信的证据。

认真考虑了坦尼恩的邀请后，库柏卡于1982年同意积极参与调查。他将随身带着隐形话筒——隐藏着的麦克风活动。尽管是一个32岁的已婚男人，一个有着两个孩子的父亲，但库柏卡还是愿意接受这一危险且没有报酬的间谍任务。调查人员希望他通过和同业公会中与卢切斯家族核心人物塞尔瓦托·阿韦利诺（Salvatore Avellino）关系密切的清运商聊天从而找出证据和线索。塞伦垃圾清运公司的老板阿韦利诺绝非普通的垃圾承运商。调查人员相信，他是卢切斯家族替“鸭子”科拉罗监管长岛的垃圾赚钱机器的角头。库柏卡把录音设备藏在衬衫里用带子贴身绑着，每当和极力诱惑他加入那个腐败组织的清运商交谈时就将它打开。

库柏卡没有机会接近警觉的阿韦利诺，但他的努力有助于启动案件调查。加入协会的清运商在窃听录音里流露出的罪证之言和含蓄的威胁能为特遣队提供正当理由，

它可以据此申请法庭授权对阿韦利诺的住宅电话进行窃听。阿韦利诺和科拉罗的电话交谈使调查又前进了一步，让特遣队能够窃听“鸭子”托尼的住宅电话，这实际上就是罗伯特·布莱克所倡导的递加战术。但结果却令人失望，这两个黑手党人知道执法部门的电话窃听能力，在使用家庭电话时只说些寻常的家务事，他们的谈话没有泄露半点和黑手党或垃圾行业腐败有关的线索。

然而，电话窃听仍发现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规律。大多数早晨，阿韦利诺会离开其尼塞夸奎的乡间豪宅，驾着他那锃亮的1982年产价值达10万美元的“美洲虎”疾驰25英里前往蚝湾去接科拉罗。白天，这个角头经常充当“鸭子”托尼的司机，送他在长岛或到市里处理公私事务。

由于电话窃听证明是白费力气，戈德斯塔克、坦尼恩和特遣队其他调查人员就将那辆“美洲虎”视为另一个绝佳的目标。因为科拉罗会坐在车上转悠几个小时，而且经常是和其黑手党内阁成员在一起，那辆车自然就成了他讨论家族重要事务的神经中枢，但要取得法庭许可来窃听这辆车却困难重重。电子窃听的法律基础——或者说合理根据——通常依赖于线人、特工或另一枚窃听器提供的证明犯罪活动正在某个特定场所被策划的情报。尽管特遣队的检察官们能认定那辆“美洲虎”就是两名重要嫌疑人——科拉罗与阿韦利诺——所利用的场所，但他们缺乏证据证明垃圾清运阴谋或其他犯罪就是在那辆车里策划出来的。

几个星期以来，戈德斯塔克一直在寻找能够争取法庭授权的法律对策。1983年3月的一个上午，他突然来了灵感，找到了他在手下面前所说的“一条来自上帝的信息”。他解释说，窃听的理由可建立在一种新的“合理根据”的概念——“同伙关系”之上。他的窃听申请主张，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阿韦利诺远比一个单纯的司机重要。特遣队可以举证，声称阿韦利诺是卢切斯家族的垃圾清运专家，是家族老板科拉罗的“得力助手”和传达其指令的“联络人”。

凭着其州调查人员的宣誓书，FBI特工证明科拉罗拥有显赫的地位，以及阿韦利诺在控制长岛垃圾清运业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戈德斯塔克的策略奏效了。但他还得在扫清另一个古怪的法律障碍之后才能取得法庭授权窃听那辆“美洲虎”。阿韦利诺的“美洲虎”来回穿越长岛的两个县和纽约市的五个区。联邦法院的庭谕在一个大面积的管辖区里都具有效力，但要在七个不同的区或县里窃听谈话，戈德斯塔克还需要取得州法院的授权。戈德斯塔克没有囿于常规作业请求大批法官给予同样的法庭授权，而是想出了一个更为简便的方法。他找到了上诉法院一个其权限涵盖长岛全岛和纽约市布鲁克林、昆斯和斯塔腾岛的法官，而另一个其管辖区包括纽约其他两个

区——曼哈顿和布朗克斯的法官帮他最终走完了那复杂的程序。

法律上的障碍扫除了，但戈德斯塔克的调查人员和技师还得设法骗过阿韦利诺潜入他的“美洲虎”。杰克·布雷赫尼是特遣队最杰出的人侵与技术专家，做过纽约侦探的他从过去苦涩的经历当中知道汽车窃听有着糟糕透顶的记录。他曾在黑手党人的汽车座里偷偷装过几次电子装置，但结果令人非常失望。汽车收音机的噪音盖过了讲话声，而且窃听器的发送距离非常有限，在跟踪车辆上很难听清楚。但是，特遣队这次拥有了技术最先进的或许能带来成功的新设备。有位与特遣队共事的州骑警偶然发现他的朋友有一辆与阿韦利诺的完全一样的 XJ-6“美洲虎”原型车。在州警察的一处营地里，布雷赫尼和他的技师同事吉姆·施特罗对那辆车进行了检测，确认只有一个地方适合隐藏窃听器且可以很方便地接上电源，那就是“美洲虎”仪表盘内侧中间部位的一处空间。

两位技师和带队调查员迪克·坦尼恩花了三天时间实验并演练窃听器安装技术，最后，他们练习得娴熟自如。一旦进入车内，他们只需 4~5 分钟即可完成任务。为了节省宝贵的几秒钟，特遣队在美洲虎公司搞到一把钥匙，准备用来打开阿韦利诺那辆车的车门。剩下的难题就是要找到合适的地点和时间接近那辆“美洲虎”。利用阿韦利诺夜间睡觉这段时间潜入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因为他将汽车停在自家的车库里，车库和房间里还有通向那栋住宅楼的走道上都精心布设了警报器。

坦尼恩提出一个希望并不大的可能性。通过电话窃听，他得知阿韦利诺将在 1983 年 3 月 23 日参加卢切斯家族所控制的私营公共卫生业同业协会的年度宴会。因为重要黑手党人的车子从未被成功窃听过，阿韦利诺或许会把保镖留在宴会上，暂时疏忽那辆“美洲虎”的安全。

带着妻子，阿韦利诺顶着狂风暴雨驱车赶到“亨廷顿城市之家”参加宴会。除了同乘一辆车的布雷赫尼、施特罗和坦尼恩外，特遣队另外 9 名调查人员作为后援分乘多辆无警方标志的汽车尾随阿韦利诺。在把钥匙交给车场服务员时，阿韦利诺被偷听到，他希望那辆“美洲虎”停在离前门远点的地方，还得和其他车辆保持距离，以免有人意外刮擦或损坏他的名贵坐驾。就在浑身湿透的调查人员展开行动时，这名卢切斯家族的角头正和穿着晚礼服的清运商及政客们边用餐边聊天，打发着晚会余下的时光。

“我们考虑到了每个可能出差错的地方，实际上一切都天遂人愿。”布雷赫尼说，窃听器装好后，他和队友们都为当晚行动成功庆幸不已。“真让人惊奇，一切仿佛是注定了似的。”

次日清晨，阿韦利诺照例开着“美洲虎”滑出私人车道驶上蛙谷公路，准备与“鸭子”托尼共度新的一天。与此同时，一个精心策划的跟踪这辆车及其乘客的计划已经启动。特遣队知道阿韦利诺和科拉罗在出行时是多么警觉，他们靠诡计多端的“干洗”花招来摆脱尾巴。科拉罗总是歪向后视镜观察“美洲虎”后面的汽车。它频频指示阿韦利诺突然驶出高速公路，走上一段便道，随后又拐了回去。还有些时候，阿韦利诺会在路侧停靠三四分钟以摆脱盯梢车辆。在市区或郊区大道上，阿韦利诺还会突然转向来个U形急转弯以甩掉可能的跟踪者。

为突破科拉罗的防守，特遣队每天派出五或六辆没有标志的汽车充当前导跟踪“美洲虎”。一名主管通过无线电联络设备安排跟踪者的布控位置，指挥他们适时地插进和退出跟踪阿韦利诺的车队。装备有传输接收机的车辆必须直接跟在“美洲虎”后面并保持目视距离，以接收窃听装置发出的信号。特遣队的驾驶员们听不到“美洲虎”里的谈话。他们的车里装有一台可放大音量和提高作用距离的高科技“转发系统”，将信号传给后方一到几英里之外的一辆厢式车。在“美洲虎”上发现不了这辆车安装的巨大的天线，其车载录音设备可将阿韦利诺车里的每一句谈话记录下来。

受“美洲虎”突击行动的成功所鼓舞，戈德斯塔克的调查人员和检察官们此时又充满期待地准备收听“鸭子”托尼的谈话。不幸的是，在窃听行动开始后的几个星期里，阿韦利诺与妻子前往佛罗里达度假一周。在他们度假期间，那辆“美洲虎”就闲置在车库里，其电池也被持续用电的窃听器所耗干。回家后，恼火的阿韦利诺无法起动车子。监听阿韦利诺家的住宅电话时，特遣队员们听到他的妻子愤怒地给经销商打电话，要对方立即修理这辆刚刚买来的汽车。听到一辆拖车已经上路要将“美洲虎”拖到经销商的修理厂去，调查员们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任何稍懂技术的技工都会找到保险丝盒里的“火线”，窃听计划就会因此而暴露。

特遣队主任调查员佛瑞德·雷亚诺（Fred Rayano）很快制定出一个应急方案。他请求萨福克县警方给予支援，在拖车司机返抵修理厂之前截住了那辆“美洲虎”。警官们把那司机带到他们警车旁，在那里不会看见“美洲虎”。确认司机背对着“美洲虎”之后，警官们就其拖运许可证与特种车驾驶员执照的问题对他进行仔细盘问。相信站在警察中间的司机被转移了注意力，特遣队的技师便溜进“美洲虎”，将连着窃听器的那根火线从保险丝盒中拔了出来。如果那根电线留在里面，经销商的技工就会从电池漏电入手查到隐藏的麦克风和发射机。正像特遣队技师们所希望的那样，经销商没能查清漏电原因，只得换装了新电池。

两天后，驾着他那辆已经修好的车，阿韦利诺来到昆斯区一家饭店前，并将车子

泊在拥挤的停车场里准备用餐，这正是特遣队的大好机会。用杰克·布雷赫尼搞来的一把万能钥匙，一名技师潜入车内打开了仪表盘下的保险盒，将“火线”重新接了起来。只用几秒钟工夫，“美洲虎”里的窃听器又通上了电。

1983年的春夏季节，戈德斯塔克和其他检察官在办公室里惊奇地收听着在阿韦利诺的汽车里进行着的无拘无束的谈话。通过他们本人的嘴巴，托尼·科拉罗与塞尔瓦托·阿韦利诺把自己和他们的同伙牵连到垃圾卡特案和卢切斯家族其他的犯罪当中。录音还挖出了比黑手党在长岛的不法活动更令人吃惊和更为重要的证据。在1957年阿巴拉沁秘密会议和1963年乔·瓦拉齐叛逃之前的几十年里，执法官员从线人那里就听说过有关“管理委员会”的传闻，但他们从未搞到一条确凿的证据让陪审团相信那神秘的黑手党董事会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在研读“美洲虎”谈话的抄本时，戈德斯塔克意识到那长期苦苦寻找的证据或许已揣在手里。在录音带上，科拉罗、阿韦利诺和其他黑手党人提到一个让人惊异的事物并详细谈论了它是如何运作的。在谈话过程中，他们讲出了一个名字——“管理委员会。”这是个料想不到的收获，其影响超出了戈德斯塔克与其手下最为乐观的估计。

第 23 章 播种季节

几个小时之后，通过他脚底下的窃听器，萨勒诺那沙哑的说话声非常清楚地传到 FBI 一个与俱乐部相隔五个街区的侦听哨位，最后一个被列为目标的黑手党老板受到了窃听。

正当州特遣队的电子耳监听着塞尔瓦托·阿韦利诺的“美洲虎”时，FBI 的设备在纽约也同样派上了用场。怀着春天衣阿华州农夫播种的那种热情，FBI 的窃听专家们正在纽约黑手党大亨们的家和巢穴里布设大量的窃听装置。从 1982 年末到 1983 年，科洛博、甘比诺和吉诺维斯家族大佬们的秘密庇护所都被特工詹姆士·卡尔斯特罗姆（James Kallstrom）的特别行动组所渗透。

1982 年秋天，FBI 甘比诺小组不间断地密切监视吉纳罗·郎格拉（Gennaro Langella），此人在街头上更多地被人称为“格里·郎”。因抢劫罪获刑的科洛博家族老板“蛇”卡迈恩·珀西科又因违犯保释规定而入狱，他的二老板郎格拉就作为街头老板替他管理家族。身为高利贷者和毒贩，郎格拉以其毫不留情的傲慢而知名且令人生畏，他满口脏话，向来无口德可言。如果算是他的一种癖好的话，那就是在其衣装粗陋的合伙人中间打扮成黑手党花花公子的模样。他是个好虚荣重仪表的人，与着装保守的黑手党显贵们不同，格里·郎喜欢更为现代的好莱坞黑道人物的打扮，喜欢对襟的运动夹克、时髦的敞开领衬衫，戴面罩式的太阳镜。

特工们注意到，在大多数晚上，郎格拉都会在“斯道达之家”（Casa Storta）——布鲁克林区本森赫斯特的一家普通餐馆里出现。男女特工们于是开始伪装成约会的情侣到“斯道达之家”用餐。郎格拉总是坐在厅堂最后面的一张专桌旁，与其他客人保持着距离。晚上 9 点钟，餐馆老板开始歇业打烊，态度蛮横地驱赶顾客，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哪怕是一杯咖啡。格里·郎和跟随其左右的聪明汉们留了下来，并将他们

桌子上盛过意大利面食、海鲜和牛肉的碗盘拾掇码放起来。明眼人可以看出，科洛博家族的党徒并不是因厨师的厨艺而慕名前来，而是把这家餐馆当成了他们处理业务的舒适而安全的包房。通过分析珀西科从康涅狄格州丹伯里市联邦监狱打出的电话，这个餐馆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证实，科洛博家族老板的电话大多数都打到了“斯道达之家”。

1982年圣诞节的前一周，卡尔斯特罗姆的技术专家在凌晨3点钟潜入了这家餐馆。进入饭馆安装窃听器的手法和卡尔斯特罗姆严密组织的大多数“黑包”袭击行动类似。开锁人——技术娴熟的技师——是潜行袭击的前导。他们首先解除报警系统的威胁，然后通过用细小的金属工具迅速拨开那设计极为精巧的防盗制动栓进入室内，开锁时需极为谨慎，以免损坏或堵塞了门锁从而留下秘密潜人的证据。在“斯道达之家”，开锁人轻松地打开了金属侧门和餐馆玻璃门上的挂锁。第二拨技师随后跟进，在郎格拉专桌上方的顶棚镶板上装上了麦克风并布设了传输线缆。在进行这合法入侵的时候，科洛博小组的专案特工在附近设置了警戒线，这些专案特工负责阻拦任何可



拉尔夫·斯科波那被窃听的谈话提醒了FBI去搜集管理委员会案的证据。斯科波是科洛博家族的打手，也是一个劳工协会的主席。他在大型的建筑工程项目中充当掮客诈取混凝土合同。（FBI的监视照片）

能危害或暴露技师的人，若发现有妨碍者出现就用无线电向开锁人和技师示警。

在“斯道达之家”的现场，技术人员们遇到一个对手——前门后面的一条看门狗。咆哮的罗特韦尔犬和杜宾犬是纽约黑帮分子最喜欢的品种，适合吓退执法人员和其他窥探者。“黑包”特工们已准备人道地征服这性情好斗的凶犬，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为此特地带来了一个灭火器，猛喷了几阵泡沫后，“斯道达之家”的吠犬安静了下来。窃听器和发射机在“斯道达之家”装好后，在附近一套公寓里蹲守的侦听特工马上着手调试，准备在格里·郎及和他的打手大快朵颐并畅所欲言时录下他们的谈话。

“斯道达之家”调查行动的意外收获是发现了一个经常坐在郎格拉桌子旁的身材矮胖而快言快语的家伙。经确认，他是个名叫拉尔夫·斯科波（Ralph Scopo）的荣誉者。这个代理老板几乎每晚都与这个低级打手对酌共饮，这让特工们感到很奇怪。通过对斯科波的职业进行调查，特工们找到了答案：他是纽约混凝土工地职工理事会的主席，这个工会的会员在纽约市每一处重要的建设开发项目上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FBI特工吃惊地发现了一个令人心焦的线索：这名工会领袖是科洛博家族的黑手党成员，代表着数千名建造地基、墙壁和楼板所需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者是曼哈顿每一处商业与住宅高楼的建设主力。郎格拉与斯科波的餐叙谈话激起了FBI调查新案件的兴趣，这个案件便是科洛博家族与其他黑手党家族联手，串通安排涉案金额达数百万美元的混凝土职位。

基于在“斯道达之家”获取的证据，更多的电话窃听装置和窃听器依据《第三章》之规定取得了法官的授权，并被暗中安装在斯科波的办公室和汽车里，他和承包商随后进行的谈话暴露出了他对黑手党老板们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斯科波是替他们向一些建筑公司代收酬金的“掮客”，而这些公司都是一个受黑手党控制的“混凝土俱乐部”的会员，该俱乐部为纽约所有大型建筑工程分配合同并拟定价格。

FBI窃听的下一个目标是科洛博家族老板保罗·卡斯特利亚诺。在FBI秘密的黑手党教父头号通缉名单上，他属于一号人物。他的亲戚唐·卡洛·甘比诺于1976年自然死亡之后，大保罗就继承了这个全国最大的黑手党家族的领导权。作为黑帮敲詐者，卡斯特利亚诺长期以来都在受着幸运之神的眷顾。

卡斯特利亚诺1915年生于本森赫斯特，其移民父母在施洗礼时给他起名为康斯坦提诺·保罗。保罗的父亲是个屠夫，为补贴家用，他在布鲁克林的家附近组织了一种被称为“拉罗萨轮”的非法乐透彩赌博。保罗在学校里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八年

级时弃学离开校园，成了他父亲的两档生意里的学徒，一边做切肉工，一边充当乐透彩跑腿者或推销员。

他有案可稽的犯罪生涯不幸地始于1934年7月4日的那个周末，当时他和两个邻居同伙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持枪抢劫了一名男服经销商，全部收获是51美元。让卡斯特利亚诺倒霉的是，有个目击者记下了逃跑车辆的牌照号码，而那辆车正是卡斯特利亚诺所拥有，他随后遭到拘捕并被确认是个业余枪手。19岁的卡斯特利亚诺还不是一个人会打手，但他知道黑手党的根本戒律“乌默它”，他坚决拒绝以告发同伙来换取轻判，这让他赢得了“勇敢者”的声誉。承认犯有抢劫罪后，被判刑一年的卡斯特利亚诺在监狱中仅仅待了三个月。

与卡洛·甘比诺联姻并且和他有着事实上的亲缘关系是卡斯特利亚诺爬上家族顶峰的垫脚石。身为表兄的甘比诺娶了卡斯特利亚诺姐姐凯瑟琳。当卡洛平步青云的时候，保罗也随着他步步高升，并在卡洛的辉煌时期充当他最为宠信的角头。到了70年代，甘比诺的身体每况愈下，作为唐卡洛的密友，卡斯特利亚诺走上了前台，并在被正式授予全权教父的权柄之前充当了家族的代理老板。他在黑手党里的显赫地位及其1.89米的个头让他赢得了一个含有恭维意味的绰号——“大保罗”。

卡斯特利亚诺喜欢阅读《华尔街日报》和财经杂志，并经常将自己描绘成商人和家族矛盾的调解人，相当于集团公司CEO的角色。在向IRS（美国国税局）申报合法收入时，他称自己的所得来自于在肉类加工与家禽公司的“投资”，而在以儿子和其他家人的名义组建的建筑公司入股也让他获得了部分收益。他伪装成博学商人的粉饰功夫给其黑社会同伙胖子托尼·萨勒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一次有吉诺维斯和甘比诺家族成员参加的聚会上，“公牛萨米”塞尔瓦托·格拉瓦诺听到萨勒诺罕见地恭维道：“保罗，你的谈吐这么优雅。我要有这嘴头功夫该多好！”

卡斯特利亚诺那看不见的力量明显扩展到了合法的工商界当中，公司经理们敏感地察觉到甘比诺家族对工会的控制，并且知道纽约地区的基（Key）和沃尔鲍姆（Waldbaum）连锁超市里有其秘密股权。甘比诺家族中擅长毒品走私的角头帕斯夸里“帕特”（Pasquale “Pat”）或者说“帕齐”康特（“Patsy” Conte）是基食品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在确定需进哪些货来进行合作联销的决策当中有着压倒性的发言权。有个总统调查团的特工问到为何偏好卡斯特利亚诺公司的产品时，沃尔鲍姆公司的大股东艾拉·沃尔鲍姆（Ira Waldbaum）回答说，“采取措施”打击有组织犯罪是执法部门的事，不是生意人的事。“不要忘了我有老婆孩子”，沃尔鲍姆说道。

由卡斯特利亚诺的儿子小保罗和约瑟夫经营的公司戴尔肉品承办行是纽约家禽与

肉类的主要供应商，负责向 300 多个独立的零售肉商和许多家超市供货。通过与“食品与贸易工人联合会”的官员相勾结，对那些不愿按照他的定价进货的店铺，大保罗能够中断向它们供货并挑起劳工问题。

大型企业对卡斯特利亚诺也相当尊重，最明显的例子是全国知名的家禽供应商弗兰克·珀杜（Frank Perdue）。其公司的电视广告让珀杜成了美国名人，他于 1981 年向 FBI 承认，他至少两次直接恳请卡斯特利亚诺给予帮助。第一次是问卡斯特利亚诺能否让黑手党控制的食物与贸易工人联合会放弃在他弗吉尼亚州阿科麦克的重要加工厂建立工会组织。第二项是珀杜认为卡斯特利亚诺能帮助他让自己的鸡肉进入纽约地区那市场巨大的连锁超市。

珀杜从未向 FBI 明说卡斯特利亚诺向他提供过什么样的帮助。首先，他说，他接触卡斯特利亚诺是冲着其专家意见去的，因为他在纽约市的牛肉、家禽和食品批发公司都有投资。甘比诺小组特工约瑟夫·奥布赖恩（Joseph F. O'Brien）逼问他为何单单求助于卡斯特利亚诺而不是超市和肉品企业的官员时，珀杜放声笑道，“为什么？因为他是教父。”

这位鸡肉供应商后来向一个总统真相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说，他寻求卡斯特利亚诺的干预，是因为他据称有着“有组织犯罪者所具有的长长的触角。是的，有着黑手党人的触角。”

从当上甘比诺家族老板的第一天起，卡斯特利亚诺就得意于自己的管理能力。1976 年，在家族收入的管理与分配上，他和自己的二老板安尼洛·德拉科罗塞进行了谈判。所有白领犯罪——串通投标、工会腐败、政治贿赂、金融欺诈——都控制在大保罗手中。德拉科罗塞则保留了更多的传统与暴力的高利贷、赌博和绑架等不法行当。但作为大老板，卡斯特利亚诺还贪婪地挖走了德拉科罗塞行动队的部分收益。

卡斯特利亚诺那光彩照人的自画像背后是其血腥残忍的一面。在从事白领犯罪之前，卡斯特利亚诺组织过获利不菲的赌博、高利贷、汽车偷盗和敲诈勒索活动。作为老板，他理所当然地从这些冒险事业中取得最大份额的收益，尽管他在具体运作上已不再发挥重要作用。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他还在家族内外亲自挑选精干杀手来完成一些必要的卑鄙工作和暗杀任务。他最令人恐惧的杀手要算罗伊·德米奥（Roy DeMeo），据联邦与纽约当局称，他在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领导的一支杀手队至少谋杀了 75 人。在《谋杀机器》一书当中，作者吉恩·马斯廷（Gene Mustain）和杰尔·坎培西（Jerry Capeci）估计被杀者的数量超过 200 人。

在德米奥的受害者当中，大多数人的遗体至今无法找到。据线人称，其杀手队的

恐怖作风是将布鲁克林的一处公寓房当成屠宰场，他们把受害者的尸体先放在浴缸中流干血，然后移到客厅里开膛剖腹进行肢解并装进纸板箱里，私营垃圾车最后将尸块倾倒在垃圾填筑地里。和黑手党当初利用谋杀公司的犹太行刑者一样，卡斯特利亚诺发现了这些不会被确认为黑手党人的雇佣杀手的伪装价值。他曾招募一支在地狱厨房活动的爱尔兰族心理变态者帮派作为他的杀手队，这个被一名侦探称为“西高地”的暴虐帮派擅长于将受害者用乱刀砍死，然后通过东河沃兹岛上的污水处理厂来处理尸体。

1978年2月，在布鲁克林区湾脊的汤玛索饭店，卡斯特利亚诺与“西高地”首领吉米·库南（Jimmy Coonan）在密室里达成了一项冷淡无情的交易。这次会面由德米奥安排，德米奥既是库南的朋友也是其杀人技巧的敬慕者。跟随库南与会的“西高地”成员“米基”弗朗西斯·费瑟斯通（Francis “Mickey” Featherstone）后来向调查人员和作家T·J·英格利希吐露称，“西高地”帮在曼哈顿掀起的谋杀浪潮让两个为黑手党效力的重要高利贷主成了牺牲者，这让卡斯特利亚诺感到十分恼火。

英格利希在费瑟斯通背叛黑手党并进入联邦证人保护项目之后待之如友，后者曾向他袒露了卡斯特利亚诺与“西高地”达成的交易。“毫无疑问，吉米，这是我们的立场，”费瑟斯通记得卡斯特利亚诺说，“从现在起，你们将和我们一起。这意味着你得停止像牛仔、像野蛮人那样行动。如果有什么人要除掉，你得经我的人批准。明白吗？”作为对“西高地”帮的补偿，卡斯特利亚诺允许他们打着甘比诺家族的旗号在曼哈顿西区进行敲诈勒索、放高利贷和劳工诈骗活动。“但无论你捞到什么钱，你都得按10%的比例分给我们一部分。”费瑟斯通援引大保罗的话说。

在纽约犯罪家族消息灵通者中间流传着与卡斯特利亚诺的女婿弗兰克·阿马图（Frank Amato）有关的传闻，而这种传闻随时都会让无以释怀的卡斯特利亚诺勃然大怒。阿马图曾是个地位低微的暴徒和绑架者，后来通过与卡斯特利亚诺唯一的女儿康妮结婚在黑社会渐露头角。在自己家人经营的戴尔肉品承办行里，慷慨的大保罗将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交给了这个新郎。阿马图却以证明自己不过是个不计后果的追蜂浪蝶之徒和虐妻者来回报卡斯特利亚诺。这对夫妇终于在1973年离婚。不久以后，这个前女婿就人间蒸发，消失得无影无踪。黑手党的小道消息为其失踪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卡斯特利亚诺下令把他“修理掉了”，康妮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的虐待让他倍感愤怒。

在统治甘比诺帝国期间，精于暴力与白领犯罪的卡斯特利亚诺成了亿万富翁，生活得如同帝王一般。在纽约市制高点之一的斯塔腾岛塔德丘富人区那林木繁茂的山岗

上，他修建了一栋拥有 17 间房的豪宅，从那里可以将拱悬于纽约上湾之上的韦拉札诺海峡大桥尽收眼底，这所具有新美国建筑风格的宅第令本尼迪克特路两侧每栋至少价值 100 万美元的建筑相形见绌。豪宅的内部装饰也颇具特色，墙上嵌着漂亮的镶板，地上铺着意大利卡拉拉出产的白色带蓝纹的大理石。这座豪宅拥有 4 间主人套房、多间客房和佣工宿舍，另有一个酒品贮藏室和一个日光浴室，淋浴室则多达 8 个。最为简单的膳食都用瓷器托盘和沃特福德水晶玻璃器皿来盛装。为了让宅邸的主人大保罗能享受户外消遣的乐趣，室外还建有一个奥林匹克标准的游泳池、一座英国式的花园和一处修建平整的地掷球球场。一条长长的环形私人车道通向一个列着白柱的门廊入口处。考虑到要与自己的全国黑手党领袖的地位相称，卡斯特利亚诺认为它应当模仿美国总统官邸的外观，并且应该将自己的家称为“白宫”。此处豪宅于 1983 年竣工，造价达 300 万美元，尽管卡斯特利亚诺可能从乐于施惠的建筑承包商那里得到过慷慨的折扣。

到了 80 年代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卡斯特利亚诺渐渐变得孤僻起来。他深居简出地生活在自己的宅院里，只接见少数亲信，很少会到附近的俱乐部里看望手下。角头们都期望到“白宫”递交或呈送他的不法所得来向他表示敬意。晋见需要预约，时间由大保罗指定。卡斯特利亚诺从家族收入中索取的份额越来越大，并且在大多数打手面前都是一副倨傲的样子，这让他博得了一个新的且含有贬损意味的绰号——“教皇”。

从甘比诺小组成立时起，FBI 特工们就一直试图寻找突破口来窃听卡斯特利亚诺的秘密，其中一种可能的办法是设法利用一辆卡斯特利亚诺用来接送其黑手党来访者的汽车。基于安全的考虑，大多数黑手党人，哪怕是应召赶到塔德丘，都不许直接驱车驶抵“白宫”的前门。他们得在本尼迪克特路旁停车，然后坐上一辆由卡斯特利亚诺的保镖驾驶的汽车由侧门进入这座筑有围墙的府邸。斯塔腾岛的角头弗兰克·德西科（Frank DeCicco）负责这迎来送往的工作，把到访者带到“白宫”再将他们送回自己的汽车。一些特工相信，他们或许可以利用这“致命的机会”在德西科的汽车里安装窃听器并偷听其乘客的谈话，因为面见卡斯特利亚诺之后，这些人有时会在车里聊上几分钟。

甘比诺小组主管特·G·布鲁斯·莫尔（G. Bruce Mouw）并不看好这种办法，但认为可以一试。“让我们碰碰那个家伙吧，”他向其小组指示道，意思是，“让我们窃听卡斯特利亚诺的家吧。”

通过他们自己的监视和从受雇线人那里搞到的情报，甘比诺小组的特工们知道没

有社交俱乐部和合适的酒店能让他们获取罪证之言。取得法庭授权之后，一个住宅电话窃听器被顺利安装好，但这证明是徒劳无功的。和所有细心谨慎的黑手党人一样，卡斯特利亚诺几十年来一直在防止因打电话而惹祸上身。从线人那里得到的可靠的情报显示，卡斯特利亚诺平常听取报告和发出指令的地方是个权作办公之用的内室，即靠近厨房的一个小餐厅。

取得法庭授权来窃听卡斯特利亚诺那间特别的私室要相对容易些。通过此前窃听甘比诺家族的打手，FBI取得了表明卡斯特利亚诺正利用自己的家来举行黑手党会议的充足的“合理根据”。棘手的事情是如何进入卡斯特利亚诺的“白宫”。这座宅院里向来不会空无一人，当卡斯特利亚诺与其亲信们离去时，他的妻子尼娜或他们的管家，即大保罗的情妇格洛里亚·奥拉特（Gloria Olarte）总会留在家里。如何潜入那栋房子是个巨大的挑战。为提防政府部门的潜入者和发生可能的暗杀事件，卡斯特利亚诺已经做好了挫败所有入侵企图的准备。一堵2.4米高的砖墙将这处豪宅围了个严实，建筑物的主体部分都布设了电子传感器，室内和屋顶安装了防盗报警器。一家私营保安公司24小时监控报警系统和闭路摄像头。晚上，泛光灯将通向宅邸的道路和周围区域照亮得如同白昼。两条杜宾犬日夜来回巡游阻拦不受欢迎的陌生人。

FBI特别行动组决心用较为简便的办法而不是精心策划的高科技行动来突破卡斯特利亚诺的重重障碍。某个人将直接从前门进入，即使卡斯特利亚诺在场，这名孤身深入的特工要能将窃听器安装在他的密室里。

声称出于未来“黑包”行动的安全需要，FBI官员从未完整地披露过这次窃听行动的任何具体细节，但这个大胆而完美的直闯龙潭虎穴的计划却广为人知。1983年3月，两个足智多谋的FBI“黑包”老手约翰·克拉维奇（John Kravec）和约瑟夫·坎塔梅撒（Joseph Cantamesa）破坏了几根电视线，而这些缆线与卡斯特利亚诺家里靠近小餐厅的那台电视机相连。身着便衣的特工坎塔梅撒冒充有线电视公司的修理工前来提供维修服务，留在屋外的克拉维奇则设法在坎塔梅撒想出安装窃听器和传输线的办法之前让电视问题得不到解决。和这个家庭的成员建立了融洽而友好关系之后，殷勤的坎塔梅撒就主动提出回来帮他们无偿地修理厨房旁边的一个故障电话机。喜欢到处捞些额外好处的卡斯特利亚诺乐于接受这免费的服务，而这将证明得付出惨重的代价。几次受邀前往那栋房子之后，坎塔梅撒解决了这个家庭所有的电视和电话线故障，同时也圆满完成了自己的特殊任务。这个义务“修理工”寻机在踢脚线里安装了微型麦克风和硬接线，小餐厅里的谈话将由它们传送到FBI的一个侦听哨位上。

在斯塔腾岛一栋租用的联排别墅里，甘比诺小组的特工立即开始对不远处的

唐·保罗与其黑手党手下的谈话进行录音。卡斯特利亚诺的生活习惯刚开始时给那个新装的窃听器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他不断地播放电视或收音机，广播的声音盖住了谈话声，有用信息无法清楚地传送出来，这就不可能获知卡斯特利亚诺和客人在谈些什么。失望的特别行动组主管詹姆士·卡尔斯特罗姆向 FBI 为外事反情报机构解决电子窃听难题的默林斯发出了求援信号。在斯塔腾岛的侦听哨位上，技术专家们用一种外形很奇特的设备和天线滤去了电视和收音机的干扰杂音。窃听器现在传出了特工们所热切期待的声音——大保罗与其亲信的密谈。

1983 年底，有个必须解决的“黑包”工作尚待完成，那就是潜入胖子托尼·萨勒诺在东哈莱姆的帕尔马好汉俱乐部。在 12 月份一个寒冷的夜晚，特别行动组的魔术师们运用其惯常的技巧在凌晨 2 点钟开始了行动。最困难的挑战是他们在俱乐部外墙上作业让防盗报警器暂时失效时要尽可能降低噪声。卡尔斯特罗姆的抑噪办法是人为地制造城市居民厌烦却又听惯了的吵闹声。他从一家私营公司借来两台垃圾清理卡车，让特工们穿上环卫服，指示他们将垃圾箱抛上人行道，然后开足马力运转卡车的垃圾研磨机。尽管如此，帕尔马好汉俱乐部人行道上咔嚓咔嚓的响声还是引起了某个人的注意。一队警方巡逻车尖叫着驶进那条街，最后在俱乐部门前停了下来。

“我们在执行任务，”卡尔斯特罗姆急忙向警官叫道，现时晃了晃他的 FBI 证件。“真该死，赶快离开这里。”警方诺诺照办。

拂晓前，特工们进入了萨勒诺的总部，在胖子托尼的会议桌附近隐藏了几个微型麦克风。在地下室里，仰头朝着萨勒诺的桌子底下，技师们在楼板里钻出一个小孔为麦克风接上了传输线。在阴湿寒冷的地下室里，虽然没有凶恶可怕的猎犬，但特工们却遇到了许多一英尺长的野性十足的老鼠。在接线工作完成之前，一只老鼠在约翰·克拉维奇脚脖子上咬了一口。

几个小时之后，通过其脚底下的窃听器，萨勒诺那沙哑的说话声非常清楚地传到 FBI 一个与俱乐部相隔五个街区的侦听哨位，最后一个被列为目标的黑手党老板受到了窃听。

第 24 章 “就是这样!”

对“科萨·诺斯特拉”的理事机构管理委员会进行一场全方位的正面进攻，而摧毁它的武器将是 RICO。

“在我的 FBI 生涯当中，这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刻。”

这是个不同凡响的计划，是黑手党研究权威与学者罗纳德·戈德斯塔克在拜访纽约南区新任美国检察官鲁道夫·吉乌里亚利时提出的。

戈德斯塔克的计划史无前例：对“科萨·诺斯特拉”的理事机构管理委员会进行一场全方位的正面进攻，而摧毁它的武器将是 RICO。

1983 年 8 月，在吉乌里亚利赶到其曼哈顿中城区圣安德鲁斯广场的办公室赴任两个月后，州有组织犯罪特遣队主管戈德斯塔克来到他的办公室，希望与他交流看法。由其主任调查员佛瑞德·雷亚诺陪同，在道出其宏伟计划之前，戈德斯塔克骄傲地总结了其特遣队通过“美洲虎”窃听行动取得的成就。“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有科拉罗的录音带，FBI 有科洛博、甘比诺和吉诺维斯家族的录音。你可以用 RICO 案件检控整个管理委员会——就是那组织。”

雷亚诺对他上司谈论的计划完全不知，当吉乌里亚利叫来几名助手倾听戈德斯塔克的宏阔言论时，他坐在那里也显出慕求高策的样子。脱去夹克外套卷起衬衣袖后，戈德斯塔克开始在一幅活动挂图上兴奋地勾画其计划的主要框架和他的人与 FBI 搜集到的证据，而这些证据都可用来指证卢切斯、甘比诺、科洛博和吉诺维斯家族的四大老板及其主要助手。他在图上列出了那些特定的犯罪行为——上游犯罪，并认定它们表现出的是一种集体犯罪的模式，因此可以进行整合把所有管理委员会成员都列为非法组织的参与者，并进行一次大规模的 RICO 控告。

当天，在私下与戈德斯塔克交谈时，吉乌里亚利对可能和另一个美国检察官发生

管辖权冲突表示了担心。他负责纽约南片地区（通常简称为“SDNY”），管辖范围包括曼哈顿、布朗克斯和纽约市北部郊区。但调查卢切斯、科洛博和甘比诺家族的许多工作都得在长岛、布鲁克林、昆斯和斯塔腾岛展开，而这些地方都属于纽约东区美国检察官的管辖范围。实际上，这两个毗邻的管辖区如此接近，吉乌里亚利透过其办公室的窗户就能看到东河对面位于布鲁克林市老城的东区办公大楼。这两个检控系统的邻居常常在一些重大案件上闹意见。通过将相关证据交给他们希望其处理检控事宜的办公室，FBI官员们可以单方面地解决这些管辖权的竞争。对于像检控管理委员会这样的黑手党大案，其管辖决定权却无法由FBI来掌控。吉乌里亚利和戈德斯塔克这两个在政治上配合默契的检察官知道，决定只能由司法部长及其顾问在华盛顿宣布。

在结束面谈之前，戈德斯塔克承诺将在与东区发生的摊牌之战中支持吉乌里亚利。作为曼哈顿的一名助理地方检察官，戈德斯塔克在早年担任联邦公诉人时曾和吉乌里亚利一起共事办过案子。他钦佩吉乌里亚利热诚的办事风格，羡慕他在下属中间赢得的忠诚，比起东区的检察官来，在与州特遣队分享证据和荣誉上，吉乌里亚利会更具有合作精神和雅量。

吉乌里亚利迅速行动给这个案子上了一把管辖权之锁。谈到乔·博南诺在那一年年初出版的《体面人》时，这位检察官向助手们吐露称，“如果博南诺在书中提及‘管理委员会’，我就能指控它。”他的手下们仔细地研究了数百份录音和调查报告以期找到检控所需的基本要件，同时还着手绘制了相关图示，勾画了如何对那些老板和他们的副手提起RICO诉讼。与戈德斯塔克会面一个月之后，吉乌里亚利在华盛顿与司法部长威廉·弗伦奇·史密斯及FBI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坐在了一起。他出示了报告图表，概述了他的检控计划，请求两位官员对自己给予支持，尽管这意味着要侵入东区的管辖区。1983年9月，满心欢喜的吉乌里亚利返回纽约，他已获准继续调查“管理委员会案”。让他深受鼓舞的是，司法部长和FBI局长向他保证，将为他补充所需的检察官和特工来加快调查。

“在这个案件当中，鲁迪就是那个800磅重的大猩猩。”戈德斯塔克得知了管辖权胜利之后评论说。戈德斯塔克意识到，华盛顿的政治势力和他那宏阔的抱负让吉乌里亚利轻松地赢得了这一天。

吉乌里亚利检控管理委员会的热情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引发了一场论战。在吉乌里亚利赴任之初，主持有组织犯罪起诉工作的助理检察官沃尔特·麦克（Walter Mack）争辩说，管理委员会案将“丢掉最根本的东西”，南区和东区用以指控所有五大家族重要头目的最有用的证据也将被撤去。他警告说，那些借来对管理委员会进行

检控的材料会束缚甚至危害那些瞄准单个黑手党头子的案件。麦克还认为，突然转移工作重心会挫伤检察官和特工的积极性，他们已经进行了几个月艰苦的调查。“管理委员会案似乎更注重宣传效果而不是对黑手党的打击，”麦克声称，“我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尽可能快地铲除那些家族，而不是管理委员会。作为决策者，鲁迪优先考虑管理委员会是非常草率的。”

作为一个颇受赞誉的检察官，在吉乌里亚利的批准下，麦克于1983年3月的确拟定了一份起诉书，准备在非管理委员会讼案中以杀人和敲诈勒索罪检控甘比诺家族24名成员和合伙人。这个由多个执法机构进行的调查在吉乌里亚利成为美国检察官很早以前就已经展开。不久以后，吉乌里亚利将麦克降职，由自己亲自主持有组织犯罪工作。“鲁迪有时和我是有些问题，”麦克承认道，“我固执己见而且直言不讳，而鲁迪的管理风格是，‘得按我的路子走’”。

一旦在纽约南区站稳脚跟，吉乌里亚利就把RICO的主要起草人鲍勃·布莱克当成尊贵的倡导者欢迎他回来。自从两年前纽约FBI高官接受了他的理论后，他就成了他们所倚重的智囊人物。特工们开玩笑地给他起了个“顾问”的绰号，而他则力劝他们设法大规模地检控整个管理委员会，以期在一次联合审判中就将这个地区黑手党老板一网打尽。在和吉乌里亚利见面时，布莱克鼓励他实施这个计划。“吉乌里亚利的脑子全速运转，”布莱克说道，“他充满着活力，知道如何运用RICO法，他吃透了它。”

仅凭一次检控就打垮那些老板的主意，吉乌里亚利后来坚称，是他自己在赶往纽约任美国检察官的数月前想到的，是受“科萨·诺斯特拉”的一个奠基人乔·博兰诺所启发。1983年初，任司法部三号首长的吉乌里亚利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博兰诺在电视节目《六十分钟》中推销其自命不凡的回忆录。阅读《体面人》时，吉乌里亚利断定博南诺已列出了管理委员会的整个组织体系。吉乌里亚利在其2002年出版的《领导层》当中称，他“梦想着利用RICO起诉那些自认为是‘堕落组织’的黑手党领导层。”

“我意识到，博南诺针对这些家族如何组织起来的描述实际上提供了一幅准确的可以运用RICO法令来打击规定目标的路线图。一旦成为美国检察官，我就会让博南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吉乌里亚利写道。他指出大多数刑事案件开始时都由联邦特工或警察展开调查。他声称，管理委员会案因他的亲自介入而多有不同。强调检控犯罪家族老板对他这个“仇恨”意裔黑手党分子的人有着特殊的意义之后，他接着说，“从一开始，我就是调查这个案子的参与者。”

然而，管理委员会调查的缘起依旧迷雾重重。

“我不知道在首次谈及管理委员会组织检控时鲁迪在想些什么，”戈德斯塔克回忆他与吉乌里亚利 1983 年的会面时说，“但没有迹象表明他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他说，‘这听起来很有意思，你打算怎么把它合在一块？’”

在吉乌里亚利到来的一年多以前，勤勉的 FBI 官员已经认识到了突破性地检控管理委员会的可能性。从 1982 年在卡萨斯道达饭店窃听科洛博帮开始，联邦和州司法人员第一次录下多个黑手党大佬那直率而无拘无束的谈话，这些人包括保罗·卡斯蒂利亚诺、托尼·萨勒诺、托尼·科拉罗、代理老板格里·朗格拉及他们的诸多黑手党同伙。特工和调查人员认真研究了那些令人信服的证据、可资利用的情报和有价值的闲聊。窃听器揭开了黑手党首脑们秘密活动的基本细节，而这些情况在以前从不为执法机构所知。塞尔瓦托·阿韦利诺的求知欲特别有用。他读过几年大学，在驾驶那辆“美洲虎”时，他像好奇的大学新生一样，不停地向“鸭子”科拉罗和卢切斯家族其他元老人物问些敏感话题，诸如其家族的历史、内部运作和与其他家族的关系。

“美洲虎”里的谈话讲到了敲诈勒索与高利贷犯罪，谈到了和其他犯罪家族合伙操纵的混凝土俱乐部，也提到了百依百顺的工会领导人和老板们在贩毒问题上的意见冲突。这里还有一些私密性的话题和自我反省的对话，既聊到了如何巧善方便地鼓励教子们循着教父的事业之路加入“科萨·诺斯特拉”，也猛烈抨击了保罗·卡斯蒂利亚诺贪得无厌地追求更大份额的不法收益。

开始对黑手党展开调查时，FBI 官员们有很大的空间来设定这些家族案件要达成的目标。他们原计划分别检控纽约五大家族的首脑，然后再摧毁他们的势力范围。就在分别展开调查的过程中，FBI 纽约有组织犯罪主管吉姆·科斯勒越来越注意到五大家族和管理委员会那相互交织的利益。每个星期四的上午，在老城区 FBI 总部一个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科斯勒都要与反黑手党小组的成员以及与他们组成联合特遣队的市警探们一起开会。会议目的是互换情报、交流看法和设法理清一些模糊的线索。“当我们对各个家族展开打击时，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楚，他们的许多调查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点，”科斯勒告诉特工说，“不同的小组拿着那七巧板不同的部分。”

FBI 和州里的窃听器捕捉到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即被窃听者无数次提到那个神秘的管理委员会。从帕尔马好汉俱乐部、“美洲虎”和其他地方取得的窃听录音处处都在谈起这个裁决机构。不同的老板都在谈论相同的高层会议、利益分配和控制在他们手里的工会与建筑公司。将数百小时的窃听录音片段拼合在一起，FBI 开始认识到管理委员会成员的权力之大：他们授权谋杀、推行联合经营、调整家族间的关系和禁止

吸收其他犯罪家族的打手。

电子窃听还弄清了黑手党对一个全国最大和最具实力的工会的影响力。劳工诈骗专家科斯勒解读了托尼·萨勒诺一天下午与克利夫兰黑手党代表谈话的重要性。在讨论挑选一个不明工会的新领导人时，这些人很随意地就否决了一些提名。科斯勒熟悉他们所提到的人名。“你有没有想到这帮家伙到第 115 大街来讨论什么？”他提醒他的同事，“他们在挑选卡车司机协会的下一届主席。”

窃听录音证实了饱受内斗折磨的博南诺家族至少被暂时逐出了管理委员会的传闻，因此这个董事会现在基本上是由纽约其他四大帮派组成。芝加哥和其他城市的犯罪家族不再自动取得管理委员会的席位。窃听结果显示，克利夫兰、费城、新英格兰、密尔沃基、布法罗和新泽西黑手党家族通常扮演着卫星家族的角色，其领导者的任免和其他重大的内部决策都得征求纽约的意见或取得它的认可。

早在 1981 年，州和联邦官员与检察官就在各种调查的不同阶段认识到了管理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并认定它是个可望拿下的 RICO 目标。“我们早在 1981 年就在考虑立案调查管理委员会，”1986~1987 年任 FBI 纽约分局局长的托马斯·希尔（Thomas Sheer）说道，“那是我们最初和最终的目标之一。”

虽然吉乌里亚利可能不是第一个想到检控管理委员会的执法官员，但他的确曾将数项独立调查的不同部分整合成一个单独的具有内在聚合力的案件。他是无可争辩的推动者，几乎从其接手纽约南区的那天起，他就在谈论着要集中火力对付管理委员会。“鲁迪把从博南诺的书里摘录的内容读给我们听，并说道，‘难道那不是个足以令人惊叹的案件？’”沃尔特·麦克指出。

在司法部长和 FBI 局长的支持下，吉乌里亚利有权从 FBI 那里获得所有与其工作重心有关联的资源。1983 年夏末，FBI 纽约分局开始展开行动。FBI 响应吉乌里亚利的请求和司法部的指示，正式对管理委员会立案，并指派它的一个最机智和最有闯劲的专案特工帕特·马歇尔（Pat Marshall）参与调查。

作为带队特工，马歇尔在 FBI 和吉乌里亚利及其专司管理委员会检控的检察官团队之间充当了联络员的角色。他得复听并采集大量录音，将被窃听的谈话整合成罪证，同时还负责研读成千上万份与主要嫌疑人有关的新旧报告，并向检察官们提供其所需的证据。FBI 协作主管吉姆·科斯勒之所以选中马歇尔是因为他在黑手党调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同时还具有非凡的交际手腕。要让特工们突然让出或中断他们手头的案子，把辛苦得来的证据交出来帮助另一个特工，就像现在的马歇尔，那恼怒、愤恨和嫉妒的情绪肯定会爆发出来。“我们需要一个既受人敬重又能圆融地处理好和

每个人关系的人，” 科斯勒告诉其他主管，“帕特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每个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只顾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偷猎者。”

33 岁的马歇尔身材瘦削，留着浅褐色的头发，少时就梦想加入 FBI。中学毕业后，他作为记录员在家乡的联邦调查局巴尔的摩办事处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大学毕业后，他有了获准进入联邦调查局工作的资格，并于 80 年代初来到纽约专门从事有组织犯罪调查。

在马歇尔的职业生涯当中，他碰到的最为复杂和敏感的任务便是管理委员会案。FBI 有条不成文的行为准则是严禁特工拒绝执行命令，但该案牵涉面之广和不得不哄着同事来合作毕竟让他承受着巨大压力。很快，他就碰到了许多唱反调的人。他反复听到的一句话是：“我们当然知道管理委员会存在，但你从来就没法证实它。” 为了让他们把录音带和他们的证人让出来，马歇尔温言软语地安抚那些反对者：“我知道你们心里窝火。但你们仍可以办你们的案，而录音带可以在其他检控和审判中再度使用。”

除了 FBI 出现内部对立外，复杂的管理委员会案有时还让州有组织犯罪特遣队大为恼火。两个机构各自为阵地对相同的嫌疑人进行着未经协调的调查，这至少让它们错失了一次找到重要证据的良机。1983 年 6 月，州调查人员通过“美洲虎”搞到一条极为珍贵的情报：管理委员会将按计划召开会议。特遣队知道，在 6 月 14 日这一天，塞尔瓦托·阿韦利诺将驱车把“鸭子”科拉罗和卢切斯家族其他领导人送到管理委员会的会场和其他老板及头目晤谈。

它显然是一次重要的会议，除了其他事项外，老板们在会上还将审查拟被五大家族所接纳的新成员的资格。调查人员听到科拉罗向阿韦利诺表示，他打算抵制甘比诺家族的一个候选者，因为此人曾在一起民事诉讼当中作过证。这个卢切斯家族的老板把站上证人席——即使与非刑事案件有关——都看成是与执法机关合作，是丧失黑手党正式成员资格的污点。

然而，没有进一步的线索表明这次会议将在何时何地举行。执法特工们以前从未搞到过与极为神圣的管理委员会会议有关的预报信息。特遣队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准备在黑手党要人离开住所时开始摄像，直到顺藤摸瓜地找出确切的会议地点。他们留下的影像可以作为实实在在的法庭证据支持管理委员会存在的说法并让其成员难脱罪责。考虑到 FBI 特工经常秘密跟踪重要的黑手党目标，州特遣队调查员佛瑞德·雷亚诺就通知 FBI 官员，称在管理委员会开会当天，他的人将跟踪参加秘密会议的“鸭子”科拉罗并设法拍摄进出会场的其他与会者。“如果你们要监视卡斯特利亚诺或者其他什么人，我们务必不要蜂拥而上而坏事。” 雷亚诺对他的 FBI 同行说。

6月14日下午，特遣队依靠一架直升机和大群州调查员来跟踪阿韦利诺的“美洲虎”。在长岛锁定“美洲虎”比较容易，尽管阿韦利诺使出惯用的“干洗”战术来摆脱尾巴，但无论是在公路上奔驰还是在密集的城市交通线上左拐右转，那辆车始终都没有脱离特遣队的视线。目标最后在下曼哈顿脏乱的鲍威利居民区停了下来。科拉罗和他的副手被发现走进了普林斯大街显然是会议地点的“巴里酒店与匹萨设备公司”。估计这些老板们得开上几个小时的会，雷亚诺就部署人手准备在黑手党大亨们退场时摄像取证。但仅仅在科拉罗赶到几分钟之后，也就是在摄像机被准备好之前，科拉罗、保罗·卡斯特利亚诺、胖子托尼·萨勒诺和其他满面怒容的黑手党人跑出了大楼，或钻进自己车或叫出租车迅速逃离了这个地方。气喘吁吁的萨勒诺被年轻些的黑手党人推着挤过后窗逃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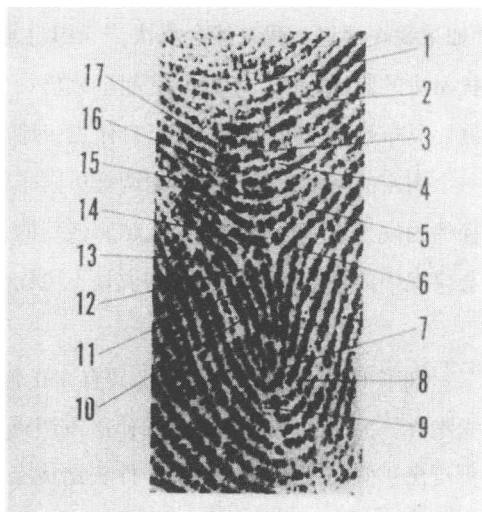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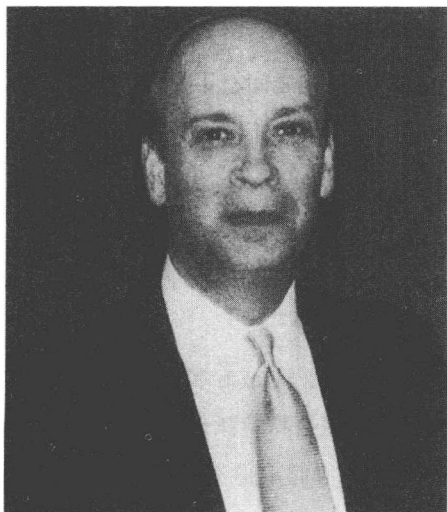
当天晚些时候，失望的雷亚诺通过“美洲虎”里的窃听器弄清了这场混乱的原因。科拉罗告诉阿韦利诺，会议被中断是因为保罗·卡斯特利亚诺发出了警讯，说是教父们被FBI侦察人员所监视。这个甘比诺家族的老板肯定地说，他看到特工约瑟夫·奥布赖恩（Joseph O'Brien）在大街上透过巴里匹萨设备公司大楼的平板玻璃窗朝里张望。这个黑手党老板认识奥布赖恩，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特工一直在秘密监视他以图刺探情报。

奥布赖恩矢口否认当天下午出现在会场附近，更不用说尾随卡斯特利亚诺。“不是我。卡斯特利亚诺看到的可能是其他人，”身高达1.98米的奥布赖恩争辩道，“如果我在那里，我自然会承认。”FBI主管们支持了他的说法，坚称他们没有特工干扰州里的监视行动。不过，这起事故仍难免让州与联邦机构之间有了嫌隙。雷亚诺推测，奥布赖恩“可能出于好奇自作主张地前来探查”。他认为，FBI的愚蠢行动搞砸了一个周密的行动。特遣队其他调查员则相信，奥布赖恩或者另一个特工别有用心地窥探的确发生过。他们估计，优越感强烈的FBI特工与其说是试图表明他们在侦破这起会议案中的调查优势，还不如说是不愿让州调查人员独享这非凡成就的全部功劳。

到了1984年底，纽约地区共有350名FBI特工史无前例地或专职或兼职调查黑手党案件。另有约100个城市的侦探或调查员被派到FBI联合特遣队来增援他们。这大批反黑手党司法人员是为了一件头绪庞杂的工作而来，他们不得不在一个涵盖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和其他州的广袤地区密切监视1000多名荣誉者和至少5000名合伙人。（黑手党调查员估计，这些家族每个荣誉者手下可有5~10名合伙人和崇拜者。）除了继续调查五大家族外，特工和调查员们不得不放下了他们的日常工作，转而从事

重中之重的管理委员会案调查。为了帮助担子越来越重的帕特·马歇尔，又一名特工夏洛特·兰（Charlotte Lang）受命成了检察官们的全职专案特工。

即将到来的管理委员会检控行动有个尚待厘清的地方是 1979 年卡迈恩·利诺·加兰特和两名同餐者的午宴谋杀案。吉乌里亚利和他的检察官们自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管理委员会下达了加兰特的死刑令，刺杀案发生时绝大多数 FBI 和当地黑手党调查人员都认为他就是博南诺家族的老板。（结果将证实官方弄错了加兰特的真实头衔。25 年后，FBI 最终弄清他从来就不是博南诺家族“法定”的领导人，而是一个傲慢的意欲控制那四分五裂的犯罪家族并希望被公推为最高独裁者的角头。）从动机上来讲，检方倾向于这种看法，即与加兰特有嫌隙的教父们害怕他发起一场成为“老板中的老板”的夺权运动而希望他死。管理委员会案的这个突破口可望提供充足的证据，让检方能够对一个真实的与管理委员会有直接联系的刺客提起谋杀指控。特工们强烈怀疑博南诺家族的吸毒打手安东尼·布鲁诺·印第里凯托（Anthony Bruno Indelicato）便是三名刺客中间的一个。加兰特被杀约 45 分钟后，在小意大利甘比诺家族拉维尼特俱乐部外的人行道上，印第里凯托受到了博南诺和其他家族要员的拥抱、亲吻和祝贺，而这一场景恰好被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一个监视小组拍摄了下来。正当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人为其他黑手党案件全力监视甘比诺家族二老板尼尔·德拉科罗塞时，印第里凯托赶来了，显然是要报告刺杀加兰特成功的消息。那是个夏天，印



加兰特谋杀案发生 6 年后，FBI 从事管理委员会调查的专案特工帕特·马歇尔运用新技术从逃跑车辆上获取了一枚隐约的指纹。这枚指纹让检方能够将博南诺家族的打手安东尼·布鲁诺·印第里凯托做为杀手队的成员起诉。（联邦调查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第里凯托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色T恤衫，从录像带可以看出其腰间衣服里的枪柄轮廓。但录像带充其量只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检察官们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印第里凯托就是加兰特的死刑杀手之一。

加兰特谋杀案中的逃跑汽车，一辆水星蒙迪欧，在案发后不久被警方找到，但他们的法证检测未能让里面的部分掌纹——汽车上留下的唯一证据——与任何犯罪嫌疑人相匹配。在介入调查的那些年里，FBI研发了一套手纹片段鉴别系统，案发五年后帕特·马歇尔冒着极大危险搞到印第里凯托完整的手纹，并利用FBI的法证系统对其进行了检测。“瞧，我们找到了他，”马歇尔骄傲地向吉姆·科斯勒和检察官们报告说，“我们靠一个车门内侧的左手掌纹抓住了他。”找到了当天出现在谋杀现场的杀手布鲁诺·印第里凯托，他们就可以通过他追查到甘比诺家族经常坐到管理委员会会议桌上的二老板德拉科罗塞。FBI和检察官现在可以将谋杀罪名钉在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身上，指控他们下达了加兰特的死刑执行令。

如果说占乌里亚利对管理委员会的兴趣源于乔·博南诺所披露的内情，那么“美洲虎”录音带则让他对那个流亡老板的文学自白书有了加倍的探索热情。在两盘录音带上，“鸭子”科拉罗及其二老板“汤姆·米克斯”塞尔瓦托·桑托罗嘲讽地谈论到博南诺在《六十分钟》节目上露面推介他的书。卢切斯家族的成员痛骂他是个违反“乌默它”戒律的叛徒，特别是他通过证实美国黑手党诞生的细节，以换取高额报酬的出书合同和电影协议。在怒斥博南诺的同时，这些黑手党人无意间为证明管理委员会的存在及其历史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为桑托罗开车时，阿韦利诺多次提及博南诺回忆录及其与老辈教父汤米·卢切斯、卡洛·甘比诺和乔·普罗旺斯的关系。1983年3月28日，博南诺披露内情一事成了桑托罗和阿韦利诺在“美洲虎”里谈论的主要话题。

阿韦利诺：“我惊呆了。他要证明什么，他是个荣誉者吗？他在承认——他，他实际上承认他有个共济会，他是个家族老板。”

桑托罗：“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阿韦利诺：“尽管他说，‘这是我的家庭。我就像父亲一样。’”

桑托罗：“他在想法摆脱黑道人物的形象。他要回到过去，啊，就像在意大利看看，当他说‘我父亲教我的’的时候。”

在《体面人》当中，博南诺否认涉毒。桑托罗嘲弄说道：“他满嘴胡说八道，我就知道他是个表里不一的家伙……他说他从未涉毒过，真是胡说八道。他自己败坏规矩，大把大把地捞钱……”

这两个黑手党人责骂博南诺显然想凭着做过黑手党教父的经历来捞取实惠。

桑托罗：“这个杂种，你知道他要干什么，这个杂种！要知道，他现在捞足了钱，他的书……拍电影，这个家伙就将像个技术指导，不管它，这个杂种要赚大钱了。”

阿韦利诺：“确实是这样，嗯，现在他们会说我们知道谁是最初的教父了。”

在两周以后的4月6日，当阿韦利诺和老板“鸭子”托尼在“美洲虎”里交谈时，博南诺再次成了主打话题。阿韦利诺对博南诺坚称他1964年被其他黑手党人绑架的说法尤感兴趣。科拉罗不屑地驳斥了这种说法，称博南诺玩失踪是害怕遭到黑手党的毒手，因为他谋杀对头老板汤米·卢切斯和卡洛·甘比诺的计划失败了。

科拉罗：“博南诺。他诉苦了好多年，这个杂种。开什么玩笑？”

阿韦利诺：“那么现在，他是怎么告诉他们自己绑架之事的？他们会对他们说是……”

科拉罗：“什么绑架？”

阿韦利诺：“就是他潜逃的时候。”

科拉罗：“他逃跑了，这个虚伪的杂种，哪来的绑架？……他得让那合理合法。他得把它说成绑架。我想知道他们勾结在一起要杀掉甘比诺、汤米·布朗（卢切斯）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后果。”

阿韦利诺告诉科拉罗，博南诺曾在采访中坚持说“教父”或者说“老板”“全凭个人意愿管理着一个家族。”

科拉罗：“他那么说的？……他们可以把他召进去，然后根据这法令把你拘押起来。”

阿韦利诺：“这 RICO 法令。他承认他掌管了一个家族……”

科拉罗：“现在他们就可以把他传唤进去……他们让他做证人……那你准备怎么办？”

科拉罗可能已经看出了鲁道夫·吉乌里亚利的意图。这个检察官及其助手每天工作15小时就是要找到罪证检控管理委员会，而为了取得关于管理委员会的历史及其权力的第一手材料，他们要讯问的一个关键性证人便是乔·博南诺。1984年11月，博南诺接到一份到纽约一个大陪审团跟前作证的传票。79岁的博南诺以往进其家乡图森市的圣玛丽医院作出回应。他声称自己衰弱的心脏和其他老年性疾病不允许他外出，而且作证的压力也可能会使他丧命。他的私人医生开具证明，称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当官方医生诊断博南诺身体状况良好且适合应讯时，吉乌里亚利就飞到亚利桑那州试图劝他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作证，并提出可对他免于起诉。

躺在床上由其律师陪护的博南诺对吉乌里亚利很友好。“你干得不错。”他祝贺这位检察官道。但他谢绝合作，对在书中和电视里提及的关于管理委员会的来历及其黑手党生涯的事情避而不谈。面对每个可作为证言的问题，他要么含糊其辞地答对，要么就行使《第五修正案》赋予他的不自证其罪的权利。

博南诺的顽抗让他付出了以妨碍司法罪领刑四个月的代价。针对其判决提出上诉时，博南诺承认写自传是“错误之举”。他坚持说，为政府作证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那也违背了他的“原则”。（博南诺出狱后，他在亚利桑那州度过了其隐居生活的大部分时光，并于2002年以97岁的高龄死在那里。很显然，他的心脏比他及其医生16年前所声称的要健康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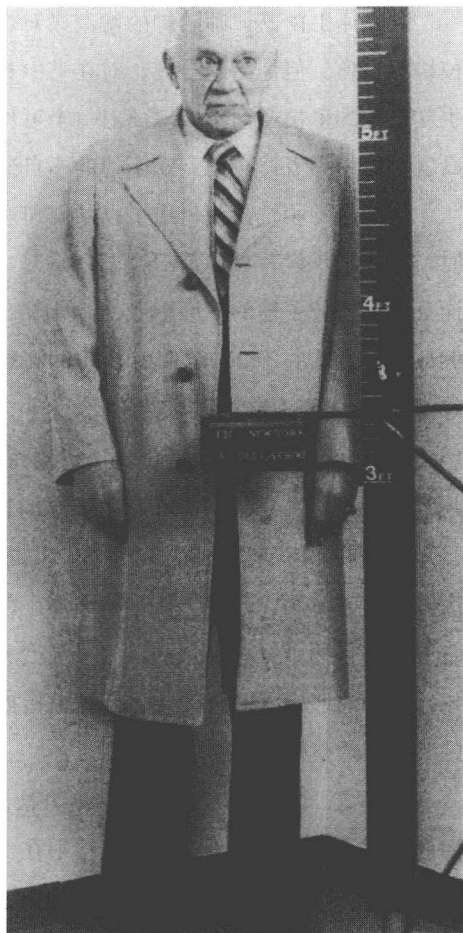
取得博南诺的证言是吉乌里亚利最后的准备工作之一。他和检察官帕特·马歇尔与夏洛特·兰及几十名前来协助工作的特工用了18个月的时间设法搞出了一份想来必无纰漏的RICO“组织”起诉书。其终稿通过了吉乌里亚利及其亲密助手和司法部决策者们的审阅。这是一枚重磅炸弹。在纽约五大家族中，有四大家族的首领将成为它的袭击目标，据称是他们组成了统治美国黑手党的管理委员会。作为其他的打击对象，追随这些嫌疑老板的几名亲信被指控为共谋犯，使被告总人数达到9名。黑手党的整个统治集团将被推上被告席。

1985年2月，在曼哈顿联邦地方法院，一份列出了15条罪状的起诉书在大陪审团的正式表决中获得通过。FBI计划在2月26日（星期二）的清晨逮捕那些黑手党人，起诉书也将在当天解密并公布于众。就在准备实施逮捕的前一周，这桩惊天大案的消息却被人泄露给了媒体。“起诉书瞄准犯罪家族的大亨”的标题赫然出现在《纽约每日新闻》2月24日周日的报纸上。次日，为确保所有猎物不会跑掉，特工们对主要目标展开围捕，保罗·卡斯特利亚诺、安东尼奥·科拉罗、安东尼·萨勒诺和他们的共同被告在家中被擒拿归案。胖子托尼·萨勒诺在被捕时机上最为窘迫。他在东哈莱姆的寓所被抓获。FBI特工赶到时，从附近安迪斯殖民地酒馆预订的一顿丰盛的外卖饭菜也恰恰在此时送到。特工们拒绝了萨勒诺容他饭后离开的请求，当时他正准备和私人医生伯纳德·韦克斯勒及家族的4名手下享用那顿晚餐。

次日上午，在一个联邦法庭里，FBI主管吉姆·科斯勒和帕特·马歇尔并肩而坐，看着黑手党要员们被一溜儿押了上来接受RICO指控。“就是这样，”科斯勒自思自忖道，“真是太好了。布莱克时时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终于做到了。”随后，科斯勒给待在其圣母玛丽亚大学办公室里的鲍勃·布莱克打去电话，向他告知了起诉的消息。“在我的FBI生涯当中，这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刻。”他告诉那位法学教授。



身材瘦长的“大保罗”卡斯蒂利亚诺。1985年2月作为管理委员会案的主要被告被FBI逮捕后，人称“教皇”的他显得泰然自若。他被指证是甘比诺家族的老板，同时也是黑手党管理委员会或者说全国理事会的重要成员。（纽约市警察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管理委员会案的共同被告安尼洛·德拉科罗塞。他是卡斯蒂利亚诺的二老板，在受到谋杀和敲诈勒索罪指控时已经患上致命的癌症。他是甘比诺家族未来的老板约翰·J·葛提的导师。德拉科罗塞1986年的死亡导致甘比诺家族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大动乱。（纽约市警察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当天，在人头攒动的新闻发布会上，由司法部和FBI官员陪坐在两侧的鲁道夫·吉乌里亚利热情洋溢地宣读了一份长长的联邦和州执法官员的名单，并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每一名或多或少为这次检控行动的准备作出过力的调查员和检察官都受到了表扬。在向记者们讲话时，FBI局长威廉·韦伯斯特略略地提到了被用来检控这些老板的反黑手党法令。“在知道该用它做什么之前，我们已拥有RICO几乎快10年。”韦伯斯特说道。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他高度颂扬了RICO的无名起草者，但在嘈杂而狂热的会场上，此言基本上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未见媒体进行过相关报道。

第 25 章 帷幕升起

“他们制定所有规矩，规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

甘比诺家族老板保罗·卡斯特利亚诺显得轻松惬意。这是 1985 年圣诞节的前一周，在他的律师詹姆士·拉罗沙（James LaRossa）的办公室里，看起来无忧无虑的他正给事务员们分发着礼物。大保罗正陷入一桩联邦诈骗案之中，并且还将面临着另一场官司，但在那个星期一的黄昏，他在拉罗沙面前显得满不在乎且镇定从容。发过礼物之后，卡斯特利亚诺坐下与他的律师闲聊起来。

卡斯特利亚诺交纳了 200 万美元保释金后被释放，此时他并没有提及他所面临紧迫的令人头痛的法律问题。他只谈到要利用圣诞和新年审判延期的机会到佛罗里达州的庞帕诺海滨去度假。在检控管理委员会之前，政府已经控告他犯下了其他罪行：操控以甘比诺家族最凶残的杀手罗伊·德米奥为首的杀人盗车团伙并从中牟利。曼哈顿检控机关指控这个团伙偷盗并运送数百辆高级轿车到科威特，每辆车净赚 5000 美元。作为其利润分红，卡斯特利亚诺据说每周都会收到一沓价值 2 万美元的百元钞票，尽管他不太可能直接指挥这个团伙的行动，也不太可能直接插手与该团伙有关的 25 起谋杀。

陶醉于将谋杀受害者尸体剁成碎片的国际盗车组织头目德米奥遇到了对于一个职业杀手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命运。1983 年，人们发现他被射杀在其凯迪拉克汽车的后备箱里。在街头上，有传言称，他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可卡因吸食者。作为大保罗的共同被告，他被认为是个性情多变且不可靠的人。

作为一个前联邦检察官和明星辩护律师，拉罗沙自信检方针对卡斯特利亚诺卷入盗车案的指控将遭到失败，于是就说些前景乐观的话来安慰他。此案既没有将卡斯特利亚诺与盗车团伙直接联系起来的证人，也没有证明他涉案的录音带。FBI 甘比诺小

组的大多数特工都反对在检控中传唤卡斯特利亚诺，他们私下承认指控他的证据——主要由低级背叛者的证词构成——是不足信的。他们相信卡斯特利亚诺将会迎来无罪判决，或者至多面临一个在此轮审判中对政府有利的悬而不决的陪审团。

（吉乌里亚利后来告诉助手们，在审判开始之前，他接到参议员阿方索·达马托打来的第二次干预黑手党调查的电话，这次与卡斯特利亚诺的案子有关。根据公布的报告，吉乌里亚利认为这个参议员“似乎很天真”，他警告他绝不许再向他提起这种事情。）

盗车案刚一结案，拉罗沙就打算投入到头绪更多的管理委员会诉讼案之中并为那单独的审讯做准备。政府迄今尚未将其控告证据，即法律上所称的“发现材料”，交给辩护律师，所以拉罗沙对录音带的内容毫无所知，而那些证据都是FBI通过在卡斯特利亚诺的家和其他管理委员会被告的庇护所里安装窃听器获取的。

在拉罗沙的办公室，跟随在卡斯特利亚诺身边的是其王牌保镖兼被保护人托马斯·比洛蒂（Thomas Bilotti）。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黑手党人。70岁的卡斯特利亚诺身材高大，说话温和，具有一种精明干练的管理者形象，是那些高档豪华的俱乐部、酒店和疗养院所欢迎的人。他极力表现得端庄而体面，在日常工作中穿着剪裁考究的套装，在家里则身穿绸缎晨衣，足踏丝绒拖鞋，但他的举止风度显然对比洛蒂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矮胖、健壮，长得像个消防栓的比洛蒂年届45岁，看上去没有一点要仿效其主人的意思。他穿着皱巴巴的衣服，衬衣和裤子的颜色总是难以协调起来。一络假发似乎总是要拂着他的眼睛，这让他的相貌更显得有碍观瞻，他的诋毁者在背后借着那不合时宜的假发嘲笑地称他为“假发佬。”比洛蒂在甘比诺家族博得的声誉靠的是他对卡斯特利亚诺那磐石般坚定的忠诚和强烈的暴力嗜好，而不是靠大保罗所提倡的需要专业操作技能的白领犯罪。比洛蒂的办事风格是不需要多少借口：他看起来像个暴徒，其实他就是个暴徒。作为斯塔腾岛一个举足轻重的高利贷主，对于逾期不还款的家伙，他最常用的惩罚手段就是用棒球棍猛揍他们。

比洛蒂的合法身份是斯塔腾岛一家混凝土供应商——斯卡拉-米克斯公司的股东。其头衔是副总经理，而卡斯特利亚诺的儿子菲利普则是总经理。斯卡拉-米克斯公司的大部分收入，当时每年超过100万美元，都来自于转包市和州里的工程项目。

当天黄昏离开拉罗沙那麦迪逊大街的办公室之前，卡斯特利亚诺向这个律师问起第五大街一家香水店的地址，他想在那里挑一些更多的圣诞礼物。走出办公室时，卡斯特利亚诺悄悄对拉罗沙称，他对其在盗车案中的表现很满意。“我非常高兴，吉米。”

当天晚上，即1985年12月18日，卡斯特利亚诺在曼哈顿东区和弗兰克·德西科（Frank DeCicco）、詹姆士·菲尔拉（James Failla）和托马斯·甘比诺（Thomas Gambino）（卡洛的儿子）三名角头有个晚宴约会。约在下午5点45分，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卡斯特利亚诺让比洛蒂驾驶那辆豪华林肯的轿车来到东第46大街上的一家高档饭店斯帕克斯牛排屋（Sparks Steak House）门前，这里是他经常和副手们一起用餐的地方。曾经做过屠夫和肉品供应商的卡斯特利亚诺自认为是个品鉴牛排的行家，他特别喜欢在斯帕克斯享受牛腰肉的美味。尽管将车泊在一处禁用的停车区，但比洛蒂对禁停告示不屑一顾，随手将一张巡警慈善总会的标牌放在挡风玻璃内侧。

一阵密集的夺命枪弹劈头盖脸地裹住了这两个下车的人。三名杀手清一色地身穿引人注目的灰白色双排扣宽大衣，头戴俄式裘皮帽，他们用手枪朝目标抵近开火。卡斯特利亚诺的头部和身子中了6枪，比洛蒂则挨了4枪。刺客们徒步脱离现场，镇静地穿过人群往东朝第二大街走去。执掌家族大权达9年之久而无人挑战的卡斯特利亚诺尽管在私宅里采取了重重安保措施，但他感觉在这座城市里四处转悠还是足够安全而无需保镖层层护卫的。他唯一的保护者汤姆·比洛蒂当天晚上未带任何武器，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卡斯特利亚诺的盲目自信。

甚至在次日上午卡斯特利亚诺的尸检结束之前，FBI甘比诺小组的特工和警方调



交纳200万美元获释之后，“大保罗”卡斯特利亚诺1985年12月18日在抵达曼哈顿一家饭店准备与角头们聚餐时被枪手杀死。这个甘比诺家族教父的尸体被移走时，调查人员已经重点关注约翰·葛提，把他视为甘比诺家族的新君主和这起谋杀背后的首要嫌犯。（犯罪现场照片）

查人员就相当肯定是谁策划谋杀了这两个人。所有明显的迹象都指向了约翰·葛提(John Gotti)，此人是甘比诺家族里最残暴的一支行动队的角头，同时也是家族中最忠于卡斯特利亚诺的二老板阿涅洛·德拉科罗塞(Aniello Dellacroce)的人。FBI的秘密窃听器捕捉到甘比诺家族成员之间的谈话，这些对话谈到了葛提的行动队和卡斯特利亚诺之间的长期不睦，特别是提及后者要追查一起搞砸了的牵连到葛提的兄弟吉恩(Gene)的毒品交易。在卡斯特利亚诺刺杀案发生的两周前，德拉科罗塞因癌症死去，FBI特工知道他在有些时候发挥着缓冲者的作用，保护着约翰·葛提及其行动队免受卡斯特利亚诺的惩罚。

FBI的黑手党研究专家推测，德拉科罗塞的死亡让防止葛提孤注一掷的最后力量也消失了，在卡斯特利亚诺对其采取行动之前，无人能阻止他发起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当线人报告称两人被杀后不久葛提就篡夺了卡斯特利亚诺的教父之位后，这种推测听起来就更加可信。约翰·葛提成了甘比诺犯罪家族的新老板。但调查人员未找到一丝葛提卷入斯帕克斯牛排屋伏击行动的证据。

死后的大保罗仍然难逃其辱，因其恶名昭彰的生活经历，纽约天主教区宣布称，经过“祈祷和磋商”后决定禁止为卡斯特利亚诺举行公开弥撒。即使在生命终结之时，大保罗看来也比不上他的偶像和导师卡洛·甘比诺。唐·卡洛·甘比诺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科萨·诺斯特拉”巨人的典范，但他属于自然死亡，而且教堂显然没有理会其声名狼藉的过去而为他举行了全套的安灵弥撒仪式。

保罗·卡斯特利亚诺与尼尔·德拉科罗塞之死极大地改变了管理委员会案的检控策略和态势。在提起诉讼时，吉乌里亚利和FBI认定大保罗是全国最强大和最重要的黑手党大佬，将他列为主要被告。随着卡斯特利亚诺的死去，在其斯塔腾岛的家中截获的一些谈话录音就无法当成证据使用，因为那些谈话内容只与他有关。虽然卡斯特利亚诺的录音带有利于整个检控行动，但检方小组担心那些摒弃的证据会对他们控告其他老板造成实质性损害。因此，审理将不让甘比诺家族直接卷入讼案当中。

基于检控策略上的考虑，检方撤掉了另一个既定的被告“拉斯提”菲利普·拉斯泰利(Philip “Rusty” Rastelli)，此人在卡迈恩·加兰特遇害后被任命为博南诺家族的老板。指控他的证据尚嫌不足，因为他的声音从未被任何窃听器录下，尽管其他被控告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和黑手党党徒指名道姓地提过他。拉斯泰利改由纽约东区司法机关依据其他RICO罪名对其进行指控和定罪，罪状是领导博南诺阴谋集团从纽约运储产业中诈取数百万美元。

就在甘比诺与博南诺家族的教父们躲过审判的同时，吉乌里亚利的检察官又将另

管理委员会案重要人物安东尼·萨勒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送给其黑手党同伙的圣诞照片。胖子托尼穿着睡衣、浴袍，反戴着棒球帽，并习惯性地叼着一根雪茄。FBI 和检察官把他列为吉诺维斯家族臭名昭著的首领，但后来发现他从未当过教父或老板。（作者的照片）



一个老板排在了管理委员会案的被告名单上，据称是科洛博家族老板的“蛇”卡迈恩·珀西科作为替补被告被推上了被告席。首批接受检控的黑手党人从 9 人减少到 8 人，胖子托尼·萨勒诺成了头号被告，法院待审案件清单中赫然出现了“合众国诉托尼·萨勒诺等人”的标题。

在五大黑手党家族当中，修改后的起诉书只锁定其中三个家族的管理委员会代表。被认定是老板的安东尼·萨勒诺是吉诺维斯家族唯一受审的首领。卡迈恩·珀西科及其二老板“格里·郎”吉纳罗·郎格拉是科洛博家族受检控的大佬。受审阵容最大的当属卢切斯家族，其老板“鸭子”科拉罗、据称是二老板的“汤姆·米克斯”塞尔瓦托·桑托罗和嫌疑顾问“克利斯蒂·蒂克”克里斯托弗·弗纳瑞（Christopher “Christie Tick” Furnari）均被检控。

经常与格里·郎一起在卡萨斯道达酒店用餐的混凝土工人协会领导人拉尔夫·斯科波（Ralph Scopo）也被指控，罪名是为混凝土工程俱乐部的老板们诈取钱财。被确认为科洛博家族打手的斯科波因级别太低不可能参加管理委员会会议，他被指控充当管理委员会的听差，为黑手党巨头们策划和实施阴谋计划。

最后一名被告是博南诺家族的杀手安东尼·布鲁诺·印第里凯托，他也是一个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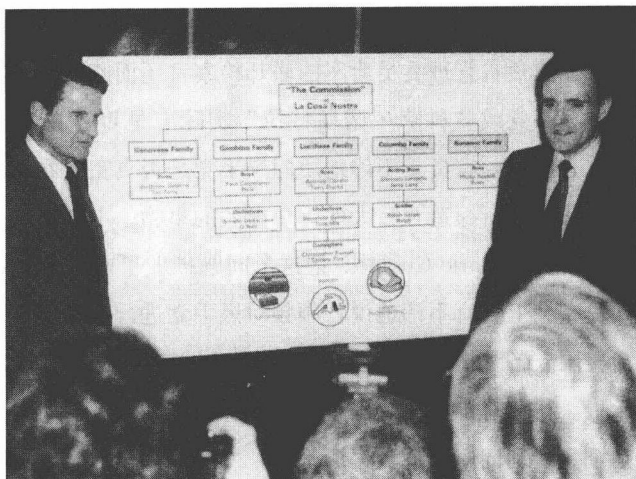
提起控告的非管理委员会成员。他因为执行管理委员会的命令在 1979 年刺杀了卡迈恩·加兰特而受审，检察官和 FBI 相信加兰特当时就是博南诺家族的教父。印第里凯托在这桩谋杀当中发挥的作用对其黑社会发展大有帮助，最终让他升任为博南诺家族的头头。

美国检察官很少在一线充当法庭公诉人，而是将任务交给其助手去完成。在像纽约这样的重要位置上，一位美国检察官的首要工作是管理、监督其办公室经办大量案件。他不会在一场艰苦的庭辩中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同时又去履行——或忽视——其监管责任。然而，鲁道夫·吉乌里亚利自信他既能担负起管理职责，又能在 20 世纪最重要的有组织犯罪审判，即管理委员会讼案中从事具体的检控工作。但 1986 年发生的一些事情改变了他的计划。纽约停车计时机构——违章泊车管理局（Parking Violations Bureau）授予的多份总造价达 2000 万美元以上的设备与维护合同引发了一起政治腐败丑闻。调查最终以控告纽约市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斯坦利·弗里德曼（Stanley J. Friedman）而告终，此人既是布朗克斯区民主党党组织负责人，也是游说市府的头号说客之一。这时，吉乌里亚利创造性地运用 RICO 法令，他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不仅用它来打击黑手党，还用它来对付公共腐败。他控告弗里德曼和三名市府官员操纵合同并将违章泊车管理局变成了 RICO 法令所定义的敲诈勒索“组织”。

是主持管理委员会案的检控工作，还是领导审理同样备受瞩目的弗里德曼案，这让吉乌里亚利左右为难，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政治上比较敏感的后者。他告诉助手，指控黑手党老板们的证据看来无可辩驳，其他机敏干练的检察官也能让这些入领罪获刑。泊车管理局案会更为棘手，他分析说，宣判无罪将有损于他及其办公室的声誉。或许，吉乌里亚利其他自我激励的动机是要和一个享有威望的对手，同时也是布鲁克林前联邦检察官的托马斯·普西科（Thomas Puccio）一比高下。在成为斯坦利·弗里德曼的辩护律师之前，普西科曾被誉为全国打击腐败政客和黑手党的最顽强的检察官之一，这种战无不胜的形象正是吉乌里亚利自己所渴望的目标。

吉乌里亚利挑选一位资历稍浅的助手迈克尔·切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担任其代理人来主持管理委员会讼案。32 岁的切尔托夫高高的个儿，头顶渐秃却有着浓密的黑胡须。从两年半以前（即 1983 年）开始展开调查时，他就与吉乌里亚利一起工作，对这个案件的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他是一个犹太教保守派传教士的儿子，出生在新泽西州的蓝领小镇伊丽莎白。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加入吉乌里亚利的团队成为助理美国检察官之前，曾得到过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位，那就是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做书记员。尽管切尔托夫任检察官只有三

在 1985 年 2 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运用 RICO 法的曼哈顿美国检察官鲁道夫·吉乌里亚利（右）和法官威廉·韦伯斯特（FBI 局长）在阐述管理委员会检控案的详细情况。尽管是谁首先提出运用 RICO 打击管理委员会尚不得而知，但吉乌里亚利被公认是该案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司法部特许转载的照片）



年，以前从未处理过一起黑手党案件，或者说一起棘手的完全依赖于电子监听的案件，但吉乌里亚利认为他是个极具才气、处事果敢的诉讼律师，不会被为那些老板开脱罪责的一枚枚法律的炮弹所吓倒。听到消息并意识到自己被赋予了一个负责处理重量级案件的绝好机会之后，切尔托夫只有一个念头：“我得赢，否则就会非常非常难堪。”他开始每周 7 天每天 18 小时地进行工作，为那意料之中的法庭抗辩预做准备。

纽约州法院有个首席法官曾说过，只要愿意，一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就能够起诉“一个香肠三明治”。一份抗辩书在纸面上可能显得势不可挡，但辩护律师们知道，检察官要说服一个由普通百姓组成的大陪审团来成就刑事指控是多么容易。通常，呈给大陪审团的是只有一种说法的证据——检方的证据。真正的战斗发生在法庭和上诉法院里。切尔托夫和另外两位年轻的检察官约翰·萨佛瑞斯（John F. Savarese）与吉尔摩·奇尔德斯（J. Gilmore Childres）将遭遇一帮狡猾而又拥有娴熟的有组织犯罪辩护技巧的律师。敛积了巨额财富的老板们也有钱招来老练的证人和调动其他资源来辩驳检方的证据和证词。

不过被告方发生了一件令人讶异的事情。冲动的“蛇”卡迈恩·珀西科做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他声称自己比大多数律师更有法庭实战经验，因而选择自我辩护。

甚至在审判开始的前夕，双方对 RICO 法令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都心存犹疑。作为美国黑手党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管理委员会审判已悄然临近。它是 RICO 首次在法庭上接受意义重大的检验，即使赢得了对这些全国最高级黑手党人的有罪裁决，争论与冲突仍将继续。这里将会有一场艰苦的上诉过程以检验依据新法律做出的有罪

判决是否符合宪法并得到高级法院，乃至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

三位负责管理委员会案的联邦检察官还面临着另一个微妙的障碍。这个国家广泛置疑黑手党或“科萨·诺斯特拉”实际上是否存在，这种情况可能影响陪审团的裁决。有些重要官员正不停地质问黑手党是否真正存在，它是不是那些傲慢且好出风头的执法官员所捏造并夸大的一个虚假的事物。卡斯特利亚诺被杀之后，纽约州长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把这个问题推上了前台。他在一次反种族陋习和歧视的新闻发布会上直言不讳地说，频频对黑手党进行执法打击和新闻报道让他本人和其他意裔美国人备受折磨。这在某种程度上响应了15年前乔·科洛博对FBI那喋喋不休的斥责。科莫对常常用“黑手党”来形容有组织犯罪感到悲痛。既然Mafia（黑手党）是个意大利词语，科莫告诉记者，“每次你说到它时，你就在向人们暗示有组织犯罪者便是意大利人——这是一种险恶的陈腔滥调。”被问到黑手党是否存在时，这位州长回答说：“你告诉我黑手党是个组织，而我告诉你那多半是胡扯。”

为了取得审判的成功，检方必须让所有12名陪审员相信四个基本事实：黑手党和它那应该是全权管理机构的管理委员会确实存在；被告是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或者是其命令执行者；管理委员会通过所谓的混凝土俱乐部控制了重要的建筑产业；管理委员会对卡迈恩·加兰特的死负有责任。

1986年9月，审判在位于福利广场的庄严的联邦地方法院正式开始。人们在第一天就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氛，当天主审法官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接受了一位匿名陪审员的起诉动议。不公开陪审员的身份和地址以保护他们免受可能的威胁和贿赂是对被告方挥出的一记重拳。在1986年，陪审员匿名是很少见的。这项裁决向陪审员们表明，他们已受到保护，以免受这些被告的伤害。

检方推出安吉洛·朗纳多（Angelo Lonardo）作为关键证人来陈述美国黑手党和管理委员会的起源与传统，此人自称曾是克利夫兰黑手党家族的代理老板和二老板。75岁的朗纳多充当了一个现身说法的历史学家，回忆了年代久远的黑手党事件、管理委员会的形成和可远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黑社会仇杀。他“变节”成为官方证人，希望减少其因敲诈勒索和毒品走私罪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刑期。除了那娓娓道来的关于黑手党的组织结构、传统习俗的证言之外，朗纳多还指出了每名被告的等级和地位。他指认胖子托尼·萨勒诺是克利夫兰黑手党处理与管理委员会关系的联络人。

在证人席上，朗纳多被检察官迈克尔·切尔托夫问道，“管理委员会在‘拉·科萨·诺斯特拉’里的职能是什么？”

朗纳多：“噢，如果有什么争端，他们就开会解决它。”

切尔托夫：“管理委员会还行使其他什么职能？”

朗纳多：“他们制定所有规矩，规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

在简要地说明管理委员会凌驾于所有犯罪家族之上的权威时，朗纳多说，“唔，根据规定，未经他们许可不得杀掉其他城市或纽约的老板。”

乔·博南诺的自我标榜之言和关于其往日荣耀的自传都被当成了指证被告的黑手党真相和证据。这个博南诺家族前老板拒绝作证，但检方播放了他在《六十分钟》节目上的电视采访，他在采访中自吹自擂地讲述了他在“科萨·诺斯特拉”的诞生和管理委员会的创立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精彩和更新的内幕消息出自科洛博家族前合伙人约瑟夫·坎塔鲁普(Joseph Cantalupo)之口。作为 FBI 的线人，他说和家族所有成员一样，他被告知珀西科在 1972 年乔·科洛博遭枪击瘫痪之后被指定为家族老板。坎塔鲁普甚至提供了 60 年代末管理委员会举行的一次咖啡谈话会的详细情况，当时科洛博权力达到了巅峰。声称与科洛博关系亲密的坎塔鲁普说，他在自己那布鲁克林的房地产公司中给这个黑手党老板安排了一个挂名职位，那是掩护科洛博进行非法活动的幌子。

“有一天，科洛博先生问我能否借用我的房子开一次会，”坎塔鲁普回忆道，“我说，‘当然可以’。”科洛博就指示他准备些吃食：“明天晚上让你老婆煮一大壶黑咖啡，出去买两磅意大利甜饼，再准备一张够五人坐的桌子。天黑了我们就到你家。”

次日，坐在自家那栋楼的门廊处，坎塔鲁普看到科洛博、卡洛·甘比洛和其他老板及他们的保镖乘车赶来并上楼进入他家。他们显得大大方方，没有人想着要遮遮掩掩。几个小时后，他们一次一个人地下楼并驱车离开了。

朗纳多和坎塔鲁普关于其黑帮生涯的证词听起来饶有兴趣，但两人都是为了获得轻判而达成认罪协议，因此他们的陈述令人怀疑，不足以证实管理委员会的存在和能量。他们的证言变得重要只是因为他们为检方的基本证据——通过秘密窃听器获取的录音增添了内容和意义。

朗纳多关于管理委员会在黑手党里拥有至高权力的说法得到一段录音的支持，这段录音与 1984 年 10 月 8 日上午在帕尔马好汉社交俱乐部举行的一次会议有关。两名自称克利夫兰家族使者的约翰·特罗娄龙(John Tronolone)、乔·皮埃里(Joe Pieri)被听到向占诺维斯家族的胖子托尼·萨勒诺求助，希望解决其家族的领导力之争。在那次会议当中，萨勒诺对两名克利夫兰特使称，他会把他们的请求传达给管理委员会其他成员。他告诉他们得教训一个独行其是的黑手党人，以便结束在克利夫兰新老板任命问题上出现的不和。讲这番说时，他的语调变得更加傲慢与专横。“让管理委员

会来决定，”萨勒诺被听到说，“告诉他这是纽约管理委员会。让他明白他现在是和大亨们打交道。”

萨勒诺曾抵制博南诺家族新老板拉斯提·拉斯泰利获得管理委员会的席位，他被录音的相关谈话增强了检方指控黑手党如何运作的说服力。1984年2月29日，胖子托尼向吉诺维斯家族的角头米基·吉尼罗索（Mickey Generoso）道出了他对拉斯泰利的看法。“我告诉管理委员会，”萨勒诺吐露说，“‘啊，啊，嗨，听着，这个家伙想成为老板。对我来说，他成为老板也未尝不可。’我说，‘但他不能出现在管理委员会里。一票就足以否决掉。因为，管理委员会的事，应该是神圣的事。’”

1984年3月22日，拉斯泰利争取获准进入管理委员会的事情在帕尔马好汉社交俱乐部再次被提起，当时萨勒诺正与吉诺维斯家族的打手詹姆士·艾达（James Ida）以及因其昂伯托蛤蚧店出名的角头“种马”马蒂·扬列诺会面。扬列诺告诉萨勒诺，拉斯泰利把他想吸收为家族成员的候选者名单交给了他，这份名单需经吉诺维斯家族高层的审查。

这个消息惹恼了萨勒诺，他猛烈抨击拉斯泰利在博南诺家族里倚重“垃圾佬”，即毒品贩子。“听着，”他责骂说，“我们还没有认可他……我不想见到（拉斯泰利），保罗（·卡斯特利亚诺）也不想见他。‘鸭子’托尼告诉拉斯提，他说，‘听着，’他说，‘先料理好你的家族。把你家族的事情解决好，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再谈管理委员会的事。’”

隐藏在帕尔马俱乐部的麦克风也录到“鸭子”科拉罗两名亲密助手的罪证之言，这两个人是卢切斯家族的二老板塞尔瓦托·汤姆·米克斯·桑托罗和顾问克里斯托弗·克利斯蒂·蒂克·弗纳瑞。他们和萨勒诺见面商量如何阻击拉斯提·拉斯泰利进入管理委员会。胖子托尼还担心拉斯泰利旗下大量的毒品交易会危及其他纽约家族。

讨论将博南诺家族排除在管理委员会和毒品政治之外的谈话是一条重要的检控证据，它证明桑托罗和弗纳瑞都属于RICO“组织”的成员。七十多岁的桑托罗对毒品生意并不陌生。和科拉罗一样，他出身于东哈莱姆一个在二战前后从事毒品贩走私的帮派。他最大的污点记录是在50年代因贩卖毒品被判处4年监禁。弗纳瑞因人身伤害和高利贷有过一次被捕记录，像他那个时代大多数黑手党人一样，他逃过了重罪判决和长期监禁。

“美洲虎”里的窃听器为检方立下汗马功劳，它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老板权力的内幕情报，包括将无视教父指令者处以死刑、管理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安排和家族吸收新成员的仪式。它甚至暴露了黑手党人如何轻蔑地看待以他们为打击对象的执法运动。

1983年7月，在吉乌里亚利宣誓就任美国检察官两周后，卢切斯家族的角头塞尔瓦托·阿韦利诺向其老板“鸭子”科拉罗谈起吉乌里亚利那矢志铲除黑手党的声明。在驱车途中，阿韦利诺提到，吉乌里亚利和其他官员相信政府逐步升级的镇压行动将打垮黑手党。阿韦利诺嘲笑吉乌里亚利，并讽刺了这位检察官的奋斗目标。

阿韦利诺：“这些意大利人都是传统的黑道之人，他们（官员们）觉得在下一个10~20年里，他们能够彻底铲除它（黑手党），因为他们正搞到越来越多的关于这些人的情报。”

科拉罗：“噢，他们将搞掉他们自己。”

阿韦利诺：“唔，那天他（吉乌里亚利）说，‘我们得雇用更多的检察官，因为有了更多的人手，我们就能铲除它（黑手党）。’所以我心里想，‘你最好马上去雇6个，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刚刚添了6个人。’”

7月底，阿韦利诺在那辆“美洲虎”里告诉“鸭子”科拉罗，《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认定他、桑托罗和弗纳瑞组成了卢切斯家族领导层，坐在车里的科拉罗闻听此言变得不安起来。两人都被那篇声称其帮派从事毒品交易的报道弄得心烦意乱，它已经引发了一场关于黑手党对毒品态度发生变化的讨论。毒品交易利润丰厚，但它比起其他非法活动更容易引起警方的注意。“鸭子”托尼称，他想警告他的打手，如果他们从事大宗毒品买卖，他将下令处死他们。他用黑手党暗语告诉阿韦利诺，黑手党的基本态度是允许暗中售卖毒品但不得被抓住。

科拉罗：“现在我不比这些家伙他妈的清白多少，因为我没有追究任何一个贩他妈毒的人，他们必须得死。够了。真他妈的。”

阿韦利诺：“就是，都是这该死的问题。是毒品。它们（执法机关）不在乎赌博和其他所有的狗屁事情。他们从来就不……”

几分钟后，科拉罗又回到了其手下贩毒的话题。“……不走上该死的街头，不去卖那狗屎的东西，你就不会入毒品这一行。我们应该杀了他们。我们得做些样子出来。看看，其他人（黑手党家族）就不像我们……好吧，有谁和我们合伙干，有谁走近我们，你知道，我们将杀了他们。不要担心，那会传到他们的狗屎耳朵里去的。知道吗？”

几天后，阿韦利诺和科拉罗再次在那辆“美洲虎”里谈起那些指出了其家族的领导人和不法交易的新闻报道。“鸭子”托尼反复念叨他是如何竭力保持在公众的视线之外以逃避执法机构和记者们的注意。

科拉罗和阿韦利诺一度骄傲地证实了“鸭子”托尼的黑社会地位。

阿韦利诺：“据说在那，在那篇文章里，它谈到了托尼，‘鸭子’托尼，谈到他控制服装中心，谈到他控制烂树叶处理业，还有建筑业。”

科拉罗：“是的，没错。你不知道？”

阿韦利诺：“我当然知道。我知道是因为我和你在一起，但不是其他每个人都知道的。”

科拉罗：“是的，唔，他们应该不知道。”

两人大笑起来。

在“美洲虎”的另一次短途出行中，针对卢切斯家族一名新荣誉者对向老板交纳贡金之事的懵懂无知，阿韦利诺和在服装中心从事敲诈活动的卢切斯家族打手理查德·德卢加（Richard DeLuca）都表示了惊诧。

阿韦利诺：“在他人会之前，他告诉我那工会是他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什么，你的意思是工会是你的？’他相信那狗屁工会是他的。而我说得是，工会？没有东西属于你的。一切都是老板的。”

德卢加：“是的。”

阿韦利诺：“等等，而我们，我们只有干好它或管理它的特权。除非你干得是合法的事情，那么你说，那是你的，他们会说，‘当然，那是你的。’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

德卢加：“你得按他的意思办。”

阿韦利诺：“他希望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的意思是，即使，即使是干合理合法的事情，你也得90%按照他当时的意思办。”

更多间接的证据表明黑手党是个秘密社团，从“美洲虎”的录音来看，取得其成员资格是个让人梦寐以求的事情。1983年春天，阿韦利诺一直在考虑是否推荐自己的儿子加入黑手党，他分别与科拉罗和桑托罗有过交谈以求指点。以科洛博家族的角头“胖男人”安德鲁·拉索（Andrew “the Fat Man” Russo）为由头，他和科拉罗提出了这个话题。

阿韦利诺：“安迪·拉索刚刚让他的另一个儿子，就是那个最小的儿子成了荣誉者。”

科拉罗：“他们（科洛博家族的人）都让他们的孩子成了荣誉者，哼。”

阿韦利诺：“是的，他的两个孩子都是荣誉者了。”

科拉罗：“你打算让你的孩子成为荣誉者？”

阿韦利诺：“不，现在不会。我的意思是此时此刻我还没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

在5年后，10年后可能会改变，但现在我还没有这个打算。”

在另一次单独和阿韦利诺坐在车里的时候，二老板桑托罗突然讲起他和科拉罗从不鼓励自己的儿子成为黑手党人。谈到卢切斯家族其他人“都觉得我们该考虑这个问题”，内心矛盾的阿韦利诺表达了他的想法。

“如果这种生活对你来说足够好，那么对我来说也足够好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点，为什么我们不让自己的儿子（加入）呢。如果我是个医生，从他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对我的儿子说，你得成为一名医生，或者如果我是个律师，我会希望我的儿子成为一名律师，所以他们必定觉得，如果这种生活对我来说足够好，那我就会希望自己儿子也拥有这种生活。不然我们就真的在说，这狗屁的生活真他妈的差劲。这是荒唐可笑的，对吧？因为我们总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对他们来说足够好的东西。对吧？”

有关受管理委员会严密监管却难以驾驭的博南诺家族的证词出自约瑟夫·皮斯通之口。皮斯通是FBI特工，曾在博南诺家族做过卧底。伪装成名叫唐尼·布拉斯科的黑手党人，皮斯通秘密录下了支持检方声称管理委员会在黑手党中拥有无上权威的主张。

1981年4月2日，博南诺家族的打手“左撇子枪手”本杰明·鲁吉埃诺告诉布拉斯科，称在卡迈恩·加兰特被杀之后，管理委员会命令各个相互攻伐的派系休战。鲁吉埃诺称，他估计在他的头儿拉斯提·拉斯泰利出狱且家族再次获得自治的时候，管理委员会能批准他成为老板。“所以”，陪审团听到鲁吉埃诺的录音说，“我们只有盼着拉斯提回家，但在这16个月老板们所说的休战期里，我们能不能活着挺过去还很难说。哪个家伙先动一下枪，他们就会灭掉整个行动队。”

1981年6月，皮斯通-布拉斯科曾陪同鲁吉埃诺和“宝贝布莱克”多米尼克·纳波利塔诺（Dominick “Sonny Black” Napolitano）见过一次面，后者是博南诺家族的一名角头，也是鲁吉埃诺所在行动队的头目。陪审团听到鲁吉埃诺保证说，卧底特工布拉斯科会尽快被吸收为黑手党正式成员。“现在你就要转正了，唐尼。”左撇子枪手发誓道。几秒钟后，反复无常的鲁吉埃诺力劝纳波利塔诺撕毁停战协定，并消灭阻碍他们控制博南诺家族的主要绊脚石“齐普”们，也就是西西里移民行动队。

纳波利塔诺打断他的话：“我不能那样做。这是管理委员会的规矩。”那个角头宣称。

许多录音披露了各种涉及到管理委员会决议的看法。在布鲁克林区本森赫斯特的斯道达饭店，安装在一张桌子上方的秘密窃听器提供了新的信息，它表明管理委员会

在处理黑手党家族之间经济纠纷上具有权威性。1983年1月26日，科洛博家族代理老板格里·郎·郎格拉和角头“弩马唐尼”多米尼克·蒙特马拉诺及朋友“胖子安吉”安吉洛·鲁吉埃诺（甘比诺家族的打手，与博南诺家族的“左撇子枪手”鲁吉埃诺无关）一起用餐。郎格拉和蒙特马拉诺向鲁吉埃诺大吐苦水，称他们对管理委员会的一项让科洛博家族付出了25万美元代价的裁决颇为不满。

因为一单失败的敲诈生意，觥筹交错的喧闹声也无法掩盖他们话语中流露出的愤怒情绪。他们告诉鲁吉埃诺他们的一个打手以劳资和谐为要挟向一家建筑公司敲诈5万美金。这家公司的老板恳求卢切斯家族的一个打手亲戚从中干预。由于这名建筑承包商与卢切斯家族的成员有着血缘关系，“鸭子”科拉罗建议管理委员会将科洛博家族的敲诈金额降到25万美元。在开会讨论时，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代理老板，郎格拉被级别更高的科拉罗、卡斯特利亚诺和桑托罗以3:1的多数票击败。

气愤的郎格拉向鲁吉埃诺表示，25万美元的损失对他来说不过是毛毛雨，但科洛博家族的阴谋被其他家族干涉让他极为愤怒，这是个很丢面子的事情。但在开会表决时，面对那些老板他保持了沉默。现在，他以其惯常的粗俗风格口无遮拦地讲了许多。“因为我问那三个家伙（老板）我是不是有权得到它（5万美元）。‘也许我错了，’我说，‘也许我无权得到它。’当那三个人说我无权得到它时，我放弃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会让这些狗娘养的老板们吃屎去。我操他奶奶的。”

表示同情的鲁吉埃诺说，他的叔叔尼尔·德拉科罗塞，甘比诺家族当时还活着的二老板，同情科洛博家族的处境。“尼尔告诉我，”鲁吉埃诺说，“他希望把它（那5万美元）交给你们。”

鲁吉埃诺郑重地对郎格拉说，对于管理委员会牺牲黑手党其他事情只考虑建筑业敲诈生意的做法，老派的喜欢靠武力说话的德拉科罗塞也同样感到失望。“他厌恶建筑，”鲁吉埃诺说，“他说，‘他们（管理委员会）为建筑上的事开会。’他说，‘我无法相信。他们讨论的都是钱。钱，钱，钱。’”

第 26 章 混凝土俱乐部

要是他与他的朋友没有分到好处，一立方码的混凝土也休想进入纽约这座城市。

黑手党难脱干系，因为所谓敲诈勒索，也就是那些欺诈法律所要制止的罪恶，就是他们以有组织和有纪律的方式结合起来去达成一个目的：去犯罪。”

最能说明管理委员会擅长捞钱的证据集中在混凝土俱乐部上。在审讯当中，陪审团对三大家族的统治者和被杀的保罗·卡斯特利亚诺如何在四年间从 13 个大型建筑工程项目敲诈了至少 127 万美元有了清楚的认识。

检察官推出两名承包商作为证人，他们作证说为了留在业内而不得不参与敲诈阴谋。“我觉得我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XLO 混凝土公司的总裁詹姆士·科斯蒂根 (James Costigan) 说道。他声称 1981 年科洛博家族打手兼混凝土工人协会主席拉尔夫·斯科波曾告诉他，每让他签下一份合同，占其合同总金额 2% 的酬金须交给黑手党人。如果科斯蒂根敢于挑战这种秩序，斯科波就以前所未有的工会麻烦来威胁他。

被检察官约翰·萨佛瑞斯 (John Savarese) 问及劳工问题对其公司产生了什么影响时，科斯蒂根回道，“损失了很多钱，到了濒临出局的境地。”

斯科波告诉这位承包商说，交给“科萨·诺斯特拉”的酬金将从所有 200 万美元以上的合同上收取。“他说这笔钱将被交到一个共同基金账户当中，然后在家族之间进行分配。”

有 7 家公司参加了这个俱乐部，科斯蒂根做证说：“控制它的人决定谁将得到什么样的工程。”科斯蒂根澄清说，没有公司在黑手党的阴谋中遭受经济损失。实际上，它们都从中受益了。和其他混凝土分包商一样，他在其标价的基础上增加了 4% 的费

用，然后将这超出的费用完全转嫁给负责整个工程的开发商或总承包商身上。（研究者们最后得到结论，由于所有预定的工程标价都被大幅抬高，黑手党与腐败承包商的合作让纽约市的混凝土总成本增加了15%~70%。）

斯科波暗示黑手党老板们并不是极度贪婪，他们指示科斯蒂根不要竞争低于200万美元以下的合同。“啊，这里还有许多小承包商，他们也得吃饭。”

以科斯蒂根的证词为基本依据，检方还播放了一段通过安装在斯科波那林肯轿车里的窃听器获取的录音。在录音带上，斯科波被听到拒绝心情急迫的承包商萨尔·德安布罗西（Sal D'Ambrosi）提出的请求，而这名承包商的公司并没有加入混凝土俱乐部。

斯科波：“这个混凝土工程应该是1200万美元。”

德安布罗西：“是，为什么我不能接这个工程。”

斯科波：“你不能接。超过200万你就不能接。要是低于200万，嗨，我，我就让你去接。”

德安布罗西：“我得找谁？告诉我，我必须找谁？”

斯科波：“你得找每个家族。而它们会对你说，不。所以不要再烦了。”

德安布罗西决心弄清楚，如果他能够幸运地成为俱乐部的成员，他得出什么价。

斯科波：“首先，所有的工程你都得付出2个点。”

德安布罗西：“为什么是2个点？”

斯科波：“他们都得付出这么多。超过200万美元的都是这样。所有加入俱乐部的家伙都捞了那么多，代价是2个点。”

德安布罗西：“嗯。把2个点算在工程里。”

斯科波：“我是说，你得提前付出。”

斯科波在录音谈话里为自己挖了一个更深的陷阱，他告诉德安布罗西，在一个没有被俱乐部控制的工程项目上，他得另交酬金给他以换取劳资和谐。这给陪审团上了一课，让他们知道了纽约腐败与高昂的建筑成本形成的基本原因。

斯科波：“要知道，如果我给你带来一个客户（总承包商），就20立方码（混凝土的一种度量），我告诉你，萨利，这混凝土1立方码60美元，这家伙就得给你63美元。”

德安布罗西：“3美元是你的。”

斯科波：“你得给我3美元。你在乎那一点点干什么？”

德安布罗西：“我在乎什么。”

斯科波：“你得到的是 60 美元。”

德安布罗西：“就这样吧。那点还算是问题么？”

斯科波：“那么趁这功夫，我就把那个承包商带过来见你。”

FBI 的录音带曝光了管理委员会拥有的生杀予夺的权力。斯科波承认，如果混凝土俱乐部受到调查，他担心自己性命不保。与 XLO 承包商科斯蒂根聊天时，斯科波想起了罗伊·德米奥的命运，被卷入甘比诺家族的盗车网络后，这个甘比诺家族的打手与残暴的刺客被谋杀了。斯科波将德米奥描述成一个严厉的有着“钢铁意志”的执法人，但他还是被做掉了，因为老板保罗·卡斯特利亚诺无端地认定德米奥不再可靠。德米奥的命运让管理委员会的捐客斯科波感到恐慌。

斯科波：“现在我受到指控，他们（那些老板们）就会感到害怕。‘噢，该死，我们根本不知道吉米·科斯蒂根那个家伙。’他们唯一担心的人是我。如果我开口，他们就死定了。所以要灭掉我这个掩人耳目的罪证。”

科斯蒂根：“真的？”

斯科波：“是的。我一生都在替他们挣钱。我一直在街上冒他妈的险。我愿意坐牢，绝不打算开口，但他们不相信。知道吗？”

斯科波声音听起来低沉，他说木工协会的腐败官员西奥多·马里塔斯(Theodore Maritas) 最近被谋杀，此前他与黑手党勾结之事被曝光且马上要以黑手党共同被告的身份接受审讯。他让科斯蒂根想起了罗伊·德米奥那可怕的结局。

斯科波：“我想，他算是个硬骨头，对吧？现在他给盯上了，他们就认为，‘在压力之下，这个家伙可能会告密。’无论他会不会这样，他们都会杀了他。我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如果这事情闹大了，我将是首先被逮捕的人之一。”

科斯蒂根：“为什么？”

斯科波：“就因为这狗屎俱乐部。现在有事情发生时，无论他们对你多么有信心，活命的机会总是那么一点点。他们说，‘噢，他可能会张开他那该死的嘴巴。’然后你就再也见不到那个家伙了。”

已经死去的保罗·卡斯特利亚诺带来了对于活着的老板们不利的证据。1983 年 6 月，吉诺维斯家族的手打路易斯·贾帝纳（一名劳工协会官员）赶到卡斯特利亚诺那斯塔腾岛的家讨论家族间有关建筑行业的事情。卡斯特利亚诺吐露了纽约市几个最大的总承包商的名字，他说这些人曾亲自向他许诺，会将有钱可赚的分包工程交给黑手党控制的公司。

FBI 的窃听器当时捕捉到卡斯特利亚诺抱怨说，混凝土俱乐部的承包商世纪马克

西姆公司未经老板们允许就参加了合同竞标。

卡斯特利亚诺：“你知道世纪马克西姆那帮人，世纪马克西姆？”

贾帝纳：“混凝土公司？”

卡斯特利亚诺：“是的。现在做得有点不厚道，他们不那么听话了。他们据说是和格里·郎（科洛博家族的代理老板）混在一起。他们是俱乐部的人，是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在侵入每个人的地盘。”

贾帝纳：“你绝不希望那样。这没有道理嘛。”

卡斯特利亚诺：“这是自讨苦吃。是吧？”

贾帝纳：“你会觉得他们是些大腕，会按类似的规则行事，对吧？”

卡斯特利亚诺：“唔，我们不知道谁见鬼惹来这事。要知道，他们是不能指望接太多的工程的。太多的活儿，这里有活儿干，每个人都能分一杯羹。”

贾帝纳：“如果他们合作，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要知道，这比制造混乱和其他什么事要强。”

卡斯特利亚诺：“当然。”

卡斯特利亚诺的混凝土生意有时把其他黑手党人给搞蒙了。1983年12月，在与卡斯特利亚诺和其公司已卖给世纪马克西姆的公司法人尼古拉斯·奥利塔（Nicholas Auletta）进行三方秘密合作时，“胖子”托尼·萨勒诺担心自己受骗了。吉诺维斯家族从事建筑业敲诈的打手路易斯·迪纳波列（Louis DiNapoli）试图为萨勒诺解释该如何分配一笔20万美元的非法收益。他们的谈话在萨勒诺的东哈莱姆总部里被录了下来。

迪纳波列：“但换句话说来说它就像一笔报酬。”

萨勒诺：“是的。但他们还得给。他们给，他们给我们20万，每月2万。”

迪纳波列：“尼克（奥利塔）该得的只有100美元。”

萨勒诺：“那么，那100美元在哪儿呢？”

迪纳波列：“在那笔钱里。是的。现在，他从这100美元里拿出50美元给保罗。再还给你50美元，还清他欠你的。”

萨勒诺仍然困惑不解，就问为什么他没有得到更多的现金。迪纳波列解释说，奥利塔的公司有部分交易中损失了钱，而这让萨勒诺更加迷惑。

迪纳波列：“损失钱的是那家公司，不只是尼克。那家公司，你拥有那家公司25%的股份。保罗也拥有25%的股份，而尼克拥有的股份占50%。所以你就按那种比例分红。你以为你减去了100美元。”

萨勒诺：“他欠我们什么？”

迪纳波列：“不，这只抵消他亏欠的50美元。那就是，为什么我得给你另外20美元的原因。”

虽然这一堂高级金融课可能让萨勒诺和陪审团感到难以理解，但这些谈话还是清楚地表明了他和卡斯特利亚诺与混凝土俱乐部的非法收益有牵连。

一些家族间的混凝土交易远未达到和谐的地步。“美洲虎”窃听器暴露了吉诺维斯和卢切斯家族高层对卡斯特利亚诺阴谋从建筑公司和工会里为自己捞钱的憎恨。

卢切斯家族的“鸭子”托尼·科拉罗急切地想了解他还未尝试过的新的黑手党诡计。在一次乘坐“美洲虎”出行时，“鸭子”的二老板汤姆·米克斯·桑托罗提起了卡斯特利亚诺捞到50万美元的事。桑托罗讲到与胖子托尼·萨勒诺以及吉诺维斯家族专司建筑业敲诈的打手文森特·迪纳波列会谈的情况。在和萨勒诺讨论敲诈生意时，桑托罗有意激怒萨勒诺，告诉他卡斯特利亚诺从混凝土生产商——标准预拌混凝土公司那里捞了大笔钱。讲述那次谈话时，桑托罗显得洋洋得意。

桑托罗：“这时我就说话激怒胖子托尼。我说，‘嗨，你知道保罗因为出售标准预拌混凝土公司赚了50万吗？’他看着我，‘你开什么玩笑？’‘是的，’我说道，‘他捞了50万。’”

桑托罗说，愤怒的胖子托尼萨勒诺把文森特·迪纳波列叫到身边，“眼里冒火”的他想知道，为什么没人告诉他那公司出售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他没有拿到分红？

桑托罗一边向塞尔·阿韦利诺讲授黑手党的礼仪要点，一边说起文森特·迪纳波列犯了个严重的错误。迪纳波列当时回答说，他以为卡斯特利亚诺的秘密计划与他的直接主管萨勒诺无关。“这不是你要考虑的狗屁事情，”桑托罗针对迪纳波列的回答说，“你把情况告诉他（萨勒诺），那就是他而不是你要考虑的事情了。”

阿韦利诺将与卡斯特利亚诺的贪婪本性有关的事情告诉“鸭子”科拉罗。他曾陪同桑托罗和卡斯特利亚诺见面，无意中听到这个甘比诺家族的老板发牢骚说，有个卡车司机地方分会的领导人减少了他们以劳资和谐为要挟索取的年金，把支付给甘比诺家族的酬金由20万美元降到了2.5万美元。

“他们习惯于每年送我一根骨头，每年约20万美元，”阿韦利诺引述卡斯特利亚诺的话说，并对他小瞧这笔酬金表示了诧异。“那是‘一根骨头’，他说。”

指出这就是卡斯特利亚诺攫取黑手党最大份不法收益的典型事儿，科拉罗说道，“我看他是在胡说。一根骨头，20万美元？……想想吧，他没拿够。我真他妈的没法

理解，他没拿够。想想吧，他拿的钱还不够。”

在被告当中，唯一未被电子监听设备录音的人是科洛博家族被指控的老板卡迈恩·珀西科和博南诺家族的打手安东尼·布鲁诺·印第里凯托，后者因卡迈恩·加兰特之死而受审。

在80年代初的大部分时间里，当秘密录音带已经在产生证据时，因绑架罪被判刑的珀西科正在监狱服刑。其家族代理老板格里·郎和其他被告在录音谈话中曾谈论过他，检方试图借此将他与管理委员会和混凝土俱乐部联系起来。但对珀西科最为不利的是他那个做保险推销员的表亲证人佛瑞德·迪克里斯托弗。

在因管理委员会案被捕之前，被通缉的珀西科曾在迪克里斯托弗在长岛旺托的家里躲藏了三个月。迪克里斯托弗将FBI引到珀西科的隐匿处，并因告发这黑手党人有功而获得了5万美元的奖金。

在接受首席检察官迈克尔·切托夫的询问时，迪克里斯托弗讲述了他如何通过婚姻无意间成了科洛博家族领导人的助手，并知悉了这个犯罪家族的秘密。迪克里斯托弗称，珀西科在他家躲藏期间曾无所顾忌地谈论他的非法活动，炫耀自己在监狱里通过访客和电话向郎格拉和其他亲信传达与犯罪行为有关的指令。“他的工作是管理一个犯罪家族。”迪克里斯托弗就事论事地说。

迪克里斯托弗将其他两名被告格里·郎格拉和拉尔夫·斯科波也圈进了珀西科的犯罪领导集团。珀西科经常说郎格拉值得信任，是他的核心人物之一。迪克里斯托弗证实，“他说拉尔夫·斯科波是其水泥与混凝土工人协会里的挂名负责人，要是他与他的朋友没有分到好处，一立方码的混凝土也休想进入纽约这座城市。”

通过迪克里斯托弗，切尔托夫得到了不仅可用于起诉珀西科的证据，而且还间接取得了对整个管理委员会不利的证据。据迪克里斯托弗称，珀西科曾回想起与卡迈恩·加兰特在70年代共处一间联邦监舍的情形。加兰特当时因贩毒正在服刑，而相对年轻的老板珀西科则因绑架罪刚开始他的刑期。这两个黑手党人相处融洽，迪克里斯托弗作证说，珀西科曾称加兰特“是个朋友和博南诺家族的头面人物”。

迪克里斯托弗回忆珀西科说，“非常坦白地讲，我投票反对伤害他。”这句话被检方用来加强其指控的力量，即尽管珀西科反对，但管理委员会还是进行了投票，并且多数人都支持杀掉加兰特。

指控布鲁诺·印第里凯托卷入1979年加兰特谋杀案有个最关键的证据，那就是在布鲁克林发现的杀手遗留在逃跑汽车上的掌纹。谋杀案发生后不久，他在尼尔·德拉科罗塞那小意大利的拉维尼特俱乐部出现充其量是一种间接证据。但检方为陪审团

播放的监视录像显示，大汗淋漓的印第里凯托当时分别受到甘比诺家族二老板德拉科罗塞和博南诺家族顾问斯蒂法诺·坎农（Stefano Cannone）的拥抱和亲吻。切尔托夫把掌纹、印第里凯托受到两名黑手党首脑的欢迎以及珀西科告诉迪克里斯托弗关于投票反对加兰特死刑联系了起来。他指出，这三个要素，加上以前只有管理委员会才能授权谋杀高级黑手党人的证词，就是一宗结伙阴谋罪的充分证据。在检方的推定当中，是管理委员会的老板们下达了加兰特的死刑命令。德拉科罗塞被指派监督这次刺杀行动，印第里凯托帮助具体实施，并在随后跑到小意大利，向甘比诺和博南诺家族的大腕们报告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切尔托夫还指出，博南诺家族原来那个无名打手印第里凯托在加兰特遇刺后被提拔为角头，这是他因功受赏的一个可靠迹象。

在审判之前，7名辩护律师和珀西科的法律顾问曾试图统一辩护策略。在这些人当中，有5人是前联邦或州检察官，所有人都是经过实战磨炼的辩护律师。通过在审前分析发现材料，他们能够摸清检方证据的可靠性和宣判无罪的可能性。

有个核心观点很明确：他们当事人的希望渺茫。这些黑手党首领和他们忠实的下属不可能取得认罪求情协议和轻判。除了承认犯下最严重的罪行外，吉乌里亚利绝不会手下留情，这意味着大多数被告都无保释的可能性，都将面临着终身监禁并老死在监狱之中。

这些律师一致认为，他们微弱的希望只能寄托于一个大胆的辩护策略：他们将默认管理委员会和黑手党的存在。他们的应对之法是让陪审团相信，与这些特定组织有牵连和与之结交并不是犯罪的证据。但对于有着献身精神和传统观念的黑手党人，这种策略与他们的神圣原则相抵触。要接受他们律师的建议，这些黑手党人就得抛弃他们最为珍视的戒律，并承认他们秘密组织的存在。即使他们的律师曾委婉地劝说他们，胖子托尼·萨勒诺、“鸭子”科拉罗和他们的共同被告都拒绝违反“乌默它”誓言。

在审前会议上，辩护律师们坦率地承认，他们已无选择。如果他们极力反驳和否认其当事人在录音中无数次提到的“科萨·诺斯特拉”和管理委员会，这些律师将放弃所有的可信性与逻辑性。

“我们不会直接对陪审团说，确实有个黑手党，而我们的当事人就属于它，”律师吉姆·拉罗沙向那些懊恼的老板和副手们鼓吹说，“我们将对陪审团说的是，‘对于这个案子，让我这么给你们说吧。起诉书的部分内容声称有这么一个组织，而我们的当事人就是它的成员。为了让你们做出判断，我们假设这是事实。但我们认为我们的当

事人没有犯下起诉书中所指称的任何罪行。’”大保罗遭黑社会谋杀之后，卡斯特利亚诺的前律师拉罗沙担任克利斯蒂·弗纳瑞的律师留在了辩护律师组里。

这些被告开始时仍表现得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勉强接受了这种方案，只要他们不被要求亲口供认与黑手党有关的基本事实。这种办法可以让他们问心无愧，因为他们坚守了“乌默它”戒律。这个将问题最小化的并不值得羡慕的任务落在能言善辩的律师塞缪尔·道森（Samuel Dawson）肩上。在向陪审团做申辩陈述的整个过程中，他一直企图把这个问题掩藏起来，只是在审判当中偶尔把“科萨·诺斯特拉”当成一个无甚意义的脚注提到过。“黑手党存在并拥有成员，”道森承认道，“即便有人是个黑手党成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犯下了本案中的罪行。”

然而，秘密终于泄露了。经过半个世纪的否认之后，通过允许其律师声称黑手党的存在是个事实，这些被起诉的黑手党人首次在美国法庭承认这个客观存在的组织。

卡迈恩·珀西科造成了另一个让人进退维谷的困境。他决定自我辩护让他的几名共同被告及其律师备感忧虑，他们担心他的辩诉错误会破坏整体辩护的态势。但珀西科是个老板，没有人能有撤消其顽固决定的权力。实际上，一些律师怀有一丝微弱的希望，认为他的法庭失误或许能导致无效审判或创造成功上诉的技术理由。但让辩护方感到不幸的是，法官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严肃地警告珀西科称，如果他坚持担任自己的辩护律师，他和其他被告将不得以“无资格律师”的理由对有罪判决提出上诉。

检方推出了85名证人并播放了一百多份录音与录像带，此外还出示了照片证据。尽管1983年州调查人员打算在鲍威利对管理委员会会议进行拍照的计划流产了，但FBI特工后来取得了成功。根据一个线人提供的情报，1984年5月15日，特工们利用一辆伪装的厢式汽车拍下了老板们在斯塔腾岛散会离开时的静态照片。会议在中产阶级聚居区南滩的一栋房子里举行，那是托马斯·比洛蒂一个堂兄的家，那家伙是个码头工人。除了博南诺家族的贱民外，所有黑手党家族都派来了代表。被拍摄存照的人有卡斯特利亚诺、比洛蒂、萨勒诺、桑托罗、弗纳瑞、郎格拉和斯科波。这次聚会的缘由不得而知，但照片的出示是一种有效且具有说服力的暗示，表明这是一次有着广泛代表性的管理委员会会议。在受审的人当中，有五人参加了这次聚会。

检方证人，像克利夫兰家族上了年纪的党徒安吉洛·朗纳多和科洛博家族一个地位低下的崇拜者乔·坎塔鲁普，在交互讯问中都可能不足以令人信服。他们是些有着多变的犯罪经历的人。站在证人席上，他们承认在以前的审讯中撒了谎，而这次同意作证只是因为基于为自己的罪行取得从轻量刑才与政府达成认罪协议。辩护律师提出

了一些巧妙的问题，暗示他们是些不值得信任的证人，有着作伪证和改变其供词的动机。但窃听录音是无可辩驳的，检方95%的重要证据都由它们构成。窃听器是政府的秘密观察者，提供了黑手党运作的无可争辩的证据。

在听取那些令人沮丧的录音的9个星期中，辩护律师们感受到了他们当事人日益悲观的失败情绪。胖子托尼·萨勒诺成了最能忍受痛苦的人，他好像根本不理睬日益逼近的厄运。作为被羁押且不得保释的对社会具有潜在危险的人，萨勒诺看起来更在乎他的胃口，而不是法庭的审判结果。他总是贪馋地吃着总也吃不完的小甜饼和蜜钱。在一次庭审结束时，他从拥挤的原告席上站起来要求法官欧文给予关照。对午餐只提供冷三明治非常不满的他哀怨地向这位法官请求道：“中午来一顿热饭怎样，法官？我们中午就不能吃顿热饭吗？”

共同被告安东尼·印第里凯托对他颇为同情，有一天就设法将一份牛肉三明治偷偷带进监狱，并暗中传给饿极了的胖子托尼。不幸的是，有个看守发现了这偷偷摸摸的伎俩，将那份三明治当成违禁品夺走了。

作为自己的辩护律师，卡迈恩·珀西科的初次登场给严肃的庭审带来了一丝喜剧色彩。当他站起来讯问证人或向陪审团做陈述的时候，陌生人乍一看可能把他当成了一位可敬的律师。和许多辩护律师一样，他身穿黑色和灰色的套装，内着全身一色的衬衣，并打着保守的条纹领带。他的金丝边眼镜和阴郁的探寻者的目光更增添了这种错觉。但当他说着布鲁克林方言用着诸如“我比方说”、“你可知道”和“该死的家伙”之类的措词试图在法律观点上赢取得分时，其正面形象便轰然坍塌。他不时紧张地向法官和陪审团表明，“请原谅，我有点紧张。”作为具有律师与被告双重身份的人，在交互讯问和动议当中，他称自己为“我”和“珀西科先生”。

在其申辩陈述当中，这个厚颜无耻的黑手党教父为博取同情，竭力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受压迫的弱者形象。“不要被成见所蒙蔽，”对着检察官，他哀求道，“是他们权力在握，而不是我。”在讯问那充满敌意的检方证人时，很明显珀西科在竭力博取得分的同时力图避免因问话失当而危及自身。他的法庭怪癖和名声引起了专业演员詹姆斯·卡安（James Caan）和罗伯特·杜瓦尔（Robert Duvall）的注意，为了观察一名扮演律师角色的真实的黑手党人，他们也出现在旁听席上。卡安在摄制原版电影《教父》前曾与珀西科接触过，而杜瓦尔在该影片及其续集当中扮演了那个顾问。

正像其共同被告所担心的那样，珀西科的表现对被告方的整体策略造成了冲击。在讯问指认他是科洛博家族老板的乔·坎塔鲁普时，珀西科声称坎塔鲁普曾被他的兄弟揍过。他的本意可能是要表明坎塔鲁普厌恶他，这个证人出庭作证是要寻仇泄愤。

“你愤愤不平是因为你挨过揍，可你挨揍是因为你没有偿还欠款。”珀西科狠批坎塔鲁普说。他的论证性提问是个明显的代价高昂的错误。那次打人事件是因一笔高利贷债务而起，这更表明了珀西科与其手下就是一群残忍的暴徒。

在盘诘混凝土俱乐部的承包商斯坦利·斯特乔伊斯（Stanley Sternchos）时，珀西科又出现了类似的错误。在力图表明斯特乔伊斯不足为信的时候，珀西科盘问出了这个证人声称自己没有依约向黑手党捐客拉尔夫·斯科波支付所需酬金的证词。通过证实例行回扣制的存在，珀西科的一系列提问强化了检方的指证力度，证实所有被告都犯下了敲诈勒索罪行。只有外行律师才会犯这种错误。

珀西科可能认为，他是在吸引陪审团并使自己的观点获得到认可，而不必让自己面对激烈尖锐的盘诘。看着珀西科，迈克尔·切托夫相信他的滑稽表现无意中帮了检方的忙。通过观察陪审团成员们的面部表情，这位检察官相信，珀西科与证人怒气冲冲的争辩只能进一步暴露其睚眦必报的暴徒本性。

替被告方出庭的只有一名证人：与佛瑞德·迪克里斯托弗关系不和的妻子凯瑟琳，即珀西科的表妹。她竭力反驳丈夫的证词，否认卡迈恩曾对他们讲过关于其黑手党地位的罪证之言，但她只是个边缘证人，其证言没有多少影响力。怀着撕碎证词和令录音失信的最大希望，辩护律师们最后只能指望他们的集体庭辩总结。然而，珀西科向陪审团所做的陈述证明比任何职业律师的讲话更吸引人。他滔滔不绝地讲了90分钟，频频强调一点，即检方没有一条证明他与某项犯罪有牵连的直接证据。他的声音没有出现在任何录音上，而且在混凝土俱乐部罪案发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监狱里服刑。

陈述临近结束时，他推开草稿靠在陪审团席的围栏上，承认在受到指控之后为躲避追捕而逃亡。“或许我有点害怕，”他声称，“或许我有点恐惧。但再也不会了。为什么？这次为什么？我做过了什么，在监狱呆这么长？这么多年？我真的讨厌重走老路被送进监狱，讨厌被拉进法庭，讨厌我的名字和名声。这一切什么时候是个头？这种厄运什么时候结束？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放过我？”他向陪审团问道。

他将指证他的两名重要证人——他的表亲佛瑞德·迪克里斯托弗和崇拜者乔·坎塔鲁普——斥为不值得信任的狡诈之徒，强调他们的证词不足以证明他有罪在身。按照辩护方的基本套路，珀西科猛烈攻击检方心怀成见地给所有被告扣上黑手党的恶名。他声称自己过去的罪恶已受到足够的惩罚，最后以恳求得到公正裁决结束辩诉。

“为了多年前犯下的错误，他们要让我接受多长时间的惩罚？他们不是来审案，

他们是来迫害与黑手党字眼有牵连的人。我不能说我从来没做过错事，你们知道我蹲过监狱。你们不能再把我送进监狱，因为罪有应得的刑期我已经服过。他们得证明我做过了错事，而实际上我是正道直行。”

在庭辩总结的过程中，其他被告的律师被迫要战胜三项主要指控。他们把管理委员会描述成并不比扶轮社更危险的团体，请求陪审团放过它是否存在的议题。他们警告说，政府正在依靠反意大利人的偏见来取得有罪判决。他们还称有关西西里和美国黑手党历史的证词充满着令人愤慨的偏见，恳求陪审团将其视为无价值和切题的材料予以驳回。吉姆·拉罗沙挖苦地指出，检方提出的许多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大多数被告出生之前。

通过攻击那些承包商，这个律师团体集体向第二项主要指控——混凝土俱乐部的构成和运作——的有效性发起了挑战，但他们不得不再次作出让步，因为这个俱乐部的确存在，斯科波也收受了酬金，但敲诈指控却是错误的。在辩护方看来，非法操纵投标的阴谋是贪婪的商人和心甘情愿的合伙人为了自己的主要利益策划出来的，其目的是要捞取成百万美元的横财。辩护律师们争辩说，这些受指控的黑手党人只是中间人，把他们拉进来是要解决承包商之间的竞争纠纷，这些被告是清白的仲裁人，而不是敲诈勒索者。

萨勒诺的前任律师罗伊·科恩死后，安东尼·卡迪纳尔（Anthony Cardinale）成了他的辩护律师。在庭辩总结当中，他斥责那些承包商是真正应当受到控告的犯罪者。“这是个由承包商而非管理委员会成员组成的俱乐部。”卡迪纳尔说。管理委员会与混凝土报酬并无干系。听听那些实际说过的话，它们并没有任何威胁或施压的意思。混凝土公司乐于付出报酬来获得行业优势。

最后，针对加兰特谋杀案的指控，这些律师要求检方出具证明管理委员会成员卷入这起凶杀案的证据。他们认为，布鲁诺·印第里凯托在逃跑车辆上留下的掌纹与其他被告并无关系。检察官不能出示一丝证明这些被告认识印第里凯托或命令他杀死加兰特的证据。

在庭辩总结当中，迈克尔·切尔托夫设法推翻被告方的辩护基调，即起诉书中所列举的犯罪是些孤立的、未经证实的罪状，缺乏证明是黑手党或任何其他组织协作共谋的证据。

“仅仅确认了某个人是黑手党成员的事实尚不足以判定他有罪，”他对陪审团说，间接地认可了辩护律师的论点，“但是，这里所指控的部分犯罪是黑手党和‘拉·科

萨·诺斯特拉’管理委员会的部分行为。这是基本要件之一，是犯罪的一半，因为这里所指控的犯罪是敲诈勒索，而所谓敲诈勒索就是成立、参加和联络某个从事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犯罪组织并利用该组织犯下诸如敲诈、谋杀和放高利贷等罪行。”

切尔托夫的结束语是针对辩护律师的集体立场进行的一阵猛攻。“所以，说这个案子与黑手党无关或者说黑手党了无干系是不正确的。黑手党在这个案子中是大有干系。黑手党难脱干系，因为是黑手党才使这种协调一致的犯罪活动成为可能。黑手党难脱干系，因为所谓敲诈勒索，也就是那些欺诈骗法律所要制止的罪恶，就是他们以有组织和有纪律的方式结合起来去达成一个目的：去犯罪。”

陪审团审议了五整天，它最后要求出示的证据是在帕尔马好汉俱乐部录下的一盘录音。它录下了萨勒诺和科拉罗商量补充精干打手的谈话。“如果不是我，”萨勒诺说，“就不会有黑手党留下。所有人都是我吸收的。”在讨论是否有必要暗杀一个残废且不忠的打手时，科拉罗煞有介事地对萨勒诺说，“你挑选了他们，现在又是你要杀掉他们。他真他妈的糟糕透了。他残废了，但我们还是得除掉他。”

被告律师吉姆·拉罗沙意识到，陪审团重新听一段与证实犯罪有关的录音是一种不祥之兆。有罪判决的前景已经非常明朗，而获得保释的被告科拉罗、桑托罗、弗纳瑞和斯科波在结案陈述后却每天露面而未潜逃，这让他颇感意外。他私下总结说，这场审判是一种“判决报告”而非势均力敌的对抗性辩论。

1986年11月19日，即在审议的第6天，陪审员们鱼贯进入法庭。陪审团主席花了28分钟宣读裁决，她的声音变得嘶哑起来。不时地端起一只蓝色塑料杯喝水的她宣告八名被告“有罪”，罪状总共达到151条。他们被裁定犯下了每项指控所认定的罪行。当冗长而枯燥的有罪裁决在肃静的法庭被宣读时，只有印第里凯托表现得很活跃。他在被告席上吃吃地笑却又显得烦躁不安，而其他刚刚获罪的罪犯们都板着脸。

两个月后，三名受到检控的老板托尼·萨勒诺、“鸭子”科拉罗和卡迈恩·珀西科及其他被证明有罪的头目“汤姆·米克斯”塞尔瓦托·桑托罗、“蒂克”克利斯蒂·弗纳瑞和格里·郎格拉又重返法庭听取宣判。他们每个人的判决都是一样：RICO案的最高刑期——100年且不得保释。那个勤勉的黑手党打手和腐败的工会领导人斯科波也同样被判处100年监禁。布鲁诺·印第里凯托领刑较轻：因执行命令杀害加兰特和另外两名食客而获刑40年。

法官欧文挑出萨勒诺给予他最为严厉的斥责，“为了你的一己之私，你基本上终生都在恐吓这个社会。”

珀西科一如既往地自我辩护，他是唯一站起来公然抨击检方和法官的人。

“这个案子、检方的态度和法庭本身都是集体的歇斯底里，都是黑手党躁狂症。在这法庭里，这如瘟疫般四处流行的偏见剥夺了我们每个人接受公平与公正审判的权利。”

在听取宣判时，其他黑手党人都显得呆钝而冷漠。而卢切斯家族的二老板汤姆·米克斯·桑托罗则显得不耐烦，他要求法官欧文加快进程。“嗨，判我100年吧，”他大声说道，“我现在就要进去了。”当法官宣布在宣判之前还有一些形式上的要求时，桑托罗挖苦地说，“一切都由你决定了，法官阁下。你在干一件漂亮工作。”（在联邦法官职位上工作了13年的欧文曾做过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有着丰富的法庭经历，他对这名黑手党人的风凉话他并不在意。欧文有时自称“音乐法官”，因为他在空闲时会谱写一些歌剧。）

对于充当管理委员会案起诉急先锋的鲁道夫·吉乌里亚利来说，这些判决是对其检控策略与政府资源广泛参与的一次总体验证。（吉乌里亚利同时在另一场重要审判中也取得了胜利，这让他在国内的声望如日中天。1986年11月，在他的努力下，布朗克斯区民主党领导人斯坦利·弗里德曼因参与一个RICO组织在纽约违章泊车管理局暗中操纵合同而被判刑。）

让多人被定罪，迈克尔·切尔托夫完美无缺的庭辩表现成了他升迁的跳板。他后来成了新泽西的美国律师，并在乔治·W. 布什总统的政府里谋得了吉乌里亚利以前所拥有过的职位——主管刑事处的司法部副部长。2003年，他被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这是法律界的最高荣誉之一。2005年，切尔托夫进入内阁，被布什任命为国土安全部部长。

管理委员会案结案数年之后，在另一起指控黑手党染指混凝土业的腐败诉讼案中，托尼·萨勒诺再次受审。有位警长在审判期间向萨勒诺提到切尔托夫的事业正蒸蒸日上。“好嘛，你替我给他传个信，”萨勒诺笑着回道，“你告诉那狗娘养的，他欠我一封感谢信。”

第 27 章 “远未完结”

下一步就要进攻“科萨·诺斯特拉”的主要经济基础，要夺取他们通过操纵工会和合法产业的腐败活动诈取的财富。

乍一看来，大规模的管理委员会裁决似乎为黑手党最显赫的几大家族敲响了丧钟。单单一次审判就摧毁了混凝土俱乐部，深藏幕后的统治集团被铲除。管理委员会——有组织犯罪版的“联合国安理会”——看来已被摧毁。

但当执法官员们弹冠相庆并认定“科萨·诺斯特拉”巨头安东尼·萨勒诺、安东尼奥·科拉罗和卡迈恩·珀西科已被史无前例地废黜之时，纽约黑手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上保持完好且富有战斗力。与每天源源不断地来自其传统行当的不法收入相比，黑手党从混凝土行业中失去的 120 万美元勒索金就显得微不足道。而且在审判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批黑手党新党徒——大多数不为黑手党调查人员所知——通过不同的方式充实了他们的家族。两个最新的阴谋是每年诈骗 1 亿美元的燃油税和窃取曼哈顿西区那残破的高速公路的废旧资源。

燃油骗局里的一个典型人物是粗通英语的波兰移民“米萨”米塞斯洛·斯泽浦斯基（Mieczyslaw “Misha” Szczepkowski）。靠当建筑油漆工和杂工艰难地生活了两年之后，米萨得到了一个极为诱人的职位。有一帮布鲁克林的俄-犹太裔移民让他做了一家燃油公司拿薪水的总裁，这个新成立的公司向各个加油站供应数以百万加仑的燃油。那些俄罗斯人并不是因为其管理才能而向他付酬，他们利用他来参与 80 年代初策划的一场钻纽约州法律空子的骗局，而这部法律的初衷是简化燃油税缴纳办法。

这部新法将收取并向政府缴纳税款的职责由加油站经营者转给了燃油批发商。官员们认为从为数不多的批发商而不是数千个加油站那里收税会更便捷。然而，这部法律的漏洞是规定批发公司之间可以买卖或转售燃油。通过这个纰漏，俄罗斯人发现

了纳税过程中存在的破绽：只有最后一家将燃油售给零售商的公司收取包含在个体加油站所支付总费用当中的税款，这个批发商然后按规定将税款缴纳给政府。

在 80 年代中期，消费和销售税每加仑上涨到约 30 美分，对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来说，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通过创立傀儡或掩护批发企业，这些俄罗斯人设局吸走了部分税款。他们成立了在彼此之间进行燃油供应转让的所谓“菊花链”公司。一连串的纸上交易会五或六个公司之间进行，尽管实际交易并没有发生。为了在州或联邦特工查找滞纳的税款时逃避侦查，这些俄罗斯人就利用像米萨这样的外来或非法移民做掩护，成立数十家只存在于法人文件上的虚假公司。一个挂名或“骗子”公司总是作为最后向零售加油站售油并收取税款的批发商被列在转售记录表上。这家公司根本不存在，它只是在数月后当收税官们注意到消费与销售税款有出入时用来迷惑他们。这些俄罗斯人实际上是运送燃油，然后扣下或盗走零售商支付的税款。而那些“幌子”移民对进行着的交易规模并不知晓，就像那位毫不知情的米萨一样，当调查人员最后追查出来的时候，他们通常都已经身在国外了。

这就是后来被普遍称为“燃油走私”的诈骗行当。设计这种税收骗局的是犹太“俄罗斯黑手党”人，这些移民在纽约，主要是在布鲁克林的布赖顿海滨区建立了活动据点。俄罗斯人尽管富有想像力，但他们无法与老牌黑手党人，特别是与当时三十多岁的科洛博家族角头迈克尔·弗兰泽兹（Michael Franzese）相对抗。在肆无忌惮地犯罪方面，他深受其父亲，即科洛博家族前二老板“桑尼”约翰·弗兰泽兹的影响。

1980 年，三名俄罗斯暴徒迈克尔·马尔卡维茨（Michael Markowitz）、戴维·伯格丁（David Bogatin）和列弗·珀西兹（Lev Persits），请求迈克尔·弗兰泽兹帮助收取一笔靠燃油税骗局榨取的 7 万美元欠款。惊羨于燃油流通领域巨额的不法收益，加上拥有自己的暴力武装，弗兰泽兹逐渐挤进了俄罗斯人的骗局。他的执法打手能够保证迅速向加油站收取欠款。通过拉拢州里的官员，科洛博家族取得了假燃油经销商所需的许可证，用于骗取“菊花链”税款。

弗兰泽兹颇有雅量，只要俄罗斯人向他交纳“贡金”，他就允许他们照旧活动，让他们处理所有书面工作并冒大部分风险。科洛博家族取得 75% 的利润，剩下的 25% 归俄罗斯人所有。弗兰泽兹还和非俄裔盗窃犯劳伦斯·伊欧瑞佐（Lawrence Iorizzo）策划了类似的骗局，后者也发现了这个窃取税款的漏洞。

“燃油税生意有多么赚钱，我给你这么说吧，我每周收到俄罗斯人和伊欧瑞佐装在纸袋里的现金有 900 万美元，而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弗兰泽兹后来供认说。据弗兰泽兹提供的数据，在每月 5 亿加仑的销售收入中，科洛博家族成员及其合伙人

一度能窃取每加仑高达 30 美分的收益。在高峰时期，弗兰泽兹和他的科洛博家族同伙每月盗走 1500 万美元。

到了 80 年代中期管理委员会案开审时，甘比诺、吉诺维斯和卢切斯家族都盯上了燃油税带来的财富。继科洛博家族之后，其他家族纷纷与俄罗斯暴徒结成类似联盟，并在纽约市区、长岛和新泽西参与这种迅速兴起的非法生意。每个家族都选派一名聪明汉充当“出头人”来核对账目并从俄罗斯人售出的燃油中收取每加仑至少 4 或 5 美分的盈利。调查人员后来估算，在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黑手党及其俄罗斯同伙每年诈取政府的消费与销售税款达 8000 万到 1 亿美元。

利润丰厚的燃油税诈骗生意是黑手党新的投机事业，然而五大家族从未放弃对纽约建筑业的控制，那是它们染指已久的行业。在管理委员会案结案 7 年之后，西区高速公路的传闻已渐为人知，它暴露了黑手党家族是如何继续处心积虑地通过控制该行业来牟利。高速公路阴谋牵涉到三大家族的合作，每个家族都与承包商和工会勾结并对它们进行幕后操纵。这是黑手党促生的腐败让纽约每个建筑项目的总成本至少暴涨 10% 的另一个时期。

1975 年，日显破碎的曼哈顿西区高速公路（沿哈得逊河从炮台公园通向第 59 大街）4 英里长的高架部分因为安全原因被关闭。10 年后，由于担心这条道路会倒塌崩溃，州里开始拆除桥墩高台上正在崩解桥体，并将一份拆解合同授予约翰·P·皮肯公司（John P. Picone）。皮肯公司收到 1200 万美元的款项用于拆除一段 1 英里长的桥体，同时还拥有出售可以利用的废旧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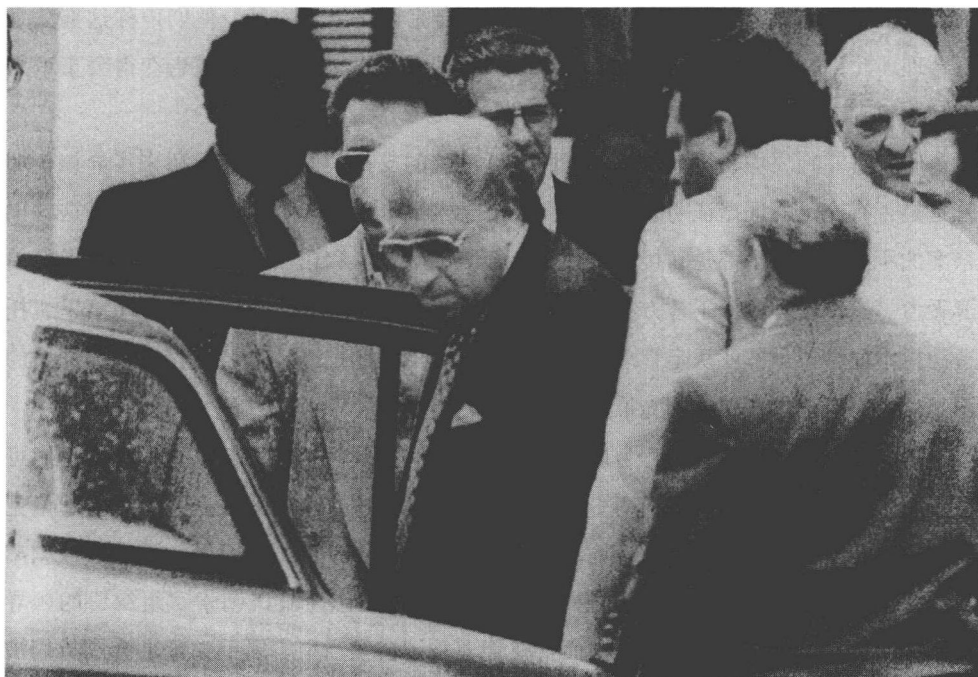
另一家公司，即没有参与拆除工程的 A·J·罗斯物流公司（A. J. Ross Logistics, Inc.），想在钢梁和其他钢材被卸下来抛售之前采购它们。那时，罗斯物流是一家为许多数百万美元的建筑项目进行钢材整形与设计的专业公司，在纽约建筑市场里是个重要的次承包商。在 80 年代中后期，这家公司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拥有 300 多名雇员，年赢利约 5000 万美元。

公司负责人托马斯·J·皮特佐（Thomas J. Petrizzo）在建筑行业里是个知名人物，现在他紧盯着西区高速公路的 11000 吨贵重钢材，但没有迹象显示他具有犯罪背景。然而，数年之后，检察官们认定他是科洛博家族的角头。作为其家族的主要代表，皮特佐在一个协调所有犯罪家族插足建筑业的黑手党式委员会里有着重要的发言权。在女儿乔·安妮嫁给卡迈恩·珀西科的小儿子迈克尔后，他和科洛博家族老板珀西科建立了直接的社会与姻亲关系。在将近 20 年时间里，皮特佐一直和纽约市的主要承包商、发展商和建筑师们打交道，帮助打造这座城市的面貌。所有人似乎都未怀

疑他是个为犯罪家族捞钱的黑手党“间谍”。

为了无偿搞到西区高速公路的钢材，皮特佐酝酿了一个将惠及科洛博、甘比诺和卢切斯家族的阴谋。根据现有的工会管理规定，拆除高速公路是个仅限于由当地一个钢铁工人协会分会来完成的项目。皮特佐与那个工会没有联系，但作为其黑手党职责的一部分，他控制了一个通常只从事码头建设与维修的木工协会分会。通过其黑社会盟友，皮特佐得知卢切斯家族正以“劳资和谐”为借口敲诈拆除高速公路的承包商皮肯公司。卢切斯家族知道皮肯公司是个实力雄厚的道路与基础设施营造商，80年代和州及市里签订了金额将近6亿美元的合同。

意识到卢切斯家族对皮肯公司极具影响力，皮特佐向该家族的建筑协调人“煤气管”安东尼·卡索（Anthony “Gaspip” Casso）提出了一个极好的建议。如果卢切斯家族领导人同意将钢材废料给他，他将发挥影响力让木匠们以比钢铁工人低出许多的工资在高速公路上替皮肯公司工作。这种安排将增加皮肯公司的收益，因此也保证了卡索和卢切斯家族能获得更大的回扣份额。此外，皮特佐自信靠废钢材准能发财，因而送给卡索80万美元来拉拢皮肯公司。



满头银发的托马斯·皮特佐为科洛博家族一名成员守夜时被秘密拍照，这个建筑承包商作为一名黑手党角头过着双重生活。（FBI的监视照片）

作为这黑手党三角关系的最后一环，皮特佐让时任甘比诺家族二老板的“公牛萨米”塞尔瓦托·格拉瓦诺来干预钢铁工人，防止他们利用其辖区权力来干扰皮肯公司聘请的木工施工队。由于甘比诺家族控制了当地的钢铁工人协会，格拉瓦诺能够阻止劳工问题的发生。付给甘比诺家族的报酬不得而知，但从皮特佐送给卡索的80万美元礼物可以看出，每个犯罪家族都发了一笔横财。

“这是一笔令人心醉的交易，”90年代末任卢切斯家族代理老板的阿方索·达尔科后来承认，“接下来的‘劳资和谐’帮助皮肯公司和皮特佐从废旧钢材上捞取了大笔钱。”

正当其家族在新旧行当里继续繁荣的时候，三名在管理委员会案中被定罪的老板正等待着他们的上诉结果。如果愿意的话，根据黑手党的传统规约，这些老板即使身处监牢仍然可以保留其头衔。只要上诉悬而未决，萨勒诺、科拉罗和珀西科就可以抱着一丝有罪判决被驳回的希望，如果无期徒刑判决无效，他们或许可以选择复归原位或悄悄引退。

在三个被定罪的老板和他们那地位稍低的五名共同被告提起上诉时，尖锐的法律论点也被提了出来。辩护方主要针对RICO的合宪性提出了质疑，他们声称这部法令不合理地允许检方使用不相干的证据和不体面的手段，从而侵害了被告获得公正审判的基本权利。

所有有罪判决均获得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支持，但有条罪状招来了异议，那就是是否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管理委员会成员卷入了卡迈恩·加兰特命案。由于这桩谋杀案的所有相关证据都是间接的，针对萨勒诺、科拉罗和珀西科的指控因此显得最单薄无力。一位法官驳斥了检方凭着加兰特谋杀案发生后不久发现布鲁诺·印第里凯托造访拉维尼特俱乐部就认定管理委员会成员卷入该案的推断。这名法官发现了证据的不足，它完全建立在“推测与推论”的基础之上。

但全体一致的总体裁决有力地确认了RICO的有效性。法官们宣称，检察官们可以提出“科萨·诺斯特拉”的历史与习俗的证据，而这些领域的证据既不会引起偏见也并非不相干。通过认可这类证词，保护老板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厚厚的隔离层被剥离了。即使黑手党领导层成员没有犯下实际的罪行，但作为敲诈勒索“组织”的领导人，他们仍有可能被判定有罪。因而，在管理委员会案当中，黑手党董事会成员们被裁定借混凝土俱乐部之手犯下了敲诈勒索罪，尽管他们没有亲自威逼任何一个承包商。他们还犯了谋杀加勒特的罪行，尽管他们没有亲手开枪。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

法学教授和前司法部检察官 G·罗伯特·布莱克。他是 1970 年 RICO——《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的主要设计者，曾徒劳地用了近 10 年时间劝说联邦检察官运用该法打击根基稳固的黑手党家族。（经 G·罗伯特·布莱克同意后转载的照片）



它肯定了 RICO 的基本理念——黑手党人可以因不同“模式”的犯罪在同一案件被起诉。

此外，法官们认为，对黑手党首领处以 100 年监禁既不残酷也不过分。最高法院后来挥出了一记法律重拳，拒绝受理甚至谈论黑手党高级囚徒的上诉，对下级法院的判决不予复审。其裁决的关键点是确认了 RICO 法令的合宪性和可执行性。简言之，管理委员会案当属打击黑手党的一个法律上的里程碑和突破口。

判决结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纽约。有个明确的信号从法院里传了出来，即全国所有反黑手党检察官都可以采用鲁道夫·吉乌里亚利所运用的策略来肢解他们辖区的黑手党家族。罗伯特·布莱克为在法庭上战胜管理委员会而欢呼，称它是个堪称经典的案例，能够鼓舞着人们向“科萨·诺斯特拉”的其他堡垒发起攻击。“它是法律和心理上的一次巨大胜利。”布莱克宣称。他称管理委员会的判决及上诉裁决的震撼性法律结果可以与 1911 年最高法院维护《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反垄断裁决相媲美。1911 年的裁决把庞大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拆解成了一批独立的竞争者。在布莱克和其他法学家看来，管理委员会案无疑是终结“科萨·诺斯特拉”对合法产业和工会进行渗透的典范。

司法部的高层官员同意布莱克的看法，认为管理委员会案堪称前所未有的鼓励检察官们发起类似攻势的典范之作。1987年11月，确切地说是在这场纽约审判结束一年之后，司法部主管刑事部门的副部长威廉·F·魏尔德（William F. Weld）将RICO称为“我们有组织犯罪工作的支柱”。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州长的魏尔德在一份进度报告中称，FBI和联邦检察官不再满足于只在黑手党人犯下罪案之后才采取行动。他声称，新的政策“是先发制人地锁定须为大量犯罪活动负责的特定的OC（有组织犯罪）人物。”

实际上，司法部在80年代后期才迟迟认同布莱克几乎在10年前就已提出的调查与检控策略，而率先运用这种策略的是布莱克早期的支持者罗纳德·戈德斯塔克和以吉姆·科斯勒、朱尔斯·博纳沃朗塔、詹姆士·卡尔斯特罗姆和尼尔·韦尔奇为代表的FBI特工。“在与有组织犯罪战斗的过程中，这种瞄准整个犯罪组织的理念成为普遍运用的最为犀利的进攻利器。”魏尔德承认RICO是政府攻击“科萨·诺斯特拉”王国的最强有力的武器。

在纽约以外的地方，打击黑手党高层人物的RICO战役不久也频频取得胜利。在堪萨斯城、圣路易斯、底特律、新奥尔良、波士顿、普罗维登斯、洛杉矶、丹佛和布法罗，老牌的黑手党家族被击败或遭到严重削弱。到了1990年，有两百多名中高级黑手党人被长期监禁或正面临着敲诈勒索审判。这些地区每地都有一个黑手党犯罪家族，它们祸害地方已达半个世纪。在绝大多数地区，并没有候选者或替代家族等在附近准备迅速填补因高级黑手党人被监禁而留下的权力真空。

纽约的情况与众不同。调查员们在摧毁黑手党基层组织上面临着比其他地区更为复杂的障碍。纽约都市区的宽广和黑手党合法与非法经济利益的多样性给执法行动带来了异乎寻常的困难。纽约当地的黑手党有其特殊之处，比其他地方的黑手党家族更具复杂性。五大家族共有1000多名打手和至少5000名合伙人，它们的存在意味着RICO审判带来的权力真空比其他地方更容易被填补。纽约的大帮派拥有充裕的人力资源接管衰败家族遗下的不法产业。如果一个家族放弃某种资产，一个与之相竞争的帮派往往就能夺得这份意外之财。

在为管理委员会审判和上诉法院的裁决喝彩欢呼之后，一些调查人员发现了黑手党的恢复能力要比理想的强大。尽管惩办了一批以博南诺和科洛博家族中层分子为主的黑手党人，但纽约黑手党毕竟苟延残喘地生存了下来。到了1988年，也就是在管理委员会案结案两年之后，联邦和州官员承认黑手党的无底洞——建筑业——依旧充斥着贿赂与被操纵的投标。

在管理委员会审判之前，州长马里奥·科莫曾驳斥过黑手党确实存在的说法。后来，他承认数十亿美元的建筑业受到了敲诈勒索者的滋扰。他呼吁企业家配合改革运动，找到把黑手党驱逐出去的勇气。科莫看过州有组织犯罪特遣队递交的研究报告后大为震怒，特遣队发现一些高层管理机构和工会组织心甘情愿地为黑手党提供方便，因为作为一种“必要的恶”，黑手党能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稳定、劳资和谐和利润。

“通过控制不同的掠夺建筑业的敲诈勒索组织的活动，”该报告称，“辛迪加可以向承包商们保证，要取得某种特定的结果，他们只须支付一次报酬，酬金的数额将是‘合理的’，而付出了酬劳就会得到相应的‘服务’。”该报告暗示称，只要公司能将贿赂金转嫁到他们的客户头上，他们宁可容忍黑手党和工会的腐败，而不愿与工会领导人相较劲，尽管后者合法、诚实且不屈不挠地行使集体谈判权合法扰乱前者的竞争计划。

工期延误是承包商和发展商的致命伤，而诡计多端的黑手党人就以可能的停工为要挟来勒索报酬。对于一个1亿美元的工程项目，该报告估计，每误工1天单利息成本就会增加7.5万美元。

“除了情况变得更糟外，其他一切依然如故，”谈到“科萨·诺斯特拉”阴魂不散时，州长科莫愁闷地说道，“过了一阵子，它会变得司空见惯。过了一阵子，如果你不铲除它，整个社会就会习以为常，而它就会在那里生存下来，在那里壮大起来。”

在该报告出炉之前，FBI纽约分局现任领导人托马斯·希尔就知道，这场战争在许多战线上都远未完结，要粉碎黑手党对工会和承包商的紧密控制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他强调要更多地运用RICO的民事条款作为手段来除去不诚实的工会管理机构。“下一步就要进攻‘科萨·诺斯特拉’的主要经济基础，要夺取他们通过操纵工会和合法产业的腐败活动诈取的财富。”希尔1987年告诉他的特工们。

水泥与混凝土工人地方理事会立即成了肃清对象，它是因混凝土俱乐部丑行被定罪的拉尔夫·斯科波所领导的一个地区性管理机构。联邦法官授权驱逐斯科波的代理人并任命一名监督者监管工会四年，直到它能够举行公正可信的选举。该理事会及其受黑手党控制的主要附属机构6A分会的官员们辞去了他们薪俸优厚的职位，而不是选择面对检察官的质询使自己在审前宣誓证词中冒做伪证的危险。他们看起来最害怕的质询是：他们是否知道谁是“‘拉·科萨·诺斯特拉’科洛博犯罪家族的成员，谁在纽约都市区以何种方式参与混凝土建筑业或从中牟利。”显然，沉默是最安全的选择。

纽约那位与黑手党人战斗了25年的侦探雷默·弗朗西斯切尼警尉相信，纽约家

族并没有因为管理委员会审判而打算自甘认输。他指出，五大家族在历史上就擅长于适应变化的环境。“近期所有的案子都表明，执法部门可以利用线人和窃听器渗入其领导层。通过减少与包括角头在内的手下们联系，这些新老板或许更注意将自己与我们隔离开来。不管发生了什么，他们远未完结。”

第 28 章 转折点

现代黑手党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这五个人要么是其拯救者，要么就是其毁灭者。

80 年代后期，黑手党检察官之间形成了广泛共识，即终身监禁胖子托尼·萨勒诺、“鸭子”科拉罗和“蛇”卡迈恩·珀西科等于把黑手党智囊团大量的无可替代的经验、关系和知识给清除了出去。萨勒诺和科拉罗的长期社会关系和对商人、政客及当地警察的腐蚀操纵是不可能被其继任者即刻复制的。但他们都处于七十多岁的高龄，即使没有在管理委员会调查中落网，或许已经该到了让位和交出权力的时候了。这两个人后来都死在狱中，80 岁的萨勒诺在 1992 年走完了其人生旅程，而科拉罗则在 2000 年，即在其 87 岁的时候辞世。科拉罗的二老板“汤姆·米克斯”塞尔瓦托·桑托罗也在其 72 岁时走进监狱打发余生。53 岁的老板卡迈恩·珀西科被判处终身监禁，相对年轻的他是科洛博家族更为可悲的落马者。他在大显身手的巅峰时期被定罪，一个很有前途的黑手党首领就此离开了街头，离开了黑手党的最高理事会。

作为这次审判的余波，在对一千多小时的调查录音进行更加严格的判读之后，一些律师和学者对管理委员会的权威及其真实权力的实际大小提出了质疑。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詹姆士·B·雅各布斯（James B. Jacobs），一位权威的黑手党研究者声称，从审判的证据来看，管理委员会在全国的影响程度及其决策方式尚未廓清。雅各布斯写道，悬而未决的谜团是管理委员会如何强制推行它的决策，还有它凭什么干预家族的内部纠纷。

心存疑窦的律师，像为甘比诺犯罪家族成员辩护的理查·A·雷博克（Richard A. Rehbock），抨击检方在 80 年代夸大了管理委员会的重要性，把它认定为黑手党的统治集团。“政府认为管理委员会可以规定家族能或者不能干什么实际上是错误的。

它是个松散的联盟，是个解决争端的会场，而不是管理机构。”

让黑手党的未解之谜更加扑朔迷离的是，审判之后出现了与检方看法相抵触的证据。1985年胖子托尼·萨勒诺被捕时，检方认定他就是吉诺维斯家族的首领。管理委员会结案后不久，萨勒诺最宠信的密友“菲什”文森特·卡法罗“变节”了。在因敲诈勒索罪受到指控之后，他成了一名检方证人。尽管萨勒诺代表吉诺维斯帮派参加管理委员会会议，但卡法罗透露，胖子托尼从来就不是这个家族的教父，而是受真正的老板所操控的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是替他们转移执法注意力的工具。（即使检方弄错了萨勒诺的头衔，但要推翻他的有罪判决仍缺乏充分的依据。他被证明犯有一些特有的罪行，其受审的原因并非是他被指控为吉诺维斯家族的教父。）

卡法罗那令人不安的披露反映出，黑手党的许多活动尚笼罩在经久不散的迷雾之中。对FBI和其他调查人员来说，靠电子窃听听到的云遮雾绕的谈话和低级告密者提供的零星材料，他们很难破解诸多秘密。黑手党的打手和合伙人往往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本家族的基本情况。尽管在布朗克斯与敲诈勒索者们厮混了几十年，但人称“屠夫好汉”的合伙人威廉·佩莱葛瑞诺·马塞利在他五十多岁时还搞不清其犯罪家族的江湖名号。为调查他与绑架、毒品交易和一起可能的地铁建设项目投标舞弊案的联系，FBI曾在马塞利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在监听的过程中，特工们听到相当精明的货运公司老板马塞利告诉其黑手党好友，他读过一篇新闻报道才弄清谁是他的黑手党监管者。“该死，我还不知道我是属于吉诺维斯家族。”惊诧的马塞利说。另一个街头捞钱人对自己的组织知之甚少的例子出自博南诺家族低级赌客和前崇拜者文尼·德彭塔（Vinnie DePenta）之口。80年代初，FBI设局在小意大利开了一家意大利面食进口公司。这个假公司交由德彭塔经营，在因替博南诺家族放高利贷而受到终身监禁的威慑之后，他成了政府的一个领取薪金的线人。期望德彭塔那掠夺成性的黑手党熟人能到D&M面食公司看望他，FBI在里面藏下了摄像机和窃听器以记录罪证之言。这精心安排的骗局未能诱来任何重要的黑手党人，但让科洛博家族的执法打手“野兽”弗兰克·法兰格（Frankie “the Beast” Falanga）落入圈套。他告知德彭塔，他将“属于”并受到科洛博家族的保护以免被博南诺家族的暴徒袭扰，但作为报酬他得将日后面食生意的部分收入交出来。

将德彭塔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后，法兰格认为应该让他了解黑手党历史的重要性。尽管与荣誉者们厮混了多年，但德彭塔对黑手党的家系毫无所知。“野兽”弗兰克·法兰格追溯了他如今控制了德彭塔的犯罪家族的起源，谈到了著名的1931年五大开山教父之一的乔·普罗旺斯。此外，法兰格还吹嘘说，他曾经做过乔·科洛博的

司机和保镖。作为入门介绍的一部分，法兰格指出科洛博家族现任代理老板是上了岁数的角头汤米·迪贝拉（Tommy DiBella），他填补了卡迈恩·珀西科遗下的空缺。“导师”法兰格关于各犯罪家族的名称与领导人的讲述让学生德彭塔感到迷惑。FBI录下了阿伯特与科斯特罗那“谁在一垒”式的交谈。

法兰格：“现在，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家族，对吧？迪贝拉归属于一个家族，对吧？”

德彭塔：“是的。”

法兰格：“他属于普罗旺斯家族。博南诺接纳了这个人。而另一个人接纳了别的人。那么这儿就有了其他的家族。你明白吗？”

德彭塔：“我想迪贝拉是科洛博家族的。”

法兰格：“是科洛博家族的。”

德彭塔：“普罗旺斯家族？”

法兰格：“也没错。”

德彭塔：“普罗旺斯家族和科洛博家族完全是一回事么？”

法兰格：“说是普罗旺斯家族也行，那都一样，都一样。”

要让他这个不开窍的新合伙人弄明白其家族渊源真是费劲，这让“野兽”弗兰克颇为不快，他于是就直奔主题地道明了他的计划，也就是想利用这家意大利面食公司掩护黑手党的活动。

法兰格：“你知道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吗，文尼？”

德彭塔：“噢，是什么？”

法兰格：“捞他妈的钱啊，还能有什么！”

这有趣的片段发生在“屠夫好汉”马塞利、残暴的执法打手弗兰克·法兰格和FBI线人文尼·德彭塔身上，这三个人的表现说明黑手党基层的保密能力和无知仍发挥着保护角头和首脑人物的作用。马塞利和法兰格远离黑手党的权力中心，从他们身上获取的调查信息无法让FBI对他们家族的力量和弱点进行评估。

FBI后来的情报表明，管理委员会案对纽约绝大多数黑手党人的各种非法活动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尽管保罗·卡斯特利亚诺被谋杀，托尼·萨勒诺、“鸭子”科拉罗和卡迈恩·珀西科被判刑，但各个帮派的不法生意继续红火，继任者们也填补了那些倒霉首领及其同党留下的空缺。这种持续的繁荣可归功于洛克·卢西亚诺在1931年为“科萨·诺斯特拉”巧妙设计的组织方案。55年后，卢西亚诺的遗产让每个家族的组织机构保持完好并能正常运作。随着80年代即将过去，五大家族的劫掠活动看

上去并无歌手的迹象。

赌博和高利贷是每个犯罪家族永久的经济来源。体彩和数彩赌博经纪业者也为它们带来巨额利润。其准确的“交易金额”无法累计清楚，但赌博研究者们相信，黑手党的赌注经纪人净赚了赌客总赌注的15%。当然，这里包括聘请雇员，租赁场地、利用电话处理赌博业务的间接费用，但其利润——和黑手党所有的不法收益一样——都是不纳税的。全美美式足球联盟的“超级杯”决赛是个最明显的例子，表明赌博能为黑手党带来财富。90年代初，纽约警察局有组织犯罪管控局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包括新泽西、长岛和康涅狄格，受黑手党控制的赌注经纪人每年在超级杯赛上所下的赌注超过10亿美元。在一场赛事和在一天之内，五大家族就从1.5亿美元的“交易金额”中净得15%的收益。甘比诺家族有个最能干的角头和赌注经纪人名叫“俊杰克”约翰·乔达诺（John “Handsome Jack” Giordano），他发展了一个拥有40个体彩赌博点的网络，根据法庭记录，仅这个网络每年的总收入就超过3亿美元。

高利贷是赌博的共生物。没有人能赖着黑手党赌注经纪人的账不还。欠债被逼的赌客为了迅速弄到钱，只有频频向高利贷主求助。大多数高利贷主提供两种形式的高利贷借款：“拆借贷款”和“抽头贷款”。纽约圣约翰大学刑事司法与法学教授霍华德·阿巴丁斯基（Howard Abadinsky），一位黑手党财经策略专家，称拆借贷款是20世纪30年代由“三指布朗”汤米·卢切斯所创的一种高利贷模式的变通方式，要求有偿还本金与利息的具体期限，这与合法借贷相似，但其利息却高的惊人。债务人每周必须为借下的每5美元而偿还6美元，那1美元的利息是抽头或油水，直到全部本金还完为止。阿巴丁斯基发现，1000美元的贷款可分14期偿付，每周一期，每期100美元，总还款额共计1400美元。

“直接抽头”贷款没有时间期限。而如果债务人错过了一周期款，麻烦就会迅速找上门。迟付一期款，抽头就以复利计算，这样周利息偿付额增加了，而本金并没减少。一笔100美元的原始贷款第一周的利息是20美元。如果错过了还款期，利息就会急剧上涨，由第一周的20美元上涨到4周后的107美元——仅一周的利息就超过了原始贷款的本金。

通常，纽约高利贷的周利息率可低至2%~5%，如考虑延期付款因素，其年利息率可高达100%以上。这巨大的利润可用80年代中期科洛博犯罪家族的高利贷为例加以说明，那时他们的高利贷客户既有嗜赌成性的赌客和蓝领工人，也有突遭资金压力

且无法取得合法贷款的生意人。科洛博家族采用常见的抽头方式，但比例要更高一些。这些黑手党人成立了一个假贷款公司，并给它起了个响亮名字——“财力资本集团”，然后靠暴力和关系人让卡车司机协会的两个地方分会向其注入120万美元作为资本开展高利贷业务。有个借款人因一笔68.5万美元的贷款每周被迫支付1.4万美元的抽头。而另一个人则为一笔40万美元的贷款在三个月内共支付了5万美元的利息。

在这高利贷生意的巅峰时期，从落入他们手里的15名商人身上，科洛博家族每周要榨取约4万美元的利息。FBI捣毁这个团伙时，特工们称它是“超级夏洛克式的经营”。借款人说，在得知这家贷款公司的黑手党背景和被告知了黑手党的高利贷座右铭——“你的身体就是抵押品”之后，他们被迫支付了那超额的利息。

家族老板、领导层其他成员和角头通常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从高利贷中牟利。他们把10万或更多美金交给打手，然后向他们收取1个点（1%）的利息，每周有保证的收入至少有1000美元。打手们将超出1%的收益都装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老板不用做任何事情，”警探雷默·弗朗西斯切尼指出，“他把100万美金投到街上，每年就能得到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钱每周都会流到他的口袋里。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未收到钱，那打手碰到了麻烦，他就会不惜一切手段去搞到那笔钱。这就是黑手党发家致富的原因。这是终极的金字塔体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FBI和州调查员拥有了约1200名活跃在纽约地区的荣誉者的档案。到了20世纪末，黑手党在纽约的由荣誉者和合伙人组成的混合大军达8000多人，他们从事着三教九流的非法投机事业。与一些新的复杂的诈骗阴谋相比，老板们从那些诸如赌注经纪和高利贷的老行当里诈取的收入不过是些零花钱。

1990年，五大家族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经济增长潜力，但有些活动它们又是联合进行的。

全国最大的黑手党犯罪集团甘比诺家族有400多名打手，从事的主要犯罪活动包括：借助码头工人协会官员之力控制布鲁克林和斯塔滕岛码头；通过与卡车司机协会的直接关系在建筑业中诈取酬金；以达成温和的工会协议为筹码向基食品公司和沃尔鲍姆连锁超市索取好处费；诈骗燃油税；以劳资和谐和提供快速货运服务为名向服装中心的各个公司索取报酬。

甘比诺家族的角头托马斯·甘比诺，即已故教父卡洛的儿子，控制了服装中心许多关键的货运网络。他本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其银行存款、股票和债券总值达7500万美元。据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分析报告称，通过抬高运输与生产的成

本，每购买 100 美元的衣服，甘比诺家族就让消费者多承担了 3.50 美元的费用。该家族最赚钱的业务是和吉诺维斯家族一起以垄断价格从办公楼、工厂和商店收购非生活废品。黑手党把持的私营垃圾清运工协会是个固定统一价格的同业联盟，消费者没有挑选清运工的选择。同业联盟每年抬高的成本达 4 亿美元，而这多收的费用大部分被甘比诺和吉诺维斯家族成员及其合伙人占有。

作为敲诈建筑业的另一种副业（吉诺维斯家族也参与其中），甘比诺家族的打手以阻止假民权激进主义组织的示威和罢工为条件向众公司诈取保护费。那些假“社会联盟”通过纠察和骚扰承包商与黑手党配合，要求他们雇用更多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黑手党人将随后跟进，向承包商们承诺说他们有能力结束抗议，但为了阻止或结束示威活动，他们需得到数千美元的报酬。由于他们的配合，承包商们通常会以周薪多达 1000 美元的挂名职位贿赂联盟的组织者。甘比诺家族的利润要大得多，单单一个工程项目就可诈取高达 10 万美元的酬金。

对于黑手党企业家来说，有组织的卖淫活动虽然不再是个收入可观的行当，但性产业仍为甘比诺家族带来了利润。态度温和、衣着整洁的角头罗伯特·第伯拉度（Robert DiBernardo）是纽约地区最大的色情出版商明星发行人公司（Star Distributors）的老板。20 世纪 80 年代，那些已经废止的扫黄法律让非法的色情杂志和图片销售成了一个重要的地下产业。第伯拉度还是时代广场秀世界中心的股东，这个中心是纽约市最赚钱的淫秽光碟和脱衣舞商业场所之一。

吉诺维斯家族至少有 300 名身份得到确认的打手，据说它比甘比诺家族更为富有。除了与甘比诺家族一起瓜分纽约市私营垃圾承运业务外，吉诺维斯家族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劳工与产业暴利上。在卡车司机协会和地方码头工人分会官员的帮助下，该家族在新泽西和曼哈顿向船运与装卸公司诈取报酬。为了避免发生代价高昂的罢工斗争，这些公司唯一的办法是支付勒索金。在向重要的清水墙与建筑承包商索取报酬时，该家族与木匠协会的关系让它处于非常有利地位。在另一起诈骗阴谋当中，木匠协会为换取劳资和谐而默许吉诺维斯家族在贾维茨会展中心向贸易展组织者、承办商和参展商榨取贿赂金。这个家族还在会展中心为几十名黑手党人安排了挂名职位以支领薪水。（通过控制当地的卡车司机分会，甘比诺家族也在那里发展了规模相对较小的敲诈勒索生意。）

20 世纪 80 年代，吉诺维斯家族合伙人迈克尔·克里米（Michael Crimi）被州巴特利公园城管理局聘为首席劳工顾问，该管理局正在实施一个投资额达 10 亿美元的

发展项目，这表明了吉诺维斯犯罪家族在建筑行业当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克里米是在不顾黑手党调查人员警告的情况下被任命的，调查人员称他与吉诺维斯家族的打手过从甚密，并与被联邦当局指称受黑手党控制的屋面防水工协会有联系。克里米曾经因放高利贷被定罪，但这项判决经上诉后被推翻。他也曾被指控参与谋杀了一个高利贷主，而最终被宣判无罪。

在纽约市熙熙攘攘的富尔顿鱼市场，吉诺维斯帮派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一直是其统治势力。通过暴力欺凌与威胁，该家族靠这个全国最大的每年毛销售额达 10 亿美元的鱼类批发市场大发横财。吉诺维斯家族的暴徒通过控制鱼类和海鲜食品的卸装和授予摊位特许权发达了起来。他们的好处费来自鱼贩、供货商和买主，这些人得迅速出货，否则其鱼货一旦腐烂就变得一钱不值。

尽管胖子托尼·萨勒诺被囚禁在监狱里，但他的兄弟“斯皮德”查尔斯·萨勒诺通过敲诈纽约市 1200 个停车场和车库正在为其家族搜刮不义之财。作为代表修车工的卡车司机 272 分会的负责人，斯皮德·萨勒诺是向雇主们索取酬金的敛财人。（他后来被指控收受了约 30 万美元的贿赂，让较低工资标准的合同得以履行。）

在新泽西大西洋城的赌场里，无需下任何赌注，吉诺维斯家族就能成为最大的赢家。通过与费城黑手党家族合作，纽约吉诺维斯家族首脑们的爪子伸进了代表赌场职员工会，即酒店雇员及调酒师工会 54 分会的金库里。在这个分会里，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是黑手党的合伙人，他们与费城和吉诺维斯帮派勾结抽走分会的会费及其养老与医疗福利保险基金。

宗教是吉诺维斯家族另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域。在闻名遐迩的观光盛会——小意大利一年一度的圣吉纳罗节上，吉诺维斯家族的行动队四处活动，向请求设立食品与纪念品摊位的小商小贩敲诈勒索。这些黑手党人还组织地下赌博，并厚颜无耻地从当地一家教会里偷走游客留在圣吉纳罗雕像上的数千美元善款。

卢切斯家族有近 200 名聪明汉，以劳工诈骗见长。通过操纵肯尼迪和纽华克机场所在地的卡车司机分会，他们有系统地接受航空公司的贿赂，让这些公司获得雇用更廉价劳工的权利，并私下签订损害工会雇员利益的劳资集体协议。同样，该家族控制了几个油漆工、管子工和木匠协会的地方分会，让它能够向一些建筑公司收取秘密酬金。通常每允许雇佣一名非工会的“黑市”工人的报酬是 100 美元，而这种“黑市”工人的时薪标准要低得多，并且无需承包商提供附加福利为其交纳工会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

取得航空运输公司的关键职位有利于为传统犯罪——机场外抢劫货物和在机场储存区内偷盗提供绝佳的情报。每年有价值超过 3.5 亿美元的货物进出机场，它们是卢切斯家族聪明汉们垂涎三尺的目标。据肯尼迪机场一名告密者称，卢切斯家族的行动队 1978 年 12 月成功实施了一起全国最大现金抢劫案。劫匪们用火力制服了警卫，然后从汉莎航空公司转运仓库里的一个保险柜里盗走约 500 万现金和价值 87.5 万美元的宝石。

20 世纪 80 年代，卢切斯家族与其主要伙伴吉诺维斯家族联手开发了一个建筑业富矿带，即操纵总标价约为 1.5 亿美元的纽约市公寓房窗户更换工程的投标。检察官们后来说，那些交易大幅抬高了工程造价，让黑手党家族从中标公司那里捞到“数千万美元”的回扣。根据和甘比诺家族达成的互助协议，卢切斯家族的头目们在服装中心成立并经营了其唯一的货运公司。这种垄断让两个家族能够操纵货运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间接抬高了女服、套装和其他服饰的管理与消费价格。

纽约两大报纸《纽约时报》和《纽约每日新闻》均因报道了大量外埠黑手党的罪案而自豪，而它们本身却成了卢切斯家族重要的敲诈目标。通过向报纸与邮件投递工会施加影响力，这个家族在报纸工厂取得了一些挂名职位并从事赌注经纪和放高利贷活动，同时还窃取并转售部分报纸。

科洛博家族拥有 100~125 名打手，主要靠燃油税诈骗和传统的赌注经纪与放高利贷赚取大量的不法收益。与甘比诺和卢切斯家族相比，从服装中心抵制工会化的公司那里，他们榨取的保护费相对较少。但在接送纽约市学龄儿童出行这一块，该家族的业绩并不逊于甘比诺家族，也赚得了一部分容易得手的钱。两个家族都是布鲁克林校车公司的秘密股东，无需和其他公司竞标，它们就能神秘地取得每年约 4000 美元的合同。黑手党负责接送儿童的团伙受职业杀手罗伯特·白令（Robert Bering）控制。他多年后吐露称，黑手党聪明汉和合伙人把持了两个代表全市所有校车司机的工会。

迈克尔·弗兰泽兹是这个家族富有创新精神的角头，他把家族带进了另一个新的领域，即靠体育和娱乐活动牟利。他成了一个体育与娱乐界名人代理公司的秘密股东。这个代理公司凭着与科洛博家族的关系，利用客户害怕与黑手党为敌的心理，逼迫他们在雇佣协议上签字。

毒品走私是科洛博家族的老本行，自混凝土俱乐部这条财富之河干涸之后，它愈来愈为该家族首领们所倚重。家族的另一项创新是开通一条通向拉斯维加斯的金融管

道，通过由令人敬畏的角头“驼鹿查利”查尔斯·帕纳瑞拉（Charles “Charlie Moose” Panarella）领导的行动队，这个帮派进入了一个在拉斯维加斯放高利贷和经营其他纽约家族有意避开的行当——妓院。

博南诺家族聚集了约 100 名打手。它经历了几十年内乱的折磨，并遭受 FBI 特工约瑟夫·皮斯通那灾难性的渗透，是五大家族中声势最小和力量最弱的一个。主要由家族的西西里支派齐普们从事的毒品生意和赌注经纪及高利贷构成了这个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透过报纸投递工会的影响力，其劳工诈骗活动主要限于向纽约三大日报中最小的《纽约邮报》诈取佣金和谋取影子职位。博南诺家族的打手兼《纽约邮报》雇员的“行者阿尔”阿尔法·恩巴拉托向黑手党人提供了一些挂名职位，并控制了排版室和发货场的高利贷与赌注经纪生意。恩巴拉托还负责每日窃取 1 万份价格为 50 美分的《邮报》报纸，然后以 20 或 30 美分的价格卖给报纸经销商。（大体上说，在纽约市三大报业巨头，特别是在《邮报》的报纸工厂里，博南诺和卢切斯家族进行的盗窃和其他不法活动每年为黑手党捞得 500 万美元的净收益。）

博南诺家族的又一个创新之举是在布鲁克林、昆士和斯塔腾岛的社区商店里装设非法的电动扑克机。这项冒险事业由该家族富有想像力的顾问安东尼·斯佩罗（Anthony Spero）所推动，他的暴徒们将这种赌博器具放置在杂货店、旅馆和糖果与百吉饼店里，与经营者按五五成分分配收益。尽管如此，到了 1990 年，与其首任教父乔·博南诺所缔造的庞大帝国相比，这个犯罪家族明显笼罩在衰败的阴影之中。

纽约最杰出的地方检察官，即曼哈顿区的罗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在评估黑手党众家族的繁荣上态度很直率。暴徒们每年单从建筑与服装业中就搜刮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1990 年摩根索在一份非正式的“黑手党现状”的评论文章中写道：“他们在这个地区征收一种让人无从察觉的税款，”他声称，“他们所做的就是直接抬高诸如服装、住宅与办公楼这类基本生活生产资料的成本，并阻碍合法企业来到或留在这里。”

随着 20 世纪最后 10 年的到来，在纽约五大家族当中，一些新面孔和美国第三代黑手党人已经取得或正在设法取得各自家族的统治权。这批黑手党新贵对让前辈教父保罗·卡斯特利亚诺、安东尼奥·科拉罗、安东尼·萨勒诺、菲利普·拉斯泰利和卡迈恩·珀西科身败名裂的潜在危险都有所警觉。对“科萨·诺斯特拉”来说，老教父们的 RICO 逮捕与审判是它的一个转折期。尽管那场斗争以黑手党令人震惊的失败而

告终，但管理委员会审判为新的领导层预演了执法部门可能用来打击他们的主要手法。

FBI 特工和检察官们公开宣称，他们雷霆般的打击并没有随着管理委员会案的结案而告终。他们致力于用原来打击老黑手党人的武器来摧毁黑手党残余势力的领导核心。RICO 将是政府铲除最新的老板联盟及其最亲密的党羽的主要武器。特工们将依靠那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利用大量打破“鸟默它”戒律的告密者和电子窃听器与电话窃听装置——去摧毁新的统治集团。“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些家族打回到它们 60 或 70 年前的街头团伙的状态。” FBI 纽约刑事处主管威廉·多兰（William Doran）自信地声称，“我们不打算善罢甘休，我们绝不会给他们留下一丝生存之机。”

在管理委员会审判当中判处众被告终身监禁时，法官理查德·欧文强调称，这严苛的刑期对那些希望继承被囚首领之位的黑手党人来说是个强烈的威慑信号。如果被抓获并遭定罪，这些新老板们肯定清楚等待他们将是何等严厉的后果。纽约众家族的前途，实际上是美国黑手党的前途，完全依赖于四个野心勃勃的领导着那些复活帮派的黑手党人：约翰·葛提（John Gotti）（甘比诺家族）、文森特·吉甘特（Vincent Gigante）（吉诺维斯家族）、安东尼·卡索（Anthony Casso）（卢切斯家族）和约瑟夫·马瑟诺（Joseph Massino）（博南诺家族）。在管理委员会案中被定罪的教父卡迈恩·珀西科似乎也算是一个决定黑手党未来的人。尽管被监禁，但珀西科拒绝放弃其在科洛博家族中的权力。现代黑手党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这五个人要么是其拯救者，要么就是其毁灭者。

第 29 章 玩蛇的人

是 FBI。我们已经包围了房子。举手出来吧！

在秘密的“拉·科萨·诺斯特拉”兄弟会当中，卡迈恩·约瑟夫·珀西科拥有的既不是绝对的忠诚也不是憎恨。他喜怒无常的个性让他博得了一些相互矛盾的绰号：着迷于他的支持者亲密地称他为“老小孩”，而其诋毁者则贬损地称他为“蛇”。生于 1933 年 8 月 8 日的珀西科在布鲁克林的卡罗尔公园和红勾区长大，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主要是意大利和爱尔兰工人阶级家庭。和他那个时代大多数声名显赫的暴徒不一样，珀西科拥有一个宽松舒适的成长环境。在大萧条时期，珀西科几乎所有的邻居家庭都面临着难以为继的生计问题，那些养家活口的人只能绝望地到附近的码头和工厂里争夺极度辛苦的工作岗位。比起大多数邻居孩子来，珀西科所接受的教育要好得多，他的父亲老卡迈恩是为曼哈顿一些著名的法律事务所工作的法务速记员，即使在最艰难时期，每周他都能带着工资袋回家。他的母亲，老卡迈恩的前妻，是个意志坚强的女性，她严格地管束着卡迈恩及其兄弟姐妹，即哥哥阿方斯（Alphonse）、弟弟西奥多（Theodore）和妹妹德洛丽丝（Dolores）。

他家附近的地区是黑手党行动队，特别是乔·普罗旺斯家族活动的乐土。年轻人都被大把挥霍着钞票的聪明汉所吸引，这些人通常在临街的那些被称为“社交”或“运动”俱乐部的黑手党巢穴里边喝着咖啡边打着牌，悠闲地打发着下午的时光，虽然这些俱乐部的名字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珀西科兄弟，先是阿方斯，后来是卡迈恩和西奥多，开始追随在附近的黑手党人身边。

16 岁时，卡迈恩不顾父母的反对从中学退学了。作为街头团伙“加菲尔德好汉”的头目之一，这时的他已经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个团伙装备有刀具、棍棒和土手枪（通常是在中学机器加工车间秘密制造的简单而粗糙的武器），以便于同敌对团伙进行

野蛮搏斗，并向无防护之力的同学勒索钱财。1951年3月，17岁的卡迈恩因在希望公园的斗殴中打死了另一个年轻人而被捕。这是他犯下的首条重罪，而当他的指控被驳回时，其大胆勇敢的江湖名声传得更响了。尽管这个体格瘦弱、身高1.69米的少年根本没有执法打手的强悍外形，但普罗旺斯家族的角头“枪手弗兰克”弗兰克·阿巴提玛科（Frank “Frankie Shots” Abbatemarco）还是看出了珀西科的黑社会潜力。阿巴提玛科把珀西科安排在他的赌注经纪与高利贷团伙里效力，后来又提拔他参与盗窃和抢劫货车活动。珀西科进步神速，二十四五岁时就成了普罗旺斯家族的荣誉者，如此年轻就成为黑手党正式党徒实属少见。

20世纪50年代，珀西科累计被捕了十多次。他的违警记录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黑手党不法活动：数彩赌博、经营博弈、放高利贷、盗窃、人身攻击、绑架、非法持有枪支和袭警。普罗旺斯家族有一批与政治人物多有联系的律师，他们知道如何巧妙地利用布鲁克林刑事法庭的审案程序。通过这些人的帮助，那些重罪指控都遭驳回或被减为轻罪。每当珀西科的案子开审时，原告和证人经常拒绝作证或者身在外地，在黑手党人的案件当中，这是一种频频出现的现象。结果，珀西科每次被羁押的时间都不超过两周，他的被捕大多数以交纳无关痛痒的属于黑手党杂项开支的罚款而告终。

早年，珀西科在布鲁克林和普罗旺斯家族其他三名青年打手“狂人乔伊”加洛·博伊斯、拉里和艾伯特勾结在一起。1957年，在曼哈顿一家酒店的理发室里骇人听闻地谋杀了黑手党老板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之后，珀西科勇猛凶暴的声望急速飙升。与加洛兄弟一起，珀西科应他们的老板乔·普罗旺和其他不满阿纳斯塔西亚贪权的黑手党首领们的要求实施了那次重大的刺杀行动。

1959年，珀西科的行动队头目弗兰克·阿巴提玛科被暗杀后，普罗旺斯家族陷入了一场内部冲突的泥淖之中。凭着刺杀阿纳斯塔西亚和完成了其他任务的功劳，野心勃勃的珀西科和加洛兄弟希望普罗旺斯能把“枪手弗兰克”留在布鲁克林的大宗地下生意交给他们作为犒赏。然而，普罗旺斯将阿巴提玛科所有的高利贷和彩票赌博家当全交给了其资格更老的亲信。狂怒的加洛兄弟和珀西科决心实施报复，采取了突击队式的闪电行动绑架了普罗旺斯的姐夫与二老板乔·马格利奥科及另外四名角头。第一个公开放弃“乌默它”誓言的黑手党打手乔·瓦拉齐称，珀西科在起兵反叛时曾向他解释说，他和其他激进分子相信，普罗旺斯向他们课收的不法收益的“税费”要比起那些老牌聪明汉的重得多。珀西科举了一个让瓦拉齐印象深刻的例子，即老板曾逼他从一笔2000美元的抢劫款中抽取1800美元交给他。

为了营救他的五名副手，普罗旺斯很快答应了叛乱分子的经济要求。一旦这些人

重获自由，普罗旺斯立即拒绝兑现他与反叛者们达成的协议，一场内战就此爆发，自20世纪30年代的“城堡之战”以来，纽约黑手党人首次“走向床垫”^①。1961~1963年，在这场所谓的“加洛战争”中，至少有9名参战者被杀，3名失踪，另有15人受伤，那些失踪者后来被推测遭到了暗杀。

加洛兄弟阵营的主要背叛者和出卖者是卡迈恩·珀西科。战斗开始后不久他就回到了普罗旺斯的营垒。据瓦拉齐称，黑手党新近退休的元老弗兰克·科斯特洛曾和珀西科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珀西科决意倒戈就是受这次谈话的影响。前者说服了这个年轻的黑手党人，称若真正忠诚于“科萨·诺斯特拉”，他就应该和老板普罗旺斯站在一起。珀西科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性在1961年8月20日的凌晨得到了验证。一位执行例行巡查任务的警长在黑暗中走进了南布鲁克林酒吧撒哈拉俱乐部，迎面碰上两个人正用绳子勒着一个人的脖子。从警长和另一名警察身边跑过后，两个加害者慌忙逃离了俱乐部。本应毙命的受害者一息尚存，此人正是拉里·加洛。警方确认其中一名加害者就是珀西科。但信守“乌默它”准则的加洛拒绝吐露任何对珀西科不利的話，因而针对他和另一名杀手的人身伤害指控被驳回。

意欲勒死拉里·加洛的企图强化了珀西科在黑手党里的奸诈名声，并让他博得了那直言不讳的绰号——“蛇”。他先是出卖加洛兄弟重新回到普罗旺斯身边，后来又伪装再次改变立场重返加洛兄弟阵营，并将拉里·加洛诱骗到那个酒吧。很明显，普罗旺斯将谋杀这兄弟俩的任务交给了珀西科及其同伙。加洛兄弟知道如何复仇，于是在1963年的3月19日，他们进行了回击。当时正坐在轿车里的珀西科遭到猛烈的弹雨袭击，杀手在一辆从旁边经过的敞篷小型载货卡车上持枪扫射。子弹擦过了他的脑袋，有几颗弹头射进了他的左手和胳膊。被送进医院的急救室时，他的眼睛肿胀凸起，脸上覆满了鲜血。一名侦探问是谁对其痛下毒手时，珀西科瞪着天花板，然后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他绝不会违犯“乌默它”而与警方合作，即使他本人的性命处于危险之中。

珀西科的手下认定那车上的杀手就是险些被卡迈恩扼死的拉里·加洛。为了宣扬他的刚强坚韧，珀西科的支持者们对这一事件的情节大加渲染，称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下巴，而他随口就将那子弹吐了出来。尽管珀西科满不在乎地说自己受了点皮外伤，但他的确是个真正的受害者，他的左手再也不能活动自如了。

^① 译注：一种形象的说法，当两个敌对的家族即将开战时，黑手党人会在市区物色好宽敞的公寓房，然后将床垫铺在房间里，储存好食物，以便随时投入战斗。



科洛博家族老板卡迈恩·珀西科（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与保镖兼主要犯罪搭档“炸弹”休·麦金托什在布鲁克林进行走谈。喜怒无常的珀西科博得了两个相互矛盾的绰号，他的崇拜者亲切地称他为“老小孩”，而其背叛者则称他为“蛇”。（纽约港码头委员特许转载的监视照片）

1962 年，乔·普罗旺斯死于癌症，这给了卡洛·甘比诺和其他老板干预“加洛战争”的机会。通过安排乔·科洛博任原普罗旺斯家族的老板，他们强行通过了一份停战协定，并于 1963 年结束了这场暴乱。珀西科为普罗旺斯-科洛博派系效力获得了回报，他被提升为角头。战乱结束了，好日子和更多的掠夺物出现在他的眼前。珀西科成了一个冉冉兴起的明星，领导着科洛博家族的一支行动队，而他的两位兄弟就是这行动队的成员。侦探们开始接到线人的密告，称几年前还被认为是个凶暴的雇佣杀手的卡迈恩现在风光了，开始雇用其他枪手替他干“脏活”。

只有一桩悬而未决的事情压在珀西科的心头：联邦政府指控他 1959 年在布鲁克林参与抢劫了一批价值 5 万美元的亚麻布。卡迈恩的主要共同被告是“炸弹”休·麦金托什（Hugh “Apples” McIntosh），此人是他作案时的贴身保镖和最能干的伙伴。这两个暴徒的形体差别尤为明显。长得像个树凳的麦金托什体重 113 公斤，身高 1.96 米，大大高出了瘦而结实的重 68 公斤的珀西科。尽管麦金托什是珀西科忠实的追随者，但其爱尔兰血统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荣誉者。

这项抢劫指控让珀西科惹上了 10 年的官司，那是纽约东区辖区内记录在案的拖延时间最长的联邦案件之一。刚开始，检察官就向珀西科提出一项交易。只要对其第一个重罪判决认罪，他就会被给予约 3 年刑期的轻判，而且还有可能在 1 年内获得保释。傲慢自信的珀西科拒绝了 this 提议，他相信以其黑手党的经验和一帮高薪聘请的律师，他能够逃脱法律的惩罚。1961 年的首次审判因陪审团内部出现分歧导致无法

作出裁决而告终。一年后，他和麦金托什被定罪，但其判决在上诉时被推翻。第三次审判被迫中断，当时珀西科遭枪击受伤。1964年，他再次被宣判有罪，但该项裁决在上诉时也被撤销。陪审团在1968年的第五次审判中查明他和麦金托什有罪，因而这次的判决得以维持。经过3年鲜为人知的争论之后，这项裁决最终于1971年得到了上诉法院的支持。珀西科得到的不是他1960年拒绝的监禁1年的认罪协议，而是最高刑期达14年的判决。麦金托什则被判处6年监禁。

在联邦上诉程序结束之前，被保释的珀西科于1971年因另一项指控被传回法庭。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提起了多项州指控，称他创立了一家涉案达数百万美元的高利贷组织。同时，珀西科那劣迹斑斑的过去造成了一起法律事故。一位州法官异乎寻常地向公众和媒体关闭了旁听审判的大门，这引起了骚动和抗议。法官乔治·波斯特尔（George Postel）裁定称，新闻媒体关于珀西科黑手党背景的报道会不公正地影响陪审团，因而侵害他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因违反宪法赋予公民和新闻机构旁听并报道案件审理的权利，波斯特尔后来受到上级法院的严厉训诫。

在1971年12月的终审当中，珀西科的律师驳倒了所有10项高利贷阴谋的指控，让他取得了无罪判决。和以往被捕的大多数情况一样，在审判开始的时候，一名检方靠其指证珀西科参与高利贷的主要证人消失了。

高利贷案发生的六个月前，科洛博家族整体平静的状态被打破，当时乔·科洛博在意裔美国人民权集会上被人开枪击中。1972年1月，珀西科因抢劫罪开始服刑，加上瘫痪的乔·科洛博丧失了行动能力，该家族的老牌党徒便挑选精明干练的角头汤米·迪贝拉任过渡时期的老板。珀西科决心维持自己在家族里的影响力，而监狱对他并不构成障碍。通过他的兄弟和被保释的麦金托什传递指令，他在家族里组织了一个势力强大的集团。到了70年代后期，尽管仍困在监牢之中，但他已被公认为家族的首领，只等他获释后正式加冕即位。

70年代中期，供认做过高利贷主和科洛博家族合伙人的乔·坎塔鲁普成了FBI的线人。他告发称，在哥伦布转盘广场暗杀袭击之后的混乱中，卡迈恩与其兄弟从乔·科洛博的儿子们手中夺走了家族控制权。“现在的情势已今非昔比，”坎塔鲁普告诉其FBI管理者说，“科洛博的孩子们现在被打入底层，而珀西科兄弟则高高在上。”

坎塔鲁普特别指出，本森赫斯特和布鲁克林其他地区都聚居着大量的意裔美国人，几乎所有的合法企业都成了其家族珀西科派系榨取保护费的对象，包括殡仪馆、酒店、餐厅和服装厂。“他们敲诈人们，把恐惧留给他们。”坎塔鲁普告诉FBI。

1979年，服刑12年被保释后，46岁的珀西科成了美国一个最繁荣和最危险的犯罪组织的教父。重返家园后，他与妻子乔伊斯及三个儿女住在长岛郊区中产阶级社区亨普斯特德。他的办公总部被称为“内斯塔社交俱乐部”，是一处老式的位于卡洛尔花园的临街建筑物。除了呆在布鲁克林和长岛，他还常常出现在他那拥有9间卧房的别墅里。这处别墅位于纽约北部索哲提斯那占地59英亩的他所谓的“蓝山庄园马场”里。珀西科因抢劫罪入狱后不久，警方突袭了这处庄园住宅，发现了一处藏有50杆步枪和40颗炸弹的军火库。

这位刚刚获得自由的卡迈恩教父颇为不幸，他出狱后正好赶上FBI开始先发制人对纽约五大家族的实施打击。FBI首次将黑手党老板及其管理机构作为目标并展开监视。1980年11月，特工们带着一份列有26条罪状的控告书扑向了珀西科，该控告书称他在狱中卷入了一场阴谋。他的同党休·麦金托什和他的表兄“胖男人”安德鲁·拉索在1977年和1978年曾试图贿赂一名IRS特工。这些黑手党人曾出价25万美金，要么让因抢劫罪被判刑的珀西科提前释放，要么把他从安保措施极为严格的亚特兰大联邦监狱转到纽约附近一个管理相对宽松的监狱。他们还希望这名IRS特工能为科洛博家族一批高级黑手党人摆平他们所得税的案子。这名特工决定将计就计，珀西科的人与这个被认为腐败的特工进行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这不仅让他们自己中了圈套，也让珀西科牵连其中。

在这起贿赂与阴谋案中，珀西科交纳了25万美元的保证金后获释，但他随后发现自己的麻烦官司越来越多了，这次是受了他哥哥“好汉阿莱”阿方斯(Alphonse “Allie Boy”)的牵连。受到敲诈勒索指控的“好汉阿莱”在保释中逃跑，寻找他的联邦法官们1981年3月在布鲁克林无意间闯入了一个会场，而这个有其他黑手党家族首领参加的会议正由卡迈恩主持。“好汉阿莱”没有与会，但卡迈恩受到另一项严重的指控，即违背与知名犯罪分子来往。

无法逃脱双重刑事控告的打击，珀西科平生第一次“抓住”了认罪协议。穿着时髦的黑色套装、白色衬衫，打着格子领带，他对其中一条阴谋罪供认不讳，承认在IRS骗局中犯了行贿罪并阻碍了司法公正。通过放弃其他五项罪名的指控，检察官们免除了他倘若在法庭上被定罪将被判处的15年刑期。结果，他被处以最高5年的监禁，且与因违犯保释规定而招致的4年刑期同时执行。

在1984年3月看来，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协议，当时受IRS行贿案和违犯保释案牵连的他服刑不到3年即被释放。他意料不到的是政府的下一步举动。甚至在其出狱之前，FBI和联邦检察官已经在向他逼近。他们称他是科洛博家族的首领并对他提起

RICO 控告，另外还要指控他在管理委员会案中犯有同谋罪。在第二次被释放的 7 个月 后，珀西科得到风声他将再次面临牢狱之灾，当时一名执法官员向《纽约邮报》透 露了他即将被捕的消息。在首份指控珀西科为科洛博家族老板的敲诈勒索罪起诉书解 密前几天，他和二老板吉纳罗·格里·郎·郎格拉一起消失了。

接到一个线人关于郎格拉行踪的密报后，FBI 科洛博小组主管达蒙·泰勒（Da- mon Taylor）很快就在布鲁克林抓住了他，当时他面部贴着假胡须进行了伪装。珀西 科更为狡猾，最终作为唯一的黑手党老板名列 FBI 十大通缉要犯名单之中。当珀西科 那后来成为管理委员会案证人的亲戚佛瑞德·迪克里斯托弗揭发了其藏匿处——后者 位于长岛旺托的家时，4 个月的追捕终于有了结果。身为保险推销员，通过与珀西科 的表妹凯瑟琳·拉索（Katherine Russo）的婚姻，迪克里斯托弗对科洛博家族的情况 相当了解。他的妻兄“胖男人”安迪·拉索不仅是珀西科的表兄，而且是科洛博家族 的高级角头。

迪克里斯托弗告诉 FBI，他在结婚之初曾目睹了他妻兄的一次骇人举动。有天晚 上在饭店里用餐时，拉索突然对桌子的一个客人大发雷霆。抓起餐叉抵住那人的眼 白，他嘶嘶地叫道，“老实点，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好吗，你这婊子养的？”当那

DETECTIVE BUREAU PHOTOGRAPHIC UNIT
POLICE DEPARTMENT
VIA 899 POST OFFICE BOX 110
PLEASE POST IN A CONSPICUOUS PLACE

WANTED

FOR
BRIBERY AND RACKETEERING



GABRIELE PERSICO AKA "THE SNAKE", AKA "JUNIOR", MALE, WHITE, 5'5", 150 LBS., BROWN EYES, BLACK HAIR, 51 YEARS OF AGE, BOB 8-0-355, RESIDENCE 84-20 11 AVE., BROOKLYN, N.Y. ALSO RESIDENCE 1405 BOWLING ROAD, SAUGHERFIELD, N.Y. FREQUENTS SOUTH BROOKLYN AREA & STATEN ISLAND.

WANTED FOR BRIBERY AND RACKETEERING ON ARREST WARRANT ISSUED ON 10-25-64 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SUBJECT IS THE "BOSS" OF THE COLONIA ORGANIZED CRIME FAMILY AND IS TO BE CONSIDERED ARMED AND DANGEROUS.

ANY INFORMATION CONTACT THE JOINT ORGANIZED CRIME TASK FORCE DET. WILLIAM VORHITTAG OR SPECIAL AGENT RICHARD BUTER AT #553-2626.

逃避 FBI 的追捕达 4 个月的珀西科藏匿在长岛的亲戚家时被出卖。被戴上手铐并以手蒙面的珀西科后来为逮捕他的特工签名。（联邦调查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CIRCULAR NO. 64/197
DATE PREPARED 11/14
POLICE DEPARTMENT
CITY OF NEW YORK
LIMITED TO DEPARTMENT CIRCULATION



面临着两场 RICO 审判的珀西科。他曾在 1984 年逃亡并成为唯一上了 FBI 十大要犯通缉名单的黑手党老板。（联邦调查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个吓破胆子的人发狂似地表示顺从时，拉索怒骂道，“下次再胡来，我把这叉子插进你的狗眼！”

当天夜里晚些时候，拉索得意洋洋地向迪克里斯托弗解释了他的做法。“如果他们怕你，佛瑞德，他们就会舔你的手或者吻你的脚。他们会尊重你。我是个黑道人物，明白吗，佛瑞德？我能撒谎，我能诈骗，我还能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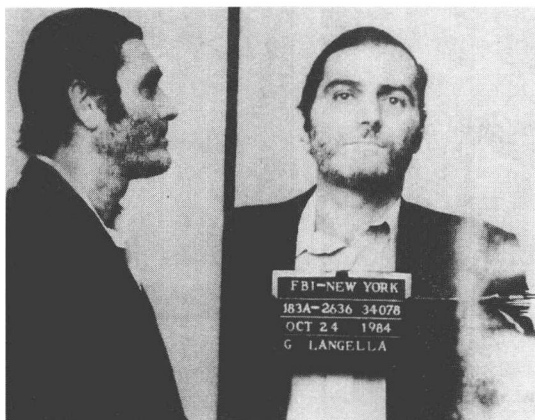
在管理委员会和科洛博家族被检控时，逃避追捕的珀西科在迪克里斯托弗的家里躲藏了三个月。他指望家族亲人的忠诚能保护他，但迪克里斯托弗这个亲戚还是出卖了他。

1985 年 2 月 15 日的下午，在迪克里斯托弗那长岛的家外面，特工泰勒拨通了迪克里斯托弗的手提电话。“我找珀西科先生，”这名特工说道，当时迪克里斯托弗正期待着这个电话。接过电话，珀西科粗声粗气地吼道：“谁?!”那探员温和地回道，“是 FBI。我们已经包围了房子。举手出来吧!”

一直躲在阁楼上的珀西科高举双手快步走了出来。与他一起被捕还有角头“弩马唐尼”多米尼克·蒙特马拉诺。通过窃听迪克里斯托弗的电话，FBI 知道蒙特马拉诺将受邀和老板一起共进午餐，特工们便算好行动的时间将他一并擒获。两人都没有带武器。在回曼哈顿的 FBI 总部做笔录的途中，珀西科与特工们开着轻松的玩笑，看起来并不慌张。他甚至诚恳地在一张扎眼地贴着其照片的 FBI 头号通缉犯海报上为泰勒签名。

对珀西科同年晚些时候的管理委员会审判来说，1986 年科洛博家族的 RICO 审判算是一次预演。指控他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佛瑞德·迪克里斯托弗和前崇拜者乔·

通常非常注重仪表和保持着装整洁的吉纳罗·郎格拉。作为珀西科的共同被告，这个科洛博家族的二老板在逃亡时蓄起了胡须并且着装低调。在线人向FBI告发了格里·郎的藏匿处之后，这种伪装再也起不了作用。（联邦调查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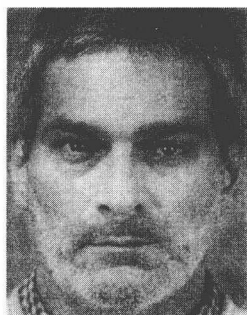


坎塔鲁普的证词，这两个人在管理委员会审判中也是主要证人。迪克里斯托弗的证词对珀西科尤其不利。他作证说，这个逃亡的黑手党老板没有提前通知就出现在他的家里，然后堂而皇之地安顿自己住了下来。在一些快乐轻松的时刻，卡迈恩喜欢为迪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妻子做一种他特别喜欢的食物，即浇上用橄榄油与蒜末拌成调味料的意大利面食。珀西科向迪克里斯托弗吹嘘，他曾经从监狱里操控着他的家族，还说靠犯罪捞了足够“花上十辈子”钱。还有一次，当回忆起他的“丰功伟绩”时，珀西科不经意间说道，“我杀了阿纳斯塔西亚。”此言意在夸耀他是乔伊·加洛的“理发店五人组”的成员之一。

除了线人坎塔鲁普和心中不快的房主迪克里斯托弗所提供的证词外，检方还靠电子窃听获取了证据。安装在“斯道达之家”的窃听器录下了格里·郎格拉那和科洛博家族的敲诈阴谋有关的谈话，这对确保珀西科和8名共同被告被定罪至关紧要。

在巩固和保护黑手党犯罪家族方面，血缘和忠诚是极为重要的因素，然而这次却是反受其害，连累珀西科的亲人和他最坚定的朋友受到RICO的“家族”审判。休·麦金托什被判处10年监禁。“蛇”的表兄安迪·拉索被判了14年。老板珀西科的刑期是39年。对他来说，这次审判让他最难接受的也许是他的长子阿方斯也受到了牵连，为了不至于和他的叔叔，即卡迈恩的哥哥搞混淆，这个儿子通常被称为“小好汉阿莱”。作为家族角头，“小好汉阿莱”因监管家族的诈骗生意和试图贿赂狱方官员使父亲受到优待而被判刑。

强硬的卡迈恩·珀西科拒绝为自己求取宽大处理，但他恳求量刑法官约翰·F·基南（John F. Keenan）宽恕他33岁的儿子。他声称“小好汉阿莱”是无辜的，



卡迈恩的长子阿方斯·珀西科。他声言要成为一名律师，但结果成了科洛博家族的角头。卡迈恩企图任命“小好汉阿莱”为老板引发了黑手党的一场内战。在20世纪90年代因敲诈勒索罪被监禁期间，“好汉阿莱”蓄起了胡须，他于2004年因下令谋杀科洛博家族的一名对手而被起诉。（联邦调查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指控他的变节证人都是说谎者。“我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可考虑的。”当这对父子的几名亲人在法庭哭泣时，卡迈恩说道。

法官基南判处“小好汉阿莱”12年监禁。亚伦·A·马库（Aaron A. Marcu）是个力荐严惩的检察官。对科洛博家族进行了3年的调查之后，他预言般地描述“小好汉阿莱”说：“他是其父亲最为信任的副手。他是科洛博家族的未来。”

除了逃出联邦监狱的这不可能的可能性外，即使是不愿承认失败的卡迈恩·珀西科也意识到，这“家族”和管理委员会 RICO 审判合并判处的139年监禁就相当于死刑。他也许命该如此，但他还是决心将家族的权杖交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小好汉阿莱”可望在8年内，也就是在他40岁左右获得保释，正值盛年的他正适合加冕为王并占有科洛博家族多年搜刮的不义之财。在他的儿子出狱之前，珀西科打算继续保有老板的头衔并向其代理人发出重要的决策指示，这和他以前蹲监狱时没有什么两样。通过保留权位，珀西科能够确保科洛博家族相当比例的不法收益仍像他本人在街头时一样流进其家人的保险箱柜里。作为一向尽职尽责的丈夫和父亲，他希望照顾好家里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让“小好汉阿莱”刑满释放时能继承到钞票和其他资产是非常重要的。

在丈夫和儿子被判刑后不久，乔伊斯·斯摩尔多诺·珀西科（Joyce Smoldono Persico）公开表达了她对卡迈恩的爱意，并坚持说他受到了不公正地判决，法院依据的仅仅是那些有野心的检察官所提供的不足采信的证据。“我知道他的人品，”1987年1月她在一封写给《新闻日报》的信中说道，“这些年来，政府给了我们太多过分的惩罚，卡迈恩和我对我们的家族和家庭的爱帮我们渡过了这些艰难岁月。我们从那痛苦的折磨中活了过来，卡迈恩也回到了家。可就在我们想着一切都安全了，正是我们重

新开始生活的时候，RICO 和吉乌里亚利又尾随而来了。”

珀西科对美国检察官鲁道夫·吉乌里亚利也是怀恨在心。为了报复他被判无期徒刑和儿子被定罪，他发出指令，欲谋杀吉乌里亚利和参与科洛博家族案件的两名检察官亚伦·马库和布鲁斯·贝尔德、FBI 科洛博家族小组负责人达蒙·泰勒及搞到对他及其儿子不利的证据的专案特工丹尼斯·马杜罗（Denis Maduro）。这锁定多人的谋杀计划被银行劫匪迈克尔·劳埃德（Michael Lloyd）给捅了出来，而完全看走了眼的珀西科曾将其视为心腹知己。在伊利诺斯州马里恩和加利福尼亚州隆波克的联邦监狱服刑时，珀西科和此人是同监牢的狱友。

劳埃德在其 1998 年的保释听证会上证实了这些阴谋，当时他吐露称，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他在狱中一直充当着政府的眼线。1987 年，在政府防卫措施最为严格的马里恩联邦监狱，那个教父和这名告密者结识了。在接下来和劳埃德一起被关押在马里恩和隆波克监狱的 8 年里，珀西科对他产生了好感并越来越信任他。劳埃德处处留意，精心收集珀西科与狱外黑手党人秘密策划阴谋的信息。作为珀西科的狱中秘书，他主要是通过工作之便获得了这些情报。

在那些年里，珀西科向劳埃德讲述了他在黑手党里的生平事迹，并称他差不多牵头谋杀了 25 个人，而其中有半数由他亲自动手。卡迈恩吐露说，他利用探监的律师和亲人向纽约传送消息，并通过这种接力系统批准黑手党的暗杀行动。珀西科传递信息的另一种方式是向律师邮寄由劳埃德打出的信件，然后经他们之手转交给科洛博家族的成员。监狱当局不允许拆阅囚犯寄给律师的信件。据劳埃德称，珀西科还贿赂监狱看守提供方便，允许他和一名到隆波克监狱探望他的女律师发生性行为。

得知珀西科发出了谋杀那些检察官的指令后，劳埃德向吉乌里亚利寄出了自己的信件，警告他提防珀西科的阴谋。劳埃德随后被招募为政府的线人，代号是“玩蛇的人”。他的情报帮助挫败了珀西科谋杀政府官员的阴谋，而珀西科却似乎从未怀疑到他。

耍弄卡迈恩·珀西科是危险的，劳埃德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但讨好联邦检察官能让他提前保释。无论劳埃德得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他都会写上一位律师的地址（实际上是官方的一个秘密通信地址）寄给 FBI。纽约南区的联邦执法当局决定不对珀西科提起新的谋杀罪指控，因为他已经被囚禁在监狱之中并无出狱之日。不理睬其气腾腾的报复阴谋还有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即追加指控将暴露劳埃德的间谍身份并切断关于科洛博家族内部财产转移的情报来源。尽管共计领刑 139 年，但在东海岸加利福

尼亚州的一个牢房里，珀西科仍操控着其犯罪家族的事务。和以往一样反复无常的他，对原来的代理人发动了袭击，这个决定将给他的黑手党家族带来致命性的后果。通过“玩蛇的人”迈克尔·劳埃德，“蛇”卡迈恩·珀西科正无意间表露了他对一场由自己发起的黑手党内部战争的看法。

第 30 章 卡迈恩的战争

现在我们开战了，可什么时候是个头？什么时候是个头哇？

在夏夜柔和的夜光中，独自驾车的维克托·奥瑞拉（Victor Orena）正驶向他自家的私人车道，就在这当口，他本能地警觉了起来。他发现有四个人坐在一辆横着停在车道中央的轿车里，要回到长岛锡达赫斯特区白金汉路上那两层楼的舒适之家，这里正是必经之处。急踩刹车，奥瑞拉猛打方向盘来了个急 U 形转弯，然后呼啸着逃离了这条僻静的乡间马路。他认识车里的那些人，并很快意识到他们为何出现在他家附近。这里必有一份欲取其性命的谋杀契约，而那四个人便是将枪口瞄准了他的杀手队成员。

维克托·约翰·奥瑞拉不是下班回家的普通生意人。他是个有才华且富有的黑手党人，渴望着能爬上高高在上的教父之位。1991 年 6 月 20 日，当奥瑞拉驱车在那朦胧的夜光中飞奔逃命时，他已经知道了谁是这起伏击的幕后黑手。暗杀令必定来自 3000 英里之外，只有背信弃义的“蛇”卡迈恩·珀西科才能下达。

在卡迈恩·珀西科和“小好汉阿莱”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刑后不久，人称“小维克”的奥瑞拉突然间成了科洛博家族一个权柄在握的人物。在法官宣读那些有罪裁决时，奥瑞拉还只是小珀西科行动队里一个奋力打拼的打手。但当“小好汉阿莱”1987 年因诈骗罪前往监狱服刑时，他挑选了奥瑞拉作为其行动队的代理角头。

被判处终身监禁后，卡迈恩首先选择他的哥哥阿方斯，也就是老“好汉阿莱”，任家族的代理老板。但接掌家族大权后不久，“好汉阿莱”就逃亡了。为了避免因高利贷被定罪而受到长期监禁，他交过 25 万美元的保释金后就溜走了。故而在 1988 年，在哥哥和儿子都不可用的情况下，珀西科通过汰选方式任命“小维克”奥瑞拉为代理老板。

“蛇”将奥瑞拉视为可以信赖的但至多是个临时配角的助手，他向后者下达了一个头等重要的指示：替“小好汉阿莱”看好宝座，直到他从狱中出来执掌权杖成为教父。奥瑞拉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确保珀西科兄弟和他们狱外的亲人能继续享有家族的收益份额。联邦黑手党调查员肯尼思·麦克凯布（Kenneth McCabe）后来得知，卡迈恩为了显示他对奥瑞拉忠诚之心的特别信任，特地授予了他两项临时老板通常难以取得的权利：“小维克”可单方面下达暗杀命令和吸收打手。

作为出色的捞钱人和恭顺的打手，54岁的奥瑞拉凭着过去的积功累德赢得了卡迈恩父子对他的信赖。奥瑞拉身材矮胖，有着犀利的碧眼和斑斑灰发。在科洛博家族的行家里手中间，他的生意头脑受到大家的一致公认。在几十年忠贞不渝地为家族里的珀西科派系效劳的过程中，主要在长岛活动的奥瑞拉灵活地打理着许多重要的高利贷和劳工诈骗生意。他的“不良档案”，即他的犯罪记录并不多。因赌博和做伪证，他曾受到过轻微的处罚，但这些都未让他蹲过监狱。对他来说，最严重的记录是曾经因放高利贷被定罪并在长岛县监狱服刑4个月。

在做打手的时候，头脑冷静的“小维克”狡猾地避开了许多暴力任务，但他知道要挑选什么样的“牛仔”去干危险的事情。实际上，在接管“小好汉阿莱”的行动队出任角头之后，他常常叮嘱前去执行谋杀任务的打手和崇拜者们说，他更喜欢西西里岛人的一种被称为“lupara bianca”（字面意思是“白色的猎枪”，实际上是指“白色死亡”，是确保尸体不会被发现的委婉之言）的传统方式。

经他的律师兼财经顾问丹尼斯·帕帕斯（Dennis Pappas）之手，奥瑞拉为自己捞得了巨额资产。联邦调查人员最终查清，帕帕斯在80年代创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11家公司并开立了165个银行账户，以便于为奥瑞拉及其同伙漂洗至少500万美元的款项。另有数百万美元，检察官和FBI特工们承认，已经难以追查。作为奥瑞拉的银行家和投资者，年近40岁的帕帕斯是著名的家族“财经顾问”。为自己捞得巨额报酬后，帕帕斯的主要工作是将该家族从放高利贷、赌博和燃油走私中捞取的现金打入那些假公司和银行账户中去。通过让黑手党人的家人在那些纸上公司里取得虚假职位并向他们发放工资，这些钱最后被漂洗干净。

帕帕斯还帮助奥瑞拉及其同伙从科洛博家族控制的工会吸走约100万美元的养老基金，这些钱被用作高利贷放贷的本金。有个为帕帕斯工作的会计师对他的账目提出质疑后收到一份令人恐惧的礼物：一条用报纸裹着的死鱼。这是黑手党惯用的警告方式，意即如果他向执法机关告密，等待他的将是死亡。

在最初的两年里，维克托·奥瑞拉充当了一个值得信赖的看守者，在家族极端重

要的政策、谋杀、吸收新成员和领导层的人事任免方面，他亦步亦趋地遵从卡迈恩从狱中发出的指令。到了1991年春天，奥瑞拉已经厌烦了珀西科的指手画脚，于是就告诉自己的亲信们说，卡迈恩失去了联系，这对家族的赢利造成了影响，那么他，而不是“小好汉阿莱”，应该取得老板头衔并被尊为教父。珀西科准备在电视节目中谈论他的生平经历，这让奥瑞拉特别恼怒。这个代理老板害怕珀西科的哗众取宠会加大施加在家族身上的执法压力，就像乔·博南诺的自传和在电视上公开露面帮助招来了灾难性的管理委员会讼案一样。

按照黑手党的惯例，奥瑞拉决心在几十名家族角头中间靠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来取得绝对控制权。他指示家族顾问卡迈恩·塞萨（Carmine Sessa）让角头们投票确认是否同意他就任老板。他们的坚定支持将为奥瑞拉被纽约其他家族接受为教父并终结卡迈恩·珀西科的权利铺平道路。被卡迈恩·珀西科提拔为顾问坐上了家族第三把交椅的塞萨从未按照奥瑞拉的要求行事。他向珀西科告发了奥瑞拉的叛逆行为。他很有可能通过卡迈恩的弟弟西奥多传递消息，当时身为角头的西奥多被准许到隆波克探望卡迈恩。珀西科的铁杆部下们也将自己对奥瑞拉的满腹怨言传给了狱中的老板。他们愤怒地称，“小维克”将他们排斥在家族最赚钱的行当之外，并通过向其他行动队施以恩惠来建立自己的帝国。

得到奥瑞拉提议公投的消息之后，卡迈恩决心痛下杀手。他向其打手下达的命令很干脆：干掉奥瑞拉。1991年6月20日的晚上，手脚并不老练的他们打算执行老板的命令。在顾问塞萨的带领下，“蛇”的四名枪手未能除掉“小维克”，当时奥瑞拉认出了将车停在他家附近的他们。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为了达成和平协议，奥瑞拉和珀西科的代表坐在一起。奥瑞拉的兵力将近200人，而珀西科的战士在25~30人之间。双方在领导权问题上都没有丝毫的松动，于是子弹在1991年11月又开始横飞了起来，战争开始了。

在与费城隔河相望的新泽西卡姆登市，一个窃听器为纽约FBI当局揭开了奥瑞拉阵营开战的缘由。FBI费城办事处在一名律师的办公室里暗中设置了麦克风，这个律师允许当地黑手党高级客户在那里秘密开会。1991年12月5日的中午，在这个律师的办公室里，费城老板约翰·斯坦福（John Stanfa）及其二老板安东尼奥·皮科洛（Anthony Piccolo）接见了亲奥瑞拉的角头塞尔瓦托·普罗旺斯，后者恳求他们在这场新发动的战争中施以援手。塞尔瓦托是家族开创者和首任教父乔·普罗旺斯的儿子，他父亲的家族是在后来才冠以科洛博之名。他现在负责该家族在新泽西地区的活动。

绰号为“萨利·普罗”和“泽西·萨尔”的普罗旺斯在大西洋城和新泽西南部与费城黑手党都有着共同的利益。

“要知道，‘拉·科萨·诺斯特拉’对我来说是非常神圣的，”萨尔·普罗旺斯说道，“我的话比什么都当真。”普罗旺斯解释说，他支持奥瑞拉是因为他选择了民意。在他的眼里，奥瑞拉是“一个绅士，一个很好的人，非常非常有能力，非常非常有资格，而且头脑冷静。”“蛇”是“疯狂的”，他要杀掉奥瑞拉才引发了战争。“卡迈恩·珀西科真是脑子有问题。卡迈恩·珀西科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他想继续上《六十分钟》节目，要接受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①的采访……”

普罗旺斯声称在家族的125名打手当中，大多数都赞成废黜珀西科，因为他的远距离统治和领导层频繁的人事变动正在造成混乱。“有100个人说我们不同意他的做法，那他的做法就不合时宜，况且他被判了100年的徒刑，而没有家族我们是撑不下去的，”他提高嗓门不停地说道，“我是说，那真是让人没法活了，你要控制家族，你还要分红。”普罗旺斯谴责珀西科的家人、他的兄弟、表亲和侄子们煽动暴乱，并悲叹地说，“现在我们开战了，可什么时候是个头？什么时候是个头哇？”

同年12月份，科洛博家族的五名黑手党人在布鲁克林被杀，其中一人在自己家前门上挂圣诞花环时遇害。在火拼当中，一些无辜的平民被枪杀。18岁的马特奥·斯珀兰扎（Matteo Speranza）是受害者之一。在这名青年工作的百吉饼店里，奥瑞拉的枪手把他错当成珀西科的支持者而残忍地杀害了他。

为防止科洛博家族将这座城市变成杀戮场，布鲁克林地方检察官查尔斯·海因斯（Charles Hynes）在12月底传唤41名嫌疑成员和合伙人接受大陪审团的讯问。然而，只有28个人露面，他们的脸都藏在短夹克衫或皮夹克的衣领里。他们没有人是告密者，所有人都不愿意说出与这场仇杀有关的任何信息。“他们把这审讯变成了一部B类电影，”海因斯愤怒地说，“我们不允许这里变成无辜者被枪杀的战场。”

然而，伏击和飞车扫射仍在继续。

奇怪的是，FBI正源源不断地获得极为详细的与这场残杀和科洛博家族的内部政治有关的报告。提供消息的人是珀西科的资深角头格雷戈里·斯卡帕（Gregory Scarpa），此人是个极端反社会的杀手，长期充当着政府的秘密线人。衣着时髦的斯卡帕身上通常会揣着5000美元的零用钱，一旦被逮捕就用它来行贿。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开始替乔·科洛博和卡迈恩·珀西科打理汽车盗窃、放高利贷、走私毒品和敲

^① 译注：有“美国电视新闻第一夫人”之称。

诈勒索生意。斯卡帕在黑社会有过一段典型的成功经历，在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步入了其鼎盛时期，并在萨顿区、拉斯维加斯、斯塔腾岛和布鲁克林的富人区都购置了房产。他身体结实，体重达 91 公斤，浑身是劲儿。他的奸诈和残暴的性情让他赢得了“凶灵神”的绰号。他的密友们曾嘻笑地说，他是那么喜欢虐杀让他讨厌的对手，他甚至告诉他们说，他真想将那尸体挖起来再杀一次。

斯卡帕盘踞了 30 年的老巢是布鲁克林区本森赫斯特一个离他的家不远的临街铺面“脆弱男孩社交俱乐部”。尽管无数次因高利贷、买卖被抢赃物、人身攻击、非法持有枪支、偷盗股票与证券、销售假信用卡和企图贿赂警官而被捕，但斯卡帕不知何故总能指让指控被驳回或赢得缓刑而走出困境。

90 年代中期，斯卡帕好运连连的个中缘由终于露出水面。作为科洛博家族的年轻打手，他在 60 年代曾通过秘密为 FBI 工作取得了一张护身符。他最突出的功劳是 1964 年在三名民权运动工作者詹姆士·钱尼（James Chaney）、安德鲁·古德曼（Andrew Goodman）和迈克尔·施沃纳（Michael Schwerner）在费城和密西西比被杀后向特工们提供了帮助。在备受国人瞩目且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调查过程中，尽管得到了这名黑手党人的协助，但 FBI 后来却因此感到不安，故而从未公开给予斯卡帕应有的荣誉。一些要求匿名的前执法官员和对案情比较了解的律师证实，这个布鲁克林黑手党人强迫一名 3K 党成员透露实情，终于查清那三具失踪的尸体埋在一处土坝里。

“他为了 FBI 跑到密西西比绑架了 3K 党的一个家伙，特工认定此人参与过尸体的掩埋，”纽约有个替许多黑手党人打过官司且对斯卡帕相当了解的律师说道，“那个家伙开了一家电器商店。斯卡帕买了一台电视机，然后装作提货离开商店。那人帮他电视抬到停在商店后面的车里。斯卡帕照着他的脑袋一记重拳将他击倒，然后将他拖进树林里痛打起来，最后用一支枪顶着他的喉咙说：‘我打爆你的头。’那名 3K 党成员意识到他是黑手党，并不是在开玩笑，就把藏尸地点告诉了他。”

密西西比任务结束后，斯卡帕继续与 FBI 保持联系，向它提供了 30 年的与科洛博犯罪家族有关的情报。和许多犯罪分子一样，他告密的动机是为了获得 FBI 的幕后干预，如果遭到逮捕或遇到判刑便可得到宽大处理。尽管做了 FBI 的密探并且违反了“乌默它”戒律，但他并没有打算放弃他的黑道利益。在奥瑞拉与珀西科的冲突爆发前后，FBI 特工“林恩”林德利·德维基奥（Lindley “Lynn” DeVecchio）一直是斯卡帕的联系人和管理者。德维基奥提交了几十份“秘密线人”报告（FBI 称其为 209 档案），这些报告根据斯卡帕提供的情报记述了冲突中发生的事件。那名特工暗中与斯卡帕会面并接听这个黑手党人打来的绝密电话，除了德维基奥外，其他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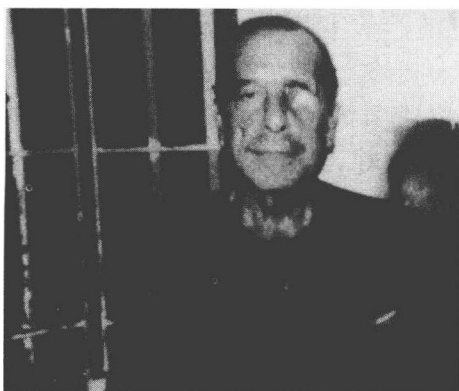
工不许接听这种电话。特工们称它为“哈罗电话”。

战争期间，斯卡帕充当了珀西科的总司令，表面上与 FBI 合作的他竭力要歼灭奥瑞拉的突击部队。斯卡帕递交给德维基奥的报告里满是与奥瑞拉的非法活动有关的罪证线索。他还出卖自己的枪手，指认他们参与了袭杀奥瑞拉手下的阴谋。尽管自己杀死了至少三名奥瑞拉的打手并试图谋杀其他人，但斯卡帕在向德维基奥告密时略掉了那些细节。在那势不两立的冲突中，他从来不报告自己是个心甘情愿的参与者。他倒是把自己险些丧命的经历告诉了德维基奥，称奥瑞拉的枪手把他的汽车打成了马蜂窝，而当时他的儿媳妇就坐在后排座上。

多年来，为 FBI 效力的斯卡帕获得了 15.8 万美元的报酬。以绝对不将其身份泄露给 FBI 以外的任何人（即使是检察官）和绝对不作为法庭证人接受传唤为条件，他答应为 FBI 工作。这是执法部门与它们所认定的极端重要的告密者之间达成的一种协议。

在战前的 1988 年，58 岁的斯卡帕因出血性溃疡进行过一次紧急手术，并在手术中接受了其行动队一个成员一品脱的血液，而这名成员后来死于艾滋病。3 年后，当战争激烈地进行时，斯卡帕被诊断也患了那种疾病。他体重减少了 23 公斤，精神憔悴且容易疲劳。但不顾其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他以铁腕治理着他的行动队，并急切地追猎着奥瑞拉派的仇敌。尽管奥瑞拉的人不能灭掉斯卡帕，但他的气数已近衰竭。1992 年 12 月 29 日，在其布鲁克林的家附近，他在一场因毒品交易引起的与科洛博战争无关的冲突当中被击中了左眼。到了 1993 年，瞎了一只眼，秃头且身体虚弱的他不再像其以前一样被人视为可怕的军阀。

在冲突初起之时，科洛博家族相对安全。实际上，政府对该家族扩展非法活动的领域知之甚少。斯卡帕向 FBI 提供的主要是其犯罪家族指挥系统的有用情报，对那些



在科洛博家族战争期间，珀西科派系的角头格雷戈里·斯卡帕在一桩毒品交易失败时被击中了眼睛。在斯卡帕因患艾滋病死于狱中之后，政府发现了他在秘密充当 FBI 高级线人的 30 年间所犯下的罪行。（纽约市监狱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即时性交易的情况则含糊不清，而对其黑手党敌人，他所说的不过是些充满侮蔑之辞的无聊闲话。

“我们对科洛博家族的情况知之不多，”当时纽约东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负责有组织犯罪部门的检察官约翰·格莱森（John Gleeson）承认说，“我们竭力探查，但收效甚微。”

和纽约其他联邦律师一样，1990年当格莱森指派布鲁克林检察官乔治·斯泰姆布利迪斯（George Stamboulidis）打入科洛博家族时，他并不知道斯卡帕与FBI的瓜葛。斯泰姆布利迪斯取得了一个突破，当时科洛博家族一个受毒品走私指控的崇拜者迈克尔·马法塔（Michael Maffatore）极度渴望得到宽大处理，便开始交待其家族一桩悬而未决的谋杀案。带着藏在身上的录音机，通过搜集证据证明其他崇拜者与那桩命案有牵连，马法塔为检察官们赢得了一些小的胜利。这是个开始，但比起重拳打击科洛博家族的上层建筑来，它更像是一次针扎。

为提起更多诉讼，斯泰姆布利迪斯连珠炮似地质问那些被传唤到大陪审团前作证的会计师和其他看起来体面却为那个家族工作的人。估计那些家族的文职助手会因畏惧作伪证而松口，斯泰姆布利迪斯就期待通过传讯来获取关键性证据来打击其主要目标：维克·奥瑞拉、他的两个同是黑手党人的儿子小维克托与约翰、卡迈恩·珀西科的儿子“小好汉阿莱”。和他的父亲一样，狱中的“小好汉阿莱”在其帮派里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家族内部冲突骤然爆发之时，这种策略终于获得了成功。有个被传唤的会计师肯尼思·盖勒（Kenneth Geller）采取合作态度，提供了与奥瑞拉的高利贷团伙和“小好汉阿莱”的地下产业有关的内幕情报。恐惧把盖勒赶进了检察官们热诚的怀抱。为了一笔一百多万美元的贷款，他每周要向科洛博家族支付1.1万美元的高额利息。想要一夜暴富的他曾向高利贷主们借下那笔钱进行过一些已经失败的投资。为凑足每周需付给黑手党的还款金额，盖勒盗用了合法客户的款项，而这等于给自己掘了一个更深的陷阱。频频被传讯的盖勒认为，只要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控告已在逼近，科洛博家族就会将他当成可能的告密者干掉。他唯一的选择是果断与政府合作，带着窃听器获取对那些黑手党人不利的证据，然后隐名埋姓进入联邦证人保护项目寻得安全。

自1991年11月至1993年10月，共有12名黑手党人和一个十几岁的百吉饼店的无辜店员进了坟墓。科洛博家族至少还有12人受伤，另有5名行人险些无辜丧命。死者当中有奥瑞拉的支持者约瑟夫·斯科波，此人是管理委员会案中被判刑的工会领导人拉尔夫·斯科波的儿子。这些枪战中备受瞩目的荒谬之处是珀西科的枪手们曾因误

杀了78岁的退休打手“汤米·斯卡斯”盖塔诺·阿马托（Gaetano “Tommy Scars” Amato）而向吉诺维斯犯罪家族道歉。当珀西科的突袭队发起进攻时，吉诺维斯家族的这个老打手恰好误入了奥瑞拉的社交俱乐部。

这场战争省去了政府通过定罪来打垮这个家族的力气。为避免因敲诈勒索和谋杀阴谋指控被逮捕并处以长期监禁，科洛博家族的成员与合伙人纷纷倒戈成了合作证人，还有些人因为害怕自己被杀而变节。至少有12名成员成了政府的证人，包括顾问卡迈恩·塞萨和两名角头。

在会计师盖勒的证词和黑手党背叛者的帮助下，政府抓住了最大的猎物维克托·奥瑞拉。他那寻求成为教父的野心终于毁了自己。1992年4月愚人节那天，藏身于情妇家中的他被逮捕，当时他装备了四杆子弹上膛的猎枪、两支突击步枪和六把手枪。同年年末，依据RICO指控，奥瑞拉被证明犯有谋杀、阴谋谋杀和大规模放高利贷等罪行。时年58岁的“小维克”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

经历了两年火拼、内斗和斯泰姆布利迪斯大陪审团的传唤，双方共有68名角头、打手和合伙人被捕并受到指控。和他们的主子一样，“小维克”及其高级打手与帮手都被判刑，主要罪名是谋杀、敲诈勒索和高利贷。同时遭监禁的还有“小维克”的两



在科洛博家族战争期间，胜利者“小维克”奥瑞拉在保镖和忠实追随者的簇拥下进入自己的汽车。当他受RICO和谋杀指控被定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时，他的夺权计划落空了。（联邦调查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个儿子小维克托和约翰以及混迹于建筑行业中的敲诈者汤姆·皮特里佐（Tom Petrizzo），后者在纽约西区高速公路的废钢材上也发了一笔小财。奥瑞拉的金融导师丹尼斯·帕帕斯则因大肆行骗而入狱。

珀西科阵营被判处长期监禁的有卡迈恩的弟弟特德、表兄安迪·拉索及得力干将休·麦金托什。珀西科的哥哥“好汉阿莱”阿方斯 1989 年在 61 岁时死去，当时这场内战尚未爆发，即便如此他还是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刑 25 年。

这场战争的附带结果是那个最为神秘的参战者格雷戈里·斯卡帕最终被判刑，他此前是珀西科的残忍无情的角头和 FBI 的暗探。对其黑手党人与线人的双重身份毫无所知的联邦检察官对他提起了其平生第一次碰到的敲诈勒索指控。联邦政府只是在布鲁克林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依据州里一项持有枪支的指控抓住他之后才对他提起公诉。甚至在被起诉之后，存着再次被宽恕的侥幸之念，斯卡帕继续秘密地向德维基奥提供情报。但他的两面派把戏玩完了，1993 年他对联邦的多项敲诈勒索罪表示认罪。

斯卡帕的法庭宣判没有公开进行。检方和被告方担心泄露其密探工作将表明他是个身居高位的告密者，从而对狱中的他带来可能的生命危险。在秘密听证会上，基于其与 FBI 的关系，他最后一次请求给予宽大处理。这终未奏效，他被法官杰克·温斯坦（Jack B. Weinstein）判处 10 年监禁，这位法官形容他的奸诈与暴行“比野兽更恶劣”。一年后，斯卡帕在监狱医院里死于艾滋病并发症，时年 66 岁。

斯卡帕与黑手党和政府盘根错节的关系成了一个令检察官头痛的法律问题，这也让斯卡帕的上线，即身为科洛博家族小组主管的 FBI 特工林恩·德维基奥，成了另一个牺牲者。奥瑞拉阵营的辩护律师们最终得知了斯卡帕和 FBI 异乎寻常的合作关系。1995 年在对奥瑞拉的 7 名成员进行敲诈勒索与谋杀审判时，尴尬的检察官们坦承，斯卡帕与德维基奥的关系损害了他们的案子。政府承认有间接证据证明德维基奥曾将机密情报泄露给了斯卡帕。检察官们被迫将其他特工递交的内部申诉书交给了那些辩护律师，申诉书称据信德维基奥将一些高度机密的情报提供给了这个黑手党人，而这些情报与科洛博家族内部秘密协助 FBI 的背叛者的身份有关。德维基奥的批评者们声称，他帮助斯卡帕逃避追捕，并在 1991 年至 1993 年的这场战争期间提醒他如何追踪奥瑞拉的打手。

在查阅了 FBI 的秘密报告后，一些检察官怀疑德维基奥曾暗示斯卡帕，其“脆弱男孩俱乐部”已被执行假信用卡调查任务的财政部特勤处监听，并且还在 1987 年向他示警，称他的儿子小格雷戈里就要受到联邦毒品走私罪指控而被捕。

科洛博家族小组三名在德维基奥手下工作的特工证实了他在那场战争期间的表现。1992年，尽管有两名背叛者证实斯卡帕谋杀了奥瑞拉的一个帮手，但他拒绝逮捕斯卡帕，这让他们对他产生了怀疑。特工克里斯多弗·法沃声称德维基奥公开偏袒珀西科一方。1992年5月22日，法沃走进德维基奥办公室向他报告了奥瑞拉的两名手下被杀之事。

“正当我准备细说时，他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后说，‘这事我们赢定了，’这个消息似乎让他很激动。”法沃回忆说，“他看起来好像不知道我们是谁，不知道我们是FBI。一条是与非的界线看起来已经模糊不清……我想这里肯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被腐蚀了。他忘记了自己是谁。”

责难是空前的，以前还没有哪个FBI特工被公开指责帮助黑手党人犯罪并替他打掩护。

德维基奥严辞否认他曾将秘密透露给斯卡帕或破坏对科洛博家族的调查。作为取得过突出成就的特工，在司法部裁定指控其行为不端的理由不充分后不久，他辞掉了年薪10.5万美元的工作。“关键问题是我从未向斯卡帕提供过任何与这场战争或其他事情有关的秘密情报。”德维基奥在一次采访中坚持说。对于他和斯卡帕的关系所受的诟病，他归结于特工和检察官们在有组织犯罪调查问题上缺乏经验，误解了与线人打交道过程中所运用的合理与合法的技巧。

至于法沃所说的“这事我们赢定了，”德维基奥补充说，“我的意思是，科洛博家族的内战将帮助我们——FBI——赢得这场打击科洛博家族的战争，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大量背叛者和情报。”

德维基奥的支持者达蒙·泰勒（Damon Taylor）曾担任过科洛博家族小组的负责人，对格雷戈里·斯卡帕的历史颇为熟悉的简洁地概括了这名黑手党人对FBI的价值：“他是镶在王冠上的宝石，尽管他劣迹斑斑。我相信他所说的任何事情。”

奥瑞拉组织的辩护律师利用斯卡帕的身份曝光大做文章，企图压倒检方以转败为胜，他们指责德维基奥为取得对奥瑞拉的支持者们不利的证据而煽动了这场战争。他们声称德维基奥向斯卡帕提供了情报来帮助他干掉对手。律师们争辩说，奥瑞拉派的被告因杀害珀西科阵营的敌人而受审，而实际上他们是在抗击斯卡帕和德维基奥联手实施的谋杀阴谋，是情有可原的自卫反击。按照那些律师的说法，德维基奥是在蓄意煽动而非制止犯罪。

辩护方的争辩取得了部分成功。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经历了一次挫败，奥瑞拉派19名被指控参与黑帮谋杀的被告要么被宣告无罪，要么被撤销了原来的判决。面

对着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的结局，绝望的维克·奥瑞拉紧紧抓住“斯卡帕自卫”说不放，以期获得重新审判。但这种花招并未奏效，他请求推翻原有判决的上诉被驳回，上诉法官们维持了其 100 年刑期的判决。

对奥瑞拉派的大多数战士来说，斯卡帕纠纷不过是暂时的法庭胜利。科洛博家族之战带来的大量证据和背叛者让他们受到了其他罪名的指控并被判刑，他们最终与自己的首领“小维克”在狱中见面了。

法庭对 FBI 和林恩·德维基奥的行为给予了谴责，斯卡帕的双重生活也随之终结。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查尔斯·P·西夫顿（Charles P. Sifton）应奥瑞拉派被告多次要求重审的请求审查了相关证据，他直言不讳地斥责了这名特工，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 FBI。“斯卡帕邪恶而暴力，同时又能玩弄和欺骗每个人，包括德维基奥，”这位法官说，“德维基奥傲慢、愚蠢，或者说易受控制，但同时又得完成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得最大限度地利用斯卡帕的情报来结束那场战争。”

斯卡帕 40 年的老部下兼被保护人劳伦斯·马扎（Lawrence Mazza）曾作为背叛者指证过科洛博家族原来的同伙，也提到过其黑手党导师的病态心理。马扎称，斯卡帕自从感染艾滋病之后就鼓励他与自己年轻的情妇琳达，那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发生性关系。“他告诉我，他不想剥夺琳达想要的东西。他太爱她了，他知道她对我有好感，而我对她也是如此。”

在讲述斯卡帕如何训练他的高利贷、赌注经纪和谋杀技巧时，马扎证实这个角头从痛杀奥瑞拉派对手中获得了无穷乐趣。在一次驱车追杀的过程中，马扎说，他用猎枪而斯卡帕用左轮手枪将他们的一个受害者打倒在地。当斯卡帕将子弹一颗颗地射进那个将死者的头部时，他得意地吼道：“这颗是替卡迈恩打的。”

第 31 章 王朝

他们的许多膏腴之地已经丢失，家族的结构被动摇，那些自称自许的首领们要么被收押等待审判，要么亡命天涯。

科洛博王朝的激烈火拼是 20 世纪纽约黑手党的最后一场战争。

从死伤和被判刑的人数上来看，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损失惨重的大血洗。最终，珀西科的 42 名打手和合伙人与奥瑞拉派 16 名成员以各种罪名被判刑并被关进了监狱，10 名背叛者避入证人保护项目也对这个家族造成了重创。卡迈恩·珀西科是这场继承权战争的表面上的胜利者。通过判处奥瑞拉终身监禁，政府不经意间遂了他的心愿。随着头领的离去，奥瑞拉的枪手们停止了叛乱，这为卡迈恩的儿子阿方斯因敲诈勒索罪服刑 8 年后被保释时成为老板扫清了道路。

从早年起，卡迈恩的大儿子“小好汉阿莱”就被指定为父亲的衣钵传人。他在科洛博家族的大本营南布鲁克林和本森赫斯特长大，他那频繁出入监狱的父亲被当地的亲戚和邻居当成了民族英雄。比起卡迈恩来，这个戴着眼镜的儿子不仅长得又高又壮，而且还是个聪明好学的学生。喜欢穿着斜纹软呢夹克的他也曾有过成为一名律师的梦想，但他大二时就离开了圣约翰大学。到二十四五岁时，据警方的情报档案记录，他已成为父亲那犯罪家族的一名角头。他 1983 年第一次被捕，当时 29 岁的他受到毒品走私罪的指控，但这项控告最终被驳回。3 年后，被检察官确认为角头的他与父亲一起在科洛博家族的 RICO 审判中被判刑，刑期为 12 年。

“这个孩子很想像父亲一样受人尊重，”参与审判的联邦检察官亚伦·马库后来说，“他受过更多的教育，在处事风格和形象上与普通黑手党人多有不同，但通过窃听录音，我们感觉他是个典型的赶超崇拜者的人。他完全被生活迷住了，他可以将别人指使得团团转，可以大声粗气地发号施令。”“小好汉阿莱”按正常程序将于 1993

当一场黑帮战争在纽约进入白热化时，卡迈恩·珀西科（左一）正设法从加利福尼亚州隆波克联邦监狱对战局施加影响。总共需服刑 139 年的“蛇”经狱方允许后成立了一个意大利文化俱乐部，他和他的狱中密友可以在那里话旧聊天。（作者的照片）



年获得保释，但他的释放受到乔治·斯泰姆布利迪斯的阻挠，后者是位助理美国检察官，也是科洛博家族诸多案件的首席公诉人。斯泰姆布利迪斯知会保释委员会称，“小好汉阿莱”涉嫌从监狱中策划谋杀了一个与他的妻子托瑞（Tori）暗中约会的男人。受害者迈克尔·迪瓦恩（Michael Devine）是斯塔腾岛一个酒吧的男招待，于 1992 年被枪杀致死。几发子弹打烂了迪瓦恩的生殖器。在写给狱方官员的信中，斯泰姆布利迪斯援引合作证人和黑手党背叛者的话说，“在谋杀案当中，如果受害者的生殖器被毁伤，这就是在告知那些听说过该案的人，受害者愚蠢地和一名‘拉·科萨·诺斯特拉’成员的配偶发生了亲密关系。”

尽管从没有因迪瓦恩谋杀案被正式起诉过，但“小好汉阿莱”1994 年夏天还是被提起了其他联邦指控，罪名是从狱中帮助指挥科洛博家族的战争，并且批准了杀掉奥瑞拉 7 名党羽的计划。另一项谋杀指控也接踵而来，检方称他在战前杀害了妹夫史蒂文·皮亚扎（Steven Piazza）。检察官们称卡迈恩·珀西科 1985 年就想杀掉皮亚扎，因为他在肉体上虐待了卡迈恩的女儿芭芭拉。此外，珀西科还相信皮亚扎不是吸毒就是贩毒，如果被警方抓获就有可能成为危险的告密者。据起诉书称，这起谋杀经过“小好汉阿莱”的特别批准并由其行动队来执行。

1994 年的审判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小好汉阿莱”被查明谋杀了皮亚扎，但由于 RICO 法律中存在一个令人费解的技术破绽，他最终还是赢得了无罪宣判。陪审团发现他的确参入了皮亚扎谋杀案，但这起谋杀不是起诉书里的一条罪状，它是一种基本行为或重罪。RICO 定罪需要至少两起基本行为，而陪审团未能将他与任何其他

基本行为联系起来。观察者认为，检方被曾经担任过角头的背叛者约翰·佩特（John Pate）所蒙蔽，可他们还指望他是指控珀西科的最佳证人。然而，过去多受“小好汉阿莱”提携的佩特似乎更愿意修改证词来帮助而非伤害他。

在那起 RICO 案件当中，其他 9 名被告要么被查明有罪，要么为获得减刑而达成了认罪协议。“小好汉阿莱”是 1995 年唯一以自由之身走出法庭的人，他的保释不再受到阻挠。

40 岁的阿方斯·珀西科拥有了老板或代理老板的头衔，现在他肩着重振其四分五裂的犯罪家族的重任。他那仍保有教父头衔的父亲卡迈恩可以把这场战争视为绝对的成功。就在科洛博家族的敌对打手们在纽约互相残杀的时候，卡迈恩已经在隆波克监狱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舒适的小环境。始终不失其首领威势的“蛇”在监狱中成立了一个意大利文化俱乐部，他和其他主要是杀手、毒贩和勒索者的黑手党狱友可以在那里谈论过往旧事。监狱当局允许俱乐部成员们筹办特殊的宴会、生日酒席和自我娱乐，这与他们在南布鲁克林的临街据点进行活动没有什么两样。在外面的时候，卡迈恩·珀西科的残忍令人不寒而栗，而在加利福尼亚中部这座阳光充足的离太平洋数英里之遥的监狱里，他却闲适地照料着一个玫瑰花园来消磨自己的日子。尽管被终身囚禁，但到了 20 世纪年代末，“蛇”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看到一个由他儿子重新打造起来的黑手党王朝。

利用 RICO 的技术性问题脱险后，“小好汉阿莱”就竭力隐藏其黑手党首领的身份。他伪装成商人，投资成立了布鲁克林客车服务站，还开了一家饭店、一个咖啡批发公司和两家百吉饼店。为了躲避纽约的调查人员，在接下来的 4 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佛罗里达度过。不过，他的好运气就在那里被耗尽了。1999 年 2 月，正当他在劳德代尔堡（Fort Lauderdale）附近一条游艇上休息时，海岸警卫队据线人密报查获他持有一杆猎枪和一把 9 毫米口径手枪，由于其 1986 年的 RICO 有罪判决，他被禁止携带武器。

受枪支指控被保释后，珀西科重新回到纽约。由于 1991~1993 年的内战，更残酷的反攻倒算仍在科洛博家族内部进行。“小好汉阿莱”向原奥瑞拉派做出明显的和解姿态，任命“野蛮比尔”威廉·卡托罗（William “Wild Bill” Cutolo）为二老板。身为大高利贷主和劳工诈骗行当的勒索者，卡托罗被赶出了卡车司机协会的领导层，只接管了一个不起眼的代表城市雇员的“产业工人”分会。这个工会职位为他向聪明汉提供挂名工作和让合同落入黑手党供应商之手打开了方便之门。

作为其“野蛮比尔”的部分特征，卡托罗总是招摇地戴着一顶大号牛仔帽。在最

近的那场战争中，他无数次逃过对手的暗杀企图，领导着一支行动队干掉了珀西科的多名打手。“小好汉阿莱”及其追随者显然不会忘记卡托罗的不忠，他们在静静地等待时机。1999年5月26日，在离他的50岁生日还有11天时，“野蛮比尔”失踪了。他的家人知道黑手党人突然失踪意味着什么。他们相信珀西科的人谋杀了他以报复其战时的行为。为了让其家属承受更多痛苦，珀西科父子精心安排，让卡托罗的尸体永远消失了。

无论小珀西科是否插手铲除“野蛮比尔”，这笔账都会算到他头上。卡托罗30岁的儿子小威廉暗暗发誓，要除掉珀西科父子为父报仇雪恨。在父亲失踪数周之后，他找到FBI主动要求进行卧底活动。将一台微型录音机绑在胸前，他很容易地与科洛博的打手们混在了一起，而这些人也都把他看成一个温顺的崇拜者，从未对他产生过怀疑。

特工们把他的渗透活动称为“复仇行动”。利用小卡托罗提供的情报，他们搞到了搜查证对“小好汉阿莱”的女儿那布鲁克林的寓所进行搜查，那是他们的目标经常待的地方。搜查证注明特工们将查找一部便携式电话机，它可能含有阿方斯·珀西科卷入“野蛮比尔”谋杀案的通话证据。这部电话连同藏在鞋盒和床垫里的2.5万美元现金被一块找到。更具价值的发现是藏在厨房炉罩里的电脑磁盘和高利贷账本。这些物证表明在卡托罗失踪前，“小好汉阿莱”从其经营的高利贷生意中抽走了100万美元的收益。

佛罗里达涉枪拘捕案和“复仇行动”中的证据无可抵赖，2000年2月，“小好汉阿莱”在佛罗里达州认罪伏法；2001年12月，他在纽约再次认输，承认犯下包括敲诈勒索、高利贷和洗钱在内的多项RICO罪行。卡托罗之子的卧底工作——科洛博家族战争的收尾部分——导致小珀西科和科洛博家族其他15名打手和合伙人被定罪判刑。

小珀西科的RICO判决是监禁13年，并处没收100万美元现金或资产。如果他在审讯中负隅顽抗而诸多证据和背叛者又令其难逃法网，47岁的他将有可能面临70年的刑期。他签订了认罪协议，但这样他就违反了“乌默它”，实际上承认了黑手党的存在而且自己就是其头目之一，这样一来他就玷辱了父亲与叔叔们的荣誉准则。

“你不是听差跑腿的人，”联邦宣判法官瑞纳·拉吉（Reena Raggi）声称，要他承认自己在科洛博家族里的地位，“你是那个组织的头目，你对你的行为有任意决定权吗？”

“是的，我有。”可怜的珀西科回道。

法官拉吉称珀西科是个“非常危险的人”，她说真希望自己有权判他终身监禁。谈到虽然陪审团查明他下令谋杀了其妹夫但他仍利用 RICO 法律的技术性问题逃过 1994 年的惩罚时，拉吉说，“我想没有什么罪他不会犯的。”

17 年前，在“小好汉阿莱”因敲诈勒索罪首次和父亲一起在科洛博家族审判中被判刑时，法官约翰·基南就恳切地规劝他改变人生方向，特别提到他离开监狱时年纪尚轻，足可以开创一种全新的生活。“要是再留在科洛博家族，你就是个笨蛋。”这位法官警告说。在联合判决听证会上，法官基南还对卡迈恩·珀西科在管理委员会案中的自我辩护才能表示了钦佩。宣判老珀西科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时，这位法官责备他说：“珀西科先生，你是一个悲剧。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才智的人之一。”

基南对这对父子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受一种过大的自我所驱使，“蛇”卡迈恩为继续控制其黑手党帝国而发动了一场两败俱伤的黑手党内战。他要建立一个王朝。他那充满谎言的阴谋最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除了已知的死于非命的那 12 个人外，包括他的儿子在内，科洛博家族战争最终导致双方七十多名领导层成员、打手和崇拜者被判刑或被监禁。在新世纪之初，科洛博犯罪家族苟活着的富有经验且未遭监禁的荣誉者减少到约 75 名。他们的许多膏腴之地已经丢失，家族的结构被动摇，那些自称自许的首领们要么被收押等待审判，要么亡命天涯。

2004 年年底，“野蛮比尔”卡托罗谋杀案终于给正关押在监狱里的“小好汉阿莱”带来了灾祸。检察官们声称小珀西科仍是代理老板，指控他下达了卡托罗的死刑命令。和以往一样，证据主要靠背叛者的告密获得，这次定罪将意味着终身监禁或死刑。

“这场战争帮我们从内部摧毁了这个家族。”乔治·斯泰姆布利迪斯说道。这位检察官参与了绝大多数由其家族内部无休止的仇杀而招来的重要审判。“他们不是合力对付政府的调查，而是盘算着如何苟全自己的性命，那就是他们成为合作证人的动机。这场战争具有雪球效应，它让我们能比平常更迅速地查办大案要案。”

第 32 章 遗产地狱

“这留下来的将是遗产地狱。”

约翰·葛提正在自己的私人办公室里规划着自己的未来。这是 1986 年 1 月的中旬，就在一个月以前，他通过谋杀叛乱夺取了甘比诺家族的控制权，并自封为这个全国最大黑手党家族的老板。让葛提和他那位身份不明的同伴没有想到的是，他那漫不经心的谈话正被纽约州调查人员秘密录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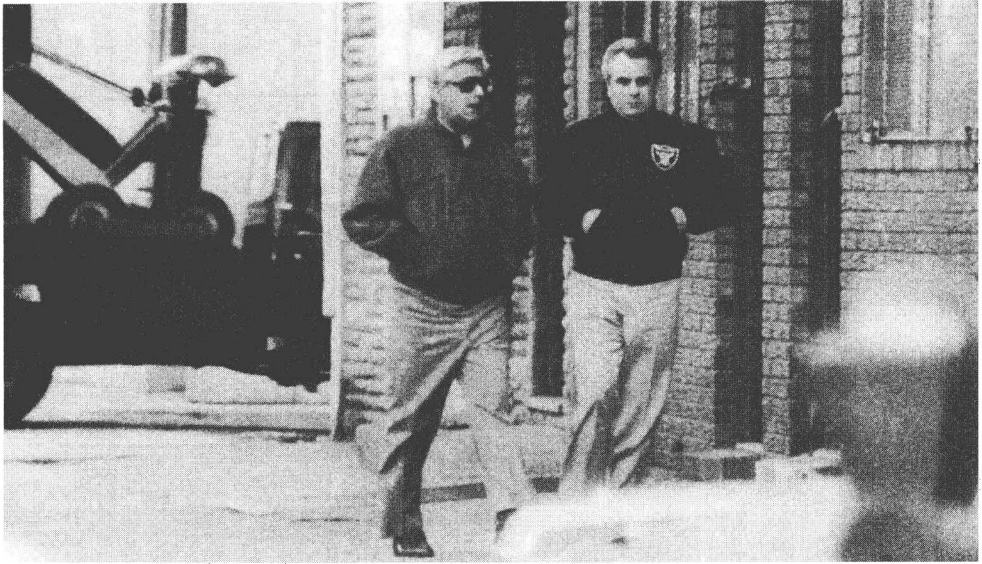
“执法部门会对我们强硬起来，对吧？”葛提那低沉的声音被一个秘密窃听器捕捉到了。“但如果我能有一年的时间打理而不受干扰。有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治理停当，让他们无法攻破，无法摧毁。即使我们死了，这也算是大功一件。”

“这留下来的将是遗产地狱。”在葛提继续幻想之前，那个同伴简短地插了一句。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吧，哈，因为它将是最好的。也许 30 年后它会衰败瓦解，但它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才会它妈的灭亡。”

在其总部伯金狩猎与捕鱼俱乐部（Bergin Hunt and Fish Club）的密室里，这个新登基的甘比诺家族教父没有后悔表露其野心勃勃的计划，他要原本已颇具威势的甘比诺家族打成一个强大的黑手党帝国。伯金俱乐部位于昆士区蓝领街区南欧森公园，十年来，这个临街的伯金俱乐部一直是葛提的指挥中心。在他那戒备森严的庇护所里，自信的葛提感觉足够安全，可以无所拘束地谈论其内心的想法。

4 英里之外有个整洁实用的办公室坐落在熙熙攘攘的昆士大道上，FBI 特工 J·布鲁斯·莫尔（J. Bruce Mouw），FBI 甘比诺小组主管，此时正坐在那里，约翰·葛提的形象如幽灵般缭绕在他的心头。一夜之间，爬到“科萨·诺斯特拉”最高层的葛提已上升到莫尔的优先名单的首位。这两个年龄相仿的人有着全然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这注定着他们将成为一对冤家。45 岁的葛提在喧闹的大城市长大，他粗暴、絮



1986年在葛提的昆士区老巢——伯金狩猎与捕鱼俱乐部门前，穿着奥克兰突击者队夹克衫的甘比诺家族新老板约翰·J·葛提（右）与打手“托尼李”安东尼·格里耶里在一起走谈。调查人员曾窃听到葛提在伯金俱乐部里的一段谈话，后者吹嘘要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黑手党犯罪家族。（FBI 监视照片）

聒、自负、嗜酒如命且无可救药地蔑视法律和政府，他甚至狂妄到希望某天通过战争来打败美国。42岁的莫尔继承了美国小城镇居民的优良品德，来自农业中心地区的他不苟言笑，办事干脆利落，是个事实上的禁酒主义者，还在冷战期间因主动请缨执行极危险任务成为一名功勋卓著的海军军官。

从成为甘比诺家族老板的那天起，葛提就把自己想像成一个神话般的黑手党领导者，将开创一个全新的“科萨·诺斯特拉”的黄金时代。几乎就在那同一天，莫尔就下定决心准备查清葛提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摧毁其犯罪王国。

葛提的洗礼名叫做小约翰·约瑟夫·葛提（John Joseph Gotti Jr）。1940年10月27日，他出生在南布朗克斯，在约翰和范妮·葛提的13个孩子（其中2个幼年即死去）中排行老五。他的双亲都是从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坐着统舱来到美国的移民的后代。他们养育着一大群子女，生活过得异常艰难，主要因为老葛提经常失去其建筑或工厂工人的工作。居无定所地辗转于一个个工人阶级社区让年轻的约瑟夫·葛提及其兄弟姐妹们尝尽了成长的苦恼。他难以忘记儿时的痛苦生活，在朋友面前常常埋怨懒惰的父亲无力抚养自己的孩子。他还说起自己曾穿着不成双的鞋子上学，还因为衣衫破旧而饱受人欺。这些小事教会了葛提去复仇。“我走进校园和他们干仗，”他骄傲地回忆道，“那就是别人尊重你的原因。第二天你看到他们时，他们会向你敬礼。我10

岁时就已经很野蛮了。”

在 12 岁的时候，葛提漂泊不定的父母最终在布鲁克林的东纽约区安顿下来，终于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些许安定。这个社区既有独栋或双拼别墅，也有公寓房和轻工业工厂。这里是年轻的黑帮分子火拼的战场，也是葛提展现其军事才能的完美地带。十几岁的他身材魁梧，出拳迅猛，组织了一个以附近两条交叉街道的名字命名的“富尔顿-洛克维好汉帮”。

在葛提的青少年时代，东纽约是“科萨·诺斯特拉”的乐土，非法的赌注经纪活动公开在临街的俱乐部和台球室里进行。葛提打群架的潜力和名声受到当地黑手党人和崇拜者的注意，而他也渴望为卡迈恩·法提科（Carmine Fatico）领导的黑手党行动队跑腿效力，当时法提科是甘比诺犯罪家族里一个听从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调遣的角头。到了他 14 岁的时候，葛提及其同伙们更加变本加厉。他们偷盗汽车、抢劫醉汉和犯些情节不甚严重的夜盗罪。有一次，他们企图从建筑工地偷盗设备，结果让他付出了惨重代价，当时一个便携式水泥搅拌机倒在他的左脚上，致使他的一个脚趾被切掉。这次受伤致使葛提总是很奇怪地颠着步子，当他快步行走时便如雀跃般地蹦跳起来。

尽管 IQ 高达 110，但葛提却是个用心不专的学生，其学校档案里处处都是其违抗师尊和殴打同学的批评之语。其正规的学校教育在他 16 岁时结束了，当时他谦和的父母允许他从富兰克林-莱恩高中辍学。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他在一家服装厂里谋到过一份并无出路的工作，做过司机助手和服装熨烫工。他真正的职业理想是做卡迈恩·法提科行动队里的执法打手。1957 年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被杀之后，这个行动队就成了重新命名的卡洛·甘比诺家族的一部分。

葛提喜欢法提科俱乐部的氛围。这里的人粗野且爱说些俏皮话，腰包里是大把的现金，出入代步的是豪华轿车，整天悠闲自在。和他的父亲不一样，他们在社区里受到别人极尽谄媚的尊重。在这个敏感的少年看来，那俱乐部是个门槛甚高、享有特权且受人敬畏的社团，它足以让年轻的葛提渴望着得其门而入。

警察局的一份关于法提科行动的情报报告将 17 岁的葛提列为地位低下的新手。在接下来的 8 年中，这个新成员的逮捕记录载明了他在纽约和长岛那段未引人注意的犯罪经历，那段从街头斗殴到吸食毒品、到持有枪支和到情节尚不严重的入室行窃的经历。这些轻罪都没有让他在县监狱的服刑时间超过 6 个月。在现存的代表着葛提早年越轨行为的几条记录当中，有一条记述了萨福克县警官爱德华·哈弗森（Edward Halverson）在 1965 年 3 月 31 日清晨无意间碰到他用铁棍撬门闯入长岛塞尔登的一家

酒馆。当葛提试图逃走时，哈弗森警告道：“呆着别动，否则我打爆你的头。”这个24岁的未来老板立刻站住。“不用担心，”葛提对那名警察说，“小心（扳机）手指。”

尽管没有可圈可点的犯罪记录，但在其十八九岁时被引荐给甘比诺家族二老板安吉洛·德拉科罗塞后，葛提就与黑手党的一个重量级人物建立了联系。那个位尊权重的黑手党人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年轻自信的暴徒。每次见面时，机敏狡猾的葛提都会恰到好处表达其景仰之情。

在葛提前9次记录在案的逮捕当中，有数次是和安吉洛·鲁吉埃诺（Angelo Ruggiero）一起被抓获，后者是他少年帮的骨干成员和法提科俱乐部的忠实伙伴。有点腔作势的鲁吉埃诺经常把德拉科罗塞称为“尼尔叔叔”，他很想让其他崇拜者误以为他是德拉科罗塞的侄子。因其肥硕的身材而被人称作“胖子安吉”的安吉洛向其他人暗示说，是他与二老板特殊关系才让葛提能够和甘比诺家族二号首脑相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通过葛提，安吉洛才获准与德拉科罗塞见面。

家庭生活也让葛提惹上了官司。经过一段分分合合的恋情之后，他在1962年3月与意志坚强的少女维多利亚·迪乔治奥（Victoria DiGeogio）结了婚。他22岁而她19岁。在他们结婚宣誓的一年以前，他的女儿安吉娜便降生了。维姬的父母——父亲是意裔美国人而母亲是俄罗斯血统——离婚了，其母再婚后她就随了继父的姓。约翰的数次被捕、第二个女儿的出生和经济问题让这个家庭备受困扰，他们头几年的婚姻生活充满着激烈的争吵，经历了多次分居之后，维姬把他拖进法庭指控他不履行抚养义务。

这个新婚的父亲正在躲避另一个麻烦——服兵役。1963年11月22日，就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杀的那天，他没有应征入伍，FBI便在两年后逮捕了他。“葛提声称，他已经结婚并要抚养两个孩子，他没有意识到不理睬征兵局是违法的，”FBI 1966年1月7日的一份备忘录写道，“他接着说，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他以前被逮捕过，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进入军队。”

最后，葛提的兵役和家庭问题都消失了。他因盗车和入室行窃而被捕与定罪的记录让他丧失了成为一名军人的资格，而通过参与更多的获利丰厚的犯罪——绑架、赌注经纪和放高利贷——让他在法提科行动队得到提拔，与维姬的争吵也随之平息。维姬的继父是个建筑承包商，他通过赠予钱款和帮助抵押让他们渡过了难关。这对重归于好的夫妻和他们那有着三子两女的大家庭变得富裕起来，他们告别了原来那局促狭窄的公寓，搬进了霍华德海滨（昆士区一个林木茂密、绿枝如伞的中产阶级社区）的舒适的新家。

霍华德海滨毗邻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离法提科行动队的新总部也不远。由于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人大量涌入东纽约，甘比诺的角头卡迈恩·法提科便将其总部迁到了南欧森公园，这里是白人和意大利人占主体的工人阶级社区。那个总部——讽刺性地——被注册成一个名为“伯金（Bergin）狩猎与捕鱼俱乐部”的非营利协会。尽管将“伯根”误写成“伯金”，但这个名字明显具有怀旧意味，因为这个帮派发家于东纽约伯根（Bergen）街。

将这个俱乐部迁到靠近肯尼迪机场的南欧森公园是法提科审时度势的高明决策。这个机场的货物和旅客流量日益增大，正在取代布鲁克林码头成为黑手党掠夺财富的重要目标。20世纪60年代，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空运货物中心，每年运费赢利超过2亿美元。其数千名雇员既是进行赌注经纪和高利贷开发的对象，也是进行犯罪牟利的内部信息泉源。

决意窃取机场的财富，约翰·葛提和弟弟吉恩及其少年密友安吉洛·鲁吉埃诺合伙犯下了一系列货物抢劫案。在抢劫过程中，鲁吉埃诺私下给葛提起了个“黑约翰”的绰号，这反映了他险恶阴暗的品格不输于他那黑黝黝的肤色。一个老黑手党人对葛提张狂无忌的个性印象深刻，就将这个年轻暴徒比作那不屈不挠的苏族印第安勇士，给他起了个更妙的绰号——“狂马”。

这个抢劫三人组的犯罪活动一向顺利，但好运在1986年走到了头，当时FBI为遏制机场日益攀升的盗窃活动展开了一次专项打击行动。特工们对货区进行了监视，随即发现葛提兄弟和鲁吉埃诺正将偷来的衣服装进一辆U-Haul卡车上。通过肯尼迪机场的逮捕和证人对嫌犯面部照片的辨认，FBI查明三人卷入了三起货物被盜案和两起抢劫案。时年28岁的约翰·葛提对其首个重罪指控供认不讳，随后被判处3年监禁，关押在防备措施最为严格的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他的弟弟吉恩和鲁吉埃诺也领受了同样的刑期。

在路易斯堡，葛提碰到了博南诺家族阴险的大腕卡迈恩·加兰特，后者因毒品犯罪正在服刑并在狱中充当着黑手党人的“监护者”。尽管还不是荣誉者，但葛提有胆量指责加兰特，称他只为自己和博南诺家族的9或者10个聪明汉和合伙人贿赂看守而搞到牛排、其他美食和酒。傲慢无礼的葛提要求这位“唐”字辈大佬和其他被监禁的黑手常人一起分享好处。葛提的大胆和沉着的自信给加兰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表示有兴趣让他进入自己的家族。据线人报告，加兰特说，“我想让他加入我的行动队。”但他后来失望地得知，约翰“已经投在尼尔（指安尼洛·德拉科罗塞）”门下。

被囚禁3年之后，葛提于1972年被保释，重获自由的他随即获得提拔。其行动队角头卡迈恩·法提科因放高利贷被起诉，作为保释的一个条件，他在等待判决期间不能与伯金狩猎与捕鱼俱乐部的成员接触。葛提回家后，在德拉科罗塞的推荐下，法提科任命他为充当其耳目的代理角头，直到他的官司问题获得解决。

感激涕零的葛提极端崇拜德拉科罗塞，在同伙跟前称赞他是“真正的男人”。肩宽体壮、说话斩钉截铁的尼尔·德拉科罗塞是个曾经为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效过力的杀手和角头。在至少一次谋杀当中，他因为戴着白色教士领扮成牧师并自称“蒂莫西·奥尼尔神父”而博得不少名气。德拉科罗塞是阿纳斯塔西亚坚定的支持者，但在策划谋杀了阿纳斯塔西亚并篡夺了家族控制权之后，擅耍政治手腕的卡洛·甘比诺把他选为二老板。

在卡洛教父的统治下，德拉科罗塞成了家族的街头总督。作为一个严格得近乎苛刻的训导者，他那令人胆怯的目光足以让角头和其他部属俯首恭行。有组织犯罪侦探拉尔夫·萨勒诺称，卡迈恩·加兰特和安尼洛·德拉科罗塞的目光阴冷，是唯一能令他脊背生寒的黑手党人。“看着德拉科罗塞的眼睛，你就能知道那目光是多么可怕，”萨勒诺说，“那是杀手的冷酷无情的目光。”

德拉科罗塞大多数时候都被人称作“尼尔”，那是他的一种美国化的意大利教名。由于他那粗犷的斯拉夫农民的相貌和方形的脸，甘比诺家族的成员在背后都称他为“波兰佬”，但没有人胆敢当着他的面提起这个绰号。

小意大利是德拉科罗塞的家园，桑树大街有间供出租的仓库经改造后被命名为“拉维尼特社交俱乐部”，那里是他处理家族事务的地方。没有窗户，正面用红砖墙加固的维尼特俱乐部像个仓促砌成的碉堡。很久以前它就是犯罪者们频繁出入的巢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开始成为传奇人物查理·洛克·卢切亚诺的聚会场所。附近居民与生俱来的多疑天性为德拉科罗塞提供了一道保护屏障。房客和店主们都是特殊的哨卫，让执法特工无法自如地监视德拉科罗塞及其俱乐部的访客。

因管理委员会暂时禁止吸收新打手，葛提没能成为荣誉者。但他1972年被指定为伯金行动队的代理角头，已表明他是一个希望之星。新的职位要求他经常替代德拉科罗塞到拉维尼特俱乐部开会讨论昆士帮派的活动，并向甘比诺家族管理层递交伯金行动队每周的不法收益分红。德拉科罗塞乐于扮演导师的角色，要用魅力征服他的新助手。两个人有着诸多的共同点：他们既是嗜赌成性的骰子与纸牌赌客，也是体育赌博的沉迷者；他们既是污言秽语的讲话人，也是顽固的直趋结果的施暴者。德拉科罗塞讲述过往日追随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黑手党的大刽子手和谋杀公司的创始人

——时经历的种种荣耀之事，而那些令人神往的故事深深地影响着葛提，使阿纳斯塔西亚成了他行为的楷模。

1973年初，当葛提为家族教父卡洛·甘比诺执行一个急迫任务时，他的机会到来了。卡迈恩的一个侄子被人绑架，尽管付了10万美元的赎金，但最终还是被撕票。甘比诺的情报网查明，不起眼的劫匪詹姆士·麦克布拉特尼（James McBratney）是绑架案的主谋。唐·卡洛·甘比诺决心复仇。

1973年3月22日，在斯塔腾岛的斯诺佩氏酒吧烤肉店里，三个假扮侦探的人与麦克布拉特尼搭上了腔。经过短暂的搏斗后，他们给了他致命的一击。这是一次并不完美的犯罪，证人从嫌犯相册上认出了其中两名假侦探——约翰·葛提和安吉洛·鲁吉埃诺。被警方追捕的葛提离开了维姬和五个孩子以躲避谋杀指控。一年后，其伯金行动队的一名线人向FBI告密，他随即在昆士区的酒吧里被逮捕。心存感激的卡洛·甘比诺高薪聘请了富有政治影响力的黑手党律师罗伊·柯恩为葛提和鲁吉埃诺辩护。麦克布拉特尼谋杀案的第三名嫌疑犯失踪了，据信他已被杀害以防成为检方证人。

尽管被告受到谋杀检控并得到证人的指认，但柯恩巧妙地与斯塔腾岛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达成了一份廉价协议。这个狡猾的律师说服当地检察官放弃谋杀指控，以换取葛提和鲁吉埃诺供认犯下最低可能性的谋杀未遂罪。柯恩还为两人争取到最高刑期4年的从轻判决。那位地方检察官从没有解释他为什么妥协，或者说为什么屈服于柯恩的哄诱。

在一座州监狱里，葛提一边靠举重锻炼身体，一边享受着特殊的优待来打发其第二个重罪刑期。为了接受一名私人医生的身体检查，看起来非常健康的他曾经从纽约北部的绿海港教养院到布鲁克林进行过三次120英里的往返旅行。州调查人员后来发现，在每次旅行当中，看守们都受到贿赂，让他得以绕道回到霍华德海滨的家并到一些酒店与黑手党同伙们见面。

他的教父卡洛·甘比诺1976年死去，当时葛提尚在狱中。按照正常的继承权，葛提相信二老板尼尔·德拉科罗塞会登上教父之位。但卡迈恩在临死前挑选他的妻弟亦即表弟保罗·卡斯特利亚诺为其继承人。德拉科罗塞获得的安慰奖是继续保留家族二号首长的位子，并控制该家族20多个行动队中的10个。

1977年被保释时，身高1.56米的葛提身体健壮、肩膀宽阔而结实，体重达90公斤。杀害麦克布拉特尼让他服刑2年，比起他早年的抢劫罪来，其谋杀罪的刑期反而更短。在绿海港教养院，他是狱中黑手党囚犯的无可争议的管理者。心怀感激的狱友们为他开了一个告别晚会，并赠给他一块匾，上书“赠给了了不起的人约翰·葛提。”

绿海港朋友敬上”。

重返他喜欢的生活圈子之后，葛提发现管理委员会为所有家族重新打开了黑手党成员名册，在其服刑期间充当伯金行动队守护者的弟弟吉恩已先他一步成了甘比诺家族的荣誉者。现在轮到约翰·葛提争取其荣誉者的身份了，由于谋杀绑架者麦克布拉特尼而立下汗马功劳，他没有遇到任何质疑之声。甘比诺家族老板卡斯特利亚诺主持了葛提的入会仪式，后者在仪式上宣誓效忠新教父大保罗和“科萨·诺斯特拉”。经德拉科罗塞批准，葛提被任命为正式角头，领导黑手党的伯金行动队。

回到家中，在他们那白色错层的套房里，葛提与维姬及五个孩子团聚了。他们那并不显山露水家与霍华德海滨其他人家相似，有个附联式的车库和一个小小的前院。显然已经知道了丈夫的真正职业并意识到他不信任陌生人，维姬自己包揽了所有家务清理的活儿。为了让忙于家务的她放松放松，葛提在每个房间都放了一台电视，这样她在整理房间时也可以看看肥皂剧。

由于需要有合法职业的证明来取得保释，葛提声称自己是一家管业公司的推销员。这家公司是其少年伙伴安东尼·格瑞诺（Anthony Gurino）所开，他向葛提提供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挂名职位。葛提并没有在昆士区四处推销管道，而是在伯金俱乐部的两个房间里挑出一间改成了自己的私人办公室，驱车离家后很快就能赶到那里。

为了获取情报，FBI 劫持小组不时地公开跟踪监视这个新角头。“那些日子，我们多半都不清楚其联系网络，”被指派监视他的特工斯蒂芬·莫里尔（Stephen Morrill）说道，“跟踪他们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是谁。”曾经有两次，葛提在餐馆里带着捉弄人的微笑让人将一瓶酒送给了莫里尔和另一名特工。每次，莫里尔都把酒送了回去。

莫里尔很快发现，这管道推销员不缺钱，而且还是个狂热的赌徒。在新泽西美度兰斯赛马场，站在葛提身后几步之遥的莫里尔看到他单场马赛就砸下了 8000 美金。怀疑这个黑手党人知道“内部消息”，这名特工在同一匹马上也押了“数目不菲的钱”，而这匹马最终几乎落到最后一名。

“你搞得我倾家荡产，约翰，”马赛结束时，莫里尔在看台上对葛提说，“你想从我身上搞到什么？”葛提反问道。“你知道我是个堕落的赌徒。”

尽管他会性情温和地逗弄特工，但葛提的暴力倾向和他那不容置疑的权威不久就显露了出来。在一个亲人遇难之后，他展现了自己那令人恐惧的残忍本性。1980 年 3 月，葛提的第 4 个孩子，12 岁的弗兰克，驾着一辆小型摩托车飞似地冲上公路，随即被邻居约翰·法瓦拉驾驶的一辆汽车撞死。这起死亡被裁定为意外事故，因为法瓦拉，其子女与葛提的孩子都是玩伴，没有受到起诉。当法瓦拉向葛提夫妇极力表示吊

慰之意时，维姬挥舞着一根棒球棍威胁他。当死亡威胁信塞进了他的信箱而“杀人犯”的油漆字被喷在其汽车上后，法瓦拉决定搬离这个地方。

1980年7月的一个夜晚，也就是在那个男孩死亡四个月之后，在长岛新海德公园卡斯特罗活动式家具店旁的停车场里，51岁的任家具店服务经理的法瓦拉下班后走向他的汽车。目击者看到有人用棍棒朝法瓦拉的头部猛击一下，随后在另一个袭击者的帮助下将受害者强行推进一辆厢式汽车里。此后，再没有人见过法瓦拉。据认为他已经被谋杀，其尸体被如何处理一直是黑手党的一个秘密。他的汽车据说已被销毁，如同要抹去葛提之子死亡事故的所有记忆一般。法瓦拉失踪时，约翰和维多利亚·葛提正在佛罗里达旅行。他们两人都坚称对这起事故一无所知。从一开始，调查人员就怀疑伯金行动队的成员为讨好复仇心切的葛提而杀死了那个不幸的邻居，而葛提前往佛罗里达旅行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

几十年来，每逢故去之子的生日，维姬和约翰·葛提都会在《纽约每日新闻》登出一篇“追思”文告。追思文写着：“亲爱的弗兰克，尽管你已经离去，但你离我们不会遥远。距离会把我们分开，但爱会让我们紧紧在一起。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爱你，妈妈和爸爸。”葛提几乎每周都会去探望儿子的坟墓。

葛提之子的惨死和安东尼·法瓦拉被残忍谋杀正好发生在FBI和州及市执法部门重新对黑手党管理委员会和纽约五大家族的头目们展开打击的时候。在昆士区以外的地方，葛提在“科萨·诺斯特拉”调查人员的目标清单中还算不上首要分子。作为甘比诺家族几十名中层角头中的一员，他不为媒体所知，在有关甘比诺家族敲诈活动的新闻报道中，他的名字从来没有被特别提到过。对他全天候地进行最密切监视的官员是雷默·弗朗西斯切尼，这位纽约警尉是当地警察局为数不多的黑手党专家。1977年，也就是葛提从州监狱里被保释出狱的那年，弗朗西斯切尼接受委任领导了昆士区地方检察官的侦探小组。作为新任负责人，弗朗西斯切尼关注的重点是黑手党对其管区造成的侵害。他不久就发现葛提在他的地盘里领导着一个实力最为强大的帮派。为了对日显尊贵的葛提表示敬意，其他黑手党人只用赞美性的绰号称呼他：“好汉强尼”或“漂亮兄弟”。葛提背后被人称为“黑约翰”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倘若那么嘲弄地称呼他，被抓住后日子肯定不好过。

通过线人和跟踪监视搞到的线索，弗朗西斯切尼很容易就得出了结论：葛提在伯金狩猎与捕鱼俱乐部里指挥着大量的赌博与高利贷活动。在附近，通过扶植弟弟理查德管理一个名为“我们的朋友社交俱乐部”的赌注经纪与赌博场所，葛提拓展了自己

的领地。（内部人都知道，“我们的朋友”指的是荣誉者。）

取得法庭的秘密指令后，当地的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于1981年在伯金俱乐部里暗中设置了一个窃听器并对两部电话进行了搭线窃听。让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技师们哑然失笑的是，他们发现那些节俭的黑手党人将一个投币式公用电话做了手脚，无需投币就可以随意打电话。更为重要的是，窃听揭开了葛提的人格个性。在他的兄弟吉恩和彼特及其犯罪老友安吉洛·鲁吉埃诺参加的行动队里，身为角头的葛提粗野而残暴。他经常被听见污言秽语地破口大骂，要求被人尊重和无条件地服从。在一次电话窃听过程中，他被录到痛骂打手安东尼·莫斯卡蒂诺（Anthony Moscatiello），因为后者没有回他的电话。

“听着，”葛提吼道，“我昨天给你家打了他妈的五次电话，现在如果你老婆觉得你狗娘养的了不起，或者她狗娘养的不得了，你他妈的不把我电话当回事，我就要把你还有你他妈的家给炸上天。”

尽管莫斯卡蒂诺不明白那“了不起”的确切含意，但他知道葛提恼怒的缘由，便怯声怯气地回道：“我绝对不敢不重视你吩咐的事情……”

葛提：“好，你打电话告诉你那混帐老婆，在我上他妈的车之前你就告诉她，我会到那儿去的，我得他妈的得教训她。”

莫斯卡蒂诺：“好的。”

葛提：“这他妈的不是开玩笑。我这三两天还不会找你的麻烦。我他妈的时间宝贵得很……你狗娘养的老实呆着别动，明天等着见我。”

莫斯卡蒂诺：“我明天整天都会待在那儿。”

葛提：“好，你明天待在那儿别走，不要觉得憋屈。不要让我再这么骂你，如果我听说其他人给你打电话而你5天内回了的话，我他妈的杀了你！”

弗朗西斯切尼的调查捣毁了小意大利一个与葛提行动队有牵连的巨额赌博窝点，这为突袭伯金俱乐部查找赌注经纪的证据提供了理由。在查抄俱乐部时被抓获的12个人当中，没有一人能出示驾照或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

但葛提与他最亲密的伯金密友都没有受到突然搜查和逮捕的影响。当弗朗西斯切尼告诉他说，其俱乐部设有窃听器而他的谈话可作为指控他的证据时，葛提表现得相当沉稳而镇静。弗朗西斯切尼回忆说，真正令葛提不安的是得知侦探们听到他无礼地侮辱卡斯特利亚诺并把德拉科罗塞称为他所忌讳的“波兰佬”。

“我对他说，‘尼尔不喜欢这样，’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显出懊悔的样子。”弗朗西斯切尼说。

然而地方检察官的调查对葛提的赌博和高利贷生意没有产生多少影响，电话窃听揭露的是些个人的癖好。通过窃听，侦探们得知葛提的弟弟吉恩和安吉洛·鲁吉埃诺在背后抱怨他造成了巨额的赌博损失。这个角头曾在一次双骰儿赌博中输掉了6万美元，他长期在其他家族的赌注经纪人那里下些烂注耗干了其行动队的利润。在1982年的全美美式足球超级杯决赛中，葛提连续输掉了9万美金。但吉恩和鲁吉埃诺都没有胆量面对面地劝说他戒掉赌博嗜好。

在FBI总部，80年代初的葛提还是个次要猎物。甘比诺小组决心摧毁黑手党的领导层，其主要精力集中在这个家族能干的领导者身上，即老板保罗·卡斯特利亚诺、二老板尼尔·德拉科罗塞和老顾问乔·N·加洛（与科洛博家族的加洛兄弟无关）。在中间阶层，有些角头在纽约市几个数百万美元产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和这些人相比，葛提就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了。比如说，控制了纽约私营垃圾清运（Garbage-carting）系统大部分业务的“吉米·布朗”詹姆士·费拉（James “Jimmy Brow” Failla）；服装中心的货运巨头，卡洛的儿子，汤米·甘比诺（Tommy Gambino）；与超市保持腐败联系的大毒品批发商帕斯夸里·帕齐·康特和在幕后操纵曼哈顿各个展览馆贸易展的丹尼·马里诺（Danny Marino）。

不过，葛提与德拉科罗塞的密切关系及其行动队的邪恶癖好还是值得关注，甘比诺小组正在寻找可以伺机突破的薄弱节点。窃听葛提的住宅电话这一计划被否定了，因为他从不在家里与黑手党人见面，他家的电话记录显示他只打给“平民百姓”，也就是非黑手党成员的朋友和亲戚。1981年底，FBI没有直接监视葛提，而是取得法庭指令后窃听其副手安吉洛·鲁吉埃诺的住宅电话。这是当时诸多电子入侵行动中的一次，意在渗入纽约犯罪家族来获取证据和情报。尽管对鲁吉埃诺展开了窃听，但特工们估计从他身上难以取得具有重要价值的线索。胖子安吉主要为葛提从事赌博和高利贷活动，在特工们看来，这个经常吹嘘与黑手党首领有着子虚乌有的关系的家伙只是个旧式的暴力型罪犯而已。然而，监视鲁吉埃诺将在无意中招来一连串对整个甘比诺家族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鲁吉埃诺身上是甘比诺小组新领导人——特工主管布鲁斯·莫尔的好主意。

第 33 章 “嘎嘎—嘎嘎”

我们明天得干一票。有两个人将被杀掉。这是一次重要的袭击行动，必须得干净利索。

如果 FBI 需要一个原型特工作为广告形象代理人的话，布鲁斯·莫尔（Bruce Mouw（与 Wow 押韵）无疑是个标准人选。年近 40 岁的莫尔身高 1.9 米，身材修长，下巴方而阔，酷似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或加里·库柏（Gary Cooper）扮演的英勇果敢的银幕执法者形象。他的祖辈都是地道的中美洲人，他出生在其荷兰裔祖父母在爱荷华州开垦定居的一个农场里，有着勤于工作和忠于国旗与国家的优良品格。约翰·布鲁斯·莫尔（他喜欢别人称他为莫尔，以便和教名同为约翰的父亲区分开来）的生活成长条件并不优越。他 6 岁那年，生活的困境迫使莫尔的父母带着三个孩子离开农场，来到附近的集镇奥林奇市（人口 2700 人）。他的父亲在那里找到了工作，而他的母亲则成了一名图书馆管理员。

14 岁时，莫尔找到了两份在课外与周末兼职的工作：在周报《苏族县资源报》做印刷徒工或普通助手和在祖母的旅馆“山村酒家”做夜招待。莫尔一边读高中一边每周工作 35 个小时，后来发现待在旅馆的一个小房间里也便于学习。受母亲的鼓励，他成了一个如饥似渴的读书虫。尽管最近的水域是 10 英里之外的一个小湖泊，但他还是深深地被航海的故事所吸引。梦想着成为一名海军军官，加上有着优秀的学习成绩和极高的智商，他报考了马里兰州安纳波第斯市的海军军官学校。尽管被录取的机会不大，但这个少年知道，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安纳波第斯的奖学金、定期的生活津贴和全供给的食宿是他接受大学教育的唯一希望。

他的希望几近破灭，因为当地的国会议员当时推荐了另一个投考者，而此人恰好是他邻居家的儿子。然而，那位国会议员的推荐者未能通过眼科检查，作为第一候选

人，约翰·布鲁斯·莫尔取得了海军军官学校的入学资格。17岁的莫尔身材削瘦，相对于他的身高，其69公斤体重仅仅达到最低标准，险些未能通过身体检查。即将从安纳波第斯毕业时，莫尔不得不决定到海军的哪个部门去服役。他的选择有限，因为作为军校学员在水面舰船上进行训练时他曾经猛烈地晕过船，被授予海军少尉军衔的他最终选择了核动力潜艇。对这个容易头晕恶心的21岁军官来说，这些大多数时间都潜航在大洋深处的潜艇平稳地像正在飞行的客机。

在冷战和越战的高潮时期，1966年莫尔作为领航员被派往新服役的“拉普号”（Lapon）（以太平洋里一种特有的岩鱼命名）核攻击潜艇。“拉普号”大部分时间都在近乎战时的状态下活动，其主要任务是追踪并在必要的情况下摧毁苏联潜艇，而这些潜艇都装备有能彻底毁灭美国城市的热核导弹。其他的秘密巡逻任务则在苏联的战略海军基地摩尔曼斯克沿岸水域的巴伦支海进行。莫尔在“拉普号”上服役期间，因获取了苏联一艘先进核打击潜艇的情报资料，他们全体艇员1969年被罕见地授予“总统集体嘉奖令”，该潜艇曾近距离跟踪苏联一艘威力强大的潜艇达40天。

“我喜欢这种任务，这是了不起而且令人兴奋的工作，玩的是‘瞎子摸人’的游戏。”莫尔后来说。但在4年令人精疲力竭的役期里，那紧张的每每长达70天的水下任务对于他来说已经足够了。有经验的潜艇军官比较匮乏，这意味着莫尔将来很有可能一辈子担任他并不喜欢的工程技术职务，于是他在1970年以海军上尉军衔从海军退役。“我不知道我想做些什么，但我不再想做海军职业军官了。”他向朋友们说道。

回到爱荷华的家中，他一直干着单调乏味的建筑工作。后来，一个仔细调查过新退役军官服役记录的FBI招募人员看上了莫尔。听了那名招募人员加油打气的话之后，莫尔突然决定要做个听起来很神气的特工。1971年8月，27岁的他加入了FBI。当时约翰·埃德加·胡佛仍在主持工作，莫尔的第一个工作地是圣路易斯。他在那里开始从事一年多的局长最关注的调查工作——找回被盗车辆、逮捕银行盗贼和汽车劫匪。1973年12月，他被调到纽约应该是一次有利于个人发展的提拔，但背景文化上的冲击让这次升迁显得不那么完美。这个来自爱荷华州大平原的特工对住在狭小的公寓里感到局促，凌乱而嘈杂的城市环境也让他透不过气来。忙碌地工作了一天之后，要在大城市里身心放松地休息很困难。打打高尔夫球或进行其他户外运动的机会很少，要驱车到乡下去也不大可能，因为要在曼哈顿拥有一辆汽车，其代价是普通人所承受不了的。“我对纽约可不着迷。”他承认道。

另一个让他感到失望的是FBI内部的主流风气，这一点即使在胡佛1972年死后也没有多少改观。“我们有一些非常杰出、非常有能力的特工，但碰到调查复杂的刑

事案件，我们就处在‘黑暗时代’。胡佛的灵魂依然存在，数字总是第一，宁要 35 件无甚意义的案子而不愿调查一两件有价值的要案。”

由于在海军里具有工程技术背景，他被重新分配到华盛顿，成了一名拴在办公室里的协调员，整天与承建 FBI 总部，即约翰·埃德加·胡佛大楼的承包商打交道。1979 年，他在华盛顿已经工作了将近 5 年，最后几个月才在有组织犯罪部门“干些实际工作”，当时在新任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法官的领导下，经过重新整顿的 FBI 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黑手党身上。当年年底，莫尔得到了如回到纽约就可获得提拔的许诺。“我希望得到主管的职位，但我不想回到纽约。见鬼，真的不想！”强忍着挫折感的莫尔接受了再次分配，条件是他将掌管新成立的甘比诺小组，那是根据吉姆·科斯勒的重组计划创建并于 1980 年开始运作的以打击纽约主要犯罪家族为目的的五个小组之一。“你肯定知道我的目标是甘比诺家族，”莫尔对科斯勒说，“那是最大的家族，最具有挑战性，而且几乎毫发未损。”

担任了在 FBI 内部被称为 C-16 的新小组的主管之后，莫尔发现档案柜里与甘比诺家族有关的情报几乎完全空白。仅存的主要是差不多 20 年前，即 60 年代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催促胡佛运用电话窃听装置、窃听器和其他调查工具获取的已经过时的情报资料。70 年代的情报信息变得枯竭起来，当时胡佛已经不再重视黑手党调查。在纽约分局，正在接受调查的案件没有一个是针对甘比诺家族领导成员或角头的。“确切地讲，我们是从零开始。”嘴里叼着烟斗的莫尔告诉他那新组建的小组，“我们面对的是那些在同一个有着 50 年历史的组织里摔打过的家伙，他们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

意识到得花一两年的时间搜集甘比诺家族领导者的基本情报资料，莫尔指派其手下特工每人各自盯住一个该家族的领导层成员。这个小组最多时只有 15 名特工，而它面对的却是一个约有 400 名荣誉者和数千名合伙人的黑帮组织。另一个难题是 FBI 缺乏有经验的黑手党调查人员。莫尔很快意识到其小组里有几名特工并不适合调查黑手党案件。“这些调查得花几年的时间来进行，对于有组织犯罪特工来说，最重要的优点之一是耐心。有些特工在思想上认识不足，他们想的是警察与小偷的那些事，想的是破门而入然后迅速抓捕目标。”

对其小组的现状进行考查权衡之后，他赶走了那些在那雷哥公园的办公室里坐等情报突然出现的人，并开始招募勤奋的特工。这些人对他的口号“不要屁股坐在办公室里发展线人或办案”有着充分的认识。他的重要命令都强调了腿功和监视。特工们不得不走上街头，摸清黑手党人的巢穴及其周边地理环境，查证黑手党大佬的住所，

弄清他们驾驶什么汽车、从事什么活动，在何地与何人见面。

单身的莫尔身边没有朋友或亲人，他总是加班加点地工作，并且希望手下人也能如此。赶走那些不卖力的懒惰特工对剩下的人是一种鞭策，留下来的人都钦佩他的工作热情，亲切地给他起绰号为“莫尔主席”。

依靠这调查机构最基本的单位，莫尔强调要把查访老线人和发展新线人作为获取成效的最可靠的办法。“你们在拿钱让线人开口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他承诺说，“这些人都在冒着生命的危险。那些情报都非常珍贵，它省却了我们的人力和时间，并告诉我们需在什么地方安装窃听器。”和他本人一样，小组里的大多数特工都不是纽约本地人，对这个城市意裔美国人的文化及其社区的风俗习惯都不甚了解。莫尔相信，只有纽约本地特工才最适合调查“科萨·诺斯特拉”案件的说法是荒诞的。“如果一个‘聪明汉’被困在刑案当中，或者对自己的老板怀恨在心，不管你出身何地，他都会向你开口。”他向小组的新手们训导说。

C-16 特工们践行了莫尔之言，他们开始在甘比诺家族内部寻找线人，并培养他们搜集有价值的线索让小组着手要案调查。两年过去了，所有调查该家族大腕级人物的工作都未取得突破，但在甘比诺家族的分支组织——约翰·葛提的行动队那里，莫尔的耐心战术得到了回报。伯金俱乐部的几名低级合伙人（非荣誉者）定期向特工们提供葛提及其行动队的活动情报。葛提远不是 FBI 最重要的黑手党猎物，但让他获刑并摧毁其行动队也是值得完成的任务。

按照 FBI 的常规安全程序，甘比诺小组在伯金俱乐部里的线人不知道其行动队里还有其他秘密为 FBI 工作的告密者。通过分析他们各自的报告，莫尔得出结论，认为葛提核心圈子里最易攻破的人是安吉洛·鲁吉埃诺。据提供情报的线人称，胖子安吉充当着葛提的执行官这一角色，负责审查行动队的高利贷与赌博账目，确保葛提得到最大份额的不法收益。鲁吉埃诺之所以看起来容易攻破，原因是线人都反映他是个无可救药的碎嘴皮子。因为其喋喋不休的闲聊嗜好，伯金行动队的成员在背后都贬损地称他为“嘎嘎”（Quack Quack）。有个线人提到，自负的鲁吉埃诺吹嘘说，他已经找到了一种规避电话窃听的非常安全的方法：谈论黑手党事务时，他就用一部以女儿名字开户的粉色公主电话机，而且用的是单独的电话线。

线人指称鲁吉埃诺涉嫌犯罪，1981 年 11 月甘比诺小组据此取得法庭指令，开始对其霍华德海滨（即葛提居住的那个社区）的住宅电话——包括他女儿的那部公主型电话——进行监听。开始时，窃听未能发现罪证或强有力的线索，而当鲁吉埃诺搬到长岛锡达赫斯特的时候，窃听器更是一无所获。FBI 技术人员不得不取得另一项法庭

指令窃听新的电话。这次，FBI 特工溜进鲁吉埃诺的新家并在一间小餐厅里安装了窃听器，据线人密报，鲁吉埃诺喜欢在那个餐厅里和其他黑手党人见面。这餐厅里的窃听器和鲁吉埃诺那喋喋不休的谈话将出乎意料地毁灭甘比诺家族的统帅部。

第一个因鲁吉埃诺的闲谈而招祸的黑手党人是教父保罗·卡斯特利亚诺。每隔一个周日，鲁吉埃诺都会冒险前往卡斯特利亚诺位于斯塔腾岛的家，等他一回到锡达赫斯特，“嘎嘎”就会给葛提和伯金俱乐部的黑手党人打电话，重述他与大保罗的谈话，并讲述自己听到的卡斯特利亚诺与其他聪明汉讨论的事情。让特工异常兴奋的电话录音是，鲁吉埃诺泄露了一些必须由管理委员会来解决的黑手党争端。对 FBI 和检察官们来说，他那强迫症似的闲聊是极珍贵的礼物，这为他们在其头号目标卡斯特利亚诺的家里安装窃听器和进行电话窃听提供了“合理根据”。作为呈给政府的另一份赠物，鲁吉埃诺吐露了足够的表明尼尔·德拉科罗塞有罪的信息，这同样为取得法庭指令对那二老板位于斯塔腾岛的家进行窃听提供了合理依据。通过鲁吉埃诺家餐厅里那个取得累累硕果的窃听器，甘比诺家族两大首脑人物首次受到秘密的电子监视。最终，窃听器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证明卡斯特利亚诺和德拉科罗塞卷入了轰动一时的管理委员会案和其他罪行。

胖子安吉也无意间将 FBI 的视野扩大到约翰·葛提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习性上。在大多数将近正午的时候，作为葛提的贴身男仆，鲁吉埃诺的任务之一是按时打电话叫醒他。葛提的夜猫子聚会，或者是纸牌和骰子赌博，很少会在凌晨 4 或 5 点前结束。因而这种电话也逐渐形成了固定模式。

“嗨，约翰，现在 11 时 30 分了。你得起床了。你怎么样？”“很好，安吉，很好。”接着便是清喉咙的咳嗽声、咕哝声和呵欠声。

轻轻地唤醒他的角头后，鲁吉埃诺就会提醒他当天需要优先处理的事情。“约翰，2 点左右我们得办这件事，记得吗？”

15 或 20 分钟后，鲁吉埃诺通常会再打个电话。“你要杯咖啡吗？”

“好的，好的，安吉。来吧，好的。”于是葛提的一天便开始了。

鲁吉埃诺的危机时刻和 FBI 窃听者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在 1982 年春天出现了。3 月 6 日，安吉洛的兄弟塞尔瓦托在佐治亚州外海死于私人喷气式飞机空难。塞尔瓦托是个大毒枭，已经逃亡多年，他的突然死亡暴露了安吉洛与毒品贸易有牵连的秘密。从锡达赫斯特那间餐厅里窃听到的谈话和其间不时蹦出的意大利词语 *babania*（黑手党称呼海洛因的暗语），特工们整理出了证据，证明安吉洛已经继承了其兄弟的毒品网络。餐厅谈话还暗示，约翰的弟弟吉恩·葛提、伯金俱乐部的其他几名成员和一名合

伙律师得到了塞尔瓦托隐藏的海洛因存货，并在最近一次的毒品交易中获得了 250 万美元的利润。

怀疑自己已经被特工跟踪，鲁吉埃诺向纽约市一名退休侦探求助，要他帮忙检查家里是否安装有窃听器和被电话窃听。得到线人的警报后，在鲁吉埃诺的家被彻底检查的当天，FBI 抢先将隐藏的麦克风关闭掉了。这名前侦探告诉鲁吉埃诺一个“好消息”——他不必担心遭窃听器窃听，但还有一个“坏消息”——他的电话被监听了。相信自己安全无虞且家中并无电子窃听器后，鲁吉埃诺就避免打那危险的电话，但更加随意地在他那被监听的餐厅里和其他黑手党人谈论毒品，而这无意中又帮了 FBI 的大忙。

莫尔的特工把那个为黑手党清查窃听装置的前侦探盘问了一通。他们警告他再为聪明汉搞“清理工作”将后果不妙。那人害怕了，一再发誓称，他没有暴露 FBI 在鲁吉埃诺家中安装的任何窃听器，但为了证明他收取 1000 美元的费用是合理的，就向他谎称发现一部电话被窃听。

在 FBI 与黑手党的战争中，线人在为双方效力。通过一条泄露给黑手党的消息，鲁吉埃诺几个月之后得知他家里事实上装有麦克风。这条消息间接地传到他那里。吉诺维斯家族打手“弗里兹”费德里科·乔凡内利（Federico “Fritz” Giovanelli）神秘地得到 FBI 的一份法庭宣誓书的原件副本，并将它交给了鲁吉埃诺。这份宣誓书与 FBI 申请授权实施《第三章》所规定的窃听有关。后来的间接证据指向了 FBI 雇用的一名女速记员，是她将那份秘密文件交给了乔凡内利。鲁吉埃诺对他家遭到窃听的可怕消息震怒不已，他开始口出狂言地威胁在宣誓书上签字的特工唐纳德·麦考密克（Donald McCormick）。

鲁吉埃诺那暴跳如雷的恐吓让布鲁斯·莫尔和约翰·葛提首次有了面对面的交锋。1983 年的一个上午，在 10 点整的时候，莫尔和麦考密克出现在葛提霍华德海滨的家门前，指示他的妻子将其唤醒。

“我们和你的行动队有过节了，”莫尔挖苦地向穿着睡衣拖鞋、打着呵欠的葛提说，“你的一个家伙在漫骂我的特工唐·麦考密克。你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告诉安吉洛闭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还是非常感谢，特工们。”葛提回道。这两个对手的短暂冲突随即结束。

数天后，一名线人向莫尔的特工报告说，怒气冲冲的安尼洛·德拉科罗塞赶到伯金俱乐部，将辱骂唐·麦考密克并把 FBI 招到葛提家去的鲁吉埃诺臭骂了一通。甘比

诺家族最高首领大保罗·卡斯特利亚诺有个更为可怕的理由为鲁吉埃诺的行为感到忧心。1983年8月，胖子安吉、吉恩·葛提和伯金行动队的三名同伙被联邦有组织犯罪特遣队以贩毒罪起诉。此次检控与塞尔瓦托·鲁吉埃诺之死有关，而证据来自安吉洛的闲聊和其餐厅里的会谈。

到了1985年，严重的法律麻烦突然缠上了卡斯特利亚诺和甘比诺家族领导阶层的其他成员——鲁吉埃基家的窃听器是部分原因，而卡斯特利亚诺与德拉科罗塞集团之间日益深化的矛盾也是一部分原因。经过联邦、州和当地执法机构数年的调查，大陪审团正准备提起一轮RCIO控告：卡斯特利亚诺和德拉科罗塞卷入管理委员会案；卡斯特利亚诺与甘比诺家族名贵轿车盗窃团伙有牵连；德拉科罗塞与约翰·葛提在另案中涉嫌参入赌博和高利贷活动。

告密者提供的线索让莫尔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印象，那就是甘比诺家族对立阵营之间的敌意正在增加。1983年，这种看法得到较为明确的证实。通过布鲁克林斯道达饭店的窃听器，特工们听到科洛博家族代理老板格里·朗格拉和角头多米尼克·唐尼·沙克斯·蒙特马拉诺在与安吉洛·鲁吉埃诺一起用餐时谈论起甘比诺家族的内部摩擦。愤怒的鲁吉埃诺称卡斯特利亚诺禁止其打手与德拉科罗塞发生任何关系，还说，“我想他是准备干掉尼尔。”朗格拉和蒙特马拉诺插嘴说，他们相信卡斯特利亚诺还打算杀掉“约翰尼”（指葛提）。

不顾“科萨·诺斯特拉”那传承已久的不得在其他家族成员面前批评老板的戒律，鲁吉埃诺毫不忌讳地攻击卡斯特利亚诺，称他“恶意诽谤自己的家族”。这番话引起了朗格拉的共鸣，他讲起了最近与德拉科罗塞的见面的情况。“我想我对尼尔说过，我知道这个婊子养的（卡斯特利亚诺）在恶意中伤你。有些事情我得提醒你，他不会善罢甘休，有人准备……”朗格拉没有讲完这句话，但特工们分明知道，他在暗示卡斯特利亚诺正在煽动自己家族内部的势不两立的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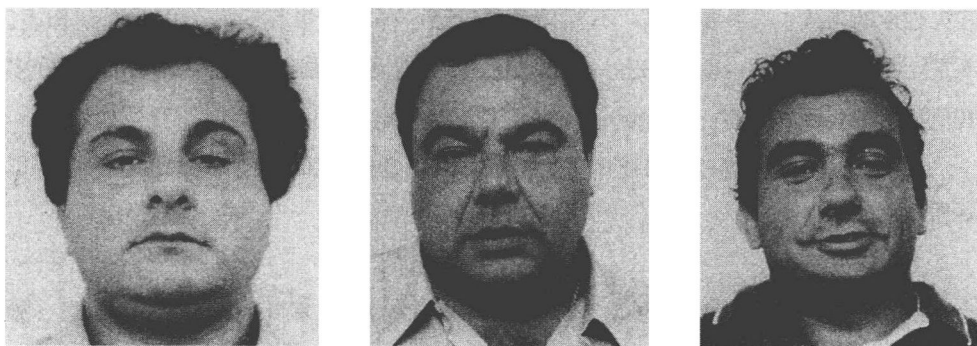
在多嘴多舌的餐厅闲聊和电话交谈中，鲁吉埃诺处处流露了对卡斯特利亚诺那专横态度的蔑视，嘲讽地称他是“吃奶的家伙”和“同性恋”。他还贬损地把卡斯特利亚诺那经营“戴尔养鸡场”的儿子称为“鸡巴人”。特工们热切地听到鲁吉埃诺用沙哑的声音指责百万富翁卡斯特利亚诺虚伪地以死刑相逼，禁止低级成员从事毒品交易，而他本人却收受家族角头们的大量现金，尽管他知道这些人都是海洛因经销商。胖子安吉及其贩毒同伙相信，大保罗在80年代初曾对博南诺家族内战的胜利方进行过资助。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伯金俱乐部的黑手党人推测其家族老板从博南诺家族的毒品生意中取得过秘密酬金。他们抱怨说，难道给予他的权利就是否决他们获得同等

的机会吗？葛提的行动队越来越认同纽约黑手党内部形成的一致看法：反对靠毒品牟利的禁令被更多的人所打破而非遵从，即使立此规矩的人也是如此。

通过伯金俱乐部的线人和鲁吉埃诺的电话，特工们发现，行动队厉行纪律的领导人葛提特别惧怕卡斯特利亚诺。当大保罗专横地要葛提赶到他家时，告密者们称，那个平时残忍狂暴的角头哆嗦地像片秋天的树叶。“他为什么要见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每当卡斯特利亚诺传他参加必须到场的会议时，特工们就听到他在电话里向鲁吉埃诺呻吟似地说道。线人们称，他害怕去那里，他完全知道卡斯特利亚诺掌握着家族的一支冷血杀手队，并能够召来残暴成性的爱尔兰黑帮“西高地”来杀掉他。这些FBI的间谍还注意到，葛提为卡斯特利亚诺惹上官司并可能被判刑和遭终身监禁而“幸灾乐祸”。

不过，对于因涉毒而被捕的鲁吉埃诺和吉恩·葛提，还有正等待自己的刑事判决的卡斯特利亚诺并没有表现出愤怒。如果指控属实，这将证明两名打手都违反了其反毒禁令——意味着犯下了死罪。这桩案子的核心证据是鲁吉埃诺在餐厅里被窃听的谈话，而卡斯特利亚诺对胖子安吉在窃听录音中反复辱骂他极为愤怒。当这些证据作为发现材料被交给鲁吉埃诺的律师时，卡斯特利亚诺便索要录音带和抄本想亲自探个究竟。按照大保罗的规定，作为伯金行动队的角头，葛提要为其行动队成员的恶行负责。实际上，毒品指控和揭露性的录音带给了卡斯特利亚诺一个机会来削弱葛提并肢解那个最强大的亲德拉科罗塞的行动队。

拒绝让卡斯特利亚诺接触录音带的鲁吉埃诺请求德拉科罗塞出面干预。鲁吉埃诺的说法有些掩人耳目，他被偷听到的只与尽力理清其亡兄财务问题的事情有关，他从



葛提的弟弟吉恩·葛提（左），他主要根据FBI窃听“胖子安吉”安吉洛·鲁吉埃诺（中）的住宅获取的证据以毒品走私罪被判刑。甘比诺家族的打手与执法人约翰·卡内基利亚（右）曾被葛提选入暗杀小组伏击保罗·卡斯特利亚诺。（联邦调查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来就没有卷入任何毒品交易。他不将录音交给卡斯特利亚诺的脆弱理由是，他最好不要让家人听到与鲁吉埃诺兄弟有关的令人尴尬的私人问题并保护其黑手党朋友。

这个理由难以令人信服，1985年春天卡斯特利亚诺为录音带之事持续向德拉科罗塞施压。与癌症做斗争并接受化疗的德拉科罗塞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其斯塔腾岛的家中。6月8日，这个病重的二老板在卧室里与葛提及鲁吉埃诺讨论了这个问题，FBI特工秘密安装的窃听器捕捉到了他们的谈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窃听的授权证据是由鲁吉埃诺那餐厅里的窃听器提供的。

“有些事情我得告诉你们，”鲁吉埃诺争辩说，“如果你们俩不为我考虑，不为我的后半辈子考虑，我就不把录音带交给他们……我不能。我不能。我的一些，一些好朋友都在那该死的录音带上。”

葛提开导鲁吉埃诺，称他有义务遵守卡斯特利亚诺和黑手党的规定，并对他因谈论神圣的管理委员会而被录音提出警告。“安吉洛，‘科萨·诺斯特拉’意味着什么？‘科萨·诺斯特拉’意味着，老板就是你的老板。你明白？忘掉所有这些没用的东西吧。”

病情恶化的德拉科罗塞称，他在录音带问题上已经拖延了几个月摊牌，希望卡斯特利亚诺会慢慢平静下来。

“我一直想尽力让你免受录音带之祸，”他告诉鲁吉埃诺，“但伟大的主啊，我不能阻止那个家伙总是拿这个问题说事。除非我对那个家伙说，‘嗨，为什么不干你自己呢，别他妈的总是提录音带。’那么你们，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后面得干什么了，我们得卷起袖子准备开战。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你所希望的。”

把话说白了的德拉科罗塞警告说，继续拒绝卡斯特利亚诺的要求会引发甘比诺家族灾难性的内战。“不要忘了，不要只考虑自己……有很多其他兄弟也会受到伤害。不是，并不是只有你会受到伤害。我也会受到伤害。他（葛提）也会受到伤害。许多其他兄弟都会受到伤害。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就因为你不把录音带交给他。”

这次会谈无果而终，鲁吉埃诺坚决拒绝交出录音带。那些录音抄本也从来没有被卡斯特利亚诺搞到。

这是1985年12月16日星期一的晚上，约150名法官官员、FBI特工、探员、检察官、律师和教授齐聚格林威治村的纽约大学法学院参加讨论会。当天晚上的主讲人是圣母玛利亚大学教授罗伯特·布莱克，即《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案》的原创者。他的题目，很自然地，是“RICO与有组织犯罪”。这群人处于一种度假的状态之

中，一边啜饮着餐前开胃饮料一边懒散地聊着天。正当布莱克准备开讲时，整个会堂里纷纷响起了移动寻呼机的响声，接着大半听众都挤着涌出了会场。特工、侦探、检察官、联邦和地方官员都听到一个相同的令人震惊的消息：大保罗被杀了。“我一瞬间就失去了大半听众，”布莱克说，“留下的那些人则开玩笑地说我到纽约策划了一场暗杀。”

在对这起谋杀展开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像布鲁斯·莫尔这样经验丰富且对甘比诺家族的内部动乱早有耳闻的黑手党检察官和调查人员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约翰·葛提是最有可能从谋杀保罗·卡斯特利亚诺及其铁杆追随者汤米·比洛蒂中获利的黑手党人。

以前，约翰·葛提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黑手党人。两名受害者的被杀突然让他成了媒体热议的对象，纽约各大报《纽约时报》、《纽约每日新闻》和《纽约邮报》纷纷以头版对他进行了大幅报道。通过推测谁是刺杀案的幕后黑手，检察官、特工和侦探们一夜之间将霍华德海滨的这个角头变成了全国瞩目的中心。在曼哈顿中城区残杀一个位高权重的教父是自28年前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在理发店遇刺以来最引起轰动的黑社会仇杀事件。阿纳斯塔西亚被杀时是后来以卡洛·甘比诺之名重新命名的“科萨·诺斯特拉”家族的老板，他的背信弃义终于招来了杀身之祸。阿纳斯塔西亚于1957年毙命，当时有个名叫约翰·葛提的少年正在布鲁克林的贫民窟里开始其“科萨·诺斯特拉”的启蒙期。

联邦和地方当局对葛提卷入卡斯特利亚诺谋杀案的推测之言并不是法庭所采信的证据。半个世纪以来，“乌默它”戒律让黑手党谋杀案无从靠法庭审讯和定罪来告破。在个别情况下，通过像亚伯·雷勒斯这样的人或许能找到解决办法，他是一名告密者，曾帮助执法部门将路易斯·利普克·布加尔特和谋杀公司其他成员定罪。没有告密者，大多数黑手党凶杀案件都会成为无头悬案。莫尔的甘比诺小组将花6年时间找到一个能解密大保罗·卡斯特利亚诺赶赴死亡宴会的谋杀参与者。

除掉保罗·卡斯特利亚诺的阴谋是在80年代中期尼尔·德拉科罗塞病人膏肓时策划出来的，其主要谋划者是约翰·葛提。葛提知道一旦其保护人德拉科罗塞离去，卡斯特利亚诺即使不杀了他也会降他的职。未经管理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秘密授权就谋杀一个“科萨·诺斯特拉”教父无疑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莽撞之举。它违反了洛克·卢西亚诺在五大家族成立时发布的黑手党头条戒律和金箴（无正当理由和未经管理委员会成员批准不得杀害老板）。

1985年以前，葛提的成功依靠的是暴力和一批冷酷而忠心的抢劫犯、高利贷者、

赌客和机器杀手。在策动叛乱的过程中，他展现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才能，堪称黑手党的谋略家和外交家。

从一开始，葛提的三个兄弟，特别是跟随他最紧的吉恩，被排除在这场阴谋之外。黑手党有条警语不鼓励兄弟参加同一个危险的任务，这样一旦灾难降临，至少有一个能活下来照顾他们的亲人。

葛提的第一个阴谋举措是派遣安吉洛·鲁吉亚诺以特使身份探听卡斯特利亚诺阵营里那些潜在背叛者的口风。胖子安吉和“公牛萨米”塞尔瓦托·格拉瓦诺，一个野心勃勃的与葛提和鲁吉埃诺同辈份的黑手党人，进行了一次直言不讳的谈话，目的是试探水深水浅。葛提准确地估计出资深杀手和大捞钱人格拉瓦诺已经不再迷信卡斯特利亚诺。尽管只是布鲁克林一支行动队的打手，但由于与卡斯特利亚诺阵营的当红角头弗兰克·德西科关系密切，格拉瓦诺加速了葛提谋杀计划的实施。格拉瓦诺可以被利用去接近德西科，后者或许愿意行些方便，因为他对德拉科罗塞态度友好，而且还是尼尔的敬慕者，具有坚韧、老派的黑手党风格。

这种迂回策略奏效了。结果证明德西科和格拉瓦诺对卡斯特利亚诺早已心怀不满，因为他索取不法收益的份额越大越大，损害了他们和普通打手的利益。两人对卡斯特利亚诺与吉诺维斯家族在建筑行业结成敲诈同盟感到沮丧，这种合作令他个人暴富起来，却剥夺了甘比诺家族其他成员的不法利润。还有一种更严重的不满情绪，大保罗曾经因一起经济纠纷而准许吉诺维斯犯罪家族在康涅狄格州杀掉甘比诺家族的一名角头，这件事让这两个黑手党人相信他背叛并且侮辱了自己的家族。“他在出卖家族。”格拉瓦诺向德西科倾诉说。

德西科和格拉瓦诺担心大保罗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分化并损害了整个家族。萨米用一段轶闻道出了卡斯特利亚诺对他所信赖的二老板尼尔·德拉科罗塞那不加掩饰的敌意。就在前一年，即1984年，格拉瓦诺来到卡斯特利亚诺的家里朝贡。他当时曾提到要去小意大利的拉维尼特俱乐部去拜望德拉科塞。“他直盯着我，好象我长了五个脑袋。‘你到那里干什么？你在我这边。’”卡斯特利亚诺斥责他说。“什么这边那边？”格拉瓦诺回道，“我想我们都属于一个家族。尼尔是我们的二老板。”

德西科还有一个因流言而起的个人烦恼。他听说卡斯特利亚诺已经决定，如果他被监禁的话，他将指定汤米·比洛蒂作他街头的代理老板。这个决定激怒了德西科，他相信比起卡斯特利亚诺的哈巴狗比洛蒂来，他更有资格取得家族的领导职位。

葛提的直觉是准确的，这两个人都是卡斯特利亚诺阵营里长期失宠的人物。他说服“迪比”罗伯特·迪伯纳多（Robert “DiB” DiBernardo）和“派尼”约瑟夫·阿蒙

(Joseph “Piney” Armone) 暗中变节。年近七旬的阿蒙是家族的一个长者和角头，是葛提谋杀阴谋中的一个关键角色。一旦卡斯特利亚诺被铲除，利用与卡斯特利亚诺行动队里老党徒们的关系，阿蒙将化解一场内战，他的支持将使那些 40 多岁的少壮派阴谋者信心大增。嫉妒显然是心有城府且处事不惊的阿蒙欢迎葛提举事反叛的主因。多年来压抑着对卡斯特利亚诺之财富与地位的嫉妒之后，他看到了跻身于黑手党领导层的终极机遇。他年轻时就博得了“派尼”（Piney）的绰号，那时他专门盗窃和销售圣诞树。

迪伯纳多是个金融奇才，身为打手的他不隶属于任何行动队而直接与卡斯特利亚诺打交道，并且与格拉瓦诺关系密切。具有创造性商业头脑的迪比为家族布建了一个数百万美元的色情书刊发行网络，而通过控制重要的将混凝土和其他建材运到市区主要工地的卡车司机协会 282 分会，他还替大保罗在建筑行业捞取勒索金。

一旦除掉了卡斯特利亚诺，阴谋者们就指望以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来赢得内部的广泛支持，即为了统一家族和将财富分给每个人，他必须被杀掉。五个阴谋家——葛提、德西科、格拉瓦诺、阿蒙和迪伯纳多——像侦探小说或电影里的情景一样给他们的阴谋集团起了个“拳头”的代号，每个人将是这致命“拳头”的一个手指。

“拳头”没有打算直接恳求其他四大家族的教父给予授权。当时管理委员会案就要开审，接近这些知名老板过于危险，而且他们所有人都和卡斯特利亚诺有着长期交情。相反，葛提采取了暗中行事的策略。他的同谋者们小心地游说卢切斯、甘比诺和博南诺家族的重要人物——与葛提同辈分的黑手党人——试探他们对卡斯特利亚诺可能被除掉的心态。安吉洛·鲁吉埃诺向甘比诺家族的密友格里·郎·朗格拉和唐尼·沙克斯·蒙特马拉诺通了气。“他们说，‘你还等什么？快些动手吧。’”鲁吉埃诺兴奋地向葛提报告说。探听第五个家族，即吉诺维斯家族的态度过于危险。这个家族头目们与大保罗关系密切，吐露给他们的任何信息，哪怕是最为隐晦的暗示，都有可能传到卡斯特利亚诺耳中，让他对悄然逼近的危险产生戒备。后来，以扭曲的黑手党逻辑，葛提宣称，通过与三大家族进行“非正式接触”，暗杀已经得到默许，即五大家族大多数都不持反对意见。

1985 年 12 月 2 日，尼尔·德拉科罗塞死于癌症，这加快了对卡斯特利亚诺采取行动的步伐。这个 71 岁的二老板时刻警惕着监视活动，即使在医院的最后几天也是如此。他以“蒂莫西·奥尼尔”（Timothy O’Neill）的假名登记住院。随着德拉科罗塞的离去，阴谋者们一致声称，葛提是迫不得已才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因为违反了其禁毒令，还因为鲁吉埃诺那招祸的录音带，卡斯特利亚诺会降他的职、肢解他的行动

队或者干脆杀掉他和鲁吉埃诺。

如果阴谋者们需要为谋杀卡斯特利亚诺找到另一个情感上的动机与理由的话，卡斯特利亚诺拒绝出席德拉科罗塞的葬礼让他们轻松地找到了这种借口。大保罗告诉好友，如果他露面就会被执法特工拍照，而继之而来的宣传将不利于他在 RICO 审判中获得无罪判决。尽管如此，在黑手党传统主义者看来，他的缺席既是一种怯懦，也是对甘比诺家族一位资深领导者的不尊重。

弗兰克·德西科为伏击卡斯特利亚诺和比洛蒂提供了重要情报。弗兰克是卡斯特利亚诺邀请的三名心腹角头之一，将参加 12 月 16 日下午 5 时在曼哈顿一家饭店里举行的宴会。接到知情者的报信后，葛提召集了 11 人组成暗杀队赶到那家饭店附近，准备伏击他们的猎物。暗杀队的成员大部分是葛提那伯金行动队的老练杀手。在实施伏击的前一天，葛提要求他们做好准备，但未详细道明实情。葛提说：“我们明天得干一票。有两个人将被杀掉。这是一次重要的袭击行动，它必须得干净利索。”

为了保密，葛提直到最后一个小时才说出袭击对象的身份和伏击地点——夹在第 2 与第 3 大道之间的东 46 号大街上的斯帕克斯牛排屋。下午 5 点前，刺客们在下曼哈顿一个公园里集合并进行了最后的部署安排。两名杀手被配置在饭店大门前的人行道上，另外两个人到路对面负责警戒。四名主要枪手配发了白色的军用防水短上衣，俄式裘皮帽和步话机。葛提认为，相似的服装会让街道上熙来攘往的行人难以区分。其他杀手沿 46 号大街散布在饭店门前的两侧，便于夹击或包抄受害者。其他杀手充当后备力量，万一卡斯特利亚诺和比洛蒂来到饭店或试图逃跑时没有被那四名主攻枪手截杀，他们可以立即增援。

那两名后备队员便是葛提和格拉瓦诺。在离斯帕克斯牛排屋有半个街区的 46 大街与第 3 大道交叉拐角处停着一辆装着有色玻璃的林肯城市型轿车，当他们钻进汽车时，葛提坐上了驾驶的位置。5 点刚过，另一辆林肯城市型轿车停在他们旁边等待红灯。冬天的夜幕早早降临。但让格拉瓦诺吃惊的是，借着那辆林肯车的顶灯灯光，他看到离他们几步之遥的卡斯特利亚诺正在和比洛蒂交谈着。格拉瓦诺立即用步话机通知埋伏好的刺客，告诉他们的目标正在“赶来”。

从他们的有利位置上，葛提和格拉瓦诺看到卡斯特利亚诺将汽车停在饭店门前。一群白衣人突然出现在那辆轿车旁，接着便是一道道火舌喷了出来。葛提启动发动机，朝着斯帕克斯饭店的方向穿过第 3 大道向东行驶。作为伏击计划的一个环节，如果比洛蒂有任何抵抗或者有警方或愚勇的行人制造麻烦，格拉瓦诺将作为应急射手协助主攻杀手行事。当他们驶到卡斯特利亚诺的林肯轿车旁停下来时，格拉瓦诺看到比

洛蒂的尸体倒卧在人行道上。“他走了。”格拉瓦诺低声向葛提说道。

公牛萨米和葛提驱车溜到布鲁克林和其他阴谋者会合参加庆功会。暗杀队的所有成员都乘坐停在第2大道旁的汽车安全撤离了现场。在赶往布鲁克林的路上，葛提和格拉瓦诺听到新闻播报：大保罗被杀身亡。约翰·葛提大胆的刺杀计划实施得完美无缺。

卡斯特利亚诺的追随者们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遇到他们的多少抵抗，葛提就通过一连串的动作“民主”地让自己升任为老板。在卡斯特利亚诺被谋杀和德拉科罗塞病死之后，甘比诺家族唯一的领导层成员是顾问乔·N·加洛。75岁的加洛手中无权，既没有强悍的行动队支持他，也没有进行战斗的勇气，他只得以合作的姿态安排葛提的加冕礼。按照黑手党的规矩，老板的当选需要家族大多数的角头的认可，于是遵照葛提的指示，加洛在大保罗被谋杀数天之后主持了一个有绝大多数角头参加的会议。这次秘密会议的会址选在“凯撒之东”饭店，时间安排在其闭门歇业之后。这家饭店距离斯帕克斯牛排屋仅数个街区，主要阴谋者之一的公牛萨米·格拉瓦诺拥有它的部分股份。与会的每个人都知道是葛提策划杀害了卡斯特利亚诺，但加洛和角头们都佯装不知。葛提照本宣科地讲话完毕，加洛严肃地宣布正在进行内部调查，日后终将查出并惩罚卡斯特利亚诺的凶手。纽约其他家族，他接着说，正在接到通知，甘比诺家族是完整、强大和团结的。在任命正式老板之前，加洛、葛提和弗兰克·德西科将暂时管理家族事务。其真正的讯息——所有角头们都知道——是葛提掌权，而阴谋者们则达成了攻守同盟，绝不承认违反黑手党最重要的戒律谋杀了老板。

如果调查人员需要证实葛提是否掌权，他们在1985年的圣诞前夜便知分晓。在德拉科罗塞那小意大利的老巢拉维尼特俱乐部外面，藏在厢式车里的纽约有组织犯罪侦探约翰·格尼（John Gurnee）目睹了引人注目的一幕。“许多人绕开街上的行人，直接走向约翰·葛提并吻他。”格尼报告称。甘比诺家族的角头和打手都聚在拉维尼特公开向这个事实上的老板致敬。他的正式任职仪式在1986年1月15日有20名角头参加的会议上举行。唯一的被提名者是约翰·约瑟夫·葛提，46岁的他毫无悬念地当选为甘比诺家族的教父。

第 34 章 “真为他们害臊”

你迈着双腿走进来，然后躺在棺材里出去，从此再无回头之路。

约翰·葛提的迅速爬升没有躲过执法者的眼睛。新年伊始，布鲁斯·莫尔就把他列为甘比诺家族领导集团“必捕”名单上的头号目标。其他执法机构也同样进行了重点部署。很快，为了从葛提身上搞到确凿的罪证，FBI、布鲁克林与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昆士区检察官办公室和州有组织犯罪特遣队各自对他展开了调查并互相磕碰起来。当时，调查人员不知道保罗·卡斯特利亚诺谋杀案是 FBI 对鲁吉埃诺进行电子窃听和卡斯特利亚诺索要可疑录音带的副产物。现在，调查人员都在设法取得授权以实施更多的电子入侵。一时之间，FBI 特工、昆士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和州特遣队几乎同时对伯金俱乐部进行渗透以安装窃听器，而彼此之间都没有互通声气。这种多路并进的电子入侵是司法权竞争的一种延续。它由来已久且常常滑稽不堪，长期折磨着纽约众多的调查机构。

第一个窃听这个甘比诺家族新老老板的机构是州特遣队。与 FBI 和昆士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侦探一样，州调查人员也发展了一名线人——一个被捕的寻求从轻量刑的三流毒贩多米尼克·卢法罗（Dominick Lofaro）——他的情报使伯金俱乐部受到了窃听。甘比诺家族合伙人卢法罗携带窃听器录下了与葛提讨论伯金行动队组织赌博和放高利贷的谈话。这段录音足够取得法庭授权对葛提的办公室进行窃听。这些电子耳事实上在 1985 年 3 月，即卡斯特利亚诺被杀九个月前就冒了出来，离葛提成为黑手党名人还有较长一段时间。窃听器被秘密安装在两部台式电话机里。伯金俱乐部隔壁有个开着红色大门却无门牌号的临街铺面，那两部电话就摆放在这铺面里面，葛提将这里改成了他的私人住处。调查人员相信，这个独立于俱乐部的处所便是葛提的密谈之地，比起伯金俱乐部的大房间，待在这里会感觉安全一些。热闹、嘈杂的俱乐部是那

些求见者候命的地方，而不是谈论黑手党事务的场所。州调查人员知道他对电话窃听相当警惕，但他们还是希望他不会怀疑其办公室的两部私人电话也被装上窃听器或遭搭线窃听。不接打电话时，通过安装在电话机里的窃听器也能实时地录下其密室里的每次谈话。

这些装置首次启用时，葛提还是个角头。他的谈话未能暴露犯罪的证据，窃听器便于1985年10月被关掉了。两个月后，以调查斯帕克斯案件为名，特遣队主管罗纳德·戈德斯塔克取得了法庭许可，重新启用了那些休眠于电话机里的窃听器，而这次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成果。当了老板，葛提令人意外地放松了警惕，他在自己办公室里口无忌言地和密友们谈论他改造甘比诺家族组织机构的计划，谈论打手的重新调配和未来领导层成员的人事安排。1986年1月，他的前几次“施政宣言”就包括“遗产地狱”的奋斗目标：打造一个不可征服的“科萨·诺斯特拉”家族。州特遣队录下了葛提奚落乔·加洛的谈话，他称加洛是个老好人，是个不中用的他正打算换掉的傀儡头目，但他并不打算让同谋者胖子安吉·鲁吉埃诺或萨米·格拉瓦诺填补顾问职缺。安吉洛，“他脑子不大灵光”，葛提告诉一个亲信说；而格拉瓦诺41岁，“他年龄还不够”。

在窃听葛提与鲁吉埃诺的一次谈话时，州调查人员中得知葛提当时已经选定弗兰克·德西科当二把手，做他的二老板。这个教父决定暂停接纳新打手，却没有说明理由。“这些人要受一次打击了，”葛提得意地笑道，“看着吧，一年半载之内，我们他妈的一个都不会吸收。一个也不。”他对鲁吉埃诺说。

作为这个全国最大犯罪家族的基本规矩，葛提让鲁吉埃诺通告所有下属，他将非常忙，不过问常规性的问题和请求。“我不管这些事情，”他下令道，“找安吉洛，找你的头儿，找别的什么人”。

转动的录音带向特遣队提供了一条信息，那就是葛提正将总部由昆士区的伯金俱乐部迁往小意大利拉维尼特。据说这是个象征性的举动，是要向本家族和其他犯罪集团表明，他从一个褊狭的角头上升为黑手党的一个首领。“安吉洛，”他郑重地说道，“我不会来这里了（昆士区）。我每天都他妈的直接到纽约。直接到纽约。那是自从我……（听不清）的那天起就一直……（听不清）的地方，而且我会死在那里。”

与其至高的地位相称，葛提的生活方式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变化。当角头的时候，他通常穿着圆翻领的套衫或敞开领衬衫，胸前挂一个或金或银的垂饰，有时还身着黑银色奥克兰突击者队夹克衫，脚穿懒汉鞋，虽然着装整洁，但还是典型的华丽而俗气的聪明汉风格。为了让自己彻底不同于以往，他穿上了浮华的同色系服装。不再是防

风外衣和运动衫，他现在衣装华贵，穿的是量身定做的对襟布里俄尼与迪利西绸缎套装，打着手工着色的彩花式领带。从前那个总穿着不合脚的鞋、全身破衣烂衫、神情局促不安的学校男生，现在披的是开司米大衣，穿的是花押字的丝短袜。几乎每一天，他那银黑色的头发都会被修剪一番，额前那招眼的V型发尖被设计成后掠式。一夜之间，他成了黑手党的博·布鲁梅尔（Beau Brummell）（指花花公子）。

不再流连于他从前打发大部分时光的伯金俱乐部，也不再去他在昆士和布鲁克林附近就餐的普通餐馆，葛提开始频频出入曼哈顿新潮时尚的咖啡馆和夜总会。他进出都有一帮身体强壮的保镖跟随，其中有几个人颇似《教父》里的那个魁伟结实的角色卢卡·布拉西（Luca Brasi）。随行者对他极为谦恭，甚至他的兄弟吉恩和彼特都帮他穿衣脱衣和为他擎伞遮阳挡雨。在两名贴身保镖中间，总有一个会随他进入饭店和公共洗手间，帮他开关水龙头，并谄媚地递给他干净的亚麻布毛巾。

1986年初，在重新塑造甘比诺家族和自己的时候，葛提仍不得不应付从他那凶暴的角头时代遗留下来的两起刑事诉讼案。两年前，他曾在自己昆士区的一个赌注经纪场所附近并行停车。葛提的车挡住了空调机修工罗穆尔·皮瑟科（Romual Piecyk）开车通过那条街道。35岁的皮瑟科高大健硕而且脾气火爆，他猛按喇叭，接着又下车气冲冲地走向葛提，一场打斗似乎难免。争吵的结果是葛提和他的黑手党同伙弗兰克·科莱提（Frank Colletti）将皮瑟科劈头盖脸地揍了一顿，皮瑟科只得抱头逃离并报警。警方最后在“安逸角酒吧烤肉店”附近找到了葛提和科莱提，皮瑟科指控他们对他实施人身攻击并从其钱包中偷走了325美元的现金。

皮瑟科当初指认葛提时并不知道他的黑社会地位，当时只想着报复。通常，对于由停车纠纷引起的情节轻微且未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的指控，在确定不予受理之前，它都会在市里那积案淤塞的法院系统里耽搁一些时间。然而，昆士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却立即抓住这个机遇来吸引公共的注意力，它以此案为例，声称臭名昭彰的新贵约翰·葛提是个野蛮残忍的暴徒并坚持要起诉他。这个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对这个琐屑的案子极为重视，急切地将审判日期定在1986年3月。检方唯一的证人皮瑟科现在得知葛提是个黑帮大亨，于是夜夜都做着被人谋杀的噩梦。这个吓破了胆的机修工拒绝与检方合作，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最后不得不将他拖进法庭。戴着墨镜、木讷呆板如僵尸般的皮瑟科撤回了他在大陪审团前做过的证词。“老实说，”他声称，“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忘记了是谁打了我”。

无需陪审团审议，主审法官当庭宣布指控无效。《纽约邮报》报道这起讼案时，用了一个巧妙而切题的新闻标题——“我忘了”。

得意洋洋的葛提带着他新聘请的律师布鲁斯·卡特勒（Bruce Cutler），一个曾在凶杀组工作过的前布鲁克林助理地方检察官，一起离开了法庭。38岁的卡特勒衣着整洁，体格上与葛提相像，曾是高中冠军摔跤手和大学足球队长的他依旧保持着健硕的身材。在短暂的庭审过程中，卡斯勒那好斗的法庭风格让葛提颇为满意。他猛烈抨击皮瑟科，说他是精神错乱的挑唆者，在酒后狂暴地攻击无辜的约翰·葛提。向葛提提问的那帮记者揭穿他是个非正统的教父，即使在躲避问题时，他依旧殷勤而和蔼地笑着，没有刻意隐瞒事实或从电视和摄影师的镜头下逃离。这个黑手党新教父惬意地享受着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尊敬。

这起讨厌的人身伤害案解决了，但一连串严重且复杂的指控正在布鲁克林联邦地方法院等着他。1985年3月，就在卡斯蒂利亚诺谋杀案发生的数月之前，葛提和他的弟弟吉恩及伯金行动队的一批暴徒被提起了RICO控告。在原来的案子当中，葛提只是个次要嫌犯，主要被告是当时还活着的尼尔·德拉科罗塞。作为调查的主要目标，德拉科罗塞被指控为掌管着甘比诺家族的两个行动队，而其中一个便是葛提的行动队。德拉科罗塞之死、卡斯蒂利亚诺的暴毙和自己地位的急速上升让葛提变成了主要被告，并让这次审判突然变成一起对政府具有特别意义的黑手党案件。被告的重新排定意味着联邦检察官们不得不迅速转变检控策略，将主要矛头指向葛提而非那个死去的二老板身上。

1986年的春天，在为RICO审判开始做准备的同时，葛提对其教父的新职位热心了起来。在适应新角色的过程中，有个令人快意的事情便是寻找那些将如泉涌般流进其私人金库的财富。在黑手党的暴力犯罪中经过长期磨炼的葛提知道，他有权分享家族里那些他大多数从未染指过的收益。现在，数百万美元的酬金正从包括码头、建筑和私营垃圾清运业在内的各色俱全的腐败与工会勒索行当中源源不断地流进他的腰包。除了从家族传统的赌博和高利贷生意中取得收益份额外，他还参与色情刊物销售和毒品走私牟利。有个打手曾向葛提报告称，通过俄罗斯黑帮首创的假燃油批发商“菊花链”系统，甘比诺家族正和其他黑手党犯罪集团一起窃取巨额燃油税。当时，伯金俱乐部里的窃听器捕捉到了他的惊异之声。“我是说每加仑2美分，每个月有2000万~3000万加仑。”一个手下指出，“那就是60万美元。”葛提惊羡地回道。

在陷入一场看来是旷日持久的RICO审判困境之前，葛提开始走访那些亲卡斯蒂利亚诺的行动队。和隐居独处的大保罗不一样，他打算通过宣扬自己理解基层普通打手的需求来博取他们的忠心。1986年4月13日，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这个新教父打算与二老板弗兰克·德西科一起前往布鲁克林区本森赫斯特的“老兵朋友俱乐部”，

准备进行一场鼓舞士气的讲话。那俱乐部是角头詹姆士·费拉（James Failla）的临街巢穴。费拉同时还是一个商贸协会的负责人，纽约许多大型私营废品收购公司都被这个受黑手党操控的协会所控制。

粗壮且大腹便便的费拉在本森赫斯特长大，成年后依旧在当地的俱乐部里打发着他的大部分时光，尽管他和许多黑手党人一样住在海湾对面较为偏远的斯塔腾岛。费拉首次作为家族的“希望之星”受到关注是在他30岁刚出头的时候，二老板卡洛·甘比诺当时挑选他充任自己的司机兼保镖。自1957年取得家族控制权后，甘比诺就安排费拉负责家族的垃圾清运业。费拉悄悄避开执法机关的耳目，控制纽约与长岛的垃圾清运行业长达30年，并且掌管着本森赫斯特的一支行动队。

但对前政权来说，费拉不仅仅是个大捞钱人，其行动队的成员都是为卡斯特利亚诺效力的冷酷“枪手”。而葛提希望费拉及其打手能为他发挥同样的作用：将废品转化为钞票并充当能干的杀手。

这些年来，费拉慢慢博得了“吉米·布朗（Brown即‘褐色’之意）”的黑社会绰号，因为他总喜欢穿着单调的土褐色衣服。和他那派头十足的新教父不一样，他不喜欢过于招摇。有一次，《纽约时报》的记者和他套近乎想采访垃圾清运业的事情，他咆哮地吼道：“吃屎去！”

作为卡斯特利亚诺的忠实追随者，在去年的那个谋杀之夜，费拉曾一直坐在斯帕克斯牛排屋里等着大保罗。为了迎接新老板约翰·葛提的到来，费拉在他的临街总部里集合了约30名行动队队员和崇拜者。这个地方处处体现了费拉对电子窃听的小心提防。房间里没有电话，在一面墙上，他张贴了一幅醒目的巨画，画面上是一只头戴耳机的蟑螂，其标题为：“我们的窃听器有耳朵。”

在最后一分钟，葛提临时取消了视察费拉俱乐部的计划，他本打算从那里乘坐德西科的汽车赶到曼哈顿的拉维尼特俱乐部。这一突然改变救了葛提一命。当天下午，一枚遥控炸弹炸死了德西科，当时他正钻进自己那停在费拉俱乐部门前街对面的汽车。调查人员通过窃听器和线人得知，内心自然不安的葛提肯定知道那起爆炸是针对他的，但他不知道谁是幕后黑手。卡斯特利亚诺那决意复仇的死硬支持者是自然而然的嫌疑人，但葛提认为，他已经安抚好了卡斯特利亚诺和汤姆·比洛蒂的所有黑社会亲人与潜在的复仇者。使用遥控爆炸物让葛提和执法官员们感到困惑。按照惯例，美国黑手党是绝不使用炸弹的，因为它会杀伤路过的无辜行人，从而招致异乎寻常的执法压力。西西里移民黑手党人齐普或爱尔兰“西高地”的暴徒有可能尝试炸弹袭击，但他们为什么要杀掉约翰·葛提呢？迷惑不解的葛提所能做的就是强化自己周围的防

护与警卫措施，防止刺客接近他和他那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高级轿车。

炸弹袭击案触动了媒体的神经，与葛提和甘比诺家族有关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而来。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尤金·尼克森（Eugene Nickerson）读过了太多的相关报道，为了葛提的敲诈勒索案，他开始布鲁克林挑选陪审团。为避免选到受主要被告的负面新闻所影响的陪审员，尼克森将审判日期推迟了四个月。在审前听证会上，葛提显得很平静，他迷住了媒体，特别是电视记者。不像那些举止刻板、形象模糊的老板，他完全是个另类的暴徒形象。举止优雅的他总是一脸淘气的微笑，他为女记者们开门引路，像政治家一样向法庭外的观众们挥手致意。对于连珠炮似的称他为黑手党老板的提问，他以标准的播音腔调说：“我是我的家庭——我妻子和孩子的老板。”

律师布鲁斯·卡特勒向渴求新闻素材的记者们发起公关宣传，把他的当事人描绘成一个勤奋工作的管道设备销售商和一位诚挚的父亲。卡特勒说，如果自己有个儿子，他希望孩子能有葛提那样德行高尚的品质。至于葛提对家庭的忠诚，跟踪过其婚外情的FBI特工有着大为不同的看法。通过例行监视和酒店密探提供的情报，FBI监视人员——没有任何窥淫之意——知道他在欺骗妻子。他最持久的婚外情发生在他和尼尔·德拉科罗塞的一个私生女之间。在“科萨·诺斯特拉”权贵中间，追逐和包养情妇是一种普遍行为，这被认为是精力旺盛的象征。然而，与尼尔的女儿幽会却违犯了黑手党的荣誉准则，因为她嫁给了一个黑手党党徒。葛提因此给其黑手党同伙戴上绿帽子，在“科萨·诺斯特拉”王国，这是一种可处以死刑的罪行。

葛提那自由而放荡的夜生活不久就结束了，原因是布鲁克林区那起RICO案件的首席检察官黛安·贾卡龙（Diane Giacalone）提出了一项动议。她争辩称，审判延期会增加葛提及同伙胁迫证人的可能性。她在提议中援引了以前发生在罗穆尔·皮瑟科身上的例子，在审理葛提的人身攻击与抢劫案的过程中，那个饱受恐惧折磨的空调机修工在证人席上临阵畏缩了。在皮瑟科极不情愿地出庭作证之前，他货车上的制动闸衬被人割掉，他接到过恐吓电话，在街上曾被一些面相凶恶的人跟踪，其中有个人还在后面踹了他一脚。法官尼克森接受了检方认为葛提对社会构成危险的看法，便于5月份撤销了他的保释，下令将他羁押到庭审结束为止。

贾卡龙要求羁押葛提让州有组织犯罪特遣队主管戈德斯塔克感到震惊。他恳求她和东区代理美国检察官里纳·拉吉（Reena Raggi），希望他们让葛提保持自由之身。“我们在监听他，我们正在获取不同凡响的东西。”戈德斯塔克对联邦检察官们说。他保证，如果葛提继续使用伯金俱乐部隔壁的私人办公室，他将和联邦检察官们分享通过正在进行的窃听搞到的证据，以便在另案中指控葛提和其他黑手党人。重叠的执法

管辖权再次在行动策略上发生了冲突。联邦检察官们认为，州特遣队窃听录音的价值几何是个未知数，他们自己寻求有罪判决的优先权自然要压倒戈德斯塔克那未知的可能性。在葛提被关押候审的当天，要求关掉窃听器的法庭指令也下达了。

审前羁押意味着葛提将离开街头几个月，这给他带来了管理上的麻烦。他首先考虑的是建立一个特别体系，以便在被关押于大都会惩教中心、即下曼哈顿联邦监狱时，能够让甘比诺家族保持平稳运转。在走进监狱之前，他商定了一种在狱中听取报告和发出指令的办法。信息将由获准前来的探监者——他的兄弟和安吉洛·鲁吉埃诺——带回并继续向下传达。他将管理家族日常活动的控制权交给了一个由三名角头组成的委员会手中。这三名成员分别是其老友鲁吉埃诺、乔·派尼·阿蒙和新副手“公牛萨米”塞尔瓦托·格拉瓦诺，他们都参与了保罗·卡斯特利亚诺谋杀案。

4月的那个下午，在二老板弗兰克·德西科被炸死的时候，格拉瓦诺正在“老兵朋友俱乐部”等着葛提前来。那起神秘的爆炸案发生之后，葛提就将格拉瓦诺拉纳入他那小小的顾问团，同他商量家族的事务。

在策划刺杀卡斯特利亚诺之前，葛提和格拉瓦诺这两个相对年轻的黑手党人彼此相识，但没有联手实施过犯罪。41岁的格拉瓦诺在布鲁克林长大，比葛提前长5岁。与他未来的老板那贫穷的童年相比，他小时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格拉瓦诺的父母是西西里移民，生活颇为富足，在本森赫斯特拥有一家小型服装厂、一套砖混住宅，在长岛还有一处度假屋。身为独子，萨米和其他许多未来的黑手党人一样，很早就厌烦了学校教育，是个不思悔改的问题少年。

格拉瓦诺是个学习吃力的学生，在学校里颇感丢脸。为消除内心的自卑情绪，他曾把一个嘲笑过他的同学狠揍了一顿。袭击了两个老师之后，他被送到了专门调教问题学生的“600”学校，到了16岁的时候——和葛提一样——他从学校辍学了。晚年的时候，格拉瓦诺声称他在教育方面的不幸是学校造成的，校方既没有意识到他是个诵读困难的学生，也没有采取他所需要的矫正措施来帮他学习和阅读。

20世纪50年代后期，格拉瓦诺儿时生活过的本森赫斯特到处都是炫耀自负的聪明汉和闹哄哄的崇拜者。为了使自已不受恶棍的欺凌，身材瘦削、身高只有1.68米的格拉瓦诺参加了拳击课。“你不必知道如何通过阅读去学习如何拳击。”他告诉朋友。他那拿破仑式的好斗为他赢得了—一个绰号。看到狂怒的格拉瓦诺赤手空拳的搏斗之后，一个当地的黑手党人说，“他真像一头小公牛”。从那以后，他就永久性地拥有了“公牛萨米”或“萨米公牛”的江湖绰号。

少年时期，他做过几年的夜盗、偷车贼和蒙面抢劫者。在试图闯入一处堆木场被

抓后，格拉瓦诺被警察饱揍了一顿。这次被捕发生在最高法院裁定被告拥有保持沉默的米兰达权利的很久以前。警察在一辆货车里殴打了他，要他指认同伙。格拉瓦诺鼻青脸肿地出现在法庭上，同意了达成一份由其律师代为协商的认罪协议。18岁的他对一项罪名从轻的指控认罪，并在向法官保证将加入军队服役之后被释放。

格拉瓦诺并没有把从军之言当真，但一年后的越南战争期间，他还是被征召入伍。为了让自己的军营生活过得舒服些，从未奔赴海外的格拉瓦诺用上了他学习的街头伎俩。在向宪兵队缴过费用之后，他开始在营区经营双骰儿赌博生意，并成了一个GI（美国大兵）高利贷主。服役两年重返故里之后，旧习未改的他重新干起偷鸡摸狗和抢劫的勾当。为寻找更大的机会，他开始作为合伙人“积功累德”，为“蛇”卡迈恩·珀西科手下的一个打手效力。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科洛博组织民权抗议运动期间，作为一个热诚的崇拜者，格拉瓦诺是乔·科洛博派往曼哈顿在FBI办公地设置纠察线的几十名示威者之一。

为了表白忠心并获准加入科洛博家族，格拉瓦诺在25岁时犯下了首宗谋杀罪，杀死了另一个冒犯荣誉者的崇拜者。“我感受到一股奔涌的力量，”格拉瓦诺多年后讲道，“对我来说，那次杀人是那么容易。”格拉瓦诺参加了受害者的葬礼，无耻地劝慰死者那悲痛不已的亲人要节哀顺变。几乎就在同时，为了取悦想教训一个商人的卡迈恩·珀西科，格拉瓦诺还完成了另一项残忍的任务。他得意地描述过如何用一根包皮的铅头棍棒砸烂了那人的一根手指。

谋杀和残忍的殴打让格拉瓦诺渐露头角，他成了科洛博家族的一个“希望之星”，一个可靠而冷酷的执法人。但格拉瓦诺与科洛博家族一个角头的亲戚结下仇怨，唯一的和平解决之道是他离开自己所选择的犯罪家族。为了避免流血冲突，同时也是对萨米之能力的认可，科洛博家族领导者们准许他加入甘比诺家族一支在本森赫斯特活动的行动队。他的新角头是“托度”塞尔瓦托·奥瑞诺（Salvatore “Toddo” Aurello），此人成了公牛萨米的黑手党导师和保护人。

这次变动让格拉瓦诺受益匪浅。在奥瑞诺的指导下，他站稳脚跟，成了一个体面的捞钱人和举足轻重的高利贷者。不久以后，凭借暴力手段以及甘比诺家族与腐败工会的勾结，格拉瓦诺得以将犯罪活动多样化。他以劳资和谐为要挟敲诈建筑公司，靠暴力达成亲管理方的工会协议，他自己开了公司，成了一个半合法的建筑分包商。随着不法利润滚滚而来，他又以合资者的身份入股了数家酒店和迪斯科舞厅，这让他能够在IRS纳税申报单上理直气壮地填写高收入的正当理由。

娶了心仪的邻家女孩黛布·斯奇贝塔（Debra Scibetta）（其叔父是博南诺家族的

一名打手)，接着又有了一双儿女，格拉瓦诺的私生活看来安详而平静。1975年，当管理委员会重新打开名册吸收新党徒时，他是最先加入甘比诺犯罪家族的新成员之一。

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地下室里，由角头托度·奥瑞诺做担保人，大保罗·卡斯特利亚诺主持了萨米的入会仪式。后来，格拉瓦诺最难磨灭的记忆便是卡斯特利亚诺那严肃而庄严的话语“从今天起，你获得了新生”和宣誓无条件忠于“科萨·诺斯特拉”并为之献身。“在这个秘密组织里，只有一种方式进来，也能只有一种方式出去，”卡斯特利亚诺拖长语调说，“你迈着双腿走进来，然后躺在棺材里出去，从此再无回头之路”。

奥瑞诺是个坚决效忠卡斯特利亚诺的角头，这个老板经常召唤他的行动队来执行谋杀任务。格拉瓦诺的机会于1977年到来了。萨米完成了卡斯特利亚诺安排的任务，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那名受害者的身份，也不清楚这第二次黑手党谋杀的动机。卡斯特利亚诺交待的另一起谋杀牵涉到个人感情，它表明格拉瓦诺始终不渝地信守其黑手党誓言。格拉瓦诺的妻弟尼古拉斯·斯奇贝塔（Nicholas Scibetta）是甘比诺家族另一支行动队的合伙人和小帮手。身为地位低微的可卡因兜售者，斯奇贝塔吸食了自己的产品，变成了一个好争吵的瘾君子。卡斯特利亚诺得知斯奇贝塔明目张胆地违犯其禁毒令，他担心如果“尼克”破产就会变成一个危及家族安全的“告密者”。无需多言，卡斯特利亚诺下令杀掉斯奇贝塔。这项任务交给了格拉瓦诺的朋友，而这些人随后暗示过他，称其妻弟已经大祸临头。格拉瓦诺没有警告尼克及时逃走，而是选择了沉默。他认为，与为亲戚承担事关生死的义务相比，忠于卡斯特利亚诺和“乌默它”更为重要。斯奇贝塔的尸体从来未被人发现，尽管有只戴着戒指的手最后被找到。格拉瓦诺再次劝慰受害者的亲人，不过这次是他的妻子及其家人。

到了80年代初，格拉瓦诺凭借敲诈勒索行当和具有黑手党背景的建筑与夜总会生意而大发横财。萨米的好运气甚至让妻子也沾有光，她中了纽约州一期80万美元的乐透彩大奖。格拉瓦诺的许多黑手党企业是和身为甘比诺家族荣誉者的妹夫爱德华·加拉福纳（Edward Garafola）一起合开的。格拉瓦诺在斯塔腾岛拥有一栋价值80万美元的豪宅，并在新泽西购得一处占地30英亩的农场，以便周末前去短途旅游和饲养轻驾车赛马。经济上的成功让他越来越受到卡斯特利亚诺的器重，他经常被选来执行重要的暴力任务。通过卡斯特利亚诺，1980年他受命谋杀费城黑手党人“约翰尼·基斯”约翰·西蒙，此人正与尼科迪马·斯卡福（Nicodema Scarfo）对抗，后者被管理委员会选定为该城黑手党家族老板。格拉瓦诺亲自策划这起暗杀，他绑架了西

蒙，然后冷冷地看着同伙用枪打爆受害者的后半个脑袋。

尽管卡斯特利亚诺对他赞赏有加，但格拉瓦诺对大保罗的忠心逐渐动摇了，最后成了葛提那个意欲除掉他们老板的致命阴谋集团的狂热成员。他与葛提结盟很快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葛提的首轮举措之一就是將格拉瓦诺提升为托度·奥瑞诺行动队的角头，原来的角头，萨米的导师，被允许和平引退而未受伤害。作为角头，格拉瓦诺通过其行动队很快创下了150万美元的高利贷业绩，这保证他每年能稳赚20万~30万美元的利润。

放下手头的黑道事务后，葛提和格拉瓦诺过着截然不同的私生活。葛提通常会带着保镖外出豪赌和花天酒地地玩乐，晚上很少与妻儿待在一起。格拉瓦诺靠高利贷从赌徒身上谋利，但他从来不把钱花在体育或纸牌赌博上。作为年轻有为的后起之秀，他和大多数黑手党人不一样，晚上通常会在家中度过。自前一次服刑之后，葛提放弃了剧烈的体格锻炼，更喜欢享受那闲散浪荡的花花公子式的玩乐。尽管在家族里的责任越来越大，但公牛萨米仍着迷于维持其出色的体格和保持他的运动员形象。为了练起大块的肌肉，他每周花3000美元购买合成代谢类固醇，同时还聘请了一名专业教练员，且定期出现在体育馆里和年轻人切磋拳艺，与专业运动员进行拳击比赛。

葛提被撤消保释和在接受RICO审判之前遭关押，这让格拉瓦诺有机会更深入地参与到管理班子当中。在1986年的前六个月里，他迅速由打手成长为家族的三大街头代理老板之一。全力效忠新政权的格拉瓦诺欣然执行葛提的各种指令——即使他们被要求除掉一个曾参与卡斯特利亚诺谋杀案的朋友和同谋者。通过安吉洛·鲁吉埃诺传递消息，葛提命令格拉瓦诺设法处死家族的色情刊物大王和建筑业敲诈掮客罗伯特·迪伯纳多。鲁吉埃诺解释说，迪伯纳多必须得死，是因为他在背后指责葛提。

数年之后，格拉瓦诺称，葛提是听信了鲁吉埃诺的不实之言后才痛下杀手。安吉欠下了迪伯纳多超过25万美元的高利贷债务，而且后者对他的领导才能也颇为不屑。据格拉瓦诺称，迪伯纳多当面羞辱鲁吉埃诺：“你有卵蛋做二老板，却没有那个脑子。”格拉瓦诺坚持说，他不能违抗葛提的命令，最后只能遵照其旨意行事。他邀请迪伯纳多到他的办公室，伪称是讨论黑手党的建筑敲诈事务。正当两人闲聊的时候，格拉瓦诺的枪手朝着迪伯纳多的后脑连开了两枪。这个黑手党色情业大亨的尸体也一直未能寻获。

被收押两个月之后，葛提在法庭里遇到了他的新对手黛安·贾卡龙。这位联邦东区的助理美国检察官是其RICO案件的首席检察官。从少女时起，贾卡龙就和伯金狩

猎与捕鱼俱乐部——这个受审的黑手党行动队的活动据点——结下了渊源。她在南欧林公园长大，在赶往一所天主教会学校上学的路上，她经常看到那些声名狼藉的人在伯金俱乐部外面转悠。由于她那坚持不懈的努力，葛提和他的弟弟吉恩及其他五名行动队成员最终受到了指控。她花了6年的时间整合了这个案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调查一伙讨好葛提并向其呈送贡金的武装强盗而带来的结果。尽管葛提未参与抢劫，但调查扩大成为 RICO 组织指控，其中包括伯金行动队犯下的谋杀和高利贷罪行。

但贾卡龙从一开始就遇到重重阻力。原来的起诉书经过了一再修改以便将尼尔·德拉科罗塞定罪，但他的死亡又迫使她重新调整案件，从而把葛提列为新的主要被告。当1985年3月葛提作为次要嫌犯之一被传讯到庭时，他是如此默默无闻，以致法官和他的书记员都不能确定他的名字如何拼写。作为一名经验相对较少的检察官，贾卡龙以前只审理过一起有组织犯罪案件。那是检控一名低级打手，结果是她败了。她那有限的审理黑手党案件的经验，还有她那指控突然显贵的葛提的总体策略，都令黑手党专家们担忧。当时，司法部有组织犯罪特遣队的律师们在东区处理了绝大部分黑手党案件。这个半独立的狂热地守卫着自己独占领地的机构反对修改起诉书来指控葛提。特遣队主管爱德华·麦克唐纳不顾基本礼节，竟然当着司法部官员的面声称贾卡龙的证据不堪一击。他警告说，无罪判决将导致今后无法使用来之不易的指控葛提的证据，再也不能追究其1985年以前犯下的所有罪行。贾卡龙与麦克唐纳的冲突标志着一场谁将首先打倒葛提的检控竞赛正在展开。在她的上司，即纽约东区的美国检察官雷蒙德·迪尔里(Raymond Dearie)的支持下，贾卡龙取得了华盛顿的批准，开始调查那个黑手党新贵。

还未来得及传唤一名证人，贾卡龙又遭遇另一场充满敌意的内斗，这次对手是FBI。在为审判做准备的过程中，贾卡龙发现伯金行动队的被告“好汉威利”威尔弗雷德·约翰逊(Wilfred “Willie Boy” Johnson)是个受FBI雇用的线人。她决定曝光约翰逊的卧底行为，迫使他成为一个能支持检控要点的检方证人。约翰逊恳求贾卡龙替他保守秘密。他警告说，如果葛提知道他干的事情，他和家人都将性命不保。15年来代号为“火树”的约翰逊一直是FBI的一个弥足珍贵的情报来源，FBI曾向他保证，他绝不会被强迫出庭作证。支持“好汉”威利的FBI措辞强烈地坚持说，必须要保守他的秘密。特工们知道，违背与约翰逊达成了协议将挫伤其他潜在线人的积极性，并对目前和以后的调查工作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

贾卡龙毫不让步。尽管约翰逊强烈否认自己是个告密者，但这位检察官还是在法庭公开宣称他一直秘密地与FBI合作着。她指望通过曝光其底细来让约翰逊改变主

意，然后再通过证人保护项目为他提供保护。这第一着棋失算了。比起政府的保护力，约翰逊更担心葛提的报复力，因而拒绝合作。在接受审讯时，他挨着葛提和其他共同被告坐在被告席上，一再向他们申明自己绝不是告密者。

指控葛提的绝大多数罪状都以 FBI 以外的其他机构所发掘的证据为依据。由于约翰逊的身份被突然曝光，愤怒的 FBI 官员就在准备该案的最后阶段以最低限度的合作来报复贾卡龙。政府内部的不和后来又进一步加深。当时另一个重要线人比利·巴提斯塔（Billy Batista），伯金行动队的一个赌注经纪人和绑架者，又被打算利用他作为审判证人的贾卡龙曝光了。FBI 将巴提斯塔安排在新泽西一家酒店里暂住，但没有提供 24 小时保护。经过一个月大部分靠自己保护自己的生活会之后，他消失了。在空空如也的酒店房间里，巴提斯塔的管理特工帕特里克·科尔根（Patrick Colgan）发现了一张纸条：“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帕特。我离开这里了。”贾卡龙揭穿其身份迫使他作证的决定让巴提斯塔突然陷入危险境地，他的逃走让 FBI 断掉了另一个秘密情报来源，这进一步激怒了 FBI 官员。

“好汉”威利·约翰逊的际遇为外界探知黑手党线人那云遮雾罩的存在及其动机打开了一个窗口。他和葛提都曾是“富尔顿-洛克维好汉”帮里的少年暴徒，都曾为卡迈恩·法提科那支活跃于东纽约的行动队效过力。因为约翰逊的父亲是个莫霍克族印第安钢铁工人，所以“好汉”威利只是半个意大利人。尽管他为法提科、葛提和其他聪明汉抢劫和杀人，但他始终被阻挡在黑手党大门之外无法成为荣誉者。当他因武装抢劫入狱服刑时，法提科未能真正地照顾好他的妻儿，这让约翰逊暗生怨恨。后来，当葛提任伯金行动队的头目时，体重 113 公斤、身高 1.83 米的约翰逊充当了他的高利贷断膝手。然而，葛提却把他称为“红皮人”（对美国土著人的蔑称）或“混血儿”，这让约翰逊背后恼怒不已。

因赌博和敲诈勒索罪被 FBI 逮捕之后，约翰逊发现了一个靠成为线人来摆脱困境的出路。愤懑于黑手党同伙的嘲笑，同时也为了再次落网时能寻求 FBI 的干预，约翰逊签约接受了 FBI 的雇用。只要能提供甘比诺和其他家族的情报，赌博与敲诈勒索罪自然就被搁置了起来。特工们知道，他不得不参与高利贷活动以继续换取黑手党的信任，但他们宁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不因为其他犯罪而被捕。对 FBI 来说，这是个合理的决定：让一个无足轻重的恶棍——一条小鱼——脱身来换取黑手党大鳄的珍贵情报，是一桩很合算的交易。

执法机构之间的竞争通过约翰逊的活动被近乎滑稽地展现了出来。在协助 FBI 期

间，因携带5万美元毒资贩卖海洛因，他被昆士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警尉雷默·弗朗西斯切尼的探员抓获。该办公室为抓住渗入葛提老巢的机会与约翰逊达成了合作协议，把他变成了一个出卖甘比诺家族的线人。那5万美元的毒资被没收。作为一把悬在约翰逊头上的确保其合作的利剑，该办公室保留了一项暂未提起的控告，罪名是企图贿赂抓捕他的侦探。

十多年来，约翰逊向FBI和该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提供了同样的秘密消息和情报，两个机构都不知道他还在为另一个主人服务。他向FBI提供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礼物——安吉洛·鲁吉埃诺的夸耀之辞。安吉洛自吹自擂地称，他在家里有个“保险”的办法，也就是使用女儿的公主型电话与行动队联系。

葛提在布鲁克林的RICO审判从1986年8月拖到1987年的3月。依靠30个小时的录音带和90名证人，贾卡龙和另一个年轻的检察官约翰·格莱逊（John Gleeson）指控葛提和6名共同被告参与了三起谋杀并犯下了敲诈勒索罪。在开庭陈述中，被告律师布鲁斯·卡特勒就显露了咄咄逼人的焦土策略和风格。这名律师慷慨陈词，猛烈攻击黛安·贾卡龙，称她捏造一个秘密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黑社会组织——甘比诺家族，目的是要借此为自己谋个好的前程。卡特勒在律师席里来回走动，将起诉书副本举过渐秃的头顶。“可恶至极。这真是让人呕吐！”他怒喝着，同时手指着那份文件，“这是它该去的地方。”他演戏似地结束陈述，怒气冲冲地把它摔进了废纸篓。

检方主要依靠7名全部是低级暴徒的变节者证人来增强其指控力度。在一次言词尖锐的反驳当中，卡特勒猛批背叛者们是众所周知的谋杀犯、绑架者或伪证者，他们靠指证葛提逃避了终身监禁，并从政府那里得到金钱和其他好处。他竭力为那些被录音的谈话辩解，坚称那只是些生活方式异于常人的“流浪者”、言词粗鲁的赌客和纸牌玩家的无聊之语，而不是黑手党人或罪犯的交谈。

被告方对贾卡龙的攻击越来越放肆，几乎达到了令人厌恶的程度。有个被告证人在其证词当中称她是“一只母狗”。审判开始时，三十多岁的贾卡龙留着披肩黑发，穿着红色的套装出庭，引得卡特勒后来在向陪审团做陈述时将她蔑称为“红衣女郎”，哪怕她穿着其他颜色的衣服。

贾卡龙本打算由已经认罪的银行劫匪马修·特雷纳（Matthew Traynor）来指证葛提是个角头和行动队头目，但检方发现他撒谎之后就将其否定了。相反，被告方却把他当成己方证人来攻击检方，声称她曾引诱他陷害葛提。特雷纳作证说，贾卡龙向他提供过违禁毒品，甚至设法在狱里满足他的性需求。“她把一切都给了我，”他说，“甚至拿出她出嫁时穿的内裤，让我需要时拿来用用”。（这次审判之后，特雷纳因在

证词里煽动性地诋毁贾卡龙被判犯有伪证罪。)

审判开始后不久，新任美国检察官安德鲁·马洛尼（Andrew Maloney）接受委派，开始主持东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马洛尼生性合群，对陌生人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但这是一种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的表象。实际上，他是一个严格得近乎苛刻的领导者，还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律师。作为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他曾是美国陆军游骑兵部队的一名军官，后来退役并从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毕业。在毕业后的12年里，他在曼哈顿做过联邦反诈骗检察官，并担任过司法部反白领腐败科的负责人。马洛尼没有参加葛提起诉书的拟定，也没有参加庭审准备工作。但在不经意地看过法庭的审理过程之后，他对法官尼克森给予辩护方近乎无限制的自由感到愤怒。在卡特勒进行恶意讽刺的交互讯问时，葛提的同伙在法庭里肆无忌惮地欢呼喝彩，称赞他把检方证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尼克森对付不了这些家伙。”看着辩护律师的表现，马洛尼心里暗想。

“这个法官比绅士还绅士，他放任他们，把这场审判变成马戏表演。”

马洛尼开始担忧贾卡龙的身体状况。在紧张的庭审当中，像喜剧女演员的她身材瘦削，看起来愈发憔悴。“她非常坚强，但她是和被告硬碰硬，甚至FBI因约翰逊身份被曝光而憎恨她。她极度虚弱，看起来随时都得进医院。”

马洛尼感到担心却未告诉贾卡龙的另一个情况是，布鲁斯·莫尔的甘比诺小组掌握了对检方不利的秘密消息。“FBI得到未经证实的密报，称聪明汉们准备在陪审团方面做手脚，”马洛尼说道，“他们正试图贿赂两名陪审员”。



甘比诺家族的盟友博斯科·拉多尼奇。在葛提1986年的首次RICO审判当中，据称这个黑帮分子曾将6万美元的贿赂金转给陪审员以操纵审判结果。（纽约市警察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陪审团受贿的情报结果证明是准确的，但受贿指控是在5年之后才被证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匿名陪审团里有个住在郊区的中年陪审员乔治·帕佩（George Pape）竟然主动为无罪判决提出索要价。在审判开始时，帕佩就联系了他的朋友博斯科·拉多尼奇（Bosko Radonjich），此人正好是曼哈顿那个残忍且风头正劲的爱尔兰“西高地”帮的新头领。（博斯科是个塞尔维亚移民，趁着大多数爱尔兰头目被囚禁的机会，他控制了那个帮派。）经济困顿的帕佩要价12万美元，他保证至少要让陪审团的裁定悬而不决。公牛萨米充当了葛提的谈判代表，他讨价还价地将贿赂金额降低到6万美元，并在审判结束前通过拉多尼奇将其交给了帕佩。

在听取了六个月的证词和辩论之后，陪审团审议了一个星期并做出了裁决。这天是1986年3月13日，星期五，美国检察官安德鲁·马洛尼忧心忡忡地等待着陪审团的结果，他预感到这天对他的手下来说是个不幸的日子。“在我做检察官的这些年里，我见过许多暴徒，他们总是或多或少地显得焦灼不安，”马洛尼说道，“但葛提极为镇定地坐在那里。他那么泰然自若，从容得让人难以相信。我知道，他肯定成功地贿赂了陪审团。”

马洛尼的猜测是准确的。听到陪审团宣读所有指控他与共同被告的罪名都不成立时，葛提咧开嘴笑了。审判结束10年后，《每日新闻》记者杰尔·卡佩瑟（Jerry Capeci）和吉恩·马斯腾（Gene Mustain）撰文称，大多数陪审团成员开始时都主张有罪裁决。然而，帕佩反复强调卡特勒的话，称贾卡龙憎恨葛提，并且她也不能证明其案子的可靠性，因而拒绝改变立场。帕佩的观点在争论中逐渐占了上风。他认为有充分和合理的疑点判定所有被告无罪。

政府向黑手党发起的进攻遭遇了令人痛心的失败，它首次输掉了一场重要的RICO审判。约翰·葛提扭转局势击败了司法部的律师们，这个教父带着恶毒的满足迎来了自己的胜利。“真为他们害臊，”他吼叫着，同时向年轻的检察官黛安·贾卡龙和约翰·格莱逊挥舞着拳头，“我想看看对他们的裁决”。

第 35 章 “他像罗宾汉”

我们要，要干掉他。

他像罗宾汉。

他取胜的时候，所有人都为他欢呼。

1986年，政府与黑手党之间同时爆发过两次大的法庭冲突，约翰·葛提在布鲁克林接受的审判就是其中之一。在东河对面只隔着两个地铁站的曼哈顿，管理委员会案已经结案，三位声名显赫的老板与他们的亲信被判处100年监禁。“那和我没有关系。”葛提对记者们说，并将管理委员会案斥为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不愿多谈。这显然是谎言，他心里自然明白。这次管理委员会审判一举铲除了黑手党许多保守派头目。与之相反，自从阿尔·卡彭半个世纪以前的芝加哥狂欢以来，葛提那令人吃惊的无罪判决让他成了“科萨·诺斯特拉”对抗执法机构的最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教父们的地位正在进行重新调整，唯一在法庭里获胜的老板葛提成了全国最著名的难以制服的黑手党野马。他在国内外的名声如此了得，以至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画出了他的面部图像，让他成为自卡彭以来第一个上《时代》杂志封面的黑道人物。久负盛名的周日版《纽约时报杂志》也把葛提像刊登在封面上，他那阴毒而锐利的瞪视在近距离拍摄中被直接凸显了出来。

自执掌家族大权以来，葛提首次摆脱了待审或面临拘押威胁的阴影。身为老板的葛提得意洋洋地向萨米·格拉瓦诺吹嘘，他将改变“科萨·诺斯特拉”的面貌，并将在如何击败政府上树立一个光辉典范。作为一个无惧于天地的亡命之徒，尽管知道自己的举动会受到FBI和其他机构的严密监视，但他并不打算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实际上，有一群调查人员对他的日常行踪已经了然于胸。每天正午左右，穿着一身慢跑服的他走出其位于霍华德海滨的家，坐上一辆由保镖驾驶的高档奔驰汽车前往其伯金

俱乐部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用复合镜子进行了重新改造，隔出了一个更衣间，里面有一张专业理发椅和一个弧形的洗发水槽。他把自己那张刊用在《时代》杂志上的封面照放大后与亡子弗兰克的照片一起摆放在显眼的位置上。他每天工作的第一道程序是让理发师打理头发，他的打扮过程通常包括修剪鬓发和接受太阳灯照射制造日晒效果的肤色。那里摆放着款式齐全的套房、衬衫、内衣、饰有花押字的袜子和鞋子，供他在黄昏动身前往小意大利桑树大街上的拉维尼特俱乐部时换上。每天，在送他到曼哈顿之前，他那辆黑色的奔驰轿车都会被冲洗一遍并擦得锃亮鉴人。这个新政权的角头和其他高层成员按要求每周至少需要到拉维尼特去一次直接向葛提汇报情况。走到拉维尼特近旁，FBI特工有时都能听见甘比诺家族的扈从们在街边门口处讨好葛提，称赞他看起来是那么精神。显然是警惕政府的电子窃听，他经常被发现与高级黑手党人一起在拉维尼特附近的街上踱步，这就是调查人员所称的“走谈（walk-talks）”。这样一来，室内的窃听器自然无法捕捉到他们的谈话。

葛提似乎喜欢玩那猫与老鼠的游戏，尽管他是一个猎物，但他还是嚣张地表露了对跟踪者的蔑视。发现有侦探或特工监视，他就嘲弄他们，一边打着响指，一边歪着嘴说“可恶，可恶”。一天下午，在桑树大街一家咖啡馆门外闲坐时，葛提看到美国检察官鲁道夫·吉乌里亚利慢慢从身边经过。葛提就对吉乌里亚利“可恶可恶”地奚落了一番，嘲笑这位检察官在暗中监视他。有时候，他会掉头走向跟踪他的侦探，将手比划成手枪的样子，嘴里喊着“邦，邦”。

深夜是葛提的聚会时间。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泡在“雷金斯意菜食府”或者其他时尚饭店或餐饮俱乐部里。他喜欢饮用最为昂贵的酒水，通常是人头马路易十三白兰地或每瓶售价都在1000美元的路易王妃水晶香槟。他的恶名昭彰和他那富有魅力的形象给他带来了极高的回头率，人们都忍不住要瞟上他一眼。有天晚上与葛提吃饭时，萨米·格拉瓦诺问他是不是不喜欢被人盯着看。“不，不，”葛提快活地大声说，“他们是我的崇拜者，萨米，他们喜欢我。”格拉瓦诺心想，葛提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英雄人物，一个受大多数纽约人崇拜的偶像。

当有一阵子名人的闲话成了许多报纸和电视新闻节目的主要题材时，葛提那绅士般的闲适生活也成了一种让人读来饶有趣味的花边消息。新闻编辑和电视制作人津津乐道于琐碎无聊的闲闻逸事，让这个黑手党笑面人的社交和私人活动也成了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他被小报媒体冠为“潇洒先生”和“特氟隆先生”，在他看来这两个称号都有褒扬之意，听起来让人愉悦。“潇洒”意味着其俊逸不凡的体貌透着令人亲近的迷人魅力。“特氟隆”是一个新闻记者转给葛提的绰号，它最初泛指罗纳德·里根，

因为这位“特氟隆总统”总能避开人们对其政府内部的错误与丑闻的指责。这是一种含义简单明了的比喻，就像特氟隆饭锅里的食物一样，没有什么犯罪指控能让这个新教父沾上身。

盛名之下，葛提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他的人称“小约翰”的儿子约翰·A（John A.）举办过一场奢侈盛大的婚礼，记者们怎会错过这种报道机会？婚礼在纽约最豪华的酒店之一赫尔姆斯利宫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厅举行，婚礼招待费将近10万美元。200人的宾客当中有许多全国各地的高级黑手党人。在新郎父亲的坚持下，酒店在大门上方悬挂了一面意大利旗帜，而这种礼遇通常只给予到访的国家元首和外国贵宾。

通过布鲁斯·卡特勒和其他律师，记者们搞到了大量说明葛提本性可爱而仁慈的新闻素材。其中有他在南欧森公园如何受欢迎；有他如何用免费的食物、酒水和爆竹为7月4日的社区聚会来买单并如何穿着洁净的白色套装赶到现场；有当地的浸信会教友医疗中心因为他捐款1万美金而送给他一个巨大的陈情匾额；还有他如何能大量引用马基雅维利的言词。

调查人员知道，葛提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的和蔼可亲的形象颇具欺骗性，他实际上是个性情暴戾且自我陶醉的暴君。他的律师们声称他憎恨毒品，然而，与保罗·卡斯蒂利亚诺不同，葛提从来就没有发布禁令以黑手党死刑来惩罚家族里涉毒的打手。卡斯蒂利亚诺伪善地接受秘密涉毒的打手的贿赂，但他从来没有公开与嫌疑毒枭们见面。而葛提不一样，除了他的被指控从事大宗海洛因交易的弟弟吉恩和安吉洛·鲁吉埃诺外，他还与国际毒枭会面并共赴宴会。这些毒贩包括约翰·甘比诺和约瑟夫·甘比诺兄弟，他们是卡洛·甘比诺的远房表亲，还在新泽西和纽约为葛提掌管着一支西西里裔行动队。

此外，作为老板，葛提的首要举措之一是命令角头帕齐·康特重新启用通向西西里黑手党的毒品渠道。葛提知道，康特曾定期向卡斯蒂利亚诺上交大笔钱款，有一次还把一辆全新的奔驰轿车送给他作为圣诞礼物。狂怒的葛提派格拉瓦诺去教训康特。在劈头盖脸的训斥恐吓之下，可怜的康特说他已经停止贩卖毒品，而他说此话只是因为他相信葛提反对这么干。

“我不在乎你干什么，”格拉瓦诺警告说，“你给保罗带来成吨的钞票，而现在你没有给葛提带来任何东西。我不想知道与那（海洛因交易）有关的任何事情。我想要的，约翰·葛提想要的，就是钱，和保罗那时的情况一样”。

失宠的FBI线人“好汉”威利·约翰逊被杀害，这件事足以证明葛提心狠手辣的

报复心。在布鲁克林的 RICO 审判期间，葛提将约翰逊逐出了黑手党组织。但他保证说，念在他死去的儿子的份上，他的背叛不会遭遇死亡的报复。离开伯金行动队之后，约翰逊谋得了一份正经工作，之后就搬到了布鲁克林的布赖顿海滨区。1988 年 8 月 29 日，在那次审判六个月之后，正当他准备动身去上班的时候，有三个人已经在等着他。杀手们朝他连开 10 枪，其中 6 枪近距离击中“好汉”威利。警方和 FBI 立刻断定葛提等来了时机并实施了报复。当然，对于这起谋杀，葛提自然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遇到一名《纽约邮报》记者问及对这起杀人案的感想时，葛提简洁地说了一句：“噢，我们每个人迟早都得走的。”

调查人员通过线人得知，葛提想让角头向打手们传达他的行为旨趣。即使被捕，他的手下都不要像普通罪犯那样畏畏缩缩或表现得悔恨。在审判过程中，他们被要求模仿他的风格：穿着名贵服装，戴着珠宝饰品，然后无所畏惧地出庭。“让他们把恐惧和无助收拾起来，”葛提向公牛萨米·格拉瓦诺强调说，“他们应看看他妈的狮子和老虎，那就是我们应该保持的形象”。

小报媒体对葛提的美化以及他对当局言词刻毒的挑战让纽约市高级执法官员们如鲠在喉。大多数人由于机构内部有规定而未公开谴责葛提，因为他并没有受到犯罪指控。但朱尔斯·博纳沃朗塔（Jules Bonavolonta）是个例外，他是 FBI 首先认识到 RICO 之重要性的特工之一。如今担任 FBI 纽约有组织犯罪部门主管时，博纳沃朗塔被葛提那积极正面的媒体宣传激怒了。“他以前是个分文不值的抢劫犯和堕落的赌徒，他现在大权在握靠得是残忍和歹毒。”博纳沃朗塔告诉记者。（FBI 通过线人的闲谈得知，甚至甘比诺家族的打手都惊讶于葛提大把输钱的豪赌，有个周末他在其他家族赌注经纪人那里输掉 30 万体彩赌注。）

作为全国最大且宣称要打垮黑手党的调查机构，FBI 承受着制服傲慢自大的葛提的压力。在 FBI 内部，成败的责任都落在甘比诺小组及其主管布鲁斯·莫尔身上。他拒绝草率地办理一个可能再次被葛提攻破的并不牢靠的案子。虽说媒体对葛提进行了大量不实的宣传，可他毕竟是个新任老板，莫尔知道要套住他还得采取新的策略。莫尔挑选专案特工乔治·加布里埃尔（George Gabriel）专门搜集指证这个“特氟隆先生”的证据。身高 1.95 米的加布里埃尔身体健壮，在这个专司黑手党调查的小组里只呆了一年。这个 30 岁的特工以前被分到执行人质营救与反恐任务的 SWAT 特警组工作，但莫尔认为他“是我遇到过的思维最为敏捷和最具进取心的特工之一”。莫尔还承认说，身处险境的时候，加布里埃尔的块头和力气足以吓退葛提的任何暴徒。

“特工们都在争抢这种案子，当我将这件工作交给他时，我能看得出乔治接受这

个挑战时是多么兴奋。”莫尔回忆说。他给加布里埃尔的指示和他对整个小组的基本要求相似：“要充满耐心，要着眼于切实可行的检控，不要进行没完没了、忽东忽西的白领犯罪调查。重点是葛提最擅长的谋杀、敲诈勒索和高利贷犯罪”。

就在莫尔开始搜集压倒性罪证时，联邦和州检察官正为日后检控葛提进行着调整与竞争。纽约东区美国检察官安德鲁·马洛尼开始了这种角力，他从布鲁克林中城区乘了一小段地铁后赶到曼哈顿，走进其南区对手鲁道夫·吉乌里亚利的办公室。数年前，马洛尼一直有意取得南区那个颇受人看重的职位。在吉乌里亚利的任命命令下达后，参议员阿方索·达马托给了马洛尼一个安慰奖，提名他出任东区负责人。马洛尼在纽约南区任检察官达10年之久，他感到失望且自认是“南区人”，于是谢绝了达马托当初的提名。三年后，改变了主意的他放弃了私法业务并接受了那位参议员的再次推荐，并经里根总统任命后取得了东区的职位。

南区在法律界被视为司法部的御用宝地。马洛尼知道他接管的是个声誉远不及其邻居的辖区，许多律师和检察官打趣地称该区犯有集体“自卑症”。葛提的RICO无罪宣判严重打击了东区的声望，作为一个精明的公诉人和一个对司法部的政治策略了然于胸的博学者，马洛尼决心迅速重振其办公室的形象。马洛尼曾是西点军校里的次中量级拳击冠军，他知道击出第一记重拳的重要性。

1987年春天，当吉乌里亚利和马洛尼为了一场谁将拿下约翰·葛提的秘密竞争而会面时，马洛尼还是个资历甚浅的新任美国检察官。相反，鲁迪·吉乌里亚利在过去的三年里领导审理了几十件备受瞩目的案件，包括将黑手党管理委员会成员、华尔街身价亿万的内幕交易者和腐败政客定罪，故而被崇拜者们奉为国家的超级检察官而受到顶礼膜拜。

马洛尼没有被吉乌里亚利的光环所吓倒，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东区将提起下一场指控葛提的RICO诉讼。两位检察官都知道，在这个犬牙交错的管区版图里，他们的办公室都可以声称有权处理此案。甘比诺家族在同属于南区地盘的曼哈顿、布朗克斯和纽约市北部郊县极为活跃。此外，18个月前斯帕克斯牛排屋外的卡斯特利亚诺-比洛蒂谋杀案就发生在曼哈顿，吉乌里亚利已经挑选了一个正在听取该案相关证据的大陪审团。

马洛尼的管辖区包括布鲁克林、昆士、斯塔腾岛和长岛，他针锋相对地说，这些地方是甘比诺家族的“大本营”。

“这关乎我办公室的荣誉，”马洛尼坚定地向吉乌里亚利说，“我希望你能退一退。我不希望FBI跟各个检察官，跟你和我的办公室争夺情报。我知道，你认为没有哪个

办公室能像你们一样卓有成效地审理案件，但是你错了，我们能”。

除了这两个联邦检察官，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也和吉乌里亚利一起合作调查斯帕克斯命案。即使是与黑手党有关，凶杀案通常都由地方警察和州政府部门负责。但鉴于卡斯特利亚诺谋杀案的重要性，FBI和警方进行了一次联合调查。根据一部被特工们称为“《杀手法令》”的法案，1984年国会授权联邦检察官检控黑帮分子，他们通常出于敲诈目的或为了巩固在诸如黑手党家族或贩毒集团这样的RICO组织里的地位而犯下谋杀罪。吉乌里亚利称，他决定和政治上举足轻重的曼哈顿地方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展开联合调查，拒绝停止继续调查这起谋杀案或将其交给马洛尼。

这次被马洛尼称为“友好晤谈”的会面最终达成了一项划分协议。吉乌里亚利的办公室将会同摩根索调查并检控卡斯特利亚诺-比洛蒂谋杀案，而马洛尼将负责着手提起RICO组织检控案。凭着他与司法部高层官员的密切联系，吉乌里亚利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他要求华盛顿在这RICO管辖权的竞争中支持他，他将会在这场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但另一场政治冲突可能影响了吉乌里亚利的决定。纽约的选举已经临近，吉乌里亚利正打算竞选市长。调查RICO案件需要花掉数年的时间，而吉乌里亚利轻易地就将这起更大的RICO案件的调查权让给了马洛尼，这让检察官们不由地揣测起他的基本动机来。多数人的看法是，吉乌里亚利知道了起诉葛提的工作准备就绪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不是美国检察官了，也就得不到人们的关注与喝彩。

在这场检控葛提的竞赛当中，另一名参与其间的检察官是州有组织犯罪特遣队主管罗纳德·戈德斯塔克。他的办公室拥有一份珍贵的资产：在葛提成为老板后不久，州特遣队在其伯金俱乐部隔壁的私人办公室里录下的窃听录音。黛安·贾卡龙的检控案在布鲁克林输掉数天之后，吉乌里亚利就怀着极大兴趣听取了葛提在录音带上的罪证之言。据戈德斯塔克称，为了提起RICO控告，他和吉乌里亚利打算集中力量对葛提展开调查，包括卡斯特利亚诺-比洛蒂谋杀案。“我们俩都感觉葛提在嘲弄执法部门，他在外面每待一天都是对我们信誉的损害。”戈德斯塔克说道。但吉乌里亚利突然停止了合作，他告诉戈德斯塔克，“我很愿意办理这个案子，但我不能插手。马洛尼已经划了一条界线。我不想被发现偷他的案子，你得求助东区了”。

自信从录音中搞到了一起指控葛提的“重大组织案件”的基础性证据，戈德斯塔克便和马洛尼以及东区有组织犯罪特遣队的爱德华·麦克唐纳见面。所有地区性特遣队都直接向华盛顿司法部报告，这些机构和它们相对应的美国检察官之间常常互生反感。在贾卡龙提起RICO控告和葛提较量之前，就是这个麦克唐纳贬斥了她的证据。

戈德斯塔克现在将他的电子窃听证据摆在这两个掌管各自检控部门的联邦官员面前。在卡斯特利亚诺谋杀案发生后，州里设在葛提办公室里的窃听器立即重新启用，监听了葛提与其密友之间的谈话达四个月，直到贾卡龙将他关押候审。戈德斯塔克热情洋溢地向马洛尼和麦克唐纳报告称，通过电子窃听，他们发现葛提威胁一个高利贷受害者；授权对一名工会领导人实施人身攻击；夸耀其昆士区的赌注经纪场所并谈论自己对甘比诺犯罪家族组织机构进行的改革。“这的确是RICO案件所需要的宝贵材料和证据，它们证明葛提的确是一个组织的头目，”戈德斯塔克断言，“他总是谈论他如何被选为老板，钱来自何处，和谁准备控制什么。”

马洛尼和麦克唐纳每个人都有权用戈德斯塔克的证据来提起RICO公诉，但他们都没有被打动。他们有个共同的想法，认为这些被窃听的谈话过于含糊，只能算是间接证据。他们都认为，这些窃听证据不足以证明葛提犯有所指证的罪状——他实际上知道或参与过的犯罪。“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这些窃听材料，”马洛尼坚持说，“你的证据经不住这个家伙的反攻。如果我们要打垮他，我们必须要知道他的死穴在哪里。证据不能满足于刚好够用，它必须是压倒性的，否则我们会让他看起来真的不可征服。”

马洛尼认为戈德斯塔克录音带算是一个起点，但要向大陪审团呈递充分的证据，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判定葛提是个过于自信的吹嘘者，马洛尼正在依靠莫尔的FBI小组去挖掘“确凿的证据”，以确保灭掉甘比诺家族这个傲慢的教父。

离开监狱和法庭之后，约翰·葛提很少离开纽约地区。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黑手党人厌恶飞行。在毒贩塞尔瓦托·鲁吉埃诺乘坐私人飞机摔死之后，葛提发誓绝不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一个飞行员。他最远的度假旅行是到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在一群打着纸牌消磨时间的保镖护卫下，他乘火车赶到了那里的一家旅馆。这些旅行都是工作性度假，让他有机会与家族成员商讨佛罗里达州南部大量的不法生意。葛提很喜欢小艇，他会驾着香烟摩托赛艇驶离佛罗里达和纽约海岸线，他在佛罗里达州购置的那条小艇被命名为“无罪”。这种水上游览与他开飞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任老板之前，他有四次因为超速和其他违规行为被挡下，还有一次因为酒后驾车被暂扣了驾照。在离家较近的长岛东端蒙托克一个时髦的“盖尼之屋”风景区，他拥有一处私人别墅，夏天会到那里度假小住。为了度周末，他在宾夕法尼亚州波可诺山区（Pocono Mountains）花30万美元买了一栋房子，并立契转在大儿子约翰·A的名下。这栋房子没有门牌号和邮箱，但有个流行于德裔宾夕法尼亚人中间的巫符被贴在石头走廊

上，读作“LOVE”。

葛提知道执法机构正在发起针对他的执法行动，但他无所畏惧，他有大量的犯罪生意和组织上的问题需要关注。FBI 窃听安吉洛·鲁吉埃诺长岛的家没有让葛拉落入圈套。由于担心电话被窃听，葛提与胖子安吉通话时总是特别谨慎，而且他从不冒险进入鲁吉埃诺那间受监听的餐厅。窃听录音和胖子安吉那喋喋不休的谈话对政府来说真乃天赐之物。麦克唐纳的有组织犯罪特遣队曾利用这些录音以贩毒罪指控鲁吉埃诺和吉恩·葛提。鲁吉埃诺的闲聊还帮助麦克唐纳的检察官们建构了 RICO 案件来指控甘比诺家族的两名元老级人物，即葛提的二老板乔·派尼·阿蒙和前顾问乔·加洛。

由于疏忽大意的检察官和 FBI 特工没有揭露陪审团明显的受贿倾向，鲁吉埃诺和吉恩·葛提两次以毒品罪被提起的讼案都以无效审判而告终。鲁吉埃诺最后身患肺癌，因此逃过了 1989 年春天的第三次审判。这一次，吉恩·葛提被宣判有罪并被处以最低 20 年的监禁。

阿蒙和乔·加洛都是七十多岁，且都被查明犯下有组织敲诈勒索罪，这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意味着死刑，他们很难服完自己的刑期。考虑到加洛糟糕的身体状况和年事已高，在一去不复返地离家到监狱服刑之前，法官准许暂时释放他，让他与家人一起度过最后一个圣诞节。对于阿蒙，只有在承认终生犯罪并且是甘比诺犯罪家族之成员的情况下，法官才会允许他回家过圣诞节。掌握家族统治权之后，葛提最早立下的规矩之一便是角头和打手绝不许承认家族的存在，哪怕予以承认就意味着减刑。不顾一切要与家人作最后决别的阿蒙向葛提传递信息，请求允许接受法官提出的条件。“不，我们不能那样做，”葛提责备阿蒙的侄子，即带信的角头“俊杰克”约翰·乔达诺说，“这会发出一种错误信息”。

阿蒙回绝了法官开出的条件。葛提冷酷无情的拒绝无疑是在告诫甘比诺家族所有成员：老板是无情的，他的规定不得违反。老朋友胖子安吉·鲁吉埃诺也受到类似的绝情对待。葛提被鲁吉埃诺疏忽大意的谈话所造成的损失激怒了，很快将他由角头贬为打手，当时鲁吉埃身患癌症濒临死亡，体重由 113 公斤减少到了 68 公斤。不顾鲁吉埃诺的朋友与家人的强烈请求，在他那忠实的追随者处于弥留之际，葛提仍拒绝前往探望或打电话问候。鲁吉埃诺于 1989 年死去，时年 49 岁。

葛提的二老板阿蒙和顾问加洛被监禁后，家族的统治机构需要进行重新调整。葛拉挑选角头“弗兰克·洛卡”弗兰克·洛卡西奥（Frank “Frankie Loc” Locascio）任二老板，在葛提掌权之前，此人一直是尼尔·德拉科罗塞的盟友。作为保守派黑手党人，弗兰克·洛卡在赌博和高利贷方面是个行家里手，但不擅长手法复杂的敲诈勒索

和白领犯罪。洛卡西奥五十多岁，他值得夸耀的黑手党成就是曾经作为年龄最小的崇拜者被吸收为荣誉者，当时他 20 岁刚出头，在布朗克斯和西切斯特县以专业手法管理家族的地下生意。1987 年，葛提指定其日益倚重的角头公牛萨米·格拉瓦诺任顾问，以取代被囚禁的加洛。在与他的新顾问一起检讨管理方法时，葛提认为格拉瓦诺在与其最为亲密的副手和合伙人分享财富时过于大方。“听我的，”葛提劝告说，尽管在爬上老板之位以前他对保罗·卡斯特利亚诺的贪婪也曾恼火不已，“给他们少喂点，让他们饿点，不要把他们养得太肥”。

在瓜分家族的建筑业不法利润时，取得最大份额的葛提没有感到良心上的不安。家族的建筑业敲诈专家格拉瓦诺每年上交葛提约 200 万美元，占其勒索收益的 80%，剩下的 5 万美元则留给自己。

通过线人和 FBI 的监视报告得知了其管理体系的变化之后，布鲁斯·莫尔对这个新政权有了自己的看法。“洛卡西奥就像牧羊犬一样忠诚，”这位 FBI 主管断定说，“约翰绝对不用担心弗兰克会像他对待卡斯特利亚诺那样对待他。”莫尔认为葛提想找一个感觉迟钝的“是，先生；不，先生”式的二老板，而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渴望自己也有大批随从的人，一个可能会在某天对他形成挑战的人。大捞钱人格拉瓦诺在他原来的行动队里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如果他愿意的话，通过让手下分享建筑业的利润，他还能够赢得更多的拥护者。通过他掌握的无处不有的信息渠道和设法探查葛提的想法，莫尔估计公牛萨米，而不是洛卡西奥，是仅次于老板的强人和那个教父真正的得力助手。

凭着洗手间里的一次谈话，莫尔不久就有了正当理由与葛提进行第二次私人会面。1987 年夏天，FBI 在新泽西对吉诺维斯家族展开调查，作为调查行动的一部分，纽华克办事处在霍波肯市凯西拉斯酒店的一个洗手间里秘密安装了窃听器。这家酒店的老板是吉诺维斯家族的一个打手，特工们已经判断它的洗手间被用来举行黑手党会议。有天晚上，特工们听到家族顾问“瘦子博比”路易斯·玛纳和其他聪明汉一起讨论如何干掉约翰·葛提与他的弟弟吉恩。那次谈话吐露了最为关键的信息，那就是谋杀指令是由吉诺维斯家族老板“钦”文森特·吉甘特发出的。

按照 FBI 的政策，莫尔有义务就此类威胁向葛提发出警告，于是他和侦查葛提的专案特工乔治·加布里埃尔在正午时分赶到了其霍华德海滨的家。葛提仍在休息，莫尔就告诉维姬·葛提，他们有充分的理由需要叫醒他。草坪上有一条健硕的罗特韦尔犬开始狂吠起来，莫尔不由地闪出一个念头，如果他受到葛提那护家犬的攻击而不得

不开枪射杀它的话，新闻媒体又将如何报道呢。他可以想出新闻的标题：“FBI 击败了葛提的爱犬”。

穿着睡袍拖着步子走下楼梯，葛提让那条罗特韦尔犬消停了下来。“不错的大狗，我喜欢它。”葛提说道。看到眼前这两个站在门前台阶上的 FBI 特工，他没有显出意外之色。“怎么啦？”

“这是公事公办。”莫尔说道，“我们掌握了情报，你的生命已经受到威胁，另一家族准备取你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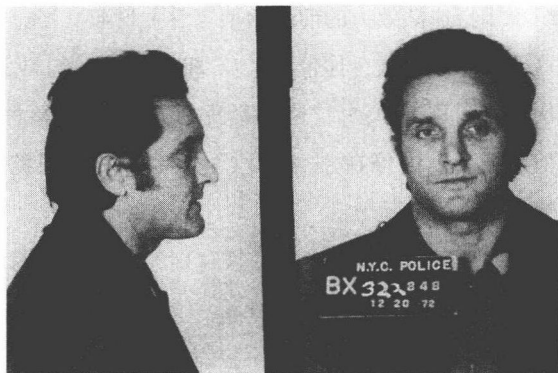
“我没啥问题，”葛提笑着说道，“我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谢谢，伙计们。”但当莫尔接着说“是‘西区’”时，他的面容骤然变色，所有人都知道此语指的是文森特·吉甘特的势力范围，即曼哈顿的格林威治村。

莫尔后来称，“我提到‘西区’时他显得很震惊，因为那意味着有麻烦上身。”FBI 如何发现他的死亡威胁和哪些黑手党人卷入其中，莫尔并没有将详细情况告诉葛提。太多的细节性情报，他担心，可能会引发两个黑手党家族之间的一场战争。根据线人的密告和监视的结果，特工们很快注意到葛提对莫尔的警告非常重视。这个甘比诺家族的老板很快改变了自己日常的出行方式，在外出处理生意和社交事务时，更多保镖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据线人报告，葛提还就这次警告和格拉瓦诺及其他亲信进行过详细讨论。莫尔的警告是 FBI 想煽动他和吉诺维斯家族冲突的圈套呢？还是的确事出有因呢？葛提的初步看法是，他的第一任二老板弗兰克·德西科可能是在“钦”吉甘特的指使下被炸成碎片，其动机是为了报复他们谋杀了他的同道老板和生意伙伴保罗·卡斯特利亚诺。葛提下令对他的奔驰和其他所有轿车进行仔细检查，看看是否藏有炸弹。

为了保险起见，葛提通过格拉瓦诺传信给吉诺维斯家族的管理层，表明他对吉甘特没有恶意。实际上，不出一年，这两个老板就同意召开一次缩微版的管理委员会会议，表明他们对彼此都没有敌意。自保守派老板们在两年前的管理委员会案中被判刑以来，这是教父们的第一次正式聚会。除了葛提、吉甘特和他们的副手外，卢切斯犯罪家族的首领们也参加了会议。动荡的科洛博家族被排除在外，因为它还没有选定正式继承人来接替被囚禁的家族老板卡迈恩·珀西科。由于曾经违犯毒品禁令且受到 FBI 特工的渗透，博南诺家族仍被禁止参加此类会议。

1988 年秋天，在格林威治村，三大犯罪家族的代表们在甘比诺家族角头弗兰克·迪阿波利托 (Frankie D'Apolito) 的兄弟家举行了会议。这是一处被称为“华盛顿广场村庄”的大型公寓楼盘，由纽约大学为学校教职工兴建。但有一两个黑手党人的近

“小维克”维托利奥·阿穆索（一张早期的嫌犯照片）继科拉罗之后成为卢切斯家族的老板，这标志着该家族布鲁克林派系掌握了控制权。阿穆索将很多权力授予其伙伴和二老板安东尼·卡索。（纽约市警察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亲设法在这高性价比的社区里谋得了房子。实际上，文森特·吉甘特有个亲戚在他们开会的那栋楼里就搞到了一套公寓房。在举行管理委员会会议的时候，接受过心内直视手术的他就住在那套房子里保养身体。

正当葛提和格拉瓦诺在迪阿波利托的陪同下经地下车库走进大楼时，他们碰到了卢切斯家族的老板“小维克”维托利奥·阿穆索（Vittorio “Little Vic” Amuso）及其二老板“煤气管”安东尼·卡索。“多好的暗杀之地啊！”当这些诱人的目标穿过地下室时，卡索向其他人低声感叹道。

这次会议有个议题是讨论是否让维克·奥瑞拉在管理委员会取得席位，当时他被珀西科选为科洛博家族的代理老板。葛提支持奥瑞拉，而且还希望恢复博南诺家族在管理委员会里的席位，要让它的新代理老板约瑟夫·马瑟诺参加会议并拥有投票权。格拉瓦诺知道奥瑞拉和马瑟诺是葛提的盟友，有了他们的支持，他就能控制管理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进而成为全国“科萨·诺斯特拉”的最高领导人。

吉甘特和卢切斯家族并不反对将奥瑞拉视为科洛博家族的代表在管理委员会里安排席位，但吉甘特对重新将博南诺家族接纳到黑手党的管理机构中反应冷淡。会议结束前，甘比诺家族老板宣布他的儿子朱利安（Junior）被吸收为荣誉者。“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遗憾。”吉甘特让葛提颇感失望地说道。葛拉原以为儿子的职业选择能赢得祝贺，但吉甘特说他绝不会把孩子带进“科萨·诺斯特拉”这个危险的世界里。

管理委员会会议结束两个月后，在一个寒冷的星期三的晚上，葛提与角头“俊杰克”乔达诺进行了一次走谈。正当他们在拉维尼特俱乐部附近的公主大街上漫步时，一辆汽车带着尖利的刹车声突然停在他们身边。四名持枪的人跳了出来并喊道，“站住！警察！”葛提被人朝前猛推，面部帖墙，两腿分开，双手举过了头顶。为州有组

织犯罪特遣队效力的前纽约侦探乔·科菲（Joe Coffey）粗暴地对他进行了搜身。“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你带枪了？”粗鲁、老派的科菲粗声大气地问道，同时用一个铁家伙顶住了葛提的腰。“这只是我的腰带扣。”葛提答道，这时他的手已经被铐在身后。他被强行推进停在一旁的汽车，坐了一小段路后被带到曼哈顿中城区的警察局做笔录。

受联邦 RICO 罪名指控被宣判无罪后不到两年，葛提再次被捕。这次他面临州里的重罪控告，即他下令杀死了一个工会官员。“我打赌，这次控告是 3 比 1。”当科菲宣读官方对他的指控时，一脸假笑的葛提讥讽地说道。

提起新的人身攻击与阴谋罪控告主要归功于州特遣队罗纳德·戈德斯塔克的坚持不懈，其调查人员在葛提旗下伯金俱乐部隔壁的办公室里安装的窃听器也自然功不可没。1986 年 3~5 月，就在他任老板后的头几个月里，窃听器捕捉到葛提与亲信们不同寻常的谈话，他们显然是在策划如何惩罚曼哈顿木匠协会领导人约翰·F·奥康纳（John F. O'Connor）。从谈话的大意上看，戈德斯塔克相信，葛提认为奥康纳应该为一家后台老板是甘比诺家族打手菲利浦·莫迪卡（Philip Modica）的新饭店遭破坏之事承担责任。在装修其炮台公园城的“银行家与经纪人饭店”时，莫迪卡拒绝贿赂奥康纳或雇用工会的木匠。奥康纳与吉诺维斯家族有联系，后来受到腐败指控而被定罪，但当初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这家新饭店受到了“保护”。甘比诺家族指责他破坏这个地方是为了报复没有得到贿赂或工会的活儿。

1986 年 5 月的一个上午，608 分会的业务经理和最高管理者奥康纳正在其市中心办公楼的门厅处等电梯。突然间，他听到一声爆响，随后感到灼热的疼痛传遍了全身。转过身去，他看到一个人正拿着枪对着他。奥康纳跌向地板时，杀手又朝他连连射击。他的腿部和臂部中了 7 枪。窃听了葛提办公室里的谈话后，戈德斯塔克和他的调查员相信，有证据表明奥康纳遭袭击是由葛提幕后策划的。这是利欲熏心的黑手党和腐败的工会官员祸害纽约建筑业的另一个案例。

东区检察官安德鲁·马洛尼听取了戈德斯塔克的录音片段，他认为可以将录音用在法庭上指证葛提，但这些证据还是很脆弱，还不是压倒性的。1988 年底，当“西高地”的杀手詹姆士·麦克埃尔罗伊（James McElroy）为逃避终身监禁而向政府投诚时，戈德斯塔克对该案的兴趣又被重新唤醒。为了获得减刑，他愿意指证全国最显赫的黑手党大佬约翰·葛提牵连于奥康纳枪击案。“我不会出卖爱尔兰人，但意大利人，谁会在乎？”麦克埃尔罗伊坦率地对一名侦探说。

戈德斯塔克希望，麦克埃尔罗伊的证词能够支持其办公室通过录音搜集到的证

据，并最终将葛提定罪。这名告密者关于枪击案的陈述听起来是可信的。他发誓他曾和葛提见过面，并称那位甘比诺家族的老板将暗杀奥康纳的合同交给了“西高地”帮。然而，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官再次给戈德斯塔克泼了一头冷水，认为麦克埃尔罗伊那鄙陋的证词过于脆弱而不足以将人定罪。再次受到东区检察官们的冷落之后，戈德斯塔克将这些证据交给了曼哈顿地方检察官罗伯特·莫根托。因为奥康纳是在曼哈顿被枪击，莫根托拥有正式调查权。莫根托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之子，曾在曼哈顿担任过美国检察官。他有过令人瞩目的检察官任职经历，在全国也算赫赫有名。他的个人影响和其办公室的威信都和美国检察官的不相上下，因而他决定起诉葛提就能大大增加检控的份量。此外，莫根托和戈德斯塔克都不否认，击败约翰·葛提对他们俩来说都将意义非凡。谈到该案时，莫根托宣称，如果葛提被证明有罪，他将设法让这个“盖棺论定的重罪犯”，这个三次逃脱法律制裁的家伙接受严苛的刑罚。因为抢劫和为了讨好卡洛·甘比诺而在斯塔腾岛企图杀害詹姆士·麦克布拉特尼，葛提曾两次被重罪判刑。根据纽约的法律，第三次犯下重罪就可以判定其无可救药，可以给予他最低 25 年和最高终身监禁的量刑。

1990 年 1 月，也就是在其走谈时被捕一年以后，光彩依旧的葛提再次在曼哈顿的法庭里闪亮登场。开始时，陪伴他的还有两名共同被告，即他往日的密友安吉洛·鲁吉埃诺和打手“托尼李”安东尼·格里耶里（Anthony “Tony Lee” Guerrieri）。根据录音证据，这两个人都因涉嫌帮助葛提策划谋杀而被捕。由于鲁吉埃诺病入膏肓，针对他的指控后来被迫中断。

在审讯期间，葛提着装光鲜而雅致，身穿定做的对襟丝绸套装，打着彩花式领带，胸前饰以折边手帕。长他 6 岁的格里耶里是个无足轻重的赌注经纪人和高利贷者，在被告席上显得可有可无，甚至成了化入无形的多余之人。吸引人们眼球的是约翰·葛提。和他那着装考究的老板不一样，法庭上的格里耶里穿着皱巴巴的裤子和混杂着黄绿色和消防红的花格子短上衣。

在葛提击败黛安·贾卡龙的控告取得 RICO 讼案的胜利之前，他的律师布鲁斯·卡特勒在刑事辩护界还是个默默无闻的角色。他在 RICO 审判中取得的令人瞩目的胜利，还有他那演戏似的庭辩技巧和他对检察官那坦率直言的嘲弄，都让他一跃成了法律界名人。在开庭陈述时，卡特勒就企图把检察官们推入被告席。他再次运用了先前在布鲁克林 RICO 审判中尝试过的辩护策略，即对检察官施以尖刻的个人诽谤。葛提的辩护律师在陪审团前踱来踱去，将嗓门调高到夸张的程度，不时地用手敲着《圣

经》，用拳头擂着桌子或讲台。他称罗纳德·戈德斯塔克是个“出名的疯子”官员，多年来一直在“叫卖”葛提的录音带，希望有个检察官能买他的账。罗伯特·莫根托则被描述为“渴望捞取政治权力”，在“黑手党歇斯底里症”和“强烈渴求知名度”的心理作祟下，极力对葛提施以政治迫害。

模仿其当事人穿着对襟套装并打着花式领带，卡特勒以一种轻柔的语调描述葛提，称他是个痛改前非的出狱者，走向新生活的他成了一个社区领袖和模范公民。他已经两次摆脱了不择手段的检察官对他提起的充满偏见的指控。卡特勒将其当事人那堪为人范的德行操守与詹姆士·麦克布拉特尼的卑鄙做了一番比较，称后者是个罪孽深重的为求取轻判而愿意说任何谎话的无良之徒，谴责检方依靠这样一个“精神病杀手，一个满口荒唐之言的流浪汉”来办案。

首席检察官迈克尔·切卡斯基（Michael Cherkasky）是个久经沙场的庭辩律师，他花了11天有条不紊地展示他的证据。切卡斯基证明被告有罪的对策主要靠葛提在戈德斯塔克录音带中说出的7个字：“我们要，要干掉他。”1986年2月7日，受甘比诺家族保护的“银行家与经纪人饭店”被人冲砸后不久，葛提和格里耶里被窃听到谈论摸清木匠协会608分会负责人奥康纳的底细。根据检方对这段窃听录音的解读，葛提曾指示格里耶里在实施攻击之前要确认奥康纳和其他犯罪家族有无瓜葛。切卡斯基为陪审团播放了重要部分的剪辑录音。

葛提：“608，约翰·奥康纳608，嗯，在百老汇16什么，好象是百老汇1694，百老汇，木匠”。

格里耶里：“这么说，如果……你想去看看。”

葛提：“啊，他是个工会代表。”

格里耶里：“去打听一下，或者派哪个能和他说上话的人去。”

葛提：“对，我们想看看谁在支持他。”

格里耶里：“噢，噢。”

葛提：“我们要，要干掉他。”

这最后7个字，“我们要，要干掉他”构成了检方控告的核心内容。切卡斯基还借助其他10盘录音带的片段，称这些材料证明了是葛提下达了袭击指令。另一段相关谈话在1986年5月7日奥康纳被枪击后不久被录到。在那段谈话当中，吉恩·葛提插嘴打断了葛提与鲁吉埃诺的谈话。

吉恩·葛提（低声说）：“约翰·奥康纳中了4枪。他们打在他腿上。我在新闻上听到的。安吉洛，情况大概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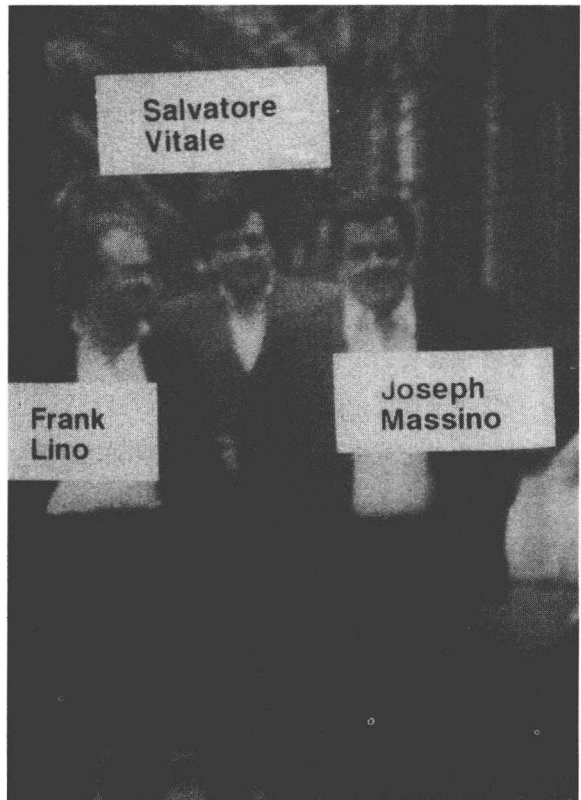
鲁吉埃诺：“噢，是的。”

吉恩·葛提：“嗨，嗨，嗨（含意不甚明了）。在新闻上听到的。”

播过录音后，切卡斯基指出，葛提作为新任老板有报复奥康纳的动机。他得迅速向纽约整个黑手党黑社会显示他的权威和力量。

除了录音带之外，检方还有“西高地”告密者詹姆士·帕特里克·麦克埃尔罗伊可资利用。在抛出这个明星证人指认葛提的证词之前，切卡斯基不得不承认麦克埃尔罗伊那血淋淋的罪恶和谎言。声音沙哑，眼睛扫视着法庭，麦克埃尔罗伊供述称，自14岁时开始，他参与了谋杀、强奸、持刀伤人、武装抢劫、贩卖毒品、放高利贷和赌注经纪等犯罪——累累罪恶数不胜数。现年45岁且正在服刑的他是因为受到RICO指控而被判刑，他至少要接受60年的监禁才能取得保释资格。尽管在证人席上频频撒谎，但麦克埃尔罗伊坚称，他指证葛提的证词是千真万确的。

麦克埃尔罗伊的经历得从1986年4月开始说起，当时他跟随“西高地”首领詹姆士·库南（James Coonan）赶到布鲁克林为弗兰克·德西科守夜，那个甘比诺家族的二老板在神秘的汽车爆炸中被炸成碎片。数年前，库南与保罗·卡斯特利亚诺达成一



1986年，在妻弟同时也是其犯罪密友的“漂亮塞尔”塞尔瓦托·瓦伊塔尔和角头弗兰克·利诺的陪同下，乔·马瑟诺前来为甘比诺家族被杀的二老板弗兰克·德西科守灵。（FBI的监视照片）

项口头协议，“西高地”将充当甘比诺家族的一支打手队。在殡仪馆，库南将麦克埃尔罗伊介绍给葛提，葛提当时问道：“是这个伙计吗？”后来，在随库南与安吉洛·鲁吉埃诺私下见面之后，库南告诉麦克埃尔罗伊，“西高地”要为甘比诺家族完成一项任务。“他说我们得打断一个木匠的腿。这人就是约翰·奥康纳，因为他砸了某个伙计的饭店”。

“他有没有告诉你，你们是在为谁干这件事？”切卡斯基问道。

“说过，”麦克埃尔罗伊回道，“是约翰·葛提。”

在奥康纳受伤的那天上午，麦克埃尔罗伊说，他是四名袭击那位工会负责人的“西高地”枪手之一，但他没有开枪。

在四个小时的交互讯问当中，卡特勒和另一个辩护律师杰拉尔德·沙杰尔（Gerald Shargel）猛批麦克埃尔罗伊，竭力针对他与葛提见面的供述提出疑点。这些律师称他是“黄狗”、“安非他明的脑袋”、“无情的冷面杀手”，企图让他承认走出监狱的一线机会就是帮助检方并隐入证人保护项目。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告唯一的证人是被“西高地”袭击的受害者约翰·奥康纳。在当时接受调查和后来因劳工诈骗被定罪时，奥康纳拒绝在大陪审团跟前作证，也不愿意就他与黑手党的关系回答问题。然而，他愿意帮助被告说话，称自己从来没有接到州调查人员关于其生命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的警告，以此证明当局并不认为葛提的录音谈话是一种威胁。

至于奥康纳为何事先没有得到警告，与证据有关的法规使检方无法做出解释或提供证词。在枪击案发生前，州调查人员认为葛提与奥康纳有关的谈话过于含糊，还不能认定是一种威胁。“在录音里，葛提对许多人都会发火，”戈德斯塔克说道，“那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去杀他们”。

奥康纳还作证说，他卷入了许多树敌结冤的工会冲突，在工会内部有无数敌人。这番陈词为被告方提供了一个说法，即他的对手才有动机对奥康纳实施攻击。

平静地看着已经商议了四天的陪审团，约翰·葛提坦然地倾听着裁决，“无罪。”陪审团主席宣布所有罪名——两宗人身伤害罪和两条阴谋罪——都不成立。那个被遗忘的被告“托尼李”格里耶里也被宣判无罪，葛提实际上对宣判结果早就成竹在胸。这天是1990年2月9日星期五，当葛提走出来举起右臂做出斗争胜利的手势时，法庭外的1000多人立刻欢呼起来。有辆栗色的凯迪拉克慢速停在路边，葛提在其体格健壮的哥哥彼特和一名保镖的护卫下俯身坐进了汽车，经过几个街区后来到了其桑树大街上的老巢。当他大步流星地走进拉维尼特社交俱乐部时，人群中又发出一阵雷鸣般的

喝彩声，爆竹也噼哩叭啦地放了起来，满脸堆笑的公牛萨米·格拉瓦诺和大群黑手党人正候在那里，朝他大发溢美之辞并致恭贺之意。

在南欧森公园，红色气球喜气洋洋地装扮着伯金狩猎与捕鱼俱乐部。三角旗被串成一串从俱乐部拉到一根街灯柱上，橱窗里也拉有一条横幅，写着“祝贺约翰和托尼。我们爱你们”。在葛提那霍华德海滨的家中，许多表示纪念战时人质与战俘的黄色气球系在一道精致的铁艺栅栏上。过路车里的人们鸣着喇叭并高声喊着，“真了不起！太伟大了！”

在拉维尼特俱乐部外那条狭窄街道上齐声欢呼的人群当中，有个向记者自称路易斯的当地人一语道破了许多相信葛提受到迫害的旁观者所怀有的谄媚的想法。“他像罗宾汉，”路易斯大声说，“他取胜的时候，所有人都为他欢呼”。

在接受记者的提问时，陪审员们声称对检方的主要证据感到怀疑。他们称录音带的质量太差，许多谈话都听不出来而且也难以理解。尽管葛提那句“灭掉他”的话能清楚地听出，但这种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很难让持事审慎的陪审团相信他打算谋害奥康纳。同样重要的是，在接受采访的陪审员当中，没有人觉得检方的王牌证人詹姆士·麦克埃尔罗伊是可信的。

这次法庭胜利，他四年当中第三次无罪宣判，扩大了葛提常胜不败的名声，让他成了无可争辩的有组织犯罪的偶像人物。律师们怀疑，若不能办成铁案，执法机关就不会再次冒险起诉他。在人们为葛提新近的胜利而欢呼的时候，FBI纽约有组织犯罪科主管朱尔斯·博纳沃朗塔指出了一个人被忽视的事实。“听着，”他告诉《纽约时报》说，“FBI还没有指控葛提。一旦我们有所动作，他就会得到他应该承受的一切，因为他早就开始走向监狱。”

第 36 章 西瑞莉太太的假日

这是个小房间，是一件很容易办的事情，一切都进行的非常完美。

1990年2月，为庆祝自己新近在法庭上取得的胜利，约翰·葛提喜气洋洋地赶到佛罗里达州度寒假。尽管纽约的天气阴沉，但FBI的朱尔斯·博纳沃朗塔也有理由庆祝一番。他正在调查一个被小心保守着的秘密：历经艰难地搜集了四年指控葛提的证据之后，布鲁斯·莫尔的甘比诺小组最终找到了情报的主线。1986年开始展开调查时，莫尔指示专案特工乔治·加布里埃尔要“找到何处才是葛提的致命弱点”。限于人手紧张，莫尔主要靠加布里埃尔，另外至多增加一到两名特工作为后援，坚持不懈地对那个狡猾的教父进行跟踪，并发展线人查找葛提那防御堡垒的薄弱之处。“不要指望有特遣队能帮助你。”莫尔告诫加布里埃尔说。莫尔知道检察官们最希望录到葛提本人的声音，它能够提供不可辩驳且具毁灭性的证据证明他作为甘比诺家族教父所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找到他议事的地点，伯金俱乐部、拉维尼特俱乐部、一处密室，一家饭店。”莫尔强调说。

沿着早先市和州里的调查足迹，FBI对南欧森公园的伯金狩猎与捕鱼俱乐部进行了窃听。自从夺取了家族的控制权之后，葛提几乎每天都会去那里。伯金俱乐部的窃听活动未能获取重要证据，葛提手下那些特别细心的打手们最终也发现了FBI的秘密窃听设备。到了1988年初，加布里埃尔确信伯金俱乐部已经被边缘化，因为葛提将其总部搬到了小意大利的拉维尼特俱乐部，他的近臣和角头们每周有五个晚上都会到那里去拜访他。那个无窗且镶有红砖面墙的俱乐部在一幢廉价公寓楼的底层，这个公寓楼没有装电梯，门前是一条肮脏街道。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它一度成了全国最大、最强势的黑手党家族的指挥部。

为找到合适的观察位监视拉维尼特俱乐部的铁门入口，在桑树大街和休斯顿大街交叉的东北拐角处，加布里埃尔租下了一套位于六楼的公寓房。这套房子隔着两个街区处在拉维尼特俱乐部的北边，透过它的一扇窗子可以无遮挡地观察到俱乐部前的人行道。这是一幢新建的高档公寓楼，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和房客挤进了它所在的那条街道。和拉维尼特街区那些多疑的居民不一样，这里的人对执法机关的窥探并无戒备之心。蹲在窗子后面，用高倍望远镜和高科技夜视仪及静物摄影机，特工们对每个进入和离开俱乐部的人都进行了拍照和记录其车牌号，并开始汇编嫌疑人的档案资料。葛提坚持要求他的所有角头和重要打手每周至少要到拉维尼特向他汇报一次，这种做法等于向 FBI 提供了一份甘比诺家族的“名人录”。葛提有 50 名乃至更多的朝臣几乎每天都出现在那里，他们的照片和视频录像让莫尔颇为得意。“这可是我们的富矿带。他们应该是个在地下活动的秘密组织，葛提让他们所有人白天都到这同一个地方，来和他谈话，拍他的马屁并带来金钱给他，搂抱并奉承他。”他知道，这些可作为间接证据来支持葛提是个黑手党教父的证词。

尽管这个小组调查了甘比诺家族近 10 年之久，但莫尔还是惊讶于拉维尼特观察哨设立之前 FBI 情报档案中存在的巨大空白。只有在他们的照片得到告密线人的指认之后，特工们才发现了许多以前无从知晓的角头、打手和腐败工会领导人的存在。“我们不知道这个家族真正有多大，尤其是布朗克斯的那些家伙。对我们而言，那就是一个陌生的未知国度。”

这些监视照片对下一步的调查至关重要。附上黑手党线人的证词，他们将文件证据和“合理根据”交给安德鲁·马洛尼的东区检察官，由他们向法庭申请授权对拉维尼特俱乐部进行电子窃听，理由是那里正在讨论各种犯罪计划。现在轮到詹姆士·卡尔斯特罗姆的特别行动组秘密潜入拉维尼特了。在 1988 年一个寂静的春夜，卡尔斯特罗姆的开锁人和技师安装了他们的第一个窃听器。没有任何攻击犬或高灵敏的夜盗警报器干扰他们，这次任务出乎意料地顺利。窃听器和发射装置被秘密安装在俱乐部后部一张据线人称由葛提专用的大圆桌附近。在动手工作时，技术特工们发现桌子附近的墙上有一张葛提从前的照片，那是他与其后来的行为榜样尼尔·德拉科罗塞的合影，照片中的两个人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眼睛冷酷地盯着这个世界。几个小时之后，大约在一英里远的下曼哈顿 FBI 总部里，特工们已准备好录下葛提那弥足珍贵的谈话。

不过这次窃听行动遭到了令人沮丧的失败。他在俱乐部里的谈话大部分都被一台苏打水机器和一台电视机的嘈杂声淹没了。尽管卡尔斯特罗姆的技师暗中返回数次调

试设备并重新安装了微型麦克风，但收听效果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进。能听清楚的话通常都是满是脏话的个人闲聊，不足以作为刑事犯罪的证据。莫尔和他的特工们只能判定，对窃听愈加警惕的葛提害怕在拉维尼特的大房间里口无遮拦地讲话。窃听器捕捉到的关于黑手党生活方式的唯一信息是，葛提带头和手下们齐声抱怨得将周六的晚上献给自己的老婆。其他夜晚可以与情妇一块过，但黑手党的习俗要求将周六留给妻子。葛提诉苦说，周六的夜晚是最无趣的，这听起来不免令人发笑，可对特工们来说却是没有价值的闲话。

由于葛提常常走出俱乐部到附近与格拉瓦诺及角头们走谈，卡尔斯特罗姆的魔法师们便使用上了其他高科技设备。将监听设备设置在停靠在路旁的汽车上，FBI 技师们试图通过远程控制启动录音来偷听他在人行道上的谈话，可是这着棋也失算了。

有个线人在密告中不经意地曝光了葛提用来自由交谈和举行秘密会议的地方。在一次报告当中，那名 FBI 间谍偶然向特工乔治·加布里埃尔提到，葛提与他的副手们经常走出拉维尼特的后门来到公寓楼底层的走廊上。那名线人回忆说，葛提与他的同伙最后又会从原路返回。这番话惊醒了莫尔和加布里埃尔，他们立刻调出拉维尼特观察哨搜集的资料，将记录人员进出大楼的录像带与时间日志的副本进行了仔细研究。经过特工们的分析，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浮出了水面。有时，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葛提的声音神秘地从拉维尼特俱乐部里消失了。而且，在这些长时间段里，观察日志都显示他并没有走出拉维尼特的临街大门。他去了哪里？加布里埃尔逼迫告密者们吐露更多细节信息，任何关于葛提去了那幢楼什么地方的传闻和怀疑都让他很感兴趣。其可能性是：葛提或者在拉维尼特后门外的走廊里和某人谈话，或者上楼到一套住房里进行秘密会谈。

有个线人的说法相当肯定。他向加布里埃尔保证说，葛提用的是其家族一个打手的遗孀内蒂·西瑞莉（Nettie Cirelli）租住的公寓房，在尼尔·德拉科罗塞时代，这名打手曾做过拉维尼特的看守者。“情报来源 C，”加布里埃尔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上写道，“也称，当他有重要的事情与人商量并且不希望被人看到和这人走在街上时，约翰·葛提就会继续利用西瑞莉的房子进行极为秘密的会谈。”

带着一份修改过的《第三章》法庭指令，卡尔斯特罗姆的人于 1989 年 10 月重新返回拉维尼特大楼，这次是窃听那幢楼的后走廊。其结果很快让莫尔笑逐颜开。这里没有俱乐部里的嘈杂声，可以清楚地听到葛提与角头们讨论家族的犯罪事务。让莫尔和检察官们特别感兴趣的是，葛提和角头汤米·甘比诺在走廊里窃窃私语地谈论服装

中心的敲诈勒索生意和甘比诺在布鲁克林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前所做的证词。

受窃听器成功的鼓舞，下一个目标便是内蒂·西瑞莉的公寓房，即那幢大楼的三楼10号房间。据线人称，要是葛提准备用那妇人的家，他就指示拉维尼特的现任看管人，她的侄子诺曼·杜旁特（Norman Dupont），建议她出去几个小时，要么逛街，要么去看望住在附近的一个侄女。尼尔·德拉科罗塞显然也用过相同的办法在那套房子里开会。作为一个黑手党打手的遗孀，西瑞莉太太自然明白她侄子那建议的特定含义。

在那房子里安装窃听器肯定会有收获，但这要比在走廊里做文章困难得多。西瑞莉太太很少离开那里，哪怕是在白天。和拉维尼特街区许多多疑的邻居一样，她很可能不会让假扮公用事业公司维修工或害虫扑杀工的技师进到她的家里，在西瑞莉太太深夜睡觉时让卡尔斯特罗姆的人冒险进入那两居室的山房子里也不可能。猛然看到自己房子被人闯入，这个72岁的寡妇很有可能会突发心脏病而死。而一次未遂的潜入无疑也会警告葛提这整幢楼已遭窃听。FBI纽约分局的几位官员认为，莫尔应当立足于充分利用走廊里的窃听器，没有必要因企图进入西瑞莉的房间而危及整个行动。

莫尔认定值得去冒险，于是在1989年11月19日，一个偶然的出现了。观察哨上的特工看见西瑞莉太太拎着一个手提箱离开公寓楼，被驱车赶来的亲戚接走了。那天晚上，她的电话响起而无人接听。很有可能，她已经离家去度感恩节假去了，那房子暂时空闲下来。机不可失，在凌晨时分，卡尔斯特罗姆那特别行动组专家打开门锁进入了西瑞莉太太的房间。她的小客厅里摆着一个沙发、两张安乐椅、一张木质咖啡桌、两个花盆和一台电视机，显得十分紧凑而整洁。卡尔斯特罗姆从来没有透露那麦克风安装在什么地方。“这是个小房间，是一件很容易办的事情，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完美。”他只说了这些。

接下来的10天让莫尔和加布里埃尔倍受煎熬。葛拉在拉维尼特出现过，但他从没有到过西瑞莉的家。发生了什么不妥？莫尔感到疑惑。是线人的误报？是不是某个警惕的邻居看到FBI进入了房间？难道某种第六感警告葛提那房间已变得危险？

1989年11月30日晚上8点钟，这种忧虑与不安终于烟消云散。在FBI总部的录音室里，一个备感无趣的特工突然全神贯注地倾听起来。西瑞莉太太的山房里首次传来动静。房间的门被吱吱嘎嘎地打开了，约翰·葛提、顾问塞尔瓦托·格拉瓦诺和二老板弗兰克·洛卡西奥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

第二天通过耳机复听夜间的谈话时，莫尔的情绪不由地高涨起来。“就在他们开

始谈话的时候，弗兰克·洛卡西奥打开了房间里的收音机，”莫尔回忆道，“葛提说，‘太吵了；关小点。’”为干扰执法机关的窃听，按照黑手党人常用的办法，洛卡西奥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但葛提用一只耳朵听话感到难受，莫尔知道那就是他要关小收音机的原因。“太好了，这对我们来说真乃幸事，”莫尔接着说，“没有背景噪音，没有外界声响，约翰想让每个人大声地讲话”。

谈话的部分内容是葛提的自我褒扬，是他如何接管受其他黑手党家族欢迎的甘比诺家族。他提到了与家族角头“乔乔”约瑟夫·科罗佐的一席谈话。

葛提：“……你知道乔乔今天在外面的汽车里对我说了什么吗？我们停在与其他人隔着大约有15个，噢，20个街区的地方。他对我说，‘你知道吧，约翰’，他说，‘让我告诉你’，他说，‘在我一生当中，我从来没有这样骄傲过，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他说。‘我知道’，他说，‘我和其他家族的几个角头聊天’。他说，‘自从有你在，他们记得这年里，各个家族第一次没有闹矛盾’。没有谁闹矛盾”。（一阵掌声传来）

格拉瓦诺：“的确如此。”

葛提：“没有哪个家族和人闹矛盾……每家都很安静。”

话题随后转向保罗·卡斯特利亚诺谋杀案。葛提谈到卡斯特利亚诺不停地要听听政府那份证明安吉洛·鲁吉埃诺和吉恩·葛提与毒品走私有牵连的录音带。葛提的话似乎印证了FBI对卡斯特利亚诺谋杀案背后之动机的看法：葛提害怕大保罗策划“谋杀”他，因为鲁吉埃诺拒绝让卡斯特利亚诺听到那个录音带罪证。

葛提：“他（卡斯特利亚诺）不能得逞，因为，萨姆，他想，你知道我们听到过风声，‘他想让人先干掉我。’但是，如果他先干掉我，他打击的是真正领导那个（贩毒）团伙的人，是安吉洛和他们。应该来说，就是录音带上的人。”

格拉瓦诺：“我认为，他本想杀掉安吉洛而不是你。”

葛提：“啊！”

葛提对那死老板的憎恨是显而易见的。他骂卡斯特利亚诺是个分裂家族的“混帐东西”。他最后一段关于卡斯特利亚诺谋杀案的话让相信他就是幕后黑手的特工们感到迷惑。“但是，不管怎样，不论是谁干的，总是有这么一个人，或许是角头们对这个该死的家伙下手。谁都有可能杀死这个卑鄙的家伙，也可能是角头们杀死了保罗。但无论是谁杀了他……他都罪有应得。”

12月12日的晚上，葛提与洛卡西奥单独留在那房子里。对特工们来说，葛提那

天晚上的话比一份署名的供认状还要有价值。他自称为黑手党“老板”，并回顾了他任教父以后收到的一些贡金。而对他自己损害最大的是，他承认至少批准了三起谋杀。

他谈到的第一个谋杀受害者是罗伯特·第伯·第伯拉度，此人是“拳头”小组的早期成员之一，那小组是为阴谋除掉保罗·卡斯特利亚诺而组建的。葛提向洛卡西奥笼统地说道，在他1986年因布鲁克林的RICO案件被关押候审时，他听信了“一句假话”，说是第伯拉度在其他聪明汉面前指责他。但他现在对副手们声称第伯拉度是“危险分子”并恶意诽谤他的话感到怀疑。

“第伯遇害的时候，他们对我说了假话。我在监狱里时他们杀了他。我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管怎样，是我批准这么干的。”

他将第二起谋杀部分归结于他对公牛萨米·格拉瓦诺的信任。这名受害者是甘比诺家族一个名叫路易斯·迪博诺（Louis DiBono）的打手，在瓜分建筑行业的敲诈利润上，此人和格拉瓦诺闹过纠纷。葛提怀疑格拉瓦诺是出于私心而将迪博诺置于死地。回顾过去，他相信萨米在迪博诺问题上曾撒谎欺骗了他和家族领导层。即使他怀疑格拉瓦诺，葛提说，他想除掉迪博诺还另有原因：他曾公然抵制葛提的召唤，拒绝参加一个摊牌会议。

“路易斯·迪博诺，”葛提接着说，“你知道他为什么得死吗？他得死是因为在我叫他的时候，他不愿参加进来。他没做过其他错事。”

另外，葛提还暗示自己批准了第三起谋杀。在洛卡西奥面前实际上是一口气讲下来的独白当中，他信口提到了那名受害者的名字，此人便是甘比诺家族格拉瓦诺阵营的“路易”利博瑞奥·米利托（Liborio “Louie” Milito）。在暗杀和从建筑业中牟利方面，米利托曾是格拉瓦诺的伙伴，但他后来失宠了，被葛提视为抗命不反的反叛者。

待在西瑞莉房间的那个晚上，葛提还对格拉瓦诺在建筑行业中的做法感到生气。葛提声称，他对格拉瓦诺利用建筑敲诈活动在家族内部形成自己权力中心甚是关切。他恼怒地说，“你在制造军中之军。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弗兰克？”

“得制止另一个阵营的形成。”洛卡西奥插话说。

“没错！”葛提大声回道。

葛提曾发泄过对格拉瓦诺的不满，暗示公牛萨米煽动对他的地下生意伙伴实施不必要的谋杀。“我每次他妈的一转身，就有个新公司冒出来。每次我们有个不顺着我们的伙伴，我们就杀了他。”显然是对格拉瓦诺的做法感到生气，葛提接着说，“我向他讲了一万次的了，‘萨米，悠着点来。要他妈的量力而行。悠着点来！你，你，你搞

出15个公司，看在老天的份上！你搞钢筋，你搞混凝土浇筑，你现在搞意大利地板了，你搞干垒墙，你搞石棉瓦，你搞地毯。你他妈的下一步还准备搞什么？”

坚称自己不是贪得无厌，但葛提还是问道，“这些公司里，我的那一份呢？”他称在黛安·贾卡龙的RICO案件审理期间被还押时，格拉瓦诺和其他捞钱人把一单干垒墙诈骗收益的10%交给他，为此他感到很高兴。“他们到狱中带信给我，说我得10%。像我他妈的这样容易满足的人，这辈子不用干什么了。我以前干得最漂亮的就是做过几单抢劫的买卖。我这辈子也不是没干过事的。可你在对我说，我分到百万美元生意的10%。”

讲到瓜分家族不法收益的细节时，葛提说他让弟弟彼特帮他收取一些酬金，一个公司约1万美元。没有道出具体数目，葛提还谈到除格拉瓦诺以外的其他人曾将不法收益交给了他。“好吧，让我这么说吧，弗兰克。当老板那天我收到X美元，当时他（格拉瓦诺）没啥表示。”葛提提到的另一个细节是角头们交给他一笔令人咋舌的贡金。“他给我的6.3万美元是因为我过生日。他们把那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

西瑞莉太太房间里的录音带开始飞快地旋转起来，这时的葛提因木匠协会领导人约翰·奥康纳枪击案正准备接受州法院的审讯。葛提在公共场合依旧容光焕发，充满着自信。他告诉记者说，他将安然躲过枪击案的指控。但在1990年1月4日，当审判就要开始的时候，他显得非常担忧起来。那天晚上在西瑞莉的房子里，这个“特氟隆先生”还为将来万一被判刑预做打算。他的谈话让FBI搞到一盘满是证据的录音带。这些证据表明，他控制了一个RICO组织，有权任命领导层成员并吸收新党徒。

开始时，葛提和格拉瓦诺单独待在西瑞莉的房子里，与他数周前在弗兰克·洛卡西奥发牢骚的情形完全相反，现在的葛提对他全是溢美赞赏之辞。实际上，他准备让公牛萨米接替他，如果他再次被监禁的话。

葛提：“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还有时间。明天我想让所有队长（角头）过来。我会告诉他们：‘在我说情况有变之前，我是主事人。不久要是我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不在街面上了，萨米就是代理老板。他是我们的顾问’……所以，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想法。你还想做顾问么？或者你想让我正式任命你为二老板么？代理老板怎样？你是怎么想的？你觉得怎么安排更好些？今天晚上考虑考虑吧。”

不等回答，葛提就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认为弗兰克·洛卡·洛卡西奥可能不像格拉瓦诺那样有能力担当重任。嘴里说着，“我喜欢弗兰克。”但葛提仍希望格拉瓦诺能接替他成为家族首领。

“我准备让我们的角头明白，”葛提接着说，“这是我的愿望，如果，如果我他妈

的进了监狱的话，这个家族将由萨米管理。我还是老板。如果我判了50年，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但我在监狱的时候，家族事务由萨米全权负责。”

当天晚上，甘比诺犯罪家族的一份正式党徒候选人名单被交到葛提手中由其权衡定夺。将崇拜者名单过目之后，葛提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好吧，让我告诉你，萨姆。我想除掉几个名字，五个或六个。我不是。我尽量不让人（听见）。我需要一些不只知道杀人的伙计。”

洛卡西奥（他的儿子是个黑手党人）也走进了房间。在谈到难以找到精明能干的新打手时，葛提显得有些气馁。人口结构的变化冲击了黑手党传统的招募方式。由于散居到了地域广阔的郊区，团结可靠的意裔邻居正在消失，而且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都希望靠拥有正当职业过活，并不想成为那横行霸道的黑手党人。黑手党人的人才资源正在萎缩。

“那我们得到哪里找他们，这些能干的伙计？”葛提百无聊赖地问道。“弗兰克，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情况变得更严峻起来，更不容易啊！我们还算逢上好时候。四处瞧瞧，哪天问问你儿子，忘掉你是谁，你是什么人物。设身处地和你儿子谈谈心。把自己当成你儿子的同龄人，然后让他告诉你，除了你身边的小伙子外，附近还有什么好小伙……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两星期以前我就告诉你，我们能找到的好小伙不多了。”

有更多证据表明葛提是个真正的统治者。他曾在谈话中提到付给律师30万美元来处理前二老板乔·派尼·阿蒙和顾问乔·N·加洛的上诉事宜。在奥康纳枪击案当中，葛提聘请了律师布鲁斯·卡特勒和杰拉尔·沙杰尔，但对付出的律师费感到愤愤不平。“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甘比诺家族？这分明是沙杰尔、卡特勒，或者随便什么人的家族。你想抢钱么？你真他妈的。”

葛提告诉格拉瓦诺和洛卡西奥，有一次在和卡特勒谈话时，这个律师向他抱怨，说是把他变成“跑腿的伙计”，要他弄清楚是否还有下一次“逮捕”。“我们把你变成跑腿的伙计，”葛提反驳说，“高价格的跑腿伙计。布鲁斯，真可恶”。

他最后把那些律师贬斥了一顿，称他们好表忠心，好拍他的马屁。“他们现在都成了习惯，这两个律师。我叫他们‘垃圾’和‘杂种’。当我见到布鲁斯时，‘您好，格里爱你，’他说。‘他百分之百地支持你。’当我见到格里时，‘您好，布鲁斯爱你。他百分之百地支持你。’我知道你俩爱我？两个傻（听不见）。我想他们并不是（笑声）哑巴杂种，你们知道吗？”

1990年1月14日，葛提乐观且自信地认为，如果在奥康纳案件中被宣判无罪，

他就再也不会受到检控了。“他们再也不能施加惩罚了，萨米，”他向格拉瓦诺说道，“是的，如果我赢了这个案子的话。如果输了这个案子，我就认了。但如果我赢了，他们，你知道吧，他们那些狗娘养的会多么惶惑。这就像你不停地朝那个家伙出拳一样，他在第一回合里就筋疲力尽。你还开什么玩笑，他能坚持到第二回合吗？蠢驴！”（容易受骗的白痴）

就在他的谈话被秘密录音时，政府的电话与窃听器威胁正在困扰葛提。1月24日，在与格拉瓦诺和洛卡西奥会面时，他对电子监听表示了担心。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头号疏忽者，不得不承认在伯金俱乐部里的谈话在奥康纳案中成了指控他的关键证据。“我真是有病，我们他妈的那么不小心。我，头号大意之人啊！”

为了挫败政府的企图，他想警告家族的每个成员，口风不紧者将受严厉惩罚。“从现在开始，”他说，“我要告诉你们，如果有人提到‘拉’或者如果说，‘拉，拉，拉，拉，拉。’这个家伙，只要他说‘拉’，我就会扭断这杂种的脖子。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他不用说‘科萨·诺斯特拉，’就一个‘拉’字，他们就得完蛋。”

几分钟后，葛提似乎担心他目前的案子和可能被定罪会鼓舞家族的异议者。事实上，他已经听说了一个打手的不忠。不论背叛者是谁，葛提对付任何敢于挑战他的人只有一个办法。“他必须得死！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会得到和杰利·贝利（Jelly Belly）相同的下场。你想，你想挑战领导层吗？好吧，那我们接受这种挑战。而你会完蛋，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杰利·贝利是指甘比诺家族体重达136公斤的打手路易斯·迪博诺，他被杀死在其停放在世贸中心地下停车场里的汽车里。）

在冬季的几个月中，对葛提来说，在西瑞莉的房子里谈事情显然比在寒冷的街上走谈更为舒服和方便。但是在1月中旬，葛提接到忠告，说是那套舒适安逸的房子可能受到政府的监视。这种警报显然是由南区和东区的检察官对葛提进行重复和竞争性调查引起的。曼哈顿的南区联邦检察官沃尔特·麦克正在调查发生在斯帕克斯牛排屋外的卡斯蒂利亚诺-比洛蒂谋杀案。有个勉强到大陪审团跟前作证的证人是甘比诺家族的角头吉米·布朗·费拉，谋杀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他正在那家饭店里等候卡斯蒂利亚诺的到来。大陪审团审议结束后，费拉向葛提报告称，他被问到以前是否见过葛提，见面的地方是何处。那是关于见面地点的问题，尽管没有特别提到某个房子，但那是一个有助于说服葛提不要继续使用那套房子的警报信号。

这个关于会议地点的问题表明各自对葛提展开调查的各个执法部门相互之间缺乏合作与沟通。在FBI和东区检察官中间，只有少数人知道在西瑞莉的房子里进行的取

得突破性进展的窃听行动。由于 FBI 和东区没有向南区通报此情，沃尔特·麦克不经意间向费拉提出的问题可能提醒了葛提，即那套房子有可能遭到窃听。

尽管葛提正在避免使用西瑞莉的房子，但东区美国检察官安德鲁·马洛尼和甘比诺小组负责人布鲁斯·莫尔坚信，葛提已经钻进了自己打造的有罪铁笼之中。为缉拿葛提耗时四年寻找铁证之后，马洛尼相信他搞到了一门威力惊人的大炮。

马洛尼挑选负责这起检控案的首席检察官是约翰·格莱森，在 1986 年葛提被判无罪的那次 RICO 审判当中，他担任了黛安·贾卡龙的助手。贾卡龙已经离开了办公室，但格莱森已经成长起来，从一个没有经验的新手变成了一位出色的公诉人。准独立性质的联邦有组织犯罪特遣队到了 1990 年已逐渐出局，统管所有黑手党起诉工作的马洛尼安排格莱森负责“科萨·诺斯特拉”科。格莱森身材削瘦，戴着龟甲色眼镜，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学者风度。他已经赢得了一连串的黑手党有罪判决，这让黑手党律师们对他刮目相看。敬佩他敏捷的思维、合理合法的技巧和言简意赅的庭辩总结，对方律师们给格莱森起了一个“耶稣会士”的绰号。对于 37 岁的格莱森来说，有希望起诉葛提并将他定罪无疑是值得珍视的机会。以前在对垒葛提及其巧言善辩且富有攻击性的律师时，东区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惨败，而这次他将有洗刷那次失败的耻辱。

有了西瑞莉房间里的五盘极为重要的会谈录音带，还有对拉维尼特大楼走廊暗谈的几次窃听，格莱森还得搜集 FBI 的视频录像和静态照片及证词来充实证据，并将其整理成合乎逻辑的上下文关系。与此同时，在 1990 年的夏秋季，马洛尼正在迎头解决另一个难题，即与南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之间长期存在的管辖权纠纷和竞争。马洛尼认为他于 1987 年已经和鲁道夫·吉乌里亚利达成了协议，布鲁克林东区处理葛提的 RICO 案件，而曼哈顿南区则负责卡斯特利亚诺-比洛蒂刺杀案。根据《杀手法令》，接替吉乌里亚利的美国检察官奥托·奥伯迈耶（Otto Obermaier）将继续与曼哈顿地方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一起就斯帕克斯谋杀案提起联邦控告。

在马洛尼试探性地提出是应该首先审理谋杀案还是 RICO 案件之后，奥伯迈耶和摩根索提出了另一套方案。他们建议将两案合并成一个大的 RICO 案件在曼哈顿，在南区进行审理。他们声称，南区拥有更为合法的司法管辖权，因为拉维尼特大楼的录音是在曼哈顿取得的，并且那最令人震惊的罪案——枪杀卡斯特利亚诺——也发生在这个区。

“我们整合了强有力的 RICO 案件之后，”马洛尼抱怨说，“我向南区简要地介绍过我们的案情。我们并不想让卡斯特利亚诺谋杀案掺和在这 RICO 诉讼案当中，它算不

上充实有力。但好心没有好报、奥伯迈耶和摩根索突然想要吃掉整块面包。他们想要这案件的压轴部分——RICO部分。”

这种争执只能由司法部高层来调解，于是在1990年11月，势不两立的双方赶到了华盛顿面见他们的首长准备就此争端一较高低。奥伯迈耶由颇得人缘的摩根索陪同前往，后者是个在南区工作了10年的原美国检察官，他的话能够影响华盛顿的官僚机构。摩根索支持奥伯迈耶的主要论点是，南区的法官比河对面布鲁克林的那些人具有更高的职业素养，而且也不可能被那些葛提铁定要保留的富有侵略性的律师所吓倒。东区的另一个弱点，摩根索和奥伯迈耶声称，是其陪审团容易受外界干扰。葛提和甘比诺家族有过企图拉拢腐蚀或胁迫陪审团的历史。

在争辩过程中，马洛尼回击说，这两个法庭只有一英里之遥。“葛提可以像在布鲁克林那样很容易地在曼哈顿找到办法来操纵讼案。”马洛尼告诉司法部首长们说。他愤怒地强调称，他的办公室已经办妥了整个RICO讼案，也就是这即将提起的控告的核心部分。“挤进来抢别人的工作，这些人是多么猖狂啊！”

为应对奥伯迈耶和摩根索对东区陪审员的指责，约翰·格莱森已搞出了一套预防陪审员被收买的方案。这位博学多才的检察官专门为可能入选的陪审员编写了一份问题密集而透彻的调查表，任何与黑手党稍有渊源或容易受其劝诱的人都将被排除在外。此外，检方在审判期间将采取措施把陪审团全程隔离，让其接受美国联邦特警的保护，杜绝葛提的手下对他们施加影响。

两周后，在西切斯特县的家里，马洛尼于上午8点整接到司法部刑事司司长罗伯特·S·米勒三世打来的电话。“我们会和你们在一起。”米勒说道。这是为东区开了绿灯，尽管米勒希望马洛尼将卡斯特利亚诺-比洛蒂谋杀案并入这次检控案当中，并将许多荣誉归给南区且允许其检察官参入庭审。

回顾司法管辖权之争，马洛尼相信那些有见地的FBI特工在背后给予的支持影响了司法部的决策。格莱森强力举荐自己证明葛提有罪的策略和他对陪审团采取预防措施的计划也有助于东区的成功。私下里，马洛尼告诉助手们说，如果这起RICO案件移交给南区，他将会辞职。

然而，对于将斯帕克斯谋杀案整合到这起讼案之中，马洛尼感到极不痛快。指证葛提的直接证据依旧脆弱，马洛尼认为警察局的调查充满着漏洞。南区主要依靠的是间接证据和两个证人。有个路人声称，他曾看到葛提出现在谋杀现场附近的人行道上，一会儿瞄瞄手表一会儿盯着那饭店看。这是在夜间看到的情形，马洛尼担心会被被告律师驳得体无完肤。第二名证人是已变节的费城黑手党二老板菲利普·利奥内蒂

(Philip Leonetti)，他将作证说，葛提曾向他承认他幕后指挥了卡斯特利亚诺刺杀案。但马洛尼认为，对于与政府已经达成减刑协议的利奥内蒂，他所提供的未经证实的证据不足以将葛提牵连到那宗罪案当中。

此外，葛提曾在西瑞莉房间称是警方杀了卡斯特利亚诺，这段录音讲话无疑会给被告提供难得的反击机会。马洛尼知道，葛提的那番闲谈是个荒谬的玩笑，但他们会借此给出理由反对陪审团裁定他犯下了谋杀罪，从而影响整个 RICO 诉讼案。“卡斯特利亚诺谋杀案本不属于这起诉讼案。但因为官僚政治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吞下它。那是我们为取得司法管辖权而不得不向华盛顿付出的代价。”马洛尼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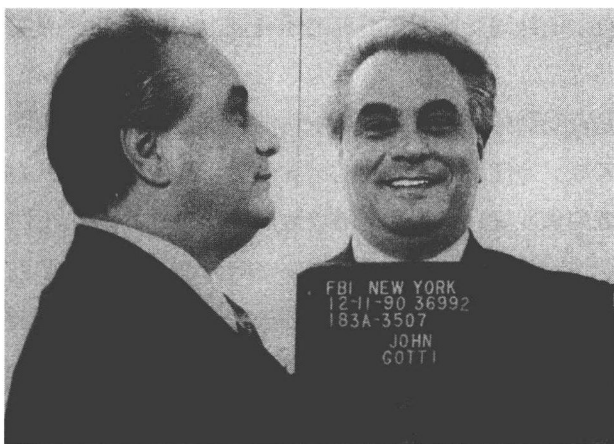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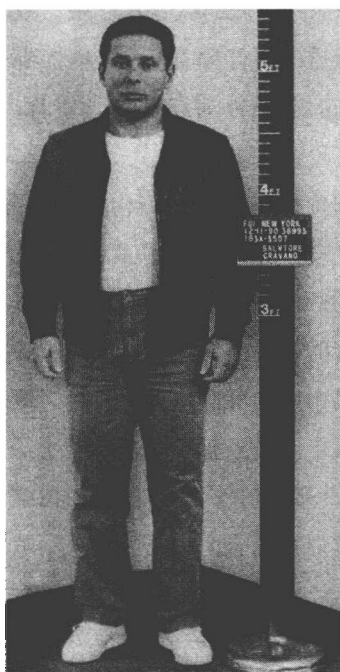
骄傲的南区办公室曾拒绝马洛尼的提议，不肯在布鲁克林法庭的 RICO 审判中充当配角。随着管辖权之争的解决，1990 年 11 月份，格莱森完成了秘密起诉书的拟定，准备起诉甘比诺家族整个领导集体——约翰·葛提、塞尔瓦托·格拉瓦诺和弗兰克·洛卡西奥提。尽管葛提白天处理家族事务和晚上进行娱乐消遣时显得镇定自若，但到了 1990 年秋天，他已经意识到与政府的冲突即将来临。他所能做的就是拿起报纸或打开电视，看看检方的势力范围之争是否解决。从新闻报道的只言片语里已经能嗅到隐含的警讯，一揽子新的控告罪状将盯上他。布鲁斯·卡特勒 11 月份狂妄地宣称，“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一切指控”，承认另一次摊牌之战已经悄然逼近。

布鲁斯·莫尔打算在甘比诺家族三巨头被起诉时立即拘捕他们。但媒体的报道让莫尔的计划受挫。尚不肯定还有谁会和他一起受到指控，葛提便命令格拉瓦诺潜逃。葛提最近已提升公牛萨米为二老板，并将洛卡西奥改任为顾问。这样，无论格拉瓦诺是否受到指控，在葛提几乎铁定会被羁押候审且不得保释时，他都将能够自由地监管家族。遵照指令，格拉瓦诺蓄起胡须藏在其岳父在波可诺山区的度假屋里，随后又藏匿到佛罗里达州南部。随着数周时间的过去而一切平安无事，松懈起来的葛提放松了警惕，召回格拉瓦诺参加家族首脑会议。这次会议定在 12 月 11 日周二的晚上在拉维尼特举行。搜索格拉瓦诺的踪迹无果之后，在那个与拉维尼特隔着两个街区的观察哨上，FBI 特工发现他在下午 6 时左右进入了俱乐部。弗兰克·洛卡西奥也赶到了那里。数分钟后，葛提乘坐他的奔驰轿车也赶了过来。通过对讲机，莫尔指示葛提的专案特工乔治·加布里埃尔实施突袭行动，一举抓捕了甘比诺家族那些受指控的领导人。

当特工们冲进去准备铐住葛提与他的两名最高将领时，甘比诺家族约有 30 名打手和崇拜者待在俱乐部里和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葛提的保镖和同伙发出嘟哝声和咒骂声，但当加布里埃尔向被告们宣读其米兰达权利时，他们并没有反抗。依旧显出他的权威和漫不经心，葛提命令俱乐部勤杂工诺曼·杜邦为他和另外两名被捕的大佬倒

上几杯搀着茴香酒的浓咖啡。莫尔赶到时，葛提正坐在他的专桌旁若无其事地啜着咖啡。抓起俱乐部的电话，莫尔拨通了FBI纽约总部FBI有组织犯罪主管刘易斯·席林罗（Lewis Schiliro）的电话。“我在拉维尼特，”莫尔尽可能平静地报告说，“我们刚刚抓到葛提和他的同伙格拉瓦诺和洛卡西奥。一切棒极了。”

双手被铐在身后，甘比诺家族三巨头被一队特工和侦探分别带进泊在一旁的汽车里。经过一小段车程，他们被带到FBI纽约总部录口供并接受指纹采集。葛提照例引领着时装界潮流。披着黑色的开士米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色调鲜丽的黄色围巾，葛提神态安详地微笑着前往监狱。矮胖的顾问弗兰克·洛卡·洛卡西奥表现的是另一个极端。被带走时，他一边咒骂一边怒视着特工，毫不掩饰他的激动情绪。穿着平时那条朴素的牛仔工作裤，内着白色T恤衫，外穿真皮防风大衣，二老板塞尔瓦托·格拉瓦诺没有虚张声势地做出大胆反抗。然而，在三人当中，公牛萨米是唯一显得震惊、沮丧和气馁的人。



1990年12月因新的RICO指控被捕时，约翰·葛提着装光鲜整洁、面带微笑，显出信心十足的表情。同天夜里，“公牛萨米”塞尔瓦托·格拉瓦诺（左）明显表现得沮丧。（联邦调查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第 37 章 “我想投靠政府”

一个重要家族的二老板指证他的老板？他是真心实意呢？还是葛提设下的某种圈套呢？

在被捕的次日上午，甘比诺家族三巨头看起来都睡眠不足且有些憔悴，指控他们的罪状之多超出了想像。在一次联合提审当中，葛提与共同被告格拉瓦诺和洛卡西奥被指控为黑手党组织的头目，犯下了 13 宗 RICO 罪行，包括谋杀罪、牵涉三条人命的阴谋罪、非法赌博罪、高利贷罪、阻碍司法罪和偷逃个人所得税罪。葛提单独受到最引起轰动的指控，那就是参与了卡斯特利亚诺-比洛蒂杀人案。

10 天后，这三个人都被一个真正令人震惊的消息击懵了，他们在内蒂·西瑞莉房子的密谈被 FBI 录音。在一次秘密听证会上，约翰·格莱森称他们是充满危险的和不安全的被告，提议不予保释。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格莱森播放了一段录音，葛提在里面谈到了他授权杀掉甘比诺家族三名成员罗伯特·第伯拉度、路易斯·迪博诺和利博瑞奥·米利托的原因。这些阴险邪恶的谈话给了联邦地方法庭法官利奥·格拉瑟 (Leo Glasser) 充分的理由，他下令这三个被羁押的人在审判期间不得保释。

有盘录音是 1989 年 12 月葛提和洛卡西奥之间的一次长谈。这盘带子让公牛萨米感到惊愕。他听到葛提不断地指责他从建筑业诈骗中大发其财，痛骂他建立效忠于自己的黑手党势力。让萨米感觉获得无罪宣判的希望更加渺茫的是，葛提的谈话将多起谋杀的罪责都扣牢在他一人身上，据称这些命案是为了解决萨米与其黑手党生意伙伴之间的经济纠纷而犯下的。

被告方不久又遭遇了另一次重创，当时法官格拉瑟剥夺了布鲁斯·卡特勒作为葛提的辩护律师的资格，而且杰拉尔德·沙杰尔也不得为格拉瓦诺辩护。在拉维尼特俱乐部后面的走廊里，这些律师被窃听到与葛提进行过谈话，这让坚韧顽强的检察官格

莱森最终以存在利益冲突问题为由将他们赶走了。

其他录音显示，为答谢这两名律师为甘比诺家族几名当事人提供的辩护服务，葛提曾暗中向他们支付过酬金，因此，按照检方的说法，他们变成了黑手党的“家族律师”。葛提还被听到表明他偷偷支付过报酬的话。“如果他们（政府当局）真正想搞掉布鲁斯·卡特勒，那他拿什么补偿我呢，”葛提对弗兰克·洛卡西奥说道。“……我给了3.6万美元。我本该付给他多少呢？”

法官格拉瑟裁定，那转录的葛提与律师之间的谈话，加上录音里提到过卡特勒和沙杰尔，就已经将他们变成了潜在的证人。他宣称律师们已经让自己面临着阻碍司法罪的指控，而这项指控将成为此次检控案的一部分。格拉瑟赶走那些律师让格拉瓦诺比葛提更为不安。1986年，为无数黑手党人打过官司的律师沙杰尔曾在一起案值达100万美元的逃税案中帮格拉瓦诺赢得了无罪判决。格拉瓦诺对沙杰尔的能力满怀信心，全指望这个精心挑选的律师帮他摆脱这RICO困境。

相信击败指控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格拉瓦诺变得极度绝望起来，甚至企图从下曼哈顿联邦大都会惩教中心（MCC）11楼的牢房里逃走。他认为偷偷越狱要比强行闯出戒备森严的监狱更容易些。他打算贿赂看守把绳子偷带进来，然后在外面同伙的帮助下翻过窗子滑下去。葛提嘲笑这个主意太不计后果，他不相信靠一根绳子就能从11楼逃下去。他有一个迥然不同的脱逃办法。“到这路的尽头，”他告诉格拉瓦诺说，“我们将筹集400万~500万美元，贿赂总统，然后获得宽恕。”他提醒格拉瓦诺，吉米·霍发（卡车司机协会那个腐败的与黑帮有牵连的主席）就成功地玩过类似的把戏。1977年，在他为尼克松总统的连任竞选提供献金和政治支持之后，霍发的长期监禁被减刑了。格拉瓦诺认为，与指望总统的赦免或减刑相比，“一扇窗子就是一个更好的机会”，但他不能不考虑葛提的否决权。虽然同在一个监区，但这两个黑手党人逐渐疏远了。格拉瓦诺曾在军队服过役，葛提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那毫无爱国心的言论令他反感。在大都会惩教中心观看电视新闻时，葛提说为了报复政府对他和黑手党采取执法行动，他希望美国被伊拉克击败。

格拉瓦诺还对葛提在和洛卡西奥谈话时背后毁谤他感到闷闷不乐。他一向自认为是葛提绝对忠诚的顾问和二老板。尽管格拉瓦诺每年从自己的不法收益里拿出约200万交给葛提，但录音带曝光了葛提还是对他心怀怨恨和嫉妒。在他们近距离相处的10个月里，每天听着葛提气势汹汹的讲话和自我标榜，萨米慢慢地清醒起来。他开始相信，葛提正在谋划一个挽救自己的策略，也就是指使辩护律师在审讯中暗示格拉瓦诺——并非葛提——才是一系列谋杀案和其他重罪背后的犯罪主谋。葛提向新的律师

团队发出的指示，要让格拉瓦诺对检方最关键的证据一无所知。他拒绝让格拉瓦诺和洛卡西奥听取检方的录音带，阅读相关抄本或私下与他们自己的律师见面。最后，葛提拒绝了格拉瓦诺要求单独审判的请求，格拉瓦诺本希望运气好的话，他们中间有人能逃脱刑责被释放出来以保全家族。根据格拉瓦诺的解释，葛提提出了一个极端利己的理由反对审判切割。“现在不是我的问题，”葛提在监区里面对面地告诉格拉瓦诺，“得尽一切办法挽救‘科萨·诺斯特拉’，而‘科萨·诺斯特拉’就是约翰·葛提。‘科萨·诺斯特拉’需要约翰·葛提。你觉得不可以接受么？”

萨米的确难以接受。他和洛卡西奥都痛恨葛拉颐指气使地对待他们。他们已经密谋过，如果能奇迹般逃脱惩罚，他们将予以回击。“弗兰克和我一度想杀掉葛提。”格拉瓦诺说。1991年初秋，格拉瓦诺的姐夫爱德华·加拉福纳前来探监让公牛萨米开始考虑激进的解决办法。加拉福纳力劝格拉瓦诺投靠政府成为合作证人。

背叛或被人出卖是公牛萨米面临的抉择。格拉瓦诺自身的利益是明确的，他将抛弃黑手党。“我厌恶这一切。”他后来表白道，说他再也不能容忍葛提的傲慢自大或甘受“科萨·诺斯特拉”的种种束缚。

通过妻子黛布拉，格拉瓦诺向调查他数年的 FBI 甘比诺小组特工弗兰克·斯佩罗和马修·特里科瑞科传出了口信。深感讶异的特工从黛布拉那里得知，萨米想就认罪协议进行谈判。10月的一天，在一次审前照例到布鲁克林法庭出庭之后，格拉瓦诺经由后廊被悄悄带到一个秘密场所。等待他的是约翰·格莱森和 FBI 的布鲁斯·莫尔。“我想投靠政府。”格拉瓦诺平静地说道。

检察官和特工们在审前阶段的 11 个月里对格拉瓦诺已经形成了一致的判断，认为他是最不可能打垮的黑手党人。“他是法庭里最为强硬的家伙，”格莱森认为，“他具有一种黑社会大佬的举止风度。他看起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让人感到害怕和危险。”如果格莱森打赌谁会背叛的话，他会认为弗兰克·洛卡西奥是最脆弱的人。当法官拒绝让其具保出去看望重病的母亲时，泪水从洛卡西奥的眼中夺眶而出。“他的表现不像个‘聪明汉’，而像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格莱森说。

根据格莱森提出的合作协议，格拉瓦诺必须供认他的整个犯罪历史，揭发他所知的甘比诺及其他家族黑手党人犯下的所有罪行。最为重要的是，他将充当主要证人指证其原统治集团中的灵魂人物葛提和洛卡西奥。格莱森给予他的承诺是，为回报他对较轻的 RICO 罪状认罪并协助指证黑手党独裁者，政府将建议给予他最高 20 年的刑罚，他原本面临着领受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的惩罚。格拉瓦诺希望刑期更短一些，但格莱森不为所动。这个背叛者成功地取得了一项让步条款：作为黑手党审判的证人，

他只在背叛后的两年内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超过了这个期限就不得被强迫作证。他争辩说，一旦被释放出狱，这个条款将能让他过上更为正常的生活。

格拉瓦诺还希望能够回避指证其原布鲁克林行动队的旧友和亲戚。政府不愿书面做出此种让步，但实际上将这种优待赋予了他。作为检方证人，他从来没有被传唤指证其行动队的同伙或他的任何亲戚。

葛提的得力助手变节的消息让少数几个得知这个秘密的检察官和特工激动不已。公牛萨米是有史以来叛变并同意作证的最高级别的黑手党人。由于对狡诈的葛提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美国检察官安德鲁·马洛尼和几位特工还难以确定格拉瓦诺的投诚是否出自于本意。“这是前所未闻的，”马洛尼告诫他的高级助手们，“一个重要家族的二老板指证他的老板？他是真心实意呢？还是葛提设下的某种圈套呢？”马洛尼最担心的是交互讯问：格拉瓦诺将走进证人席，撤回他所有的有罪供述，然后毁掉检方精心策划的检控布局。

1991年11月8日午夜，布鲁斯·莫尔、乔治·加布里埃尔和两名曾密切监视格拉瓦诺的特工弗兰克·斯佩罗、马修·特里科瑞科带着授权提审犯人的文件未经通报突然赶到大都会惩教中心。“你想让我们把约翰·葛提带下来么？”一个看错了法庭文件的看守问道。“不。不，”机警的加布里埃尔有力地说道，“塞尔瓦托·格拉瓦诺。”格拉瓦诺离去不到一小时，一名看守或许是为了讨好葛提，特地来到他的牢房将他叫醒。这低声传到葛提耳朵里的是不啻于晴天霹雳的消息：他的二老板已被FBI带走。半夜转狱，葛提知道，只意味着一种可能：公牛萨米成了叛徒。

当天晚上，在特工的簇拥保护下，格拉瓦诺被带到FBI的一个“安全藏身处”，长岛的一家汽车旅馆，接受初步讯问。次日，他被递解到FBI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匡恩提科训练学院做详尽的情况汇报。获悉格拉瓦诺的背叛是真实可信而非葛提的邪恶圈套时，格莱森、马洛尼和莫尔都长嘘了一口气。格拉瓦诺回顾了他的黑社会经历，廓清了笼罩在许多暴力重案之上的迷雾，若非他据实相告，许多都将成为无头悬案。他还警告他们，要小心黑手党正在进行的非法交易和活动。格拉瓦诺被指控实施了三起谋杀，但让他的讯问者感到震惊的是，他坦承参与了另外16宗命案，而所有案件至今都没有告破。在这19起黑手党谋杀案中，格拉瓦诺坚称自己只扣动过一次致命的扳机，他自圆其说地称，他是个旁观者，而不是连环杀手。“有时我是个枪手；有时我是个替补者；有时我把人架起来；有时我只是动动嘴而已”。

他披露的核心内幕是在斯帕克斯牛排屋外如何处死保罗·卡斯特利亚诺和汤米·比洛蒂。格拉瓦诺没有牵连到这两个人的命案中，但他还是提供了关于这起阴谋、

行动的安排和杀手队成员身份的详细内情。他的讯问者惊讶地得知，他和葛提就坐在现场附近的一辆车里，看着这场谋杀剧上演。而且，对于这起谋杀案，他提供了与检方为审判而拼凑的版本完全不同的说法。

“你们完全搞错了，”格拉瓦诺告诉格莱森，“我从来就没有下过车。”站在街上太危险了，格拉瓦诺接着说，因为卡斯特利亚诺可能会看到他并在遭刺客伏击之前溜掉。本来有个证人准备作证，称他看见葛提站在斯帕克斯饭店外人行道上，而格拉瓦诺关于犯罪现场的此番描述让那个神秘证人失去了作证资格。基于格拉瓦诺提供的证据，检方估计那名证人的确是认错了人，把体形与其老板相像的杀手“文尼”文森特·阿图苏当成了葛提。

除了斯帕克斯谋杀案，格拉瓦诺还提供第一手资料说明葛提在过去五年里如何接管并治理甘比诺家族。他的证词夯实了认定葛提是 RICO 组织首脑的最关键的控告。检方和 FBI 还得到另一份礼物，针对葛提 1986 年首次接受 RICO 审判并被判处无罪一事，格拉瓦诺透露了当时买通布鲁克林陪审团的情况。在那起由黛安·贾卡龙提起公诉的案子当中，他详细说明了在“西高地”帮派的协助下他如何向一名陪审员行贿 6 万美元。

公牛萨米对以往未知内情的深度披露需要检方将原来的审判方案进行大幅调整。作为首席检察官，为了说服陪审团裁定约翰·葛提有罪，格莱森紧张地忙碌了两个月以重新进行检控布局。为了在匡恩提科那数不清的讯问当中放松下来，颇具男子汉气质却过于紧张的格拉瓦诺每天都会慢跑三到五英里，然而走进拳击赛场与更年轻更强壮的 FBI 特工厮混在一起。

从第一天，即 1992 年 1 月陪审团筛选开始起，葛提的人格面貌就主导着法庭的气氛。他作为美国头号黑帮分子和司法部通缉的首要黑手党人的名声吸引着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媒体争相报道这一事件。这是葛提五年内被第四次接受审判。风险是很高的。无罪判决对政府来说将是一次重挫士气的失败，但对这个“特氟隆”先生而言，它将巩固其不可战胜的声誉，并有可能使他永远免受后续检控。

当然，约翰·葛提，公然表现出了他对敌手的傲慢与蔑视。他挑衅地瞪视着法官格拉瑟，似乎要从精神上征服并恐吓他。背着陪审团，他故意用别人听得见的耳语大肆辱骂检察官。在一次休庭期间，《新闻日报》记者彼得·鲍尔斯听到他用“毛都没洗干净”的污秽之语骂那位法官和检察官们是“同性恋”。盯着格莱森，他高声向洛卡西奥耳语说，这个检察官正在主导一场针对他“仇杀”，称格莱森脑子里全是他，不会将精力集中在其他人身上。“我是他唯一的被告。他早晨醒来就会向他老婆说，‘你好！

约翰’。”当格莱森走近被告席时，葛提常常怒骂说，“你老婆是个吸毒鬼”。这是对格莱森的妻子进行的荒谬可笑攻击。作为护士，她在工作中想来会接触到毒品。

另一位检察官詹姆士·奥伦斯坦被葛提起了个“基督杀手”的诨名，显然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在其他场合，葛提公开把一名 FBI 特工称“该死的人渣”，而马洛尼是个“狗娘养的笨蛋”。指着体型匀称而健硕的特工乔治·加布里埃尔，他用一种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学比喻称其为“小公爵弗契特勒里”。

人们普遍认为格拉瑟是个公正而坚定的法官，这个布鲁克林法学院的原院长终止了葛提及其律师在以前的审判当中惯用的恶作剧伎俩。再有逾规之举，这位法官警告说，葛提将被带离法庭并被迫通过闭路电视观看审判过程。葛提的法庭滑稽表演就此结束了。

接替布鲁斯·卡特勒出庭辩护的是受人敬重的曾任全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主席的艾伯特·克里格（Albert Krieger）。来自迈阿密的克里格身材高大，头顶渐秃，酷似演员尤尔·伯连纳。他是个出色的反诘问高手，但他好交际的个性激怒了葛提。看到克里格在休庭期间与马洛尼聊天，葛提就专横地要求他不得与敌人交谈。“我最好结束这种闲聊，要不我会被塞进汽车后备箱彻底完蛋。”克里格说道，一边朝马洛尼使着眼色。

葛提偶尔也会表现得轻松愉快。有天下午，马洛尼告诉克里格，称已故教父卡洛之子托马斯·甘比诺刚刚与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达成了交易。根据认罪协议，汤米承认充当葛提的骨干角头非法操纵服装中心大部分货运业务，并同意支付 1200 万美元的罚金。他还承诺将放弃他在服装中心的货运路线。通过对州里从轻指控的敲诈勒索罪认罪，甘比诺得到的补偿是无需到监狱服刑。

克里格将这个信息小声告诉了葛提之后，这位律师转身给马洛尼带回了口信：“告诉马洛尼，我愿意随时交纳 2000 万罚金取得同样的协议”。

担心葛提的断膝手再次向陪审团施压导致前所未有的措施出台。为了一桩旷日持久的讼案，东区首次将陪审团隔离起来并安顿在酒店里。12 名陪审员和备补人员受到异常严格的保护，他们的身份和地址都没有透露给检方和被告方。陪审员们受到法警 24 小时保护，在审判期间不许接见访客，甚至家人，而且他们所有的电话都受到监听。

每天，在法庭那被栅栏严密隔离的一侧，由其家人和追随者组成的追星族挤在那里无限钦佩地注视着葛提。在审判首日，葛提的亲信们聚集在布鲁克林中心区的法庭外，手举标语牌，上面写着，“我们爱你，约翰”。与这些示威者相呼应，一辆吵嚷的卡车大声鸣着喇叭向他致意，好像他是个竞选总统职位的候选人。受葛提那些近臣的

邀请，作为一种精心策划的意在影响陪审团裁定的圈套，好莱坞经常扮演影屏硬汉的安东尼·奎恩（Anthony Quinn）和米基·鲁尔克（Mickey Rourke）及其他影剧界名人加入了其铁杆支持者的行列。这些演员频频向葛提挥手并祝他好运。“我们最好让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为我们一方鼓劲。”马洛尼不无嘲讽地说。他意识到这是为葛提而发起的公关活动。

从开庭陈述开始，格莱森就将一幅检方指控的证明葛提大量违犯 RICO 法律的脉络清晰且色彩鲜明的犯罪图景展示在众人面前。这位检察官追溯了案件的各个主体部分：葛提作为角头所发挥的作用，刺杀卡斯特利亚诺的先发制人且大胆的阴谋，葛提浮出水面成为甘比诺家族老板，和后来在他的批准下发生的一系列谋杀与其他事件。格莱森的许多证据都来源于州调查人员和 FBI 那八年的电子窃听。陪审团被带回逝去的时光之中，听到了葛提在他伯金俱乐部隔壁的私人办公室里，在安尼洛·德拉科罗塞家里，还有——对葛提最具杀伤力的——在拉维尼特俱乐部外的走廊里和在西瑞莉太太的公寓房里进行的谈话。

在审判的早期阶段，表情冷漠的葛提对庭审过程显得满不在乎。他不得不听了六个小时用法庭里的喇叭播放的罪证录音，但他拒绝戴上耳机以便听得更清楚些。为了证实窃听的日期和证明谁在现场，检方出示了黑手党人进出拉维尼特俱乐部的影像和静态照片资料。通常，当那些照片闪现在巨大的屏幕上时，葛提都会转过身去，似乎表明它们与自己毫无关系。或许，他最终意识到了硬性规定角头和重要打手必须经常到拉维尼特朝拜他所造成的危害。那些拜访让他惹火烧身，现在有力地证明了他是一个黑手党老板。

葛提唯一一次完全抛掉伪装是为了和检方最寄予期望的证人“公牛萨米”塞尔瓦托·格拉瓦诺对阵相拼。对格拉瓦诺来说，背叛是一段给他带来累累伤痕的经历。“他进来的时候精神几近崩溃。”布鲁斯·莫尔特别提到。固执的萨米需要不停地听到保证，听到检察官和 FBI 将支持他的减刑请求。“他告诉我们，‘我多年来就恨你们这些家伙。我怎么知道你们会支持我，还证明我是个好证人？’”在格拉瓦诺出庭作证前，莫尔和 FBI 纽约分局局长吉米·福克斯及其他特工经常去看他，保证会给予支持。“我们希望他镇静下来并保持神志正常，不要在证人席上临阵退缩。”莫尔说。

在格拉瓦诺按计划出庭的前一天，格拉瓦诺的面部被整合在一只老鼠身上的图片传单在法庭附近被到处散发，并且还大量地被张贴在树上和建筑物上。其标题是，“典型的撒谎老鼠：‘说谎者’萨米·格拉瓦诺。”作为证人首次出庭时，格拉瓦诺抛去了他惯常的不拘礼节的工人装风格，差不多是在模仿葛提的高档穿戴。每天来到法

庭时，他都穿着裁剪考究、色调保守的双排扣套装，并挂配各种饰物。为了确保这位特殊证人的安全，政府派出魁梧结实的美国法警将法庭围了起来。在直接面向葛提的拉拉队队长们的第一排公共坐席上，一群从FBI特警队挑选的身体健壮、留着平头的特工坐在那里。

在出庭作证的9天里，格拉瓦诺充当着审判的主要证人。坐在离被告席十几米的地方，他和葛提进行了几个回合的目光与气势上的较量，格拉瓦诺没有眨眼或表现得不安。回应格莱森那诚恳的讯问时，格拉瓦诺供认了一系列十恶不赦的罪行，承认参与了多达19起的谋杀案，而其中10起就发生在葛提任家族老板的时候。他关于保罗·卡斯特利亚诺处决行动的策划与根本原因的讲述，还有他那令人信服的对斯帕克斯外面那起谋杀案一分钟一分钟地重新再现，都为那项特定的指控提供了最为坚实的支撑依据。

在西瑞莉房间的一段谈话录音中，葛提开玩笑地称必定是警方杀死卡斯特利亚诺，这是被告律师最强有力的支撑点证明他与大保罗谋杀案无关。葛提讲到这番话时，格拉瓦诺也在那房子里。他解释说那是一句谎话，一句内部人开的玩笑。“当说到是警察干的，或许是警察干的时候，他会做出一种表情并打着手势，然后是一阵傻笑。”格拉瓦诺作证说。

在大多数黑手党审判当中，检察官们都靠特工或侦探来解释窃听录音中黑手党人那些令人费解的措辞。遇到需要解读黑手党的暗语和葛提的古怪言词时，公牛萨米是一个比任何特工或警察更有说服力的专家。通过格拉瓦诺，检方向陪审团提供了一本极为珍贵的关于“科萨·诺斯特拉”习俗与传统的启蒙书。甘比诺家族的指挥系统、指向葛提的财富流动、葛提的行为依据和他下令实施五起谋杀的动机都被格拉瓦诺逐一解释了一番。

当萨米面无表情地坐在证人席上时，他周遭的紧张空气几乎令人窒息。有两个女人竭尽全力地要冲破法庭门口警卫们的阻挡，同时大喊着说他在掩盖他自己的罪行。“杀人犯！唾弃你！鄙视你！”其中一个尖叫着，同时挤向法庭门口。她后来告诉记者说，格拉瓦诺要为她两个儿子的死负责。炸弹恐吓差不多司空见惯，它迫使整个法庭休庭三次。法官格拉瑟也未能摆脱恐怖的气氛。在收到死亡威胁之后，他受到了24小时保护。

在五天的时间里，格拉瓦诺经常受到葛提的律师艾伯特·克里格和安东尼·卡迪纳尔（Anthony Cardinale）（一位替弗兰克·洛卡西奥辩护的思维敏捷的代理律师）那

尖刻且急速的质问。通过尖锐的提问，他们暗示格拉瓦诺把自己未经葛提允许而犯下的罪行推到葛提的头上，并竭力让他落入圈套。克里格和卡迪纳尔谴责公牛萨米是个“满肚子坏水的小人”，一条没有良心的“毒蛇”。克里格不停地朝他猛烈炮轰，要他承认面对自己恶贯满盈的一生，他唯一能够取得特赦的办法是将葛提的人头放在托盘上交政府。

格拉瓦诺没有慌乱，他承认想避免在监狱度过余生。“我希望改变我的生活，而这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说出我整个生活方式的真相。”他回道，击退了被告律师的进攻。尽管进行了种种娴熟而机敏的诘问，但这些律师未能挫败格拉瓦诺的防守，也没有找到其证词中存在任何明显的矛盾或直白的谎言。作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证人，他让这个以窃听录音为基础的原本证据确凿的检控案件楔入得更深。

格拉瓦诺作证的时间越长，葛提的镇静就消失得越多。他不再常常向其支持者微笑，在与律师低声交谈时也明显烦躁起来。被告方的唯一证人是税务律师，他声称葛提一向免于向美国国内税局申报收益，因为他一直因涉嫌犯罪而受到调查。这名律师的观点明显文不对题，所以在交互讯问当中，他的证词被斥为毫无价值。否则，被告方还会依靠交互讯问反驳其他罪状。法官格拉瑟拒绝被告方要求传唤数名证人质询拉维尼特录音带的听觉可靠性并质疑格拉瓦诺的精神稳定性。格拉瑟裁定那些证人不具备专家资格引来被告律师卡迪纳尔的强烈抗议。这位律师言辞尖锐的异议让葛提的脸上泛起了一丝光彩。他热切地握着卡迪纳尔的手，满意地说他至少有一个律师在战斗，在挑战法官的权威。

双方庭辩总结的焦点都集中在案件的两大支撑依据，即录音和格拉瓦诺身上。克里格和卡迪纳尔极力降低录音的可信度，称那些录音谈话脱离了上下文，把葛提的话辩解为哗众取宠的胡闹，是对粗野的个人和赌客讲过的夸大其词的街头俚语，而不是黑手党老板授权谋杀或讨论犯罪的谈话。如果有真实的谋杀发生，辩护律师就争辩称，那也是检方的明星证人萨米·格拉瓦诺犯下的。代理洛卡西奥出庭的卡迪纳尔申辩说，谈话时其当事人仅仅露个面，很少讲上一句话，因此不足以证明他犯下了RCIO罪行。这两名律师都责骂格拉瓦诺，称他是个为夸大其证人的重要性和求取宽恕而编造谎言的撒谎者。在大多数旁听者看来，这显然是一种徒劳的策略。无论他们怎么费尽口舌，这些律师都不能驳倒格拉瓦诺，而葛提在录音里的声音自始至终都如水晶一般清楚明白。

格莱森的总结强调了他的论点。陪审团，他声称，无论是单凭格拉瓦诺的证词还

是窃听录音，都能找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犯罪者犯下的每一条罪行。实际上，检方已经证实了安德鲁·马洛尼在开庭陈述中发誓要证明的东西：“这是一个黑手党老板用自己的话、用自己的手（格拉瓦诺）把自己打倒的案子。”

听了六个星期的录音和证人的证词后，陪审团只需两天另加 14 个小时审议出结果。1992 年 4 月 2 日，葛提被宣告犯有全部 13 条 RICO 罪行，除了一项较轻的非法赌博的指控外，洛卡西奥也被裁定犯下了其他所有罪行。在为铲除葛提辛勤工作了数年的检察官和特工的簇拥下，FBI 驻纽约最高官员吉米·福克斯当庭表达了政府的喜悦欢快之情。“这个特氟隆先生完蛋了。他已经被牢牢捆住，所有指控都令他动弹不得。”

两个月后，葛提再次出现在法官格拉瑟面前接受正式宣判。他交叉着双臂微笑着，一言不发地放弃了判决前陈述的机会。其结局毫无悬念：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弗兰克·洛卡西奥也得到同样的判决，这个在审判过程中几乎被人遗忘的被告高声赞颂他那已经垮台的首领。“作为约翰·葛提的好友，我深感遗憾。如果地球上有更多像约翰·葛提这样的人，我们就会拥有一个更美好的家园。”

27 岁的律师罗纳德·库比（Ronald Kuby）当时在协助葛提的法务人员工作。他觉得这个“潇洒先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听完判决片刻之后，库比和其他律师看到葛提被带进“待宰栏”里。他那高档的黑色双排扣套装、绸缎衬衣和黄色的领带被扒了下来，换上了犯人的素色连衫裤囚服。除了终身监禁的判决之外，法官格拉瑟按照形式上的要求，向葛提处以 50 美元的罚款以支付法庭的文书费用。

“他完全放松了，一脸的笑容，”库比回忆道，“他说出的第一句话是，‘那个法官，他肯定知道如何用那 50 美元的罚款伤害一个人。’”

法庭外面，许多来自伯金狩猎与捕鱼俱乐部的人不断地呼喊着，“放掉约翰·葛提”。听到判决，抗议者们突然发动了一次小规模暴乱，他们推翻汽车，与警察及法警们混战成一团，直到增援部队赶来将他们驱散开去。

葛提又回到了大都会惩教中心的牢房，但并没有待多久。他当天午夜被唤醒，在黎明之前被一队警车送到了新泽西州泰特博罗市的一个小型机场。以前因为害怕空难而拒绝飞行的约翰·约瑟夫·葛提被推上了政府的一架小型喷气式飞机。他的手和脚被戴上了镣铐，身边围坐着美国法警。他将被带往伊利诺斯州马里恩市一座防备措施最为严格的重罪监狱，在当时的联邦刑法系统当中，它是最为严苛的监狱。1992 年 6 月 24 日的那天上午，他被送进一间被特别隔离的侧牢之中，关押在这里的他实际上要在这孤独的禁闭状态中度过余生。

第 38 章 苦涩的结果

利用这些家伙时就像在驯养一匹狼。你可以放手喂他们，但他们终究是狼，你绝不能信任他们。

这些好伙计赢了，但得付出代价。

大赢家是洗刷了耻辱的东区检察团队和布鲁斯·莫尔的 FBI 小组，这些律师与特工的策略让约翰·葛提失蹄落马。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司法部和 FBI 的官员们评价称，葛提的失败是一次强烈的心理震撼，震慑的不仅仅是甘比诺家族，而是整个黑手党。FBI 纽约分局局长吉米·福克斯和美国检察官安德鲁·马洛尼高兴地指出了黑手党愈加悲观的原因。首先，有罪制裁决表明，哪怕是最令人生畏的“科萨·诺斯特拉”教父，政府都能把他送进监狱。也许更重要的是第二点原因：官员们相信，公牛萨米的背叛损害了黑手党最有用的资产——“乌默它”。通过变成全国地位最高的黑手党背叛者，他宣传了根据 RICO 法令创立的证人保护项目的有效性。他向美国所有地方的黑手党人证明，通过指证上级可以使自己免于惩罚并开始新的生活。享有威信的格拉瓦诺临阵变节无疑增加了老板和角头们行动的困难，他们现在不得不考虑一旦检控危机出现时，他们的手下和最亲密的伙伴能否保持忠诚之心。

就在纽约执法机关高层在舆论上异口同声地欢呼葛提被打倒时，因调查冲突而引起的不快已经悄悄让高层官员之间的关系恶化起来。这种不快是欲将葛提定罪的激烈竞争和 FBI 与马洛尼所持的策略留下的后遗症。

FBI 窃听西瑞莉太太的客厅取得了成功，但这却招来了其他机构的憎恨。几盘最令人震惊的录音带都是 1990 年初葛提在曼哈顿受审时录下的，当时州里指控他下令谋杀木匠协会领导人约翰·奥康纳。FBI 特工录到葛提谈论至关重要的事情，而这些谈话对摩根索的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和罗纳德·戈德斯塔克领导的有组织犯罪特



纽约政府官员（从左至右）：FBI 纽约分局局长吉米·福克斯、FBI 刑事处主管威廉·多兰和纽约东区美国检察官安德鲁·马洛尼在为葛提的有罪裁决而欢庆。马洛尼挫败了曼哈顿联邦和州检察官欲从其管辖区夺取葛提案的企图。（美国司法部特许转载的照片）

遣队极为重要。录音带曝光了葛提涉嫌买通陪审员操纵那起人身伤害案的阴谋。经过数年密集的调查之后，摩根索和戈德斯塔克的人当时正就奥康纳案联手提起公诉。在其中一盘录音带上，葛提被听到讨论如何设法接近据信是一家公用事业公雇员的陪审员“博伊尔”或“霍伊尔”。葛提的主意是派遣“西高地”的爱尔兰成员，让他们找到那名据认为具有爱尔兰民族背景的陪审员以施加影响力。

另一盘录音中含有一条令人震惊的信息，即执法机关内部有一名间谍在替甘比诺家族刺探情报。从西瑞莉房间的谈话来看，很明显这个间谍已经向那些黑手党人泄露了秘密，称州特遣队一直在窃听萨米·格拉瓦诺那位于布鲁克林的建筑公司办公室。格拉瓦诺当时刚刚由顾问提升为二老板，那里的窃听器本来很有可能会为调查者带来诸多情报。同样令人不安的信息是，那名间谍为了获取酬金正在提供有关州里已展开调查行动和即将对黑手党提起控告的秘密情报。

取得 FBI 的合作之后，马洛尼决定不将这新的情报告诉摩根索和戈德斯塔克，当时他手下的联邦检察官们正在整理西瑞莉房间的窃听录音。马洛尼认为，与贿赂陪审团有关的谈话“过于含糊”，对正在起诉葛提的州检察官们没有什么价值。“在贿赂陪

审员或阻碍司法方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他们。”马洛尼声称。不过他承认受到FBI的影响，当时FBI反对向其他机构吐露拉维尼特窃听行动的存在。“FBI不信任戈德斯塔克的办公室，认为它可能是个走漏消息的漏洞。”马洛尼后来吐露说。

莫尔同意马洛尼的观点，认为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陪审团受到贿赂。他说，FBI所考虑的主要是成功地实施拉维尼特窃听行动并抓到深藏在执法机关内部的叛徒。联邦官员关心的是他们自己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在奥康纳审判期间，葛提被窃听的消息稍有泄露就有可能令西瑞莉房间里的窃听行动在初期阶段就遭到失败，进而毁掉甘比诺小组和东区正在着手准备的RICO案件。

在奥康纳案遭遇惨败的几个月之后，摩根索愤怒地得知FBI没有将他们关于陪审团可能遭到贿赂的怀疑和证据告诉他。检察官们深知，贿赂和胁迫陪审员是甘比诺家族惯用的手法。因此，在那桩人身伤害案开始审理之前，这位地方检察官已经在竭力防范潜在的危险。他和二把手芭芭拉·琼斯（Barbara Jones）急切地需要吉米·福克斯做出保证，如果FBI获得陪审团遭贿赂的任何线索都得及时相告。摩根索接下来的步子迈得更远，他请求FBI局长威廉·韦伯斯特给予同样的帮助。而首席检察官迈克尔·彻卡斯基认为他已经从莫尔那里取得了类似的承诺。

西瑞莉房间的录音里关于讨论并计划贿赂陪审员的证据本可以让摩根索请求判决无效。此外，这些录音还会增强州里的证据的说服力，因为葛提谈到与“西高地”合作，而这在指控他的人身伤害案中是个举足轻重的议题。

“FBI对我撒谎了，”愤愤不平的摩根索向其高级助手们诉苦说，“他们以为就他们自己代表政府”。

州首席有组织犯罪检察官戈德斯塔克感觉受到FBI和马洛尼的双重背叛。他们没有就潜在的陪审团问题警告过他，也没有告知其办事处对格拉瓦诺办公室所进行的代价高昂的电子窃听活动已被叛徒曝光。让戈德斯塔克更加愤怒的是，他曾毫无保留向马洛尼和FBI提供情报支持帮助他们展开RICO调查。他的办事处将葛提在伯金俱乐部里谈话的罪证录音带交给了联邦检察官，这些录音都是在发生卡斯蒂利亚诺谋杀案和葛提接管家族后不久搞到的。戈德斯塔克的一名检察官还曾经在东区检控葛提的案子中全职为马洛尼效力。“我们应该是联合调查的一部分，但他们从不告诉我们从拉维尼特搞到的对我们的案子极具影响的情报，”戈德斯塔克愤然道，“我要求马洛尼做出解释时，他告诉我，‘我不必做任何辩白。FBI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情，而我们就没有告诉你，仅此而已。’”

葛提击败了奥康纳人身伤害案的指控之后，戈德斯塔克痛苦地听到其调查员乔·

科菲与一名 FBI 特工在醉酒后的一席谈话。“他告诉乔，”戈德斯塔克说，“‘我们在流口水。我们等着你们输掉，这样我们就能起诉他了。’”坦率的马洛尼同意戈德斯塔克的想法，认为在捕捉葛提的问题上的确存在暗中较劲的现象。“FBI 当然高兴州里的案子出现无罪判决的结果。”马洛尼承认道。但这位检察官和 FBI 坚持己见，声称在州人身伤害案审判期间，从未发现真正能证明葛提的盟友接触或影响陪审员的证据。

戈德斯塔克仍然相信，凭着其调查员提供给东区的葛提录音带，加上其他的有效证据，就能够在 FBI 实施拉维尼特窃听行动前的两三年证明那个“特氟隆先生”犯有数项 RICO 罪行。“这不是嫉妒，”戈德斯塔克坚持说，“这是常识性的看法，FBI 得自己办案，然后赢得所有荣誉。他们不想以其他机构的证据为基础将葛提定罪”。

对于莫尔来说，挖出甘比诺家族在执法机关里的间谍是当务之急。仅凭录音带里的一条线索，甘比诺小组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安德里斯·库伦斯（Andris Kurins）就查出了那个叛徒。库伦斯从录音中找到的点滴线索是甘比诺家族的合伙人乔治·赫尔伯格（George Helbig）以某种方式卷入了间谍活动。非意裔的赫尔伯格是个为葛提的角头“小平头乔”约瑟夫·科罗欧（Joseph Joe Butch Corrao）效力的执法人和高利贷者。通过重点调查赫尔伯格的业务联系和对他的电话进行录音，库伦斯最终解开了谜团。

告密者是个名叫威廉·派斯特（William Peist）的侦探。此人被分配到纽约警察局情报处工作，而那是一个协同 FBI 及其他机构对黑手党展开联合调查的精英部门。因从前做过厨师被人起绰号为“面包师”的派斯特有着毫无瑕疵的警察任职经历。其左腿在一次车祸中受伤被切除后，他被安排在情报处一个工作轻闲的职位上。保险公司因车祸向派斯特支付了 134.5 万美元的保险赔偿金，但警察局拒绝了他领取因公免税养老金退休的请求，因为事故发生时他并未执行公务。

显然是为了报复养老金和提前退休遭到拒绝，派斯特与远房亲戚彼特·梅维斯（Peter Mavis）商定向甘比诺家族提供秘密情报。这名探员知道经济窘迫的梅维斯是个高利贷客户，偶尔与甘比诺家族的暴徒赫尔伯格进行合作。派斯特有机会接触警察局与州里的黑手党秘密情报档案并且愿意将其卖出，但他从未与甘比诺家族的成员接过头，都是通过彼特·梅维斯向他们传递情报。秘密被传给赫尔伯格后，再由他转给直接交到葛提手中的约瑟夫·科罗欧。

因为黑手党人都不知道他的身份，所以派斯特感觉很安全。尽管通过保险理赔他拥有 100 万美元的存款，但这名侦探在过去的数年中还是为了区区 2 万美元的蝇头小利向黑手党出卖情报。主要靠进行电话录音排查，所有阴谋者都被勤奋执著的库伦斯给追查了出来。1993 年，派斯特对一项联邦诈骗指控认罪并领受 7 年半的刑期。

派斯特被判刑是奥康纳人身伤害案的一种喜忧参半的结局。根据派斯特的供述，摩根索和戈德斯塔克评估了他给他们办公室造成的总体损失，考证了他毁掉的多年来的调查成果，其结果令他们灰心丧气。在奥康纳伤害案审判当中，派斯特被指派承担了保护匿名陪审团的敏感任务，他因此能够向甘比诺家族吐露至少一名陪审员的姓名。他曝光了州特遣队在格拉瓦诺办公室里的窃听活动，掐灭了州调查人员的所有希望，让他们无法搞到与甘比诺家族活动有关的潜在证据与线索。总而言之，单单一个堕落的警察或许就给摩根索和戈德斯塔克造成了无可逾越的障碍，让他们无法打败那个“潇洒先生”。

即使纪律严明的 FBI 也被这轰动性地调查甘比诺家族所引起的名誉与经济上的纷争所激怒。1991 年，因为他们一本讲述如何调查保罗·卡斯特利亚诺、约翰·葛提和甘比诺家族其他权势者的书《老板中的老板》，特工安德里斯·库伦斯和约瑟夫·奥布赖恩（Joseph O'Brien）在 FBI 的狂怒声中辞职。特工们记述了调查手法并公开了窃听摘录，但 FBI 官员称该书选用的材料没有得到认可，因为那些录音从未被带进法庭作为证据使用。愤怒的特工和官员们炮轰库伦斯和奥布赖恩涉嫌虚构事件夸大自己的功绩，靠其他调查人员的成绩沾名钓誉。该书对卡斯特利亚诺性生活的详细描述让 FBI 高层颇为尴尬，根据法律这些内容不应该出现在 FBI 的档案当中。这场争吵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 FBI 的一条神圣的原则：特工不得靠为政府工作时取得的机密证据谋利。据称库伦斯和奥布赖恩可望获得 100 万美元的版税和影片权益。

“就个人感受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实际上让所有特工感到恶心，”吉米·福克斯当时说道，“这是个极其恶劣的先例”。据福克斯称，这些特工将“一本教科书”交给了黑手党，让它知道了 FBI 从事秘密调查与监视的种种手段。

这两名特工都是在四十五六岁时迫于压力离开了 FBI，而再有几个月他们就有资格领取退休金了。州有组织犯罪特遣队声称，奥布赖恩就是那个故意破坏他们录像取证行动的“高个子”特工，1983 年 6 月他们本打算将黑手党头目们进出巴里酒店参加管理委员会会议的情形进行录像。在该书出版之前，两名特工都受到过高度褒扬。主要因为参与过卡斯特利亚诺案的调查，奥布赖恩还荣获司法部长颁发的杰出服务奖。

数年后，奥布赖恩为那本书的可靠性进行了辩护，否认该书含有对黑手党有用的敏感信息。被问到他和库伦斯的作用在检控卡斯特利亚诺和甘比诺家族其他黑手党人时是否被夸大时，他回答说，“有些是言过其实，但书中所写的绝大部分都是准确的。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公牛萨米也成了—本书中对抗甘比诺家族暴行与恐吓的主人公。格拉瓦诺在“潇洒先生”的审判中表现出色，此举让他由随从式的黑手党人成了一个恢复了正常生活的黑帮名人。在审判结束 18 个月后，因实施多起谋杀和涉嫌敲诈勒索，他再次出现在原来的那个法庭接受法官格拉瑟对他的判决。听证会更像是表彰其功绩的庆功会，官员们讲着种种悦耳动听的话竞相赞颂格拉瓦诺，褒扬他对执法机关和整个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约有 90 名检察官和调查人员给格拉瑟写信热情洋溢地称赞格拉瓦诺。

在申明政府认知“格拉瓦诺犯罪行为的范围与严重性”的同时，首席检察官约翰·格莱森称他是“有组织犯罪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证人”。除了葛提的落网，甘比诺及其他犯罪家族至少 37 名黑手党人与帮手被判刑或认罪，格莱森将其归功于格拉瓦诺的证词或他出庭作证的威慑力。作为对格拉瓦诺那杰出贡献的认可，FBI 的吉米·福克斯赠给他—件专门授予特工以旌表英勇行为的奖品———块经过特别设计的正面有—面美国国旗的手表。

在宣判之前，格拉瑟引述了—名 FBI 特工的看法，称格拉瓦诺决心指证葛提是“我所见过的最勇敢的事情”。这位法官看来同意格拉瓦诺的支持者们的评价，认为他由目无国法的黑手党人变成了—个拥护法律与秩序的人。“从来没有—个在有组织犯罪中拥有他那般地位的被告从—种生存状态跃进到另—个生存状态。”格拉瑟宣称。

格拉瓦诺与政府达成的协议约定其最高刑期为 20 年。格拉瑟盛赞公牛萨米在进攻黑手党的战争中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将其刑期减为 5 年监禁和 3 年监督释放。这样宽大的量刑意味着在被永久释放前，格拉瓦诺只需再接受 9 个月的待遇优厚的羁押，并且偶尔还会在黑手党案件中出庭作证。正式羁押期结束后，成了自由公民并改名为吉米·莫兰的格拉瓦诺和妻子及两个孩子—起定居在亚利桑那州。在背叛家族的时候，格拉瓦诺留在街面上的 150 万美元“高利贷账款”被甘比诺家族没收。单凭那块生意，他每年至少可有 30 万美元的进账。在他数百万美元的资产当中，政府允许他还可以拥有其中 9 万美元的现金与家财，并且每个月发给他 1400 美元安家生活费。

发现政府的经济资助和保安条款过于束手束脚，格拉瓦诺于 1995 年 12 月脱离了只在里面待过 8 个月的证人保护项目，走上了自谋生计之路。1997 年，他与作家彼得·马斯（Peter Mass）签订了协议，准备以其黑手党的经历为题材出版—本个人传记。为宣传这本名为《二老板》的书，格拉瓦诺接受了电视采访，暴露出他并未大幅改变自己的容貌。其脸部唯一的变化是通过整形手术矫直了两度骨折的鼻子。尽管没有吐露自己的假名和新地址，但格拉瓦诺声称不怕遭到前同伙的报复。“我不会躲避

黑手党。”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二老板》将他由暴徒转变成“科萨·诺斯特拉”百万富翁的冒险经历进行了净化处理，该书对于他那骇人听闻的谋杀和犯罪，要么进行辩解，要么完全略过。萨米认为是诵读困难迫使他过早地离开了学校，怪罪本森赫斯特那浓厚的“科萨·诺斯特拉”氛围诱使他加入了黑手党。（格拉瓦诺翻来覆去地强调那不变的误导于人的老套话，也就是在自己指证从前的犯罪同伙时，他也曾是个受害的年轻人。在审判的过程中，他称自己是个“贫民区的产物”，尽管他孩提时的本森赫斯特是个街道整洁、草坪平整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杂居的地区，他的家庭也足够富裕，全家人都可以在长岛的度假别墅里度过每个夏天。“这是个聪明汉教唆孩子们如何去偷，如何去抢劫并鼓励他们杀人的地方，”格拉瓦诺声称，“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贫民区”。）

他声称，他作为荣誉者能够生存下来靠的是服从命令，哪怕被要求杀人或背叛家人与朋友。这个忏悔的黑手党人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半合法的建筑承包商和餐馆老板，一个设法阻止葛提的谋杀冲动与暴行的黑手党改革者。据格拉瓦诺称，在忠心耿耿地为葛提效力了5年之后，当得知其老板打算在联合审判中出卖他时，他才决定背叛。做了25年的黑手党人之后，他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悟：黑手党那受人敬仰的荣誉规则都是虚伪的。“一切都是为了贪欲与权力，”格拉瓦诺这样写道，“实际上，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玩笑”。

这本书让他净赚了至少25万美元，这让他有资本在菲尼克斯市开了一家名为“马拉松”的游泳池建筑公司。在他从前创办于布鲁克林的几家具有黑手党背景的建筑公司当中，有一家就用到这个名字。这些年来，萨米一直与在葛提案中倚重于他的检察官格莱森保持着联系。1994年被任命为一个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之后，格莱森通常在圣诞节前后都会接到格拉瓦诺打来的问候电话。无论是把格拉瓦诺当成朋友的格莱森还是FBI特工都没有怀疑他处在某种麻烦之中，但在2000年2月，公牛萨米的生活又回到了原地。他在亚利桑那州因州和联邦毒品指控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和女婿。起诉书控告他是一个贩毒团伙的头目和融资者，靠贩卖一种在年轻人中间颇有市场的违法兴奋剂——摇头丸，这个团伙每周的总收入约为50万美元。

在审判葛提和其他黑手党人的交互讯问当中，格拉瓦诺在毒品问题上受到过讯问。辩方律师徒劳地想通过表明他参入了毒品交易令他信誉扫地。无论是在证人席上还是后来在他的书中，格拉瓦诺都严辞否定与毒品交易有一丝关系，并坚称他的一个黑社会原则是绝不碰毒品。“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排斥它——毒品，”他多次作证说，“我是个黑道中人。但我不喜欢毒品生意”。

在《二老板》中谈论另一个道德问题时，他批评葛提鼓励自己的儿子小约翰成为荣誉者。格拉声称，他绝不允许儿子杰勒德或任何其他亲人步其后尘加入黑手党或从事任何方面的犯罪。“我是绝对反对的，”他于1996年作证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是一些诚实守法的人，不要与我所干的这些事情和‘这种生活’有任何瓜葛。”被标榜为政府的模范证人5年之后，他成了一个颜面无存的困窘者，一个把自己的家人——不仅是儿子，还有妻子和女儿——募入其组织里的毒品贩子。

萨米的谎言欺骗了FBI，在因涉毒被亚利桑那州当局逮捕之前，他与特工们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99年9月，就在他被捕前不久，在菲尼克斯举行的联邦调查局全国主管特工会议上，他还是个有名的演讲者，他的题目是：有组织犯罪如何运作。

审前听证会之后，在布鲁克林那个他经常作为检方证人出庭作证的联邦法庭里，格拉瓦诺与儿子对阴谋贩卖危险毒品的指控低头认罪。现在，那曾经让葛提落马就擒的同类证据——被秘密录音的谈话和背叛者的证词使格拉瓦诺负罪领刑。在被窃听的电话里，格拉瓦诺被听到与妻子及女儿谈论毒品收益。在他那拥有三十多名成员的摇头丸贩卖团伙中，一些把他当成英雄崇拜的年轻人作证说，格拉瓦诺喜欢被人称为“老板”和“大佬”。他教他们如何运用谋杀的最佳武器和技巧，并用他那刺耳的声音谈论要在亚利桑那州成立新型的黑手党组织。“他不会安于现状在亚利桑那州做个游泳池推销商或者经营一家建筑公司，”美国检察官助理琳达·兰西威尔（Linda Lacewell）在听证会上说道，“他想重温旧日荣光，他想找回往昔的‘生活’，想重掌权柄”。

被捕之后，热衷于健身的格拉瓦诺被诊断患有格雷夫斯氏病。这种愈显严重的甲状腺疾病让他看起来非常憔悴，他双目凹陷，两只大耳朵在其秃头上显得特别突出。作为案件审理的一种结果，亚利桑那州当局以《二老板》的收益可追溯到他的敲诈勒索时代为由没收了格拉瓦诺40万美元的财产和图书版税。该州打算将这笔钱分给格拉瓦诺的谋杀受害者的家庭。

联邦法官阿林·罗斯（Allyne Ross）判处格拉瓦诺20年监禁，同时责骂他积习难改，亵渎了政府和司法机关给予他的仁慈与信任。这个刑期要比量刑指导所建议的多出4年，表明政府对格拉瓦诺的背叛异常愤怒。加上在亚利桑那州对州里的多项毒品指控认罪，他直到77岁高龄才有资格获得保释。萨米那自称“公牛宝贝”的儿子被处以9年零6个月的监禁。

这次因涉毒被捕或许救了格拉瓦诺的性命。1999年7月，《亚利桑那共和报》报道他生活在该州且状况良好，并表示他对黑手党颇为鄙视。格拉瓦诺声称他曾设法避

免新闻的报道，但还是受到这家报社的“讹诈”而接受了采访，因为如若不然它就会曝光他与妻儿住在菲尼克斯地区的真相。这份报道被全国媒体转载，纽约的黑手党人被他明目张胆地生活在亚利桑那州激怒了，就唆使他从前的伙伴前去除掉他。格拉瓦诺的狂妄对甘比诺家族的统治集团来说是一种无以释怀的刺痛。据调查人员称，其他家族鼓动甘比诺家族杀掉格拉瓦诺以惩罚他对“科萨·诺斯特拉”的不敬，并以此为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明叛逆者公然挑衅黑手党会有什么结果。

格拉瓦诺本身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杀手，他已准备好面对迟早都会寻他而来的杀手队。他总是随身携带着武器，穿着防弹内衣，频繁地变换着装有大量警报系统的住所，并在家里养了一条护卫犬。

其中一个受命带着炸弹与枪支前来刺杀格拉瓦诺的人是其妹夫爱德华·加拉福纳，此人要认出他没有任何困难。这些衔命而来的杀手盯上了格拉瓦诺，但他们的阴谋被亚利桑那州警方挫败。在黑手党人设下圈套伏击萨米之前，他因摇头丸东窗事发而被收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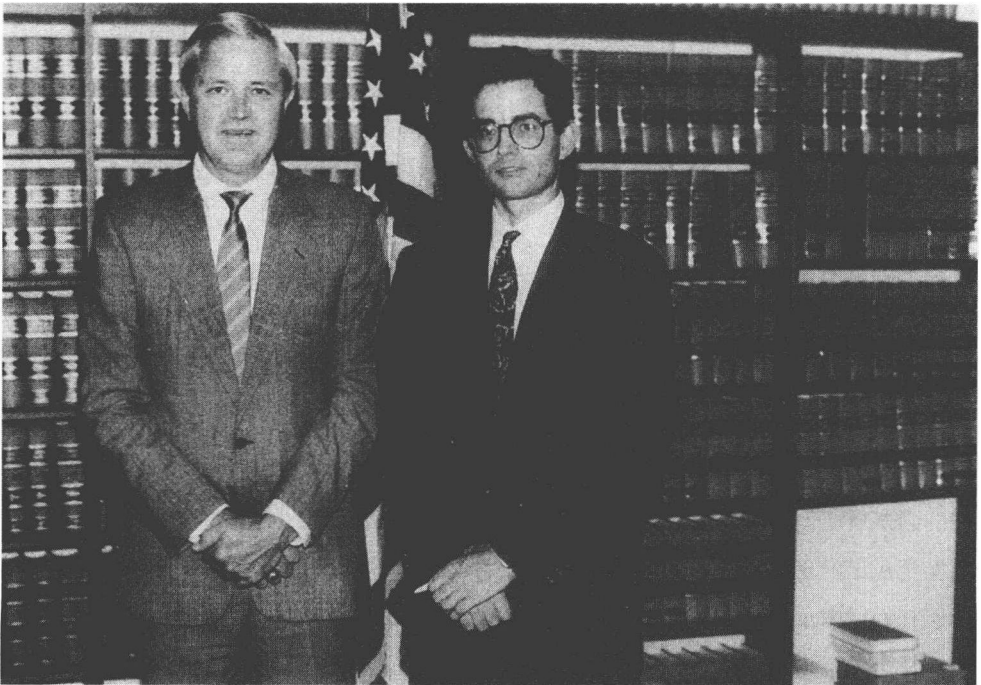
格拉瓦诺往日的另一个秘密于2003年被曝光，当时黑社会职业杀手理查德·库金斯基（Richard Kukinski）把他牵连到1980年的一桩凶杀案当中，而那起命案的受害者是一位纽约僻地居住的侦探。库金斯基被判处了四个终身监禁，在纽约服刑的他声称格拉瓦诺交给他一份谋杀合同，让他带着霰弹枪赶到侦探彼特·卡拉布罗（Peter Calabro）位于新泽西鞞河市附近的家中将其杀害。格拉瓦诺没有承认犯下了那桩“悬案”的罪行，新泽西卑尔根县的检察官们也拒绝说明这起凶杀案的动机。但卡拉布罗被杀之后，他被怀疑接受了甘比诺家族一个盗车团伙的贿赂。库金斯基自夸开了一家只有一个人的谋杀公司，已经为黑手党和其他客户完成了一百多单谋杀合同。他的绰号叫“冰人”，这和他在处理受害者尸体前先将其冰冻起来的习惯有关。

回顾过去，对格拉瓦诺的5年从轻量刑负有责任的政府官员和法官格拉瑟是受病态的固执所驱使，决意要打破约翰·葛提在法庭上战无不胜的神话。联邦机构过分强调格拉瓦诺的价值，过分强调了他在审判葛提时提供的帮助和他那可能的人格转变。检察官们后来承认，除了以策划谋杀了保罗·卡斯特利亚诺的罪名将葛提定罪之外，格拉瓦诺的证词虽然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但还不是决定性的。仅凭将葛提牵连到其他三起谋杀案之中的拉维尼特录音带就足以保证有罪裁决和对其处以终身监禁的量刑。检察官和特工对他们给予公牛萨米最大优待的提议进行了辩护，反复强调了他促成的诱使其他“科萨·诺斯特拉”背叛者变节的波纹效应。（RICO的严厉惩罚和政府资助

的证人保护项目已经招来了大批黑手党告密者。)对也罢,错也罢,官员们宣称格拉瓦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让许多杀手和敲诈勒索者在对整个社会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害之前就被判刑。

然而,在考量格拉瓦诺的贡献时,刑事司法系统还是忽略了他自私自利的动机和他肮脏的犯罪经历。他变节的时候完全知道通过拉维尼特录音带取得的如山铁证必定让他领受终身监禁的惩罚。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像所有陷入 RICO 困境的黑手党人一样,他知道检方以从轻量刑引诱合作证人的曼特罗咒语:“先进来(合作),先离开(监狱)”。如果要为那 19 桩命案和他任二老板时的可恶经历承担责任,即使是 20 年的最高刑期也显得代价低廉。格拉瓦诺签约成为检方证人指证案犯是他犯罪生涯中最为成功的骗局,他本人对此也了然于胸。

“他得到的是关乎其一生的交易,”在评价发展黑手党背叛者的困难时,甘比诺小组原负责人布鲁斯·莫尔说道,“利用这些家伙时就像在驯养一匹狼。你可以放手喂他们,但他们终究是狼,你绝不能信任他们。萨米就是这种人。”



布鲁斯·莫尔(左)谋划了 FBI 的一个长远战略,旨在终结约翰·J·葛提作为美国最臭名昭著的黑手党教父的统治。虽然葛提在法庭上的攻击令他不安,但年轻的约翰·格莱森是将这个黑手党大佬定罪的首席检察官。(美国司法部特许转载的照片)

第 39 章 自我崇拜

如果你总和傻瓜纠聚在一起，那你就会和他们一样变得弱智低能。

“我的灵魂告诉我，得选择我已经选定的每条道路，我没有更多的选项。仔细听好喽，即使你们能活 5000 年，你们也不会看到另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尽管被囚禁在联邦监狱系统的深牢大狱之中，与纽约的“科萨·诺斯特拉”家族和亲人相隔千里，但约翰·葛提并不打算放弃其家族老板的头衔。美国黑手党于 1931 年成立之始确立了一条神圣的规定，若非死亡或让位，教父不得被免职。于是在 1992 年，约翰·葛提援用了这条规定。通过甘比诺家族俱乐部里的窃听器和线人所提供的情报，FBI 知道他决心抓住那权力的外表并保持他在重大决策中的发言权。政府同样决心挫败他的如意算盘，联邦监狱局将他转到当时防备最为严密的监狱，即伊利诺斯州南部马里恩市那个超级设防的“惩教所”。马里恩监狱于 1963 年启用，取代了闷热的阿尔卡特拉斯岛监狱，可以容纳 350~370 名被认定为危险或在其他监狱造成纪律麻烦的犯人。

囚号为 182-053 的葛提被关在马里恩监狱管理最严格的监区，接受无限期的单独囚禁。在绝大多数日子里，他每天被禁闭 21~23 个小时，只能与看守联系。看守通常通过囚室门上的小窗口传给他盛在金属托盘里的食物。这个挑剔讲究的“潇洒先生”衣着上的唯一变化是总穿着式样完全相同的连衫裤，他永久不变的活动环境是一个 4.5 平方的混凝土墙牢房，里面有一个不锈钢抽水马桶和面盆，一张宽 0.3 米的铺着薄床垫的混凝土板床，还有一台 12 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天，作为消遣，手脚都戴上了镣铐的他被允许沿着监狱内一条 11 米长的狭窄走道散散步。每月还有那么一

到两次机会，他可以来到一个小小的户外操场上，与其他犯人一起短暂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他唯一可以见面的探监者是每月可以探望他两次的律师和家人，见面时会有一堵玻璃墙相隔，靠电话交谈，所有进出的邮件都受到狱方的甄别检查。

在被囚禁的第一年里，葛提还可以抱着一丝希望，指望律师能推翻他的判决。18个月过后，这种希望终于破灭了。他最有力的上诉论据——布鲁斯·卡特勒失去辩护资格剥夺了他挑选自己的律师和要求公正审判的权利——被美国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庭一致驳回。该法庭裁定卡特勒“本人在相当程度上涉嫌卷入了甘比诺犯罪家族的活动”，他被排除在审判之外是理所当然。（卡特勒的活跃与好斗导致他1994年被判处藐视法庭罪，罪名是违反了法官格拉瑟的关于被告方和检方律师不得向媒体公开评论案件进展情况的审前禁声令。因在采访中攻击检方，卡特勒被处以90天的软禁，且在6个月内不得参与东区案件的辩护。对一名律师施以如此罕见的惩罚自然受到公民自由主义者和新闻工作者自然而然的炮轰，他们声称这是违规剥夺卡特勒的言论自由权，是充满偏见地企图压制律师们积极地为有组织犯罪当事人进行辩护。）

葛提的辩护律师还称，检方的主要证人格拉瓦诺在审判过程中犯有作伪证罪，而且检察官们隐匿了他卷入尚未曝光的谋杀案和毒品走私的证据，这些主张均以证据不足被驳回。（这些上诉裁定在格拉瓦诺因毒品犯罪被亚利桑那州逮捕的六年前下达了。）

当1994年最高法院拒绝审议葛提的上诉时，整个甘比诺家族都知道他们的老板难逃厄运。尽管结局已定，但葛提仍效仿科洛博家族被监禁的老板卡迈恩·珀西科，打算为自己保留最高头衔并建立一个“科萨·诺斯特拉”王朝。其继承人显然是人称“小葛提”的大儿子约翰·安吉洛。（小葛提的中名叫“安吉洛”，是为了纪念父亲以前的犯罪密友安吉洛·鲁吉埃诺而起的。）他的另一个重要动机便是经济利益。只要葛提仍是无可争辩的老板，家族相当部分的不法收益就会继续流入儿子和其他亲人手中。

在被判刑很久以前，葛提就开始培养约翰·安吉洛为他的继承人。在许多方面，在相貌和行为方式上，小葛提（一个他终于感到厌恶的名字）都是其父亲的翻版。身体健壮的他在少年时就热衷于举重运动，在学校里是个顽劣的学生。警尉雷默·弗朗西斯切尼，昆士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侦探组负责人，在1980年初曾数次窃听过当时身为角头的葛提与他那十几岁的儿子的电话交谈。“显然他在教他如何像聪明汉那样待人处事，教他什么可以做和什么不可以做，如何举止得体地与其他荣誉者相处以及什么时候得关紧嘴巴。”弗朗西斯切尼说道。

被捕之后，约翰·J·葛提指定儿子约翰·安吉洛·葛提为代理老板。这个被称为“小葛提”的儿子因敲诈勒索罪被监禁，事实证明他是个愚笨的当选者和拙劣的领导人。因下令对广播名人柯蒂斯·斯利瓦实施糟糕的谋杀，他2004年再次被起诉。（AP/Wide World Photos）



在寄宿学校纽约军校毕业之后（该校毗邻西点军校，强调军事纪律并接受后进生），小约翰一夜之间成了个生意兴隆的商人。到了20岁出头的时候，他已经拥有数家货运和房地产公司。在开拓生意市场的过程中，这些公司从来没有碰到工会问题或竞争。他成功的大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知名度和甘比诺家族对卡车司机协会和建筑承包商的影响。

还是在他刚步入20岁的时候，与父亲一样养成了夜猫子习惯的小约翰与一帮年轻恶棍卷入了数起暴力械斗事件。有一次，他被指控袭击一名未当班的警察。当性情暴躁的小约翰与同伙殴打一名顾客时，那位警察曾试图帮助受害者。不过没有一项人身伤害指控让他身陷囹圄，因为要么是受害者害怕出庭指证，要么是证人撤回了他们以前对警方所做的证词。有其父必有其子，在小葛提的核心圈子里有两名铁杆成员便是父亲那黑手党密友的儿子，即弗兰克·洛卡西奥的儿子“托尔”塞尔瓦托·洛卡西奥和已故的安吉洛·鲁吉埃诺的儿子约翰·鲁吉埃诺。

据FBI和纽约黑手党侦探们称，在他24岁时，也就是在父亲成为教父两年之后，

小葛提被吸收为甘比诺家族的荣誉者。“我们知道，他父亲非常得意。”弗朗西斯切尼特别提到。这个儿子打破了黑手党之前不可违背的打手父母都必须具有纯意大利血统的规定。小葛提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和俄罗斯人的后代。甘比诺家族为帮助老葛提而修改了规定，确认只有父方的意大利家系才是取得正式党徒身份的必要条件。在两年后的1990年，即在小葛提成婚并在赫尔姆斯利宫酒店大宴宾客后不久，葛提送给了他一份特别的圣诞礼物。他把儿子提升为角头，使26岁的他成为甘比诺家族历史上获此头衔并领导一支行动队的最年轻的人。从老葛提被囚禁于马里恩的那天起，小葛提就成了他的主要支持者和联络该家族余众的密使。在其判决下达之前，葛提就任命小葛提为代理老板，并指定包括其哥哥彼特·葛提在内的三人角头小组辅佐他处理日常事务并就必须的快速决策向他提出建议。这次提拔是个不同寻常的举措，它让这个年仅28岁的历史上最年轻的黑手党人在名义上掌管了一个黑手党家族。

作为家人，小葛提被允许每月探望父亲两次并谈上几个小时。尽管每次探监时他们都受到了视频监控和被录音，但FBI相信这对父子在利用暗语和诡秘的交流来讨论黑手党家族的事务。

回到纽约，小葛提显然从父亲的不幸中吸取了教训，知道该如何传达父亲的指示，或如何与可靠的家族老人们讨论急迫的问题。对窃听器和电话窃听异常警惕的他喜欢在街上“走谈”，而交谈的对象仅限于他的叔叔彼特和几名年长的角头。他有意避开彼特那昆士区伯金狩猎与捕鱼俱乐部的巢穴，政府也已经关闭了他父亲在小意大利的拉维尼特俱乐部。桑树大街上的一幢五层砖混结构的拉维尼特大楼的所有者是“山猫乔”约瑟夫·拉法提，FBI认定他是甘比诺家族的一个打手。1993年，法庭宣布伯金俱乐部为敲诈勒索活动的中心。根据这项裁定，政府将大楼没收并拍卖给新的房主。作为周边中产阶级向劳动阶级居住区移居和人口结构变动的标志，单调简陋的充当了黑手党70年窝点的拉维尼特大楼经过内部改造变成了一个经营女性饰品的商店。约翰·葛提和尼尔·德拉科罗塞的照片已经不复存在，商店老板艾米·钱在灯火辉煌的门口处挂了一幅醒目的毛泽东像。

知道自己受到监视和调查，小葛提就竭力地改变其公众形象。他改掉了以前深夜待在酒吧和迪斯科舞厅里娱乐消遣的习惯。晚上他会在长岛北岸濒临虾湾的拥有14间房、价值130万美元的亲水豪宅里陪伴妻子金和四个孩子。他的着装较以前保守许多，会频频出现在教师家长会上，还常常带着小甜饼参加孩子学校里组织的聚会活动。小葛提的律师更像个长于宣传的高级幕僚，他们会向记者通报他的学术追求：他已经成了一名积极的收藏者，正在大量收藏图书和搜集与美国印第安人生活有关的物

品，而且还在攻读律师助手课程以更好地了解法律制度。

萨米·格拉瓦诺的背叛和大批角头与打手被判刑让动荡不安的暗流迅速涌动起来，家族领导层需要紧急重组。在家族实力受到重创的情况下，小葛提开始着手巩固行动队和任命新的角头。但他电闪般地升任老板让他在家族内部广受嫉恨，被人斥为无功受禄，而且其领导能力也受到更多资深打手的质疑。傲倨不敬在黑手党里是一条重罪，年长的角头们对这个年轻代理老板那傲慢的态度甚感不满。线人在向 FBI 甘比诺小组报告时特别提到家族内部和其他家族对他的评价，许多人认为这个代理老板既不灵活圆滑也无谋策断事的能力。在分析小葛提的表现时，布鲁斯·莫尔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他喜欢被人奉承，喜欢受人关注，而他最喜欢的东西是落入他口袋里的钱。这种黄白之物很令他着迷。”小葛提的愚蠢之举是在和其他家族发生高利贷与敲诈勒索的地盘纠纷时牺牲了甘比诺家族的角头和打手的利益。吉诺维斯家族非常轻视小葛提，拒绝与他商量事情。在和其他犯罪家族进行磋商时，甘比诺家族也经常是输掉的一方。“他是个笑柄。”莫尔一言以蔽之。

尽管一路跌跌撞撞，但在被定罪之前，小葛提还是统治家族达 5 年之久，与父亲在街头任老板的时间大致相当。1998 年，小葛提实际上被 RICO 法令废黜。一份经过广泛调查的起诉书指控他继承父位，并从大量的敲诈、赌博、高利贷和劳工诈骗活动中榨取了不法收益。最引人注目的罪状是该家族对斯科仕俱乐部的敲诈勒索。这家颇受社会名流与游客欢迎的高档俱乐部位于曼哈顿上东区，据称在过去 6 年中被甘比诺家族敲诈的总金额达 100 万美元。据检察官们透露，证人准备出庭证实俱乐部的业主和雇员被迫向甘比诺家族交纳保护费以获准营业，并且至少有 10 万美元作为分红被转给了小约翰·葛提。

检察官们让小葛提更加颜面无存，为了支持认定他为黑手党太子的指控，他们公布了在突袭其昆士区办公室时发现的证据。藏匿在一个壁箱里的是小葛提无法说清来源的 35.8 万美元现金和几把未曾登记过的枪支。他疏忽大意的集中体现是一份人员名单在他办公室里被发现，几十名于 1991~1992 年间加入纽约黑手党的党徒都名列其上。调查人员相信，那份名单是依照黑手党惯例交给甘比诺家族复核审查的。由于让官方发现了名单，小葛提使其他家族数十名黑手党人处于危险之中，这严重损害了甘比诺家族在整个“科萨·诺斯特拉”里的可靠性声誉。得知那份候选人名单保存在他的手中达数年之久，其他家族的首领们顿感目瞪口呆。作为最基本的安全措施，它本应该立即被销毁。

小葛提似乎有保留名单的嗜好。第二份在其办公室的文件夹里发现的名单让他再

次困窘不已，可它却意外地充实了执法机关的情报档案。那是1990年他举行婚礼时接受173名贵宾34.8万美元礼金的记账簿，而许多道贺者都是纽约五大家族的面面人物。其父亲手下最富有的角头之一汤米·甘比诺奉上了7万美元，公牛萨米·格拉瓦诺则送了7500美元。检察官们打算将这婚礼礼金名单用做间接证据，证明小葛提在黑手党里的重要地位和其他家族对其重要性的认同。

受审前夕，在绝大多数共同被告对可减轻罪行的指控认罪之后，小葛提才签订了一份认罪协议。指控他的敲诈斯科仕俱乐部的罪状被去掉，但他承认犯有高利贷、非法赌博和其他勒索罪，包括利用假民权激进主义组织，以少数民族雇佣配额问题为借口威胁进行建筑行业罢工。另外，他还被证明犯有偷逃个税罪。在他1999年9月的审判当中，小葛提引用了父亲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我是男子汉的后代。我在接受我的救赎”。他的律师杰拉尔德·沙吉尔（Gerald Shargel）和塞雷塔·凯迪亚（Serita Kedia）谈妥了一份未曾让步的协议，这样35岁的他被判处6年零5个月的监禁并处罚款75万美元，这比他若在审判中被定罪必定领受20年刑期的惩罚轻了许多。

也许，让葛提父子更为懊恼的是，老葛提在马里恩监狱与家人谈话的监听抄本在审前被公布。在交给审判法官的备忘录当中，检察官们声称那些谈话证实了小葛提在甘比诺家族里有着极高的地位，同时也证明老葛提清楚儿子的犯罪活动并试图指导他如何管理家族。

最为直白的谈话录音是在1998年1月29日取得的。在小葛提被捕后不久，这个被囚禁的教父在马里恩接受了哥哥彼特和女儿维多利亚·葛提·阿格雷诺的探访。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讲话被狱方录音，但葛提在谈到儿子时还是常常冒出讽刺与失望之言。谈到与不可靠的合伙人交往时，他责骂小葛提与小儿子彼特是“狗屎”，提到家族的生意时则称他们为“垃圾桶”。老葛提看过起诉书后，痛责小葛提与一个人所共知的“喋喋不休……总给人招来麻烦的”共同被告——换句话说，一个可能会牵连他的黑手党人纠缠不清。

葛提称起诉书里的几名共同被告为“傻瓜”，并悲叹道，“如果你总和傻瓜纠聚在一起，那你就会和他们一样变得弱智低能。”他对儿子将一些重要的任务交给低级合伙人感到不满：“为什么需要所有的仆从和侍者来服侍他。”这是一句密语，意即小葛提依赖于未经受考验的崇拜者。

最让葛提恼火的是，儿子执意将几十万美元现金连同新党徒名单和几支枪藏匿在其地下室的办公室里。“看看他们会给他扣上什么帽子吧！”葛提恼怒地说道。“地下室里有来路不明的钱。把名单送给他们，我真的不想说了，这能有多糟糕就有多糟

糕。壁箱里有枪。真是疯子干的事情!”

小葛提的律师认为他是父亲那恶名声的受害者，但葛提不承认这种说法，称儿子是因为“愚蠢”才让自己官司缠身。“这你不能怪名字……对吧，你不能怪你姓什么。”

儿子的不幸引得他发了一通令人吃惊的感慨：“你们想想，为什么没有我，这帮人就会四分五裂？”他问哥哥和女儿，“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老板，制定自己的道德规范，提出自己的理由，安排自己的节奏，那么这就是它的结果。这就是事情的结局”。

在1998年的那次探监过程中，维多利亚·葛提·阿格雷诺替哥哥进行了辩解。身为悬疑小说作家的她极力表白他的无辜，同时强调了政府对她的亲人，包括对她的丈夫卡迈恩·阿格雷诺都心存偏见。据FBI特工透露，葛提曾极力反对维多利亚与阿格雷诺的恋情。莫尔称，在他开始约会维多利亚后不久，葛提就派遣执法打手用棒球棒殴打阿格雷诺。后来，葛提突发慈悲，同意了这桩婚事，并允许将他的这个女婿——一名“拆车场”拆用被盗车辆有用零部件的专家——吸收到他自己的犯罪家族之中。利用女儿探监的机会，葛提奚落了她那患上躁郁症的丈夫。“他感觉好吗？”葛提问道，“他感觉还好吗？他的用量是不是增加了？他是不是坐在汽车后座上苦苦想着是谁偷走了方向盘？”后来，谈到阿格雷诺在汽车废物利用与拖车生意上频频碰触法律时，葛提强调他的女婿需要他的帮助。“他随便哪天就会惹官司上身，这个白痴。他在恐吓自己。他给自己带来了绞索。我不可能喜欢他，可他在那里还是需要我。”

在3年后的2001年，威胁烧光竞争对手的卡迈恩·阿格雷诺在警察的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中被抓获。承认在废旧金属生意中犯有敲诈勒索和税收诈骗罪后，他被判处9年监禁并处110万美元的罚款。他与维多利亚·葛提的婚姻以离婚告终。

老约翰·葛提对家族本显单薄的控制力在新的世纪里迅速减弱。1998年他被诊断患有颈部和头部癌症，在一家监狱医院做过手术之后，其健康状况日益恶化。2002年6月10日，他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美国联邦监狱医疗中心死去，时年61岁。纽约各小报报纸和电视台依照总统或皇室女王逝去的规格报道他的死亡与葬礼，这些媒体在过去的15年里一直津津乐道地追踪他的各种活动。《纽约每日新闻》以15个版面的文字与图片报道了他的生平，而《纽约邮报》则为他辟出了13个版面。甚至是中规中矩的、通常对讨厌的黑帮人物不予理睬的《纽约时报》也在头版上登出一篇2500字的讣闻。

与所有先他而去的曾经显赫一时的美国黑手党教父，包括阿尔·卡彭、洛克·卢西亚诺、卡洛·甘比诺、维托·吉诺维斯、乔·博南诺和汤米·卢切斯相比，葛提的生命终结受到了全国各地记者们更深度的报道。尽管没能由布鲁克林天主教教区在教堂里为其做安灵弥撒，但葛提的离去符合他那浮华的生活方式：新闻报道称，他的葬礼花去了约20万美元的费用。在昆士区殡仪馆停留一夜之后，他那镶金的铭刻着其生卒年月的青铜色棺椁便在送葬队伍的护送下从昆士区穿城而过。紧随枢车之后的是22辆大型高级轿车、数百辆私家车和19辆花车。那些花艺造型经过了巧妙的设计，反映了他生活中所爱好的各个方面：一只马提尼酒杯、一匹赛马、一把红桃同花顺、一支香烟和纽约北方佬的标志符。街道上成千上万的争相触摸枢车的旁观者，天空中盘旋的是四架一路追踪拍摄的电视台新闻直升机。连绵不绝的送葬队伍花了90分钟才穿过昆士区，途中经过了他那霍华德海滨的家，慢车缓行地通过了南欧森公园那伯金俱乐部门前的街道。在俱乐部附近和霍华德海滨周围，许多高悬的横幅上写着“约翰·葛提永垂不朽”。在圣约翰公墓，他的至亲，包括其母亲范妮，都参加了由一名牧师主持的短暂的祈祷仪式。约翰·葛提被埋葬在家族的墓地之中，紧挨着他的父亲和12岁时死于车祸的儿子弗兰克。

被一些喜欢用恐怖腔调说俏皮话的人称为“死鬼”乐园的圣约翰墓地容纳了许多黑手党重要人物的坟墓。埋在葛提近旁的有他的导师安尼洛·德拉科罗塞、卡洛·甘比诺、洛克·卢西亚诺、乔·普罗旺斯、乔·科洛博、卡迈恩·加兰特和塞尔瓦托·格拉瓦诺。

当初，约翰·葛提说，他所希望的就是以其老板之力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他的遗产之作：建立一个永续不败的黑手党家族。这是1986年葛提取得家族控制权仅数周之后执法窃听器捕捉到的他那“遗产地狱”的高谈阔论。作为新任教父，他继承了一个犯罪的超级王国，而这个遗产是在过去30年中被两个富有开拓精神的黑手党创业者卡洛·甘比诺和保罗·卡斯特利亚诺所缔造的。葛提在街头拥有5年绝对的权力去实现他那打造一个牢不可破的犯罪家族的目标。他的统治开始的时候，他掌控的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和势力最强的犯罪组织。他离去的时候，甘比诺家族变成了一个分崩离析、内忧外患的帮派，而他是造成家族凋败和自己家庭破碎的祸首。

在早期的诸多成功和谋杀保罗·卡斯特利亚诺之后，葛提无可争议地接管了家族，加上后来一连串的无罪宣判，这些都让他的自负自大膨胀起来。报刊与电视对他那浮华生活方式的吹捧性报道，他那异于传统的癖好，还有他在法庭上战无不胜的神话，都放大了他的盲目自信。葛提是黑帮人物时尚风格的首创者和缩影。他是个新派

的坦率无畏、派头十足的黑手党人，他对权力机构那种“如果你有种，尽管来抓我”的公然藐视令人不禁心生感佩之情。

“他是首位媒体教父。”布鲁斯·莫尔说道。这位 FBI 特工主要负责最终导致葛提被定罪的调查行动。“他从来没有打算隐瞒他是个超级老板的事实”。检控葛提的美国检察官安德鲁·马洛尼对媒体迷恋于它们所喜爱的黑帮分子感到愤怒。“他成了媒体的指挥棒。他看问题的方式，他着装的风格，他对法律的傲慢，都在影响着媒体。媒体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把他吹捧成了一个民间英雄。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或无视他是个邪恶的谋杀者的事实。”

葛提的傲慢自大和媒体对他的吹捧只能增强屡受挫败的特工和检察官战胜他的决心。通过窃听器，他被听到大声怒骂政府心怀“深仇”要治他之罪，而如果他落入圈套将会遭受多么“严厉”的法律制裁。然而他还是屡屡犯下那早就给他带来诸多麻烦的根本性错误，直到它们最后被证明是致命性的。他对政府的电话和窃听器窃听的能力已有察觉，并威胁将杀掉任何落入电子窃听圈套中的手下，包括长期与之患难与共的伙伴安吉洛·鲁吉埃诺。但葛提漠视了他自己的训示。由于正确判断出伯金狩猎与捕鱼俱乐部是个必然被窃听的目标，秘设在伯金俱乐部大厅里的窃听器未能抓住他的把柄。讨论黑手党事务时，他就退到隔壁一间不引人注意的办公室里，他自信调查人员不知道这个地方，因而可以安全地躲避电子窃听。在他成为老板后不久，他愤怒地得知，州有组织犯罪特遣队在他的私人密室中安装了麦克风。从其办公室谈话中获取的证据让甘比诺家族其他犯罪成员深受其害，而在木匠协会领导人约翰·奥康纳枪击案当中，那些被窃听的谈话成了对他极为不利的关键性证据。

然而，在三年前吸取了伯金俱乐部惨痛的窃听教训之后，他在小意大利的拉维尼特俱乐部再次犯下了同样严重的错误。由于觉得在寒冷的天气里走谈太不舒服或频频变换聚会地点太麻烦，他选择了拉维尼特的后走廊和楼上西瑞莉那温暖的家进行密谈，这些地方让他感到舒适。他显然没有想到线人揭发了他在拉维尼特大楼里的秘密庇护所，就像他们以前泄露了其伯金俱乐部的密室一样。再一次，过于懒惰或自信的他未能通过变换会议场所或清查窃听器来避开调查人员的侦查。在监狱里，他依然无法管住自己的嘴巴。在马里恩，他大发了一通表明其子有罪的言论，尽管他知道他的话被录音，并可能危害自己的亲骨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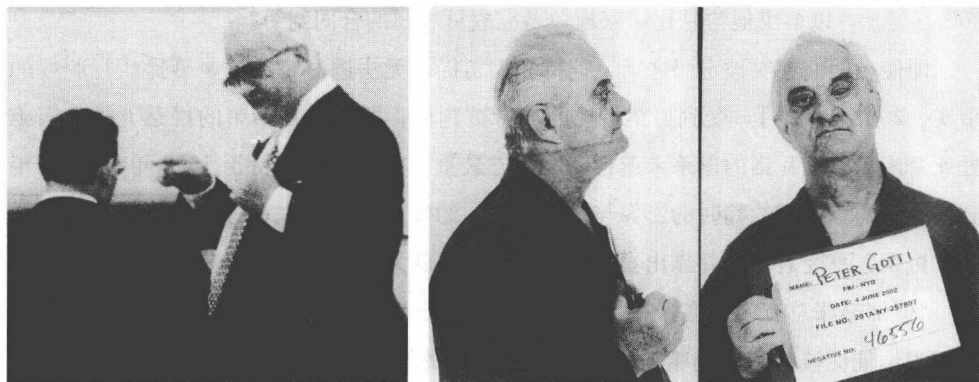
葛提对监视的漠不关心为自己和所有角头制造了异乎寻常的麻烦。他屡屡忽视黑手党本来是个秘密组织的基本常识。整个家族的人都知道 FBI 和侦探们经常在拉维尼

特附近对每一个人进行录像和拍照，但葛提对这种危险视而不见，要求其领导核心成员和角头顺从他的意志赶到那里露面并向他报告情况。他的这条命令让蹲守在观察哨上的 FBI 特工欣喜异常，从这个与俱乐部隔着两个街区的房子里，他们可以观察到络绎前来的各色人等。在葛提最后一次 RICO 审判当中，他们的录像成了指控他的部分证据。此外，强制性地拉维尼特聚会让 FBI 有机会锁定它以前并不知道的甘比诺家族成员。在 RICO 组织审判当中，那些角头和打手出现在拉维尼特的录像和静态照片成了指控他们的重要的间接证据。

对葛提来说，无法鉴别忠奸庸庸是他从未自省过的弱点。在原来的二老板弗兰克·德西科被谋杀之后，葛提非常倚重公牛萨米·格拉瓦诺，开始时提拔他为顾问，后来则任命他为二老板。格拉瓦诺是个帮葛提实施谋杀的得力组织者，同时也是个大捞钱人，每年向老板交纳一百多万美元的收益。但他曾经出卖过其他人，这种污点对葛提来说应是个值得警觉的信号。以前，每当卷入内部冲突当中，格拉瓦诺的解决之道便是杀掉对手，然后将人们对这灾祸的指责转嫁到其他人身上。即使在有道德顾忌的黑手党人中间，他也是以寡廉鲜耻著称。如果为了扫除爬升的障碍而需要杀掉其妹夫或生意伙伴的话，公牛萨米也不会心慈手软。和许多有经验的黑手党人不一样，格拉瓦诺从来没有被囚禁过，因此葛提也不知道他在严酷的监狱考验中会如何反应。他误判了格拉瓦诺对他的忠诚度，迷信了“科萨·诺斯特拉”王权的神话。据布鲁斯·卡特勒称，格拉瓦诺欺骗了 FBI 特工和检察官，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意志坚强、硬如钢铁的黑帮人物，一个不认同葛提的黑手党政策而敢于直面反抗的人。律师们回忆说，当着葛提的面，“格拉瓦诺总是显得恭恭顺顺，甚至是谄媚奉承约翰”。

而当真正的考验来临之际，比起拯救自己的老板和几十名犯罪同伙来，苟全自保对萨米来说更为重要。

被格拉瓦诺出卖之后，通过任命儿子为代理人 and 继任者，葛提将自己的信心寄托在血缘关系之上。这样做，他便是无视小葛提的经验不足以及明显的裙带关系在家族内部造成的怨恨。黑手党帮派传统上是靠功劳而非老板的血缘关系来挑选有才干的领导人，在“科萨·诺斯特拉”内部，首领的后代并不享有自动继承权并获得有保证的财富。通过同时代科洛博家族发生的事件，葛提实际上知道推行世袭统治的危险性。卡迈恩·珀西科未经大多数角头同意而提拔自己的儿子引发了科洛博家族派系之间的一场毁灭性的内战。葛提化解了类似的叛乱，但小葛提的无能统治在他本人获罪和十几名其他角头、打手和合伙人被判刑中达到了巅峰。



在侄子“小葛提”被定罪后，成为甘比诺家族老板的彼特·葛提在训斥一名手下。他继任老板后不久即遭逮捕并瞎了一只眼睛，后因敲诈勒索罪和策划谋杀背叛其弟弟的“公牛萨米”塞尔瓦托·格拉瓦诺被监禁。（联邦调查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随着儿子 1999 年入狱，葛提抓住权力和维系世袭统治的最后希望就寄托在哥哥彼特身上。和小葛提一样，作为近亲属的彼特能够到监狱里探望他并用他们的密语传送消息和接收指示。和他的两个野心勃勃的弟弟约翰与吉恩相比，彼特显得低调许多，他充当了他们的一个言听计从的助手，一个让人交口称赞的听差。约翰曾任命彼特为伯金行动队的角头，在小葛提被囚禁之后，便将代理老板的权柄交到他的手上。在被吸收为职业黑手党人之前，彼特在纽约公共卫生局工作了 10 年。因在工作期间从垃圾车上摔下受伤，他每个月可领取 2000 美元的残废抚恤金。FBI 的甘比诺小组并不高看彼特的黑社会能力。“他既不是真正的罗德斯式的学者，也没有特别的闯劲，”得知彼特成为新任代理老板后，莫尔评论说，“他具有管理一个黑手党家族的能力吗？当然没有。”

彼特住在其昆士区的庇护所伯金俱乐部附近。他竭力避开公众的注意，以免与弟弟一样招来牢狱之灾。与甘比诺家族的其他俱乐部一样，这个俱乐部也风光不再，它的一半空间被一个肉店和一个熟食店占去。这位新教父短暂的荣耀感在弟弟死于狱中的一个星期之前就消散殆尽。2002 年 6 月，彼特因受 RICO 控告而被捕，罪名是充任甘比诺家族的代理老板和总头目。一年后，62 岁的彼特·葛提在一生中首次被定罪，被查明犯有敲诈勒索、洗钱和靠收买控制码头工人的一个地方分会等罪行。

葛提的另一个任家族角头的弟弟理查德·V·葛提及其打手儿子理查德·G·葛提成了彼特的共同被告，他们也被类似的敲诈勒索指控打倒在地。有条戏剧性的侧面消息与三葛提案件有关，那就是好莱坞受过这个家族劫掠。陪审团听到的证词是，一支甘比诺家族的行动队曾企图向武术电影演员史蒂文·西格尔(Steven Seagal) 敲诈

300 万美元，以解决他与甘比诺家族一名准成员之间的合同纠纷。

即使在他们首次被定罪之后，彼特和小葛提也无法逃避替约翰·葛提代行职权的事实。2004 年 12 月，受到另案指控的彼特被判刑，罪名是在弟弟的授意下批准实施处死萨米·格拉瓦诺的谋杀未遂行动。检方最重要的证据是彼特于 1996 年和 1997 年到马里恩监狱探望约翰时的影像与录音谈话，约翰当时咒骂说，想着像格拉瓦诺这样的“鼠辈”享受着自由并靠出卖他来渔利时，他就无法安睡。

“但那笔账总有一天得算的，就像其他每笔账一样，你知道我的意思……”约翰恶狠狠地催促彼特说。仍嚷着要报复格拉瓦诺的葛提发誓说，如果他再碰到公牛萨米，“我会剥他妈的皮，吃他妈的肉”。

在被证明有罪并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判决之后，彼特愤愤不平地在法庭上大声说：“我的名字是葛提。如果我的名字不是葛提，我就不会在这里。”这是个牵连犯罪的借口，彼特的弟弟约翰曾严厉斥责儿子也以此来解释他的悲哀。

2004 年，正当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刑的小葛提准备离开监狱时，他的保释因受到新的 RICO 指控而被突然取消。最令人震惊的新情况是指控他于 1992 年授权谋杀了自称犯罪斗士的曾在广播脱口秀中贬斥约翰·葛提的柯蒂斯·斯利瓦（Curtis Sliwa）。据信在一次由小葛提批准的意在报复父亲受辱的袭击当中，身为“守护天使市民巡逻组织”创始人的斯利瓦被枪击而受重伤。

这 2003 年和 2004 年的判决与控告意味着葛提四兄弟——约翰、吉恩、彼特和理查德——还有他们的两个儿辈都因违犯 RICO 或因毒品犯罪而走上穷途末路。（然而，“葛提”这个名字或许对一名女性亲属——葛提的女儿维多利亚而言颇多益处。她以娘家姓出版小说并为一家报纸的随笔专档撰写文章。维多利亚还成了一部颇受欢迎的有线电视连续剧——《成长的葛提》的主角，这部电视剧围绕她作为一个离异的单身母亲在长岛豪宅里抚养三个狂野难驯的少年儿子的问题展开。）

葛提氏重掌家族权力的前景看起来渺茫。“甘比诺家族对葛提家族完全丧失了信心。”莫尔认为。

但是，莫尔和其他黑手党观察家相信，约翰·葛提的亲属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所做的就是捞钱。”提到葛提的家眷时，莫尔说道。谈到葛提氏 15 年的统治时，莫尔相信他们以牺牲家族其他成员的利益为代价都暴富了起来。他估计在约翰·葛提被押往监狱的时候，仅他一人就拥有 2000 万~3000 万美元的现款。“钱放在哪里？天才知道，”莫尔坦承道，“在海外？在手提箱里？我们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它。”葛提与其亲属在十多年间敛聚的不法财产数额均以公牛萨米·格拉瓦诺和其他背叛者

的情报为分析依据。这些告密者声称葛提兄弟有系统地从事服装中心、建筑业、垃圾清运业和诸多码头公司的不法生意中瓜分收益。此外，葛提氏还从家族的赌博与高利贷行当里大发其财。

20世纪90年代，FBI一个财产查抄小组曾试图调查葛提的秘密财富但收效甚微。“绝不少于1个亿，而不是几百万美元。”谈到劳而无功地搜查葛提的藏宝时，FBI的纽约官员吉米·福克斯说道。格拉瓦诺向FBI讯问人员供称，葛提的主要捐客是哥哥彼特和儿子小葛提。但葛提从没有向格拉瓦诺吐露一丝线索表明他如何和在何处隐藏这大量财富。“这是黑手党最大的秘密，”莫尔接着说，“甚至连萨米都不知道”。

1986年葛提任教父的时候，他身边有大量的钱可捞。根据后来黑手党审判的证词和已掌握到的秘密情报，联邦和纽约调查人员保守地估计，在80年代中期，甘比诺家族每年的毛收入约为5亿美元。起初，有多达21个活跃于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和佛罗里达的行动队向葛提朝贡。到了他死去的时候，可能只有15~18个行动队仍在活动，而街头上未遭拘禁的打手数量由最高时的400多人减少到不足200人，并且他们的几个利润最大的行当遭到毁灭性打击。

葛提对黑手党造成的损害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犯罪家族。纽约其他家族相信，“潇洒先生”的恣意妄为和异于传统的行为给整个黑手党带来了令人讨厌的恶名，让它们受到了直接伤害。这些家族用一种象征性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他的责难。其他家族没有一个有头脸的人物参加葛提的守夜和葬礼，这在所有“科萨·诺斯特拉”成员看来是一种深有意味的侮辱。

在狱中最后几年的凄凉岁月里，葛提一直生活在被结发40年的妻子所疏远的阴影之中。狱方称维姬没有前来探望他。在一段与彼特·葛提交谈时被录音的谈话当中，他被听到提及一个儿子曾恳求他不要离婚。FBI官员声称，葛提夫人对丈夫把小葛提带进其犯罪家族感到愤怒，曾屡屡为儿子的被捕和遭到判刑而责骂他。“如果对自己的儿子有一点点爱或怜悯之心，什么样的父亲还会鼓励儿子成为黑手党老板甚至是暴徒。”莫尔说道，证实了葛提夫妇在儿子的命运上发生的争吵。在葛提被定罪很久以前，他们的婚姻或许已经亮起了红灯，当时FBI关于他与其他女人有染的监视报告被泄露给了新闻媒体。

1997年，在狱中与哥哥彼特进行被录音的谈话时，葛提突然满嘴脏话地大骂妻子。葛提怒斥维姬是个不逊于格拉瓦诺的叛徒，称自己后悔与她结婚，咒骂她不该将儿子小葛提即将被囚禁的恶果归咎于他的身上。

葛提死亡一周年时，他的四个孩子在《纽约每日新闻》上登出“追思”文告。“尽管你的痛苦无边，但你以你活着的方式逝去，骄傲并带着荣耀。”小葛提在刊文中写道。女儿维多利亚的文字是：“亲爱的爸爸，时光流逝，泪痕犹在，无日不想着您，忆着您。你的活力、忠诚、奉献和爱永远留在我的心间。”值得注意的是，这年的文告中没有他妻子的颂词或追思寄语。但在后来的几年当中，她的名字也出现在报纸的纪念文告当中。

也许，葛提性格中最大的缺陷是自我崇拜，而这个弱点既毁了他自己又毁了甘比诺家族。即使在狱中，他的自我崇拜也不见收敛。囚禁在马里恩时，他每每忍不住夸耀他那“光荣”的丰功伟绩，吹嘘自己在落败之前给政府造成的种种麻烦。“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吗？”1998年1月29日女儿维多利亚和哥哥彼特探访他时，葛提这样问道。“他们花费了8000万美元，捏造了三桩充满谎言的案件，利用了7个在证人保护项目中杀死了100个人的告密者，最终不就是为了陷害我吗？你们明白吗？”

为了证明他选择的黑手党道路是命中注定的，他告诉维多利亚和彼特，“我的灵魂告诉我，得选择我已经选定的每条道路，我没有更多的选项。仔细听好喽，即使你们能活5000年，你们也不会看到另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第 40 章 “煤气管”

“鸭子”科拉罗送给他热爱的犯罪家族一样离别礼物，那就是家族权力的一次和平交接。他相信这将保证家族的光明未来。他彻底失算了。

他的暴力倾向在早年就逐渐形成。

显然，早在少年时期，他就喜欢打架斗殴，就热衷于用一杆 22 口径步枪猎杀老鹰。他小心谨慎地避开注意和干扰，从屋顶上用装有消音器的枪支猎杀猎物，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后来对他取得犯罪成功颇有助益的诡秘的行事特点。残杀老鹰让他开始尝到血腥的味道。在作为黑手党人的 30 年间，他参与或谋划了至少造成 37 个受害者死亡的谋杀案。此外，至少还有 25 个目标被列在他的必杀名单上，包括一位法官和一名检察官。在列为猎杀目标的受害者当中，有几名遭到枪击并受伤。由于其计划出现意外，大多数人则躲过了一劫。尽管其血腥的杀人成就远较同时期更为显赫的黑手党首脑人物——甘比诺家族的老约翰·葛提与公牛萨米·塞尔瓦托·格拉瓦诺——更为突出，但事实上他的恐怖统治和他的名字在黑手党以外鲜为人知。他在纽约“科萨·诺斯特拉”内部有着一段与众不同的经历。在管理委员会案后期，他迅速跃升到卢切斯犯罪家族的权力顶峰。在五大家族中间，他那可怕的复仇激情是人所共知的。在江湖上，他有个令人恐惧的绰号——“煤气管”。

“煤气管”出生于 1942 年，洗礼名为安东尼·塞尔瓦托·卡索，在布鲁克林公园坡与卡洛花园交界的贫民区里长大。那里是一个黑手党党徒的“孵化场”，走出过诸如珀西科和加洛兄弟这样名闻一时的黑手党人。在这个黑手党暴徒麋集的地方，年少的卡索在 50 年代末加入了“南布鲁克林好汉”帮，并开始横行霸道地胡作非为。那是个少年帮派，在红勾区码头靠拳头、砍刀、棍棒和燃烧瓶逞凶斗狠。和许多黑手党



外号“煤气管”的安东尼·卡索在卢切斯家族的小意大利巢穴“玫瑰夫人饭店”外面，当时他正离开遇害侦探乔·彼得罗西诺的纪念馆穿过街道。作为卢切斯家族的二老板和事实上的领导人，卡索开始追求更有品味的着装和生活方式。他有天花掉3万美元疯狂购买衣物，并买了一瓶3000美元的酒。（FBI和纽约警察局的监视照片）

人一样，身高1.71米、体重68公斤的他在形体上并不招人注意，但卡索还是以其勇猛刚毅的行事风格，特别是他纯熟的步枪与手枪枪法，赢得了雄武大丈夫的名声。

利用屋顶为靶场射击固定在烟囱上的靶心目标，他练就了一身百步穿杨的好枪法，能用手枪击中30米外的汽水瓶子。一位在布鲁克林同一地区长大的前侦探说，卡索和密友们通过用填充有棉花和纸板碎屑的消音器裹住自制的枪支而逃过了警方的监视。在人口密集的社区，屋顶起到了休闲区的作用，人们的一个普遍爱好是在屋顶

的笼子里饲养鸽群。卡索的枪法了得，帮了想让鸟儿免受食肉鹰荼毒的养鸽者的大忙。“邻居们总是喜欢叫我，‘你能过来干掉这个老鹰吗？’”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我像个随时待命的医生一样”。

尽管纽约有着严格的枪支登记管理法规，但黑帮成员还是能很容易地搞到非法手枪。“买枪就像在食品杂货店买东西一样容易，我们那地方每人都有一把——如果没有十把的话”。

卡索是三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他继承了父亲对武器的浓厚兴趣。9岁的时候，父亲就带着他走上了追猎之旅。他从父亲那里还得到了那个怪异的名字——“煤气管”。附近的黑帮分子诙谐地给他父亲起了这么个名字，因为在执行黑手党的任务时，他总是拿着根金属管子作为棍棒威胁受害者。老卡索从来没有取得荣誉者资格，但在二三十年代，在成为一名码头装卸工之前，拿着煤气管的他经常受维托·吉诺维斯的调遣，前去威胁和殴打受黑手党控制的纽约滑稽剧剧院职工工会里的异议者。小卡索对这个绰号颇为嫌恶，任何提到它的人都会让他怒火难遏，尽管他并不介意少数几个密友称他为“煤气管”。

16岁时从高中辍学后，卡索就跟随父亲走上码头，开始其码头工人的生活。在布鲁克林码头，他显露出一种将成为其人格特征的残酷本性。一天，卡索听到一名搬运工夸耀他经过金属加固的新工作靴。“‘煤气管’接过一辆铲车，让约230公斤的货物重重地落在那人的脚上，将他的大部分脚趾砸得粉碎，”那位在公园坡长大的前侦探回忆道。“随后，他大笑了起来，说他想看看那新靴子能有多么好”。

很快，卡索引起了克利斯蒂·蒂克·弗纳瑞的注意，后者是布鲁克林一个日后将成为卢切斯家族顾问的黑手党角头。弗纳瑞用黑手党惯常的历练课程来训练这个新学徒，“煤气管”因此成了一名高利贷执法者和一个赌注经纪人。在20岁时，卡索因赌注经纪问题首次被捕，最终被监禁5年并处罚金50美元。尽管在1965~1977年间被捕过5次，但这将是他在后来的33年中唯一一次被定罪。在黑手党一再聘请奸猾的律师和恐吓目击证人的帮助下，虽然受到一系列重罪指控，但他均赢得了无罪判决或者控告遭驳回。他犯下的重罪包括：持枪伤人、买卖赃物、贿赂保释官释放其黑道朋友、盗窃银行和贩卖毒品。

“煤气管”首次记录在案的谋杀发生在70年代中期，谋杀指令来自于弗纳瑞，其任务是：杀掉为卢切斯家族效力但据说正在与缉毒特工合作的毒贩李·施莱菲尔。卡索将施莱菲尔诱骗到黑手党的社交俱乐部，用一把22口径的消音手枪朝他头部连连射击杀害了他。这次谋杀是“煤气管”显示其骨气的有力证明。在弗纳瑞的保荐之

下，他在 32 岁时成了卢切斯家族的一名荣誉者。

“这起命案发生后不久，”卡索数十年后在写给一位法官的信中称，“在克利斯蒂的举荐下，我成了卢切斯犯罪家族的一名荣誉者。当时在我们的社会圈子里，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在进入“荣誉社团”之前，卡索形影不离地与弗纳瑞行动队里另一个崇拜者维托利奥·阿穆索（Vittorio Amuso）粘在一起，后者有个与科洛博家族的维克托·奥瑞拉类似的绰号：“维克”和“小维克”。阿穆索比卡索年长 11 岁，但他们相似的特强凌弱的习性，健壮结实的体魄、卵圆形的面庞和黑色的寸头发型，让他们能够像兄弟或表兄弟一样亲密相处。

“煤气管”和维克结对组成了一个富有战斗力的小组，尽管卢切斯家族老板“鸭子”科拉罗虚伪地禁止手下沾染毒品，但他们还是积极地参与毒品走私。在一宗牵连到西西里黑手党和从泰国走私海洛因的重要交易中被捕之后，卡索和阿穆索设法让针对他们的指控因证据不足而遭驳回。卢切斯家族领导层不顾黑手党不许贩卖毒品的虚伪禁令，最终将阿穆索吸收为“荣誉者”。随后，他和卡索加入了一个门槛儿甚高且组织严密的盗窃团伙。这个团伙被警方称为“支路帮”，由 15 个经验丰富的犯罪分子——电子专家、锁匠和保险柜解密高手组成，擅长破坏防盗安全系统。在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十多年间，这个团伙频频闯入纽约和长岛的银行和珠宝店行窃。据估计，从保险箱和金库里窃取的财物超过 1 亿美元。在大多数重大的盗窃行动中，充当望风者的“煤气管”和维克都会来到现场，确保卢切斯及其他家族的首领能得到他们的那部分赃物。

作为一对搭档，“煤气管”和维克在 70 年代都热切地愿意为弗纳瑞执行谋杀任务。弗纳瑞当时是卢切斯家族“第十九洞行动队”的角头，其行动队队名本是布鲁克林一个充当其总部的酒吧的名字。除了第一次单枪匹马地杀掉毒贩李·施莱菲尔外，卡索在阿穆索的协助下还执行了其他 4 次谋杀任务。操着手枪、霰弹枪，还有一次是装着消音器的机关枪，他们杀死了两名受害者，而另外两人尽管身受重伤，但最终还是奇迹般地逃生了。

卡索对弗纳瑞极为忠诚，以致于他 1980 年谢绝了后者提拔他任其原行动队角头的好意，当时克利斯蒂·蒂克已经成了卢切斯家族的顾问。放弃提升机会的“煤气管”成功地劝说弗纳瑞将角头之位传给好友维克·阿穆索，这无疑保证了其后续利益的获得。卡索把自己描绘成弗纳瑞的一名普通而忠诚的弟子，更愿意直接为这位新顾问效力。根据这个犯罪家族的规定，顾问可以在身边留一名打手充当助手，弗纳瑞选

择了卡索。

娶了孩提时期的心上人莉莲·德尔杜卡（Lillian Delduca）后，卡索便与妻子及一双儿女生活在布鲁克林。他假扮成卡车司机并冒充一家建筑公司的销售代表，而莉莲则在他们那普普通通的弗莱彻兰兹社区里开了一家女用内衣精品店。表面上，像许多其他勤劳工作的蓝领家庭一样，他们也在努力地打拼着，为的是在社会上混出个头脸。

1977年，在一次毒品诱骗陷阱中险些被抓之后，“煤气管”就从执法机关的视线中消失了。80年代初，就在FBI和纽约有组织犯罪特遣队开始围剿五大黑手党家族的时候，安东尼·塞尔瓦托·卡索被认定是卢切斯家族一个跑龙套的角色。政府打击黑手党的首波行动是以黑手党的首领和权贵们为目标。在联邦与州调查人员的优先调查表上，卡索只是个处于最底层的受人差遣的角色。

然而，甘比诺家族的叛乱者约翰·葛提、弗兰克·德西科与公牛萨米·格拉瓦诺对“煤气管”严厉刚硬的名声早有耳闻。考虑到卡索是卢切斯犯罪家族一股必须予以重视的潜在力量，德西科便尽可能与其接触，探听他对谋杀卡斯特利亚诺的计划有何看法。“弗兰克说，‘煤气管’告诉他，他对保罗毫不在乎。”格拉瓦诺报告称。

卡索从来没有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告诉其直接主管弗纳瑞。缄口不言后来被证明是个明智的决定。

1985年10月，就在卡斯特利亚诺被杀一个月之后，时任吉诺维斯家族老板的文森特·吉甘特赶到弗纳瑞那斯塔藤岛的家中，与卢切斯家族首领“鸭子”托尼·科拉罗进行密谈。尽管当时就在房子里，但卡索并没有参加这次高层会议。第二天晚上，弗纳瑞将会谈的成果告诉了卡索和阿穆索，即一个报复同道老板大保罗·卡斯特利亚诺被杀的决定已经出炉。

葛提声称，甘比诺家族对卡斯特利亚诺被谋杀迷惑不解，并表示他们自己正在追查凶手，但这些决心施以报复的教父科拉罗和吉甘特没有理会他所施放的烟幕。他们一致认为，葛提未经管理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允许而杀害了一个老板，这无疑违反了黑手党一条神圣的教规。开会商讨之后，这两位老板认定葛提及其二号首领弗兰克·德西科必须领受最严厉的惩罚。

几个月之前，在被德西科探听口风的时候，卡索曾声称对杀死卡斯特利亚诺的计划毫不关心。现在，为了报复大保罗被刺杀，他最急迫的任务是和阿穆索一起策划处死其继任者约翰·葛提与弗兰克·德西科。针对葛提的复仇行动最终导致德西科被一枚遥控炸弹炸成碎片。这是一起困惑了葛提和执法专家达7年之久的命案，直到“煤气管”泄露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之后才真相大白。



甘比诺家族的角头弗兰克·德西科。他是葛提的首任二老板，曾帮助策划谋杀了保罗·卡斯特利亚诺。他在一起汽车爆炸案中被炸死。这起爆炸案的主要目标是葛提，动机是报复卡斯特利亚诺被谋杀。（纽约市警察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在谋杀葛提与德西科的行动指令下达的同时，一个超乎常理的行动策略也被传达下来。吉诺维斯和卢切斯家族首脑们希望卡索和阿穆索用一种传统上被美国黑手党认为非法的武器——炸弹来消灭这两个目标。此前，炸弹一直为管理委员会所禁止，因为它有可能杀害无辜者，让黑手党内部的清洗招来太多的注意。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爆炸物会掩盖黑手党涉案的事实，同时也防止寻仇者将吉诺维斯和卢切斯家族作为谋杀案幕后的黑手。明目张胆的大爆炸也会转移执法特工们的注意力，让他们不致于将美国黑手党作为嫌疑对象。爆炸物将迷惑每一个人，而最有可能的是，会让谴责的焦点转移在西西里黑手党人齐普们身上，这些人在意大利有过用炸弹炸死对手的记录。

为执行“除掉葛提”的任务，吉诺维斯家族借给卡索一个重要的助手“蓝眼睛”赫比·佩特（Herbie “Blue Eyes” Pate）。作为吉诺维斯家族一名经验丰富的杀手，佩特是黑手党里少有的人才：他是个弹药专家，在美陆军服役时受过训练。神通广大的卡索搞到了一种像软质粘土的名为C-4的长条形塑性炸药，而佩特则想出了如何拼装一个遥控玩具车来引爆它的办法。在其纽约北部郊区的家里，佩特为卡索和阿穆索验证性地演示了其武器与遥控器的使用效果。对这些阴谋者来说，现在已是万事俱备，只需要找到合适的地点来伏击葛提和德西科。

1986年春，当葛提设法巩固自己在家族里的统治地位时，他对吉诺维斯-卢切斯

家族决意为卡斯特利亚诺之死复仇的计划毫无察觉。他也没有想到吉诺维斯家族高层与他的两名角头吉米·布朗·费拉和丹尼·马里诺（Danny Marino）已经达成密约为刺杀计划提供帮助。作为卡斯特利亚诺的亲信和老友，费拉不满葛提发动突然政变。他可能还怀抱着希望，认为一旦葛提被除掉，吉诺维斯领导层会帮助他出任甘比诺家族老板。

“煤气管”负责部署行动计划，他发现葛提是个难以对付的猎物，要将葛提隔离在某个既适合伏击又能让刺客有较大机会全身以退的地方实属不易。他抱怨称，葛提“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通常都待在拥挤的地方，身边围着大批贴身保镖。然而，通过费拉，那名 C-4 爆破手获悉了一个罕见的能够一举干掉葛提和德西科的机会。

为了安抚那些曾经站在卡斯利亚诺阵营里的行动队，葛提频频走访它们的老巢以图赢得支持。作为一种善意的姿态，葛提和德西科计划一起访问费拉那布鲁克林区本森赫斯特的“老兵朋友俱乐部”。接到费拉的密告之后，卡索与他的共谋者们便开始了行动。费拉告诉他们，葛提和德西科将乘坐后者的汽车离开那个临街俱乐部，这是同时干掉两个人的绝佳机会。

1986年4月13日，一个星期天下午的早些时候，在与费拉的俱乐部相距一个街区的地方，卡索伙同阿穆索及后者的兄弟博比已经乘一辆轿车赶来，车子的有色玻璃让外人无法看到他们。赫比·佩特留在自己的车里在附近守候。他们所有人都看见，德西科在进去之前将他那辆别克-埃莱克特拉汽车停在俱乐部对面的街边上。佩特将 C-4 炸药藏在一个褐色的纸袋里，然后拎着那个袋子和另一个塞满食品杂货与面包的提包，慢慢地朝德西科的汽车走去。佯装掉下什么东西，佩特弯下腰，将装着 C-4 炸药的纸袋放置在别克车的底板下。他随后便漫步走回了自己的汽车。

葛提当天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前往费拉总部的行程，或许就是这一决定救了他的性命。坐在汽车里，佩特看到德西科离开费拉的俱乐部走向那辆别克车，身边还跟着另一个人。“蓝眼睛”赫比认为第二个人是葛提，随即就打开了他的起爆器。将靠人行道一侧的车窗玻璃摇下，佩特慢慢朝德西科的汽车开去，在驶近目标车辆时猛然按下遥控开关。爆炸几乎让德西科立即毙命，当时他就坐在汽车里，正为那个跟着他走出俱乐部的人在汽车仪表盘上的小盒里翻找一个律师的名片和电话号码。第二个名叫“弗兰克·哈特”弗兰克·贝利诺的人的确与葛提有几分相像。他是卢切斯家族的普通打手，同时也是德西科的朋友，贝利诺活了下来，尽管腿和脚部受重伤。

爆炸产生的金属与玻璃碎片如疾风暴雨似地落在佩特的车上，他的右耳和面部被

划出了许多小伤口。卡索和阿穆索兄弟毫发无损地驱车逃离了。克利斯蒂·蒂克随后指示卡索，“告诉每个人要暂时低调行事并静待时机，但得继续寻找机会除掉葛提。”然而，这次炸弹袭击阴谋是卢切斯家族唯一一次企图铲除葛提的努力。葛提与卡索及阿穆索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绝对没有怀疑他们曾试图将他炸成碎片。

习惯杀人却没想到自己也是个被杀目标的卡索经常独自活动。警方偶尔会发现他的踪迹，但对监视极为警觉的他会飞快地穿堂过巷，闪电般地闯过红灯，让人很难跟踪。1986年9月一个晴朗的下午，独自驾车的“煤气管”朝布鲁克林一家离他家很近的旅馆驶去。据线人向联邦检察官提供的密告，当时他满脑子都在想着那些被偷来的债券。甘比诺家族的一个合伙人已准备与卡索碰头，估计是讨论转让盗窃来的大量无记名债券的问题。这次见面是个诡计，当卡索将凯迪拉克汽车停在卡威尔冰淇淋店前的街道边时，另一辆至少载着三名枪手的汽车追上来并停靠在它的旁边，随后一阵急促的弹雨就透过驾驶员一侧的车窗向他袭来。葛提未带武器，背部与左臂中弹的他跌跌撞撞地穿过街道扑进一家酒店，并抓起一条桌布裹住伤口止血。目瞪口呆的酒店雇员或食客没有人告诉警方谁突然闯了进来，而卡索当时正藏在一个地下室冷藏库里。他后来浑身颤抖地走出冷藏库给维克·阿穆索打电话，后者随即驱车将他接走并送往医院。

探员们跟踪卡索来到医院，但对于谋杀动机和黑手党可能卷入其中的问题，他在那里一直避而不谈。“没有什么人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有组织犯罪。”卡索无法解释在他车里发现的一个不同寻常的物品——警察局的一份秘密的汽车牌号清单。调查人员在执行监视任务时，通常会在无警用标志车辆上挂用这些车牌。除了失血之外，他出院时身体状况还算良好。

“煤气管”很快猜出是谁要干掉他。因一笔海洛因销售利润的瓜分问题，他与合伙人，即甘比诺家族的角头“好汉米基”迈克尔·帕拉迪索结下了怨仇。由于管理委员会案尚在审理之中，平时解决黑手党内部纠纷的协商机制暂时失效，两个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由此激化。

在他的伤口愈合之前，卡索的情报间谍就查清了意欲杀掉他的杀手队负责人的身份。通过纽约警察局两名每月从他那里领取数千美元报酬的“贪腐”侦探，他搞到了那名枪手的名字和警方对他进行拍摄的监视照片。这两个人都在有组织犯罪调查部门工作，有机会获取机密情报，包括告密者的身份、官方获取的证据和即将实施的抓捕行动。通过卢切斯家族一名合伙人与这些侦探接触，卡索此前就与他们达成了一项交易，由他们将警方和FBI调查黑手党的进展情况通告给他。

卡索准备杀掉未能干掉他的杀手队的所有成员，但由于管理委员会案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他的复仇行动不得不延后实施。

自1931年五大家族创立以来，卢切斯犯罪家族证明了自己是纽约各家族中最稳定和内部纠纷最少的一个。在50多年里，家族权柄由盖塔罗·加利亚诺和平地传给三指布朗卢切斯，后来又转给安“鸭子”东尼奥·托尼·科拉罗。和其他四大家族不一样，卢切斯家族从未发生过要谋害教父性命的阴谋事件，而且也从来没有因为内战而遭受分裂之痛。

“鸭子”托尼希望继续这种和谐的传统。随着1986年秋天管理委员会审判的即将落幕，科拉罗看到了可怕的不祥之兆。卢切斯家族领导层将面临着灭顶之灾，比起其他犯罪家族，它遭受管理委员会案的影响要严重得多。意识到将与二老板汤姆·米克斯·桑托罗及顾问克利斯蒂·蒂克·弗纳瑞一起走向末路，“鸭子”便准备有条不紊地进行权力交接。在11月份有罪判决下达前不久，他将“煤气管”卡索和维克·阿穆索召到弗纳瑞那斯塔藤岛的家中。受弗纳瑞游说的影响，科拉罗准备挑选阿穆索或卡索作为接掌家族权力的最佳候选人。尽管两人都无长期的黑手党管理经验，但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对科拉罗的组织和对弗纳瑞的忠诚。两人还是成就卓越的捞钱人，这是一种最有利的招牌，意味着他们能够保持家族的繁荣并同黑手党对手竞争。

科拉罗知道卡索和阿穆索都是不容置疑的毒品走私贩，但他不理睬这些。维克·阿穆索曾因毒品犯罪进过监狱，而“煤气管”也受过毒品指控的敲打。科拉罗当然知



“鸭子”安东尼奥·科拉罗于20世纪后期被任命为卢切斯家族的老板。“三指布朗”汤米·卢切斯以其善于逃避有罪判决而给科拉罗起绰号为“鸭子”。(美国司法部特许转载的照片)

道他们给他带来的许多财富都来自于毒品交易，而他表面上严厉禁止从事这种交易，违者将处以死刑，但这不再是要紧的事情了。

在这次斯塔藤岛会议结束时，阿穆索被指定为家族教父的继承人。一旦“鸭子”托尼被处以终身监禁，他将填补科拉罗的职位。对于这次关系重大的会议，其内情只有卡索的说法为世人所知。据“煤气管”称，科拉罗接受了弗纳瑞的建议，认为领导权可以安全无虞地托付给顾问的两名被保护人中的任何一个。“科拉罗说，‘他们当中得有人出来（成为老板）’，克利斯蒂就将我和阿穆索带进隔壁的房间让我们做出决定。”声称无意谋取家族最高权位的卡索说，通过支持阿穆索成为卢切斯家族下一任教父，他决定了会议的最终结果。尽管他以前为了阿穆索而拒绝成为角头，但在新政权里，卡索不久还是接受提拔成了顾问，后来又做了二老板。

1987年初，卢切斯家族老一辈领导层成员都被判处终身监禁。“鸭子”科拉罗送给他热爱的犯罪家族一样离别礼物，那就是家族权力的一次和平交接。他相信这将保证家族的光明未来。

他彻底失算了。

第 41 章 血洗

“那家伙是个线人。在这辈子，你只能用一个办法对付告密者，那就是杀掉他们。他从州里走到 FBI，他的确在通风报信。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几十年来，卢切斯家族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其主力部队以曼哈顿和布朗克斯为根据地，而另两支劲旅则活跃于布鲁克林和新泽西。在维克·阿穆索继位之前，他的三位前任老板都来自于曼哈顿-布朗克斯地区，那里是家族的发源地，是一些实力最强大的行动队聚集的地方。作为崛起于布鲁克林支派的领导人，维克·阿穆索和“煤气管”卡索现在控制了由约 120 名荣誉者和近 1000 个合伙人及崇拜者组成的纽约黑手党第三大家族。

通过窃听器和线人提供的线索，联邦和州调查人员基本摸清了卢切斯犯罪家族高层的变动情况。布鲁克林一位被派到卢切斯小组的检察官格雷戈里·奥康耐尔正在调查这新组成的指挥机构。早些时候，他断定说，“阿穆索拥有老板头衔，但家族的决策者和原动力是‘煤气管’。”阿穆索开始几乎每天都在其霍华德海滨的家附近打手球锻炼身体。FBI 特工已经听到街谈巷议，称比起管理家族的基本事务来，阿穆索对其户外运动更感兴趣。

对于统领曼哈顿-布朗克斯和新泽西行动队的角头们来说，阿穆索和卡索都不太有经验。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年龄较大且经验更为丰富的黑手党人，看着这两个布鲁克林聪明汉那令人目瞪口呆的飞升，他们更多的是迷惑不解或充满愤恨。由于对那些根基深厚的角头们充满不信任感，新领导人决心充分利用手中的独裁权力。受多疑症和疯狂贪欲的驱使，他们的政策是推行可与谋杀公司相匹敌的对内与对外的恐怖统治。在这场清洗结束前，约有 40 名受害者——主要是卢切斯家族的荣誉者和合伙人——

丧命或失踪（据推测已遭杀害）。大多数人不论对错都被卡索扣上行为不忠或告密者的罪名被除掉。

布朗克斯区的“巴迪”安东尼·隆戈是首批失踪的角头之一，他在阿穆索和卡索正式上任前不久就被杀掉。隆戈的罪过是：据称科拉罗曾一度考虑指定他为继任者，他因此有可能对这些出身布鲁克林的执掌家族大权的新贵们心怀嫉妒。卡索向手下阿方索·达尔科吐露说，他和阿穆索解决了这个潜在的大麻烦，承认“我们杀了隆戈并将他埋了起来”。

10年来，布朗克斯打手迈克尔·帕帕迪奥（Michael Pappadio）一直充当达克斯·科拉罗在服装中心里的代理人，他是从哥哥安迪默那里继承了这份重要的工作。帕帕迪奥是个杰出的捞钱人，每年向家族高层输送数百万美元的财富，这些钱一部分是他以劳资和谐为借口敲诈各个公司勒索的，另一部分则来自他在曼哈顿商业中心的高利贷生意。帕帕迪奥的资产还包括在一家黑手党货运公司里持有的秘密股份，而这家获利丰厚的公司在服装中心拥有业务专营权。怀疑帕帕迪奥可能在上缴利润时截留自肥，卡索和阿穆索突然安排更为忠实可靠的仆从与合伙人西德尼·利伯曼（Sidney Lieberman）接替他的职位。由于利伯曼是个犹太人，他们觉得他应该知道如何从犹太人经营的公司里榨取更多的钱。在服装中心，这些公司占据着主体优势。利伯曼清楚自己肩负的使命，马上充当了谣言的制造者，称帕帕迪奥在欺骗新一届领导层，一年就截留了1500万美元的收益。不甘任人摆布的帕帕迪奥声称自己是个荣誉者，还是达克斯·科拉罗的前心腹朋友，于是愤而抵制被一个非黑手党的局外人，一个“犹太杂种”，从待遇优厚的职位上赶走。接着他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遵照卡索的指令，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一支杀手队驱车将帕帕迪奥带到了“王冠百吉饼店”，那是昆士区一家由卢切斯家族打手经营的百吉饼店。帕帕迪奥以为要举行一次例行性黑手党会议。他刚一进门，一名杀手喊道，“突袭！”这时另一个暴徒操着一段沉重的铜电缆已经砸在他的头上。“你们干什么？”摇摇晃晃的帕帕迪奥呻吟道，挣扎着站住脚跟。第三名杀手近距离朝帕帕迪奥的脑袋连开了7枪，完成了谋杀任务。

新政权有个理想的办法处理尸体。帕帕迪奥的尸体被一个殡仪馆火化了。这个殡仪馆经常向卡索的荣誉者盟友乔治·扎波拉（George Zappola）提供特殊服务。

布朗克斯第二个被优先列在卡索那“家族清洗”名单上的角头是迈克尔·萨勒诺。他被发现死在自己汽车的后备箱里，头部遭枪击，喉咙被割开，宽度延及两耳。萨勒诺被卡索和阿穆索视为潜在的挑战者，前者掌管着一支人数众多且经济实力雄厚的行动队，并且对他们跃居其上也曾表示过不满。萨勒诺对这些新领导人还构成另一

种威胁，由于他过去与“蒂克”克利斯蒂·弗纳瑞关系密切，卡索和阿穆索怀疑自己的过去，自己的“肮脏经历”被他知道的太多。卡索给出了杀掉萨勒诺的理由，称他是个“告密者”，并且在宾夕法尼亚秘密经营一个利润可观的垃圾填埋场时向家族高层瞒报了收益。作为萨勒诺死后的一种意外收获，卡索和阿穆索按照其高利贷账目获得了他那本金总额约700万美元的放贷收入。

通过在一个腐败的卡车司机协会任工会代表的身份，布朗克斯打手安东尼·迪拉皮（Anthony DiLapi）替家族从事着劳工诈骗活动。嗅出家族新任领导人的敌意之后，迪拉皮搬到加利福尼亚州重新安家。他随即被宣布为不忠，是个反对家族管理层的阴谋者。迪拉皮是已遭监禁的原二老板汤姆·米克斯·桑托罗的侄子，阿穆索和卡索便散布谣言称，他和叔叔在管理委员会案发生之前就密谋反对“鸭子”科拉罗。根据纽约那些受贿侦探提供的情报，卡索尾随迪拉皮追踪到加利福尼亚，他的猎物最终在那里被从纽约赶来的四名杀手枪杀。为干掉迪拉皮，卡索罕见地拨发1万美元费用，作为杀手们跨州追击的开支。

约翰·彼特瑟利（Jonh Petrocelli）的错误是对外夸耀他对黑帮朋友格斯·法拉斯（Gus Farace）的忠诚，后者是博南诺家族一个杀害联邦毒品执法特工埃弗雷特·哈彻（Everett Hatcher）的合伙人。那名特工的遇害招来了一场大规模的追捕，政府当局向纽约各家族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必须交出凶手。五大家族首脑共同发布通令，任何人不得向法拉斯提供帮助。彼特瑟利当时正在窝藏这个亡命者，卡索便电话给他，称必须立即处死法拉斯以解决黑手党的麻烦。当彼特瑟利拒绝杀掉法拉斯时，卡索的杀手队就将这个抗命不从的党徒枪杀在其扬克斯市的公寓楼走廊上。他保护朋友的努力终归徒劳。决心将罪责从黑手党身上推卸干净，博南诺家族的杀手终于找到法拉斯的藏身处并将其杀害灭口。

布鲁诺·法西欧罗（Bruno Facciolo）是卢切斯家族一个在布鲁克林地区活动的打手，1986年因忘记探望受到夺命伏击而在养伤的“煤气管”而失宠。由于与甘比诺家族的成员交往频繁，且有传言称他向官方吐露了迪拉皮谋杀案的内情，卡索对他进一步燃起了敌意之火。那两名执法部门内部的叛徒侦探火上浇油，报告称他们相信法西欧罗在为FBI工作。受卢切斯家族同伙的诱骗，法西欧罗来到布鲁克林一个汽车修理店与人见面，当他意识到落入圈套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企图脱逃的他被扭倒在人行道上，随后又被拖进店铺，过路者没有人进行干预或报警。意识到命将不保，法西欧罗哀求给予最后一个方便——打电话向女儿告别，但三名杀手不为所动。法西欧罗受到枪击和刀捅，其尸体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中被人发现。他的嘴里塞了一只金丝雀，

这是传统上黑手党对告密者的一种警告。

法西欧罗的死导致他的两名黑手党伙伴被谋杀，而这命案背后的动机仅仅是为了防止他们实施报复。卢切斯家族与法西欧罗一起专事珠宝偷盗和拦路抢劫的同伙是阿尔·维斯孔蒂（Al Visconti）和拉里·泰勒（Larry Taylor），这两个人受到卡索的杀手暗中跟踪并遭枪击致死。维斯孔蒂的腹股沟被特意射了几枪，新首领们相信他是个同性恋者，让家族蒙受了耻辱。

因为与卡索和阿穆索共同作奸犯科，腐败的工会领导人付出了深重的代价。自50年代后期开始，卢切斯犯罪家族就与工会官员结成联盟从油漆承包商身上榨取数百万美元的酬金，算是他们阻止在最后时刻出现工程麻烦的补偿。（作为最后一批施工工人，通过消极怠工，油漆工往往能为承包商和发展商造成代价异常高昂的工程延期。）付出酬金的油漆承包商还能得到黑手党人更多的“帮助”，他们可以取得私下签订的劳资谈判协议，还被允许雇用低廉的非工会工人。80年代后期，由州和联邦检察官发起的调查行动威胁到这种种交易，并给卢切斯家族的新贵们敲响了警钟，让他们惶恐地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指控。詹姆士·毕晓普（James Bishop）曾是一个拥有600名会员的油漆工工会主席，同时也是一个民主党地方领导人。他被卡索视为最容易招供的参与者和最有可能与检察官们合作求取轻判的人。如果毕晓普变节，他将有许多内情可以吐露。在纽约几乎所有大型公共与私营工程的油漆合同中，有高达10%的净利润回扣被寡廉鲜耻的工会领导人伙同包括卡索和阿穆索在内的黑手党伙伴瓜分了。仅在一个大型的地铁项目当中，他们就与卢切斯家族瓜分了400万美元。

卡索再次求助那两个腐败的探员，他们证实毕晓普正在向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告密”。因此，在5月的一个清晨，正当毕晓普在其昆士区的情妇家过夜之后准备驱车离开时，卡索的两名枪手突然袭击，让他再也无法作证。他的头部和胸部被消音手枪射进了8颗子弹。

与吉诺维斯、科洛博和甘比诺家族的首脑们一起，卡索和阿穆索在源源不断地从准备参与政府公寓房工程项目的公司那里收取保护费，这些公司获准就窗户安装工程参与受到非法操纵且价格暴涨的工程投标。1989年，在FBI着手调查这类不法交易时，卢切斯家族领导者们对这场阴谋的一个关键人物“宝贝”约翰·莫里西（John Sonny Morrissey）越来越担心，此人是一个代表窗户安装工的钢铁工人地方分会的工人代表。这个工会很早以前就是卢切斯家族的领地，而莫里西是工会里为该家族效力的捐客，深知敲诈活动的运作方式和交给其黑手党操控者的勒索金分配情况。莫里西

是位身材魁梧的钢铁工人，也是个好打架斗殴的粗野汉子，经常骄傲地自称是个黑道中人。“我是个贼和暴徒。”喝了几杯酒后，他常常这样大声地说。为保险起见不让这个多嘴多舌的莫里西向官方告密，卡索下达了他的死刑令，同时要求其尸体不得被发现，他的失踪要看起来像是为躲避检控而出逃。接下来，卢切斯的杀手们劝说莫里西随他们到乡下快活地玩上一天。驶过一段临时便道后，他们来到新泽西乡下一个荒废的住宅开发工地。第一颗子弹擦伤了满怀狐疑的莫里西。“我不是告密者。”他呻吟着，身子瘫倒在地。当行刑手们逼近他时，他哀求他们迅速而没有痛苦地结束他的生命。他们把他的尸体埋藏在成吨的垃圾底下。尽管临死之言未能挽自己的性命，但莫里西说的是实话，他没有与 FBI 合作。

对于他们所认定的敌人，卡索和阿穆索鲜有心慈手软的时候。尽管年近 80 岁且身体状况堪忧，但原顾问“麦克”玛利亚诺·默卡纳索（Mariano “Mac” Macaluso）仍然被列入卡索的“敌人名单”之中。作为老前辈，默卡纳索曾以打手身份为家族效力了 50 年。倘若加入反对派的运动之中，富有且深受卢切斯家族成员敬重的他就会成为一种威胁。在卡索和阿穆索的信使阿方索·达尔科的传唤下，赶到酒店本欲参加会议的默卡纳索被命令交出其个人财产。默卡纳索哭泣着说，“我被扔到一旁，这不公平！”达尔科的回答生硬而干脆：要么选择强制性退休，要么选择死亡。

卡索现在用权力和力量来解决个人恩怨。他的首要任务是查出并追杀在布鲁克林伏击并打伤了他的枪手。知道卡索绝不会善罢甘休，那些无能的杀手在刺杀失败后就分散躲藏了起来。卡索的头号目标是杀手队的骨干成员詹姆士·海德尔（James Hydel）。此人是斯塔藤岛一个无甚名气的毒贩与暴徒，同时也是甘比诺家族一个具有半个意大利血统的合伙人。海德尔是甘比诺家族角头丹尼·马里诺的侄子，这层关系并没有让他得到卡索的宽恕。

“这个家伙知道他境况不妙，”卡索多年之后讲道，“我没有死，他对每一个人都小心提防，没有人能接近这个家伙。”

2003 年，卡索在接受采访时说，他雇了一名 FBI 特工和两个纽约市侦探查找海德尔。他说，与这个堕落的三人小组联系并向他们支付酬金的人是伯顿·卡普兰（Burton Kaplan），此人是卢切斯家族的一个合伙人，也是他与司法人员接触的联络者。据卡索称，那名 FBI 特工找到了海德尔并通知了那两个侦探，当目标冒险探访布鲁克林的一个黑手党俱乐部时，他们把他抓了起来。伪称有拘捕令的侦探们铐住了海德尔并把他塞进一辆卡索送给他们的汽车里，随后将其拉到一个封闭的车库里。（那辆绿色的汽车是“煤气管”在拍卖会上买到的一辆无标志的警车。）他们将俘虏从后座上拖

了出来，把他捆了个结实，然后塞进汽车的后备箱里，继而赶到一个玩具反斗城（Toys “R” Us）停车场的预定地点与卡索会合。这是卡索唯一一次亲自与探员们接触，他与他们握手，感谢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声称，尽管他知道那名 FBI 特工的底细，但他只通过卡普兰从中联络，从来没有与他见过面。坐上绿壳车的驾驶座后，仍将海德尔留在后备箱里的卡索驱车离去，那两名侦探则开着卡普兰的车紧跟其后。

“那个家伙是个大块头，身高有 1.89 或 1.90 米，他不停地踢着车盖，当时停车场附近还有许多人，”卡索冷笑着说，“但我并不在意，有警察站在我旁边，如果有什么麻烦，那两个狗娘养的侦探会替我开脱。”

在布鲁克林区卑尔根海滨居民区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神枪手卡索把海德尔当成靶子练习，他朝其腿部、胳膊和身体开枪，却不造成一处致命伤。最后，在海德尔供认了杀手队其他成员的身份之后，卡索朝他的脑袋补上致命的一枪结束了拷问。和许多卡索的受害者一样，海德尔的尸体从未被人发现。

为了查找和绑架海德尔，卡索称他总共付出了 7.5 万美元的费用：为他效劳的纽约侦探和 FBI 特工每人得到 2.5 万美元。他声称，为搞到与黑手党调查有关的机密情报，他通常每个月会付酬金给这些贪腐的警官，每人 1000~1500 美元，而遇到有像绑架海德尔这样的特殊任务，他们还会得到额外犒赏。

海德尔的惨死没有平息卡索那复仇的躁狂，也没有结束他对其他伏击者的追杀。他的私人刑队认为他们干掉了海德尔的一个名叫尼古拉斯·吉多（Nicholas Guido）的帮凶。悲惨的是，在 1986 年圣诞节那天，他们枪杀的并不是真正的尼古拉斯·吉多，而是一个 26 岁的站在自家外面的电话安装工。这个无辜的人惨遭杀害是因为替卡索兼职的侦探间谍们犯了一个错误。卡索要求他们找出那个应该是尼古拉斯·吉多的刺客时，他们就搞到了一个住在布鲁克林公园坡的同名同姓者的地址，这个受害者比卡索决意要杀死的那个崇拜者小 3 岁。

卡索对这起谋杀不屑一顾。

“嗨，这是个错误，”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但没什么了不起。”真正的尼古拉斯·吉多逃到了佛罗里达，后来因人身伤害罪向警方自首，他知道蹲在监狱里要比留在街头让“煤气管”卡索持枪捕杀更安全些。

伏击队的第三名成员罗伯特·白令（Robert Bering）通过在证人保护项目里寻找安全逃过了卡索的魔爪。这位前高速运输管理局警官向 FBI 自首，承认他是黑手党的雇佣杀手，并就与卡索无关的罪案出庭作证，包括黑手党秘密控制纽约市的各个校车

公司。白令 40 岁时死于心脏病发作，也许是因为担心“煤气管”那复仇的力量会穿透监狱高墙而过分焦虑所致。

在黑社会里爬升为二老板之后，卡索决心在光明世界里过过舒服的日子。在布鲁克林高档亲水居民区米尔海湾，他慷慨地花了 120 万美元建造并装修了一个新家。监理工程施工的建筑师是卢切斯家族合伙人安东尼·法瓦（Anthony Fava），他此前曾为家族其他成员设计过豪宅并监督建筑施工。1991 年，在卡索的房子完工后不久，法瓦被发现死在布鲁克林。他那赤裸的支离破碎的尸体被丢在一辆失窃的汽车里，手和脚都被捆绑了起来。他受到疯狂的残杀，尸体上有几十处枪眼和刀捅的创口。在活着的时候，他的脸、胸部和胳膊就被烧焦，施虐的工具或许是烟头。谋杀是遵照卡索和阿穆索的指令实施的，表面上是因为法瓦被怀疑充当了或者正在变成警方的卧底。

根据线人的报告，调查人员提出了可能影响法瓦命运的第二个因素。卡索担心，通过新房子的图纸设计和开支记录，这个建筑师知道了太多的与其财务状况及豪宅造价有关的信息。卡索的随从传出话说，法瓦该死，因为他向卡索要价太高，并且还是个政府密探。法瓦死前被剥去了短裤，这表明他受到搜身以查找隐藏的录音设备。他是另一个被错误地污蔑成告密者的受害者。后来，“煤气管”用一种少有的隐含些许怜悯之情的语气，严厉斥责杀手没有他的特别指令而折磨那个建筑师。他认为，这份“工作”是一次常规谋杀，不应该进行长时间虐待。

仅仅是向一个他所喜欢的布鲁克林邻居示好，卡索就能发出死刑命令。这个邻居曾向他抱怨说，有个极浪漫的名叫安吉洛·西格尔拉（Angelo Sigona）的年轻人总是纠缠他的女儿，要和她约会，而这可能会危及她与另一名求婚者的婚约。正当害着相思病的西格尔拉坐在自己的汽车里时，一个杀手开枪打死了他。不清楚这个邻居是不是只想打西格尔拉一顿，威胁他一下，而并非要永远地除掉他。但卡索显然表现得像个无所不能的旧式黑手党教父，只会用一种办法解决所有问题。

有个更直接的请求来自角头塞尔·阿韦利诺，此人是卢切斯家族在长岛上的垃圾清运业控制者。在管理委员会案的反扑当中，有几笔老账需要清算。阿韦利诺想杀掉罗伯特·库柏卡，在这个勇敢的秘密为州有组织犯罪特遣队工作的垃圾清运商的帮助下，阿韦利诺的汽车被窃听。在管理委员会审判中，“美洲虎”录音是指控“鸭子”科拉罗和其他黑手党大佬的毁灭性证据。阿韦利诺在管理委员会调查中逃过了检控，但害怕库柏卡可能引出新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从而危及他和黑手党每年从长岛垃圾清

运业中榨取的 40 万美元收益。

“美洲虎”窃听削弱了阿韦利诺在黑手党里的地位，损害了其声誉。他担心自己在录音带上的话会被当成证据，证明他通过在卡车司机协会和垃圾承运人同业公会里的影响力向承包商勒索酬金。“谁控制了雇工谁就控制了老板，”在 1983 年被窃听的汽车谈话中，阿韦利诺被听到这样向他的两名打手传授策略，“因为……如果你有 20 个人，他们明天不准备去收拾那该死的垃圾，那你打算听谁的？”

阿韦利诺对黑手党控制了卡车司机和垃圾承运人协会格外得意。“现在碰到不规矩的家伙和其他这样那样的人时，你手上有了鞭子。强有力的工会能为每个人挣到钱，包括聪明汉。有了强有力的工会，聪明汉们能搞到更多钱。”

1989 年，阿韦利诺仍然逍遥法外，仍然经营着其长岛的地下生意，可他害怕库柏卡和他的家人会成为联邦调查行动中的关键证人，他希望库柏卡立即被杀掉。批准了谋杀行动的“煤气管”证实，这个长岛的垃圾清运商的确在向 FBI 和检察官们告密，这不仅对阿韦利诺，而且对他和阿穆索在垃圾清运业中的巨大利益都造成了威胁。“我有办法从 FBI 办公室里搞到机密情报。”卡索安慰属下说。

卡索批准了谋杀罗伯特·库柏卡和他的父亲，后者创立了他们那家独立的小型垃圾承运公司。甘比诺家族在长岛的垃圾勒索生意中瓜分了部分收益，它同意谋杀计划由卢切斯家族来实施。1989 年 8 月 10 日的清晨，罗伯特·库柏卡和妹夫唐纳德·巴斯托（也在和 FBI 合作）单独待在他们长岛的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准备拟定当天的工作计划。卢切斯家族的两名杀手闯进来杀死了他们。杰尔·库柏卡因当天早上留在家里而逃过一命。

尽管两个证人都被干掉，但卡索和阿穆索还是怪罪杀手罗科·维图利（Rocco Vitulli）和弗兰克·弗雷德里科（Frank Frederico）把事情办砸了，他们将一个装有手枪的运动包落在现场，而且与库柏卡扭打的那个枪手还留下了血迹。“煤气管”照旧没有对这些人的死亡感到懊悔。“那家伙是个线人。在这辈子，你只能用一个办法对付告密者，那就是杀掉他们。他从州里走到 FBI，他的确在通风报信。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由于完成了这项任务，弗雷德里科得到了卡索和阿穆索的认可并被吸收为荣誉者。（1995 年，因这起命案受到指控的维图利就罪行较轻的联邦指控达成认罪协议，随后领受了从轻量刑的 4 年刑期。躲藏 14 年之后，弗雷德里科于 2004 年承认了他曾执行的任务，并在 76 岁时被判处 50 年监禁。）

两名勇敢的生意人被枪杀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报道既揭露了黑手党的

大胆凶残，也直陈了执法部门的疏忽，而这种疏忽会潜在地打击其他证人揭发“科萨·诺斯特拉”的积极性。这场悲剧还让执法机关卷入了一场置疑它们在保护库柏卡和巴斯托问题上存在明显疏漏的争论。FBI 特工和联邦检察官指责州有组织犯罪特遣队在秘密工作的危险性上误导了库柏卡父子，并且也未能回应受害者无数次提出给予保护的申请——包括罗伯特·库柏卡在被杀前夜提出的援助请求。当时的特遣队主管罗纳德·戈德斯塔克坚持说，库柏卡拒绝了重新安置或进入证人保护项目的建议，并称他想保住自己的产业并留在长岛。州调查人员认为 FBI 和联邦检察官存在过错，他们争辩说，库柏卡和巴斯托在被杀前的那段时期只为联邦政府工作，而这是黑手党实施这起谋杀的主要动机。40 岁的库柏卡和 35 岁的巴斯托撒手留下了他们的妻子和五个孩子。

寡妇们提起的诉讼将这起命案的责任全算在州特遣队身上。1996 年，法官裁定，该机构未能就他们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向库柏卡和巴斯托提出警告，并且疏于为他们提供保护。他们的家庭获得了 960 万美元的赔偿金。

“特遣队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这两个人，”寡妇们的律师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Folks）愤怒地说道，“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只需在他们的办公室外架设保安摄像头，并偶尔将警车停在附近警告那些坏家伙就够了。”曾在曼哈顿做过联邦检察官的福克斯称，州调查人员和检察官没有采取执法机关所采用的常规措施去保护证人：“他们应该联系卢切斯家族的头目，警告他们不得伤害‘我们的证人。’那就是通常该做的事情，让他们知难而退。”

卡索的内部清洗和暗杀像库柏卡这样危险的局外人似乎让卢切斯家族的首领们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在他们统治之初，维克·阿穆索和安东尼·卡索就任命新角头阿方索·达尔科为主要掮客，从家族的各种冒险生意中收取并递交他们应得的收益。在财物的分配上，达尔科得到过明确的指示。“维克告诉我，‘阿尔，我们让安东尼来掌管现金。我对科萨·诺斯特拉的事情更感兴趣，你知道的，那是些重要的事情。’”阿穆索依靠卡索的办事头脑和他那令人恐惧的形象来保证他们得到最大份额的收益。作为老板，阿穆索喜欢留意体制上的问题，喜欢与其他教父聚会恳谈，喜欢任命角头和挑选新荣誉者。

卡索有个追求细致的癖好。他极为细心地记录了角头和打手们缴给他的报酬和他们的杂项费用，包括付给司法人员的贿赂金。另一个怪癖是在卡片文件上列出打手和合伙人的犯罪本领。在向角头乔治·扎波拉解说其文件系统时，卡索特别提到他将顶尖的盗车贼归类在“C”项下。当问到他的类别时，“煤气管”那尖刻的风趣让扎波拉

颇为灰心，“在‘U’项下，表示无用。”

在接管家族大权之前，卡索和阿穆索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毒品交易。作为家族首脑，他们突然享有的领导权益令他们的毒品收入相形见绌。他们每个月可从长岛的垃圾承运业敲诈活动中分到1.5万~2万美元；通过向8家航空公司保证劳资和谐和允许它们欺骗雇员以剥夺他们的工会福利，每月可获得7.5万美元的回扣；每周从非法的视频赌博机器上可获得2万美元的收入；每年还从重要的混凝土供应商奎德罗兹混凝土公司索取24.5万美元佣金，条件是保护它不受苛刻的工会合同限制。（建筑承包商们受到卢切斯家族暴徒的警告，说是如果想避免“严重的问题”，就得使用奎德罗兹公司已搅拌好的混凝土。）

他们派驻服装中心的特使西德尼·利伯曼特别能干。据说通过一种诡秘的敲诈办法，他每年向他们纳贡20万美元。据劳工部调查人员称，利伯曼会让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LGWU）——业界最大的工会——的一名腐败官员威胁在选定的公司里推行工会化运动。当一名ILGWU的组织者出现在公司之后，利伯曼或他的律师就会磋商出秘密的现金交易将工会排斥在工厂之外，而靠这种系统性的勒索取得的大部分收益都会转交给卢切斯家族的两个首领。（数年后，利伯曼承认犯下了一项RICO劳工敲诈阴谋罪并被判处4年监禁。）

作为家族首领，卡索和阿穆索还在低级成员的所有赌博与高利贷收入中占有份额，同时还会获得一些数额巨大的单笔报酬。为感谢卡索帮助他们在拆除的西区高速公路上窃取钢材，科洛博家族付出了80万美元的佣金。在科尼岛一个大型住宅综合开发项目中，由于允许甘比诺家族接替一个受卢切斯家族保护的总承包商，他们取得了60万美元的报酬。

循着科洛博家族的足迹，卢切斯犯罪家族也将犯罪触角伸到燃油盗窃行当，并与俄罗斯诈骗犯马拉·巴拉圭那（Marat Balagula）结成了伙伴关系。“他从燃油税生意中赚了几百万美元，我们家族和他一块也挣了不少。”“煤气管”多年后吐露了这个信息。当另一个俄罗斯暴徒向巴拉圭那索要60万美元的保护费时，卢切斯家族杀掉了他。卡索只记得那个俄罗斯对手名字是“弗拉基米尔（Vladimir）”。他的全名是弗拉基米尔·热兹尼科夫（Vladimir Reznikov）。

就他个人而言，卡索每年从自己的高利贷生意中就可捞取十几万美元。他还拥有一个独享的美差：控制乔治·卡利卡塔斯（George Kalikatas）。此人是个希腊裔恶棍，因为允许他在昆士区从事高利贷、赌注经纪和敲诈勒索活动，仅在1990年一年他就

交给卡索 68.3 万美元。而在每一个圣诞节，各个行动队为表孝心通常会送给老板和二老板价值达 10 万美元的礼物。

这泉涌般的财富大大改变了“煤气管”的生活方式。除了他那造价不菲的新房外，他还如帝王般地疯狂购物。他有一天购置衣物就花掉了 3 万美元，又花了十多万美元买了一个 10.5 克拉的钻石戒指。然而，他那自大而粗俗的个性从未离他而去。在迈阿密的一家法国餐厅用餐时，他点了酒店里最贵的葡萄酒，一瓶即花掉 3000 美元。借着烛光，斟酒服务员照例耍了一番娴熟精妙的斟酒功夫。沉渣去除后，杯中葡萄酒那微妙的芳香也就弥散开来。“煤气管”品了品酒，向那个绕席游走的侍者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在同伴的吵闹声中，卡索将一瓶“七喜”汽水倒进了酒杯。有一次过圣诞节，卡索带着大批暴徒和他们的女友出现在洛克菲勒中心的“海鲜烤肉馆”。因其观景窗正对着溜冰场，这里颇受食客们的欢迎。由于没有提前预约，餐厅领班告诉卡索没办法搞到桌子。点出一沓百元钞票放在那人的手上，卡索得到了一张最前排的餐桌，这小费花掉了他 1400 美元。

1990 年，在卢切斯家族的权力顶峰盘踞了将近 4 年之后，卡索和阿穆索感觉安全了。他们吸收了 17 名年轻的新成员来扩充自己忠实信徒的队伍，靠这些人足以察觉任何异议者的抱怨。他们在家族内部的真正或者想像的敌人已经躺进了坟墓。另一个有利之处是他们那隐秘的生存状态。媒体或政府都没有把他们当成黑手党要人和“科萨·诺斯特拉”首脑人物关注。所有迹象都表明，他们可以长期且成功地行使家族统治权。生活如此惬意，他们的关系又如此密切，以至“煤气管”和维克都有雅兴带上妻子而非保镖一块到迪斯尼世界去游玩度假。

最让人得意的是，数百万美元的财富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的保险柜。

第 42 章 “教授” 与胖子皮特

你们得知道这个家族是多么危险。他有情报来源，有特工，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即使在这渐行暗淡的光线中，阿尔·达尔科也能看得出“煤气管”安东尼·卡索的焦虑不安。他们沿着布鲁克林汉密尔顿公园内的堤坝散步，眼看着纽约港上空的太阳缓缓沉落。卡索说出了那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为了躲避即将来临的敲诈勒索罪拘捕，他和维克·阿穆索准备潜逃。1990年5月那个星期六的傍晚，达尔科被召到“大炮”（公园内一个摆有一尊旧式大炮的地方）进行紧急会面。

卡索过去曾多次暗示称，那些受贿的联邦与地方执法特工在暗中向他提供机密情报。他将遭逮捕的消息就是从一个被他称为“水晶球”的腐败间谍那里得来的。

现在，卡索匆忙将详情告诉了达尔科。未来两天，指控他、维克·阿穆索和吉诺维斯、甘比诺和科洛博家族高级成员的联邦起诉书就要被公开。由于黑手党在纽约市房地产开发项目中通过敲诈勒索和非法操纵投标控制了窗户安装合同，他们已经受到RICO组织指控，这次调查将被称为“窗户案”。

卢切斯家族老板维克·阿穆索已经找地方躲了起来。“你准备怎么办？”达尔科问道。“你最好也离开这里。天知道他们会不会到你家等着你？你会被捕的。”

卡索自信他的情报——估计来自一个堕落的FBI雇员——是准确的，逮捕时间就定在下星期一。他解释了自己出逃的原因。他和阿穆索相信，在其他被告受审之后，他们更有把握击败指控。在头几场审判中就可以看出检方证据和检控的力量。在后面接受审判时，阿穆索和卡索就能带着准备更充分的律师走进法庭应对法律战。

卡索还讲到其他的重要消息。在阿穆索和卡索逃亡期间，达尔科将成为代理老板，但并不拥有正式头衔，重大决策仍由阿穆索和卡索决定，他们已经设计好了通过

迂回的办法从藏身处联络达尔科。卡索将一份写有纽约和长岛许多投币式公用电话及其位置的单子交给了达尔科，并称将用这些号码给他打电话。有个信使将会通知他在什么时间和在什么地点接电话。这是个意在挫败执法部门窃听黑手党人的谈话并追踪其电话的方法。

“再见，”卡索说道，并结束了这次会谈，“我就在附近。你是老板。不要担心。只干大事，不要为小事烦神。”离别之前，卡索用力地抱了抱达尔科，泪水湿润了这个无情杀手的眼睛。

在发号施令管理家族方面，阿方索·达尔科还是个经验稍逊的新手。他在卢切斯家族的职业生涯一向单调乏味且前途渺茫。他身体单薄、秃头，说话一向轻言细语。身为黑手党人，他更像一个卑躬谄媚的办事员，而不是一名逞强斗狠的黑帮分子。在其黑手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充当一名掠夺者、低级捞钱人和崇拜者的角色，只有在荣誉者或角头认为他有可能派上用场时才会作为帮手参与犯罪活动。他在布鲁克林长大，家里的几名亲人与黑手党都有瓜葛。在他生活成长的那个地方，“科萨·诺斯特拉”被看成是社会景观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用达尔科的话来说，“它就像一片森林，其间的所有树木都是有组织犯罪的成员。”

学校教育对达尔科来说是次要的，15岁时他开始全职干些合法却不体面的工作，同时还竭力讨好卢切斯家族一支在布鲁克林中产阶级社区坎拉西活动的行动队。尽管参加过各种犯罪活动，包括抢劫、偷盗、纵火、绑架、赌注经纪、经营掷骰子赌博、伪造货币和抢劫一辆装甲车，但他从未发过大财，生活一贯拮据。作为从犯，一切他能干的非法勾当他都干过。有一次，他打算做成一单大生意，结果却招来了一场灾祸。因试图买卖50万美元的被盗股票，29岁时他遭到逮捕并被判刑，在新心（奥西宁）监狱蹲了5年班房。

1966年，以坎拉西行动队合伙人的身份回来街头之后，达尔科重操旧业（主要是非法赌博和放高利贷），捞到了一笔非法收入。他还试图从事毒品贩卖，这是迅速致富赚大钱的最可靠的途径。达尔科没有让自己成为特别成功的海洛因、可卡因批发商，但通过尝试毒品交易，他在卢切斯家族打通了一些重要的人脉关系，并与两名新贵维克·阿穆索和安东尼·卡索搭上了联系。

达尔科长期为坎拉西行动队效力最终获得了回报，1982年，在他50岁“高龄”时，“鸭子”科拉罗亲自主持了他的入会仪式将其吸收为荣誉者。不幸的达尔科几乎没有时间来享受被提升为打手的快乐或利用地位的升高来捞钱。在成为正式荣誉者数月之后，他被判处将近4年监禁。因毒品走私被捕之后，他为了取得轻判达成了认罪

协议。1986年底获释后，达尔科回到了正经历着结构变化的卢切斯家族，此时阿穆索和卡索已经取得了家族的统治权。

1988年，达尔科所在的坎拉西行动队角头保罗·瓦瑞奥（Paul Vario）自然死亡，这为阿穆索和卡索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来任命自己人担任这支家族里最富有的行动队的头目。尽管其黑手党的资历平平，捞钱能力不足，任打手的时间也有限（大半天时间都在监狱里度过），但阿尔·达尔科还是被选中。他拥有老板们所要求的首要条件：有感恩之心；能因被迅速提拔而对他们忠心耿耿；有一贯恭敬从命的经历和没有拥兵自重的背景，而这最后一点实际上是保证他绝不会对老板们构成威胁。几乎自从与卢切斯家族发生联系时起，达尔科就被人称为“小阿尔”。阿穆索和卡索认为他应该有个更时髦的绰号。他个性谦和，戴着眼镜，喜欢穿着斜纹软呢短上衣和白色的衬衫并打上色调柔和的领带。看着他这副扮相，他们挖苦地叫他“教授”。

随着地位的提高，达尔科的经济状况迅速改善。以前，他在曼哈顿西区码头附近的汉堡宫摆了个从事赌注经纪和快餐售卖的摊位，以贴补他从彩票赌博和高利贷中赚取的微薄收入。突然之间，真得感谢阿穆索和卡索的垂青，他的口袋鼓起来了。作为角头，取得前任的高利贷账款是其权利之一，他因此得到一笔16万美元的高利贷本金和每周约1万美元的利息收入。此外，分享其行动队——14名打手和约100名合伙人——榨取的不法收益让他每周另有数千美元进账。这些财富大部分来自于对航空公司、面包店和殡仪馆的敲诈勒索。

早些时候，达尔科已经从布鲁克林搬到了曼哈顿，他那滚滚而来的财富让他能够在小意大利开一家名为“拉唐纳玫瑰”（La Danna Rosa）的饭店。这个成了卢切斯家族新会议厅的饭店就在为纪念约瑟夫·彼得罗西诺警尉而以其名字命名的广场上。20世纪初，那位纽约侦探被西西里黑手党所杀。通过黑手党和政客的影响，达尔科从州里搞到一个数百万纽约人梦寐以求的奖赏：一套廉价的有租金补贴的公寓。让达尔科非常满意的是，这套房子的位置十分理想，就在小意大利，与“拉唐纳玫瑰”相距不远。为逃避执法机关的监视，达尔科避开了临街的黑手党俱乐部，把自己的饭店作为方便而安全的场所和卡索及卢切斯家族其他成员进行会谈。知道《第三章》规定的电话与窃听器窃听所能造成的灾难，“教授”定期对自己的寓所和饭店进行彻底清查，以查找有无窃听设备。为感谢家族老板们的提携，达尔科还派其技术人员勘察卡索的家和胡桃酒吧（布鲁克林一个阿穆索和“煤气管”频频探访的据点），查证是否藏有秘密窃听器。

卢切斯家族新老板维克·阿穆索和“煤气管”卡索对达尔科还另有所用。他们任

命他为自己的私人掮客，负责从各个不法行当中收取例费。在圣诞节的时候，达尔科还会把行动队角头们孝敬的10万美金作为节日礼物转给阿穆索和卡索。

达尔科每年将超过100万美元的全部不法收益交给家族财务总监卡索。考虑到卡索对截留的多疑和他对精确性的狂热苛求，达尔科把为老板们搜刮的每一美分及来源都进行书面记录，并将账目交给他。为了更加保险，达尔科还保存了自己的开支底账。

部分是出于对达尔科那犬马之劳的一种奖赏，两位老板给足面子并主持了他儿子约瑟夫的人会仪式，并将他安排在其父亲的行动队里。在坎拉西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举行过仪式之后，卡索用肘轻推了阿穆索一下，然后庄严地向达尔科宣布，“你的儿子现在属于我们，他不再属于你。”追寻着父亲的足迹，乔·达尔科成了一名毒品贩子，他还开始品尝自己的样品，堕落为瘾君子。

在达尔科成为卡索的被保护人之前，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参与过任何谋杀。但作为阿穆索和卡索最器重的角头，在他们许多恐怖统治的谋杀之中，他都充当了同谋者的角色。这个卢切斯家族“教授”将已遭驱逐的服装中心原监管人迈克尔·帕帕迪奥骗至一家百吉饼店，将他送上不归之路。在这个可怜的受害者被另一名同伙枪杀之前，达尔科用棍棒残暴地殴打过他。他参与过或者知道至少11次处决行动。为追杀安东尼·迪拉皮，他指派儿子加入杀手队，一路跟踪到加利福尼亚将其杀害。达尔科还亲自挑选了杀手捕杀布朗克斯的角头迈克尔·萨勒诺。为便于替卡索执行某次谋杀任务，达尔科搞到一支冲锋枪，并在交给指定杀手之前通过自己家的窗子朝外试射。

1990年5月，阿穆索和卡索的潜逃没有中止家族的内部清洗。许多谋杀都是达尔科在卡索的授意下组织实施的。通过事先安排的打到公用电话亭里的电话，达尔科就能接到卡索（很少是阿穆索）的谋杀指令。即使逃亡在外，卡索还是设法通过达尔科从其执法机关里的间谍那里搞到机密情报。1990年秋天，他告诉达尔科去警告约翰·葛提和萨米·格拉瓦诺，称他们在圣诞前后会受到联邦指控而被捕，这个情报后来被证明是准确的。

卢切斯家族的逃亡老板们偶尔会大胆地露面与“教授”会谈。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地区，达尔科曾经两次和他们见面，一次是在酒店，另一次是在超市的停车场里。经过一番乔装打扮，两人都长出了胡须，戴上了太阳镜和棒球帽。他们显然深信自己不会被人认出来，而达尔科也不会被特工盯梢。会面结束后，阿穆索和卡索就共乘一辆黑色吉普车离开。他们甚至多次更为冒险地溜到纽约与达尔科会谈，地点通常

是在布鲁克林的安全藏身处。达尔科发现，卡索毫不气馁于一个逃亡者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不停地向他倾倒各种要扩大家族活动范围的想法。利用科洛博家族卡迈恩·珀西科和维克·奥瑞纳之间的分裂，在与达尔科的一次密谈中，卡索提出了一个和平方案。卡索称，通过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帮派里，卢切斯家族可以结束科洛博家族无休止的战乱。过去，审慎的达尔科对卡索所有的个人提议都会赞同，而不会考虑其危险性，但现在他鼓足了勇气反对这个合并设想。他争辩说，科洛博家族的人不能被当成可信任的伙伴，而且如果卢切斯家族成了一个更强更大的家族，甘比诺和吉诺维斯家族就会被激怒。就他个人的看法，他估计卡索合并两个帮派的隐秘动机是想让自己成为这个联合家族的老板，进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黑手党教父。

这是达尔科少有的坦率之言。片刻之后，他又恢复了一贯的顺从。卡索对本家族聪明汉的一次暴怒再次警告了他，知道失去了卡索的信任将有什么灾难降临。卡索勾出10名打手的名字，然后发誓说，一旦官司结束，他就邀请他们所有人来参加庆功宴。在他们就餐之前，他接着说，“我要杀掉他们所有人，因为在我逃亡期间他们欺骗了我。”

老板们潜逃7个月之后，达尔科被授予了代理老板的头衔。1991年1月9日，家族领导人会议在坎拉西一名卢切斯家族打手的家里举行。“阿尔，你现在是老板了，”阿穆索说道，同时打开一瓶酒以示庆贺，“你现在管理着家族。”尽管拥有了头衔，但达尔科的实际权力还是非常有限。阿穆索和卡索告诉他说，他们将继续发号施令，做出所有重要决策，并占有家族大份额的收益。此外，阿穆索禁止达尔科授权谋杀或吸收打手，而这本是老板无可争议的特权。为表明自己的恭从地位，在会议结束之前，这位新代理老板将最近为卡索赚取的7.5万美元现金交了出来。

阿穆索和卡索的离去在家族内部引起了关于谁真正有权临机决断和解决与其他家族矛盾的争论。达尔科越来越察觉到，频频通过预先安排的电话系统与他通话的“煤气管”并不信任他。尽管被指定为代理老板，但达尔科感觉卡索给他的都是些“欺诈性的指示”，他收到的情报与指令也被卡索传给了卢切斯家族其他成员。这些欺诈性的指示是用来考验达尔科是否忠实地执行了老板的命令。很明显，他们对他的忠诚度和能力还心存疑虑。

1991年春，卡索下达了一个令达尔科震惊的谋杀指令。这次的谋杀对象是达尔科所熟悉的充当了卡索多年得力助手的角头“胖子皮特”皮特·奇奥多（Peter “Fat Pete” Chiodo）。奇奥多体重181公斤，擅长恐吓倔强的承包商和迟还贷款的高利贷顾客。与阿穆索和卡索一起，奇奥多年前已经受到与“窗户案”有关的RICO指控。奇

奥多的法律麻烦是一项次级指控，罪名是参与卢切斯家族控制纽约一个油漆工工会的腐败活动。作为卡索的一名“死亡天使”，胖子皮特曾组织杀手队谋杀了钢铁工人协会领导人索尼·莫里西。

胖子皮特没有成为逃亡者。面临着两场审判，这个40岁的黑手党人决定承认犯下两份起诉书所列的罪行，以求从轻量刑让他在10年内获释。否则，这双重的敲诈勒索罪判刑可能意味着他得在狱中了却余生。在达成认罪协议之前，奇奥多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那就是事先未取得阿穆索和卡索的同意。他的两个老板与他的决定得失攸关，因为他们也是这两起案件的被告。卡索对奇奥多未经磋商即行认罪的举动大为震怒，同时还怀疑他为获得轻判而与检方合作，因此便给达尔科打去电话。“杀掉胖子皮特。”这是他下达的简短指令。

为卡索卖过力杀过人的奇奥多意识到，他的认罪可能会激怒“煤气管”。在判决期到来之前，他从未远离过其斯塔藤岛的家，冒险出门时总会有大批亲人陪护。为了查出奇奥多，达尔科挑选了其行动队里一个知道胖子皮特的习性和常去之所的成员，并利用黑手党的技术人员窃听其住宅电话，目的是寻找线索确定杀手们可以在何处伏击他。黑手党人通过窃听得知，奇奥多准备离开当地前往一个未知的藏身处，直到判决日到来时才会赶回来。在1991年5月8日早晨出发之前，他打算开着他的凯迪拉克到斯塔藤岛一个汽车维修站进行发动机检修。三名枪手，包括阿尔·达尔科的儿子乔，候在两辆汽车里准备实施伏击。打开发动机盖时，奇奥多发现刺客正朝他逼近。他拔出手枪抢先开火，同时赶忙撤退，身边的子弹啸叫着飞窜。杀手们无人受伤，奇奥多却弹孔累累地倒在地上，全身中了12枪。枪手确信他已经死亡，便和他们的司机一起迅速逃走。

然而杀手们错了。尽管腹部受重伤且右手被打成残废，但持续了8个小时的急救挽救了奇奥多的生命。外科医生相信是他的肥胖救了他的命，他的肥肉阻挡了子弹致命性地穿过任何一个重要器官或动脉。

达尔科的杀手队仍试图完成卡索下达的任务，他们想在医院里寻找第二次机会干掉他。在一个与家族的一名打手关系密切的护士陪同下，卢切斯家族一个歹徒冒充医生试图潜入奇奥多的病房。但FBI特工和警察组成了一道警戒网保护着这个受伤的黑手党人，未经批准，任何人都无法接近他。

在这次夺命袭击之前，胖子皮特·奇奥多拒绝了检察官提出的指证其上级和其他黑手党人以换取更轻量刑的建议。“我理解你们的工作，但并不感谢——再见并祝好运。”奇奥多对处理“窗户案”的联邦检察官查尔斯·罗斯（Charles Rose）和格雷戈

里·奥康耐尔这样说道。但 12 处弹伤最终让他相信，要想活命就得抛弃“乌默它”誓言成为告密者。在床边的讯问中，他向两名检察官详细地揭发了他的前老板阿穆索和卡索及家族其他成员犯下的无数命案与其他罪行。

意识到奇奥多可能给他们造成的危害，阿穆索和卡索就试图用另一种办法来阻止他告密。卡索指示达尔科传信给奇奥多的父母，称如果他们的儿子出庭作证或与检方合作，他们将性命不保。这种威胁违犯了黑手党所确立的党徒违反规约但其无辜亲人免受报复的荣誉规则。但达尔科再次遵照指令，让打手务必将口信传达过去。奇奥多对这种威胁非常重视，他的妻儿及其他近亲属很快转入到证人保护项目之中。对胖子皮特那些拒绝进入保护项目的亲属，卢切斯家族的两个老板的确实实施了报复。他叔叔弗兰克·西格尔纳瑞诺（Frank Signorino）的尸体被发现塞进了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而他的妹妹帕特丽夏·坎波扎诺（Patricia Capozzalo）被蒙面杀手用消音手枪击中背部和颈部受了重伤。

袭杀奇奥多的拙劣行动进一步削弱了达尔科作为代理老板的声誉。1991 年 7 月，在卢切斯家族打手理查德·帕果理亚若诺的女友那斯塔藤岛的家里，他参加了有两位老板与会的紧急会议。阿穆索和卡索刮光了胡须露面，并没有打算伪装自己。他们宣



卡索曾经的亲信“胖子皮特”皮特·奇奥多（右）。在一次清洗黑手党不忠嫌疑者的运动当中，卡索把他列入被处决者名单。尽管身中 12 枪，但奇奥多还是活了下来。医生认定其肥胖的身体救了他的命。（FBI 的监视照片）

布免去达尔科的代理老板职务，同时挑选四名角头组成临时领导小组，负责在他们潜逃期间处理家族事务。尽管达尔科是这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但这次降职让他颜面尽失，表明领导层对他执行重要任务的表现极为不满。阿穆索不愿直接同他讲话或正眼看他，这让他尤感不安。

在管理层重组数天之后，这个家族因有名无实的老板维克·阿穆索被逮捕而陷入恐慌之中。在斯克兰顿附近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当独身外出的阿穆索用公用电话打电话时，FBI特工突然将他扑倒擒获了。此前他最后的藏身处一直没有被找到。FBI的确查清，在其逃亡的14个月里，阿穆索曾用“里奇”之名登记住宿，在斯克兰顿北部的克拉克萨米特城假日酒店“尼古拉斯村旅馆”里藏匿了两个月。他有一些朋友住在那个镇子里。从他被捕的情形来看，FBI人员并非通过调查手段取得相关情报，而是有人告密。有个匿名的电话呼叫者“投下一角硬币”向FBI报告了阿穆索的行踪，透露了他将在购物中心出现的大致时间。在卢切斯家族内部，有个与阿穆索关系密切的人知道这种预先安排的电话联络方式并且出卖了他。

随着阿穆索被羁押并面临着RICO审判，卡索笼罩在这个家族头上的阴影更加阴森可怖。完全控制着这个犯罪家族的他继续与达尔科联系，从他那里获取关于家族事务的最新消息并做出指示。但在这些秘密的电话交谈中，达尔科感到了一种与日俱增的冷淡与疏远。让“教授”备受折磨的是，卡索企图恐吓奇奥多的家人，而谋杀指令下达前不久与胖子皮特的一席谈话也让他难以忘怀。“这些家伙（阿穆索和卡索）好称别人是叛徒，给人扣上叛徒的帽子，然后再杀掉他们，”奇奥多警告说，“我得到消息，你和我都会被杀掉或者受到伤害。”

达尔科曾参与过受害者达十几人的多起谋杀案和谋杀未遂案，这些人无一例外都被卡索称为卧底。这不由地让他为自己的命运担忧起来。他知道，仅仅是未经证实的不忠谣言就足以激怒卡索，令他杀掉甚至最为忠实的奴仆。

阿穆索和卡索选任的监管家族日常事务的四人小组每周开会一次。1991年9月19日，星期四，达尔科照例参加了在曼哈顿中城区“金伯利”酒店举行的会议。在下午的会议中间，一个名叫迈克·迪桑提斯（Mike DeSantis）的打手出现在会场，尽管他不是小组成员。迪桑提斯是另一名小组成员弗兰克·拉斯托瑞诺（Frank Lastorino）的手下，是卡索频频招来委以重任的精明能干的杀手。达尔科发现一把手枪就插在迪桑提斯后腰的衬衫里，并注意到他穿上了防弹背心，这个杀手看起来好像正准备进行一场枪战。

“完了。我要被干掉了。”达尔科心里想。他立刻跳了起来，避过拉斯托瑞诺和其他小组成员的阻拦，急忙跑出了房间。

次日上午，他的毒品罪保释官在家里给达尔科打来电话，告诉他 FBI 获悉黑手党已经发出了对他的死亡追杀令。现在相信卡索会想尽办法躲藏起来，达尔科决定破釜沉舟。他带着妻子德洛丽丝和黑手党儿子乔及其他近亲属逃离了这座城市。他决定叛逃，但极度惶恐的他担心卡索会联系“水晶球”或另一名间谍对他下手，因而不敢到曼哈顿中城区的 FBI 总部自首。星期六的晚上，小心翼翼的“教授”突然出现在郊区新罗谢尔（New Rochelle）的 FBI 办事处，准备供认自己的严重罪行，并披露他替“煤气管”卡索和维克·阿穆索犯下的所有骇人听闻的谋杀。

联邦检察官罗斯和奥康耐尔应邀参加讯问，他们在纽约州北部的一个酒店里见到了这个惊魂未定的背叛者。FBI 已经设立了一道警戒线保护他。“尽管与特工一起待在房子里，但他对‘煤气管’仍极度疑惧。我们进门的时候，他正躲藏在浴室里，”奥康耐尔回忆道，“他告诉我们，‘你们得知道这个家族是多么危险。他有情报来源，有特工，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回忆过去，竭力解释背弃黑手党的缘由时，达尔科声称对阿穆索和卡索压榨他的方式深表痛恨。“每当有任务要完成，每当有别人不愿干的事要做，我就是那个被他们挑出来的傻瓜。”他告诉检察官和特工们说。他承认，他的突然出逃要付出高代价，他得放弃其黑手党的财富，包括街头上的 150 万美元高利贷款。他知道，他所有的不法财产都会被卡索和其他角头没收，好在他手里还有以前作为急用钱存下来的 5.5 万美元。

在胖子皮特·奇奥多遭袭击和阿尔·达尔科自首之前，联邦与州执法机关对阿穆索和卡索的疯狂屠杀和卢切斯家族的新政权基本上一无所知。令人意想不到的，两个高级角头向他们详细披露了该家族最为残暴的罪行和保守最严密的秘密。FBI 特工整理过数百页名为《302 报告》的讯问材料，它为达尔科和奇奥多直接披露的许多包括以前不为政府所知谋杀和敲诈勒索案提供了文件证明。这些背叛者回顾了与阿穆索、卡索及其他黑手党人交谈与会面的情况，让政府对诸多由阿穆索和卡索指使犯下的谋杀案、谋杀未遂案、杀手的姓名和受害者尸体的处理办法都有了清晰而详实的了解。阿穆索与卡索的活动方式、卢切斯家族重新改组的指挥机构、与逃亡老板们联系的电话联络系统和新角头与打手的底细都被当成礼物泄露给了政府。“教授”达尔科还交出了藏匿在家里的账簿，让特工们得以了解该家族整体的财富规模。达尔科和奇奥多揭开了卢切斯家族形形色色的非法勾当，曝光了它如何通过控制约 20 个工会分

会向几十家建筑、航空与垃圾清运公司勒索保护费和操纵投标费。

让人更开眼界的是，两名变节角头吐露了另一个阴谋，即这个犯罪家族如何通过胁迫和敲诈布朗克斯区杭斯点（Hunts Point）大型蔬果批发市场和布鲁克林另一家较小市场的主要批发商来抬高这个城市每串香蕉或每根莴苣的价格。卢切斯家族在这些农产品市场拥有隐性利益是不争的事实，但 FBI 在粉碎黑手党的控制方面少有进展。达尔科指认了通常以罢工和破坏为要挟向市场批发商勒索报酬的布朗克斯行动队成员及其工会合作者，而这改变了 FBI 的调查前景。自然，这些敲诈费用几十年来都通过提高新鲜蔬果零售价的办法转嫁在公众头上。

卢切斯家族暴力与白领犯罪的详细情报是个证据的宝库。“教授”与胖子皮特合力推开了检控卢切斯家族五十多名黑手党人和合伙者的大门。

第 43 章 图麦克的蜕变

在监狱里考虑良久之后，阿塞图拉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条出路。尽管会很痛苦，但他还是准备抛弃自己终身为之奉献的庇护了他 35 年的黑手党。

正当特工和检察官们筛查甄别阿尔·达尔科和彼特·奇奥多的证据时，卢切斯家族第三个且更为重要的角头正试图逃离“煤气管”卡索的恐怖威胁。

他就是安东尼·阿塞图拉。这个来自纽瓦克的家伙因其野人般的残暴博得了“图麦克”的绰号。他形容“鸭子”科拉罗准其加入“科萨·诺斯特拉”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阿塞图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黑手党人，一个笃信黑手党的荣誉规则神圣不可侵犯的狂热信徒，代表着黑手党的完美理想。忠诚而绝对可靠的他为“荣誉社团”奉献了 30 年，而他得到的回报也已超出了其最狂热的梦想。图麦克在纽瓦克从一名低级的高利贷暴徒和数彩赌博收款员成长为一个老练的角头，并最终成为卢切斯家族整个新泽西支派的指挥官。科拉罗是个宽容的教父，让他在花园之州（新泽西州的别称）和佛罗里达放开手脚活动了二十多年，使他成为卢切斯家族最为成功的党徒。“那简直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被问到与“鸭子”的关系时，阿塞图拉回答打手们说。在科拉罗的长时间任期内，阿塞图拉变得越来越富有，每年从其行动队的传统行当——赌博、高利贷、毒品与勒索保护费——及其控制的合法生意中捞取约 50 万美元的净收入。

阿塞图拉的部分黑钱通过投资房地产、保险、沥青、设备租赁和垃圾清运公司漂白。80 年代，阿塞图拉向美国国税局（IRS）申报年收入约为 10 万美元。其犯罪收入实际上是它的 5 倍，但各种投资为他在新泽西和佛罗里达的奢华生活提供了合理的

幌子。

为了在新泽西以外拓展犯罪事业，阿塞图拉于 70 年代在南佛罗里达建立了一个前哨据点，并在迈阿密北部的娱乐城好莱坞购置了住房。没有哪个家族能在佛罗里达州享有独占地盘的权力，而迈阿密地区对黑手党创业者也总是门户洞开。当阿塞图拉开始在佛罗里达活动时，这个州正经历着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迅猛增长。他便利用机会从事毒品买卖、非法赌博和敲诈各种公司。阿塞图拉让副手们看护着其新泽西的产业，自己则经常逗留在佛罗里达以便避开其原籍州调查委员会发出的传票。新泽西警察部门的情报档案显示，图麦克经常化名“安东尼·安德森”乘机飞抵或离开佛罗里达州。

一份 1975 年 4 月 10 日入档的文件错误地载明他比南佛罗里达其他任何有组织犯罪者都要强大。尽管阿塞图拉当时在黑手党里的地位正在迅速上升，但他在迈阿密地区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黑手党管理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佛罗里达州唯一的“科萨·诺斯特拉”教父是桑托·狄拉菲肯特，这个毫无争议的老板生活在墨西哥湾的坦帕，据估计其势力遍及整个州。阿塞图拉从来没有侵占狄拉菲肯特的地盘或向他发起挑战。他圆滑地向这位佛罗里达教父表达了最大可能的尊重，经常会就该州不法生意的创新问题向他请教，并在狄拉菲肯特离开其迈阿密的第二个家外出办事时亲自为他开车。

阿塞图拉对“鸭子”科拉罗评价甚高，其原因之一是这位纽约老板对贡金的要求不高。“鸭子”1970 年初掌家族大权时，新泽西支派每年要向纽约领导层上贡几十万美元。到了 80 年代，这种年金大幅降低，阿塞图拉缴纳区区 1 万~5 万美金也未受过纽约的责罚。如帝王般富足且聚财多年的科拉罗不再过于贪婪，因而降低了对新泽西行动队的朝贡要求。80 年代末，“鸭子”在管理委员会案中被告罪和维克·阿穆索与安东尼·卡索的迅速爬升结束了阿塞图拉的美好时代。

现在，在一场与黑手党新首领发生的冲突中，他第一次成了被打击的对象。新领导集团认为新泽西每年上交 5 万美元是一种卑鄙的侮辱，要求阿塞图拉交出其行动队 50% 的所得。与此同时，政府扩大监视范围也给图麦克带来更多的麻烦。1987 年初，与前老板科拉罗一样，阿塞图拉受到 RICO 指控，而一旦被定罪就有可能被终身监禁。在躲避重罪审判 30 年之后，他作为卢切斯家族新泽西行动队这个犯罪组织的头目受到传讯。这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进行的审判深入调查了其行动队在该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活动，包括毒品走私、信用卡诈骗、赌博和放高利贷。联邦检察官们主要倚重低级线人和窃听录音提供的证据，但谨慎的阿塞图拉在录音带上从来没有露出马脚。在

这场有史以来最长的持续 21 个月的 RICO 审判中，他和 19 名打手与合伙人成了被告。尽管案件审理过程如此漫长，但陪审团在 1988 年 8 月只需 14 个小时就做出了裁决：所有 20 名被告都被宣判无罪。

这是第一例以大批被告被判无罪和黑手党取得完胜而告终的 RICO 要案。苦涩的失败刺痛了司法部，促使它今后力避进行复杂而漫长的同时检控十几个甚至更多黑手党被告的“大审判”。然而，参与阿塞图拉案件的联邦检察官们是败在黑手党的惯用伎俩——贿赂陪审团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阿塞图拉的行动队当中，有名未受指控的成员恰好有个侄子是该案的陪审员。为了 10 万美元的贿赂金，他的侄子保证至少要让陪审团的裁定悬而不决。结果，那人在陪审团房间里的游说非常成功，让阿塞图拉和他的所有犯罪同伙都获得无罪宣判。

躲过 RICO 的打击后，图麦克·阿塞图拉现在面临着由维克·阿穆索和“煤气管”卡索施予的黑手党审判。阿塞图拉拒绝将行动队未来收益的一半交出来，也不愿到纽约拜见这些新首领。他知道，这般抗命不从违犯了黑手党的基本规约，但他还是固执对副手们说，“我不会跪地磕头，不会屈服。”他的黑手党经验告诉他，卡索和阿穆索的贪欲无法得到满足，他们正在破坏“鸭子”科拉罗与他一起确立的经济传统与约定。

小维克和“煤气管”早有应对之策对付图麦克的顽抗。他们诬称他是告密者，剥夺了他的角头头衔，并发出了处死他及其儿子小安东尼（新泽西行动队的成员之一）的谋杀指令。卡索为处死阿塞图拉还举出了别的理由，因为据信他曾违反“科萨·诺斯特拉”规定，让妻子杰拉尔丁向其行动队成员传送指令。卡索强调称，女人不得参与黑手党的活动是一条不可违反的禁令。

1988 年秋天，在纽华克的无罪宣判后不久，整个新泽西行动队都接到阿穆索和卡索的传唤，要他们去听取该组织重新调整的正式命令。约有 10 名成员（占该行动队荣誉者人数的一半）出现在坎拉西一栋住宅楼外面，会议将在那栋楼的一间地下室里举行。但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在这些新泽西黑手党人彼此坦承害怕在屋子里遭集体屠杀之后，他们四散奔入各自的汽车逃走了。稍后，新泽西支派全体抵制 1988 年阿穆索和卡索在布鲁克林主办的圣诞宴会，并在 1989 年初拒绝到曼哈顿参加另一次例会。卡索勃然大怒。“岂有此理！把他们全部干掉！”他命令达尔科道。

大约一年之后，阿塞图拉的大部分手下慑于恐怖统治而放弃了抵抗。他们抛弃了他，投靠在阿穆索和卡索的身边。阿尔·达尔科和胖子皮特·奇奥多受卡索之命准备处死新泽西行动队不忠的残余分子：阿塞图拉、他的儿子和 7 名忠于旧主的死士。在

“拉唐纳”饭店里举行的一次对策会议上，达尔科向新泽西行动队的成员们发出了严厉警告。“阿塞图拉是个抗命反叛之徒，你们必须尽全力除掉他与他的儿子及一切效忠于他的人。”为了追踪“这些反叛者”，阿塞图拉从前的两名打手将阿塞图拉、他的妻子、儿子小安东尼及其叛乱集团其他几名打手与合伙人的照片交给了达尔科。这些照片大多数都是在阿塞图拉举行宴会时拍摄的，拍照地点就在他新泽西的家里。阿塞图拉的照片被标记为“图”，表示“图麦克”，而其儿子则被标记为“小图”。从1988年底至1990年期间，达尔科将这些照片交给14名打手和崇拜者传看，试图在新泽西和佛罗里达找到这对父子。

卡索反复强调了追杀的急迫性，并打开领导集团的金库，提出大笔钱款用于剿灭阿塞图拉父子及其残余势力。忠于图麦克的汤米·理奇阿迪被发现躲在新泽西南部托木斯河附近一个农家里。巧合的是，理奇阿迪的藏身处就靠近卢切斯家族一名布鲁克林打手的朋友的农场。杀手们被派到这个农场准备猎杀理奇阿迪，但他很少离开其藏身之所。有个杀手提议在他们潜伏的这个农场散养一些马匹，希望受引诱的理奇阿迪能靠近看看这些动物。花了约7万美元买来了马匹，但它们未能把多疑的理奇阿迪诱出他的庇护所，没人能清楚地看到他一眼。

胖子皮特·奇奥多带领杀手队赶到佛罗里达追杀阿塞图拉和他的儿子，但小托尼·阿塞图拉转败为胜挫败了追杀者。小阿塞图拉成了猎人，他追踪奇奥多的汽车，然后向警察报警，称有个纽约黑手党人就在当地。当得知警察拦下奇奥多讯问他在佛罗里达的活动时，卡索当着达尔科的面“怒不可遏地大发雷霆”。

奇奥多打算绑架阿塞图拉的打手约瑟夫·拉马特（Joseph LaMorte），想要严刑逼其吐露图麦克的下落以挽回脸面。当他们发现拉马特非常警觉而难以在街上得手后，奇奥多及其杀手队便决定杀死他。在目标那佛罗里达的家外面，瞅准他坐在汽车里的时机，他们朝其颈部和肩膀连开了两枪。胖子皮特自信地向卡索报告，称他们已经结果了拉马特的性命。但尽管身受重伤，拉马特还是活了下来。“彼特一发子弹花了我2万美元。”卡索向达尔科发起牢骚，称他为了奇奥多的杀手队在佛罗里达的行动拨出了4万美元的经费。

佛罗里达之行从一开始就是一次方向性错误的远征。就在1988年至1989年奇奥多在南佛罗里达掘地三尺地展开搜查时，阿塞图拉正蹲在新泽西的监狱里。在受到RICO敲诈勒索罪指控被判无罪后，因拒绝在一个州有组织犯罪调查小组面前作证，图麦克以藐视法庭指令罪被监禁一年。令人费解的是，卢切斯家族杀手队在前往佛罗里达之前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

除了拉马特之外，新泽西其他异议者都逃过了卡索的行刑队。图麦克在黑手党里的长期生活教会了他如何辨认刺客，但他再也不能躲过日益增大的执法压力。继1988年的RICO无罪宣判之后，新泽西州调查人员开始关注阿塞图拉的去向，经过4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后终于有了收获。利用卢切斯家族新泽西派系的内部分歧与动乱，该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找到了证据，证明其行动队在新泽西敲诈一名视频扑克赌博机生产商和在新泽西滨海城填勒索步行街的娱乐厅。在1993年的一次审判当中，阿塞图拉虽然击败了谋杀与阴谋罪的指控，却被宣判犯有敲诈勒索罪。起诉书指控他是一个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头目并瓜分过不法收益。他的长期追随者汤米·理奇阿迪被查明犯有谋杀罪，其受害者是一个拒绝向卢切斯家族缴纳足够贡金的合伙人，理奇阿迪用高尔夫球杆将他殴打致死。这些罪行大多数都发生在阿塞图拉的极盛时期，当时阿穆索和卡索尚未接管其行动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被定罪的那起敲诈勒索罪审判当中，图麦克从前的两名帮助新政权追杀他的打手作为共同被告被宣判有罪。

肥头大耳的图麦克·阿塞图拉身体状况颇为糟糕，体重超过113公斤且患有高血压，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健壮且精力充沛了。53岁的时候，他被判处了30年监禁且不得保释，他离开监狱的唯一办法是躺在棺材里被人送出来。反省自己走向毁灭的根源时，他归咎于阿穆索和卡索引发的内乱，认为是内部冲突才让调查人员搞到了有价值的线索并从背叛者那里获取了证词。阿尔·达尔科因害怕“煤气管”而向政府投诚，转变成了指证阿塞图拉的一名关键证人。在监狱里考虑良久之后，阿塞图拉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条出路。尽管会很痛苦，但他还是准备抛弃自己终身为之奉献的庇护了他35年的黑手党。他现在愿意指证荣誉者，愿意揭露曾发誓隐瞒的“科萨·诺斯特拉”秘密。

促其转变的重要原因是，他发现自己原来的副手们遵照卡索之命将他与妻子的照片交给了杀手队。“我和儿子都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无论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他在一次采访中愤怒地强调说，“他们来杀我，我认了。但我的妻子呢？她对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总是在我们的家里给他们做饭。在我看来，这就是恩断义绝。”

在决定背叛之前，阿塞图拉向他的强硬对手，一位名叫罗伯特·布奇诺（Robert Buccino）的官员，伸出了求助之手。在州里对他展开调查并判刑的过程中，布奇诺充当了急先锋。他们在故乡奥林奇市时曾是一对儿时好友，而布奇诺认为自己那时是个比图麦克更为狂野的少年。就在阿塞图拉舒适地躺进黑手党的怀抱时，博比布奇诺走上了与之相反的道路。

体格健壮，身高1.83米，常常面带微笑的博比·布奇诺进入了新泽西州警察局。

做过7年的骑警之后，他被调到有组织犯罪部门，开始监视他非常熟悉的人物安东尼·图麦克·阿塞图拉。70年代初，他们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交锋。在布奇诺位于新泽西州利文斯通的家里，阿塞图拉责问他为何要跟踪调查自己，最后气冲冲地摔门离去。布奇诺想打乱这个黑手党人的阵脚，称监视意味着准备传唤他到一个州调查委员会面前作证。“这是一句诈言，”布奇诺承认道，“但他相信了我，因为当时他身边有些暴徒正接到传票，那也许是他慌忙逃往佛罗里达的原因。”

几十年后，作为总检察长领导班子成员和黑手党专家，布奇诺主持了让阿塞图拉以敲诈勒索罪领刑的调查工作。由于急切地想获得从轻量刑，阿塞图拉便与儿时密友坐在一起，详细披露了黑手党的大量罪行。阿塞图拉让州、联邦，甚至意大利有组织犯罪机关获得了大量的与卢切斯及其他犯罪家族有关的非窃听证据和历史情报。阿塞图拉讲述了他作为一名黑手党官员的生活经历，让调查人员对卢切斯犯罪家族渗透与敲诈新泽西合法产业，以及与市府官员进行腐败勾结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了解。

作为他的礼物之一，阿塞图拉解释了政府遭受重大失败的主要原因。他吐露了1988年在联邦敲诈勒索审判过程中贿赂陪审团，最终让他本人及其行动队获得无罪判决的内幕。他加入黑手党近40年，为此间的诸多暴力犯罪提供了大量证据。他的情报导致40件武器被缴获，包括一挺机关枪，还让黑手党一个年毛收入达4000万美元的赌博集团被摧毁。阿塞图拉让13起命案真相大白，他承认知道这些谋杀阴谋，但坚称自己从未亲自动手杀人。阿塞图拉一直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自称在家族里所充当的角色和任何生意人没有两样。他声称，他的目的就是美国人的基本目标：让自己和朋友们富足起来，同时将暴力控制在最低程度。

罗伯特·布奇诺和其他讯问者并不认同图麦克那自私自利的辩解。不过，布奇诺仍让他发泄而未加争辩。告密者在警方的工作中是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阿塞图拉正在带来新的拘捕与检控。通过背弃黑手党的举动，他说服了心腹知己汤米·理奇阿迪和卢切斯家族另外两名打手也步其后尘成了合作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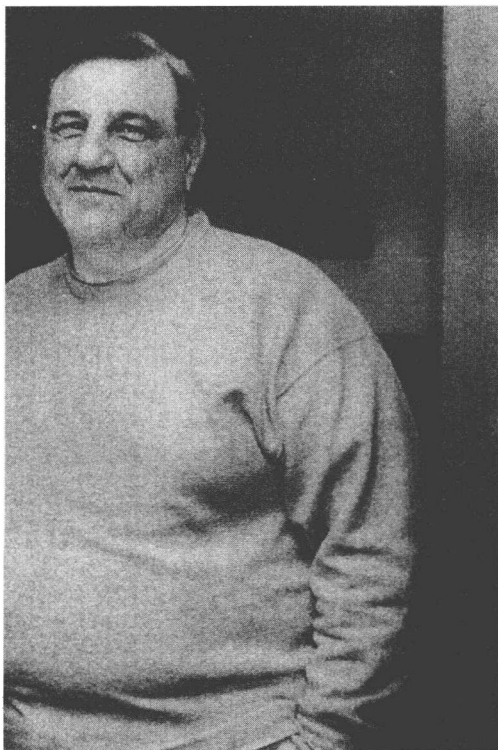
阿塞图拉及其追随者提供了大量的详细情报，促使卢切斯家族12名其他黑手党人对包括9起谋杀在内的一揽子联邦和州指控认罪。到了讯问阿塞图拉的工作结束时，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宣布卢切斯家族新泽西支派已被严重削弱。

阿塞图拉出乎意料地献出了与新泽西黑手党的初创有关的历史资料，那是他通过与黑手党前辈谈话了解到的此前不为黑手党学者所知的情报。在1931年美国黑手党组织创立时，洛克·卢西亚诺同意成立唯一一个独立的新泽西犯罪家族，即伊丽莎白市的迪凯瓦肯特家族。纽瓦克地区势力较强的行动队头目被给予了一次机会，可以选

择加入纽约五个新成立的任何一个家族。相信他们在卢西亚诺那个纽约最大的家族（后来被称为吉诺维斯家族）里爬升的机会并不大，于是纽华克的大多数角头就和其他四大家族站在了一起。他们 1931 年的决定确立了纽约五大家族在新泽西的强势而持久的存在。

在受邀前来讯问案情的意大利有组织犯罪特工面前，阿塞图拉揭开了美国与西西里黑手党之间真实关系的谜团。他吐露称，在美国和西西里家族里拥有双重身份是绝对禁止的，黑手党人只能效忠于一个国家的组织。每个纽约家族与西西里黑手党都有联系，主要是为了方便毒品交易。尽管美国黑手党人厌恶齐普们（西西里荣誉者）以恩人自居的态度，但觉得与自己的美国同伙相比，他们更有献身精神并更为残忍。阿塞图拉承认西西里人有权感觉高人一等。在西西里老板的严厉控制之下，他认为，他们比美国黑手党人具有更强的纪律性，组织更严密，行动更为诡秘。年轻的美国黑手党人愿意贬损地称西西里人是“外国佬”、“老油条”，或是美国老派黑手党人过去常常操着口音浓重的英语道出的——“老古董”。

“鸭子”科拉罗与西西里人关系密切，阿塞图拉因此经常与被派到美国活动的意大利黑手党人进行合作。图麦克为他们物色合适的旅馆，帮他们跟踪目标。谈及两名



“图麦克”安东尼·阿塞图拉具有典型的黑手党成名史，后来成了监督卢切斯家族在纽约和佛罗里达州地下产业的千万富翁。阿塞图拉 1994 年投奔政府，声称卡索和阿穆索因经济纠纷企图杀掉他及其家人。（征得威廉·萨罗同意后转载的照片）

来到新泽西“干活儿”的齐普时，他特别提到了西西里人那残酷无情的规约。得知被追杀的受害人就要死于癌症时，这些齐普们并没有放下屠刀。在西西里黑手党的审判体制之下，他们的谋杀对象不允许未因错受罚而自然死亡。即使处于弥留之际，那名受害者仍被处死以儆效尤，阿塞图拉吐露说。

第 44 章 455 年监禁

“我帮助他们，可我得到的是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的结果，”“这真是开他妈的玩笑。”

1993 年 1 月，卢切斯家族那位有名无实的老板维克·阿穆索在 RICO 审判中被定罪并处终身监禁，而三名重要的角头——阿尔·达尔科、彼特·奇奥多和图麦克·阿塞图拉——正在供述他们所知道的与家族活动有关的所有内情。背叛者让 FBI 特工和检察官对“煤气管”安东尼·卡索的恐怖力量和他在家族内外的暴力屠杀大开了眼界。前角头们的情报促使卢切斯小组的检察官们把逮捕卡索作为最迫切的任务。“这是街头上最为危险、狡猾和残忍的黑手党头目，”布鲁克林区美国检察官安德鲁·马洛尼宣称，“他是我们的头号通缉要犯。”

负责卢切斯案的两名联邦检察官决意拿下卡索，他们因此推迟了辞去公职并从事私法业务的计划。助理美国检察官查尔斯·罗斯和格雷戈里·奥康耐尔下定决心要把他送上被告席。“在我们看来，他是我们所知的最危险的有组织犯罪人物，”奥康耐尔告诉记者，“此人应该对无数谋杀罪负责，他会公众造成最大危害。”

检察官们发现，“煤气管”的名气甚至让公然挑衅恐怖大亨约翰·葛提的公牛萨米·格拉瓦诺也不寒而栗。格拉瓦诺在家族间的建筑业敲诈生意中结识了卡索。倘若卡索被带上法庭，他请求能够免除其出庭作证的义务。萨米害怕卡索就像对付彼特·奇奥多的亲属那样报复他的亲人。

在调查卡索逃亡期间可能取用的秘密财产时，FBI 和检察官们发现了 6 个不同开户者账户里的 684458 美元存款。在布鲁克林一家银行，卡索那用上了娘家姓的妻子莉莲·德尔杜卡租用保险箱藏匿了 20 万美元，这笔钱最后也被找到了。

卡索脱离 FBI 的视线达 22 个月。焦躁的 FBI 纽约分局局长吉米·福克斯加大搜

查力度决心找出他。他警告说，“他心理变态，他的名字应该叫作‘疯狗’。”为查找线索，FBI特工和纽约侦探对卡索的几名亲信进行了跟踪并窃听了他们的电话。根据阿尔·达尔科提供的情况，FBI打算通过调查他过去与亲信进行巧妙联络的电话亭通信系统来找出卡索的藏身处。在监视卡索的老巢时，布鲁克林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人员窃听到打给卢切斯家族新顾问弗兰克·纳斯塔瑞诺（Frank Lastorino）的可疑电话。电话被查出是从新泽西那宁静祥和的橄榄山镇一栋错层式住宅里打出的，那里离卡索吵闹的布鲁克林巢穴有55英里。核查过房产档案之后，那栋房子受到了严密监视。那处房产坐落在一个森林茂密、人烟稀少的地方，房主是卡索的一个女友。1993年1月19日上午，在女人离开之后，FBI特警队用破墙槌撞开了前门，“煤气管”出现在眼前。他刚从浴室出来，头发湿漉漉的，身上裹着一块遮盖的浴巾。为改变容貌，他蓄起了胡须，留长了从前的平头短发，并且戴上了眼镜。这种伪装再无用处，追捕行动就此结束。

卡索被独自关在这豪华装修的房子里。搜查人员发现了一支步枪、塞在公文包里的34万美元现金和FBI特工《302报告》的大量影印件。很有可能，这些与卡索及卢切斯家族其他成员有关的机密文件是被告律师在暗中交给了卡索的打手。为了准备在听证会和审判上为卢切斯家族犯罪成员辩护，被告律师们收到了这些作为发现材料的文件。

在卡索仍在潜逃期间，一份指控他的牵涉面更广且更新了证据的RICO起诉书已被呈交，其大部分证据由叛逃角头奇奥多、达尔科和阿塞图拉提供。除了原来因操纵市住宅开发项目投标合同而受到敲诈勒索罪指控（即“窗户案”）外，他现在还面临着其他大量的重罪指控：至少25宗谋杀与谋杀未遂罪，外加无数敲诈勒索罪和劳工诈骗罪。

在法官宣布他对社会构成危险并下令将其羁押且不得保释后，卡索便开动他富于想象力的大脑，盘算着如何拖延或阻止审判。为逃出这戒备森严的离市政厅和FBI纽约分局总部都不远的下曼哈顿大都会惩教中心，他构思了两种行动方案。在卢切斯家族成员在外接应的情况下，卡索将贿赂一名守卫帮他逃跑。（不同的报道对其贿赂金额持有不同的估计，有的是8万，有的是20万美元。不管其确切数字是多少，这对当时年薪只有3万美元且意志不坚的看守们来说是个很大的诱惑。）第一种方案要求卡索大摇大摆地走出大都会惩教中心，而不是采取暴力手段进行危险的突围。得到如果计划成功将支付另外40万美元的承诺后，有个看守给卡索拿来了衣服准备替换他的囚服，还帮他配制了打开其囚室门与监区门的钥匙。

脱逃行动按计划于早晨6点30分进行，卡索将便服穿在了囚服里面。单独待在监区的那名受贿看守打开了电控门，让卡索乘无人看守的电梯来到一楼。卡索尽可能镇静地朝一个通向街边小巷的出口走去。就在他离自由只有几步之遥时，一名警卫拦住了他。他编造的理由是，他接到传唤，将到主楼休息厅与律师见面。这名起疑的警卫不大相信监狱会将律师见面会安排在黎明时分。将卡索押回监区后，那个警觉的警卫居然相信了受贿看守可疑的谎言。看守称，他接到行管办公室的电话，允许卡索自己前往一楼与律师见面。

遭遇失败之后，卡索便制定了一个更为轻率的脱逃计划。为了前往布鲁克林老城的一个法院参加审前听证会，他通常会坐在厢式车里由两名美国法警押送过去。他为自己的打手们设计了一个狂野的计划，准备在他从法庭返回曼哈顿的路上伏击法警。杀手们将用一辆碰撞车在布鲁克林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堵住那辆厢式车，然而朝法警开火，迫使他们举手走出来。

与此同时，通过与科洛博家族的一名狱友密谋，一个杀掉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尤金·尼克逊（Eugene Nickerson）的备选方案被策划出来。这名法官接受指派，将主持对卡索及其科洛博狱友的单独立判。“煤气管”希望这个法官的被杀将导致审判无效或者至少能拖延审判进程，让他有更多时间实施脱逃计划。他的狱外盟友得到指示：尾随这位回家的法官登上开往长岛的列车，然后找个最合适的时机杀掉他，要么在列车上，要么在他下车之后。

因昔日密友维托利奥·维克·阿穆索的一道命令，卡索的所有计划都在1993年底被突然取消了。阿穆索当时仍是卢切斯家族名义上的老板，1991年被捕之后，阿穆索被查明犯有54宗RICO与谋杀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据调查人员和检察官们称，阿穆索最终断定，是卡索出卖了他，“煤气管”就是那个匿名的将FBI引向他的被捕之地——斯克兰顿那个购物中心的告密者。出卖他的原因？阿穆索相信卡索想夺取老板头衔并取得家族的绝对控制权。在牢房里，复仇心切的阿穆索发出指示称，“煤气管”已被剥夺了二老板头衔与权利，成为受卢切斯家族所有黑手党人所唾弃的贱民。

失去了家族的支持，面临着阿尔·达尔科和皮特·奇奥多的压倒性证词和如山的铁证，卡索打出了最后一张牌。1994年2月，就在他的RICO审判开始的两周前，他的家人向参与卡索案的FBI主管特工理查德·鲁道夫传递了一个重要消息。“煤气管”安东尼卡索希望投诚，想以政府证人的身份指证黑手党。如果政府对他从轻量刑，他发誓说，他可以与公牛萨米·格拉瓦诺一样披露足以重创卢切斯与其他家族的重要

情报。

在达成合作协议之前，检察官们需要在不惊动其狱友的情况下评估卡索的价值。他的监区里还关押着其他黑手党被告，这些人细心地观察着狱友进出惩戒中心的情况，警惕着可能的叛徒。为了保护他，官方耍了一个花招把他带到布鲁克林的法庭，然后按预定计划把他送进一个地下室与检察官们见面。以他必须为其审判中可能用到的证据提供书写样本为借口，他被传唤单独出庭，卢切斯家族平常随他参加审前听证会的共同被告没有一同前往。

在卡索法庭密会检察官罗斯和奥康耐尔两周之后，他们达成了一份协议。1994年3月1日，在其阴谋杀掉的法官尤金·尼克逊主持的闭门听证会上，卡索承认犯了14宗谋杀罪和一揽子RICO敲诈与勒索罪。为了替被告行使辩护权，前有组织犯罪检察官马修·布里夫（Matthew Brief）在罗斯和奥康耐尔的建议下受邀担任了卡索的代理律师。（检察官通常要求背叛者放弃他们原来的常常还为其他黑手党客户服务的律师，这些人常常被检察官称为“黑手党律师”而得不到信任。通常，大多数为黑手党客户辩护的律师都拒绝替背叛者出庭，他们相信为这类当事人辩护会危及自身的安全。）

罗斯和奥康耐尔曾担心，没有一点证明其有罪的窃听录音作为审判证据，卡索或许有可能从他们的手里溜走。现在，没有必要进行漫长的审判，也不存在无罪宣判或陪审团的裁定悬而不决的可能性，凭着他对那足以判处他14个终身监禁的罪行认罪，卡索再无全身以退的希望了。

“我们现在牢牢地捆住了他。”在卡索签订合作协议发誓吐露他所知道的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所有罪行与背景情报信息之后，奥康耐尔告诉罗斯说。这是个没有商议余地的认罪协议，要求检察官向法官告知卡索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实际上是要确保他获得轻判。尽管厌恶卡索的过去，但罗斯和奥康耐尔知道，与一个臭名昭著的黑手党人达成协议毕竟不是易事。他们将给他一线生机，但前提是他得在政府摧毁黑手党的过程中有显著的贡献。任何一个将终身监禁改为轻判的量刑都完全取决于卡索之情报的价值。检察官们相信，倘若卡索如实交待，他就能打开证据的宝库，让他们能够指控其他黑手党人、腐败的工会和企业家，甚至是其执法机关里的间谍、受贿通匪的警察和联邦特工。

卡索显得心满意足，相信自己在最后时刻成功地争取到开始全新生活的机会。在他的印象中，尽管没有形诸文字，但检察官和FBI特工们曾在口头上强烈地暗示过他，他们会设法大幅缩减他的刑期以换取证词。他分明看到自己被娇惯地供养在“乡村俱乐部”式的监狱里，不出五六年就可隐匿在证人保护项目当中。

作为一个很有价值的背叛者，接受重重保护的卡索乘飞机从曼哈顿大都会惩戒中心被带到遥远的德克萨斯州拉图娜联邦监狱。这座监狱离纽约有 2000 英里之遥，靠近埃尔帕索城和墨西哥边界。在这里，他被安排在拥有豪华设施的囚室之中。这种牢房专供惹人注目且面临危险需要安全保护的告密者使用。卡索那舒适的住所被称为“瓦拉齐套房”，这个套房坐落在一个与其他犯人相隔离的监区里。它是 30 年前为吉诺维斯家族打手乔·瓦拉齐修建的，那时的瓦拉齐是第一个公开打破“乌默它”戒律的荣誉者。尽管晚上被关在长 2.7 米、宽 1.8 米的单人牢房里，但卡索白天可以在隔壁的那个房间里活动，那里面有沙发、立体声系统、电视、冰箱、微波炉和一个用来煮咖啡和茶叶的电炉。在炎热的沙漠气候里，通过“排水冷却器”（一种当地的采用循环水管的空调装置），他房间里的温度舒适宜人。

在拉图娜，罗斯、奥康耐尔与 FBI 特工开始探究卡索的黑手党秘事。检察官们对黑手党凶徒的种种怪癖已经习以为常，但他们还是被卡索操持家务的热诚和难以抑制的洁癖逗乐了。他会为缺少一面刮脸镜子而苦恼。在他们长时间的交谈中，他会在那个单炉头的电炉上煮起咖啡和茶叶，并经常擦拭桌子除掉污渍和碎屑。他的阅读品味也让他们迷惑，他要求订阅检察官和特工并不熟悉的《罗伯报告》，那是一种顶级奢侈品杂志，定位是“寻找奢华生活方式”的读者。

在卡索被捕之前，FBI 的调查和线人的证词都表明他与其认罪协议中所列的 14 起谋杀案有关。在接受讯问当中，他供认了大量的以前从未联系到他身上的命案，让讯问者们感到非常震惊。他承认，在作为卢切斯家族的学徒、荣誉者和二老板的 30 年间，他总共下令实施或亲自参与了至少 23 起其他谋杀，受害者人数达 37 人。此外，还有 25 名被他判处死刑却侥幸免遭劫难的受害者。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在他近期的恐怖统治中受到“特别眷顾”，他们或者带伤逃走，或者因既定的谋杀计划出错或中途失败而没有受到伤害。在卡索为官方解开的黑手党诸多难解之谜中，有一个便是 7 年前的那起让约翰·葛提的二老板弗兰克·德西科死于非命的汽车爆炸案。从卡索的口中，他们得知了令人惊讶的真相，即葛提才是吉诺维斯和卢切斯家族真正想除掉的目标，不过作为保罗·卡斯特利亚诺被杀的一种报复，德西科之死让他们还算满意。

又一个谋杀目标，“煤气管”承认，是他的讯问者之一——查尔斯·罗斯。在逃亡期间，卡索曾发出谋杀指令要除掉他。他指示手下和纽约那两个被他收买的侦探，要他们查找这位检察官的曼哈顿住所，窃听其电话掌握他的动向，然后杀掉他。卡索就事论事地解释说，他想杀掉罗斯是因为他相信这名检察官向《纽约邮报》披露了不实的报道题材，即建筑师安东尼·法瓦因为与卡索的妻子通奸而被严刑拷打和谋杀。

罗斯面无表情地回答这个终未如愿的刺客说，“我原谅你，安东尼。继续说吧。”

特工和检察官们是在拉图娜监狱才获知卡索在羁押候审时策划的最新阴谋与罪行。他吐露了企图杀掉法官尼克逊的阴谋、贿赂看守的冒险之举和胆大妄为的脱逃计划，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讯问者。

卡索讲述了黑社会的屠戮，讲起了对无辜受害者麻木不仁的谋杀。倾听并记录着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供述时，奥康耐尔都竭力保持着职业性的镇静。但有一段叙述仍让他不寒而栗。70年代末，卡索与其他黑手党人合伙用23米长的“特里之梦”号改装拖捞船从南美走私毒品到纽约牟取暴利。1978年11月，这条船连同其运载的23吨大麻和50万片甲苯唑酮或者说安眠酮（一种当时颇为流行的处方镇静剂）被海岸警卫队查获。卡索没有立刻被牵连进去，但他决定杀死船长的儿子以防他认罪告密。

这个毫无戒备之心的年轻人接到邀请，打算与卡索及其同伙到佛罗里达州埃弗格来兹沼泽区钓鱼。在这名受害者赶到碰头地点之前，卡索与他的同伙已经挖好了墓坑。“那个孩子到来后，我就掏枪杀了他。”奥康耐尔记得卡索这样说道。卡索变得不安起来，因为那个年轻人的血溅到了其汽车的引擎盖上。“当讲到把血迹从车上洗去的麻烦时，卡索笑了，脸上满是愉悦的表情，”奥康耐尔说，“当他把泥土铲进墓坑时，那个还活着的小伙子突然站了起来，他使用铁锹铲进他的嘴巴，然后继续将他活埋。”

这位检察官惊骇不已，便问卡索活埋一个人是否会让他良心不安。“‘没有，’他告诉我们，‘必须得这样做。’”

在接下来的三年半里，仍处在候审期的卡索被转到纽约和东北地区数个监狱。他总是被安排在专为合作的黑手党背叛者准备的保护性牢房里，与监狱的普通犯人相隔离。实际上，他在遭羁押期间已经处于证人保护项目当中。特工和检察官们继续进行着他们的讯问工作，对于他收买两名侦探来获取情报并让他们替自己犯罪的供词，他们特别希望去证实。他的一个最令人震惊的说法是，他曾指派这些特工充当杀手实施了一起黑手党谋杀。作为对吉诺维斯家族老板文森特·吉甘特的一种支持，卡索称他在1990年将谋杀任务交给了这些侦探，由他们处死甘比诺家族的角头埃迪·利诺（Eddie Lino）。

受到卡索的指证之前，那两名受到怀疑的侦探已经黯然退休，但没有受到谋杀或受贿罪指控。卡索向联邦和警察局调查人员告发称，通过家族里几乎专职为他服务的中间人伯顿·卡普兰，他定期与这些侦探进行联系。在策划绑架并虐杀企图干掉“煤气管”的枪手吉米·海德尔的行动中，卡普兰发挥了协调作用。据卡索称，1990年卡

普兰还帮助传递警讯，称他和维克·阿穆索在“窗户案”中就要受到 RICO 指控被起诉。被宣判犯有毒品走私和逃税罪后，卡普兰被处以 27 年监禁。当时，也就是 1997 年，他拒绝为取得从轻量刑而签订认罪协议证实卡索的说法，即那些侦探在出卖情报并为黑手党犯罪。由于没有取得其他证据，检察官们觉得仅凭卡索之言不可能立案指控那些侦探。

在 2003 年的一次采访当中，卡索称利诺被谋杀是因为吉诺维斯家族老板“钦”吉甘特憎恨甘比诺家族的对手约翰·葛提，希望以此削弱他的实力。利诺是个令人敬畏的杀手，在斯帕克斯牛排屋外刺杀保罗·卡斯特利亚诺和汤米·比洛蒂的行动中，他就是其中的枪手之一。“他是约翰最得力干将之一，是我们想敲掉的硬骨头，”卡索接着说，“我们倒不担心萨米（格拉瓦诺）。”

1990 年 11 月 6 日，利诺被发现毙命于他那辆黑色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之中，那辆车当时就停在布鲁克林的主干道环形公园大道的便道上。为了拦住这个 48 岁的行事谨慎的杀手，卡索相信那两个侦探亮起了车顶上的闪光灯以违反交规为由将他带出主干道并将其枪杀。为了这起谋杀，他记得向侦探们支付了 4.5 万或 7.5 万美元的酬金。

自现代黑手党诞生以来，腐败警察向来是困扰纽约地区警察机关的一个敏感话题。堕落的警官和调查员要么被直接拉下水，要么作为黑手党人的亲戚或老友被慢慢腐蚀。黑手党还雇用前侦探和警官为私人耳目，这些人在执法机关里有各种关系，比较容易搞到机密情报。罗斯和奥康耐尔对黑手党“拉拢”警察的能力早有耳闻，因此对卡索从不法侦探那里搞到情报并取得致命帮助的说法并不感到奇怪。

卡索谈到自己收买了一个 FBI 间谍，这让一个甚至更具爆炸性的腐败问题暴露了出来。据 FBI《302 报告》披露，阿尔·达尔科在 1991 年背叛后告发称，卡索曾经提到从那个绰号为“水晶球”的特工那里接收情报。数年之后，卡索的辩护律师称，对于纽约那个 FBI 败类特工，他们在他们面前也是有过类似的说法。直至 2003 年，卡索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说，他已经向讯问他的 FBI 特工指认了那个叛徒。他声称，FBI 有意掩盖那名污点特工与黑手党人有牵连的真相，而且他的讯问者还警告他说，如果他坚持自己的说法而损害 FBI 的声誉，那么他的减刑协议将不容乐观。卡索坚称，特工们指示他在接受检察官的询问时，不得吐露那名内奸特工的身份或证实他的存在。卡索声称，他不愿在判刑问题上冒险，因此多年来都在保持沉默。

但司法部宣称卡索是个不值得信任的撒谎者，断然否定他的说法。格雷戈里·奥

康耐尔声称，在1994年的合作协议达成后不久，他对卡索进行过密集的讯问，当时“煤气管”否认有个FBI特工从他那里领取薪水。“他将这间谍之说斥为一派胡言。”奥康耐尔接着说。在为卡索辩护时，他的律师们强调称，他是迫于压力而不能向检察官讲实话，因为FIB特工曾警告要报复他。

最终的结果是可耻的。联邦调查人员接受了纽约侦探被腐蚀的说法，却不理会黑手党将他们自己的特工拉下水的可能性。

他刚刚变节时，FBI就宣扬卡索是个王牌俘虏，在提供弹药帮他们打败黑手党的能力上与公牛萨米·格拉瓦诺不相上下。实际上，除了1996年3月在参议院附属委员会面前作证曝光黑手党与俄罗斯黑帮勾结窃取燃油营业税外，卡索的潜在证词都没有被利用。在提起黑手党控告或将某个黑手党人定罪的审判上，检察官们从来没有在大陪审团面前称他是证人。

渐渐地，那份合作协议开始失效了。1997年8月，卡索的交易受到最后一击，当时检察官们草草地废除了协议，将他逐出了证人保护项目。他因此有了一个并不值得羡慕的“殊荣”，那就是成了唯一被扔出该项目的黑手党重要变节者。这种非常之举，检察官们说，是卡索在签订了合作协议后的口是心非、谎言和罪恶导致的。

政府罗列了卡索在达成认罪协议之后的诸多违法之举，指控他为取得特别优待而本性难改地贿赂看守和狱方雇员。他把现金、戏票和汽车轮胎送给他们，让他们偷偷带进来各种各样的好玩意儿，包括伏特加酒、葡萄酒、寿司、牛排、火鸡、炸牛肉片、一次性相机、收音机和化妆品，带进他的住处。第二项罪名是在其保护性监狱住所里对另一名黑手党背叛者，即科洛博家族一个让卡索厌恶的前打手，实施了一次所谓的人身攻击。

然而，政府抛开卡索的时机与决定无疑取决于一件更具争议的事情：他企图让两个大名鼎鼎的“科萨·诺斯特拉”叛徒萨米·格拉瓦诺和阿尔·达尔科信誉扫地。在卡索被踢出该项目前不久，他给检察官们寄出了一封信，对格拉瓦诺和达尔科在一些重要的黑手党审判中给出的证词提出质疑。针对约翰·葛提1992年的有罪判决，卡索驳斥了政府的明星证人，称公牛萨米发誓从未参与毒品走私纯属一派胡言。卡索称，在20世纪70年代，他曾将大批大麻卖给了格拉瓦诺，而稍后格拉瓦诺提出将其从中国走私来的价值16万美元的海洛因存货售给他。

卡索还写信告发格拉瓦诺于1991年1月下令行刺颇具争议的政治活动家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牧师，当时夏普顿正在整个黑手党巢穴密布的白人社区本森赫斯

特领导着一场主要由黑人青年参加的抗议游行。开始时，卡索坚称在夏普顿被刺的次日，格拉瓦诺在布鲁克林与他见过面并将其涉案情况告诉了他。检察官们轻而易举的反驳了这种说法。他们指出，在袭击案发生的当天及后来的几个月里，公牛萨米作为葛提的 RICO 审判的共同被告已被羁押候审。

卡索还猛烈抨击了其前奴仆从阿尔·达尔科，称在犯罪和重大事件上，包括他被任命为家族的代理老板，其证词都充满了谎言与夸大之辞。卡索在信中写道，检察官和 FBI 容许达尔科谎报自己的头衔，因为这能提高他作为一名政府证人的威信与重要性。检察官们将卡索之言斥为“诬告的连祷文”，他们反击称，他的不端行为打消了他们递交建议信的可能性，而呈交这种在联邦法院被称为“5k1.1”的评价书就是要以从轻量刑回报他的合作。几乎从他居心叵测地开始“转变”时起，检察官们称，他们就相信卡索在知情不报并在他参与犯罪的问题上误导他们。在其变节的头几天里，两次测谎器测试都表明，他在其秘密财产的多少和企图杀害法官尼克逊和查尔·斯罗斯方面说了谎话。（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在允许卡索留在证人保护项目 4 年之后，检察官才迟迟地提到测谎结果。）将卡索列为对他们再无利用价值的丧家犬后，司法部希望最后根据他 1994 年供认的全部 72 条罪状对他量刑。

在宣判之前，卡索给联邦法官弗雷德里克·布拉克（Frederic Block）寄出了长达 32 页的三封手写信，对政府的定罪理由进行了逐条辩驳。卡索将自己描述成一个诚实而正派的黑手党人，恳求重新回到证人保护项目当中。他进行了纽伦堡式的辩护，将大多数罪行都归咎于不得不遵从“科萨·诺斯特拉”的命令。他认为自己被错误地定性为心理变态的杀手，坚称自己实际上只动手杀过两个人，而并不是检方所称的那么多。他指出，在这两名他供认不讳的受害者当中，汤米·海德尔首先想在伏击中杀掉他。卡索还暗示海德尔由于其他原因而死有余辜。他在信中称，在企图谋杀他前不久，海德尔还诱奸并杀死了一个年轻女子。

卡索承认说，他错误地指认萨米·格拉瓦诺卷入了夏普顿牧师的伤害案，但这是个诚实的错误，是很早以前与其他黑手党人谈及此案后留下的一段有破绽的记忆。然而，他义正词严地坚持了其他的说法，即格拉瓦诺参与了毒品交易，格拉瓦诺和阿尔·达尔科在数起黑手党审判中均做了伪证。

至于他为了获得特别优待而贿赂看守的指控，卡索声称，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双重标准的对待。他指出，政府通过他才得知受狱方特别保护的黑手党背叛者所犯下的种种走私和其他罪行。他接着指出，FBI 特工警告他必须对这些事情保持沉默，因为他们需要从这些背叛者身上获取证词，需要让告密者过得舒适而快乐。

卡索相信，在经过三年半的合作之后，他是唯一被挑出接受严惩的人，这仅仅是因为他指控了格拉瓦诺。他在写给法官的信里暗示称，检察官们害怕他驳倒格拉瓦诺并推翻约翰·葛提的判决而给司法部带来一场噩梦。为证明他所言非虚，卡索要求在判决之前对他进行一次独立的测谎验证。

由于文化程度有限，卡索写道，他很难将胸中的块垒表述清楚。“我不否认我犯罪的过去。”他恳请法官给予再次进入证人保护项目的机会，并说出了想成为合作证人的唯一动机——“只是因为我想为自己争取体验全新生活的机会”。

卡索的陈情状难以抵挡检察官与 FBI 特工的联合证明书。他们断然驳斥了他的说法，声称并非不义地撤销了与他达成的协议。

然而，有个令人迷惑的问题因认罪协议的破裂而出现了。为什么卡索——一个聪明的罪犯——要说谎并毁谤格拉瓦诺和达尔科？要知道，挑战决定其前途命运的政府显然让他捞不到好处。检察官和特工们对他的变节给出了多种解释。他们分析称，他是出于邪恶的嫉妒心而孤注一掷，与格拉瓦诺和达尔科不一样，他不会成为一个受公众瞩目的大牌证人，不会被人称赞为一个改恶从善的黑手党人。他曾指望至少在一起知名案件，即将在对吉诺维斯家族老板文森特·吉甘特的审判中发挥作用。但政府认为“煤气管”的经历过于臭名昭著，在任何审判中都不能将他当成得力证人使用。“用他就像把阿道夫·希特勒推上证人席一样，”奥康耐尔评论说，“不可能无视其历史而让他确实为人所信。”

基于这一点，据检方分析称，卡索意识到其刑期不会大幅减少，于是就向政府宣战了。律师和特工们推测，为保证自己在狱中性命无忧，他决定讨好黑手党人，声称已经浪子回头并且打击了两个著名的黑手党叛徒格拉瓦诺和达尔科。

受邀参与卡索案的乔治·斯泰姆布利迪斯，即那位在科洛博家族的检控案中获胜的检察官，特别提出，“煤气管”曾有过一次改过自新的极好机会，尽管“实际上比起政府以前签约雇用的任何合作证人来，他有着更多的令人惊悚的历史包袱。”政府承认卡索提供过极具价值的情报。但他在保护性监禁期间犯下的罪行自然而然地破坏了合作协议，并且毁掉了他作为一名诚实证人的可用性，斯泰姆布利迪斯在法庭陈述中指出。

1998年7月，法官布拉克完全接受了检方的立场，驳回了卡索希望获得减刑并重返证人保护项目的请求。“理应惩处，”布拉克裁决道，“合作者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惩罚而不是宽恕，政府中止履行合作协议的义务就是传达此种重要信息的有效方式。”

这位法官还向 56 岁的卡索传达了另一个信息，那就是长达 455 年的 13 个不间断终身监禁的判决。卡索还丧失了被政府当成犯罪所得而没收的 150 万美元资产。

“我原来的检察官告诉我不要担心，”卡索被带走时嘟囔着说，“但他们从未打算信守诺言。”

在接下来的多年里，为了他的减刑和重返证人保护项目，卡索的律师们继续战斗着。律师马修·布里夫在首次上诉时谴责了检方，称他们仅仅因为卡索指证萨米·格拉瓦诺参与毒品犯罪就背信弃义地撕毁了认罪协议。

这种方式难以奏效后，新律师约翰·D. B.·刘易斯（John D. B. Lewis）申告称，在履行认罪协议期间，利益冲突让检察官钦点的律师布里夫无法充分地为其行使辩护权。布里夫曾在一份宣誓书中称，罗斯和奥康耐尔应该立即在法官面前确认卡索之认罪协议的有效性，并争辩说在卡索签订合作协议之前他就想退出该案，但他们威胁要对他提起职业道德与纪律的指控。尽管这仓促的安排让他措手不及，但布里夫还是留了下来，不过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与卡索进行彻底沟通，同时检方也缺少任何切实可信的宽大承诺。

尽管刘易斯长篇累牍地提出了申请，但上诉法院并不接受卡索关于检方行为失当和他本人主要因指认公牛萨米·格拉瓦诺为毒品奸商而被草率定罪的申告。2002 年，就在他被当成不可信任的说谎者被抛弃四年之后，他的可信性不同寻常地增强了，当时格拉瓦诺承认参与了大规模的摇头丸毒品交易。突然之间，格拉瓦诺为政府所做的审判证词至少部分是可疑的，而卡索的供述则变得更为可信。

“从第一天开始，卡索就讲出了真相，即格拉瓦诺曾长期涉足毒品交易，但这种说法立即被联邦政府工作人员所否定。”刘易斯称。这位律师特别指出，在卡索受到多年的怀疑与指责之后，政府终于指控格拉瓦诺为西南地区的头号毒枭。“格拉瓦诺显然知道毒品世界的底细，而这仅仅是卡索所吐露的政府却不愿意听的许多真相之一。”刘易斯接着说。

但卡索与政府的战斗出现了一个异常的戏剧性的转折。

在卡索试图成为合作证人 11 年之后，一场爆炸性的控告使其争取减刑的斗争变得复杂起来。2005 年 3 月，他于 1994 年指认的那两名侦探被正式确认为黑手党杀手。

已经退休的路易斯·埃珀利托（Louis Eppolito）和斯蒂芬·卡拉凯帕（Stephen Caracappa）被指控亲自为“煤气管”实施了一起谋杀并帮他追踪和杀死了另外 7 名仇敌。在布鲁克林提起的一项联邦指控称，这两个侦探自 1985 年起就愉快地为卡索做

事，直到其雇主 1993 年被捕。据控告，他们每个月领取多达 4000 美元的月薪，而执行特殊的调查与杀人任务还会另有奖赏。

就如何实施犯罪以及这些犯罪背后的动机，控告书载明的细节与卡索在法庭文件里的表述及其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说法存在一定差距。但是，起诉书和检察官的陈述实际上表明，卡索关于雇用和收买侦探的供词实际上是准确的。

控告书特别指出，这两个侦探亲自处决了甘比诺家族的角头弗兰克·利诺，在布鲁克林的一条主干道上，他们拦下弗兰克并将其枪杀。他们还被指控参与了另一个特别可耻的行动：绑架詹姆士·海德尔并将他塞进汽车后备箱送给卡索，而卡索后来对其进行了严刑拷打并最终杀害了他。海德尔最终因为谋杀卡索未遂而被后者残忍地杀害。

最终导致两名侦探被逮捕的新证人出现了，它促使布鲁克林地方检察官和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对这起警察腐败案重新立案调查。5 位调查人员声称，他们发现了新的证据，包括与埃珀利托有关的录音与录像。这些新证人的身份没有立即被披露出来。但被告律师推测其中一人是伯顿·卡普兰，这个黑手党合伙人很早以前就被卡索指定为他的中间人，负责与被卡索称为“我的侦探”的腐败警察进行联络。在联邦监狱苦度 8 年之后，据称 70 岁的卡普兰已经改变想法成了告密者，并作证称他就是卡索与受贿警察之间的联络人。

卡拉凯帕和埃珀利托都是极具迷惑色彩的侦探，他们都在警察队伍中工作了二十多年。两人都被指派到精英部门调查与黑手党有关的罪案，而卡拉凯帕还有机会查清告密者的身份并搞到 FBI 的机密材料。20 世纪 90 年代，他们每人领取了约 7 万美元的残疾抚恤金从纽约警察局退休了。到了被捕的时候，他们已是一对居住在拉斯维加斯的邻居。检察官在法庭文件中声称，1969 年埃珀利托申请加入警队时撒了谎。在他的申请书里，他发誓与有组织犯罪人物没有任何联系，而实际上，当时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甘比诺家族的打手，并且他还认识许多其他黑手党人。

退休期间，埃珀利托与人合著了《黑手党警察：一位出身黑手党的正直警察的故事》，并在 11 部罪案电影中担任过配角，往往扮演黑帮分子。

公牛萨米·格拉瓦诺的毁灭和内奸侦探案取得的突破显然无助于“煤气管”的减刑斗争。证明格拉瓦诺是个毒枭的证据未能除去对他不利的控告——撒谎、为谋取监狱违禁品而贿赂看守和攻击狱友——而这些都是过去被用来将其逐出证人保护项目和证明终身监禁合理的根据。这些前侦探受到检控是纽约警察局历史上最可耻的丑闻，

它在表面上也增强了卡索与司法部进行交易的诚信度。然而，在重新立案对卡拉凯帕和埃珀利托展开调查后，调查人员拒绝对他进行采访。在联邦政府看来，“煤气管”仍然不值得信任。2005年检察官们声称，他们既无意于依靠他的证词，也没有考虑减轻他的刑罚。

尽管以告密者证人的身份抗议待遇不公，但卡索仍被监禁在政府最严苛的监狱，即科罗拉多州佛罗伦萨市的落基山恶魔岛监狱。这个所谓的“超密监狱”按规定最多可以关押575名被联邦监狱局认定为全国最危险的联邦罪犯，包括伊斯兰恐怖分子。其正式名称为“ADX—佛罗伦萨”，于1994年开始投入使用，是个高科技防逃监狱。它取代了位于伊利诺伊州的戒备森严的马里恩监狱（约翰·葛提被关押的地方），被用来监禁那些被认为无可救药的囚犯。和佛罗伦萨的大多数囚犯一样，在每天长达23小时的时间里，卡索都被关在隔离牢房里，只有一线自然光透过一面小小的有孔窗玻璃射进来。透过这块玻璃，他既看不见天空，也看不到附近的落基山脉。食物都经过两道门送进他的牢房，而他要么读读书报，要么靠那台13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收看节目，以此来打发大部分时光。他那与外界隔绝的牢房里容纳了一张铺着3英寸厚床垫的混凝土平板床，一个混凝土马桶，一张桌子和一个固定的书架。每周他有5天可以走出牢房一小时，到一个封闭的小院里和其他几名犯人一起散步，这通常是他与其他狱友接触的唯一机会。

懊悔签订合作协议的卡索说，在背叛之前，检方提出过一个对他本该极有好处的交易。他差点接受了一份让他接受20年监禁就有资格保释的认罪协议。“我帮助他们，可我得到的是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的结果，”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这真是开他妈的玩笑。”

第 45 章 “美国队”

“看看他留下的足迹吧。他为金钱而出卖灵魂。他将历经岁月的准则扔出窗外。那就是我们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

卢切斯家族改变立场加入“美国队”的角头们用检察官格雷戈里·奥康耐尔的话来说，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与“煤气管”卡索不一样，他们得到了宽大量刑或者免罪释放。

由于担心被列入卡索的谋杀名单，“教授”阿方索·达尔科便自首认罪并为自己及其荣誉者儿子乔寻求政府的保护。（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尽管乔在家族清洗期间参与一桩凶杀案和一起未遂谋杀案，但政府同意对他不提起检控。）作为一个令人信服的证人，达尔科帮助政府最终将卢切斯家族老板维克·阿穆索和其他五十多名暴徒定罪。在证人席上，达尔科承认自己卷入了 10 起谋杀以及他所称的“一堆罪行”：放高利贷、赌博、勒索、劳工诈骗、伪造货币、纵火、绑架和向拒付保护费的公司扔燃烧弹。在最后一次出庭时，他总结了自己的蜕变。达尔科告诉法官，“我肉体上还是从前那个人，但我本质上已不再是那个人了。”检察官们对他的合作大加赞赏，声称他摆脱了“科萨·诺斯特拉”，而且不会有指控等着他。一位联邦法官接受了政府的《5K1.1》鉴定书，于是达尔科带着亲人消失在证人保护项目之中。他没有蹲过一天监牢。

身中 12 枪的胖子皮特·奇奥多活了下来，半身不遂而难以摆脱轮椅的他指证了前老板维克·阿穆索和卢切斯家族其他几名黑手党人。如果卡索受审，奇奥多将会作为检方的一名主要证人出庭。在他的认罪求情协议当中，胖子皮特承认参与了 5 起谋杀和无数次敲诈勒索。他也被纳入证人保护项目之中，被给予了新的身份并免除了监禁。

在粉碎他发展并领导了二十多年的卢切斯家族新泽西支派上，图麦克·阿塞图拉成为检方最有力的武器。由于他是新泽西州第一个变节的黑手党领导人，并且他对“科萨·诺斯特拉”高层了如指掌，他的重要性因此被夸大。他揭露了新泽西犯罪家族实施谋杀、对工会与产业进行渗透、放高利贷和贿赂陪审团的黑幕，为州和联邦检察官们提供了一幅进行大规模检控的路线图。被阿塞图拉告发的黑手党人并不知道，他是不可能出庭指证他们的。检察官不愿把他当成证人使用，因为80年代为逃避佛罗里达州提起的敲诈勒索阴谋罪的指控，他谎称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痴呆症”。在黑手党案件中，如果检方的主要证人有智障记录，陪审团就不会做出有罪裁决。但他可以证实案情，仅凭这点威胁就能够帮助政府。面对由阿塞图拉帮助整理的且有文件证明的证据，他以前的十几名打手纷纷停止抵抗并选择签订认罪协议，而不是冒险接受审讯并承担被处以终身监禁的后果。

和所有背叛者一样，阿塞图拉感觉有资格获得一张“通行证”，即通过对州里宣判的敲诈勒索罪缓期处刑或予以察看免除监禁。新泽西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人员认为，在图麦克的帮助下，卢切斯家族在该州的活动陷于瘫痪，于是建议大幅减轻他所面临的最高60年的刑罚。在1994年12月其宣判日到来时，阿塞图拉的律师罗伯特·G·蒂文斯（Robert G. Stevens）强调称，作为一个黑手党首领，阿塞图拉有过一段“独特的非暴力的历史”，而作为一个重要的背叛者，他如果被监禁就会面临生命的危险。

州法官曼纽尔·H·格林堡（Manuel H. Greenberg）对阿塞图拉看法并不乐观。格林堡列举了他大量的犯罪记录，查明“他在一个凶残的暴力组织里绝不只是个旁观者”，最后判处他最高20年的监禁并处罚金40万美元。由于阿塞图拉在新泽西监狱容易被人认出，为保护其免受黑手党的报复，该州将他送到北卡罗来纳州州立监狱服刑。

新泽西总检察长办公室最终解救了阿塞图拉。该办公室有组织犯罪调查人员在一份内部报告中给予他高度赞扬，称他揭开大量的与新泽西、纽约和佛罗里达黑手党有关的情报信息，而这些信息通过其他手段均无法获取。2002年12月，他的刑期减为即服刑期，在被监禁9年零2个月之后，他被无条件释放，其关押时间尚不及其最高刑期的一半。63岁的阿塞图拉留在了南方，远离了其昔日黑帮同伙聚集的新泽西。经历了他那不可否认的恣意快活的有组织犯罪历程之后，9年是个并不苛刻的惩罚。

1987年初，维托利奥·维克·阿穆索和“煤气管”安东尼·卡索继承并统领着一个纪律森严的黑手党家族——全国最富有的犯罪家族之一。尽管卢切斯家族以“鸭

子”科拉罗为首的领导集团已被拔除，但FBI和州里的机构正在到处查找线索和零星的证据向新政权的统治者们逼近。执法官员们知道，阿穆索和卡索已在控制之中，但这两个领导者和该家族的主干组织还没有面临遭受执法机关立即攻击的危险。五年后，卢切斯帮派已经分崩离析，有六十多名荣誉者——约占其成员总数的一半——遭监禁、被杀或“被转化”。

黑手党调查人员将卢切斯家族的毁灭主要归咎于卡索为谋取最高权力和为自己榨取财富而不停地耍弄种种阴谋。阿穆索拥有老板的头衔，但在这分裂家族的混乱背后，卡索是主谋之人。法庭证词、FBI的讯问和卢切斯家族变节者的尖锐评论都说明卡索扮演着主操控手的角色，是个阴险狡猾之徒。“‘煤气管’比阿穆索更危险，对那场有助于我们摧毁其家族的清洗负有更大责任。”与查尔斯·罗斯一起对卡索、阿穆索和卢切斯家族其他成员提起过公诉的格雷戈里·奥康耐尔总结说。那两位检察官对卡索那恶魔般的经历了然于胸——大多数是通过听取他本人的供词获悉——他们因此私下给他起绰号为“撒旦”。“他对阴谋和谋杀有着无穷无尽的热情，”奥康耐尔说道，“我起诉过毒贩，有组织犯罪头目和恐怖分子，而唯一令我感到害怕的人就是‘煤气管’。我担心非常聪明且报复心极强的他会将魔爪伸出狱外，并如影随形地伸到我身后。”（“煤气管”被捕获并同意认罪和合作之后，罗斯和奥康耐尔就离开了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开始创办他们那已拖延多时的民营事务所。1998年，罗斯死于脑肿瘤，时年51岁。）

在卢切斯家族被卡索赶到政府怀抱里的所有老牌党徒当中，图麦克·阿塞图拉也许是最为痛苦的一个。他35年间从一个周薪75美元的学徒爬上家族的最高层再到最终逃亡，这一经历浓缩了美国黑手党的近代史。叛逃后不久，阿塞图拉在新泽西州牛顿市监狱里曾接受过采访，言词狂热的他追忆起他在“鸭子”科拉罗“仁慈”统治下的光辉岁月。他如讲神话般地谈起了“科萨·诺斯特拉”，称它在60年代到80年代末是个真正的“荣誉社团”，里面都是积功擢升之人。因为种族背景和身世卑微的缘故，这些人原本被阻断了升迁与求富之路。在阿塞图拉那浪漫化的回忆当中，他那一代黑手党人将谋杀和暴力视为最后的手段，只有在严重违犯“科萨·诺斯特拉”准则的情况下才会使用。他拒绝讨论调查人员称他知道至少13起黑帮谋杀的报告。他更喜欢将自己描绘成一个非暴力角头，其矢志保护的是一个被误解但神圣的组织。“再没有更伟大的生活了，”他悲哀地说道，“我们对金钱感兴趣，但我们不会把金钱置于荣誉之上。黑手党人前辈教导我们，绝不要想着在一桩交易或一场骰子或纸牌赌博中欺骗任何人。他们按老规矩出牌，因为他们希望这种游戏或交易永远进行下去。”

执法压力最终让阿塞图拉面临着痛苦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在监狱中枯萎死去，要么背弃誓言成为告密者。他知道，倘若仍在效忠于原来那个受人敬重的老板，毫无疑问，他会承受监禁的判决并谨守“乌默它”戒律直至死去。“这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走的道路。这是我所选择的生活，我相信自己是个荣誉者，而且会永远坚信这一点。”

但“煤气管”卡索和维克·阿穆索捏造莫须有罪名想除掉他，这击垮了阿塞图拉坚守“科萨·诺斯特拉”神圣准则的信念。他文过饰非地称，他们，而不是他，才是出卖者和背叛者，因此他的放弃也是情有可原。

在联邦和州执法机构对黑手党发起进攻之前，阿塞图拉的黑手党生活是惬意安乐的。“那时候，我们恪守纪律，注重配合，在组织性上比它们更好，我们利用了这一点。”当提到执法不力的太平岁月时，他笑了起来。“现在，情况恰好相反。那些家伙紧密配合而我们却正在自相残杀。”

倘若有更好的领导集体，他觉得，卢切斯家族或许能抵挡并打退政府的进攻。阿塞图拉是家族突然腐朽与衰败的直接见证人，他批评了在80年代至90年代被吸收的那些骨干荣誉者，称他们更热衷于敛财致富和毒品走私，而不是谨遵黑手党那理应敬畏之的行为准则。他指出，在这导致卢切斯家族分崩瓦解的内乱背后，“煤气管”卡索是唯一的始作俑者。“卡索和他的人未经锤炼，没有荣誉感，”图麦克悲哀地反省说，“看看他留下的足迹吧。他为金钱而出卖灵魂。他将历经岁月的准则扔出窗外。他想干的事情就是杀人，杀人，抢夺你已经，甚至你还未赚到的所有东西。那就是我们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

第 46 章 睡衣把戏

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沙利文大街上的古怪男人在吉诺维斯家族里实际上拥有多么大的权力。

几乎每一天，一个头发灰白、衣服破旧的人都会从格林威治村一幢红砖墙的无电梯公寓楼里走出来，然后小心翼翼地穿过楼前的大街。通常，有一或两个人会陪伴在他身边，扶持他在沙利文街上走过六十多米长的路。这个佝偻着身子的人通常的目的地是街边一个光线昏暗的俱乐部，他会在那里打打牌消磨时日。在大多数日子里，他都会不招人注意地穿上袋形裤、工作鞋，套上防风外衣，戴上一顶毛线帽。但在风和日暖的天气里，他走上街头时会穿着睡衣，套着浴袍，趿着拖鞋，显出一副不分东西南北的样子。无论是穿着休闲服还是睡衣，他经常会让弟弟——纽约市一位天主教牧师和社会活动家陪同。

在路人和邻居看来，这个不修边幅的在附近短时间闲逛的中年人显然得到了家人或朋友富于同情心的照顾。他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嘴角流着口水，在人行道上常常不管不顾地撒起尿来。在人前，他妈妈和弟弟都说他是个精神失常和身体残疾的病人。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这个前轻量级职业拳击手穿着睡衣出来闲逛的情形会习惯性地出现。许多医生和精神病医师开出证明称，年过 50 的他患有器质性脑损伤引起的痴呆症并经受着心脏病的折磨。他的家人说他是个可怜的前拳击手，脑部因受经常性击打而受损，智商水平在 70 左右。

离开沙利文街头，这个奇怪的男人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深夜，在曼哈顿上城的一套百万豪宅里，身为房主的他或披上一袭绸缎袍子或穿着一身运动装，其谈吐连贯，思维敏捷，完全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他假装精神病患者已经 30 年了。布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骗局就是要帮他逃避检控和罪有应得的监禁。此人名叫“钦”文森特·吉甘

特，是全国最有韧性和最残暴的黑手党大佬之一。

其他黑手党人经常假冒做正经生意的商人；弗兰克·科斯特洛竭力扮做绅士；约翰·葛提和阿尔·卡彭冒充热心于公共事业的慈善家，而“钦”吉甘特是唯一一个装疯作傻的黑手党人。

除了在格林威治村短时间闲逛之外，隐居的吉甘特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是“科萨·诺斯特拉”版的霍华德·休斯。休斯是个行为古怪或者半疯的偏执狂患者。晚年，在经营一个资产数十亿的企业集团的同时，他远离尘世，僻居在拉斯维加斯一家酒店的套房里。20世纪末吉甘特控制了吉诺维斯家族，他指望其古怪的行为能掩饰自己作为黑手党老板的真实身份。他统治着一个多元化的犯罪集团。这个集团已发展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黑手党犯罪家族，其触角深深地延伸到费城、布法罗、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黑手党家族里。在吉甘特的统治下，吉诺维斯家族一年的非法收入就高达1亿美元，在执法界内部被嫉妒地称为美国黑手党的“常春藤联合会”和“劳斯莱斯”。

稍有一丝背叛的迹象，狡诈、阴险与诡秘的吉甘特就会下令处死打手、合伙人和所有臆测的敌人。只要他提到的名字或绰号，聪明汉和崇拜者就会立即被处决。在身为老板的长期统治期间，对涉嫌投靠政府的所有人，他都会遥控予以谋杀，但他有个例外。这个例外之人不是荣誉者，而是一个合伙人，一个吉甘特视之若子的为家族效劳的工人。这是他唯一一次打破惩治潜在叛徒的铁律，而偏偏因为饶恕了这个人，他将付出惨重代价。最终，他将牺牲其整个黑社会帝国。

格林威治村和下曼哈顿邻近纽约大学与华盛顿广场公园的地区是文森特·吉甘特少时和成年之后生活的地方。他父亲塞尔瓦托是个宝石雕刻工，母亲约兰达是个裁缝，1921年从那不勒斯移民来到美国。他们在那个周围有沙利文、汤普逊和布利克大街穿过的地方定居下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里仍受附近小意大利城的影响，是个各色人种杂居，且有着些许波希米亚风情的地方。在家里的男孩子当中，生于1928年3月29日的文森特排行老三。“文森特”是附近居民的常用名，为了将他与同名者区别开来，吉甘特早年的朋友都叫他“钦”。这个外号起因于他母亲习惯称他为“Cincentzo”（发“chin-CHEN-so”音），意语的意思是“小文森特”或“文尼”。他的好友们则简称其名为“Chin（钦）”，这便成了他终身的绰号。

吉甘特（Gigante，发“gee-GAN-teh”音，意为“意大利伟人”）是个对学习了无兴趣的学生，读完8年级后就从一所名为“纺织高中”的职校辍学了。当时他刚满16岁，到了可以离校的法定年龄。同年，仍属青少年的他得到一张“黄单”（犯罪记

录)。在16~22岁之间，至少被警方拘留了4次的吉甘特受到一连串指控：买卖赃物、持有无证枪支、偷盗汽车、纵火、赌博和赌注经纪。这些指控大多数以遭驳回或处以小额罚金而告终。只有一项指控让他无法侥幸脱身。在一次大规模的就布鲁克林学院的篮球和足球赛事进行体育赌博当中，他因为充当了跑腿人或者收款员而被捕。地方检察官设法彰显其强硬姿态，要求对参与者处以监禁而不是课以无甚意义的罚款，即使涉案的小喽啰也概莫能免，吉甘特因此被关押了60天。

在20岁前后的几年里，吉甘特被捕时登记的职业均为失业裁缝。作为一个高大健壮且拳风凌厉的年轻人，他更以职业拳击手的身份知名。在纽约附近的俱乐部或小型比赛场所里，他以轻量级选手的身份参加了拳击比赛，出战25场赢了21场，这一成绩被收录在拳击界的百科全书《奈特·弗莱谢尔拳坛名人录》当中。在当时的40年代末，俱乐部拳击手打过4~6场比赛通常会得到一部分门票由自己售出获利，而不是领取一笔固定的报酬或奖金。这是个大多数黑手党帮派都插足职业拳击赛的时代，它们热衷于操纵比赛和控制能赚钱的拳击手。尽管他的拳击生涯渐成过去，但“钦”吉甘特有着与众不同的殊荣，他的管控者是黑帮大佬和其格林威治村的邻居“汤米·赖安”托马斯·埃玻利。埃玻利是原洛克·卢西亚诺家族的成员，当弗兰克·科斯特洛执掌家族大权时，他开始涉足职业拳击赛的敲诈勒索行当。

据50年代初在有组织犯罪情报部门工作的侦探们称，吉甘特当时是个崇拜者，正以暴徒的角色为家族的高利贷与赌博事业打拼并在曼哈顿西区一步步爬升。他有三个兄弟，即哥哥帕斯夸里、马里奥和弟弟拉尔夫，也是渐露头角的黑帮暴徒。最小的弟弟路易斯则走上不同的职业道路，他想成为一名牧师。

在投入黑手党怀抱的吉甘特四兄弟当中，文森特的进步最快，并引起了在二战前逃到意大利并支持墨索里尼政权的角头维托·吉诺维斯的注意。返回纽约以后，吉诺维斯在名义上服从弗兰克·科斯特洛的领导，但实际上，他控制着家族里一个事实上独立的派系，而吉甘特四兄弟就效忠于他。帮助支付他们母亲的医药费后，据信吉诺维斯赢得了吉甘特四兄弟的爱戴。文森特年近30岁时成了吉诺维斯的被保护人，并充当了他的司机兼保镖。

几乎可以肯定，在1957年5月2日的那个夜晚，“钦”为一心想夺取家族大权的维托·吉诺维斯帮了大忙。当天晚上，有个杀手突然喊道，“这是给你的，弗兰克！”一发子弹随即擦过了弗兰克·科斯特洛的脑袋。这次侥幸脱险促使科斯特洛退出老板之位，并将原卢西亚诺犯罪家族的统治权交给了唐·维托。此后，这个犯罪集团就被称为吉诺维斯家族。科斯特洛公寓楼的门卫指证文森特为袭击者，但当侦探们赶到其

格林威治村的公寓寻找他时，29岁的“钦”已经逃走。文森特杳无踪迹，而他的兄弟马里奥和拉尔夫却在沙利文街与蹲点监视的侦探们发生了冲突。在一次扭打当中，探员们在马里奥的汽车中发现了一把短柄斧头和一根棒球棍，他们随即以袭警罪名被逮捕。这项罪名后来减轻为妨害治安行为罪，两兄弟交纳罚金后获释。

科斯特洛遭枪击三个月后，文森特走进曼哈顿中城区一个警察所问道，“你们要为科斯特洛案找我？”在警方以谋杀未遂罪对他做笔录时，信心满满的吉甘特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冲着摄像机卖弄地微笑。为了这次法庭辩诉，这名前职业拳击手聘请了莫里斯·埃德尔鲍姆（Maurice Edelbaum），此人是纽约市名头最响、出庭费用最昂贵的辩护律师之一。对于科斯特洛枪击案发生后吉甘特的突然失踪，埃德尔鲍姆的所有解释是，他本来就不在市内，而是到了500英里远的某个地方。同样难以解释的是，要从“坟墓”监狱保释出来，吉甘特如何筹集这10万美元的保释金，而且他如何能付得起聘请埃德尔鲍姆的费用。当时，29岁的吉甘特已经结婚，育有四个孩子，而他填写的只是个收入中等的职业，即在格林威治村一个联邦政府投资的住宅开发工地上当看门人。那实际上是个挂名职位，是他靠黑手党对建筑行业的影响力取得的。很有可能，唐·维托替“钦”支付了那笔不菲的律师费。

在1958年春的谋杀未遂案审判当中，只有科斯特洛的门卫指证了吉甘特，尽管自案发之后他那超过90公斤的体重已瘦了14~18公斤，而且那长而卷曲的头发也被剪成了小平头。埃德尔鲍姆反驳称，检方唯一的指认证人瞎了一只眼睛，而且另一只也视力受损。科斯特洛谨遵“乌默它”戒律，拒绝指认吉甘特就是枪手。

这个全部由男性成员组成的陪审团几乎不到六个小时就做出了裁决：无罪。约40名家属，包括吉甘特的妻子奥林匹娅和他们四个年幼的孩子及朋友们立即热烈地鼓起掌来。“钦”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重重地坐进被告席的椅子上。“我知道一定是这个结果，因为我是无辜的，”他向记者们宣称，“警察总是挑我的错。”这次控告唯一的法律后果是，警方发现他对几十张违规停车罚单不理不睬，这让他付出了500美元的违规罚金。

不到三个月，吉甘特再次戴上了手铐，这次是与其教父唐·维托一起被捕。1958年7月，作为一场国际贩毒阴谋的参与者，他们和另外35名被告被捕。吉诺维斯在联邦起诉书中被指认为一个从欧洲、古巴、波多黎各和墨西哥进口大宗海洛因和其他毒品的犯罪集团的头目，而“钦”是他的主要帮手。这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西西里黑手党联合行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在一些内城区，主要是在包括纽约、芝加哥、

1957年，因谋杀弗兰克·科斯特洛未遂而被通缉的“钦”文森特·吉甘特在潜逃了3个月 after 自首。科斯特洛拒绝指认吉甘特是擦破他脑袋的枪手，后者随后被宣告无罪。（AP/Wide World Photos）



费城和克利夫兰在内的黑手党传统势力范围内开拓毒品市场。

在法庭讯问当中，戴着角质架眼镜的吉诺维斯显得很平静，而吉甘特则显得垂头丧气。吉诺维斯俨然一副成功者的打扮，穿着格调保守、剪裁考究的套装，内着白织提花衬衫，打着紫灰色领带，胸袋中露出白色手帕的一角。吉甘特则穿着一件方格花呢运动衫，衣衫的下摆松松地耷拉在裤子外面，显得肥大而蓬乱。当检察官依次细陈他对这个黑手党老板的重要性时，吉甘特又重新趾高气扬起来。“他是吉诺维斯的被保护人，是黑社会的一个后起之秀，是这个吉诺维斯的头号帮手，”曼哈顿美国检察官保罗·威廉斯（Paul Williams）声称，“他们看来总是一起并且同时参与这场阴谋。”

一年以后，即1959年，这个老板与他的门徒都被裁定违反了毒品法。唐·维托领受了15年的刑期，不过他的定罪后来因证据可疑而受到执法专家们的质疑。吉诺维斯被送到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服刑，“钦”从此就再也未见过他的教父。他与老板分开了，领刑7年的他被监禁在宾夕法尼亚州刘易斯堡市联邦监狱。主审法官原打算给予吉甘特更长的刑期，但据说他受到了格林威治村和小意大利居民那雪片般飞来的信件的影响，这些信件纷纷证明“钦”有着良好的品格，并且正在为青少年们工作。检察官对这些信件和“钦”以前那不为人知的关怀社会底层青少年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但法官未加理会。在刘易斯堡，吉甘特是个模范犯人。他远离纷争与烦扰，在监狱的锅炉房里当了一个维修工。他的良好品行为他赢得了保释，让他不到5年就返回了格林威治村。

出狱后不久，“钦”吉甘特就成了一个在格林威治村和小意大利活动的行动队的角头，前途看好。他带着妻儿离开了拥挤的公寓房，搬进了新泽西州老泰潘镇一栋高档舒适的郊区豪宅里，离下曼哈顿约 25 英里。就在这个地方，吉甘特的精神能力问题首次出现。1969 年，他在新泽西受到指控，罪名是贿赂老泰潘镇警察，以便就其他执法部门的监视和可能的调查向他发出警告。这个镇的所有警察，一名警长和四名警员，悉数被解雇。吉甘特从来没有因此而受审。以前，他从未有过接受精神病护理的记录，但得知贿赂案调查展开之后，他便开始寻求治疗。他的律师从精神病医师那里搞到了医检报告。报告载明他“精神错乱，无法言语，有精神分裂症状”，是个“需要接受电击疗法的病人”。据诊断，他的智力被发现“如婴儿般简单”，其身体状况正在恶化。这是个立刻奏效的防守策略。法官裁定文森特·吉甘特的精神状况不适合受审和协助其辩护律师，随后驳回了贿赂指控。

维托·吉诺维斯 1959 年离开街头前往监狱时仍保留着老板头衔，直到最后才将日常管理权交给新泽西角头菲利普·伦巴多（Philip Lombardo）。伦巴多高度近视，不得不戴上几乎与挡风玻璃一般厚的眼镜，因此博得了一个大不中听的绰号“眯眼本尼”。1969 年吉诺维斯死于心脏病发作，从此无法服完他的刑期。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困于缺乏可靠的线人，联邦和地方调查人员一直未能准确地摸清吉诺维斯家族领导层的构成。黑手党家族当然从不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其指挥体系的情况，不过调查人员相信，吉诺维斯家族是美国黑手党最为隐秘的帮派。20 世纪 70 年代初显然发生了一场权力斗争，吉甘特原来的拳击经纪人汤米·赖安·埃玻利成了最大的输家，他于 1972 年在布鲁克林被枪杀。（神父路易斯·吉甘特也认识埃玻利，于是主持了他的葬礼。）老板的权杖正式被伦巴多夺走，他为吉甘特后来的行为树立了榜样。吉诺维斯家族高级打手“菲什”文森特·卡法罗将伦巴多描绘成一个自我保护意识极强的人，他“希望留在幕后，让自己远离警察”。据卡法罗称，伦巴多将许多权力交由继任的二老板行使，甚至让其他人做他的“替身”，代表吉诺维斯家族代表参加管理委员会会议。

“钦”吉甘特在 70 年代的内部斗争中成了一个赢家。埃玻利被杀后，他靠接管其下曼哈顿和西区的大量赌博业务大发横财。吉甘特的地盘从南端的炮台公园扩展到第 14 大街，受黑手党控制的彩票和体育赌博经纪人需要得到他的允许才能在其地盘上活动。吉甘特的年收入据说达到数百万美元，菲什·卡法罗称，最为成功的经纪人需要将利润的 50% 交给“钦”。

效仿菲利普·伦巴多自我保护的长处，吉甘特开始深居简出，但会经常前往精神病

医院，特别是当有消息称大陪审团正在调查吉诺维斯家族的活动时更是如此，其黑社会同伙偶尔会将这些医检称为“预先定调”。在“科萨·诺斯特拉”内部，“钦”利用精神病医师躲避可能的逮捕和另一个刑期，这无损于他的声誉或削弱他的权力。到了70年代中期，他成了整个吉诺维斯家族里说话极具分量的角头。

在那些年里，小意大利有个年轻的卡车司机直接感受到了吉甘特的厉害。他在新泽西的工作受残暴成性的“托尼·普罗”安东尼·普罗文扎诺所控制的卡车司机工会560分会的庇护。这个分会据称是卡车司机工会历史上受黑手党腐蚀最严重的一个机构，其残忍的手段往往令人不寒而栗。据信吉诺维斯家族的角头普罗文扎诺帮助谋杀了吉米·霍发。那个年轻而天真的卡车司机对该工会的声誉及其不成文的关于顶撞官员的规定毫无所知，因为投诉其雇主，他与一名工会代表发生了争执。第二天在停靠车辆时，这名司机看见三个气势汹汹的暴徒向他逼近。他比暴徒们跑得快，最后穿过乔治·华盛顿大桥安全地回到家里。

“我惹了大麻烦，我得挨揍了。”这名司机对父亲说。数年后，在一份交给政府调查人员的宣誓书中，他描述了父亲如何把他送到小意大利一个糖果铺里，让他把自己的遭遇讲给坐在里屋的一个人听。

“我把整个经过都讲了出来，他随后对我说，‘孩子，你是得挨揍。’”当那名司机声称不知道这个分会受黑帮保护时，那人笑了起来。“他认为那很可笑。他说道，‘好吧，这事我留心点就是了。’”结果是，里屋的那个人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让司机返回工会大厅，当着所有工会代表的面亲吻那个被他顶撞的官员。“我不得不起誓说，我绝不再挑战560分会的权威。”

遵照吩咐并在工会官员面前赎回自己之后，这个感激涕零的司机发现，替他出面干预的那个人就是附近的黑手党头目“钦”吉甘特。

在整个70年代，吉甘特是家族里的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负责与其他家族一起协调黑手党的地下生意。为确保吉诺维斯家族控制的木匠协会不会损害甘比诺家族的建筑项目，1976年公牛萨米·格拉瓦诺曾拜访过吉甘特。那是萨米与“钦”的首次会面，甘比诺家族一名成员做介绍时称他为角头。“‘钦’纠正了他，称自己不再是角头了，”格拉瓦诺回忆说，“他是顾问了。”

在这次于格林威治村黑手党俱乐部里举行的会谈当中，“钦”发誓会留意格拉瓦诺的工会问题，当时他照例穿着睡衣和浴袍，留着三四天未刮的胡须。在和格拉瓦诺讲话时，他听起来口齿“非常清楚而连贯”。70年代末，作为甘比诺家族建筑方面的专家，公牛萨米·格拉瓦诺陪同其老板保罗·卡斯特利亚诺和汤米·比洛蒂参加了一

次“迷你型管理委员会”会议。此次会议在斯塔藤岛一栋民宅的地下室里举行，与会者还有吉甘特及其他黑手党大佬。这一次，吉甘特刮了脸，正常地穿着裤子、衬衫和水手短外套。“他的睡衣必定送进了洗衣店。”比洛蒂开玩笑地对萨米说。和上次与格拉瓦诺面谈时一样，吉甘特讲话清楚明白，绝无含混、口吃之状或错字漏句。

“基本上都是‘钦’带头讲话。他认为举行管理委员会会议应该确实为了‘科萨·诺斯特拉’，不是为了生意，不是为了钱。”格拉瓦诺回忆道。吉甘特告诫与会者称，管理委员会聚会讨论的应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要防止黑手党之间的战争，要谋局定策。格拉瓦诺表态说，他讨厌参加讨论工会纠纷和家族间分肥的会议。这些事情，吉甘特坚持说，应该由角头们“在较低层级的会议中解决”。

频繁的高层会议对吉甘特来说过于冒险。“我已投入大量时间进行这种精神错乱的表演，我不希望在这些会议中被抓、被看见或被窃听。”格拉瓦诺引述他的话说。

“钦”的诡计比他自己料想的更为成功。他并未察觉到，他精神失常的把戏蒙蔽了许多FBI、州和市里的调查人员。他们把“钦”文森特·吉甘特看成黑手党的一个滑稽可笑的小丑。有些人对他的精神状态心存疑窦，更多的人则认为他的确是疯了。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沙利文大街上的古怪男人在吉诺维斯家族里实际上拥有多么大的权力。

第 47 章 心理战

“我们耗费了大量人力对‘钦’进行跟踪，但这始终未能让我们扳回一局，”“他是个真正的挑战，是一个谜。”

在一家店面前的人行道上，一群人正在交谈。这时一辆轿车缓缓滑过来，最后在他们跟前停下。两名 FBI 特工坐在汽车的前排，徽章醒目地别在他们的夹克服上。突然，交谈停止了，那群站在人行道上的人被坐在后排的那名乘客吸引住了。他的脸被剪有窥视孔的纸袋罩住，而他的手正指向人行道上的人。在他轻声低语的时候，两名特工在匆忙地做着记录。突然间，这群人惊恐地朝着不同方向逃开，并喊叫道，“他们带来了告密者！”

在格林威治村沙利文大街上，FBI 和那个戴着拙劣面具的人如此招摇地出现，这宣告了政府调查吉诺维斯家族的心理战鸣锣登场。时间是 1982 年，FBI 改组后的吉诺维斯小组正采用超常策略对那个可怕的帮派展开一场卓有成效的进攻。小组新任主管唐纳德·斯科特·理查兹发现了其手下的状态堪忧。“我们情报有限，士气低迷，我们在哪方面都没有像样的调查。”理查兹忧虑地坦承。

作为 1980 年针对纽约“科萨·诺斯特拉”主要犯罪家族而组建的五个小组之一，这个小组在前两年中一直未能找到可供起诉之用的证据来控告吉诺维斯家族的重要打手或铲除其主要的地下产业。FBI 一直认为，“眯眼本尼”菲利普·伦巴多因身体状况不佳而退居到佛罗里达，将家族交给了新老板安东尼·萨勒诺。作为官方眼中的教父，胖子托尼是该小组的首要目标，其东哈莱姆的总部帕尔马好汉俱乐部自然受到了严密监视，但至今没有发现他与任何大案有牵连。

理查兹扩大了目标范围，决心重点关注吉诺维斯家族在老城区，特别是在那个被称为“三角市民促进会”的临街据点里的活动情况。这个俱乐部位于沙利文大街，处

在西三街和布利克街之间。它的对面就是文森特·吉甘特的母亲居住的公寓楼，那里也是吉甘特经常逗留的地方。三角俱乐部是个光线暗淡的陋室，里面塞满了破旧的桌椅，它的小吧台上还摆了一台咖啡机。吉甘特下午的大部分时光都消磨在这里。俱乐部那厚玻璃板窗户上涂了一种白色的黏性物质，使人行道上的人无法看清室内的情形。室内的墙上有些标语，分别是：“硬汉不会告密”，“不要讲话，这里被窃听”和“敌人在监听”。

尽管FBI不能肯定吉甘特是否精神失常，但官员们相信，在吉诺维斯家族的权力等级当中，他至少保有角头的头衔并领导着一支行动队。把三角俱乐部列为监视对象还有另一个原因，这里是吉诺维斯家族公认的在中城区活动的角头马修·扬列诺一周一次的聚会地点。他的精神状态没有问题，更多时候他被人称为“种马马蒂”，1972年“狂人乔伊”约瑟夫·加洛在昂伯托蛤蜊店被枪杀时，他就在他兄弟经营的那个店里。特工理查兹认为，既然有两个角头将三角俱乐部作为隐蔽所，那它就应该被列为主要监视对象。在俱乐部对面公寓楼的观察哨上，FBI人员发现，当他们沿着沙利文大街溜达时，吉甘特常常会向打手们说些什么。理查兹请求配备远程抛物线传声器窃听吉甘特在人行道上的走谈，但他的申请被司法部否决。官方律师警告称，以这种方式搜集的证据有可能不被采信，抛物线设备会不加分别地传送路人的谈话，而不仅限于特定的嫌疑人或场所发出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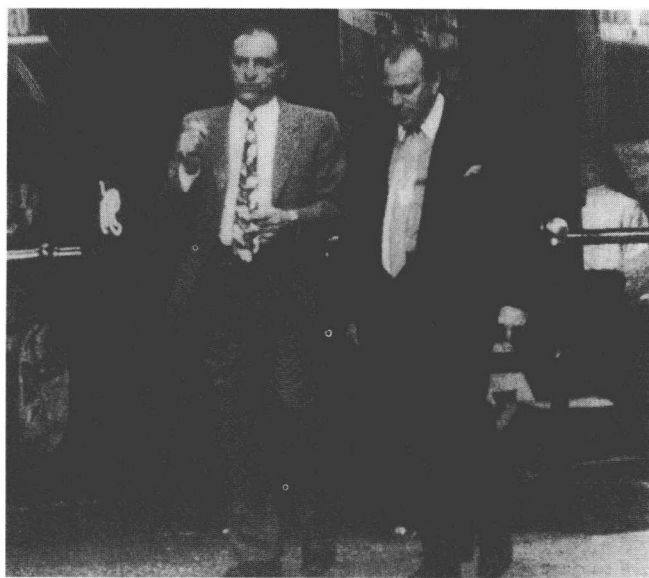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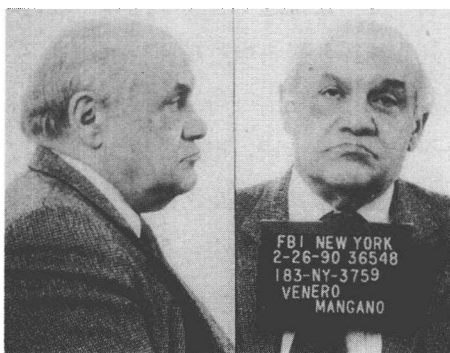
随后，FBI停靠在沙利文大街的汽车被派上了用场，理查兹将微型窃听器装在它们的后视镜里。如果吉甘特停在任何一辆做了手脚的汽车旁边交谈，观察哨里的特工就会遥控启用窃听器。虽然技师们把窃听设备摆弄了一个月，但因为无法听清“钦”的任何谈话，最后不得不放弃。

窃听三角俱乐部被看成了一种了无胜算的冒险而遭到否决。这个经常挤满人的小房子非常嘈杂，窃听的声音将无从辨别，因而无法作为证据使用。FBI那有限的情报显示，吉甘特确在俱乐部里俯在手下的耳边讲过话。“同时有许多家伙在那里说话，窃听器将毫无用武之地。”理查兹判定。他想找些更安静而吉甘特和扬列诺觉得更安全的场所，这样麦克风或电话窃听会更有效果。（FBI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吉甘特每个月都要将俱乐部清查一次，以检测有无电子窃听行为。）

通过实施“心理战”，理查兹希望吉甘特和扬列诺会避免利用三角俱乐部，进而把特工引向他们的秘密庇护所。“我们要把他们从那里赶出去。”他催促其小组说。遵照理查兹的命令，特工们公开在俱乐部正对面的一家旅馆里安营扎寨，并明目张胆地对进出俱乐部的每个人进行拍照。特工们定期在沙利文大街巡逻，记下俱乐部附近每

辆汽车的牌照号。有个别出心裁的骗局是让特工戴着纸袋面具扮成告密者来吓唬他们。“毫无疑问，他们以为我们找了告密者来指认他们。”理查兹得意地说。

这过分招摇的监视行动显然没有吓倒吉甘特，他大多数下午仍继续冒险进入俱乐部。特工们相信，他通常在晚上讨论重要的黑手党事务，这个时候在靠近沙利文大街的格林威治村及其附近的休南区跟踪他就更为困难。有时，他会走进附近休斯顿大街的博康西诺饭店和格兰德大街的鲁吉埃诺之家餐馆。与他在街上走谈和在饭店里会面的人主要是少数几个深受宠信的资深助手：布朗克斯区轻言细语的黑手党人“奎尔特·多姆”多米尼克·西里罗，因其母经营鸡蛋店而得名的“鸡蛋本尼”维利若·曼卡诺，和经常为吉甘特开车的头发稀疏的“秃子多姆”多米尼克·坎特里诺。曼卡诺和坎特里诺都是吉甘特的故友旧交。



在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任吉诺维斯家族老板期间，文森特·吉甘特最亲密的朋友和深受宠信的助手是（自左上顺时针）二老板“鸡蛋本尼”维利若·曼卡诺、角头“秃子多姆”多米尼克·坎特里诺和角头“奎尔特·多姆”多米尼克·西里罗（其左方有一不明身份者陪同）（FBI 和纽约警察局照片）

曼卡诺比吉甘特年长7岁，他在格林威治村的整个生活都以“钦”为中心，只有不到“三角”去的时候，他才去打理自己那位于附近汤姆逊大街上的俱乐部。矮胖的曼卡诺是个招人喜欢的好邻居，因为他允许老年人——大多数都不是黑手党人——在他的俱乐部里打牌和进行社交活动。俱乐部里插着美国国旗并张贴着弗兰克·西纳特拉、佩里·科摩和其他美籍意裔演艺者和社会名流的照片。尽管从未因重罪入狱服刑，但曼卡诺有着厚厚的因赌博被捕的违警记录。在FBI档案当中，他被载明是赌注经纪、高利贷和劳工诈骗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并因赌博和敲诈指控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被永久禁止进入大西洋城赌场。

除了其黑手党的生意，曼卡诺在服装批发方面也取得了成功。他创建了M&J企业，那是一家以折扣价收购过剩的带标签的牛仔裤、衬衫和其他衣服，然后再将其销往乡村和海外的公司。曼卡诺挑选“香肠”约翰·巴芭塔做他的保镖，此人曾做过地下赌场的中介人，还在新泽西码头当过高利贷执法打手。这两个以食物为绰号的黑手党人——鸡蛋本尼和香肠约翰尼——勾结在一起，惹得特工称他们是“‘钦’的早饭套餐”。（吉甘特终于奖赏了曼卡诺，把他提拔为二老板。）

在其白日 and 夜间的漫游中，甚至在滂沱的大雨里，吉甘特照例着装奇异，行为乖张。他会中途停下来，露出自己的器物，在大街上撒起尿来。有一次，在黎明的闲游中，他发现了一个FBI监视小组。突然，他跪倒在沙利文和休斯顿大街交叉处的圣安东尼天主教堂前面，好似在祈祷一般。

通常，“钦”总显得虚弱无力，一副无人搀扶就挪不开步子的样子。被派到FBI特遣队的纽约侦探盖塔诺·布鲁诺却发现了吉甘特动作敏捷的另一面。由保镖扶着胳膊，吉甘特正慢慢穿过繁忙的休斯顿大街，这时交通信号灯突然变红了。毫无困难地，吉甘特疾如野兔般跑了起来，同时拍打着保镖，示意其避到人行道上。很快，他又恢复了脚步沉重的步态。

吉甘特古怪的行为在他母亲那四楼的公寓房里也有所表现。检察官和特工采用了一种被称为“给电话线搔痒”的办法刺激黑手党人就电话与窃听器窃听交换看法和消息。为了让他们忧虑焦躁并喋喋不休地多讲话，征集证据或大陪审团证词的传票被同时送给一个家族或行动队的数名成员。一天，特工帕特·马歇尔和帕特·柯林斯敲响了约兰达·吉甘特的家门，准备将一张传票交给她的儿子。在一个关着的莲蓬头下，“钦”穿着浴袍正站在浴缸里。他将一把撑开的伞举在头顶，裂着大嘴傻笑，而后又语无伦次地咕哝着。

转向特工，吉甘特淘气地朝他们眨着眼睛。柯林斯将传票戳进“钦”的浴袍口袋

里。“他是疯了。”柯林斯冲着约兰达·吉甘特说道，然后转身离去。

吉甘特的家人抗议说，他有精神疾病却在遭受残酷且于理不公的骚扰，随后聘请律师巴里·斯洛提尼克（Barry Slotnick）来阻止 FBI 的调查。“他精神失常已经几十年，难以想像他会是某个有组织犯罪网络的头目。”斯洛提尼克说道。“他连一个糖果铺子都经营不了，更别提犯罪家族了。”（在纽约人中间，“糖果铺子”指的是一个简单的苏打冷饮柜，通常由一对夫妻经营，同时也会卖些冰淇淋、糖果、杂志和报纸。）

家人坚持说，吉甘特这般无助，所到之处都得人搀扶，常常令他们非常尴尬。吉甘特家的牙科医生赫伯特·鲁宾（Herbert Rubin）只在夜间其他病人离去后才给文森特治疗。鲁宾解释说，他不能让一个穿着浴袍与睡衣的衣容不整、精神错乱的病人在正常营业时间走进他的诊所。

“钦”那反应最强烈的辩护人是他的牧师弟弟路易斯·吉甘特，后者经常扶着他在社区附近散步。凭着拆除违章建筑和翻新住房项目赢得的声望，他被人亲切地称为“吉神父”和“贫民区牧师”。与他的中途辍学并早早卷入犯罪活动的哥哥们不同，路易斯在校期间是个篮球明星，并靠着一笔奖学金从乔治敦大学毕业。27岁被授予圣职之后，他成了圣阿撒拉修斯天主教堂的牧师，教堂所在地的南布朗克斯区是个贫穷且犯罪横行地方。60年代后期，几乎凭一己之力，吉甘特神父成立了“东南布朗克斯协会”（SEBCO），向数千名居民及时提供一些像样的房子，当时南布朗克斯的住宅房因火灾和年久失修而受损严重。东南布朗克斯协会总共建起或修缮了两千多套民众急需的住房，并将其廉价售给低收入家庭和老年人。于是，“吉神父”被誉为布朗克斯大贫民区稳定的原动力，80年代，纽约大主教约翰·奥康纳称赞他是“教会的建筑师”。

利用其城市改革者的知名度与成功，吉甘特神父做出了一个寻常牧师所不为的举动，即开创其政治生涯。竞选国会议员失败一次以后，他于1973年胜选，并作为布朗克斯区杭斯点的代表担任了一届市参议会（纽约市的管理实体）议员。一旦有机会，他就驳斥黑手党的存在，谴责媒体和执法部门捏造意大利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概念。他与意裔美国人民权联盟结盟，参加了1971年黑手党老板科洛博被枪击致残的哥伦布转盘广场集会。这位神父在事发之时冲向演讲台，引导混乱的民众祷告并帮助恢复了秩序。

哥哥文森特、马里奥和拉尔夫被确认是黑手党人，而他自己与这些知名暴徒是亲属关系，这不可避免地让吉甘特神父成了备受争议的人物。1979年，因涉嫌帮助被判刑的黑帮分子“吉米·那波”詹姆士·那波利谋求较好的监狱条件，他被传唤到了一

个大陪审团面前接受了质询。

吉米·那波不是一般的赌注经纪人或业余赌徒。他是吉诺维斯家族的大捞钱人，因在曼哈顿设法操纵拳赛、策划谋杀阴谋、实施恶毒的人身攻击、放高利贷和组织一个年赢利达 3500 万美元的玻利希彩票与赛马赌博网络而留下了长长的犯罪记录。检察官们指控吉甘特神父在大陪审团面前回避质询，而该陪审团正就他与同伙贿赂狱方官员让那波利获得圣诞节出狱假和提前释放这一事件展开调查。通过贿赂，吉米·那波在牢房里还能享受酒店提供的饭菜和葡萄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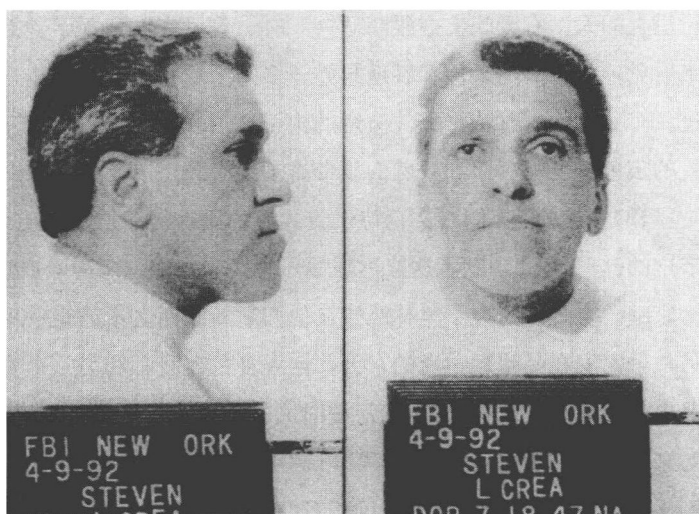
吉甘特神父争辩称，讯问他与“亲密的老朋友”那波利的谈话侵犯了其牧师职分。针对藐视法庭的指控，他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强调其“教士特权”的机密性和《第一修正案》赋予了他不受干涉地从事宗教活动的权利。这番争辩和其他牧师为他进行的抗议示威未能打动主审法官。大陪审团裁定他犯有逃避讯问罪，吉甘特神父因此被判处 10 天监禁，而实际上只被关押了 7 天。

当吉甘特神父以个人名义为史蒂文·克雷（Steven Crea）递交了请求宽恕的申请时，另一个与黑手党大有干系的问题突然冒了出来。克雷被 FBI 认定是卢切斯家族的角头和建筑业敲诈行当里的强权人物，因参与一起谋杀阴谋于 1985 年被宣判犯有结伙阴谋罪。在写给量刑法官的信件中，这位牧师称克雷是一位“特殊的朋友”，曾帮助他在南布朗克斯阻止了“犯罪的冲击和住房的恶化”。（克雷犯有谋杀阴谋罪的有罪裁决被推翻。被其黑手党敬慕者称为“史蒂文奇迹”的他后来升任卢切斯家族代理二老板，2004 年在承认敲诈了一家重要的建筑公司并卷入牵涉到承包商和工会的“组织腐败”之后被监禁。）

尽管吉甘特神父为黑手党知名人物出面干预，但执法机关承认，没有一丝证据证明他与任何犯罪有牵连，更不用说参与黑手党的活动。但媒体对 SEBCO 提出了质疑，其住宅协会与承包商的关系被查明具有很深的黑手党背景。《纽约时报》1981 年报道了 SEBCO 与文森特·迪那波利的业务联系，而迪那波利是吉诺维斯家族的打手兼建筑业敲诈专家。未经竞标，由迪那波利参股或投资的公司就取得了与布朗克斯的 SEBCO 和许多其他联邦投资企业签订的干墙（内墙和镶板面）与木工合同的大部分份额。70 年代后期，迪那波利一伙在公共事业合同中就搜刮了超过 25 亿美元的不义之财。

《乡村之声》于 1989 年声称，干墙、木工和建筑垃圾清运公司与黑手党人勾结并由其充当行政人员、股东和顾问，从 SEBCO 项目中揽得了合同总价超过 5000 万美元的工程。它同时还指出，与被判刑的劳工诈骗犯迪那波利和克雷有牵连的公司正从 SEBCO 合同中受益。

卢切斯家族下一代打手可受该家族二老板史蒂文·克雷领导。作为黑手党在建筑行业当中的一个主要监管者，因勒索从世贸中心废墟清运瓦砾的公司而被定罪的克雷即将服完刑期。（FBI照片）



多年以来，吉甘特神父都拒绝谈论具有黑手党背景的公司是否是以正当途径取得合同。其他 SEBCO 官员强调称，所有工程都不是 SEBCO 直接授予，相反，它们是通过与负责工程项目的总承包商签订分包合同取得的。然而，总承包商们肯定知道，SEBCO 并不排斥具有黑手党背景的公司，而且还知道聘用这些公司他们或许可以避免工会问题和代价高昂的罢工，这是令相关各方都很满意的一揽子交易。

吉诺维斯家族在布朗克斯有个合伙人名叫“屠夫好汉”佩莱葛瑞诺·马塞利。他骄傲地表达了他对吉甘特牧师的崇敬之情。在他的货运公司办公室兼杭斯点黑社会总部前面，马塞利挂出了一面横幅，上面写着，“如果你不信任吉甘特神父，那你还能信任谁？”

吉甘特神父不愿就 SEBCO 的次承包商问题多言，却常常猛烈攻击执法机关“错用和滥用权力”。他将三个哥哥的犯罪记录说成是非暴力的“赌博”逮捕，并表示对文森特在 80 年代中期遭受的“迫害”深感愤怒。

实际上，FBI 正在提高警觉，设法向“钦”吉甘特逼近。在 FBI 的管理委员会调查以指控安东尼·萨勒诺（指认他是吉诺维斯家族的老板）而告终时，一些特工就怀疑吉甘特会成为潜在的继任者。

吉诺维斯小组新任主管约翰·S·普里查德三世相信吉甘特神智清楚且大权在握。他下令加大侦察力度，要更为严密地监视吉甘特和三角俱乐部。他的首个举措是建立一个隐蔽的观察哨。这个观察哨就设在附近的纽约大学一幢大楼楼顶上的小屋里，装备有可变焦距镜头的照相机，可以暗中监视每个进入俱乐部或与吉甘特一起出现在人

行道上的人。有天晚上在跟踪“钦”时，普里查德发现了他双重人格的表演。这位特工看见他穿着浴袍，慢吞吞地与秃子多姆·坎特里诺一起走向一辆泊着的轿车。俯身进入车里时，吉甘特将那件破烂的袍子交给坎特里诺，而几乎一秒钟后，他那剪裁考究的灰色鲨鱼皮呢套服和戴着的领带露了出来。

1985年，特工们对文森特·吉甘特的跟踪终于取得了有意义的发现。“这个穿着浴袍的谜”（FBI幽默者这般称呼他）有两套住宅，两种爱情生活和两个互不相干的亲密家庭。吉甘特与妻子奥林匹娅在他们那新泽西老泰潘镇的家里育有两男三女。他的另一个家安在曼哈顿时尚的东区，他大多数夜晚都和另一个女人在那里度过，她的教名也是奥林匹娅。（在恋爱和浪漫时刻的称呼上，“钦”是个谨慎的人。）“米茨”奥林匹娅·埃斯波西托（Olympia “Mitzi” Esposito）为他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钦”白天在沙利文大街附近处理日常事务，他从来没有离开纽约-新泽西地区，哪怕是到外地进行最为短暂的度假或旅行。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特工们终于找到了他夜间的安乐窝。吉甘特一旦离开下曼哈顿，查尔斯·博杜安和其他特工就开始对他进行冒险而刺激的跟踪。深夜时分，有着一身赛车手技艺的打手兼司机维托·帕尔米里（Vito Palmieri）会驾驶一辆凯迪拉克或其他大型轿车接上他，然后走上一段令人心跳的行程。“他极难追踪。”博杜安惊讶地说，因为帕尔米里根本不理睬限速和红灯。他会突然错道拐进单行线，左转右拐地驶往上城。为了确定是否被人跟踪，帕尔米里做了“许多惊险动作”，博杜安报告称。

尽管采取了高风险的规避动作，但吉甘特的藏匿处还是被找到。那是公园路和麦迪逊大道之间东77大街上的一栋联排别墅。

别墅坐落在一个高档时尚的街区，是栋气派而美观的建筑。这座四层白砖的建筑物采用了黑色镶边，红色的门道边框上饰以仿制的气焰灯笼，而顶层的砖墙上则有一道醒目的花砖檐壁。此处富丽堂皇的住宅是拥有多家唱片公司和夜总会的莫里斯·利维（Morris Levy）送给奥林匹娅·埃斯波西托的，此人数十年来一直与吉诺维斯家族高层保持着经济上的往来。根据房产记录，利维1983年通过朋友将这栋市价接近100万美元的房子以1.6万美元的价格转卖给了奥林匹娅。利维是前一年以52.5万美元的估价购得此处房产，他显然愿意在这栋再好不过的房子上承担大笔损失。

（1979年，在和吉甘特的一名亲属进行的另一起不动产交易中，利维将其桑尼赛德农场（Sunnyside Farms）上的土地赠予了吉甘特神父。这个他用来饲养纯种马的农场位于纽约北部的根特，占地2000英亩。一栋农场式的住宅楼在这片土地上建了起来，吉甘特神父在法庭笔录中称，它几乎被专门用来接待来自其布朗克斯教堂贫困的

教区居民。20世纪80年代，附近的根特居民称，他们经常看见吉甘特神父和客人们待在房子里。)

利维被圈里人称为“音乐界的教父”，是独立的轮盘唱片公司的主要股东，他还拥有包括曼哈顿“鸟国”在内的多家知名夜总会。对其历经30年搜集的厚厚的FBI档案显示，他一直为费城犯罪家族和吉诺维斯帮派从事高利贷、敲诈勒索和洗钱活动。因为是犹太人，利维无法成为荣誉者，但FBI特工称，他喜欢扮演一个硬汉的角色，是三角俱乐部的常客。“他从未隐瞒自己与黑手党有瓜葛的事实，”约翰·普里查德说，“他与聪明汉的联系让人们害怕他并照顾他的生意。”据说利维在80年代中期身价达7500万美元，通过让吉诺维斯家族首脑们作为股东参与其唱片批发销售和进入他的音乐制作公司，他成了大佬们的大捞钱人。黑手党人给予了回报，他们以多种重要的方式来帮助利维的“草莓”唱片联营店和音乐公司，也就是向他保证不会存在工会问题，还通过以有利的合同条款为歌手录制唱片来“影响”他们。

利维那声名狼藉的背景于1988年被公开曝光，当时因企图与黑手党人合伙向一个唱片发行商敲诈120万美元的赔偿金，他受到了联邦敲诈勒索罪指控并被宣判有罪。1990年，他死于肝癌，时年62岁，还没来得及领受10年监禁的刑期。

普里查德深信“钦”在利用这栋别墅作为举行黑手党事务会议的隐蔽场所，因而将它列为一个监视和窃听的优先目标。1985年夏天，依据《第三章》规定并取得法庭授权后，这栋住宅的电话受到了持续60天的监听。吉甘特的谈话未能带来犯罪的证据或线索，但窃听提供了实质性的证明材料，即他那精神错乱的行为是一种装模作样的表演。在电话里，吉甘特主要与孩子和“米茨”奥林匹娅·埃斯波西托聊些寻常的家务事——带些食品回家、预约体检时间、天气——但他的谈话总是风趣横生、妙语连篇。

1985年10月17日，吉甘特给米茨打电话，询问医生检查她剧烈咳嗽的情况。“不要吸烟。”他责备她说。挂断电话前，他给了对方一个响亮的亲吻声，接着又说道，“我爱你。”1985年11月8日，他又给米茨打了电话（那是他最后几次被录音的电话之一），告诉她她正在理发店里，并问有什么东西需要他带回家。

FBI在上城跟踪吉甘特的小组发现，他会突然下车随机地找个电话亭打电话，但他们没有办法追踪或监听这些突发性的电话。当窃听其住宅电话未能发现与过去或当前罪案有关的线索时，普里查德便尝试了其他办法。FBI夜间在东78大街上的拉马兹·叶史瓦犹太教区学校的大楼里设立了一个观察哨，从其后窗和阳台上可以俯瞰东

77 大街边的那栋别墅的后窗。校方官员将一把前门钥匙交给了 FBI，称如果特工想利用楼房进行监视可随时通知他们。

一天午夜，学校校长诺姆·舒多尔斯基（Noam Shudolsky）博士被保安人员叫到大楼，他们报告称三楼阳台上的一个传感器失效了。FBI 并未通知校方特工当天夜晚会待在那里。当舒多尔斯基——拿着手电筒——看到阳台暗处有个人时，他大叫道：“站着别动！你被捕了！”

“不要开枪，我是 FBI 的人。”那人赶紧应道。

特工觉得无需通知他“就能进进出出”，这让舒多尔斯基博士大为光火。他收回了前门钥匙并禁止 FBI 使用那栋大楼。普里查德将那个过分热情的特工训斥了一顿，称他违反了与校方达成的协议。

普里查德尝试了另一个办法，决心趁“钦”在别墅里不提防时暗中监视他。一名特工在东 77 大街 61 号的一幢高档大楼里租下一套房子，那里靠近 67 号的那栋别墅。普里查德对这套房子很满意，因为它紧挨着“钦”的上城庇护所的三楼。

1985 年底，这套两居室的公寓每月的租金为 4500 美元，特工查尔斯·博杜安承担了主要观察任务。每天夜里，博杜安都给自己装备了绿色迷彩服、小手电筒、对讲机、装在乙烯基包里的笔记本和由一个 FBI 生产的轻型防水遮篷或者小帐篷。从公寓房的后阳台上，体格健壮、身高 1.83 米的博杜安爬过约 0.55 米的距离攀上拉马兹的阳台而不会触发任何一个传感器。这位特工说，他或许可以假定“我们仍然得到了校方许可”，是在“非正式”地使用拉马兹的阳台。

博杜安卧倒在地，在阻挡雨雪的遮篷遮掩和庇护下，监视着约 15 米开外的那栋别墅。通过它那巨大的后窗，他可以毫无遮挡地观察到三楼的内部情况。吉甘特抵达时，街上的特工就会用对讲机提醒他。平躺在地面上，周围以花盆做掩护，博杜安靠目视而非双筒望远镜或照相机来进行观察。（当时，有一项法庭裁决（后来被撤消）禁止采信靠望远镜和照相机取得的证据，除非特工已经取得搜查令来观察建筑物的内部情形。）

博杜安在其正式的《302 报告》中特别提到，吉甘特夜间的到访成了固定习惯。通常，他会在午夜之前赶到，然后到卧室和起居室所在的顶楼去洗澡。淋浴过后，“钦”有时会穿上浴袍，但只会穿上一小会儿。一般地，他会换上运动上衣或毛线衫来到餐厅，与家人和朋友或与吉诺维斯家族的手下们一起用餐。“钦”总是坐在桌子的上首与其他人聊天，并亲自为客人倒酒。他看到吉甘特偶尔还会将客人拉到一旁耳语一番。在博杜安看来，他绝无身体有恙的迹象。他会轻快自如地在三层楼上走来走

去，不用人帮助也能使用电梯。

这位特工经常看到“钦”在三楼戴着眼镜，读读报纸或者专注地看些他从书架和文件柜上取下的文件与账簿。在一份《302 报告》当中，博杜安记录称，有天晚上吉诺维斯家族打手安吉洛·迪阿库托（Angelo D'Acunto）与吉甘特一道走出这个特工的视线进入了厨房。从厨房单独返回之后，吉甘特就开始在桌子上数“一大堆美钞”。体检结果表明，博杜安有着极佳的视力，在他看来，“这笔钱的数额显然不小”。

吉甘特通常在上午 9~10 点之间离开房子，走时仍会穿着来时的破旧衣服或浴袍被人送回他母亲那沙利文大街的家。黄昏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街头，由保镖扶着胳膊，溜达一小段路，从不远处的儿童救济社总部门前经过，然后进入三角俱乐部。他的活动日程就像潮汐一样可以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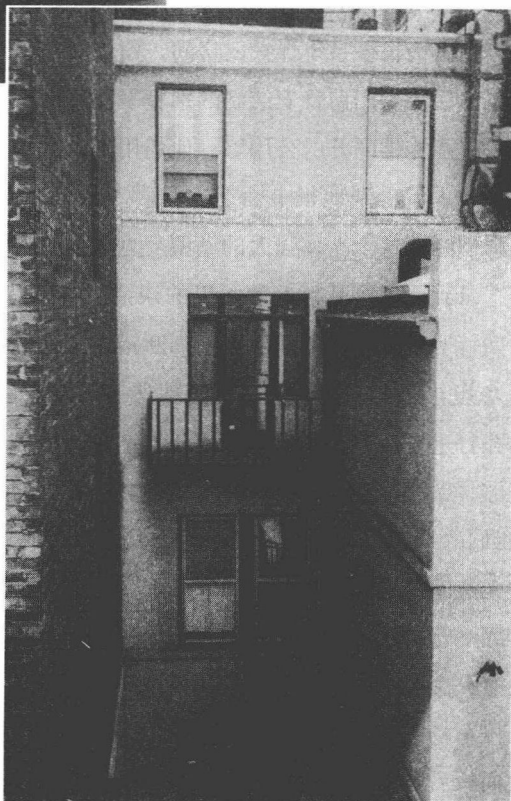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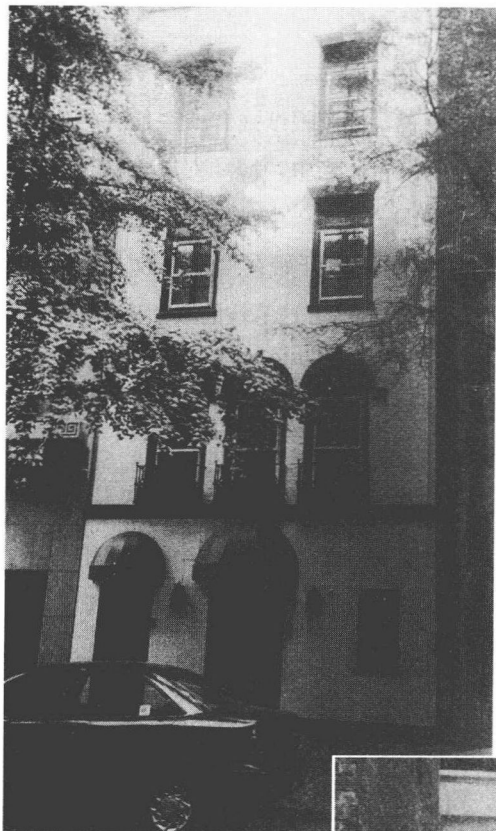
在 1986 年冬天和 1987 年初春的 4 个月里，几乎每天晚上，博杜安都会躺在拉马兹学校的阳台上窥视着那栋房子。他与其他特工及警方一名轮班侦探的观察报告让普里查德，还有 FBI，取得了“合理根据”对“钦”吉甘特发动新一轮进攻——窃听那栋别墅。

暗中设置窃听器的法庭指令于 1987 年春天取得。技师们没有打算秘密潜入通常住有人且受高级报警系统保护的房间，而是决定利用 FBI 在附近公寓楼上租用的房间作为入侵途径。利用博杜安绘制的别墅平面草图，詹姆士·卡尔斯特罗姆的特别行动组钻穿了将两栋楼隔开的公用墙。他们用了无声钻孔机，这种机器能吸出碎片，不会让灰尘与木屑落到地板上而泄露马脚。特工们打算将窃听器设置在橱柜后面的墙里。技师们相信这个功率强大的微型麦克风能被完美地隐藏好，因而能形成一条“传送通道”录到厨房及其附近餐厅里的谈话。吉甘特与助手们经常在那两个地方交谈。但卡尔斯特罗姆的窃听者们出现了判断错误。他们开始时将麦克风放在电冰箱而非橱柜后面，其电机的嗡嗡声盖过了其他所有的声音。接下来，他们又在墙上钻错了位置，钻孔打进了浴室并且穿透了墙，电钻贯通墙体，敲掉了一块墙面瓷砖。在忙乱的特工能够将钻孔修补好之前，它显然会被别墅里的人发现。

“我们的平面图不准确，误差达数英尺。”卡尔斯特罗姆叹息道。

这无意间提醒了吉甘特，FBI 正在渗透这栋别墅并且他在那里已经被监视。他停止在客厅举行会议。后窗的窗帘都全天候地拉上了，防止有人从阳台上窥视。

还有一个更大的失望等着吉诺维斯小组。有天晚上，利用“秃子”多姆·坎特里诺离开停车场的那几个小时，卡尔斯特罗姆的入侵专家们潜入了他的凯迪拉克汽车。移去后面板后，他们将一块相同的暗藏有窃听设备的面板装了上去。这次行动的目的



FBI 特工发现文森特·吉甘特过着浪漫的双重生活，其夜间大部分在东区一栋豪华的私宅里度过。调查人员利用附近犹太学校的一个屋顶观察哨监视吉甘特夜间召集的黑手党会议，通过那栋私宅的后窗（下方）可以直接观察他的动静。当特工们错误地钻穿了墙体时，窃听这栋住宅的努力遂告失败（作者的照片）

是要再现州特遣队窃听卢切斯家族老板“鸭子”科拉罗那辆“美洲虎”所取得的成功。“我们看见‘钦’和胖子多姆在那辆卡迪车里谈话，我们肯定已经取得了重要证据或情报，”普里查德说，“但我们难以置信地倒了霉运。几乎就在卡迪里的窃听器开始工作的同一天，有消息传出来称戈德斯塔克的办公室（州特遣队）窃听了‘美洲虎’，‘钦’于是停止在汽车里谈话。”

打击吉甘特的行动陷入了停滞，但 FBI 对吉诺维斯家族另两处堡垒展开的进攻要成功得多。主要通过帕尔马好汉俱乐部里的电子窃听，胖子托尼·萨勒诺在管理委员会案中被抓捕，并受到两项不同的劳工诈骗指控，萨勒诺作为黑手党头目的生涯以终身监禁告终。

唐纳德·普里查德将“种马”马蒂·扬列诺赶出三角俱乐部的计划最终取得了成效。扬列诺开始依赖起他那中城区的一个办公室，FBI 的窃听器和秘密摄像机在那里取得了一连串指控的证据。1986 年，马蒂被宣判有罪，罪状是敲诈脱衣舞吧和饭店数百万美元的不义之财、勒索建筑公司和向食品供应商，包括扬基体育馆里一家供应热狗的公司，索取保护费。

审判结束时，扬列诺被判处二十多年监禁。政府甚至硬挤进了他最得意的餐馆，即小意大利的昂伯托蛤蜊店。扬列诺的兄弟罗伯特是这家生意红火的饭店的大东家，但司法部发现，饭店靠美味的食用乌贼、海螺肉和意大利面食赚取的利润都交给了吉诺维斯家族。一位联邦管理人员在餐馆里驻店 7 年，目的就是检查账簿和监视收银机。在罗伯特·扬列诺提起诉讼指控政府通过不当管理使昂伯托饭店陷入破产境地后，这名监视者才于 1994 年离去。

在法庭上取得了对胖子托尼和“种马”马蒂的胜利之后，FBI 锁定的吉诺维斯家族的三大目标只有“钦”吉甘特久攻不下。所有针对他而采取的行动均告失败，“我们耗费了大量人力对‘钦’进行跟踪，但这始终未能让我们扳回一局，”FBI 的唐·理查兹承认说，“他是个真正的挑战，是一个谜。”

第 48 章 真正的老板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那句话成了法庭上的证据，我就会杀了他。”

“……我会把这交给老板。”

不知何故，胖子托尼·萨勒诺随口说出的许多重要话语居然被 FBI 特工和检察官们忽视了。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检察官鲁道夫·吉乌里亚利和 FBI 官员对吉诺维斯犯罪家族的一个基本情况坚信不疑，即在 1986 年管理委员会审判之前，托尼·萨勒诺一直是吉诺维斯家族的教父。他们不能肯定“钦”吉甘特是否精神健全，但在法庭文件和新闻公告当中，他们从未怀疑萨勒诺的地位。

在 1986 年管理委员会审判很久以前，调查人员照样忽视了直接来自聪明汉之口的线索，这些自由畅谈的黑手党人当时丝毫未意识到自己受到了窃听和电话监听。

早在 1982 年 4 月 4 日，布鲁斯·莫尔的甘比诺小组就监听到“胖子安吉”安吉洛·鲁吉埃诺与约翰·葛提之间的一次电话交谈，这次谈话强烈暗示了吉甘特在地位上等同于保罗·卡斯特利亚诺。在长岛的家里，鲁吉埃诺向当时的角头约翰·葛提说，“保罗和‘钦’达成了一项协议，”他接着说，“我们任何朋友倘若因毒品被逮捕，他们就杀掉他。无需经过领导层开会讨论，什么都不需要，直接杀了他。他们要警告所有人，要提醒所有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家伙会告密。”这明显说明，对在毒品贩卖过程中被捕的任何黑手党人，卡斯特利亚诺和吉甘特都可以对其处以死刑。只有教父才能单方面行使对他人处以此种极刑的权力，这就证明了“钦”吉甘特在掌管着吉诺维斯家族。

1983 年 6 月 23 日，通过“美洲虎”上的窃听器，州有组织犯罪特遣队人员听到

卢切斯家族老板“鸭子”科拉罗抱怨称，“钦”和“保罗”未和他磋商就搞出了一份管理委员会决议。“什么管理委员会？”科拉罗发牢骚说。“管理委员会就是他（吉甘特），当他们决定将某个家伙干掉时，没有人给汤姆（桑托罗，卢切斯家族的二老板）和我招呼一声。”

1984年5月22日，托尼·萨勒诺和“种马”马蒂·扬列诺在帕尔马好汉社交俱乐部有过一次被窃听的谈话，其中一个片段还是未能让特工和检察官们真正警觉起来。萨勒诺和扬列诺当时正在讨论一份将被其他家族吸收为荣誉者的候选人名单。候选打手的那些让人更容易识别的绰号没有列出来，这让萨勒诺感到心烦意乱。他说，“所有人我都不认识。他们没把绰号写在这里……但不管怎样，我会把这交给老板。”萨勒诺的话直接承认了他在家族里并不是最后的裁决者。

1985年2月6日，就在管理委员会检控案被解密的几天前，胖子托尼沮丧地与打手吉乌塞佩·萨巴托（Giuseppe Sabato）讨论过黑手党教父们即将遭到逮捕的新闻报道。他们想知道“钦”是否也在被指控之列。“不要管新闻报道，”萨巴托说道，“下周就有人要被捕了。我敢肯定有保罗和另一个人，还有‘鸭子’托尼。我敢肯定我今晚能搞清楚。如果‘钦’被抓，他们也逃不掉。”

提到吉甘特那装出来的精神病，萨巴托接着说，“所有，所有愚弄政府的骗人把戏，他妈的，都骗不了人。”萨勒诺回道：“如果他被逮捕，那他可真够苦够屈的，在他妈的精神病院耗了这些年，全是白费心机。”

FBI在连线绘制一幅准确的吉诺维斯家族指挥体系结构图时或许犯了错误，特工们多年来都不能确定吉甘特真实的精神状况和他在家族里的角色。但纽约各个家族所有黑手党人都知道，政府多年来都认错了人，把托尼·萨勒诺当成了吉诺维斯家族最高领导人。实际上，“钦”吉甘特才是个强大的黑手党家族的教父，他的怪异之举是一种逃避检控的花招，而胖子托尼·萨勒诺只是一个稻草人，被吉甘特用来欺骗调查人员。

很明显，两个老牌聪明汉安吉洛·鲁吉埃诺和约翰·葛提证实了“钦”就是吉诺维斯家族的最高首领。1982年，FBI窃听到他们谈论涉毒被捕者的惩罚问题，而同一年即使像阿方索·达尔科这样的新党徒也受过相关训示。在小阿尔被吸收为卢切斯家族荣誉者的人会议式上，“鸭子”科拉罗告诉他，在老板中间，文森特·吉甘特领导着吉诺维斯家族。

80年代初，“公牛”萨米·格拉瓦诺当时还只是个黑手党的中层领导。他从甘比诺家族的上级那里得知，“钦”是“科萨·诺斯特拉”的一股重要势力，在纽约之外

有着致命的影响力。格拉瓦诺被告知，在一场争夺大西洋城赌博和工会敲诈行业更大份额的集中攻势中，“钦”曾下令谋杀拥有区域权益的费城“科萨·诺斯特拉”老板安吉洛·布鲁诺。几乎就在同时，成为费城家族二老板的菲利普·利奥内蒂（Philip Leonetti）发现，在80年代，为解决一场内部争斗，吉甘特已经授权谋杀了费城另外6名黑手党人。

在波士顿和普罗维登斯活动的新英格兰犯罪集团，即帕特里阿卡帮派，是另一个听令于吉甘特的犯罪家族。当阿尔·达尔科任卢切斯家族代理老板时，吉甘特的密使曾邀请他参加了波士顿黑手党新领导成员的就职仪式。“我们选定了管理机构，”在伊丽莎白街一个面包店里的聚会上，吉诺维斯家族打手吉米·埃达（Jimmy Ida）吹嘘道，“文森特已经确定了人选。”

在爬上教父之位以前，“煤气管”安东尼·卡索对吉甘特那可怕的影响力与地位也有了明确的认识。1986年夏天，就在管理委员会案审判期间，卢切斯家族的上级通知他说，“钦”已经发出了对约翰·葛提的谋杀指令，以报复其刺杀保罗·卡斯特利亚诺。

政府调查人员最终于1986年夏天获悉，吉甘特多年来一直是吉诺维斯家族无可争议的老板，而此时管理委员会检控几乎过去了两年。情报出自一名背叛者之口。因受劳工诈骗和敲诈勒索指控，面临有罪判决和长期监禁的“菲什”文森特·卡法罗开始与政府合作。特工们称，他背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儿子托马斯和一个女朋友免遭起诉。（托马斯·卡法罗声明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拒绝达成认罪协议，并继续充当家族的合伙人。）

卡法罗数十年来一直是胖子托尼·萨勒诺最亲密的心腹知己，他驱散了遮蔽该家族领导层将近10年的迷雾。他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证据，证明“钦”吉甘特多年来都在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生活。“钦”一直装疯卖傻，并竖起萨勒诺这个靶子来掩盖自己在家族里的无限权威。

卡法罗1974年被“转正”吸收为荣誉者，当1981年“眯眼本尼”菲利普·伦巴多明显因身体不佳退出老板之位时，他正在萨勒诺手下效力。几乎就在伦巴托挂冠而去的同时，做过顾问和二老板——从未当过老板——的萨勒诺遭受了打击。对于这一点，卡法罗在FBI的讯问报告里称，“钦”吉甘特接掌了教父权杖。没有发生内部争斗，吉甘特首要举措之一便是“压制”（贬谪）萨勒诺，把他降为最低级打手，让他事实上无权可掌。

呆在其纽约北部的乡下住宅里，从挫折中恢复过来的萨勒诺觉得百无聊赖，便想

重操旧业在市里从事敲诈勒索活动。吉甘特采用了一些伦巴托式的保护策略，他向卡法罗指示：“让托尼回来，你留在他身边，看住他，要确保他不出问题。”萨勒诺被命令重新参加管理委员会会议，一切和伦巴托在位时一样，但要尽可能不向其他家族吐露谁才是吉诺维斯家族真正的老板。“‘钦’希望警察继续高度关注他在上城的住宅，而不是在其老城区的大本营。”卡法罗说道，他利用萨勒诺作诱饵。据卡法罗回忆，吉甘特只参加了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但在与其他犯罪家族聚会之前，“胖子托尼都得就任何可能影响到家族的重大问题与‘钦’商量。”胖子托尼的所有决定都得首先“取得‘钦’的许可，”卡法罗接着说。

在 FBI 相信萨勒诺掌管吉诺维斯家族期间，据卡法罗称，吉甘特于 1982 年批准了两起对联邦调查产生重大影响的谋杀。3 月份，就在受操纵投标和敲诈勒索指控将与吉诺维斯家族成员一起受审的前不久，拥有 2.5 万名会员的木匠协会的主席西奥多·玛利塔斯突然失踪了。检察官相信他被杀害了，因为黑手党害怕他成为政府证人来指证主要被告文森特·迪那波利，而迪那波利是吉诺维斯家族的建筑业控制者。玛利塔斯消失之后，迪那波利谈妥了一份认罪协议获得了轻判。

卡法罗吐露，吉甘特下令实施了第二起轰动一时的谋杀，而执法机构却错误地将该案与对总统罗纳德·里根内阁的首任劳工部长雷蒙德·多诺万（Raymond Donovan）展开的调查联系在一起。1982 年，鉴于有人指控当时在一家建筑公司任经理的多诺万，称他曾与有组织犯罪人物见面并且知道向黑手党人提供酬金的内情，一位联邦特别检察官就此展开了调查。在联邦调查当中，有个首要嫌疑人是“好汉屠夫”佩莱葛瑞诺·马塞利，此人是吉诺维斯家族一个主要在布朗克斯活动的成员，与多诺万原来的建筑公司签有一份数百万美元的运输合同。1982 年 8 月，“好汉屠户”之子奈特·马塞利被吉诺维斯家族徒黑手党人枪杀致死。由于小马塞利在暗中帮助特别检察官莱昂·西尔弗曼（Leon Silverman），这起命案不禁让人感觉到，黑手党是在阻止对多诺万-马塞利的调查。西尔弗曼后来认定，“没有充分可信的证据”支持联邦声称多诺万与黑手党人有勾结或者知道非法酬金的指控。

但奈特·马塞利的被害和因他在联邦调查中从事间谍活动引发了民众的激烈争论，促使布朗克斯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展开调查。该办公室后来指控多诺万、“好汉屠户”马塞利和其他 6 人从一份地铁建造合同中诈取了 740 万美元的不法收益。经过 9 个月的审讯之后，所有被州里提起控告的 8 名被告都被宣判无罪。

布朗克斯的调查以吉诺维斯家族两名打手因奈特·马塞利谋杀案被定罪而告终。卡法罗称，吉甘特批准了这起谋杀，因为小马塞利了解吉诺维斯家族不法行当的底

细，并且已经成了一个告密者。尽管布朗克斯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宣称联邦政府掩盖了多诺万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但卡法罗坚称奈特·马塞利谋杀案与多诺万及特别检察官西尔弗曼的调查无关。卡法罗反驳了地方检察官的说法，称吉诺维斯家族并不知道那个年轻人与特别检察官混在一起，“钦”要除掉他仅仅是因为相信他是个告密者。

卡法罗还向 FBI 吐露了“钦”如何花掉 17.5 万美元使哥哥马里奥 8 年的联邦刑期减去 2 年。马里奥这次是因为高利贷和敲诈勒索被定罪。据卡法罗称，1984 年，为无数黑手党人打过官司的狡猾律师罗伊·柯恩告诉他，减刑 3 年需花 25 万美元，而 2 年则需 17.5 万美元。“钦”选择了 2 年，卡法罗称，他在取得减刑裁决之后将约定的现金交给了柯恩。柯恩何以能操纵减刑？菲什估计这笔钱被“被用作一笔‘贿赂金’或‘酬金’”，但他不知道交给了谁。另有一次，卡法罗声称他通过柯恩的办公室“洗过”一笔 20 万美元的非法赌债。债务人（一名商人）写了一张 20 万美元的支票交给柯恩的事务所作为所谓的律师费，在扣除了一笔服务费之后，柯恩将大部分现款转给了卡法罗和托尼·萨勒诺。卡法罗对柯恩的指证未能使这名律师受到任何刑事控告，1986 年，在卡法罗背叛后不久，他就死去了。

自其政权确立之日起，吉甘特就担心下属那口无遮挡的谈话会充满危险并被日后用来指控他。窃听器、电话窃听、暗中携带窃听器的告密者都无法从他自己口中取得一句令他坠入圈套的罪证之言。为了避免因间接证据被牵连到 RICO 或其他刑事控告当中，吉甘特向吉诺维斯和其他犯罪家族发出了警告，称任何在直接或电话谈话中提及其姓名或绰号者，他都将严惩不贷。高级助手“鸡蛋本尼”曼卡诺、“秃子多姆”坎特里诺和“奎尔特·多姆”西里罗向所有家族传达了这项指令：绝不要在谈话中提及吉甘特之名。吉诺维斯家族的打手提到他时可以指指或摸摸自己的下巴，或用拇指和食指比划成“C”形并说道，“那个人”，“我的姑妈”或“朱莉娅姑妈”。

在一次讨论合作进行建筑业敲诈活动的会议期间，甘比诺家族的“公牛”萨米·格拉瓦诺因提到吉甘特的名字而受到吉诺维斯家族文森特·迪那波利的警告。格拉瓦诺故意戏弄迪那波利，就问起“钦”对一个家族间的问题有何看法。“萨米，”迪那波利严肃地说，“你要是被录音，或者你给这个人招来麻烦，那你就得付出代价。”

1986 年，吉诺维斯家族一名成员无意中听到卢切斯家族打手安东尼·托尔托雷诺（Anthony Tortorello）在问，为什么“钦”对毒品交易如此深恶痛绝，而他本人却正从自己人的走私中大捞好处。狂怒的吉甘特派遣顾问路易丝·博比·吗哪（Louis

Bobby Manna) 面见卢切斯家族首领，要求将托尔托雷诺杀掉。时任卢切斯家族二老板的“煤气管”卡索承认托尔托雷诺有违禁令，但认为他用处甚大不宜被处决。为安抚吉甘特，卢切斯家族的首领们承诺称，托尔托雷诺会因侮辱“钦”而受到严刑鞭打。为了让吉甘特相信违反其指令者必遭惩处，一场遮人耳目的苦肉计因此得以上演。

FBI的窃听器曾捕捉到科洛博家族的“黑人乔”约瑟夫·戈冈（Joseph “Joe Black” Gorgone）称，吉甘特只是在演戏，并没有疯。后来有密报传到吉甘特的耳中，称FBI已经录下戈冈的话。“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那句话成了法庭上的证据，我就会杀了他。”在传给科洛博家族顾问卡迈恩·塞萨的口信中，吉甘特威胁道。

吉甘特得了冠状动脉疾病倒是没有欺世瞒人。1988年，他接受了一次主动脉瓣更换手术，一个心脏起搏器被装入体内以调节心率。当年夏天，渐渐康复的他接受了约翰·葛提的邀请，准备参加一次简约版的管理委员会会议。经过协商，葛提的人安排了两个老板的首次面对面密谈，会议地点在甘比诺家族角头弗兰克·德阿波利托（Frankie D’Apolito）的兄弟家。甘比诺家族认为这对葛提来说是个安全的地方，可防止吉甘特将会议变成一个伏击他的骗局。他们没有想到，这对“钦”来说甚至更为安全，因为其家人在格林威治村居民区有一套公寓房。

在葛提与卢切斯家族代表维克·阿穆索和“煤气管”卡索赶到之后，吉甘特露面了，身边由其二老板“鸡蛋本尼”曼卡诺陪同。穿着睡衣和长袍的他解释说，因近期做过手术，他正在母亲和其他亲人的家里养伤。为参加这次会议，他只需抬脚走进电梯就行了。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批准科洛博和博南诺家族在管理委员会的席位。吉甘特并不反对饱受内战折磨的科洛博家族重获席位，但他否决了葛提关于允许博南诺家族从流放地返回的提议。他意识到，作为拥有完全投票权的代理老板，博南诺家族的乔·马瑟诺会让葛提稳获5票中的3票，从而让他能够控制住这个黑手党的最高权力机构。马瑟诺是葛提的盟友，一旦吉诺维斯和甘比诺家族之间发生争执，他自然会支持有恩于他的葛提。很有可能，科洛博家族的代表维克·奥瑞拉也会与甘比诺家族站在一起。“钦”可以依靠的就是卢切斯家族老板维克·阿穆索和二老板“煤气管”卡索，他们厌恶葛提，而且还参与过吉甘特的阴谋欲除掉他。“钦”不会冒险将两张仆从票交给葛提而放弃对管理委员会的控制。

另一个议题是补充各个家族的人手。“钦”抱怨卢切斯家族最近未征求他的意见

就吸收了11名荣誉者。而且，他反对其中一个候选人，并嘲笑此人是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因为他曾帮助警方逮捕了一个行凶抢劫的路贼。“他不再是个问题了，”“煤气管”插嘴说，“我们已经杀了他。”

甘比诺和吉诺维斯家族是全国最大的两个黑手党犯罪集团，最强盛时每个家族都约有400名打手，但它们现在的人数都降了许多。考虑到人员匮乏的现状，葛提力劝吉甘特补充40人来增强家族的实力。“公牛”萨米·格拉瓦诺知道，葛提是准备挖吉甘特的老底并赢得吉诺维斯家族新进人员的忠心。他会告诉他们，是他帮他们实现了加入“科萨·诺斯特拉”的夙愿。

“钦”识破了葛提的诡计，据萨米称，他三言两语地否定了这个提议。“为什么我得让你去关心他们？如果他们跟着我，你还会关心他们，应该不会吧？感谢你的关照，时机成熟时我会办那些事情。”

对于“科萨·诺斯特拉”老板如何生存的问题，格拉瓦诺对“钦”的一句话印象颇深。吉甘特声称，他从自己的生意当中就取得了足够的财富，他不会逼迫行动队交出它们的大部分收益。“公牛”萨米·格拉瓦诺认为，这是个在家族里笼络人心的聪明之举，况且行动队上交的利润已很丰厚——每年超过1亿美元。

在散会之前，吉甘特谈起了自己的心脏手术，并且敞开睡衣上部让人看其胸部的大伤疤。离开房子时，葛提对格拉瓦诺说，把他们首次会议的地点安排在他居住的楼内，吉甘特是多么“聪明”和警惕啊。“他像狐狸一样狡猾，这个家伙。”葛提恨恨地说道。

这是吉甘特和葛提的唯一一次会面。有个棘手的问题并未提上会议议程，即因受阴谋杀害葛提及其弟弟吉恩的联邦指控，吉诺维斯家族新泽西支派有几名成员被定罪。

尽管吉甘特没有受到刑事指控，但有人在新泽西被起诉使得黑手党内部悄悄流传着一种说法，即“钦”发出了对葛提的谋杀令。在他们的管理委员会会议举行之前，吉甘特曾试图遮掩这个问题。通过一个抚慰葛提的口信，“钦”向他郑重宣告，新泽西黑手党人，包括他的顾问博比·吗哪，都是背着他搞阴谋活动的“叛徒”。

吉甘特的解释是个十足的谎言，葛提并未轻易相信。但要与吉甘特及其帮派较量，葛提仍显得谨慎。听了葛提被窃听的谈话，甘比诺小组负责人布鲁斯·莫尔感觉葛提害怕与“钦”对质。“我们听见约翰贬斥每一个人。他把科洛博家族的人称为‘柬埔寨人’。维克·阿穆索和‘煤气管’被奚落成‘跳梁小丑’。他甚至嘲讽其好友马瑟诺。但他从来没有骂过‘钦’，一次也没有。谈到他时，他总是带着深深的

敬意。”

葛提未能察觉到吉甘特的敌意有多么强烈。他从来不知道“钦”曾与甘比诺家族的两名叛变角头吉米·布朗·费拉和丹尼·马里诺密谋杀掉他，并借此成为左右甘比诺家族政治格局的人。为报复其盟友保罗·卡斯特利亚诺被杀，吉甘特曾对亲信说，“得有人付出代价。”尽管未能除掉葛提，但“钦”让其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们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其中有三人被杀害。他授权谋杀了葛提的首任二老板弗兰克·德西科、甘比诺家族的角头埃迪·利诺（在斯帕克斯牛排屋外枪杀卡斯特利亚诺的杀手之一）和葛提的司机兼保镖“博比”巴托洛莫·博瑞利（Bartolomeo “Bobby” Borrelli）。卢切斯家族的“煤气管”卡索在一次采访中称，他帮助策划了这三次“袭击”。

得知其上城的别墅已遭 FBI 监视，且管理委员会案已经显示出政府电子窃听的威力，“钦”隔离自己的念头更加强了。与此同时，他竭力充实其精神不健全的医疗记录。以接受其私人精神病医师“器质性脑损伤痴呆症”的治疗为名，吉甘特更加频繁地留在西切斯特县医院的心理健康诊所。在二十多年里，以“调理”为名，他曾 28 次登记住进了这个他最中意的诊所。他当然知道，要把他不人道地从精神病房拖去受审会让 FBI 很难堪。

在吉诺维斯家族内部，吉甘特养成了保持警觉和注意隐蔽的习性。他规定荣誉者在被吸收进来之前要经历更长的考验期或学徒期，并指示角头和打手尽可能长时间地对其他家族隐瞒未来打手的身份。他认为，保守秘密可以防止调查人员从线人那里查清吉诺维斯家族新的和可能容易动摇的党徒。万一发生暴力对抗事件，让其他家族对新打手们无从察觉也会隐藏吉甘维斯家族的真正实力。在另一项指示当中，吉甘特提醒角头们要保持低姿态，要避免在公共场合被发现与他在一起，所有信息都经由两名可靠的助手奎尔特·多姆·西里罗和“鸡蛋本尼”曼卡诺来传递。

吉诺维斯家族教父与基层角头和打手的主要联络人是奎尔特·多姆，他在家族里被称为“信使”。西里罗是吉甘特的大捞钱人，管理着“钦”的高利贷银行。奎尔特·多姆长期以来一直追随吉甘特，他们的交情可追溯至 40 年代末，当时他们都是俱乐部的拳击手。西里罗的职业拳击生涯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作为一名次中量级拳击手，在 20 岁时黯然退出拳坛之前，他被击昏而输掉三场比赛，另有一场勉强取得平局。调查人员指望通过西里罗找到吉甘特，但发现他总是很老练地溜掉了。离开其布朗克斯的家后，他驱车驶上一条高速公路，然后在高速行驶时突然刹车靠边，让跟踪的尾巴飞驰而过。在曼哈顿，奎尔特·多姆有无数条逃跑路线。“他会进入有多个出

口的办公楼或饭店，然后从其中一个出口冲出来甩掉我们。”FBI 主管约翰·普里查德说道。

在“钦”执政之前，新泽西行动队的招摇几近于厚颜无耻，他们以黑手党传统的拥抱和亲吻来彼此打招呼。新泽西有组织犯罪部门官员罗伯特·布奇诺不久就注意到，在“钦”的铁腕统治下，吉诺维斯家族的警觉性日益提高。打手们不再在公共场所热情洋溢地彼此问候，他们变得更加警惕，并采取了异常的举措来挫败监视。不过有时候，该帮派虽然使尽浑身解数却仍然难免失手。FBI 曾发现有支新泽西行动队在霍波肯市一家饭店的洗手间里聚会并对它进行了窃听。吉诺维斯家族打手“剑手”廷诺·菲尔马拉（Tino “the Blade” Fiumara）是个在新泽西码头活动的重要敲诈者，他想出了一个摆脱跟踪的办法曾屡屡奏效。布奇诺的调查人员最终看穿了菲尔马拉的诡计：在赶往会议地点的途中，他会蜷缩在汽车的地板上或后备箱里逃避追踪。

费城家族的二老板菲尔·莱昂内蒂（Phil Leonetti）是个公认的黑手党人才鉴定专家，他高度赞扬了吉甘特的领导层。莱昂内蒂为人凶残和狂暴，人称“疯子菲尔”，是被监禁的费城老板尼古德默·斯卡弗（Nicodemo Scarfo）的侄子和被保护人，在受到敲诈勒索和谋杀罪指控之后，于1989年变节成了政府证人。在接受特工的讯问时，他将“钦”吉甘特领导的帮派描述成“美国最成熟、最警觉、最诡秘和最强大的‘科萨·诺斯特拉’家族。”

第 49 章 “钦” 的数百万财富

“毫无疑问，他是我见过的最狡猾、最有心计的黑手党人，似乎没有办法能够捕捉他。”

1988 年，在一个参议院委员会面前，“菲什”卡法罗讲了一堂黑手党经济学 101 速成班课程，阐释了吉诺维斯家族如何繁荣起来的历程。“我的家族从赌博和彩票生意上捞了许多钱。我们虽然从赌博上赚到钱，但我们真正的影响力，我们的力量，来自于工会。就这一点来说，有了工会的支持，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就能使这个城市或者国家按照我们的意志停工。”

卡法罗所言非虚。80 年代中期政府的反黑手党打击行动镇压了胖子托尼·萨勒诺、“种马”马蒂·扬列诺，并摧毁了他们的数个建筑与敲诈勒索行当。不过，吉诺维斯家族的黑手党产业实际上未受打击。财富依旧从赌博和高利贷行业中滚滚而来，而该家族最珍视的“金矿”——劳工诈骗——也是日出斗金。

通过与腐败的工会官员签定秘密协议，“钦”吉甘特的行动队可以捞取源源不断的酬金，还能谋得高收入的“挂名”职位。这个犯罪家族还从寡廉鲜耻的四大行业（富尔顿鱼市场、会议与贸易展、垃圾清运和码头服务业）管理协会那里得到心甘情愿的帮助。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拖车隆隆地驶在下曼哈顿的鹅卵石路面上，工人们抓着一个个覆盖着冰块柳条筐，不停地将鲜鱼送进这个全国最大的海鲜批发销售中心——富尔顿鱼市场。自 1833 年运营以来，这个市场一直激发着人们的创作灵感，许多精彩的故事都围绕勤劳而坚韧的商人和劳动者展开，讲述了他们如何为了向纽约地区提供每一种海鲜、河鲜产品而从半夜到黎明辛苦地忙碌在东河岸边。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主要靠冷酷无情且经验丰富的角头“萨克斯”约瑟夫·兰扎，黑手党在这个市场里站稳了脚跟。兰扎组织了一个海产品工人协会，并因狂殴市场里拒绝向其支付会费的批发商与供应商而博得了“萨克斯”（Socks：含“猛击”之意）的绰号。50年后，吉诺维斯家族主要通过兰扎组织的工会实施控制，在这个年交易额达10亿美元的市场里仍是看不见的主宰力量。

每周有五天，一百多家货运公司和五十多个批发商会将容易腐烂的海产品运进纽约。为了保鲜，它们必须尽快卸装货物。黑手党强大的控制力就源于货物进出市场的这个环节。只有6家被称为“卸货行”的公司获得吉诺维斯家族的授权，可以将满载着值钱的海产品从东海岸码头和养鱼场赶来的冷藏车上卸下来。在这个市属土地上的市场里，这些自行成立的卸货公司没有取得市政许可证，却可以在黑手党的准许下开展生意。它们赋予自己专有的市场领地权为卡车卸货，为卸货车辆指定先后顺序，为自己的服务定价，因此货物并非按照“先到先卸”的原则处理。为了立即送到批发商的摊位上，尽管只有数英尺之遥，但供货商或货运公司仍不得不贿赂卸货公司，否则海产品就会留在人行道上，眼看着变质直至一钱不值。

市场里还有类似的被称为“装货行”的无证公司取得吉诺维斯家族的许可，承揽了批发商发货给客户的所有售后运输服务。只有少数几家受黑手党优待的装货公司才被允许用手推车将货物送到几百个客户停在一旁的货车或卡车上。这些客户基本上都是餐馆老板和给零售店供货的供应商。在销售或采购鱼或其他海产品的经营者当中，没有谁能拥有挑选卸货工或装货工、讨价还价和选择停车位的机会。

在这个州里法律不能及的地方，黑手党的存在及其多疑文化在胁迫着诚实的商人和工人，让他们不敢与调查人员合作或作证。偶有不满现状的反抗者会发现，自己的车辆被人恶意破坏，自己的轮胎被人割开，而他本人会遭遇暴力或碰到更严重的问题。既然所有卖主和客户都顺从于这共同的境况，市场只需将增加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便是。

在半个多世纪里，时有时无的调查会暂时将黑手党人，如萨克斯·兰扎及其数名继任者，扫除出去。但吉诺维斯家族很容易就可以物色到接替者来继续它的盘剥事业。市政府负责向贸易商发放执照并在市场里监视其经营活动的官员私下承认，对执行监管任务的文职公务员来说，那里的环境太危险也太复杂。虽然少数几个批发商和供应商有胆量公开控诉，但实际上市政府还是决定让黑手党从中渔利，只要餐馆和零售店里能取得大量的海鲜供应就行了。

“钦”吉甘特任命“罗斯”罗萨里奥·甘吉（Rosario “Ross” Gangi）和阿方索·

马拉冈（Alphonse Malangone）这两名角头来控制市场并向领导层输送利润。这两个角头和吉诺维斯家族前任管理者卡迈恩·罗马诺（Carmine Romano）的儿子都在市场里开有海鲜批发公司。甘吉名义上是一家鱼货公司的雇员，而马拉冈则经常在市场里晃荡，让其凶神恶煞的面容为更多人所熟识。他因一只眼患有微疾而总是戴着墨镜，因此博得了“太阳镜阿莱”的绰号。

仅卸货与装货环节每年就让吉诺维斯家族净赚了200万~300万美元的“酬金”（谓之“勒索金”更为恰当）。每年约6800万公斤的鱼和海产品被售出，其销售、薪资和辅助设施金额总计达8亿~10亿美元，而其中很大一部分被黑手党人以在市场的公司里入干股或以防止出现工会问题为名收取“保护费”的方式吸走。市场还是其他重要的“科萨·诺斯特拉”犯罪的重要场所。黑手党人从进场货车上偷盗海产品，还通过赌博和高利贷从一千多名市场雇员身上诈取钱财。

“这个市场是东北地区最棘手的有组织犯罪难题，”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检察官迈克尔·切卡斯基在90年代初评论说，“你拿掉一个家伙，就有一大群不值钱的恶棍在排队接替他。”

1986年，由州里投资的雅各布·K·贾维茨（Jacob K. Javits）会展中心在曼哈顿西区竣工。会展中心以一位美国参议员的名字命名、耗资4.86亿美元，延绵五个街区，玻璃幕墙闪闪发亮，是座时髦的中庭式建筑，承担着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功能。该设施按设计每年可举办80场高端工业贸易展和会议，据认为必定能够创造工作机会，推动旅店、餐馆和交通产业的发展，并为市和州里带来数十亿美元的销售与房客税收。

这座设施给吉诺维家族带来的机会让规划者们始料不及。从开幕日那天起，“钦”吉甘特的臣仆们就将这耸入云天的75米高的“水晶宫”变成了一个黑手党人和有犯罪前科者的职业介绍所和一个掠夺的竞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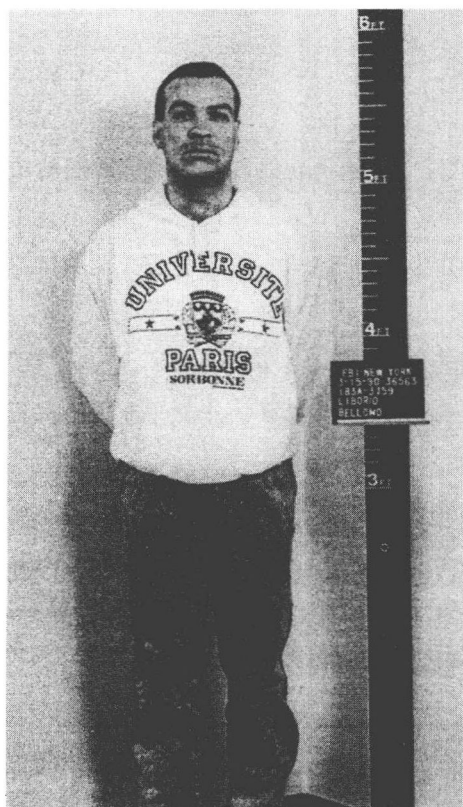
这种滥用从业者的现状有赖于吉诺维斯犯罪家族对木匠协会的控制。通过与中心签订集体劳资协议，该协会获得了挑选100名木匠到中心工作的独享权利。这些安装或拆卸展品的工作都是美差，享受着工会规定的最高工资，且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吉诺维斯家族通过对工会领导人施加影响可在中心指定首席工人代表——分配木匠到哪里务工的官员。

工人代表的首要监察职能是确保集体劳资协议被用人单位切实履行。在吉诺维斯家族的计划当中，派驻中心的工人代表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他们被用于盘剥参

展的制造与组装公司。这是黑手党屡试不爽的一种方法，即除非通过工人代表交纳酬金，否则这些公司就会受到怠工或停工的威胁。工人代表还有对违犯工会协议之举视而不见以换取贿赂的能量。作为贿赂者，展品制作公司得到的是“双乳哺乳”的照顾，即可以雇用非工会工人和被“允许”以低于时薪标准付酬。这些不法行为可让公司避交工会所要求的养老金和福利基金，从而增加公司的利润。

通过工人代表诈取的酬金大约有一半都转给了吉诺维斯家族管理层。可以理解的是，由工人代表挑选的所有木匠都非常赞同这种腐败交易。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家族的荣誉者或合伙人，还有许多人都有犯罪前科。他们由于某种原因受到优待而获得了贾维茨中心的工作，而其他 2.5 万名工会木匠却没有这种机会。

首批工人代表中有两人没有多少木工经验，却经由工会最高领导人批准后获得职位——年底薪为 10 万美元。拉尔夫·科普拉（Ralph Coppola）就是其中者之一，他是吉诺维斯家族的打手，也是一个服过刑的纵火犯。其继任者是安东尼·菲奥里诺（Anthony Fiorino），此人是“巴尼”利博里奥·贝洛莫的妹夫，贝洛莫为吉诺维斯家族曾接替胖子托尼·萨勒诺担任过东哈莱姆和布朗克斯行动队负责人的角头。被任命



吉甘特被监禁时，“巴尼”利博瑞奥·贝洛莫成为街头老板；其敲诈勒索罪的刑期结束时，他将是角逐吉诺维斯家族下任教父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联邦调查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为木匠协会的工人代表之前，菲奥里诺一直是个珠宝商。他尚可称道的成就是赢过几场职业板手球比赛。

盛传吉诺维斯家族在制造敲诈勒索事件和工会问题，贾维茨中心的贸易展和会议业务在其早年十分萧条。当时全国每年投入大型会议和贸易博览会的费用为730亿美元，贾维茨管理方原指望能吸引其中的7%~10%。实际上，它只吸引了2%，因而其经营出现了亏空，一年就损失约100万美元的营运成本。

除了高报酬的挂名职位和工会敲诈外，吉诺维斯家族的聪明汉在会展中心还有其他捞钱机会。从1986~1991年，每年在贸易展和会议上失窃的商品与设备的价值在50万~100万之间。几乎所有能够移动的展品都有可能被盗。在一次视力产品贸易展上，一个装有525个人工眼的密封袋子被人抢走，这起盗窃案或许能证明展品被盗防不胜防。对“钦”吉甘特的犯罪家族来说，雅各布·K·贾维茨会议中心总体上讲的确是个令人惬意的犯罪与腐败的游乐场。

垃圾向来是个棘手的事情，纽约市处理它的费用变得越来越浩大。1957年，为大幅削减成本，该市采取了一项激进措施：停止从办公楼、工厂、饭店、医院和所有无关民居的企业（包括最大的高档百货公司到最小的夫妻糖果店）清运垃圾。其目的是要减少公共卫生局的预算，使其职能仅限于居民区的垃圾收集。所有商业性的清运工作均实行私有化，由经市里批准和管理的公司进行运作。市政府天真地以为，私营垃圾清运商的工作会更有效率，其成本会比公共卫生局更低。

不到10年，吉诺维斯和甘比诺家族就成了这次改革的赢家。就在卢切斯和甘比诺家族在长岛操纵同业协会和卡车司机协会组织一个垃圾清运卡特尔的时候，吉诺维斯家族与甘比诺家族也在纽约的五个区联手干着同样的事情。通过控制卡车司机813分会和管理小组，这些家族能够在整个垃圾清运业中制定行规和发号施令。黑手党人决定清运公司能够保留或发展那些被称为“清运站”的服务对象，还决定其服务收费的价格。

在纽约市开展业务的资质条件由两个受吉诺维斯和甘比诺家族控制的全市性行业与区属协会（即废纸协会和纽约市暨郊区商业性垃圾清运公司协会）来商定。协会有权就拖运路线的划分、“清运站”的彼此转让和定价进行裁决，任何独行其是而胆敢挑战其裁决的垃圾清运公司都将面对卡车司机工会的刁难、暴力的威胁和设备的破坏。协会有一条非法却不得违抗的垄断性规定，即清运公司不得与其他会员竞争同一个服务对象。所有高利润“清运站”的投标与价格都受到非法操控。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纽约市约有300家公司从事垃圾清运业务，其“清运站”达25万个，每年收取的垃圾费超过10亿美元。行业成本一般很难降低，垃圾清运商——协会和拖运者所确认的公司只享有一次选择“清运站”的机会。这种充满弊端的做法造成了垃圾处理的低效率与混乱，有十几个清运公司会同时在曼哈顿中城区的同一个街区施工。

尽管纽约对垃圾清运商来说是全国最令人眼红的肥肉，但有实力的全国性公司都敬而远之，不愿与黑手党角力。1992年全国第二大垃圾清运企业伯朗宁-弗累斯实业公司（Browning-Ferris Industries）开始在纽约冒险开拓业务，不久它就接到了赤裸裸的警告。一天早晨醒来，该公司的纽约营销主管在自己家的草坪上发现了一个狗头。狗嘴里塞着一张条子：“欢迎来到纽约。”

“我们知道，那是黑手党的一种传统方式的警告，意思是不得插足纽约市场。”伯朗宁-弗累斯公司高管菲利普·安吉尔（Philip Angell）如此说道，同时誓言公司将决不屈服于“科萨·诺斯特拉”的威胁。

尽管媒体和调查人员都宣称垃圾清运行业暴力横行且服务质量差，但市政府仍未能顶住垃圾清运行业协会的游说与政治压力进行实质性改革。

吉诺维斯家族的代理人在废纸协会的领导层里占据主导地位，而那个协会的办公地点就在曼哈顿老城区运河大街，那里是文森特·埃斯波西托（“钦”与奥林匹娅·埃斯波西托所生之子）与父亲的司机兼保镖维托·帕尔米里活动的根据地。“钦”的这个儿子还被安吉洛·庞特（Angelo Ponte）所雇用，而后者是一个大型垃圾清运公司和老城区一家高档饭店“庞特之家”的老板，同时也是垃圾清运行业协会的重要成员。

多面手“太阳镜”阿莱·马拉冈，即吉诺维斯家族派驻富尔顿鱼市场的那个令人生畏的角头，还负责管理家族的垃圾清运行业。通过其肯斯县垃圾行业协会“理事”的职位，他行使着其大量的管理权。

甘比诺家族与马拉冈角色相当的人物是角头吉米·布朗·菲尔拉（Jimmy Brown Failla），此人是黑手党的政界元老，自50年代末以来一直是商业性垃圾清运公司协会的决策者。每个星期二的中午，如时钟般准时的菲尔拉就会带着新做的意大利点心来到协会办公室。周二的奶油甜馅煎饼卷座谈会是专为垃圾清运商们安排的，这些人要么是碰上了麻烦，要么是寻求菲尔拉的首肯以达成各种协议和操纵“清运站”投标。

在80年代后期，私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和一些市民组织的研究报告就指出，这

两个犯罪家族通过抬高要价分享了非常可观的利润。研究发现，纽约的私营垃圾清运费用高居全国榜首，比芝加哥、波士顿和洛杉矶多出一倍。一个杂货店或熟食店正常的垃圾费支出一年达到1.5万美元；快餐店为3.6万美元；而一个普通饭店是5万美元。先驱广场的梅西百货需支付约50万美元，一幢摩天办公大楼要交纳100万美元，而公用事业公司——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的缴费则高达200万美元。

由于平均费用抬高了约40%，垃圾清运卡特尔每年的收费最高可达15亿美元。当调查审计师们最终见到那同业协会的账簿时，他们发现吉诺维斯和甘比诺家族及其主要垃圾收集伙伴们每年至少多搜刮了60万美元。利用市政府疏于监管，通过谎报从许多大楼与商店清运的垃圾重量，受黑手党控制的公司每年骗取了几十万美元的不义之财。

在扮演《教父》中那仁慈的老板唐·科里昂很久之前，马龙·白兰度就在好莱坞另一部黑手党题材的电影里担任过主角。在1954年的电影《码头风云》当中，白兰度饰演了一个反抗工会敲诈者的码头硬汉特里·马洛伊（Terry Malloy）。这部电影对黑手党人的阴险、严酷的工作条件和纽约港霍波肯码头的腐败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是一场抵制黑手党染指ILA（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浪潮的组成部分。在50年代的一次清查整治当中，一个代表两个州的码头委员会得以成立。它有权对纽约—新泽西码头上的工人和公司进行管理和资格审查，并禁止有严重犯罪记录的前科犯在码头上工作。

码头委员会结束了“码头临时工”时代，在以往的用工模式中，工人没有稳定的工作，但不得不每天到场，而且为了能够被人雇用，通常还得将部分收入交给ILA码头搬运工头。自30年代以来，吉诺维斯和甘比诺犯罪家族就在码头上坐庄分肥，而其不义之财主要来自工人的贿赂金和靠敲诈得手的工会福利与救济基金。甘比诺家族控制了布鲁克林和斯塔藤岛的ILA分会，曼哈顿和新泽西码头则是吉诺维斯家族的势力范围。

码头临时工的废除迫使两大家族转换策略，工人不再是其主要欺诈对象，港口里那海量的装卸和航运业务成了它们新的目标。60年代，集装箱化运输彻底改变了海运业的面貌，使航运公司更容易受到“科萨·诺斯特拉”的侵害。不再是一帮多达30人的码头工人一件件地卸下“零担”货物，装在大型集装箱里的货物现在都被起重机从船上吊上吊下。这种现代化的系统使海运业主要集中在新泽西州纽华克港和邻近的伊丽莎白港，而这个地区属于吉诺维斯家族的“殖民地”ILA1804-1分会的管辖

范围。

新的货物处理系统需要码头附近有维修集装箱的公司出现。很快，吉诺维斯和甘比诺家族就控制了一个同业组织“大都会海运业维修承包商协会”（METRO），这个协会代表二十多家公司就全行业的事务与 ILA 展开协商。当地的 ILA 分会与 METRO 协会的高层管理职位均由吉诺维斯家族成员所占据。控制了工会和 METRO 协会，港口区的新泽西一方就处在该家族的掌控之中。为取得优惠的工会合同和免于额外雇工（强制性雇用不必要的人员），维修公司不得不承受敲诈勒索。在工会方面，具有黑手党背景的顾问们被授予了大量合同，就利用工会会员数亿美元的福利基金进行投资提出建议。这些合同的酬金经过漂白后成了吉诺维斯家族大佬们的个人福利。

70 年代末期，因在东海岸港口从事敲诈勒索与贿赂腐败活动，经 FBI 调查之后，117 名 ILA 官员、商人和吉诺维斯与甘比诺家族数名打手被定罪。然而，在纽华克和伊丽莎白港口，时断时续的压力未能撼动吉诺维斯家族对 1804-1 分会和 METRO 协会的控制。在谈论吉诺维斯家族在港口里的成功时，新泽西总检察长办公室有组织犯罪部门副主管罗伯特·布奇诺感叹吉甘特帮派是个难以对付的敌人。“这些年来，我们都在试图渗透到他们中间去，但总是被赶了出来。”1989 年，布奇诺曾承认吉诺维斯家族是该州势力最为强大的犯罪家族。

在 1988 年的管理委员会会议上，约翰·葛提因为儿子开始了“科萨·诺斯特拉”生涯而洋洋得意，但“钦”吉甘特当场给他泼了一头冷水。虽然“钦”的长子安德鲁·吉甘特不是荣誉者，但“钦”并没有反对他享受其家族在港口事业上的成功。安德鲁是享受“挂名”赏赐的主要例子，他在两家 METRO 公司拥有经理职位，年薪共计 34 万美元，并且他还是新泽西一家集装箱维修公司和迈阿密一家船运公司的股东。在吉诺维斯家族内部，精明的角头和打手们知道，“钦”反对其子正式投入“科萨·诺斯特拉”的怀抱，但他们还是发现了其父子关系的另一面：安德鲁是“钦”的代理人，在纽华克和伊丽莎白港口守护着其政权的重要利益。

随着 80 年代的过去，消息灵通的 FBI 和司法部黑手党专家们不得不承认，他们一直被吉甘特那古怪的行为所蒙蔽，错把别人当成了吉诺维斯家族的老板。“吉诺维斯家族和其他有着畅通报告渠道的家族不同，”FBI 小组主管唐纳德·理查兹发现，并称“钦”让 FBI 摸不清真实情况的策略奏效了，“根据监视结果和线人的报告，我们以为萨勒诺就是老板。结果却出乎我们最初的意料，“钦”是个权力更大的家伙。”

管理委员会案将胖子托尼列为教父，取得该案审判胜利的首席检察官迈克尔·切尔托夫援引审判证据称，萨勒诺参加过管理委员会会议，并“受到老板一样的对待与

尊敬。”切尔托夫勉强承认说，吉甘特和萨勒诺也许应该被视为同等地位的人，“萨勒诺是董事长，而‘钦’是总裁。”

FBI 纽约有组织犯罪部门主管吉姆·科斯勒并不认为萨勒诺的有罪判决和指证他是家族最高首领有失公正。“即使是个幌子，可根据法律，无论从哪一点来看他都是个老板，他拍板定案、调解争端，参加所有管理委员会会议。你无法否认，胖子托尼的确在充当着家族老板的角色。”

1986 年“菲什”卡法罗的背叛和其稍后的证词驱散了笼罩在其家族领导层之上的迷雾，最终让吉甘特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得以曝光。背叛之后，卡法罗暗中携带窃听器达一年之久，但他仍无法接近“钦”，更不用说与他交谈。卡法罗的间谍工作让检察官们攻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毒品走私案。但从总体上看，他没有对其家族造成严重损害，也没有搞到 FBI 最想得到的东西——证明吉甘特卷入罪案的力证。与其他犯罪家族的首领不一样，靠窃听器或电话窃听难以让诡计多端的“钦”吉甘特落入圈套。在其超机密的核心圈子之外，没有人能获准接近他或博取他的信任。而且，似乎有一批绝不会出卖他的打手和合伙人在死心塌地追随着他。

约翰·普里查德，后来在市和州执法部门谋得高职的 FBI 吉诺维斯家族小组主管，叹服于吉甘特的逃避本领。“毫无疑问，他是我见过的最狡猾、最有心计的黑手党人，似乎没有办法能够捕捉他。”

第 50 章 “我知道尸体埋在哪儿”

“放她一马。我能给你相当不错的情报。我知道尸体埋在哪儿。”

舒适地躺在床上，女友如猫咪般地偎依在身边，博比·法伦高（Bobby Farenga）感到很安全。几天前，靠售出 500 克可卡因，他有了 2 万美元的存款。作为中间人，他有可靠的进货商为他供货，未来的毒品生意肯定会顺风顺水。时睡时醒之际，他听到其布鲁克林寓所的前门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开门——FBI——你被捕了！博比。”一个刺耳的声音命令道。在他缓过神来，或者说一只脚踏上地板之前，房间就被撞开了，一群持枪的人闯进了他的卧室。博比（“巴克利”（Barclay）是其教名，因有自抬身价之嫌，他在自己的圈子里从未用过它）因那 500 克的毒品交易被逮捕。这是 FBI 精心设下的圈套，他遇饵上钩将可卡因卖给了一个扮做买主的秘密特工。

在 1987 年 11 月的夜间实施的这起突袭是 FBI 与纽约警察局联合毒品特遣队的一次常规行动，为遏制毒品如势不可挡的洪流一般涌入纽约市，他们已经进行过几十次类似的抓捕。所有的袭击者都知道，在毒品圈子里，博比·法伦高是个低级喽啰，与大毒枭或有组织犯罪并无密切联系。但他的被捕即将证明老“科萨·诺斯特拉”先知们那先验之言的正确性。针对毒品走私的危险，他们曾发出警告称，面临长期监禁的毒品贩子将成为告密者并给所有人带来危险，包括老板。

博比·法伦高甚至从未见过“钦”文森特·吉甘特，一位让 FBI 陷入困境的像谜一样的黑手党人。然而，就是他那不起眼的落网将把 FBI 引上一条通向吉诺维斯家族教父的曲折之路。

法伦高那极普通的单身公寓位于湾脊区，带领由特工与侦探组成的 8 人小组闯进其公寓的是联合毒品特遣队的 FBI 主管刘易斯·希利罗（Lewis Schiliro）。希利罗从

法学院毕业后直接进入 FBI，被同事称赞为“智多星”的他能够抓住刑事法规中难于发现的细微之处，还能想出办法不伤一人地将重罪犯缴械捕获。大多数特工都害怕被派往纽约，但希利罗在长岛长大，熟悉当地环境，便主动请缨到纽约两个最危险的机构，即毒品与有组织犯罪部门工作。他侦破复杂案件的能力很快得到认可，不到三年就成为调查小组的主管。在那刻板僵化的官僚机构里，对一个资历甚浅的新手来说，这是个令人钦佩的成就。（退休之前，希利罗已升任 FBI 纽约分局局长）

希利罗外表沉静而内敛，厌弃繁文缛节的管理工作，只要有可能，他就会走上街头，跟踪嫌疑人，询问证人和捕捉“狗杂种”（坏人）。希利罗喜欢侦探工作，对追捕罪犯和毒贩的行动尤感兴趣，他形容自己的工作就“像在百老汇拥有最好的座位看演出”。他身材瘦削，戴着眼镜，惹人注目地蓄着垂须，与特工那令人敬畏的冷酷而刚毅的大众形象迥然不同。但在 80 年代中期，作为带队特工和主管，他曾领导一个 FBI 调查小组摧毁了西西里人的海洛因走私网络“比萨大亨”，当时，它是美国受西西里黑手党控制的最大的毒品走私团伙。

逮捕博比·法伦高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之下是个更大的牵涉约 20 名海洛因与可卡因毒贩的调查行动。有个充当中间人的告密者出卖了法伦高并将他介绍给花 2 万美元购买其毒品的秘密特工，当时博比喜不自胜地将 500 克可卡因卖给了那个特工。通过电话窃听获取了指控法伦高的充足证据之后，希利罗决定逮捕他并取得了进入其房间的搜查证。在刘易斯·希利罗的名单当中，法伦高是个不甚重要的角色——“与我们正在调查的其他目标相比，他还算不上大鱼。”但可能性总归是有的，他或许知道毒品圈子里一些大毒枭的情况，搜查他的家或许能找到追踪其他毒贩的线索。35 岁的希利罗摒弃了拳脚的连环猛击和激烈的枪战，将毒品突袭演化成高超的艺术。他更喜欢在午夜刚过之后实施突袭，这时的嫌疑人最为松懈，在睡梦突遭惊扰的迷茫之际来不及抛弃藏匿的毒品，也不太可能反抗，却容易脱口说出罪证之言。

在法伦高的寓所，突袭者使上了他们惯用的破门招数，在以官方身份大声发出开门警告的同时，将一个特制的液压破门器楔进门框与锁头之间。不出 5 秒钟，门锁突然崩断。室内，年近 40 岁的博比·法伦高一脸困惑，凸出的大肚皮露在内衣裤之外。被戴上手铐时，特工宣读了其“米兰达”权利。突袭者搜查了这个单卧室公寓，在博比女友一侧的床头柜上发现一把装有子弹的 25 口径手枪。希利罗以持有枪支为名下令将那个女人逮捕。给她上手铐时，法伦高的大脑开始清醒起来，并意识到那个留着别致胡须的特工指挥了这场突袭。听过对他的指控之后，法伦高要求到另一个房间与希利罗单独讲话。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贩卖 500 克 K 粉会判多长时间。“20 到 25 年。”

希利罗告诉他。联邦毒品法是严厉的，即使对初犯者亦是如此。

“让她走，”法伦高低声说。“放她一马。我能给你相当不错的情报。我知道尸体埋在哪儿。”咒骂了一两声之后，希利罗警告法伦高说，如果想救自己和女友，他的情报必须有价值而且准确。“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否则你会招来更大麻烦。”

法伦高称，他可以连夜带他们赶到布鲁克林区威廉斯堡，那里有处房子藏有两具尸体。令希利罗吃惊的是，法伦高当时还说了一句：他们是黑手党的受害者。“如果让她走，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无需多言，希利罗让法伦高赶紧穿上裤子。约20分钟后，博比与逮捕者驱车跑完10英里的路程来到了布鲁克林区的另一端。

在斯科特大道旁一个脏乱的工业区里，法伦高带人进入一栋砖混平房仓库，并在一个装车台前的坡道上停了下来。“你们在这里可以找到‘矮子’，他的脚对着仓库。”法伦高自信地说。取出后备箱里的两个大锤，特工和侦探们开始猛砸混凝土地面，但收效甚微。他们需要援助。凌晨3点钟，警察局专司营救与人质任务的应急勤务队带着由发电机供电的大探照灯赶到了现场，他们用手提电钻钻地，用反铲挖土机在坡道上挖出了大坑。在地表以下1米左右的深度，挖掘者们挖出了骨头——但那是鸡骨头而非人骨。这个发现让法伦高颇为兴奋。“埋他的时候，我们吃了一顿炸鸡外卖，肯定有人把骨头扔进了坑里，”博比给希利罗打气说，“就是这个地方。”聪明汉们显然饶有兴味地挖掘了这个墓穴。

又挖了不到半米深，“矮子”汤米·斯佩罗（Tommy “Shorty” Spero）的尸体出现了，这个科洛博家族的黑手党人被塞在睡袋里。随后在一个塑料袋中发现了第二具尸体，这是吉诺维斯家族合伙人理查德·斯卡瑟拉（Richard Scarcella）的遗体。第二具尸体正在法伦高所说的位置：仓库内一个小便池下。“每次小便时，我们都说撒到了理查的头上。”法伦高得意地告诉希利罗说。

尽管已经身陷麻烦之中，但随着暗夜的消逝和他那藏尸的情报得到确认，法伦高却变得越发轻松甚至快乐起来。当天午夜接到当地警察部门的传唤，仓库主人就带着他的律师，一个身穿红色夜礼服足踏高跟鞋的漂亮女人，赶到了现场。与色迷迷的警察周旋时，那个律师讲话结结巴巴，一再被法伦高纠正。“谢谢你，你是个真正的绅士。”她说道。“不，女士，我是个罪犯。”他俏皮地回答。仓库老板没有被逗乐。他最近才购置这处产业，而现在FBI特工和探员们就在询问他两具尸体的事情。讯问是例行公事的——他没有理由担惊受怕。法伦高已经将这处建筑前主人的情况告诉了希利罗，此人与这两个人的被害干系甚深。

两具尸体已经被掘出。坐回仓库外的车里后，法伦高大略地供述了与命案有关的

情况，希利罗听得急切而投入。法伦高揭露了这两起以前尚不为人知的黑手党谋杀案，并指出它们均由吉诺维斯家族的同一个杀手队所为。他还打开大门带领特工们走向另一个更引人兴趣的新发现。他透露了一些外围情况，称四大“科萨·诺斯特拉”家族正在进行一场涉案金额达数百万美元的诈骗与操纵投标活动。逮捕一个不起眼的毒贩，FBI居然意外地碰到两个扑朔迷离的案子。尽管博比·法伦高与吉诺维斯家族并无密切关系，但希利罗知道，比起他的毒品特遣队，他的这个犯人对有组织犯罪小组更为有用。卢切斯小组已经搞到了一些与多家族建筑阴谋有关的些许线索，希利罗便通知了侦办该案的特工理查德·鲁道夫。很快，鲁道夫就会同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查尔斯·罗斯和格雷戈里·奥康耐尔开始讯问博比·法伦高。（检察官罗斯和奥康耐尔还参与过“煤气管”卡索案的审理。）

这两起谋杀案的背景很容易弄清楚。从70年代中期起，法伦高就伙同吉诺维斯家族打手“格里”杰勒德·帕帕（Gerard “Gerry” Pappa）和与他同属家族合伙人的彼特·萨维诺（Peter Savino）一起贩卖毒品。这些年来，他帮助帕帕杀死了五名受害者。帕帕实施谋杀，法伦高和萨维诺则充当帮凶或帮助处理尸体。威廉斯堡仓库里的两具死尸被埋在那里的时候，萨维诺正是那处建筑的主人。

理查德·斯卡瑟拉于1978年被杀。斯卡瑟拉是个砖石建筑行业的承包商，也是吉诺维斯家族的合伙人。在为家族要员“芬泽”弗兰克·蒂尔里（Frank “Funzi” Tieri）修缮房层时，他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向蒂尔里索要建筑材料费。蒂尔里指派帕帕“狠狠教训”斯卡瑟拉，因为他胆敢向一个黑手党贵族索要钱财实属大不敬之罪。这并不是谋杀指令，但斯卡瑟拉是个凶恶残暴之徒，由于担心暴打他会招来报复，帕帕就决定杀死目标以绝后患。

仓库里的第二个受害者是“矮子”斯佩罗，此人是科洛博家族已失踪7年的角头。斯佩罗在布鲁克林一带敲诈和抢劫毒贩，分得毒品商那50万美元的谋杀酬金之后，帕帕、法伦高和萨维诺便依约杀掉了斯佩罗和他的兄弟。将尸体埋在仓库里是萨维诺的主意，当时的建筑工程尚未完工，新浇灌的混凝土地平将不留痕迹地掩藏被害者的尸首。

博比·法伦高的情报是可靠的，这些命案可以“告破”结案。但杀手和主谋格里·帕帕已在7年前被霰弹枪打成了碎片。对理查德·鲁道夫和检察官们来说，让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法伦高所吐露的黑手党多家族联合操纵投标的阴谋。有传言称，黑手党正从与负责大面积公寓房建造与维修工程的机构——纽约市住房管理局签订的承包

合同中榨取数百万资金。现在，他的供述为特工们所听到的传言增添了实质性内容。法伦高知道这个阴谋的大概情况，但不能具体说清楚其来龙去脉。在彼特·萨维诺开办的一家构成这一骗局重要部分的窗户生产公司里，他也注入过资金，但一直处在阴谋的边缘地带，其了解的情况主要是萨维诺告诉他的。几年前，萨维诺抛弃了他，不再让他做犯罪与生意的搭档。博比的老本行是毒品走私而不是生产窗户，他那有关住房管理局诈骗的情报既不准确而且过时。但他知道在四大家族的撑腰下，萨维诺策划出一个绝对有把握的计划，即通过操纵投标取得住房管理局的窗户安装工程。检察官们立即给这个骗局起代号为“窗户案”，而侦破该案的关键人物便是黑手党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奇才彼特·萨维诺。

萨维诺并非典型的崇拜者，早年与聪明汉并无联系。他父母属中产阶级，观念传统、家境殷实、性情耿直。他没有黑手党亲戚，没有人用“荣誉社团”的德行故事来影响他。他在布鲁克林区本森赫斯特长大，一向是个好学生。从天主教教会学校毕业后，他读过一年大学，后来便进入家族产业开始在父亲的金属加工厂工作。当时是60年代中期，正是纽约黑手党的黄金时代。20岁且头脑灵活的萨维诺发现，黑手党人通过控制工会将其爪子伸进了多个建筑行业。580分会也受黑手党的控制，其官员通过私下签订合同收取系统性的回扣，该分会代表着在大型住宅与商业建设工地施工的窗户安装工和建筑与装饰钢铁工人。

萨维斯身高1.83米，头发乌亮，皮肤黝黑，长相俊朗，有着天生的好人缘，每个碰到他的人都能对他心生好感。他认准挣大钱的最快捷的办法是贿赂580分会的工人代表及其黑手党朋友。

为工会做事之后，萨维斯与其少年时的伙伴博比·法伦高和格里·帕帕斯混在一起，这两个人已成长为黑手党犯罪家族求功心切的新成员。帕帕加入了“荷兰佬”安东尼·图佐（Anthony “Dutchie” Tuzzo）的行动队，耳濡目染地掌握了黑帮暴徒迅速攫取钱财的招数。帕帕愉快地接纳了萨维斯，让他成了其黑社会的帮手，并向他传授了毒品走私的基本技巧。他们还巧设秘密通道从南方各州走私数千箱香烟进入高税收的纽约地区，每盒香烟给他们带来了50美分的利润。然而，萨维诺在新泽西进行的一次交易露出了马脚，并于1973年被FBI逮捕，罪名是跨州走私和涉嫌联邦偷漏税。纽瓦克办事处一名特工提议撤销最严厉的指控，并依据较轻的罪行对萨维斯缓期处刑——如果他成为告密者的话。对萨维诺来说，这是个相当合算的妥协方案。他躲过了一场有罪判决，条件是为纽瓦克FBI办事处充当14年的“C.I.”（秘密线人）。然而，他没有向FBI提供多少关于其同伙或者他真正在干些什么的情报。“我从来没

有主动提供过情报，”他后来就那段时间的表现作证说，“被他们召去时我才回答一些问题，但重要的信息我从来不说。”

萨维诺有很多情报可能告诉 FBI，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与黑手党的合作关系正使他富足起来。当时，他还偶尔参与谋杀。除了掩埋在其威廉斯堡厂房里两个人外，他还作为帮凶随同格里·帕帕参与了另外 4 起谋杀，其犯案总数达 6 起，比博比·法伦高多出一起。通过帕帕，他结识了卢切斯家族的头面人物“煤气管”卡索和维克·阿穆索，并通过投资他们从拉丁美洲输入大麻和安眠酮的生意赚了几十万美元。

萨维诺还利用与 580 分会的腐败关系赚得钵满盆满，该分会允许他以极优惠的工会条件经营窗户生产与安装公司。为回报其出手大方的贿赂，这个分会允许他降低工资并在福利和医疗津贴上欺骗工人，这使他独具了一项竞争优势。萨维诺一直在寻找更大和更容易到手的财富。70 年代后期，他在一个由联邦政府新投资的新项目中发现了可以大发横财的机会。为节约取暖用油，政府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开始对在公寓住宅区安装双层隔热窗玻璃的项目给予补贴。纽约住房管理局有 90 万个窗子可以更换，预计每年可节省 500 万美元的取暖费用。这是个千载难逢的窃取财富的机会，萨维诺在帕帕的帮助下力劝吉诺维斯家族领导层，称一个卡特尔通过操纵投标可以获取巨额利润。这几乎就是混凝土俱乐部的翻版，在黑手党前管理委员会的操纵下，那个俱乐部成功地运作了数十年。

窗户安装项目于 1978 年开始。为获取更大的利润份额，萨维诺开办了两家公司，即谷芒窗户公司和美国铝金属公司。由于卢切斯家族控制着窗户工人工会——580 分会，这个家族自然得吸收进来。既然科洛博和甘比诺家族在数家窗户企业中持有秘密股份，它们也得参加进来。包括萨维诺的公司在内，共有 13 家具有黑手党背景的企业将瓜分这项工程，它们自己决定将由谁递交最低的“有竞争力的”假报价，以此大幅抬高所有的合同价格。与正常竞争所产生的合理利润相比，黑手党人的预期利润增加了 1~2 倍。除了黑手党控制的通过抬高造价牟取暴利的公司外，非黑手党的公司也可以加入这个同业公会，但它们每装一个窗户需缴纳 2 美元的会费，而这部分回扣都为四大家族所瓜分。由于住房管理局计划换装近 1 万个窗户，仅靠非黑手党公司的回扣，这些家族就能稳拿一百多万美元的不法收入。

排斥在同业公会之外的承包商则受到恐吓不得参与竞争。卢切斯家族惯施暴力的爪牙索尼·莫里西，580 分会的一名工人代表，警告其他公司若通过正常途径从住房管理局拿到工程将面临严重后果。莫里西以工程停工威胁它们，并称它们所安装的每一个窗户将被砸烂，它们的工厂也将被摧毁。他的警告和其工会的能量受到了全行业

的注意。

彼特·萨维诺不是荣誉者，但他与吉诺维斯家族的关系看来很可靠，特别是在同业公会成立的1978年格里·帕帕被吸收为打手之后更是如此。已涉足高利贷行当的帕帕在萨维诺的两家窗户公司里都拥有股份，更为重要的是，他是萨维斯与吉诺维斯家族领导层沟通的联络人。1980年7月，未接到任何危险警讯的帕帕被人用霰弹枪杀死，这显然是一起黑手党仇杀，与科洛博家族的“矮子”斯佩罗被杀有着直接关系。斯佩罗失踪之后，也就是在其尸体在仓库里被发现很久以前，科洛博家族就怀疑帕帕因经济纠纷杀了他。萨维诺心惊胆战地紧张了两个月，担心自己作为帕帕的同伙会不会是下一个谋杀对象。9月份的一个下午，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让他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立即赶到小意大利格兰德大街的鲁吉埃诺之家饭店。这是他第一次被传唤与不知来头的黑手党人见面。一个念头吞噬了他：他就要被送上不归之路，而试图逃跑也将无济于事。

鲁吉埃诺之家的老板是吉诺维斯家族的打手乔·齐托（Joe Zito）。在齐托的陪同下，萨维诺走进二楼的一间密室。围桌而坐的是黑手党头面人物胖子托尼·萨勒诺、芬泽·蒂尔里和“钦”吉甘特，众保镖则侍立在一旁。萨维诺无法掩饰自己的恐惧，神经已绷到极点的他不停地擦拭脸上渗出的道道冷汗。完啦！他相信，因为卷入毒品交易和帮助格里帕·帕杀死了“矮子”斯佩罗，这些吉诺维斯家族的大腕们就要对他执行可怕的死刑了。

“冷静些，”吉甘特大声说，“你没有什么麻烦。只要告诉我们真相就行。”

吉甘特是主要发问者。首先，他想知道帕帕行动队的代理角头是否拿走了死者的所有资产，主要是其高利贷款项。当萨维诺证实这种情况时，他对“钦”当时的反应感到意外。吉甘特厌恶地朝地板吐了一口痰，然后喃喃自问：“这些是新规矩么？我们从窗户和孤儿那里拿钱？”

“钦”接着对他说，他怀疑帕帕是因为谋杀“矮子”斯佩罗而被人寻仇枪杀。他不仅没有得到杀人许可，而且杀的是其他家族的角头——一个受保护的黑手党人。萨维诺没有主动说出自己帮忙把斯佩罗的尸体掩埋在混凝土地平之下，也未透露他因为谋杀“矮子”而得到毒贩们的酬金。

既然帕帕已经走了，当着萨维诺的面，这三个首脑人物——他还不能确定他们的地位等级——公开讨论了他们中间将由谁来管理他。“我来管他。”吉甘特做出决定。“钦”的第一道命令就让萨维诺大出血：他得付给卢切斯家族的“煤气管”卡索和维克·阿穆索100万美元。当时，这两个卢切斯家族未来的独裁者还只是角头，他们曾

交给帕帕 50 万美元作为“资本”来扩张萨维诺的那些窗户公司。他们打算利用住房管理局骗局和萨维诺的其他半合法窗户企业捞一把。但萨维诺觉得“煤气管”和维克缺乏商业意识，而且作为生意伙伴太爱管闲事，于是他和帕帕便解除了与他们达成的协议。“煤气管”便向“钦”控诉，要求吉诺维斯家族连本带利返还 100 万美元（含 50 万美元的投资利润），因为预付款已经交给了其家族的打手帕帕。根据黑手党的荣誉准则，吉诺维斯家族要对帕帕的契约负责，即便他已经不在人世。“钦”吩咐萨维诺以家族名义拿出 100 万美元，他就得遵命保证凑足这笔钱，尽管帕帕早将那 50 万美元据为己有。作为家族里一个地位低贱的合伙人，一个统治阶级的奴仆，萨维诺无权抱怨或抗议他做出的决定。

让萨维诺离开之前，吉甘特指示他随时与“鸡蛋”本尼·曼卡诺联系，将所有和其他家族达成的关于窗户合同的安排与决定向他报告。曼卡诺将是彼特联络“钦”的主要管道，所有与黑手党事业有关的信息均由他来传递。彼特每周必须到其格林威治村汤普逊街的俱乐部里向他汇报 3~4 次。“钦”还允许他拜访其至圣之所，也就是他本人的老巢“三角市民促进会”。

这次饭店会面让萨维诺破费了 100 万美元，但能活着走出来已令他倍感欣慰。

“钦”和曼卡诺的俱乐部根据实际需要都对萨维诺敞开着。他是个大捞钱人，帕帕死去之后，吉诺维斯家族需要利用他的才干继续从窗户工程中牟取暴利。从一开始，“鸡蛋”本尼就将吉诺维斯家族的规矩告诉了萨维诺。在谈话中绝不许提及吉甘特的名字，如果他不得不提到他，曼卡诺警告萨维诺说，“指着自己的下巴，然后说‘这个人’。”还有一个可以用的称呼是“我的姑妈”。曼卡诺和“秃子”多姆·坎特里诺特别强调，当有不明来历者问及吉甘特的精神状况时，他应回答说，“文森特疯了。”

萨维诺发现，吉甘特在三角俱乐部里经常穿着睡衣和浴袍，与“鸡蛋”本尼和“秃子”多姆或打打牌或低声聊聊私密话题。他看见吉甘特沿着街边步履艰难地行走，同时嘴里不停地咕哝着，还看见他在沙利文大街上停下来，站在人行道上不管不顾地撒起尿来。萨维诺知道，吉甘特的行为“是个伪装，是个笑柄”。

渐渐地，“钦”对萨维诺亲热起来，但向来警觉的他绝不谈及住房管理局窗户骗局的具体细节。萨维诺发现他能够侃侃而谈，即使是在穿着睡衣的时候。一天下午在三角俱乐部，吉甘特把他带进洗手间，拧开水龙头，然后小声问他家族或者工会里是否有人从他身上榨取额外的报酬，是否有人强迫他免费给自己家安装窗子。当萨维诺向他保证无人逼迫他时，吉甘特回道，“好嘛，我就是想知道是不是有人在欺负你。”

示意萨维诺随他走出俱乐部，吉甘特使了个眼色，说道，“你知道吧，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说我精神不正常，我的情况很糟糕。”萨维诺点点头，竭力忍住不笑出来或者表现得窘迫。他意识到，吉甘特在他面前不遮掩自己的古怪花招就是在抬举他。

吉甘特越来越看重萨维诺，会不时地邀请他到鲁吉埃诺之家的密室里用餐。有一次，饭店老板乔·齐托开始埋怨起萨维诺的穿戴。“你穿得太随意了，”齐托评论道，“我得改掉你的穿衣风格，把你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抓起一把手柄上别致地雕着一个鸭头的雨伞，吉甘特朝着齐托的脑门上砸去，同时严厉地喝道，“对我来说，他穿得够好了。”

1980年至1987年期间，吉甘特无数次面见萨维诺，并将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妻子与情妇。“钦”不允许家族里其他任何人接受萨维诺的无偿服务，但同意他为自己老泰潘镇的家及其东区情妇的别墅更换窗子。与吉甘特的孩子们见过几次面后，萨维诺向“秃子”多姆问起他那些儿子的职业。“文森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卷入这种生活。”坎特里诺说道，便不再多言。

萨维诺已陷入了“这种生活”，这种让人担惊受怕的生活。一天凌晨3点钟，他在家被“秃子”多姆打来的电话吵醒。“马上到这里来！”坎特里诺吼道，“我回不来了！”萨维诺闪出一个念头。不知道犯了什么弥天大错的萨维诺将所有急用钱和珠宝留给了妻子。看那阵势他似乎马上就要被黑手党杀害。没有人陪着他离开家，他要在黎明前赶到格林威治村一个破落的街区去见坎特里诺，而且没有任何人能见证他的失踪。在沙利文大街，坎特里诺一言不发地领着萨维诺来到三角俱乐部附近一个理发店的背后，吉甘特手里拿着一张男装商品目录表正在那里等着他。指着慢跑服一栏，“钦”问萨维诺，“能给我红、蓝、绿各买一件吗？”

心里长吁一口气，萨维诺记得曾将一份邮购目录册交给了坎特里诺，并告诉他可以为“钦”买到他需要的东西。“不是给我买。是给我的孩子，”吉甘特说道，并将小册子交给了萨维诺，“你可以走了。”驱车回到家的萨维诺将这件事琢磨了几个小时，他估计这深夜命令他赶过去应该是一次考验。“钦”在试探他是否在任何时候都能绝对服从和绝对可靠，而这是一名荣誉者所必备的素质。

第 51 章 穷途末路

“你有 24 小时的考虑时间，要么同意合作帮助我们，要么走向监狱。”

“要让一切，所有的一切都看起来光明正大。一切都要显得合理合法……要保持警惕，我们绝不想无端地露出破绽被人抓住。”

“我们已搞到很多，我们需要你作为证人——活着。”

“钦”吉甘特对付 FBI 的第一道防线是假装精神失常。他还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认为在深夜能够安全地进行黑社会活动。彼特·萨维诺通过“秃子”多姆·坎特里诺得知，他们的上司固执地认为 FBI 特工不会在午夜之后工作。吉甘特相信，在黎明前的那几个小时里，他不会受到 FBI 的监视。

萨维诺已经习惯了深夜被传唤到三角俱乐部去。在另一次针对其忠诚度的考验当中，吉甘特问他能否“接近”——谋杀的委婉说法——一个人，因为此人杀了吉诺维斯家族一名打手的儿子。目标是个住在附近的熟人，萨维诺感到为难，但要忤逆“钦”的旨意将是愚蠢的。“干掉他！”吉甘特命令道。让萨维诺松了一口气的是，在他执行任务之前，这个命将不保的人被宣判有罪并遭监禁。

尽管偶尔会出现令人心惊肉跳的时刻，但彼特·萨维诺还是对他与吉甘特的关系很满意，对住房管理局的舞弊合同给他带来的可靠利润也很知足。他那同业公会的策略得到完美运用，让他能够买一辆栗色的劳斯莱斯和一辆“美洲虎”，还能从布鲁克林的湾脊搬进斯塔藤岛更高档的豪宅里去。他的经济前景光明，为完成凭着其商业头脑和依附黑手党取得的合同订单，其布鲁克林的新工厂正在开足马力运转。得来容易的钱激起了他猎取女色的欲望，尽管已明媒正娶过三个老婆，但他还包养了许多情人。他前两次婚姻均以离婚告终，前两个妻子给他留下了五个孩子。40 岁时，萨维诺

那曾经健壮的体形变得臃肿起来。在体重达到 136 公斤时，他接受了吸脂手术，而不是通过锻炼和节食减肥。他的教育（在南方一所大学求学一年）与早年的生活经历让他与身边的黑手党人有所不同。他们觉得他怪怪的，因为他阅读书籍与杂志。更让他们不解的是，他喜欢收藏老电影《陈查理》（Charlie Chan）。那是三四十年代的一部系列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聪明的中国侦探的故事。

到了 1987 年，萨维诺已经放弃了贩卖毒品的危险生意。他在黑社会巨额融资方面远远超过了博比·法伦高，于是他就切断了与这个并不可靠的前合伙人的一切联系。但正是这个法伦高领着 FBI 找上了门，FBI 找他问过头但没有逮捕他，萨维诺得知了博比已经把他出卖的可怕消息。政府在他原来的威廉斯堡仓库里挖出了两具尸体，而法伦高已告发他参与了 5 起谋杀，数十起毒品交易和住房管理局那个巨大的窗户诈骗阴谋。

由于牵连到吉诺维斯、甘比诺、科洛博和卢切斯家族的头头脑脑，在雄心勃勃的检察官和特工们看来，所有迹象都表明窗户案调查将是一个成就功名的审判。查尔斯·罗斯、格雷戈里·奥康耐尔和侦查该案的带队特工迪克·鲁道夫已开始为一场黑手党多家族审判做准备。围绕黑手党新霸主们，调查行动赫然像管理委员会审判一样将对“科萨·诺斯特拉”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尽管只是个合伙人，但萨维诺是吉诺维斯家族的智囊人物，并最有可能成为审判黑手党的核心证人。他的作用极为重要，因为他与四大家族的黑手党人都有直接联系，对每个犯罪家族和无耻的工会领导人具体榨取了多少酬金都非常清楚。而且萨维诺的供述中将有一个更让人感兴趣的东西。那个将他收罗在门下，经常与他见面并且至少保护了他 7 年的黑帮大佬就是行事极为诡秘的文森特·吉甘特。

鲁道夫和检察官们只需稍施压力就让萨维诺放弃抵抗，坦白交待了他所知道的与吉甘特和其他黑手党人有关的所有情况。最初，罗斯单独与萨维诺在一家小餐馆里见面，喝过咖啡之后就向他传达了最后通牒：“你有 24 小时的考虑时间，要么同意合作帮助我们，要么走向监狱。”第二天夜里，在昆士区一个汽车旅馆里，萨维诺与罗斯及特工再次见面听取了检察官和 FBI 提出的条件。仅仅供认自己的罪行不足以获得从轻判决，政府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他犯下 6 宗谋杀罪和参与了涉案金额达数百万美元的诈骗案。要立案起诉参与窗户诈骗案的重要黑手党人，检察官们除了萨维诺的证词外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仅凭萨维诺这个公认的阴谋者、投机商和谋杀帮凶的话尚不足以对他们提起检控，更不用说有罪判决。重要证据只能通过萨维诺的间谍活动取得。鲁道夫和检察官希望他携带窃听器尽可能多地秘密录下投标操纵者，特别是“钦”吉

甘特的罪证之言。

这对萨维诺来说是个危险的任务，一旦聪明汉发现其窃听器就必死无疑。FBI不可能全天候保护他，但极度渴望轻判的彼特·萨维诺还是同意了这些条件。否则，以这44岁的年纪，再被监禁至少20年，生活对他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博比·法伦高被捕和仓库发现尸体的消息已被吉诺维斯家族获知。指控萨维诺的罪名一直未公布，为消除他被执法部门控制的嫌疑，检察官和特工想法泄露了假情报。鲁道夫通知萨维诺的律师，称想找彼特谈谈仓库的那两具尸体。据萨维诺称，这个律师在与吉诺维斯家族合作，会将FBI关注萨维诺的情报传给该家族的领导层。在律师事务所询问萨维诺时，鲁道夫明确告诉那个律师，彼特不是任何罪案的嫌疑人。这位特工放出烟幕称，FBI只想通过萨维诺了解威廉斯堡仓库的建设和使用者的情况。鲁道夫的问候将萨维诺描绘成一个无辜的受骗商人，暗示FBI认为谋杀案另有嫌疑人。这种策略似乎奏效了。这个律师向吉诺维斯家族的首领们传递消息称，萨维诺是清白的，他没有透露任何有用的信息。

罗斯和奥康耐尔的计划面临的唯一障碍源于该市两大司法部联邦管辖区的持续竞争。鲁道夫·吉乌里亚利的南区有个检察官得知法伦高被捕，便开始将他当成潜在证人讯问，目的是调查一所高中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存在的腐败行为。担心吉乌里亚利的办公室有可能劫持窗户案并抢走萨维诺，东区的安德鲁·马洛尼便在FIB总部与吉乌里亚利进行了另一次他所谓的对话。“鲁迪知道有个重大的有组织犯罪案件正有了眉目，于是就想伸手夺过去，”与会的奥康耐尔声称，“我们告诉他，法伦高不想与南区合作，吉乌里亚利便在争论中败下阵来。”

萨维诺的协议要求他承认参与了6起谋杀并违犯了RICO法令。他在闭门听证会上供认不讳，根据正常的协议条款和视其在调查当中提供的帮助大小，其最高20年的刑期有可能缩短。

萨维诺的主要管理人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迪克·鲁道夫（Dick Rudolph）。鲁道夫在甘比诺家族昆士区的伯金俱乐部附近长大，对黑手党的习惯相当了解。由于厌倦了无聊的会计师职业，同时又渴望过上较为冒险的生活，他在10年前，也就是其26岁时进入了FBI，并在卢切斯小组度过了大部分时光。现在，鲁道夫的工作是向萨维诺传授情报收集的常规技巧，让他设法取得在法庭上能站得住脚的证据。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针对萨维诺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危险，他们每天都会进行交流。通常，他们会选在夜间在纽约的汽车旅馆或郊外接头。“彼特勇于正视压力，是个有魅力，喜欢交往和谈吐幽默的人，”鲁道夫说，“若是不考虑他所犯下的谋杀和其他罪行，与他

相处还能体味到他那令人愉悦的一面。”

秘密调查始于1988年2月。在布鲁克林湾脊，萨维诺的办公室受到了窃听，黑手党有关窗户承包合同的会议有时会在这里举行。萨维诺最危险的任务是随身携带秘密麦克风出没于黑手党俱乐部、酒店、餐厅和进行走谈而不引起怀疑。令他迷惑的是，聪明汉们从未挡住他“搅拌”搜身过。针对“钦”吉甘特这个终极目标，FBI技术人员设计了一种微型设备，若吉甘特在萨维诺耳边低语就有可能录到他的声音。萨维诺从来未能用窃听器捕捉到他的声音，却录下了几十次与四大家族代表们进行的显示吉甘特与罪案有牵连的谈话。

1988年3月11日，在和曼卡诺商议一份合同时，萨维诺试图把吉甘特在这场阴谋中的作用凸现出来，便说，“文森特说过，如果时机……”曼卡诺打断他的话。“不要提那个人。”萨维诺还想试试，便接着说，“好吧。不提他。不过，他说过要出手竞标的。”他从曼卡诺那里得到的唯一回应是“嗯。”

在帝国大厦前的一次走谈当中，曼卡诺向萨维诺反复强调，必须要伪造档案掩盖诈骗行迹。“要让一切，所有的一切都看起来光明正大。一切都要显得合理合法……要保持警惕，我们绝不想无端地露出破绽被人抓住。”

另有一次，萨维诺向新加入者文森特·里奇多（Vincent Ricciardo），科洛博家族在一家窗户公司拥有小部分股份的执法打手，讲起了操纵投标的基本知识。“比如说明天就有一项投标，那么我们就来抛硬币吧，”萨维诺说道，“这是1万个窗户。好吧，你赢了。现在，你拿到了这个，那下一个就是我的。不管它是什么。”

里奇多特别提到，四大家族会防止所有独行其是的公司拿到合同，它们会安排黑手党控制的工会到工地去纠察。“我们要让工程停工，”他接着说，“就是这么简单。”提到一个不愿意为每个窗户付2美元回扣的承包商时，里奇多说出了他的解决办法。“我会把他扔出窗户。他得承担后果，他得给人交钱。他星期二就得滚出窗户工程。”

在有四大家族荣誉者参加的一次会议上，580分会官员索尼·莫里西，即卢切斯家族的掮客和执法打手，愤怒地宣称，同业公会中有一家不受黑手党控制的公司未经许可竟到一份合同。在莫里西威胁“要砸烂其工程的所有窗户”之后，这家公司退出了竞标到手的工程。作为对该公司老板的惩罚，这些家族决定，在未来所有的承包工程中，他必须为每个窗户向他们纳税14美元。

1989年6月5日，萨维诺在鲁吉埃诺之家饭店向曼卡诺报告称，卢切斯家族的“煤气管”卡索和甘比诺家族的彼特·葛提想从承包工程中取得更大份额。曼卡诺纠正萨维诺，警告他要记住窗户生意主要属于吉诺维斯家族。“这全是我们的，不准任

何人碰它。”曼卡诺坚定地说道。

这是他与曼卡诺及其他黑手党人最后一次面对面的接触。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与甘比诺和卢切斯家族头目们的交往比他料想的更为凶险。1987年11月在仓库发现尸体后，甘比诺家族的“公牛”萨米·格拉瓦诺就警告曼卡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杀死萨维诺，不要让他有任何机会出卖他们。“萨米，”鸡蛋本尼回道，“我自己也看他看不顺眼，但“钦”在乎他，我们不是不想有所动作。”

向来多疑的“煤气管”卡索对仓库疑尸的出现极为警觉，他宣称萨维诺肯定是个告密者，并催促吉甘特除掉他。“浴袍说，‘不行。’”“煤气管”向阿尔·达尔科吐露说，并用私下起的贬损绰号指代吉甘特。（当FBI的窗户案调查于1989年浮出水面之后，卡索毫不犹豫地杀死了家族里一个潜在证人，即合伙人索尼·莫里西，尽管这个工会官员并没有背叛，而且他本人也受到了调查。）

荒谬的是，甘比诺和卢切斯家族大佬们索取萨维诺人头的要求可能反而保护了他。吉甘特自认为是美国黑手党的超级老大，无意于听取对手，特别是令人厌恶的约翰·葛提和“煤气管”卡索的建议。在黑手党上层政治当中，这些人还是资格较浅的新手。这是“钦”的主观判断，家族里无人能找到一丝对萨维诺不利的证据，而且萨维诺每次都完成了他交代的任务。贪欲或许也影响了吉甘特。早些时候，萨维诺替吉诺维斯家族向卢切斯家族偿还了100万美元的债务，而且他还是家族的一个挣钱机器。四大家族的住房管理局舞弊合同的总额超过1.51亿美元。尽管调查人员无法准确给出这起诈骗的涉案金额，但据检察官格雷戈里估算，“数百万美元”落入了吉诺维斯家族的口袋。

1989年春，吉甘特对萨维诺的信心终于动摇了。“煤气管”卡索那潜藏在执法部门内部的间谍报告称，萨维诺的确在为政府刺探情报，卢切斯家族因此切断了与他的一切联系。此前，“鸡蛋”本尼·曼卡诺愤怒地得知萨维诺未告知他就与甘比诺和科洛博家族代表进行会谈。在曼卡诺看来，自行与其他家族议事已是一种出卖行为，而卡索的警告则更是为他敲响了警钟。

FBI也发出了危险信号。1989年6月21日，萨维诺在办公室里接到一个不祥的电话。打电话者拒绝亮出自己的身份，但萨维诺听得出那是布鲁克林一个黑手党党徒的声音。此人声称见到萨维诺与FBI特工在一起，并准备公开这个消息。当天晚上与迪克·鲁道夫讨论这个电话时，萨维诺声称这是个恶作剧，想继续进行刺探活动。这位特工听后深感不安，萨维诺可能暴露了。“他是个无法判定的因素，”谈起那个神秘的来话者，鲁道夫判断道，“即使什么也没看到，他仍有可能通告所有人，称你在和

政府合作。”萨维诺成功地充当了20个月勤劳的告密者，检察官已经取得50个小时被秘密录音的谈话，指控四大家族高级黑手党人的证据看来充分而有力。“我们已搞到很多，我们需要你作为证人——活着。”鲁道夫郑重地说道。

当天晚上，FBI特工驱车将萨维诺送回他那斯塔藤岛的家。收拾了一个行李箱之后，他便跟随特工们离家消失在证人保护项目之中。他的第三任妻子想随他一块走，但终未成行，因为没有得到前夫的许可，她将不能带走他们那年幼的儿子。

先是准许彼特·萨维诺进入其核心圈子，后来在威廉斯堡发现尸体后又替他担保，这是吉甘特犯下的大错。“钦”对萨维诺的信任让他本人及其最亲密的副手们陷入了险境，并且招来了现在也深陷麻烦之中的其他家族怒潮般的敌意。更令人尴尬的是，萨维诺损害了“钦”的名声。“钦”发出了对萨维诺的谋杀令，并异常罕见地向其他家族寻求帮助。与卢切斯家族的阿尔·达尔科一起在小意大利走谈时，吉诺维斯家族新顾问吉米·埃达将一张萨维诺敞胸露怀地站在另一个人旁边的照片交给了他。“阿尔，文森特需要你的帮助，”埃达说道，“我们有理由相信彼特·萨维诺与他的同伙待在夏威夷，我们知道你们有个要找的人也在夏威夷。文森特想杀掉这些家伙。”

受美国法警24小时保护的萨维诺从未被黑手党发现。吉诺维斯家族的聪明汉试图通过电话威胁他的妻子来胁迫他。他们警告称，如果萨维诺出庭作证，她和孩子将面临危险。有一天，她在自己汽车的前排座上发现了一个未点燃引信的莫洛托夫燃烧弹。尽管未被正式纳入证人保护系统当中，但政府还是开始向她及其孩子提供保护。

首席检察官罗斯和奥康耐尔花了11个月的时间精心整理证据。1990年3月，主要依据萨维诺的大陪审团证词及其录音带，“钦”吉甘特和另外四大家族的14名其他黑手党人与合伙人受到了RICO组织罪指控。他们被指控通过操纵75%的窗户承包工程投标掠夺了几千万美金。1978~1989年住房管理局的合同总金额为1.91亿美元，仅他们取得的合同总价就达1.51亿美元。这起诈骗令管理委员会审判最重要的部分——混凝土俱乐部案也大为逊色。尽管黑手党从混凝土合同中明显剽掠了数百万美元，但侦办该案的检察官经过4年调查取证也只能证实其中的120万美元。

3月30日上午，穿着睡衣的吉甘特在沙利文大街其母亲的家里被逮捕，起诉书也于当天被公开。被命令穿好衣服，他顺从地披上一件黑色束带浴袍，随后又穿上鞋子并戴上一顶羊毛帽子。在双手被铐在身后之前，他一言不发地将一张写有弟弟路易斯·吉甘特神父的电话号码的卡片交给了特工。在FBI下曼哈顿的总部被拍照并采集了指纹之后，吉甘特的话开始多了起来。有个特工问起了他大哥帕斯夸里，吉甘特便

受 RICO 指控被捕之后，文森特·吉甘特被提审时穿着他惯常的街头服装：睡衣和浴袍。在法庭听证会上，假装患有精神病的“钦”表现得精神错乱，坚持说他参加了一个婚礼上并要求看看新郎。（联邦调查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掏出一张表示帕齐已经死去的弥撒通知单。“他与上帝在一起。”吉甘特说道。给他采集指纹时，另一名特工与他闲聊起来，问到了他的拳坛生涯和赢了多少回合。“我是个重量级拳手，后来体重下降了，成了一个轻量级的。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我记不清了。”

在接受提审时，“钦”的身边便是其二老板“鸡蛋”本尼·曼卡诺和角头“秃子”多姆·坎特里诺。当天上午被捕的人还有科洛博家族顾问“本尼”本尼迪托·阿洛伊（Benedetto “Benny” Aloï）、甘比诺家族角头彼得·葛提（约翰·葛提的哥哥）和卢切斯家族角头“胖子”皮特·奇奥多。卢切斯家族的两名重要被告“煤气管”卡索和维克·阿穆索缺席，他们在一名内奸侦探对其发出逮捕警告之后立即潜逃了。在法庭上，与其他被告一同坐在陪审席里，吉甘特显出一副精神错乱的样子，不停地咕哝着想知道“婚礼”何时开始。“新娘在哪里？”他多次问道。

吉甘特的律师巴里·斯洛特尼克（Barry Slotnick）声称吉甘特精神失常，无法参与辩护。在家属提供了100万美元的保证金后，他为“钦”赢得了假释。小报媒体大量报道了吉甘特的被捕及其在法庭上的表现。新闻标题将他称为“古怪教父”和“疯狂大佬”。精神病医师递交了吉甘特精神错乱的诊断报告，坚称他思维缺乏连贯性，辩护律师因此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战胜了检方。在裁定其心智健全且具备辩护能力之前，“钦”的案子将与其他被告的案件分开审理。

有萨维诺的证词及其破坏性的录音带作为主要证据，与窗户案有牵连的绝大多数高级黑手党人都被定罪。1991年，经过6个月的审理之后，吉诺维斯家族的本尼·曼卡诺和科洛博家族的本尼·阿洛伊被宣判有罪。“秃子”多姆·坎特里诺在受审前自然死亡。被抓获之后，“煤气管”卡索和维克·阿穆索被处以终身监禁，其刑期部分源于窗户案的指控。唯一被宣判无罪的重要黑手党人是彼特·葛提，其弟弟的律师布鲁斯·卡特勒为他进行了辩护。卡特勒对萨维诺的品格进行了猛烈攻击，称他是个连环杀手，先是靠策划诈骗阴谋渔利，后来为苟全性命又设法诱陷他人。“那个堕落的人，那个肮脏的人，那个劣迹斑斑的人就在这里。”卡特勒依旧以他那疾风暴雨般的风格大声喊道，同时将拳头重重地插在控方席上。没有证据确凿的录音可用来指控葛提，事实上，有份录音带还显示他投资一家窗户公司蒙受了损失。“我现在在这家公司已经两年了，”葛提被听到抱怨说，“我还没收回四分之一（的投资）。”

在“钦”的律师试图证明其精神错乱的过程中，窗户案审判让他们对政府在投标舞弊案中的力量和弱点有了清楚的认识，但对他延期审判无意中帮助检方扩大了指控吉甘特的罪名。正当这场复杂的就其行为能力展开的法律战僵持不下时，三名重要的黑手党人背叛了，每人都持有对“钦”不利的新证据。萨米·格拉瓦诺和阿尔·达尔科准备指证吉甘特是个教父，并供述他与甘比诺和卢切斯家族的关系。达尔科和费城那个变节的二老板菲利普·利奥内蒂将出庭证实他下令实施了6起谋杀和多起未遂谋杀。靠100万美元保释金在外逍遥的吉甘特于1993年6月被重新带回法庭，这个孤单的被告将面临着新的指控。除了窗户诈骗案外，他还被指控犯有更多的严重罪行：吉诺维斯家族的头号首领，授权实施了一系列黑手党谋杀，包括欲取约翰·葛提性命却只杀掉弗兰克·德西科的那起炸弹袭击。

在此期间，被告方的精神病医师诊断吉甘特患有幻觉、精神分裂症，以及可能由阿尔茨海默病或早年在拳击场上造成器质性脑损伤引起的痴呆症。在1996年春天举行的一次趋向性心智健全听证会上，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举出了其他精神病医师诊断吉甘特神志清楚的反证，并出示了萨维诺、格拉瓦诺、达尔科和莱昂内蒂的表明黑手

党头目们都知道“钦”的精神错乱行为系伪装的证词。背叛者们无一例外地指出，如果相信吉甘特精神失常，其他“科萨·诺斯特拉”首领就绝不会认可他的老板地位。

一位联邦法官结束了这场拖延了6年的诉讼案。他裁定吉甘特的精神状况适合受审，并认定他在亲人的帮助下参与一场“处心策划的骗局”来伪装精神疾病。但更多的拖延还在后面。在开庭审判的前夕，吉甘特第二次接受了心内直视手术，即双冠状动脉旁路手术，审判只得延期6个月等待他的康复。最终，在1997年夏天，坐在轮椅上的吉甘特被路易斯神父推进了法庭，审判程序正式开始。吉甘特的家庭心脏病医师每天都赶到现场，每次休庭期间都会检查其病人的血压和健康状况。一个月来，脸色苍白的吉甘特坐在被告席上，双眼茫然地盯着前方。当背叛者们出庭作证，当检察官播放窃听黑手党人的录音证实他是个老板并卷入了牟利阴谋和策划谋杀时，他寂然地蠕动着嘴唇，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好像在打盹儿。吉甘特的声音没有出现在任何一盘录音带上，但政府拥有包括约翰·葛提在内的黑手党人提及“钦”或“文森特”是个老板的录音。“钦”曾威胁杀掉任何提及他名字的人，但此举未能奏效。

历时一个月的审判接近尾声时，检方安排其最惹人注目的证人彼特·萨维诺出庭作证，此举明显是想在陪审团审议开始前向其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收尾力证。10年前为政府充当间谍时，萨维诺精力充沛且不知疲倦，但现在的他看起来倦怠而憔悴，全然不像个五十多岁的人。他在一个秘密的地方通过闭路电视作证，遭受癌症严重摧残的他虚弱得无法行走，只能借助一张轮椅撑直身子。不停地从其瘦骨嶙峋的脸上擦去汗水，他是唯一为直接与“钦”进行犯罪交易提供第一手信息的前合伙人。在安静的法庭里，当他出现在7台电视的屏幕上并回忆吉甘特与他讨论谋杀和诈骗阴谋的情景时，他的话深深地吸引了陪审团成员和旁听者。由于病疼，萨维诺蜷缩了起来，头颅不时地垂到胸口上，身子也费劲地在轮椅上挪动着，他需要休息几次来调整自己。他用犹疑的语调恳求道，“请让我休息下，”接着又说，“我需要休息一分钟，伙计们。”

辩护律师没有传唤任何证人出庭，他们指望交互讯问和庭辩总结能让6名寻求轻判的背叛者和深信吉甘特是个受人尊敬的黑手党霸主的特工丧失可信度。辩护律师反复强调了一个事实，即政府此前已将胖子托尼当成吉诺维斯家族的老板定罪，而现在检方却指证吉甘特在掌管那个家族。这些律师争辩称，如果FBI冤枉了萨勒诺，那么FBI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极度虚弱的被告吉甘特身上犯错也就不足为奇。

一个匿名陪审团（纽约审判黑手党时的一种必须如此的惯例）审议了三天。陪审员们返回法庭时，吉甘特振作了起来，显得比审判期间任何时候都要精神，但当女陪

审团主席宣读裁决时，他转动着眼珠子，显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他被宣判犯下数项最为严重的罪行：担任吉诺维斯家族教父、参与窗户诈骗案、阴谋杀害约翰·葛提及其弟弟吉恩和彼特·萨维诺。他稍感安慰的是，陪审团搁置或者说驳回了他在费城授权实施 4 起黑社会谋杀的指控。

判处他 20 年而非最高 27 年的监禁并处罚金 125 万美元，法官杰克·B·温斯坦 (Jack B. Weinstein) 对“钦”的生涯也曾有所思索。“他是故我的影子——一个经历数十年邪恶的犯罪暴政之后最终在迟暮之年走上穷途末路的老人。”

这位法官错了。监狱的高墙不能遏制这个老人的狡诈或“邪恶的犯罪暴政”。

第 52 章 “钦”最后的炫耀

“我们没完，维托（吉诺维斯）不在，但文森特还在。”
“作为一个黑手党头目，很难理解他靠什么获得乐趣。”
“他唯一感兴趣的似乎是他所运用的绝对权力。”

以 69 岁高龄被监禁之后，“钦”吉甘特继续着他几十年来所做的事情：在监狱里，他依旧是一副精神失常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仍是吉诺维斯家族无可争议的掌舵人。联邦检察官花了 5 年时间才还原其真实权力的本来面目。2002 年，他再次被起诉，罪名是从监狱里控制其犯罪家族。因假装精神错乱，他还受到了妨碍司法公正罪的指控，其以前的刑期因此延长了 7 年。

这次，他的儿子安德鲁，一个富有的集装箱货运经理，成了其共同被告，罪名是充当信使将父亲的重要决策与指示传递给纽约黑手党人。控方宣称，尽管不是荣誉者，但安德鲁在“吉诺维斯家族里是个关键性角色”，在“纽约—新泽西码头是个强有力的代理人。”

从德克萨斯州沃思堡联邦监狱被带到布鲁克林受审时，“钦”又恢复了他那昏沉迷茫的样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当法官问他是否与律师讨论过这些指控和他想怎样认罪时，他语无伦次地说道。

15 个月后，即在 2003 年 4 月，吉甘特的脑损伤、躁狂症、年老糊涂、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精神分裂症都奇迹般地治愈了。在审判首日，他思维清晰，精力旺盛，做了一场令人震惊的自白：为避免继续被检控，他承认 30 年以来在接受精神能力诊断时欺骗了精神病医师。作为对其如实招供和承认犯有妨碍司法公正罪的交换条件，政府放弃了对他的敲诈勒索罪，即在监狱里继续掌控其犯罪家族的指控。另一个潜在的 20 年刑期减为 3 年监禁，且是 3 年接受察看的缓刑。

46岁的安德鲁着装考究，的确具有公司经理的派头。他步父亲后尘接受了一份认罪协议，承认犯有诈骗罪和向一家船运公司勒索了9万美元。他被判处2年监禁（量刑极轻。倘若被证明犯下所有罪状，就有可能被判处20年监禁）并处罚金200万美元。

如果能活着的话，“钦”最快可望在2012年获释，届时他将84岁。

显然，这对父子已经看清并掂量了那些证据的分量，如果在审判中死顶硬撑将势必被压垮。与约翰·葛提父子一样，“钦”和安德鲁在狱中受到视频监控，电话交谈也被录音。检察官们可随时证实“钦”在使用暗语和手势信号让安德鲁向吉诺维斯家族传递信息。

乔治·巴龙（George Barone）是个可靠的证人，急切地想指证“钦”和安德鲁参入了新泽西和迈阿密港口的敲诈勒索活动。这个79岁的老牌黑手党人在码头区活动，有着经久不忘的好记性，是个颇有名气的杀手。因为在码头敲诈勒索被起诉，还因为自己与安德鲁的一桩经济纠纷而上了“钦”的谋杀名单，巴龙宣称放弃信守黑手党的“乌默它”戒律。

另一名将出庭作证的检方证人是“小甜饼”迈克尔·德厄索（Michael Cookie D'Urso），此人是吉诺维斯家族的合伙人，受谋杀指控被捕后背叛了黑手党。两年以来，德厄索在监狱里录下了吉诺维斯家族成员议论“钦”在掌管家族并利用其子作为中间人的谈话。

“不要让任何人对你说我们完蛋了，”角头“秃子”艾伦·朗戈（Alan “Baldy” Longo）在一份录音上说道，“我们没完，维托（吉诺维斯）不在，但文森特还在。”打手帕斯夸里·法塞蒂（Pasquale Falcetti）被听到向德厄索提起他与安德鲁·吉甘特在码头上的不法事业。“无论安德鲁说什么，那都是他的意思，”法塞蒂说道，同时用手摸摸自己的下巴，“谁敢不听？”

吉甘特的认罪令那些诊断其精神分裂症无可救药的精神病医师大出其丑。“钦”17年来的精神病主治医师路易斯·达达摩（Louis D'Adamo）博士在法庭宣誓书里称他“患有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明显具有错觉、幻觉、思维混乱和我们所称的阴性症状的精神疾病。”在1997年吉甘特受审时，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神经心理学学科主任威尔弗雷德·G·万戈普（Wilfred G. van Gorp）称，这位病人在经受“中到重度痴呆症”的折磨，这种疾病“临床表现为具有特定功能的深层神经系统的机能障碍”。2003年，在吉甘特承认装病之后，万戈普得出结论，称他可能既是个精神病患者也是个骗子。“（监狱）录音带上的那个家伙不是我诊察过的那个人。”

（在审判吉甘特和审查其病历档案时，他欺骗政府的另一个伎俩被曝光。对于像他那般身居高位的黑手党人来说虽然是些鸡零狗碎的蝇头小利，但吉甘特与其家人还是利用其精神病诊断的结果为“钦”争取了每月900美元的社保残废救济金。救济金从1990年一直发放到他被监禁时的1997年，这也许是“钦”来得最容易的钱。）

对一个显赫的“科萨·诺斯特拉”教父来说，像普通罪犯那样避重就轻地认罪就是一种尚无 precedents 的投降。“钦”打破传统认罪并议定了一项认罪协议。无论审判结果如何，教父们不得投降并试图从检察官那里寻求宽恕，这些行为会严重挫伤黑手党的士气。约翰·葛提、卡迈恩·珀西科、“鸭子”科拉罗，甚至是有名无实的托尼·萨勒诺都曾顽抗到底。在检察官和调查人员看来，吉甘特的主要动机是再清楚不过的，他在帮助受连累的儿子安德鲁和其他家人。向政府认罪让安德鲁获得宽恕，使他未因敲诈勒索罪被处以长期监禁，尽管这打碎了“钦”那自以为高明的不让子女与黑手党有牵连的形象。他已经将安德鲁推进一种邪恶的行当之中，并通过黑手党的力量让他腰缠万贯，还利用他为中间人来继续控制家族。

吉甘特另一个虚伪之举是宣称自己将近亲属隔离并排除在黑手党的事务之外。2002年，检察官丹尼尔·达斯基（Daniel Dorsky）取得法庭授权调查了吉甘特的病历档案。他指出，他的亲属在其精神状态方面故意误导了精神病医师。认罪协议特别载明，任何为吉甘特的骗局提供帮助的亲人都不得以妨碍司法公正罪被起诉。他的妻子、子女及弟弟路易斯神父免受起诉是吉甘特从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让步条件之一。

“钦”料知狱中生活必多艰辛，狱方当局容许黑手党老板拥有诸多特权并听任黑手党人控制整个监区的时代已经过去。严格的安保措施和对来访者进行严密的电子监视已经挫败了约翰·葛提和卡迈恩·珀西科的企图。在那遥远的监狱里，他们无法就甘比诺和科洛博家族的重大决策口授机宜，也无法利用亲人充当信使。他们试图保有些许控制力的做法最终让自己的儿子也陷入监牢。在政府同样找到了他和安德鲁的证据之前，“钦”通过遥控已经掌管了其家族长达五年。

吉诺维斯家族的命运急转直下，一切都肇始于吉甘特在判断犯罪性质与忠诚度上所犯的唯一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其统治期间，他降低了对新进者彼特·萨维诺的警惕性。在萨维诺原来的仓库里发现两具尸体之后，“钦”对来自其他黑手党人的警告置之不理，并让萨维诺继续参与日常的家族活动，尽管他此前对任何可能危及自己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掉。“萨维诺绝对是“钦”定罪的关键人物，在他之前几乎无物可依，无人可靠。”FBI特工迪克·鲁道夫指出。

负责窗户案检控的检察官格雷戈里·奥康耐尔也称赞了萨维诺，称他在推动吉诺

维斯家族的衰亡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奥康耐尔评论萨维诺是个“富有的，被宠坏了的家伙。他总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为逃避牢狱之灾又会不顾一切。”谈到萨维诺所表现出的勇气时，他的轻蔑又转为钦佩。“每天带着窃听器与残杀告密者的聪明汉们见面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杀害。”

临终之际，萨维诺艰难地完成了协助政府的工作。在癌症晚期那不间断的疼痛当中，他作为主要证人在1997年的审判中指证了吉甘特，并在其55岁生日的6周之后死去。

“钦”首次受到RICO指控并被定罪时，吉诺维斯家族基本上完好无损。这个全国最大的犯罪家族拥有四百多名荣誉者，它的14个行动队几乎和过去数十年一样充满生机。执法分析者们指出，它仍是全国最难攻破的犯罪家族。五年后，吉甘特的遥控统治在凄凉的失败中结束，部分原因是他资格最老和能力最强的副手们已不能在外鼎力相助了。“鸡蛋”本尼曼卡诺被监禁，“秃子”多姆坎特里诺和“钦”的弟弟拉尔夫已经死去，其身为角头的哥哥马里奥因逃税正在服刑，而有可能填补代理老板之位的“奎尔特”多姆·西里罗则因心脏病发作而暂时丧失了主事能力。

“钦”及其资深助手们的离去有助于执法机构对该家族实施渗透和再次将“钦”定罪。有两个行动队被为躲避谋杀阴谋罪而成为告密者的合伙人“小甜饼”迈克尔·德厄索和一个外号为“大弗兰克”的卧底侦探所渗透。凭借他们搜集的证据，2001年和2002年共有六名角头和七十多名打手、崇拜者和合伙人被判刑或被迫认罪。从小意大利到迈阿密码头，他们的犯罪活动扩展到东海岸的许多地方。被捕者的罪名繁多，主要是黑手党的老本行：劳工敲诈、产业勒索、高利贷、非法赌博、黑社会谋杀和抢劫，包括实施一次被挫败的欲从《纽约日报》职工信贷协会窃取200万~600万美元的犯罪阴谋。通过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和市政厅迟到的市场管理整治行动，这个家族另两个重要的经济支柱——私营垃圾收集协会和富尔顿鱼市场——基本上被摧毁。

1997年吉甘特的人狱是执法部门打击吉诺维斯家族取得的一个突破性胜利。没有“钦”的严格监管，这个试图恢复元气的家族很快陷入了失控状态。

2003年被定罪并回到一个设有医务所能治疗其心脏病的惩教机构之后，吉甘特作为一个“疯”教父的统治便告结束。这里他无需胡言乱语地佯装思维错乱，也不用茫然地盯着虚空。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去适应，得举止得体，得善用余下的将主要在远离其故乡纽约的南部和中西部监狱度过的时光。无论是作为普通聪明汉还是教父，

他从未到过夜总会和高档饭店，也从未真正地度过一次假，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其出生地格林威治村的方圆 50 英里以内。“作为一个黑手党头目，很难理解他靠什么获得乐趣，”在分析吉甘特的追求时，纽约州有组织犯罪特遣队原负责人罗纳德·戈德斯塔克说道，“他唯一感兴趣的似乎是他所运用的绝对权力。”

在监狱里，日渐老去的吉甘特仍表现出其黑手党教父的骄傲自大与专断。看守克里斯托弗·塞克斯汀（Christopher Sexton）问及是否有其他犯人烦扰他时，“钦”回道：“没人敢瞎干涉我。”

第 53 章 并无魔力：刑事侦破会计

“我到处寻找新的办法，于是渐渐地它就出现在眼前。它并非突然闪现的锦囊之计，也没有特别神奇的魔力。”

在 FBI 特工中间，杰克·斯塔宾（Jack Stubing）以其不屈不挠的韧劲为人称道。“他既不会为疑难案件所烦忧，也不会对其坐视不管，”他的同事帕特·马歇尔（Pat Marshall）不无钦佩地说，“他更像个看门狗，一旦投入案件调查，没有结果他绝不罢休。”

但在 1998 年，斯塔宾对其当务之急——策划一套对博南诺犯罪家族展开进攻的方案——显得一筹莫展。在纽约郊区长大的他肩膀宽厚，身材适中。和其他 FBI 特工一样，他对博南诺犯罪家族的历史和当前的组织结构所知不多。在 FBI 做过几年普通办事员之后，他在 1984 年成了一名特工。三年后，他开始专门对博南诺家族展开调查，并最终获得了提升成为 FBI 博南诺小组的主管。

斯塔宾的办公室设在下曼哈顿一幢大楼的第 22 层，是个可以为“C-10 小组”（FBI 对“刑事调查第 10 小组”的简写）谋划行动策略的安静之所。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原本用来对嫌疑人和证人进行测谎器测试，其厚厚的墙体将外面的喧哗与嘈杂严严实实地阻隔在斯塔宾的耳膜之外。独处一室，咬着一根牙签，置身于昏暗的灯光之下，听着 CD 机上播放的贝多芬、科普兰和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凡此习惯都有助于这个 45 岁的特工理顺他的思绪——他已经花了好几天时间来研究情报档案和特工们的《302 报告》。他的结论令人沮丧：小组最近取得的成果没有多少价值。

从美国“科萨·诺斯特拉”诞生之日起，博南诺家族就是黑手党 DNA 的基干部分。它的起源与名称可追溯到 1931 年，追溯到城堡战争结束和乔·博南诺荣任老板之时。在博南诺（小报记者蔑称他为“乔疯子”）的统治下，该家族经历了 30 年的繁

荣，直到他玩弄强权手腕反受其害时为止。为成为老板中的老板，他曾经想杀掉其他资深教父，不想阴谋败露而引祸上身。1966年，管理委员会逼他提前引退，让其家族进入了一个长达十多年的混乱动荡的无教父时期。这个犯罪家族的指挥结构极不透明，执法分析者们对其领导层的构成都难有定论。FBI和纽约警察局的高级情报人员曾错误地相信，博南诺家族的重要人物“利诺”卡迈恩·加兰特多年来都在担任老板职务，直到他1979年被枪杀。然而他们完全误判了他的地位和权力，他从来就不是教父，在与真正的老板“拉斯提”菲利普·拉斯泰利进行较量时被处死。

黑手党观察家不久就发现，加兰特被谋杀并没有终结博南诺家族内部的统治权之争。加兰特之死没有换来安宁，而是引发了因1981年的一个惊人发现而激化的雷霆之怒。FBI特工约瑟夫·皮斯通化名“唐尼·布拉斯科”渗透到博南诺家族的一个行动队。他是第一个混入黑手党的特工，在六年多的时间里，皮斯通搜集了许多极为珍贵的与该家族内部结构有关的秘密情报，也获取了大量的导致博南诺家族和与之关系密切的佛罗里达与密尔沃基黑手党帮别数十名人被定罪的罪证。皮斯通的惊人之举激怒了其他家族的大佬们，尽管纽约还没有重要的黑手党成员被立即投入监狱，但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博南诺家族的内乱所带来的危险。结果，该家族被踢出了管理委员会并被限制与其他黑手党人和合伙人合作。

到了1988年，FBI官员们对博南诺家族的能力和日渐式微的力量已不屑一顾，便将博南诺小组作为一个协作单位并入科洛博小组。他们的主要理由是，随着管理委员会案和其他调查行动的结束，这两个家族已经遭到刑事审判的重创和内斗的严重削弱，都陷入了混乱无序和行将灭亡的状态。那时，FBI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三个最大和最令人生畏的“科萨·诺斯特拉”帮派，即甘比诺、吉诺维斯和卢切斯家族身上。

“博南诺家族没有受到我们的密切关注，”斯塔宾回忆道，“甚至其他家族的聪明汉都在嘲笑他们。他们成了让人看不起的笑料。没人把他们当成严重的威胁。”

20世纪90年代，其他家族高层人物的背叛使FBI更加轻视博南诺家族，认为它不过是黑手党宇宙里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行星罢了。萨米·格拉瓦诺和其他名闻一时的背叛者都没有透露多少与博南诺家族有关的情报，因为这个家族已不在黑手党的主流社会之中，它被逐出了管理委员会，被排斥在有利可图的建筑与其他行业的同业联盟之外。

然而，1995年当斯塔宾成为博南诺-科洛博小组的主管时，他感觉风向已经转向了博南诺家族。从他早些时候作为情报特工到处刺探的情况来看，他怀疑这个犯罪家

族正充满生机地发展了起来，它被排斥在与其它家族合作进行的项目之外实际上让它避开了密集的监视和检控。他相信博南诺家族开拓的是些独占的和新兴的领域，故而没有像其他家族那样遭受到大量涌现的家族背叛者的危害。

斯塔宾的游说劝服了 FBI，在八年的间断之后，博南诺小组于 1996 年重新恢复为独立的单位，斯塔宾是其首任主管。但经过两年的监视、奔走和搜寻证据之后，小组里的十来名特工仍未找到博南诺家族可资利用的任何弱点。破坏其他家族的常规手段——电子窃听和设法培养告密者和合作证人——都没有取得成效。斯塔宾未能找出一个有价值的告密者，也未能立案检控博南诺家族首脑人物或重要的角头。

“我们运用了所有能够有效打击‘科萨·诺斯特拉’的传统手段，但这次它们都难以奏效，”斯塔宾说，“我到处寻找新的办法，于是渐渐地它就出现在眼前。它并非突然闪现的锦囊之计，也没有特别神奇的魔力。”

他想出的调查方法从未被用到打击纽约黑手党家族的行动当中。斯塔宾将在一种异于常规的个人财务记录调查，即“刑事账目清查”上碰运气，最终目的是打倒那个处在政府瞄准镜上的对复兴博南诺家族起着关键作用的黑手党人。其小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黑手党新巨头约瑟夫·查尔斯·马瑟诺。

第 54 章 “干得不错，路易”

“快点，我们走！这事终得有个了断，成败在此一举！”

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每个曾经与乔·马瑟诺角智斗谋的特工和检察官都对他那令人敌意尽消的彬彬有礼和精确持久的记忆力印象深刻。和许多黑手党人不同，他从来不会挑衅地朝执法人员咆哮怒骂，哪怕是在被逮捕、审讯和带上法庭时，马瑟诺说话都很温和、沉着镇静，保持着一团和气。他对细节的精确记忆令人敬畏。多年以后特工们问起他时，他仍能回忆起他们的名字，甚至说出被用来跟踪他的无标志车辆的牌照号码。有一次，因为曾摆脱一位特工的跟踪监视，他友好地向那人表示了歉意。马瑟诺的一名代理律师既惊异于他对复杂法律问题的领会能力，也叹服于他重现数周前所谈及的无数话题的记忆力。在黑白两道，他所到之处都能赢得尊重。

昆士区麦斯佩思（Maspeith）是马瑟诺成长并度过大半辈子的地方。那里是个明显落后于时代的蓝领聚居区，满目都是单户或者双户排屋、破败的工厂与仓库和拥挤阻塞的公路，其间还夹杂着一块覆足坟茔的墓地。他父母都是第二代意裔侨民，育有三个男孩，1943年出生的他排行老二。他的母亲操持家务照料孩子，父亲则靠在街头贩卖水果养家糊口。乔在格罗夫·克里夫兰高中读到了高中二年级，辍学后不久就以一个新聪明汉的角色引起了昆士和布鲁克林警方的注意。通过一个少年朋友，即“拉斯提”菲利普·拉斯泰利的侄子，乔巴结上了身为博南诺家族角头的拉斯泰利。麦斯佩思既是拉斯泰利的生活之地，也是他犯罪的大本营。在他亲切地称其为“叔叔”的拉斯泰利的栽培下，充当合伙人和捞钱者的马瑟诺日益成熟起来。到了年近30岁时，在纽约警察局和FBI的情报档案中，马瑟诺已经是个全能的卡车货物强盗、赌注经纪人和高利贷放贷人。他在泊于建筑工地和停车场里的快餐车里经营彩票赌博和高利贷生意。这些被称为“蟑螂车”的餐车既出售三明治、热菜、糕点和软饮料，也是马瑟

诺从事非法赌博和高利贷生意的幌子。

身材魁梧的马瑟诺身高 1.8 米，30 岁刚出头时体重就飙升到 113 公斤。“因吃了太多自己出售的三明治和油炸圈饼，他的体重迅速增加。”最先跟踪这个黑手党人的 FBI 特工之一帕特里克·F·科尔根这样说道。在 FBI 抢劫小组工作的科尔根知道，马瑟诺已成为一个荣誉者，是拉斯泰利的被保护人。到了 70 年代中期，特工推断他已成了纽约的一名抢劫“大亨”，专门打劫酒和咖啡粉。“每当这些案子出现时，我们就知道可能是乔所为。”科尔根特别提到。

20 世纪 70 年代，抢劫犯们在纽约地区每周要实施 5~6 起案情重大的拦路抢劫，这让 FBI 感到十分头痛。马瑟诺的盗劫团伙最招人注意。根据线人的报告，科尔根怀疑马瑟诺至少盗走了价值 200 万美元的柯达胶卷，在半路抢劫了一批送往塞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商店的价值 50 万美元的服装，还抢走了一批 10 万美元的咖啡商品。大多数抢劫的手法大致雷同：挡下汽车，跳上脚踏板，然后用枪抵住司机的脑袋。马瑟诺喜欢用一种更为和平的方法：让运货司机有预谋的“弃货”。“有些司机陷入了高利贷圈套，他们偿还高额利息的唯一办法是与劫匪配合。”科尔根说。

马瑟诺成功的关键是他总有本事找到隐蔽的停车场或仓库作为“卸货点”，在这些地方，被抢货物可以在犯罪形迹暴露之前安然卸下。每次抢劫货物并将其装上小卡车或厢式车运给收赃者和预约的客户后，马瑟诺都会付给其行动队成员 1500~2000 美元的酬劳。当然，卖赃后的大部分收益都落入了他的腰包。

FBI 特工相信，马瑟诺在仓库和货场，特别是在麦斯佩思的工业区里都有内应，并且和拿下整批赃物的收赃者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为了瓜分部分赃物，被同行和 FBI 称为“胖子乔伊”的他还经常充当中间人帮助其他抢匪策划抢劫与销赃。马瑟诺的组织成了一个黑社会销赃货物的清算中心，经过他处理的商品包括龙虾、河虾、空调、电视机和酒水。

凭着自己的专长，马瑟诺与同时代的另一个年轻抢劫犯，甘比诺家族的约翰·葛提，结成了伙伴关系。马瑟诺与妻子及三个女儿搬到霍华德海滨后，他们成了邻居。科尔根称马瑟诺经常帮助葛提解决棘手问题。“乔伊有两个特别的长处：他善于变换地点隐藏赃物，还能提供不易找到的主顾，让其一次就拿走你手里的整批货物。”

尽管 FBI 抢劫小组在密切监视马瑟诺，但要让他束手就擒并不容易。特工们以为在一个塞满被盗物品的仓库里肯定能将他堵住，但当他们从前门冲进去的时候，他已经从后门逃之夭夭了。另有一次，特工们发现马瑟诺的人将被盗的高档男装藏匿在昆士区的科罗纳，每当有顾客来选购折扣衣服时就通过一根绳子将其滑到街对面一家男

子服饰用品店里。“他沉着自信，屡屡成功脱险，”特工乔治·汉纳（George Hanna）承认道，“他狡猾且为人所惧，无人愿意告发他。”

1975年，在一场混乱之后，帕特·科尔根以为必定能擒获滑头的马瑟诺。独自驱车巡逻时，这名特工发现一辆被劫持的卡车满载着服装驶出麦斯佩思一家餐厅外的停车场。正当科尔根准备尾随跟踪时，一辆汽车挡住了他的去路。数分钟后，那辆挡路车朝卡车疾驶而去。科尔根继续追踪，看见那个挡道的司机招停卡车并跳上了它的脚踏板，随后又返回自己的汽车迅速绝尘而去。认出马瑟诺就是那个在停车场拦住自己的司机，科尔根心想，“乔伊肯定是让那个司机丢下货物设法逃走。”

在距离餐厅半英里远的地方，科尔根追上了劫持货物的司机，那人在正徒步奔逃。“不准动，想活命就老实点！”科尔根冲他的俘虏大声喊道。他认出此人是雷·韦恩（Ray Wean），一个为马瑟诺效力的身高1.83米、体重159公斤的执法打手。“韦恩块头那么大，我都没法铐住他。一分钟后，乔伊驾车回来问道，‘怎么啦？’待着别动，乔伊，我有个坏消息告诉你，你被捕了。”

发现科尔根没有后援，马瑟诺赶紧逃回车里，同时高声喊道，“我得洗澡去！”便驱车逃走。

两天后，在律师的陪同下，马瑟诺前来投案，与韦恩一起因州际运输盗窃罪接受审讯。韦恩被定罪并领刑近一年。这是马瑟诺的首条重罪指控，他没有自我辩解，而是完全依靠律师的开庭和结案辩护。他的律师争辩称，他纯粹是停车看看有点头之交的熟人韦恩是不是有什么麻烦。这种策略奏效了，陪审团裁定他无罪。

尽管科尔根的证词未能让马瑟诺获刑，但韦恩的被捕在3年之后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因另一起窃案而面临长期监禁时，韦恩向科尔根伸出了求助之手，最终为了逃避牢狱之灾而成了卧底线人。数年来，非意裔也非荣誉者的韦恩告发了许多黑手党人，但对揭发与马瑟诺有关的案件却犹豫不决。“雷是个恶人，是个精神变态者，不怕任何事情，”科尔根声称，“然而他有充分的理由对乔伊畏若死神。马瑟诺看起来非常合群，他能巧舌如簧地将一条死狗说得活过来，他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再杀死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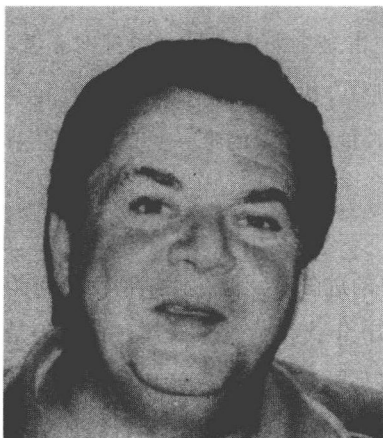
卡迈恩·利诺·加兰特刺杀案是马塞诺一块重要的进阶石，他在谋杀博南诺家族的这个野心家时似乎充当了主要参与者的角色。在7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自认为是博南诺家族新老板的“拉斯提”菲利普·拉斯泰利将马瑟诺吸收为家族成员，而当时加兰特因毒品犯罪正在狱中服刑。到了1979年，形势发生了逆转，获释后的加兰特

正厉兵秣马欲夺取家族控制权，而拉斯泰利却因敲诈勒索罪被监禁。

马瑟诺对拉斯泰利十分忠诚，不时地赶到宾夕法尼亚州刘易斯堡联邦监狱去探望他，并成了其联络纽约部属的主要信使。得知了马瑟诺的行迹之后，加兰特将他召来狠狠训斥了一顿，命令他停止充当拉斯泰利的联络人。拒不从命的马瑟诺对加兰特说，“他就像我的叔叔一样。他培养了我，给我施洗礼（加入了家族）。我不能背弃他。”马瑟诺向其最亲密的同盟者，他的妻弟塞尔瓦托·瓦伊塔尔（Salvatore Vitale），吐露了这次谈话，并坦承害怕因忠于拉斯泰利而招来脾气暴烈的加兰特对自己痛下杀手。

在灾祸降临之前，马瑟诺从拉斯泰利那里带出了要求手下和管理委员会杀掉加兰特的口信。管理委员会批准了这项请求，于是在1979年7月12日，马瑟诺出现在布鲁克林区布什威克的一家餐馆外面。他可能在充当后援杀手，也可能就坐在汽车里准备阻挡任何途径此地的警方人员。在乔-玛丽意-美饭店那僻静的天井里，一支杀手队除掉了加兰特，替拉斯泰利和马瑟诺消除了威胁。

加兰特毙命时，马瑟诺据称在黑手党谋杀方面已是一个老手。数十年后，检察官们得知他此前至少参与了两起谋杀。实际上，据信甘比诺家族老板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保罗·卡斯特利亚诺曾于1979年交给马瑟诺一项谋杀任务。据法庭文件记载，由于与吉甘比诺家族关系密切，马瑟诺应召与约翰·葛提一起杀死并肢解了卡斯特利亚诺女儿的男友维托·博雷利。虚荣心是这起谋杀显而易见的动机，这个专横的甘比诺家族首领极为愤怒地听到，博雷利曾贬损他的相貌，称他长得像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推销其产品的家禽供应商弗兰克·珀杜（Frank Perdue）。珀杜曾恳求黑手党大佬卡斯特利亚诺给予关照，让他的鸡肉进入纽约的超市。



摄于卡迈恩·加兰特1979年被谋杀前后的乔夫·马瑟诺。在策划加兰特谋杀案中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后来进入博南诺家族领导层。（纽约市警察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马瑟诺在 70 年代中期谋杀的第二个知名人士是“多多”约瑟夫·帕斯特托，马瑟诺欠了这个香烟走私贩和高利贷者 9000 美元的债款。为了抹掉债务，马瑟诺据说朝帕斯特托的脑袋连开了两枪，并将其尸体塞进垃圾桶里。

刺杀加兰特是马瑟诺爬升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接下来的权力整合当中，他鼎力支持的黑社会候选人拉斯提·拉斯泰利经管理委员会批准成了博南诺家族的正式老板，而拉斯泰利的首要举措之一便是提拔马瑟诺为角头。这位新教父不得不在监狱里进行遥控统治，并在表面上任命资格更老的角头“萨利弗若兹”塞尔瓦托为代理教父。但博南诺家族精明的打手们显然知道，作为唯一与拉斯泰利有着直接联系的聪明汉，唯一定期到刘易斯堡讨教的人，马瑟诺才是操持大局的主事人。特工乔·皮斯通当时正化名“唐尼·布拉斯科”伪装成珠宝贼刺探情报，尽管没有直接参入马瑟诺的活动，但通过与博南诺家族消息灵通且信任他的老手，如打手“左撇子枪手”本杰明·鲁吉埃诺和角头“宝贝布莱克”多米尼克·纳波利塔诺聊天，他猜测马瑟诺拥有极高的地位。“左撇子和宝贝称他是家族里的高级角头之一。”这位特工向他的 FBI 主管们报告称。

根据皮斯通的情报，FBI 感觉到另一场风暴正在逼近难以控制的博南诺家族，尽管拉斯泰利已就任为新教父，而管理委员会也向其长期不和的各个派系下达了“禁止流血”的禁令。通过目击者的证词和 FBI 对背叛者的讯问，一场黑手党大屠杀以及马瑟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详细内情终于在 20 年之后被曝光。



1979 年，在取得管理委员会批准谋杀其主要竞争对手卡迈恩·加兰特之后，“拉斯提”菲利普·拉斯泰利成为博南诺家族无可争议的老板。（纽约市警察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到了1981年初，就领导层的人事安排和是否保留拉斯泰利为缺席首领的问题，不同的派系在新的摩擦中逐渐形成。各执一词的角头们未能通过双方的高层会议解决纷争。在这些被称为“管理会议”的协商会上，黑手党的荣誉准则禁止与会者携带武器。管理委员会警告分裂各方不得使用暴力，以防在整体上对“科萨·诺斯特拉”的事业造成危害，同时还要求他们自行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在尔虞我诈的黑手党社会里，纽约三大家族都私下支持各自所看好的人。拉斯泰利的拥护者得到甘比诺和科洛博家族支持，而吉诺维斯家族则怂恿其主要竞争者“宝贝雷德”阿方斯·印第里凯托（Alphonse “Sonny Red” Indelicato）、“幸运儿菲尔”菲利普·贾可尼（Philip “Phil Lucky” Giaccone）和“大特林”多米尼克·特林彻尔（Dominick “Big Trin” Trinchera）挑起一场叛乱。这三个结盟的叛逆角头想在家族里取得更大的利益与权力。

1981年春天，科洛博家族的打手“塔提”卡迈恩·弗朗泽斯（Carmine “Tutti” Franzese）向马瑟诺发出了警告：他的对手——那三个角头——正在“扩充实力”，在为最后的摊牌秘密地做着准备。马瑟诺转而向其管理委员会里的盟友，即甘比诺家族的老板保罗·卡斯特利亚诺和科洛博家族的教父卡迈恩·珀西科，求助并请求给予裁决。“他们告诉我，‘你得保护自己。做你该做的事情，’”马瑟诺告诉妻弟与舆论宣传者塞尔·瓦伊塔尔说，“他们准备从拉斯泰利手里争夺家族的权杖。”

马瑟诺将“保护自己”解读为管理委员会同意铲除三个角头，让拉斯泰利派系免遭灭顶之灾。他因此策划了一场先发制人的袭击行动。为挫败敌人，他拉拢中间势力——反复无常的西西里人齐普——与自己站在一起，承诺新的和获胜的领导集团将与他们分享胜利成果。西西里人参加进来，为伏击那三个已成猎物的角头，他们同意从自己的蒙特利尔支派中引入杀手。这些杀手在纽约不会被人认出，行动结束后可以迅速返回加拿大。

在策划谋杀三名角头的过程中，主要同谋者和拉斯泰利坚定的信徒“宝贝”布莱克·纳波利塔诺提出建议，希望让其行动队的合伙人唐尼·布拉斯科参与谋杀行动，想以此增长他的“科萨·诺斯特拉”资历。“我想吸收唐尼，想让他发挥重要作用。”布莱克向马瑟诺和瓦伊塔尔提议道，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褒扬了那个FBI卧底特工。马瑟诺立即否决了这个提议。他此前就有预感地告诫其行动队成员避免与布拉斯科接触，甚至禁止他们在婚礼或社交聚会上与他同坐一张桌子。“他可能会坏事。”已经起疑心的马瑟诺说道。

为了把三名角头诱入陷阱，马瑟诺安排了第三次家族管理会议，地点就定在一个看似中立的场所，即甘比诺家族一家深夜营业的俱乐部。（甘比诺家族二老板阿涅

洛·德拉科罗塞不仅知道这场阴谋，而且还批准约翰·葛提的行动队给予支援。)为打消敌人的疑虑，博南诺家族两名中立角头“乔·巴约讷”约瑟夫·齐卡尔利(Joseph “Joe Bayonne” Zicarelli)和“战士尼克”尼古拉斯·迪斯蒂芬诺(Nicholas “Nicky the Battler” DiStefano)也在受邀之列。为了替马瑟诺及其亲信找到一个辩解的借口，会议特意选定在星期二的晚上。在马瑟诺位于麦斯佩思的俱乐部与住所里，每周二都是聚餐狂欢和彻夜打牌的欢乐日子，在有预谋的袭杀之夜，一次大规模聚集可在事后解释为例行性的社交活动，如果引起警方怀疑的话。

1981年5月5日黄昏，来自马瑟诺和“宝贝”布莱克·纳波利泰诺行动队的十几名打手和崇拜者聚集到了俱乐部。他们大多数人对即将发生的大事毫无所知。人称“加拿大乔治”的重要齐普杰兰多·西亚西亚(Gerlando Sciascia)也带着一班来自蒙特利尔的人马出现了。此人是个角头和大毒枭，他手下经过精心挑选的杀手将参与当晚的行动。“走！”和西亚西亚耳语一番之后，瓦伊塔尔听到马瑟诺下令出发。乔治曾提出异议：他对马瑟诺指定一个非意裔合伙人充当监视哨防备警方感到不踏实。那人便是24岁的杜南·莱森海玛(Duane Leisenheimer)，因为有着一头浓密的金发，马瑟诺行动队的人都称他为“金发仔”。金发仔在麦斯佩思长大，从少年时起就紧紧追随马瑟诺。在马瑟诺的调教下，他成长为乔手下的一名得力劫匪、一个善于巧妙地摆脱执法跟踪的王牌司机、一个手法高超的盗车贼和一名拆车专家。

尽管蓝眼睛的金发仔没有西西里或意大利血统，但马瑟诺向西亚西亚保证，“他是个好孩子。不要担心他。”这些主要猎手——马瑟诺、西亚西亚、纳波利塔诺分乘三辆汽车和一辆厢式车朝聚会地点驶去。被手下称赞为电子专家的马瑟诺给金发仔及其他参与者配备了无线电扫描仪。这种装置可监听警方和FBI的无线电频段和对讲机，如果警方巡逻车或看起来可疑的车辆接近黑手党的会议场地便可发出警告。在分头奔向各自的车辆时，金发仔听见马瑟诺大声说，“快点，我们走！这事终得有个了断，成败在此一举！”

下午5点40分，这些黑手党人驱车离开了麦斯佩思的俱乐部。恰在此时，FBI特工文森特·萨维德尔(Vincent Savadell)正独自驾车在那个俱乐部外的大街上进行例行性巡逻。他此前已在这里转悠了一个小时，记下了泊在俱乐部附近所有车辆的车牌号。这是个单调的工作，目的是要辨别聪明汉与其同伙的身份并查出他们的家庭住址和活动地点。发现马瑟诺带着几个人准备乘一辆深酒红色的别克车离开，萨维德尔赶紧记下了其牌照号码。他追赶那辆别克车，但很快就跟丢了，而马瑟诺车队的其他车辆已经驶上附近的长岛高速公路。

尽管萨维德尔驾驶的是一辆无警方标志的奥尔兹莫比尔牌汽车，但马瑟诺还是发现了它，并用对讲机上通报了这辆“调皮车”（这是他应对执法人员跟踪的密语，表示需驾车躲避）的情况。萨维德尔对马瑟诺的徒劳跟踪是FBI在那个重要的晚上对他进行的唯一一次监视。

这些黑手党人的会合地点在布鲁克林；“管理会议”将在一个已被甘比诺家族改成深夜营业的非法酒吧与赌场的餐厅里举行。这里是本森赫斯特的一处商业区，处在第13大道上，靠近第67大街。金发仔的任务是在与会场相距两个街区的地方警戒，如果外面有潜在的麻烦苗头，主要是警方巡逻队、可疑车辆和附近敌对帮派出现，就用对讲机向马瑟诺和其他人示警。“宝贝”布莱克与他的四名暴徒坐在一辆停靠在俱乐部门口对面街边的红色厢式车里。

在那两层建筑的一楼内，西亚西亚和马瑟诺向聚在他们身边的十来个人做着最后的安排。四个人被指定为射手，配备了一杆锯短了霰弹枪、多把手枪和一支冲锋枪。其中有三人是加拿大齐普：维托·里佐托（Vito Rizzuto）、伊曼纽尔·拉格索（Emanuel Raguso）和一个瓦伊塔尔与马瑟诺只知道其绰号为“老头”的杀手。

曾当过空降兵的瓦伊塔尔拿到了那支汤姆冲锋枪，因为马瑟诺认为他在部队里学会了如何用它。检查武器时，从未摆弄过半自动或速射冲锋枪的瓦伊塔尔意外地将五发子弹打进了墙里。“我不想子弹满天飞。”马瑟诺警告他说，接着要求他不要用那支枪，除非确有必要。

由于在这“和平”会谈当中，中立的角头乔·巴约讷和战士尼克不是袭击目标，射手们都配备了滑雪帽以防那两名局外人认出他们。枪手们被命令藏在一个大衣橱里，并注意向外观察，只有在西亚西亚发出信号——用手理理头发——时才可现身。如果“宝贝”雷德·印第里凯托未能到场，谋杀行动将被取消。他是最令人生畏和好斗的反对派角头，马瑟诺的计划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除掉他。

就在前一天，即1981年5月4日的晚上，在本森赫斯特一家与那餐厅相距数个街区的由博南诺家族打手弗兰克·利诺经营的酒吧里，三名反对派角头举行了一次紧急策略会议。利诺是印第里凯托的儿子安东尼·布鲁诺手下的行动队成员，布鲁诺因刺杀卡迈恩·加兰特有功于两年前被提拔为角头。正如马瑟诺事先被警告的那样，叛乱者们正在储备大量武器，并将武器库隐藏在利诺的酒吧里。经过内部商讨，这三名角头同意遵守“科萨·诺斯特拉”的准则，不带武器参加次日晚上与马瑟诺派系进行的谈判。利诺受命与他们随行，同样不携带武器。这些角头向利诺特别强调，如果他们未能从“和平”会议上返回来，布鲁诺·印第里凯托将有权使用贮存在酒吧里的武器

对拉斯泰利的支持者实施报复性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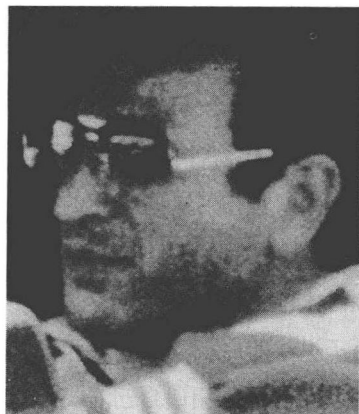
5月5日晚上9点左右，三名角头和利诺一起离开走向了摊牌之战。出发前，心怀忧惧的阿方斯·印第里凯托提出一个可怕的忠告：“一旦发生枪战，每个人都得靠自己突围。”

当四人朝俱乐部门口走去时，金发仔正坐在他的望风车上，“宝贝”布莱克·纳波利塔诺与其枪手们则待在那辆厢式车里。“他们到了。他们正准备进来。”金发仔听见厢式车里有人用对讲机通知说。俱乐部里，前门铃响了。通过衣橱的缝隙，瓦伊塔尔窥见“宝贝雷德”印第里凯托、“幸运儿”菲尔·贾可尼、“大特林”特林彻尔和弗兰克·利诺走了进来。衣橱里的四个人立即套上滑雪帽。维托·里佐托持枪突然闪了出来，喊道，“抢劫！所有人都靠墙站着！”另外三个人也跟着冲出并分散开来。按照任务分工，如果能让他们靠墙排开站着，里佐托和拉格索将扫射这些上当的受害者。瓦伊塔尔和第四名杀手“老头”则负责封锁前门，射杀任何企图逃跑的目标。

尽管瓦伊塔尔没有用汤姆枪扫射，但密集的枪声还是立即淹没了一切声响。因恐惧而浑身僵直的弗兰克·利诺看见蒙面人闪进挤满人的房子里，随后就看见马瑟诺扭住“宝贝”雷德的胳膊，用“一个东西”攻击他。在搏斗中，瓦伊塔尔相信自己看见马瑟诺杀死了另一个角头菲尔·贾可尼。在瓦伊塔尔跑到指定位置防止有人从前门逃跑之前，惊恐的利诺回过神来，跳过已倒地的“大特林”特林彻尔，飞快地穿过了那道门。转过身来，瓦伊塔尔看见“加拿大乔治”西亚西亚压住摊手摊脚地躺地上的“宝贝”雷德·印第里凯托，随手将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脑袋。急促的弹雨刚刚停歇，瓦伊塔尔突然发现现场只剩下自己和马瑟诺及三名死者。其他人——他们的同谋者和两名中立的角头——都通过一个瓦伊塔尔和马瑟诺都不知道的后门逃跑了。看看马瑟诺，再看看那鲜血横流的地面，瓦伊塔尔记得乔寂然地对他说，“真是一团糟。人都跑哪儿去了？”

马瑟诺的西西里盟友们一言未发就带着他们的伤员桑托·乔达诺（Santo Giordano）离开了，在一阵猛烈射击的过程中，乔达诺的背部意外地挨了一枪。当天夜里，他们花了500美元请了一个愿意帮忙的医生给乔达诺做了手术，没有按法律规定向警方报告枪伤。（这次枪伤让乔达诺半身不遂，直到他后来死于空难也未治愈。）

行动结束后，马瑟诺将“宝贝”布莱克·纳波利塔诺和他的打手从厢式车上召来。被指定为后援杀手的他们居然没想到要派枪手堵住前门，致使利诺穿过黑暗的街道逃掉了。现在，他们的任务是清理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场，把尸体“打包”准备移走。纳波利塔诺的人用油漆工的帆布罩单和绳子将死亡角头们包了起来，然后冲洗满是血迹的地板以清除这场屠杀的痕迹。



在1981年的“和平会议”上，乔·马瑟诺指挥伏击了博南诺家族的3名反派角头：“宝贝雷德”阿方斯·印第里凯托（上左）、“幸运儿菲尔”菲利普·贾可尼（上右）和“大特林”多米尼克·特林彻尔（下左）。不久以后，因让一名FBI特工渗入博南诺家族，马瑟诺策划处死了他的盟友“宝贝布莱克”多米尼克·纳波利塔诺（下右）。（联邦调查局特许转载的照片）

独自返回马瑟诺那麦斯佩思的俱乐部后，塞尔·瓦伊塔尔受到了其他行动队成员的热情拥抱和亲吻，他们知道，无需特别告知，接下来将有一场盛大的庆功宴。带着马瑟诺的随从“大路易”詹姆士·塔塔莱昂纳（James “Big Louie” Tartaglione），瓦伊塔尔又驱车返回，帮助转移尸体和清除线索。用帆布卷起来之后，尸体被装上了“宝贝”布莱克的那辆红色厢式车。此时午夜已过，街道上寂寥无人，瓦伊塔尔和金发仔的车分别停在两个十字路口上，准备拦住并阻止任何过路司机看到这一幕。塔塔莱昂纳驾驶厢式车开往霍华德海滨，马瑟诺、瓦伊塔尔和金发仔乘坐轿车紧随其后。在一条小巷里，瓦伊塔尔看到有三个人正等在那里，他们分别是约翰·葛提的弟弟吉恩、约翰的心腹亲信“胖子”安吉·鲁吉埃诺和约翰行动队的暴徒约翰·卡内基利亚（John Carneglia）。对于甘比诺家族成员的出现，瓦伊塔尔无需向马瑟诺发问。他看得出他们是这场谋杀的帮手，将设法让三个角头的尸体永远消失。

在霍华德海滨将厢式车移交给葛提的人后，塔塔莱昂纳明智地抑制住好奇心没有问它会被开往何处。数周后他再次见到了马瑟诺。马瑟诺委婉地提到他在大屠杀之夜的功劳。“干得不错，路易。”

1981年5月6日上午，乔·马瑟诺和“加拿大乔治”杰兰多·西亚西亚在昆士区怀特斯通的卡普里汽车旅馆外被人发现。政府声称马瑟诺将西亚西亚和其他加拿大枪手招进美国，并在前一天夜里谋杀了3名反叛角头。2003年，马瑟诺因谋杀西亚西亚被起诉。（FBI的监视照片）



第 55 章 “漂亮塞尔”

“你怎么找到它的？”“我们自有办法。”

然而，杀手们留下了后患。

从恐怖的大屠杀中逃走的打手弗兰克·利诺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能指认马瑟诺及其同谋者，还可以向索尼·雷德的儿子布鲁诺·印第里凯托告密，透露他父亲与两个盟友受骗并遭屠杀的情况。马瑟诺再次利用其甘比诺家族的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弗兰克的表兄埃迪·利诺（Eddie Lino），甘比诺家族的一名打手，陪同弗兰克和马瑟诺及博南诺家族其他头目见面，得到了自己的生命不受威胁且不会成为谋杀目标的保证。“不要担心，你不会被杀掉。”马瑟诺承诺说。

利诺被给予了优待：他被任命为布鲁诺·印第里凯托行动队的代理角头，并取得了马瑟诺那“一切都已经过去”的保证，以后不会有更多的伤亡。他得到指示，要散播胜利者对除掉三名角头的辩解之辞，称那是一种确保和平以维护家族整体利益的保护性措施。（担心受到吸毒成瘾且胆敢刺杀卡迈恩·加兰特的布鲁诺·印第里凯托的报复，马瑟诺与索尼·布莱克的手下曾追杀了他一个月。管理委员会后来对布鲁诺网开一面，使他重新接受它的保护，但把他降为了打手，并让他回到其原来的已由弗兰克·利诺任角头的行动队。）

大屠杀的第二天，为避开警方可能的调查，也害怕下落不明的布鲁诺的报复，马瑟诺认为最好是潜伏起来。他赶往大西洋城，但因为一次紧急的阑尾切除手术，他不得不缩短泡在海滩和赌场的的时间。他的妻弟塞尔·瓦伊塔尔闻讯来到医院陪护并将他送回纽约。

在和平谈判屠杀案发生后的第 19 天，阿方斯·印第里凯托的尸体在欧森公园和东纽约交界的一块空地里的浅坟中被发现。一块价值 2000 美元的卡特尔手表就戴在

他的手腕上，很明显他不是因财而丧命。现场距离甘比诺家族的打手接手运尸车辆的霍华德海滨不到一英里。（菲利普·贾可尼和多米尼克·特林彻尔的尸体也被埋在那块面积较大的泥泞地里，但他们的遗体是在 FBI 于 23 年后的 2004 年获得线索之后才被找到。）

“宝贝”布莱克·纳波利塔诺在印第里凯托的掩埋问题上与马瑟诺发生了争吵。马瑟诺曾负责清除所有尸体的痕迹，纳波利塔诺因而指责他草草掩埋了事，让调查人员找到了杀人线索。两个月后，“宝贝”布莱克失踪了，在执法部门看来，他也必定受到了黑手党的极刑惩罚。在他消失的当天，忧郁的纳波利塔诺将他那枚珍贵的小指钻戒、一沓现金和住宅钥匙交给了“运动休闲室”（其行动队位于布鲁克林贫民区绿点的活动据点）的男招待查理。“我要开会去了，不知道能不能回来。”纳波利塔诺黯然地说道。

纳波利塔诺之死已经有了现成的理由。1981 年夏天，一场大地震震撼了整个博南诺家族。当时化名唐尼·布拉斯科卧底了 6 年的特工皮斯通浮出了水面，他惊曝内幕称，“宝贝”布莱克欢迎他加入其行动队，并打算吸收他为家族的荣誉者。由于纳波利塔诺轻信于人，官方的检控行动必然会接踵而来。

在皮斯通那前所未有的渗透被公开之前，三名 FBI 特工曾在一个黎明之际来到纳波利塔诺那绿点“运动休闲室”楼上的屋子里找他。黑手党老板一旦得知皮斯通的渗透，纳波利塔诺必将性命不保，FBI 因而得尽可能早地向他讲出真相。道格拉斯·芬斯尔（Douglas Fencel），纳波利塔诺在以前的小冲突中结识的一名特工，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纳波利塔诺，让他在紧急情况下寻求 FBI 的保护。“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不会那样做的。”纳波利塔诺拒绝了变节的提议。为了证明皮斯通是个真正的特工，而他也不是在哄骗纳波利塔诺来合作，芬斯尔向他出示了一张皮斯通面带微笑和自己及另外三名特工站在一起的照片。

“他是个勇敢的家伙，”芬斯尔说道，“由于把特工带进了家族，他给家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但他并不打算合作，哪怕是丢掉自己的性命。”

一年以后，在斯塔藤岛西部一块树荫浓密的沼泽地，一条装有纳波利塔诺尸骨的装尸袋被人发现。他主要是靠牙科病历和珠宝首饰物被验明身份，那些东西都得到了其亲属的确认。纳波利塔诺之死的完整版本于 2004 年，也就是在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脑袋 23 年后才隐约为人所知。证人作证称，是“宝贝”布莱克昔日的盟友乔·马瑟诺下达的处决命令。为考验在屠杀三名叛乱角头时险些丧命的新代理角头弗兰克·利诺，马瑟诺指派他执行了这次谋杀任务。

作为一个顽固不化的暴徒，利诺在 25 岁时就展现了他的勇气和对警察的藐视。1962 年，他因协助一个在布鲁克林杀掉两个侦探的抢劫犯逃跑而被捕，尽管被警察野蛮地拷打了四天，但他紧咬牙关未吐一字。他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被打断，头部也遭到反复猛击，让他落下了总是不停地眨眼睛的病根。最后，一根扫帚把被插进了他的直肠——此类折磨方式在 1997 年曾造成一桩丑闻，当时警官们在布鲁克林一个警察所里鸡奸了一个海地移民。虽然还不是一个黑手党人，但利诺坚定地遵守了“乌默它”准则。

马瑟诺命令利诺找个安全的地方，再派枪手除掉“宝贝”布莱克。1981 年 8 月 17 日夜间，利诺在湾脊的一家餐馆“汉密尔顿饭店”与布莱克和家族的时任顾问“斯蒂威·比夫”斯蒂法诺·坎农接上头，然后驱车穿过韦拉札诺海峡大桥，将他们送到斯塔藤岛参加另一个所谓的家族管理会议。坎农对此行的真正目的显然一无所知，他被带上有利于麻痹“宝贝”布莱克，让其消除戒心。

在斯塔藤岛埃尔廷维莱（蓝领聚居区）的一栋房子里，打手弗兰克·科帕站在门旁迎接三人的到来，告诉他们会议将在地下室里举行。正当纳波利塔诺走下楼梯时，科帕将坎农拉了回来，同时“砰”地关上地下室的门。这是在向利诺发出信号，要他猛力将布莱克推下楼梯。两名杀手正等在楼梯井的底部。弗兰克的表兄罗伯特·利诺打响了第一枪，但显然未击中或者只擦伤了布莱克，再开枪时却卡了壳。跪坐在地上的布莱克抬起头，说道：“再来一次，干得漂亮点。”

第二名枪手“猴人”罗纳德·菲洛科莫射出几发 38 口径的子弹结果了“宝贝”布莱克的性命。谋杀地点是非洛科莫父母的家。菲洛科莫因养了一只猴子作为宠物而博得了“猴人”的绰号。尽管全力为家族效劳，但因为执法部门当过监狱看守而不符合“科萨·诺斯特拉”的一条规定，他自动失去了成为荣誉者的资格。由瓦伊塔尔开车，马瑟诺和“加拿大乔治”西亚西亚乘一辆面包车紧跟利诺的车。他们随后等在斯塔藤岛那栋房子的外面，倘若纳波利塔诺活着逃出地下室，他们将作为后援射手杀掉他。

利诺安排另一个小组移走并埋掉“宝贝”布莱克的尸体。当夜的任务完成后，马瑟诺和瓦伊塔尔返回了各自的家，而打儿时起就是一对亲密朋友的利诺和科帕则驱车赶到布鲁克林参加一个意大利街头艺术节以舒缓紧张情绪。由于天黑，利诺的掩埋小组未能找到已经为布莱克挖好的墓穴。由于担心将尸体放在车上会被人发觉，掩埋小组飞快地挖了一个坑，匆忙将那个被害角头放了进去，没想到一年之后就被人发现。

“宝贝”布莱克被杀让博南诺家族的黑手党人深知持续警觉的必要性，同时也警

告他们如果被秘密特工蒙骗将面临死刑。“因为唐尼·布拉斯科，我不得留张收据给‘宝贝’，”马瑟诺对瓦伊塔尔说。在马瑟诺的词典里，“收据”指的就是谋杀。马瑟诺接着说，即使将来因谋杀三名角头被定罪，但想到自己除掉了罪有应得的“宝贝”布莱克，他就会感到心满意足，因为他玷辱并危害了整个家族。

马瑟诺眼里的另一个罪当诛杀的人是“宝贝”布莱克行动队的聪明汉“左撇子枪手”本杰明·鲁吉埃诺。他曾带着皮斯通“上蹦下窜”，并允许那个特工跟随自己“积累资历”。鲁吉埃诺罪不可恕之处是为皮斯通提供保护，还把他引荐给家族首领，并信誓旦旦地称他是个可靠的崇拜者和极具潜力的大捞钱人。实际上，皮斯通为蒙骗鲁吉埃诺和纳波利塔诺而上交的“收入”来源于FBI提供的秘密活动经费。

在“宝贝”布莱克最后一次出行的三天后，FBI通过窃听器获知马瑟诺的杀手已经传唤鲁吉埃诺赶到“假日酒吧”。那是下曼哈顿麦迪逊大街上一个邋遢肮脏的聚会场所，离左撇子枪手那“纽约人村”社区的公寓房只有一箭之遥。“他们要杀他，”在那个酒吧附近执行监视任务的特工帕特·马歇尔说道，“那是个鬼门关，人们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被抬出来。”

为了抢先在鲁吉埃诺离开家时把他“绑”离街头，那名监视特工匆忙驾车行动，不料却撞上了一辆巴士。正当鲁吉埃诺迎头走向马瑟诺的枪口时，另一名秘密监视鲁吉埃诺的特工路易斯·维拉佐（Louis Vernazzo）接到了在目标赶到酒吧之前将其截住的紧急无线电指令。当健壮的带有意大利人面部特征的维拉佐突然持枪跳出一辆凯迪拉克汽车时，鲁吉埃诺被吓得浑身颤抖。“左撇子以为自己就要被杀，一切都完蛋了，随后却听到了让他顿感轻松的话，‘FBI，站住！’”维拉佐向同事们讲述道。那天，鲁吉埃诺因受敲诈勒索和枪支指控被突然逮捕，而这可能救了他的性命。

另一个身处险境的黑手党人是博南诺家族脾气火爆的打手安东尼·米拉（Anthony Mirra），是他首先把皮斯通当成合伙人使用。体态臃肿的米拉身高1.83米，体重109公斤，是个令人恐惧的敲诈老手，还是个靠“捅”对手解决争端的“快刀手”。米拉绝非傻瓜，一听说皮斯通是个卧底特工，他就意识到自己已经上了政府的检控名单，随即就从其经常出没的场所消失了。但更危险的是，博南诺家族高层决意要除掉他，要让他作为另一个实例来告诫黑手党人让FBI渗入家族会有什么后果，况且他还有可能为取得宽恕而变成FBI的密探。

米拉频繁变换住所，只与博南诺家族另一个聪明汉，即其表弟约瑟夫·迪阿梅科（Joseph D'Amico）保持着联系。年长28岁的托尼·米拉曾栽培过乔伊·迪阿梅科，帮他在22岁时成为一名荣誉者，让他骄傲地成为黑手党最年轻的党徒之一。有一天，

他接到一个指示其“穿好衣服”这一令人惊讶的电话，这意味着他已经有资格成为正式党徒了。感恩戴德的乔伊竭力模仿托尼的黑手党风格与举止。在他的眼里，托尼不仅仅是个表哥，更是个精明的提携者。

1982年2月18日，米拉给迪阿梅科打去电话，约定在下曼哈顿的女友家里与他见面。在准备出门放松一下之前，他一直藏匿在那里。在哈里森大街一处靠近哈得逊河的日子里，54岁的托尼以十分亲密的拥抱欢迎乔伊的到来。迪阿梅科意识到，向来多疑的表哥从上到下拍打他是想摸清他是否带有武器。几分钟后，这对表兄弟坐进了米拉那辆停放在大楼地下车库里的沃尔沃汽车里。当托尼停车用一把钥匙准备打开出口大门时，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乔伊拔出巧妙隐藏的手枪近距离朝米拉的头部开了数枪。

坐在逃跑汽车里在外等候的是乔伊的姨父“阿尔·沃克”艾尔弗雷德·恩巴勒托（博南诺家族的成员和《华盛顿邮报》的长期勒索者）和表弟理查德·坎塔瑞拉（Richard Cantarella）。后来，在检查米拉的尸体时，警察发现他在潜逃时用来开销的一大叠现金——6779美元就藏在他的一只长筒靴里。

迪阿梅科认为这起谋杀是一种道不清理还乱的家族事务。米拉和坎塔瑞拉共同的姨父恩巴勒托——被他称为“阿尔姨父”的那个人——向他传达了谋杀指令。从阿尔姨父那里拿到一把38口径手枪时，迪阿梅科被告知命令是由乔·马瑟诺直接发出的。尽管迪阿梅科崇敬——并且深爱着——米拉，但任务必须得完成。因指挥了这起难以顾及亲情的杀害其外甥的谋杀行动，阿尔姨父被提拔为角头。

数年后，当迪阿梅科谈到表弟理查德·坎塔瑞拉还没有被吸收为家族荣誉者时，马瑟诺打断了他的话。迪阿梅科当时对坎塔瑞拉大加称赞，并间接提到他参与了谋杀米拉的行动。那起黑社会谋杀的话题被马瑟诺偶然提起，当时他正穿梭在参加女儿阿德琳婚宴的客人中间。

家族里的杀戮与剧变很快让马瑟诺位极人臣，成了囚徒拉斯泰利无可争议的代理人 and 家族的“街头老板”。随着地位的迅速上升，马瑟诺的注意力也由组织绑架和拦路抢劫转移到比较文雅的相当于高级黑手党人之博士学位的劳工敲诈技巧。同时，他也抓牢了保证其利润的副业——赌博和高利贷。特工乔治·汉纳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在跟踪马瑟诺，发现抢劫不再是博南诺家族特别中意的活动，它已被更简单和更赚钱的犯罪（特别是毒品贩卖）所超越。在执法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拦路抢劫的风险日益增加，而且有个线人向FBI报告称，价值200万美元的被盗胶卷只让马瑟诺行

动队捞到区区 6 万美元的零头。

马瑟诺的活动据点仍在麦斯佩思。他与妻子约瑟芬开了一家“J&J（乔与约瑟芬）熟食店”，为“蟑螂”餐车提供三明治和其他美味佳肴，这看起来合法的生意为马瑟诺舒适的生活方式提供了财力证明。特工对熟食店隔壁的一个店面更感兴趣，它在房地产档案上被登记为“J&S（乔和塞尔）糕饼暨 MVP 货运”俱乐部，是马瑟诺谋划犯罪的临时场所。MVP 是指马瑟诺、其妻弟塞尔·瓦伊塔尔和该俱乐部非正式主厨卡迈恩·佩卢索（Carmine Peluso）（博南诺家族一名合伙人）之名的首字母。根据附近一条主干道的名字，博南诺家族的老人将这个边道上的据点称为“拉斯特街俱乐部”。乔和塞尔在那里经营高赌注的纸牌赌博，那是一种通常需要用四副牌和小丑牌的大陆式金罗美牌戏。“庄家”，也就是这对姻兄弟，抽走赢家 10% 的所得。

绰号“漂亮塞尔”的塞尔瓦托·安东尼·瓦伊塔尔从孩提时起就是马瑟诺的追随者。浪漫的爱情将马瑟诺带进了瓦伊塔尔的家。在家附近的一条人行道上卖圣诞树时，乔结识了瓦伊塔尔的姐姐约瑟芬并调起情来，随后便与她约会，不久就娶了她，当时两人都只有十几岁。马瑟诺比瓦伊塔尔年长 4 岁，于是充当起大哥哥的角色，在他 12 岁时教他如何游泳，更为重要的是，教他如何在暴徒横行的布什威克街头和在昆士区生存下来。

从格罗夫·克里夫兰高中毕业后，瓦伊塔尔在一所市立学院读了半年书，随后就开始了两年封闭式的军营生活。光荣退役之后，他在昆士区一个改造低级毒品犯的州立教养中心谋得一份合法工作，成了一名矫正官。由于对工作兴趣了了，他在一年后便辞职为马瑟诺经营一辆“蟑螂”餐车，并在出售快餐的同时以 500:1 的赔率经营彩票赌博。在空闲的时候，瓦伊塔尔和两名同伙背着乔犯下了一些情节轻微的夜盗罪，主要是闯入工厂行窃。马瑟诺直接质问他的妻弟，并向他提出一个不容抗拒的要求：“菲尔·拉斯泰利给我传来口信，说你在抢劫。如果你在干的话，就和我一起干。” 24 岁的他于是就自豪地开始在姐夫手下“积累资历”。到了 70 年代中期，乔已经将黑手党经济学的基本精髓传授于他，让他从事纵火骗保、赌注经纪、拦路抢劫、放高利贷和洗钱等活动。

瓦伊塔尔对其启蒙者逃避逮捕的机警与精明感到惊讶。“他知道自己周围的一切动静。你绝不可能发现他有睡着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盯着所有的事情。”他告诉其他崇拜者。

这个年轻的罪犯跟着马瑟诺通过了所有的忠诚测试，后者甚至指使他参与了 1976

年7月处死高利贷主与烟草走私贩“多多”约瑟夫·帕特托的谋杀。马瑟诺承认，他在“J&J熟食店”楼上的厨房里杀死了帕特托，并让塞尔冲洗血迹。命案发生的第二天，瓦伊塔尔用一个提桶、一把地毯刷子和一瓶来苏儿清洗了厨房，甚至将冰柜里的微小污点也擦去了。

到了70年代后期，比姐夫瘦得多且更注意自己身材的瓦伊塔尔已经成为马瑟诺最亲密的心腹和密友。为了向黑手党同伙表明他与塞尔深厚交情，乔在他的婚礼上充当了男傧相，让塞尔极感荣耀。

“他们形影不离。”跟踪这两名黑手党人10年之久的特工帕特·科尔根说。乔伊是他从事高利贷、抢劫和其他一切犯罪活动的导师。但实际上塞尔当时只是他的听差。如果不是乔伊，塞尔肯定一直在餐车后部卖咖啡。

在拉斯泰利被监禁期间，瓦伊塔尔很清楚乔已经成了家族事实上的老板。当博南诺家族其他角头和老牌教徒赶到“J&S糕饼店”与他走谈时，他分明看到了他们流露出的敬意。分析这诸多事件——博南诺家族四名角头那显然被谋杀的失踪和J&S糕饼店的大型聚会——FBI确信，窃听这个俱乐部以摸清博南诺家族领导层到底在搞什么鬼的战略时机已经成熟。

但马瑟诺在他的堡垒里设置了一个复杂的“三层”防护系统，即两层涂黑了的橱窗和一层圆木图案的砖构壁板，让FBI技术人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里的防护能力得到加强，”科尔根说道，语气中透着内行者的钦佩，“他有最好的门锁，一流的警报系统，我们得知，如果你进去了，你只有30秒钟的时间去用另一把钥匙，然后你还得输入密码以切断警报。”

此外，马瑟诺还对附近的居民和店主施以小恩小惠，请他们充当业余放哨者，倘若在俱乐部关门时有特工或侦探在附近转悠就给他报警。科尔根凭直觉认为，得用一种打破常规的办法才能潜入马瑟诺那神秘的密室。他知道，马瑟诺请了附近一个居民在上午给他打扫俱乐部。这个看管人有一串钥匙，而那令警报失效的密码就写在他皮夹里一张每次进门前都会被拿出来的纸条上。结束了在J&S俱乐部的工作之后，那个清洁工下午就会到附近一个酒馆里闲适地待上老半天。坐下来怡然自得地休息时，他总会将那串钥匙和钱夹放在吧台上。有个特工在酒馆里与那人搭讪了半天，记住了放在吧台上的钥匙串和皮夹的样子。一天，在清洁工去洗手间时，那名特工将那钥匙串和皮夹转交给了酒馆里的另一个特工，并将那看起来相似的物件放在原处。在附近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一个锁匠配制了俱乐部的前门钥匙。不出所料，关掉报警器的密码就写在一张折叠在皮夹里的纸条上。

钥匙串被盗约一小时后，它和皮夹又被换回吧台，而那个微醉的清洁工对此间的变化毫无察觉。不久，在凌晨3点钟，FBI特别行动组的特工潜入J&S俱乐部安装了一个微型麦克风。但FBI的这次入侵以失败告终，窃听器工作了两天却没有捕捉到任何罪证之言，后来整个发送系统突然变哑了。技术专家们猜测马瑟诺的人扯掉了那个装置。

原来塞尔·瓦伊塔尔用一种原始的方法发现了窃听器，从而挫败了FBI的窃听企图。通常在打开警用无线电扫描仪之后，他让助手站到俱乐部一个较远的角落里，然后大声说话并弄出通常是冲洗马桶的响声。一天，扫描仪收听到说话声，而马桶的冲洗声也从那个房间里传送过来。瓦伊塔尔循声找到那张主牌桌上方的一块吊顶，拆除了FBI放在里面的麦克风和发射机。

扫描仪只是马瑟诺反窃听防御的一个方面。其行动队所有成员都受到严厉警告，绝不允许在俱乐部谈论事情。除此之外，他还用上了另一种防御手段。每隔一周，为许多重要黑手党人所熟知的技术员汤米·康姆皮尤特就被带到J&S俱乐部对执法部门可能设置的窃听装置展开电子排查。

作为FBI特别行动组组长，节俭的詹姆士·卡尔斯特罗姆对马瑟诺俱乐部的失败并不感到羞惭，而且决心取回那昂贵的高端设备。他命令科尔根把它搞回来。“我不能让他们留下我们的装备，”卡尔斯特罗姆说，“那是政府的财产，得把它取回来。”瞅准一个进入俱乐部的机会，科尔根跟在一个暴徒身后猛然闯过了那道被锁着的门。“那个家伙转过身来，‘你他妈的是谁？’随后就冲我挥出一拳。我急忙闪过并将他打倒在地，随后其他人都朝我围了过来，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都别动。是帕特。’”

解救这名特工的人是乔·马瑟诺。喝住围着科尔根的打手，马瑟诺得意地猜出了他闯进来的目的，并用戏弄的口吻说道，“我们头一天就发现了。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要不我早就把它还给你了。”叫人拿来麦克风和两个砖块样子的发射机，马瑟诺又递给特工一杯啤酒。“你怎么找到它的？”科尔根问，“我们自有办法。”马瑟诺笑着回道。

第 56 章 黑手党的霍雷肖·阿尔杰

他已经为一个波澜壮阔的统治时期做好了准备，只等着监狱大门为他打开。

不出所料，特工皮斯通的渗透导致博南诺家族，还有佛罗里达与密尔沃基其他犯罪集团共计五十多名黑手党人受到检控。1981年11月，利剑首先落在“宝贝”布莱克·纳波利塔诺原来的行动队头上，它的五名打手被指控谋杀了三名角头并犯下各种敲诈勒索罪。（“宝贝”布莱克在该案中被列为主要被告，但在其尸体于1982年得到确认之前，他的失踪之谜一直未能解开。）在“宝贝”布莱克行动队成员被抓进去四个月之后，马瑟诺得知他即将受到类似的谋杀和敲诈勒索罪指控而被捕。“我得到口信，说是马上要起诉了。”1982年3月他向瓦伊塔尔耳语道。马瑟诺没有透露其情报来源，也没有打算与其他被告一道受审。那天他正准备潜逃。他打算等到第一轮审判结束，这是黑手党头目们经常采用的一种策略，意在摸清检方的证据，再谋划出更为可靠的辩护之法。“我一个人会有更多的取胜机会。”他告诉瓦伊塔尔。

汉普顿斯，长岛东部一个时尚的避暑胜地，是他避难的首选之地。尽管时值冬末淡季，但马瑟诺还是在那里碰到一些熟人。两个星期后，他找到“金发仔”杜南·莱森海玛，让其找个更安全的藏身处。

金发仔急切地想帮助这个他称为“头儿”的人，想到跟在马瑟诺身边所受的实战教益，其感激之情自难言表。金发仔对汽车尤为着迷，曾在布鲁克林一所培训技工的汽修职业高中学习了一年，离校后便利用所学的技术偷盗而不是维修汽车。16岁时，按照一家拆解并出售汽车有用部件的拆车场的定单，他每周偷来的特定型号的汽车数量猛增到15辆，能赚取约2000美元的收入。在拆车场干活时，由于懂得拆解热门车辆的技巧，他每周还可以另拿300美元。拆车场老板将金发仔引荐给马瑟诺，并担保

说他“是个勇敢的小伙子”，于是这个金发少年在 18 岁时加入了乔的抢劫团伙。金发仔最初的工作是从拖车上卸下被盗货物，再装上小卡车和厢式货车送给收赃者和愿意帮忙的商人。

为了显示黑手党首领也可以是机会均等的雇主，马瑟诺把金发仔叫到一旁，对其传授行业生存之道，虽然他并不是意大利人的后裔。他禁止这个年轻罪犯在他们的麦斯佩思地区偷盗汽车或贩卖毒品，因为它会招来执法机关的注意而让 J&S 俱乐部和其抢劫窝点承受不必要的“压力”。金发仔还被告诫不得在昆士区其他黑手党老巢，特别是约翰·葛提的俱乐部附近偷盗车辆。“如果那些人逮住你，你就会在汽车后备箱里完蛋。”马瑟诺警告说。

马瑟诺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要保持警觉。“看你的后视镜。”他敲打他，提醒有执法车辆在监视。金发仔亲身领教了马瑟诺如何靠着警觉脱离陷阱，甚至对 FBI 实施反侦察，在特工们发现他之前窥视他们。时刻保持警惕的他还注意到，特工们到附近地区活动时总会在麦斯佩思一家餐厅的停车场上更换无警方标志的车辆。因此，通过暗中监视停车场，马瑟诺的人弄清了 FBI 车辆的样子和车牌号，并能认出在这个地区谨慎行事的司法人员。

不久，金发仔就成了马瑟诺行动队里一个公认的合伙人。马瑟诺对其甩掉尾巴的技能非常赏识，经常让他充当司机带着自己在城市森林里穿梭或赶往纽约北部和宾夕法尼亚州探访“老头子”——老板菲尔·拉斯泰利。

金发仔加入谋杀三名角头的行动让马瑟诺对他更加信任。1982 年春天，当马瑟诺让他帮助寻找藏匿处时，金发仔想出了一个安全的住所：他父母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尔福德的度假屋。那房子在波可诺山区，位于纽约西北 80 英里处。金发仔的父母同意两人无限期地待在那房子里，除非他们自己要住进去。在那些短暂的时间里，主要是周末，马瑟诺会转移到一家汽车旅馆里去。

马瑟诺得到的与逮捕和起诉有关的消息是准确的。1982 年 7 月，曼哈顿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公布了 RICO 指控，称他是个阴谋的策划者，但不是谋杀三名角头的实际参与者。

一年以后，拉斯提·拉斯泰利被假释，可以自由地重掌家族大权并成为“正式”老板。然而，博南诺家族绝大多数成员都明白，即使在潜逃，马瑟诺仍充当着家族主要首领的角色。与后来卢切斯家族“煤气管”卡索所采用的方法类似，他通过事先安排的打到公共电话亭的电话向瓦伊塔尔下达命令。为了表示对马瑟诺的忠诚与敬意，角头和重要打手们纷纷赶到波可诺山区寻求指示并报告黑手党事务，而拉斯泰利对自

己的这个被保护人受到这般礼遇并没有提出异议。另一个犯罪家族的高级访客，即马瑟诺那拦路抢劫的犯罪搭档约翰·葛提，也赶去给他打气和抬升其“科萨·诺斯特拉”地位。

为逃避 FBI 的跟踪，在被带到米尔福德之前，前往藏身处的来访者都在纽约或宾夕法尼亚州的支路上由金发仔驱车来接。由于对金发仔“看后视镜”的能力颇为信心，马瑟诺曾冒险让他送自己到纽约主持高层会议以解决通过电话和信使不能处理的问题。

待在波可诺的时候，马瑟诺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是要谋杀曾帮他除掉卡迈恩·加兰特的杀手切萨雷·邦温特（Cesare Bonventre）。邦温特是个齐普角头，不知何故冒犯了马瑟诺。1984年，在米尔福德的隐匿处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马瑟诺将除掉邦温特的任务交给了塞尔·瓦伊塔尔。从马瑟诺的口气当中，瓦伊塔尔相信乔对邦温特的忠诚产生了怀疑，因为在他潜逃，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在“为了家族的利益”而需要“奉献”自我的时候，这个角头没有露面来帮助或拜访他。瓦伊塔尔私下推测此次谋杀可能另有原因：作为势力强大的西西里帮派的首领，邦温特已隐约地成了马瑟诺的竞争对手。马瑟诺向他暗示说，他是按照拉斯泰利的命令行事，并不清楚个中缘由。“老头子想让切萨雷走。”乔简单地说了这么一句。

瓦伊塔尔不大相信这是拉斯泰利做出的决定。以其目前的优越地位，瓦伊塔尔认为获释后的拉斯泰利已经厌倦了家族的长期动乱，况且他即将引退僻居。“他想平静地过完这辈子，”瓦伊塔尔回忆说，“从他（出狱）回家的那天起，他就想辞职让位。”

在金发仔前去刺杀邦温特之前，马瑟诺告诫他说，那齐普角头——据说卷入了25起谋杀——可能是个很难对付的猎物。“他是个非常狡猾的家伙。你务必小心。”

1984年4月的一个晚上，为执行马瑟诺的谋杀计划，瓦伊塔尔以带其参加由拉斯泰利主持的会议为名在昆士区将邦温特接上了车。然而，瓦伊塔尔调头将车开往金发仔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拆车场，马瑟诺派遣的杀手“哈哈”路易斯·阿塔纳西奥（Louis “Ha Ha” Attanasio）则坐在汽车后排座上随车同行。驶近拆车场时，阿塔纳西奥朝邦温特的头部开了一枪却只擦伤了他。邦温特奋力与瓦伊塔尔抢夺方向盘，想朝一辆停在路旁的汽车或隔离墩撞去。瓦伊塔尔一只手将他挡开并把汽车开进了拆车场，阿塔纳西奥又朝邦温特那颤搐的身子连开了几枪。“我得补他几枪，这狗娘养的不想死。”阿塔纳西奥嘟囔地向金发仔说道。

邦温特谋杀案对瓦伊塔尔来说是个基准性事件。作为对其效劳的一种奖赏与认可，他姐夫批准将他吸收为好朋友——荣誉者。由马瑟诺和顾问斯蒂夫·坎农主持仪

式，37岁的瓦伊塔尔在为乔效力15年之后正式加入了“荣誉社团”。大部分仪式都使用意大利语，作为第二代美国人，瓦伊塔尔几乎一个字都听不懂。

两年过去了，FBI仍未能接近马瑟诺。特工们定期跟踪瓦伊塔尔和其他知名的行动队成员，希望顺藤摸瓜地找到这家伙。根据线人的提示，负责追捕行动的特工帕特·马歇尔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波可诺地区。他的调查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马瑟诺从当地一个古玩店给女儿们寄出了洋娃娃。但在波可诺这个广袤的地区，仅凭这条线索尚不足以让他们追踪到马瑟诺的巢穴。

特工们没有想到，马瑟诺在使用假名“乔·拉索”并犯了一个难以置信的错误。令人费解的是，他企图从波可诺一家药店偷窃一瓶价值不到一美元的阿斯匹林，而且被逮个正着。他竭力说服店主不予追究，并出示了名为“乔·拉索”的身份证。在所有“全境通告”中都没有那个名字的逃犯，当地警察便让他离开了。

后来，FBI得知马瑟诺即使在逃亡也不忘制造一些风流韵事。周末，有个与他勾搭成奸的女人会被金发仔从纽约接到汽车旅馆里与他幽会。他们是在探监时相识的，在许多次赶往监狱探访拉斯泰利的路上，马瑟诺都让她搭便车坐进自己的凯迪拉克或林肯汽车。她探望的人是与马瑟诺在同一监狱服刑的丈夫。

追捕行动在马瑟诺逃亡28个月后结束。1984年7月，他返回纽约向执法机关自首。在露面之前，他有充裕的时间与律师研究博南诺家族“宝贝”布莱克行动队首批五名成员的诉讼程序。这些黑手党人因特工皮斯通的卧底刺探而祸及其身。包括“左撇子枪手”鲁吉埃诺在内，共有三人被查明未向当局举报谋杀三名角头的阴谋而违反了RICO法。实际上，特工和检察官们并不知道，他们事实上担任了后援杀手，并且在伏击现场移走了尸体。审判依据主要是皮斯通的渗透证词和一盘表明他们与屠杀有牵连的磁带。正如马瑟诺所期望的那样，审判暴露了FBI搜集的与这起谋杀有关的有限证据和检方的基本庭辩策略。

“习惯我这张脸吧，以后你会经常看到它。”当马瑟诺被带进FBI总部接受指纹采集和拍照时，一直在追捕他的特工帕特·马歇尔警告他说。作为马瑟诺案件的专案或带队特工，马歇尔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沉着冷静的敌人。“他对我的警告毫不在意，而是平静地说，‘没问题，做你该做的吧。’”

马瑟诺交保获释，但马歇尔和检察官对他和金发仔莱森海玛的调查远未完结。被召到大陪审团跟前并得到免受起诉的豁免权后，金发仔拒绝回答自己与马瑟诺潜居在波可诺地区的问题，他随即被指控藐视法庭并领受了15个月的监禁。在其服刑期间，大陪审团对马瑟诺和博南诺家族其他成员所受的新指控展开了调查。在金发仔入狱的

前夜，马瑟诺及其行动队成员在 J&S 俱乐部为他聚会饯行。众人称赞并拥抱这个“硬汉子”，并递给他共计 1.7 万美元的红包，算是对他保护乔的一种奖赏。

返回纽约不到一年，马瑟诺又受到另一项 RICO 指控。作为拉斯提·拉斯泰利的共同被告，他被指控犯有工会诈骗与勒索罪。在霍华德海滨的家里被捕时，马瑟诺礼貌地要求到屋外而不是当着妻子和十几岁的女儿阿德琳与乔安妮的面被戴上手铐。“因为他对我们总是彬彬有礼而且诚恳。”马歇尔满足了他的要求。

不久以后，即在 1985 年 6 月，马歇尔再次在霍华德海滨向他发起进攻，当时他正坐在塞尔·瓦伊塔尔泊在自家附近的别克车里谈话。这次，马歇尔身后还跟着两个人。身陷三角头谋杀讼案当中的马瑟诺又面临另一项指控：阴谋杀害香烟走私贩与高利贷者“多多”约瑟夫·帕特托，此人 10 年前在 J&S 熟食店的楼上被枪杀。这迟到的起诉书还控告了瓦伊塔尔，但其罪名与这些牵涉四条人命的谋杀案无关，而是作为同案犯参与了检方所指称的系列抢劫案。

戴上手铐后，这对姻兄弟被分别塞进 FBI 的汽车，马瑟诺与马歇尔及另两名特工同乘一辆车。马瑟诺腰身肥胖，马歇尔得用两副手铐将其双手铐在背后。当特工在附近一个红绿灯处停下来时，另一辆车紧急煞车停在他们旁边。身材魁梧的约翰·卡内基利亚靠了上来，此人住在附近，是约翰·葛提手下的暴徒，曾帮助马瑟诺处理过三名角头的尸体。卡内基利亚用手猛砸 FBI 的汽车顶部，同时急切地问道：“乔伊，你怎么啦？”特工们知道卡内基利亚对司法人员怀有强烈的敌意，素以一触即怒的暴虐脾气出名，便纷纷将枪伸了出来。“不想死就离开这里。”一名特工警告卡内基利亚说。朝那特工阴冷地瞪了一眼之后，卡内基利亚退开了，声称将给马瑟诺的律师打电话。

作笔录时，马歇尔注意到马瑟诺很有钱，口袋里随身带着 3192 美元现金。他很快为这新的指控交纳了 100 万美元保释金。马瑟诺不愧为黑手党的重要头目，在应对即将到来的两场 RICO 诉讼战时，他镇定自若，毫无惊慌之态。他继续在其麦斯佩思的老巢露面，照顾其半合法的“蟑螂”餐车和熟食生意，管理他的黑手党秘密组织。他甚至有闲心赶到大西洋城的凯撒宫赌场寻乐，并在那里很快欠下 1.5 万美元永远不会偿还的赌债。

对执法监视向来警惕的马瑟诺偶有反常之举，他会不顾危险地与其黑手党老友约翰·葛提，当时还是甘比诺家族的一名角头，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这两个来自不同家族的黑手党人故意炫耀他们的良好关系，经常你来我往地探访对方的俱乐部。葛提

不顾管理委员会关于不得与被驱逐的博南诺家族发生密切联系的禁令，公开向黑手党要员们表明了他对马瑟诺的信任，1984年马瑟诺参加了维多利亚·葛提的婚礼便是他们关系密切的一个明证。一年后，当甘比诺家族二老板安尼洛·德拉科罗塞死去时，马瑟诺非常抢眼地与吉恩·葛提同车前来守灵。他与悲恸的葛提兄弟一起出现是个相互支持的信号，表明在他们与甘比诺家族老板保罗·卡斯特利亚诺那不共戴天的冲突当中，他与他们站在一起。（不久以后，FBI的窃听录音会使马瑟诺大为震惊，他将听到葛提在与亲信谈话时轻蔑地称他为“大鲸鱼”和“废物”。）

1986年春天，作为政府的主要目标和拉斯提·拉斯泰利的共同被告，马瑟诺终于第一次被带进布鲁克林联邦地方法院接受审判。这位博南诺家族的教父一年前在曼哈顿管理委员会案中就受到检控，但为了便于审理一桩指控他和其他十名被告的劳工敲诈大案，那些指控都被压了下来。在过去的20年间，博南诺家族的头目和卡车司机工会814分会的官员们狼狈为奸，进行了系统而标准化的诈骗勒索活动。通过操纵投标合同和以劳工问题为名，这些黑手党人和腐败的工会官员每年从纽约大型的搬运与仓租公司身上勒索一百多万美元的酬金。

气愤的马瑟诺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打击。“我一分钱也没捞。”谈到自己被指控从那桩阴谋当中牟取暴利时，他向合伙人们诉苦说。关键性证词来自卡车司机工会一名认罪的腐败官员安东尼·吉利伯提（Anthony Giliberti），在一次拙劣的袭击当中死里逃生之后，他开始与政府合作。马瑟诺向其他黑手党人透露称，他曾粗暴地对待过吉利伯提。“我给他松了松骨头。”按照黑手党的恶行标准，他认为一次后果不甚严重的袭击算不上控告的合理理由。受马瑟诺威胁的吉利伯提相信，他就是想谋杀自己的幕后黑手，但那种罪名并没有指向马瑟诺。

每天穿着普普通通的黑色套装和运动衫，马瑟诺在法庭上对检察官和特工比其他被告显得更为恭顺和友好。在一次休庭期间，联邦有组织犯罪特遣队首席检察官劳拉·布雷维蒂（Laura Brevetti）在近乎空荡荡的法庭里注意到了他那无甚忧虑的心态。那天，布雷维蒂通过示意图阐述了非法操纵投标和被一家搬运公司（涉嫌向博南诺家族交纳5%的回扣）所鲸吞的额外费用。细看了看示意图，又打听了那家公司老板赚取的额外利润，马瑟诺在那检察官面前故作窃笑地说，“我想那婊子养的欠了我的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一份被黑手党染指的合同是替FBI将器具和设备搬进它那老城区的新办公室。）

在法院大厅里偶然碰见帕特·科尔根，马瑟诺友好地向他的老对手打招呼。“嗨，帕特，我听说你高升了。”马瑟诺说道，显然知道这位FBI特工已经被委以行政职位。

“我听说你也是啊，乔伊。”马瑟诺咧开大嘴，报以无声的一笑。

拉斯泰利是个癫痫病患者，马瑟诺在审判期间多次帮了他。有一次，马瑟诺徒手撬开了一个电话亭的门，把犯病受困的拉斯泰利抬了出来。他还安慰拉斯泰利，让他相信在被告席上突然病倒是不会咬着舌头的。在那次癫痫病当庭发作的过程中，拉斯泰利的懒汉鞋蹭掉了，当马瑟诺捡起它们时，布雷维蒂听到另一名被告，也就是原二老板“眼镜尼克”尼古拉斯·马兰盖洛（Nicholas “Nicky Glasses” Marangello），粗声粗气地说，“不要急着穿鞋子，乔。”

乔·皮斯通的卧底工作带来了第一手指证博南诺家族成员的压倒性证据。离开证人席时，这名特工被马兰盖洛的天真吓了一跳。直呼其假名的马兰盖洛脱口说道，“唐尼，你怎能这么做？你是我们的人。”皮斯通和检方 50 名证人的证词说服了陪审团，十几名被告被裁定有罪。1987 年 1 月，拉斯泰利被判处 12 年监禁，而乔·马瑟诺将在其犯罪生涯中首次走进监狱。其最高刑期为 10 年。

判决后不久，首席检察官劳拉·布雷维蒂听到令人不安的消息，即马瑟诺对她暗怀敌意，有可能要置她于死地。在十几名辩护律师当中，有个人向她透露称，马瑟诺对她那大胆的检控感到愤怒，曾经低声说，“我希望她死于艾滋病。”

葛提在裁决下达时已经是甘比诺家族的新老板。有线人向 FBI 报告称，甘比诺家族有个角头为讨好其教父而提出要谋杀布雷维蒂和主审那起敲诈勒索案的法官尤金·尼克森（Eugene Nickerson）。他们的动机是报复葛提的挚友乔·马瑟诺被判刑，这表明葛提-马瑟诺轴心得到了甘比诺家族忠诚分子的强烈认同。

风闻死亡威胁的布雷维蒂不禁“担忧起来”，因为有天夜里她回家时发现早上已经关掉的空调正在全速运转。有人到过她的房子。特工建议在他们展开进一步调查期间她最好离开纽约。她于是怀着忐忑的心情赶到夏威夷开始度假。布雷维蒂明白，没有证据证明马瑟诺卷入了谋杀计划。FBI 知道，唯一愿意接受这个任务的杀手是吉米·海德尔。可还没来得及策划谋杀，海德尔就因为企图杀掉卢切斯家族老板安东尼·卡索最终被拷打至死。“煤气管”无意中除掉了布雷维蒂和法官尼克森的威胁。

已经被定罪的马瑟诺又面临着曼哈顿的 RICO 审判，这次他将与妻弟塞尔·瓦伊塔尔一同受审，两人都被指控是黑手党“组织”的积极参与者。最严重的是，有力证支持的牵涉四条人命——博南诺家族三名角头和“多多”约瑟夫·帕特托——的阴谋罪指控只对准马瑟诺。针对塞尔的指控主要是随同马瑟诺参与了两起抢劫案和犯下妨碍司法公正罪。在管理委员会案中脱颖而出的首席检察官迈克尔·切尔托夫提出，如果马瑟诺承认至少谋杀了一人就可获得从轻量刑。马瑟诺拒绝了这项认罪协议——判

处约 12 年监禁且与他那 10 年的劳工敲诈罪刑罚一并执行——决心冒险接受审判。这是一场赌博，如果输掉，他可能要付出 20 年的代价。

“他是黑手党的霍雷肖·阿尔杰。”切尔托夫称呼马瑟诺说，意在提醒陪审团注意马瑟诺的重要性。这位检察官粗略地讲述了马瑟诺迅速成长的犯罪经历，警告陪审团他必定会成为黑手党的明星人物，除非能以有罪裁决令他出局。政府的核心证人是身材粗壮的暴徒雷·韦恩（Ray Wean），也就是马瑟诺的那个从前进行拦路抢劫活动的帮凶。抓住逃避监牢之苦的唯一希望，韦恩渐渐鼓起了勇气指证他的前角头。FBI 特工乔·皮斯通在将马瑟诺定罪的 814 分会审判当中发挥过作用，他这次又作为重要证人被召来证实马瑟诺在家族里的显赫地位。

在一次法庭休会期间，向来爱好交际的马瑟诺借机与乔·皮斯通长聊了一阵子。他想知道在《唐尼·布拉斯科》（一部即将上映的以这名特工打入博南诺家族进行卧底的经历为蓝本的电影）当中，哪个演员将扮演他。“那可真是个问题，乔伊，”皮斯通回答说，“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像你这么胖的人。”向来不会喜形于色的马瑟诺与皮斯通一起大笑起来。

两名具有 RICO 辩护经验的律师出现在被告席上。在管理委员会案中与切尔托夫对垒的塞缪尔·道森为马瑟诺辩护。瓦伊塔尔的代理律师是布鲁斯·卡特勒，在约翰·葛提那陪审团遭贿赂的首次敲诈勒索罪审判当中，他为其当事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并因此在律师界声名鹊起。这些律师深谙 RICO 法令的复杂性，不管裁决结果如何，他们决心凭借该法的“时限”性规定来克制检方的证据。

他们的策略果然奏效了。马瑟诺在牵涉四条人命的阴谋罪指控上被宣判无罪，但陪审团一致裁定这对姻兄弟犯下了许多其他罪行。然而，陪审员们却发现一些关键性的实质行为（特定的犯罪）都发生在提起此次公诉的 5 年之前或者彼此间隔有 10 年。主审法官援引诉讼时效法规支持了被告的动议，直接推翻了陪审团的裁决。他驳回所有指控的依据是，这些犯罪跨越了 19 年而不在 RICO 所规定的期限之内。一个技术上的漏洞让马瑟诺和瓦伊塔尔赢得了胜利。

审判开始时，卡特勒以吟诵的语调道出了瓦伊塔尔对马瑟诺的感情。他对陪审团说，“他不但与乔·马瑟诺一起在布鲁克林长大，不但热爱着乔·马瑟诺，不但与乔·马瑟诺有着姻亲关系，而且他为此感到骄傲，而且愿意宣示这一点”。RICO 指控于 1987 年 6 月遭到驳回，瓦伊塔尔因此能够在曼哈顿的一个牛排餐厅与律师一起欢庆胜利，而因劳工敲诈罪被判刑的马瑟诺不得不继续服完自己的刑期。

在马瑟诺被遣送到阿拉巴马州塔拉德加市联邦监狱服刑之前，瓦伊塔尔在下曼哈

顿的联邦拘押监狱大都会惩教中心探望了他一次。谈到自己在卡车司机 814 分会案中被宣判犯下 RICO 罪行，马瑟诺将责任归咎在角头加布里埃尔·因方提（Gabriel Infanti）的头上。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当拉斯泰利还在监狱服刑时，马瑟诺就通过那个工会从搬运公司索取了大量回扣。榨取这部分非法收入的管道是安东尼·吉利伯提，此人是被判过刑的抢劫犯，也是菲尔·拉斯泰利的远房亲戚。他刚出狱时对劳工事务毫无经验，但很快就成了一名领取高薪的工会组织者和工会代表。怀疑吉利伯提在抗命不遵且有可能向调查人员泄密，马瑟诺便下令除掉他。谋杀任务交给了因方提，于是在 1982 年 7 月 14 日的飞车袭击当中，正准备进入自己汽车里的加布里埃尔挨了 9 枪。枪伤痊愈之后，这名工会官员在接下来的 4 年中成了指控马瑟诺的关键证人。

马瑟诺向瓦伊塔尔埋怨称，因方提把谋杀吉利伯提的任务搞砸了，没有让杀手下车去干掉目标。他还为另一件事抱怨因方提。这个角头曾负责处理切萨雷·邦温特的遗体，但遭肢解的尸体在两个桶里被人发现且被查明了身份。最后，有人看见因方提与 FBI 特工帕特·马歇尔在一起说笑，这足以证明他是个背叛者。

向瓦伊塔尔暗示了谋杀指令之后，马瑟诺尖声说道，“我希望把这事儿办了，马上就去办。”

1987 年圣诞节的前一周，瓦伊塔尔与帮手诱骗因方提到布鲁克林的一个仓库里参加“例行会议”。在会议开始之前，他后脑遭到枪击并当场毙命。枪手将因方提随身携带的 2500 美元据为己有。不同于邦温特尸体的处理办法，因方提的遗体得到很好的隐藏，从来未被人发现。实际上，因为让吉利伯提活着去作证并将马瑟诺送进了监狱，因方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FBI 自我褒扬了一番，得意地看到博南诺家族高层人物被定罪判刑。老板拉斯泰利和被正式任命为二老板的马瑟诺被关进监狱，FBI 判定博南诺家族已经受到重创，其重要性已大为降低。在整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FBI 官员与特工都在准备向更大的黑手党目标发起进攻。

拉斯提·拉斯泰利那隐没无闻的王朝衰败了，谋杀清洗大肆盛行，赚钱的行当丢城失地，他本人、马瑟诺和其他资深领导人被投入监狱。早先，在被长期监禁之前，拉斯泰利在黑手党内部就以其致命的狂暴为人所惧。因对丈夫的不忠异常愤怒，他的妻子康妮主动向 FBI 告发了他的犯罪劣迹。1962 年，在向 FBI 举报后不久，拉斯泰利太太就失踪了，调查人员相信她是在拉斯泰利的授意下被谋杀了，尽管杀掉一个女人而不是靠恐吓使其沉默违反了黑手党的荣誉准则。

第二次被判处长期监禁的拉斯泰利不久就患上了癌症，虽然拥有老板头衔，但其权威在家族里不可避免地衰落了。马瑟诺则不然，监禁期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保有控制权和规划未来的时期。他将瓦伊塔尔提拔为角头，并以他为联系纽带带来继续统领家族的残余力量。

每月到塔拉德加市探监时，瓦伊塔尔都怂恿马瑟诺接受教父权杖，声称这是大多数角头的愿望。尊重老板可终生保有其头衔的“科萨·诺斯特拉”传统，而且对拉斯泰利着力提携自己也心怀感激，马瑟诺拒绝在拉斯泰利还活着的时候成为教父。然而，尽管对拉斯泰利心怀感念，但在与瓦伊塔尔的一次闲谈当中，马瑟诺的确随口说了一句尖酸刻薄的话。“他能有多聪明？他在监狱里都待了半辈子。”

瓦伊塔尔成了其囚徒姐夫的主要利益看守者。在被定罪之前，乔让他参与了五花八门的违法活动：放高利贷、从事赌注经纪、经营视频赌博机——通常被称为“鬼牌扑克”，以及勒索一家向“蟑螂”餐车供货的大型餐饮公司。每周从其他不法行当中还能有数千美元的收益，瓦伊塔尔必定将其中一部分交到姐姐（马瑟诺的妻子）与侄女手里。

“我有今日，全赖他栽培，”谈到不法利润的分配时，瓦伊塔尔对同伙说，“将50%交给他是理所当然的。”

瓦伊塔尔得尽表忠心与其过去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不无关系。马瑟诺准许他成为家族的荣誉者，而实际上他因为当了一年的矫正官本应自动失去这种资格。当聪明汉们问起瓦伊塔尔曾经是个狱警的传闻时，马瑟诺总是向他们保证那是无稽之谈。“我一向和他熟悉，”他撒谎说，“他绝不是个C.O.（矫正官）。”

马瑟诺依靠主要在布鲁克林活动的瓦伊塔尔和新顾问安东尼·斯佩罗充当其监管人，让他们全力保护家族的残余力量。他所有的命令和建议都由获准以亲戚身份探监的塞尔代为传达。马瑟诺的主要指示是：未经他批准不得吸收任何聪明汉；任何角头在他离开家族时不得玩忽职守；任何打手在他服刑期间都不得转往其他行动队。

“绝不要向其他家族暴露任何弱点，否则它们会占你的便宜。”马瑟诺告诫瓦伊塔尔说。他特别强调的另一点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你自己。”自信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马瑟诺所希望的，瓦伊塔尔经常厉声向角头们下令说：“乔希望这么做。”

马瑟诺还要求瓦伊塔尔与他在甘比诺家族颇具影响力的盟友约翰·葛提保持密切联系，至少每两周要与他接触一次，得听取他的建议。为了与葛提保持亲善关系，1990年瓦伊塔尔下令谋杀了博南诺家族的合伙人路易斯·图济奥（Louis Tuzzio）。在执行家族的谋杀任务时，图济奥意外打伤了甘比诺家族一名打手的儿子，这让葛提十

分恼火。葛提要炫耀他的权威，瓦伊塔尔就不得不迎奉他。

1991年和1992年，瓦伊塔尔获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当时他和马瑟诺的直接联系被切断。眼看就能获得保释资格，担心当局声称瓦伊塔尔的到访是来讨论有组织犯罪问题而拒绝将其提前释放，马瑟诺就将瓦伊塔尔从其访客名单中除掉了。瓦伊塔尔相信，通过继续前去探望丈夫的姐姐约瑟芬，马瑟诺会一如既往地对他“下达”重要指示。

与马瑟诺的当面交流被切断之后，瓦伊塔尔下定决心，一旦有危及家族利益的危机出现，他作为老板代理人将牢牢控制生杀大权。他继续为自己和马瑟诺搜刮不义之财，并行使着通常只有老板才拥有的至高权力。未取得马瑟诺的许可，他曾下令实施了三起谋杀。在街头上，没有人对瓦伊塔尔取得管理层分肥和发出死刑命令的权利提出过质疑。“所有人都知道瓦伊塔尔在代表乔讲话。”FBI特工杰克·斯塔宾当时特别指出。

身处塔拉德加的牢房之中，马瑟诺完全可以放心其黑手党家族的利益与个人的金库都受到了漂亮塞尔的保护。他已经为一个波澜壮阔的统治时期做好了准备，只等着监狱大门为他打开。

第 57 章 和善的教父“耳朵”

“他们正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更弱。”

1991年6月，拉斯提·拉斯泰利死于肝癌，时年73岁。第二年，乔·马瑟诺在服刑6年之后被授予“受监管释放”（保释）。在重获自由的第一天，他就以黑手党教父的身份受到了欢迎。在获释之前，马瑟诺指示瓦伊塔尔说，“如果拉斯泰利死了，就让我做老板。”塞尔自然遵命行事。在拉斯泰利的葬礼结束数天之后，按照黑手党的规程，在角头“疯子查理”查尔斯·穆西洛（Charles “Crazy Charlie” Musillo）位于斯塔藤岛道森区的家里，顾问安东尼·斯佩罗主持了一次由十来名角头参加的会议。作为唯一的候选人，乔·马瑟诺毫无争议地当选为老板。

考虑到政府在重要的RICO案件中所运用的手段，马瑟诺出狱后决心避免犯下任何令其他老板落入圈套的错误。以其49岁的年龄，如果能避开RICO陷阱，他还会有一段很长的任期。作为保护自己和改造家族的第一项举措，他关掉了家族的社交俱乐部，他认为它们无异于公开的靶标，诱惑着执法部门前来进行电子窃听与监视。促使他禁用传统聚会场所的一个诱发事件在他获释前不久发生。

在马瑟诺被监禁期间，瓦伊塔尔鼓励家族成员在麦斯佩思公共图书馆附近的一个中心会所里聚会。那是一处掩藏在一条胡同后部的一层楼建筑，邻近格兰德大道。这个所谓的“格兰德大道社交俱乐部”是角头“棒球手米基”迈克尔·卡德洛（Michael “Mickey Bat” Cardello）的活动据点。瓦伊塔尔频频造访那个俱乐部，并开始每周二在那里举办大型宴会款待所有行动队的打手。实际上，他是在模仿马瑟诺。以前，马瑟诺每周都会会在J&J俱乐部举行一次聚会，聪明汉们纷纷到场以表恭敬之意，现在，他们赶来为马瑟诺的最高代表瓦伊塔尔捧场。

格兰德大道上的欢宴被FBI所察觉，特工们随即在其主房间里秘密安装了一个摄

像机和三个窃听器。尽管在俱乐部里倍加小心，但卡德洛和打手们在胡同外面会口无遮拦地交谈。两个被巧妙隐藏在外墙里的窃听器捕捉到了他们的谈话，而通过窃听街头上一个公用电话亭内一条黑手党人自以为安全的线路，FBI也屡有收获。令马瑟诺气愤的是，在他获释前不久，FBI成功地实施了代号为“格兰德终曲”的行动，让卡德洛和七名打手及合伙人因敲诈勒索罪被定罪。

“格兰德终曲”行动的首要目标瓦伊塔尔逃脱了FBI的猎网。尽管如此，因为在格兰德大道俱乐部主办招来FBI渗透和指控的大型聚会，愤怒的马瑟诺严厉斥责了瓦伊塔尔。

关掉俱乐部是马瑟诺安全计划的序幕。为了把自己与潜在的告密者隔离开来，并避免其直接介入家族的犯罪活动，他分散了家族的组织机构，成立了更多的秘密小组。其精干的核心组织由高级角头组成，他们每人各司其职，监管某一领域的重大活动，在不得探听其他人事务的同时通过瓦伊塔尔向马瑟诺间接地汇报情况。尽管意外地发生了灾难性的格兰德俱乐部事故，但鉴于在自己受监管释放期间塞尔在管理家族事务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马瑟诺还是正式任命塞尔为二老板。如果违反保释条款，马瑟诺在今后两年随时就有可能被送回监狱服完刑期。保释条款中有条禁令便是不得与知名罪犯和被判过刑的黑手党人交往。尽管瓦伊塔尔被怀疑是个荣誉者，但他从来未被证明犯过与黑手党有牵连的罪行。作为近亲属，两人有正当理由探访彼此的家庭，他们在私人的家庭宴会和社交活动当中见面不会危及马瑟诺的自由。这是个审慎的周全之策，它不至于引起保释机关的愤怒，也让FBI难以证明他们的交往有违法条。

1992年11月返回昆士区后，在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里，马瑟诺主持了一场由全体角头参加的庆祝会。他利用这次机会确认了对角头们的重新任命，同时向众人宣布他在保释期间将通过瓦伊塔尔传达命令。另外，他们仍需通过他的妻弟向其交纳贡金。

为进一步确保安全，他向“钦”文森特·吉甘特学了一招，禁止其他人提及自己的名字或绰号。吉甘特的吉诺维斯家族成员在提到他时都会轻拍或指着自己的下巴。马瑟诺则指示手下摸一摸或指向自己的耳朵而不得道出他的姓名。最后，破解了马瑟诺那密令的调查人员戏称他为“耳朵”。其他家族对他心怀恭敬的成员称之为“大乔”，这既突出了他那159公斤的体重，也显示了他作为黑手党名人所具有声望。

在向角头们传达如何使用马瑟诺的固定称谓时，瓦伊塔尔强调：“我们只有让我们老板和其他老板一样强大。我们必须保护乔，否则家族就会分裂。”

马瑟诺下令推行的另一项变革透着些许自负与虚荣。他规定聪明汉们不得再把自己的帮派称为“博南诺”家族，这个沿用了六十多年的名字将不复使用。从今往后，他们应称自己的组织为“马瑟诺”家族。马瑟诺声称，早就应该去除乔·博南诺的名字，因为他著书立传和接受电视采访玷辱了家族名声，泄露了“科萨·诺斯特拉”秘密，并帮助敌人在1986年将管理委员会成员定罪。“乔·博南诺因为背叛曝光内情而令家族受辱。”马瑟诺对瓦伊塔尔说。马瑟诺一方面禁止在谈话时提及其姓名，另一方面又沽名钓誉地更改家族名称，这过度的自负让他看不见这二者间的矛盾。

这个新教父近乎病态的安全意识让他改变了家族成员传统的人会议式。担心FBI突袭仪式现场会暴露“乌默它”宣誓的道具——一幅将被焚烧的圣像画和一把象征着忠于家族的刀子或手枪——于是他下令禁止使用它们。在他对新成员进行了资格审查之后，瓦伊塔尔、斯佩罗和角头们将授权主持一场简化的仪式。无需割开扣动扳机的手指取血，也不用手捧燃烧着的圣像画，这种仪式就能让候选者“再生为”家族的正式成员。如果特工突然闯进来，黑手党人可以声称他们是一帮朋友，正在打牌或参加社交聚会。

马瑟诺还推行另一项严格的安全考验标准，要求候选者必须有8年与荣誉者共事的关系。他相信这会确保新打手的可靠性和降低像FBI特工乔·皮斯通那样对家族进行渗透的可能性。

按照新的规程，瓦伊塔尔在住宅、商店、工厂和酒店里主持过约20场仪式。所有参与者，新老打手，都站起来手扣着手，这时瓦伊塔尔吟诵道：“以马瑟诺家族的名义，我们紧紧地、秘密地团结在组织之中。你们今天再生了。今天，你们开始了你们新的生命。”1995年，在受监管释放结束之后，马瑟诺参加了入会议式，并骄傲地将家族在全国所有犯罪集团当中创下的独一无二的记录告诉了新打手，称它是美国唯一从未出现过卧底线人或政府合作证人的家族。

按照“按需相告的原则”，马瑟诺尽可能限制信息流量，即使对角头也是如此，以防在特工征募线人或对打手实施电子窃听时造成更大的泄密机会。认为依赖其他家族的可靠性也得不到保证，他事实上禁止手下参与它们联手进行的项目。他让新角头“大路易”詹姆士·塔塔莱昂纳脱离了黑手党的一个重要委员会，“我们实际上与建筑工会无关。”马瑟诺说。角头安东尼·格拉齐亚诺（Anthony Graziano）退出了那能带来数百万美元不法利润的燃油营业税骗局。“让我们忘掉它吧。”这是马瑟诺的简短解释。

他把角头与家族特定的不法行当捆绑起来，便于为自己培养忠诚的追随者并构筑

安全屏障。每个角头都拥有自己的个人财富，此举将激励他们时刻警惕调查陷阱。他还向角头和打手们施压，让他们推荐自己的儿子为荣誉者。他的理由是，他们更熟悉“科萨·诺斯特拉”的习俗，而且具有更高的忠诚度。马瑟诺认为，通过招募后代并将他们安插在其父亲的行动队里，角头们会紧咬牙关保护儿子——和他自己。行动队的指挥官们心里清楚，如果他们成为叛徒，他们的儿子就会面临着内部报复的危险，而且很有可能被处死。马瑟诺相信，背叛者将失去很多东西。

和其他教父会面是个令马瑟诺头痛的事情。在管理委员会案中，教父们进出会场的照片是极好的间接证据。管理委员会审判之后，家族间的高层聚会不再经常举行，偶有召开他也是派瓦伊塔尔或斯佩罗代替自己参加。

他与约翰·葛提之间的长期友谊和惺惺相惜的好感已大不如往昔。马瑟诺的刑期结束时，葛提的终身监禁才刚刚开始。在一次与瓦伊塔尔开诚布公的交谈当中，他批判了葛提，指责他违反了“科萨·诺斯特拉”准则，招来了公众对他们秘密社团的关注。“他违反了每一条准则。约翰毁掉了这一代人。约翰让我们回到了100年以前，而他对保罗所做的一切（谋杀老板保罗·卡斯特利亚诺）也绝不是我愿意干的。”葛提死去时，马瑟诺没有参加他的守夜与葬礼。

与葛提不同，马瑟诺喜欢隐姓埋名。他希望隐身幕后，他的面孔远离电视新闻节目，他的个人简历和照片从未刊登在报纸上。出于同样的原因，他避开了“科萨·诺斯特拉”的大多数社交活动，包括守灵、葬礼、婚礼和本家族成员及其他帮派要人的洗礼仪式等。为了躲开调查人员窥探的眼睛和相机，只有当出于对黑手党传统的尊重而必须前往时，他才会派代表参加这些黑手党的活动。

面对最新科技，马瑟诺禁止使用移动电话谈论黑手党事务。他知道这种电话能像有线电话一样容易被监听。通过窃听，执法机关可以发现以前所不知的打手并探查出家族的真正实力。他还相信，FBI会利用那小小的移动电话做文章，把窃听器藏在里面交给线人对各个家族进行渗透。

所有家族成员都得到忠告，要像他那样对司法人员谦恭有加。从现在起，即使被特工和侦探纠缠不休，他们都得像礼仪学校的毕业生一样有礼貌。他们可以保持沉默，但他不喜欢可能招来积极调查的顶撞。

如果有家族成员遇到法律麻烦，马瑟诺的政权将施以援手。他设立了一种由他控制的专用基金，要求每名角头和打手每月缴纳100美元。一旦为家族犯罪而被捕，家族将为成员支付全额律师费。在向他的行动队收取这部分必缴的费用时，弗兰克·利诺称：“如果你有麻烦，老板就会帮你。”不过多年以来，马瑟诺只在一起刑事讼案中

拨出过 15 万美元。

博南诺家族向来注重发展黑手党的国际联系，马瑟诺与家族里出身于西西里并擅长毒品走私的齐普派别重新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81 年，他为了除掉三名反叛角头曾将重要齐普拉进了拉斯泰利的阵营，现在他打算再次把他们作为一支秘密军团使用，主要因为他们不为纽约执法当局所知。家族那蒙特利尔的齐普行动队约有 20 名打手，由狂热地拥戴马瑟诺为教父的“加拿大乔治”杰兰多·西亚西亚和维托·里佐托领导。

马瑟诺已经就任为老板的传闻被 FBI 获悉。1993 年初，在马瑟诺出狱后不久，时任 FBI 科洛博-博南诺小组负责人的林恩·德维基奥和他的博南诺家族专家杰克·斯塔宾突然赶到霍华德海滨，来到马瑟诺那两层带柱廊的住宅楼前。打开前门后，马瑟诺没有将特工请进屋内。斯塔宾知道马瑟诺极为狡猾，根本不给他们勘察室内的机会来找地方秘密设置窃听器。

德维基奥喜欢玩“智力游戏”，喜欢通过与黑手党人攀谈来亲自评估他们的价值，并观察他们面对压力时如何反应。可能性总是有的，他们某个人也许会说漏嘴泄露一些有价值的情报，而且这还是一种成功机会虽不大却能建立友善关系的好办法，如果某个黑手党人遇到麻烦想要合作而需要联系 FBI 时，这种关系就能起到作用。

除了摸摸马瑟诺的底细，特工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向 15 年前受到乔·皮斯通欺骗过的聪明汉“左撇子枪手”鲁吉埃诺传递警告信息。FBI 相信，马瑟诺以前曾打算杀掉无能的鲁吉埃诺，但“左撇子枪手”还是得到了宽恕，并且就要服完因皮斯通的证据而获罪的刑期被释放。德维基奥和斯塔宾建议马瑟诺警告鲁吉埃诺，让其重返黑手党社会后不要报复皮斯通和他的家人。“不会有事的，你们尽可放心。”马瑟诺保证说，这实际上证实了他在掌管家族。

在与特工开玩笑时，因为在最近一次的汽车盯梢中甩掉了斯塔宾，马瑟诺特地向他道歉。“这是意外，”他说，“不是要故意逃避，因为走过了妻子想下车的地方，所以才来个急转弯。”

在驱车返回办公室的路上，特工们知道马瑟诺的自负在作怪，他想炫耀自己并不比 FBI 精英逊色。“那个家伙对汽车、车牌号和曾经跟踪过他的人有着难以置信的百科全书式的记忆力。”德维基奥对斯塔宾说，“他待人或许热情，举止也可能守旧，但他也确实喜欢卖弄自己是多么聪明和谨慎。”

为了取得保释资格，马瑟诺必须说明其合法收入的来源。他坚称自己是长岛法明

戴尔“餐饮天王”公司的顾问。这家公司负责为“蟑螂”餐车的经营业主（作为副业，有些业主当然还会从事赌注经纪和高利贷活动）备办热菜和点心。塞尔·瓦伊塔尔在那家郊区食品厂里也拥有类似的挂名职位。

这对姻兄弟于1984年获得他们的挂名工作，公司股东们当时耳闻了这对黑手党人的大名，就暗中恳求他们给予帮助。卢切斯家族的打手卡迈恩·阿韦利诺在附近拥有一家类似的餐饮企业，而且还想争夺他们手中红红火火的生意。后来乔和塞尔出面干预，将“餐饮天王”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防止地位远不及他们的阿韦利诺继续骚扰。为了漂白不法收入，乔和塞尔成立了一家空壳企业——昆士餐饮公司。在“餐饮天王”投资50万美元之后，这个假公司每年可分得50万美元的年红利，同时每月还能获得1.75万美元的酬金。在马瑟诺被监禁期间，瓦伊塔尔将乔的那份酬金转给了他的妻子。

马瑟诺每周到食品厂露面一次，通常是靠打牌来打发时间。遇到调查，这家公司遮人耳目的说法是，除了就“蟑螂”餐车的供货路线提出建议外，他还为他们的食品调制一种味道鲜美的调味汁。在工作日期间，许多卡车、轿车和人员在工厂里进进出出。在那巨大的一层楼建筑内，调查人员要想监视马瑟诺实际与何人接触实属不易。

在食品厂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态度和善的马瑟诺驳斥了他是新任教父的说法。“我不相信有所谓的黑手党存在。一群意大利人出去吃饭，他们就说那是黑手党。”马瑟诺声明自己是个“合法公民”，除了这餐饮职位外，还靠经营不动产谋生。“我付出了我的时间，我得到我该得的东西。”他回答时任《时报》记者的本书作者说。

“餐饮天王”公司的职位是马瑟诺合法收入证明计划的一部分，他可以借此向IRS（美国国税局）申明自己有一份正经收入，有能力购买一套价值75万美元的住宅，还有钱在昆士区和佛罗里达州购置房地产并在纽约投资停车场。不动产大多数都以其妻子的名字购置，而且她每年从停车场生意当中还能抽取0.9万~1.7万美元的收益。总体上，他的资本净值最终将高达1000万美元。

马瑟诺的纳税申报单上没有填写他的高利贷与赌博收入，也没有列明其行动队缴纳的贡金。他和瓦伊塔尔经营着一个稳赚不赔的“银行”，那就是强迫角头和打手以1.5%的周利率借贷，然后由他们以甚至更高的利率转借给其他受害者。角头们向其高利贷打手强调了准时将本金和利息收回的极端必要性，因为里面含有必须上交给领导层的高额利息款。从来没有人拖欠，“他们更清楚，”瓦伊塔尔说，“你怎能不还钱给你的老板和二老板呢。”将60万美元的本金投到街面，乔和塞尔每周就能收到9000

美元的超额利息。

所有贷款都得经马瑟诺批准，但由瓦伊塔尔负责在他的“秘密账本”，即一个小小的螺旋形活页簿上列明了放贷金额和利息。老客户弗兰克·利诺借去50万美元，数年后还款约100万美元，这给家族领导层带来了一笔可观的利润。

体育赌博由“管理员”们替马瑟诺操作，这些专业的赌注经纪人与他们的头头对半分享利润。情况好的时候，一周就能为管理层带来1万~1.2万美元的收益。90年代末，马瑟诺没有继续在棒球上下赌注，他抱怨自己快要“被杨基队毁掉”了，这个棒球队为它的纽约赌迷们连连赢得了比赛。

通过非法的视频赌博游戏，即通常所说的“鬼牌扑克”，这个家族及其领导阶层轻松地捞取了巨额财富。这些机器通常被放置在咖啡馆、酒吧、餐馆、比萨饼店、黑手党的社交俱乐部，甚至是糖果和百吉饼店里，可以接受硬币和100美元以下的纸币。每台机器都能记录赢输，游戏结束时，玩家就从经营者那里取走余额，而经营者将与拥有赌博机的黑手党人对半瓜分盈利。

20世纪90年代，博南诺和其他家族提供了4种赌博机：鬼牌扑克，玩家至少得抽到一副对子才能赢；水果机，类似于合法赌场里的老虎机装置；电玩老虎机，可用于包括“21点”在内的各种靠运气赌博的机器；夸特马，玩家押注在屏幕上挑选比赛的获胜者。

角头弗兰克·利诺布点设置了几十台“鬼牌扑克”机，每周的利润高达4万美元。马瑟诺家族管理层要求将视频赌博总收入的10%上交。利诺将这部分款项称为“（教会）什一税”，他对同行说，“我猜黑手党是在学教会。”

马瑟诺家族有条习俗是要求角头们每月缴纳“贡金”，圣诞节时还得捐出一大笔“孝敬钱”。腰包硬实的角头弗兰克·科帕通常每月上交6500美元，圣诞礼金为2万美元；角头理查德·坎塔瑞拉的月费是1500美元，圣诞节的孝敬费为2.5万美元。加拿大行动队每个圣诞节都会送来1.5万美元。另一个出手阔绰的角头“大路易”詹姆斯·塔塔莱昂纳在20年间共计向马瑟诺纳贡15万美元，甚至瓦伊塔尔在圣诞节时也捐出1万美元给老板。

得益于90年代其他家族的大规模被定罪，马瑟诺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就确立了自己作为纽约乃至全国头号教父的地位。约翰·葛提（甘比诺家族）、文森特·吉甘特（吉诺维斯家族）、维托利奥·阿穆索与安东尼·卡索（卢切斯家族）和卡迈恩·珀西

科与维克托·奥瑞拉（科洛博家族）全被关进监狱。1998年，他们的组织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正设法进行重新整合。博南诺家族一枝独秀，其领导层毫发无损，马瑟诺乘机填补了被囚教父们留下的权力真空。这个家族正从“唐尼·布拉斯科”的卧底灾难中恢复元气。虽然其正式党徒一度不足100人，但马瑟诺已经将荣誉者人数提高到150人以上，并组成了15支有效运作的行动队，其严格的纪律和安全措施看起来发挥了作用。与那些背叛者蜂拥而出的家族迥然不同，博南诺/马瑟诺家族从未出现荣誉者叛徒，这表明其家族成员坚定地忠实着“乌默它”和“大乔”。

作为纽约唯一呼吸着自由空气的全权教父，马瑟诺有足够的影响力为所有黑手党家族制定大政方针。在1999年底或2000年初的某个日子里，对自己的安全和逃避监视的能力颇为自信的马瑟诺罕见地召集了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并且同意亲自到场。与会者有甘比诺家族的老板彼特·葛提和其他三个家族的代理老板。马瑟诺精心挑选的会议地点是深受其信任的打手路易斯·雷斯帝沃（Louis Restivo）的家。那套住宅所在的里戈公园是昆士区一个较大的犹太中产阶级聚居区，黑手党人一般不会到那里去。

管理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议程是想办法解决科洛博家族内部的领导权争斗。马瑟诺未能调停好这个棘手的争端，他事后向瓦伊塔尔解释说，冲突各方“积怨太深”。

另一个主要议题是充实受RICO审判重创而萎缩的各个家族。除了迅速填补死亡和引退成员的空缺之外，每个家族每年在圣诞节时还可以新增两名打手。纽约“科萨·诺斯特拉”有条规定，要求所有候选者必须通过其他家族的审查。在入会仪式举行之前，每个家族有两周的时间就其他家族候选者的可靠性提出异议。

这次管理委员会会议后不久，马瑟诺怀疑其他家族阳奉阴违，正在更快地扩充自己的队伍。它们重新用上已死亡打手的名字来加快入会速度和充实力量。每个家族的基本人数在20世纪30年代被洛克·卢西亚诺的严格限定过，以防某个家族变得过于强大而引发黑手党的内部对抗与战争。马瑟诺决心坚持以前的规定，指示瓦伊塔尔保留一份死者名册，防止其他家族重复使用亡者之名。

马瑟诺已成为全国地位最稳固的教父，为了与自己的新地位相称，他变得更加时髦起来。他的衣橱里塞满了一个本森赫斯特的裁缝根据其肥胖体形精心缝制的欧式套装和其他衣服。作为抢劫者和角头，拥有福特、别克和凯迪拉克中型轿车就让他心满意足，而现在他喜欢上了梅赛德斯-奔驰。

1996年，胃口始终很好的马瑟诺成了麦斯佩思卡萨布兰卡饭店的幕后老板。他经常到那里用餐（有时是一碗简单的撒上熟胡椒粉的扁面条），而大多数时候，为炫耀

其非同小可的身份，他会放开肚量与角头和打手们一起大嚼那烘脆的棒形面团卷，享用那碗盘满桌的小牛肉和意大利面糊菜。既然饭店——打手路易斯·雷斯帝沃是名义上的店老板——是个公共场所，检察官就难以证明它是个黑手党讨论犯罪活动的窝点。

和原来的邻居约翰·葛提在曼哈顿频频光顾的那些时髦夜总会相比，卡萨布兰卡饭店只能算是个蓝领餐馆。它靠近 Pep Boys（曼尼、莫尔与杰克三猛士）公司的一个汽车零部件供货仓库，坐落在一条单调破旧的商业街上，这也体现出了马瑟诺不事张扬的行事特点。坐在可供 80 人用餐的伪装饰艺术风格的厅堂里，沐浴在明亮的霓虹光中，客人可以感受到它是在谄媚 1942 年的经典电影《卡萨布兰卡》。汉弗莱·博加特的雕像如真人般大小，穿着白色无尾礼服醒目地立在饭店门口，那部影片的招贴画和演员照片则张贴在餐厅的所有墙上。男洗手间的门上贴有一张博加特的照片，而合演女星英格丽·褒曼的剧照则令女洗手间的门陡然增色。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菜肴是这家饭店的特色菜，其菜单中有一种被称为“妖怪特使”的砖灶比萨饼，还有一种借用博加特的一句著名台词命名的“就看你的了，孩子”比萨。

作为马瑟诺家族黑手党人的一个强制性就餐点，这家饭店的成功让他每周可以从中抽走 750 美元的盈利。为博得马瑟诺的好感，打手和合伙人们出于无奈经常在饭店大厅里举行聚会。“这是老板的地方。为什么要把钱送给别人？”每当其行动队的打手们筹划社交活动时，角头理查德·坎塔瑞拉就会语气强硬地向他们建议道。

很明显，在一开始的遭遇战当中，马瑟诺战胜了 FBI 的 C-10 博南诺小组，后者甚至不知道该家族已经易名。回顾 1998 年与其他特工的并肩战斗，该小组主管特工杰克·斯塔克估计，“耳朵”在五年间已通过黑手党传统的地下产业使家族恢复了元气，并且正在 90 年代那趋于繁荣的股票市场里开拓新的疆土。情报报告显示，主要通过向遇到财务危机的高消费雇员提供高利贷，马瑟诺的一些角头已成为黑手党深入不法经纪公司的开路先锋。“他们先把受害者诱入圈套，再在炒股诈骗和其他阴谋当中利用其才能，”斯塔宾告诉小组里的新特工诺拉·康利（Nora Conley）说，“他们正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更弱。”

斯塔宾曾尝试各种办法攻破马瑟诺的防线。在寻找一种打破常规的接敌途径时，斯塔宾向纽约整个有组织犯罪部门的主管特工凯文·多诺万（Kevin Donovan）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想借用刑事侦破会计师，也就是从事白领事务与股票诈骗案件调查的特工，FBI 此前从未考虑过将他们专门用在黑手党调查上。斯塔宾认为会计师们或许

能抓住马瑟诺，但不是“正面与他对垒”，而是通过一场侧翼进攻，即审查马瑟诺和瓦伊塔尔手下的财务记录，那些人正在源源不断地为他们创造财富。斯塔宾的计划是重点调查涉嫌为家族处理洗钱业务的合伙人，或者本身就是敲诈勒索受害者的人。如果他们因金融犯罪被逮捕，所有人都将是潜在的脆弱环节，都可能害怕受到长期监禁。凭着逃税罪或 RICO 指控的少许压力就有可能说服这些捞钱人和受害者合作，让他们携带窃听器 and 允许自己的电话接受监听以取得指控马瑟诺及其高级头目的罪证。这是一场耗费时日的赌博，要系统地、渐进式地办案以追查不法之财如何流向乔和塞尔。

“银行系统的记录不可能更改，”斯塔宾告诉多诺万，“如果我们有人知道需要查什么，知道那钱流向何处和清楚它如何流过去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揭开马瑟诺帝国的秘密。”

斯塔宾知道普通黑手党特工未受过解读财务记录的训练，因而他希望刑事侦破会计师（一种较新的工种）能为他的小组工作并取得类似于他们在盗用公款和欺诈案调查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聪明汉会撒谎会欺骗，但银行记录不会改变。”斯塔宾向多诺万强调说。

斯塔宾搬来了两个年轻的援兵。他们在追猎“科萨·诺斯特拉”暴君方面显得经验不足，但仍不失为能干的执业会计师。第一个人是 29 岁的杰弗里·萨奈特（Jeffrey Sallet）。他天性活泼，对细节有着准确持久的记忆，在 1998 年参与马瑟诺案调查之前已有近两年的 FBI 工作经历。萨奈特在波士顿郊区长大，有个在财政部任调查员的叔叔。受叔叔那激动人心的冒险经历所激励，他最终成了一名 FBI 特工。

1999 年 3 月，另一名前来报到的会计师是已经有一年 FBI 工作经验的金伯利·麦克卡弗里（Kimberly McCaffrey）。她留着一头乌发，虽然身高仅 1.52 米，但正值 26 岁的年纪，似乎总也不知疲倦。作为青少年奥林匹克奖牌得主，她在马里兰州陶森德大学（Towson University）获得过一笔体育奖学金。她在新泽西州北部长大，加入博南诺小组时对黑手党的了解非常有限，只不过是少女时期读过一些与约翰·葛提的经历及其逃避有罪判决的相关报道。“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还在街头而不是监狱，”她后来对朋友们说，“这让我萌生出总有一天我要凭自己的本事与黑手党较量的想法。”

斯塔宾很快喜欢上他的两名刑侦会计师特工。他告诉多诺万：“他们看看那一箱子单据和档案材料，很快就能弄清洗钱和逃税的模式。这可是我们其他人都干不了的活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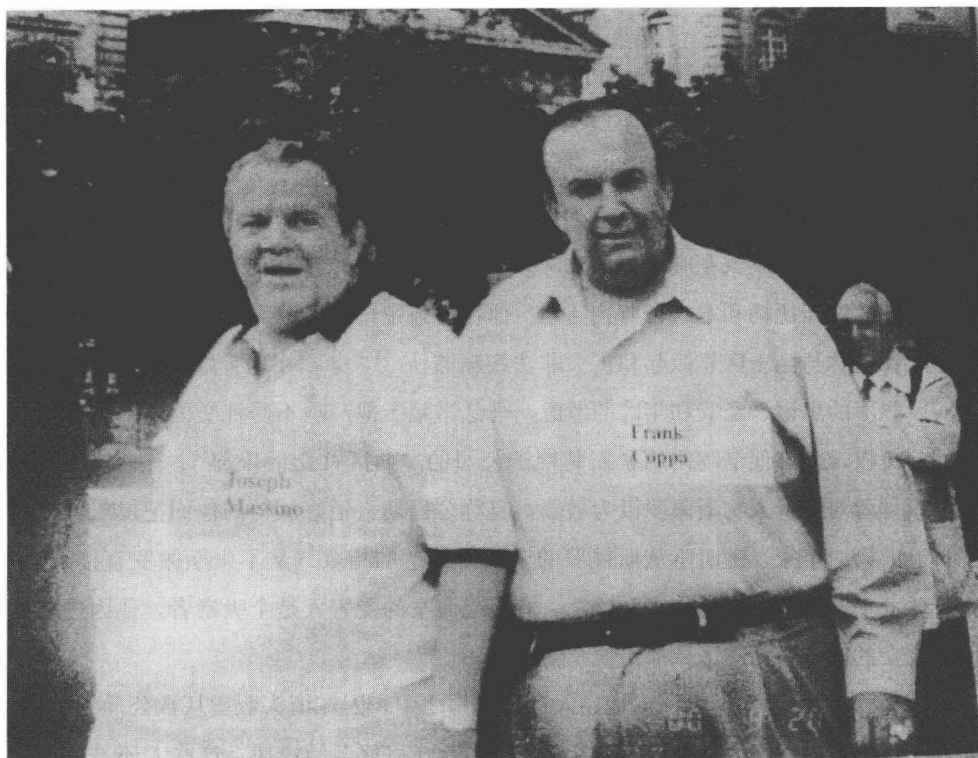
当两名会计师在 FBI 总部忙于整理马瑟诺的个人档案时，警方正在东河对岸以传统方式对该家族的“老人”——顾问安东尼·斯佩罗展开了调查。警方和联邦缉毒局在布鲁克林进行的这场耗时三年的调查与斯塔宾的总体规划无关，它在 1999 年将谋杀与敲诈勒索的罪名牢牢地钉在斯佩罗身上。这名顾问的麻烦肇始于黑手党那由来已久的隐患——与毒贩相勾结。

靠经营“大苹果汽车服务公司”做幌子，斯佩罗长期在南布鲁克林意裔美国人聚居区以外的巴斯比彻和本森赫斯特活动。他在当地很出名，因为擅长在屋顶调教鸽群和在布鲁克林与昆士区靠掀起和扩大非法视频赌博（“鬼牌扑克”游戏）来牟利。出于对斯佩罗的忠诚、经验和年龄的考虑，马瑟诺赋予他一项不受社交俱乐部禁令所制约的豁免权，允许他继续使用紧靠其幌子公司的“西区社交俱乐部”。有一群年轻好斗的崇拜者对传奇人物斯佩罗极为敬慕，自称“巴斯大道好汉”的他们把俱乐部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随时听从斯佩罗的亲信所传达的指令（从不由斯佩罗直接下达）执行任务——抢劫、人身伤害和谋杀。有一起命案的受害人是个吸毒者，他因进入斯佩罗之女的家行窃而犯下致命错误。

“巴斯大道好汉”们已深深地卷入毒品贸易之中，因在街头贩卖从数公斤到 10 美元一小包不等的海洛因，他们有 19 名成员被警方和禁毒局逮捕。这些人还是穷凶极恶之徒，经常用焊枪和棒球棍来教训涉嫌欺骗他们的人。在一次被羁押期间，这些暴徒当中有许多人开口招供罪行，导致斯佩罗与他的主要传令者“J. B.”约瑟夫·贝南提（Joseph “J. B.” Benanti）受到了牵连。10 年前，当 FBI 特工威廉·范德兰德（William Vanderland）发誓要抓住从未被长期监禁过的斯佩罗时，这个老黑手党人干脆地回道：“我可以奉陪。”2001 年，斯佩罗因领导 RICO 组织被定罪，并在 72 岁时被判处意想不到的终身监禁。听到宣判时，斯佩罗的脸红了。他被定罪的依据全部是间接证据，没有直接证词证明他曾明确下达过任何实施犯罪的指令。

斯佩罗案的首席联邦检察官詹姆士·瓦尔登（James Walden）后来承认，调查人员“竭力寻找并希望搞到马瑟诺牵连其中的证据”，但最终未找到丝毫对他不利的东西。“其他家族都处在极为混乱的状态之中，但马瑟诺似乎已经巩固了其内部组织。”瓦尔登说。

斯佩罗的麻烦加深了马瑟诺的恐惧，他担心自己会被暗藏窃听器的线人或电话窃听装置录下闲谈之语而受到牵连。早先，他认为在街头走谈和在卡萨布兰卡饭店与瓦伊塔尔及少数几个角头进行悄声细语的谈话是安全的。在 2001 年斯佩罗受审之前，他提高了警惕，并将与心腹角头们进行超机密的谈话挪至国外进行。他还指定他们组



2000年，肥胖的角头弗兰克·科帕为乔·马瑟诺及其妻子到法国和蒙特卡洛旅行埋单。马瑟诺利用由角头陪同的海外旅行摆脱FBI的窃听器 and 摄像机监视以处理家族事务。（司法部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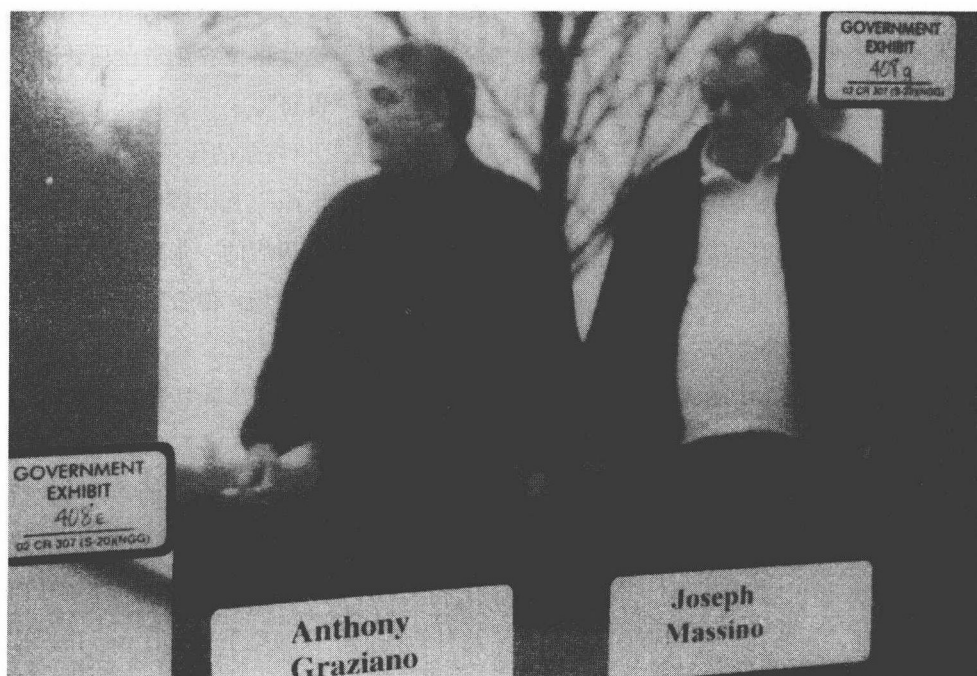
成一个相当于其执行委员会的小组，暂时履行顾问职责。马瑟诺相信，美国执法特工不会到海外追踪他。在一种远离监视威胁的轻松环境里，他指导自己的部下们获得了新的执行任务的能力。这些黑手党人通常由妻子陪同随行，这种办法有助于将出境活动伪装成单纯的旅游度假。在一次携妻陪同马瑟诺夫妇到法国和蒙特卡洛旅行的过程中，角头弗兰克·科帕包下了一切开销，他以前就献给其教父大量珠宝和一件裘皮上衣。马瑟诺则在巴黎送给科帕一串念珠，算是答谢之物。

角头安东尼·格拉齐亚诺被公认是家族的代理顾问，他曾带着妻子罗妮与马瑟诺夫妇一起前往墨西哥旅行。60岁出头的格拉齐亚诺人称“T.G.”，是家族管理层的忠实捞钱人。他领导着一支在斯塔藤岛和布鲁克林靠销售海洛因获取暴利的行动队，并在街头上投入了50万美元本金从事着高利贷生意，同时还经营着大量非法的“鬼牌扑克”视频赌博机。T.G.的行动队以暴戾野蛮而臭名远扬，他们用打火机烧焦受害者的皮肤，用绳子套住高利贷拖欠者的脖子拖行。格拉齐亚诺还扩大活动范围在佛罗里达州开了一家证券推销所，利用90年代的经济繁荣进行股票和电话销售诈骗。与

他的教父一起秘密前往墨西哥度假返回之后，在他那斯塔藤岛的珍藏品陈列室的墙上，怀旧的格拉齐亚诺挂了一排照片，照片中的马瑟诺和他们夫妇都面带微笑，一起游历了墨西哥。他此前精心搜罗了一些塞满填充料的动物头固定在墙上，现在这些照片就挨着他的珍藏物两侧依次排列着。

航空公司的记录和马瑟诺与格拉齐亚诺从墨西哥返抵纽华克自由国际机场的录像向 FBI 证实了二者之间的亲密关系。特工怀疑格拉齐亚诺已经获得提升来接替斯佩罗，并在海外旅行期间接受了履新晤谈。他们还发现，格拉齐亚诺随马瑟诺出现在一个为马瑟诺治疗糖尿病的诊所里，那里或许是另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放心地讨论他们共同的黑手党事业。

2001 年 12 月，通过线人得知格拉齐亚诺至少有三名合伙人准备送他圣诞“贡金”后，特工们随即申领到搜查证，在他离开斯塔腾岛一家饭店时对他进行了搜身。不顾马瑟诺要求谦恭以对的训令，格拉齐亚诺冲着特工约瑟夫·博纳沃朗塔（FBI 已退休的黑手党调查主管朱尔斯·博纳沃朗塔的儿子）和格雷戈里·马萨（Gregory Massa）破口大骂。“你们他妈的干吗烦我？为什么不去找本·拉登？”没有同这个怒气冲冲的



乔·马瑟诺被发现与其犯罪内阁成员“T. G.”安东尼·格拉齐亚诺一起离开其斯塔藤岛的私人医生诊所。FBI 怀疑马瑟诺 2001 年将这个医生的诊所作为一个密谈的安全地点。（FBI 的监视照片）

暴徒理论，作为可能接受非法酬金的证据，特工们将一个塞着超过 5000 美金的封面上写着“Buono Natale”（原文如此，意为“圣诞快乐”）的信封没收，特工在他的口袋里还另外发现了 31292 美元。在向瓦伊塔尔报告这搜身之辱时，T. G. 庆幸没有将另外 25 个信封带在身上，那些里信封装着打手和合伙人孝敬的数千美元现金。

马瑟诺非常看重格拉齐亚诺，他甚至愿意为保护他而杀掉自己的前盟友、享有威信的角色“加拿大乔治”杰兰多·西亚西亚。西亚西亚在 1981 年马瑟诺铲除三名反叛角色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他 10 年后出狱接掌家族统治权时给予了鼎力支持。出生在西西里岛的西亚西亚是个腰缠万贯的国际毒枭，在美国和加拿大活动并领导着家族的蒙特利尔行动队。在布鲁克林受到阴谋与甘比诺家族吉恩·葛提一起从事毒品交易的指控并被宣判无罪之后，西亚西亚返回了加拿大，但不久就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侨民被驱逐出境。1997 年被允许进入美国后，他搬进曼哈顿东区一套高档公寓房，继续遥控指挥其蒙特利尔行动队并监管其毒品贸易。

显然深受马瑟诺的信任，他进入了家族的执行委员会，承担了顾问安东尼·斯佩罗被指控后不得不放弃的部分职责。与格拉齐亚诺共事时，西亚西亚越来越担心经常吸食可卡因的 T. G. 靠不住。“每次我看到这个家伙，他都是一副飘飘欲仙的样子。”西亚西亚抱怨说，并怂恿瓦伊塔尔将这种情况报告给马瑟诺。格拉齐亚诺在马瑟诺面前对天发誓否认吸毒，并坚称他唯一服用过的麻醉品是“胃药”。

1999 年 3 月，马瑟诺解决了这两个角头的争执。在瓦伊塔尔的侄子结婚 25 周年纪念日上，马瑟诺把他的二老板带到一旁。“乔治得走了。”瓦伊塔尔记得马瑟诺这样对他说道，当时他们单独坐在长岛亨普斯特德村阿米瑟饭店的一张桌子旁。马瑟诺次日将前往墨西哥坎库恩度假一周，以便证明其不在犯罪现场，他希望在国外逗留期间西亚西亚能被除掉。

遵照指示，瓦伊塔尔将谋杀任务交给了角色“布朗克斯肉饼”帕特里克·迪菲利珀（Patrick “Patty-from-the-Bronx” DeFilippo）和打手“约翰尼·乔”约翰·斯皮瑞托（John “Johnny Joe” Spirito）。瓦伊塔尔交给迪菲利珀一把配有消音器的手枪去执行任务，“肉饼”后来则将谋杀的详细经过告诉了他。据瓦伊塔尔称，迪菲利珀对 65 岁的西亚西亚早有“满腹牢骚”，便约他在 1999 年 3 月 18 日晚上见面沟通。为了不让西亚西亚起疑，迪菲利珀谎称他们得和另一个将仲裁他们争议的黑手党人会合。由斯皮瑞托开车，迪菲利珀前往西亚西亚位于曼哈顿的家接上了他。坐在车上，据说挨着西亚西亚的迪菲利珀持枪朝着他的头和身子一顿猛射，把他打成了马蜂窝，随后在布朗克斯一条死胡同里把尸体抛了下去。瓦伊塔尔在角头中间散播假消息称，这起未经授

权的谋杀与马瑟诺的领导层无关，它似乎是一起与毒品走私有牵连的命案。为了防止西亚西亚的加拿大齐普行动队找马瑟诺复仇，这种烟幕弹必须得施放。

为了蒙骗那些加拿大人和家族其他成员，马瑟诺向角头们传话，称领导层将追查凶手。他命令四十多个聪明汉为西亚西亚守灵，虚情假意地宣扬他的悲伤和对被害角头的敬重。据称凶手迪菲利普也参加了守夜，但马瑟诺坚持其一贯政策没有参加这次可能引起执法摄影者注意的集体活动。不久，马瑟诺露骨地向两名心腹角头表露了他认为西亚西亚该死的真情实感。“他真是活该，该怎么管理家族轮不上他插嘴。”他对理查德·坎塔瑞拉说。“那就是他的教训，谁让他议论我的角头。”弗兰克·科帕也吐露了西亚西亚命案背后的动机。马瑟诺向他坦承了自己的不快，称“加拿大乔治”“想除掉 T. G.” 或者“伤害他”。

在霍华德海滨的一次宴会上，瓦伊塔尔告诉马瑟诺，那辆用来处死西亚西亚的汽车得毁掉，因为车里的血迹无法清除干净。“可怜的乔治，他肯定是血尽而死。”马瑟诺轻蔑地说道，接着又称将用家族公款补偿约翰尼·乔·斯皮瑞托的汽车损失。据瓦伊塔尔称，作为对斯皮瑞托个人的奖赏，马瑟诺声称谋杀乔治让他完全有理由被转正，因此就将他吸收为荣誉者。这个教父认为，那是一件干得漂亮的“活儿”。

第 58 章 黑手党迷

“这就是黑手党，我才不管用什么手段！”

出于安全的考虑，乔·马瑟诺开始周游世界。然而，他的海外之旅并不能确保他那精心构筑的保护墙牢不可破。三年来，通过对财务记录的深入研究，杰克·斯塔宾的刑侦会计侦探杰弗里·萨奈特和金伯利·麦克卡弗里正慢慢取得成果。开始时，他们选定塞尔·瓦伊塔尔为“关键人”，因为他长期充当马瑟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因而在 2001 年，他进入了他们的罗网。作为家族二号首脑，瓦伊塔尔日益富足起来，并从平民化的霍华德海滨——马瑟诺仍住在那里——搬到了长岛的时髦小镇迪克斯山庄。与妻子黛安娜分居后，1998 年他花 40 万美元再次在长岛另一个高消费阶层聚居的塞亚瑟镇购置了一套房产，并搬了进去。长岛郊区既是他的避难所，也是他谋财取利的沃土，那里有家银行被赌博与高利贷辛迪加变成黑手党的附庸和洗钱中心。

在萨福克县调查非法赌博的侦探帮助下，根据一名线人在另案中吐露的线索，麦克卡弗里和萨奈特发现瓦伊塔尔和一个临时行动队的数名合伙人在长岛梅尔维尔镇欧洲美国银行受到特别优待。调查该银行的交易记录时，特工们注意到大量的存款、取款和转账的金额都令人费解地略低于 1 万美元。按规定，如果交易金额超过一万美元，银行必需将其明细表——现金交易报告书——递交给财政部。这是一种以“重构交易”模式进行洗钱和逃税的手段。两名特工发现，大批金额稍低于一万美元的交易到瓦伊塔尔与其长岛的同伙处就中断了。五年来，这个二老板及其亲信通过这家支行漂白了大批款项。

当 FBI 和萨福克县探员找到同意合作的高利贷和赌博受害者时，调查便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那家银行有个会议室是瓦伊塔尔的暴徒处理高利贷事务的地方，受害者们讲述了在那里见到瓦伊塔尔的执法打手的情形。当银行的正常客户在出纳员面前办理

业务时，黑手党人正在那间里屋里恐吓自己的客户。甘比诺家族也通过那家银行洗钱，其合伙人“文尼 D”文森特·康吉利奥（Vincent “Vinny D” DeCongilio）特别凶恶，经常用藤条来抽打拖欠债款的债务人。

2001年11月，瓦伊塔尔和六名合伙人，包括那个银行经理，因受敲诈勒索和 RI-CO 组织罪指控被羁押。此前，另一个因将该支行变成黑手党的营业所而被捕的雇员采取了合作态度，曝光了黑手党人控制银行的内幕。虽然交纳了 50 万美元保释金后获释，但从未在监狱中待过一小时的瓦伊塔尔仍因敲诈勒索、高利贷和洗钱罪指控而面临着 20 年的监禁，于是他开始与政府谈判。他的认罪协议和供认瓜分了其行动队 1/4 的利润很可能使其刑期骤降到 45 个月。在等待正式宣判期间，他被软禁在家中，一举一动均受到电子监视。宣判未能如期进行，部分原因是瓦伊塔尔声称自己是个酗酒狂，要求被安排在监狱的药物滥用项目当中。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是个狂喝滥饮的酒鬼，但该项目会让监狱里的日子好过些，而且还可以让其监禁期减少整整一年。跟随着瓦伊塔尔，那个银行经理和其他四名行动队成员也纷纷认罪，以期取得从轻量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调查瓦伊塔尔是因为他与马瑟诺的关系而实施，但这项调查最后走进了死胡同。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马瑟诺逐渐剥夺了瓦伊塔尔的权力，更多地依靠执行委员会的角头们监管家族的日常事务和帮他收取分赃所得。瓦伊塔尔获准保留其二老板头衔，并和马瑟诺一起参与他们原来的主要以高利贷、赌博和勒索“餐饮天王”公司为主要内容的项目。马瑟诺冷冷地向瓦伊塔尔解释了这样安排的原因，称普通角头和打手们都“厌恶你”。瓦伊塔尔实际上被逐出了领导层，他甚至被禁止在每个角头都会受到马瑟诺欢迎的卡萨布兰卡饭店露面。

瓦伊塔尔对自己被遗弃很愤懑，但他无力反抗。他责怨马瑟诺破坏他与家族其他人的关系，大幅削减他的分赃收益。“为了他，我所有的事情都做过，”瓦伊塔尔向一个还与他保持联系的角头诉苦说，“他让角头们远离我，他们不能给我打电话，也不能送我圣诞礼物。”

马瑟诺向理查德·坎塔瑞拉和弗兰克·科帕吐露了他驱逐瓦伊塔尔的原因：他被“塞尔目空一切的大腕派头”激怒了。这些年来，马瑟诺说，他的二老板变得太傲慢、太自负了，喜欢别人称他“漂亮”，鼓励别人叫他“俊塞尔”。马瑟诺认为他的妻弟正在克隆约翰·葛提那妄自尊大的性格，想方设法地穿着时髦服装，还让设计师给他梳理头发。瓦伊塔尔拒绝劝说他的四个儿子加入犯罪家族，这在马瑟诺看来就是一种初显不忠的迹象。弗兰克·科帕、弗兰克·利诺、理查德·坎塔瑞拉和其他角头的儿子

都应募成了打手。

由于还有一些共同的确立已久的事业，瓦伊塔尔继续将来自这些领域的收益交给马瑟诺，并在个人家庭之间的交往中与他见面。失去家族角头的经济支持后，这个二老板自己在长岛开拓了新的地下生意。距离没有减轻马瑟诺对他的敌意。“你得当心点，乔对你不大满意。”打手吉米·加兰特，已故者卡迈恩·加兰特的侄子，警告这个落魄的二老板。马瑟诺的核心圈子成员弗兰克·科帕也提醒塞尔小心老板那不曾消解的憎恶：“小心点，待在长岛别动，你自己躲开些。”

瓦伊塔尔相信，既然将谋杀“加拿大乔治”的任务交给他，说明马瑟诺已经宽恕了自己。“需要杀手的时候，他还会找我。”瓦伊塔尔心里想。但这种希望转瞬即逝，他在长岛 RICO 案件中认罪只会加深马瑟诺对他的不信任。马瑟诺动用家族的专项基金替瓦伊塔尔支付了 5 万美元的律师费，但他怀疑那短短的四年刑期可能意味着他在告密。与科帕谈起瓦伊塔尔的情况时，马瑟诺说，“我们一起干过 7 次活儿，”承认瓦伊塔尔可能将他牵连到 7 起黑社会谋杀当中。将手比划成手枪的样子，马瑟诺接着说他得宽恕塞尔，因为他是自己的妻弟。“否则，我得让他出局。”

同样痛苦的是，瓦伊塔尔相信自被捕之后他就被马瑟诺和家族抛弃了。备感凄凉的是，他在一次因轻微的心脏病发作而住院的时候，除了一名打手外，家族里无人前来探望，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我得不到那些人的支持，”在等待服刑期间，他向一个朋友发牢骚说，“我老婆和孩子会被扔上街头。”这种抱怨听起来让人奇怪，因为他有近 50 万美元的存款，还有数百万美元的不动产，况且他与妻子的关系甚是疏远。

被博南诺小组捕获的另一个重要猎物是“T.G.”安东尼·格拉齐亚诺。2002 年，因涉嫌诈骗、谋杀、勒索、欺诈、毒品走私和参与一起涉案金额达 1100 万美元的骗局，他在纽约和佛罗里达州被同时起诉。面对不可辩驳的证据，格拉齐亚诺放弃抵抗认罪，被判处 11 年监禁。其行动队的大部分成员，十几名打手和合伙人，随他一起被定罪。会计师特工们在捕获格拉齐亚诺的行动中只起到辅助作用，许多证据是曾经帮助政府打败顾问安东尼·斯佩罗的暴徒和毒贩“巴斯大道好汉”提供的。这些多嘴的“好汉”曾在格拉齐亚诺和斯佩罗行动队的毒品交易中充当打手。在指证斯佩罗之后，为了获得轻判，他们向 FBI 提供了格拉齐亚诺犯罪活动的线索并愿意出庭作证。

20 世纪 90 年代股票市场的虚假繁荣为黑手党带来了掠夺财富的极佳机会，马瑟诺的角头成为抓住机遇的早期投机者。和格拉齐亚诺一样，弗兰克·科帕和弗兰克·利诺发现，人们那狂热的贪欲可以像高利贷和赌博那样很容易地给他们带来大笔财

富。科帕率先涉足巨额融资领域，自从1977年被卡迈恩·加兰特吸收为荣誉者以来，作为一名黑手党人，他一直在为家族捞取不法资财。科帕原以为卡迈恩·加兰特是博南诺家族的老板，当他眼里的“老板”被枪杀之后，他震惊地得知了那完全不同的真相。科帕自认为“是个捞钱人，是个行骗者，而不是个杀手”，但他还是参与了两起谋杀，而且还帮助利诺袭击了“宝贝”布莱克·纳波利塔诺，以讨取马瑟诺的欢心。

作为高利贷经纪人，科帕在小证券经纪公司拥有众多客户。他发现，“华尔街就像个大鳄，并且愿意和黑手党打交道。”他的黑手党身份为他人市并在两家经纪行进行炒股诈骗提供了有利条件。“贱买和创造交易需求”是他诈出数十万不义之财的惯用手法。他很得意于自己在黑社会被人称为“阔佬”，他有价值200万美元的现金和黄金并将其大多数都藏在保险箱里，在新泽西和佛罗里达还拥有多处豪宅。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奢侈而放纵的生活方式，包括吸毒和暴饮暴食，将他这个身高1.89米，曾经非常精壮的打手变成了一个衰老的、大腹便便的黑手党人。

1992年因逃税被捕后，科帕开始了一段艰苦的监狱时光，这是他的第一个重罪判决。刚开始在一个管理相对宽松的监狱接受2年的监禁时，他曾经突然大哭起来。1994年出狱后，他重操旧业，充当了马瑟诺的一个战功赫赫的捞钱人，而马瑟诺也在不断地激励他奔向成功，把他提升为角头，还一度将四个行动队交给他来管理。

博南诺小组的调查和政府严防黑手党侵入金融市场的措施终结了科帕在华尔街上的欢宴。2002年春，他再次被定罪，这次是因股票欺诈被处以3年监禁。

科帕早期在狂热的华尔街取得的成功招来了其黑手党老友弗兰克·利诺的竭力仿效。当还是分别生活在布鲁克林区本森赫斯特和格雷夫森德的少年时起，他们俩就经常在一起四处游荡并寻衅滋事。在科帕告诉他博南诺家族打算补充新成员之前，利诺还是个仰望吉诺维斯、科洛博和甘比诺家族之门而不得人的崇拜者。因为经受了警察的野蛮殴打没有供出同伙，利诺得到黑手党人认可，并被“宝贝”雷德·印第里凯托的行动队所接纳。利诺被人称为“眨巴眼”，因为他的头部遭受警察的猛击后犯下了不停眨眼睛的毛病。利诺永远不会忘记他成为荣誉者的那个日子：1977年10月30日，那天正巧是他39岁生日。

三名角头被谋杀之后，作为马瑟诺的忠实支持者，通过放高利贷、信用卡偷窃、赌注经纪和“鬼牌扑克”赌博，利诺为自己和家族管理层赚取了数百万美元。频频眨着的双眼、顽皮的微笑和柔和的嗓音掩盖了利诺那凶残野蛮的人格。他曾代表家族统治集团参与了六起包括杀害角头“宝贝”雷德·印第里凯托和加布里埃尔·因方提的行动，尽管据称他从未扣动过扳机。在马瑟诺关掉各个街头俱乐部之前，利诺在格雷

夫森德成立了其名字与“科萨·诺斯特拉”巢穴的本质着实相悖的“圣母卡夫里尼社交俱乐部”。卡夫里尼是个曾大力帮助过意裔移民的修女，是第一个被封为圣徒的美国人。

尽管四次被定罪且按律当处4年监禁，但利诺还是屡次逃过终审判决。1997年，在政府对操纵股票市场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的情况下，他最终没能逃避惩罚。马瑟诺支付了7.5万美元的律师费，但利诺还是被宣判犯有股票欺诈罪和勒索罪，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57个月。对股票市场的基本词汇，如“首次公开发行”或“买升卖跌”，几乎毫无所知的利诺自己并没有能力组织金融诈骗活动，他靠的是科帕的指导和对经纪人的胁迫来赚取钱财。有位辩护律师称利诺是个股市盲并非妄言：“我的当事人甚至不知道华尔街在哪儿。”

随着利诺、科帕和格拉齐亚诺的离去，还有瓦伊塔尔的遭贬谪失势，马瑟诺的指挥体系露出了豁口，但他抵御检控的防线似乎和从前一样牢不可破。起诉其二老板和角头的所有检控都没有让他受到牵连，而且他还有一个候选人可随时充任其代理二老板。这个人选是理查德·坎塔瑞拉，此人是他联系角头和重要打手的主要联络人，充当他抵御逮捕的内城堡垒。

通过叔叔阿尔·沃克·恩巴勒托，他在黑手党里起步甚早。尚是稚子少年之时，当过打手任过角头的恩巴勒托就让他这个侄儿接触聪明汉的社会与文化，并带他参加临街巢穴里的社交活动，参加守灵和葬礼。对于一个聪明的崇拜者来说，这些都是接受“科萨·诺斯特拉”礼仪的熏陶和从叔叔那里学习如何议定诈骗合同的良机。

黑手党人好以绰号相称，因为他的头发上总涂着厚厚一层润发油，这个新手很快博得个颇不文雅的名号——“龟头”，但这无碍于他的爬升。通过其博南诺家族的关系人，理查得知通过贿赂纽约航海航空局的市府官员“里克”恩里科·马佐奥（Enrico “Rick” Mazzeo）可以在斯塔滕岛渡口集散站租到卖报纸和快餐的摊位。那是些特许经营的赚钱摊点，且利润稳定，但坎塔瑞拉把它们改成了赌注经纪室以增加收益。阿尔叔叔是家族里打入《纽约邮报》的颇有能耐的人物，他还向理查提供了一个挂名的工会职位，那就是跟随报纸运送车送货的“跟班”。《邮报》里的影子职位是一种有组织犯罪权益，得靠认识合适的人才能获取。坎塔瑞拉每周领取800美元的薪水，另外还有医疗和福利津贴，而他只需花300美元找人随车替他卸下一捆捆的报纸。

作为阿尔叔叔的一个忠实马仔，在1982年谋杀因举荐FBI特工乔·皮斯通而受极刑惩处的表哥托尼·米拉时，坎塔瑞拉充当了逃跑汽车的司机。四年后，出于对自

身安全的考虑，坎塔瑞拉实施了另一起谋杀。受贪腐罪指控被捕的市府官员里克·马佐奥已经出狱回家，但他失去了工作，而且沉迷于吸毒。为了不让马佐奥有任何机会告密，坎塔瑞拉有天夜里将他约了出来，并在穿过一个废弃的汽车修理厂时朝他的后脑壳扣动了扳机。坎塔瑞拉的表亲约瑟夫·迪阿梅科，即杀死他们表哥托尼·米拉的枪手，也参与了谋杀，并朝马佐奥的脑袋上开了枪。为彰显黑道义气和彼此间的团结，迪阿梅科配合理查犯下这起命案，尽管事前未取得领导层的授权。

正当沿着黑手党人从事高利贷和赌博活动的惯常路线前进时，坎塔瑞拉失去了阿尔叔叔对他的宠爱，后者甚至反对将他吸收为黑手党正式成员。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角头，阿尔叔叔认为坎塔瑞拉参入了太多的与甘比诺家族打手约瑟夫·乔·布奇·科拉奥（Joseph Joe Butch Corrao）合伙进行的不法活动，而这对博南诺家族会构成潜在的危害。他们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坎塔瑞拉甚至想杀掉阿尔叔叔。乔·马瑟诺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虽然身在塔拉德加监狱，但还是出面干预，命令准予坎塔瑞拉进入荣誉社团。

1990年7月，这个暴徒被吸收为黑手党正式党徒，当时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开始对博南诺家族在《邮报》里的“污水坑”展开调查。当时，《邮报》的工厂位于下曼哈顿南街，靠近博南诺家族的地盘。博南诺家族许多成员都生活在那里，他们或到附近的社交俱乐部里聚会，或到那家臭名昭著的“假日酒吧”里饮酒作乐。多年来，博南诺家族把持该报的运输投递业务并进行相关的敲诈勒索活动，这在工会改革者中间一直是个公开的秘密。

通过强力楔入报业司机工会并由恩巴勒托以领班身份出勤上班，博南诺家族在该报的运输投递系统中占据了大量领干薪的挂名职位。这些美差被分给了坎塔瑞拉、迪阿梅科、瓦伊塔尔的一个儿子和其他十几个聪明汉及其家人。在该报的管理方，博南诺家族的合伙人罗伯特·珀瑞诺（Robert Perrino），《邮报》的运输投递主管，紧密配合着家族的活动。在受博南诺家族保护的装货码头上，高利贷、毒品贩卖和枪支走私活动猖獗，身为家族前二老板尼克·马兰盖洛的女婿，珀瑞诺也从这罪恶的繁荣当中捞足了好处。他获利丰厚，每个月付给马瑟诺和瓦伊塔尔的回扣就达到500~600美元。

到了1992年，随着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调查力度的持续增强，瓦伊塔尔和坎塔瑞拉得知大陪审团索取了《邮报》的员工资料，并且还听到更为不祥的消息，那就是珀瑞诺的办公室受到了窃听并被录像。金发仔莱森海玛在《邮报》也有一份运送投递的工作，他听说珀瑞诺“在讲坏话并恶意攻击许多人”，还嘀咕称，“我不会自蹈死地”。

认定珀瑞诺软弱靠不住，没有同仍在狱中的马瑟诺商量，塞尔·瓦伊塔尔就发出了处死珀瑞诺的谋杀令。“他要变节了，会给家族带来大麻烦。”瓦伊塔尔向坎塔瑞拉和其他参与谋杀的同谋者解释说。

坎塔瑞拉的儿子保罗在一些可以将珀瑞诺绑架并送他上路的地方踩了点。但瓦伊塔尔和坎塔瑞拉改变了计划，1992年5月5日夜间他们哄骗珀瑞诺到本森赫斯特的一个家族俱乐部参加对策会议，他从此就没有活着被人见过。杀手队的部分成员由弗兰克·利诺提供，他们处死并埋掉了珀瑞诺。（他的尸体于11年后被找到，就埋在斯塔藤岛一家废弃的汽车修理厂的混凝土地面下，头部受到多次枪击。）为了在罪行败露时能有人证实他不在犯罪现场，坎塔瑞拉夫妇与儿子儿媳在斯塔藤岛马里那饭店共进晚餐并拖延了很长时间，相信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珀瑞诺的死让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失去了他可能提供的证词，这给调查博南诺家族的犯罪活动造成了麻烦。不过，调查还是发现了证据，证明《邮报》官员在黑手党成员的帮助下向东河倾倒报纸，然后将之计算在报纸发行量统计数字当中以提高广告价格。珀瑞诺失踪一个月后，他在曼哈顿受到了州里的敲诈勒索罪指控。《邮报》的另两名官员对伪造发行数字供认不讳，随后被处以缓刑以代替监禁。

唯一被监禁的黑手党人是理查德·坎塔瑞拉，工资记录和证明他从未工作过的监视结果是明显的证据。为获得从轻量刑，他承认犯有大盗窃罪，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其挂名职位，随后他在自己家附近，即东河中的雷克岛外役监狱，服刑9个月。八十多岁的阿尔·恩巴勒托叔叔也避重就轻地认罪，因年龄缘故，他被处以缓刑而非监禁。

刑满释放后，在同样服完了刑期的乔·马瑟诺的庇护下，坎塔瑞拉更为积极地重新开始了其打手生涯。与角头弗兰克·科帕配合，坎塔瑞拉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靠赌博、高利贷和敲诈勒索敛财的大捞钱人。80年代初，通过开辟新的行当——停车场生意，坎塔瑞拉拓展了其黑手党与经济活动的范围。他根据广告信息取得了曼哈顿一家停车场的租约，随后就遇到了他未来的生意伙伴——谄媚的巴里·温伯格（Barry Weinberg）。

温伯格十几岁时就进入停车场行业并靠它发了财。他经营了多个停车场，但他的财富基本上来自于经纪业务，即取得地产租约，然后再以高价转让出去。温伯格出身于犹太人家庭，生活在布鲁克林羊头湾中产阶级社区。他被与黑手党神话般的故事弄得神魂颠倒，渴望有朝一日能被有组织犯罪的硬汉们接纳为朋友。温伯格是个无可救药的赌徒，也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三十多岁的他遇到坎塔瑞拉后就立即被吸引住

了。在获准进入真正的黑手党家族上流社会后，兴奋不已的温伯格教会了坎塔瑞拉靠停车场生意淘金的基本技能。数十年来，通过瞒报被加到停车费里的税金，纽约停车场那些肆无忌惮的经营者们找到了许多办法来扩大利润。因为顾客是在取车时付现，而进出记录的人为操作性大，市和州里的收税官难以准确认定交易量和应交给政府的税额。据州审计官后来分析，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停车场的行业诈骗金额达到数百万美元。

在温伯格的帮助下，坎塔瑞拉开始在曼哈顿，包括小意大利经营停车场。只要受到附近竞争者的烦扰，坎塔瑞拉就指派手下的暴徒恫吓他们，要么让其交纳保护费继续营业，要么强迫他们关门走人。对付顽抗者的一个办法就是烧掉停车场门口那并不牢靠的值班室和摧毁停车场。“这就是黑手党，我才不管用什么手段！”当一个崇拜者问他何以靠冲砸和纵火解决问题时，坎塔瑞拉狠狠地说道。

在坎塔瑞拉手下积累“资历”时，温伯格找到了甜头。他相信有黑手党人作为靠山会在洽谈生意时提升他的声望和影响力，因为其他商人害怕黑手党为他撑腰。温伯格是个老烟鬼，讲话如机关枪似的，很健谈。在谄媚地与坎塔瑞拉合作的过程中，他还发现了另一样有用的东西。身为一个已经养有四个子女的二婚者，一个秃头驼背中年人，他相信黑手党的光环正辉耀在他的头顶之上，让他有足够的魅力吸引女人。

温伯格是个喜好炫耀和卖弄的家伙，挥金如土，他的座驾都是名贵轿车，有红色的敞篷劳斯莱斯，有本特利，还有梅赛德斯-奔驰。聪明汉们知道，他口袋里的零用钱和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备用的现款就多达6万美元。90年代末，坎塔瑞拉将其日常活动的总部设在小意大利桑树大街上的达尼科饭店。这家饭店的主人佩里·克里斯塞提利（Perry Criscitelli）是博南诺家族的知名打手。温伯格也被吸引到小意大利，他在那里频频与坎塔瑞拉和博南诺、甘比诺家族的黑手党人会面。作为一名酒店投资者，温伯格成了桑树大街上的“迪克西玫瑰”咖啡馆的股东，那里离达尼科饭店不过一个街区之遥。

对温伯格来说，与黑手党人的交往当然是令人愉快而兴奋的，尽管他得为这种冒险付出一些代价。坎塔瑞拉认为自己有权享有温伯格的部分产业，于是就不断地向温伯格索取酬金，其总金额最终高达80万美元。奇怪的是，温伯格都是通过写支票或经过第三方转交的方式将这些大部分被刑法界定为勒索金的报酬转给坎塔瑞拉。温伯格企图掩盖自己缴纳勒索金或贡金的动机，在支票上都会注明“借款”二字，他天真地以为这样做会让它们显得合理合法。

1999年，为炫耀其黑手党的背景，温伯格将另一个仰慕黑手党的生意人奥古斯

丁·斯科扎瑞 (Augustino Scozzari) 带进了坎塔瑞拉的势力圈子。斯科扎瑞出生于意大利，生活成长于德国，在他创办建筑公司失败之后，他就移民来到了美国。四十多岁的斯科扎瑞体格魁伟，长得一表人才。在纽约亲戚的指点下，他将小意大利的“特里萨之家”餐馆盘了下来，并把这家位于桑树大街上的饭店更名为“Due Amici”（两个朋友），随后就遇上了正在餐饮领域寻找类似投资的温伯格。作为非正式经纪人，温伯格帮他买到了一家位于纽约金融区交易广场的外卖式意大利餐馆“创意厨房”。斯科扎瑞读过许多黑手党题材的书籍，深深地被书里所讲述的人与事所吸引，当温伯格提出把他带进坎塔瑞拉的圈子里时，他立刻被兴奋的狂潮淹没了。不久，斯科扎瑞就被坎塔瑞拉当成了中间人，帮他漂白来自其经济奴隶温伯格的酬金。慢慢地，坎塔瑞拉对斯科扎瑞越发信任起来，私下里同他谈起了“荣誉社团”的细微之事，并在一次聚会上把他介绍给了乔·马瑟诺。温伯格和斯科扎瑞似乎对置身于坎塔瑞拉的流氓生活方式当中备感庆幸，而为了保护坎塔瑞拉，这些“黑手党迷”将绝不向司法人员妥协。

就在这两个半合法的生意伙伴向他献媚求宠的时候，坎塔瑞拉正在为马瑟诺的利益盘算着。90年代初，作为孝敬领导层的一种方式，他让马瑟诺和瓦伊塔尔（塞尔此时尚未与马瑟诺决裂）插足到停车场这个财富矿藏之中。在三份停车场合营协议当中，乔·马瑟诺和塞尔·瓦伊塔尔均被列为股东，这样老板和二老板在填写夫妻共同的纳税单时就可以列举这些投资证明其收入的合法性。

根据马瑟诺的吸收儿辈为荣誉者来充实家族的计划，坎塔瑞拉通过鼓励儿子保罗成为家族打手巩固了自己与老板的关系。马瑟诺主持了保罗的人会议式并向他宣讲了传统的行为准则，这让坎塔瑞拉备感荣幸。为显示自己越来越赏识坎塔瑞拉，从1996年开始马瑟诺就经常邀请他周末到卡萨布兰卡饭店赴宴。他们的亲密行为还包括交换可能跟踪他们的执法车辆的车牌号码。

当1999年马瑟诺指定他为行动队角头并任命他为监管家族事务的特别委员会成员时，坎塔瑞拉对他更是感恩戴德。相信坎塔瑞拉对自己忠贞不二，马瑟诺就将与其他家族首脑联系的超机密细节告诉了他，并讲起了自己对一些重大谋杀案的看法。他回忆了自己为拉斯泰利建功立业的诸般成就，标榜自己是前老板的“单人部队”。回顾屠杀三名角头时，马瑟诺告诉坎塔瑞拉袭击是在“近距离”发生的，委婉地承认了他就在现场。谈起瓦伊塔尔遭贬谪的话题时，马瑟诺称他在塔拉德加服刑期间就开始对塞尔不满。他特别反感塞尔在《邮报》案调查期间杀死了珀瑞诺，如果瓦伊塔尔当时找他商量他绝不会同意。



1999年，乔·马瑟诺与妻子约瑟芬着礼服参加塞尔·瓦伊塔尔一个儿子的婚礼。瓦伊塔尔之妻的面部被遮蔽，因为她已经进入了证人保护项目。（司法部的照片）

身为角头，坎塔瑞拉的小金库很快就膨胀了起来。他保留了自己战利品的更大份额，同时还取得其行动队的部分收益。在马瑟诺统治期间，他作为打手和角头成了一个拥有百万家财的富豪，可能是家族里仅次于马瑟诺的最为富有的勒索者。在高利贷——他取得2%的抽头——和各种敲诈勒索行当中，他一年至少能有50万美元的收入。这滚滚而来的财富让坎塔瑞拉能够在曼哈顿拥有13个停车场，并在斯塔滕岛高档时尚的“海门庄园”购置一栋价值二百多万美元的小别墅。坎塔瑞拉比他那节俭谨慎的教父要奢侈得多，他浮华放纵的嗜好扩大到了收藏美洲虎、梅赛德斯-奔驰、凯迪拉克和各式老爷车。

2001年底，瓦伊塔尔的被捕让坎塔瑞拉与马瑟诺靠得更近。他被任命为代理二老板，成了家族真正的二号人物。在挑选坎塔瑞拉为自己的主要副手时，马瑟诺没有察觉到一个致命的新情况：博南诺小组已经对他的新战地指挥官理查·坎塔瑞拉及其狂热的追随者巴里·温伯格展开了极为迅速的调查。

第 59 章 分而治之

“你将面临严厉的指控。这不是危言耸听。你知道你干过什么，也清楚我们会做什么。”

1999 年，在制订行动策略时，FBI 刑侦会计师弗里·萨奈特和金伯利·麦克卡弗里决定首先审查乔·马瑟诺和塞尔·瓦伊塔尔及他们妻子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单。IRS（美国国税局）的档案记录了为两对夫妇制备年度纳税申报单的会计师的姓名，于是相关会计事务所被要求交出它们的存底。特工们刚开始行动就碰上了好运气，那些事务所保留了以往十几年的备忘录，尽管相关法律没有要求那样做。

有个令人惊诧的细节表明乔和约瑟芬·马瑟诺在赌博上有着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在他们共同的所得税报告书（只注明马瑟诺夫人的职业为“HW”（家庭主妇））上，他们注明在 90 年代的四年间共中了约 50 万美元的乐透彩奖金。特工们不相信哪对夫妻能连年撞上这般无休止的好彩头，但最终还是无法认定这乐透彩“奖金”是纯粹的幸运所得还是黑手党的不义之财。多数人推测，乔是通过家族的亲信搞到中奖的乐透彩奖券。他们将奖金交给真正的持有者，然后将搞到的彩票转给他。真正的奖金得主拿到了未向 IRS 申报的钱，而马瑟诺，倘若被审计的话，就可以将乐透彩奖金列入自己的合法收入以证明其生活优裕的合理性。

1996~2001 年期间，马瑟诺的乐透彩“好运”开始接踵而来，他们每年申报的总收入都在 373052~590789 美元之间。在审查成堆的税款账目时，刑侦会计师们发现了一种比乐透彩赌博更令他们感兴趣的東西，他们被马瑟诺和瓦伊塔尔各自委托的会计公司就重复投资事宜而互发的传真所吸引。特工们注意到了那些载明了合伙股份与收益的名为《K-1 报告》的文件。为了使其合法收入具体化，马瑟诺和瓦伊塔尔在他们的税务报表中列明了从三个停车场取得的收益。《K-1 报告》为他们与理查德·坎

塔瑞拉的关系提供了文件证明，因为后者的妻子劳蕾塔·卡斯特莉是第三方投资人和停车场公司的高管。

通过仔细审查合伙协议，特工们在档案中找到了另一个参与者的名字。他们发现，乔和塞尔的妻子为了给停车场注入先期资金向巴里·温伯格开过支票。萨奈特和麦克卡弗里认为，以前未曾发现的温伯格作为中间人卷入停车场生意，这是他们最有利用价值的发现。这个神秘的温伯格是谁？特工们决定把他作为博南诺家族的一个捞钱人，一个能够用以渗透该家族的潜在弱点而给予了重点关注。

2000年，由萨奈特和麦克卡弗里牵头，FBI的C-10小组对温伯格展开了严密监视，不停地对他进行跟踪并追查其银行和财务记录。监视小组发现，他与理查德·坎塔瑞拉及其黑手党同伙，还有奥古斯丁·斯科扎瑞，经常见面并一起参加社交聚会。他们熟悉了温伯格的活动规律，对他的日常活动安排，对他早晨离开新泽西北部克洛斯特市的豪宅并在曼哈顿的停车场、饭店和小意大利的某些场所与人频繁见面的情形了如指掌。

调查温伯格花了一年的时间，结果证明刑侦会计师们的直觉是正确的：他在10年间至少逃税100万美元。他没有递交纳税申报单，也没有报告其惊人的1400万美元的估计利润。2001年1月9日上午，驾着一辆价值9万美元的梅赛德斯前往其曼哈顿中城区一个停车场的途中，温伯格被一辆交警巡逻车以违犯交规为由拦在路边。这是个花招，下车后，他被推进一辆无标志的厢式车里，萨奈特和麦克卡弗里正等在里面。“你有15分钟的时间做出一个终生的决定。”萨奈特开始发话。特工们告诉疑惧不安的温伯格，他被指控犯有偷逃所得税罪，要想逃避监禁只有一种选择：他必须进行间谍活动，暗中录下与坎塔瑞拉和其他黑手党人的谈话，直到最后被安排在证人保护项目当中。否则，他将立刻受到逃税指控并因此失去作为秘密证人的所有价值，因为坎塔瑞拉及其同伙会担心他可能与政府达成了交易而避开他。

温伯格不到15分钟就做出了合作的决定。当天他就开始“提供情况”。这是正式认罪协议签订前的程序，被告在此过程中需向检察官和特工坦白自己的罪行和知道的所有不法行为。检察官随后就可以评估温伯格作为线人和潜在证人的价值，并确定可能给予他宽大量刑的程度。

温伯格有许多秘密可以吐露。他讲述了十多年里与坎塔瑞拉、弗兰克·科帕，以及另一名插足停车场生意并单独敲诈了他约8.5万美元的角头，一起进行诈骗与贿赂活动的情况。停车场的合伙经营、脏款的漂白和受到两名角头勒索都被曝光。温伯格献给坎塔瑞拉一人的贡金就达到80万美元，并且他还吐露了六个月前在被坎塔瑞拉

殴打之后是如何交出另外 25 万美元的。认为温伯格曾在其他黑手党人面前抱怨过他，怒气冲冲的坎塔瑞拉在小意大利高档时尚的“罗马咖啡馆”门前拦住他。吼着，“你为什么说我坏话?!” 理查照他面门一拳，将他打倒在人行道上。这个角头要求温伯格在继续与他交往之前交出 50 万美元作为谢罪礼。坎塔瑞拉最后勉强同意 25 万美元，但威胁说：“你欠我所有的东西。”

对 C-10 小组来说，把温伯格变成卧底间谍是个前所未有的成功。除了特工乔·皮斯通外，FBI 还从来没能让一个将暗中窃听荣誉者并有机会接近角头的线人打入博南诺家族。他们在温伯格身上取得的成功为间谍工作带来了双重胜利。在接受萨奈特和麦克卡弗里的讯问时，温伯格咬出被他带进坎塔瑞拉组织里的商人奥古斯丁·斯科扎瑞，称他进行过洗钱活动。在和两名特工就与黑手党人勾结的法律后果进行了言语粗暴的对话之后，斯科扎瑞最终放弃了对黑手党的幻想并加入到卧底行动当中。他也开始秘密录下与坎塔瑞拉见面时的情况。“转化他并不困难，”萨奈特说，“为了过得好些，生意人有许多东西可以抛弃。”

这些黑手党迷很快变成 FBI 的重要线人，并最终录到一百多个小时证明坎塔瑞拉及其同伙有罪的录音。最后，坎塔瑞拉变得不安起来，怀疑温伯格可能是个卧底。他向马瑟诺谈起了自己对温伯格的怀疑，而那个教父将手比划成手枪的样子，问他是否需要帮助来解决问题。在黑手党人动手伤害温伯格之前，麦克卡弗里和萨奈特从坎塔瑞拉那被秘密录音的谈话中察觉到温伯格已经面临着危险。2001 年 12 月，充当了一年的卧底之后，温伯格被撤离出来并紧急进入了证人保护项目。（这个改过自新的黑手党迷后来活了两年，在 58 岁时死于癌症。）

也许是因为奥古斯丁·斯科扎瑞的意大利血统，坎塔瑞拉对他坚信不疑，甚至在得知温伯格向政府告密之后也是如此。自恃有着善于识别背叛者的能力，坎塔瑞拉相信被线人渗透的不幸绝不会再次降临在自己的头上，因而继续与斯科扎瑞随意且不计后果地交谈，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 2002 年夏天。

温伯格背叛六个月后，斯科扎瑞仍受到坎塔瑞拉的信任并成功录下了后者提及 C-10 小组的头号目标乔·马瑟诺的谈话。而且，坎塔瑞拉忘记了或者根本不理睬马瑟诺禁止在谈话中，哪怕是转弯抹角地，提及其名字的警告。2002 年 6 月，在约翰·葛提死去之后，坎塔瑞拉被马瑟诺在黑手党里的地位正急骤上升的新闻报道和宣传弄得紧张不安。“报纸说乔现在是个大家伙了，”这个角头对斯科扎瑞说，“那不是好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不是好事。”

还是在那个夏天，坎塔瑞拉再次言语“失检”，向斯科扎瑞吹嘘马瑟诺 1990 年曾

在狱中出面干预将他吸收为荣誉者。“实际上促成这件事的是乔。他在监狱里。他传出口信……他干了10年……他说我想知道阿尔（恩巴勒托）有什么理由要阻拦理查（坎塔瑞拉）。因为有人在乔的耳边传过话。”

坎塔瑞拉的时间不多了。8月份，特工们突袭并搜查了他那市价为170万美元的豪宅。他们找到一个保险箱，里面藏着一份其行动队成员的花名册和马瑟诺、瓦伊塔尔（被写为“俊塞尔”）和博南诺家族角头们那未上电话簿的电话号码。试图让坎塔瑞拉合作的萨奈特说道，“你将面临严厉的指控。这不是危言耸听。你知道你干过什么，也清楚我们会做什么。”

冷冷地面对特工，坎塔瑞拉拒绝了变节的提议。相反，遵照黑手党的规定，他将这次突袭和特工施加压力的情况报告了乔·马瑟诺。他意识到温伯格和斯科扎瑞——也突然从街头消失——已经落到检方手里。但他感到欣慰的是，虽然他可能会因经济犯罪受到指控，但检察官们无法用他最害怕的谋杀罪降伏他。

不出两个月，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2002年10月2日，萨奈特和麦克卡弗里在黎明前撬响他的家门，惊醒了正在睡觉的坎塔瑞拉和他的妻子劳蕾塔。这个代理老板受到24项敲诈勒索罪的指控，其罪状涵盖了所有可能的黑手党罪行，包括谋杀。58岁的他因10年前的一起谋杀而面临着终身监禁。他原以为FBI和警方已忘记了那桩命案：杀害博南诺家族打入《纽约邮报》里的腐败同谋罗伯特·珀瑞诺。他绝没有想到萨奈特和麦克卡弗里那么勤奋地重新翻出了与他和博南诺家族其他权贵有关的陈年积案。和当初调查珀瑞诺失踪案的纽约州警方探员合作了3年，他们通过原来的窃听录音和一名新发展的与“巴斯大道好汉”有交往的线人已经搜集到充足的证据，证明坎塔瑞拉与那起谋杀案有牵连。

坎塔瑞拉55岁的妻子和他一起被戴上手铐，她被指控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和交易来藏匿并漂白他的赃款。作为父亲的帮手和系列抢劫与诈骗案的参与者，他们31岁的儿子保罗也同时被捕。

与坎塔瑞拉一家三口一起，博南诺家族其他20名黑手党人和合伙人也成了FBI的俘虏并受到指控。第二次因股票诈骗罪被判刑5年且已经服刑4个月的角头弗兰克·科帕受到了新的敲诈巴里·温伯格的指控。科帕第一次被判刑时就受到精神创伤，当时他在其他同案犯面前突然大哭起来。61岁的科帕知道，一项可让其刑期延长20年的RICO判决将敲响他的丧钟，而且他那深藏着的200万储蓄金也将毫无用处。不到一个月，科帕打破了博南诺-马瑟诺家族70年的历史走出了致命性的一步，他成了一名政府证人。为了获得大幅减刑，他通过律师告知FBI，他愿意与检方合作并指

证马瑟诺、瓦伊塔尔、坎塔瑞拉和自己所有的黑手党同党。“我不想再坐牢了。”他向特工和检察官们请求道。

以前，当其他家族大批“叛徒”与检察官们达成交易时，博南诺-马瑟诺家族仍从整体上保持着对“乌默它”毫不松动的忠诚。即使在特工皮斯通渗透之后的审判与长期监禁期间，也没有任何打手或角头向检察官求情或违背“乌默它”誓言。2002年11月份，科帕的背叛让FBI和检察官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调查乔·马瑟诺的突破口。科帕与马瑟诺交往了25年，他能详细讲述马瑟诺爬上权力顶峰的升腾之路，也能逐一揭露其老板的大量罪行。通过马瑟诺在饮宴作乐时对他讲过的罪证之言，他还能够证实老板卷入了多起黑社会谋杀。

科帕最惊人的供述是他以目击者的身份吐露了在斯塔藤岛一栋住宅的地下室里谋杀“宝贝”布莱克·纳波利塔诺的情形。这是与该命案有关的首份证词，科帕指认了包括马瑟诺在内的主要参与者。从少年时起，科帕就是弗兰克·利诺从事暴力和白领犯罪的同伙，也是和他一起参加吸毒聚会和其他社交活动的玩伴。现在科帕告发了他相伴终生的老友，指认他是另一个参与“宝贝”布莱克谋杀案的关键人物。

科帕揭露的谋杀秘密远不止于此，他还提供了指证理查·坎塔瑞拉参与珀瑞诺谋杀案的证据，并让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塞尔·瓦伊塔尔牵连其中。早年在做打手的时候，坎塔瑞拉一直是科帕行动队的成员。他曾得意地向科帕讲述了如何帮助瓦伊塔尔诱骗珀瑞诺参加死亡会议并处理他的尸体。在另一次滔滔不绝的聊天当中，坎塔瑞拉向科帕详细透露了他在谋杀表兄托尼·米拉时如何充当逃跑汽车的司机。

通过他的律师和狱里的流言，坎塔瑞拉得知了科帕已经变节的消息。作为一个对



2003年1月9日，当FBI特工在黎明之际到访时，受到RICO和谋杀指控的马瑟诺已穿好黑丝绒运动服准备接受逮捕。（联邦调查局特許转载的照片）

社会构成危险而不得保释的羁押犯，坎塔瑞拉意识到科帕的背叛会让更多的谋杀罪名压在自己身上，让他虽坐穿牢底也无法脱身。在科帕决意变节一个月以后，坎塔瑞拉一家三口签定了认罪协议，也被吸收在证人保护项目当中。坎塔瑞拉免除终身监禁的唯一希望是背叛其黑手党上司，这意味着要帮助检方将塞尔·瓦伊塔尔和黑手党头号教父乔·马瑟诺定罪。

马瑟诺防御墙的细小裂缝正在扩大，到了2003年1月，他那精心构筑的防御墙显然发生了崩坍。他知道科帕和理查德·坎塔瑞拉父子在夜深人静之际已被神秘地带离了牢房。交保获释之后，坎塔瑞拉夫人从她斯塔藤岛的家里消失了，显然是随丈夫和儿子一起在某个联邦监狱的边房或军事基地里接受保护性监管，那里通常是重要线人被安置的地方。当他们的律师很快被与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关系融洽的律师所取代时，两名角头正与政府合作的猜疑得到了证实。

马瑟诺能够嗅出最高明的跟踪者，此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是兵困愁城了。在其霍华德海滨的家里，那些全景式地监视着附近那条安静街道的摄像机已经证实，特工们正在他家前门布哨监控。新年伊始，博南诺小组新主管乔治·汉纳下令对他展开24小时监视。考虑到1982年马瑟诺为躲避即将到来的RICO检控而逃亡，而且怀疑他在海外旅行时已经找到了藏匿处，汉纳这次要确保他插翅难逃。

2003年1月9日——他60岁生日的前一天——凌晨6点钟，正当乔·马瑟诺起床穿衣之际，他家的门铃响起来了。前来逮捕他的是三名穿着后背有黄色“FBI”字样的蓝色冲锋夹克的C-10小组成员、一个IRS特工和一位参与调查的州警探。“他没有感到意外。”身高1.83米、体格匀称健壮的FBI特工谢默斯·麦克埃利阿尼（Seamus McElearney）说。马瑟诺神态自若地伸出双手等着手铐。“他知道我们会来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裹着睡衣的乔西·马瑟诺（Josie Massino）表情冷漠地站在厨房的餐桌旁，静静地看着特工为丈夫宣读他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米兰达权利。在马瑟诺被带进外面的汽车之前，特工们在走廊里匆匆看了看近旁的餐厅。厅里摆放着名贵家具，当空挂着水晶枝吊灯。

金伯利·麦克卡弗里和杰弗里·萨奈特发起了最终令马瑟诺束手被擒的调查。他们从来没有与马瑟诺讲过话，但他认识他们。“你一定是金伯利，而你必定是杰弗里。”马瑟诺说道，同时指了指身为抓捕小组成员的他们。麦克卡弗里问他为何这么早起床。“我准备到糕饼店去，”他打趣地回道，“我以为你们昨天会来的。我看到了附近的监视车子。”

穿着一件没有口袋的黑丝绒运动服，马瑟诺身上没有带任何东西，没有手表，也

没有任何钱。“他知道监狱里需要什么。”麦克埃利阿尼说。一旦走进联邦监狱，所有贵重私物和钱财都被拿走，他得到的将是一身囚服。

在乘车前往曼哈顿 FBI 总部接受指纹采集与拍照的路上，马瑟诺打开了话匣子，预言他将被羁押且不得保释。“弗兰克·科帕的动作真快。”他继续说道，表明知道这个出卖他的黑手党第一人。被告知他将作为“宝贝”布莱克·纳波利塔诺谋杀案的策划者和后援枪手被起诉时，马瑟诺反驳说，“那里很久以前的事情。我和它没关系。”

萨奈特和麦克卡弗里问他何以未曾见面却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你们给巴里绑了那么多窃听器。”他回道，提起了温伯格录下的录音。为表明自己清楚这些特工的背景，他谈到麦克卡弗里大学毕业后不久就被招进 FBI。她想知道他从哪儿搞到这些个人信息。“你做你的功课，我也是。”他咧嘴笑道。

这位教父做“功课”时得到过许多帮助。坎塔瑞拉在自己的家被搜查时曾和萨奈特和麦克卡弗里讲过话，他肯定在马瑟诺面前描述过他们的样子。在坎塔瑞拉变成合作证人之前的发现材料，包括温伯格窃听的详细信息，都被移交给坎塔瑞拉那曾为许多博南诺家族成员辩护过的律师。特工们推测，这个律师事务所的某个人把那些发现信息或列有他们名字的文件副本转给了马瑟诺。

在 FBI 办公室接受讯问时，他被介绍给了 C-10 小组二号首长诺拉·康利 (Nora Conley)。“你相当于二老板。”他俏皮地说道。

当天早晨被捕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空有头衔的二老板塞尔·瓦伊塔尔。他获释后被软禁在家里，正在等待因高利贷和在欧洲美国银行洗钱被定罪的正式宣判。因为达成了认罪协议的缘故，他得到了刑期将少于 4 年的保证。倘若因新的 RICO 指控被定罪，那后果将会严重得多，对 55 岁的“漂亮塞尔”来说，那几乎确定无疑地会变成终身监禁。

在 FBI 总部 26 楼讯问过瓦伊塔尔之后，麦克卡弗里和萨奈尔打出了一张分而治之的牌。他们向他出示了用于申请法庭指令的法律备忘录，这份文件将乔·马瑟诺列为对社会构成危险且可能潜逃的人，请求予以羁押且不得保释。该备忘录将在当天下午提审马瑟诺时由检察官呈给法官。特工们指出，瓦伊塔尔特别在意这法庭文件中一份让他深受震动的报告书。在这份档案里，检察官们声称他们有证据表明，马瑟诺相信瓦伊塔尔可能成了叛徒与线人而准备杀掉他。

“你得作出决定，”在瓦伊塔尔看过那份法庭文件之后，萨奈特说道，“你有两条

路可走。”瓦伊塔尔一言不发。但麦克卡弗里看得出，他阴沉的眼睛表明，对意欲置他于死地的姐夫，他那忠贞不渝的情感已风卷残云般地消散了。“塞尔，”她相信，“知道这是情与义的决绝。”



乔·马瑟诺被捕后，他的家人在其霍华德海滨的家门前的一棵树上系上黄丝带，表明他是个英勇的人质和战犯。为防范对手和执法部门的窥探，马瑟诺在家中安装了闭路摄像机，让他能够发现任何在房子和街道附近执行监视任务的人。（经曼尼·苏阿瑞兹同意后转载的照片）

第 60 章 多米诺骨牌效应

“这次见面是个葬礼，我就要完蛋了。”

摇摇摆摆地迈着步子，肥胖的身材被黑色运动服凸现得更加臃肿，被捕的当天下午出现在法庭时，乔·马瑟诺在众人面前是一副古怪的样子。FBI 和检方官员对他被起诉甚感得意，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兴奋地披露称，五大家族逍遥法外的“最后一个教父”被逮捕。正如马瑟诺所预料的那样，检方赢得了在审判前将他作为一个“对社会构成危险”的嫌犯无限期羁押的动议。提审之后，塞尔·瓦伊塔尔被直接押送监牢，因为他原本就在等候此前的敲诈勒索罪判决。

马瑟诺显得不慌不忙，他的镇定或许来自他对起诉书所列罪状的迅速估判。大多数都是了无新意的几乎在每次 RICO 审判中都会抛出的利用赌博和高利贷牟取暴利的“组织”指控，最重要的罪状是他在 22 年前策划并参与了“宝贝”布莱克·纳波利塔诺谋杀案。在听证会上，检察官透露称，他们有两个未公开身份的荣誉者和 13 名其他人准备指证他犯下了所有罪状。从检方的陈述当中可以明显看出，弗兰克·科帕和理查德·坎塔瑞拉违反了“乌默它”准则，他们可能是唯一对马瑟诺构成严重威胁的证人。科帕曾出现在谋杀纳波利塔诺的现场，而坎塔瑞拉对乔作为老板期间的活动了如指掌。由于没有录到乔本人的声音让他领罪，检方将严重依赖两个有着欺骗与撒谎经历的职业罪犯证人的可信性。通过抨击他们有着靠牺牲马瑟诺以自保的自私动机，一个有经验的律师或许就能在交瓦讯问中推翻他们的证言。从初始印象上来看，其他政府证人似乎没有直接证据可以用来指证，故而应该不会对马瑟诺构成重大威胁。

“这家伙害不了我。”在和与自己与塞尔·瓦伊塔尔及另一名共同被告弗兰克·利诺的律师商量对策时，马瑟诺常常这样说道。利诺被指控参与了纳波利塔诺谋杀案和其他大量的敲诈勒索活动。对瓦伊塔尔提起的最重要的指控，即涉嫌卷入 10 年前《纽

约邮报》运输官员罗伯特·珀瑞诺那被推测遭谋杀的失踪案，也并非坚实有力，即使坎塔瑞拉承认了自己的角色并出庭指证这个二老板。

从表面上看，各自都受到谋杀罪指控的马瑟诺和瓦伊塔尔表现得步调一致，摆出了团结御敌，共同应对敲诈勒索罪指控的姿态。在被捕一个月以后，这对姻兄弟在一次审前听证会上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当时首席检察官格雷格·安德烈（Greg Andres）曝出了一则惊人的消息。在解释为何马瑟诺被关押在布鲁克林而瓦伊塔尔在曼哈顿，而且他们在法庭里也被隔离时，安德烈声称，政府有可靠情报证明马瑟诺曾打算“伤害”瓦伊塔尔。“伤害”是律师指代谋杀的委婉之辞。安德烈没有透露这一情报是出自科帕和坎塔瑞拉的讯问报告。那两名背叛者都曾听到过乔那残酷无情的判断，即塞尔只有通过和政府秘密合作并暗中监视他才能在长岛获得轻判。

在和曾在长岛为他辩护过并取得认罪协议的律师约翰·米切尔谈话时，瓦伊塔尔驳斥了检方关于其生命受到威胁的断言，称那是个“诡计，是妄图让我合作的胡言乱语”。但马瑟诺对瓦伊塔尔的可靠性仍然感到怀疑。在布鲁克林大都会惩教中心，他告诉同室囚友弗兰克·利诺称，他“很烦”塞尔，打算“给他一张收据”（他的黑手党暗语，意为“谋杀”）。马瑟诺的那些博南诺家族的狱友也齐声附和，将瓦伊塔尔称为“弗雷德”（Fredo）——《教父Ⅱ》中科里昂的叛徒哥哥。

法庭听证会结束两周之后，马瑟诺的怀疑变成了现实。通过儿子的律师朋友，瓦伊塔尔暗中告知检方他想脱离黑手党。从曼哈顿的牢房里被迅速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政府设施里之后，他开始揭开30年来和马瑟诺及其他黑手党人结伙犯罪的秘密。惊讶的约翰·米切尔接到一封经人代转的署名瓦伊塔尔的信件，来信称他即刻起被解聘，不再担任他的辩护律师。“他足以凭着自己的表演天才赢得奥斯卡奖。”得知瓦伊塔尔背叛的消息后，米切尔说道。“我周五在监狱里见过他，他像平时一样可爱、友善和谦卑。几天后他就走了。他甚至给了我2.5万美元的部分律师费。如果你在考虑投靠政府，你是做不出这种事情的。我真是目瞪口呆。”

特工麦克卡弗里和萨奈特在瓦伊塔尔被捕当天播下的一粒种子已经开花结果。他们曾把检方的法庭备忘录给他看过，里面有一份关于马瑟诺与其他黑手党人讨论杀掉他的报告书。瓦伊塔尔随即怒火中烧。在他们被共同提审的当天，瓦伊塔尔决心一旦安全无虞就抛弃马瑟诺。“我那时就有了这种想法，认为‘坐在身边的他不值得接受我的尊重与礼遇。’”瓦伊塔尔在一次讯问当中向特工和检察官们供称。瓦伊塔尔表现出了新的合作精神，将自己非法所得的48.1万美元现款交了出来，它们原来或藏在家里，或存放在化名申请的一个银行保险箱里。他家里还有一样令人感兴趣的物品是

他的秘密账本，上面列明了他和马瑟诺的高利贷客户及其欠款。

和所有渴望减刑的证人一样，检方要求瓦伊塔尔详细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供述他所知道的其他黑手党人犯下的罪行。他承认在三十多年里共参与了 11 起谋杀并犯下一揽子 RICO 罪行。要想免受终身监禁获得轻判，他得依靠检察官写给宣判法官一封概括其对政府的价值并推荐减刑的《5K1.1》公文信件。瓦伊塔尔的确从检察官那里取得了一个让步：他的供词或情报均不得用于起诉他的姐姐，也就是马瑟诺的妻子乔西·马瑟诺。实际上，尽管在马瑟诺被监禁期间收受了黑手党赃款并有意识地在弟弟与丈夫之间传递黑手党信息，但瓦伊塔尔的认罪协议使乔西免受了牵连。

被告律师在布鲁克林监狱与马瑟诺和弗兰克·利诺见面时传递了瓦伊塔尔变节的消息。尽管马瑟诺知道瓦伊塔尔作为检方最了不起的证人出现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但他在律师面前不动声色，没有表现出任何忧虑与不安。利诺竭力表现得同样镇静和不为所动，但内心充满着忧伤和孤独。以前让他牵连到“宝贝”布莱克谋杀案的唯一证人是弗兰克·科帕，由于没有强有力的证据，他的证词有可能被人视为以换取提前释放为目的的自利之言而难以令人信服。塞尔·瓦伊塔尔将是个更具威胁的证人。他能证实利诺在另外三起谋杀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揭露他参与了恶名昭彰的屠杀三名角头的行动。“这次见面是个葬礼，我就要完蛋了。”利诺心想，但不敢当着马瑟诺的面说出来，以免让人感觉到他的脆弱。

利诺的儿子约瑟夫是个家族打手，这让他陷入了进退维谷之境。他担心，倘若自己正在崩溃的忠诚被马瑟诺所察觉，他的孩子和孙子就有可能受到报复。不过，他还是希望达成协议免遭终身监禁，故而悄悄传话给检方表示愿意合作。出于安全需要被单独监禁之后，利诺拒绝在和美国检察官们讨价还价期间参加有马瑟诺和他们的律师参加的对策会议。他甚至不愿与儿子约瑟夫聘请的新律师讲话。利诺对被单独囚禁 81 天毫无怨言，考虑到一旦自己是个告密者的消息传扬开来，待在这个被他叫作“窟窿”和“鞋窝”的地方要比与普通犯人共处一室安全得多。在签约成为“合作证人”之前，利诺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向检方招供内情。按要求指认他所知道的每个人是打手还是合伙人时，利诺将儿子的名字归入博南诺-马瑟诺家族打手之列。“你们已经知道他是个荣誉者。还能算是什么大人物？”他向 FBI 特工据理解释道。

到了 2003 年春天，马瑟诺与他的律师们得知有四个自行招供的高级黑手党人准备出庭指证他，但不知道还有其他背叛者也抛弃了他。

理查·坎塔瑞拉被捕后曾要求马瑟诺为其行动队指定一个代理角头，他选中的人是乔伊·迪阿梅科。22 岁时就成为荣誉者的迪阿梅科早年就极为残酷，为雪洗唐尼·

布拉斯科惨败之耻，他在马瑟诺的授意下杀死了自己的表兄托尼·米拉。迪阿梅科表现出了他的坚韧与刚毅，在大陪审团调查三角头谋杀案之后，他因为做伪证蹲了18个月的监狱。后来，在90年代，因喜欢参加吸毒聚会，他博得了“狂欢小子”的绰号。在成为表兄理查·坎塔瑞拉的行动队成员之后，迪阿梅科潜心经营家族的地下生意，最终赢得了马瑟诺的赏识。

在1月份马瑟诺被捕的数天前，坎塔瑞拉行动队的两名新打手吉诺·盖莱斯特罗(Gino Galestro)和约瑟夫·萨贝拉(Joseph Sabella)请求与其代理角头紧急见面。在富尔顿鱼市场附近那个不起眼也不太可能受到FBI监视的“墨西哥电台”餐馆里，两名打手报告称，坎塔瑞拉在斯塔藤岛的家突然人去楼空，他的私人车道上满是未清扫的积雪，坎塔瑞拉交保获释的妻子已经失踪，而他们的几个孙子也突然离开了学校。这些迹象都表明：坎塔瑞拉一家已经进入了证人保护项目。

“回家吧，抱抱你们的孩子，你们可能要进监狱了。”迪阿梅科沮丧地对盖莱斯特罗和萨贝拉说。他的表兄理查可能正在告发行动队的每一个人，也会指认他和托尼·米拉与恩里科·马佐奥谋杀案有牵连。“他准备抛弃我。”在给FBI的C-10博南诺小组现任主管乔治·汉纳打电话前，这种想法多天来一直占据着迪阿梅科的大脑。迪阿梅科悄悄供认犯下了四宗谋杀罪和一堆其他罪行，并同意从事间谍活动来刺探家族的秘密。FBI取得了另一个突破，乔伊·迪阿梅科成了博南诺-马瑟诺家族里首个充当眼线的荣誉者，将携带窃听器秘密采集罪证之言来掀翻那个他曾经发誓要保护的帮派。

2002年，在前往佛罗里达度假的途中，尚未被捕的乔·马瑟诺曾在伯克莱顿停留，特意欢迎“大路易”詹姆士·塔塔莱昂纳出狱归来，并与他攀谈聊天。作为自己和家族的百万捞钱人，在1997年被宣判犯下敲诈勒索罪并处以5年监禁之前，大路易一直是个非常成功的高利贷放贷人（总有10~15名落入他那圈套里的傻瓜）。65岁的塔塔莱昂纳经济充裕，尽管马瑟诺希望他重返纽约并担任其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他还是准备愉快地歇手隐退。塔塔莱昂纳仍处于受监管释放（保释）期，而且知道了FBI对格拉齐亚诺和坎塔瑞拉的打击，他一直按兵不动地待在家里，直到瓦伊塔尔背叛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传入他的耳中。没有北上帮助马瑟诺渡过难关，塔塔莱昂纳反而联系上曾帮他取得高利贷认罪协议的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鲁思·拉登布鲁克。尽管这位检察官让他被定罪判刑，可因为在庭审期间曾帮女儿解决了一个医疗上的麻烦，塔塔莱昂纳对拉登布鲁克心存感激。从塔塔莱昂纳的话中，经验丰富的黑手党检察官拉登布鲁克知道，他作为黑手党人的历史已经结束并急切地要出逃变节，但她提醒说

并不能完全保证他能取得从轻量刑。在佛罗里达和她及 C-10 特工约瑟夫·博纳沃朗塔与格雷戈里·马萨见面之后，塔塔莱昂纳承认，“如果塞尔揭露了真相，我可就麻烦了。我有许多命案在身，塞尔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最严重的罪行是参与了两起谋杀，并在 1981 年帮助处理了三名被杀角头的尸体。

塔塔莱昂纳寻求宽大量刑需要他完成更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作证，他得携带窃听器进行间谍活动。2003 年 3 月初，他返回纽约并通过家族的秘密渠道告知被羁押的马瑟诺称，在这危难之际他愿意帮助管理家族。这个诈敌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他甚至把一个 FBI 女特工介绍给了马瑟诺的代理头目们，伪称她能从一个法庭雇员朋友那里取得执法部门的机密文件。在九个月的时间里，大路易搞到了直指家族临时领导层的 45 盘罪证录音带和大量的第一手情报。马瑟诺指定的新首领是代理老板“托尼·格林”安东尼·厄索（Anthony “Tony Green” Urso），塔塔莱昂纳的录音曾捕捉到他哀叹瓦伊塔尔的背叛造成了严重后果。“塞尔在出卖每一个倒霉蛋。”另有一次，在谈论瓦伊塔尔的两面派和预期的证词之后，厄索接着说，“我要是杀掉他的一个孩子，塞尔会感觉如何？”厄索完全被蒙在鼓里，他对塔塔莱昂纳没有一丝怀疑，让他审查了其他家族机密的新成员推荐名单。

铭记马瑟诺关于禁止提及其名字的相关指令，角头和打手们在塔塔莱昂纳的录音带中经常用“我们的朋友”和“另一个人”这样含义隐晦的话来指代他。FBI 拍摄过一盘塔塔莱昂纳在仓库里与其行动队成员见面时的录像带，里面有几个聪明汉们边摸自己的耳朵边说“我们的朋友”的镜头。然而，百密一疏，特工还是从一个粗心的黑手党人嘴里听到了“马瑟诺家族”。

故孽旧冤的阴影也向年少时就被马瑟诺庇护在翼下的“金发仔”杜南·莱森海玛逼来。瓦伊塔尔和其他背叛者正在提供金发仔与屠杀三角头、谋杀并肢解切萨雷·邦温特和其他许多罪案有牵连的证据，足以让他以 RICO 罪名获刑 20 年。46 岁的金发仔已经结婚，还干着卡车司机的工作。2003 年 6 月，他惊讶地迎来了专案特工萨奈特和麦克卡弗里的到访。“你以前为这个家伙进过监狱。你不希望还得进去一次吧。”萨奈特坦率地说道。他指的是金发仔 80 年代初因拒绝就帮助马瑟诺潜逃一事作证而被宣判犯有藐视法庭罪并领刑 15 个月。自认为是个“硬汉”的金发仔没有多言，只说会与律师商量。他从首席检察官格雷格·安德烈那里还得到一条强硬信息：“你这次担心的将远不止藐视法庭罪。”

在政府发出警告后不久，马瑟诺的一名私家侦探拜访了金发仔的律师，想探听莱

森海玛是否有意出卖其从前的庇护人。这次探访的结果适得其反。相信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金发仔飞快地扑进政府的怀抱，让检方得到了另一个有力的证人来支持其论点，那就是马瑟诺 25 年来一直是个黑手党“歌利亚”（旧约圣经里的非利士巨人）。

到了 2003 年夏末，检察官们获得了大量意想不到的由七名背叛者提供的证据，一场与以往大为不同的审判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原来的两名主要被告瓦伊塔尔和利诺已经和检方站在一起，马瑟诺在即将到来的审判当中将作为唯一的被告面临着一场复杂的 RICO 阴谋罪指控：其各种罪状共计 11 条，特定的敲诈勒索行为达到 16 种。那原本只与一起谋杀（杀死“宝贝”布莱克·纳波利塔诺）有关的讼案骤然扩大成牵涉七起谋杀和更多谋杀未遂、纵火、高利贷、非法赌博、敲诈勒索和洗钱等罪行的检控行动。基于瓦伊塔尔的供词及其与马瑟诺的长期关系，有大批新的指控可让检方依据 RICO 法律追溯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组织”犯罪的罪行。在这罪状大幅增加的检控当中，1981 年的三角头屠杀案显得较为突出。1987 年，马瑟诺已经被宣判谋杀这三个人的“阴谋罪”不成立。新的指控不会让他被双重定罪，因为其罪状被改成一种直接参与枪杀的实体行为。

在这海量的罪状当中，第八项谋杀罪意味着极刑——死刑。主要通过瓦伊塔尔的大陪审团证词，马瑟诺被指控下令处死了“加拿大乔治”杰兰多·西亚西亚，因为他胆敢呵责乔最宠信的一个黑手党人“T. G.”安东尼·格拉齐亚诺。其他七起谋杀都发生在 1994 年之前，而国会在这一年才颁布法律允许对被定罪的出于“利于敲诈勒索”目的而杀人者处以死刑。西亚西亚被杀的时间是 1999 年，政府可根据他的有罪判决并援引该法对马瑟诺选择执行死刑。这部法律的主要打击目标是贩毒集团和街头暴力团伙的首领，马瑟诺以其特殊的条件可能成为第一个因罪领受死刑的教父。由于死刑案的证据具有专门性，西亚西亚谋杀案将被单独审理而不出现在马瑟诺那包含多项罪名的 RICO 审判当中。

有许多刑事辩护律师希望成为被起诉的知名教父马瑟诺的代理人。据法院传言称，约有 30 名律师以候选者身份主动自荐。被马瑟诺选中的是戴维·布赖特巴特（David Breitbart），他打趣而又骄傲地称自己是个“出租的快枪律师”。

布赖特巴特称，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马瑟诺需要一个不受政府或检察官所胁迫的斗士。”

布赖特巴特有着一不逊色于年轻人的健壮体魄和聪明头脑。在成为律师之前，他在治学严谨的市立布朗克斯理科中学组建过篮球队，赢得过柔道黑腰带，还是学校的一

名心理学者、教师和阅读专家。在布朗克斯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任过两年检察官之后，他走上了辩护律师席，他的第一个知名当事人便是人称“碰不得先生”的大毒枭“尼克”勒罗伊·巴恩斯（Leroy “Nicky” Barnes）。在联邦检察官 70 年代中期证明巴恩斯领导着“一个最邪恶的毒品团伙”之前，他多次为这个受到州里谋杀、毒品和枪支指控的毒品大亨赢得无罪宣判。

除了普通的民事诉讼当事人以外，布赖特巴特的老主顾还有吉诺维斯、卢切斯和科洛博家族的被告。他曾在一场引人注目的有组织犯罪审判当中为“傻瓜”约翰·塞拉萨尼（John “Boobsie” Cerasani）赢得了值得回味的无罪释放。1982 年，在因乔·皮斯通的渗透而招来的敲诈勒索罪检控当中，塞拉萨尼是博南诺家族唯一受到指控而被宣判无罪的打手。布赖特伯特对自己挫败检方证人的能力颇为自得，声称他那尖刻灼人的交互讯问是“事实的炼铁炉”。成为联邦法官的前检察官芭芭拉·琼斯（Barbara Jones）对自己与布赖特巴特的庭辩搏杀怀有极深刻的印象，她每年都会邀请他到福德姆大学法学院为自己的学生讲授交互讯问的技巧。

在法庭上与马瑟诺对垒的首席检察官是格雷格·安德烈。这位布鲁克林的助理美国检察官 36 年前出生在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市，那时布赖特伯特已经开始了其司法界的从业生涯。作为一个走上其事业发展快车道的首席检察官，安德烈拥有一份出色的成绩单。他斗志旺盛，加入过圣母玛利亚拳击队，在西非贝宁湾和平工作队工作期间曾两度从疟疾的袭击中死里逃生。他很快摸清了黑手党的教义，并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帮助监禁了一百多名大部分表示认罪的被告。在担任检察官小组的成员时，他迎来了自己最重大的胜利，包括将博南诺家族顾问安东尼·斯佩罗定罪，并取得下任顾问“T. G.”格拉齐亚诺的认罪协议。

针对例行动议和被告要求迅速公开发现材料的请求，布赖特伯特和安德烈在审判前甫一见面就爆发了一次唇枪舌剑的激辩冲突。安德烈赢得了大多数决定性的法律争斗。对检方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他获准出示与“加拿大乔治”西亚西亚谋杀案有关的证词，尽管该案会被另案审理。此外，检方被允许通过证人将其他未受指控的让马瑟诺牵连于整个 RICO 组织阴谋罪的谋杀与其他犯罪作为例证。尽管陪审团不会裁决马瑟诺是否卷入了这些未受指控的犯罪，但相关证据增强了检方将他描述成一个邪恶的犯罪老手的可信性。布赖特伯特有个痛处是西亚西亚谋杀案的指控，这让其当事人面临着死神威胁。“他们正在树起火刑柱来逼迫认罪，”布赖特伯特声称，“他 60 岁了，认罪对他来说无异于死刑。这意味着将老死于监狱。”

在乔·马瑟诺的一生当中，他只有这一次是个失败者，当法庭陈述于 2004 年 5 月

开始在布鲁克林老城区一个法庭里进行时，没有人比布赖特巴特和他的助手律师弗洛拉·爱德华兹（Flora Edwards）更清楚这一点。在第一名证人被传唤之前，这些律师就摸清了检方看起来势不可挡的基本进攻策略。在这戏剧般的 RICO 审判当中，有一个，或许两个，背叛者证人几乎成了标准的道具。检方推出了七名以已经认罪的二老板塞尔·瓦伊塔尔为核心的强大证人阵容，这在以往的教父审判当中是从未有过的。

弗洛拉·爱德华兹在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素有“文案女王”的称誉，马瑟诺亲自挑选她坐到“第二座席”上充当布赖特巴特的助手。在紧张激烈的庭审当中，她能迅速高效地提出无可辩驳的、经过审慎推敲的动议。而马瑟诺的审判必定是一场激烈的辩驳之战，一个看起来微小的法律论点就有可能影响陪审团的裁决或在后来的上诉当中被证明是决定性的。

从开始挑选陪审团时起，这两名律师就要面对另一项特别的任务：弱化马瑟诺的恶名声。为避免他们对黑手党指控产生不当的偏见，由 12 名陪审员和 8 名预备成员组成的全体陪审员已被法官隔离。自然，这种方式无疑让他们嗅出一丝危险的气息。出于安全需要，陪审员的名字都对被告和检方保密，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也不得互相吐露姓名或地址。作为保护他们的匿名性和防止陪审团遭贿赂的另一个手段，联邦法警每天护送他们回家和返抵法庭。

布赖特巴特的反击是一种管理委员会审判式的辩护。承认或否认黑手党的存在并非明智之举，他要设法让这种让步对马瑟诺有利。“乔·马瑟诺是否是老板都不足以证明这些基本行为，”布赖特巴特对陪审团强调检方缺乏直接证据证明马瑟诺犯过任何罪行。“即使你们查明他是个老板，你们也不能裁定他有罪。”

被告方最艰巨的挑战是削弱塞尔·瓦伊塔尔的可信性。双方都知道瓦伊塔尔与马瑟诺的关系关乎到所有的重要指控，而且他的证据将其他背叛者的证词都牢牢地粘合在一起。法庭的两百个座位上都坐满了旁听者，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对关键证人与交互讯问高手之间的较量都怀有专业性的兴趣。

瓦伊塔尔和姐姐乔西·马瑟诺之间的超现实主义情景剧也在上演，后者就坐在第一排，与丈夫相距 6 米。在审讯的每一天里，她总是在向记者宣称乔的清白无辜，总是直面不幸地坐在那令人麻木的硬木长椅上。但除了塞尔站在证人席上的那五天，她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瓦伊塔尔一直刻意避免直视她或坐在她身边的侄女阿德琳和乔安妮，即使当他的证词谈到在马瑟诺服刑期间他曾以关爱和钱财来安抚他们的时候。乔西的眼睛怒视着瓦伊塔尔，几乎要用如火的目光焚烧那个她曾经溺爱地称其为“宝贝弟弟”的男人。“他是我的血，是我的肉，但你怎能原谅他不仅对我而且

对我丈夫，对我孩子的父亲所做的事情？”在一次休庭期间，她对《每日新闻》的记者约翰·马祖利（John Marzulli）倾诉道。

布赖特巴特企图通过尖刻的提问和巧妙的诱导来让瓦伊塔尔承认，是羡慕与嫉妒促使他想通过诬陷马瑟诺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位律师未能诱出任何明显的矛盾或直率的谎言，只是再次撞上瓦伊塔尔那毫无表情的脸和轻声而语的沉稳。当被要求指出法庭里的马瑟诺时，瓦伊塔尔的轻蔑与藐视甚为明显。“哦，就是那边的那个戴眼镜的先生。那家伙正盯着我。那就是他。”

结束作证之后，如释重负的瓦伊塔尔如同从战斗机飞行员的弹射椅上被弹射出来一样，没有回头看一眼姐姐和姐夫就从侧门冲了出去。

每天，着装整洁得体的乔西都会带来两大包亲手烹饪和外卖的食物作为丈夫的午餐。她会轻声地与丈夫耳语，不时地朝他投以深情的一瞥。在陈述马瑟诺那骇人听闻的暴行和他在逃亡期间的桃色际遇时，她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马瑟诺经常穿着宽大肥胖的或蓝色或灰色的套装和开领的白色衬衫。在被告席上，他要么咀嚼着口香糖，要么没完没了地吃些午餐的剩饭或糖果，有时还匆匆写些便条递给他的律师。由于患有糖尿病，在听证休庭期间，他会用医疗器械测量自己的血糖水平和血压。

经常持续达 8 个小时的庭审似乎让马瑟诺烦恼不堪。当背叛者证人和原 FBI 特工们重新回放他 30 年来活动的言谈和事件时，他的脸色愈加苍白和憔悴。检方展出了一面大台板，上面贴着约 60 张黑手党人的面部相片和几十张监视照片，据称这些已经死亡或活着的人都与他的黑社会爬升有联系。在众人看来，这就是一部法庭版的《这就是你的生活》。陪审员们听到的不是真实的姓名，他们不得不适应黑手党用神秘的绰号来称呼彼此的嗜好，诸如“博帕龙”马蒂、“哈哈”路易斯、“空手道”汤米、“豆子”乔、“百吉饼”路易和“兔子”彼特……

检方的七名主要背叛者具有几乎相同的经历，从他们身上可以解读 20 世纪后期黑手党文化的历史。所有人都出身于城市蓝领家族，受过很少的正规教育，很早就渴望并成了黑手党党徒，并且都取得了成功过着优裕富足的生活。他们的经历表明，在黑手党里，无知并不是进阶爬升的障碍。詹姆士·塔塔莱昂纳就是个例子，他作证称理解不了自己所读的东西，回忆不起重要的日子，也不知道“科萨·诺斯特拉”的意大利语意思是“我们的事”，他以为它表示“朋友”。在七个人当中，只有一人对充斥着他们生活的谋杀和血淋淋的事件露出一丝懊悔。在回忆并描述伏击三名角头的过

程时，弗兰克·利诺情不自禁地轻声啜泣起来。然而，在那个事件当中，他本人险些成了受害者而不是杀手。所有人都同意塔塔莱昂纳关于执行黑社会谋杀的说法：“不是他就是我。如果我抗命不从，被杀掉的人将会是我。”

布赖特帕特猛烈抨击和贬低背叛者关于马瑟诺之历史的供词，这导致他与安德烈之间爆发了火药味十足的舌战。开始时，主审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尼古拉斯·加劳菲斯（Nicholas Garaufis）以其诙谐的、自我挖苦的警告勒住了这两名对手。当交互讯问变得更为激烈时，布赖特帕特和安德烈之间的争吵也进入了白热化。这位检察官指责布赖特帕特歪曲事实，并在陪审团旁边对证人的回答不恰当地、故作低语地进行贬抑和错误的定性。作为报复，布赖特帕特抗议安德烈玷污了他的名声，并一度要寻求无效审判，称法官对他的问题和法庭行为的限制造成了“一种令我的当事人不可能胜出的气氛”。

加劳菲斯是个性情平和、面含笑意的法官，往往未穿工作黑袍就坐在法官的高脚椅上。他警告两名对手，“管住你们的嘴巴，小心被罚款。”他最严厉的责难是针对布赖特帕特的。这位法官曾经突然中断交互讯问并将陪审团送出法庭，因为布赖特帕特根本不理会他针对不当提问所下达的指令。“你嘴巴里吐出的全是挖苦讽刺的污泥。”加劳菲斯说道，命令布赖特帕特坐下来，停止抱怨他对马瑟诺的裁决存有偏见。

在历时九周的法庭听证期间，检方共推出了78名证人，出示了三百多件证物、照片和录音带。被告的唯一证人是个FBI特工，为了贬抑瓦伊塔尔的可信性，他在一场被告回击乏力的辩驳当中被传唤出庭，意在证明证人的证词与他先前接受讯问时所提供的情报之间存在一个小小矛盾。在法庭外面，已于庭审期间度过其65岁生日的布赖特帕特自信地宣称，他已经取得了交互讯问的胜利，无需反驳证词。

布赖特帕特的最后机会是向陪审团做庭辩总结，他最大的障碍是降低7名背叛者那海量证词的可信度。他指责FBI和检察官通过声名狼藉的告密者来为30年来对马瑟诺展开的一连串代价高昂却不成功的调查进行辩护，并借此杜撰和润饰它们的起诉书。他特别指出，尽管进行了无数次电子窃听，但FBI从来没有从马瑟诺口中取得一句罪证之言，也没有获得一枚指纹或其他物证证明他卷入任何一起罪案。布赖特帕特声称，为拿下马瑟诺，政府败坏了司法公正，承诺给予本应为共计18起谋杀负责的反社会者以自由和轻判。“在法庭审判史上，这是一群被拼凑起来的最自私、最傲慢和最堕落的人，”他对陪审团说，“把乔·马瑟诺交给我们，然后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这位律师在五个小时的陈述中几乎不看手稿，而是频频地设法与陪审员进行目光接触。他将最大的恶意留给了瓦伊塔尔，称他“憎恨乔·马瑟诺”，是个“疯狂的被

自己的人所鄙视的精神病患者”。布赖特巴特没有否认马瑟诺是个黑手党老板，他企图利用这种让步反败为胜地击垮检方自己的证词，即只有教父才能发出谋杀指令。这位律师强调，既然指控马瑟诺的7起谋杀都发生在他1992年成为老板之前，仅凭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他的清白。布赖特巴特引述“科萨·诺斯特拉”的权力结构及其指挥体系规则，声称1992年之前身为角头的马瑟诺没有权力下令杀人。他竭力将命案的罪责转嫁到前任统治者菲尔·拉斯泰利和博南诺家族其他大亨头上。在对证据进行了一番荒谬的分析之后，他将马瑟诺的统治描述成温和的、没有流血的仁爱之治。“他热爱生命，厌弃死亡。”布赖特巴特宣称。

在整个审判期间，安德烈和另两名政府检察官罗伯特·亨诺克（Robert Henoch）和米特拉·霍莫泽（Mitra Hormozi）都在不断地取得背叛者的证词，证明在正式成为教父很久以前，马瑟诺就是事实上的老板。亨诺克在开庭陈述中向陪审团断言，在马瑟诺的统治之下，“如果遇到麻烦，你不能拿回一份糟糕的成绩单，因为不及格的后果就是死亡。”

在陈述检方的部分庭辩总结时，霍莫泽将谋杀罪责归咎在马瑟诺身上。“有人会清楚，发出命令或决定生死的人比杀人者负有更大的责任。”

在强力反驳布赖特巴特之论点的过程中，安德烈把检方的这起特大检控案的所有部分都整合了起来。在为利用背叛者作为铲除黑手党老板的必要的邪恶力量进行辩护时，他列举了许多没有他们的供词就不可能结案的谋杀和其他重罪。他承认，这些叛离者是自私和渴望逃避监禁之苦的，但他发誓所有人都将受到审判。“他们是罪犯，是谋杀者，是犯罪组织——那个人的组织的一部分，”在结束总结时，他手指着马瑟诺说道：“这个人至今还肩负着责任，肩负着作为组织里最高统治者的责任。”

按照记者室的传统，11名报道审判的记者就陪审团审议时间的长短及其裁决结果立下了赌约。他们对这个由10男2女组成的陪审团多长时间才会出来各持己见，但无一例外地认同其最终的裁决结果：有罪。5天后，即2004年7月30日，陪审团女主席用将近15分钟的时间宣读了11条罪状和50项特定的敲诈勒索行为的无异议裁决。“喔，天啊！”马瑟诺的女儿阿德琳呜咽起来，当女主席61次宣告“有罪”或“证据确凿”时，她的头埋进了自己的手里。陪审团还下令没收马瑟诺约1040万美元的资产，约相当于他10年的犯罪所得。法官还将他非常得意的卡萨布兰卡饭店也加进查封对象之列。

一切都结束了，马瑟诺转向妻子，摊开了双手，似乎在无声地问：“你怎么办？”

尽管采取许多诡计多端的防范措施来躲避其他教父所遭受的灾祸，但乔·马瑟诺从未料到这陡生的危情乱局会如突发的洪流将他淹没。他在十多年里一再挫败了FBI的常规行动，这使他相信自己城高墙厚难以被攻破。他怎么会料到两名刑侦会计师，特工萨奈特和麦克卡弗里，会对其整个家族发起一场独辟蹊径的稽查行动呢？通过从他那罕有的守法行为——填报个税申报单入手，经过迷宫式的缜密调查，他们终于将他掀翻在地。

通过任用角头来操控家族的经济引擎，马瑟诺构筑了历经10年风雨而能有效抵挡FBI常规调查的隔离墙。通过让角头和他们的儿子们发财，他相信牵连于他会让他们付出太多代价。他把这种分权管理的体制看成一种对付检控的坚如磐石的屏障。而当角头们把反戈一击视为自己获得从轻量刑的唯一机会时，它反而变成了阿喀琉斯之踵。

马瑟诺最大的错误是对塞尔·瓦伊塔尔的虐待。即便如此，这个受辱的妻弟开始时显然准备与他同舟共济地渡过RICO风暴。所有证据都表明，在萨奈特和麦克卡弗里就威胁其性命的阴谋向他发出警告之前，瓦伊塔尔一直没有打算出卖马瑟诺。如果瓦伊塔尔忠贞不移，马瑟诺很有希望击败这独辟蹊径的指控，从而使FBI这准备最充分的欲将他绳之以法的努力再次受挫。身为传统主义者，马瑟诺违背“科萨·诺斯特拉”的一条基本准则公然“侮辱”了他30年来最忠诚的支持者瓦伊塔尔。这是个致命的错误。瓦伊塔尔决心成为一名“C. W.”（合作证人）在加快背叛的令马瑟诺难脱其罪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是个决定性因素。

他对瓦伊塔尔的判断错误造成了诸多严重后果，而不仅限于马瑟诺本人身陷囹圄。1992年出狱之后，他向其颓败衰落的犯罪集团注入了勃勃生机，让它拥有15个行动队和一百五十多名打手，成为靠不法产业繁荣起来的强盛家族。然而，瓦伊塔尔对该家族百科全书般的了解，还有“大路易”塔塔莱昂纳通过秘密录音取得的罪证之言，都有力地支持了那突然如洪水般涌来的大量控告，使马瑟诺的许多地下黑势力被铲除。新的证据还导致家族第二梯队的领导者连同32名角头与打手一起被逮捕。在两年的时间里，该帮派近一半的骨干分子——约60名正式党徒和最资深的指挥官——都被监禁或等待审判。

在最新的被捕者名单上，名列榜首的是马瑟诺最后钦点的代理老板“漂亮文尼”文森特·巴斯查诺（Vincent “Vinny Gorgeous” Basciano）。2004年11月，在受到RICO谋杀指控未获准保释之后，巴斯查诺发现自己与马瑟诺一起被关押在布鲁克林的大都会惩教中心。45岁的巴斯查诺是个美容院老板，主要在布朗克斯从事敲诈勒索活

动，其绰号既源于他的职业，也与他那堪称堂堂的仪表有关。

“漂亮文尼”有许多他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要同马瑟诺商量，而老板“耳朵”乔突然成了一个专注的倾听者。他意识到巴斯查诺可能是个关乎其前途命运的关键人物。被定罪后不久，被诸多黑手党告密者出卖的马瑟诺决定顺时而动。让执法官员们吃惊的是，他主动要求成为一名线人。他把毫无提防的巴斯查诺作为手里与政府达成减刑交易的王牌。他声称，他能使巴斯查诺牵连到大量未结案的严重罪行当中，还能让这个代理老板谈论他正在策划的一起令人震惊的犯罪——谋杀一名检察官。

2005年1月初，马瑟诺录下了自己与巴斯查诺的两次监狱密谈，话题涵盖博南诺家族的后续活动和一些尚未告破的谋杀案。据信由巴斯查诺提议的最具轰动性的计划是杀死负责起诉博南诺家族的联邦检察官格雷格·安德烈。

1月底，主要根据其涉嫌犯罪的谈话，巴斯查诺被指控阴谋杀害安德烈。此外，这次接踵而来的检控还披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马瑟诺在和他从前的主要敌人，即那个长期追踪他的政府小组在合作。他加入“美国队”的动机很清楚，执法官员和辩护律师都知道，他想让亲人保有其约1000万美元的非法所得，并且希望妻子和89岁的母亲能免于被逐出各自的家。（政府原打算没收这些通过犯罪收益购得的房子。）

他背叛其黑手党家族的另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因素是强制性的终身监禁正因其2004年的RICO有罪裁决在等着他。如果因为1999年下令谋杀杰兰多·西亚西亚而在第二次审判中被定罪，悄然向他逼近将是一个可能的合法注射毒剂的死刑判决。

除了窃听巴斯查诺，据称马瑟诺还向特工供认了家族的坟地。特工们在那里挖出了菲利普·贾可尼和多米尼克·特林彻尔的遗体，这两名角头20年前被马瑟诺下令残杀致死。执法官员还急切地想解开马瑟诺40年来作为一名重要黑手党人的秘密，还想摸清他所知道的近期其他四大家族首脑人物所犯下的罪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为取得判决上的突破，马瑟诺聘请他以前的仇敌爱德华·麦克唐纳来与检察官达成认罪交易。1986年，当麦克唐纳担任东区有组织犯罪特遣队负责人时，他的特遣队证明了马瑟诺是个黑手党敲诈勒索者，让他首次被定罪入狱。在麦克唐纳为马瑟诺全力游说的情况下，他至少与检察官们达成了一项值得注意的妥协方案。马瑟诺承认杀死了西亚西亚，政府则撤回其极刑——死刑申请。）2005年6月，免除了死刑的马瑟诺听到了法官尼古拉斯·加劳菲斯的判决，领受连续服完两个终身监禁的刑期。

因为他的合作，马瑟诺取得了一个保有其100万美元资产的机会，让妻子能够保留他们那伪乔治王时代艺术风格的家。马瑟诺将约900万美元，包括760万美元的现金、金条和不动产，移交给了政府。放弃了通过犯罪手段获取的储蓄金后，马瑟诺

太太表示，由于丈夫抛弃了“乌默它”，他们的婚姻已经出现裂痕。这个历经岁月洗磨与丈夫相濡以沫的妻子告诉记者，她不认同乔的变节，并且不一定会到监狱去探望他。

马瑟诺，这个黑手党最高级别的告密者，仍可以抱着重获自由的希望。如果他的证词和检举在大量的“科萨·诺斯特拉”案件中被证明有效，他的双无期徒刑可望缩短。

马瑟诺是纽约地区第一个成为背叛者的老板，而他曾经被视为黑手党的保守派行为准则和“乌默它”戒律的一根柱石。（“科萨·诺斯特拉”仅有的另一个指证自己家族的教父是费城的拉尔夫·拉塔尔，他2000年受RICO指控被定罪后转变为政府证人。）马瑟诺长期被执法部门和黑手党人描绘成20世纪最后的主要教父，被看成是黑手党的救世主。然而，他62岁时留下的最后作品是衰败零落的博南诺家族，而且他的背叛还威胁着其他黑手党家族。

“和所有他以前谴责其与政府合作并欲除之而后快的人一样，他太脆弱了。”有个曾为博南诺家族聪明汉辩护并要求匿名的资深律师这样说道。在总结其他黑手党被告的代理律师的观点时，他接着说：“最终，在结束其犯罪历程之后，乔不过是另一个伪君子。他拼命地想苟全性命，想抓住一线重新走上街头的机会。”

后记 回到山洞

新世纪伊始，美国黑手党被描绘成了一个被碾碎了的巨人。检察官和 FBI 官员正以令人麻木的频次发起着检控行动，并且看上去严重摧毁了黑手党在纽约的神圣堡垒。从颞手称庆的政府当局传出来了明确的信息：曾经不可战胜的五大家族，连同这个国家其他地区的犯罪家族一起，正被剿灭殆尽。一些狂热者赞美这是“教父们的末日”。这些联邦和州里的联合战役是美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为成功的反犯罪作战。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24 个黑手党家族，这个国家里曾经最具组织性和最富足的犯罪集团，几乎被歼灭殆尽或者说被严重削弱。（相较而言，一场代价更高的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反毒品祸乱之战进行得十分艰苦且看不到尽头。）

然而，2001 年 9 月 11 日从根本上改变了这光明而乐观的图景。

恐怖分子攻击了世贸大厦，而五角大楼留给了“科萨·诺斯特拉”一份意外的遗产：重新燃起的生存希望。

在改变黑手党的前途与命运上，9·11 事件是个决定性的因素。被劫持的飞机摧毁了双子塔，刺入了五角大楼，杀害了近 3 000 名无辜者的飞机让黑手党得到了暂时的解脱。自从基地组织发动自杀式袭击以来，FBI 和整个美国的警察无可非议地专注于一个最主要的任务：防范恐怖袭击。

但即使在 9·11 以前，联邦和地方对黑手党的调查已经在放慢脚步。官方的逻辑结论是，作为一个苟延残喘的敌人，黑手党无需受到太多关注。20 世纪 90 年代，FBI 和州政府开始投入最大的精力展开了黑手党调查，而大多数集中于新千年前几年的检控和定罪便是这些长期调查的收尾之作。在新世纪的头几年里，全国用于打击聪明汉的资源愈见减少，而 9·11 事件更是加速了这种趋势。在世贸中心大绝灭后的三个月里，纽约几乎所有的黑手党小组特工都被迫放下现有的调查工作全力投入到反恐行动当中。一些特工被借用达七个月之久，还有一些再也没有返回“科萨·诺斯特拉”工

作岗位。“毫无疑问，一些重大的行动计划在9·11之后被暂时搁置了起来，”FBI发言人詹姆士·马戈林承认。

反间谍和反黑手党在过去25年里一直是FBI所关心的两个最主要的任务。突然间，黑手党被降到了次要位置。2002年5月，在宣布FBI那经过修改的工作计划时，FBI局长罗伯特·S·米勒三世引人注目地将黑手党排除在该机构最紧迫的挑战之外。“保护美国免受恐怖袭击”列在其计划表的首要位置；预防暴力与重大白领犯罪和打击公共腐败取代了已经居于优先表下端的“科萨·诺斯特拉”的位置。

其重要性降低的其他例子也很明显。在FBI华盛顿总部，甚至FBI的称呼用语也发生了变化。监督所有“LCN”（拉·科萨·诺斯特拉）调查工作的有组织犯罪处被更名为“跨国犯罪组织处”。

在20多年里，FBI每位被安排到纽约分局（56个外派分支机构里最大的一个）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在负责黑手党调查方面总是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显然是要顺应形势的变化，米勒在2003年改变了这种模式，挑选了反恐专家帕斯夸里·迪阿缪罗（Pasquale D'Amuro）任纽约负责人。五个家族小组缩减了规模，仍归FBI刑事处旗下，而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被大幅扩充的“反恐怖主义处”已经成立。

总体上，在全国1.1万名特工当中，FBI重新调整了其中500多人的职位，其职责由传统的反犯罪转移到打击基地组织及其恐怖主义分支上。官员们承认，专职的有组织犯罪小组被削减或撤销，但其准确数字只有少数人才知道。

在纽约市，FBI征讨美国黑手党的中坚力量——在1100名反黑手党特工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抽调参加反恐行动。在20世纪90年代FBI征伐纽约犯罪家族的鼎盛时期，多达350名特工和100名警探在黑手党特遣队全职或兼职工作。到了2005年，这支450人的分遣队被裁减了约三分之二。约100名特工被指派长期或临时执行反黑手党任务，同时协助他们的只有纽约警察局少数几个警官，而不是从前支援FBI黑手党小组的100名警察。与此同时，反恐怖主义处得到了扩充，其专职特工达300多人，另外还有从其他联邦机构和纽约警察局抽调了400名调查人员。

FBI高层为人事调动进行了辩解，他们找到了充足的根据将黑手党的威胁最小化。许多人相信，政府已经达成了其主要目标，即把黑手党打回到其20世纪之初的状态：组织松散，内斗成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者。“他们的前途暗淡并且危机四伏。”WK·威廉斯（WK Williams）2004年在接受采访时预测说，这位FBI官员在华盛顿指挥着FBI在全国的反黑手党行动。（威廉斯以大写字母表示其未给出全称的教名。）

深信黑手党的光辉岁月已经过去，乐观主义者认为，只需最后的几颗钉子就能

封住它的棺材。为支持这种论点，现任和前执法部门官员都能列举出一长串击败“拉·科萨·诺斯特拉”的场面。

1. 只有纽约和芝加哥（黑手党最大的传统堡垒）的家族还保持着一种徒具其表的组织框架。除了纽约和芝加哥家族那些仍存在分支组织的地方，特别是佛罗里达州，全国其他地区的20多个犯罪家族都一败涂地或者实际上已经灭亡。据威廉斯称，黑手党的残余力量大部分都集中在纽约和东北走廊。

2. 几乎所有的纽约和全国其他重要家族的知名首领都已经被投进了监牢。

3. “乌默它”——勇气与沉默的保护戒律——已经被打破。通过合作以寻求从轻量刑，不断出逃的背叛者们正在寻找免遭RICO惩罚的庇护所。经历了半个世纪从无家族首领或角头背叛的时期之后，甚至大佬们也在“变节”。

4. 意裔美国人社区随着人口结构和社会问题的变化而改变，不再是黑手党人的避难所，也不再是招募一代代忠诚可靠的新党徒的摇篮。纪律渐渐松弛，崇拜者们——如博南诺家族的巴斯大道好汉——愈来愈多地染上了毒瘾。他们很容易被逮捕，而为了脱身他们会讲出所有秘密。

5. 通过惩处大批腐败的工会领导人和任命内部监察人员，黑手党与重要工会（最著名的是卡车司机协会和建筑业工会地方分会）的联盟关系已被削弱或被斩断。

6. 政府通过监管卡车司机协会以防工会借款流向被黑手党控制的酒店，同时通过由合法的跨国公司竞购一些最大的赌场，那些最强势家族在拉斯维加斯的摇钱树被砍倒了。靠赌博牟利的时代似乎已经终结，内华达州当局出台的更为严格的执业监管措施阻止了黑手党人对赌场的控制。

7. 继市长鲁道夫·吉乌里亚利的政府引入严厉的执业法规之后，通过将数十家被黑手党染指的公司列入黑名单，控制纽约宝贵资源——食品批发市场、服装中心、垃圾清运业、贾维茨会展中心——的黑势力受到了钳制，如果说还未被完全铲除的话。这些管理措施成了人们眼里的防火墙，足以抵挡聪明汉们重新染指这些商业富矿。（历史上有名的曾长期受黑手党人折磨的富尔顿鱼市场将在2005年基本上被关闭。其交易业务将转入布朗克斯一个现代化的、封闭式的设施内，这可望增强政府的监管力度以防黑手党人施加后续影响。）

8. 定罪判刑已经摧毁了黑手党的管理委员会，现在已不太可能有另一个至高无上的机构能重获权威来解决争端、推行传统习俗并维持黑手党的组织纪律。

“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所具有的影响力已经成为过去，”詹姆士·卡尔斯特罗姆说道，这位 FBI 纽约分局负责人在 FBI 打击黑手党的行动中是位重要的参与者。“他们仍有暴徒和窃贼在那里，但在控制像卡车司机协会和重要行业方面，他们的影响力为零，再也不能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罗纳德·戈德斯塔克响应了卡尔斯特罗姆的看法，这位曾参与管理委员会检控案的前纽约检察官将残存的犯罪家族描绘成无组织的乌合之众。“黑手党被严重削弱，它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向其成员提供帮助。再也没有人遵守规约。他们或许会继续从事犯罪活动，但他们将作为个体而非具有生存能力的组织来行动。”

在 2003 年去世前不久，原纽约侦探拉尔夫·萨勒诺，一位很早就向“科萨·诺斯特拉”开战的勇士，形象地称这个组织是个正在淡出历史舞台的时代错误。他认为，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成员“素质的下降”。“曾经，就在不久以前，还有大批意裔美国人希望进入这些家族。现在，他们更想成为合法公司的 CEO。这些家族不再吸引有能力的年青人。”

针对教父及其高级信徒连续遭受的法庭大溃败，辩护律师们基于自身的信息优势进一步解释了个中原因。律师们声称，严厉惩治 RICO 违犯者使叛离者如潮水般地涌将出来，进而摧毁了黑手党的长期生存计划。杰拉尔德·沙杰尔表述过那些曾为重要的有组织犯罪嫌疑人辩护过的律师们所持有的看法，他说，“被处以 20~40 年乃至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的判决前景是促使人们采取合作态度的一个强劲动力。”曾为约翰·葛提及其数名亲人和萨米·格拉瓦诺辩护过的律师沙吉尔声称，陪审团变得“更加保守起来，”在与黑手党有关的案件中更倾向于有罪裁决。“在 70 年代至 80 年代，我们取得过许多无罪判决。现在，如果陪审员听到‘黑手党’字眼，他们更有可能臆断为有罪。这意味着甘冒审判和严刑惩处之险的旧式人物已经所剩无几。”

官方的主流看法是，进入 21 世纪的“科萨·诺斯特拉”在受到连续猛击之后业已溃散，甚至有些细心的分析家们已经为它准备好了讣告。然而，有些值得警惕的迹象，至少在纽约，表明这个病人并不甘心躺进坟墓，且不妨留意以下出现在本千年头几年里的现象：

赌博和高利贷——黑手党那互依共存的主业——似乎不可遏抑。甘比诺家族有个角头被发现在昆士区监管着年毛收入达 3 000 万美元的赌注经纪场所。博南诺家族也正在从类似的不法活动中牟利，通过郊区长岛的两个体育赌博团伙，它每年要诈取 1 000 万至 2 000 万美元的净收益。昆士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曾采取打击行动摧毁了博南诺家族控制的一个高科技跨国组织，据称它在 2002~2005 年间操纵的体育赌注达

到惊人的 3.6 亿美元。聪明的赌徒总喜欢随黑手党下注，而不会到经州里授权的外围赛马赌博营业室和乐透彩投注点碰运气。在棒球、足球和篮球赛上下注有 50% 的获奖机会且能避税，而州里具有代表性的乐透彩赌博则被看成是在做白日梦，因为中奖的机会微乎其微。

此外，黑手党的赌博网络几乎总是与高利贷结合在一起，随时张开大网等着需要急用钱而不顾极高利率的冲动赌徒。因为操纵着一个利率高达 156% 的赌博和高利贷分支网络，吉诺维斯家族新泽西行动队有 20 名打手和合伙人被逮捕。

尽管不停地试图改革建筑业和建材贸易工会，但黑手党家族仍在玩着它们的老把戏。黑手党人大幅抬升曼哈顿大都会交通运输局（纽约地区重要的公共运输机构）一幢摩天办公大楼出新工程原本 4 亿美元的造价就是一个可耻的例子。联邦起诉书称，通过抬高成本价和违犯工会雇工制度，该项目发展商——甘比诺家族的一名老合伙人——勾结具有黑手党背景的承包商和腐败的工会官员诈取了 1 000 万美元的不法收益。该发展商承认，作为家族溢价分红的一部分，他多年来每周都要将 1.25 万美元的贡金交给甘比诺家族的一名打手。

在另一起尚未结案的诈骗案当中，通过从一个建筑工地临时升降机操作工工会取得挂名职位，一群吉诺维斯和甘比诺家族的打手诈取了 200 万美元的收入。同样地，通过从一个重型机械行业协会和一个油漆工地方分会谋取影子职位，科洛博和吉诺维斯家族 22 名成员组成一个小组合伙骗取了 350 万美元的薪酬。被黑手党敲诈的工地包括新现代艺术馆和为扬基与大都会小俱乐部球队修建的棒球馆。这些假职位的受益人包括被囚禁的科洛博家族老板“蛇”卡迈恩·珀西科和其他家族权贵的儿子。这些跨家族诈骗有个让人似曾相识的共同点，那就是一种“专门小组”的创立，这不禁使人想起黑手党在过去几十年里所成立的旨在各个帮派间分配非法所得的“俱乐部”。

有个联邦大陪审团还控告新近亡故的乔·科洛博的两个儿子，称他们在一场“卷土重来”的阴谋当中故伎重演，想获得科洛博家族的支持。在房屋和办公楼的改造出新合同中，他们涉嫌敲诈和诱骗数家公司数十万美元而被起诉。

吉诺维斯家族远未停止其在建筑行业里的敲诈活动，它持续盘剥纽约市干式墙与木工行业。联邦和州当局曾夸耀他们已经粉碎了这个家族对该行业及行业工会的控制，但在 10 年之后，该家族有个角头和 21 名低级成员因卷入涉案金额达数百万美元的欺诈和劳工勒索活动而被起诉。

所有这些建筑行业的犯罪都是作为在 9·11 之前即开始调查的成果被发现，当时“科萨·诺斯特拉”仍是政府一个优先关注的目标。

2004年，关于黑手党在一个重要的全国性工会——国际卡车司机协会——里保持着影响力的争论又重新出现了。有20名调查人员和律师在集体抗议中辞职，他们抱怨卡车司机协会主席詹姆士·P·霍发，失踪的吉米·霍发的儿子，在阻止他们清除“科萨·诺斯特拉”影响的努力。负责整顿工作的爱德华·施蒂尔（Edward Stier）是个德高望重的前联邦检察官，他声称霍发阻挠对“有组织犯罪的经济源头”和工会官员的腐败展开调查。1989年，在其顶层官员受到多次调查和定罪之后，这个工会受到了奉命根除黑手党影响的联邦监控系统的监管。为设法终结政府的监督，小霍发1999年挑选施蒂尔组建了被称为RISE（遵规、廉正、实力与道德）的自我监管试验小组，并由前FBI特工充当小组成员。霍发誓言，他的责任是铲除任何残存的黑手党影响力。然而，他自己任命的调查人员挂靴辞职暴露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彻底改革具有被黑手党长期渗透历史的工会充满着危险。

甚至市长鲁道夫·吉乌里亚利那警觉的反黑手党政府也困窘于吉乌里亚利大门前的一个工程项目。在其任期结束前不久，一些为造价达2200万美元的市政厅公园整修工程供应混凝土的公司被中止了供货合同，因为此前《纽约时报》报道称，它们在更换公司名称之前涉嫌与黑手党家族达成了劳资和谐协议。

通过在建筑行业里的持续存在，黑手党人甚至设法直接从9·11事件中牟利。卢切斯家族二老板“神人”史蒂芬·克雷承认勒索了一个在世贸中心清理瓦砾的公司。博南诺家族曾企图盗卖双子塔废墟的废金属但未获成功。

在20世纪80~90年代集中打击行动的后期，对于顽固不化的黑手党人来说，纽约十亿美元的建筑行业似乎与以前一样容易被染指。在吉乌里亚利遭遇一次异乎寻常的挫败时，阻挡在该行业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障碍显现了出来。他的政府曾硬性颁布过旨在将聪明汉和与黑手党有牵连的公司清除出大型食品批发市场和垃圾清运行业的管理与执业法规。当吉乌里亚利打算制定类似的法律治理建筑工程项目时，他遭到一个极具能量的发展商、承包商和工会联合体的强力阻击，其提案在市议会被封杀。从此以后，没有政治人物敢于提议严厉监督那个易遭腐蚀的行业，因为就选战而言，该行业的工会向来都是举足轻重的助选者。

通常，黑手党似乎总要决意保留一些历史的纽带。乔·马瑟诺在2004年接受审判时，有条侧面消息揭露了博南诺家族的知名打手和小意大利的餐馆老板佩里·克里斯塞提利是圣吉罗节委员会的主席，而据称市长吉乌里亚利的政府已经清除了黑手党对它的影响力。克里斯西泰利被迫从管理这个著名的旅游盛事的专门小组辞职。但没过多久，作为纽约他特别喜欢的一个就餐点，吉乌里亚利将克里斯塞提利那桑树大街

上的达尼科饭店列在其推荐名单榜首，提供给了当年参加共和党大会的代表们。

“科萨·诺斯特拉”在新世纪被重新发现的另一处富矿是在服装中心以劳资和谐为要挟索取“保护费”，而这些不法活动可以回溯到洛克·卢西亚诺的极盛时期。敲诈大师们来自甘比诺家族萨米·格拉瓦诺原来的那支在布鲁克林活动的行动队。在他投靠政府以后，这个行动队曾繁荣稳定地发展了很长时间。

据警方称，黑手党特别擅长的汽车“拆车场”行当仍在发展壮大。通过重新出售被盗汽车的零件和气囊，吉诺维斯家族有个在布鲁克林活动的团伙年利润达 250 万美元。

在继续从事经受过时间考验的犯罪活动时，五大家族还不约而同地开拓新的获利达数百万美元的冒险事业。它们在许多领域都有着富于想像力的创新：

电话费诈骗：因在五年间从数千名不知情的用户那里窃取 2 亿多美元，角头塞尔瓦托·托里·洛卡西奥，甘比诺家族被定罪的二老板弗兰克·洛卡西奥的儿子与衣钵传人，与九名其他打手和合伙人被起诉。黑手党人巧设骗局诱感受害者尝试各种成人娱乐活动，如色情聊天、约会服务和灵命解读。偷窃靠的是“谎言”，被“免费试用”的广告欺骗之后，落入圈套的打电话者每月被诈去的电话费高达 40 美元。调查人员称，熟悉高科技的黑手党人设计了一种空壳公司的迷魂阵，然后通过当地电话管理服务机构间接地给打电话的人开出账单。FBI 甘比诺小组负责人菲利普·斯卡拉（Philip Scala）估计这起诈骗案是黑手党有史以来犯下的涉案金额最高的大案之一，他说，“仅凭那种诈骗利润就能让甘比诺家族看起来像个世界 500 强公司。”

制售假冒 CD 光碟：吉诺维斯家族有个团伙多年来在长岛每周都仿造了 1 万张光盘，在这场阴谋被挫败前每年获取了 250 万美元的纯利润。

信用卡：在昆士区，吉诺维斯家族的打手伙同商店出纳员和店员抄录信用卡号码，然后利用它们制造假信用卡。每盗取一个号码，不良雇员就会取得 50 美元的酬金，而假信用卡则以每张 1 千美元的价格被卖给在警觉之前已经采购数千美元商品的客户。有些为博南诺家族一个行动队效劳的电脑黑客们也进行过类似活动，他们窃取了墨西哥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号码。这种诈骗由角头“大威利”威廉·里维洛（William “Big Willie” Riviello）策划指使，他以布朗克斯的一个蘑菇包装仓库为掩护进行活动。

卫生保健：新泽西州有支吉诺维斯家族行动队控制了一家卫生保健公司，主要为雇员和工会安排和管理集体体检和牙齿与眼睛护理业务。主管们被迫同意为子虚乌有的医疗服务付出额外费用，而这部分钱自然落入了黑手党的腰包。新泽西总检察长办公室在窃听该行动队的赌注经纪活动时偶然发现了这个阴谋，但未能取得其诈骗金额

的准确数字。

电话卡：甘比诺家族通过成立供应预付费电话卡的公司窃取了数百万美元。这些黑手党人通过零售店，特别是移民聚居区里的摊点来分销这些电话卡，其购买者多用它们来打越洋电话。甘比诺家族提供的这种卡通常的售价是 20 美元，但大多数打过 2 美元或 3 美元的电话之后就无法使用，因为它们没有按定额充值。没有人为诈骗这些低收入者被捕，因为许多受害者都是非法侨民而不敢向警方报案。谁能猜得出他们到底谋取了多么不法利润呢？

黑手党在纽约的后续活动表明，它的残余分子能够生存并继续依靠赌博、高利贷和勒索保护费兴旺起来，但一场大范围的复苏深深地依赖于大批新黑手党人适应新型犯罪的能力。死灰复燃并没有让 RICO 法律的主要起草人罗伯特·布莱克感到惊讶。他把五大家族近期侵入金融和医疗保健产业看成是“科萨·诺斯特拉”获得达尔文生存适应能力的最新阶段。布莱克把黑手党描绘成“一种资本主义的镜像和反复发作的资本主义顽疾”。他特别指出，它总会以科技创新的成果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养分并破坏旨在治理产业、工会和麻醉品使用的法律。“我们不会赢得这场对黑手党的战争，”他忠告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遏制或控制它。”

布莱克和其他经验丰富的反黑手党资深人士担心，政府轻视其长期敌人终将导致自食恶果。“让敌人躺在地上爬不起来比再次击倒他更容易，”布莱克说，“撤去人力财力，如果回头再完成这件工作，我们就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尽管宣称保持着决不松懈的警觉，但执法部门如同过山车般打击传统犯罪家族的努力无疑正处在一个向下的循环当中。2003 年 9 月，FBI 局长米勒在接受国内公用无线电台的采访时讲了许多。由于 9·11 事件，他要求公众“体认到并不是每件事情都得由我们来做”，并催促地方政府要在 FBI 将反恐和新的优先目标作为工作重点时承担起它无暇顾及的责任。

在面临暴力犯罪和财政预算制约的同时又要面对恐怖主义，州检察官和警方在同黑手党的斗争方面一如既往，丝毫没有懈怠。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纽约，为协查案件和整治受黑手党侵蚀的行业而成立的州有组织犯罪特遣队拥有 140 名调查员、律师和后备人员。现在，其工作人员被逐渐缩减到约 60 人。共和党政府剥夺了这个机构的独立性，将它并入了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砍掉了其独立的预算，还经常让它从事与有组织犯罪无关的调查。新任总检察长埃利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民主党党员））

坚持称，他在竭力恢复这个机构的元气，但困于预算限制。斯皮策通过揭露华尔街、市政当局和保险业丑闻迅速成了美国名人。然而，在对付“科萨·诺斯特拉”的前线，他领导的总检察长办公室在前七年里鲜有作为。斯皮策认为那些家族比其 20 世纪 90 年代时“已经萎缩且更加衰弱”，但承认“它们正在渗入各种不同的领域。”尽管预算被大幅削减，他发誓自己那“编员更少，地位更低”的特遣队仍能在扼杀黑手党方面发挥辅助作用。由于人员大幅裁减和优先任务转移，这恐怕是一个难以成为现实的誓言。

在其他黑手党为患多时的州，类似的有组织犯罪和情报搜集部门被裁撤或缩小了规模。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州的官员将黑手党当前的重要性和危险程度降到了最低。由于资金短缺，各州都不愿为有组织犯罪调查人员提供专门培训，也不愿意对需要经常进行监视却无绝对成功把握的秘密行动承担费用。数月以来，电话监听装置和窃听器，几乎一直充当着获取定罪证据的基本工具，只能供六名特工使用，但对面临着持久的暴力犯罪问题却又苦于资金短缺的地方警察和检察官来说，那已经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有组织犯罪科主任检察官丹尼尔·卡斯特利曼希望有更多的人手来对付黑手党。“谁认为黑手党已经灭亡，谁就如同痴人说梦，”他强调说，“仍有蠢蠢欲动的犯罪团伙准备、愿意和能够利用人性的弱点，仍有年青的暴徒想要仿效和延续黑手党人的生活方式。”

除非 FBI 有魄力重申自己的主张，否则迅速剿灭黑手党的执法愿望将如梦幻泡影。弗雷德里克·马腾斯（Frederick Martens）曾任宾夕法尼亚州刑事委员会执行董事，还担任过新泽西州州警有组织犯罪情报部门负责人，他警告称，联邦和地方政府被“蒙蔽”了，以为这世纪之交的定罪洪流意味着黑手党的覆灭。他说，“我不禁想起了越南战场上的将军们，他们利用虚假的歼敌数字来宣称胜利”。

在黑手党的基本结构似乎受到重创的同时，马腾斯担心执法部门松懈起来的进攻态势会让那些家族枯木回春。“适应性和持久性是黑手党的基本特点。给一线生机，它们就会充分利用。”

20 世纪末，FBI 过于乐观地评估博南诺和科洛博家族群龙无首且濒临消亡导致了一场痛苦的失败。在八年的时间里，FBI 为节省人力只让一个小组监视这两个犯罪家族。这种节约最重要的后果是博南诺家族在乔·马瑟诺领导下戏剧般地复活了。“我们的教训是，你不能降低对任何家族的警觉性，”曾任该联合小组临时主管的布鲁斯·莫尔评论说，“所有家族都能够死而复生。”

患上弹震症的科洛博家族甚至也有着明显的复活能量。FBI 通过博南诺家族背叛者“大路易”詹姆士·塔塔莱昂纳得知，科洛博家族在本世纪头几年里曾将一份 10 人的荣誉者候选人名单交给其他家族审查。这种重新补充其残损队伍的能力表明科洛博家族仍能指望拥有稳定的新党徒资源。

另一个对联邦的撤退提出警告的人是安德鲁·马洛尼，这位前美国检察官目睹了约翰·葛提最后被定罪的过程。“如果政府稍有懈怠，他们就会赢得喘息之机，”马洛尼预言说，“他们（黑手党）像个吸血鬼；你得拿尖桩刺穿他们的心脏，而且那还不算完。”

在家族遭受猛烈打击的过程中，美国的黑手党人始终保留着一种有助于其生存的宝贵资产。那就是媒体对黑手党人的浪漫化描述，它潜移默化地鼓励人们将黑手党作为美国文化的另一面加以接受。20 世纪 70 年代获得奥斯卡奖影片《教父》让公众形成了一种认识：在一个偏见重重的由白种新教徒统治的社会里，为了赢得认同和进步，作为少数民族群的意裔美国移民唯一的办法是被迫成立犯罪组织并诉诸暴力和盗窃。大量小说和电影都采用过移情和喜剧化的手法，如《普里兹家族的荣誉》、《老大靠边站》、《我的子弹会转弯》和《巴格西》，将一些黑手党人塑造成为生活奢靡却又惹人喜爱的黑帮人物。这些电影把他们描绘成具有献身精神的犯罪分子。另外，他们还常常被赋予可以救赎的品质，是一群尊崇荣誉、忠诚和服从准则的人。他们的诉求完全是美国人的理想，那就是赢得财富和尊敬，哪怕偶尔需要谋杀和背叛。

可望参与有组织犯罪审判的陪审员经常被问到他们的判断是否受黑手党题材的影片或电视节目的影响。许多文学作品将“科萨·诺斯特拉”描绘成光荣与邪恶兼而有之的集体，是一种奇特地类似于大型合法公司的组织，其潜台词是黑手党人引领着异于传统的敢做敢为的生活。而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个黑手党人是“好家伙”。

影剧界有部类似的钟情于黑手党的经典作品是获得 HBO 奖项的电视连续剧《黑道家族》，它相当于电视版的《教父》，是个收视率极高的节目。这部电视剧潜在的富于人性化的主题是，除了他身为一个新泽西行动队角头的职业之外，主人公索普拉诺（soprano）是个最典型的追寻着生命、快乐和安全之意义的郊区居民。他住的是小别墅，捞的是大把的钞票。然而他有着那些步入中年的渴求名利的父亲所共有的苦恼：他与卡梅拉婚姻开始触礁；她执迷于女权，要设法将自己从单调乏味的生活解救出来；他那些十几岁的被宠坏了的孩子都桀骜难驯；尽管有着许多女友，但他苦闷于不被人爱亦不为人欣赏。在自己的“事务所”——一个充斥着险恶之人，稍有过错就

会导致死亡或拘禁的地方，这个自负的黑帮头目频频遇到各种麻烦事。

真正的角头和聪明汉绝不会仿效托尼的行为。他跟踪并杀死受害者，忙于通常为角头或老板所不屑的家务事，而谋杀其实是打手和崇拜者的差事。如果像托尼·索普拉诺那般行事，没有哪个高级黑手党人能活得长久。托尼无视黑手党人最基本的告诫，让自己成了一个现成的靶子，很容易被对手干掉。他不带保镖出行，白天逗留在街边咖啡馆里喝咖啡，每天起床后的头件事是穿着睡衣懒散地沿私人车道走到公路附近取报纸。

性和在精神病治疗在《黑道家族》的故事情节中很是突出。然而，对于一个决不能表现出虚弱征兆或精神状态不稳的老板或角头来说，向精神病医师倾诉心声将是一个爆炸性的错误，因为找精神病医生无疑会引起对统治集团首领之可靠性的争论与怀疑。托尼·索普拉诺不理睬这种警告，他找了一位女精神病医师咨询，而在为他那吹毛求疵的不安全感给出忠告并解读其梦中所表露出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表征、恐惧和性挫折时，后者自然充满着迷人的魅力。没有哪个自尊自负的黑手党人会将自己的隐私吐露给陌生人，更不用说一个女精神病医生。提高妇女在工商业界的地位在政治上理所当然的，但黑手党抗拒这种潮流。

《黑道家族》的确在多个方面准确地反映出黑手党原生态的生活方式，那粗俗的话语很像在实际审判中播放过的那些被秘密录音的尖刻之言。托尼及其亲信生动地还原了黑手党所特有的野蛮与残暴。而托尼那无节制的嫖娼可能是在模仿无数聪明汉的越轨行为。

尽管充满着残忍、堕落和性，但这部作品还是流露出对托尼的潜在同情。这个黑手党人怀念从前的时代，那时的荣誉者都是斯巴达式的值得信赖的人。作为这部电视剧里的非正统派主角，他的焦虑与任何努力追求物质成功的普通守法美国人没有什么不同。他慷慨大方，为自己的孩子操心，为被弃情人的死亡而悲伤。他同情身患癌症的朋友，也怜悯着企图自杀的少年密友。《黑道家族》实际上是一部围绕一个畸形的郊区家庭展开来的消遣性的肥皂剧，它有助于为真实的黑手党家族塑造另一种虚伪的形象。

“荧屏中的他们具有一种扭曲的荣誉感，‘不屈从于’任何人，很容易搞到女人和金钱，”在谈论《黑道家族》的黑道人物形象时，有组织犯罪历史学家霍华德·阿巴丁斯基如此说道，“此类影视作品将有组织犯罪浪漫化，而作为一种并非出于本意的结果，它们让那特殊的人物形象持久地根植在人们的心间，并创造出了种种与黑手党有关的令人向往的神话。”

为了找到更多的与那些真实家族的复活能力有关的线索，美国执法计划制定者们有可能会将目光投向黑手党的诞生地——西西里岛。二战后，意大利软弱的中央政府容忍了黑手党的复兴，让那些家族控制了合法产业，并通过与名声向来不佳的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结盟来插足政治体系。

20世纪80年代，勇敢的检察官乔凡尼·法尔科内（Giovanni Falcone）对岛内的“科萨·诺斯特拉”发起了战后首次不间断的进攻。通过部分采用美国人的办法——与悔罪者或者说背叛者达成认罪协议来打破“乌默它”和进行个人档案调查以证实黑手党人与勒索金有牵连，法尔科内和另一名检察官保罗·博塞利诺（Paolo Borsellino）赢得了大量的审判胜利。尽管受到重重保护并工作在碉堡式的寓所里，但两名检察官在1992年还是受到炸弹袭击而死亡。这是黑手党发出的令人震惊的表达其强硬对抗立场的信息。他们的被杀刺激了意大利，多年来，通过增加检察官人手并将悔罪者及其家人隐入首次运作的意大利证人保护项目，意政府终于突破了西西里族长们的防线。

从2002年至2004年，在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伯勒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设法颁布了一部不利于将黑手党人定罪的法律之后，这场凌厉的持续了10年的执法攻势受到了牵制。新法规定不得采信背叛者的证词，同时限制使用将黑手党人牵连到诈骗与勒索罪案当中的账务证据，并且阻止募用悔罪者。

西西里的现代教父们运用公关手腕采取了低姿态的被称为“黑手党和平之吻”的政策。由于担心重新引燃民众对他们组织的愤怒之火，新老板们尽量避免和执法机关进行暴力对抗，而是更多地采取隐形匿踪的较量。他们严格约束打手，平息内部冲突，并停止谋杀所谓的“杰出尸体”、检察官、法官和坦率直言的对手。“现在，黑手党比以前更强大了，因为其领导者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巴勒莫反黑手党总检察长办公室二号首长塞吉奥·巴比拉（Sergio Barbiera）承认道，“没有人犯下一起能够招来大众媒体关注的严重罪行。”

巴勒莫首席检察官皮特罗·格拉索（Pietro Grasso）补充说，“黑手党的沉默是一种策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存在。”

执法部门承认，在所有产业和公用事业当中，重新组织起来的西西里帮派已经恢复了他们传统的“保护”计划。2003年，通过在检察官设在反黑手党活动中心巴勒莫的办公室里安插间谍，这些重新打造的家族给了执法者们一记重击。两名调查“科萨·诺斯特拉”与腐败政客关系的官员被逮捕，他们被指控充当双重间谍和破坏案件

调查。

曾大量报道过西西里黑手党的美国记者亚历山大·斯蒂尔（Alexander Stille）称，黑手党已经重新获得了不祥的政治生命力，正在设法攫取其过去所享有的那种无上权威。“即使‘科萨·诺斯特拉’只能投出5%的选票——最保守的估计——它也能改变许多选举的结果。”

正如过去所经常出现的那样，西西里黑手党的能量在美国喷发引起了回响。机敏的黑手党观察者意识到，西西里人有办法通过输入新的齐普来巩固美国的家族。新泽西州迪凯伏坎提家族的背叛者“野兽弗兰克”弗兰克·斯卡拉比诺（Frank Frankie “the Beast” Scarabino）供称，他的头儿计划雇请“幽灵杀手”杀死线人和暗杀法官与FBI特工。“他们准备输入西西里枪手。”他在一次黑手党审判当中作证说。斯卡拉比诺称，迪凯伏坎提家族的头目们将那些西西里人称为幽灵杀手，因为他们不为美国警方所知，能够“做完活儿（谋杀）后全身以退，离开这个国家”。曼哈顿联邦检察官米里亚姆·罗卡赫（Miriam Rocah）形容这个计划“并非空穴来风的闲聊”。实力弱小的迪凯伏坎提家族经常充当甘比诺家族的帮手并且与乔·马瑟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从斯卡拉比诺关于幽灵打手的供述中可以看出，这有可能是纽约较大家族所酝酿的一个计划。

西西里还是美国黑手党被削弱家族的兵员招募地。博南诺和甘比诺家族有过在纽约成立西西里分支的历史，而迪凯伏坎提家族之言表明它们与西西里黑手党人的联盟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在背叛狂潮折磨着美国黑手党的后期，未正式加入意大利帮派的西西里人可以被美国犯罪家族吸收为荣誉者并成为受欢迎的增援力量。因其钢铁般的纪律性，更为关键的是，由于他们坚定地忠诚于“乌默它”准则，齐普们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

十年的挫败可能刺激下一拨美国教父采用西西里黑手党所惯用的生存之道——残杀告密者的亲人来强硬地维护“乌默它”戒律。管理委员会有条很少被打破的规定是禁止伤害“平民”，也就是受害者无辜的亲人。然而，在2003年9月，FBI秘密录到时任博南诺家族代理老板与顾问的“托尼·格林”安东尼·厄索谈论起谋杀合作证人的孩子及其他亲人的设想。他把这作为阻止叛变浪潮的最可靠的办法提了出来。在乔·马瑟诺被捕之后，厄索在一次讨论会上谈到封住告密者之口时催促博南诺家族其他头目们说“……你得让人抛尸街头——这必须得堵住”。“你叛变，我就灭掉你全家……为什么要让叛徒的孩子快乐无忧，你我的孩子遭了殃是因为我被终身监禁了……看看，路易，路易，如果你有个孩子，我讨厌这么说，你只需做你该做的，他

们就会他妈的三思而行了。”（厄索意想不到的，他的话被身上暗藏窃听器的告密者“大路易”塔塔莱昂纳录了下来。）

五大家族吸取过去的教训，重新将固有的血统视为不可或缺的身份证明。为了确保更为可靠的忠诚度和更大的安全性，各个家族的统治集团恢复了一个硬性条件，那就是将父母双方，而不仅仅是父亲，必须是意大利血统作为取得荣誉者资格的基本条件。在乔·马瑟诺 2004 年的审判当中，塞尔瓦伊塔尔披露称，马瑟诺和其他领导人在管理委员会会议上重申了这条硬性规定。瓦伊塔尔还报告了另一个汰除懦怯者的举措。2000 年，教父们发布命令，任何受毒品指控而被捕的崇拜者必须在出狱至少五年以后才能被吸收为荣誉者。这条规定意在最终剥夺脆弱的毒品贩子的成员资格，这些人常常为了逃避严苛的刑罚而成为线人。

这些黑手党权威者倡导的极端措施应该是一种对付意志薄弱者的信号。FBI 纽约有组织犯罪部门原主管马修·赫伦（Matthew Heren）认为，“被逼到角落后，他们有可能铤而走险，使出以前不曾用过的招数”。赫伦在指出黑手党的暴力倾向时称，FBI 有份分析报告认为，纽约地区从 1970~2003 年间至少有 912 起谋杀与黑手党有关，平均每年约 30 起。

赫伦和两名一线特工——甘比诺小组的菲利普·斯卡拉和吉诺维斯小组负责人米歇尔·坎帕内拉（Michele Campanella）——证实了需要更多的特工。斯卡拉说，“尽管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要想在三到五年内一举剿灭他们，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手和资金”。

在乔·马瑟诺与其同伙领刑入狱之后，FBI 官员相信甘比诺和吉诺维斯帮派重新回到了五大家族的金字塔塔尖。据 2004 年斯卡拉和坎帕内拉估计，它们每个家族都设法扩充了队伍，至少拥有 200 名积极活动的打手和数千名遵命而行的合伙人。在街头老板和角头们的领导下，经历了约翰·葛提张扬无忌的统治时期之后，甘比诺家族变得极为诡秘起来。“他们设法让自己的大捞钱人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斯卡拉说道。为隐蔽这些金融家的身份以避开调查，街头老板们已经指示他们避开黑手党人的活动据点和社交场合，因为他们在那些地方有可能被特工们发现。

坎帕内拉相信，另一个大犯罪集团吉诺维斯家族正在竭力重构在文森特·吉甘特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触角广布的地下产业结构。在狱中，日显衰老的吉甘特保留了教父头衔，而高级角头们在他服刑期间管理着家族。“老板被关进了监狱，但有人准备传承他的衣钵并照料着家族的赚钱行当。”坎帕内拉说。

有个引起诸多争论的问题是，减轻执法压力是否能削弱“科萨·诺斯特拉”的残余力量。社会公共机构对黑手党力量的记忆可能会消退，当越来越多的历经战争考验的特工和检察官被调离与黑手党对垒作战的前线时，调查的热情和先发制人的策略会越来越来少。大多数联邦检察官都是刚刚离开法学院前来报到的新手，他们没有受过检控黑手党人的锤炼，也不清楚黑手党的计谋。正当他们磨练出处理复杂的 RICO 案件的技能时，许多人未干满十年就离职从事赚钱的私人执业活动了。20 年来，司法部的 14 个有组织犯罪特遣队依靠一批留任时间更长且为打击黑手党倾注了大量精力的骨干检察官开展着工作。尽管许多执法研究者相信这些独立的特遣队证明了自己的效能，但它们仍依据 1989 年的一项政治决策被裁撤了，目的是安抚那些更多地将其视为竞争对手而非合作者的美国地方检察官。

如果联邦政府继续急剧转向，地方官员们怀疑 FBI 会不会将它从线人，特别是从那些与赌博和高利贷活动有关的告密者那里搞到的情报转给他们。FBI 据说仍在吝惜地与州检察官和警察局分享着证据和情报线索，而后者却常常招来其他机构的不满和干扰。

纽约和其他都市区出现邪恶的俄罗斯、亚洲和拉丁美洲黑帮可能进一步转移了地方和联邦执法机关对黑手党的注意力。这些大多数都是新近抵达美国的掳掠者，他们很少涉足需要专门操作技能的犯罪，而是主要从事毒品走私和靠暴力恐吓身边的生意人勒索“街头税”。既然五大家族在巨大的燃油税骗局中热切地利用过俄罗斯黑手党，而且还将“爱尔兰西高地”当成杀手使用过，那么他们通过与新种族暴力团伙勾结来牟利也是有可能的。有些亚洲和俄罗斯罪犯擅长高科技诈骗和洗钱，对频频违犯“科萨·诺斯特拉”禁毒令的黑手党人来说，亚洲人一直是他们一个重要的毒品来源。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跨国勾结的迹象是黑手党与阿尔巴尼亚黑帮的眉来眼去。FBI 的威廉斯称，黑手党扩展了与阿尔巴尼亚帮派的关系，在共同经营毒品、赌博和色情冒险事业方面，以前主要充当帮凶的阿尔巴尼亚人已经取得了对等的地位。

对黑手党的未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纽约市产业整合委员会和类似管理机构的持久性。为防止黑手党重新插足食品批发市场和私营垃圾清运业，这些机构于 20 世纪 90 年代应运而生。在纽约地区，至少有一个被逐出的具有吉诺维斯家族背景的垃圾承运商被发现重新进入了这个行业。依靠胁迫手段，这个黑手党人利用两个“幌子”公司诈骗了客户 200 多万美元。当合法承运商向当局投诉聪明汉们再次诉诸暴力抢夺客户时，他的行迹终于败露了。

背叛者们证实了黑手党在继续渗入货运行业，他们在证词中称，博南诺/马瑟诺家族曾帮助一家与黑手党有牵连的公司攫取了《纽约邮报》的废纸承运合同。在乔·马瑟诺 2003 年被逮捕之前，这名承包商每月都在向这个家族支付 2 500 美元的酬金，而其中大部分都落入了马瑟诺的口袋。

乔·马瑟诺的经历是评估“科萨·诺斯特拉”前景的一个样板。“耳朵”乔最终被打倒，但他有能力用十年的时间使博南诺家族复活成一个日趋繁荣的犯罪集团，这对执法部门来说是个严肃的教训。很有可能，在五大家族里，马瑟诺的克隆者们正在竭力赢得时间，指望趁着调查懈怠之际来恢复元气。“它们想让每个人相信，‘我们快完蛋了，就放过我们吧。’”FBI 特工菲利普·斯卡拉警告称。这些黑手党人无疑会尝试新的办法来摆脱他们前辈的命运。尽管大城市仍然充满着迷人的吸引力，但有迹象表明，黑手党正跟着人口分布的潮流积极地在郊区扩展地盘。在那里，比起联邦和大城市的调查人员来，这些家族遇到的将是准备不足的警察。

历史学家霍华德·阿巴丁斯基称，“有组织犯罪如影随形地追逐着金钱，而郊区有钱也有越来越多的机遇”。纽约、芝加哥和底特律家族已经确立了强大的郊区领地，而且阿巴丁斯基预测还会有新一轮的扩张。“只要黑手党有个关键的核心人物在发挥作用，它们就会找到贪取豪夺的机会，并且总能吸引新的成员。”

2005 年 3 月，黑手党侵害郊区的一个鲜活事例浮出了水面。经过十年的顺利发展之后，甘比诺家族一个以西切斯特县为活动大本营的行动队被打垮了，它的 7 个知名荣誉者和 25 名合伙人被逮捕。据联邦控告书称，这个行动队的不法利润总计达 3 000 万美元，其主要来源是非法赌博，特别是“超级杯”赛事赌博。在这个行动队的总收入当中，还有相当部分是从郊区的建筑与运输公司和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镇一家饭店榨取的保护费。这些被起诉的黑手党人还仿效其大城市同党的惯常手法盗用了工会的养老和福利基金。

这项调查的推动者是个“唐尼·布拉斯科”式的人物。这位 FBI 特工渗入该行动队近三年，其卧底工作导致甘比诺家族后葛提时代的知名新首领们受到了敲诈勒索罪的指控。检控书认定阿诺德·斯奎蒂里（Arnold Squitieri）是代理老板，而安东尼·梅盖尔（Anthony Megale）是代理二老板。或许是黑手党进行地理转移的一种迹象，这两个人生活在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而不是甘比诺家族显贵们以往所喜欢的曼哈顿或其他地区。

黑手党未来的剧变可能是受创家族之间的合并。新泽西执法官员和黑手党权威人

士罗伯特·布奇诺称，合并的设想是该州境内的行动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来的。同一时期，卢切斯家族首脑人物“煤气管”安东尼·卡索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当时他曾考虑要与内斗频仍的科洛博家族整合在一起。这种趋势不乏先例。1931 年，富有远见的卢西亚诺以激进方式将各个独立的派系重新整合成五个稳定的家族。对他那 21 世纪的后辈们来说，解决内部纷争并重新组合成更少却更强大的帮派以提高生存机会的时机或许已经到来。

在再次受到毒品指控之前，主要叛离者“公牛”萨米·格拉瓦诺对黑手党行将终结的预测不屑一顾。“不要自欺其人。‘科萨·诺斯特拉’会回来的，”他写道，“我听说中国人、俄罗斯人要取而代之。相信我吧，他们不可能把付出了我们五六十年，不管多少年心血的東西整合起来。”

黑手党的老对手，前纽约警尉雷默·弗朗西斯切尼，也持以相同的观点。他不相信深谙赌博、高利贷和其他犯罪之道的黑手党会迅速或者静悄悄地灭亡。“过去，还是在西西里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要回到山洞。’他们会返回山洞来保护自己并进行重新整合。我认为黑手党将会那么做。”

对执法部门和整个国家来说，这两个来自冲突双方的极具洞察力的判断理应是个严肃的警告：黑手党身受重创——但并不是致命性的。

附录 A 家系

吉诺维斯家族

1931—1937年：“洛克”查理·卢西亚诺，家族和美国黑手党理事机构“管理委员会”的创立者；1937年以娼妓业组织者的身份被定罪并领刑30年；1946年被驱逐到意大利。

1937—1957年：1957年，在对手维托·吉诺维斯幕后操纵的未遂谋杀当中被子弹擦伤头部之后，“首相”弗兰克·科斯特洛匆忙隐退。

1957—1969年：维托·吉诺维斯取代了科斯特洛，但在1959年被宣判犯有毒品走私罪；1969年，因贩毒罪仍在服刑的他死于狱中。他的名字成了家族的名称。

1970—80年代：80年代初，“眯眼本尼”菲利普·伦巴多因身体状况恶化以家族首领身份引退。为转移外界的注意力和欺骗执法机构，“胖子托尼”安东尼·萨勒诺成了名义上的老板。

1982年至今：“钦”文森特·吉甘特也利用萨勒诺为“幌子”老板，直到胖子托尼1986年被宣判犯有敲诈勒索罪并被处以终身监禁。在1997年和2003年被宣判犯有敲诈勒索罪之前，吉甘特几十年来一直伪装患有精神疾病。按刑期其出狱时间为2012年，届时他将84岁。

博南诺/马瑟诺家族

1931—1964年：约瑟夫·博南诺，家族的创立者和管理委员会的初创成员；1964年因阴谋暗杀敌对教父欲成为黑手党“老板中的老板”遭失败而被迫流亡隐退。

1964—1965年：无教父时期，家族因各派系争夺控制权而陷入了内战。

1975—1979年：“利诺”卡迈恩·加兰特阴谋成为教父，他扩大了毒品交易，并且为扩充自己的派系实力而引进了西西里黑手党人；为阻止他变得过于强大，管理委员会

1979 年下令将其处死。

1980—1991 年：“拉斯提”菲利普·拉斯泰利；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刑后在狱中度过了他的大部分统治期；1991 年死于癌症。

1991—2003 年：“耳朵”约瑟夫·马瑟诺重新将该帮派整合成美国的头号黑手党家族，同时沽名钓誉地更改了家族名称。2004 年受 RICO 指控被定罪后，马瑟诺成为纽约第一个与政府合作的老板；家族未来的领导层状况不明。

卢切斯家族

1931—1951 年：盖塔罗·加利亚诺，现代黑手党诞生时的开山教父之一。他处事低调谨慎，20 年间未曾被捕过。1951 年，盖塔罗因患重病隐退。

1951—1967 年：原二老板“三指汤米·布朗”盖塔罗·卢切斯主政，期间未出现任何反对派，家族遂冠以其名以示敬意。1967 年死于癌症。

1970—1986 年：“鸭子”安东尼奥·科拉罗；在狱中服刑期间担任过 3 年临时代理老板后成为老板。他是个极具实力和影响力的教父，直到 1986 年在管理委员会案审判中被定罪。

1986 年至今：“小维克”维托利奥·阿穆索被任命为老板，二老板“煤气管”安东尼·卡索是事实上与其地位平等（如果说不是更强势的话）的领导者。他们对内部嫌疑敌人的血洗造成许多党徒背叛家族和被政府定罪。阿穆索和卡索分别在 1992 年和 1998 年被判处终身监禁。阿穆索保留了名义上的老板头衔。

甘比诺家族

1931—1951 年：文森特·曼卡诺，隐秘地（事实上不为联邦和地方执法机构所知）领导着早期五大家族中的一个，直到 1951 年失踪。

1951—1957 年：“大刽子手”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谋杀公司”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普遍认为他通过政变杀死曼卡诺夺取了家族统治权。

1957—1976 年：卡洛·甘比诺在策划阿纳斯塔西亚理发店谋杀案后成为老板。1976 年，作为黑手党的超级教父，甘比诺在其权力的巅峰时刻死于心脏病发作。家族以其命名。

1976—1985 年：“大保罗”保罗·卡斯特利亚诺，即甘比诺的妹夫，爬上了家族首领的宝座。卡斯特利亚诺在斯帕克斯牛排屋外被年轻对手约翰·葛提施以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丧命。

1986—2002年：“好汉约翰尼”约翰·葛提成为自阿尔卡彭以来最具知名度的老板。继3次无罪释放之后，他于1992年被宣判犯有敲诈勒索罪和包括杀死卡斯特利亚诺在内的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之后，他于2002年在狱中死于癌症。

2002—2003年：约翰的哥哥彼特·葛提掌管家族，直到2003年被宣判犯有敲诈勒索罪并被处以9年监禁。2004年，被查明阴谋杀害“公牛”萨米·格拉瓦诺而面临终身监禁。

2005年：代理老板阿诺德·斯奎蒂里因RICO罪行被指控。

科洛博家族

1931—1962年：“橄榄油大王”乔·普罗旺斯创建了一个最早的家族。他成了一个百万富翁，但晚年被以“狂人乔伊”约瑟夫·加洛为首的少壮派成员的反叛所困扰，并于1962年死于癌症。

1963—1971年：主要通过卡洛甘比诺的鼎力支持，约瑟夫·科洛博被任命为老板。1971年受到枪击并导致瘫痪后，他的任期被缩短。枪击案发生时，他正在出席一场旨在抗议执法机关对意裔美国人持有所谓偏见的集会。“科洛博”之名成了其家族名称。

1972—1986年：“蛇”卡迈恩·珀西科靠强权控制着家族，直到他1986年在管理委员会案和另一起敲诈勒索案中被定罪。

1987年至今：尽管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但珀西科竭力在监狱里把持家族控制权，直到其子“小好汉阿莱”阿方斯准备继承他的教父之位。珀西科企图创建一个黑手党统治王朝而引发了一场内战。阿方斯2001年被判犯有敲诈勒索罪，这导致其家族出现了权力真空和分裂。2004年，他受到新的谋杀罪指控并被定罪。

附录 B 黑手党老板世系表

卢切斯家族

1931年——布朗克斯黑手党人盖塔罗·加利亚诺成为五大新家族的老板之一。

1951年——身患重病的盖塔罗将家族领导权交给“三指汤米·布朗”盖塔罗·卢切斯，家族遂以后者之名命名。

1967年——卢切斯死于癌症，造成了短暂的领导权真空。

1970年——“鸭子”安东尼奥·科拉罗被任命为老板。

1986年——科拉罗在管理委员会案中被定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1987年——“小维克”维托利奥·阿穆索在“煤气管”安东尼·卡索的帮助下取得了家族控制权。阿穆索拥有老板头衔，但实际权力显然被二老板卡索所把持。

1992年——阿穆索被宣判犯有敲诈勒索罪并被处以终身监禁。

1998年——卡索在对敲诈勒索和多起谋杀指控认罪之后被判处终身监禁。

2004年——代理老板“百吉饼路易”路易斯·戴多恩被宣判犯有谋杀罪。其可能的继任者是“神人”史蒂芬·克雷。

博南诺/马瑟诺家族

1931年——约瑟夫·博南诺经洛克·卢西亚诺授权后领导新的家族。

1964—1966年——博南诺在企图成为管理委员会超级教父未遂后突然消失。两年后重新现身，后来声称他被对手所绑架。

1966—1980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老板进行严格控制，派系林立的权力斗争使家族陷入了混乱状态。

1981年——“拉斯提”菲利普·拉斯泰利被指定为老板。

1981—1991年——拉斯泰利成为有名无实的老板，实际权力被二老板约瑟夫·马瑟

诺所掌握。

1991年——拉斯泰利死于癌症，马瑟诺就任为老板。

1992—2002年——马瑟诺重振家族使之成为美国最强大的黑手党帮派，同时改家族之名为马瑟诺。

2003—2004年——根据诸多背叛者的证词，马瑟诺被逮捕并被宣判犯有敲诈勒索和谋杀罪。

2004—2005年——马瑟诺成为告密者，其家族领导层陷入了混乱状态。

甘比诺家族

1931年——文森特·曼卡诺成为新家族的首任老板。

1951年——曼卡诺失踪，据信被“大刽子手”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所杀。

1951年——阿纳斯塔西亚攫取了老板头衔。

1957年——阿纳斯塔西亚在酒店的理发店里被枪手所杀。

1957年——策划谋杀阿纳斯塔西亚的二老板卡洛·甘比诺成为教父，家族遂以其名命名以示敬意。

1976年——美国最强势的黑手党首领甘比诺自然死亡。

1976年——甘比诺的妹夫“大保罗”保罗·卡斯特利亚诺被加冕为老板。

1985年——卡斯特利亚诺在曼哈顿的饭店外被约·翰葛提指派的谋杀者杀死。

1986年——葛提未遇任何阻力夺取了家族统治权。

1992年——3次无罪释放之后，葛提被宣判犯有敲诈勒索罪并被处以终身监禁。

2002年——仍拥有老板头衔的葛提在监狱里死于癌症。

2002年——葛提的哥哥继任为老板。

2003—2004年——彼特·葛提受到敲诈勒索罪指控。

2005年——代理老板阿诺德·斯奎蒂尔被起诉。可能的继任者为“尼克”尼古拉斯·科罗佐或“乔乔”约翰夫·科罗佐。

卢西亚诺/吉诺维斯家族

1931年——“查理·洛克”塞尔瓦托·卢西亚诺作为首任老板组建了以自己之名命名的家族。

1937年——卢西亚诺以领导“强制性卖淫”组织的罪状被判刑。

1937年——“首相”弗兰克·科斯特洛接替卢西亚诺之位。

1937年——科斯特洛在谋杀未遂案之后“引退”。

1957年——维托·吉诺维斯统治家族。

1959年——吉诺维斯受毒品走私罪指控被定罪。

1969年——“眯眼本尼”菲利普·伦巴多无教父时期之后被任命为老板。

20世纪80年代——伦巴多隐退，“钦”文森特·吉甘特成为教父。

1997—2004年——吉甘特被宣判犯有敲诈勒索罪，后在狱中保留了老板头衔。

获释期：2012年。

可能的继任者：“巴尼”利博里奥·贝洛莫。

普罗旺斯/科洛博家族

1931年——“橄榄油大王”约翰夫·普罗旺斯被指定为老板和管理委员会成员。

1962年——普罗旺斯在“狂人乔伊”约瑟夫·加洛发动叛乱期间死于癌症。

1964年——约瑟夫·科洛博在卡洛·甘比诺的支持下被任命为老板，其帮派名称遂变更为“科洛博家族”。

1971年——科洛博在自己组织的争取意裔美国人民权的集会上被枪击并致瘫痪。

1972—1979年——“蛇”卡迈恩·珀西科的势力控制着家族，他本人在1979年出狱后成了全权教父。

1986年——珀西科在分别进行的两起检控案中被宣判犯有敲诈勒索罪并被处以终身监禁。

1986—2004年——在儿子“小好汉阿莱”阿方斯·珀西科就任老板之前，珀西科竭力在监狱里遥控管理着家族。20世纪90年代初为争夺领导权而爆发的派系战争对家族造成破坏性灾难，导致大批家族成员被定罪，包括珀西科的儿子。

2004年——代理老板“乔·弗利”乔尔·卡卡瑟被宣判犯有谋杀和敲诈勒索罪。

家族领导权悬而未决。



北航

C1638921



家族兴衰、教父更替、谋杀总统、控制工会……合谋与分裂，扩充队伍与清理门户，五大家族翻云覆雨，影响了每个美国人的生活。

记录史上最惊悚、最惨烈的黑手党发迹史，从西西里岛传奇起源到纽约的帮派林立，再现五大家族一百多年的沧桑变迁。

上架建议：历史·纪实

ISBN 978-7-214-06300-7



9 787214 063007 >

定价：58.00 元